絲綢之路文獻敘錄

顧廷龍題

- 政治军事
- 历史地理
- 丝路交通
- 经济贸易
- 文化交流
- 民族宗教
- 语言文字
- 音乐百戏
- 丝路人物
- 丝路考古
- 敦煌文化
- 丝路研究综述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丝绸之路文献叙录

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甘　肃　省　图　书　馆　合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8

主　编：牟实库
编　者：牟实库　易雪梅　刘　瑛

丝绸之路文献叙录
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甘　肃　省　图　书　馆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科技印刷厂印刷　兰州天水路236号
开本：787×1092毫米1/16　印张：41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00千字　印数：1—2,000

ISBN7-311-00225-7/k·28　　定价：16.90元

序　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蚕丝的国家。中国的丝绸早在战国时期就传到西方，成为世界著名的特产而享有盛誉。公元前四、五世纪，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意思是丝国。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去西域的通道，汉与中亚的交通更为畅通，大量的中国丝绸都经这条通道西运，人们就称之为“丝绸之路”，或称“丝路”。

丝绸之路是横贯亚洲的大通道。这条大路的开通，不仅使天山南北地区与内地联为一体，而且使中原同西域以及更远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除了丝绸之外，中国的金属工具和铸铁、凿井技术也传到中亚转输至欧洲；而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蚕豆）、胡麻（芝麻）、胡瓜（黄瓜）、胡蒜（大蒜）、胡桃（核桃）、胡萝卜等植物和汗血马、橐驼，各种珍禽异兽以及毛布、毛毡等各种毛织品，也陆续东来。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然后再向东土传播。因此，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历史和东西方各种经济文化的交流起着重大的作用，深入研究自公元前两世纪以后千余年这条通道的历史，早成为学者们的一项重要的课题。

我注意西北的历史地理，始于三十年代初，当时负笈于燕大学研究院，顾颉刚教授创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九一八事变后，为唤起全民抗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边疆，多刊研究西北历史、地理的论文，我则为学会辑印《边疆丛书》，出版了《西域遗闻》、《敦煌随笔》、《敦煌杂钞》、《哈密志》、《科布多政务总册》等书，使我对西北的历史、文化与中西交通史有所认识。嗣后颉刚教授为研究《尚书》文字之演变，邀我相助，我遂致力于敦煌本《尚书》之搜集，从而得知敦煌石窟蕴藏的丰富，然很多珍贵资料流散海外，虽专心访求，有若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而已。我对敦煌之学既经粗涉范篱，向往之情，时萦梦寐。抗战中，我于1939年应叶景葵、张元济两先生之邀，到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从事历史文献的搜集与保存，每见有关西北之书刊，力谋采集，所获虽不甚富，而搜集之念未尝一日忘怀，经数十年之积累，有关此学的基本图籍，大致具备，可供东南地区研究者的参考。

1988年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稿会在甘肃省图书馆举行，我始有幸一访丝绸之路东侧之河西走廊，历经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而至敦煌。所到之处，古迹众多，文物简牍出土繁富、一入博物馆，图书馆，令人留连忘返。莫高窟中的塑像壁画，精美绝伦，使我叹为观止，有谓“敦煌是丝路上的一颗明珠”“丝路学为当今世界之显学”，信非虚语。五十多年前，我就有一访敦煌之志，但无机遇而常引为憾事，不意衰年得偿宿愿，快慰奚似！

建国后，甘肃省图书馆以西北地方文献的搜集编辑为重点，其远见卓识，令人钦佩！我常谓编辑各种专题资料索引是省、市以上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图书馆收藏的各种专门图书资料，只有编制了各种专门的资料索引，才能为广大的科研工作者所充分利用，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真正发挥图书馆的效用。但要做好这项工作，却非轻而易举，除了丰富的收藏这个物质条件外，对编辑者的素质又有很高的要求：一是要对专题有较全面的了解和相当丰富的知识。二是要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私忘我的精神。三是要有兀兀穷年，不懈地探索追求的毅力。近时有许多人轻视目录索引工作，不知目录的排比类次，其繁重并不亚于论著的撰述。索引目录之业，造福于专家学者，推进科学文化之发展，实为一种隐而不显的潜在的功能，看不见，摸不着，因此不易为人们所了解和重视。但它推进科学文化事业又确实存在着。因此，我希望大家能了解它，重视它，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

牟实库、易雪梅等同志纂辑的《丝绸之路文献叙录》，我得先睹其总目与说明，其内容不仅著明篇名、作者、刊名、卷期，而且也有他们博览诸文后所作的叙录，这些提纲挈领的扼要叙述，使读者能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按图索骥、探骊得珠，节省许多人寻找的时间。这真是少数人出力，多数人受惠，功德无量的好事。我深信此书出版后，专家学者必将得到很大的方便，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将起有力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今年恭值建国四十周年，举国欢腾，为改革开放，学术交流皆有所参考。图书馆工作者成兹一编以为国庆献礼，有很大的纪念意义。因此，牟、易等同志来信要我为此书作序，我就忘其耄荒，谈了一些感想和不成熟的看法，希望编者读者有以教之。

顾廷龙

一九八九年五月于北京之北苑时年八十有六

序　二

丝绸之路是我国丝绸文化闯开的一条中西通道，它的起点是长安，穿过河西走廊至敦煌、分南北路，出玉门关沿北路经车师前王庭、龟兹、疏勒等地越葱岭，经中亚、西亚到罗马；出阳关沿南路经楼兰、于阗等地越葱岭再经大月氏、安息到罗马，全长七千多公里。我国的丝绸便沿着这条路传入欧洲。丝绸是我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结晶，西方人视为“无价之宝”，安息与罗马的战争中，安息人以鲜艳夺目的中国丝绸作军旗，致使罗马兵团眼花瞭乱而败北。罗马皇帝凯撒在胜利后祝捷时，赐给凯旋归来的将军以绚丽的中国丝绸，使人们惊讶赞叹。罗马妇女争购中国的锦绣纹绮作衣服。不到半个世纪，中国丝绸席卷欧洲，很快就渗透到人民生活中了。

如果把丝绸之路从长安向东延伸，经沿海口岸东渡日本，那么万里丝路象一条无形的文化大运河，把东方和西方全线沟通。丝路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放出了灿烂的光辉。

丝路繁荣已成过去，然而沿着丝绸之路却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迹：古城、古墓、长城、寺院和石窟。特别是从敦煌石窟和吐鲁番坟墓中发现的数万件文献，牵涉到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等许多国家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因而，震惊世界学坛，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

众所周知，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当今世界学术上一个热门，东西方都有许多国家的学者在探讨。在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必然会带来民族兴旺和国家富强。我国汉唐时代就是最明显的例证。探讨丝路文化兴衰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对外开放、文化交流是有启迪作用的。

《丝绸之路文献叙录》一书正是为研究丝路文化提供过去的研究成果和系统参考资料的专著，虽然限于国内发表的文章和馆藏文献，但耗时十年，搜集了764篇论文，其中既有已故专家如向达、贺昌群、黄文弼、冯承均等的著作，也有健在的专家如季羡林、唐长儒、任继愈、张广达、黄盛璋、姜伯勤等的论文，还有很多是长期工作在丝绸之路上的专家。除了国内专家，也还有个别日、德、英、美、意、荷、苏诸国学者论著的译文。论文分为十二个大类：政治军事、历史地理、丝绸交通、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百戏、丝路人物、丝路考古、敦煌文化、丝路研究综述等，每类又包括多种专题，每篇论文都有叙录，介绍其内容、观点和学术成果，共写叙录百万余言，堪称洋洋大观。到目前为止，它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的丝路文献叙录专著，这对国内外丝路文化的研究者来说，是一部重要的资料工具书，对丝路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必将产生积极地促进作用。

段文杰

一九八九年四月于敦煌研究院

出版说明

一、丝绸之路闪烁着中西人民的友谊和智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曾起过重大作用。自上世纪末，“丝路”之说创立以来，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至今方兴未艾，为国际上之显学。为了帮助从事“丝路学”研究工作者查找前人研究成果，并对有志于“丝路学”研究的中青年同志提供这方面的文献资源，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和甘肃省图书馆联合编辑了《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简称《叙录》）。

二、《叙录》是一部研究丝绸之路较完备的参考工具书，收录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至1986年底，有关丝绸之路的调查报告、考古发掘及学术论著等方面的文献764篇，写成百万字的叙录。它反映了七十余年来我国“丝路学”研究成果和水平，对历史学研究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叙录》根据所收文献分为十二大类，对每篇文献的内容、观点，同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以及部分作者的生平事迹都作了简要介绍。为便于读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检索，书后还编有文献主题索引。

四、《叙录》对有些学者早年发表的丝绸之路研究论著，1980年以前又汇辑成专书出版者，一般不再收录。

五、《叙录》所收文献，均源于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中文新旧报刊。由于该馆报刊收藏有限，更兼编者学识水平的关系，遗漏和舛讹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原文作者批评指正。

1989年1月

目　录

一、政治军事

（一）丝路开拓与经营

001　建郡前的河西走廊 ……………………………………武守志（ 1 ）
002　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 ……………………………刘光华（ 2 ）
003　试述西汉对河西的开发 ………………………………翟宛华（ 2 ）
004　汉武经略河西考 ………………………………………缪凤林（ 3 ）
005　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 ………………………刘光华（ 4 ）
006　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 ……………………………张维华（ 5 ）
007　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 …………………………王宗维（ 6 ）
008　西汉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考 ……………………………周振鹏（ 6 ）
009　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 ………………谷　苞（ 7 ）
010　建郡后的汉代河西 ……………………………………刘光华（ 7 ）
011　东汉凉州之疆域及人口之密度
　　　——并论河西四郡对文化之贡献…………………刘仁成（ 8 ）
012　古敦煌郡沿革及其遗迹 ………………………………陈希夷（ 8 ）
013　敦煌沿革与人口 ………………………………………齐陈骏（ 9 ）
014　汉代的敦煌郡 ……………………………吴礽骧　余　尧（ 10 ）
015　汉代的属国 ……………………………………………王宗维（ 11 ）
016　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 ……孟　池（ 11 ）
017　前汉西域经略 …………………………………………丁国藩（ 12 ）
018　西汉西域都护所辖诸国考 ……………………………周振鹤（ 13 ）
019　汉代西域都护府的由来
　　　——兼谈郑吉的历史功绩…………………………贾应逸（ 13 ）
020　试论西域戊己校尉 ……………………………………侯　灿（ 14 ）
021　汉晋时期的西域戊己校尉 ……………………………侯　灿（ 15 ）
022　西汉时期西域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情况
　　　——《汉书·西域传》研究…………………………钱伯泉（ 16 ）
023　东汉后期至北魏对西域的管辖 ………………………苏治光（ 17 ）
024　论汉代乌孙对伊犁河流域的开发
　　　——关于汉代乌孙族人口发展问题的研究………王明哲（ 18 ）
025　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 ……………………韩儒林（ 19 ）
026　两汉在西域屯田论述 …………………………………彭慧敏（ 20 ）
027　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 ………………………………李古寅（ 20 ）

028 西汉敦煌军屯的几个问题 ……………………………………徐乐尧 余贤杰（ 21 ）
029 汉代河西军屯劳动者成份和生产状况 ……………………………………李古寅（ 22 ）
030 西汉屯田与"丝绸之路" ……………………………………张荣芳（ 23 ）
031 KHROH（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
…………………………………（匈）乌 瑞著 荣新江译（ 24 ）
032 隋朝对于西北之开发与经营 ……………………………………李松伍（ 25 ）
033 略论隋朝对丝路的经营 ……………………………………陆庆夫（ 25 ）
034 唐代对西域的开拓和经营 ……………………………………章伯锋（ 26 ）
035 唐代都护府述略 ……………………………………唐启淮（ 27 ）
036 安西都护府治西州境内时期的都护及年代考 ……………………………………柳洪亮（ 28 ）
037 评《新唐书・地理志》关于安西都护府记载 ……………………………………胡树杞（ 28 ）
038 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北庭节度使留后问题 ……………………………………唐长孺（ 29 ）
039 辽对西北路的经营 ……………………（日）长泽和俊著 陈俊谋译（ 30 ）
040 汉武帝的西域节团 ……………………………………张德光（ 30 ）
041 吐谷浑遣使考 ……………………（日）松田寿男著 周伟洲译（ 31 ）
042 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 ……………………………………杨宪益（ 32 ）
043 论西汉与乌孙的和亲 ……………………………………翟宛华（ 32 ）
044 试论唐代的和亲政策 ……………………………………任崇岳（ 33 ）
045 唐代真公主与回纥的和亲 ……………………………………刘美崧（ 34 ）
046 四方万国 回纥最亲
——略论唐朝与回纥的和亲……………………………………鲁 琎（ 35 ）
047 唐代的公验与过所 ……………………………………程喜霖（ 36 ）
048 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 ……………………………………王仲荦（ 36 ）
049 "支那"一词起源质疑 ……………………………………汶 江（ 37 ）
050 支那名号原音证 ……………………………………李志敏（ 38 ）
051 明代高昌馆来文及其历史价值初探 ……………………………………胡振华 黄润华（ 39 ）

（二）军事活动

052 试论汉匈之争的初期战略及在西域的对抗 ……………………刘锡淦 陈良伟 尚衍武（ 39 ）
053 论汉伐大宛和汉朝的西方政策 ……………………………………李开元（ 40 ）
054 关于高车副伏罗部起义西迁的背景与时间问题 ……………………………………段连勤（ 41 ）
055 论"凉州之乱" ……………………………………施光明（ 41 ）
056 六世纪下半叶突厥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原因探讨 ……………………………………芮传明（ 42 ）
057 唐代河西陇右的战略地位 ……………………………………钮海燕（ 43 ）
058 唐太宗平定高昌的历史意义 ……………………………………王 谖（ 44 ）
059 唐代前期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唐安西四镇的弃置 ……………………………………郭 锋（ 45 ）
060 究竟是回鹘还是吐蕃在公元789—792年间夺据了别失八里？
……………………………………（日）森安孝夫著 罗贤佑译（ 46 ）
061 唐开元二年西州府兵
——"西州营"赴陇西御吐蕃始末……………………………………朱 雷（ 47 ）
062 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 ……………………………………陈国灿（ 47 ）
063 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 ……………………………………齐陈骏（ 48 ）

064 唐末沙州（敦煌）张议潮的起义 ……金启综（49）
065 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 ……姜伯勤（49）
066 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 ……唐长孺（50）
067 唐代回鹘控制北庭的过程 ……孟凡人（52）
068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之二
——唐代烽铺的管理 ……程喜霖（53）
069 哈刺契丹的军事组织 ……（苏）皮科夫著 冯继钦译 龙体聪校（54）
070 马可波罗记叙的元初两起叛乱考释 ……余士雄（54）

（三）国家关系

071 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 ……吕振羽（55）
072 "凿空"前西域同内地的联系 ……朱振杰（56）
073 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 ……王炳华（57）
074 两汉时期西域与祖国的关系 ……刘慧琪（57）
075 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王宗维（58）
076 河西诸凉王朝与西域
——论魏晋末至北魏初我国西疆的行政主权 ……薛宗正（59）
077 北魏与西域 ……马荣国（60）
078 魏晋时代之塔里木盆地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翦伯赞（61）
079 李世民与少数民族 ……陈金陵（61）
080 唐代内地与新疆的关系 ……陈全方（62）
081 岑参边塞诗和唐代的中西交往 ……柴剑虹（63）
082 释桃花石（Taugas）……岑仲勉（64）
083 桃花石和回纥国 ……章 巽（64）
084 唐代厌可汗考 ……罗一之（65）
085 突厥以后、蒙古以前——过渡时期的中亚汗国
——《草原帝国史》选译……（美）路克·关顿著 赵 结译（66）
086 明朝的西域关系 ……赵俪生（67）
087 明代蒙古与西域关系述略 ……白翠琴（68）
088 明初帖木耳帝国和中国的关系 ……陈生玺（68）
089 明代瓦剌与西域 ……马曼丽（69）
090 1759——1820年清与浩罕的关系 ……潘志平（70）
091 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朱杰勤（71）
092 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 ……周谷城（71）
093 公元第十到第十五世纪中国同中亚的关系 ……王治来（72）
094 十五世纪初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关系 ……郑鹤声（73）
095 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 ……马 雍（74）
096 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 ……齐思和（75）
097 中古时期中印人民的友好交往 ……黄道立（76）
098 中巴友谊的历史 ……夏 鼐（77）
099 "丝路之路"与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交往 ……张铁伟（78）
100 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 ……朱杰勤（79）

101 萨珊朝波斯 ……………………………………………………………………周谷城（ 79 ）
102 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 ……………………………………冯家升（ 80 ）
103 中国与阿拉伯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 ………………………………………马 坚（ 81 ）
104 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关系 …………………（叙利亚）卡米勒尔·雅德（ 82 ）
105 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 …………………………………………纳 忠（ 83 ）
106 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深厚友谊 ………………………………………周一良（ 84 ）
107 中国和阿曼历史上的友好往来 ……………………………………………沈福伟（ 84 ）
108 汉唐时期中国与狮子国的关系 ……………………………………………许道勋（ 85 ）
109 东汉和贵霜关系史上的两个问题 …………………………………………莫任南（ 86 ）
110 汉代的中国与埃及 …………………………………………………………孙毓棠（ 87 ）
111 成吉思汗和中亚 ……………………………………………………………王治来（ 88 ）

二、历史地理

（一）西域各国历史

112 西北史概述 ……………………………………………………………………杜光简（ 90 ）
113 中亚历史与文明研究概论 ……………………………（法）韩伯诗著 耿 升译（ 90 ）
114 《中亚历史和文明》第一、二章摘要 ……………（法）韩伯诗主编 耿 升摘译（ 91 ）
115 关于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中亚历史研究之现状 ………（日）森安孝夫著 陈俊谋译（ 92 ）
116 阿拉伯和波斯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史料 …………（英）唐·丹·莱斯利著 陈海龙译（ 92 ）
117 丝绸之路上两大国——伊朗和中国历史的比较 ……………………………赵俪生（ 93 ）
118 盛唐诗歌中之河西走廊及西域 ………………………………………………朱 稧（ 94 ）
119 公元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 ……………………………陈守忠（ 95 ）
120 西夏时期河西历史概述 ……………………（日）中岛敏著 王 钺、汤开建译（ 96 ）
121 前凉年号新考辨 ………………………………………………………………侯 灿（ 96 ）
122 秃发南凉始末 …………………………………………………………………赵向群（ 97 ）
123 沮渠北凉略论 …………………………………………………………………林 干（ 98 ）
124 西域见闻琐记 …………………………………………………………………向 达（ 98 ）
125 新疆 ……………………………………………………………………………何观洲（ 99 ）
126 西域、新疆与新疆省 …………………………………………………………齐清顺（ 99 ）
127 我国历史上的帕米尔 …………………………………………………………黄盛璋（ 100 ）
128 《汉书·西域传》的研究
——以呼尔斯威和岑仲勉两人最近成果为中心（节译）
…………………………………………………………………（日）榎一雄著 袁 林译（ 101 ）
129 拘弥国考 ……………………………………………………（日）长泽和俊著 李步嘉译（ 101 ）
130 于阗国考 ……………………………………………………（日）掘谦德著 纪 彬译（ 102 ）
131 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 ……………………………张广达 荣新江（ 103 ）
132 藏文文献中的若干古于阗史料 ………………………………………………巴桑旺堆（ 103 ）
133 车师后部史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孟凡人（ 104 ）
134 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 …………………………………………吴 震（ 104 ）
135 突厥初世史探幽 ………………………………………………………………薛宗正（ 105 ）
136 突厥研究史概述 ……………………………（德）K·H·孟格斯著 李坚尚译（ 106 ）
137 突厥勃兴史论 ………………………………………………（日）松田寿南著 樊 圃译（ 107 ）

138　论突厥汉国的分裂……刘锡淦（108）
139　东突厥汗国的政治结构……薛宗正（108）
140　略论西突厥史中的若干问题……林　干（109）
141　阿波可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创造者
　　——兼论突厥汗国的分裂与西突厥汗国的形成……王　谖（110）
142　关于西突厥与西突厥汗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
　　——兼与王谖同志商榷……段连勤（111）
143　突厥和隋王朝的关系试探……臧　嵘（112）
144　论西突厥部族与隋唐王朝的关系……陈国灿（113）
145　西突厥开国史考辨
　　——兼评沙畹说和王谖说……薛宗正（113）
146　西突厥纪事……林　干（114）
147　试解突厥泥利之谜……刘锡淦（115）
148　突骑施汗国的兴亡……薛宗正（116）
149　于阗尉迟王家世系考述……殷　晴（117）
150　藏文古籍所述于阗王谱系迄始年代研究……林梅村（117）
151　关于于阗政权与喀剌汗王朝关系的探讨……汤开建　王叔凯（118）
152　论回纥汗国……刘志霄（119）
153　回纥的兴起及其和唐朝的关系……程溯洛（120）
154　回鹘西迁路线新探……阿合买提江·艾海提（121）
155　从回鹘西迁到黑汗王朝……王小甫（121）
156　古高昌国历史略述……黄文弼（122）
157　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侯　灿（123）
158　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马　雍（124）
159　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唐长孺（125）
160　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程溯洛（126）
161　高昌回鹘王国（公元850年——1250年）……（德）葛玛丽著　耿世民译（127）
162　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段连勤（127）
163　从两件敦煌文书看河西回鹘……高自厚（128）
164　敦煌遗书P2992号卷《沙州上甘州回鹘可汗状》有关问题考……孙修身（129）
165　回鹘与敦煌……（日）森安孝夫著　高　然译（129）
166　新复州回鹘研究……钱伯泉（130）
167　唐代吐蕃在新疆的活动及其影响……马国荣（131）
168　新疆藏文简牍考述及释例……王　尧（131）
169　吐蕃在敦煌统治形态的变迁（摘译）……（日）山口瑞凤著　朴宽哲译（132）
170　关于喀喇汗王朝若干有争论的问题……（德）O．普里查克著　魏良弢译（133）
171　喀喇汗王朝政治史述略……魏良弢（134）
172　喀喇汗王朝的疆域及其境内民族……魏良弢（135）
173　论两个喀喇汗朝……（苏）达维多维奇著　徐均平译（136）
174　哈拉汗朝历史简述……耿世民（136）
175　西辽政治史稿……魏良弢（137）
176　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周良霄（138）

177 试论耶律大石西迁的原因……纪宗安（139）
178 西辽疆域浅释……邓锐龄（140）
179 关于“后西辽”……王治来（141）
180 贵霜王朝的形成……阎宗临（142）
181 哌哒国在中亚的统治……苏北海（142）
182 《魏书·哌哒传》考释……余太山（143）
183 哌哒史二题……余太山（144）
184 关于哌哒的覆亡……余太山（145）
185 粟特国考……宪 益（146）
186 《魏书·粟特国传》辨考……余太山（146）
187 《魏书》粟特不是俄粟特……肖之兴（147）
188 论吐火罗……王斐烈（148）
189 吐火罗论……杨建新（149）
190 吐火罗国史考……（日）内田吟风著 斯英琦 徐文堪译（150）
191 察合台汗国初探……刘志霄（151）
192 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陈连庆（152）

（二）丝路重镇

193 汉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之演进……贺昌群（153）
194 汉代令居塞的地理位置……王宗维（153）
195 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价……顾颉刚（154）
196 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马 雍（155）
197 两关遗址考……劳 干（155）
198 玉门位置辨……方诗铭（156）
199 玉门关与玉门县……陈梦家（157）
200 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来源……张维华（157）
201 锁阳城杂考……陆庆夫（158）
202 汉魏时期的敦煌……（日）榎一雄著 徐秀灵译 陈国灿校（159）
203 元代的敦煌……（日）大岛立子著 高 然译（159）
204 误传的中国古王城与其水力利用……岑仲勉（161）
205 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黄盛璋 方 永（162）
206 吐谷浑的诸根据地……（日）佐藤长著 王丰才编译 芈一之校订（163）
207 西域辨正……杨建新（164）
208 西域地名考……苏北海（165）
209 《魏书》本纪中地望不详西域诸国考略……陈连庆（166）
210《水经注》和《法显传》
——纪念顾颉刚先生（1893——1980）……章 巽（166）
211 唐写本地志残卷浅考……薛英群 徐乐尧（168）
212 唐代西域诗句释地……刘维钧（168）
213 岑参“西征”诗地名探讨……刘 满（169）
214 岑参西域之行及其边塞诗中对唐代西域情况的反映……卢 苇（170）
215 葱岭……肖之兴（171）

216 疏勒名称考……苏北海（171）
217 SERES为疏勒说……钱伯泉（172）
218 喀什噶尔的历史变迁……田卫疆（173）
219 古代于阗的西城和东城
——于阗古都及绿洲变迁的探索……殷　晴（174）
220 于阗媲摩城、坎城两地考……孙修身（175）
221 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史树青（176）
222 新疆出土佉卢文简书内容的考释与分析……赵俪生（176）
223 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
——兼论楼兰遗址和魏晋时期的鄯善郡……马　雍（177）
224 沙漠古国——楼兰考察记……穆舜英（178）
225 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侯　灿（179）
226 楼兰古城历史地理若干问题探讨……陈汝国（180）
227 楼兰鄯善问题……冯承钧（181）
228 从考古考察与调查论楼兰城市的发展及其环境变迁……侯　灿（181）
229 北魏鄯善镇、焉耆镇考……苗普生（182）
230 焉耆尉犁危须都城考……陈　戈（183）
231 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
——博格达沁古城调查……韩　翔（183）
232 古焉耆、尉犁国都及四十里城东旧城考……陈可畏（184）
233 库车县古遗址简介……梁志祥（185）
234 略述龟兹都城问题……黄文弼（186）
235 《大唐西域记》中的飒货逻、折摩驮那、纳缚波故国考……王北辰（187）
236 高昌麹氏王国郡城考述……侯　灿（188）
237 高昌疆域郡城考……黄文弼（189）
238 吐鲁番的高昌故城……阎文儒（189）
239 高昌王国行政地理区划初探……郑炳林（190）
240 唐安西四镇考……张建侯（191）
341 碎叶是中国唐代西部重镇
——驳苏联所谓中国西部边境"从没有到过巴尔哈什湖"的谬论……卫　江（191）
242 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殷孟伦（192）
243 李白的故乡——碎叶……马国荣（193）
244 从吐鲁番出土"氾德达告身"谈唐碎叶镇城……吴　震（194）
245 唐碎叶建置诠索……薛宗正（194）
246 碎叶城今地考……张广达（195）
247 铁门关考……刘　侃（196）
248 铁门关、铁门谷和遮留谷……陈　戈（197）
249 唐代"轮台"初探……林必成（167）
250 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钱伯泉（198）
251 唐轮台名实核正……薛宗正（199）
252 唐轮台位置续考……钱伯泉（199）
253 轮台和乌鲁木齐……刘维钧（200）

254 北庭故城与北庭大都护府……………………………………………………………薛宗正（200）
255 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中科院考古所新疆工作队（201）
256 天山脚下的历史名城——北庭……………………………………………………王秉诚（202）
257 关于唐代庭州的几个问题…………………………………………………………鲁才全（203）
258 关于庭州的位置……………………………………（日）长泽和俊著 陈俊谋译（203）
259 唐蒲类诂名稽址
——庭州领县考之二……………………………………………………………薛宗正（204）
260 别失八里（五城）名义考实………………………………………………………陈 戈（205）
261 论别失八里……………………………………………………………………………孟凡人（205）
262 弓月城和阿力麻里城方位考………………………………………………………孟凡人（206）
263 弓月城及双河位置考………………………………………………………………易漫白（207）
264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黄文弼（207）
265 略论可汗浮图城………………………………………………………………………孟凡人（208）
266 唐代西域裴罗将军城考……………………………………………………………周连宽（209）
267 裴罗将军城考…………………………………………………………………………王叔凯（210）
268 中亚地名考略三则……………………………………………………………………刘 伉（211）
269 有价值的中亚地名文献…………………………（苏）哈萨诺夫著 牛汝辰译（212）
270 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张广达（212）
271 安息与乌弋山离
——读《汉书·西域传》札记之一……………………………………………孙毓棠（214）
272 条支
——读《汉书·西域传》札记之二……………………………………………孙毓棠（215）
273 中亚条支、条支海考…………………………………………………………………苏北海（215）
274 条支、犁轩、大秦和有关西域地理………………………………………………余太山（216）
275 唐代"条支"地望质疑………………………………………………………………朱 方（217）
276 《魏书》本纪中所见印巴次大陆诸国考实………………………………………陈连庆（218）
277 唆里迷考…………………………………………………………………耿世民 张广达（218）
278 从大宛到浩罕的疆域问题…………………………………………………………苏北海（219）
279 浩罕属于古代中国……………………………………………………屈振华 秦 江（220）

三、丝路交通

280 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裴文中（221）
281 西北交通之史的研究…………………………………………………………………姚玄华（222）
282 西域交通之历史的观察……………………………………………………………周谷城（222）
283 历代西疆路程简疏……………………………………………………………………岑仲勉（223）
284 从《穆天子传》和西罗多德《历史》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西交通…………莫任南（223）
285 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
——《穆天子传》的研究………………………………………………………钱伯泉（224）
286 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开通……………………………………………………………卢 苇（225）
287 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王宗维（226）
288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张春树（226）
289 汉代的西域交通………………………………………………………………………郜 英（227）

290 汉朝西域路线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王宗维（227）
291 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黄文弼（228）
292 丝绸之路概述………………………………………………………………………孙培良（228）
293 丝绸之路初探………………………………………………………………………贾应逸（229）
294 《丝绸之路》…………………………（瑞典）斯文赫定著 安应民译 胡清华校（230）
295 丝路考察纪略………………………………………………………………………齐陈骏（230）
296 汉代对西域交通与中国文化之影响………………………………………………陈安仁（232）
297 汉代祁连山路考述…………………………………………………………………王宗维（232）
298 古代居延道路………………………………………………………………………王北辰（233）
299 丝绸之路东段述略…………………………………………………………………杨建新（234）
300 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鲜肖威（235）
301 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
——兼与鲜肖威同志商榷………………………………………………吴礽骧（236）
302 西夏时代河西南北交通路线……………………（日）西田龙雄著 张鉴衡 陈宗祥译（237）
303 丝绸之路在青海……………………………………………………………………张得祖（238）
304 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初师宾（239）
305 也谈“羌中道”……………………………………………………………………吴礽骧（240）
306 丝绸之路东段的另一支线——青海路……………………………………………周伟洲（241）
307 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冯汉镛（241）
308 自汉至唐的草原丝绸之路…………………………………………………………苏北海（242）
309 宁夏境内的“丝绸之路”
——兼论唐长安、凉州北道的驿程及其走向…………………………鲁人勇（243）
310 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黄文弼（244）
311 古代西域南道上的若干地理问题…………………………………………………王北辰（246）
312 “丝绸之路”南道中我国境内帕米尔路段调查……………………………………王炳华（247）
313 试论唐贞观年间所开的大碛路
——兼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郑炳林（247）
314 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
——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孔祥星（248）
315 丝绸之路和古代于阗………………………………………………………………殷 晴（249）
316 关于汉代“丝绸之路”中段路线问题
——与李约瑟、齐思和等专家商榷……………………………………莫任南（250）
317 汉唐时代中西交通概述……………………………………………………………步 履（251）
318 丝绸之路——汉唐时期中西陆路交通……………………………………………赵永复（252）
319 龙门所见中外交通史料初探………………………………………………………温玉成（252）
320 伊斯兰教产生前香料之路的变迁…………………………………………………安维华（253）
321 中印交通的演变……………………………………………………………………郭廷以（254）
322 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范祥雍（254）
323 粟特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自公元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芮传明（256）
324 关于玄奘从跋禄迦国至赭时国的一段行程………………………………………周连宽（257）
325 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黄盛璋（258）
326 《西天路竟》笺证…………………………………………………………………黄盛璋（258）

四、经济贸易

327 古代西北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贡献……刘锡淦（260）
328 中国丝绢西传考……姚宝猷（260）
329 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季羡林（261）
330 华丝传入欧洲考……朱杰勤（262）
331 两汉与罗马丝贸易考……龚 骏（263）
332 上古时期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莫任南（264）
333 汉代丝绸贸易考……（荷）胡四维著 耿 升译（265）
334 河西四郡新农业区的开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关键……谷 苞（266）
335 河西走廊对沟通中西商务之贡献……萧静安（266）
336 曹魏时期河西经济恢复原因浅析……陆庆夫（267）
337 五凉时期的河西经济
——兼论汉代河西开发的历史趋势……武守志（268）
338 论唐初河陇地区经济的繁荣……黄新亚（269）
339 论唐代河陇地区经济的发展……梁 勤（269）
340 甘州回鹘与中西贸易……高自厚（270）
341 历史上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新疆商业志编辑室（271）
342 古代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商业往来……徐伯夫（272）
343 汉代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马国荣（273）
344 唐代"丝绸之路"上的纺织品贸易中心西州
——吐鲁番文书研究……孔祥星（274）
345 略述唐朝对西域的商业贸易管理……雷学华（275）
346 唐代中原与西域间的商业贸易关系……雷学华（275）
347 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
——唐代马价绢新探……马骏民（276）
348 唐与回纥经济往来述论……崔德明（277）
349 回鹘与丝绸之路……樊保良（278）
350 突厥诸民族在中国的贸易活动……陈庆隆（279）
351 王延德行记与天山硇砂……张承志（279）
352 西夏社会经济及其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地位……白振声（280）
353 元代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白 钢（281）
354 元代色目人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贡献……匡 晔（282）
355 古代维、汉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玉素甫·丁（283）
356 从经济方面看中亚研究史……（日）山本光郎著 姜镇庆译（284）
357 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王冀青（285）
358 中古时期中国与乌孜别克斯坦的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关系……郭庆昌（285）
359 中世纪时期阿塞拜疆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苏）寇 瑟著 君 石译（286）
360 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乌廷玉（287）
361 结绿和埃及宝石贸易……沈福伟（288）
362 从大黄、茶叶贸易看十五世纪后的中亚交通……潘志平（289）

五、文化交流

363 上古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齐思和（291）
364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阎宗临（291）
365 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日）长泽和俊著 张英莉译（292）
366 少数民族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齐思和（293）
367 关于《大唐西域记》……季羡林（294）
368 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王明哲（295）
369 丝路掇琐……刘铭恕（295）
370 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汪宁生（296）
371 汉唐间西域之交通及其文化……常任侠（297）
372 略论十六国时期凉州地区的文化教育……施光明（297）
373 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黎尚诚（298）
374 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张广达（299）
375 成吉思汗与塔塔统阿
——兼谈历史上的蒙维文化交流……樊保良（300）
376 由考古学上所见到的新疆在文化上的地位……黄文弼（300）
377 新疆在东西文化上的估价……吴蔼宸（301）
378 养蚕织绸的技术是怎样由内地传入新疆的……谷 苞（301）
379 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贾应逸（302）
380 试论我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石声汉（303）
381 葡萄考……谭少惠（304）
382 葡萄、葡萄酒传入我国的考证……张玉忠（304）
383 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胡 澍（305）
384 棉花、瓜果、蔬菜及其他
——古代西域和内地农作物的交流……谷 苞（306）
385 新疆的坎儿井……王鹤亭（306）
386 新疆省坎井来源析疑……张之毅（307）
387 新疆坎儿井的来源及其发展……黄盛璋（307）
388 关于石窟寺艺术和它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阎文儒（308）
389 龟兹壁画的人体画法……曷 谛（309）
390 古代和田派美术初探……王冀青（309）
391 克孜尔石窟壁画画法综考
——兼谈西域文化的性质……吴 焯（310）
392 谈丝路石窟壁画中的荷花形象……陈履生（311）
393 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杨 泓（312）
394 西域绘画所见服装的研究……（日）原田淑人著（313）
395 中国纸的发明……傅振伦（313）
396 新疆出土古纸研究
——中国古代造纸技术史专题研究之二……潘吉星（314）
397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季羡林（315）
398 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黄盛璋（316）

399 纸张和印刷术在新疆的传播……………………………………………………徐伯夫(317)
400 印刷术的发明和演进……………………………………………………………张怀礼(318)
401 我对张骞出使西域与药物输入的看法…………………………………………宋向元(319)
402 中国古代金丹术的医药化学特征及其方术的西传…………(英)李约瑟著 韩怡凡译(319)
403 中央亚细亚出土的本草集注残简文献学的研究
……………………………………………………(日)渡边幸三著 储天任译(321)
404 中印文化交流……………………………………………………………………季羡林(321)
405 中印文化的交流…………………………………………………………………常任侠(322)
406 略论印度龙与中国龙的关系……………………………………………………胡同庆(323)
407 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黄盛璋(324)
408 中印历史上的医药关系…………………………………………………………刘成基(325)
409 汉魏南北朝从国外传入的医药文化……………………………………………陆曼炎(325)
410 宋代以前的外来药物及其在方剂中的应用……………………………………穆德全(326)
411 中国和阿拉伯的医药交流………………………………………………………宋大仁(327)
412 对宋大仁先生《中国与阿拉伯的医药交流》一文的意见………………………郭庆昌(328)
413 中外医药交流的一些史实………………………………………………………耿鉴庭(328)
414 火药的发现及其传入欧洲的经过………………………………………………冯家升(329)
415 火药的发明、发展和西传………………………………………………………冯家升(330)
416 蒙古西征用过火药吗……………………………………………………………冯家升(331)
417 中国丝绢的输出与西方的"野蚕丝"…………………………………戴 禾 张英莉(332)
418 唐代中国和亚洲各族的文化交流………………………………………………方 循(333)
419 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魏良弢(333)
420 古丝路道旁的中亚艺术…………………………………………………………唐恒亮译(334)
421 中国画法的西渐与伊朗细画……………………………………………………孙培良(335)
422 中国艺术对回教艺术的影响
…………………………………(埃及)Dreaky Mohammed Hassan著 马继高译(336)
423 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夏 鼐(336)
424 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陈竺同(337)
425 七曜历的起源
——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刘世楷(338)

六、民族宗教

(一)民 族

426 商周秦汉时期甘肃境内的氐羌月氏和乌孙……………………………………曹怀玉(340)
427 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及其分布……………………………………………王宗维(340)
428 关于匈奴人在河西走廊地区活动的几个问题…………………………………白凤岐(341)
429 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和匈奴及河西四郡的设置……………………………潘 策(342)
430 郁夷、大月氏的来源和迁徙……………………………………………………何光岳(343)
431 小月氏和尉迟氏……………………………(日)榎一雄著 斯英琦 徐文堪译(344)
432 汉代羌族的活动……………………(日)佐藤长著 王丰才编译 芈一之校订(344)
433 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胡昭曦(345)
434 乞伏氏出于高车补证……………………………………………………………陈仲安(346)

435 汉代卢水胡的族名与居地问题……………………………………………………………王宗维（346）
436 关于卢水胡的族源及迁移…………………………………………………………………赵永复（347）
437 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4号研究
——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探索……………………………王　尧　陈　践（348）
438 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汤开建　马明达（349）
439 河西回鹘略论……………………………………………………………………………林　干（350）
440 关于甘州回鹘史中的几个问题………………………………………………………李　泙（351）
441 甘州回鹘世系考…………………………………………………………………………高自厚（352）
442 甘州回鹘余部的迁徙与西州回鹘之关系……………………………………………汤开建（353）
443 党项在中原与亚洲内陆关系中的作用………………（美）陆宽田著　乐赛月译（354）
444 以敦煌为中心的诸民族之动态……………………（日）梅村坦著　陈俊谋摘译（354）
445 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与分布……………………………周伟洲（355）
446 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周伟洲（355）
447 吐谷浑与唐、吐蕃的关系……………………………………………………………胡小鹏（356）
448 从李土司族谱谈到吐谷浑与土族的关系及土族族源问题…………………芈一之（357）
449 如何正确处理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林　干（358）
450 柔然与西域关系述考…………………………………………………………………余太山（358）
451 隋唐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的关系……………………………………………吕光天　古清尧（359）
452 “羯胡”、“柘羯”、“杂种胡”考辨…………………………………………黄永年（360）
453 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周连宽（361）
454 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传统友谊……………………………………………白寿彝（362）
455 新疆之伊兰民族…………………………………………………………………………王日蔚（362）
456 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王炳华（363）
457 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王炳华　王明哲（364）
458 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杨建新（365）
459 也谈汉代的乌孙
——《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商榷…………………………………………刘光华（365）
460 汉代乌孙居地考…………………………………………………………………………苏北海（366）
461 乌孙及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林　干（367）
462 西域的羌族………………………………………………………………………………钱伯泉（368）
463 突厥族……………………………………………………………………………………林　干（369）
464 从突厥内徙看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张　雄（370）
465 九至十三世纪初突厥各部的分布与变迁………………………………………蒋其祥　周锡娟（371）
466 初期葛逻禄族史之研究………………………………（日）内田吟风著　陈俊谋译（372）
467 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马长寿（372）
468 试论回鹘史中的若干问题……………………………………………………………林　干（373）
469 从车师族到高昌回鹘……………………………………………………………………苏北海（375）
470 关于回鹘的西迁………………………………………（日）森安孝夫著　陈俊谋译（376）
471 唐及五代时期的回鹘族………………………………………………………………林　干（376）
472 高昌回鹘亦都护谱系考
——西域时代回鹘史札记……………………………………………………………程溯洛（377）
473 铁勒与突厥的关系及铁勒是否可以被称作民族的问题……………………………段连勤（378）

474 葱岭西回鹘考……王日蔚(378)
475 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钱伯泉(379)
476 关于《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一文的几点看法……汤开建(380)
477 维吾尔族……乌衣古尔·沙依然 史 众(381)
478 元代维吾尔人对于祖国文史的贡献……程溯洛(382)
479 维吾尔族先民回鹘与匈奴、突厥关系考辨……苏北海(383)
480 丝绸之路与维吾尔族……刘志霄(384)
481 维吾尔族源流新考……苏北海(385)
482 维吾尔族汉译名称源流考……苏北海(386)
483 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谷 苞(386)
484 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演变考……王日蔚(387)
485 关于维吾尔族历史的几个问题……冯家升(388)
486 维吾尔族居新疆考……樊 哨(389)
487 对樊哨同志《维吾尔族居新疆考》的几点意见……冯家升(390)
488 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樊保良(391)
489 试论回回民族的来源及其形式……林 干(391)
490 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白寿彝(393)
491 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黄 靖(394)
492 略论大月氏贵霜帝国的建立及其族系问题……水天长(395)
493 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齐思和(396)
494 关于匈奴西迁过程的探讨……肖之兴(397)
495 哌哒民族的起源……(日)榎一雄著 刘永增译(398)
496 古代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易卜拉音·穆提依(399)
497 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法)哈密顿著 耿 升译(400)
498 关于Toquz Oγuz与"九姓"的几个问题
……(日)片山章雄著 章 莹译 吴大山校(401)
499 西突厥的形成、属部及其它诸问题……杨建新(402)
500 柯尔克孜族的故乡及其西迁……杜荣坤 郭平梁(402)
501 叶尼塞吉尔吉斯的西迁与中亚吉尔吉斯民族的形成……马曼丽(403)
502 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杨志玖(404)

(二)宗 教

503 西域佛教之研究……(日)羽溪了谛著 许敦谷译(405)
504 佛教下之西北……顾颉刚(406)
505 佛教东渐的传说……(日)白鸟库吉著 朱彤樵译(406)
506 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序……任继愈(406)
507 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吴 焯(408)
508 从《张骞出使西域图》谈佛教的东渐……孙修身(409)
509 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任继愈(409)
510 六朝时代中国境内之西域佛僧……江应梁(410)
511 汉唐时期新疆佛教流行情况述略……陈 戈(411)
512 《于阗教法史》……王 尧 陈 践译解(412)

513 龟兹佛教与石窟……姚士宏（413）
514 古代库车的佛教与佛教遗址……买买提·木沙（414）
515 库车发现的卵石佛像及藏文题刻……刘松柏（414）
516 魏晋时代的鄯善佛教……陈世良（415）
517 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耿世民（416）
518 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孟凡人（417）
519 炳灵寺石窟与西秦佛教……杜斗城（417）
520 火祆教入中国考……陈 垣（418）
521 魏晋南朝火祆教钩沉……王 素（419）
522 摩尼教入中国考……陈 垣（420）
523 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林悟殊（421）
524 摩尼教寺院的戒律和制度……刘南强著 林悟殊译（421）
525 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耿世民（422）
526 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柳存仁著 林悟殊译（423）
527 唐代摩尼教与中亚摩尼教团……林悟殊（424）
528 试论摩尼教与回鹘的关系及其在唐朝的发展……艾尚连（425）
529 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林悟殊（425）
530 中世纪维族与摩尼教的关系……苏北海（426）
531 《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林悟殊（427）
532 摩尼教《下部赞》汉译年代之我见……林悟殊（428）
533 六到八世纪突厥人的宗教信仰……樊 圃（428）
534 试论回纥宗教思想的演变与改宗摩尼教……杨圣敏（429）
535 中古时代中亚细亚及中国之基督教……（法）伯希和著 陆翔译（430）
536 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白寿彝（430）
537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考……王日蔚（431）
538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考……苏北海（431）
539 伊斯兰教在新疆发展之商榷……柏 南（432）
540 一千年来伊斯兰教（回教）在新疆的发展……苏北海（432）
541 新疆佛教由盛转衰和伊斯兰教兴起的历史根源……李泰玉（433）
542 回回教入中国考……Issac Mason著 朱杰勤译（434）
543 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白寿彝（435）

七、语言文字

544 新疆之语言文字……王日蔚（436）
545 新疆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耿世民（437）
546 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方壮猷（437）
547 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黄盛璋（439）
548 吐火罗语略说……子 范（440）
549 论吐火罗语……王斐烈（441）
550 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季羡林（441）
551 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国语考……（法）列 维著 冯承钧译（443）
552 吐火罗语与尼雅俗语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乌鲁木齐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季羡林（444）
553 焉耆——龟兹文及其文献……李 铁（444）
554 于阗文及其文献……黄振华（445）
555 浅论粟特字母的传播与回鹘文的创制……王叔凯（445）
556 回鹘文字来源及其演变……李符桐（446）
557 粟特文及其文献……黄振华（447）
558 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道 布（448）
559 突厥文及其文献……陈宗振（448）
560 尼雅新出的一件佉卢文书……（美）邵瑞祺著 黄盛璋译（449）
561 古代维吾尔族文字和文献概述……耿世民（449）

八、音乐百戏

562 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阴法鲁（451）
563 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日）岸边成雄著 邹仲华译（452）
564 八世纪前中国乐舞与西域乐舞之递禅……常任侠（452）
565 中、印两国在音乐文化上的关系……杨荫浏（453）
566 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新疆乐舞……周菁葆（454）
567 两晋南北朝是各族乐舞大交流的时代……王克芬（455）
568 汉唐间外国音乐的输入……贺昌群（456）
569 关于隋唐时代吸收西域音乐的历史经验……马 可（457）
570 隋唐时代汉族人民学习西域音乐的故事……刘兆云（458）
571 隋唐燕乐的成立、递变和流传……潘怀素（458）
572 苏祇婆的“五旦”理论……何昌林（459）
573 从新疆的古老音乐探索燕乐及其调式音阶理论……关也维（460）
574 唐代音乐与西北之关系……吴荣曾（460）
575 唐代的音乐艺术……阴法鲁（461）
576 唐代西域音乐的流行……赵铭善（462）
577 漫谈唐代的音乐……阴法鲁（462）
578 新疆歌舞与唐代音乐……阴法鲁（463）
579 《西凉乐》与《伊州乐》
——我国西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与汉族音乐文化相结合的乐种……谷 苞（463）
580 试探《西凉乐》民族之源
——暨论“变龟兹声为之”……郝 毅（464）
581 也谈《西凉乐》
——兼与郝毅同志商榷……牛龙菲（465）
582 精美的西凉乐舞……李根万（466）
583 古代龟兹乐的巨大贡献及其深远影响
——在新疆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的发言……谷 苞（467）
584 从古今字谱论龟兹乐影响下的民族音乐……潘怀素（467）
585 《龟兹乐》与《十二木卡姆》
——为纪念维吾尔族著名音乐家吐尔地阿洪诞生一百周年而作……谷 苞（468）
586 龟兹乐与木卡姆……周菁葆（469）

587 龟兹乐舞史话……………………………………………………………………霍旭初（470）
588 唐乐《部落稽》考源
——暨论匈奴音乐文化艺术之流传……………………………………郝 毅（471）
589 法曲…………………………………………………………………………丘琼荪（472）
590 “霓裳羽衣曲”考……………………………………………………………………阴荫浏（473）
591 关于《泛龙舟》……………………………………………………………………陈文成（473）
592 中国古代的舞蹈艺术……………………………………………………………常任侠（474）
593 隋唐的舞蹈…………………………………………………………………………常任侠（475）
594 试谈唐代舞蹈……………………………………………………………………欧阳予倩（475）
595 唐代舞蹈续谈……………………………………………………………………欧阳予倩（476）
596 唐代舞蹈浅述……………………………………………………………………秉 勋（477）
597 唐代——古代舞蹈艺术高度发展的时期…………………………………王克芬（478）
598 西安地区部分出土文物中所见唐代乐舞形象……………………………周伟洲（479）
599 龟兹舍利盒乐舞图………………………………………………………………霍旭初（480）
600 胡腾舞何时传入中原……………………………………………周 到 刘建洲（481）
601 胡腾舞考……………………………………………………………………………激 川（481）
602 唐代舞曲《屈柘枝》
——敦煌曲谱《长沙女引》考辨……………………………………何昌林（482）
603 秦王破阵乐的来源………………………………………………………………杨宪益（483）
604 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耿世民（484）
605 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季羡林（485）
606 古代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及新疆的几种乐器
——略谈角、笳、笛、觱篥和琵琶的产生及其演变………………………谷 苞（485）
607 龟兹筚篥的流传及其艺术特色…………………………………………………霍旭初（486）
608 唐代的琵琶技法……………………………………………………………………曹安和（487）
609 火不思乐器考略……………………………………………………………………关也维（487）
610 汉唐间西域百戏之东渐…………………………………………………………常任侠（488）
611 汉唐间西域传入内地的杂技艺术………………………………………………常任侠（489）
612 说汉唐间百戏中的“象舞”
——兼谈“象舞”与佛教“行象”活动及海上丝路的关系………………贾 峨（490）
613 民间保存的唐西凉伎………………………………………………………………杨宪益（491）
614 康居泼寒胡戏传入中国考………………………………………………………刘铭恕（491）
615 唐代波罗球戏考……………………………………………………………………罗香林（492）
616 唐代西藏马毬戏传入长安………………………………………………………阴法鲁（493）
617 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金维诺 李遇春（494）
618 板桥三娘子…………………………………………………………………………杨宪益（494）

九、丝路人物

619 西王母新考……………………………………………………………………库尔班·外力（496）
620 张骞与西域…………………………………………………………………………张仲和（496）
621 张骞通西域…………………………………………………………………………姚 鉴（497）
622 试论张骞通西域……………………………………………………………………刘 戈（497）

623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徐伯夫（498）
624 西汉经营乌孙的三个女外交家
——刘细君、刘解忧、冯嫽……………………………………………………………………杜 奋（499）
625 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冯嫽……………………………………………………………………其 平（499）
626 段会宗在西域活动的年代背景及其评价……………………………………………………刘光华（500）
627 班超与西域………………………………………………………………………………………秦卫星（501）
628 班超投笔护西域…………………………………………………………………………………刘维钧（501）
629 班超对中西交通的贡献…………………………………………………………………………莫任南（502）
630 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徐伯夫（503）
631 班勇生平考………………………………………………………………………………………柳用能（504）
632 甘英出使大秦考…………………………………………………………………………………龚 骏（505）
633 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及其贡献…………………………………………………………………莫任南（506）
634 氐人吕光和他的后凉政权……………………………………………………………齐陈骏 郭 锋（507）
635 裴矩功过述评……………………………………………………………………………………齐陈骏（507）
636 王玄策使印度及其勋业…………………………………………………………………………郑师许（508）
637 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
——《补唐书张义潮传》订补…………………………………………………………………姜亮夫（508）
638 瓜沙曹氏世谱……………………………………………………………………………………姜亮夫（509）
639 谈与瓜州曹氏世谱有关的几个问题……………………………………………………………孙修身（510）
640 敦煌李姓世系考…………………………………………………………………………………孙修身（511）
641 阿史那忠在西域
——《阿史那忠墓志》有关部份考释……………………………………………………………郭平梁（512）
642 唐朝的少数民族大将契苾何力…………………………………………………………………郭平梁（512）
643 略论郭元振………………………………………………………………………………………张启撰（513）
644 高居诲《使于阗记》笺证………………………………………………………………………钱伯泉（514）
645 关于“西域”“回回”和“阿维森纳”问题——答郭庆昌先生……………………………宋大仁（515）
646 王延德与《西州使程记》………………………………………………………………………顾吉辰（515）
647 耶律楚材及其《西游录》杂议…………………………………………………………………樊保良（516）
648 关于李暹及其西行………………………………………………………………………………鲁 深（517）
649 中西方历史上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余士雄（517）
650 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向 达（518）
651 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唐锡仁（518）
652 《马可波罗游记》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中西交通的贡献………………………………………余士雄（519）
653 略论鸠摩罗什……………………………………………………………………………………殷 鼎（520）
654 鸠摩罗什年表考略………………………………………………………………………………陈世良（521）
655 法显是怎样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谭吴铁（522）
656 宋云行纪笺注………………………………………………………（法）沙 畹撰 冯承钧译（523）
657 宋云丝路之行初探………………………………………………………………………………马曼丽（524）
658 关于敦煌人宋云西行的几个问题………………………………………………………………杜斗城（524）
659 杰出的学者玄奘…………………………………………………………………………………吴 晗（525）
660 玄奘三藏之行脚与取经…………………………………………………………………………郑师许（526）
661 论玄奘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石 峻（527）

662 唐玄奘和他的《大唐西域记》……………………………………………………………方　循（528）
663 试论玄奘法师出生、西行的年代问题……………………………………………郭元兴（528）
664 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游　侠（529）
665 玄奘与印度佛学
——从玄奘在印所著的三论说起……………………………………………吕　澂（530）
666 苏祇婆其人…………………………………………………………………………何昌林（531）
667 关于苏祇婆身世的一个假设………………………………………………………杨宪益（531）
668 康昆仑与段善本……………………………………………………………………杨宪益（532）
669 康昆仑与摩尼教……………………………………………………………………杨宪益（533）
670 来自中亚的北齐画家曹仲达………………………………………………………吴　焯（533）

十、丝路考古

671 斯坦因与亚洲极中部文物……………………………………………………………周谷城（535）
672 从出土文物看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李遇春（535）
673 新疆考古概况
——中国考古学专题报告……………………………………………………向　达（536）
674 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武伯纶（537）
675 "丝绸之路"新疆路段考古述略……………………………………………………王炳华（538）
676 新疆考古的发现………………………………………………………………………黄文弼（539）
677 新疆考古的发现
——伊犁的调查…………………………………………………………………黄文弼（539）
678 从新疆出土文物中探索新疆古代的科学技术………………………………………穆舜英（540）
679 新疆出土汉、唐丝品初探……………………………………………………………武　敏（541）
680 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夏　鼐（542）
681 "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新疆博物馆（543）
682 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它…………………………………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544）
683 吐鲁番考古研究概述…………………………………………穆舜英　王炳华　李　征（545）
684 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竺　敏（545）
685 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武　敏（546）
686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几种唐代织锦……………………………………………………陈娟娟（547）
687 唐代西州墓中的绢画…………………………………………………………金维诺　卫　边（548）
688 试释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绢画伏羲女娲像……………………………………………刘凤君（548）
689 吐鲁番出土丝织物中看唐代的印染…………………………………………………武　敏（549）
690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棉花种植和纺织………………………………………沙比提（550）
691 唐代的复面和胡部新声………………………………………………………………武伯纶（551）
692 复面、眼罩及其它……………………………………………………………………王　澍（552）
693 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安家瑶（553）
694 若羌县巴什夏尔遗址出土的古代璃玻器皿…………………………………………张　平（554）
695 新疆的石刻艺术………………………………………………………………………王子云（554）
696 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张学荣（555）
697 麦积山石窟的分期……………………………………………………………………董玉祥（556）
698 丝绸之路东段的几处佛教石窟

——泾川王母宫与南北石窟寺考察……马化龙（558）
699 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阎文儒（559）
700 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分期问题浅探……朱英荣（560）
701 克孜尔新1窟试论……许宛音（561）
702 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郭沫若（562）
703 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说明……中科院考古所资料室（562）
704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文物出版社（564）
705 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郭沫若（564）
706 就斯坦因在我国新疆丹丹乌里克、磨朗遗址所发现几块壁画问题的新评述……阎文儒（565）
707 龟兹五铢铸币的考古发现及其有关问题……张　平（566）
708 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王朝文物……夏　鼐（567）
709 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夏　鼐（568）
710 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夏　鼐（569）
711 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夏　鼐（570）
712 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夏　鼐（571）
713 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朱捷元　秦　波（572）
714 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夏　鼐（573）
715 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廷式金币……夏　鼐（574）
716 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廷金币……夏　鼐（575）
717 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夏　鼐（576）
718 中国发现的十五世纪威尼斯银币……（意）毛·斯卡尔帕里（577）
719 “和阗马钱”考……夏　鼐（578）
720 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物概述……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579）
721 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新疆博物馆考古队（580）
722 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赵俪生　温玉成（580）
723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黄文弼（581）
724 杂胡官印考……黄盛璋（582）
725 唐代胡俑、骆驼与“丝绸之路……孙　迟（582）

十一、敦煌文化

726 汉魏时代之敦煌……（日）榎一雄著　陈俊谋译（584）
727 敦煌石室……卫聚贤（585）
728 敦煌莫高窟在东方文化上的地位……王子云（585）
729 敦煌艺术概论……向　达（586）
730 谈敦煌艺术……吴作人（587）
731 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常书鸿（587）
732 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贺昌群（588）
733 敦煌佛教艺术和古代于阗……孙修身（589）
734 形象的历史
——谈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段文杰（590）
735 莫高、榆林二窟杂考……向　达（591）
736 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史苇湘（592）

737 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阎文儒（593）
738 敦煌壁画与佛经……周一良（594）
739 阿旃陀和敦煌
——纪念印度阿旃陀艺术1500周年……常书鸿（595）
740 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段文杰（596）
741 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金维诺（597）
742 敦煌壁画祇园记图考……金维诺（598）
743 祇园记图与变文……金维诺（599）
744 敦煌乐舞资料的历史背景……阴法鲁（600）
745 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阴法鲁（601）
746 敦煌壁画和唐代舞蹈……董锡玖（601）
747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艺术
——“丝绸之路上的乐舞之一”……董锡玖（602）
748 敦煌乐史资料概况……牛龙菲（603）
749 三件敦煌曲谱资料的综合研究……何昌林（604）
750 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陈庆英 端智嘉（605）
751 试论“敦煌学”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和意义……周丕显（606）
752 敦煌遗书概述……周丕显（607）
753 敦煌经卷在中国学术文化上之贡献价值……姜亮夫（607）
754 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姜伯勤（608）
755 敦煌、新疆古藏文写本述略……陈 践（609）

十二、丝路研究综述

756 王国维与西北史地学……钟兴麒（611）
757 斯坦因和我国西北史地研究……杨建新（611）
758 斯坦因对东方学研究的贡献
——他关于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的研究论著与考察报告详目……王冀青（612）
759 斯坦因所考见之中西交通……周谷城（613）
760 读西域文明史概况之笔记……赵浚波（614）
761 日本的“丝绸之路”热……童 斌（614）
762 丝绸之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日）长泽和俊著 冯佐哲译（615）
763 法国对中国西域的研究……耿 升（616）
764 科兹诺夫与哈拉浩特文化……马曼丽（616）
本书主题索引
后 记

一、政治军事

1.丝路的开拓与经营

001 建郡前的河西走廊 武守志

(《社会科学》"甘肃"1984年第2期)

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古远年代。武威皇娘娘台，是齐家文化的主要遗址。齐家文化的居民已进入铜石并用时期。至于分布在山丹、酒泉、玉门一带的火烧沟类型文化和民勤沙井文化，是晚于齐家文化，属于同一时期，代表不同系统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一时期，大约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和尧舜禹时期、商周时期，河西一带生活着总称为羌的游牧部落，古籍称之为氐羌。而所谓戎或西戎，也是指羌而言。战国以降，有月氏称雄河西。月氏，属于氐羌系，是我国西北之古老民族。月氏西迁前的驻地，《史记》和《汉书》都说是居敦煌、祁连间。而其势力，东曾申展到河套西北部，与东边匈奴相接，西面阳关西南，柴达木盆地西北、阿尔金山山脉一带，也是月氏的地域。至于乌孙住地，不仅史、汉记述不同，就是《汉书·张骞传》和《西域传》记述也有差异。作者认为乌孙与月氏均为随畜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即所谓"行国也"。追逐水草加游牧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然的利用，因而其居地就不稳定。但乌孙也是西迁前较长期居住在我国敦煌一带西北边陲的古老民族，不过与月氏比较当时势力微弱，常为月氏附属。正当月氏称雄河西的时候，游牧在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却觊觎河西。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而自立为单于以后,匈奴势力陡然加强，首先把矛头指向敢于轻视它的东胡和月氏。于是大破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控弦之士达三十余万。匈奴势力逼向河西，月氏开始西迁。西迁过程中，迫使乌孙离开敦煌一带向西北匈奴牧地逃移。月氏西迁，河西走廊成了匈奴的辖区，同时也成为它的重要后勤军事基地。因此，东向可威胁关陇，西向可挟制西域，南向可交通氐羌。匈奴之占据河西，对汉朝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这时的匈奴，不断南下进行侵扰。汉统治者当时无力抵抗，只好以和亲的羁縻政策,以求得汉、匈紧张关系的缓和。经过文景之治，到了武帝时，国力日强，已具备抗击匈奴侵扰的条件。元光二年(前133年)武帝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接着便是收复"河南地"战役的胜利。后又听从张骞的建议，积极主张交通西域。关于武帝打通河西走廊、交通西域的动机，中外史学工作者意见不一。作者以为其主要动机无疑是出于战略目的，即夺取匈奴在河西走廊等地的后勤和军事基地,在西域诸国寻找反击匈奴的联盟,以切断匈奴右臂。但也不能排除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要求打通商路,以扩大经济上的交换范围。当然,这种意图也是服从于断匈奴右臂的主要动机的。汉武帝出于上述动机，决定打通河西走廊。经元狩二年(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战，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随着以后的移民设郡，屯田筑塞，河西走廊

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河西走廊成为一条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通路，在中西交通上所起的作用日趋重要。

002 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 刘光华

（《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3辑）

关于敦煌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为中外学术界注目，但研究重点多在敦煌建郡以后，本文则侧重于建郡前历史的研究。首先，对敦煌一名的由来，根据《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敦煌之名在河西置郡之前即已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书都对敦煌与祁连连用。匈奴呼天为祁连。祁连是少数民族语，而非汉语。既然敦煌与祁连连用，此敦煌绝非指敦煌郡或敦煌县，它和祁连一样，应是当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至于敦煌一词的原意，早在东汉时就无法得知了，所以应劭作了"大"和"盛"的解释。但作者认为，敦煌之名原土著居民意在指地区而言，其范围可能比后来的敦煌郡为大，今之疏勒河流域的敦煌、玉门平原，应是古代敦煌的范围。因其土著居民沿河而牧，往返于疏勒河流域的绿洲之上，故其范围较建郡后为广。

其次，在研究敦煌历史问题中，常提到三危山，因此《尚书》有"窜三苗于三危"的记载，遂将今敦煌的三危山与尧舜的危山联系了起来。把三危山与敦煌联系起来的开创者是杜预，但其说未必妥当。因尧、舜活动的地域主要在今黄河中下游，不可能把古敦煌作为处理罪人的流放区。

第三、自东汉以后，瓜州就是敦煌之说已成定论，主要依据是秦穆公时，秦人势力已达敦煌。对此，阚骃在《十三州志》中首先提出怀疑，顾颉刚先生在解放前后，先后作了较详的论证，认为《左传》所提瓜州不是敦煌，而是关中秦岭一带。本文作者又据《通鉴外纪·周纪》及《史纪·周本纪》的有关材料又作了补证。

第四、河西地区因其地理关系是一个多民族汇交之处，民族角逐频繁，居民迁徙无常，敦煌当不能例外。据史载，敦煌古代居民有苗、允姓之奸、乌孙、月氏、匈奴等。作者认为三危山不在敦煌，瓜州不是敦煌，故三苗及允姓之奸，则应排除于古敦煌居民之外。我国古文献对西部地区的古民族统称氐羌、羌戎和西戎，因"羌，从人从羊，因以为号"，故敦煌地区土著居民，应属氐羌。据最新考古发掘所得，疏勒河流域应属火烧沟类型文化，火烧沟人应是敦煌地区最早的居民，这与文献羌"主牧羊"，"西戎牧羊人"的记载吻合。

第五、敦煌扼中西交通之咽喉，对敦煌历史的研究，为丝路学研究的重要一环。其中对敦煌建郡年代之研究，中外学者多所注目，但说法各异，仅《汉书》帝纪和地志所载亦不相同。作者对各家之说，进行了排比研究，复据史籍记载考证，认为《汉书·地理志》之说，即敦煌于后元元年（前88年）建郡之说较之可信。

003 试述西汉对河西的开发 翟宛华

（《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

西汉时的河西，位于甘肃的西北部，处于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东西长约一千公

里，南北宽几公里到一百多公里，因地形狭长如走廊，故有河西走廊之称。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北面的古浪峡，经武威、张掖、酒泉、到最西面的敦煌玉门关，总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西汉政府占领河西以后，通过建郡县、列亭障、屯田、实边，对河西进行开发。本文论述了西汉时期开发河西的措施及其重大作用。据《史记》、《汉书》记载，大月氏曾占据张掖、酒泉一带，势力很强。到楚汉战争时，大月氏为匈奴所攻破。与大月氏同时居于河西地区的还有乌孙及诸羌。乌孙在当时是一个小国，受大月氏控制。诸羌则散居河西之南的山区内。秦汉之际，匈奴由弱到强，月氏由强到弱，直到匈奴独占河西地区。在汉文帝时期，匈奴曾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入侵，西汉与匈奴的矛盾异常尖锐。到汉武帝时，西汉已是“财力有余，士马强盛”，遂决意征伐匈奴，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经过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大将军霍去病的两次征伐，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赵破奴将属国之骑及郡兵数万，从令居出击匈奴，经过大军之清荡，河西完全控制在西汉手中，这为开发河西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河西归汉后，就大规模的开始移民屯田，进行开发。文帝时晁错提出用移民实边来代替秦朝“轮番戍边”的政策。“文帝从其言，募兵徙塞下”。武帝时，则采取收复一地就在此地移民开发的政策。经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把中原很多贫民、罪犯、商人迁到河西，为开发河西提供了劳动力。移民实边政策，只部分地解决了就地生产粮食，就地供应军粮问题，但不可能全部供应。为解决此问题，西汉在边地又实行军屯。为加强军屯领导，还在军队建制中设有“候农都尉”和“田官吏卒”，专管军队中的农业生产。西汉时在西北的军屯，从今天的陕西北部、内蒙古黄河沿岸、宁夏全境、兰州以北的景泰、永登、直到河西的酒泉、敦煌，设置田官。利用士兵修渠灌溉，垦田种地。它不仅繁荣了当地的社会经济，而且成了统一西域的后方基地。西汉开发河西的步骤，除移民、屯田外，还采取列亭障、设郡县等军政合一的行政机构，以保障西北边地开发的顺利进行。列“亭障”是开发河西地区的第一步。郡县的形成，就是在起“亭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元狩二年后，西汉的势力由河东移到河西。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朝开始以令居为据点，有计划的开发河西。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在河西置酒泉、张掖郡，集中开发河西，其重点在敦煌、居延泽一带。至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由酒泉郡分置了敦煌郡。到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又将张掖郡所辖之一部分分置了武威郡。这时上距河西归汉已近五十年，距酒泉、张掖建郡也近四十年。这四、五十年，河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西汉在开发河西中，能取得显著成就，与政府贯彻执行晁错提出移民实边的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晁错移民实边的优惠政策，是合乎情理，顺乎民心的，在汉代一直奉行。这是开发河西的有力措施。开发河西的重大作用，一是打通了中西交通、巩固了西北边疆。二是中原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传入河西及西域。三是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缓和了内地的阶级矛盾。

004 汉武经略河西考 缪凤林

（《甘肃科学教育馆学报》1940年第3期）

汉初，西北边境匈奴为患，武帝为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曾想通月氏，与之联合以夹

击匈奴。为此目的遂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月氏，骞在往还途中，均被匈奴所拘，前后达十余年。张骞通使西域，虽是历史上的"凿空"事业，但就解决当时匈奴问题，实无所成就，不过在这时期，汉与匈奴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汉武元光、元朔间的汉匈战争，大抵限于中部和左部，到了元狩时期，汉匈战争转向西北方面，尤其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霍去病两次深入匈奴右地，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解除了西北边患，于是和内地一样设郡县，置屯田，以保护西域之交通。本文就汉武进击匈奴，置河西四郡的重要性，作了全面的阐述。由于河西四郡的建立，解决了匈奴从西北对汉廷的威胁，对已收复的河南之地，得以切实建设；在河西建立新根据地，也便于再出师进击匈奴；与西域之交通得以沟通，中西使节商旅可直接往还，特别是西域诸国始通于汉；隔绝了西羌与匈奴之联系，减轻了西北边患。故河西四郡的设置，对西域交通之开拓，关系至为重要。作者在本文中，对河西为什么要建郡县，建郡县的意义？受郡县统治的人民又从何而来？设郡县的效果如何？等等问题，都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这对丝绸之路研究，裨益甚多。

005 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 刘光华

（《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2期）

汉武帝开发河西对我国历史有其重大意义，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对汉武帝开发河西地区问题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开边设郡：是开发河西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武帝"广开三边"，在新开拓地区推行郡县制，把广大落后边远地区的社会制度，用行政手段纳入封建政治的范畴之中。为此武帝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建酒泉郡，后又建立了敦煌郡、武威郡、张掖郡。在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政令下，当地各族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经济文化上、风俗习惯上与汉族人民的相互影响大大加强，并使自己迎头赶上先进的汉族。

二、徙移民，开屯田；是汉武经营河西的又一重大措施。河西地区徙民开始的年代，当与设郡同时或稍后。当时迁徙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无着的农民、刑事犯罪者、犯有叛逆罪的政治犯及家属。武帝的徙民措施，直接地改变着河西地区人烟稀少的空旷状况。西汉末年河西四郡的户口，总计有六万一千二百七十户，二十八万二百一十一口。但在武、昭、宣时期，河西四郡的人口数应高于这个总计数，因为这期间除大批徙民外，还有大量的戍卒（包括田卒）。如果将当时的徙民与戍卒两项加起来，四郡人口总数，估计最低也在五十万上下。这五十万人就是当时开发河西的主力军。

三、发展农业，改变边地农业落后状况。武帝时是河西农业突飞猛进的时期，大量的徙民和田卒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政府对盐铁实行专卖，又保证了国家能够给生产者提供必需的铁农具；河西地区畜牧业兴盛，又为发展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畜力资源；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徙民和田卒，本来就是内郡的农民，他们把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带到了河西。这些因素统一在徙民和田卒身上，就构成了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武帝时又对水利比较重视，不仅在内地，而且在边郡也大兴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特别是居延屯田区一带的水利建设，据居延汉简记载有甲渠，

临渠、广渠、水门、肩水等名称，当与灌溉有关。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和创造的代田耕作法和耧犁于武帝时即传入西北边郡，改变了传统的农业耕作技术。到了宣帝甘露以后，西北边郡出现了和平安定的局面，农业进入了稳固的发展时期，当时居延地区粮食不仅能自给，而且有了剩余。河西四郡农业的经营方式有两种，一是军屯系统的屯田，是国家经办的农场，其劳动力是体现封建剥削的力役；二是民屯系统的徙民，由国家"贷与产业"，土地属国家所有，要向国家缴纳租税。不过这种关系随着边郡进入和平时期，私人地主势力很快发展，国有土地逐渐转移到私人地主手中，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就成为主导的生产关系了。

开发河西不仅是把河西地区纳入西汉的版图，而且在军事上为"断匈奴右臂"这一战略目标的完成提供了人力、物力和地利方面的支援，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也就为人们所重视。开发河西，也为通西域提供了重要的人力、物力保证。西域和汉朝通使以后，河西地区又成为中西交通的必经之路，西域的物产、音乐舞蹈、宗教艺术传入汉朝，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国的特产丝及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中亚、欧洲。汉朝先进的冶铸和穿井技术这时也传到了中亚各国，对促进其社会生产有着重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实现西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这一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匈奴遭到了一系列失败。从西汉中期开始，匈奴开始逐渐西迁，而新兴起的鲜卑也随后步步西向。在汉朝的打击下，后来又在鲜卑的压迫下，北匈奴终于走上了西迁欧洲的行程。北匈奴的西迁，对欧洲历史又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006　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　　张维华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

关于河西四郡建置年代，《汉书·武帝纪》与《地理志》的记载各不相同，本纪以酒泉、武威同建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地志则称酒泉建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威建于太初四年，后世学者多主本纪之说。但作者根据《史记·大宛传》张骞出使西域事，《匈奴传》昆邪王降汉事，证明酒泉建郡不在元狩二年，而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武威建郡，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金城建郡事，太初中伐大宛事，及赵充国传等史实，证明不在元狩、元鼎中，当在昭帝末年宣帝初年，即在元凤而后，神爵之前十数年中。张掖之建郡，根据汉书武帝纪、地志、食货志，以及李陵教射酒泉、张掖事等，证明本纪元鼎之说为可信，而地志之说有误。至于敦煌之建郡，作者根据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刘屈氂巫蛊事变，李广利击大宛事，证明不在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乃建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之先，则地志之说不可据，帝纪之说则可信。根据史料考证，作者认为汉于河西建郡，最初仅酒泉一郡，后因交通增繁，商贾往来，士民移徙，则于元鼎六年以后，别置敦煌、张掖二郡，武威此时尚属张掖所辖，最后于元凤以后始置之。作者对河西四郡建置之研究，史料充分，考证翔实，见解新颖，条理明晰，研究西北史地的同志可资参考。

另外，台湾《大陆杂志》1951年第3卷5期载有施之勉先生《河西四郡建置考》一文，对《武帝本纪》与《地理志》所记不相一致问题，又据《史记·大宛传》、《汉书

本纪，地志·食货志》及《盐铁论》等书记载，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通鉴》以下，胡三省及清代著名学者齐召南、全祖望、钱大昕、王先谦及朱一新等人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作了分析，其所得结论与张维华先生《考疑》一文基本一致，可一并参阅之。

007 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 王宗维

（《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

关于汉代在河西设立四郡的时间问题，众说纷纭，迄无完论。明确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是研究历史和丝绸之路的需要，而且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即编印河西各地、县、市地方志的需要。本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文章首先把两千多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记载和各家有代表性的论点列出一表，共有三十余种，说明分歧之大，以便于比较，并提出了对待、分析和运用这些资料的意见。接着分别对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设置时间的各种说法，根据史书记载，逐一进行了考证，否定了不正确的说法，提出了结论。经过论证，认为河西四郡的设置时间：(1)酒泉郡：始设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2)张掖郡：始设于太初三年末至四年初（公元前102年至101年）；(3)敦郡煌：始设于后元元年或二年（公元前88年至87年）；(4)武威郡：始设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从元封三年始设酒泉郡起，到地节二年最后设置武威郡，经历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个皇帝，历时54年，可见汉朝经营河西的历程之艰巨。西汉政府虽然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它的成就却永垂千秋。本文引用资料丰富，考证缜密，论证充分，为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材料。

008 西汉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考 周振鹏

（《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

西汉开辟河西走廊是一件大事，但设置河西四郡的年代，却长期以来成为悬案。其源盖出于《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所记年代相互矛盾所致，历代史家及研究者议论不一。数百年来四郡的建置年代并未解决，直至本世纪四十年代，张维华先生从武帝纪、地志以外的史汉有关记载出发，综合考察河西地区置郡的经过，断言武帝纪、地志的说法都存在问题，认为四郡之中酒泉最先置，武威最后，张掖、敦煌则可从武帝纪。这个结论已大大超越前人的认识。大约与此同时，劳干先生利用三十年代所获之居延汉简，参以文献资料分析推断，武威建郡当在元凤三年十月之后，地节三年五月之前；其它三郡仍从武帝纪。六十年代初，陈梦家先生更进一步将史汉等文献资料和汉简所载有关史料进行全面的排比，认为《史记》的记载有其一致性，四郡之建置主要应以《史记》为据。他的结论是：酒泉、张掖应同置于元鼎六年；敦煌郡之设置当在张掖、酒泉之后；武威则应置于宣帝初，其建郡之上下限应为地节三年至元康六年间。本文对上述诸说，进行了评论，并引用《史记》、《汉书》、居延汉简等史料中的有关记载，对四郡之设置年代逐一进行了论证，对河西四郡设置年代得出如下结论：酒泉郡设于元狩二年，张掖与敦煌两郡设于元鼎六年，武威郡设于地节三年，本文资料丰富翔实，论证缜密周到，观点鲜明具体，对河西四郡设置的年代作出了较明确的结论。

009　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　　　谷　苞

（《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西汉初期，河西地区为匈奴所据，汉辖地区，经常受匈奴和西羌骚扰。武帝继位，于公元前133年派兵出击，削弱匈奴势力。《汉书·匈奴传》："汉军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殰，罢（疲）极苦之"。公元前121年，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降汉，汉于元狩二年（前122年）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分置张掖、敦煌郡。河西四郡之设，对尔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着重论述了其历史意义。

河西是通向新疆的长廊，是有名的丝绸之路。四郡之设，促进了汉朝统一西域。设郡之后，汉将秦长城延伸到阳关、玉门，烽燧深入到轮台。长城之南，为汉移民屯垦区，从而隔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加强汉朝与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的联盟，为共同抗击匈奴提供了有利条件。随后汉以河西四郡为依托，扩大对西域诸国的影响。《后汉书·西域传》："匈奴敛税重刻（苛），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附，愿请都护"。其后，东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使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面。在此期间，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不断发展，中国的丝绸、冶金技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茶叶、磁器、漆器，药材、乐器等均经此路传到西方各国；而西方的良马、棉花、胡桃、胡葱、菠菜、葡萄等农作物，以及音乐，舞蹈、杂技、宗教等也随而传入内地。河西四郡以及新疆境内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都是丝绸之路重镇。丝绸之路的畅通，无疑促进了这些城市的繁荣发展。同时，在这些地区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还建立了发达的封建文化。作者从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西凉乐的深远影响，石窟寺艺术的成就等方面，简述了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作者认为，其历史功绩主要是：扩大了汉朝对古代新疆的政治经济影响，使新疆统一于汉朝；将河西游牧地区建成为农业区，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方便条件；发展了河西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两汉、西晋和唐朝都是河西地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作者列表说明了这些朝代河西四郡的户数、人口、县（城）数的变化，从而可了解所谓丝绸之路长廊的兴衰和变化情况。

010　建郡后的汉代河西　　　刘光华

（《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2辑）

汉武帝开发、建设河西地区，对于开拓丝绸之路，对于我国历史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论述河西地区建郡以后对汉代历史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秦汉之际，匈奴开始强大，西域诸国皆役属。西域诸国成了匈奴军事活动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府藏"，成为西汉前期匈奴空前强大、不断南下侵掠汉朝边境的物质基础。汉武帝从战胜匈奴的总战略出发，针对"单于益西北"的形势，控制河西后，即设置酒泉郡，加强政治统治；又筑边塞，列亭障，设烽燧，置都尉，驻戍卒，屯田兵，将河西建设成为"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基地。向北可以直接出击匈奴腹地；向南隔绝匈奴与南羌的联系；又大大缩短了汉朝与西域之间的距离，便于通往西域。因而，得以在政

治上瓦解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在经济上“夺其府藏”，断其物资来源；在军事上，河西不仅成为集结军队和出军的前哨阵地，而且成为人力、物力的后备基地，对战胜匈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汉朝解决北部严重边患后，河西地区社会安定，居民休养生息，经济得到发展，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王莽作乱时，三辅地区流人前往河西，“避凶饥者，归之不绝”。窦融曾治理河西十三、四年，治绩卓著。在刘秀统一天下中，他利用河西地区雄厚的人力、物力，亲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辆”东进支援，对消灭隗嚣叛乱、统一陇右，畅通河西与中原联系方面，发挥了作用。

东汉初年，在光武帝拔乱反正政策影响下，河西地区仍然置水官吏，修理沟渠，发展文教，皆蒙其利。但由于国力不足，光武多次拒绝西域诸国请派都护以抗匈奴的要求；以后又受一些不明边事朝臣的错误影响，与西域的关系，史称“自建武至于延光，三绝三通”，使匈奴贵族复又控制西域，对河西开始掠夺。又由于河湟、陇右的羌人反抗起事，连绵征战。所以，从汉明帝开始，河西地区又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带来无穷灾难，使已开拓和畅通的丝绸之路，遭受严重阻碍和破坏。

011 东汉凉州之疆域及人口密度

——并论河西四郡对文化之贡献　　刘仁成

（《西北文化》月刊1947年第1卷第2期）

海运未通以前，河西本为中西交通孔道。两汉以来中国丝绢均经此道，运往西方。故《通鉴·唐纪》称：“至唐代宗，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一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当时西北财力之雄厚，人民之殷富，江南与之相较，犹有逊色。本文就东汉凉州之疆域，人口之密度，与其他各州作了比较，疆域之广在十三州部之中仅次于扬、益二州。东汉时羌祸又起，人口虽有减少，但远不能与其他郡成比例，敦煌一郡仅减少九千一百九十五人，可见四郡生活之安定。河西为东西交通走廊，盖以其地位之偏僻，独处西北一隅，未受中原战祸之波及，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学者，亦得就之传授。历史既久，传播愈广，不仅保存汉代固有文化，且此之地，人才蔚起，英才辈出，实为河西文化之光荣时期。

012 古敦煌郡沿革及其遗迹　　陈希爽

（《西北通讯》1948年第3卷第2期）

敦煌在中西交通史上，中西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对汉唐时期的敦煌，比之为今日的上海，盖因其地为古代中西交通之总枢纽。自汉及宋，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敦煌均为西北之屏障，亦为经营西域之根据地。汉置河西四郡，其在政治、军事上作用甚大，而敦煌郡在四郡之中，更有其特殊地位。因为在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其地更为汇通之锁钥。特别是佛教自西域东传，则以敦煌为荟萃之地，由此可知敦煌地位之重要。故研究中西交通史，中西文化史者，必须研究熟知敦煌的历史沿革。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则可知敦煌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作者在本文中，对敦煌

的历史沿革，敦煌的古迹遗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叙述。鉴于敦煌在我国历史上的变迁非常繁复，文献记载不足，许多重要史迹，多因年代久远，归于湮没，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对“丝绸之路”和“敦煌学”研究的补充。

013 敦煌沿革与人口 齐陈骏

（《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0年敦煌学专辑）

敦煌自古就是中西交通要道。清代以来，许多学者对敦煌史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订正工作，然而，对敦煌历代沿革与人口还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介绍。本文在这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从远古神话和传统的记载看，汉武帝立郡之前的敦煌，属古雍州境域，人口极其稀少。但它与中原地区却早有联系，而且被称为“三苗”的部族也早在这里栖息生活。到了夏商周三代，包括现今敦煌、安西都属古瓜州范围，这里居住的三苗后裔称为羌戎。战国及秦，羌戎为月氏所兼并。月氏盛时，曾占有以后的凉、甘、延、沙等州，“控弦十余万”。后匈奴破月氏，遂占有河西整个地区，并经常进扰汉王朝西方边境。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2年）大破匈奴后，在河西设立武威、酒泉二郡。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置张掖、敦煌二郡，是为“河西四郡”。敦煌郡据《汉书·地理志》载：统辖六县，即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西汉敦煌之户口，平帝元始时有户一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劳贞一先生据此推算，前汉时敦煌郡六县，面积约合十四万九千一百五十平方公里，以元始时的人口除之，每县仅六千三百八十九人，每平方公里只0.3人，每户不到四人。东汉时，敦煌人口有二万九千余，户应有七千余，按县平均每县约五千人左右。人口较西汉减少，是因经常与匈奴发生冲突，人口内徙的结果。三国曹魏时敦煌郡属县除两汉原有六县外，增宜禾一县，由于不断的战乱，人口大约只有一万余人，每县平均不到二千人。两晋时的敦煌郡，按《晋书·地理志》载：统县十二，即昌蒲、敦煌、龙勒、阳关、效谷、广至、宜禾、宜安、深泉、伊吾、新乡、乾齐，但实际上为九县，此时面积虽比两汉时为大，但户却减少了。西晋时敦煌郡有户六千三百，按每户四人的比例计算，则实有人口不到二万五千人，以九县平均，每县不到三千人。西晋统一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即进入十六国大分裂时期，在此前后，敦煌为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政权所辖。前凉、前秦敦煌郡辖县四，即昌蒲、敦煌、龙勒、效谷。其户口史无记载。据作者推算，前凉最多时不到二万人，前秦时则有较大增加，达到七万五千多人。后凉、北凉、西凉以及北魏、北周时敦煌郡的户口，史书亦无记载。据作者估计，后凉、西凉、北凉时的人口，不少于前秦时的七万五千多，北魏时敦煌郡遭到一次浩劫，当时辖县六，最多也只三千人左右。北周时的人口据隋时人口推算，大致是八、九千人。公元581年隋王朝建立，据隋志所载，敦煌郡辖县三，即敦煌、常乐、玉门三县。有户七千七百七十九，以一户四人计，全郡约三万人左右，以县平均，每县约一万人。到了唐代，郡改州，州改郡，最后又改郡为州，仍称为沙州。经安史之乱，吐蕃乘机蚕食河西之地，一直到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首领张议潮赶走吐蕃奴隶主，河西复归唐朝统辖，州、县建置无大变革，有两个属县，即敦煌、寿昌。唐沙州户口，每县有一万六千余人。沙州

在归义军统治下一直到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为赵元昊所占领，是为西夏时期，敦煌仍称沙州，但县属户口，史均不详。至公元1227年，西夏为元所亡，乃将沙州升为路，在此期间，敦煌人民曾经过一次大迁徙，被迫搬到甘、肃两州交界处居住，因而居民极为稀少。到了明代，则完全成了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其人口亦无明确记载，大概不会上万。敦煌户口到清代乾隆年间，达历史最高水平，有八万人，在此之后，则又逐渐减少，清末及民国初年，大约不会超过两万人。敦煌人口的变迁，是丝绸之路研究的另一个问题。从人口演变，我们可窥知丝绸之路的兴衰。

014 汉代的敦煌郡 吴礽骧 余尧

(《西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32年第2期)

作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与实地考察，对汉代敦煌郡的史地沿革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对汉代敦煌郡的建郡年代、地理位置等提出了自已的看法。

关于敦煌的建郡年代，根据夏鼐先生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发现的汉简记载，在敦煌建郡之前，玉门已设有都尉，称"酒泉玉门都尉"，属酒泉郡管辖。因此，敦煌建郡应在设置酒泉郡及其所属的玉门都尉之后。据此作者以为欲探讨敦煌的建郡年代，必须先研究酒泉郡的建立时间。汉武帝为了"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以制止匈奴势力的卷土重来，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羌事后，同年即遣"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郡、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采取了进一步开发河西的部署。以此看来，酒泉郡应建于元鼎六年。其所属玉门都尉，据有关记载，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王恢以佐赵破奴击楼兰有功，封为浩侯。同年，"酒泉列亭障至玉门"，修筑了自酒泉至玉门的障塞，设置了玉门都尉。据上所述，敦煌郡的设置年代当在此之后，其上限为元封四年。敦煌郡建置年代的下限，根据史书记载，太初元年李广利伐大宛时，敦煌之名已见于史书，说明当时敦煌业已建郡。而李广利两次伐宛，大军"起敦煌西""出敦煌"，"还至敦煌""因留敦煌"，足见敦煌乃当时汉师的屯兵之所与后方基地，可以认为敦煌建郡即是为李广利伐大宛所做的军事准备，因此作者认为敦煌建郡年代的下限为太初元年。根据以上情况将敦煌建郡的年代定为元封五、六年间(公元前106—105年)，较为妥当。

汉代的敦煌郡，包括今敦煌、安西两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八万余平方公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北部为北山山地西段；南部为祁连山，西南以党金山口为界，西部为阿尔金山山脉。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敦煌郡有属县六，即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与龙勒。文章对这些地区的地理分布、境界、县治等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并加以介绍。关于玉门关的位置，历来有很多争论，作者根据甘肃省博物馆自一九七九年以来的考察结果，初步考定马圈湾遗址，为汉玉门候官治所，玉门关为玉门候官所辖，置啬夫和佐治理。其确切位置，似应在马圈湾遗址西南0.6公里处，马圈湾与羊圈湾之间的高地上，方位东经93°45′，北纬40°21′。关于阳关遗址、作者认为向达先生的见解是恰当的。似置于墩墩山与龙首山之间的红山口。

汉代不仅在敦煌郡设置了玉门关、阳关等关隘，而且修筑了城障烽燧、塞墙、天田

等严密的军事防御设施和候望、通讯等系统。在塞墙终点以西，还有沿南、北通的邮驿亭隧，同时，大致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了玉门、阳关、中部、宜禾等四部都尉，都尉下置候官、候长、燧长等官属，此外，还驻有屯田士卒。正是由于汉代设置了一整套完整周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才保证了中西交通的畅通和河西四郡的开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015　汉代的属国　　　王宗维

（《文史》1983年第20辑）

本文根据史籍文献的有关记载，论述了汉代设置属国的情况。我国设置属国的年代较早，到秦朝已形成简略的制度。政府已设立专门官员，接待来首都的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管理归附少数民族部落的事务。汉袭秦制，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休屠王、昆邪王率众四万余人降汉后，武帝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设置属国。文章介绍了汉代设置属国的概况、职官及其职责、管理体系，并对《史记》、《汉书》等史书中所记之"五属国"作了考证。《史记》记分徙休屠王、昆邪王"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盐铁论》说："浑邪率其众以降，置五属国以拒胡"；《史记正义》把"边五郡故塞外"省改为"五郡"；《资治通鉴》把后半句改为"因其故俗为五属国，"均与《史记》原意不符。"边五郡"究指那五郡，历来意见也不一致。作者认为，所谓"边五郡故塞外"，只是大致的方位。说元狩三年就在五之地设五属国，与事实不符，当时并未同时设置五属国。所谓"边五郡"，是指陇西、北地、西河、上郡、朔方（含五原）。接着，文章又论述了两汉时代设置的属国、属国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西汉从元狩三年开始，历经昭、宣二帝，共设置了七个属国，它们是：安定属国、天水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金城郡属国。东汉建立后，对西汉原来设立的属国基本上维持原状。安帝即位，国内民族矛盾激化，东汉政府陆续设置了一批属国，以缓和民族矛盾。这种属国与西汉初所设属国不同，它是将郡县管辖区内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划出来设置属国，属国吏民不承担赋税，属国都尉与郡太守平行。这样的属国计有张掖、张掖居延、广汉、蜀郡、犍为、辽东、金城、安定、西河、上郡、巴东等11个。作者引用史书文献记载，对各属国的设置时间、管辖地区、首府所在、都尉姓名、组织机构等，均有较详论述。由于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生产部类和社会制度均与汉族不同，汉朝按地域划分社会单位，匈奴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汉朝为农业生产，匈奴为畜牧生产；汉朝为封建社会，匈奴为奴隶社会。故汉朝政府对归附部落实行属国的制度，对中央政府和属国吏民都是有利的，在历史上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一是争取了大批少数民族人民归附汉朝，分化、瓦解了少数民族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二是安定了边疆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繁荣了商业贸易；三是有利于引导各族人民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应先进的生产水平。

016　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　　　孟　池

（《文物》1975年第7期）

古代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我国新疆广大地区叫做西域。两汉中央政府在西

域建立了一套行政机构和军事组织，发展了西域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加强了西域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并通过西域扩大了中国同西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和交往。因而在新疆地区保存了两汉时期的大量历史文物，其内容包括各种建设的遗址、墓葬以及出土的汉文木简、佉卢文木牍、印章、钱币、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工艺品等。通过这些历史文物，结合文献记载，有助于我们对两汉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政治、经济措施获得比较全面的了解。本文根据《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的有关记载，论述了两汉时期西域各地的地方行政组织的名称和不同员额的官职。地方行政组织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国”的名称，在原来部落或土邦的基础上，任命原有国王为王，比之于内地的诸侯王。其中有些官职保留了当地原有名称，如大禄、且渠之类；有些官职则显然为汉朝中央政府所增置，如都尉之官，几乎各地都有。西域各地自君长以下的各级官吏，都受汉朝中央政府及其代表西域都护的管辖和监督。西域各君长的代立，由中央政府选定和批准。本地内乱或与他地发生冲突，也由中央政府或西域都护处置。当匈奴势力或西域各地的内乱危及国家统一时，西域都护可以调发西域各地军队平乱。西域都护除了监督西域各地的行政以外，还统帅中央政府在西域的驻防部队。汉朝驻西域的部队平时都开垦屯田，力求自给自足，以后就形成一套完整的屯田制度。各地的屯田事务统由都护总领，这不但有助于解决驻防部队的给养问题，而且对于西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作用。两汉时期西域地区的统一推动了西域同内地的经济交流，促进了生产的共同发展。冶炼、商业等莫不如此，特别是商业往来更为频繁，物资交流十分畅通。汉朝将大量绮绣杂缯等赠送给西域各地贵族，西域商人到内地购置各种货物。中亚各地商人也通过西域到中国内地经商。这些活动，不仅见诸于《汉书·西域传》，《汉书·陈汤传》，且为发现的矿冶遗址以及其他历史文物所证实。汉朝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和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为了维持安定的社会秩序和保障交通安全，在西域重要商道上修筑了许多城垒和烽燧台，驻扎戍兵。在重要地点还设置关城，稽查行旅。烽燧亭障早在武帝时期已从敦煌延长到盐泽（即今罗布淖尔）。宣帝以后，烽燧组织和城垒关卡便遍及西域各地了。

017　前汉西域经略　　　　丁国藩

（《益世报》 1948年2月24日、3月2日）

本文所指西域，系今日新疆之地（汉代西域范围，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乌孙、大宛、康居、月氏及安息等广大地区）。本文除对西域之古代人种、语言文字作了考证外，着重阐明了汉代对西域之经营。汉初，匈奴奴隶主对西北边疆，抢劫破坏，为患甚大，京都长安受到威胁。武帝初，为了实现夹击匈奴的策略，遣张骞使大月氏，骞之使命未能完成，但却探明了西域，得知西方概况，开阔了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遂促成汉武通西域的思想。当张骞还在匈奴被拘押时，汉匈关系已起了变化，霍去病两次进击匈奴，使匈奴的势力退出了河西走廊，于是设四郡，据两关，通西域之走廊遂掌握在汉人之手。为了进一步消除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又采取筑长城，设亭障，置屯田，联乌孙，取楼兰，击大宛等措施，以巩固西方边疆，并保卫西域通道。作者还根据当时考古所得，

对汉代西北部边疆的组织系统，长城的建造，烽燧的设备，邮书的传递，规模之大，技术之精良，设备之完善，都作了详细考证。证明汉代对西域经营之苦心，花费之浩大，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商道之畅通。特别是烽燧制度，组织严密，可及时传报边警，邮传驿运，已极发达，公文命令可得及时传递。故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障，交通称便，东西使者不绝于途，“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使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且不少人请命出使，借着政治、军事的保护，到中亚诸国去作贸易。中国丝绸，随着这些使节商旅，大量输往西方，塞里斯（Seres丝国）之名盛传于西方。同时，“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四方之客，盈于都门”，当时国际商道之盛，概可知矣。

018　西汉西域都护所辖诸国考　　　周振鹤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

汉人所谓西域有几重不同的含义。狭义的西域的具体范围是：东至玉门、阳关、西至葱岭，南至昆仑山，北至天山。所谓西域城郭诸国即在其中。西域都护府辖区则超出这个范围，西逾葱岭，并有大宛，北越天山，而囊乌孙。关于西域各国国名及管辖范围、距离远近及人口等问题，历来多所研究，认识各异，本文作者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列举了汉宣帝时西域都护所辖属国四十八个的名称。认为这四十八国之数乃以汉元帝时为断。但西域诸国的数目并非一成不变。对三十六国之名目，历来有所争议原因在于没有弄清三十六国的地理范围。其实三十六国是指小而分散的西域城郭诸国，并不包括这个范围以外的国家。城郭诸国是西域地区特殊地理环境的产物。在沙漠里分散的绿洲上生息的人民有城郭田畜，形成居国；在山谷的居民则随畜逐水草，称为行国。居国数目多，地位重要，故统称居国和行国为城郭诸国。作者根据三十六国的地理范围，由汉元帝都护所辖云四十八国之目，逆推汉宣帝初建都护时的三十六个城郭国应该是：鄯善（楼兰）、且末、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婼羌、小宛、戎卢、乌秅、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捐毒、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渠犁、乌垒、尉犁、危须、焉耆；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卑陆、卑陆后国、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这三十六国之说当起于宣帝初建西域都护之时，因此时城郭诸国对汉的臣属关系才完全确定，三十六国之数也才十分明确。而西域都护的辖区则超出此范围，辖有地跨天山南北的乌孙，西逾葱岭的大宛、休循、桃槐等国。

019　汉代西域都护府的由来

——兼谈郑吉的历史功绩　　　贾应逸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77年第3.4期）

“西域”，泛指历史上我国西部地区的广袤疆域，自古以来就与内地有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早在公元前的西汉，中央政府就已对西域实施行政统辖。这种行政统辖，一般被认为是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的建立而开始的。但本文作者认为，公元前102年建立的“使者校尉”乃是汉朝政府在西域最早的行政机构。必须明确，这一机构是在

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设置的。从字面理解，似为“以给使外国者”而置的统领和保护屯田的机构，实际上却是代表了汉朝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推行汉朝之政令，诸如任命官吏、征收赋税、屯田戍边、调动当地军队等等。所以，那种认为汉朝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权力自“西域都护”始的说法，显然不够全面。从公元前102年设“使者校尉”，到公元前68年改置“使护鄯善以西校尉”，直到公元前60年建立的西域都护府，前后经历了四十多年，这是一个随着统治的加强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过程。作为最后一任使者校尉的郑吉，也是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会稽郡（今江浙一带）人，曾数出西域。公元前68年，以侍郎率兵屯田渠犁，在使者校尉屯田的基础上，继续垦荒、修渠灌溉，同年秋，奉命发焉耆、危须等地军队，攻下西域要冲车师，给匈奴分裂势力以重创，并在此屯田，巩固这一要地。汉简资料表明，当时郑吉的职务正是“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其下设有副卫司马、丞、都尉、郎等官吏，可见这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它有效地统辖了较原“使者都尉”辖地更为广大的地区。显然，这是汉朝政府在西域政权职能的进一步发展。此后八年即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大衰，西域都护府正式设立，府治乌垒（轮台）。郑吉出任第一任都护，此外还设副都护、丞、司马、候、千人等官属。西域都护作为汉朝政府派遣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在西域行使国家权力、推行汉王朝政令、维护秩序、册封当地统治者、设立地方基层组织、发展生产、管理日渐兴旺的屯田事业。西域都护府建立后，从今敦煌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及帕米尔一带广大天山南北麓和昆仑山山麓，包括费尔干那谷地的大宛及伊犁河一带的乌孙等地均归之统辖。这是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为西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而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对巩固统一、发展西域生产，是有一定功绩的。

020　试论西域戊己校尉　　　侯　灿

（《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

本文主要讨论戊己校尉为何而置，它有什么作用，设置后有什么变化，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问题。

西汉初年，匈奴奴隶主屡侵西北边境，有时直接骚扰到西汉首都长安，不仅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严重威胁西汉政权。武帝时反击匈奴的条件已经成熟，除派张骞两次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和乌孙外，还于元光、元朔、元狩年间大规模地出击匈奴，迫使匈坊远循，取得了“河南“、“漠北”及“河西”之战的巨大胜利，并在河西置郡设官，隔断了匈奴与羌族的联系。此后，西汉政府与匈奴贵族政府之间，又在西域开展了激烈的争夺战。从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至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的三十多年间，既有三征楼兰，三伐大宛之举，其后又有“五争车师”之争夺战。在此基础上，于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正式设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戊己校尉的设置是西域史上的一件大事，主要是为了建立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构加强军事实力，以巩固西汉中央政府对匈奴用兵所取得的胜利，并为西汉中央在西域设置都护创造了条件。神爵二年(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兼护南北道，至此西域正式统属于中央王朝。设立戊己校尉的主要作用是：抵御侵扰，以备征讨。因为戊己校尉所辖的是一支就地屯垦的部队，这支部队可组织西域各国对付强敌侵扰，同时还可加强西域社会秩序的安定；协助西域

都护，安辑诸国；屯田积谷，减少中央耗费；促进“丝绸之路”的畅通。至于戊己校尉的性质，文章认为：它既受中央又受都护的双重领导。从掌握兵权受命调遣，属中央；从行政管理，经营屯田，则又属都护。它是一种耕战相结合的既受中央，又受都护领导的屯垦戍边部队。关于戊己校尉的历史，根据史籍记载，从西汉宣帝元康四年开始，至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高昌郡建立为止，近四百年时间。从设官的变化可分为：宣帝元康四年至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成帝建始中（前30至28年）至河平年间（前25年）和成帝阳朔四年（前21年）至东晋咸和二年三个时期。从屯驻处所的移徙情况看，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第一次开始在车师屯田起，至元帝建昭三年，其屯驻处所在车师前王庭交河城。第二阶段从成帝建始三年至河平四年，己校徙屯姑墨，戊校屯驻交河。第三阶段从成帝阳朔四年至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戊己校尉屯驻高昌壁。第四阶段从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至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在车师前后部分别设置戊己校尉，车师后部戊己校尉屯驻金满城；前部戊己校尉屯驻柳中城。第五阶段从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至东晋咸和二年，戊己校尉屯驻处所一直在高昌壁。

戊己校尉屯驻的处所——交河，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要冲，高昌是新北道上的枢纽。设置在这条“丝绸之路”上的戊己校尉，在巩固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成果，安定西域的社会秩序，对“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和中西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作用。

021 汉晋时期的西域戊己校尉　　侯灿

（《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从西汉到东晋时期，历代中央王朝都曾在西域设置戊己校尉的官职，在西域都护的领导下，它对管理士卒屯田事务，巩固对西域地区的统治，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戊己校尉设置的历史、屯驻处所、作用、名称来源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戊己校尉从何时开始设置？史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始置于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其根据是《汉书·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的记载。作者根据《汉书·西域传》总叙和车师条的记载：“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是岁元康四年（前62年）也，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认为戊己校尉的设置当在汉宣帝元康四年，比初元元年早十四年。从元康四年到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高昌设郡为止，戊己校尉存在了将近四百年时间。在这近四百年的历史中，除西汉建始、河平年间有过短暂的戊校、己校分设，东汉永平末年有过短暂的同官分任外，其余时间都是一职一官。戊己校尉的屯驻处所，曾经有五次变动。戊己校尉的设置，对抵御匈奴贵族势力的侵扰，安辑西域诸国；屯田积谷，减少中央耗费；发展农业生产，繁荣西域经济；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都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关于戊己校尉名称的来源，古人有三种说法：一是说戊己没有正位，“寄治耳”；二说戊己居中，镇抚四方；三是说“厌胜”，“西域在西为金，匈奴在北为水，戊己生金而制水”。作者从汉代名官以事以地的总倾向考查，根据戊己校尉设置的历史背景和事件本

身探索，否定了古人的说法，认为戊己之名有两方面的含意；一方面是表示从崇高天地日月——戊己的匈奴贵族手中夺取了车师；另一方面又表示对匈战争在西域取得的巩固性胜利。戊己校尉的命名，仍然属于以事名官的范畴。文章还对研究西域的一些著述中所说的“两校尉”，“三校尉”，等提法做了考证，认为《后汉书·西域传》总叙里“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的记载中，“二”字应是衍文，后来治史者未认真考查，以讹传讹，越弄越乱。“三校尉”并非戊己校尉，而是汉武帝征和年间的三个屯田校尉。至于《陈汤传》中“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其三校都护自将”的“校”字，应作部分的“部”字解释。所谓六校应是指的六个部份，而不是“六个校尉”。

022　西汉时期西域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情况

——《汉书·西域传》研究　　钱伯泉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4期）

新疆古称西域，从先秦古籍来看这里与内地交往频繁，即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自张骞通西域，汉宣帝设都护，西域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为了有效的统治西域，汉朝政权对西域进行了多次有关人口、社会经济和交通情况的实地调查，其中最完整的资料保存在《汉书·西域传》。《汉书·西域传》所记的各国统计数字，为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所得。为了说明问题，文章将《汉书·西域传》所记四十八国人口数户数，列表作了说明。从表中数字得知当时西域各国户数为227,550，口数为1,286,679，胜兵数330,424。元始二年关内各地的户数为12,233,062户，西域占全国总户数的五十五分之一；关内各地的口数为59,594,978，西域为全国的四十七分之一。若以一九八〇年新疆人口为1,283万人，全国人口为九亿八千万人计算，新疆人口为全国的七十六分之一。汉朝的比数要比一九八〇年的比数高得多，可见西汉时期，西域是很富庶繁荣的，无论人口的密度，还是生产的发达，都与中原地区的一些郡国不相上下。当时西域的大部分国家是定居的，有城池，主要从事农业，少部分则从事畜牧业生产。从分布情况看，塔里木盆地周围，除若羌、鄯善外，都经营农业生产。昆仑山及葱岭山中，天山以北各国都从事畜牧业生产。另外西域各国矿产丰富，许多国家出铜、铁、铅。早在西汉以前，这里的一些国家就知道冶炼鼓铸，用来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武器。从《汉书·西域传》所记的社会经济情况来看，当时西域各国已有阶级分化的现象，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阶段。西域各国最高统治者有“王”，下面又有名目繁多的各级官吏，此外，乌孙、车师、大宛、龟兹、焉耆都有“贵人”，所谓“贵人”，也就是贵族，这些人都属统治阶级。

西汉时期的中西交通和贸易关系非常兴旺，中西贸易大都以官方的形式出现。西域各国派遣大批使者到中国来，以向汉朝贡献为名，进行贸易，商人也都参加到使者的行列中。汉朝皇帝派出的使者也是官商，他们出使西域既要完成皇帝指定的政治任务，也用皇帝的货物进行交易。西汉时期的贸易商品以黄金和丝绸之主，其次是白银、漆器、竹杖、木棉布等。西域输入中国的物品，有马匹、骆驼、裘毛、珍珠、香料等。在当时汉通西域的交通有南北两道，作者对两道所经国家由东向西，列表作了介绍：

南道：

阳关⟶鄯善⟶且末⟶精绝⟶于弥⟶于阗

⟶皮山⟶
- ⟶莎车⟶西夜⟶蒲犁⟶无雷⟶大月氏⟶乌弋山离
- ⟶乌托⟶罽宾⟶天竺（印度）

北道：

玉门关⟶车师前王廷⟶焉耆⟶乌垒（西域都护治所）⟶龟兹

⟶乌孙⟶康居
- ⟶奄蔡
- ⟶大宛

⟶姑墨⟶疏勒⟶
- ⟶大宛⟶康居⟶奄蔡
- ⟶大月氏⟶安息

023 东汉后期至北魏对西域的管辖 苏治光

（《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

西汉宣帝时置西域都护管辖西域，东汉安帝延光时改置西域长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王朝曾短暂地统一南北外，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地方割据，形成南北对立局面。那么，从统一王朝转化到南北对立这段时期，中原政权究竟是怎样管辖西域的呢？本文专就此问题进行了简略地分析。西域在先秦时就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各地保持着密切联系。秦汉之际，匈奴占据河西走廊，西域与中原的联系暂时受阻。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破匈奴后，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昭帝时又增设金城郡，乃称河西五郡。从此西域与中原地区联系畅通，西域也正式列入汉王朝版图。汉王朝除保留西域各国原来政体外，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治理。到汉元帝时在车师前部设置戊己校尉，专门防御北匈奴进入西域。从西汉末到东汉中期，由于汉王朝政策上的失误，西域曾经“三绝”于汉，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也曾两度复置又复罢。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设西域长史去平定西域。此后，西域长史在敦煌太守领导下管辖西域，兼负车师地区防务。作者特别指出，从汉安帝延光二年到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3—127年），这一任西域长史的职权与后任西域长史职权有很大差别。这任西域长史是班勇，他任西域长史四、五年间，职权很大，敦煌太守只起配合作用，他实际上担负了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的职责。班勇免职以后、西域长史除指挥后部司马防守车师地区外，还继续负责安抚西域诸国，但要在敦煌太守领导下进行。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以后，又复置戊己校尉负责车师地区防务，西域长史仍在敦煌太守领导下管辖西域。此后，历桓、灵、献各帝直到魏晋，沿袭不变。曹魏管辖西域是从整顿河西四郡开始的。在整顿河西四郡过程中，由于曹魏王朝大力抑挫地方豪强势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及盐业生产，实行佃田、罚赋，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使河西四郡各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执行保护西域商人的正确措施，赢得了西域的信任，从而保证了对西域的管辖。曹魏仍沿袭汉顺帝以来旧制，设置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管辖西

域。从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到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0年）、西域长史府仍管辖西域，戊己校尉仍坚守车师防区，并未因京师有乱而自行废除。文章分析了未废除的原因。西域长史府设有司马、假司马、主薄、从掾、郎中、录事、监量、兵曹、铠曹、功曹、仓曹、水曹等官职。西域长史主持管理西域各国的日常工作，如向西域各国转达中央政府和敦煌太守的命令，迎送并保护中央派往西域去慰问各国的特使、反映西域各国动静、迎送西域各国进京朝贡的使者，维护西域南道与中道商队的安全。由于魏王朝沿袭汉王朝管辖西域的正确方针，在敦煌太守、戊己校尉、西域长史的努力下，"其大国龟慈、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晋王朝也沿袭汉、魏王朝管辖西域的方针，除继续派遣西域长史、西域戊己校尉管辖并保卫西域外，对来朝贡的各国不仅赏赐丰厚，还授予官爵、印授，如鄯善、焉耆、龟慈、疏勒、于阗王都被封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候"。同时，还常派特使慰问西域各国。西晋亡后，东晋偏安江南，北方群雄割据，史称"十六国"。西域由于地理位置及行政隶属关系，一直属于凉州地方集团的势力范围。从全国范围讲，谁占据凉州，谁就拥有西域。前凉张氏、后凉吕氏、西凉李氏、北凉沮渠氏都先后割据凉州，拥有西域。前凉起初承袭魏晋制度，仍置西域长史管理西域日常工作，戊己校尉负责高昌地区防务。后来，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前凉还把西域（包括高昌郡）与敦煌郡、晋昌郡划为一个行政区，设沙州刺史、西胡校尉治理。沙州刺史下设敦煌太守、晋昌太守、高昌太守，分别管理各郡事务；还设西域长史营、戊己校尉营、玉门大户军营，分别负责西域的日常事务与防务。这一套行政制度为后凉、西凉、北凉所沿袭。这些凉州地方割据集团，必须向被视为中原王朝的中央地方割据集团称臣纳贡，接受官爵封号，才能自存。中原王朝忙于逐鹿中原时，就通过凉州地方割据集团管辖西域。当有余暇西顾时，就出兵统一凉州，直接管辖西域。

024 论汉代乌孙对伊犁河流域的开发

——关于汉代乌孙族人口发展问题的研究　　　　王明哲

（《新疆社会科学》 1983年第1期）

本文从汉代乌孙族人口的发展，论述了乌孙对伊犁河流域的开发。

伊犁河流域，既是新疆著名的农业基地，又是著名的林牧区。《汉书》记载："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历史上有名的"天马"——伊犁马就出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引了许多游牧民族，诸如塞、大月氏、乌孙、悦般、哌哒、西突厥、突骑施、葛逻禄、回鹘、契丹、蒙古以及哈萨克族等等，都曾在伊犁河流域活动或与之发生过联系，促进了这里的发展。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地区的开发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而游牧民族所经营的畜群的增多，既能提供更多生活资料，促进人口发展，又迫使人们寻求开发新草场。据《汉书·西域传·乌孙传》记载：乌孙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但未载明这项统计的时间。作者认为，乌孙人口的增长，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乌孙西迁前后（前160年左右）至汉武帝元狩、元鼎年间张骞通乌孙时（前119—115年），约四十年左右。据《史记·大宛列传》，西迁前乌孙曾"控

弦数万"的资料，及张骞二使西域到乌孙时"国众分为三"而各拥兵万余骑的情况，全国之兵约五万骑，循此上推四十余年，乌孙西迁时全国之兵当在五万骑以下，大约三万之谱。再据《汉书·乌孙传》所列乌孙户、口、兵的比例，以及古代游牧民族，军事和生活组织合二而一的社会特征推算，乌孙西迁时的人口约为十万五千人左右。西迁后，经四十余年，按拥兵五万骑推算，全国有户三万五千左右，有口约十七万五千人左右。四十余年，户、口、兵分别增加了约75%、66%、70%。

第二阶段，大致从武帝元狩、元鼎直至汉宣帝本始（前73—70年）年间约五十年左右。《汉书·西域传·乌孙传》载，昭帝末和宣帝本始之初，匈奴屡侵乌孙，汉发兵十五万骑援助，而乌孙自将"国半精兵五万骑"出征，那么全部兵力当为十万，依此推算，总户约为七万户，人口约为三十五万。这是乌孙人口的又一次重大发展，也是乌孙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伊犁河流域进一步开发的重要证明。

第三阶段，是从宣帝本始三年到甘露（前53—50年）年间约二十年左右。这是乌孙人口的飞跃发展时期。这期间户数增至十一万，人口增至五十五万，胜兵增至十六万五千。析其原因，本始之战后，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开始瓦解，乌孙一跃而为西域最强大的政权；战争中，乌孙俘虏四万人及牲畜七十余万头，大大增加了实力；在西域的威望显著提高，就乌汉关系，本始之战是双方在政治、军事上结盟的标志，战后又进一步从结盟走上"内附"（即归属汉王朝）的道路。

文后附有乌孙户数、人口和胜兵发展增长情况表。另外，本叙录中已收有林干撰《乌孙及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王炳华及本文作者合撰《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读者可参照阅读。

025 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 韩儒林

（《文史杂志》 1942年第2卷第2期）

汉代击匈奴，建河西四郡，始开东西交通。但要保证中西交通畅通，必须进兵西域，肃清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及影响，否则，不唯中西交通不能维持，而且西北边郡人民不得安宁，国家民族的命运也要受到严重威胁。由于西域地处边陲，交通工具和道路均甚陋劣，首先对军事上所需粮饷的运输，是一个难于克服的困难。作者认为战争的胜负，则系于粮草的充足与否，进击匈奴是如比，进军西域也是一样。《汉书·西域传》中记武帝常自述其经营西域给养困难的情形，认为由内地向边陲运输粮饷绝不可能，依靠西域诸国，供给远征军的军粮，据武帝的经验，也是靠不住的。为了彻底解决西域的给养困难，解决军粮的补充，减轻国库负担，切断匈奴右臂，在西域开设屯田，乃是军事上的一件重大政策。西汉在西域屯田，虽有渠犁、轮台、伊循、乌孙、车师等地，而在军事上占重要地位的则为渠犁及车师。汉代先屯田渠犁，后又迁到车师，即西汉经营西域，初以渠犁为中心，向东逐渐进至车师。据作者考证，匈奴经营西域的中心，是先由焉耆一带迁到车师，汉为驱逐匈奴计，自然要东夺车师，因车师是西域的门户。匈奴为了保存自己在西域的势力，绝不甘心放弃车师，所以西汉与匈奴争夺车师，前后达五次之多。西汉与匈奴五争车师，其中第四、五两次，都是郑吉凭借渠犁作根据地，率领

屯田士卒，实现了东制匈奴的目的。至此，西域都护郑吉，终于完成了武帝切断匈奴右臂的大业。后汉时，敦煌车师间的新路，大致上遵循现在甘新大道，这条路线上的伊吾(今哈密)又变成了汉与匈奴争夺的要冲。因为通往车师前后王部，都必须经过伊吾。而车师前王部(吐鲁番哈喇和卓)是通天山南麓诸国的门户，车师后部金满城(济木萨)是通往天山北麓诸国门户。汉通车师前后王部，既然都须经伊吾，则可知伊吾在这条道路上地位的重要。按东汉建武至延光，西域三通三绝，但对伊吾的争夺，竟达四次之多。前汉与匈奴五争车师，后汉与匈奴四夺伊吾，因其地为当时经营西域之要冲，扼中西交通之咽喉，故两汉对此两地的争夺，不仅关系中西交通，且关系到西北边郡的安宁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因此。两汉在西域的用兵，对保护商旅往来，保卫中西交通的畅通至关重要。

026　两汉在西域屯田论述　　　彭慧敏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1期)

本文论述了两汉在西域屯田的原因、过程及历史作用。文章认为，屯田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对于开发边疆、巩固边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国策。中原政权大规模地"移民实边"始于西汉，历代相袭不断，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文章分析了采取屯田政策的原因，是因为秦始皇采取戍边政策以防匈奴，常年在北方边界戍守的有40万人，这些人不但本身不能参加生产劳动，还要几倍的人为他们从中原长途运输粮食等生活用品和军需品，促进了秦朝的灭亡。西汉吸取秦朝戍边失败的教训，汉文帝采纳晁错《募民徙塞下书》的建议，实行屯田政策，收到明显的效果。两汉在西域屯田，始于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年至前105年)，直到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还在车师后部侯城置戊部候。西汉屯田区有：眩雷、轮台、渠犁、伊循，赤谷，交河，焉耆，高昌、姑墨、北胥鞬等十处，东汉屯垦地区主要在金满城、柳中、且固、伊吾卢等五处。根据出土文物，汉政府在精绝(今民丰县境内)也曾屯田。文章简要介绍了这些屯田区的具体地点及情况，论述了屯田的意义。认为两汉在西域的屯田，不但巩固了张骞通西域以来所创立的勋业，而且与西域各族人民交流了生产经验，丰富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生活，为巩固边疆、保证祖国经济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安居乐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沟通丝绸之路起了积极作用。致使屯田事业本身，也由边疆而内地，历魏、晋、隋、唐至明、清而沿袭不废。

027　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　　　李古寅

(《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1期)

汉代西北屯田包括军屯和民屯。本文对过去在民屯研究方面的一种普通看法，即认为在各级田官管理之下的屯民(徙民)是国家的佃客，租率为百分之五十左右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首先，汉代西北民屯(徙民)究竟由什么机构进行管理？是国家体系，还是郡县体系？作者在探索了汉代徙民的原始后，认为是后者。西北屯田是民屯、军屯并进。民屯由晁错的倡议肇其端，大规模的实施则在汉武帝中朝以后。晁错对民屯的规划，集中反映在他给汉文帝上的《募民徙塞下》的奏疏中，这篇奏疏一方面指出西北边民

少，经常受匈奴侵扰，徙民实边有必要性；另方面，“选常居者，家室田作”，是要搬迁者安家落户，建立且农且军的民防体系，并非一时权宜之计。至于民屯成份，及国家对民屯的方针政策，晁错的意见是：第一，徙民的主要方式是“募”；第二，民屯的成份是罪人，免徙复作、丁奴婢、贫民不能自立者；第三，对徙民予以种种优待，使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巩固边防利益相结合。文帝听从晁错建议，“募民徙塞下”。不久，晁错又二次上疏，对徙民的管理体制作了进一步的设计，是把徙民置于一般郡县乡里行政系统管辖之下的。晁错计划之实施始于文景之世，至武帝时则大批民屯队伍开赴西北。至于西汉王朝对徙民的处置和管理，基本上是对晁错设想的具体实践。作者在引证了《汉书·武帝纪》、《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域传》、《汉书·地理志下》等史籍关于破匈奴，徙民实边，在河西地区建郡置县的有关记载后指出，汉代大量徙民只能置于郡、县、乡、里的民政体系中，而不在各级田官系统。关于汉代西北民屯（徙民）的剥削方式和剥削量，作者否定了“课取收获物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地租率”之说，并认为曹魏民屯和汉代徙民的剥削率并无承袭关系。曹魏屯田民的租率是“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是无问题的。但曹魏屯田户除分租以外，基本上不负担国家其他赋役徭戍。而汉代西北民屯（徙民）除地租（地税）外，还有其他赋役徭戍。再者，汉代徙民五五分租的观点是和当时优待实边徙民的政策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两汉时，内郡民户土地税尚是三十税一，在其他赋役相同的情况下，边郡负有戍守任务的徙民不可能反而税百分之五十。从各方面分析，把曹魏屯田四六分组，五五分租的剥削率，硬套到汉代徙民头上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在“更赋皆给”的情况下，汉代民屯（徙民）的土地税当为三十税一，或低于此，方较合适。总之，当时徙民屯田的意义：1.自武帝元狩二年向河西徙民建郡，其军事意义很大，而且对经营西域起了大本营的作用。2.汉代民屯调整了生产关系，缓和了土地兼并。3.西汉末年，隗嚣割据陇右，领有河西的窦融归附中央政权，对隗嚣迅速败亡和东汉的统一起了莫大作用，而其根源则应追溯到西汉的徙民实边。4.屯民同广大戍田卒一起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加速了西北各民族的融合。

028　西汉敦煌军屯的几个问题　　徐乐尧　余贤杰

（《西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

西汉王朝开拓河西及西域后，实行戍边屯田政策，这对开发边疆，巩固边防，保障丝路畅通都起了积极作用。本文仅就敦煌军屯问题，根据史籍文献的有关记载，结合汉简及实际考察资料，考证并论述了西汉在敦煌军屯中的几个问题。一、关于驻军屯田与戍卒屯田的问题。一般认为，西汉时期河西的军屯，开始就是戍卒屯田。经作者考证，认为西汉敦煌的军屯，在利用戍边士卒进行屯田之前，曾经历了一个驻军屯田的阶段。西汉敦煌屯田的时间，至迟不晚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这表明，西汉王朝在经过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即在敦煌留驻军队，进行屯田，以巩固敦煌这个卫护河西走廊和经营西域的重要前哨阵地。二、关于戍卒屯田问题。比早期的驻军屯田有较大发展。其开始时间与敦煌障塞亭燧的建立相一

致，即敦煌建郡以前的元封四年。当时在敦煌北塞设置有宜禾、中部、玉门三个部都尉，在南塞设有阳关部都尉。在部都尉下，设有侯官、侯长、燧长以及各级属吏。敦煌边塞的候官数共有12人，即：广汉、美稷、昆仑、鱼泽、宜禾（以上宜禾都尉）；平望、破胡、吞胡、万岁（以上中部都尉）；大煎都、玉门、玉门关(以上玉门都尉）。敦煌障塞亭燧组织系统的建立与完善，标志着戍卒屯田的开始与发展。这一阶段参加军屯劳动的人员，有守谷卒、刑徒、吏卒家属和戍卒。三、关于敦煌军屯的地区问题。主要有三个地区，即玉门都尉大煎都侯官辖境、宜禾都尉鱼泽侯官属地和阳关都尉所属渥洼水西岸。四、敦煌军屯的组织领导问题。与居延地区存有很大差别，居延边塞的军屯，有一套完整的组织领导系统，而敦煌边塞则没有。这里因为居延军屯的规模比敦煌大得多；但敦煌的防御组织却比居延更密集，所以敦煌的边塞防御组织系统也即军屯的组织系统，没有再设田官系统的必要。五、关于军屯与民屯的关系问题。西汉敦煌的障塞亭燧建立在先（元封四年），郡县设置在后（元封五、六年），障塞亭燧的辖境即是后来置县设郡的基础；而敦煌徙民屯田则与设置郡县同时。故军屯乃是民屯的先导，它为民屯的开始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而民屯又是在军屯的卫护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六、关于居延汉简中“负马田敦煌”的记载问题。有人认为汉武帝太初年间敦煌屯田中，曾使用过马耕。作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此说与西汉的马政史实不符，与牛耕发展的史实不符，这与对简文的理解有误相关。简文中的“负”字乃“负佗（以驴马骆驼载物）”之意，是将自备马匹，驮物支前；战争结束后，又在敦煌参加屯田活动，把这样两件事合记在一起了。

029 汉代河西军屯劳动者成份和生活状况　　李古寅

（《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第4期）

关于汉代河西屯田结构形式及其具体内容，有待进一步钻研。本文专就河西军屯劳动者成份和生活状况进行了研究。从汉简中考察，河西军屯劳动者成份有六类：（1）田卒、河渠卒：这是专事务农的戍卒，多由内郡人充当。从《居延汉简》的记载看，田卒备有武器，说明田卒系农时耕种，闲时戍守，战时打仗。田卒的衣物由国家统一发给，从事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河渠卒负责修渠灌溉，比专事农耕的田卒为少。但因敦煌、居延所凿井渠与内地井渠的形式显然不同，流泉既多，溉区亦广，故须专人守护，因而河渠卒的地位亦很重要。（2）牧士：为专事牧牛者。汉武帝末年，在居延一带推行代田，使用牛耕，这些牧牛人即“牧士”，他们在屯田中也起了重要作用。（3）戍卒家属：戍卒家属是军屯的一支重要劳动大军。汉简里有很多家属名籍，这些简牍说明，在屯戍系统中家属人数甚众。家属之中的妻子、父母、弟妹等年岁，大都在十七岁至五十二岁之间（子女除外），恰是能够耕作的年龄，因而可称为屯田的劳动大军。分析家属廪名籍和戍田卒廪名籍，得知边防戍田卒有集体生活方式和单家生活方式两种。边防屯戍的下级军官侯长、燧长、亭长之属，大凡由边郡人充任，他们赴任时有带家属的；这些带家的戍卒，或者是携家长期戍守，并不以一年为限，或者是戍边期满后，即安家边陲，成为民屯的后备军。（4）刑徒、复作：两汉军屯劳动力，还有相当一部分徒刑、

复作。《汉书·赵充国传》载："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屯田。赵充国在奏疏中把弛刑名列首位，反映出刑徒在屯田中地位的重要。汉简中刑徒、复作屯田戍边的材料就更多了。弛刑屯士是两汉军屯系统中一部分重要劳动力。（5）燧卒和省卒：这两种戍卒和纯粹的屯田卒相反，戍守是第一任务，耕田或其他辅助性劳作为第二任务。（6）军屯佃客和佣工：军屯佃客是作者提出的新问题。作者对居延汉简中有关"客"、"客子"、"客民"的简文作了分析并证之于文献资料，认为汉简中的"客"、"客子"、"客民"是军屯中的佃民。他们或为内地失掉土地而流落到边地的流民，或为卖掉份地的徙民。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只得租种农都尉所属的公田，缴纳一定的地租。军屯劳动成份有如上述。综上分析有以下特点：军屯者的工具，由国家统一发给；屯田卒的食盐由公家发给；戍田卒的蔬菜自种自食；戍田卒和其他屯田劳动力有一定的文娱生活。六类军屯劳动力，除军屯佃客和佣工外，其他五类屯田队伍都属劳役剥削。统治阶级虽采取过一些措施，使他们久安其处，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生活异常艰苦。不过，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军屯劳动者，用他们的生命和血汗保卫了边郡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为巩固西北边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030　西汉屯田与"丝绸之路"　　　张荣芳

（《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本文作者于1982年7、8月参加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和兰州大学历史系联合组织的秦汉时期丝绸之路考察队，考察了兰州至乌鲁木齐一段。沿途参观了各地区出土的历史文物，考察了一些屯田遗迹和烽燧遗址，收获颇大。经过实地考察，使作者对于西汉在西北地区的屯田是"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重要作用深信不疑。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一、屯田对打败匈奴的作用。匈奴在战国时代就在大漠南北兴起，秦汉之际，发展成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大奴隶主军事政权。匈奴奴隶主贵族恃其强大，常进犯中原地区，而且切断了中原与河西走廊和西域的联系，阻塞了中西交往的通道。秦为防御匈奴侵扰，一是修筑长城；另一是徙民实边和派遣有罪之人戍守边疆。汉初，由于社会经济凋敝，匈奴不断南扰，边郡不胜其害。文帝时，晁错总结了秦戍边的经验教训，提出不仅"谪戍"边境，而且要募民在边地垦田，实行长期守卫政策。汉文帝"从其言，募民徙塞下。"这是对匈奴作战的一个战略考虑。武帝时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些胜利，始终与移民实边和实行屯田有关。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汉在河西设置四郡，一方面修筑军事防御工事，一方面积极徙民与屯垦。从史籍和出土汉简材料看，西汉在河西四郡屯田的规模很大。文章评述了河西屯田的作用后指出：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汉朝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是分不开的；而反击匈奴的胜利，又与汉朝在西北实行屯田紧密相连。此为武、昭、宣时期的历史所证明。二、西域屯田解决了往来使者和商人的食宿供应问题。随着对大宛战争的胜利，汉武帝把河西屯田的经验和制度传到西域，于是屯田在西域地区逐渐开展起来。为了使"丝绸之路"畅通，西汉在西域屯田所选择的地点大抵考虑两个因素：第一，土壤膏沃、水源充足；第二、军事、政治上的要冲。作者列举了轮台、渠犁屯田区、车师前部、交河屯田区、姑墨屯田

区，乌孙赤谷城屯田区，伊循屯田区，北胥鞬屯田区等地区的情况予以说明。西域屯田的历史作用，作者认为更重要的表现在屯田使汉朝在西域的常驻军队和政府官员有足够的粮食供给。由于在西域屯田积谷，使西汉的军队能在西域站稳脚跟，并向西域诸国征取赋税，进一步解决往来使节和商队的食宿供应，从而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三、屯田与巩固边塞的关系。秦统一中国后，为防匈奴骚扰，将各国长城连接修理，成为“万里长城”。汉为巩固边防，也修筑长城，文献中往往称为塞、障塞、城障、列城、亭障、亭徼、亭候、亭隧、坞壁等。这种塞与亭、障、隧、壁、坞相结合的边防线，对于保卫边疆，保护往来使者和商队都有重要作用。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这种边防线也伸延到河西和西域。文章征引文献记载，对令居以西至酒泉，酒泉以西至玉门，玉门西至盐泽，盐泽以西至库车，以及居延塞等五段边塞的修筑时间、长度、建筑结构等作了详细介绍。纵观西汉时为防御匈奴和羌族，交通西域，在河套以西至西域，兴建了规模巨大的三、四千里障塞、亭、燧，构成了巩固的边塞防线，在政治、军事、经济和交通诸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文章还论述了这条边塞防线与屯田的关系：一是修筑边塞的劳动力主要是屯田士卒；二是守卫边塞的人主要是屯田士卒；三是修筑和守卫边塞的人的粮食供给都是靠屯田。可见实行屯田后，边郡的粮食供应情况。因此，屯田使东起河西，西到西域的漫长边塞得以巩固；边塞的巩固，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四、丝绸贸易的历史见证。汉武帝以来的屯田制度，使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到西域这段丝路畅通无阻。当时丝绸贸易的情况，从两方面反映出来。一方面是往来使者把丝绸西运，另一方面是商业性质的丝绸贸易。西汉时代丝绸贸易的盛况，不但见之于文献，而且为地下出土的实物所证明。总之，作者认为西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以后，“丝绸之路”畅通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在西北地区实行屯田是最重要的原因。

031 KHROM（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

〔匈〕乌 端著　　荣新江译

（《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本文探讨了古典藏文中Khrom一词的含义和它在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吐蕃帝国行政组织中的地位。这个词的原意是“市场、城市、人口”。有的学者将其作为一个行政单位译作“刺史”。本文根据古典藏、汉文献、敦煌文书和碑铭等史料，对这个词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Khrom是包括唐朝前期数州在内的一级行政单位。它基本上是军事性质的。所以译为“军镇”比较合适。史料证明，在吐蕃帝国的行政制度中，没有任何可以和唐朝的州相对应的行政单位，因而不能用对应唐朝一州之长的“刺史”来翻译。军镇下面还有下属节儿。有的学者也译为“刺史”。作者认为这个词更宜于和所谓“县”而不是“州”的长官相比拟，因而应译为“城主”。军镇是设立在吐蕃帝国东、北和极西边境地区的军事组织，在帝国内部没有这种机构。文章还考证出自公元八世纪末到吐蕃帝国崩溃这一时期一些军镇的名目。这些军镇是：（1）玛曲军镇：位于林国和果洛地区附近，也即黄河上游河曲附近地区；（2）野猫川大军镇：位于青海湖的东部或东北部地区；（3）凉州大军镇：即今武威；（4）瓜州大军镇：除瓜州外，还包括肃州和

沙州；（5）"萨毗"军镇：包括整个罗布泊地区；（6）一个位于于阗王国中的不知名的军镇；（7）小勃律（吉尔吉特）国之军镇。本文所考证的许多军镇均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也可看出当时吐蕃帝国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故为研究丝绸之路者应注目之资料。

032　隋朝对于西北之开发与经营　　　　李松五

（《西北论衡》1938年第6卷第11、12期）

本文首先对历代开发与经营西北边郡及其兴衰史实，作了简略介绍，然后对隋朝经营西北之业绩，从开发西北，交通建设，对外政策及商业贸易为重点，进行了阐述。隋朝统治中国时间较短，即从开皇元年至大业十四年（公元581——618年），但对中国历史的演变和社会的进步，却占有重要地位。隋初，突厥侵占北方，几至中原，吐谷浑雄据西北，阻隔中西交通，前者为文帝所降服，后者为炀帝所击败，西北边郡之地完全收归隋之领域，从而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文、炀二帝都很注重西北之建设。开皇三年，帝令河西立堡营田，以实塞下。大业四年，谪天下罪人为戍卒，大兴屯田于河源，五年大赦天下流民，于西北边塞筑堡营田，击败吐谷浑，以通西域。在此基础上，注意水陆交通之建设。西北陆路交通自汉开始，至隋炀帝时日趋繁荣，当时中西交通自敦煌至西海，凡为三道，畅道无阻。故在开皇、大业时，与西北各族交通频繁，通商互市，彼此称便。大业五年，炀帝"西巡河西，西域诸胡，佩金玉，被锦罽，焚奏乐，黾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州县督课，以夸示之。"由此可见当时河西社会之繁荣以及国际贸易之兴盛。作者还根据有关历史记载，对当时有西域胡人来往经商的贸易市场，如长安、洛阳等五十余个城市作了统计，并将输入输出之商品也作了简要介绍。通过本文，可略知隋朝对西北之经营和当时中西商道之畅通、国际贸易之繁盛。

033　略论隋朝对丝路的经营　　　　陆庆夫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中国古代史论文辑刊）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对丝路经营的业绩，首推西汉。此后，战乱不休，"或绝或通"。隋朝统一南北，丝路经营又进入高潮，而论者不多。本文专就隋朝对丝路的经营作了详细考察。隋朝对丝路的经营，首先是开通了西域的三条道路。裴矩《西域图记》载："从西倾以去，纵横所亘，将二万里，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北道从伊吾，中道从高昌，南道从鄯善，总凑敦煌。"这说明有三条道路可通西域。但在隋初，由于"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军旅数起"，丝路为之阻塞。因此，解决突厥和吐谷浑问题，既可解除其对边防安全的威协，又能打开通西域的三条道路。隋对这两个周边部族，采取了不同方式。其一是施展谋略，离间东西突厥；其二是用武力平定吐谷浑。隋朝对突厥、吐谷浑所采取的行动，使西域诸国震动很大，据史书记载。"及灭吐谷浑，蛮夷纳贡，诸蕃慑服，相继来廷。"于是通西域的三条道路完全畅通。隋在解除威胁、

开通丝路的同时，沿丝路地区设置了一些重要机构，主要是：1.建立郡县，加强管理。它们是鄯善郡即古楼兰城，统显武、济远二县；且末郡，统肃宁、伏戎二县；西海郡，即吐谷浑国郡，统宣德，威定二县，河源郡，统远化、赤水二县。此外，还在丝路北道要冲伊吾地区设置伊吾郡。五郡的设立，不仅有效地保证了丝路安全，而且将这一大块古代各族人民长期生活的地方纳入隋朝版图。2.驻守军队，移民屯田。隋在丝路沿线布设军队，不仅担负戍守边防任务，还负有开荒屯田，供应丝路的职责。3.设西域校尉，监管贸易。西域校尉，负责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和通商事宜。西域校尉很可能设在张掖。裴矩受隋炀帝重托，坐镇张掖，往来于武威、敦煌、伊吾之间，通过多种方法，引致西域使者、商旅到内地活动，对丝路上国际间的交往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由于隋朝对丝路经营的重视，与西域之间的交往，一度出现繁荣之貌。首先表现在与西域交往范围更大，来往国家较前代更加增多。从范围讲，两汉所通西域大体是指敦煌以西、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一块地方，隋则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势力可及乌浒(阿姆河)以西地区。从国家讲，汉时西域“称名号者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乃五十五王”，其中有的“户民数十即称国王，徒有名号。”而隋裴矩所记西域四十四国“皆余千户，利尽西海，多产珍异。其山居之属，非有国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载。”与西域的交往还表现于贸易的繁荣。隋代还于建国门外置四方馆，设专人掌其方国互市事，又在缘边各地置“缘边交市监”，与各国开展贸易活动。隋对西域的交往又表现在文化的互相传播。以音乐为例，西域音乐自张骞通西域伊始，就逐渐东传，为内地人所喜闻。至隋定七部乐、九部乐，皆以西域乐为主。唐又发展为十部乐。当时所用乐器，如竖头箜篌、曲项琵琶，“并出自西域”。纵观隋朝对丝路的经营，无论在恢复中西交通，促进文化交流，开拓国家疆域，加强民族融合等方面，贡献是巨大的，意义是深远的。它给唐朝进一步经营丝路，建业西域，创造了条件，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034 唐代对西域的开拓和经营　　章伯锋

（《社会科学》“甘肃”1980年第3期）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盛大局面。因此，繁荣的丝路之上的内地、西域和中亚各国的商人、使臣往来不绝，东西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丝绸之路的畅通，主要是唐政府在西域建立了巩固的统治，并施行有效管辖的结果。唐王朝建立时，西域地区主要为突厥势力所控制，唐太宗李世民分别于公元630年和640年降服东西突厥两部。先后在伊吾、高昌及天山北部设立伊、西、庭三州和安西都护府，在今新疆广大地区建立了统治政权。后西突厥复强盛，再次兼并铁勒诸部，并霸西域诸国，而焉耆、龟兹亦凭籍其势力抗唐。644年和648年唐派兵讨平焉耆、龟兹之乱，“遣使者谕降小城七百，西域震惧”，“西突厥、于阗、安国（今苏联中亚布哈拉一带）争馈驼马军粮”，唐的政治势力伸延至中亚地区，乃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于阗、疏勒、碎叶，号四镇”。设置四镇是唐经营西域的重大决策，使唐在西域的统治进一步巩固。651年阿史那贺鲁于降唐后复叛，乘西突厥内乱兼并各部而成一大势力，唐多次派兵征讨予以平息。在此前后，中亚各国先后臣服唐朝，接受册封，唐于各

国地置州府，仅公元661年一次，即派专使于中亚各地设置十六个都督府七十个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军府。唐对西域地区的行政军事管理制度，在伊、西、庭三州和隶属州县的罗布淖尔一带，完全与中原地区相同，在西域其它地区则实行都护府、都督府、州制度。在这部分地区内，唐任命原来的酋长或国王担任都督、州刺史等实职，授与中郎将、大将军、公、王等爵衔称号。西域各部及中亚诸国有义务出兵马及军需物资助唐作战。货币制度方面西域各地亦遵唐钱法形制铸钱流通。在军事设施上，也建立了一整套机构。在安西、北庭辖境内各重要地区和交通要道，设有军、镇、守捉、烽、戍等军事单位，并在各军镇广为屯田，以资粮粮。由于唐在西域行使有效的行政管理，各项政令贯彻一如中原各府、州，社会安定，丝绸之路畅通，各族人民往来迁徙，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入居中原的突厥族人，不少成为唐朝的名将大吏。汉族人民的踪迹更是遍布天山南北，远及中亚地区。驻守西域的卫戍、屯田士兵，为开发和保卫边疆，起了很大作用。大量汉族人进入西域，中原文化也随之在西域广泛传播。总之，自汉唐以来，西域与中原内地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我国西北地区在二千多年以前，即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横贯中亚，联结欧州的“丝绸之路”，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对西域地区的开发和经营，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对世界文明发展史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085 唐代都护府述略 唐启淮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在其周边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经济形态不一、语言风俗迥异的众多民族。唐中央政府统治这众多民族的一个主要方式，是按民族或部落建立府州，以其原有的首领、君长为都督、刺史，直接统治本民族，中央政府通过边州都督府和都护府进行管辖。其中都护府管辖的区域最广，治理的民族最多，对唐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巩固影响也最大。因此，都护府是研究唐代民族关系、唐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巩固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安西、北庭、濛池及安北等大都护府的设置、管辖范围、民族关系等，都与丝绸之路的研究有关，故予介绍。本文从三个方面研究了都护府问题。一是唐代各都护府的设置及统辖区域。唐王朝在民族地区设置都护府，始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平定高昌之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的都护府计有十一个，但经近人查证，实际上只有八个都护府，并对这八个都护府设置的历史背景及统辖区域作了简要叙述。由此即可了解到唐王朝对统一和管辖民族地区的重视，也可看到在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王朝大一统局面的空前盛况。安史乱后，随着唐中央政治的腐败，内地的藩镇割据，战争频繁，周边民族分裂势力便逐渐抬头，唐前期设置的都护府也就逐渐废置。二是唐代都护府的机构、职能及为发挥其职能所采取的相应措施。都护府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官有定员，职有专任，从人事、民政、赋役、军事、司法等方面均有官员掌管，与内地都督府一样，是重要的地方机构。都护府的职能是：负责维持本府辖区内的统治秩序，对内附民族进行安辑；保卫本府所辖各府州的安全，防止他国侵犯；考核本府下属各府州都督、刺史与中央合作的情况及其“治绩”，叙录功勋；镇压人民的反抗，征讨民族上层的分裂叛乱。为充分发挥都护

府的职能，唐中央政府还采取了：设立军事机构，屯兵戍守，并由都护统领；注意解决都护府所属戍兵的给养，以及注意都护人选等重要措施。唐王朝在民族地区建立的一整套都护府制度及采取的相应措施，使唐中央政府的政令得到有力的实施，从而有效地行使了管辖权。三是都护府的历史作用。唐代都护府是封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唐代地主阶级统治少数民族人民的工具。但在历史上，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巩固起过积极作用。首先，维护了国家统一，保卫了边疆；第二，推动了民族地区的开发；第三，加强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总之，唐代都护府加强了民族地区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巩固，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036 安西都护府治西州境内时期的都护及年代考　　柳洪亮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代设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边防、行政和各族事务。唐继汉制，设安西都护府，辖葱岭以西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安西都护府的设置，意义重大，为此，作者考察了安西都护府治西州境内时期的历任都护及其年代。《唐会要》卷七三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九月，“侯君集平高昌国，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当时，安西都护府直接统辖的区域包括西、伊、庭三州以及稍后的焉耆地区。在此之前，已知最早的安西都护是郭孝恪。据《旧唐书》记载，郭孝恪出任都护的时间是在贞观十六年，但此时置安西都护府已两年，前面应该还有一任安西都护。本文作者根据《文馆同林》所载《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及《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册乔师望凉州刺史文》等史籍的记载，认为唐高祖李渊之女卢陵公主的丈夫乔师望是第一任安西都护。其后，才是第二任都护郭孝恪。郭孝恪任都护时间较长。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郭孝恪以安西都护行昆丘道副大总管讨伐龟兹，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郭孝恪战死在龟兹。贞观二十三年，柴哲威继任安西都护，其父柴绍是唐高祖李渊三女平阳公主的丈夫，以军功封谯国公、柴哲威袭爵。柴哲威做过右屯营将军，因其弟参与房遗爱谋反事受牵连，被流放岭南，后又起用为交州都督，卒於任。史载柴哲威任安西都护行近三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十一月，最后一位高昌王麴智威之弟麴智湛出任安西都护。据作者考证，安西都护府设在西州的年限为贞观十四年至显庆三年（公元640年—658年），近十八年之久。在此期间，唐王期企图将安西都护府西迁龟兹，即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十二月郭孝恪出击龟兹，结果未达到预期目的。因此，柴哲威继任仍在西州境内，直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始移龟兹。而西州旋改为都督府，麴智湛也就由安西都护、西州刺史改任西州都督。本文后附“安西都护府治西州境内时期的都护表”，可资参阅。

037 评《新唐书·地理志》关于安西都护府记载　　胡树杞

（《文汇报》1950年9月3日）

《新唐书·地理志》关于安西都护府所辖二十个都督府的名称、属州、地望等，不

仅记载粗疏，而且有严重错误。作者根据敦煌石室发现的史料，和盖斯特教授在新疆及东土耳其斯坦一带发掘的报告，将历史上记载不全的安西都护府所辖的山南焉耆及月支等二十都督府录出，以供研究历史和沿革地理者参考。山南焉耆等四都督府是：焉耆、龟兹、疏勒、毗河。月支等十六都督府是月支、大汗、天马、条支、高附、修鲜、写风、悦般州、奇河州、姑墨州、旅獒州、崐埣州、至拔州、鸟飞州、王庭州、波斯。根据敦煌石室所发现的史料，还有康居、大宛两都督府隶属安西都护府，而《新唐书·地理志》遗漏未载，该两都督府均在锡尔河与阿姆河北。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氏曾根据敦煌所发现的材料，作了详细研究，认为其中还有六州未设都督府，亦不隶属康居与大宛两都督府，而直接归安西都护府管辖。另从盖斯特教授的报告中，知道当时还有许多都督府是属于双重管辖的，如显庆二年设置的昆陵都督府所辖的十二个都督府，即同时接受昆陵都督府与安西都护府的双重节制。但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新唐书·地理志》均无记载。

038　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北庭节度使留后问题　　　唐长孺

（《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

本文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书和碑刻等资料，探讨了唐代安史之乱时伊州，西州和北庭节度使及留后的人选问题。自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兼领安西四镇及伊、西、北庭节度使的封常清入朝后，伊、西、北庭节度使有哪几人，史书记载不详。惟杨炎所撰《杨和神道碑》于乾元二年及上元元年（759至760）记一杨预，此后直到大历元年（766年）才据《通鉴》记杨休明。据敦煌、吐鲁番文书及碑刻记载得知，从乾元以后至大历元年杨休明以前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除杨预外尚有杨志烈、周逸及缺名的杨某三人。这个杨某与杨预，杨志烈有什么关系，作者进行了探讨。作者辑录了《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的录文，对照《杨和神道碑》的记载，发现杨和之子为杨预。杨和是金吾大将军，四镇节度副使，而杨某之父为右武卫大将军，故推断杨预与杨某似是同祖弟兄。这两人的事迹历官颇多相同：都曾在安史乱时出使西、庭和四镇，都在河西管内任都督和重要军职，都从河西迁任伊、西、庭节度使、御史中丞。作者又引用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建午月西州使衙榜》的录文，证明在宝应元年（762年）二月杨志烈任伊、西、庭节度使、御史中丞。这样从乾元二年至宝应元年四年之间，有三个姓杨的节度使到西州先后上任，其中二人是同祖兄弟。又据《旧唐书·吐蕃传》等史书记载杨志烈在宝应元年十月已是河西节度使，广德二年（764年）杨志烈曾遣兵东攻灵州，未几吐蕃围凉州，杨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根据这些史实，作者怀疑杨预、杨某是一人，也可能杨某就是杨志烈。作者还移录了伯2942号文书中有关伊、西，北庭事件的条文，一是《判集伊、西、庭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条，二是《判集，差郑支使往四镇索救援河西一万人》条，并作了分析，认为文内叙述了伊、西、庭留后周逸勾结突厥，杀死“使主”一事，地点在由伊州到北庭途中的长泉。这位“使主”又是“元帅”，是被迫自杀的。因此，这位“使主”很可能是节度使或节度副大使。这个节度使出入河西与伊、西、庭，可能就是杨志烈，并推断他当时兼领伊、西、庭节度，常驻河西，故在伊、西、庭置留后，对周逸而言，他是“使主”。他于广德二

年末或永秦元年初投奔甘州，为征集兵马救援河西，就由甘州径赴北庭，中途至长泉为沙陀所杀。《判集》的主人则可能为观察副使，行军司马。

039 **辽对西北路的经营**　　〔日〕长泽和俊著　陈俊谋译

（《民族译丛》1984年第4、5期）

本文主要根据《辽史》等史籍记载，考证并论述了辽代对丝绸之路的经营。作者首先论述了辽太祖的西征。神册元年（916年）辽军从河曲越过阴山，征服山北各部族，神册五年(920)年攻占云内、天德之地，以及神册四年对居住在呼伦贝尔地区的乌古部的镇压。在此之后，辽太祖又于天赞三年（924年）六月进行西征。作者考证了太祖西征的路线和沿途的地名，认为太祖的西征是从上京经呼伦贝尔地方，沿克鲁伦河、土拉河到达鄂尔浑河流域。太祖的军队便由这里越过霸离思山（巴尔斯山）和蒲类海，达到浮图城（吉木萨尔）。而大元帅尧骨的军队则南下赴河曲地方，讨伐了党项，并在途中向甘州回鹘可汗派遣了使者。由于这次西征，辽的势力首次伸展至漠北，打通了与西域贸易的丝绸之路。至天福元年（公元936年），石敬塘把燕云十六州献给了辽，切断了阻卜与中原王朝联系的道路之后，辽与西域的贸易，才逐渐得到了发展。但因漠北诸部族经常叛乱，故这条贸易路线也屡屡中断。辽朝对容易中断的西北丝绸之路的经营倾注了最大之努力。直至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以后，才彻底征服了漠北诸部族，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了漠北三城：可敦城、古回鹘城和龙庭单于城，设镇州，维州和防州。又在上京的西北方，利用哈拉哈、克鲁伦、额尔古纳河等，分别建筑了静边城，河董城，皮被河城和塔懒主城等四城。以此作为辽统治漠北的前哨基地。不久又在漠北三城实行了屯田。辽还积极利用了从这里连接漠北与甘州的"回鹘路"，对甘州回鹘进行攻击，特别是对新兴的西夏屡次进行攻击。作者引证史料，论述了这些攻击的具体情况。至重熙十九年（公元1051年），辽在征服西夏之后，随着辽之西南经略的进展，而以回鹘路取代了辽初的上京至漠北的道路。辽在这方面的根据地是西京大同府，而连接西南边境与漠北的重要据点却是倒塌岭。重熙十九年首先设置了倒塌岭都监，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又于倒塌岭置节度使。至保大二年（1122年），辽因受金国进攻，天祚皇帝自云中府（山西省大同县）经云岗石窟寺，到达丰州天德军（白塔），又从这里越过阴山逃到山北的阴夹山。耶律大石也经由漠北逃往西域。作者在论述了辽与漠北的密切关系后，又论述了辽与西北诸国的贸易关系，即：与漠北诸民族的贸易，与西域诸国的贸易和与河西，甘肃地方的贸易，并着重论述了与西域的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进一步说明辽经营西北丝绸之路的重大意义。

040 **汉武帝的西域节团**　　张德光

（《和平日报》1947年5月26日，6月23日，29日）

本文分五个部分，即西域的历史和地理大势；汉通西域的动机；张骞奉使大月氏的经过；张骞奉使乌孙；张骞远征西域的影响。其中在张骞奉使大月氏和乌孙部分中，作者对其所经路线考证较详，尤其对出使西域后的影响分析较明。骞出使乌孙后，又分遣

副使通好大夏、大宛、康居、月氏、安息等国，各国也派遣使节，随张骞之副使来中国，汉朝声誉渐被于西方。迨至李广利击大宛，西域皆入中国掌握，东西交通畅通。同时，自张骞通西域后，汉人的地理知识大为开阔，证实了九州之外，还有一个更大更新奇的世界，引起了东西方人民的兴趣，揭开了中西通商和文化交流的序幕，从此使节商旅往来不绝。当张骞之副使到安息时，其王派二万骑远迎于东界，并派人随使节来中国参观，还送上大鸟卵和犁眩人，从而使西域幻术传入中国，中国丝绢传入中亚以至罗马。自汉至唐，千百年来在此路上的商旅络绎，使节相望，形成了国际交往的友谊之路，即“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丝绢、漆器及冶金技术等传入西方，西方的音乐、绘画以及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使中西文化的发展为之一新。

041　吐谷浑遣使考　　〔日〕松田寿南著　周伟州译

（《西北史地》1981年第2、3期）

吐谷浑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政权，位于甘肃洮河流域到青海湟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从公元四世纪前半建国，到七世纪后半灭亡，历时三百五十多年。本文通过对十九个向北魏遣使朝贡五次以上的国家的对比，发现吐谷浑朝贡六十四次，是最多的，比第二位宕昌的二十三次多二倍。为什么吐谷浑对北魏如此频繁地遣使朝贡？作者运用丰富的史料，详细考证了南北朝至唐初吐谷浑的建国和发展情况，包括吐谷浑的来源、疆域、民族、经济、交通、贸易、宗教、生活习俗等。在考证这些问题的同时，从各方面论证了吐谷浑在东亚细亚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原来吐谷浑是辽西鲜卑族慕容涉归的长子，从他父亲那儿分得部落一千七百户。涉归死后，因与其弟慕容廆部落相斗生隙，遂乘永嘉之乱，率部落西迁，越过陇山，占领了甘肃临夏和青海西宁等原来氐羌族居住的地方。吐谷浑死后，他的儿子吐延继位，确立了对氐羌族的统治，并把疆土扩展到青海西部。当时羌人的生活是以游牧的畜牧业为主，并开始定居，从事农耕和商业。吐谷浑征服羌人后，也过着游牧生活，有城郭而不居，国王和王族都住着庐帐，向羌人的富室和商人征税。随着时间的推移，吐谷浑人也逐渐学会城居和农耕，同化于羌人的生活。到吐谷浑王拾寅时代，正当北魏孝文帝时，特别是在公元474年以后，吐谷浑进入了一个大转变时期。吐谷浑王开始营造屋宇宫室，佛教也开始在国内流行，并与北魏的交往急剧加强，与北方的凉土（河西）、夏国和南方的蜀地有了交往。拾寅的儿子伏连筹在益州（成都）建立九层佛寺，标志着吐谷浑与南朝贸易关系的确立。到了南北朝末期和隋代，吐谷浑的王庭也变成了定居的城郭。吐谷浑王夸吕就住在青海湖西边十五里的伏俟城。吐谷浑向北魏遣使频繁，正是他们开展贸易的一种形式，是大规模开展国际贸易的需要。当时，作为中原和西域间的交通、贸易路线，除经由河西走廊而外，据青海的吐谷浑作为中继者乃至参与者也是很盛的，商胡、佛僧赖吐谷浑之导译而往来是很多的。隋唐之时，吐谷浑已兼并了西边的鄯善、且末两国。当时经由西域南道的西方商贾及其货物，是从鄯善到敦煌进入吐谷浑的领土内，再向内地转送。吐谷浑之频频通商，就成为西域诸国与中国关系的基础。从公元608年到635年，隋炀帝和唐太宗曾先后三次派军征讨吐谷浑，正是丝绸之路南道直接连接河西走廊的贸易开拓运动。经过充分论证，作者认为吐谷浑是东西交通、贸易的媒介者和中继者，在商业上处于五个交通路线

的交会点，从公元五世纪到七世纪之间，在东亚细亚国际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五条交通路线是：（一）从渭水盆地经湟水流域西行的路线；（二）从漠南达凉州（武威），纵断南山山脉南下的路线；（三）东行西域南，从鄯善折向东南间的路线；（四）从拉萨方面的西藏中心部分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北上的路线；（五）从南中国的四川北行向青海方面的路线。

042　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　　杨宪益

（《西北文化》月刊1947年第1卷第3期）

据《旧唐书》记载，唐时东罗马帝国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至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五次遣使来华。为了辨明遣使来华的原因，作者根据此期间东罗马的史实，认为东罗马国家实权在掌有军权的节度使手里，这些拥有军权的贵族，被称为Patrice。《唐书》所载"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此波多力乃为Patrice的对音。显然当时遣使中国的不是皇帝，而是拥有军权的贵族。这些贵族节度使为东罗马的真正统治者，内外政策皆由彼等来决定，遣使中国也是他们所策划。因为当时中国已降服突厥，成为亚州之最大强国。波斯为大食所灭，复又进攻东罗马，因此东罗马请中国与之联盟，以抗大食，此乃其五次遣使来中国的主要原因。再从时间上来看，一至五次遣使来中国，正是大食侵犯围攻东罗马之时。后来，东罗马用称为"希腊火"的火炮击退大食，大食再未能发动进攻，故东罗马也再未遣使来中国。

火药为中国所发明，隋炀帝常在宴会中用烟火爆竹向外国人夸耀，故西方人对火药的知识，当得自中国。西方人用火药，始于东罗马的"希腊火"。据作者考证，此"希腊火"很可能是东罗马使臣从中国带去。相传"希腊火"为加利尼科(Calinicus)所造，此人来自叙利亚希利奥城（Helio poils），该城为《魏略西戎传》之汜复城。"丝绸之路"由中国经中亚的思陶域，而以汜复为西方的终点，故来自汜复的加利尼科，很可能来自中国。隋代波斯与突厥使臣，对中国烟火颇感兴趣，可能东罗马了知此事，故当大食进攻时，即由中国求得制作火药之法，击退了大食。由此即可证明，中国火药通过"丝绸之路"传向西方，而火药的西传，实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043　论西汉与乌孙的和亲　　翟宛华

（《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乌孙是西汉时西域的一个大国，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民族，也是当时西汉和匈奴争取的对象。本文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的有关记载，论述了西汉采取与乌孙和亲的手段，达到与乌孙结成政治联盟，断匈奴右臂，共击匈奴的目的。文章详细论述了和亲的原因、过程和作用。自战国以至汉高祖刘邦时，北方强大的匈奴一直侵扰中原地区，其势力已延伸到现在山西及河北北部。由于西汉政权初建，实力虚弱，不能抗拒匈奴，只得委曲求全，采取和亲政策。这个政策经惠帝、文帝、景帝，直到武帝即位，一直没有改变。但匈奴从未停止对边境的侵扰。迄汉武帝时，西汉已"财力有余，士马强盛"遂由和亲转而采取武装进攻，以消灭匈奴的军事力

量，解除匈奴对中原的侵扰。从元光六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29—119年），汉、匈之间就进行了十多次大战，给匈奴以沉重打击。汉武帝又采取联合乌孙，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方针。因乌孙当时为匈奴属国，受匈奴控制和威胁，也想摆脱匈奴。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汉、乌双方结成了和亲关系。汉朝相继以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的昆莫猎骄靡（即昆莫）和军须靡为妻。细君公主在乌孙只生活了四、五年便去世了，未完成汉、乌联盟的任务。而解忧公主则连续嫁给军须靡、翁归靡和泥靡三个昆弥为妻，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她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帮助支持乌孙昆弥进行决策，并派侍女冯嫽到西域诸国进行活动，扩大汉朝的影响。解忧公主生了三男二女。这些子女在乌孙、龟兹、莎车都曾居于显要地位，扩大了解忧公主在乌孙和西域的政治影响。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3年）匈奴胁迫车师共同侵犯乌孙，遭到西汉与乌孙从东西两方的联合反击，直捣匈奴，大获全胜，致使匈奴属国瓦解，走上衰败的道路。其后乌孙昆弥翁归靡去世。在他几个儿子争夺王位的斗争中，解忧公主与冯嫽又配合西域都护郑吉，打败了叛乱的细沉瘦，和解了乌孙内部的纠纷，维护了汉朝与乌孙的联盟。她们在乌孙的和亲为汉、乌两族人民的团结友谊作出了贡献，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一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通西域的目的，加强了西汉在西域各国的势力和影响，使西域地区处在西汉的统治之下。二是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三是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随着和亲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乌孙的良马输入内地，内地的丝绸、水利灌溉技术、铁器和冶铁技术、建筑艺术、音乐也相继传入乌孙，对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044　试论唐代的和亲政策　　　任崇岳　罗贤佑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我国从西汉到清代的，几千年间，中原汉族王朝与各少数首领民族的和亲，史不绝书。如何看待和亲，历来众说纷纭。但都认为是统治阶级采取的一种羁縻政策，是权宜之计。本文着重论述了唐代的和亲政策，认为和亲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外交工具，是为扩大自己势力而进行的政治活动。我国的和亲，虽历代多有，但以汉、唐两代为最盛。作者分析了唐代和亲与汉代和亲不同之特点：一是汉代只与北方的匈奴和西北的乌孙和亲比较单纯，而唐朝则与吐蕃、突厥、回纥、奚、契丹、南诏、拔汗那等都曾经和亲，情况比较复杂；二是汉代的和亲只限于西汉，而唐代的和亲则与唐朝相始终；三是汉代的和亲总是遣宗室女或宫女出嫁，而唐代有几个公主却是皇帝的亲女儿、亲妹妹；四是汉代的和亲不要求对方遣送人质，而唐代则有要求对方遣送人质的事例。接着，作者根据史籍文献的有关记载，详细论述了唐代从高祖李渊开始实行的和亲政策及其效果。认为唐朝的和亲，并非出于一个模式，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唐初的和亲政策，均围绕消灭东突厥这一战略目标而制订，与西突厥及其周围少数民族和亲以打击东突厥，实现其"远交近攻"的政策。迨东突厥被消灭后，唐朝又以和亲政策作为剪灭西突厥的工具，与吐谷浑、吐蕃、薛延陀等族和亲，对削弱西突厥的势力起了很大作用。唐太宗实行和亲，并以武力为后盾，故收效显著。至唐代中叶，唐王朝由鼎盛趋于衰微，天宝十四年（公元

775年）安史之乱后，唐借回纥兵平乱，屡以公主与回纥和亲，并大量以缯帛交换回纥马匹，以求得北境的安宁。唐对南诏的和亲也是如此。至于唐与后突厥、吐蕃的和亲，则是为了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唐代中后期和亲所以未能取得较大成就，一是国势衰弱，武力不足以镇慑各部；二是任用非人。各少数民族也利用和亲的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目的。这一点西突厥表现最为突出。他们与唐和亲，一是为了求得册封，得到唐王朝的奖掖和扶植，以便对本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二是为了取得唐朝的物产和水草丰盛的牧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也袭唐故伎，以和亲来联络邻国。作者认为，和亲在宏观上促进了唐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045 唐代真公主与回纥的和亲 刘美崧

（《江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本文通过唐代与回纥和亲史实的分析，探讨了应如何正确看待汉唐的和亲政策的问题。对于汉唐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实行的和亲政策，往往被历代的封建史学家视为屈辱性质的“下策”，是一种姑息的权宜措施。作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这种看法不仅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而且局限于西汉初期汉与匈奴和亲的范围。如纵观历史发展，则和亲的作用和影响甚为深远。这是中央王朝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怀柔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政治举动，是巩固边防的重要手段。和亲开创于汉高祖刘邦。他于公元前198年被匈奴30万大军包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后，采纳了娄敬的建议，把宗室女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作阏氏(相当于王后)，实行和亲。以后又为西汉惠帝、文帝、景帝所继承，避免了汉匈之间大规模的战争，有利于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在国家强盛统一的西汉武帝、昭帝、宣帝、元帝和北魏道武帝时期，都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实行和亲政策。汉武帝嫁宗室女细君、解忧公主给乌孙昆莫，是为了“断匈奴右臂”，沟通西域；汉元帝把王昭君嫁给亲附的呼韩邪单于，也是为了怀柔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史称魏道武帝诸公主皆嫁于宾附之“国”。到了唐代，和亲更是在各民族比较友好的环境下进行的。唐朝的皇帝注意吸取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了汉代的和亲政策。唐高祖曾想以和亲怀柔突厥，唐太宗曾想以和亲羁縻薛延陀，均因情况有变，未能实行。据《唐会要》统计，唐朝的和亲公主有15名：嫁给吐谷浑的宏化公主，嫁给吐蕃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给回纥（鹘）的宁国公主、崇徽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嫁给契丹的永乐公主，燕郡公主、静乐公主，嫁给奚的固安公主、东光公主、宜芳公主，嫁给突骑施的交河公主，以及远嫁拔汗那（今中亚费尔干纳）的和义公主。唐朝和亲的范围超过了汉代、北朝及隋代，不仅有汉族公主嫁给少数民族首领，还有少数民族的公主嫁给汉族。而且各少数民族首领相互之间，也互嫁公主进行联姻。唐王朝还以境内少数民族首领的女儿封为唐的公主和亲。唐朝推行和亲政策，是为了使边疆少数民族永作屏藩。这在唐与回纥和亲时得到充分反映。文章扼要介绍了回纥军队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李亨首次将亲生女儿宁国公主嫁给回纥葛勒可汗，唐德宗李适将亲生女儿咸安公主嫁给回纥长寿天亲可汗为可敦，唐宪宗答应将亲生女儿永安公主嫁给回鹘保义可汗，唐穆宗将妹妹太和公主（永安公主的妹妹）嫁给回鹘崇德可汗等情况，论述了唐与回纥长期和亲的效果。

特别是促进了马绢等商品交换与互市的空前发展，加强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046 四方万国 回纥最亲

——略论唐朝与回纥的和亲　　　鲁　琏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4期）

“和亲”作为民族关系中的一种政治措施开始于汉朝，到了唐朝，统治者大多以和平的态度运筹安边保境的策略，和亲政策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显著特点，即“真公主”（皇帝的亲生女儿）出嫁。公元758年，唐肃宗将亲生女儿宁国公主嫁给回纥葛勒可汗；788年，唐德宗将亲生女儿咸安公主嫁给回纥顿莫贺可汗；821年，唐穆宗将胞妹太和公主（宪宗女）嫁给回纥崇德可汗。这是唐代仅有的三位用以和亲的真公主，她们无一例外地嫁给了回纥可汗，被册封为回纥可敦。可见，在唐众多的羁縻府州中，地处瀚海都督府的回纥与唐的关系，尤为特殊。这正是本文所说的“四方万国，回纥最亲”的原因。当然，这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但同时也是唐和回纥关系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贞观年间，唐就曾与回纥合力击败薛延陀，封回纥首领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唐太宗还亲临灵州，接见回纥等部首领，以唐官官之，吐迷度等首领尊推太宗为“天可汗”，后又修筑贯通南北的“参天可汗道”，供回纥首领入唐和唐使往来需要。由此可见唐与回纥关系之密切。及至安史之乱，唐帝国势若垒卵。为挽救危局，平定内乱，唐肃宗即位伊始，遂遣使回纥，回纥亦派人入唐“请和亲”，于公元758年7月，宁国公主出嫁回纥葛勒可汗。由此在加强了政治联系的基础上，促成了军事上的合作，葛勒可汗遣太子叶护率兵协同唐军，屡败叛军，收复二京。到唐代宗时，回纥再次出兵助唐，击败史思明余部，荡平叛军巢穴。在助唐平叛、恢复统一的战斗中，回纥军队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在“安史之乱”的艰难岁月里，唐统治者改以往用假公主和亲的惯例，代之以真公主出嫁回纥，从而将唐代和亲推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唐前期和亲公主所无法比拟的政治意义；同时，也促进了双方的经济交流。主要表现在巨额的马绢贸易上，这在中世纪马绢互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显然，这是受了唐与回纥和亲的直接推动。这种互市，不仅有利回纥，而唐也正是依赖了回纥的媒介作用，才得以继续充当丝路东端的东道主。在唐与回纥之间的经济交往中，唐和亲公主常秉公斡旋双方因商品质量而发生的纠纷。当时，回纥大量马匹入唐，路途遥远、水草缺乏，部分马匹病弱在所难免，并非以劣马市绢。澄清这一点，便于认识唐与回纥和亲而产生的经济交往的真正价值。不仅如此，唐、回和亲也直接影响了双方的文化生活。唐公主带去了内地的习俗及先进技术，尤其是公主定居的城郭宫室，积极引导流动的回纥社会走上定居或半定居的轨道，也为其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其民族趋于进步。而回纥文化也以其特有的形式影响着唐朝，其音乐、舞蹈乃至饮食服装，深为中原人们喜爱，尤其是摩尼教得以在唐风行，也正是因为回纥的作用。本文由此对唐代与回纥的和亲予以肯定。“四方万国，回纥最亲”，概括了唐与回纥间民族关系的亲密和友好。

047　唐代的公验与过所　　程喜霖

（《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

关于唐代过所，已有人研究，但认为过所与公验颇不相同。本文根据敦煌、吐鲁番近年出土的有关过所和公验的十件文书，重新进行了探讨，并考察了过所与公验的关系。汉代的路证称做“过所”或“传”，魏晋时代的传，用于外出官吏、公务人员，一般百姓使用的路证统称过所，隋唐因之。唐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平定高昌，在其地置西州，设安西都护府，沿用唐朝行政制度，凡度关津者，须持过所，请过所者，必先申牒请给，官府严审后判给。敦煌、吐鲁番新出过所文书九件，其中六件是申请、勘查过所的文书，三件是官府勘给的过所实物。作者抄录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瓜州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及1965年敦煌莫高窟所出《唐天宝七载（公元748年）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两件，就其内容和形式作了详细分析。唐代的路证除通称的过所外，还有一种路证称为“公验”，其申请、勘给与过所同，然内容形式未见于史。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生动地记录了他在登州请“公验”的详细情况。圆仁所记从文登县出发至长安，沿途所过州县请公验事，与十三年后的圆珍从台州所获公验的情形相似。作者移录了《大日本佛教全书》所刊《圆珍台州府公验》图版。由圆珍公验可知，这种称为“公验”的路证，又可称为“公凭”、“公据”。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曾云：唐宣宗时，中书门下奏：“……僧尼……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宋朝僧尼出游给公验的制度源于唐代。无论圆珍公验，还是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最澄公验，皆是唐后期州勘给僧尼公验。这里作者从《吐鲁番出土文书》对史籍缺载的唐前期百姓度关所持公验作了说明。是书所收公验文书八件，其中七件残损，从仅存文意知非路证，唯有一件是称为公验的路证。按唐律，关津对过往行人均须检验其证明身分的公文，称为过所或公验。唐代的公验称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公验路证，作用如同过所，是其狭义。从广义言，公验含义非常广泛，即由唐朝官府发给，有官员签署并钤有官府印鉴，具有法律效能的证件，一概可称之谓公验，或称公凭、公据。文内列举七条具体事例，以为佐证。关于“公验”与“过所”的异同，作者对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在《三井寺藏唐过所考》一文中认为过所“与公验颇不相同”的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公验至迟在隋朝就出现了，而在唐代公验数见于文献，正因为公验即指官府发的证明文件，作为路证的过所亦是公验。唐代的过所与称公验的路证并行，虽然两者形式有差异，但其内容与作用基本相同，甚至可以互称，此就狭义而言。若从广义而言，公验包括过所，过所只是公验的一种，唯从这个意义上讲，公验不能称为过所，因为公验的含义远比过所广泛，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048　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　　王仲荦

（《文物》1975年第7期）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民丰县汉代精绝遗址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过所。过所，就是通过关、戍、守捉的通行证明，在汉代也叫做“传”。《周礼》郑玄注：“

传，如今移过所文书。”刘熙《释名》：“过所，至关津以示之也”。本文是对阿斯塔那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文书的探讨。一是唐瓜州、西州户曹给石染典的过所；二是唐益谦等请给过所的牒文；三是有关麴嘉琰请给过所的高昌县文书；四是有关蒋化明丢失过所案件的文书。作者对这几件过所的内容作了详细的解释和分析。申请过所必须由申请人备具牒文，按照规定一一说明各种有关的项目，诸如外出原因、人数、身分以至奴婢来源、牲畜的毛色口齿、外出以后家中的户徭由谁承担等等，必要时还要附交有关的证件。负责审查的官吏对此要一一核实。例如麴嘉琰请给过所，先由当事人提出申请，然后由主管机关西州都督府户曹向其所在的高昌县进行调查复核，由高昌县具文申报调查的结果。和这件文书同时出土的天山县调查张无玚请给过所的文书上面，特别注明据里正、保头的证明，张无玚所携带的奴仆和马驴等“并是当家家生奴畜”，而并非“詃诱影他等色。”同时在过所上，有关审批人员都要一一签名。这些手续和《唐六典》所记载的规定完全吻合。申请人领到过所以后，沿途还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唐代在交通要道设有烽、戍、守捉等以稽查行旅。行旅往来，如果不持过所，或者过所开列的事项与实际不符，会受到拘留审讯；如果过所完备，就可顺利通行。过所制度的重要目的在于防止偷漏国税、逃避赋役、拐卖人口，以至清查来自国境以外的破坏活动，这对于保障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促进生产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从过所制度的执行，可以看到在开元年间，唐中央集权制度，对幅员广大的国家，实行着有效的控制。同时也看到西州地方政府，严格执行了中央政府关于过所的各项规定，它发出的过所和其他地方政府所发出的一样，在全国各地都具有法律效力，地处新疆的西州，当时正处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

049 “支那”一词起源质疑 汶 江

（《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刊载了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与文化》一文，认为“支那”一名起源于“荆”。此说虽非他所首创，但却为旧说提供了一些新的理由。本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支那”一词起源于“秦”而非“荆”。作者从三个方面提出了与苏仲湘不同的论点。首先，苏仲湘认为印度的三种古籍：《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骄胝厘耶的《利论》中，都出现了“支那”的称呼，证明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印之间已有直接交通。经作者论证，认为前两部书都是经过长期和多次的加工才形成的，有很多内容是后人增加进去的。有关“支那”名称的记载就是这样。后一部书的骄胝厘耶一名出自伪托，此书成于公元后一至三世纪间。苏仲湘还介绍了古代楚国的历史和文化，认为当时通用荆的名号，楚是别名，成为中国的代表。作者引用我国古籍的记载，证明荆字比楚字晚出，楚人从来不自称为荆，荆字只是用于表示轻蔑，荆字的使用比楚字少得多。如果用楚国来代表中国，亦理应称之为楚，断不会称为荆。其次，苏文认为古代印度所得到的，主要是中国南部的消息、即大体是楚国的消息。当时荆与中原国家对峙，《荀子·性恶篇》中“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和《罗摩衍那》中“支那”与“外支那”之名，即表示这种政治局面。经作者考证，《荀子·性恶

篇》和印度古籍中并无“居楚而楚”和“外支那”之名，《摩罗衍那》中之“外支那”，其意为辽远、高峻、西部等，乃指新疆。苏文又引用杨雄的《蜀王本纪》和常璩的《华阳国志》的记载，说明荆与蜀之特殊联系，以及巴蜀已成为荆之外府。作者则引用甲骨文等文献记载，证明在周代巴国与楚国地位平等，秦与蜀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四川治水有功的秦太守李冰父子即是明证。故巴蜀为荆之外府之说毫无根据。最后，作者又谈了古代巴蜀与印度的交通问题。认为中印的直接交通以西蜀与东印度之间开始得最早，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叶，至西汉文景时首先打开通道的为跑单帮的商人。李冰父子在蜀兴建水利，促进了四川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秦灭六国前后，曾把大量秦民迁到四川。故在秦统治下的四川商人带到印度去的中国名号，除“秦”而外不可能有其它，从而证明“支那”一词起源于“秦”之说似较合理。

050 **支那名号原音证** 李志敏

（《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中国被世界各国称为支那（China）。此名最早出现于梵文，拼法是Cina。其涵义、字源和原音为何？对此中外学者曾作过较多的研究，迄无定论。多数人主张为“秦”字原音之说。本文对此进行了考证，认为“秦”字为支那名号原音之说漏洞很大，论据软弱无力，经不起推敲，缺乏成立的基础；主张“丝”字是支那名号的原音，并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证。

关于“支那”涵义，唐宋学者已开解释之肇端。元时的《马可波罗行记》、法国人沙海昂的《行记·注》、清人薛福成之《出使日记》，均涉及支那原音之说，均谓为“秦”之译音。盖因秦始皇逼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欧洲北上者，称中国为秦，欧洲人亦相沿不改，近之学者多承其说，遂成不破之论。印度几部最为古老的梵文典籍，如《政事论》、《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摩奴法典》等书，或提到丝绸运销印度的事实，或记载中国之名号支那。据此确定丝绸运销到印度的时间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学者们普遍认为外语的中国名号，大体都由梵文Cina（支那）衍出，其共同来源即“秦”字。《史记》、《汉书》等文献关于匈奴人，西域土人称中国为“秦”，称中国人为“秦人”的记载，便成为“秦”是支那名号原音说的一大依据。关于“秦”之名称如何传入印度的问题，论者又提出月氏西迁、匈奴西迁和贩丝商人三种传报说。本文对这三种说法均引证史实予以否定。因月氏西迁约在公元前139年至129年，匈奴西迁更迟。月氏和匈奴进入西域比丝绸运销印度的记载迟了大约一个半世纪。故月氏、匈奴传报说只能是一种猜测，未经证实。上古时代的丝绸贩运只能是短距离、多次倒手的活动，层次多，周期长，一般都是渐次波及相互邻近的地区，然后才间接地传到远方。远离中国的贩丝商人很难知道丝绸出产国的真实情况，所以也很少可能将中国名号传报给印度。冯承钧《西域地名》说支那“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以北诸种之名，后为中国之号”。近有外国学者发现在梵文典籍中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北部一带被称为Cina，尼泊尔人谓其北部和山区一带为Cina。这与汉文佛典所说之震旦国（支那）之说丝毫不爽。养蚕与丝绸生产发明于古代中国。在最先输入丝绸的邻近部族或国

家，汉语“丝”字当随同丝货进入这些民族和国家的语言之中，并以汉语“丝”字为词源组成各自的新词。梵文Cina这个词在《政事论》一书中的涵义是“丝”。“Ci”是汉语“丝”字的音译，“na”为梵文的词尾。汉语“丝”亦是随丝货进入古印度而进入梵文的。梵文Cina名号最为古老，且与其他外国的中国名号在语音方面极为一致，故这些外国语中的中国名号，均由梵文Cina所衍出。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中国。“支那”名号当是随着丝绸的间接贩运，通过印度进而传播到西亚、北非以至希腊、罗马。古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意为“丝国”，当是支那的对音。这可证实支那名号原来的含义也是“丝国”。古印度人误以丝绸之来路的雪山以北诸地就是丝绸的产地，因而称其为支那。由此可见支那名号的原音为汉语“丝”字。

051 **明代高昌馆来文及其历史价值初探**　　胡振华　黄润华

（《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

高昌馆是明王朝为担任外事和国内边疆民族事务翻译工作而建立的“四夷馆”中的一个馆。它翻译和保管的文书，包括哈密、安定、阿端、曲先、罕东、鲁陈、亦力把力、黑娄等地区。这些地方包括了今日的新疆和十九世纪下半叶被沙皇俄国侵占的我国西部领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全部地区。本文介绍了高昌馆珍藏的八十九篇文书的目录，并对其历史价值进行了分析探讨。作者认为，从文书可以看出明代中央政府与新疆各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密切关系，是研究明代维吾尔族的历史和语言文字的宝贵资料。这些文书说明，新疆地区各政权与明王朝是地方和中央的臣属关系，明王朝对新疆各地有至高的政治权力；同时也表现出新疆各地与内地在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从六十七次朝贡记录中，可以看出进贡的物品有二十三种，最常见的有马、玉石，还有奇兽如狮、豹及土特产金刚石、玛瑙、貂鼠皮等。新疆各地要求的赐物也有二十多种，以丝绸、瓷器为主，还有一部分金银工艺品。这些物品大都是汉唐以来传统的交易物。由此可见，明王朝与新疆的贡市是两千年来内地与新疆经济交流的继续与发展，而政治上联系的加强，对巩固祖国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2、军事活动

052 **试论汉匈之争的初期战略及在西域的对抗**　　刘锡淦　陈良伟　尚衍斌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

本文论述了汉武帝与匈奴斗争的初期战略。文章首先介绍了汉匈斗争的形势，分析了汉武帝改“和亲”为军事进攻的社会基础，论述了汉匈双方采取的战略部署，以及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具体情况。公元前三世纪末叶，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两大帝国，即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它们为争夺左右全国的最高领导权，在长城南北展开了激烈的军事斗争。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基，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改变了前代高、吕、文、景的“和亲”政策，代之以战争进攻。从公元前133年开始，诱匈奴袭马邑，拉开了汉匈战争的序幕。汉武帝所以改“和亲”为军事进攻，其社会基础依据是：两汉经数十年休

养生息，经济发展，物资丰富，军事供应殷实；匈奴频繁南下袭扰，侵害西汉政府和人民的利益，上下一致要求抗击匈奴；匈奴贵族连年用兵，沉重的军费和兵役负担，使匈奴人民强烈要求停止战争，为汉武帝的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战略部署上，匈奴冒顿单于分帝国为三，置左右贤王及各级将领居东西两方，单于居中，集大军，以图中路突破，直取长安。征服西域，设童仆都尉，建立稳固的后方，以取得人物资源。汉武帝为打破匈奴的战略部署，出兵朝鲜，牵制左贤王；进军河西，迫使昆邪，休屠王降汉，切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然后集中兵力进攻匈奴单于，直至寘颜山赵信城而还。这样便打破了匈奴的战略部署，减轻了中原地区的压力，于是将斗争重心转移到西部，使汉匈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域是匈奴帝国的主要供应地，又是其力量源泉之一。汉武帝即采取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派贰师将军伐大宛，均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以“乌汉联盟”打破了“匈宛联盟”，实现了汉武帝的战略目的，从而加剧了匈奴的内部矛盾，使西域列入汉朝版图，封建经济获得长久发展，使西域进入新的纪元。文章对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以及“乌汉联盟”与“匈宛联盟”形成的过程及相互斗争情况，均论述较详，为了解开通丝绸之路的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053　论汉伐大宛和汉朝的西方政策　　　季开元

（《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

李广利伐大宛，是西汉武帝时在中亚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争。这次战争先后历时四年，调动几十万军队，十几万匹牲口，阵亡战士近十万名，损失战马三万多匹，耗资巨大，全国震动。对这次战争，中外研究者论述不一，大体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汉武帝想得到大宛的汗血马用来改良汉朝的马种；二说是为贯彻桑弘羊提出的“兵据西域，夺之便势之地以候其变”这一决策的必要行动；三说是汉武帝欲仿效黄帝乘龙升天的传说，欲乘天马升天，这是汉武帝发动伐宛战争的思想动机。本文不同意上述诸说，认为虽有部分因素，但非主要原因。元鼎四年六月，汉朝在汾阳得到宝鼎，同年秋，得到渥洼水所产的良马，武帝特意“作宝鼎，天马之歌”。在武帝的心目中，天马是龙的变象，鼎是承受天命的象征，鼎和天马就成为仙登的一种符瑞，从而产生了征服四邻，一统天下的思想。特别是张骞提出了“致远之略”的指导方针，把西域各国按军事力量的强弱分为“行国”（游牧民族）“土著”（农业民族）两类，提出了使这些国家臣服于汉朝的设想和主要利用经济收买的手段。这个“致远之略”，就是武帝时期经营西域政策的最初蓝图。在伐宛战争之前，汉朝已征服了东方的朝鲜，平定了南方的南越，西南夷已经辟为郡，北方的匈奴已被击败，大一统的汉帝国已经建立；只有西域尚未被征服，大宛的汗血马（天马）尚未得到。在这种情况下，求天马就成为汉帝国征服西域，伐宛战争的象征。在战争爆发之前，汉武帝曾耍了个外交手腕，铸了一匹金马派使臣去换大宛的汗血马，遭到大宛拒绝，并杀了汉朝使臣，直接导致伐宛战争的爆发。可以看出，汉武帝为了推行自己的西方政策，逐步向西扩展自己的势力，把打击目标指向大宛，使用的手段也逐步升级，从经济，外交，军事威望，最后发展到战争。故作者认为，汉朝发动伐宛战争的原因，是汉朝推行以张骞的“致远之略”为蓝图的西方政策的必然结果，这种政策又和汉武帝本人的宗教迷信思想，和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影

响历史进程的巨大物质力量。

054 关于高车副伏罗部起义西迁的背景与时间问题　　段连勤

（《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

公元五世纪下半叶，蒙古草原上发生了高车副伏罗部反抗柔然汗国统治的起义与西迁的重大事件。本文论述了副伏罗部起义西迁的历史背景，考证了起义发生的时间。高车原名丁零、敕勒，两汉时居于南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到叶尼塞河一带，在匈奴以北。公元一世纪末匈奴国家灭亡后，南迁蒙古草原。十六国北朝时，因其部众制造和使用高轮车，被邻族称为高车。他们分为两部分：六部高车住在蒙古草原中部和东部，副伏罗部住在蒙古草原西部，约有五十万人口。公元402年，住在漠南阴山一带的柔然族崛起，其首长社仑率众征服了高车诸部，自称丘豆伐可汗，建立了柔然汗国。柔然贵族对高车人实行残酷的奴隶制统治，掠夺他们的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并征集高车男子经常对北魏进行侵略战争。高车人民对柔然汗国的统治十分仇恨，随时准备摆脱，仅公元429年就先后有六七十万高车人摆脱柔然人后归降北魏军，给柔然汗国以沉重打击，出现了严重危机。公元464年柔然吐贺真可汗死，子予成继位，号受罗部真可汗。他停止了对北魏的侵略战争，调整了对高车上层分子的关系，招来叛降北魏的高车人，缓和了柔然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汗国获得转机。但在公元485年予成可汗死后，继位的豆仑可汗在守旧派贵族的支持下，对内实行残暴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战争，在三年之内即对北魏发动四次大规模战争，使柔然汗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重新激化起来。魏孝文帝十一年（公元487年），豆仑又率军侵扰魏国边境，阿伏至罗与堂弟穷奇乘机率领高车部众十余万人起义，分两路向西转移。经过与豆仑追兵英勇顽强的战斗。终于摆脱了柔然军的追击，辗转迁至今新疆吐鲁番以西，建立了高车国。关于高车副伏罗部起义和西迁的时间，《魏书·高车传》说在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魏书·蠕蠕传》说在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对此，冯承钧先生曾作过考证，认为高车西迁应在太和十一年而不在太和十六年。本文作者同意这个考释，并引用史书有关记载，从五个方面作了进一步考证，并分析了《蠕蠕传》记载错误的原因。

055 论“凉州之乱”　　施光明

（《社会科学》“甘肃”1984年第2期）

西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在凉州发生了鲜卑秃发氏首领树机能领导的各族人民反晋武装大起义，史称“凉州之乱”。“凉州之乱”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解放以来史学界对这场斗争研究还很不够，即便在《魏晋南北朝史》中也只写了寥寥二十余字。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鲜卑，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随着鲜卑族从漠北向南发展，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魏晋之际，鲜卑族又进一步向内地迁徙，凉州也成为鲜卑族的重要活动地区，在这里生活着几十个鲜卑部落，其中秃发氏就是最为著名的一支。秃发氏于公元三世纪初率部众从塞北阴山一带迁入

河西凉州地区。生活在凉州地区的鲜卑、羌、北胡等少数民族人民和居住在这里的汉族人民友好相处。但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些少数民族却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啖赏利，妄加讨戮”。沉重的封建剥削和野蛮的民族压迫必然激起凉州各族人民的反抗。到公元267年，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凉州之乱。”泰始五年（269年）二月，西晋政府为加强对凉州各少数民族的控制，“分雍、凉，梁州置秦州”，以胡烈为刺史，“烈素著名于西方，故使镇抚之”。泰始六年（270）年，在树机能率领下，秃发鲜卑部落首举义旗。胡烈率军镇压，起义军英勇战斗，全歼西晋军，打死胡烈。西晋政府又调派“尚书乐陵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讨树机能”。但结果同样遭到惨败。泰始七年（271年）四月，义军直趋金城（今甘肃兰州），驻守这里的凉州刺史牵弘也遭到和胡烈同样下场，全军覆灭，自己死于乱军之中。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起义军三战三捷，士气大振，而西晋统治阶级却是一片惊恐，反晋烈火越烧越旺，鲜卑、羌、汉等人民纷纷起义，义军扩大到二十余万人，“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尽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肝食”。在一系列胜利面前，起义军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泰始十年（274年）八月，义军攻打金城周围地区受挫。后树机能又采取十分错误的策略，向西晋军“遣入质子”，致使义军内部人心涣散，形势急转而下。在斗争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树机能率军直捣凉州治所武威获捷，切断了西晋政府与河西的联系。西晋统治者于咸宁五年（279年）春，任命马隆为讨虏护军、武威太守，并另行组建强悍军队，企图扑灭凉州人民的反抗烈火。面对重兵镇压，凉州人民“或乘胜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狠狠打击了西晋军队。后马隆改变作战方略，且施离间之计，分化瓦解义军。树机能虽率军进行顽强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树机能为叛将所杀。一场历时十年的凉州各族人民反晋大起义被镇压下去。这场以鲜卑族为主体，包括羌、汉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参加的“凉州之乱”，就其性质来说，即是反抗西晋民族压迫的正义民族斗争，又是反抗西晋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作者认为，西晋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十六国割据战争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前者是封建制度下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后者则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下的产物，其原因远较前者复杂得多。

056　六世纪下半叶突厥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原因探讨　　芮传明

（《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

本文引用了大量正史资料，论证了有关六世纪下半叶，即从四十年代初突厥首次与中原交往至公元600年左右达头可汗败奔吐谷浑为止，这一时期内突厥与中原诸国的重大战争事件。文章对希尔达·埃克塞迪先生的《六世纪下半叶突厥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战争关系》一文的观点即：突厥人因中原地区未能满足他们对于丝绸的要求而发动的逼迫其贸易的战争，提出了异议。文章以为公元六世纪下半叶突厥人与中原诸王朝之间的战争，特别是规模较大的战争，主要是由于中原诸王朝为了争夺政权而借助“戎狄”，以及为“威震异域”而主动打击他们造成的。这些战争基本上与贸易无关。文章将五，六十年中突厥与中原王朝的主要军事冲突事件，划分为四个时期，探讨了导致这些战争的原因。

563—564年。这一时期突厥与中原王朝（北齐）的战争，是北周政权出于与北齐争夺中原霸权的目的，联结突厥，夹击北齐所致，而不是由贸易问题所产生的战争。

577—579年。在北周灭齐之后，展开的突厥与周的战争。战争的掀起，是中原两政权角逐的结果。周灭齐，齐遗臣亡入突厥求救，突厥助齐复辟。这场战争的起因，仍然是由中原王朝间的政治争斗而起，并非贸易战争。

581—584年。导致隋朝与突厥大战的因素，首先是隋朝取北周而代之，致使前政权王室的人员强烈不满。其次是因为北齐失国不久，其遗臣总是耿耿于怀，伺机复辟，常借助突厥人的力量与中原王朝争斗。其三是因为隋对待“北夷”的政策与前相比，不如北周那样致力于抚慰。这三种因素混杂起来，便酿成了这场大战。

597—603年。这场战争从开皇十七年始，至仁寿三年九月突厥部落内乱，达头众溃西奔吐谷浑，受隋政权扶持的启民可汗北进，占领了达头留下的土地和部众，突厥与中原的这场战争，历时五、六年之久。当时隋政权建立已近二十年，实力大为增强，故对于北方的突厥人进一步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进攻性策略，这场战争基本上是由隋王朝的这一政策酿成的。

据此，公元六世纪下半叶，突厥与中原王朝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基本上都是由中原王朝的政治斗争，以及对“夷狄”的积极征服政策所造成的，与贸易问题几无关系。至于埃克塞迪先生列举若干条战争期间或战前不久突厥遣使“朝贡”中原的记载，以论证其“贸易包含战争”的“规律”这一点，作者的解释是：1.某些不特别指明“××可汗”所遣的朝贡使团极有可能是冒用官方名义的民间商人组织。这种“朝贡”和突厥统治者们与中原王朝间的战争无关。2.当中原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争斗的王朝时，突厥很可能在同一时期内，当此政权争战，而与彼政权通好，故须辩明那些突厥朝贡使团究竟遣往何处，而埃克塞迪先生则有混淆的地方，遂使表面上看来，贸易与战争确如他所说的那样颇有关联了。3.笼统地说：“突厥遣使朝贡”中的“突厥”使团未必即指来自与中原交战的那一部分“突厥”，而有可能来自与中国尚保持和平关系的另一部分“突厥”。这种情况出现在突厥与中原的战争期间，就不能肯定使团究竟来自何处，而无法将贸易与战争联系起来。因此埃克塞迪先生将战争的原因归之于突厥人之渴求贸易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057 唐代河西陇右的战略地位　　钮海燕

（《历史教学》1985年第1期）

唐代河西、陇右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一带，其地介于蒙古高原和青海高原之间，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唯一通道。汉以后的历代中原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重视这一地区。本文就唐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分为前期的兴盛，中期的衰微和后期的收复三个阶段，论述了它的战略地位。唐初统治者意识到河西、陇右的重要，在夺取关中之后，首先把矛头指向这里。在削平河陇后，才掉转兵锋，攻入中原，平定南方。李世民正是因为有河陇地区的粮草供应和马匹的支援，才有可能统一中国。随着统一形势的发展，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下令将全国划分为十道，陇坻以西归陇右道。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又从陇右道分黄河以西为河西道，以适应当时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太宗时，连年与突厥战

争，把主要力量放在安西四镇，故对河陇着力不多。从高宗时起，突厥势力转弱，吐蕃力量渐强，安西四镇屡被攻陷，河陇常受骚扰，故从高宗、武后到玄宗统治时期，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经营。一，屯田。汉武帝曾在此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成效良好，后代统治者纷纷效法。唐前期，高宗、武后到玄宗在这一地区，特别是鄯、凉、河、甘等州进行了大规模屯田，进行了一系列较有成效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保证了唐朝初期西北政局的稳定。二，马政。唐前期的劲敌突厥、吐蕃，均为占有马上优势的游牧民族，而唐之所以能够与吐蕃进行有效战争，甚至消灭突厥，则有赖于唐代在河陇地区施行的马政。唐太宗贞观初年，在陇右首置监牧，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又积极鼓励民间养马。为了进一步增加马的数量和改良马的品种，唐在与吐蕃的战争中，还利用外交手段与之进行马帛交易。这样，河陇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进展。天宝年间这里的粮食不仅能满足当地需要，而且可济关中不足。这就大大加强了唐王朝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政治地位。当时河西、陇右拥兵十四万八千人，精兵良将云集，使吐蕃难以攻入；这一地区既是屏障关中，抵御吐蕃的前线，又是维持丝绸之路，经营西域的可靠后方。到天宝后期，唐朝外强中干的政局已日渐暴露。安禄山叛乱，唐朝不得不抽调河西、陇右以及北庭至安西四镇的精兵东下平叛；因此，吐蕃乘隙虏掠杀伤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堙没者数十州，并以陇右为根据地，威逼关中，回攻河西。安史之乱平息后，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已无力加强这里的防卫，更无精力整置屯田、监牧。随着诸州为吐蕃掌握，河陇地区的经济也逐渐衰退。又由于吐蕃占据了河西，使西域与中原失去了联系，陷于孤立无援地位；于是，唐失去整个西部优势，中原统治亦面临动荡不安的危险。河西，陇右失陷以后，唐人大批地被屠杀，从农民的地位降为奴隶。唐人不甘于残暴的奴役，曾多次进行反抗；其中影响最深，作用最大的是沙州人张议潮于大中二年（848年）举行的起义。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的使者送沙、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一州图籍归朝，唐政府命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从此河陇地区复为唐有，吐蕃占据河陇地区达八十年的历史宣告结束。张议潮收复河湟后，在汉族政权的统治下，农业有一定的恢复，但并未得到唐朝的支持。此后，唐帝国也无力经营这一地区，没有取得这一地区的战略优势，也未呈现出前唐时的盛况。尽管如此，据有河陇，终究防止了几个少数民族的进犯，保障了唐西北部的暂时稳定，使唐帝国得以苟延残喘。回顾有唐一代对河陇地区经营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开发大西北的战略决策可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058 唐太宗平定高昌的历史意义　　王　谍

（《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

本文论述了唐太宗平定高昌的历史背景、影响及意义。高昌国故地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丝绸之路的三条主要通道有两条经过这里，扼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咽喉。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朝政府在此设置戊己校尉，驻军屯田，经东汉、曹魏、西晋至东晋初年。此后，前凉张骏在此设置高昌郡，历前秦、后凉、西凉至北凉。公元460年，北方柔然族的势力到达这里，曾立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其后几经变乱，公元493

年，汉人麴嘉被拥立为高昌王，传十世，历时141年。至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派军队平定了高昌国，在此设置西昌州（后改为西州），并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高昌麴氏王朝至此灭亡。西汉以来，西域已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也同内地一样，长期陷于各民族割据混战的局面下。从西魏时期开始，西突厥族进入西域。唐高祖武德年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统一了西域地区，对唐保持友好关系，高昌国也同唐朝保持友好关系。到贞观二年，统叶护可汗因内乱被杀，西突厥分裂为两部：咥利失可汗统领弩失毕部落居伊犁河以西，乙毗咄陆可汗统领咄陆部落居伊犁河以东。乙毗咄陆可汗割据一方，扰乱西域，对抗唐朝。从贞观六年（公元632年）起，高昌王麴文泰也开始了对抗唐朝的活动。他遣兵袭击焉耆，与西突厥共击伊吾，囚系唐朝从西突厥赎回的汉民，并拘留西域各国派遣入唐的使者，挑拨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与唐朝的关系，堵塞丝绸之路的交通。唐朝要统一西域，必须首先平定高昌。麴文泰所以敢于对抗唐朝的原因有三：一是要控制丝绸之路的经济命脉；二是认为与唐远隔沙碛，道路艰险，可抗唐军；三是依靠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支持，有恃无恐。但当唐军到达高昌时，麴文泰忧惧无策，发疾而死。其子麴智盛试图抵抗，终于投降，乙毗咄陆可汗仓皇西逃，不敢来救。高昌国遂于贞观十四年八月统一于唐。唐朝在此设立西州、安西都护府和四个折冲府，安置了麴氏王朝旧部，并核实户籍，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加强了交通管理，兴修水利，设置官市，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繁荣。其后，唐朝军队平定焉耆、龟兹，设置安西四镇，消灭西突厥政权，完成了统一西域的大业。其基础均为唐太宗平定高昌所奠定。故此举实为唐太宗顺应历史潮流和西域各族人民之愿望，维护了祖国统一，疏通了丝绸之路，对促进我国人民同西亚、欧洲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059 唐代前期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唐安西四镇的弃置 郭锋

（《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在唐代的西域研究中，对安西四镇的弃置问题说法不一。本文主要阐述唐代前期唐与吐蕃争夺西域的情况。研究这一问题，对弄清安西四镇的弃置问题很有帮助。

唐代前期，唐、蕃使臣往来频繁，但战争也接连不断，而冲突重点在西域。唐自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设伊州始，至高宗显庆年间苏定方大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遂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升为大都护府，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广大中亚地区设置府、州，控制了整个西域。在此同时，吐蕃于贞观十五年左右控制近邻泥婆罗，十八年控制羊同国后，继续向葱岭诸国进军。可能在显庆至龙朔初年，吐蕃便控制了刚置于唐安西大都护府管辖的吐火罗入四镇的战略要地护密。到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吐蕃军进入疏勒以南地区与唐军相遇，遂拉开争夺战幕。龙朔三年底，吐蕃进攻于阗，唐派安西都护高贤击弓月，救于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又派西州都督崔知辨和右武卫将军曹继叔率兵救于阗。乾封二年至咸亨元年（公元667—670年），吐蕃东起松州，中经陇右，西至安西大都护府辖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攻陷安西都护治所龟兹，侵占了西域十八州，唐迫于无奈，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将安西都护治所迁至西州。上元元年

（公元675年）于阗王伏阇雄发动反击，西州、沙州派军参加，取得了西州——罗布泊——且末以东控制权。伏阇雄乘机来朝。唐名义上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在且末、鄯善、于阗一带设十二州。这是唐的羁縻政策，而实际势力并未进入，真正能控制的仅是天山以北以东地区。

仪凤年间，吐蕃进逼唐本土陇右，中书令李敬玄统兵十八万反击，大败而罢。接着，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反叛。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唐派裴行俭出使西域，以送波斯王子归国为名，相机平定了阿史那都支之乱。因此，岑仲勉先生提出调露元年唐复四镇之说，学者多从之，认为补充了史籍一大疏漏。实际上此时吐蕃依然控制天山以南四镇所辖的塔里木盆地绿州地区，而且活动频繁。阿史那都支反叛地在碎叶，裴行俭行军走的也是避免惊动吐蕃的"天山北道"，仅限于天山以北地区，并未涉足四镇或派兵击吐蕃问题。因此次平定阿史那氏叛乱成功，暂将安西府治由西州迁至碎叶，碎叶代焉耆成为四镇之一，稳定了西突厥局势。故此时所谓的四镇，只有碎叶一镇在唐王朝手中，而且时间不长又成为新崛起的突骑施的游牧地，吐蕃势力也渐次渗入，甚至出现了吐蕃册封十姓可汗事，从此唐王朝失去了对碎叶的控制。

垂拱年间，武则天临朝执政，决心进击吐蕃，但在垂拱——永昌两次大战中，唐皆败北。直到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吐蕃内部分裂，武则天再次攻击，才取得大胜，并一举克复西域天山南北及塔里木盆地全部地区，复在龟兹置安西都护府，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结束了吐蕃控制西域的局面。这是唐代前期唐、蕃争夺西域和四镇弃置的大概脉络。史籍对这一时期内四镇弃置的记载应是可信的，中间并无漏载。

060 究竟是回鹘还是吐蕃在公元789—792年间夺据了别失八里？

〔日〕森安孝夫著　罗贤佑译

（《民族译丛》1982年第3期）

公元八世纪末叶，当时中原的唐王朝已经衰弱，无力控制天山东部的丝绸之路。新兴的回鹘与吐蕃这两个强国，为了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便在公元789至792年间进行了占领别失八里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如何？学者们见解不一。多数人认为是吐蕃获胜，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回鹘获胜。本文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回鹘与吐蕃对别失八里的争夺中，回鹘开始时虽遭到失败，但最终还是获得胜利。包括吐鲁番在内的所有天山以东地区，此后便处于回鹘势力控制之下，直至大批漠北回鹘人被黠戛斯从蒙古高原驱赶到这里以后。作者引用回鹘毗伽可汗碑铭、保存在柏林的古突厥文抄本和用波斯文写的摩尼教赞美诗集《麦尔纳曼》等文献资料记载的事实，证明从公元八世纪末至九世纪中的这一时期，统治天山以东地区的是回鹘人，而不是吐蕃人。又引用公元820年左右出使回鹘的穆斯林塔米姆在其行记中的记载和中国文献《资治通鉴考异》中所引《后唐懿宗纪年录》的许多记载，证实在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回鹘的活动范围一直扩展到大漠之南，却没有吐蕃人出现于漠北回鹘领土的任何记载。根据这些史实，作者得出了回鹘夺取了别失八里的结论，并补充了一些有关的资料。

061 唐开元二年西州府兵

——"西州营"赴陇西御吐蕃始末　　　朱　雷

（《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

在阿斯塔那108号墓出土的"西州营"文书中，得知"西州营"在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四月曾在陇西。西州乃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灭麹氏高昌王朝后所置，下辖五县；同时实行府兵制，建立四个折冲府。"西州营"即抽调西州几个折冲府中的府兵，临时组建而成。西州府镇戍任务很重，兵员本来不足，需从内地增调，为何却组成"西州营"，远去三千余里之外的陇右地区陇西县？首先揭示该文书的吴震同志，认为该文书是一式三份的"名籍"，故定名为"西州营名籍"，去陇西是执行运输任务。日本菊池英夫认为是"支给薄"，定名为"开元三月四月西州营诸队请受马料帐"。作者分析考证了文书的具体内容，同意菊池所定的性质，并就赴陇西的原委始末进行了研究。

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杨矩送金城公主入蕃，吐蕃贿赂杨矩，得河西九曲之地，遂阴谋进攻。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五月，吐蕃要求定疆、结盟。八月，盟尚未结，便大举向临洮、兰州，渭州之渭源进攻。玄宗命薛讷，郭知运等抗御。郭知运乃西陲名将，当时为伊州刺史兼伊吾军使，遂奉命前来击蕃。同年十月，唐军大败吐蕃于渭源，十二月置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为节度大使兼鄯州都督。西州营可能就是那时组成，并随郭知运前来御蕃，至次年四月尚在陇西驻守，所需秣料尚由陇西供给。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郭知运大破吐蕃于九曲，吐蕃多次遣使请和，陇右形势为之缓和。大约就在这时，西州营返回西州。因这些牒文逾期，作为故纸便被民间作了死者的服饰之类葬入墓中。

062 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　　陈国灿

（《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关于唐朝吐蕃陷沙州城的时间，过去都以《元和郡县志》所记为据，定为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1914年罗振玉著《补唐书张义潮传》，推定为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自此，有的认为《元和志》所记"固信有证"；有的认为是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有的认为应以786年为宜；还有的判断敦煌的"陷落"、"降下"、"蕃和"不止一次。中外学者各依所据，众说不一。

作者认为《元和郡县志》所记太粗略，《旧唐书》、《唐会要》关于此事的记载也是大概估计之说，不足为据。文章引用了《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又据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八月十五日建的《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记载沙州刺史周鼎到莫高窟庆贺李大宾功德窟建成的事实；又据《颜鲁公宋广平碑》侧记中所言宋璟第八子宋衡与周鼎保守敦煌，于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十一月带领家眷回到长安的事实，推断出吐蕃攻沙州城的时间应是大历十一年（776年）八月以后不久的九、十月间。阎朝杀周鼎而自代的具体时间，可能是大历十二年（777年）的九、十月间。此后，阎朝保城抵抗，还坚持了十年。因此，沙州城陷蕃时间，应是贞元二年（公元786年）。

唐代宗大历年间，唐蕃之间的战争在河陇进行，河西诸州相继失陷。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德宗即位，采取和平外交，派太常少卿韦伦护送五百俘虏归蕃，此后双方转敌对为友好，建中年间还曾三次会盟。在这种形势下，吐蕃对沙州城的进攻也停止下来。唐蕃关系再度恶化，吐蕃大举攻战始于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八月。沙州城就是在这一形势下重新受到攻击而陷落的。作者认为，这就是沙州城所以能孤守十年而陷失的历史背景。

作者还征诸敦煌文献，引用《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子年记履倩等户手实》和《丑年八月沙州女妇令狐大娘牒》等文牒。这些史料中有"蕃和之日"，"蕃和以来"，"去丙寅年"，"丙寅年十一月"等记载。"蕃和"一词，即沙州居民对阎朝谈判出降，吐蕃和平占领沙州这一历史事件的简称。这一时期的"丙寅年"，按推算，正是贞元二年（公元 786 年）。经过上述论证，作者认为沙州城的陷蕃时间是贞元二年（公元786年）。

063　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　　　齐陈骏

（《甘肃师大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4期）

唐朝末年，沙州（今敦煌）张议潮领导沙州人民反对吐蕃奴隶主统治的大起义，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评述了这一事件，并就唐与吐蕃的关系以及当时河西、陇右的情况作了概述。

公元六、七世纪之交，藏族松赞干布建起奴隶制的吐蕃王朝，唐太宗为求和好，将文成公主嫁给。文成公主赴藏时，带去许多精细手工业品，药物和蔬菜种子。后来，为满足松赞干布请求，又给送去蚕种，还派了许多擅长酿酒，造纸，碾硙的工人去传授技术。这对吐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所以文成公主至今仍受藏族人民爱戴，成为汉藏两族人民团结友好的象征。到中宗年间，唐又接受吐蕃请求，将金城公主嫁给赞普尺带珠丹（即弃隶缩赞），尺带珠丹给唐玄宗上表，说吐蕃与唐是甥舅宿亲，和同为一家。双方每一皇帝或赞普更替，都互派使节，生相庆，死相吊，亲密往来。藏王达摩赞普死，丞相立乞离胡为赞普，未经唐册封，引起国人不满，当时有人说："且无大唐册命，何命赞普"。可见汉藏两族人民在政治上是十分密切的。但吐蕃的奴隶主与贵族为夺取奴隶和土地，曾向唐激烈争夺过安西四镇；后又趁安史之乱(公元755年)，吐蕃乘机发动大规模进攻，到公元781年最后占领沙州，便夺取了包括河西在内的整个陇右，使这一地区从封建社会倒退到奴隶制社会，广大人民论为奴隶，长期遭受残酷杀戮与掠夺。

对于吐蕃奴隶制的暴虐统治，河陇地区人民早已不堪忍受，到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内讧，847年吐蕃落门川讨击使尚恐热篡夺了吐蕃大权，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在河陇地区进行争夺，更加深了河陇人民的灾难，张议潮遂于848年在沙州率众起义，很快占领沙州。到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又先后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州，并派遣他的哥哥张议潭带十一州地图去长安觐见。唐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名其军为"归义军"。到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

又克复凉州，于是陷没百余年的河陇，次第收复。但是，当时的唐王朝已无力顾理，将十一州全托付予张议潮治理，至咸通八年（公元867年），议潮将河陇事务交其侄子张淮深管理，他自己入朝，留居京师，至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卒于长安私第。

064 唐末沙州（敦煌）张议潮的起义　　金启综

（《历史教学》1954年第2期）

公元九世纪中叶，沙州人张议潮起义，打败吐蕃在敦煌的统治，收复河西地区的英雄业绩，由于新旧《唐书》不为张议潮立传，其事迹显为人知。关于起义经过，新旧《唐书》及其它史籍记载互有出入，但《资治通鉴考异》却有较详考证。本文根据《考异》和其它资料论述了唐末沙州张议潮起义，收复沙州的经过及其建设等问题。河西走廊为丝绸之路的孔道，而沙州则为通往西域之咽喉。其地北连伊吾（哈密），西北通高昌（土鲁番），西南经鄯善通于阗（和田）。故河西走廊自汉时起，即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前进基地。自公元八世纪末，河西北面有突厥、回纥，南有吐蕃，两面经常攻击河西。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河西、陇右军队空虚，逐渐占据河西、陇右诸州。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攻陷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逃往甘州，为沙陀所杀。杨休明代为节度使，又逃往沙州，设立节度使府。这时沙州四围诸州均为吐蕃所占，并包围沙州。沙州刺史周鼎拟焚城东奔，部下不从，都知兵马使阎朝杀周鼎代为刺史，守城十一年，终因粮尽为吐蕃所占。文章引用史书有关记载，说明吐蕃占领区人民遭受的苦难与压迫，以及群众的反抗斗争。至唐武宗、宣宗时（公元840至850年左右），吐蕃因内乱势力衰落，唐朝乘机收复了河西东部，而西部则为沙州张议潮为首的人民起义所收复。据《资治通鉴考异》及其他史料记载，张议潮乘吐蕃内乱，潜与城中有力者划策，于大中二年（公元848年）率众里应外合，将吐蕃镇将逐走，收复沙州，继又收复瓜州，并立即遣使驰表赴长安告捷。唐朝任命张议潮为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归义军节度使兼十一州营田处置观察等使。此后张议潮又率领群众，经过十余年艰苦斗争，才最终战胜各外族势力，打通丝绸之路。团结河西西部回纥、吐蕃、吐谷浑、嗢末、党项、阻卜、月氏、龙等少数民族，开凿沟渠，扩大人工灌溉，发展农、牧、商业、文化，使沙州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交通和贸易的中枢。

065 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　　姜伯勤

（《中华文史论丛》 1981年第1辑）

唐代的沙州辖今甘肃敦煌及附近一带，安史乱后地属吐蕃，五代时属回鹘，宋属西夏。是汉唐“丝绸之路”西端的门户。本文通过对唐敦煌“书仪”写本的研究，论述了吐蕃占领沙州时期，沙州玉关驿户起义的前后过程及对以后的巨大影响。这组书仪现存十七则，其中有几则反映了当时震动沙州的一次驿户起义。例如，就中第十一则题为《沙州状逆贼玉关驿户氾国忠等六人》，是沙州官吏为呈报此文的一篇状文。状文略述了玉关驿户氾国忠等六人起义的原委及杀入沙州子城的梗概。作者以本件状文为经，参照其余几篇文牍，结合唐代史籍，对这次起义事件，作了初步考察。关于这次起义的年

代，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有系于“大中五年（851）以降”的意见。然而根据作者对陶慕士《新疆吐蕃文书集》中所反映的沙州“优秀蕃人臣民”被杀一事，以及嗣后委任新“节儿”诸事，与《书仪》所见玉关驿户起义中沙州节儿自杀及其委派新节儿诸事对照殊属一致。由此证明，在大中初年之前，沙州业已爆发过人民起义。再经对《书仪》第八则《某人为氾国忠事上相公启》私人书信的研究，作者认为沙州玉关驿户的起义，不得晚于791年的孟秋。考察状文及某人上相公启，这次起义以驿户的发动为一重要特色，而以自称“拓拔王子”为另一特色。驿户是起义的发动者。已知驿户的姓名有氾国忠、刑兴、张清三人，他们的籍贯都是玉关，在起义前一年“拟逃瀚海”即庭州而被“相府”“罚配酒泉”。在驿户制的奴役下，引起这次驿户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是“驿将王令诠等苦克”。这次起义除六名或七名驿户外，沙州当地群众起而响应，当是意料中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起义者立驿户刑兴为王，号称“拓拔王子”。为什么一个压在底层的驿户起义要自称“拓拔王子”？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拓拔氏河西鲜卑曾建立过南凉政权，也由于作为吐蕃属部的拓拔氏族曾横遭诛刈，因而起义者以“拓拔王子”称号，就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起义者沉重的打击了吐蕃沙州节儿和蕃大德为代表的统治，起义者的一个重要战果是造成驻沙州子城的吐蕃节儿的自杀。节儿，即rtse-rje，是隶属瓜州节度使之下的沙州城长官。起义的另一个战果，是镇压了一批“监使、判咄”。监使与判咄是一种蕃籍官员。起义的又一个战果是震动了“东道军州”。所谓“东道军州”，乃是吐蕃将河州（今甘肃临夏）为中心的河西、陇右地区称为“东境”、“东道”或“东道军州”。“东道军州”是吐蕃用兵的战略要地，而发自酒泉的玉关驿户的轻骑，三夜间竟越过了东道军州的一些重要关城，使统治者不由得惊呼：“东道烽铺，不告烟尘，莫测此贼，有同天落”。但这次起义似乎带有浓郁的反民族压迫的色彩。起义者由于只顾“谋杀蕃官”而放松了对汉族“破落官”及上层僧侣的警惕，终于惨遭逮捕杀害或錮送瓜州。历时三夜，行经千里的玉关驿户起义，人数不多，时间甚短，失败很快，但对此后若干年中吐蕃占领下的沙州乃至河西局势的发展，确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是由于包括玉关驿户起义在内的沙州人民对吐蕃统治的长期反抗，促成了吐蕃在占领沙州后政策上有较多的转变，并容纳、保存了较多的唐制。二是玉关驿户起义构成了沙州人民反抗斗争的历史传统，它以浓郁的反民族压迫色彩和反奴役色彩，影响了此后的张议潮起义和嗢末大起义。吐蕃王朝把蕃汉人民沦为“驿户”“嗢末”之类的被奴役者；而这些“微弱者”的反抗，却形成了一股历史的巨流，这股巨流，终于埋葬了奴隶制的吐蕃王朝，结束了吐蕃对沙州和河西地区的占领。

066　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　　唐长孺

（《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第1辑）

唐末归义军节度建立以后，一直维持到北宋初，其事迹国内外学者多所考证，日人藤枝晃氏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引据许多资料，最为详尽。作者于1957年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显微胶片中抄录了一些斯坦因盗窃去的敦煌文书，其中也有涉及归义军节度的资料。本文是对这些资料内容的评介。一、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自从张议潮于咸

通八年（公元867年）入朝长安之后，沙瓜地方政权即由其侄张淮深掌握。一般认为即在此时或潮在长安逝世后(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淮深就被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从张景球撰的《张淮深墓志铭》、《张氏勋德记》、《张淮深变文》这些资料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疑问。然而在敦煌文书中却发现有与之相矛盾的资料。斯1153号是沙州驻长安的进奏院上本使的状。文书中说在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三般专使都到兴元驾前。他们面见军容长官和宰相，具说"本使一门拓边效顺，训袭义兵，朝朝战敌，为国输忠，请准旧例建节。廿余年，朝廷不以指扔，今因遣（宋）闰盈等三般六十余人论来者"。按张淮深之死，据墓志铭在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光启年间遣使论节的所谓"本使"或"仆射"非淮深莫属。文书中又说："修文写表，万遍差人，涉历沙碛，终是不了"，一直拖了二十年，要求并没有获得满足。因而张淮深继任后，虽然在事实上是节度使，但却长期没有得到朝廷授予节度使的名义。二、张承奉题名结衔考异。千佛洞张135号窟内有如下题名：……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南阳郡开国公张承奉一心供养。就在这窟内与张承奉题名南北相对的另一供养人题名为：□(勅)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索勋。索勋在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已为节度使，但他所带检校官却远较张承奉为低。索勋在另一处洞窟中的题衔为：勅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请使定□军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钜鹿郡开国公食邑贰千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索勋一心供养。《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光化三年（公元900年）称：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右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军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据上引资料，作者认为当索勋为节度使时，张承奉的官位比索勋高，虽非朝廷任命，却可以由此断定他不是节度副使。索勋尊之以虚衔而自揽实权。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或稍后，张承奉自称虽是节度使兼御史大夫等等，但他所受的正式官职尽是节度副使及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等。那时没有节度使，承奉以副使权知兵马留后。据《旧唐书·昭宗纪》他获得节度使的任命远在五年之后。三，曹议金的继任及其卒年。张承奉直到天复末年还称节度使，据斯5747号文件记载，天复五年（公元905年），亦即天祐二年，张承奉检校官已称司空，不久便自称为西汉金山国白衣天子。西汉金山国的终年不能确定，一般认为至早不在梁末帝的乾化四年（公元914年）前，曹议金代张氏而掌握沙州地方政权也不能确定在那一年，据《瓜沙曹氏年表》的有关称谓，认为议金在贞明间（公元915—921年）已主州事。但作者发现的斯4398号《曹元忠献硇砂状》的题衔为：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御史大夫谯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曹元忠（中略）天祐十四年五月日新授（衔与前同略）曹元忠。天祐十四年即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那时议金之子元忠已称节度观察留后，检校司空，议金当已为节度使。据此，曹议金之任节度使便需提早几年。曹议金之死，据《旧五代史》卷七九《晋高祖记》曹议金死于天福五年（公元940年）二月，这是报讣到达朝廷的年月。按斯4291号《归义军节度使批准百姓张富子女胜莲出家之牒》的有关记载，作者认为议金之死至迟不出天福二年（公元937年）二月，或更早一、二年。四、归义军节度和甘州、凉州的关系。斯3329号《张义潮传记》载，大中二年"敦煌、晋昌收复已讫"，这年是收复了沙、瓜二州，又云"次屠张掖、酒

泉，攻城野战，不逾星岁，克复两州”，是说在大中三、四年间（公元849—850年）攻取甘州和肃州。又据斯936号《沙州、伊州地志》大中四年义潮又收复西州。《义潮传记》又述及收复凉州事，但不记年月。按《通鉴》卷二五〇咸通四年（公元863年）三月称：“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奏自将蕃汉兵七千克复凉州。”此事不见两《唐书·懿宗纪》。作者根据斯6342号一个关于收复凉州事宜的表和批答文书考释，收复凉州应在咸通二年，较《通鉴》所记早了二年。或义潮奏中的两年是言其始，而《通鉴》则言其终。关于唐末凉州的情况，作者指出了《五代史记》卷七三《吐蕃传》中有关记载的误讹，《新唐书·方镇表》记载的疏略或可疑之处后认为，凉州收复后即属归义军管内，河西节度使本治凉州，大历以后改治沙州，所以归义军亦即河西节度的军名，管有凉州是当然的。凉州收复以后还经常发生战争，沙州镇戍军也就长期留居其地。但二州之属归义军为时并不太久，到了张淮深统治时期，便逐渐不能控制。从斯2889号中和四年（公元884年）肃州防戍都营田□汉君县□张胜君等状中，作者判断这时期凉州自有节度使，已不属沙州管了。而且从状文“其甘州回鹘和断末定，二百回鹘常在甘州左右捉道劫掠。甘州自胡进达去后，更无人来往”这段话来看，似手甘州也不属沙州管了。斯389号也是肃州防戍都给义军的报告，详细叙述了甘州情况。从状中所说情况看，甘州这时是回鹘、吐蕃、龙家等族角逐之场。最后，吐蕃、退浑、龙家都撤离甘州，回鹘遂占甘州。回鹘何时占甘州，史籍无载。《旧五代史·五代史记》均说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十一月甘州回鹘遣使入朝进贡，其占领甘州当在其前。唐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以后归义军曾经重又把势力扩展到甘州。然不久回鹘占领甘州已经巩固，归义军终于不能维持其在甘州的地位。在张淮深统治时代，肃州设有防戍都，经常向他报告东方的情况。到他的末年，肃州也脱离了归义军。大致在张淮深末年归义军节度所管虽然仍称河西十一州，实际上只有沙、瓜二州而已。

067　唐代回鹘控制北庭的过程　　孟凡人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回鹘原住今色楞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公元六世纪初始称回鹘。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史那贺鲁叛唐，将军梁建方及回纥婆闰率诸部平定，收复北庭。显庆元年（656年），贺鲁复犯边，唐遣程知节、苏定方、梁嗣业等将军，并率回纥军征讨，贺鲁败逃石国，苏定方及婆闰追至石国西北苏咄城，执贺鲁送洛阳，加婆闰右卫大将军瀚海都督。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记载回纥与北庭及其以西地区的关系。天宝元年（742年）骨力裴罗自称叶护，不久又自称可汗，从此回纥便致于西方的发展。先后战胜拔悉密及葛逻禄，将其漠北部落并入回纥，又将势力扩展至金山一带。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后，吐蕃占据河西，内地与西域的联系为之隔绝，唐王朝始开“回纥路”。所谓“回纥路”，即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和四镇留后郭昕假道回纥朝奏之路。“回纥路”路线，大致分为两段，一段是由北庭至回纥牙帐，一条是由回纥牙帐至长安。

北庭地处天山东部，扼东西交通之咽喉，又有广阔的牧场，在军事地理上至为重要。故回鹘与吐蕃对北庭的争夺战长达十年之久，两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是德宗贞

元六年（790年）吐蕃获胜，占据北庭，回鹘战败，退居漠北，至贞元十一年（795年），回纥怀信可汗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回纥王统更易，回纥可汗由原药罗葛氏改为䟢跌氏统治，第二怀信可汗有远谋大略，致力于向西方的发展，收复吐蕃占领下的北庭及凉州，直至回鹘西迁止，北庭一直为回鹘所占据，这为回鹘的西迁创造了条件。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回鹘连年灾害，国内饥馑，统治集团内部，互相争伐，至开成五年（840年），又受到黠戛斯的侵袭，形成了回鹘族历史性的大迁徙。据史载，西迁回鹘共十五部，有一支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奔吐蕃，一支投安西。但其主体是西到北庭后，然后才各自分散。回鹘控制北庭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回鹘控制了北庭，在漠北回鹘国破而大量西迁时，得以顺利地进入西域，因为北庭是回鹘西迁的最大集散地和接受地，又为其后高昌回鹘的发祥地，并逐渐发展成为今日新疆地区的主体民族。这种发展变化，无论对新疆民族史或对丝路民族变迁的研究，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068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二

——唐代烽铺的管理　　程喜霖

（《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5期）

唐代烽铺由兵部职方郎中员外郎管理。但唐疆域辽阔，边烽与长安相距万里，当然不可能由兵部直接管理。那么，兵部之下的烽铺究竟由谁具体管理？作者根据近年在吐鲁番所获文书，对唐代烽铺的管理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拟定了管理系统图。根据史籍和文书记载，兵部之下烽铺统属系统有三：一是州县镇统属的烽铺。据唐《烽式》记载，烽铺要将烽警报告所属州县镇，或止于本管境内，或传告京都，皆由州县镇依《烽式》执行，烽燧失堠等情况须由地方州县勘当。要之，州县有管理所属烽铺的职权。《唐六典》卷三："兵曹司兵参军掌武官选举，兵甲器杖，门户管钥，烽堠传驿之事。"可知凡涉军防，皆归州府兵曹司兵参军职掌，烽铺亦当由其主理。唐制，下州不设司兵参军，其职由司户兼理。州辖县，一般烽铺置于县。有关烽堠事宜，在县的一般应归司兵佐或司户佐处理。但县令、丞、尉统管诸曹之事，当然也管理烽堠。那么烽堠与镇戍是否有从属关系，由吐鲁番文书所见，镇界内之烽由镇管理，有统属关系。二是军镇的烽铺。唐高宗时，在边防建军，设置军区，又称为军镇。《烽式》说军之行动和驻营，拟置爟烽又称引烽，以警戒报警为务，边防军镇即依制行事。从文书所见，军镇亦置有烽铺。阿斯塔那226号墓所出《唐开元某年伊吾军典王元琮牒为申报当军诸烽铺䦆田亩数事》中就记载了速独、高头、柽堆等八个烽。同墓出土的《唐伊吾军牒为申报诸烽铺䦆田所得斛斗数事》中，记有柽堆烽、乙耳烽、乌谷铺、骨吐禄铺等二烽、二铺。同墓出土的二十七件镇戍烽铺䦆田牒状中，伊吾军申报当军诸烽铺䦆田与粮贮牒状七件，记有十三烽、二铺。又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记有哈拉和卓所获《伊吾军屯田残籍》记苜蓿、都罗二烽，可证军镇有自已的烽堠网。三是折冲府烽堠。从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武周君住牒为岸头府差兵向礌石及补府史符事》及《唐开元二年(714年）西州蒲昌府牒》可知，在边防的折冲府负有向镇戍铺派兵防守的任务。尤其战争时期，折冲府对派兵防卫的烽堠有统属关系。折冲府在州之下，与县并列，但折冲都尉比县令、丞的品

位高，县之境界与折冲府之地团，也不尽相同。唐制以卫统府，折冲府不受地方官的管辖，但实际上是由都护、节度使、都督（有的兼州刺史）直接管理。州刺史亦干预折冲府的发兵、练兵、军备、点兵等事，且刺史官品高于折冲都府，习惯上仍有上下级关系。本文列有唐代边要所置烽铺的管理系统图，对“史所不详”的管理制度，作出了补充。严密的烽燧制度，对卫疆安民曾起过重大作用，同时对保障丝路的畅通也有重大贡献。

069　哈剌契丹的军事组织　　〔苏〕皮科夫著　冯继钦译　龙体聪校

（《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

本文探讨了哈剌契丹的军事组织，哈剌契丹又称西契丹，即大辽王国衰落后西迁到东突厥斯坦领土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那部分契丹部落。在十一世纪初，契丹的军队在东亚已有“无敌”的声誉。哈剌契丹成立后，受到当地许多部落和民族的抵制，他们不得不进行多年艰苦的斗争，这就使军队成为“国家的靠山”。哈剌契丹第一位葛尔汗耶律大石是一位大军事理论家和卓越的统帅。他熟悉孙子、吴子和李广的军事著作，很重视军队建设。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一套军事行政管理体制，目的在于巩固国家、中央政权和建立一支忠诚而有战斗力的军队。哈剌契丹国内凡十八岁以上的男子、能够拿起武器的都要从军。军队的战斗单位是“土绵”，每个土绵不少于一万人。军队的核心是由重武器骑兵人员组成，其中既包括契丹贵族的代表，又有职业军人。轻武装骑兵是军队的基本群众，他们执行侦察、撕杀、追击敌人等各种战斗任务。重武器装备的近卫军承担葛尔汗的警卫，在关键时刻也参加战斗。由于哈剌契丹领地里定居的居民较少，因此军队里的步兵相当少，专用于围攻要塞，并熟悉掷石器投射石炮等技术。还建立了由汉人制炮匠组成的、具有中国式武器技术的特种技术队伍。他们还利用过从苏丹军队里得来的大象，扩大轻骑兵中的弓箭手。文章还根据有关史料，考证了哈剌契丹军队的数量、防御工事、部署计划、部队装备、训练，以及城市的出现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等问题。还特别详细地论述了哈剌契丹军队的战术、士气和作风，以及存在的弱点。文章认为：由于哈剌契丹的军队经常过着战争生活，有作战的习惯，有高度的机动性、良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因而成为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初，中亚强有力的军队之一，其战术在历次战争中是卓有成效的。其后因产生地方分权，适合大战需要的战斗组织逐渐消逝，契丹封建主组织掠夺性袭击甚至互相火并，以及邻邦强大和属民起义，使哈剌契丹的国家和军队日益削弱，最后导致军队的毁灭和国家的灭亡。但他们的战斗经验却受到后来各国和部落的重视和运用，并给予高度评价。

070　波马克罗记叙的元初两起叛乱考释　　余士雄

（《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两处记叙了元朝初年发生的两起重大的叛乱。本文对《游记》中的记载进行了考释，元初的两起叛乱，在我国历史上都有记载。一次是以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的后王乃颜为首，在东北发动叛乱，并勾通在西北的窝阔台后王海都

同时叛乱。元世祖忽必烈亲率大军四十六万于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征讨，打败乃颜军，活捉了乃颜，立即处死。再一次叛乱是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大都发生的千户王著杀阿合马的事件。阿合马是忽必烈的大臣，回族。曾任上都同知、中书平章政事、诸路都转运使、荣禄大夫等职，受到忽必烈的宠信。他便有恃无恐，横征暴敛，贪赃枉法，排斥异己，强占民女民妻，卖官鬻爵，积金如山，民怨鼎沸。王著是契丹人，身为千户，疾恶如仇，因其母及妻女并为阿合马所辱，愤恨已极，遂与另一人同谋，在忽必烈和皇太子离开都城时，以太子之名诱骗阿合马到皇宫内杀之。忽必烈闻讯后，即命人搜捕同谋者悉杀之。本文引用《游记》中对这两件事的记载，对照《元史》和《蒙古史》中的有关记载，进行了考释。如《游记》中说乃颜是“忽必烈之诸父”。实际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玄孙，而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故乃颜是忽必烈的侄子，而不是他的“诸父”。又如，《游记》中记主谋杀阿合马的人是陈著，《元史》则说是王著，经考证，应为王著。有的情节《游记》有记载而《元史》则无。故二者在这方面可互为印证，互为补充。

3.国 家 关 系

071 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　　吕振羽

（《民族团结》1962年第2期）

新疆与祖国的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原始公社制后期，新疆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物中的彩陶，可能与仰韶文化遗存的彩陶有关。在西周（公元前1122—770年），约成书于战国时（公元前403—221年）的《穆天子传》和《山海经》，都有关于昆仑山、赤水及新疆、青海其他一些情况的论述。因此，至迟到战国时，周人的足迹已达到新疆并爬过昆仑山。依据可靠文献和地下出土遗存，新疆正式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从前汉武帝时（公元前140—87年）开始的。从前汉起，两汉政府都在新疆设置统辖所谓西域三十六国或五十余国的军事、行政机构——都护府及其所属的戊己校尉等。西汉时这种开创性的措施和建树，奠下了新疆成为祖国疆土的基础，也奠下了新疆各兄弟民族成为今日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的基础。在唐朝，由于西汉以来的关系的发展，对西域的统治一面承袭两汉以来的都护制度，一面又将西域和突厥人散布的地区，按内地行政建制区划为府、州，县，而仍授予各部族和部落上层以各种官衔，并通过他们去进行统治。因此，到唐朝，新疆和祖国的关系，较之两汉有了进一步的密切和确定。在五代、辽、金、两宋，内地各个政权相互争夺和分裂的期间，新疆也未断绝它和内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联系。在元朝，新疆一开始就和内地一样，元政府设立元帅府、都护府管理军事，设按察司、宣慰使、提举司、交钞库、达鲁花赤、断事官等管理民刑、财政等政事。元明之际，蒙古贵族各据一隅，并每每互相火并，新疆亦分裂为吐鲁番、别失八里、于阗三大部和一些小的地方封建统治势力。清朝和民国时期，新疆始终是祖国的一个行省，为维吾尔自治区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新疆和祖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又为加强经济的联系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据《北史》、《魏书》等史籍的记述，从两汉开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成了生产以至生活上的重要

因素。到唐朝，西域和内地的经济、文化的联系，有了更大的发展，并进一步形成为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同时又促进了西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五代和两宋、辽、金，据新旧《五代史》、《宋史》、《宋会要辑稿》、《辽史》、《金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书的记述，新疆与内地经济、文化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在唐朝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明朝，明廷对西域的统治，由于针对元室残余势力的关系，与元朝有所不同，因而在财政、经济的关系上有着相应的差异，但没有改变经济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性质。清朝在鸦片战争以前，新疆在财政上完全统一于中央朝廷，和内地的经济、文化关系，基本上也和内地各行省相互间的关系一样。由于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新疆和祖国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对新疆历史的研究，是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在这方面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可供研究者参考。

072 “凿空”前西域同内地的联系 朱振杰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本文从原始人群及部族的迁徙，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传说诸方面，探讨了张骞凿空之前西域同内地的联系。作者认为，西域同内地的联系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比通常说的张骞凿空要早的多。新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遗物，遍布东迄伊吾，西至喀什，北到阿勒泰的辽阔地区。这些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来自东方的羌族、乌孙族，匈奴族，应有一些民族或部族为居延人、单桓人、龙勒人、吐火罗人，焉耆人，大夏人等。他们都是在汉武帝之前从河西迁到西域及其以西的。他们的西迁，不仅把原来驻地的原始经济、文化带进了西域，而且成为后来西域诸民族和现今新疆各民族渊源的重要成份。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意即丝国。这就是说，早在距今两千三百年前，希腊，罗马已有了我国的丝绸，并以此而得名。那么地处中西交通要道的西域，得到内地丝绸和其他物品的时间肯定更早。文化交流方面，作者主要就新疆与内地在舞蹈艺术，彩陶文化和细石器文化方面的联系进行了探讨。如周初制定的《六代舞》，特别是宫廷中的《四裔乐》，就是当时各民族乐舞开始融合的证明；另外，内地彩陶文化约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从内地进入新疆东部。新疆的细石器文化与祖国北方的细石器文化也同出一源。在经济、文化联系的同时，也开始了政治上的联系和联合。如商朝强盛时，“诸侯八泽而来者千百国”与商王通好。其中就有不少是来自西域的小国。武王伐纣时得到南方和西方许多民族的支持和援助。灭纣后周武王曾举行盛会，宴请各地诸侯和部落首领，共庆胜利。远古时西域和内地的这些联系，都还处于自发的。而在张骞通使西域及其以后，确立了西域和内地日趋牢固的政治关系，开创了友好交往的新纪元。但真正凿空的功绩，应归凿空前那些促进西域和内地在友好交往的人们。他们虽然青史无名，但却为以后西域和内地政治、经济、文化日益频繁地接触和往来，进而形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奠基的贡献。

073　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　　　　王炳华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4期）

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的历史关系是新疆历史研究中有待加强的薄弱环节。本文试图把足以说明这种关系的考古资料加以整理、纂辑、分析，以期研究的深入。距今一万年稍后的哈密七角井细石器遗址，其石器造型，加工制作工艺明显受华北地区细石器如山西下川、河南许昌灵井等的影响。在新疆，这类细石器遗址还有三道岭、阿斯塔那，罗布淖尔等多处。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同一种文化技术影响下的产物，是新疆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即与黄河流域文化交流的有力说明。1976年，在安阳殷墟发掘的距今三千二百年前后殷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玉器占出土器物的39.2%，经鉴定绝大部分属新疆玉料，可见商王室用玉主要取之于新疆。在吐鲁番盆地西缘，天山阿拉沟、鱼儿沟一带曾发掘大批春秋战国以至汉代的墓葬。其中出土了一件凤鸟刺绣，从丝绢到图案显然属于中原地区的产品。还有一块方泥饼，用菱纹链式罗包裹，虽已腐朽，但痕迹仍存，其细密的组织非丝莫属。这一带在古代并非交通要道，也非政治经济中心，却都出现来自中原的丝织物。此外，与新疆地区邻境的阿尔泰地区，也曾出土过约公元前第一千年中期的风格、技法类似的丝织物。这一事实也可以帮助我们考虑当时中原与新疆的联系。与丝绣相类，漆器、铜镜和东南沿海的贝类，在汉代以前就出现在新疆。阿拉沟春秋战国墓中有许多漆器出土。在新疆和阿尔泰地区都曾出土过战国时期的中原铜镜。解放前，在罗布淖尔的原始社会墓地中发现过只产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海菊贝制成的珠饰。解放后，在哈密五堡（距今三千年前后的原始社会墓地）以及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墓地中也都发现过不少海贝，大都为装饰品，个别含放于死者口中，类似商代中原的习俗。这些海贝多为“货贝”，或“环纹货贝”，其产地虽为广泛，但联系有关资料，最大的可能还是来自我国东南沿海。阿拉沟古代墓葬和喀喇和卓原始社会遗址，都出土过虎纹、虎形饰牌。结合历史发展，这应是当地居民图腾崇拜的表现或遗留。联系古文献中有关先秦时期西域地区的对于“西王母”的怪诞描写，可窥见新疆地区早期历史的科学内核，同时也表现了当时中原地区对西部的认识和了解。河南新郑、汲县等地出土过一种青铜莲鹤纹壶，时代约在春秋中期，或晚到战国初期，这种新颖的莲花立鹤形象显然是受到印度文化艺术的影响，而这一影响的最大的可能是取道西域。在先秦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昆仑、沙海，罗布淖尔，孔雀河等地理概念的记载。从感性认识到形成文字，又有一个过程。所以，实际存在的联系当较文献表明的更早一些。汉以前华北地区与新疆的通路大致经山西北部进入河套地区，更西即进入河西走廊。与汉以后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不同的是，分段运行，各有其主，并无统一的规制和管理。但这一历史基础却是张骞“凿空”的前提。

074　西汉时期西域与祖国的关系　　　　刘慧琪

（《历史教学》1966年第1期）

西域同祖国内地的关系，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开始。本文仅叙述两汉时期西域与祖国

的关系问题。所谓西域，其基本范围是敦煌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一带地方，相当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汉中期，汉王朝与匈奴的主要矛盾是争夺对西域的统治汉。匈奴冒顿单于在西汉初年征服西域，设僮仆都尉，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西域成为匈奴进攻汉室的右臂和重要经济来源。张骞通西域后，诸国纷纷遣使来汉，受到汉朝隆重接待。但在玉门关外最东的国家楼兰、姑师等受匈奴指使，成为匈奴的耳目，经常拦击汉使。所以，汉开拓河西后，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由赵破奴率军数万，首次出兵攻打姑师、楼兰；接着，李广利又于太初元年至三年（公元前104—102年）率兵征大宛。此后，设都护，又在轮台、渠犁等多处屯田，以减轻西域人民负担。汉经营西域，一为削弱匈奴势力，二为沟通中西交通，发展贸易。由于屯田和采取减轻人民赋税的政策，因而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得到西域人民的广泛支持。至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始设都护，管理西域军政大事，汉之号令直达西域，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绶，调遣军队，正式确立了在西域的统治地位。车师是西域的门户，也是匈奴在西域的主要据点。汉与匈奴在争夺车师中，发生过几次战争，西域诸国都积极派兵协助汉军，才迫使匈奴势力退出。王莽时，西域重受匈奴控制。至东汉初，西域诸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数遣使致质于汉，愿请都护"。东汉与西域曾三绝三通，班超、班勇三通西域，主要是调遣西域诸国兵将与匈奴斗争。汉朝三绝西域，每次都引起西域诸国忧恐与不安，人民重遭灾难，益思事汉。

自汉统一西域，丝绸之路大盛，使者相望于道，商胡僧侣不绝于途，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关系加深。汉在西域大量屯垦，中原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得以直接传入。汉武帝时，关中开凿龙首渠时发明的井渠法，很快就传入楼兰附近的白龙堆，从而使西域生产力得到提高，人口迅速增加。近年在民丰县尼雅河旁一座古遗址中，掘出一对属于当地民族男女合葬的"木乃伊"，可能系东汉时的人物。男子穿的红锦袍上织着"万事如意"、"延年益寿宜子孙"等隶书，属内地织物；女的殉葬的奁盒，系我国南方常用的籐条编成，内装一面用篆体书写的"君宜高官"铜镜，另有绸制绣花粉袋、木梳、线具等，与内地所用物品无异。这反映出当时西域社会生活已逐渐被纳入了汉族先进的轨道。

075　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王宗维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研究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了解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了解"丝绸之路"，是一个重要内容。本文引证《史记·骠骑列传》、《汉书·霍去病传》、《史记·大宛列传》、《盐铁论·西域篇》、《汉书·赵充国传》、《汉书·王莽传》等的记载，证明西域一词在西汉时泛指郡县辖区以西汉朝力所能及之地，并无严格界限。置郡以前，河西武威以西地区、湟水上游、青海湖周围地区，均曾包括在西域范围内。东汉班固撰《汉书·西域传》，才把河西地区和西域明确分开："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河西是亚州东部和中部交通的咽喉，东西南北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大都要经过这里。西域的许多民族是由河西迁去的，或者是经过河西而迁去

的。河西民族对西域的发展有过很大的贡献。本文比较详细地记述了秦汉之际原居河西的月氏人、乌孙人、塞种人、大夏人，羌人、敦薨人，居延人、单桓人、龙勒人、焉耆人、匈奴人，还有其他几种民族西迁的原因及过程。有的举族迁移，有的分批部分迁移，但都在河西地区留下影响或留下遗民。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同西域各国的来往与日俱增。宣帝时在西域设立都护，更加方便了西域各国前来长安。质子、使臣、商旅途经河西时，往往得到同族人接待。其中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回国而留居河西，参与汉朝军政，或自谋生计。因他们兼通语言，成了汉朝政府与西域各国进行联系的纽带，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后汉书·西域传》载：汉朝"立屯田于膏沃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种情况不仅在西域，河西当亦如此。河西是汉朝经营西域的通道、基地，又代表朝廷兼管西域。由于河西与西域地界相连，利害相关，所以西汉政府开发河西与经营西域同时进行。河西移民较多，设郡置县较早，生产发展比西域快。汉又以河西为基地大力经营西域，河西人民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汉与西域各国的往来日益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河西地区的生产发展也很迅速。汉朝经营西域的结果，保卫了河西地区的安全，西域各族人民为建设河西，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对两地区安全威胁最大的是漠北匈奴，它们为反抗和防止匈奴贵族的奴役，从西汉到东汉的三百年间安危与共并肩战斗，多次保证了西域战争的胜利。两汉的河西地方官员，都把保卫和建设西域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保证了丝路的畅通。

076　河西诸凉王朝与西域

——论晋末至北魏初我国西疆的行政主权　　　薛宗正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7期）

晋末至北魏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纷扰的时代，其时南北分裂，北方复又分为若干地方政权，然而西域并未从祖国的统一体中分裂出去。河西诸凉王朝除鲜卑秃发氏的南凉外，前凉、后凉、西凉、北凉都继续对西域行使主权，维持了我国对西域主权历史的连续性。前凉是汉族张氏在河西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前凉在碛西设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前者总统政事、安抚属藩；后者督理屯田、供应军食，皆驻节于高昌故垒。晋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前凉迫于形势，暂时向石勒后赵称藩，使仅至凉州的丝路贸易东通京洛。高昌、于阗、鄯善、大宛等使节也都穿越前凉，前往内地。在此之前，这些国家名义上称臣于晋，实为前凉领藩。前凉的全盛时代，尽有陇右、碛西之地，下领凉、河、沙三州，其中沙州下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尉、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个郡级行政单位。葱岭以东除龟兹外，尽归其版图。前凉八主共七十六年，一直对西域行使主权。其间，印度音乐输入了凉州。前秦是西晋之后我国北方第一个统一政权。苻坚即位后，进军河西灭前凉，遂遣使西域各国，并与车师前部、鄯善建立宗藩关系。前秦的西部领疆承自魏、晋、前凉，仍以高昌垒为据点。公元382年苻坚委任骁骑将军吕光为统帅，出师西域，讨伐龟兹、焉耆等国。公元385年，吕光奏捷东归。同年，前秦败亡。吕光在归途中夺据姑臧，控制了河西全境，建立了后凉政权。后凉政权实为前秦政权的继

续，西域与河西的局部统一更加巩固，龟兹、于阗等岭东城郭诸国尽数纳入吕凉版图。文化交流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多彩。后凉除在西域高昌继续设郡外，又创设西域大都护，以王子亲自出镇，这是西域行政建制史上的一大创新。公元403年，存在十八年的后凉政权在动乱中灭亡。其后，汉族李氏西凉政权、匈奴沮渠氏北凉政权同时并存，递相更替，其政治影响皆西及西域。公元400年，李暠在晋昌建立西凉政权，而高昌等西域诸国即隶属于李氏政权。公元420年，西凉最后的据点被北凉攻克，诸史以此为西凉覆灭之年。西凉残余势力败入碛外，在伊吾自成一体。北凉为匈奴沮渠蒙逊于公元396年所建，都姑臧，逐渐统一河西。鼎盛时期，其领疆远至西域，重要据点为高昌郡，非但鄯善、焉耆诸国皆为其臣属，而且也包括昆仑山下的于阗。公元439年，北魏大举西征北凉，攻克姑臧，诸史以此为北凉覆灭之年。其残部以高昌为根据地，建立政权。其后，北魏一方面遣使，一方面使用武力，控制了西域南道鄯善、焉耆一线。西凉残部归附北魏，北凉余部则为柔然所并。本文作者认为，旧史所载西凉、北凉灭亡之年皆误。此二政权全盛时代的领疆不但据有河西，而且包括碛西、其河西都城失守后，碛西仍有其残余势力，仍奉西凉、北凉正朔。故此二政权的存在年限，应以其碛西政权的结束之年为准，即公元444年，西凉结束；公元460年，北凉结束。

077　北魏与西域　　　马国荣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3期）

公元386年建立的北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即拓跋鲜卑部为统治民族的北方统一王朝．公元423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立即着手统一北方，当时西域主要在柔然势力的控制下．北魏统治者在多次进击漠北柔然故地之后，遂派人出使西域。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王恩生、许纲等首次出使西域，由于途中受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太延三年（437年），北魏先后又派出侍郎董琬、高明等六批使臣，携带大量物资再次出使西域，不仅到达了乌孙，还到达了费尔干一带的破洛那和者舌二国。当董琬和高明返回内地时，乌孙等十六个地区和国家都派遣使臣，一同东往，为北魏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亲征臣服于柔然的北凉，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门户。北凉残部入据鄯善，拓跋焘派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率凉州兵讨伐鄯善，并在这里设镇。鄯善设镇后，焉耆成为柔然控制下的与北魏在西域对垒的重要据点。太平真君九年（448年），拓跋焘命万度归以鄯善为根据地，进军焉耆，攻克后又设焉耆镇。万度归乘胜西讨龟兹，控制了天山以南。太平真君十年，在游牧于龟兹以北至伊犁河流域的悦般部配合下，北魏多路出击柔然，迫使其西迁，从而控制了天山以北。至此，北魏基本统一了西域。北魏对西域的统治，实质上是前秦以及五凉地方政权对西域统治的继续。设郡县制，文书资料表明，高昌境内设有交河、田地、南平、横截等郡，各置郡守，郡下有县如永安、安乐，夸林、龙泉等等，各县设县令和司马，分管行政和军事。高昌城内有坊，坊下有里。高昌王以下有行政、军事两大系统。设“吏、祠、库、主、客、礼、民、兵”八部分管政务，各部设长史，长史之副为司马。此外，还设将军和处理具体工作的官员。高昌的重大军政活动，必经北魏政府批准，高昌王曾在太和二十

年（496年）、永平元年（508年）、永平五年（512年）、神龟元年（518年）四次请求内迁，获同意。历届高昌王均受北魏册封，一直延续到西魏。西域其它地区的一些首领亦接受北魏的册封。西域诸国向北魏的朝贡活动，有两个高潮：太延元年（435年）至太和三年（479年）；景明三年（502年）至孝昌元年（525年）。这期间，鄯善、焉耆、车师、粟特、高车、龟兹、悦般、疏勒、渴槃陀、悉居半、破洛那、遮逸、员阔、罽宾、迷密、哌哒、于阗、石那、阿袭、高昌、悉万斤、朱居槃等几十个民族和地区向北魏朝贡。甚至柔然在延兴四年（474年）也开始向北魏遣使入贡。西域与北魏的朝贡关系，一是纯属商业贸易性质，扩大商业和文化交流；另一种则纯属政治交往，西域各地为进行某种活动或对付外来势力，派使臣请求批准并在物质与军事上给以支持等等。其中第一种是主要的。西域各地的特产，经商人之手传入内地，使北魏都城洛阳空前繁荣，促使和加深了西域各族同中原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078　魏晋时代之塔里木盆地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翦伯赞

（《历史社会季刊》1947年第1卷第2期）

塔里木盆地，自汉以来即为中西交通要道，对中西贸易和文化传播，有着走廊作用。后汉时，因国内爆发农民战争，演化为豪族火并，内乱削弱了国家元气，因而中原王朝对这里的统治遂不能维持。三国时，魏、蜀、吴火并，内战持续了半个世纪，更没能顾及恢复塔里木盆地。西晋虽然结束了三国割据局面，但因内战民穷财竭，更无力顾到这个盆地。东晋偏安江左，与塔里木盆地之关系更加隔绝。因此，自三国以至两晋二百年间，中国史上对塔里木盆地的记载，甚为模糊。作者根据史书记载，尤其是汉晋木简的记载，一方面阐明了魏晋时代塔里木诸国兼并及其生活，另一方面对此时期这个盆地诸国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较详细的考证，中国势力退出这个盆地，佛教文化及艺术从西域和印度继续流入，使这个盆地起了变化。如《佛国记》载："（于阗国）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晋书·西域传》谓龟兹城内有"佛塔千所"。据此，可知当时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已获得了广大信徒，而天竺语已成为这里的通行语了。佛塔寺院之建筑式样和佛像的雕刻等佛教艺术，已普遍存在于塔里木盆地诸国。由此可知，三世纪初至五世纪的二百年中，佛教的信仰及其文化艺术，已成为这个盆地人民主要的生活和知识源泉。佛教传入西域，再由西域传入中国本土，到南北朝以至隋唐时代，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普遍信仰，从而对我国文化艺术起了很大影响。

079　李世民与少数民族　　陈金陵

（《历史教学》1979年第8期）

盛唐时代，丝绸路上商贸繁忙，中外佛教徒和各国使节往来达到空前程度，这和唐太宗李世民重视和妥善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直接有关。唐朝初期，东有稽胡扰边；西有吐谷浑威胁；特别是突厥侵袭，直逼唐廷首都长安。同时又因皇室财力有限，曾被迫暂

时中止与西域贸易。太宗即位后，唐王朝先后平定诸乱，在西域、漠北设立了安西、燕然两个统管边疆地区行政、军事的权力机关——都护，置所有边疆民族的府州都在它的实际统辖之下。另外，又对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羁縻政策，以其部落列置州县，大者为都督府，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世袭之。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大败突厥、活捉颉利可汗后，李世民采用温彦博的建议，保持突厥原有组织形式，尊重突厥习俗，迁民于塞下，选择忠于唐廷的突厥贵族管理各部，招抚突厥人民来归，"酋帅悉以大官"，号召参加唐室工作。吐谷浑以鲜卑族为主，原为隋之一部分，隋末以来不断对唐王朝进行武装骚扰。李世民本想说服，曾遣使反复晓喻十次均未凑效，才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率军战败之。战败后仍保持吐谷浑王国，授其王以可汗称号，并妻以宗女。高昌古称车师，汉武帝时已统一于汉，汉族人民大量徙入。北魏文帝时一度称王割据。隋亡后，勾结西突厥攻击唐之伊吾，阻挠交通，西域各族人民与中原地区往来，或西域各国使者路经其域，皆被囚系，往来旅商贸物，均遭寇攘。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帅军平定之，并以其地置西州。"置立州县，一如中原"，从而结束了高昌割据一百八十年的历史。这些政策适应历史发展需要，保证了国家安定统一，消除了民族隔阂，帮助兄弟民族人民安居乐业，使得经济大为发展，国力空前强盛。因而，各国争相遣使、通商，有十国之使"其徒旅不减千人"，每国使团达百人左右，大大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值得注意的是贞观十八年（644年），李世民曾发布诏令奖励突厥人及西州地区人民内徙务农，可免两年租税负担，促使他们前往陇右、关中从事农业生产，仅突厥族"入居长安者，近万家"。民族和睦的局面，促进了各族文化交流，如文成公主入藏，先进的碾硙、造酒、纸笔等文化传入吐蕃，参天可汗道的开辟，加强了与漠北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设立国子监，使各族子弟及外国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当时约有八千人之多。长安成了中世纪世界上罕见的一大都会，文化交流达到空前规模，中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所以有如此伟大的成就，与李世民所执行的一系列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

080　唐代内地与新疆的关系　　陈全方

（《史学月刊》1982年第3期）

本文通过昭陵、乾陵的唐代石刻和新疆、陕西出土的文物资料，结合史书文献记载，阐述了1300年前内地与新疆各族人民血肉相连的兄弟关系。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位于陕西省乾县。这两座陵墓上布置着大量的巨型石刻艺术和文字碑碣，其中新疆少数民族首领的石像达数十尊。保存在昭陵的有：龟兹、于阗、焉耆、高昌等国国王和薛延陀可汗的石像；保存在乾陵的有：龟兹都督、国王、大首领和于阗、疏勒国王的石像。这些石刻艺术品，一方面是唐代统治阶级自我歌功颂德的例证，同时也体现了当时汉族人民和新疆诸少数民族要求统一、团结的共同愿望，是我国境内各兄弟民族深情厚谊的产物。文章概括阐述了自周秦以前直至唐末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焉耆、于阗、龟兹、高昌、疏勒等国和唐末自漠北迁入新疆的回鹘族与中原王朝特别是唐朝的关系，列举了在相互交往中的著名

人物、重大史实和典型事例。并着重指出：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内地与新疆关系的发展。汉武帝时，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打败匈奴，统一了新疆。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是新疆地区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标志。到唐朝时期，新疆与内地统一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疆的政治、军事、赋税、土地制度等，基本都与内地趋于一致。唐末，回鹘人大批迁入新疆，和本地原来的民族融合，进而形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即维吾尔族，并较详地论述了回鹘与唐朝的关系。从整个论述中，可以看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同汉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新疆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友谊是经过长期历史考验的，是牢不可破的。本文所述各国均居古代丝绸之路要冲，与中原交往密切，故对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亦多有参考价值。

081　岑参边塞诗和唐代的中西交往　　　柴剑虹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1期）

本文具体分析说明了岑参边塞诗作为研究唐代中西交往资料的价值。首先是关于西域历史地名的考释。“瀚海”作为地名，首见于司马迁《史记》，此后两千年来，以各种不同的含义出现在史籍和文学作品中。对它的注释众说纷纭。作者根据岑参《白雪歌》、《天山雪歌》等提供的线索，从保留有突厥语汇的维吾尔口语中得出结论：“瀚海”乃“杭海”之音变，是两千年前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突厥民族对高山峻岭中险隘深谷的称谓。后人望文生义，将它释作“北方海名”，甚至以讹传讹，遂变成北方戈壁沙漠的统称。岑参在本诗中使用了本来意义“瀚海”，使得这一重要地名不致湮没。“轮台”一名亦起于汉代，汉之轮台，在今轮台县东南数十里处。有人以为唐之轮台亦在此处。作者根据岑诗的描述，参照有关历史资料和民间传闻，认为唐之轮台，应在今米泉县境内破城子遗址处，位于伊州、庭州、碎叶的交通要道上。至于岑诗中的“阴山”，作者认为并非今内蒙河套地区的阴山山脉，而是天山北支博克达山脉，甚至到了元代，一些有关西域的诗文，仍称天山北麓山为阴山。此外，从岑参的边塞诗中亦可考知天山山脉其它一些支脉的古称。其次，关于唐代西域交通。从敦煌西进安西、北庭的路线，一般认为有三条，即南、中、北三道，而在玄奘西行时，经楼兰的中道就被认为已废弃。作者具体分析了岑诗，认为天宝八年岑参第一次出使时，是采用南北道结合的办法西进的。而天宝九年冬，岑参东归则走的是经莫贺延沙碛的中道，可见，唐天宝年间，丝路中道并未废弃。此外，亦可通过岑诗研究当时新疆境内的许多交通路线。最后，关于民族文化交流，作者具体分析了岑诗在研究西域乐舞交流上的价值。认为岑诗生动介绍了胡人长于乐器歌舞的特性，打破了文化交流上的民族偏见，赞美“汉胡合奏”。特别是《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作者认为此诗着力描绘了唐代著名的“胡旋”舞，并对其从西域传入内地作了高度评价。此外，岑参的边塞诗还反映了各民族在语言、文字上的学习、交流，创造性地表现了少数民族传闻及不同的民族文化色彩，为我们研究唐代中西经济、文化、交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材料。

082 释桃花石（Taugas） 岑仲勉

（《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21号）

中世纪时，中亚及东欧一带称中国为"桃花石"，其意义何在，始终得不到正确的解释。但中外学者，对此名作解释的约有六、七种之多，有谓"桃花石"为"大魏"（De Guignes)之对译；有谓为"唐家"之对译；有谓契丹"大贺氏"之转译；有谓"拓拔"之对音；有谓Taugas为大食语之"回纥"及西辽史之Tamidj（谓即回纥地）；梁园东先生谓"桃花石"最初之意，系指中国的天子，及后西北诸番上唐太宗号为"天可汗"，即"桃花石"与"可汗"之合称，遂流行于西北一带而保存了下来，竟以"桃花石汗"为中国皇帝之固有称号（见梁园东著《"桃花石"为"天子"，"桃花石可汗"为"天可汗"说》，原载《边疆公论》第3卷第4期）。本文作者在对各家之说进行了考证后持否定态度，认为"桃花石"为城名，此城非一般之城。作者根据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认为Taugas为敦煌之对音。因为自汉武开四郡后，敦煌实握有中西交通门户之锁钥者，至少达六百多年。特别在古代，敦煌是"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其地不仅是中西交通之咽喉，且为国际商业之集散地，历史如此悠久，地位如此重要，故外人将初到疆境之称呼，渐渐变为国号，也是可能之事。作者还将大月氏、覩货罗、桃花石名称字母进行排比研究，认为此语经数百年，几经转译，有所异变，初输入西方之Tokhari为种族之称，再度输入之Thogara为郡县称，三度输入之Taugas则由郡县而变为国号。同时作者还根据中国历史之发展，推测以Taugas之称谓我国，应在五胡乱华之后。因为当时南北隔绝，西方商贾及货物不能远达中原，敦煌则成为国际商业都会，故将其郡名，逐渐演变为国号。本文论点虽非定论，但作者通过对Taugas一词之研究，对敦煌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深入考证。通过本文既可看到中西方间的政治关系，还可了解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繁荣和重要性。

083 桃花石和回纥国 章巽

（《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

回纥国(即喀喇汗王朝)是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汗国。它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与唐朝关系较为密切。本文探讨了桃花石一名的沿革及为何把它与中国和中国人以及西迁后的喀喇汗王朝联系起来的历史原因。

桃花石一名，始见于《长春真人西游记》。《游记》解释说："桃花石谓汉人也。"近代学者们发现，自从公元第六世纪末期以降，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个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称呼，都和桃花石一名相近似。作者列举了这些文献中对中国和中国人称谓原文的拉丁字母转写，认为其与桃花石一名同出一源，是很明显的，只不过在不同时代，音读稍有一点非本质的轻微相差而已。但这些同出一源的名称，其最早起源，长期以来，学者间意见不一。或以为是"大魏"（Ta-göei，指北魏）的转讹；或以为是由"唐家"（Tang-Kia指唐代）转讹而来；或以为是"拓跋"（Tak-dat或Tak-pat，北魏皇族的姓）音变而来。其他各说或废弃，或难于成立，唯"拓

跋”说则风行一时。然而作者认为，其起源乃来自“大汗”，而非来自“拓拔”。汗是可汗的缩称。古代我国北部有一些兄弟民族称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为可汗，其起源很早。如北魏的拓拔氏的先祖早已有可汗称号。后来的柔然、突厥、回纥诸族的君主，也都沿用可汗这个称号。因他们经常和南方的中原皇朝相接触，就把中原的皇帝也称为可汗或汗。又见中原皇朝之大，乃以大汗称之。所以大汗一名，应该就是桃花石等同出一源的名称的由来，且渐渐更推广到用来作为中国和中国人的称呼了。作者把拓拔两字和大汗两字的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拟测注音作了比较，认为桃花石等等同出一源诸名称，最先当由大汗一名而来。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编的《突厥语大词典》，对桃花石一词的解释共有五条，其中第三条说：这个词用来作诸汗的称号，“桃花石汗”，意思就是“古国和大汗”。

回纥这个兄弟民族，对唐、宋朝廷都保持甥舅之称，西迁后所建的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于喇喀汗（最高的汗），阿尔斯兰汗（狮子汗）等尊称外，还要加上桃花石汗的徽号，于不忘故国之中，兼具大汗的荣名。喀喇汗王朝一名中的喀喇汗三字，是从这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常用的尊号音译而来，近代国外一般的历史著作，也都以此来称呼这个王朝。但目前我国的出版物，对这个王朝有的称哈喇汗朝，有的称哈拉汗朝，有的称喀喇汗王朝等等。至于这个王朝在今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部和中亚境内所建国家的国号，范文澜称之为喀拉汗国。所以如此相称，大概是以其王朝之名来作国号。其实在历史文献中，对这个国家是记载着国号的。作者例举《辽史》的记载，金人的记述，元朝和明朝初年的有关记载予以佐证。喀喇汗王朝所创立的国家，是由若干不同的部族联合、混合而建成的。但从回纥国这个国号，可见组成这个国家的核心是回纥人。

喀喇汗王朝这个译名，用字既不统一，而且也只是王朝名，并非国号。所以我们应该用我国历史记载上原有的国号来称呼它。作者认为，回纥西迁后所建的国家，应如辽、金、元史籍之所载，亦应称为“回纥国”，把它的年代定为840—1212年。为区别起见，不妨把647—846年建于北方的称为北回纥国，把840—1212年建于西方的称为西回纥国。

084 唐代天可汗考 罗一之

（《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16期）

关于天可汗称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岑仲勉《释桃花石》一文，颇具新意。本文则就天可汗一词来源、演变及其影响，进行了论述，其观点多为我国学者采纳。天可汗称号起于唐太宗平定东突厥之后，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均有记载。按此尊号是以太宗平突厥颉利可汗而起，是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20年）四月间事。又《唐会要》及《册府元龟》均记有开元时曹国、石国及吐火罗上表唐天可汗，请讨伐大食事，可知太宗死后百年之久，西北各国仍尊称唐帝为天可汗。但据两《唐书》记载，西北各国又有单独尊称太宗为可汗，而不称天可汗者，此种尊称显系有别。据作者考证，称太宗为可汗者，因其地为中国的一部，并由中央王朝置吏设治者；称天可汗者，则为国际联合之首领，即以其国首领为都督，而不再别置吏者。唯天可汗之功能历久不替，起因始于东突厥之平定，故天可汗称号最为突厥民族与西域各国所引称，且辗转传到罗马，致欧洲

史地学者亦以此称号名中国皇帝。据突厥阙特勤碑，突厥对中国皇帝有Tabgacqaganqa之称。突厥语称天或掌天之官为Tengui，或Tangri，或Tagni，或Tangara，因发音上转变，Tabgac遂为天官或司天之意，Qaganqa，与可汗相似，若Tabgac与Qaganqa连为一词，则为中文天可汗之意。唐时西域各国又以突厥声威最著，其语词传入西方后，以是西方各国亦遂以天可汗为中国皇帝之尊称。七世纪初东罗马著作家提奥费赖塔东记述中亚突厥人事迹时，记东方一大国国王Tangas称Tatssan，意即上帝之子，其国境内有大江，分其国为两部，一部穿黑衣长袍，一部穿红色衣服，嗣后黑衣国家统一了全国等事。所谓Tangas，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之桃花石，即天子国之意，此即突厥语Tabgac演变之译名。十三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亚巴尔费陀地理书中有"扬州为中国天子所居，其称号为TamghejKhan"，此即为桃花石的对音，亦即突厥语Tabgac Qaganqa之对音。又波斯史诗《沙那美》中，亦有帖木儿住Sihun地方，中国皇帝Tanghuz Khan遣使到来的记载。所谓Tanghuz Khan，与桃花石同意，亦即天可汗一词的沿称。由此可知天可汗一词沿用之久及影响之巨大。故弄清天可汗一词来源与演变，对研治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关系、政治关系，均有其重要意义。

085 突厥以后蒙古以前——过渡时期的中亚诸汗国

——《草原帝国史》（1979）之一章

〔美〕 路克·关顿著　　赵　结译

（《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本文论述了公元八世纪突厥汗国灭亡后到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统一中亚前五百年间，中亚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斗争、融合、变迁、兴衰的史实。在这一时期，在中亚兴起的主要国家，有回鹘诸王国、哈拉汗王国、塞尔柱帝国和花拉子模国。公元744年，回鹘骨力裴罗消灭了突厥汗国，创建了鄂尔浑国，统治中央草原的东部和南部达一世纪之久，其领土从阿尔泰山一直延伸到贝加尔湖，公元840年才被吉尔吉斯人所灭亡。这期间，回鹘人曾与吐蕃帝国争夺塔里木盆地丝绸之路的贸易垄断权。回鹘并向粟特人学习粟特文字、农业技术、楼房建筑与壁画艺术，通过粟特人信奉了伊朗的摩尼教。鄂尔浑国灭亡后，回鹘人四散奔逃。至九世纪中叶，又兴起了三个主要的回鹘王国，即甘州回鹘，沙州回鹘和高昌回鹘。它们分别位于今张掖、敦煌和吐鲁番一带。还有许多王国分布在今新疆省及其以西。与此同时，吐蕃帝国崩溃。九世纪时，葛逻禄人在费尔干纳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分为东西两个汗国。公元875年，第一个伊朗系的伊斯兰国家——萨曼王朝兴起，抵制了突厥部落向西进入波斯和阿富汗。十一世纪中叶，萨曼王朝的突厥军事长官阿布·曼苏儿·赛布克的斤，在阿富汗建立了伽色尼王朝。葛逻禄人创建了哈拉汗王国，并消灭了萨曼王朝，与伽色尼王朝以阿姆河为界分国而治。公元十一世纪，一支游弋在西部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塞尔柱人兴起，建立了塞尔柱帝国，侵入伽色尼王朝的呼罗珊地区，并在丹丹纳干附近发起一场大战，击溃了伽色尼军队，统一了波斯全境。塞尔柱的孙子托克西尔当了帝国的第一任苏丹，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一支阿尔泰语

族——哈拉契丹离开北中国，经长期跋涉，越过草原，在锡尔河盆地建立了新的国家，并打败了塞尔柱人。其后哈拉契丹又与花剌子模发生龃龉，花剌子模趁蒙古乃蛮部落侵入哈拉契丹之机，吞并了哈拉契丹，建立了花拉子模汗国。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摧毁了花剌子模汗国，掌握了直达伊朗语系国家的大道。本文对以上各民族之间的斗争，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和影响，以及各个汗国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论述较详。对各国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与中原王朝的交往、贸易等方面，也有较具体的论述。是一篇研究丝绸之路和中亚历史的重要资料。

086　明朝的西域关系　　　赵俪生

（《东岳论丛》1980年第1期）

本文作者认为，明初洪武、永乐时的西域政策，与汉武帝、武则天的相似，是积极的。这时中原正值元末大乱之后，生产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混乱，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政策，在大西南试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对蒙古则以防备其贵族割据力量的侵扰为重点。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冯胜下河西，在肃州（今酒泉）以西70里的汉朝遮虏障之地、嘉峪山之麓，初筑土城220丈。关内肃州设“镇”为西北大军之所在；关外设“关西七卫”其中四个设在今敦煌西南青海柴达木盆地一带。这些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进行着严格的茶马交易。另一卫所设在哈密。明朝以此地为出发点，对西域诸国广事招徕，历时六十年之久。永乐时，通西域的使臣往来频繁，有一叫陈诚的人历经十七国，写有《西域蕃国志》一书，所记重要邦国有别失八里、撒马儿罕和哈烈。别什八里位于天山以北济木萨一带，是蒙古察合台后王们的主力所在。明初因受帖木儿汗国的威逼，故与明朝友好，历四世汗王均向明朝进贡。到歪思汗篡弑以后，将主帐移到亦力把里（今新疆霍城一带）。在正统年间，当也先不花汗王在位时，亦力把里跟中原仍有往来。撒马儿罕即著名的帖木儿汗国。帖木儿在明太祖即位的次年登上王位。在近四十年里他东征西讨，接连得胜。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开始与明朝通好，洪武二十七年向朱元璋进表称颂。但他却拘留朱元璋的特使傅安达十三年之久，并在永乐元年（公元1404年）发动对明朝的征伐，因帖木儿于次年死去而中止。哈烈是帖木儿汗国的一个分部，位于今阿富汗赫拉特之地。其东北的八剌黑（即巴里黑）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贸易中心。此国与明朝亦甚友好。文章列举史实，说明明朝与西域诸国建立友好关系，使明帝国成为这些国家的宗主国，明朝给一些国家封官施爵，授予冠带，并调解一些国家之间的纠纷。在这种友好相处和往来中，汉人和西域人民之间也日益接近和融洽。迄明仁宗洪熙朝（公元1425年），改变以前通西域、下南洋的积极政策，召来西北边境上无休止的纷扰。弘治七年至八年(公元1494——1495年)，明朝和吐鲁番的割据者打了一场拉锯战，深感嘉峪天地位之重要。兵备道李端澄才于此构筑大堡，以后又陆续修墙壕，筑墩台，成为边防要塞。由于吐鲁番割据者的侵扰，哈密部众先后退居苦峪（今安西）、肃州、至正德末、嘉靖初（十六世纪上半）哈密东南的安定、曲先、赤斤、罕东诸卫都雕零殆尽，其残余部众也纷纷迁至关内的肃州和甘州。这才是明朝西北边境以嘉峪关为界的时代，也是明朝对西域无可作为的时代。

087　明代蒙古与西域关系述略　　　　白翠琴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宋代中西海运交通日繁，原盛于汉、唐时期的陆路交通日渐式微。从此中、西丝绸贸易线以海上运输为主，但中西陆路交通并未关闭。直至蒙古族征服中、西亚各地，建立元朝一统后，封分诸汗王国，遍设驿道，交通称便，原来繁盛一时的中西陆路丝路贸易线又有所恢复。后因中西亚诸汗王国相互并吞，彼此争权、致使战乱不已。但丝路之上的商业贸易并未终断。明王朝统一后蒙古势力远徙漠北和西域各地。随着蒙古势力的衰微基本上分为互不统属的三大部，即鞑靼（又称漠北蒙古）、瓦剌（又称西蒙古）及兀良哈诸卫。明朝为了防止蒙古势力的南侵，于西北沿边地带设立九边重镇。洪武以来，嘉峪关先后设置八卫，其中哈密卫对加强与西域的联系，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哈密是西域诸族与明廷通贡之要道，又是瓦剌与西域诸族、中原地区的贸易中继站。因此，哈密遂成东西蒙古诸部与明王朝争夺的要地，无论是瓦剌、鞑靼及察哈台宗王后裔，甚至明廷，都想将其控制在手中，以扼中西交通要道。本文首先对瓦剌历代诸王与哈密的关系，既利用联婚和军事征伐手段，控制哈密上层；又利用回回善于经商的特点，经常与其一起朝贡和经商，他们的足迹西至撒马尔罕，东至甘凉和京师一带。对此，本文依据《明史》、《皇舆考》、《四夷广记》等资料，详为考述。

其次，瓦剌与别失八里为邻。别失八里即十四世纪中叶察哈台汗国分裂后，居住在其东部的蒙古人所管辖之地区，亦即《拉什德史》所指的蒙兀儿斯坦。其地域范围，南至焉耆以西整个南疆直至费尔干纳盆地，北面从额尔齐斯河、额敏河到天山，再西到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瓦剌为了向西发展，为了争夺东西贸易通道，必然受别失八里阻隔，早在十四世纪末，就发生过瓦剌进攻蒙兀儿的事件。以后争城夺地事件屡有发生，其目的都是为了扩大领地，争夺东西贸易线。

再次，文中对瓦剌与撒马尔罕、哈萨克、乞儿吉思的关系，也进了较详细的研究。特别是瓦剌对撒马尔罕贡使的劫掠，瓦剌与哈萨克为争夺塔什干贸易城市，以及相互间为扩大领地的斗争，都作了研究记述。

总之，明代丝路交通虽以海上为主，西域及中亚又处在蒙古诸汗王后裔分割占领之下，但中原地区与西域诸族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蒙古瓦剌与西域诸族贸易关系极为密切，并以哈密为中心，构成了当时东西贸易的枢纽。瓦剌通过哈密西抵撒马尔罕，东至中原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瓦剌贡使和回回商人经常成群结伙，一起朝贡和进行贸易。由此证明，中西丝绸之路在明代仍然畅通，这对丝绸之路兴衰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088　明初帖木耳帝国和中国的关系　　　　陈生玺

（《史学月刊》1957年第7期）

本文针对向达、尚钺两先生对郑和下西洋的看法，探讨了明初帖木儿帝国和中国的关系。向达先生在分析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时认为，帖木儿在1404年底率兵东侵，与

郑和于1405年首次下西洋,几出于同时,进而便推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从海上抄袭帖木儿的后路,牵制其兵力,达到以夺为守的防御目的。尚钺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纲要》一书中进一步认为,郑和下西洋还有联络印度,共同对付帖木儿的意图。本文对此提出质疑,首先论述了帖木儿与明朝的关系。当帖木儿崛起于中亚之际,正是明朝推翻蒙元统治、统一中国之时。洪武二十年(1387年)四月,帖木儿首次遣使向明朝贡。至1394年,帖木儿对明朝的态度极为谦卑恭顺,以藩属自称。这是因为明朝国势强盛,帖木儿忙于西征,故暂时称臣,作为权宜之计,以解除后顾之忧。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朝派使臣傅安、郭骥等率官军一千五百人,往当时帖木儿的都城撒马尔罕回报。此时帖木儿西征已获大胜,不仅独霸中亚,而且震惊东欧,对中国的态度突然变化,并扣留了傅安等人,断绝了与明朝的往来。至永乐二年冬(1404年),帖木儿便率军四十余万向东进发,行至乌浒河之际,帖木儿发病死亡。从此帝国内部为争夺皇位而内讧,据有哈烈的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乘机攻占撒马尔罕,统治了帝国全部。到永乐五年(1407年)沙哈鲁将傅安送回,复向明朝贡,双方才建立了友好与通商关系。事实说明,帖木儿帝国自1387年通好中国以后,除在1394到1407年傅安被扣期间双方交通阻塞,形势处于对立而外,基本上维持着和平友好关系。因此,认为帖木儿东侵引起郑和七次下西洋之说,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作者还进一步从时间、地理和文献记载等方面,论证了郑和下西洋与帖木儿的东侵无关,并从郑和下西洋的实际行动,说明这是一种武装通贡,其性质是以互市性的官方贸易作为内容,以宣耀武力作为工具招诱入贡明朝,以达到对外扩张的政治目的。

089 明代瓦剌与西域 马曼丽

(《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

瓦剌原是我国古代的北方游牧部落。十三世纪初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之萨彦岭与唐努山之间,到明代,它经常出现于西域,并对丝绸之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本文根据有关史籍的记载,探讨了明代瓦剌与西域关系的几个问题。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一、瓦剌势力始入西域;二、脱欢、也先时期瓦剌对西域近邻的政策;三、也先死后,瓦剌活动重心移向西域及其与中亚的关系。据作者考证,早在元代阿里不哥反叛忽必烈王室时期,阿里不哥的军队里就有瓦剌的部队。公元1262至1263年由于忽必烈的驱赶和禁运粮食,阿里不哥率众由漠北转向西域,并和察合台后裔阿鲁忽交战,占领了伊犁盆地。后又遭到阿鲁忽的进攻而战败,众叛亲离,军队溃散在天山一带。军队里的瓦剌人也散留在西域地区,与西域发生关系。到了明代,在公元十五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瓦剌领主乌格齐哈什哈与东蒙古彻底分裂,并杀死东蒙古大汗额勒伯克,将政治中心移向杭爱山以西。瓦剌的领地也由叶尼塞河上游萨彦岭与唐力山之间伸展到了西域沿边一带,与别失八里、哈密等接邻,并相互发生战争。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明朝准瓦剌之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1426年,脱欢吞并贤义、安乐二王领地,统一了瓦剌,控制北部的乞儿吉思,成为东西蒙古的实际大汗。脱欢死后,他的儿子也先主宰东西蒙古。他为实现“大元一统天下”,在东部、中部、西部三方面同时向南展开了全面攻势。在东部瓦剌势力直逼女真与朝鲜。在中部,夺取西域的要冲哈密地区;用通婚、利诱等和平方

式，使哈密从属于自已；并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手段，控制了沙州、罕东、赤斤等三卫，把从哈密到嘉峪关一带的交通要道夺取到手中，并利用丝绸之路和东边大同一带贡道，分头向明朝频繁入贡，进行市马和其他私市，往往一年数次，动辄两三千人，规模是很可观的。在西边，脱欢时期瓦剌的势力已经伸进西域的亦力把里，脱欢，也先还屡次打败亦力把里汗。相互的武装冲突连绵不断，但始终未能使亦力把里屈服。瓦剌的势力只扩展到伊犁河地区。也先死后，瓦剌与西域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外学者对此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瓦剌已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得无影无踪；另一种认为瓦剌在争夺丝绸之路中遭到失败，成为活跃在西部和北部东土耳其斯坦、希布察克草原和中亚草原的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对该地区的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本文作者对这两种看法都不尽同意，认为也先死后，瓦剌远未退出历史舞台，其活动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直到十六世纪末。但由于中央集权土崩瓦解，瓦剌对外政策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历史作用也逐渐减少，并列举大量史实论证了这一观点，说明瓦剌处在日益强大而又与之矛盾尖锐的哈萨克、吐鲁番以及东蒙古的三面包围之中，三条贸易通道均被封锁。瓦剌在尝尽分裂与衰弱之苦以后，仍顽强挣扎，追求统一，并逐渐形成松散的四卫拉特联盟。明末清初，他们终于在我国西北边疆建立起强大的卫拉特民族政权，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090　1759—1820年清与浩罕的关系　　　潘志平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浩罕（清文献又写作霍罕或敖罕）是十八至十九世纪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的乌兹别克封建政权。1759—1820年的六十多年中，浩罕为清西北边外一个附属国。本文探讨了浩罕归附清王朝的历史背景；与清的藩属——宗主关系建立的过程、性质和地位；当时清在中亚的政策以及浩罕在什么历史条件下离异而去等问题。1759年以前，浩罕之领主属于乌兹别克明格部，当时，浩罕名义上属布哈拉汗国，而一度又受制于准葛尔。及至十八世纪中叶，布哈拉汗国亡于波斯，浩罕额尔德尼才完全摆脱布哈拉而把安集延，纳木干、玛尔噶朗联系在自已的政权之下。1755—1759年间，清朝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后统一了新疆，浩罕就成了清的附属国。据《清实录》记载，从1759至1810年浩罕三代伯克曾九次派使节朝见清帝。但在相当时期里，它既受制于清驻边大臣节制，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清对浩罕的政策是“恩威并用，内外有别，不得称汗，准商减税”。清政府政治上的和平睦邻和经济上的准商减税”。政策，给中亚东部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安定和平，经济繁荣。浩罕之逐渐离异而去，是与清统治之衰退和浩罕在中亚之崛起相关。清王朝历康、雍、乾达于鼎盛，而后则日趋衰落，其在新疆的统治也日益陷入深刻危机；而另方面却是浩罕之崛起。浩罕扩张始于爱里木，他自称为汗，1809年夺取塔什干。塔什干是费尔干纳盆地连接哈萨克、俄罗斯、希瓦、布哈拉贸易的交通枢纽。爱玛尔（1810—1822）继位后，于1814年攻克土尔克斯坦城，1815年在锡尔河下游筑阿克一美切克堡。浩罕亦向东扩张，占领鄂什。浩罕诸城一字排列在传统的“丝绸之路”贸易线上，垄断了过境贸易和中转贸易。其使节也频繁出入于喀什噶尔，大做生

意。对清廷的限制和斥责不予理会。1820年，浩罕唆使和支持下的张格尔入侵喀什噶尔，遂结束了自1759年以来的依附关系。

091 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朱杰勤

（《学术研究》 1982年第4期）

本文作者认为：中外关系的建立，一定先从人民相互接触开始，两国官方的交聘一定在民间往来之后，等到历史把这件事纪录下来，又在数十年之后了。如张骞出使西域大约在公元前133年，而迟到公元前98年，司马迁的《史记》才把这件事纪载下来。所以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应该以人民为主体。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关于后人称为“丝绸之路”的通行时间，《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说：“第一个丝绸商队从中国到伊朗的时期是公元前106年。”而作者认为中国丝绸运经伊朗的时间还会更早些，即张骞通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有人认为汉初匈奴兵犯不止，阻塞了通西域的道路，直至汉武帝发兵大败匈奴，才畅通无阻。其实即使匈奴支配着丝绸之路，丝绸贸易仍然进行。不过国与国的关系有时紧张和恶化，就会发生障碍或暂时中断的事。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也早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已经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利于水上交通，西北边地则适宜陆路运输。由于水陆交通的发达，中国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已经同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贸易关系，并由此推动我国学者对外国的研究。我国学者对中外关系史作有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从汉代开端。如司马迁的《大宛传》，班固的《汉书·安息传》等。中国国号远播到西方还是在于汉代。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十六世纪前，我国文化在世界史上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而且对世界发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国人民在对外关系上一贯以“仁义”为宗旨，在文化交流中，毫无保留地把自已的文化成果贡献给全世界。在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中国也不断从外国吸收有益的东西，加以改造来符合自己的需要。中国和外国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交流，对各自的国家都发生一定的影响，从而丰富了双方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华的活动，是中西文化一场大接触。由于传教士要在中国引入和传播基督教，宣传科学就成为必要途经，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知道欧洲科学的存的，扩大了中国学者的科学视野，使中国学者对欧洲近代科学发生兴趣。耶稣会士也把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文物制度介绍到欧洲，西方一些著名学者都在哲学上、文艺上和经济思想上不同程度地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时和平相处，有时爆发战争。因而我们研究对外关系史，应该包括和平与战争两方面的关系。但和平关系比战争关系要长得多。

092 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 周谷城

（《世界历史》 1979年第1期）

本文中所说的古代，指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年七世纪一千多年的时间。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西亚地区发生过震憾世界历史的重大问题，如古波斯帝国的创建，亚历山大帝国之扩张，安息帝国的兴起，以及萨珊王朝的衰落。所谓西亚，系指中国边境以西，直到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大片土地，包括小亚细亚半岛，阿拉伯半岛、阿姆河及锡尔河流域的很大

地方，以及印度河流域，直达印度洋岸，这一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东方如中国和印度等国贸易和文化向西发展，西方如希腊、罗马等国贸易和文化向东发展，都必须经过西亚，由此可知西亚地区在世界历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分作四个部分对西亚地区的民族斗争、奴隶主及封建帝国的兴衰更迭，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作了较全面地论述。一、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波斯人民不堪米地亚人的统治，在居鲁士的领导下，推翻米地亚人的统治，创立了波斯帝国。其国之大包括了今日的中亚南部，阿拉伯半岛，欧洲东部及非洲的尼罗河下游。居鲁士死后，大流士继起，并于公元前512年率大军远征欧洲，挑起了波希战争，最后占据了希腊本土。波斯与希腊的战争，促进了东方文化向西传播。二、公元前360年时，马其顿人菲利普（Philip）领军南下，攻占希腊，至公元前338年统一了希腊全境。他死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奴隶主帝国。帝国版图包括南欧、北非、西亚、印度河东岸，东边靠近了中国。继亚历山大而起的则是塞流古，他对希腊文化的东传起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对佛教艺术的影响至巨，促成了希腊化的佛教艺术。希腊化的佛教艺术是希腊化与佛教化的混合体，称为犍陀罗艺术，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犍陀罗艺术也随之传入。中国艺术中的希腊色彩，是从犍陀罗艺术来的，即从印度境内希腊化的佛教艺术来的。三、大夏和安息的兴起。大夏（即巴克特里亚），在中国边境西部之西，居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为古代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区。其地土地肥沃，宜于生产，巴克特里亚人是波斯人的一支，公元前256年，曾脱离塞流古的统治而独立。他们在贸易方面，远与希腊有间接关系，近与中国和印度有直接往来，它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心。它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在《汉书·西域传·张骞传》里多有记载。公元前139年左右，大夏因月氏和安息的夹击，终于灭亡。安息在大夏之西，也是古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区，并曾受亚历山大及塞流古的统治。公元前250年脱离塞流古帝国，成立了一个版图占整个西亚的安息帝国，在当时与中国和罗马并称世界三大帝国之一。它与罗马偏重于军事，而与中国，则以贸易关系最为突出，我国的《汉书》对此多有记载。四、安息帝国的衰落与萨珊王朝的建立。安息帝国主要民族为帕提亚人，但还包括外来的黄种人，如斯克泰人等。由于波斯人不堪斯克泰等民族的歧视，在古波斯后裔阿尔戴西尔的领导下，推翻了安息的统治，建立了以他祖先为名的萨珊王朝。萨珊波斯在公元226到641年的时代，正处在东有中国，西有罗马世界的大文明的正中，控制着东西方贸易的往来。中国的丝织物运销罗马，必须经过西亚的波斯，但波斯对丝绸贸易控制极严。为了争夺丝绸贸易和控制丝绸贸易路线，与罗马多次发生战争，直至六世纪中叶，中国育蚕方法经波斯人之手传入罗马后，萨珊波斯控制蚕丝西运的局面才得以打破。但在萨珊波斯时代，对东西方在贸易、文化、艺术、哲学、特别是宗教等方面，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对古代西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论述，是研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篇重要材料。

093　公元第十到第十五世纪中国同中亚的关系　　王治来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 1981年第2期）

丝绸之路的开拓，对古代东西方人民经济文化交流，对加强东西方人民友谊和理

解，对创造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故丝绸之路堪称文明之路，世界之路。关于丝绸之路的历史、贸易及中西民族关系等问题，我国史籍颇多记载，诸家研究考证亦多。本文主要对我国唐朝兵败怛罗斯及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势力退出西域，并走向衰落后，有关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及中、西亚地区的民族关系，进行考证研究。

公元十至十五世纪，西域及中亚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域地区相继由吐蕃、回鹘、葛逻禄、突厥诸民族割据，中亚则落入阿拉伯哈里发所派之地方总督管辖之下。这时期和中亚地区发生关系较多的、则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少数民族都自称是“唐家子”或“唐家子汗”（意即中国人或中国皇帝），而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学者，也是这样的看待他们。因此，中国少数民族同中亚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部分。本文重点研究了这一时期葛逻禄、回纥、西辽统治中亚和西域时，与西方各国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成吉斯汗征服中亚及至元朝统一后，中西交通复又畅通，丝路之上又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直至明朝建立，商旅使节仍不绝于途。十五世纪下半期，中亚烟云遍地，战乱不息，我国西部，瓦剌始强，不时抢劫来往商旅，兼之吐鲁番与明王朝争夺哈密，侵犯肃州，战乱不已。千百年来东西方人民用血汗浇铸而成的丝绸之路，到此时，东西方商旅则视为畏途，一切商业贸易和来华使节，全部改向海路，陆上交通从此为之隔绝。

094　十五世纪初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关系　　郑鹤声

（《山东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文本引用大量史籍文献资料，论述了明朝初期中国与亚非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关系。亚非两洲的土地和人民，都占全世界半数以上。号称世界文明策源地的就有中国，印度，阿拉伯，埃及等国家。各国均建立了自己所需要的政治制度，发展了自己所适应的经济和文化。中国和亚非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文章认为，在政治上，中国对四邻国家的态度，一向主张“和平”与“自卫”相结合的方针。明初统治阶级对四邻国家尤其对海外国家，也屡次表示了“和平共处”的态度。朱元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对外政策，西北边境，因有元朝的残余势力为其劲敌，故主张“谨防”；对东南海上国家，是其友邦，所以主张“不征”，并举出十五个“不征”的海洋国家。文章略述了明初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政治上的关系，计有国际纠纷的调解，旧港宣慰使司的建置，敕封番王和敕封番国名山大州典礼的举行等。如对安南与古城国、爪哇与三佛齐、暹罗与古城、苏门答腊、满剌加诸国之间国际纠纷的调解；旧港宣慰使司与朝鲜、日本、满剌加、安南、暹罗、琉球等国家的商业往来关系；以及明皇帝对占城、三佛齐、锡兰山等国国王的敕封，对安南、高丽、占城、古里、爪哇、满剌加、渤泥等国家派使臣祭祀其山川并勒石纪事等。在经济上文章追溯了自第七世纪中叶至元代，中国在印度洋上贸易主权的演变情况，指出元代承袭唐、宋的市舶制度，并对海外贸易都由国家经营；进行贸易的船舶，都由国家集中管理。偶许私商贸易，也必照例抽税。明朝继承元代遗规，对亚非国家的贸易，亦采取国营方针，并扩大了规模。朱棣为了扩大与亚非国家的贸易，组织了以郑和为首的庞大的和平使团，率巨

舰百艘，七次下西洋，往返历时近三十年，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在经济上的联系。相互贸易的形式为：亚非国家对中国的朝贡和海外贸易互市。据文献记载，有贡物可考的有二十八个国家，朝贡商品共496种。在海外贸易方面，除派遣郑和使团和其他使团向亚非国家直接进行外，还准许亚非国家的使节在中国首都与地方分别进行。在文化上，由于中国文化是一个比较长期存在而没有中断的文化，对四邻国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有一定的影响。亚非国家也有其高度的文化遗产，如阿拉伯的科学，印度的哲学，以及其他国家的艺术，都为中国人民所喜好，并吸收其精华，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佛教与回教的传入，对中国学术思想和生活习惯影响甚大，故中国与亚非国家的文化，互相交流，成为丰富多彩的文化。明初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文化上的关系，主要有：历法冠服科举制度的颁给、图书乐器度量衡的赠予、风俗宗教的崇扬、建筑绘画雕刻的流传和奇异植物的采集移植等。文章对各项活动均列举史实资料，详加论述。本文篇幅较长，引证历史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对明初中国与亚非国家特别是东南海洋国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关系，论述得具体而周详，对丝绸之路的研究颇多参考价值。

095　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　　　　马　雍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

张骞通西域后，中亚各国（本文中的“中亚”不包括今新疆地区）与汉朝的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到了东汉后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中亚人来华热潮。在来华的中亚人中，姓名卓著者当以安清的年辈最早，他出家后来到中国，宣扬佛法，翻译佛经，以安世高之名著称中国佛教界。关于他的生平、时代，流传了许多谬说，作者推测他是公元106年左右继位的波斯王科斯雷斯之子，他之出家，恐为形势所迫。此外，另有安息人安玄，可能由海路来华，从事过政治活动。除安息人外，有月支（贵霜）人和康居人，其中月支人有沙门支娄迦谶（支谶），支曜以及支亮，支谦之父等，还有东汉中期迁居敦煌的月氏人家庭竺昙摩罗刹即法护的先人。而康居人康巨，康孟祥都是汉灵帝时由康居来华的沙门，至于对儒学相当精通的康僧会之父因经商挈家定居南方口岸交阯（今越内河内）。释昙谛的先人也是公元210年前后定居吴兴的康居人，其母黄氏显然是汉族妇女。由于《高僧传》只记载对佛教有贡献的人，所提到的人名极其有限，即使如此、亦能反映许多佛教以外的情况。此外，《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都曾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中亚人来华的情况。曹魏控制河西不必说，即令蜀国亦取道青海羌中与中亚有所联系，新疆考古资料中曾出现高附（喀布尔）附近的贵霜朝摩雷迦家族的姓氏，这绝非偶然。在新疆还曾出土佉卢文字资料，这是贵霜王国的官方文字之一，属印度语系中的西北俗语。该地正属当时贵霜王国的中心地区。于阗、鄯善分别采用了佉卢文字，但政治上与贵霜王国并无任何瓜葛。可见外来文明的强烈影响是来自大批的移民而不是来自征服，这也是由于本地绿洲的居民人数较少，原有文化较低，而外来移民人数较多，文化较高的原因。总之，东汉中期以后，特别是在灵帝时期，中亚地区的居民，包括月支人、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天竺人，不断移居中国境内，其中有佛教僧徒、商

贾、贵族、游客等。他们来华的路线分海、陆两道，取海道者经印度航海来到交阯，一些人留居交阯，一些人继续北上，到达洛阳；取陆道者，越过葱岭来到敦煌，一些人留居敦煌，一些人继续东进，到达洛阳。这些中亚人因与汉族的频繁接触，很快汉化，他们的姓氏大多按其原来的国名而分别改为支、康、安、竺等汉化的姓氏。他们几乎全都是佛教信徒，不仅带来了佛教文明，还带来了许多中亚的风俗习惯和服饰器物，逐渐在内地流行成为中国文化生活中的组成部分了。同时，他们本身也接受了中国固有的文化教育。某些人深受儒学的影响。他们似乎并没有保持其自身血统的习惯，而是愿意与汉族通婚，经过一段时期后，便与汉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除此之外，在西北新疆的于阗和鄯善地区也迁来了成批的中亚移民，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语言文字、宗教、艺术及政治制度。东汉末年出现的大批中亚人移居中国的现象，仅以通商、传教、旅游等原因解释似恐不够，其背景有可能由于当时中亚动乱，为避难而辗转来华。

096　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　　齐思和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55年第1期）

中国和拜占廷很早就发生了商业和文化关系。中国史籍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有关拜占廷的资料，不仅可与西方记载相印证、相补充，并且可以用来解决丝绸之路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和拜占廷的关系，即：中国史书中关于拜占廷的记载；中国的育蚕法传入拜占廷的经过；拜占廷输入中国的商品；拜占廷转入中国的民间杂技与宗教。

拜占廷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于公元330年（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将国都迁至巴尔干半岛东部的拜占廷，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至公元395年（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死后，罗马帝国遂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以拜占廷为中心，西部以罗马为中心。公元476年（刘宋后废帝元徽四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继续存在一千多年，至公元1453年（明景帝景泰四年），始为土耳其所灭。拜占廷地居欧亚之间，位于中世纪丝绸之路要道上。当时君士坦丁堡是拥有一百万右左人口的大都市，是东西商人聚集之地，对商品转运、文化交流都起了桥梁作用。在中国史书中，拜占庭被称作犛靬、大秦或拂菻。《后汉书·西域传》称：“大秦国一名犁鞬”，当是罗马的音译。中国的使者甘英欲通大秦，至阿拉伯为当地人所阻，未能前往。文章引述了《史记·大宛列传》、《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戎传》、《通典》、《旧唐书·拂菻传》中关于拜占廷的记载，其中所记的风俗物产，可与拜占廷的史书相印证。其中所记两方的通使关系，可补充拜占廷史书的缺略。文章还根据史籍文献的有关记载，论述了中国丝绸和育蚕法传入拜占廷的经过。中国的蚕丝与丝织品自希腊时已传入欧洲。最初只有少数贵族妇女作为衣料。及至拜占廷帝国时期，蚕丝已成为日用必需品之一。把蚕丝从中国运到欧洲，罗马时期有海陆二路：陆路从长安出发西行至玉门、阳关，又分两路。南路沿罗布淖尔南，经善鄯，沿大戈壁南，经于阗、莎车以达大宛。北路则经车师、龟兹、温宿以达大宛。至大宛后西经布哈拉以达安息。沿途之于阗、莎车、布哈拉等城市，在汉唐时期，当东西交通之要冲，为著名的国际商业城市。海路则

从泉州、广州出发，经印度或锡兰，至波斯湾登陆，至八吉打，或经红海以达开罗。然后再由开罗、八吉打等城到叙利亚的泰尔、培卢特等城，便到达拜占廷帝国的统治区域。无论陆路或海路，丝绸贸易均需经波斯商人之手。为了垄断丝绸贸易并控制丝绸之路，拜占廷与波斯两国经常发生战争。直至公元522年，拜占廷才得到育蚕缫丝的方法。

据文献记载，在拜占廷查士丁尼皇帝时，有两个曾居留中国的波斯僧人，将蚕子藏于竹杖中，自印度至拜占廷，求见皇帝，愿将养蚕法传给拜占廷。得到皇帝嘉许，育蚕缫丝之法遂流行于罗马领土。至十二世纪中叶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南意大利西西里王罗哲儿二世自拜占廷帝国掳劫两千名织丝工人，移住南意，使意大利亦能从事丝绸生产。至十三世纪以后，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等地才从事此项生产。十八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吉朋曾认为，在东西方贸易中，东方商品大量输入罗马，而东方各国并不需要罗马的商品，故罗马完全以现金来支付。其后的西方历史家多持同样见解。作者认为，这种说法至少对中国与拜占庭间的商业关系来说是错误的。据中国文献记载，自拜占廷输入中国的商品，比较重要的有玻璃、琉璃、珊瑚、海西布、水银。经罗马商人转运来中国的商品有玛瑙、车渠、水晶、琅玕、金钢、苏合、薰陆、郁金香、珠、玳瑁、琥珀。由此可见，拜占廷对中国的贸易规模相当宏大，并非以金银购买中国商品。在商品交流的同时，拜占廷的民间杂技、幻术与宗教也随着拜占廷人的东来而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拜占廷的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留斯派）也传入中国，此为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始。唐代丝绸之路畅通，西亚的伊斯兰教、袄教、摩尼教都于此时传入。佛教虽自汉代已传入，但至唐代较前更为兴盛。文章还对景教传入中国的经过，景教僧在中国传教、建寺和译经情况，以及唐武宗时，各外来宗教惨遭厄运，景教在中国逐渐绝灭等情况，都进行了考证论述。

097 中古时期中印人民的友好交往　　黄道立

（《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4期）

中国和印度，在亚洲或世界上都是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长期以来两国人民之间和政府之间彼此友好往来，尤其在中古时期关系较密切，持续时间也较久。本文回顾了这一时期的友好交往和科技文化的全面交流。汉武帝时，通西域的张骞就曾看到中国出产的“邛竹杖、蜀布”，在中亚、印度一带出现。东汉明帝时，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到公元四、五世纪，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进一步增强。公元七世纪中叶玄奘去印度，是交往的一个高潮。公元九世纪后，两国在外交和商业上的联系愈来愈显得地位突出，到十五世纪前期，郑和七下西洋是又一个交往高潮。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后为止。唐玄奘是促进中印友好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印度一词最初就是由玄奘定名的。唐派出使印度的著名人物还有王玄策，公元648—664年间，他曾三次去印度，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度境内的国家商洽事务。宋朝以后，互派使臣的记载就更多了。通商方面，东晋时期中国产白团扇在狮子国供佛。唐朝义净去印度，同行就有“商人数百”。南宋时通过海运，双方土特产交流频繁。宋人撰《岭外代答》、《诸蕃志》两书，记载了宋代国际贸易事业的繁荣。元、明以后，除政府间往来密切外，民间的贸

易规模也比过去更大。郑和率领船队先后去印度及东南亚各国，这是东西交通史上无前例的壮举。源远流长的和平往来，也使两国的侨民逐渐增多起来，他们对促进文化交流也起着不小的作用。至于两国在科技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既深且远。佛教的传播是交流的重要途径。往来中印两国间的大批佛教僧侣，都是文化界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贡献全面反映在中印两国科学、技术、语言、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古时代，中国的造纸、火药 指南针、印刷术受到世界重视，其中有些很早就介绍到印度。在天文学方面，中国和印度都起源很早。关于太阳黑子和宇宙新星，我国都有世界上最早的纪录。隋唐时期随着印度的僧侣来华，带来了印度的天文、历法知识。天文、历法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成就。我国数学成就也早已流传国外，当然也影响到印度，而印度的数学成就，也随着佛教流传我国。“中国的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在这方面，中印交流也是很突出的。早在中古时期，中国针灸疗法传入印度，即对当时印度医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在作物品种和生产技术方面，中古时期中印双方也展开了广泛的交流。我国新疆和西藏的少数民族，因离印度较近，所以与印度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更多，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中印两国人民从来也是相互学习，彼此影响的。我国在“汉以前未有反切之学”，大约自东汉以来有些学者接触到印度的古梵文后，即开始研究汉语的音韵学。在文学方面彼此间影响也很明显。其他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刻，中、印双方的影响极为深远。我国敦煌、玉门、云岗等处的石窟壁画和雕刻，都是中国固有艺术接受印度影响而形成的结晶。历史的长河因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曲折或回流，但在中古时期，由中印两国人民谱写的和平友好往来和科技文化全面交流的主旋律，始终鼓舞着两国人民继续前进。

098 中巴友谊的历史　　夏鼐

（《考古》1965年第7期）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亲密的近邻。中巴两国人民两千多年以来，一直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保持着长久友谊的记录。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需要一条或几条交通道路。古代中巴交通线除海道以外，陆路上主要是经由中国西北部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中亚细亚和阿富汗，转而南下经过西巴的印度河流域到印度河口的海港。这条路是著名的“丝路”，由阿富汗向西可直通地中海东岸，中国的丝绢便由这条路向西运输到罗马帝国。其次是由中国的西藏自治区西部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经过克什米尔到印度河流域。更东的两条线，是由中国的西藏经过锡金、印度到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和由中国云南省经过缅甸、阿萨姆到东巴基斯坦。中国文献上第一次提到今巴基斯坦，是与“丝路”的开辟有关。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右左，张骞出使西域，当他在大夏国时，曾看到由“身毒”国运购来的“邛竹杖、蜀布”。果若如此，其物是由中国四川省运到印巴次大陆的，那么，当时经由中国云南和缅甸的中巴交通线已经通行。与此同时，即公元前第二世纪时，印巴次大陆的人民在其史诗《摩诃波拉他》中提到中国，称为“至那”。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张骞到大夏国时，其国已隶属于大月氏，国号贵霜，定都于富

楼沙（今白沙瓦）。中世纪的中国巡礼者如法显、宋云、玄奘等都曾到过这里。富楼沙和咀叉始罗两处都是在“丝路”的一条支路上。在后一地点，1951年曾出土一件中国汉代弩机上叫做“牙”的青铜零件，和由中国和田运去的三块软玉。这条支路沿印度河到河口的海港，后然由海路西去。约公元60年所编写的一本希腊文的商人手册中，提到由印度河口的海港巴巴利空（当在卡拉奇附近）运出中国丝绢。中国的特产大黄，最初是经由黑海输入罗马，后来改由这里出口，罗马人叫它作“巴巴利大黄”。玄奘还提到一个传说：在迦腻色伽王时，有中国的“河西蕃维”所送来的质子，输入印巴次大陆原来所无的犁、桃，加以种植。一位近代的印度学者以为，银朱也当是由这条路线从中国传入印巴次大陆的。中国纸在七世纪也是由这条路线传入印巴次大陆。在中国方面，新疆的和田，在本世纪初曾发现贵霜国的铜币。以后又继续发现与巴基斯坦古代文化有关的文物。巴基斯坦古代文明对于古代中国的最大影响，是在宗教和艺术方面，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后，西域僧侣相继前来中国传教译经，其中有许多便是由今巴基斯坦境内来的。许多中国的僧徒也西行求法，其中大部分都到过西巴基斯坦。最著名的有五世纪初的法显，六世纪前半的宋云和七世纪前半的玄奘。通过佛教僧徒的往来，西巴基斯坦丰富多彩的健陀罗式佛教艺术也传入中国，对中国艺术起了很大影响。在新疆境内“丝路”沿线，都有受这种艺术影响的佛教遗物。更东有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洛阳龙门和大同云冈，以及其他地点。712年起伊斯兰教传入西巴。自此以后的中巴交通，主要是由海道。著名的布拉曼纳巴德遗址、巴摩布尔遗址，都曾发现中国的瓷器。至于中国与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的关系，有人曾根据各地所发现石器的分布，以为在史前时代中国与这地区便有交通往来。在伊斯兰的时期，中国和东巴的往来更多。明代永乐、宣德年间（1405—1433年），中国的穆斯林郑和曾先后多次奉使到亚非许多国家访问时，到过东巴的榜葛剌国。中巴友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099　“丝绸之路”与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交往　　张铁伟

（《西亚·非洲》1981年第4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和生产丝织品的国家。公元前五世纪，我国的丝绸即开始西传，经过波斯（又称安息，1935年改称伊朗）转运到希腊、罗马、阿拉伯等地。本文论述了中国和伊朗在历史上经过丝绸之路的友好交往。先秦时代，我国人民和西域各国之间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已有往来。汉族的“鼎”在公元前二世纪时曾通过“塞”族，传入波斯。“塞”族人还为我国第一个友好使团访问安息提供“导译”。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张骞第二次至西域，乌孙后，派副使分别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地友好访问。这是我国使者第一次正式访问波斯。此后丝绸之路上来往人员不断增多，贸易逐渐频繁，中国丝绸等物品运到波斯，再由波斯转销西方；西方及波斯的商人也带着他们的物品运销中国。文章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自汉至明各个时期中国与伊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情况，列举了其中的重要事件和著名人物，以及近些年来我国考古

工作者在新疆、青海、甘肃、陕西、泉州、广州等地发现大量的波斯银币、银器和波斯锦等历史文物，说明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传统友谊是源远流长的。伊朗地处葱岭以西丝绸之路的要冲。本文引用中、伊两国历史交往的史料甚多，论述系统而周密，为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材料。

100　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　　朱杰勤

（《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本文根据我国史籍文献的有关记载，论述了中国和伊朗在历史上的友好关系。文章共分五个部分：一、两千多年的友谊。中国和伊朗都是亚洲的文明古国。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和南中国海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线，自古就将两国联系起来。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又派副使访问安息，受到友好接待，开始了两国政府间的往来。安息位居丝绸之路的枢纽，与中国共同保护丝路，对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了良好作用。自两汉以迄唐宋，两国的交往都一直延续着。据《册府元龟》记载，由公元647年至762年一百多年间，由波斯派往中国的使节共二十八次。唐代旅居和在中国安家落户的人很多。唐代中期的名将李元谅即是波斯人的后裔。唐末诗人李珣是住在四川的波斯人后裔。有一个波斯人后裔李密，是一个名匠，曾于公元614年去日本，并参与了那里的奈良文化革新。现在广州的怀圣寺和泉州的清净寺，都是唐宋时波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寺。二、古代中、伊两国的陆海交通。陆路交通，以甘肃敦煌为出发点，由丝绸之路中道可直达波斯，其北道、南道也可到达波斯，故均为到波斯的路线。海道交通即由广州港口到波斯湾。三、元、明二代中伊两国人士的友好往来。元世祖忽必烈曾将宗室女阔阔真嫁给波斯国王合赞汗为妃。伊儿汗王朝在公元1297年派法克尔哀丁为使者，由海路到中国，拜谒元成宗铁穆耳，受赐贵族之女，并在中国逗留至1305年。元朝也曾派使者出使伊朗。在明代，占领伊朗的突厥族帖木儿曾派使者来中国，明朝派使者傅安等报聘。帖木耳的第四个儿子沙哈鲁据有哈烈（赫拉特）至妫水一带，明朝曾派陈德文等聘问。沙哈鲁在1419年又派出510人的庞大使团，由沙的火者率领访问中国。随员火者盖耶素丁将沿途见闻写成《使华记》。1413年，明朝派陈诚等到哈烈诸国报聘，往返三年，把他的见闻写成《使西域记》。这两本书都是中伊友谊史的宝贵资料。郑和七次下南洋，曾三次到伊朗商港忽鲁谟斯，受到热烈欢迎。随员中的旅行家马欢、费信和巩珍都分别写了游记《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对忽鲁谟斯都有详细确切的记载。四、中伊两国物产和技术的交流。中国传入伊朗的主要有丝绸和养蚕、织锦、冶铁、造纸、印刷等技术，以及桃、杏、茶等植物；伊朗传入中国的有波罗球艺（即马球）、箜篌、琐呐等乐器和苜蓿、葡萄、胡麻、无花果等植物。五、中伊的艺术作风的相互影响。主要是绘画、建筑、瓷器、装饰、丝织等艺术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101　萨珊朝波斯　　周谷城

（《历史教学》1956年第10期）

古代波斯帝国在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曾起过重大作用，做出过重大贡献。在丝

绸之路研究中，常常涉及到波斯的许多问题，诸如波斯与中亚各国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宗教等。这些问题又是丝绸之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本文对萨珊波斯以前的历史、萨珊波斯的兴起、萨珊波斯的经济、文化，特别是萨珊波斯在东西经济文化中的国际地位等方面，进行了扼要系统的论述，对丝绸之路研究甚多裨善。萨珊朝波斯是古代波斯人于公元226年推翻安息统治后建立的帝国。曾东征印度，西攻罗马，北克阿尔明尼亚，共历时四百余年，于公元641年被阿拉伯统治者推翻。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以农为主，手工业也较发达。古波斯定袄教为国教，袄教是波斯的统一信仰。公元三世纪又创立摩尼教。古波斯使用巴拉维文，这种文字可上溯到公元前四世纪。萨珊时代的建筑，继承了古波斯时代的遗产，具有尖顶拱形风格。雕刻也极精巧、图案如猎犬、狮子、野猪、野羊等最为突出。

萨珊波斯帝国时，东有中国，西有罗马，它处于当时文化交流中间，东西贸易，思想汇合，几乎都居于中心位置。尤其丝绸贸易，早在安息时代，安息人便已控制中国与罗马直接交往；到萨珊波斯时代，控制更严。六世纪中国蚕种传入欧洲，便是中经波斯人之手而后传入罗马的。波斯的文化艺术风格也传入中国，在中国输出的丝绸花纹中也常显示出来。当时，袄教随着萨珊王朝中兴而中兴；佛教早已传入其境；犹太教仍很流行；基督教正向西亚大发展。各种宗教同汇于萨珊波斯，于是在公元三世纪便产生了混合诸教为一体的摩尼教。后因摩尼受到迫害，摩尼教徒向东逃奔，并沿丝绸之路传向东方各国，影响一些民族和国家的思想文化。摩尼教也于唐代传入我国，并盛行于大江南北，唐武德年间，摩尼教惨遭迫害，历经宋代始渐绝迹。

102　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　　冯家升

（《新华月报》 1955年第10期）

历史上中国和阿拉伯有过密切的友好关系。早在公元前126年张骞使西域回长安后，报导了西方的情况，《史记》中所记的条支，就是当时的阿拉伯。后汉时，甘英打算从波斯湾经条支到大秦，因人阻隔并告以困难而止。但《后汉书·西域传》记条支情况较之《史记》为详。由于中国使节商旅，未曾渡海涉足阿拉伯，对其认识均源于波斯人之口，所以难免模糊不清。据本文作者研究，在公元七世纪正当中国盛唐之时，西方的阿拉伯最为强盛，由于双方势力强大，两方的边境竟在中亚相连接。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哈利发奥斯曼曾遣使节来唐，这是阿拉伯和中国的第一次交往，自此以后，中阿双方交往频繁，关系日臻密切。据史籍记载，有唐一代的二百多年时间里，阿拉伯遣使来唐就达三十七次之多，其中也不免商人充当使节，进行贸易活动者有之。公元七至十三世纪，中阿商业贸易极为发达，从波斯经中亚、过新疆到长安的丝绸之路极为繁盛，当日阿拉伯首都巴格达为世界贸易中心，中国的货物则特别辟有“巴杂儿”，主要经营丝织品、磁器、纸、麝香等。中国的长安，有所谓的“西市”，是阿拉伯及中亚商人的聚散地，还有沿海的广州、泉州，都是著名的国际市场。这些阿拉伯及中亚商人，除来往于阿拉伯与中国进行商贸活动外，有的长期留居不返，受中国教育，任中国官吏，如唐宣宗时的李彦升，元时蒲寿宬、蒲寿庚等，都是阿拉伯人的后裔。经济上的交往必然促进

文化上的交流。所以作者在文中，对中阿文化交流及其贡献，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认为阿拉伯人对中国文化上的最大贡献有天文、历法、医学和伊斯兰教；中国对阿拉伯文化最突出的贡献是造纸术、炼丹术、脉术，以及指南针、火药等。而阿拉伯天文历法对中国影响较大，如札马剌丁撰“回回万年历”，又造仪象器七种，进于忽必烈，后主持司天监工作。明代，中国两种历法参用。洪武元年（1368年），设立中国式的司天监，又设立回回司天监，监中又设“回回历法科”，因此，中国天文历法受阿拉伯影响达四百年之久。直至清初才为天主教徒带来的西洋历法所代替。在医学方面，忽必烈时成立“广惠司”，专门制造回回药物，供他自己和宫廷使用，1292年还在大都和上都设立“回回药物院”。所有这些均可证明阿拉伯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至于中国文化，如造纸术传入阿拉伯是唐天宝十年（751年）以后事。天宝十年中国兵败怛逻斯，许多随军工匠（包括造纸工匠）被大食所掠，从此中国造纸术传入了阿拉伯，这在杜环的《经行记》中有较详的记载。炼丹术和火药也于八至九世纪时传入阿拉伯，后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在中阿文化交流的研究工作中，1958年阎文儒先生在《文物参考资料》第9期上发表了《从考古发现上看阿剌伯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文，从考古学的角度阐发了中阿友好关系。该文对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巴士拉附近的沙玛拉、苏沙、拉哈斯等古城遗址，都有中国瓷器的发见，其中以伊拉克的沙玛拉遗址出土的唐代陶瓷最为丰富。如三彩陶器，最主要的有彩釉壶，式样不同，彩釉各异，这无异是唐代传入的；白瓷残器均系晚唐作风；青瓷残器出土很多，种类与我国洛阳出土青瓷片一样，有的又与唐代越窑出土极为相似，这些都证明中世纪时，中阿关系密切，中阿文化交流极为兴盛，这为今日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参考材料。

103 中国与阿拉伯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　　马坚

（《人民日报》 1956年8月15日）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相隔数万里，但很早以前，就已发生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据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麦斯欧迭的记载，远在五世纪时，中国船只就经常航行到俄曼、西拉甫、波斯湾海岸、巴哈林海岸、俄卜莱、巴索拉等地。这些地区的船只也常到中国来。唐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遣使来中国后，中国与大食的来往逐渐频繁，乃至唐贞元十四年（798年）的一百四十七年间，大食共派遣使节三十次。当时波斯人统称阿拉伯人为“大食”。宋太祖乾德四年（996年）因僧人行勤游西域之便，宋朝皇帝带信给黑衣大食哈里发，向他致意。宋开宝元年(968年)大食遣使来中国。自开宝元年至嘉祐元年(968—1056年)八十九年间，共达十七次之多。元统一中国和消灭阿拔斯王朝后，中国与阿拉伯各国间的交通愈加便利。明朝时云南回民郑和七次奉使西洋，曾到东南亚和中近东阿拉伯各国，阿拉伯各国的使臣也曾屡次到中国。中国与阿拉伯各国的经济联系也很紧密。据中国史书记载，东南亚各国到处有阿拉伯商人的足迹，中国的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在唐宋元时代都是外国贸易港，各置市舶司以征关税，并受理对外贸易。其时，广州、泉州、扬州都有阿拉伯侨民的居住区。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和大食国间贸易之盛。这种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活跃了各国的经济生活，也促进了中国人民和阿

拉伯人民之间的友谊。在中古时期，阿拉伯人不仅执亚、非、欧三洲国际贸易的牛耳而且是世界文化的传播者。他们不仅保全了古代希腊灿烂光明的文化、而且吸收了埃及、叙利亚、波斯、印度、中国的文化，并加以发扬光大，然后传播到东西各国。阿拉伯人把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传到西方去，把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天文学、医药等传入中国。阿拉伯语文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曾经是唐、宋、元时代伊斯兰教徒间通用的语文。我国西北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至今还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他们的语言，人民币上也有这种文字。全国各地的清真寺都有人学习阿拉伯文的教义和教律。阿拉伯的天文历算和天文仪器，元时传入中国，对中国天文历算的演进起了一定作用。回回历在元、明、清三朝，沿用四百余年。阿拉伯医药对于中国的贡献也是很大的，阿拉伯人不仅输入许多药材，而且输入阿拉伯的医学。中国的蒸酒方法也可能是直接从阿拉伯人学来的。南京回族学者刘智著《天方性理》、《天方礼典》、《天方至圣实录》三书，介绍了阿拉伯哲学、伊斯兰教教典和穆罕默德圣人的历史。中国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除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外，阿拉伯人曾学习中国的绘画、织锦和瓷器制造。中国的皮影子戏，通过蒙古人和土耳其人、于十二世纪时传入埃及，很受埃及人民欢迎。作者在埃及求学其间，曾将孔子的论语译成阿拉伯文，这部古典著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由此证明中国与阿拉伯的友谊关系源远流长。

104 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关系 〔叙利亚〕卡米勒尔·雅德著

（《历史研究》1958年第11期）

本文根据阿拉伯历史文献《黄金牧地》、《诸国志》、《游记》、《索隐》、《妙文无双》等书的记载，论述了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由丝绸之路连接起来的历史关系。早在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治中国时起、就与阿拉伯开始了商业交往。中国输入阿拉伯的马匹。印度和中国的船只在伊斯兰教以前已到达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西拉王国。中国代表团还曾访问波斯。唐太宗时，唐朝势力西及里海。萨珊王朝皇帝伊副候被伊斯兰教军队打败后，曾向唐太宗求援。太宗命边境上的军队支援他、以后他被叛军杀死。其子卑路斯逃至长安，被唐朝封为“右武卫将军”。公元635年，有一个景教代表团从波斯前去中国，受到唐太宗的优待，并下令把基督教经典译成中文，还允许在那里建立一座教堂和修道院。公元651年，当波斯奥斯曼时代，有一个阿拉伯代表团到达长安，目的是宣传伊斯兰教。阿拉伯军队在攻下波斯以后，曾到达中亚并在古泰伯率领下进入中国，占领喀什、进抵吐鲁番与中国军队交战。后因古泰伯被撤职，战争遂停。在翁米亚和阿巴西亚两个王朝时期，阿中之间使团往来频繁，计有32起之多。在中国的宋朝（960—1280）有20起。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最后一次战争于公元571年发生在怛逻斯城，阿拉伯人获胜，俘虏了一批中国人。唐朝发生安禄山叛乱时，唐明皇曾向哈里发阿蒲茶拂请援，阿蒲茶拂派遣了一支由阿拉伯人、突厥人和畏兀儿人组成的军队，在突厥人业阿福尔率领下，帮助中国军队平定了叛乱。唐明皇允许穆斯林官兵留住长安，同中国女子结婚，并在公元762年敕建清真寺一座。这个时期，阿中之间的贸易特别兴盛。在伊斯兰帝国的中心建立了巴格达城。它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很快发展成世界上当时最大的城市。这时阿拉

伯人已经建立了制糖、玻璃、香料、钢铁、棉织品等新的工业，并出口产品，而进口调料、丝绸、珍宝、金银等。在海道从古就有船只来往于阿拉伯、印度与中国之间。巴士拉和西拉甫成为海运城市。到宋代，在广州、杭州和泉州都设立了市舶司，专管海路贸易。到十世纪末，阿拉伯与中国之间的海上贸易趋于繁荣。许多阿拉伯商人和水手留住中国的广州与泉州。到元代，忽必烈在宫廷中延揽学者和艺术家，把很多穆斯林学者调到中国，传播知识。天文学家加马鲁丁把很多“天文仪象”传入中国，并给忽必烈撰写了万年历。在阿中的长期交往中，相互了解、相互学习。中国的造纸、印刷、罗盘和火药等四大发明，首先传入阿拉伯，然后由此传给其他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

105 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 纳 忠

（《历史教学》1979年第1期）

本文首先简述了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交通。主要是张骞通西域后，经历大月氏，大宛、康居等中亚国家，从而听到了有西亚条支的情况，所以在《史记》、《汉书》中都提到“条支”，它所指的是波斯湾伊拉克等阿拉伯地区。东汉和帝永元时、甘英出使大大秦、抵条支，为西海（波斯湾）所阻，乃返。张骞和甘英的西使、丰富了中国人对中、西亚和阿拉伯地区的知识，开拓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其次文章重点叙述了中国与阿拉伯的贸易关系、中国文化对阿拉伯的影响，以及阿拉伯人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唐代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通过丝绸之路来中国经商的波斯及阿拉伯人络驿不绝，当时中国的长安、广州、扬州有专门销阿拉伯及波斯货物的市场。在巴格达有专门销售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的“中国市场”。宋代以来，海路渐次发达，泉州、广州还设有“蕃坊”，专供大食等国外商人经营和居住。来中国的阿拉伯人中，很多在中国定居，娶妻生子，将伊斯兰教带入中国。南宋时期，阿拉伯、波斯长期战乱，来中国居住的穆斯林又大量增加，蒙古征西后，穆斯林来华者更多，使伊斯兰教大大发展，许多地方建起清真寺。尤其在新疆，伊斯兰教代替了原先的佛教等宗教。阿拉伯人来中国后有不少从事学术研究，对中国文化多所贡献。元代受阿拉伯天文、历法影响很大，研究天文的机构中，还设有“回回司天监”。西域回回学者札马鲁丁创造了多环仪、方位仪，叙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七种天文仪器，对观测天象很有帮助。元初参考回回历法作庚午历法，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元世祖曾颁行九年，后颁新历，仍以万年历为蓝本。元代医疗机构中有“广惠司”和“回回药物院”，足见阿拉伯药疗和药物对中国的影响。中药中的“乳香”、“设药”等，都是从阿拉伯地区输入的。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等，都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入欧洲。阿拉伯人从中国学得石磁指极性知识，首先以罗盘指南用于自已的航海事业，然后传到西方。造纸术初传入撒马尔罕，撒马尔罕的贸易输出中，纸张跃居第一位，后传入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纸长期流行欧洲各地，享有很大声誉。中国的瓷器深受阿拉伯人民的喜爱，早在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就广泛使用中国瓷器，并按中国的方法制造瓷器，在伊拉克北部的撒木

拉城，发掘出许多模仿中国的当地瓷器。中国绘画对阿拉伯影响也很大。阿拉伯历代图书插图中，可以清楚看到模仿中国风格的人物、鸟兽、花草等画，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中国和阿拉伯友好关系之密切及彼此文化影响之深远。

106　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深情厚谊　　周一良

（《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

本文论述了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自古以来的深厚友谊和经济上、文化上的相互交流。远在1200年以前，阿拉伯（当时称为大食）已开始由丝绸之路与唐朝交往。叙利亚的白衣大食和伊拉克的黑衣大食，都与唐朝政府建立了联系；唐宋时常遣使到中国来。从八到十五世纪末，中国同阿拉伯保持着非常频繁的贸易关系。阿拉伯商人往来于扬州、泉州、广州等地，其中不少人长期居留中国。他们把象牙、犀角、宝石、香料等运到中国，再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贩运到西方去。八世纪时，在今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城里，就有专卖中国瓷器的市场。十五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他的船队曾到过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亚丁和哈达拉毛。中国和阿拉伯在宗教上的联系也很悠久。叙利亚人所创的景教，在唐时传入中国，建立寺院，受到政府的保护，辽金和元朝时仍在流行。伊斯兰教在中国一千多年来广泛传播，成为中国人民同阿拉伯人民之间紧密团结的纽带之一。中国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在不断进行。阿拉伯的天文历算和天文仪器在元朝时传入中国。郭守敬曾参考阿拉伯历法，改订中国历法。阿拉伯的药材、医学和外科手术也传入中国。明朝的大药学家李时珍，在他所著的《本草纲目》里，也收进了很多阿拉伯药物和治疗方法。来自叙利亚的爱薛在元朝政府任职，被派往波斯访问，受到忽必烈的赞扬。也黑迭儿和他的儿子马合马沙在元朝政府管理工部事务。1266年元朝定都北京时，也黑迭儿负责设计修建皇宫。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四大发明，经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八世纪时，在阿拉伯统治下的撒马儿罕，曾建立了中亚最早的造纸业。七世纪中叶，中国工匠曾把中国的绘画艺术和织锦技术传授给阿拉伯人。事实说明，千余年来中国和阿拉伯人民之间存在着悠久的友谊和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但从西方帝国主义侵入东方以后，这种友谊和联系即被破坏割断。只是在许多阿拉伯国家赶走帝国主义和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友谊和联系才得到恢复。

107　中国和阿曼历史上的友好往来　　沈福伟

（《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

阿曼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古代成为这一地区和中国交通的海陆要冲。中古时期，阿曼帆船常常航行于波斯湾和南海之间，为沟通阿拉伯各国和中国经济的往来，维系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中国大帆船也在同一航线上远航印度洋，由于它的体积大、载货多、航行安全而声誉卓著。最早运到中国的阿曼物产中有乳香、椰枣，还有珍珠和良马。中国帆船到达波斯湾，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和中国的联系。中国船大约在五、六世纪之交确已到了阿曼国都希拉，沿途经过阿曼各港。南北朝时期，北魏和中亚、西亚各国往来密切，《魏书》卷八记载，北魏正始四年（公元507年）10月，“嚈哒、波斯、渴槃施、渴文

提、不那杖、怛杖提等诸国”都派使者通过陆路到达北魏都城洛阳通好。在六国中的渴文提、怛杖提都是阿拉伯国家。阿曼和中国最早的外交往来，应从507年算起，从那时起，中国历史上才正式出现怛杖提这个艾兹德部族的阿曼，从此以后，中国和阿曼在很长时期中，便一直维系着直接的贸易关系，始终保持着友好往来的优良传统。在唐朝，阿曼一直和中国保持着政治上和商业上的联系，海上往来尤其频繁。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游历中国之后，在851年写成《中印游记》一书，详细叙述从阿曼到中国所历的海洋和岛屿。唐代地理学家贾耽也曾把中国帆船通航波斯湾的海上航路加以记录。在898年阿曼归卡尔马特朝统治以前的四个世纪，可以算是中国和阿曼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往来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十世纪中叶，北宋统一中国后，积极奖励海外贸易。阿拉伯及非洲的物产，都经过阿曼运往中国，如真珠、通犀、龙脑、乳香、龙涎香等等，中国华丽的丝绸、瓷器及其他货物输往阿拉伯及西方世界。十一世纪起，海外贸易大有起色，直到十二世纪上半叶为止，中国和阿曼的友好关系也进入了第二个高潮时期。十二世纪中叶以来，阿曼政局起了重大变化，马立克王朝统治了阿曼。与此同时，埃及法蒂玛朝和继起的阿尤布朝发展印度洋贸易的政策，和十字军的东征，使得红海和地中海之间商业联系，显得空前活跃。从十二世纪中叶一直到十四世纪中叶，形成了中国和阿曼友好往来的第三个高潮。到中世纪末期，经过明初的海禁，在永乐年间，中国在印度洋上展开了规模宏大的贸易和外交活动。这种海上活动，以郑和率领的宝船队七下西洋而名扬四方，震动了整个印度洋，展开了中国和阿曼友好往来的第四个高潮。自从六世纪初，怛杖提使者和洛阳结盟以后，直到十五世纪上半叶，中国和阿曼的友好往来，在近千年的历史中，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得以经历了四个高潮。

东汉时，中国和阿曼尚无直接往来，甘英出使大秦，仅到波斯湾头的条支而止。至于中国货物运抵阿曼，主要是通过安息道和乌弋山离道，再渡波斯湾运抵阿曼。阿曼与中国直接发生交往，是在北魏正始年间，从此中国的丝绸及阿拉伯的香料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商品。直至公元十一世纪，阿曼的乳香、龙脑、荳蔻等，还通过丝绸之路大量运入于阗。由此可考中国阿曼经济关系之一斑。

108 汉唐时期中国与狮子国的关系　　许道勋　赵克尧　范邦瑾

（《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本文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国与狮子国的关系。全文共分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从史籍记载中，考证了狮子国名称的演变和与中国的关系。狮子国亦名执狮子国，音译为僧伽罗或僧诃罗，即锡兰岛之今斯里兰卡共和国。狮子国之名始自东晋高僧法显。他曾在那里居住两年(公元411—413年)。他写的《佛国记》，是我国最早记述狮子国历史、民情与风光的文献。由于狮子国地处印度洋中，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站，“诸国商人共市易”。中国的丝绸、瓷器、香料等商品，大都经此运转至印度、波斯、非洲以及其他地区。故中斯两国人民在法显之前早已有友好往来。据《梁书》、《南史》及《通典》记载，东晋义熙二年（公元406年），狮子国“始遣使献玉像”。这尊高四尺二寸的玉佛像，是由沙门昙摩护送来的。此为中斯佛教关系的首次记录。但法显之前，

史籍并无"狮子国"的著录。原来狮子国是僧伽罗的意译。所谓"僧伽罗"即执狮子之意。汉时称叶调，三国时称斯调，均为僧伽罗之对音。在公元二世纪三十年代初，叶调国即曾向中国"遣使贡献"，足证两国往来关系之早。在第二部分，作者扼要介绍了法显《佛国记》中关于锡兰形成的历史传说、岛国美丽富饶景况的描绘。并详述法显之后，狮子国与南朝宋、梁之间建立的友好亲善关系，特别是狮子国僧人及比丘尼到中国弘扬佛教的概况，对南朝佛学的兴隆与宗教艺术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在第三部分，作者论述了唐朝与狮子国友好关系的新发展：一是在文化思想方面，主要是佛教的继续传播；二是在政治外交方面，政府间使臣往来日益频繁；三是在经济交流方面，商业贸易的广度与深度均空前提高。并引用史书的有关记载，作了简要阐述。

109 东汉和贵霜关系史上的两个问题　　莫任南

（《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贵霜王朝系我国古史上的大月氏民族所创建。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为匈奴所败遂远徙，西击大夏而臣之。时为公元前165年。当时大月氏还是一个未统一的部落，有五翎侯。百多年后，贵霜翎侯丘就却始强大，灭其他四翎侯，自称贵霜王，开始向外扩张，侵安息，灭濮达，据罽宾。丘就却死后，子阎膏珍立，复灭天竺，继阎膏珍之后的贵霜王是迦腻色迦。迦腻色迦在位时，国势极盛，为当时世界之一大强国。研究贵霜与汉王朝的关系，以及贵霜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和作用，是丝绸之路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仅就世界各国学者在研究贵霜王朝与东汉关系史上的两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补正，这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多所裨益。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提出了两个颇为重要的论断：一是公元90年"班超迫使贵霜王迦腻色迦正式承认臣服于汉帝国"；另一个是迦腻色迦统治的末期，东土尔克斯坦（我国新疆）的最重要城市国家——疏勒、莎车、于阗都被并入贵霜帝国的版图"。作者认为这两个论断，纯粹是曲解中国古籍，随意穿凿附会出来的。为探求历史真相，澄清混乱，本文对这两个问题作了切实的考证和研究。首先探讨了班超迫使迦腻色迦"臣服"的问题。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西域发生班超同月氏副王谢的战争。《后汉书·班超传》对这次战争的起因、性质、规模、战争的结局均有记载。然而苏联和其他国家学者对这唯一的一段史料，都作了牵强附会的解释，从而歪曲了事实，颠倒了是非。关于战争的原因和性质，《后汉书·班超书》只说到贵霜求婚汉公主不成之事。显然，这只是一个导火线或者战争的口实，并非根本原因。而事实上迦腻色迦在位时，贵霜国势极盛，其领土北达两河流域，南至恒河中游，掩有中亚和西北次大陆，但迦腻色迦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夺取葱岭以东领土，这即是他派副王谢率大军来攻班超的根本原因。当月氏副王谢带七万大军越葱岭来攻时，班超"众少"，"收谷坚守"，进行自卫防御，正义性显属汉朝。而苏联和其他国家学者，硬把战争责任推到双方身上，歪曲了战争性质。对于战争的规模和贵霜的失利，苏联和其他国家学者也作了过分夸大的渲染。实际上班超是靠智谋取胜，只同月氏打了几场小仗。班超在挫败了入侵者的气焰后，一则为了继续执行和平友好政策；再则月氏还有力量，不可阻击，就无条件地"纵遣之"。至于认为贵霜"臣服"于汉，乃将"月氏由是大震，

岁奉贡献”这句话误解了。“贡献”与战前月氏向汉“贡奉珍宝、符拔、狮子”中的“贡奉”是同一含义，即指商业贸易而言。关于迦腻色迦兼“并”疏勒、莎车、于阗的问题，作者分析了苏联和其他国家学者作为论断根据的《大唐西域记》记载，认为引证者忽略了玄奘“闻诸先志”的声明，而将传闻之事，作为主要依据。《后汉书·西域传》，记疏勒、莎车、于阗史实甚详，但无贵霜征服它们的记述。《三国志·魏志》同样没有贵霜兼并葱岭以东地区的记载。贵霜在迦腻色迦一世时，国势繁盛，是中亚和西北次大陆的大帝国。它曾侵入过疏勒，但为班超所击退。迦腻色迦一世死后，传至婆苏提（公元145—176年）贵霜便开始分裂、衰落。从公元三世纪前期起，萨珊波斯自西来侵，贵霜就愈益衰落。一个逐步没落的国家没有可能向外扩张。从留世的铭刻、钱币资料中，也找不出贵霜兼并疏勒、莎车和于阗的证据。

110　汉代的中国与埃及　　孙毓棠

（《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作者较详细地论述了张骞通西域后汉朝经营西域的情况、丝绸之路的路线和与埃及交通的海道路线，以及中国与埃及的相互贸易。埃及是非洲东北部有名的文明古国，地当欧、亚、非三洲交通枢纽，是地中海东部商业荟萃之地。远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不久，中国和埃及即通过丝绸之路有了间接的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史记·大宛传》所记张骞在西域所传闻的黎轩（犁靬、犁鞬），即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当时是希腊贵族后裔托勒密王室有名的都城。其后黎轩善眩人即随安息使臣来到中国，所谓黎轩善眩人，就是埃及亚历山大城有名的杂技家或魔术师。这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人。《汉书·地理志》记载张掖郡属县中有一县名为骊轩，据作者推断，可能是汉武帝重视此事，遂于丝绸之路要道上设置此县，以夸耀于从西域来的各国使节商贾们。这可以看作是中、埃两国古代交通史上最早的一个纪念。公元前一世纪，西汉与西域的贸易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而日益发展，直至西汉末年，虽无中国与黎轩直接交往的记载，但中国的丝织品早已由丝绸之路到达亚历山大城。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穿的丝衣即为中国丝织成。王莽篡汉与东汉初期60余年，西域局势暂时混乱丝绸之路受阻。公元73年，班超至西域，经20余年整顿，重新稳定了西域，丝绸之路复又畅通。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条支，获得不少关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新知识。加以公元一、二世纪汉与西域诸国往来进一步密切，才确实知道了一些关于埃及的情况，并改称黎轩为“大秦”。东汉、魏晋时期所称的大秦，包括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和沿地中海东岸诸地，但其主要大都市仍是亚历山大城。据《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对大秦的记载可知，在公元一至三世纪，中国不仅较详的知道了埃及，而且还知道了西边的撒哈拉大沙漠。作者还简要介绍了丝绸之路通大秦的南北两道。北道从长安西行，出玉门关，先至楼兰，溯孔雀河西上至尉犁，西经乌垒城、龟兹、姑墨、西南至疏勒（今喀什噶尔）。从疏勒西越葱岭到达大宛都城——贵山城，再西至粟特。自此再西南行，达安息东边重镇木鹿，它是安息对东方贸易的大门，为东方入安息的必经之地“号为小安息”。若自粟特南行至监氏城，再西行，亦须经安息。自木鹿或监氏城入安息，先到其旧都番兜

（和椟）城，转西南至阿蛮，再越扎格罗斯山岭抵达安息后期都城斯宾。斯宾是安息与罗马边界上的一个商业名城，交通便利，公元一、二世纪时是中东商业荟集之地。从此沿河而下，可达条支，它是波斯湾头一大海港。从斯宾西北行，在幼发拉底河上游渡河，可抵古叙利亚的安条克，《魏书》称之曰安都。自北南下，经大马士革、加沙、越西奈半岛，即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这是中国至埃及的主要商路。所谓南道，从长安西行至楼兰后，南行经扜泥、伊循城（今若羌），溯车尔臣河至且末，西经精绝、扜弥、于阗、皮山，然后西北可达莎车，由此西逾葱岭至大月氏。今天自扜泥至于阗这段路已因沙漠侵蚀而南移。《后汉书》又说："自皮山西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日至乌弋山离国"。这就是从皮山经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越兴都库什山南行的东汉有名的"罽宾乌弋山离道"。从乌弋山离"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到了条支，有陆路和海路便都可通大秦。

作者在要简介绍丝绸之路南北两条陆路交通后，又介绍了以南印度、斯里兰卡为主要的中介或中转站，最终达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海路。认为中国至印度的海路，在汉武帝时业已开通，公元一至三世纪中国和斯里兰卡及印度的海上贸易关系，不断得到加深，而且日益密切。并介绍了在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和东方以及印度交通贸易往来的三条海上路线，同时介绍了中国运往大秦的丝绸和其它商品以及从大秦输入中国的商品种类和名称等。

111　成吉思汗和中亚　　王治来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1981年第18期）

成吉思汗在他的晚年征服了中亚（天山南北和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并把这个地区分给了他的第二儿个子察合台。自此以后，中亚落入蒙古的统治之下，垂数百年。甚至到清朝统一新疆和沙俄侵占中亚三个汗国的时期，这些地方的统治者仍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如何评价成吉思汗在中亚的历史作用，中外史学界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作者认为，应以他是一个中国的统治者作为大前提。在此前提下，可以看出成吉思汗是匈奴单于、突厥可汗、汉唐与西辽皇帝的伟大继承者，是正统的中国王朝——元朝的始祖，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早在西汉时期，今新疆地区、费尔干纳（大宛）、帕米尔（无雷）及其以西的一些小国（如桃槐、休循），都已属于中国的西域都护管辖。唐朝时，不但今新疆地区，而且原西突厥所属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也列入了中国的版图。成吉思汗征服中亚，使其地与蒙古草原再度统一于中国。中亚地区地处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枢纽，无论是中国北方草原和内地，都同中亚有密切的贸易关系；无论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商人、突厥人、畏兀儿人，仍至阿拉伯人、波斯人，也来往于北方草原及其他地方。中国内地的粮食、布匹、丝绸运往色楞河一带。东西方商业贸易受到蒙古统治者和人民的欢迎。当时，中亚河中地区的统治者尊称花拉子模沙。公元1215年，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就听到成吉思汗大败金人之事，并派使团探听蒙古的军事力量，成吉思汗不仅热情接待了这个使团，为了回报，也派出了使团及商队去河中。到达布哈拉后，摩诃末部属掠其财物，杀害使节及商队人员。此事引起成吉思汗的恼怒，于是又第二次派使团去河

中，要求惩办凶手。但使节又遭到了摩诃末的杀害，这才引起了成吉思汗的西征。西征的结果，使原属西辽的河中地区回到了中国的版图。成吉思汗西征象一把铁扫帚，把从华北到中亚的地方割据势力一扫而光。一切关卡和壁垒都被清除，东西道路，开通畅达，这对于中西交通和商业贸易甚为有利。由于成吉思汗的西征，中国的火药、手工艺及产品，蒙古的札撒、骑兵战术、驿站制度等，传到了中亚和西方，影响久远。以后帖木儿及其后继者时中亚的政治、文化，基本上就是蒙古制度、波斯文化同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这进一步证明了蒙古西征和大一统对于促进东西经济、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

二. 历史地理

1. 西域各国历史

112 西北史概述 杜光简

（《西北通讯》 1947年第7.8期）

本文对周秦以来至明清各个时期西北经营的得失作了概述。周秦时代，西北疆域大都未出内西北范围，人民之间，与河西及西域诸民族应有所往来，但无确切记载，而有明文记载者，始于西汉。武帝为反击匈奴，一方面派张骞使西域，谋联合月氏以夹击之，另方面派卫青、霍去病直接进击匈奴，据河西，设四郡，从而打通了西域交通路线，从此汉朝势力进入西域。西汉亡后，汉对西域之统治及交通，时断时续，直至东汉明帝，又对匈奴的进犯进行反击，西域之交通得以恢复，使节商旅往来更加频繁。两汉经营西北的结果，防止了匈奴南侵，保卫了西北边疆领土的完整，发展了中西交通，建设了西北边郡城市。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对西北的经营，在政治上远不如两汉，但经济文化的交流，较两汉为盛。至唐代，对西北之经营规模最大。太宗擒颉利，东突厥被击败；高宗破西突厥，西域遍设羁縻州，远达里海之东，印度河之北，领土较汉时为大。当时西域设两大督护府，北庭大督护府辖天山北路，安西大都护辖天山南路及葱岭以西诸州，安西督护府下又辖四镇，即龟兹、碎叶、于阗、疏勒(后以焉耆代替碎叶)。此四镇为唐在西域之主要根据地，直至天宝末年，高仙芝败于大食，唐在西域之势力遂衰。宋时，国势最弱，河西、青海、宁夏及陇南洮河流域为西夏所占，与西域之关系因之很少。迨至元代，世祖忽必烈灭南宋统一中国，其疆域之大，为历代所不及。世祖立中书省于燕都，立行中书省于陕、甘，陕西、甘肃之有省名即始于此。又因镇抚西域，置阿姆河行省，以统葱岭以西；设阿力麻里元帅府，以监天山南路；别失八里元帅府，以督天山北路；曲先元帅府，以统吐鲁番以东。并广设驿站，东西交通称便。明代疆域较宋为大，而对西北之经营，远不如汉唐，至于西域，则与明无密切关系。清朝统一中国，于西北置陕西、甘肃行省，划乌鲁木齐以东之地于甘肃，葱岭以西之塔什库尔干、浩罕、兴都库斯坦等地皆为属国，版图之大与唐略等。咸同间，沙俄乘新疆之乱，攫占葱岭以西之地，又进兵伊犁，赖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又顶住了沙俄的侵略，于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正式建立新疆行省。通过本文可以了解西北的历史概况，以及西北在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西北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民族的混合地，同时是中西文化的沟通地，国际商业贸易之孔道。为此，研究西北史地则为研究“丝绸之路”的前提。本文仅将西北历史的发展，中国历代对西北的治理及兴衰，以及和西域的关系作了介绍，可供有关研究人员参考。

113 中亚历史和文明研究概论 〔法〕韩百诗著 耿 升择译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7期）

中亚地区东起万里长城，西至喀尔巴阡山脉，北抵西伯利亚大森林，南达伊朗和西

藏高原。中亚历史是欧亚大陆史和地中海盆地及西欧定居民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伊朗、印度和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概述了对中亚历史和文明研究的状况。文章从十七世纪荷兰学者维特森撰写《北方和西方鞑靼史》一书开始，介绍了法国汉学研究者对中亚史的研究，他们有雷慕沙、德经、儒莲和沙畹。记述了汉学的诞生、发展和形成独立学科的过程。特别是论述了沙畹和伯希和对中亚史的研究及著作。自伯希和于1945年去世以来，中亚研究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不仅涉及到中国和苏联，而且也包括喀尔巴阡山以东、西伯利亚、伊朗和阿富汗、印度大陆的北部、西亚原拜占庭帝国疆土等地区。文章还论述了中亚地区文明的特点，汉族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巨大影响和丝绸之路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并提出，由于缺乏考古和文献方面的资料，要完全通达中亚史还有许多复杂障碍。如文献资料零碎不全，有些未加工整理和考证，缺乏工具书，尚不能作铭文汇编等。作者认为对中亚史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应以考古资料为依据，对资料进行初步的解读；第二阶段又可分二步走，首先既以考古资料，又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然后再过渡到完全以文献为基础的阶段，指出考古学和汉文史料对研究中亚历史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本文对法国学者研究中亚历史和文明的情况谈得比较系统和全面，并对中亚地区民族变迁和经济文化发展加以扼要的描述，对了解这一地区和丝绸之路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114 《中亚历史和文明》第一、二章摘要　　〔法〕韩百诗主编　　耿　升译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

《中亚历史和文明》一书由法国法兰西学院教授韩百诗主编，1979年出版。全书共分六章，重点是讲中国的西域。本文是该书第一、二章的摘要。第一章主要根据中外史籍文献和考古资料，概述了中亚从史前至今的历史地理沿革。文章指出，西域的疆域大致从咸海到中国甘肃省的敦煌，南西伯利亚到阿尔泰山，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到西藏北部的阿尔金山山脉。这一地区存有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迹。中亚史前史结束时间可能在公元前1200年至1000年。中亚一直是两种民族共处、即游牧民族同定居民族杂居的地区。而游牧民族首先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欧洲人种，其次是蒙古人种。文章叙述了中亚各民族的斗争和迁徙，东西方对中亚的了解过程，以及二十世纪初英、俄、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学者对新疆地区大规模的所谓考古调查；和张骞通西域后，汉、唐、元、明、清各朝对西域的经营和开拓历史，英、俄帝国主义对中亚的侵略扩张等史实。第二章主要是以丝绸之路和丝绸贸易为线索，概述了中亚的贸易及其对东西方文明产生的影响。文章认为，从上古时代起，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城市安条克（安都）到中国长安，即有通商大道。中亚绿洲城市就是商旅的驿站。从中世纪起，由于商品改变和政治动乱，使通商大道变迁，许多城市消失。气候条件也使丝绸之路改道。如公元四世纪左右塔里木河的改道，使楼兰地区变成了荒凉的沙漠，最后被人们所遗弃。据汉文史料记载，丝绸之路最古老的路线是南路。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四世纪，途经这条大道的商旅络绎不绝，人数最为众多。这条道路的中心是于阗，在公元头几个世纪中，这条大道非常繁华。稍后，由于政局变化，这条大路已变得不太安全。商旅们便选择了北路。玄奘赴印

度走的正是这条道路。文章还介绍了丝绸之路的几条具体路线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情况，以及在塔里木盆地等地考古发掘出的大量丝绸麻棉和羊毛织品。并指出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平原上的粟特国，原来是一个丝绸库存国和生产国，从上古时代到中世纪，这里都是东西方丝绸贸易的中转站，并在贵霜帝国统治时代得到了迅速发展。本文叙述简练，引用考古资料较多，对研究丝绸之路有一定参考价值。

115　关于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中亚史研究之现状　〔日〕森安孝夫著　陈俊谋摘译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

本文是一篇书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1979年匈牙利学者哈马塔主编的《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史史料导论》的介绍与评论；第二部分是对1978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收藏的敦煌）西藏语文献选集》第二卷的评论。这两本书都是有关中亚史的重要著作，其中涉及我国敦煌发现的许多文献和文书，对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在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中亚史研究的现状和《史料导论》编纂的目的及内容，并指出其不足之处。认为自公元六世纪以来在中亚最活跃的民族是突厥族，以他们的语言所写的文献种类繁多。但《史料导论》并未把这些内容全部包括进去，而且关于突厥民族及突厥文献连一个题目也没有，令人遗憾。另外，该书未提到蒙古语、亚美尼亚语、焉耆语和龟兹语，也是美中不足。接着，作者对本书内容中的中世纪伊朗语、阿拉伯语、中国语和西藏语等史料，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论。在第二部分，作者对《西藏语文献选集》编纂缘由和出版过程作了介绍。这本书是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几个藏学研究者，从伯希和搜集的敦煌藏语文献中精选出的特别重要的一些文献，附有解说作为影印集出版。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照片光彩夺目，清晰度很高。并认为这本书影印集的出版，是最近的一大快事，必将大大促进世界藏学的发展。作者还对该书的十八处作了评论和注释。其中包括用藏文、古突厥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以及回鹘文、梵文等所写的罗摩衍那史诗、占卜、医药、法律、公文、诏书、契约、书信、佛经等内容的文献。

116　阿拉伯和波斯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史料　（美）唐·丹·莱斯利著　陈海龙译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4期）

本文摘译自《远东历史》，主要记述了阿拉伯和波斯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史料。这对研究古"丝绸之路"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远在伊斯兰教时代以前很久，由于发展丝绸贸易，用拉丁文和希腊文书写的罗马史料和西亚史料就已提到远东国家"赛里斯"和"秦"。这些含混称呼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一世纪斯特拉波和维吉尔等人的作品中。直到耶苏会士本内迪克等人旅行到中国，才证实这两地都指中国。"秦"的称呼见于希腊文《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公元一世纪中叶）。三世纪的马尔丁努斯说秦国位于世界尽头。五世纪摩西的亚美尼亚文著作提到"秦尼斯坦"，也提到秦国。六世纪东方希腊人科斯马斯和印度人也称为"秦尼斯坦"。罗马人托勒密所提到的两个都会，将其拉丁文汉译，无疑是指洛阳和长安。七世纪初埃及希腊人西摩卡达的著作看来与后期阿拉伯人的记述关系更密切，而与

拉丁文和希腊文著作关系却更远。他们把中国称为桃花石，还说桃花石（洛阳？）和库布（姆）丹（长安）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建。九世纪及其以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论述就更可靠。最可靠的史料是商人苏莱曼于公元851年的著作，书中只提到广府港，伯希和与桑原认为就是广州。阿布扎依德916年前后所写续篇也提到库姆丹（疑即宫殿的译音），当为长安无疑。他所说的靠近吐蕃（《黄金牧地》说是一个大城市），一位皇帝曾来此避黄巢之乱，作者认为是指成都而言。943年的《黄金牧地》也提到中国的三个城市。其中所提Ansu（Anmwa或Anmu）是首都之意，大概是指雍州或安西(Anxi)，即长安。九世纪的重要史籍伊本·霍尔达德伯赫所著《郡国道里志》列举了濒海城市多处。唐代以后的三百年则只有一些宋代新资料，而且多是第二手材料。在阿拉伯和波斯的著作中，十二世纪伊德里西提到了以下城市：杭州、苏州、福州或泉州、开封或长安、广州，还有龙编，靠近河内。但作者认为伊德里西的地理知识颇成问题，他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他前人的知识而有歪曲，也可能把年代弄错，还可能前后抵牾。值得重视的是一部无名氏的波斯文著作《世界境域志》（约公元982—983年）。其中提到的大部分是陆路上的城市。如沙州、瓜州、甘州、肃州等。到蒙元时代就有更为丰富的材料。阿布尔菲达（约公元1321年）提到了行在、刺相、雍州、广府等城市。他还提到新罗（朝鲜）、瓜州和肃州。作者认为阿布尔菲达引用了比鲁尼和伊本·札依德的著作，无疑是把一些不同的时期的不同记载混在一起了。更重要更可信的是拉施特约在公元1310年用波斯文撰写的《史集》，他把中国分为十二个省。拉施特提到的大约二、三十个城市多不见于阿阿拉伯史料。波伊尔据中国史料列举城市等级依序有京、都、府、州、军、县、镇和村。在中国史稿本中，他列举了隋以前的六个国家及其疆域或首府。阿拉伯史料基本上有两个来源，早期史料(公元九世纪起)着重指出广府是贸易港，长安是中国首都。后期史料（蒙元时期起）则着重指出北京、杭州、泉州、广州的重要性。哈菲兹—依—阿布鲁约在1422年写了当时波斯使臣到中国的访问记。书中提到了肃州、甘州、汗八里、兰州（？）、真定府（？）、平阳（？）。中国的穆斯林史料主要出自十四世纪或以后，涉及唐代者不能盲从。阿拉伯和波斯史料所谓中国许多城市都有穆斯林团体的说法，只有元代及其以后的中国史料可以证实。

117 丝绸之路上两大国——伊朗和中国历史的比较　　赵俪生

（《西北史地》1986年第6期）

中国和伊朗是丝绸之路上的两个大国。本文对这两国之间在古代、中世纪的历史做了一些比较。认为它们之间有不少同步现象。伊朗版图为165万平方公里，中国为960万平方公里，中国比伊朗大六倍。伊朗人口有3,744万，中国有10亿，中国人口比伊朗多30倍。两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传统上有南北之分。伊朗传统上有东西之别。伊朗史上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形成于大流士王时代，约在公元前521年；中国则形成于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伊朗比中国早300年。其原因是中国殷周之时，周围没有比华夏文明更高的民族。伊朗的西方则有巴比伦、亚述、古埃及和古希腊。它们相互征伐，夹带着文化、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交流。故伊朗当时的历史发展比中国快些。伊朗历史上第一

个著名朝代是阿契门尼德王朝，居鲁士、刚比西士、大流士、泽尔士等名王辈出。其时正当中国春秋后期，恰与鲁国最后的襄、昭，定、哀四世相当，正是文化巨人孔子生活和活动的时候。到西汉，中国也出现了"名王辈出"的现象，有高、惠、文、景、武、昭、宣等皇帝。特别是汉武帝，给历史的震动与大流士相当。此后，伊朗被亚历山大征服，继之以塞留古的统治，接着是偏东的大夏国和偏西的帕提亚国，即中国史籍所谓的安息。安息王朝绵亘约四百年，时间略与西汉、东汉帝国相当。但安息已进入自然经济，而中国古典经济仍在氾滥。伊朗的萨珊王朝是影响最大的一个王朝，它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最积极，留下的历史痕迹最多。其时间约略相当于我国的魏晋、南北朝、隋。但在社会风貌上则是相当兴盛的封建社会，可与中国的盛唐时期形成对照。所以，作者认为要研究丝绸之路，重点应该放在伊朗的萨珊王朝和中国的隋、唐。因为两国在这一时期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是丝绸之路研究中性质最重要、内容最丰富的课题。文章还就宗教和商业、手工业两个问题，探讨了对伊朗和我国的影响。中国不出产宗教，但却出现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汉武帝独尊儒术，顶替了对宗教的需要。波斯出产宗教，与释迦牟尼同时，就出现门琐罗亚斯德。到公元三世纪，又出现了摩尼。以后摩尼教在回鹘人中很兴盛，又经回鹘人传入中国。唐太宗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夹带传来四面八方的文明，成为酿成盛唐文明的原因之一。在商业贸易方面。据中外钱币学者考证。我国已发现波斯银币1174枚，地点分布很广，还有较大量贮存的痕迹。这些情况足以证明两国间贸易之发达。据《太平广记》记载，在河北定县发现波斯银币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张明远的人，专门跟突厥人做生意，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由此联想到我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者认为丝绸之路上从西亚、中亚来的影响，自汉唐至元明，对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带来了一定的刺激，值得深入探索。

118　盛唐诗歌中之河西走廊及西域　　朱　偰

（《杂方东志》1944年第40卷第3期）

本文首先概述了唐代河西走廊及西域之地理位置，并论述了上述地区的重要性和唐代经营之功绩。本文第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岑参"河西诸诗"，"北庭诸诗"，"安西诸诗"及"军歌"。通过这些诗歌，可以看出唐代河西走廊之富绕，酒泉市场之繁华，天山南北之雄伟，沙漠戈壁之辽阔，以及前人开拓经营之艰辛。其军歌气势磅礴，音调铿锵，有铁马金戈之声，可想见唐代国威远被中亚之盛况。此诚唐代第一流杰作，

第二部分介绍了王维、高适、李白、杜甫、王昌龄、王之涣等人诗歌中，有关河西及西域之作。王维尝使至边，过居延，出诸塞；高适尝躬从军旅、随军远征诸塞；李白先世住居西域，白生于碎叶，曾亲历西域边关；杜甫未曾渡河而西，但秦中杂诗，颇有关于边塞之作；王昌龄"从军行"，实为边塞最佳之军歌；王之涣关于西域之诗虽不多，然"凉州词"一首，已足以传训千古。

以上这些人的作品，可以见到盛唐诗歌中之河西与西域。凡唐代河西边民生活，经济状况，唐代对河西与西域之建设，经营西域之宏规远略，大漠南北自然景象之壮观雄伟，以及历代在西域势力之消长，唐在西域国威之盛，均可见其大概。

119 公元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　　陈守忠

（《西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4期）

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动荡，唯独河西陇右，桑麻翳野，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安乐。各割据政权首领又较修明，兴学重才，中原学者纷纷西奔为之效力，多所建树，并为以后隋唐盛世造就了人才。自安史之乱后及至五代宋初的数百年间，河陇地区民族之争，无时少歇，战火绵延，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由于战火频繁，丝路之上贸易往还风险大增，丝绸贸易线遂由陆路转向以海运为主，曾盛极千百年的陆上丝绸贸易线为之衰落。近年对汉唐盛世、地处丝路要冲的河西历史，史家多所研究，对唐末五代大混战时期的河西历史，论者较少，作者有鉴于此，作了系统的研究，并从安史乱后吐蕃对河陇地区的的占领；吐蕃衰落及通过河西的民族大迁徙；河西三政权；凉州吐蕃、汉联合政权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较详的考证。

安史之乱，吐蕃乘机大举进攻，陇右尽失，且进逼京师。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仆固怀恩又反，勾结吐蕃、回纥，进攻奉天（今乾县），河西节度使杨志烈遣军进击，被仆固怀恩袭破，于是吐蕃乘机围凉州，杨志烈突围奔甘州，后被沙陀杀害。凉州陷没，其余诸州也相继沦失。时中原动荡，河西隔绝，史官记事多所失缺，给后人研究留下不少疑难。

在吐蕃占领河西及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掀起了民族大迁徙，通过河西走廊，南来北往，西去东归，影响既大且深。早在永嘉之乱后，吐谷浑辗转西迁，在青海草原建立起吐谷浑国；后吐蕃兴起，被逼东迁，唐安置于安乐州（今吴忠、环县等地）。其族大部迁徙后，仍有不少散居河西走廊，依祁连山游牧，吐蕃不断征集其充军入寇。现今的土族，即其后裔。党项族原为我国古老羌族的一支，原居地在今白龙江流域，吐蕃兴起后，被迫东迁，其中以拓拔氏为首的部族迁至庆州（今庆阳地区）、夏州（榆林）一带，成为后来建立西夏的主体民族；另一部分留居河西，后来李继迁攻取凉州时成为内应。至于吐蕃，是随吐蕃奴隶主贵族向唐境开展掠夺战争而迁徙。及至吐蕃王国崩溃，散居各地的无复统摄，逐渐于当地民族融合。作者还将五代分裂至宋初，蕃汉杂居共处，其居地、族名可考者予以列举。这些部族于宋以后和当地汉族融合，但地名相沿，至今不改，这些吐蕃地名，成为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

吐蕃奴隶主贵族向唐境发动掠夺战争，给双方的民众均带来深重灾难，不断引起反抗，及吐蕃衰落，中原不久亦陷于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各割据政权纷纷自立。自宣宗大中二年（884年）沙州张议潮起义，河西先后出现了三个独立性的地方政权。即：瓜州归义军、甘州回鹘、凉州蕃、汉联合政权。作者对这些政权的历史沿革、统辖地域、民族成份、民族关系，以及现今个别民族的继承关系，都一一详为考订，并据大量的史料，补证了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地区历史记载之缺失和不足，同时为继续研究这一时期的河西历史及民族演变等问题，提供了较系统详实的材料。

120 西夏时期河西历史概述　　　〔日〕中岛敏著　王　钺　汤开建译

（《甘肃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

本文概述了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历史。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对西夏国的兴亡和河西地区的形势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西夏是公元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前期的二百年间，在中国西北地区兴起的一个王国，其疆域东到鄂尔多斯，西到河西走廊，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国王是属于藏系民族的党项拓跋氏。党项族原居四川西部及西藏东部一带的山区。七世纪初，为摆脱吐蕃侵逼，经青海、甘肃东部，迁移到陕西北部的鄂尔多斯，以夏州和庆州（今甘肃庆阳）为据点。公元874年王仙芝、黄巢起义反唐，攻占长安。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因率军助唐平乱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国公、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从此，拓跋李氏的势力便在陕北地区发展起来。至五代时期，统治了以夏州为中心的地区。北宋建立后，次第扫平地方政权，夏州亦并入北宋版图。第九任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携族人留居宋朝京城。其族弟李继迁与同党数十人逃奔夏州东北地方斤泽，结集党项族人与宋朝争战，势力逐渐扩大，尽占昔日定难军之地。宋真宗时，对李继迁实行招抚政策，任命其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赵。李继迁遂将主攻方向转向河西走廊。当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县）为中原通往河西的门户，是丝绸之路交通和贸易的要冲，成为宋夏两国必争之地。经过反复争夺，李继迁在公元1002年（咸平五年）攻占灵州、打开了向河西扩张的大门。1004年（景德元年），李继迁在攻陷凉州后中矢身亡，其子德明继位。1006年（景德三年），宋夏订立和平协定，宋朝封德明为西平王。委以定难军节度使。当时凉州为吐蕃所统治，甘州、肃州为回鹘所统治，沙州瓜州为归义军节度使曹氏所统治。李德明通过与吐蕃、回鹘的反复争夺，历时三十年，终于全部占领了河西走廊。德明死，其子元昊袭位，改首都兴州为兴庆府，改革内政，加强国防，创立西夏文字，发展文化。1038年10月自称皇帝，宣告独立。宋夏经过激烈战争，于1044年12月议和，元昊对宋称臣，宋封元昊为西夏主，每年赐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元昊表面上对宋称臣，在国内仍保持皇帝称号。它同宋辽保持友好关系，坐收丝绸之路贸易转运之利。女真族兴起，建立大金国而取代辽，西夏转对金称臣。十三世纪初，蒙古铁木真部兴起。1226年，成吉思汗军队攻占河西，又攻西夏都城中兴府（即兴庆府），西夏遂亡。文章还论述了西夏占领河西后，丝绸之路和沙州贸易的情况，以及西域于阗、龟兹、高昌等国取道柴达木盆地，沿湟水东行，到达北宋边境城市秦州的路线。

121 前凉年号新考辨　　　侯　灿

（《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2期）

作者鉴于目前通行的中国历史年表（大致可分为三种），对于前凉年号的编排各自不同，究其原因，在于所根据的史料不同。因而进行了新考辨。

经查考，197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系据宋人龚颖撰《运历图》编排的，而《运历图》早在南宋时，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就说，“不知颖何所据而言”，

而今天，《年代简表》所编前凉年号仍沿用其说，只不过是继清代一些人的陈说而已。198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则是根据出土文物和《晋书》的记载。《纪年表》据西北所出前凉简牍和其它纪年文物的记载补正古史，证实《晋书》的记载与纪年文物的记载相符，而与《运历图》的记载迥异。这就充分证明前凉时期并没有实行如《运行图》所载的那些年号。

前凉原是西晋管辖下的凉州（包括当时的楼兰和高昌），当西晋灭亡后，张实、张茂、张骏、张重华，以致于张玄靓都奉西晋愍帝建兴年号，至张天锡时才改奉东晋穆帝升平年号。至于1957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历史纪年》，一面将《运历图》所载年号标出，另一面又将《晋书》等史籍记载用括号“（　）”注明，这种标注正是编者不能确定的表现。

解惑释疑，考明前凉各王的建元改元年号，不仅有助于中国历史年表的统一编排，且对研究“丝绸之路”上的西凉史也有一定意义。

122　秃发南凉始末　　赵向群

（《西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1期）

本文根据史籍记载，论述了秃发部的起源及建立南凉政权的经过。秃发与建立北魏的拓跋本为鲜卑的同一氏族。拓跋部发源于大兴安岭地区，后迁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湖一带。在诘汾任部落酋长时，又向西南迁到蒙古沙漠以南。东汉末年，秃发部渐从拓跋部中游离出来。在诘汾的儿子力微晚年，西部鲜卑与中部鲜卑争夺河套一带的肥沃牧场，拓跋各部被击散。力微投靠没鹿迴部，居留长川一带（今内蒙古兴和县境）。力微的长兄匹孤则率部南下，散居在今甘肃、宁夏、青海的广大地区。匹孤死，子寿阗继为部落首领，遂有秃发这一姓氏。这可能是匹孤率部南下时，中途汇合了其他断发的部族，因而被魏晋人称为“秃发”。到西晋初年，秃发部已成二十余部、二十余万人口的强大部落联盟。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为防范鲜卑侵扰，晋朝派重兵攻击金城以南的秃发部。寿阗的孙子树机能率部奋勇抵抗，在凉州大地与晋军交战三十余年，双方互有胜负。直到西晋永兴二年（公元304年）才被凉州刺史张轨所镇压。张轨建立前凉，祖孙坐镇河西76年，秃发部处于长期的沉寂。公元376年，前凉被前秦所灭，此时树机能的二世孙思复鞬为部落首领，秃发鲜卑再度崛起于河西。到思复鞬之子乌孤担任部落首领时，正值前秦被东晋打败，中原重陷于分裂，氐人吕光在姑臧建立后凉。乌孤致力于务农积谷、秣马厉兵，扩充地盘，于公元397年在西平（今青海西宁）建立南凉政权。当时人才济济，河西诸名士充当幕宾，延揽中原冠冕为之参议军政。399年建都于乐都。当年八月，乌孤因酒醉骑马摔死，由其弟利鹿孤继位，迁国都于西平。402年，利鹿孤死，由其弟傉檀继立，又迁都乐都。此时羌族姚氏在关中建立的后秦强大起来，先降服西秦，又灭掉后凉。傉檀惧后秦兵威，对秦称臣，被后秦委任为凉州刺史，驻防凉州。至406年年底，傉檀将国都迁到姑臧，割据了半条河西走廊。这时匈奴夏国赫连勃勃崛起于朔方，407年9月南下打败傉檀。410年，傉檀出兵进攻北凉，被北凉沮渠蒙逊全部消灭。傉檀逃到乐都。414年，乐都被西秦占领，傉檀投降西秦，不久即被西秦主乞伏炽

磐药杀，南凉国亡。从秃发乌孤太初元年（397年）到秃发褥檀弘昌七年（414年），南凉政权共存在17年。本文对秃发部的兴起、战争、建国、衰亡的过程论述甚详，对了解十六国时期丝绸之路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23　沮渠北凉略论　　　林　干

（《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

十六国时期，我国割据政权林立，战乱频繁，各民族的变迁兴衰十分剧烈。建立于今张掖的北凉政权即其中一个。本文根据《晋书》、《魏书》、《宋书》、《隋书》等史籍的有关记载，全面论述了沮渠蒙逊建立北凉政权的过程及其灭亡。北凉自公元401年（东晋隆安五年）建国，到公元460年（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宋孝武帝大明四年），柔然攻高昌，杀蒙逊之子沮渠安周止，前后凡六十年。当其全盛时期，曾消灭西边的西凉和东边的后凉，统治了河西走廊、青海西北部及新疆东部一带，成为扼居丝绸之路要道的主要力量。本文对沮渠蒙逊的兴起及北凉政权的建立、与邻国的斗争、北凉政权的衰败及其向西域迁移、北凉的著名人物和文化对北魏的影响等问题，均引用史籍记载，论述具体而周详。研究北凉的兴衰，对了解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情况和当时丝绸之路均有重要意义。

124　西域见闻琐记　　　向　达

（《文物》1962年第7、8期）

本文为作者1951年新疆之行的札记。札记之一是对耿恭台与疏勒城的考证。南疆喀什市的疏附城东北隅有一座耿恭台。既名耿恭台，应为纪念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耿恭守疏勒城拒匈奴之事。耿恭坚守疏勒的故事见于《后汉书》卷四十九《耿恭传》。但《后汉书》卷七十七《班超传》也有班超守疏勒事。班超和耿恭，同时都守过疏勒。然而根据两者的传记所载，班超之守疏勒是为拒龟兹、姑墨，而耿恭之守疏勒是为拒匈奴。显然二人所守的疏勒，乃是同名异地：一在天山以北，一在葱岭之东。耿恭所守的疏勒城，在天山以北今吉木萨尔附近；班超所守的疏勒城，在天山以南葱岭东面今喀什市境内。耿恭没有到过今喀什市境内。疏附的耿恭台出于后人好事者的附会。札记之二是面衣别解。近年吐鲁番墓葬中发现死者以布复面，自治区博物馆和武伯伦先生都定为面衣。但是唐代生人也用面衣，两者均未提及。作者举《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法师到高昌后，高昌王鞠文泰为法师打发盘缠，除金银绫绢外，又说："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为例，说明这里的面衣，虽和死人复面所用名称相同，但此为生人用以御严寒者，其质料、形式，当与死人复面之布大有不同。西域地方备冬季旅行用的保护手、足、头面之具，如手衣、面衣之类，应该渊源甚古，惜别无可考。札记之三是对龟兹国之东西昭怙厘的考证。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一称龟兹为屈支国。书中还提到两座有名的伽蓝，"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明昭怙厘，而东面随称……"。这里的东西昭怙厘，即为《梁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中的雀梨大寺，也即《水经注》卷二所引道安《西域记》中的雀离大寺。雀梨、雀离、昭怙厘，只是同

名异译。作者认为玄奘所记的东西昭怙厘的遗址在今库车西南，书上称为渭干河的河口，今名库木吐剌的地方。关于这一遗址的比定，首先得确定古龟兹都城所在。作者疑拟汉唐间古龟兹都城，即为《西域记》所说的荒城。其遗址可能在今日库车以南的新和。札记之四是热海道小考。玄奘法师自高昌出发西行，经过今焉耆、库车……，逾越唐名凌山今称木苏尔岭的天山隘口。自此山行四百余里，过大清池，一名热海。这就是现今属苏联中亚细亚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伊塞克库尔湖。通过伊塞克库尔湖的这一条路，是古代中西交通最有名、最频繁的一条大道，今姑称之谓热海道。自汉至元，中西交通大事，大都发生在此路。走热海道的另一问题，就是取道湖北或湖南的问题。玄奘法师逾越凌山，取道热海北面。英人华特斯把玄奘西行路线画在热海南面是不正确的。札记之五是河西新疆诸石窟寺所留帝国主义文化强盗的题名问题。作者列举近几十年来帝国主义文化强盗对精美壁画的破坏事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尤其是帝国主义文化强盗及其帮凶，在盗窃文物，剥离壁画之后，还到处留名，表示得意。殊不知这正是二十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文化强盗在新疆进行文化掠夺的一本题名录和自供状，值得保存，并有教育意义。

125 新疆 何观洲

（《新亚细亚》1932年第4卷第3期）

本文共分十部分，即：新疆即古西域；西域与中国交涉史略；汉时出西域之四道；各道所经诸国略志；《文献通考》所记往西域之三道；西域风俗政治物产之一斑；地方沿革表；清代新疆之屯田及历代屯政考；人口——清及西汉人口大概；附录西北人口及移兵预算表。通过上述十部分，可系统了解新疆上自西汉下迄有清一代之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风物习俗等方面的概貌。尤其对西域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引证史料较多，条理清晰。对西域之交通，记述明确，考证周详，对汉代的南北两道，以及对南道以南和北道以北之辟径，都作了考证。而且对沿线古代诸国，即南道五国及南道以南的四周，北道十二国及北道以北的三国，从其名称的演变，方位之所在，城郭之大小，人口之密度，以及宗教信仰等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另外，对在丝绸之路史上有过重大贡献而著名的楼兰、龟兹、轮台、于阗、疏勒等十一个城市，据《皇舆西域图志》列表其自汉至今名称的变化，记述甚为周详。本文实为研究新疆史地可资参考的一篇重要材料。

126 西域、新疆与新疆省 齐清顺

（《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

本文考证了西域、新疆名称的来源、范围以及新疆省的建立。中外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广大地区在我国历史上长期被称为“西域”。西汉时期这一名称已被广泛运用。它所指的范围，有狭意和广意两种。其狭意范围，基本就是现在的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敦煌以西、帕米尔以东的南疆地区。其广意范围，则包括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及中亚地区，直到黑海附近。清朝在平定准噶尔及其大小和卓叛乱以前，仍然用“西域”一名来称呼今新疆及其

以西地区，有时把青海和西藏也包括在内。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清朝政府对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的平定以及统一天山南北两路战争的结束，清政府直接统治了今新疆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这时“新疆”一词在清朝官方文书中开始出现，意思是“新辟疆圉”或“新辟疆土”的简略，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名，与此同时，清政府在我国的贵州、云南、四川一些地区也曾在相当长时间内使用同一含义的“新疆”一词。随着清朝在今新疆及其周围地区统治的巩固和历史的发展，“新疆”二字逐渐变成固定地名。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龚自珍第一个发出在今新疆建省的呼声。稍后，朱逢甲也建议设省。他们建议的省名是“准回省”和“西域省”。清光绪初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左宗棠、刘锦棠等带领中国军民进兵新疆，从沙俄手中收复了伊犁，当时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明确提出建立“新疆省”。清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清廷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驻扎乌鲁木齐，标志着新疆省的建立。从此，新疆作为固定地名，正式成为我国各省中的一个。

127 我国历史上的帕米尔　　　　黄盛璋

（《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1期）

帕米尔位于我国西部，地处亚州中心地带，古代就是东西陆路交通要道，丝绸之路就通过这里。中国人最早发现帕米尔，最早记载帕米尔，中国政府最早对帕米尔进行管辖。汉代西域都护的三十六国明确包括葱岭中的国家。唐在葱岭设官置守，清朝属新疆统一管辖。只是到十九世纪末，才为沙俄武装侵占。现在地图上的这段未定线，即沙俄武装入侵以后的军事线，企图强迫清廷接受，遭拒绝，而成悬案。

作者在地理特征部分指出，东帕米尔的塔什库尔干，很早就建有城邑，是西域最早经营农业的地区之一；帕米尔东缘的喀什噶尔，也是西域丰饶之区。这两处历来就是我国西域的政治、经济中心。它和我国其他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历史非常久远。

中国最早记载帕米尔的史料，如《汉书·西域传》，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等，都是古代研究帕米尔及其周围国家的重要著作。而中国对帕米尔的管辖，早在西汉就在西域设官置吏，行使主权。清朝于1759、1790年完成的《皇朝内府舆图》、1783年纂修的《钦定西域图志》、《一统志》等书都明确记载，帕米尔分别为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属境。

本文最后两部分还详细记述了沙俄对我国帕米尔的侵略经过，以及地图上帕米尔未定界和待议地区的来历。十九世纪后期，俄、英帝国主义分别从南、北入侵，帕米尔地区就成为他们争夺的焦点，而沙俄用武力侵占了帕米尔大片土地后，又伙同英国私分我国帕米尔地区。对此，清政府始终表示“中国决不能认”，并曾正式向俄、英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以后历届中国政府，都未予以承认。

了解帕米尔历史的真相，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128 《汉书·西域传》的研究

——以呼尔斯威和岑仲勉两人最近成果为中心(节译)

〔日〕榎一雄著　袁　林译

(《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本文论述了中外学者研究《汉书·西域传》的情况和成果，特别是对拉丁大学名誉教授呼尔斯威和中国学者岑仲勉的研究成果作了评论。西域起初称为西北国或西国。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时，才把“西域”作为公用名而确定下来。班彪、班固等编纂《汉书》时设立《西域传》，开创了正史中立《西域传》的通例。《汉书》中有不少难以解释的部分，班昭为此作过讲解。到东汉、三国时，有一些学者加以注释，这些注释由西晋的晋灼和臣瓒先后汇集成《汉书集注》和《汉书集解音义》。东晋蔡谟把臣瓒的注全部分散注入《汉书》正文中。颜师古又合并了以上各注，并增补了各家和他本人的注释，成为《汉书注》。清末王先谦又汇集了颜师古注和以后各家之注而成为《汉书补注》。《汉书注》和《汉书补注》有关《西域传》的部分，汇总了各家关于此传的注释，是研究《汉书·西域传》的重要著作。专门研究《汉书·西域传》的著作，有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和丁谦的《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第一卷，也是研究《汉书·西域传》最主要的资料之一。欧洲学者也对《汉书·西域传》作过译注。最早是俄国的比丘林。从1827年至1851年，他写了七十种著作和论文，被誉为“俄罗斯中国学之父”。继比丘林之后，英国人亚历山大·瓦利翻译了《汉书》、《后汉书》的几篇外国传。其后陈兰达的德·格洛特用德文翻译了《汉书·匈奴传》，译注了《汉书·西域传》，到1979年，呼尔斯威集以往研究之大成，在汉史专家罗威的帮助下，译注了《汉书·西域传》，题为《中国在中亚，早期阶段：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汉书〉卷六一、卷九六译注》。在这部著作中，呼尔斯威认为：《史记》原有大宛传已佚，现行的《史记·大宛传》，一字不改地抄自《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并认为这两部书中有关征伐大宛的记载中许多地方文字错乱。本文作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是分割《史记·大宛传》而产生的。《大宛传》被分为三部分，分别移录进《张骞传》、《李广利传》和《西域传》之中，并提出四条论据。与呼尔斯威的著作几乎同时出版的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表现了作者研究西域史的热情和功力。本文作者认为这两部书的共同缺点是没有充分注意到对《汉书·西域传》正文的研究。并认为现有的《汉书》经历漫长岁月，有不少佚失，其中有些部分能够予以补证，应在可能范围内加以补正。本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外学者研究《西域传》的成果，为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目。

129 拘弥国考

〔日〕长泽和俊著　李步嘉译

(《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

拘弥国是古代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个重要国家。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此国共

有人口二万零四十人，比于阗、莎车、鄯善等国的人口都多，以后被沙漠埋没。本文根据史书记载，考证了拘弥国的位置和关于城市被沙埋没的传说。经过认真测算、考证，认为拘弥国西距于阗三百九十里，东距精绝七百里。拘弥城与捍𡡉、扜弥为同一地点、即达德力城，但与唐代的媲摩、坎城并非一地。《宋云行记》中所记之捍𡡉城，所以被看作媲摩城，是因为捍𡡉城南大寺里的金佛像与《大唐西域记》中所记媲摩城的雕檀立佛像极为相似造成的。公元前二世纪左右，拘弥国还是丝绸之路南道上最大的国家，但到公元175年前后，却变成人口只有一千余人的小国，成为于阗国的属国。但因它是沙漠中的绿洲，故其存在一直延续到遥远的后代。在丝绸之路南道附近，到处都流行着一个传说，即由于向罗汉或圣人撒沙子，结果造成沙子从天而降埋没了城市。如《大唐西域记》、三世纪在于阗附近编纂的《大方等大集经》和《太平御览》等文献中，都有类似的记载。这都是城市被沙漠所埋没的故事的流传。这些传说的根据，渊源于印度。因为在公元二、三世纪之交成书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夸耶》卷四中，记载了与上述各书相同的传说。从这些传说可知，沙埋城市的传说，是以共同的故事内容及城市名称不断向东流传的。因这些传说记载在佛典上，故应是在西域南道各地佛教流行之后形成的，它的最初模样当更为久远。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和田地区曾使用过与楼兰语极为接近的印度俗语，文字也是佉卢文。这说明在公元二、三世纪时，从健陀罗到和田以至楼兰，都普遍地使用过印度俗语，因而使传说可以极为顺畅地流播，使印度的故事，在漫长的岁月里传入了西域地区。

130　于阗国考　　　〔日〕堀谦德著　纪　彬译

（《禹贡半月刊》1935年第4卷第1、4期）

本文共分十九部分，系作者所著《解说西域记》中的一节，自该书中译出，并改名为《于阗国考》。作者《解说西域记》一书，采取分割解说法，即将唐玄奘《西游记》原文割裂，而逐段加以解释考证，故每段含有本文、解释、考证三组。考证为著者精华之所在，但在翻译过程中，鉴于“解释”（即解释本文）一组，对我国读者，殊为累赘，故予删去。于阗即《西游记》中之瞿萨旦那国，在西域诸国中与中国本土关系最为密切。其地当中西交通之孔道。这里吸收印度、伊兰、中国三种不同文化，咀嚼融合，而形成一种新文化，并成为西域文化中心，中西文化沟通之关卡。佛教一经传入于阗，形成向外发展之总枢纽，由此而普及西域诸地，更传入中国本土和东方各国。因于阗在中西交通上所处地位之重要，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故中西学者，专门研究于阗的著作较多，本文即其一。本文篇幅较长，但重点应为1.国号，2.国势概况，3.中国史上之于阗，4.佛教之东来，5.佛教史上之于阗，6.波伽夷城，7.媲摩城，8.尼壤城，9.覩货逻城及折摩驮那之旧地，10.纳缚波。以上都关系到古代于阗的史地、于阗之佛教、于阗与中国本土之关系，其中6—10段，均系玄奘东返时所经之城地，这些城镇，有的已为沙漠湮没，有的已成荒墟，有的早已迁徙，但这些地方却为古代东西方商旅必经之地，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今虽湮没荒废，但对“丝绸之路”研究者来说，则为应注意之问题。

131　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　　　张广达　荣新江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本文分四节介绍了和田和敦煌发现的一些有关于阗国史的于阗文、汉文、藏文献和文物材料。为研究于阗史较系统地提供了正史以外的研究资料线索。目前研究于阗史的资料多集中在唐代到宋初的中古于阗王国阶段。这些史料大致可分为文献、文物两类：文献方面有于阗文文献。早期于阗语字体规范，语法严谨，年代为四至六世纪，大部分抄写的是佛教经典，多出土于和田附近。晚期字体潦草，年代为七至十世纪，保存数量较多，而且在和田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都发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世俗文书。对于这种灭绝千年而重新出土的文字材料，经霍恩雷、洛伊曼、斯坦·柯诺夫、贝利等学者八十多年的艰辛努力，已经解读出来。这是研究于阗史的最直接史料，可为学术界所利用。其次是汉文文献。和田发现的汉语文书，大多被斯文赫定和斯坦因拿走，藏在斯得哥尔摩和伦敦。从文书纪年看，大多是于阗陷蕃以前之物，其内容有告身、牒状、寺院的入破历、契约和古籍抄本等。这批文书多成残片，但其中也有可以说明问题的材料。敦煌藏经洞有关于阗的文书保存较好，其中有佛经，也有世俗文书。世俗文书大多是归义军，特别是曹氏掌握政权时双方来往的牒状、公凭、愿文等，当时两个政权在经济文化上密切往来，这也反映了"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的一个侧面。这些汉文材料，一则补充、订正了原有正史和其它文献材料；另则也是解开于阗文和藏文有关史料疑难的钥匙。第三是藏文文献。七世纪初兴起的吐蕃王国长期与唐朝争夺包括于阗在内的安西四镇，因而吐蕃文献也记载了于阗史之一些重大事件。终唐之世，吐蕃至少两度占领于阗地区，并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这里所遗留下来的藏文文献，不仅是研究于阗佛教史的基本文献，也是研究于阗历史地理、语言文字所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此外，在敦煌文献中，我们还可找到公元十世纪于阗、沙州、甘州三个地方政权之间来往所写的藏文书信。在文物方面，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的挖宝者、探险家、考古工作者、旅行家到和田收集、发掘了许多珍贵的古代文物和文献。文物中如雕像、壁画、木板画、陶器、木器、钱币等为研究于阗经济、文化提供了实物。此外，唐末、宋初敦煌的沙州归义军政权与于阗尉迟氏（即李氏）王朝保持着密切来往和姻亲关系，莫高窟的壁画中也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反映于阗史的形象材料。

132　藏文文献中的若干古于阗史料　　　巴桑旺堆

（《敦煌学辑刊》　1985年第1期）

唐代吐蕃统治于阗时期，吐蕃和于阗精通藏文的佛学翻译家，将有关于阗的佛教、历史资料译成藏文，介绍到吐蕃本土，传至今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古于阗的重要史料。本文介绍了一些重要文献，包括：1.藏文《大藏经》中关于于阗的著作。其中，《甘珠尔》部中有《无垢光经》、《月藏经》、《日藏经》、《牛角山授记》、《丹珠尔》部中有《于阗阿罗汉授记》、《僧伽伐禅那授记》、《善友传》、《于阗授记》；2.于阗和敦煌所出藏文卷子，其中有现藏巴黎图书馆的《于阗佛法史》、和田出土的藏文

木简和敦煌其他一些著名的藏文卷子，如《吐蕃大事记年》等；3.吐蕃以后历代藏族历史学家所撰于阗史籍，如《汉藏文集》中的《于阗佛法史》等。

作者根据上述藏文文献，还对古于阗国的形成、于阗国名"李域"和于阗王世系、姓氏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对进一步研究古代于阗有一定参考价值。

133 车师后部史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孟凡人

（《文史》1982年第16辑）

车师后部位于新疆博格达山以北，在历史上特别是汉魏时期曾起过重要作用。本文根据《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三国志》等史书有关记载，初步探讨了车师后部历史中的一些问题，对后部建立的背景和时间、后部的辖境和城镇、后部王世系和职官、后部的经济概况、后部与两汉中央政府的关系、后部的消亡等问题，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证。西汉时，车师地接匈奴，当丝绸之路孔道，汉武帝以前一直附属于匈奴。汉武帝欲联合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车师即成为双方必争之地。故在汉占领车师后，因有博格达山阻隔，交通不便，遂于神爵二年将车师分为前后二部。后部的辖境：东临蒲类海，西至玛纳斯，南隔博格达山与前部相接，北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关于车师后部的城镇，据史书记载，有金满、后部候、且固、疏勒、于赖、务涂谷等，作者对这些城镇的方位均作了详细考证。唐代文献记载多视务涂谷与金满城为一地。经作者考证，认为二者应为两地：务涂谷可能在吉木萨尔县城南约15里的千佛洞一带；金满城位于吉木萨尔县城北20余里的护堡子。且固城、后部候城与金满城同为一城。关于疏勒城的地址，有些学者认为是奇台县城南110里天山北坡麻沟梁上的石城子，经作者实地考查，在今泉子街以南与头道桥之间，有一古城遗址，可能是疏勒城所在地。曹魏时期的于赖城即为汉时的金满城。至于后部王的世系，经作者考诸史籍，记有名字和事迹者，西汉有姑句、须置离，东汉有安得、涿鞮、农奇、军就、加特奴、阿罗多、卑君、曹魏时期有壹多杂。车师后部的经济以游牧为主，农耕为辅。在东汉时期，经济有较大发展，人口及牲畜均有大幅度增长。后部与两汉的关系，总的来说，它隶属于两汉中央政府。但当汉朝力量消弱、政策不当、或匈奴在西域势力抬头时，后部往往叛汉投降匈奴。这种现象在两汉时期曾反复出现。作者围绕汉朝在西域设立的戊已校尉的兴废，将后部与两汉中央政府的关系及其具体表现，分为六个阶段和九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至于车师后部的消亡，作者认为可能在曹魏正元三年前后到晋咸宁元年之间，为鲜卑所灭。

134 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　　吴　震

（《文物》1983年第1期）

东晋十六国时期，今西北地区，特别是河西一带各封建势力互争雄长，政权更迭频繁，年号使用纷乱，历史学家困惑难解。本文仅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十六国时期的年号进行了探讨，考证了这些文书流行于高昌的原因，对一些有关的历史问题提出了初步看法。作者首先论述了高昌设郡之沿革，从西汉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到晋咸和元年

（公元326年），高昌为戊已校尉屯戍之所。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前凉张骏于此置高昌郡，先后延续使用西晋建兴年号和东晋升平年号，这说明前凉始终领有高昌。苻坚于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年）八月灭前凉，以梁熙为凉州刺史，镇姑臧，以高昌杨干为高昌太守，高昌郡属凉州。吐鲁蕃出土有建元文书。建元二十一年八月，姚苌缢坚，苻丕继位，改元太安。后凉吕光继前秦统治凉州，使其子吕覆镇守高昌。据出土文书考证，史载吕光龙飞年号似为龙兴之误。黄文弼先生1928年曾于吐鲁番获白雀元年九月“随葬衣物疏”一件，认为是姚苌白雀年间北地难民或商人携来。作者分析了苻坚淝水之战失败后，凉州刺史梁熙的政治态度，认为白雀是姚苌年号，衣物疏并非来自外地，而是吐鲁番出土之物。作者又论述了北凉段业和西凉李暠相互递代领有高昌。北凉年号有神玺和天玺，西凉年号为庚子、建初和嘉兴，出土文书中均有这些年号。后沮渠蒙逊灭西凉，任隗仁为高昌太守。作者认为，隗仁曾在玄始四年（415年）被西秦乞伏炽磐所执，被拘留五年。其时高昌仍属西凉。故隗仁为高昌太守当在西凉亡后的玄始十年(421年)。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没有再见玄始十三年以后的年号，却出现相当于玄始十三、十四年的夏真兴六、七年的文书共六件。真兴是夏赫连勃勃的年号。经作者考证，推断为是当时北凉臣服于夏的标志，可补史书记载之阙漏。作者对出土文书中出现的“绿禾”、“建平”年号进行了考证，认为“绿禾”为北魏“延和”年号之改写。因北凉虽自建年号，但依附于夏时则使用真兴、承阳年号。其后北凉附魏，与魏通婚、受魏封号，因此受北魏年号是十分可能的。“建平”年号使用者甚多，但在时间、地点上却无一相当。故只能就文书本身加以分析。认为可能是沮渠牧犍于承平五年改元建平，而史书失记。这个年号起自公元437年，止于442年，共六年。对文书中发现的建初、承平及义熙年号，作者也根据史书记载及文书所记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建初为高昌阚首归的最后一个年号，其元年为489年，到491年，首归即为高车王所杀，立张孟明为王。建初年号共有三年。公元496年，张孟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其后国人杀马儒，立其长史鞠嘉为王。鞠嘉在位24年卒。“承平”、“义熙”两个年号正是鞠嘉在位时先后所立。本文论述清晰、考证缜密，为了解丝绸之路的重镇高昌的历史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135　突厥初世史探幽　　　薛宗正

（《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

本文是作者《古突厥汗国史稿》一书的第二章。该书尚在编写，故将本文先期发表，以飨读者。

自公元460年阿史那氏从高昌北徙，至他钵可汗死后，东西突厥分裂，对这段历史称之为突厥初世。作者从柔然、高车的盛衰消长与阿史那氏亡徙高昌北山；从阿贤设定居金山到伊利可汗建国；从乙息记可汗到木杆盛世；突厥的社会制度到国家组织；突厥汗国与我国北朝政局五个方面，对突厥的初世史进行了探讨。

柔然，一作茹茹，又作芮芮，蠕蠕、东胡之苗裔也。原居鄂尔浑河及独乐水流域，公元五世纪初渐强，并代取以前匈奴、鲜卑地位，称霸漠北，魏主数次讨伐，终未能制服。公元460年，柔然灭沮渠高昌政权后，迫使臣属沮渠氏的阿史那氏北徙高昌北山（即

我国史籍上之贪汗山）。阿史那氏其远祖本出西海塞种，东迁漠北而为汉魏之呼揭、呼得，国亡而成匈奴之赀虏，南奔而为晋末乱世之杂胡。其近祖即臣于北凉沮渠之平凉杂胡。阿史那氏在高昌徙北山后，亡匿不出，经数世始徙金山，因其地界铁勒（即Dil）无异陷身铁勒族的汪洋大海之中，致使原出西海塞种的阿史那氏全盘铁勒化了，并与周围铁勒部结合起来，很快演变为一个新兴的大民族。这一新兴民族，实即铁勒化的阿史那氏，同采用“tükr”共名的铁勒部结合起来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经过了几个世纪才形成。突厥族的构成，曾吸收了高车、铁勒及其各个部落。所谓突厥，几乎是改头换面的高车、铁勒部落。从阿贤设徙金山，经大叶护统帅到伊利可汗，可谓突厥初世的三主，阿贤设定居金山，是突厥有史时代的开端。突厥汗国的建立标志着突厥历史的新纪元，仅历三主，即伊利、乙息记及木杆可汗，就已取代柔然、哌哒两大霸主的地位，成为漠北民族最高统治者。击灭柔然，统一漠北，东破契丹，北服结骨（汉之坚昆，唐之黠戛斯），西破哌哒，葱岭东西诸国，莫不归附。其版图东邻高昌，西极西海，南界大漠。俨然赫赫大国，并与中原抗衡。

突厥汗国继承和发展了古匈奴、柔然等漠北古国行政建置中若干精华，形成了一种融贯东西的崭新骑马民族文化。畜牧业是全部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其国家组织乃是建筑在阿史那氏同异性突厥身份不平等基础上，阿史那氏的优越地位体现在国家的各级组织中。对于阿史那氏而言，它是分权制的国家，对于异姓突厥而言，它又是集权制的国家，这种分权与集权制的矛盾统一构成突厥国家别开生面的特点。

突厥汗国与我国的北朝政局，作者重点考察了木杆和他钵两可汗在位时突厥政治立场的变化。木杆可汗国力强盛，逐渐向西向南发展，介入我国北朝的政治斗争：一是联周伐吐谷浑 二是联周攻齐；三是周、齐争迎突厥和亲公主事件。木杆可汗在位二十年，公元572年逝世，其弟他钵可汗继位，此人雄才大略，当其在位时（572—581年），国势强盛，“控弦四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两国陷入突厥儿皇帝地位。嗣后他钵由袒齐疏周，转为反周，后坚持周、齐并存，并从中渔利的政策。581年他钵辞世之时，正是隋代周之年，东亚大陆进入复趋统一的崭新时代。

136 突厥研究史概述 〔德〕K·H·孟格斯著 李坚尚译

（《民族译丛》1981年第5期）

本文综述了从公元十五世纪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五百多年来，国际上突厥学的建立和研究的情况。突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民族，突厥学是一门崭新的多学科的学问。文章从十五世纪席勒特贝尔格所著《突厥人的风俗》一书开始，相继介绍了英、法、德、意、俄、芬兰等国学者研究突厥人的历史、国家、军队和语言等方面的著作和出版时间。并特别指出德尼所著、于1921年在巴黎出版的《突厥语语法（奥斯曼方言）》，是一部唯一的、最好的和最完备的突厥语语法。文章又介绍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各国考古队在中亚地区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等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察和发掘。发掘的文物有17种语言和24种文字的文献。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突厥语的，多半是回鹘文献，少数是鄂尔浑鲁尼文文献。大约与此同时，考察队在叶尼塞河上游和鄂尔浑

发现了突厥鲁尼碑铭。鄂尔浑碑文还包括有汉文。由于中亚地区考古发掘的重大成就和古突厥鲁尼文献和回鹘文献的解读，突厥学的研究有了迅速发展，在柏林形成了突厥学研究的新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项研究几乎全部停顿。文章还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著名突厥学专家的研究情况及其论著，其中有苏联、德国、匈牙利、法国、英国、丹麦、芬兰、土耳其等国。并指出俄国的拉德洛夫是现代突厥语领域的先驱。本文对突厥学的研究情况论述全面扼要，可供丝绸之路研究者参考。

137　突厥勃兴史论　　〔日〕松田寿南著　樊圃译

（《西北史地》1982年第2、3期）

本文论述了古代居住在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汗国兴起的史实，考证了突厥与蠕蠕、铁勒、契骨等民族的关系，以及锻铁技术与贸易对突厥族发展的影响。突厥原归蠕蠕统治。在公元546年，突厥部落酋长土门脱离了蠕蠕统治，在阿尔泰山地区宣布独立。接着便攻打蠕蠕，迫使蠕蠕可汗阿那瑰自杀。不久突厥第一任可汗即位，号伊利可汗。蠕蠕战败之后，重心向南移动，并分为两派：阿那瑰的叔父邓叔子在沃野镇之北阴山地区建立了基地，受到突厥第二代乙息记可汗科罗的攻击，最后被第三代木杆可汗俟斤消灭。另一派以阿那瑰从弟登注的次子铁伐为主，奔向北齐的北边。后铁伐为契丹所杀，登注代立，登注又为其国人所杀，国人又立库提为主，北齐又废库提，立阿那瑰之子庵罗辰为主，安置马邑州。在谈到突厥与铁勒的关系时，作者指出《新唐书》把铁勒与回鹘混同起来是错误的。经作者考证，认为铁勒是一个大部族，回鹘、突厥、高车均属其中一部。突厥能从蠕蠕统治之下脱离而独立的最大原因，就是利用了立国于准噶尔的高车与蠕蠕长年的争霸战争。最初站在蠕蠕一方参战的突厥，击破铁勒，尽降其众五万余落，成功地掌握了统治铁勒的权力，才致于强大。契骨是住在鄂尔浑河畔北方森林地带的部族，《史记》称为坚昆，唐代称为结骨或黠戛斯，元代称为乞儿吉思，突厥称为吉尔吉斯。他们居住在唐努山南境阿姆河盆地，即唐努乌梁海。这个地方从古以来就以产铁著名。突厥强盛时，吞并了契骨。传说中突厥和契骨是同一祖先的记载，反映了这两个部族自古以来就因锻铁技术的交流而有极深的关系。文章还考证了突厥族的起源，是在天山山脉第一高峰的博克达山。因为这里产铁，特别是济木萨儿南八十华里的水西沟，以铁矿之纯与质地之良闻名，博克达山古称贪汗山，因山容像兜鍪，又称为兜鍪山、馒头山。作者还论证了贸易路线与突厥族的关系。突厥建国后不久，就以阿尔泰山为界划分为东、西突厥两部。西突厥起先把根据地设在天山山中的大溪谷裕尔都斯。这个溪谷与东方的吐鲁番盆地和博克达山北麓地区，以及与南方的焉耆和库车等地通往伊犁的要路相通。其后，西突厥的势力向葱岭以西逐渐发展，其势力突破铁门关到达兴都库什山，在托克马克建立新的基地，并把王庭转移到此。托克马克是向天山南路的乌修吐鲁番（Us-Turfan）、向喀什噶尔去的山道和沿天山北麓向西突厥斯坦去的交通线的交会点。产铁和商路，是西突厥发展的重要条件。古代的阿尔泰山，是东向漠北的鄂尔浑河畔，北向阿姆河流域，西向伊犁盆地，南向天山北麓的交通线的交汇点。突厥的祖先除占有这个要冲而外，还具有锻铁特技，因而逐渐强大起来，积蓄了向四方扩展的

巨大势力。加上贸易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和中国贸易关系的发展，成为他们开拓疆土、左右国家存亡的巨大力量。作者认为，游牧国家加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和外国的贸易关系，即发展商品交换，扩大绢马交易，这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作用。作者引证许多史籍的记载论证了这一观点。

138　论突厥汗国的分裂　　　　刘锡淦

（《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

关于突厥汗国分裂的时间，论者颇多，大都认为应在公元582年末至583年初，即沙钵略白道之败和大逻便西奔达头之时。本文作者仔细研读分析了《周书》、《隋书》、《旧唐书》等史籍中有关突厥汗国的记载，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大逻便只是东突厥中一小可汗，并不是西突厥可汗。他的投奔达头可汗，不可能造成东、西突厥的分裂。实际上，在土门可汗时，其弟室点密率军十万，征服西域诸国、自称可汗之时，东、西突厥的分裂即已萌芽。到室点密之子达头时，分裂即构成事实。达头原未随父西征，而留居汗国本部任地头可汗，亦称地头设。当时北周与北齐斗争激烈，争联突厥以为外援。达头力主与齐联合，而木杆可汗未采纳他的建议，继续与周联合，并发动对北齐的战斗。从此，达头与木杆之间就出现了分裂的阴影。公元572年，木杆可汗逝世，其弟他钵继位。他钵为人骄横，上台不久便取消了达头的地头可汗职务。达头便返回西域，与其父共同经略，成为室点密的得力助手。这时东、西突厥的分裂即成事实。公元576年，室点密逝世，达头就成为西突厥最高统治者。公元581年，他钵可汗逝世，沙钵略继位。583年，与隋将窦荣定战于凉州。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受到隋朝偏将长孙晟的离间，留塞迟归。沙钵略杀其母，掠其他，焚其牙帐，迫使大逻便跑到西突厥，投奔达头可汗。因此，东、西突厥的分裂的时间应在公元576年到581年。文章还列举事实，从五个方面说明了在他钵统治时期，东、西突厥即已分裂。并指出杜佐《通典》“至大逻便，沙钵略分为二国”，不符合历史事实。对通常认为东、西突厥的分裂是由于隋政府实施“离间”政策的说法，也予以否定。指出突厥分裂的内因是兄弟叔侄各统强兵，互相猜忌、争权；外因是天灾蔓延，民怨沸腾，与四邻结怨。隋朝的离间虽起了一定作用，但非主要原因。

139　东突厥汗国的政治结构　　　　薛宗正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历史上的东突厥乃同西突厥相对而言，为早期突厥汗国政治统一体分裂后的产物。《太平寰宇记》载：“其地东至辽海以西……南至沙漠，北至北海五千里皆属焉。”其极盛时代，高丽以及华北诸割据政权均向其称藩，成为君临漠北的多民族大国。本文主要对东突厥汗国的内部政治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东突厥汗国在政治组织形式上异于早期突厥汗国的变化是“设”(xad)的地位日益显赫，它取代了原来的方面小可汗。突厥汗国时存在着大、小可汗并立的采邑分国制度。汗国分裂后，西突厥仍沿旧制，而东突厥则废除旧制，原来的小可汗职能由“设”取替。为“设”者皆可汗的同胞兄弟或嫡亲子

侄，拥有统率重兵，镇御一方的全权。仿照木杆可汗时代的四部分国，设的数目似限于四，分别出镇东、北、南、西四方。其所主方位依突厥贵东贱西习俗，存在着班序尊卑之别，故四方面的设，实际为方面小可汗采邑分国制的继承。作者经过对东、北、南、西四面设出任人选的考查，复原了东突厥汗国历代四面设的名单。进而探讨了颉利可汗之世册立东面泥步设为突利可汗的原因，纠正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流行的错误观念，即颉利可汗被认为大可汗，突利可汗被认为小可汗之说。对蓝突厥贵族（阿史那·阿史德氏等）垄断其它显爵的一系列新的历史变化，也作了具体考查，对东突厥建国后大批粟特人与汉人涌入漠北，在缔造和发展汗国方面的重要作用及其政治地位也有详细论述。日本学者护雅夫曾指出，突厥汗国本质上就是"阿史那氏的家产国家"，其基础即建立在对异姓部落的不平等统治。东、西突厥分疆而治以后，阿史那氏以突厥汗国正统继承者自居，这种不平等压迫被视为神圣不可动摇的祖制。对境内所属各部恣行威福，在直属诸部置吐屯监国。在未置吐屯的诸部，其酋长也只能领俟斤、俟利发等低职，非但对蓝突厥贵族专享爵位设、特勒等莫可染指，较之粟特人及高层汉人的地位亦低得多。本文对这些属部，分为异姓突厥诸部、九姓乌古斯即九姓铁勒、东部诸藩等三种类型，分别论述了他们与阿史那氏的关系和内政，外交及其盛衰兴亡过程。总的来看，领土广大，属部众多，是东突厥汗国强大繁荣的重要物质前提，但同时也带来了矛盾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凭籍武力推行的不平等统治毕竟不能持久，这种多重矛盾终至成为埋葬汗国的重要因素。

140　略论西突厥史中的若干问题　　林　干

（《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突厥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它的最高统治集团姓阿史那氏。突厥在公元六世纪中叶兴起于今新疆东北部，后来势力扩展至大漠南北及西域、中亚一带，至八世纪中叶退出我国历史舞台，其活动时间长达二百年之久，对中国及世界历史，都曾发生过巨大影响。突厥之正式分裂为东西二部，始于公元583年，至657年西突厥政权覆亡，其存在时间也在七十年以上；若从西突厥始祖室点密562年自主为可汗起算，至742年十姓可汗阿史那昕绝统为止，为时达180年。鉴于西突厥史文章国内发表的很少，本文就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的原因；西突厥的部族构成；西突厥的疆域和属国；唐朝在西突厥地区设置的府、州、镇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和看法。

关于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的原因，作者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因受中国离间政策所致问题予以纠正。首先突厥是游牧民族，它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游牧的畜牧业。其所以分裂为东西二部，其主要原因首先应从经济基础（游牧经济的分散）和上层建筑（政治组织的松懈）这些带决定性的社会因素去探求。其次便是突厥统治集团之内讧。因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各方势力逐渐汇合为两大营垒，一是达头为首的西部势力，一是沙钵略为代表的中央汗庭。诚然，长孙晟曾利用其矛盾，"鼓动其情，必将自战"。而实际在游牧经济基础上，只要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因素存在，即使当时没有隋朝的反间政策，突厥的分裂也难避免。西突厥的部族构成（即族内所包含的部落）颇为复

杂。其主要部分则为五咄陆和五弩失毕两大部，两大部下又各分为五个小部。这十部如何形成，史文无征，但早在室点密在位时（562—576年）便已存在。《旧唐书·突厥传》下载："初，室点密从单于（指土门可汗）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这十姓部落就是上述的十部。其后因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屡生变乱，当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对咄陆部和弩失毕部的统治关系已很松弛，有时甚至难于控制。因此咥利可汗继位之后，于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重新整编了这十个部落。其具体名称，据新、旧《唐书·突厥传》（下）的记载，均一一列出。西突厥的疆域，早在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583年）之前，即在公元567年（周武帝天和二年）左右、突厥与波斯瓜分嚈哒之后，就已扩展到乌浒河（今阿姆河），河北的铁门就是当时中国突厥与波斯两国的界址。达头可汗（576—603年）及处罗可汗(587—611年)时，虽主要居于乌孙故地(今伊犁河上游），但处罗复立二小可汗以分统所部。自此之后，铁门北面的药杀水（今锡尔河）流域，也都成为西突厥可汗的建牙之处。至于铁门以南的其他各小国，原先就归吐火罗统治，后来吐火罗归属于西突厥，这些小国自然也归西突厥统治了。其时两突厥的疆界伸展到阿姆河以南，印度河以西极远。在西突厥统治的这片辽阔疆域中，除可汗汗庭是政治首脑部，是主要的政治中心外，还有其他几个重要中心，如吐火罗、碎叶城，这些都是丝路之上的重要城市。唐代前期东西突厥政权的先后覆亡，不仅改变了大漠南北、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政治形势，同时也改变了北方和西域以至中亚各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唐朝在大漠南北、西域和中亚地区设官置府，行使行政权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原中央王朝把官府设置到漠北和中亚地区并把行政权力伸张到漠北和中亚地区的创举（西域地区设置官府则始于汉）。文章叙述了唐设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之雅尔和屯城）的过程。安西都护府统辖天山南路及中央亚细亚一带。其中对归安西都护府管辖的"安西四镇"的盛衰兴替叙之尤详。安西都护府所属府州颇为繁多，文章还列举了当时属于羁縻性质的府州名称，由此可窥知当时西突厥的势力范围及唐朝政治、声教之所及。

141　阿波可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

——兼论突厥汉国的分裂与西突厥汉国的形成　　　王　谅

（《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

本文论述了突厥汗国的分裂与西突厥汗国的形成。着重论证了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是阿波可汗，而不是达头可汗。认为法国学者沙畹的《西突厥史料》、中国学者岑仲勉的《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日本学者内田吟风《西突厥初世史的研究》，以及其他学者的著述，对这些问题并没有阐述清楚，在以往突厥史研究中，一些论述突厥汗国分裂，西突厥汗国形成历史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突厥汗国分裂的原因及西突厥汗国的形成，《隋书》和《新唐书》的记载不同，《隋书》所谓的"西突厥"，是指突厥汗国分裂以后与沙钵略可汗相敌对的阿波可汗部，而《新唐书》却明确地将西突厥汗国的创始系之于达头可汗及其父室点密可汗，并未言及阿波可汗。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隋书》说却遭

到了一些中外学者的否定，沙畹与岑仲勉均赞成《新唐书》说，都以室点密可汗系统为西突厥汗国的正宗，而把阿波可汗排除在西突厥可汗世系之外，根本否认他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作者认为，无论是沙说还是岑说，都没有阐述清楚突厥汗国在分裂前后的发展变化，而这些问题却涉及突厥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为了便于查对，文中附有突厥汗国可汗世系图。

突厥汗国在分裂前分为四部。这四部又是由最初的两部发展而来。对这种变化，作者作了简单的图示，即在突厥汗国之下分为居于东部的土门伊利可汗和居于西部的室点密可汗两系统。东部系统下分为东方可汗部、中面大可汗部、西方可汗部；西部系统下为西面可汗部。作者认为把室点密可汗父子当作西突厥可汗的看法是错误的。室点密父子在突厥汗国分裂以前，应当是突厥汗国的西面可汗。作者列举《续高僧传》卷十二《道判传》、《希腊史残卷》、《隋书》卷八四《突厥传》、《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的记载以资佐证。而阿波可汗所属的西方可汗是突厥汗国的四部之一，以往突厥史的研究者很少提到，中国史籍也语焉不详，仅《隋书·突厥传》和《资治通鉴》中曾提到它“居西方”，其首领是“步离可汗”。西方可汗部与西面可汗部是不同的两个部，人们常易混淆而忽视了西方可汗部的存在。作者对西方可汗部突厥的情况，如关于步离可汗的继任者、西方可汗部的地理位置、阿波可汗的王庭所在地等，仅作了一些推测。

突厥汗国分裂的背景，正如大多数突厥史家所指出的，是公元583年发生的内讧。然而，这次内讧并非偶然，而是其国内外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可汗继承制的混乱，在汗国内部造成了重重的矛盾；二是隋朝对突厥汗国采取了离间政策。公元582年突厥汗国分裂，西突厥汗国由此形成。但西突厥汗国并不象《新唐书》及沙畹所言，为西面可汗达头所创始，而是如《隋书》所言，由西方可汗阿波创始。作者在详述西突厥汗国的形成过程后指出，它是阿波可汗以自己统领的西方可汗部为基础，又迫走达头可汗，合并西面可汗部而创立的。达头可汗不是西突厥可汗。作者认为有两方面根据：一是西突厥汗国建立之后，达头可汗的活动范围已东移至于都斤山以南的漠北地区；二是西突厥汗国可汗世系与达头可汗无关。

最后，作者的结论是，关于突厥汗国发生分裂与西突厥汗国形成的历史，《新唐书》说、沙说与岑说很难成立，《隋书》等中国史籍的记载是正确的。现在人们所说的西突厥，实质上包括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突厥汗国的西面可汗部与西突厥汗国。

142　关于西突厥与西突厥汗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

——兼与王谡同志商榷

（《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王谡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发表《阿波可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一文中评论说，“在以往突厥史的研究中”已经形成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本文作者认为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应取慎重态度，并为使突厥历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求得比较正确的认识，对王谡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关于突厥汗国分裂前阿波可汗的封地及牙帐所在地，王谡认为“南限在龟兹以北，东限在于都斤以西，即现在的阿尔泰山及准噶尔地

区”，其牙帐设在可汗浮图城。而作者通过对阿波可汗封地位置的诸多考证，认为突厥汗国分裂前阿波可汗的封地在于都斤山和金山之间的科布多盆地及与之邻接的阿勒泰地区。其牙帐（“北牙”）设在于都斤山西北科布多盆地中的某地。关于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经作者对《隋书·突厥传》、《通典》、《新唐书·西突厥传》等史籍中，关于西突厥汗国早期历史记述的全面研究，认为达头是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在西突厥汗国建立后，他一直是西突厥汗国的大可汗；达头没有降隋，他在西突厥汗国一直发挥着大可汗的作用，并作为西突厥汗国的大可汗参与了公元583—600年西突厥汗国的历史活动；公元600—603年又曾一度把东西突厥汗国统一起来。阿波虽也参与了西突厥汗国的创建，但仅是一个依附于达头的西突厥汗国的可汗。王谡把主要属于达头的历史活动挂到僻处一隅的阿波可汗的帐上，大大抬高阿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适当的，作者还引证《隋书·西突厥传》、《隋书·铁勒传》中的有关记载，指出王谡将阿波可汗时的封地与泥撅处罗可汗统治西突厥汗国时的疆域混为一谈，从而断定阿波可汗时已统治达头可汗的领地，也是错误的。《隋书·西突厥传》将阿波及其后裔定为西突厥汗国的正统，固有其若干理由，但通观西突厥汗国的创立过程，以及同东突厥汗国的斗争，达头都比阿波可汗及其继承人泥利可汗起了大得多的作用，无疑他是西突厥汗国的创立者和正宗。王谡把阿波说成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以及对其在西突厥建立后历史作用的估计，均不符合历史事实。

143 突厥和隋王朝的关系试探　　藏　嵘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北方的突厥曾大规模卷入中原的逐鹿战争，学术界在评论这一现象时，有人认为，中原的某些集团和突厥的军事联盟，是分裂祖国的罪行；把突厥与隋的关系说成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把突厥视为外来侵略者。作者对这种看法提出不同意见。并根据史书记载，系统阐述了突厥与隋王朝的关系。突厥是曾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民族，西魏文帝大统八年（公元542年）始见于史书。不久即推翻柔然汗国的统治，崛起于我国北方草原，打败哌哒、契丹、契骨等族，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汗国。突厥建国伊始，就十分重视与中原汉族的交往和商业贸易。公元551年，突厥与西魏联姻，伊利可汗（土门）娶长乐公主为妻。北齐、北周对峙时期，突厥与中原两王朝的交往更加密切，与北周互相通婚，并经常联合攻打东边的北齐与西陲的吐谷浑。杨坚代周建立隋王朝时，突厥面临政治大动乱，至583年，突厥即分裂为东、西二部。584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由于内部矛盾重重，遂向隋朝称臣求援，请求南迁，并率领部寄居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的白道川。599年，东突厥突利可汗又率部归隋，被封为启民可汗，使东突厥成为隋王朝的一个成员。隋炀帝曾亲至塞北启民可汗穹帐视察，启民以臣礼迎拜，突厥兵马也归隋朝统一调发。这些史实说明，突厥与隋王朝的关系是臣与君的关系，作者还指出，隋朝时期，突厥与中原汉族人民的经济交往更为频繁密切，与汉族的融合同化加快进行，599年至601年，突厥人曾三次大批南迁，聚居于陕西、山西北部和甘肃一部。612年，西突厥的处罗可汗又率部归隋，迁居于会宁、楼烦一带。突厥与

汉族的通婚也更为常见。从北周至隋，即有五个公主嫁往突厥，民间也相互通婚。原来流行于汉民中的道教、佛教，突厥人也开始信仰。隋唐之际，突厥人散居于内地者更多，中原汉族许多人也因各种原因徙居于北方突厥地区。这对汉与突厥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融合同化都起了促进作用。隋末，北方政局混乱，突厥始毕可汗乘机摆脱中原王朝控制，重新崛起，其原因是隋炀帝采取了错误政策，引起双方关系的破裂，并非两个国与国之间的敌对行为。通过上述史实，作者认为，突厥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兄弟民族间的关系，而且是中央与地区、君与臣的关系、把突厥看作外藩、外国是极为错误的。

144 论西突厥部族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陈国灿

（《历史教学》1981年第7期）

西突厥是我国新疆北部与碎叶河流域的一支突厥族，以十大部落（“十箭”）为基干组成，故又名十姓突厥。

突厥原居我国北方，六世纪强大后复被中亚。因其昆季争长、父叔相猜，隋利用其矛盾，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政策，使其相攻，并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分裂为东、西二部。西突厥达头可汗，欲依隋王朝力量击败东突厥的沙钵略。遂在政权分立次年、即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二月，率其属降隋。大业初，西突厥处罗可汗抚御无道，其国多叛，屡为铁勒所败。隋炀帝遣使前往“慰谕”，处罗跪受诏书，尊炀帝为圣人可汗，又遣使朝贡，为后来西突厥各部归附树立了榜样。唐政权建立后，西突厥统治者继隋时朝贡传统，争附于唐，贡使不绝。唐初西突厥统治者之间尽管时有矛盾，甚至在有内乱的情况下，这种臣属朝贡关系也基本未变。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大败东突厥于阴山，北部及西部各族首领纷纷来朝，诸蕃君长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太宗下诏对东突厥实行册封。至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对西突厥也开始册封。自此,东、西吐厥除遣使朝贡外，有关重大事件亦向唐王朝表奏，听命受诏。新可汗即位，需唐册授，相沿因袭，成为惯例。册授制度，是我国封建时代实现多民族统一的一种方式。受册封者，表明他是唐统一政权下的一个地方政权。永徽时平阿史那贺鲁叛乱，又将原册授臣属制进一步发展为就地设治、统一管理，并承袭汉设“都护”传统，在昆陵、蒙池设二都护府。册立西突厥王裔弥射为兴昔亡汗兼右卫大将军、昆陵都护,管领碎叶水以东贺鲁下五咄陆部落；册授西突厥王裔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蒙池都护，分领碎叶水以西五弩失毕部落。其所属诸部按大小设府州；诸首领论位望高下，授予都督或刺史以下官职。至于二都护府的府治，昆陵府设治双河（今新疆博乐县），蒙池府设治千泉（今苏联的明布拉克），后改设碎叶（今苏联的托克玛克）。西突厥与隋唐王朝的关系不断改进、发展，维护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的繁荣。

145 西突厥开国史考辩 薛宗正

——兼评沙畹说和王谡说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关于西突厥的历史开端和创业可汗，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作者刊举影响较大的俄

人巴尔拖里德，法人沙畹以及王濩之说，排比了《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关于东、西突厥之分的史料，认为以上各说在史料上虽各有所本，却各执一偏，有失于史料的年代顺序与记述宗旨。巴尔拖里德之说影响不大，沙畹说和王濩说仍有相当势力，此二说的基本分歧仅在于达头或阿波谁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而皆承认582年的战争爆发之岁即西突厥汗国成立之年。其实此年形成的仅为突厥西部叛乱集团，达头、阿波皆为叛乱首领。突厥内战整整持续了二十年（583—603年）。内战初期形成的西部叛乱集团并非突厥内战结束之后定型化的西突厥汗国。突厥汗国本为统一的政治实体，但分部而存，大小可汗采邑分封制度为其政治基石。这一制度的初世形态为四部分国。作者经过考辩，否定了日人内田吟风与王濩之说，指出突厥初世四汗中并无西面可汗、西方可汗之别，“西面”、“西方”二词函义原本无别；西方可汗褥但步离与西面可汗室点密实为一人；突厥四部所缺之部应为北面可汗部。突厥四部分国的具体内容为：建牙于都斤山的中面大可汗，总摄全局，兼理南面；牙于幽川直北的东面可汗，镇驭奚、霫、契丹；牙于独洛水之北面可汗，督绥契骨、薛延陀、铁勒九姓；以及牙于大裕勒斯河谷之西面可汗，统辖葱岭东西诸国，通罗马以拒波斯。继则论证了沙钵略夺取大汗之位后，推行削藩、推恩政策，增置小可汗，四部分国制进一步演变为七部分国制，阿波即为增置的诸小汗之一，而非如王濩所断言的阿波是继初代步离、二代步离之第三代西方可汗。沙钵略的推恩，削藩措施，非但未能解怨于阿波，且又树敌于达头，导致大小可汗自身存在的矛盾更加尖锐化，终于引起阿波等西部诸小可汗的联合叛乱及突厥汗国的分裂。公元583年阿波率先倡乱揭开突厥内战序幕，并在漠北建立僭主统治，但僭主政权仅存三年（585—587年），而其兴亡皆在漠北、金山之间，足证其人非西突厥创业君主。达头也是突厥叛乱集团的首脑，而非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西突厥的建国及其与东突厥的分疆而治，并非是突厥内战双方经过长期较量而达到的自然平衡，而是达头叛乱失败的历史产物。确切的说，是由于隋朝武装介入了突厥内战，从而引起西部叛乱集团重新分化的结果。本文引证《隋书·西突厥传》、《隋书·突厥传》、《通典》等史籍有关记载，认为西突厥的汗统并非简单地纯出一系，其创业君主乃木杆、阿波之裔泥利可汗，至射匮可汗之世始复归于室点密、达头一系。

146　西突厥纪事　　　林　干

（《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东、西突厥政权曾在丝绸之路上起过重要作用，但我国史学界的研究尚属薄弱。本文仅就西突厥的盛衰兴亡，较详的进行了考叙，为丝路之上民族政权的建立发展及其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西突厥始祖为室点密（公元562—576年在位）。室点密即突厥汗国建立者阿史那土门（伊利可汗）之弟。西突厥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势力，从室点密时便已形成。公元576年室点密死，其子玷厥继立，号达头可汗。他在位期间，联合各方势力，共同反对最高可汗沙钵略，并在西部宣布独立，使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二部。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年）冬十二月，东突厥都蓝可汗为部下所杀，达头乘机占领漠北，自立为步迦可汗，实际上成为东西突厥的最高可汗。但因这种统一无坚固基

础，且不久达头侵隋边塞受挫，进攻启民可汗也受阻，终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降于启民。但西突厥势力在阿尔泰山以西牢固，并不因达头在漠北的失败和西奔而有所影响。曾在隋开皇时，属于西突厥的阿波可汗被东突厥的叶护可汗俘虏，族人立达头之孙、鞅素特勒之子为泥利可汗。泥利死，子达漫立，是为泥橛处罗可汗。大业七年（611年）炀帝劝令处罗入长安，分处罗可汗之众为三，一部居于会宁即（今甘肃靖远东北），另一部居楼烦（治所在今山西静乐），处罗将五百骑常随炀帝巡游，赐号曷娑那可汗。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居楼烦的特勒大奈随从，屡建军功，受唐封拜窦国公，赐姓史氏。公元618年曷娑那归长安，唐封为归义王。

公元611年，炀帝劝令处罗入隋后，族人则立其叔父，号射匮可汗，西突厥势力开始强大。唐武德二年(619年)射匮死，子统叶护立，西突厥势力益盛，据乌孙故地（今伊犁河上游），后移汗庭于石国（今中亚塔什干）北之千泉。千泉是其北牙，而南牙则在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之巴尔赫)附近。当时中亚一带及我国西域地区都受其统治。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统叶护为其伯父所杀，并自立为莫贺咄候屈利俟毗可汗，族人不服，自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屡有变乱，至贞观十二年（628年）西突厥遂分裂为二。沙钵罗叶护建汗庭于虽合水（即碎叶川)北，谓之南庭；乙毗咄陆可汗则建牙帐于镞曷山西，谓之北庭。嗣后乙毗咄陆和沙钵罗二可汗互相攻战，乙毗咄陆渐次强大，西域诸国多归附于他。贞观十五年（641年），沙钵罗可汗为乙毗咄陆擒杀，并击灭吐火罗，自恃强大，遂骄倨，竟拘唐使，侵暴西域，为唐安西都护郭孝恪击败。后又进击康国，路经米国时大肆掠略，民怨沸腾，诸部遣使至唐，请废黜乙毗咄陆更立可汗，太宗遂册立前莫贺咄候利俟毗可汗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咄陆自知为众所不容，乃西奔吐火罗，部落散亡。初、乙毗咄陆可汗阿史那贺鲁（室点密五世孙）为叶护，贞观二十年（646年）率众附唐，封为泥伏沙钵罗可汗，贞观二十三年唐在西域设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都督，高宗时授贺鲁子咥运为右骁卫中郎将，不久归还。咥运劝父拥众西走，建牙帐于双河（今新疆博罗县西之博罗塔拉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成为雄霸西突厥的唯一大汗。后沙钵罗侵西域，唐将苏定方率军出击，沙钵罗败走石国，后为唐将萧嗣业所擒获，西突厥政权亡，唐遂统一了西突厥全部辖境。至高宗龙朔二年（662年），由于唐伐龟兹，西突厥贵族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屡侵唐边境，唐因吐藩入侵之故，未能出师远征，乃用吏部待郎裴行俭之谋，诱擒都支及遮匐，留其副使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自此以后直至天室元年（742年），唐对阿史那氏均采取安抚政策。是年三月，玄宗发兵护送十姓可汗阿史那昕至碎叶西之俱兰城，为莫贺达干所杀，交河主公与其子阿史那忠孝逃归，西突厥阿史那氏从此遂绝。天室十年（751年）高仙芝兵败怛罗斯，其后唐朝苦于藩镇之乱，中原多事，无暇顾及西陲，从此中原与西域关系日益隔绝。

147 试解突厥泥利之谜　　刘锡淦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

《隋书·西突厥传》记载：“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有隙，因分为二，渐以强盛，……大逻便为处罗候所执，其国立鞅素特勤之子，是为泥利可汗。”本

文作者认为，这段史料把东、西突厥混淆得一蹋糊涂，造成历史悬案。作者根据《隋书》中的有关记载，对这段史料进行了较详细的考证。认为大逻便并非西突厥之可汗，他与沙钵略的关系纯属东突厥内部事务。当时西突厥的最高可汗为玷厥，即达头可汗。大逻便的领地是突厥北牙，因受到沙钵略的攻击，被迫西奔，投靠达头可汗。向达头借兵十万人，连旧部十万共二十万人又夺回北牙，与沙钵略互相攻击。这是东突厥的分裂，而不是东、西突厥的分裂。在此以前东、西突厥的分裂已经明朗。西突厥之始祖为东突厥始祖土门伊利可汗之弟室点密。达头可汗即室点密之子。在大逻便与沙钵略的互斗中，东、西突厥即走向公开分裂。室点密的子孙，世为西突厥可汗。大逻便之世系，则属东突厥系，他是东突厥的一个可汗，而非西突厥之可汗。大逻便被处罗候莫何可汗所执时为公元587年，即隋文帝开皇七年，其国立泥利为可汗。公元588年，莫何可汗亡，由沙钵略之子雍虞闾继其汗位，号颉伽施多那都兰可汗。都兰可汗之妻为周之千金公主，隋赐姓杨，改封为大义公主。大义公主对亡国心怀不平，于是联合泥利，共同抗隋。这个泥利就是大逻便阿波可汗的后裔。西突厥也有一个泥利，是室点密达头可汗的后裔，即泥撅处罗可汗达漫之父。泥撅处罗可汗于公元611年（隋炀帝大业七年）入朝于隋，西突厥立射匮可汗。射匮的父亲是咄陆，一作都六，祖父是达头可汗；泥利则是射匮可汗之兄。由于达头可汗连年征战，西突厥内部产生厌战情绪，发生分裂、国人拥其孙泥利为可汗，迫使达头出走，西奔吐谷浑。由上述情况可知：有两个泥利，东突厥泥利之父为鞅素特勤，西突厥泥利之父是都六。长期存在的“咄陆与鞅素特勤应为一人”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

148　突骑施汗国的兴亡　　　　薛宗正

（《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本文论述了八世纪中叶崛起于中亚的突骑施汗国的兴亡。突骑施汗国是在西突厥阿史那氏衰微后兴起的异姓突厥，以突骑施、车鼻施、处木昆三姓为其核心部落。汗国的创立者乌质勒、娑葛父子出身于突骑施部，雄主苏禄出身于车鼻施部，其权臣重宰常出身处木昆部，故有“三姓突骑施”之称。文章论述了突骑施三姓的来源、突骑施汗国的开创、建成和重建，以至汗国的灭亡。突骑施三姓源出漠北、曾为铁勒部落，至北朝时已逐渐西迁至天山北麓。公元六世纪突厥勃兴，统一漠北、西域，铁勒诸部全被征服。不少部落放弃了旧族名而被称为异姓突厥。突厥汗国东、西分裂以后，突骑施三姓都出现在西突厥境内。唐贞观年间，西突厥咥力失可汗推行两厢十姓改革，碎叶川东诸部称五咄陆，碎叶川西诸部称五弩毕。突骑施、处木昆毕属咄陆部落之一。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以后，十姓突厥归唐。唐朝在西突厥故境继续承认阿史那氏对异姓突厥的统治。文章评述了阿史那氏内部斗争及其衰微的过程，以及突骑施部首领乌质勒创建汗国的事迹。乌质勒领导西域诸异姓突厥部落，同侵唐的东突厥、吐蕃浴血奋战，攻败东突厥，收复被其占领的碎叶；配合唐军大破吐蕃；击退东突厥的进攻；推翻阿史那氏对西突厥的统治，被唐朝册封为金河怀德郡王，旋即病卒。乌质勒之子娑葛继位，击灭阿史那忠节，有效地控制了西突厥全境，除原有十姓外，又增加了四姓，建号贺腊毗伽十四姓可汗。据作者考证，娑葛并非因兄弟争国而死，而是在助唐伐东突厥时，于景云二年（公

元711年）败亡。娑葛死后，十四姓故地一度出现了极大的混乱。车鼻施部的苏禄收拢部众，自立为毗伽可汗，受到唐朝的承认和册封。并多次打败新兴的大食对中亚的扩张侵略，成为中亚各族人民尊崇的英雄和唐朝在西部边疆的屏障。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以后，苏禄割断与唐的宗藩关系，兴兵犯边，为唐所败，国势日衰，无力驭众，为其部下所杀。苏禄死后，突骑施汗国发生黄、黑二姓之争，国势日益衰亡。随着唐军在怛逻斯之战中被阿拉伯人打败和葛逻禄的勃兴，突骑施汗国遂趋灭亡。本文对突骑施汗国的兴亡过程论述甚详，并对唐朝政府对这个汗国的政策得失作了评述，为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材料。

149　于阗尉迟王家世系考述　　　殷　晴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位于昆仑山北麓丝绸之路上的于阗，是我国古代西陲重镇和中西交通线上的要地。它对祖国的统一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起过重大作用。从秦汉以前建城为国到宋初一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执政的尉迟氏王族，作为一方之主，长治久安，实属罕见。本文从尉迟氏族源及于阗建国传说；于阗尉迟氏王室的兴衰；王室振兴和中原联系的加强；“大室于阗国”尉迟氏政权的最后结束等四方面，考述了于阗尉迟王家世系。

作为“城郭之国”的于阗建于何时？以及建国情况如何？作者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日人羽溪了缔《西域之佛教》，英人贝利教授《于阗语文书集》、李文柱《上古音研究》以及加拿大蒲立本教授《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等古今中外著述的有关记载和论述，指出了以往研究者的误讹之后，认为于阗尉迟氏王族与月氏人有关之说，有一定依据。至于建国年代以公元前三世纪比较稳妥。其国势盛于西汉末年。据《后汉书》载：广德攻破莎车后，于阗雄张南道，辖地西抵疏勒，东接鄯善，“领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东汉后期，于阗作为汉廷统治西域的政治中心，国势益盛，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为其统属，与鄯善并为昆仑北麓之两大强邦。当北魏末年（公元470年）柔然围攻于阗，接着“风俗与突厥略同”的嚈哒强盛，于阗乃为其役属。直到公元567年西突厥室点密可汗消灭嚈哒，才结束此局面。隋、唐时，于阗仍在西突厥控制之下，尉迟氏王族亦处于突厥化的过程。后在安史之乱中，于阗王室助唐平乱有功，不仅尉迟氏王室名噪一时，迁往内地的王族，亦备受优待。公元790年，即唐德宗贞元六年吐蕃势力占据昆仑山北麓，于阗依附于吐蕃贵族。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敦煌的张议潮率蕃、汉各族人民收复河西，于阗始摆脱吐蕃贵族的羁绊。此时，李圣天在政治上积极靠拢中原，于是盛极一时称为“秦马秦”的“大室于阗国”的名声又响亮起来。公元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以喀什为都城的哈拉汗朝与大室于阗国旷日持久的战争开始，直到十一世纪初，哈拉汗朝进占于阗，尉迟氏政权才告结束。

于阗尉迟氏政权能够维持千年以上，其自然条件和经济结构的特殊，佛教的风行，为其长治久安带来有利条件。它为维护祖国的统一曾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在祖国西陲有这样一个长期稳定的地方政权，无疑对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带来莫大

助益。

文后附有“于阗（尉迟）王统表”可供查证。

150 藏文古籍所述于阗王谱系迄始年代研究　　林梅村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现存文献中，有关于阗王朝的史料分属汉文、藏文和于阗语言文字资料三个系统。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新发现的藏文史料对汉文系统有关于阗王谱系的记载冲击最大：它对唐以后于阗王系的记载与汉文文献一致，和于阗塞语文献也相吻合；而对唐以前于阗王系的记载却截然不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引据藏文史料。已造成两个后果：一是迄今未能认识到新发现的藏文于阗王谱系对于阗史研究的真正价值；二是一些本来比较清楚的问题，被搅的十分混乱。例如把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提前到公元一世纪甚至更早。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关键是对藏文于阗王谱系的迄始年代至今没有找到。为此，作者仔细研究了有关于阗古史传说的藏文古籍传世本和敦煌本关于佛教出现时间的矛盾：《于阗教法史》、《洛阳伽蓝记》和《大唐西域记》均云：“昔者，此国佛法未被”。比丘遍照随商贾到于阗之后，劝服于阗王皈依佛门，此地“于是出现圣教”。当时的于阗王，《于阗教法史》记作尉迟·胜生，系于阗建国后第三代王。同时，《大唐西域记》和《于阗教法史》又云，早在于阗第一代王地乳时代，此地已有佛教。这一自相矛盾之处，为探讨藏文系统文献所述于阗王谱系的迄始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由于《于阗教法史》提供的年代数据不足信，即据已知汉文文献探讨于阗王朝年代体系。据汉文史料，藏文文献中前三代于阗王在位平均年代是四十二年一代，因此，于阗首创佛教国家的第一代于阗王地乳的年代应始于公元176年。以此推之，藏文文献中前三代于阗王的大致年限约为：第一代地乳王，公元176—218年；第二代叶护罗，公元218—260年；第三代尉迟·胜生，公元260—302年。其间以四十二年为一代计算，是根据《后汉书》、《梁书》的有关记载而推算的。两书记载，公元152—175年，汉恒帝元嘉二年至汉灵帝熹平四年，于阗王安国尚在位，但据《后汉书》记载，其人不可能是地乳王。所以地乳王在位年代不能早于斯时只能以最大可能性四十二年一代推算。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据藏文系统文献，远在公元一世纪甚至更早。作者通过对这一系统文献所记于阗史传说的分析，以及研究了《后汉书》、《梁书》的有关叙述后予以否定。认为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不早于公元175年。作者并根据于阗本地语言文字资料，对汉、藏、佉卢三系统文件所述于阗王谱系中地乳王和叶护罗这两位国王的不同称谓作了释疑。本文认为藏文古籍所述于阗古史传说的重要价值远远超出人们现在的估计，它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否定传统的记载，而在于填充了汉文和于阗本地语言文字两系统文献都没有叙述清楚的一段于阗史。

151 关于于阗政权与喀剌汗王朝关系的探讨　　汤开建　　王叔凯

（《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关于喀剌汗王朝历史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颇多重视，国内从喀剌汗朝的历史乃至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疆域等，各个方面都开展了研究，但多因袭外国学者的一些

看法，其中于阗政权与喀刺汗王朝的关系，就是明显的一例。

于阗自汉至唐，一直是臣属中原王朝的一个城邦国家。九世纪以后，在其西部出现了一个以伊斯兰为国教的喀刺汗王朝，开始向东面的异教徒地区，开展传播伊斯兰教的"圣战"。国内外学者认为：经过了几十年的宗教战争，于阗最后被攻占，其版图也纳入喀刺汗王朝的范围之内，并从于阗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王室民族成分、于阗地区宗教信仰三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为由，从而得出公元十世纪时于阗国政权不复存在的结论。本文作者对此则持否定态度。由于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史·于阗传》第一次出现，"黑韩（又作汗）王"的称号，人们则认定这是喀刺汗王朝征服于阗的标志。作者认为"黑汗"即"可汗"之音译，《宋史》有可汗、合罕、克韩、黑汗、克韩等词，均为Khan一词的不同音译，如果把"黑韩"与喀刺汗等同起来，不免失之偏颇。黑汗这一可汗之译词，不仅在公元1009年出现，而且此后于阗最高统治者还延用过。不仅如此，在李圣天时期还经常使用"国王"的称号。因此，"黑汗"之称，并不能说明于阗政权发生了什么变化。

关于于阗王室民族成分变化问题，学者一般根据于阗王在大中祥符二年，派遣了一个名叫罗斯温的回鹘族使者入朝宋朝，从而断定于阗统治者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变化。事实上早在唐代中后期，于阗已明显受到突厥的影响，如统治者称之曰"叶护"，就是明显例证。从公元九世纪中期，随着回鹘民族的西迁，于阗地区的回鹘力量增强，甚至最高统治者也由回鹘人所取代，于阗政权派出一个回鹘使者，是很自然的事，这绝不能证明于阗王室民族起了变化，相反的则证明于阗王朝是一个回鹘人的政权。至于于阗地区宗教信仰发生变化的问题，国内外学者认为，十一世纪初于阗地区由佛教改宗伊斯兰教，这似已成为定论，但作者通过《宋史》、《辽史》及其它史料考证后，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公元十一世纪后期，佛教在于阗地区仍占主导地位，不仅国王信奉，而且佛教僧侣在于阗仍有较高的地位，当时的外交活动主要依靠佛教徒去完成。如宋徽宗政和七、八年（1117—1118年），于阗两次遣使入贡，都是佛教徒完成的。如果伊斯兰教统治了于阗，却派佛教徒完成外交使命这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在公元十一世纪后伊斯兰教向东发展扩张，对于阗的宗教信仰有所改变，但佛教仍占主导地位，直至西辽攻占于阗即公元十二世纪后，伊斯兰教才在于阗地区占据统治地位。

于阗是丝路之上的一重要城市，历史上与中原王朝关系极为密切，佛教传入后的一千多年中，对当地的思想文化影响颇大。研究于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情况等，都是丝路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在研究中有不少新的见解，对丝路之上民族关系，宗教传播的研究，可资参考。

152 论回纥汗国 刘志霄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本文论述了七世纪中叶，维吾尔回纥汗国的形成和壮大过程。是研究中国通史、维吾尔民族史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回纥汗国是维吾尔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阶段，也是形成统一维吾尔民族的重大转折时期之一。公元前三世纪，巴尔喀什湖至贝加尔湖之

间的中亚草原，准噶尔盆地，以及蒙古草原所构成的广袤草原地带，有一个由十五个大部落组成的名为丁零的游牧部落联合体活动，为首的是袁纥部，亦即维吾儿部。由于缺乏资料，作者将这一时期维吾儿的政治活动归并到丁零部落联合体研究。丁零最明显的活动，是与匈奴之间的斗争。因而这期间维吾儿的历史活动，除了战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迁徙，二是组合。本文详细记述了在迁徙、组合过程中，维吾儿势力进一步壮大成为独立汗国并与唐建立密切联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汗国的阶级关系与经济、文化。作者引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史集》、《世界征服者》等史籍的记载和传说，论述了早期维吾尔在与突厥汗国的战争中，以血缘和宗法为纽带的氏族社会的解体，奴隶制的短暂过程，而后在与隋、唐的政治、经济往来中，迅速转入封建社会的全部过程及其社会、经济特征。汗国的经济，是由畜牧业、商业、以及农业和手工业构成。作者着重索解了商业经济得以出现的原委；一是唐朝为了褒奖回纥汗国协助平定“安史之乱”，除每年向汗国馈赠一定数量的丝绢外，同时还规定了以马匹交换丝绢协议，其数字相当可观，使汗国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商业热情。二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失去了河西走廊等地。唐朝在天山南北军政机构孤悬绝域，只有通过回纥汗国，才得以与唐朝中央维持联系。由此，回纥汗国直接掌握了东西方陆上交通，并利用这一条件，垄断了东、西方间的丝绸贸易。特别那些在汗国掌握东、西方贸易的粟特人，取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常常充当可汗的使者、顾问，直接参予汗国的政治，经济及宗教活动。至于回纥汗国的文化，包括文字、语言、建筑、宗教、舞蹈、音乐等也都在这一时期有了辉煌的成就。

153　回纥的兴起及其和唐朝的关系　　*程溯洛*

（《历史教学》1979年第7期）

过去，有些国外历史著作，把我国七—八世纪兴起的回纥，特别是对公元744—840年这期间在漠北存在过的封建政权，称为“回纥汗国”，“回纥王国”或“回纥帝国”；有的所附地图也将其画为独立王国。在国内，1958年出版的《维吾尔史料简编》中有关唐代的第二章，也出现了“回纥汗国”字样。这些称谓违背历史事实，均属不妥。本文旨在纠正这一错误。

回纥是维吾尔族的旧称，源出突厥语族的铁勒（又名高车），原为我国蒙古草原上的兄弟民族。西魏至北周期间，突厥族兴起后，以袁纥为主的东支铁勒人民受突厥贵族统治压迫。隋大业年间，隋出兵打败西突厥，袁纥人民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团结土拉河以北其他东支铁勒人民，反抗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602—611年）统治，正式宣布其族名为“回纥”。经作者研究新旧《唐书》、《魏书》、《隋书》和《资治通鉴》等有关史料后认为：回纥兴起，与隋、唐王朝的资助分不开；特别在唐王朝的帮助下，灭薛延陀后，成为蒙古草原上的主要民族。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在回纥住地置“瀚海都督府”，任命回纥首领吐迷度为都督；又置六府七州，受唐北方的羁縻府州“燕然都护府”（后隶“安北都护府”）管辖。从此，回纥地区正式归入唐朝版图，开辟“参天至尊道”，置邮驿（过邮）六十八处。到公元744年，即吐迷度的第六代孙骨力裴罗时，又

得唐助，灭后突厥颉跌伊斯的统治而统一漠北，建立了游牧封建政权；骨力裴罗被唐封为怀仁可汗、左骁卫员外大将军。这个政权传十五世而亡。在十五世可汗中，只有四位因特殊情况未受唐封；其余皆受唐封。不仅首领受唐封，首领以下的大臣也受唐任免。军队受唐王朝征调，或从征，或直接编入唐军。唐王朝有时在漠北回纥地区直接驻军；有时将回纥军民迁往内地。玄宗天宝十四年至代宗广德元年(755—763年)间，先后征调回纥兵平定安史之乱。其后，吐蕃陷陇右、西域，回纥人又为唐王朝收复北庭、龟兹，与吐蕃进行过多次战斗，为打通丝绸之路，建议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纵观史实，回纥在漠北的政权是唐王朝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与一般地方不同的只是实行"羁縻府州"政策，是属统一的国家内部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而非独立的王国或帝国。

154　回鹘西迁路线新探　　阿合买提江·艾海提

（《西北史地》 1985年第3期）

曾雄据漠北的回鹘汗国，在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因天灾和内讧，遭到黠戛斯人的入侵而崩溃。回鹘部众开始了历史性的大迁徙。乌介可汗率领十三部，南下附唐；另外十五部，在庞特勒率领下西奔葛逻禄。对这一支西迁回鹘人所走的路线，史学界看法不同。有的认为到达葛逻禄后，又分为两支：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奔吐蕃系指北庭而言，奔安西是指高昌。有的认为，西迁回鹘先集中到北庭，然后一奔安西，一奔葛逻禄。而奔吐蕃的一支，是在西迁途中顺道进入河西地区的。本文不同意上述看法，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旧唐书·回纥传》和《资治通鉴》记载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疑有脱误。因为这与常理不合。《新唐书·回鹘传》和《文献通考》记"残众入吐蕃、安西"，说明不是另外的两支，似较合理。奔吐蕃者也不是指北庭。根据《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摩尼教《赞美歌集》残卷序文和米诺尔斯基《塔米尔·伊本·巴哈尔的回鹘旅行记》等文献记载，当回鹘西迁时，北庭本为回鹘所有，并非吐蕃所占。奔安西者也不是指高昌，应是唐朝安西都护府所管辖的天山以南广大地区；而高昌此时称为"西州"，仍被吐蕃所控制。至于先集中于北庭，然后再一奔安西，一奔葛逻禄，也难以令人信服。因在回鹘西迁前，阿尔泰山北部一带已被黠戛斯控制，由此经过已不可能。作者认为，史籍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奔葛逻禄是回鹘西迁的主要方向或最终目的；第二，回鹘西迁经过河西、安西和其它地区时，其"残众"留了下来。因此，840年回鹘西迁的路线应当是：从鄂尔浑河流域越过蒙古高原，南下到额济纳河下游，再向西从天山东北角穿过巴里坤草原，经准噶尔盆地的东南边缘进入安西地区，最后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中亚楚河流域一带。文章还探讨了西迁的人数、投奔葛逻禄的原因，以及西迁前河西、新疆和中亚部分地区已居住有大量的回鹘人及其近族部落等问题，并得出明确的结论。

155　从回鹘西迁到黑汗王朝　　王小甫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14期）

本文运用大量中西史料，试图说明建立黑汗王朝（喀喇汗朝）的样磨部是由回纥汗

国药罗葛贵族率领的一些部落在九至十世纪发展而成的。在漠北回纥汗国（公元744—840年）时期，其西部势力已越过阿尔泰山，但却受到三姓葛逻禄联盟的挑战。为了摆脱回纥的控制，葛逻禄主部于公元756年开始离开阿尔泰山故地，向西南迁徙至楚河谷地。而在此之前，已先后有三部分葛逻禄南下至帕米尔、费尔干纳东部和今阿克苏、乌什一带，构成了《九姓回鹘可汗碑》上所说的"归顺葛逻禄"，而其活动区域仍属回纥的势力范围。八世纪九十年代初，回纥汗国西部统治者的驻地从北庭迁到了西州（高昌）。唐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回纥汗国药罗葛氏的传统地位为跌跌氏的骨咄禄怀信可汗所取代，于是九世纪初，一些药罗葛氏贵族被迫西迁，投奔当时汗国西部的药罗葛氏统治者（大约在公元803年，跌跌氏在汗国西部的统治得以确立），大批部落羊马进入"归顺葛逻禄"的活动地区，并与其不断冲突，最后到了阿图什一带，这就是后来的样磨部。"样磨"，突厥语，意即"前锋"。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在黠戛斯的攻击下崩溃，漠北回鹘由跌跌氏乌介特勤和药罗葛氏庞特勤各统一部，离开蒙古高原，乌介特勤南下，庞特勤西迁。西迁的回鹘十五部沿途不断分化，其主体到达焉耆一带，另一部分则直接投奔了样磨部。庞特勤到焉耆后即称叶护，后来唐册封其为怀建可汗。公元866年，其后继者住龟兹，形成当时的回鹘族势力中心。大约在九世纪末、十世纪初，样磨部由于西迁回鹘族的加入而发展壮大起来，完全控制了原属归顺葛罗禄的地区。龟兹回鹘可汗与样磨部首领，一度以传统的双汗制形成联合统一，前者称阿尔斯兰汗（狮子王），后者称博格拉汗（公驼王），西州、甘州由狮子王所派都督管理。公元924年，甘州回鹘自称可汗，随即样磨部博格拉汗萨土格自称"黑可汗"。早在九世纪初，样磨就占领了喀什噶尔城，大约在公元942年，样磨又夺取了费尔干纳盆地东端的重镇讹迹邗，被葛逻禄当作自己的"一道屏障"的归顺葛逻禄彻底并入了样磨。同年，萨土格攻下了八拉沙衮。样磨的政治中心也从阿图什附近迁到了喀什噶尔。公元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萨土格·博格拉汗改宗伊斯兰教，其穆斯林名字叫阿布德·克里木，死于公元955—956年，其子木萨·本·阿布德·克里木继位。公元960年左右，木萨在八拉沙衮自称"众汗之汗"即"狮子王阿尔斯兰汗"，正式脱离龟兹回鹘自立。由于王朝诸多的统治者称号中都带有"黑汗"，所以被称为黑汗王朝，该王朝仍实行传统的双汗制：名义上的大可汗狮子黑汗王驻八拉沙衮，副可汗公驼黑汗王驻喀什噶尔，形成了木萨的后裔(狮子王)和萨土格另一个儿子苏莱曼的后裔（公驼王）两大分支。公元1041—1042年间，统一的汗国分成两个单独的黑汗王朝，两支都保留了传统的双汗制，东支领有七河流域，费尔干纳东部与喀什噶尔等地，汗庭仍在八拉沙衮和喀什噶尔；西支领有河中与西部费尔干纳，汗庭在讹迹邗(后迁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公元1211—1212年，西辽治下的东西支黑汗王朝几乎同时覆灭。

156　古高昌国历史略述　　　黄文弼

（《金陵学报》第10卷第1、2期）

高昌国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其历史的发展演化极为复杂。为说明高昌国历史，必以车师为始。作者根据《史记》、《汉书》等，对高昌历史进行了全面考

证。《史记》所记姑师即车师，自汉武与匈奴争车师，至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止，历时四十年，车师与汉时离时合，及神爵二年郑吉为都护(兼护北道)车师遂内属。至王莽时，车师复叛离。后汉永平中，匈奴与西域诸国共寇河西，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北击匈奴，而班超借以服鄯善，降于阗，西域与汉绝六十五年后，至是复通。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定西域，置戊己校尉，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复叛，车师与匈奴屡寇河西。故后汉自明帝十六年至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计八十年，西域时通时绝。此后三国纷争，无暇顾及西域，西域诸国不见于史者百余年。晋置高昌郡，高昌之名始于此，然车师王仍居交河城。前凉、后凉及北凉皆置高昌太守，车师自为王如故，及沮渠无讳窃据高昌后，自称高昌王，高昌有王亦始于此。至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安周破车师，车师国遂亡。车师自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至后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计有国五百余年，至此遂亡。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沮渠氏为蠕蠕所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历经张孟明、马儒为王，至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8年），国人杀马儒，立金城郡榆中人麹嘉为王，至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候君集灭高昌，高昌遂亡（计麹氏有国凡九代，历时一百四十四年）。以其地为西州，下置高昌、柳中、交河、天山、蒲昌五县。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年)没于吐蕃。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回鹘占据西州，至宋初仍为回鹘所占据，称“西州回鹘”。南宋时，高昌又为畏兀儿所有（据考证回鹘即畏兀儿）。宋宁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畏兀儿从元太祖征战有功，封其后代为高昌王，历三百四十余年。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为吐鲁番速擅所并，又二百三十九年。清初，服准噶尔，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平准噶尔，遂内属。计自成化五年至乾隆二十四年，速擅占有吐鲁番计二百八十余年。上面所述系二千年来高昌历史发展变化的全貌。高昌是丝绸之路必经的重要城市，所以前汉时与匈奴五争车师，后汉时三通三绝，隋唐时锐意经营，设州置县，其目的为保丝路之畅通。故明了高昌的历史，对“丝绸之路”的研究颇有裨益。

157　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　　　侯　灿

（《文史》1984年第22辑）

麹氏高昌王国，是我国中古历史上建立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封建割据政权。这个王国经南北朝、隋，至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为太宗统一，历时139年。因其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冲，故对当时内地与西域、中国与西方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本文研究了麹氏高昌王国的官制问题。对此，中外学者曾做过不少研究。本文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汇集和整理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和雅尔湖古墓区出土的墓砖及有关文字资料，对麹氏高昌王国的官制系统、等级、来源与性质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全文共分上、下两篇。上篇录列了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的考古资料197份，按年代先后编排，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麹氏高昌时期人记载的有关官制的墓表、碑记资料，计140份；第二部分是唐太宗贞观十四年灭高昌后，有关高昌官制的墓表、墓志资料，计27份；第三部分是麹氏高昌纸文书中有关官制的资料摘录，计30份。这三部分资料中共有官职162名，548个官次。下篇是对麹氏高昌王国官制考古

资料的研究。作者首先对罗振玉、黄文弼和日本汉学家嶋崎昌关于高昌官制的研究作了评价，然后对高昌官制的系统与基本等级进行了考证。认为麴氏高昌王国的官制大体分为六个系统：将军戎号、戍卫兵将、王府中央、东宫王都、郡府与县城官制。而其迁升等级，最基本的是一至九级，并按系统分等级对这些官制进行了论述。最后又探讨了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的来源及其性质。认为高昌官制是以模仿内地中央政权和继承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官制为主，又因时因事设置了一些。将军戎号主要是模仿北魏官制，行政官制则主要继承了秦汉以来的历代王朝之制。其官制性质，则是一个地方豪族控制的以联姻为基础的封建割据王国，并表现了对外的依附和臣服性。在这个王国中除国王外，第一等级的官职由王族的世子所独占，第二、三等级的高级官职除麴氏一族外，由世代与之联姻的张氏家族所拥有，第四、五等级的官职，也为少数高门望族所占据，这些家族都直接或间接与麴、张两家有着姻亲关系。通过这些联姻的家族，便构成了一个以麴氏家族为首的家族统治集团。它一方面依附于内地中央王朝，不断向其朝贡；另一方面视形势向邻近的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民族政权“臣服”。这种依附性和臣属性、也表现在官制上面。本文篇幅较长，引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十分丰富，论证细致严密。文内插有高昌王国各系统和各级官职名称表，阅读清晰醒目。文后并附录“麴氏高昌各王在位年数表”和嶋崎昌“麴氏高昌国官制一览表”，对研究丝绸之路政治军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158　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　　　　马　雍

（《考古》1972年第4期）

东晋时期，前凉张氏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置高昌郡。公元五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此地形成一个封建割据王国，仍以高昌为名，其居民包括汉族和若干其他西域少数民族，而以汉族为中心。在这二百年间，高昌共历四姓十五主，其历史见于《魏书》、《周书》、《宋书》、《梁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诸史，但以往的文献记载大多简略，兼有讹误。近代考古发现的许多珍贵文物材料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的领土。最近展出的出土文物中又有许多高昌的重要史料，其价值更在以前已知的文物之上。本文作者选出其中三种加以介绍，并对所涉及的高昌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研讨。一、延昌廿七年兵部买马奏文。原文虽因残缺不能通读，但大意十分清楚。这是高昌兵部收购民间私马的一张帐目呈报单据。文件开端似总叙买马事由，其后具列从某人处买某种马用钱若干。文后“谨案条例”至“奏诺奉行”一行为高昌奏状末尾的例行文字。鉴署于此行之后的三名官员是负责通进奏状的。奏状官签署之后书写奏状的年月日，延昌为麴氏王朝第七代国王麴乾固的年号。延昌二十七年相当于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签署于年月日之后的三名官员是负责画诺判行之官。这三名官员都带有“将军”头衔，其官阶均较前面奏状官为高。第一员□将军高昌令尹麴伯雅为国王乾固的世子，后于公元602年嗣位，并曾于隋炀帝时入朝于隋，在内地居留三年之久，是史籍上的知名人物。这种奏文的价值，一是可以从中了解高昌的行政制度，二是可以了解高昌物价之一斑。文中对于高昌的行政制度与物价论述甚详。二、族谱。原件入墓时已

剪作五纸鞋样，残缺较甚，文字多漫漶不明。作者择其文字保存较多的三页，据应有格式予以复原。这件族谱的格式和内地近代的族谱基本相同，谱上所表示的父子、兄弟、夫妻等亲属关系十分清楚。其中有的人写上名讳；有的人“讳”下空白，仅书“字某”，甚至连“讳”字也未填写，未填名讳的是修谱时尚在世之人，因据古礼，死后始称讳。妻子或称“夫人”，或称“妻”，显然称夫人者其夫有官爵，而称“妻”其夫是白身。所有妇女都不书“名”而只写“字”，有的妻室仅书“某氏”而已。官爵书于本名方框之左，但官爵的记载似乎还不齐全。从这几页残存的族谱上找不到明确标志年代的证据，而作者从所书写的官爵方面推断，此族谱大概是属于麹氏朝之物。如果对于时代的判断不错，则谱上的官爵又有助于了解麹朝的职官制度。其中如“主簿”、“从事”，已见于《梁书》和《周书》的高昌传。此外，如“啬夫”、“郎中”、“宣威司马”、“禅将军”，皆可补见所未知之阙。尤可注意者，在谱二上出现了“察孝廉”的记载，由此可见，麹朝不仅在设官分职方面大体袭用汉魏旧制，就是在仕进门经方面也采用了汉魏旧制。三、随葬衣物疏。吐鲁番出土文物中，有两件佛教徒的随葬衣物疏。一件的年代为延昌三十六年（公元596年），另一件为延和十二年（公元613年）。这两件随葬衣物疏与内地习见之随葬衣物券是性质相同的迷信文书，所不同者，这两件衣物疏都由一个“比丘”代死者移文于冥神的，所以名之为“衣物疏”，以别于一般的衣物券。在内地所见到的这类迷信文书中，与此衣物疏最类似者为山东临朐出土之北齐高侨为妻王江妃所造木板。这三件文书的时代极为接近，说明当时由山东至新疆民间的风俗习惯是何等一致。虽然这两件随葬衣物疏都属于佛教信徒，但移文的对象却是与佛教无关的五道大神，并且约请张坚固、李定度这类神仙来担任“倩书”和“时见”。这就说明汉族文化在高昌民间生活中根深蒂固，远非外来的佛教迷信所能动摇，乃至佛教僧徒也不得不遵循固有的风俗习惯。新疆地区的佛教艺术既具有健陀罗艺术的风格，也具有我国民族艺术的风格。从这种衣物疏上又看到，就在宗教信仰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方面，也和艺术一样，佛教一传入新疆，立即受到我国民族文化强烈的影响，从而与我国固有的风俗习惯杂揉在一起。这种融合现象在新疆体现的特别明显，由此可见中西文化交流之一斑。

159 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　　唐长孺

（《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高昌郡的设置是张骏于咸和二年（317年）击擒“叛将”戊己校尉赵贞的直接后果，也是自汉以来高昌地区本身发展的结果。高昌是丝路之上的一个重镇，对其历史沿革的研究，系丝绸之路研究的一部分。本文仅就曹魏复置戊己校尉至高昌郡设置以前这一段时期提供了一些有关高昌的资料，以供研究者探索。高昌和凉州特别是和敦煌有着密切的关系，北魏时人阚骃所著《十三州志》曾明确指出：“高昌壁，故属敦煌”。阚骃所谓“故”，当指东汉。据此，东汉时高昌已被认为是凉州乃至敦煌郡所属之地。东汉末年，凉州大乱，形成了许多地方割据集团。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继曹操为魏王，平定了凉州诸割据集团，西域道路重又畅通。是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过二年，复置戊己校尉。《魏略·西戎传》指出，曹魏戊己校尉仍治高昌。曹魏第一任戊己校尉

张恭，第二任即张恭之子张就。张就最后官至金城太守。他任戊己校尉时间较长。张就以后魏晋间充任戊己校尉的姓名不可考。直至咸宁初年有戊己校尉马循。马循之后的戊己校尉不详，只知索清曾任戊己校尉长史。自黄初三年（222年）复置戊己校尉至西晋，戊己校尉职如两汉，领兵屯戍，安定西域。屯戍情况史籍从未记述。作者根据罗布淖尔北古海头所出晋代木简中关于屯戍高昌兵士死亡的记录，确知泰始四年（268年），有一批兵士由海头调发到高昌留屯。海头是西域长史所在地，兵曹为长史府属，所发兵士应即西域长史所统之属。就在这一时期，高昌出现了所谓“士兵”。顾名思义，即由高昌士人充当。表明这个自汉以来的屯戍区已存在一定数量的土生土长的定居人户，也表明戊己校尉所领兵除了来自别地的戍卒以外，还有从高昌居民中组成的队伍。高昌定居人户的祖先，不论是汉人、车师人或其他各族人，统统是晋朝戊己校尉管辖下的高昌人。高昌士兵的出现还表明高昌也有了类似州郡兵的军队。两晋末年，中原大乱，凉州相对安定，迁入了大量人口，大概有一批迁入高昌。永宁元年（301年），张轨任凉州刺史后，子孙相承，统治凉州地区，史称前凉。张轨及其子张实之时，都作为晋的凉州地方官统治这个地区。高昌实际上已被视为凉州的一个郡。从以上资料看来，即使在东汉末年到“晋室不纲”的历史阶段，高昌以至西域仍然受朝廷派遣的戊己校尉、西域长史的管理。总之，在高昌置郡前，高昌已具有郡的规模以及作为郡的一切军、政制度。

160 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 程溯洛

（《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

公元九世纪四十年代漠北回纥汗国崩溃，大部分回鹘人留居原地，与其他民族相融合，其余分三支西迁河西和西域。由庞特勤率领的十五部，先集中于北庭附近，不久又越过天山，和他们的先世高车人汇合。到公元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庞特勤已在焉耆立号，奠定了高昌回鹘王国的基础。不久，回鹘第二位首领仆固俊率领吐鲁番盆地的族人，战胜北庭至安西一带的吐蕃统治者，收复高昌、轮台等要地，建立了以高昌为中心的回鹘政权。并在北庭建设了避暑的夏都。到十世纪后半期，高昌回鹘王国的疆域已经形成：东至哈密乌纳格什湖，西抵天山西部，南接和田，北达准噶尔盆地南缘，兼有吐鲁番、塔里木两盆地。王国自成立至十四世纪五十年代止，历时五百多年，始终臣属于唐、北宋、西辽和元，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十分密切。高昌回鹘王国的政治制度是，最高统治者为“亦都护”（突厥语，意为幸福的君主），自称为“阿斯兰汗”（即狮子王），其权力为专制和世袭，是国家的最高立法者和执行者。亦都护下的大臣，有宰相、枢密使、于齐尔、断事官以及各级大小伯克，属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主要为农民，其次为奴隶，再次为萨里（在寺院劳动的僧侣的仆人）。其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封建农奴制，有一小部分是封建租佃制。高昌回鹘王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主要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农产品有五谷、棉花、胡桐、畜牧业有马、牛、羊、野马、骆驼，并引天山雪水灌溉农田，利用水力以水磨加工粮食。手工业有丝、棉织品、皮制品、铁制品和硇砂（氯化钠）。由于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很兴盛，尤其与内地的贸易十分频繁。如与辽朝的燕京（今北京）和上京（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与五代、北

宋的首都洛阳、开封等，都有大规模的商业往来。回鹘政府还发行货币，制造秤、尺等，便利交易。在文化方面，高昌回鹘王国的绘画、音乐、舞蹈、戏剧、历法、文字、医药、宗教等，也有很大发展。用回鹘文写作或翻译的文献，有《乌古斯可汗传说》、《金光明经》、《玄奘传》等。回鹘人曾信仰摩尼教、佛教和景教。本文对高昌回鹘王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论述，对了解回鹘民族在东西方经济交流、文化传播，以及对丝绸之路的贡献都很有裨益。

161　高昌回鹘王国（公元850年——1520年）　〔德〕葛玛丽著　耿世民译

（《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2期）

本文共分十五个部分，概述了新疆昆仑山和天山之间的塔里木盆地地区的地形、民族、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重点介绍了回鹘族从塔里木盆地迁到吐鲁番地区后建立高昌回鹘王国的历史。作者对当地的雕塑、壁画和出土文物及写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高昌回鹘王国的制度、习俗、绘画、服装、农牧业、商业、住房、民族关系、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情况，从而勾画出这个王国当时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绚丽图景。作者还论述了居留在塔里木盆地地区的印度、塞人、粟特、吐火罗、叙利亚、汉、藏、蒙、突厥、回鹘等民族的来源和变迁，展示了古代新疆地区多民族杂居、各民族之间互相联系、影响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在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这两个地区的古代情况，特别是有四百年历史的高昌回鹘王国在经济、文化上的成就，对研究古代中西交通和文化贸易交流，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62　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　段连勤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78年第4期）

河西回鹘政权，是唐末至宋初河西三个地方性独立政权之一，曾在维护丝路交通、促进与中原政治经济交往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本文对这个政权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了论述。

据文献记载，今肃南裕固族乃河西回鹘的后裔。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其部众四散奔逃，一部分从蒙古迁入河西，史称河西回鹘。当时吐蕃占据河西，故史称"奔吐蕃"。早在公元一世纪初匈奴崩溃时漠北丁零人（回鹘族的先民）就大批迁往河西，唐武则天时，东突厥在漠北复国，进攻回鹘根据地乌德鞬山，九姓回鹘中的一部分又迁往河西．因河西早有回鹘，又因由甘州北出额济纳河（今黑河）、居延海、通往外蒙翁金河，自古就是通往漠北的要道，所以一部分回鹘"奔吐蕃"，有上述历史、地理原因。吐蕃将迁入的回鹘分散到河西陇右广大地区；甘州聚居较多。所以，除甘州回鹘外，尚有贺兰山、秦州、凉州、合罗川（即黑河）、肃州、瓜沙州等回鹘。

吐蕃对回鹘统治暂短。公元842年，即迁入的第三年，吐蕃内乱，两派争杀；850年论恐热追杀尚婢婢于瓜州，大掠河西，积尸盈野；沙州人张议潮起义成功，河西为归义军统治．但自875年黄巢起义，唐无力顾及河西，归义军政权渐渐衰微，河西遂由一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割据。

甘州回鹘初居山丹县东北，立有可汗。唐僖宗时，屡求册封。公元875年，唐赠绢一万匹予以支持。这支回鹘很快壮大，不久即据甘州城，开始扩展，至十世纪初，其势力东达河兰地区。公元911年，回鹘兵临沙州，张承奉尊甘州回鹘可汗为父；后曹义金又奉为“父大王”，河西为甘州回鹘控制。

甘州回鹘首领与中原五代各王以甥舅相称，贡使十分频繁。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年）册封权知可汗仁美为英义可汗。仁美死后，其弟狄银卒阿咄欲(即仁裕)立，后唐明宗又册封为顺化可汗。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年），又册封仁裕为奉化可汗。同时，回鹘也遣使贡辽，故《辽史·百官志》、《属国表》均将甘州回鹘列为辽的属国。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回鹘与宋朝关系又有发展。不仅贡献大批土特产，还将战马，骆驼等重要战略物资售予北宋，遂引起辽的关切及西夏的不安。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西夏攻占灵州后，即挥师西进；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夏军勾结辽军，进攻甘州回鹘。甘州回鹘向辽恭顺，辽撤兵；然后全歼夏军于甘、凉之间。次年，夏复遣大将张浦将精骑二万，占凉州，西上围攻甘州。可汗夜落纥乘夏军疲惫，遣大将翟符守荣出击，夏军大败。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辽国大将肖图玉借口甘州回鹘叛辽，发大军攻取肃州，尽徙民众于土隗口故城而还。此后，甘州回鹘又与西夏争夺凉州，连年攻杀，人物殆尽。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西夏陷甘州，甘州回鹘政权遂亡。

作者还分析了甘州回鹘政权覆没的原因，并列有甘州回鹘世系表，可资查考。

163　从两件敦煌文书看河西回鹘　　高自厚

（《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河西回鹘建立政权时期，正是中原多事之秋。随着中原王朝的盛衰更替，记载河西回鹘的史料也时详时略，很不完备。敦煌文献中的河西回鹘史料十分丰富，正好弥补了正史之不足。本文从两件敦煌文书即《曹元德上甘州回鹘可汗状》与《曹元忠状》的记载，探讨了五代中后期的河西回鹘状况，特别是甘州回鹘与沙州的关系。文章根据文书，对照《宋史》、新、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等史书的有关记载，来判定这两个状文的上状人、上状时间和上状对象。据作者考证，前一状文的上状人曹元德。是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义金的长子。曹义金死后，由曹元德继位。上状对象是顺化可汗，即甘州回鹘可汗仁裕。上状时间为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作者还指出，日本学者梅村坦在《以敦煌为中心的诸民族之动态（下）》一文，说这件文书是曹义金作为“兄”给“弟”甘州回鹘顺化可汗的信，是错误的。因为曹义金是顺化可汗仁裕的岳父，不可能称仁裕为“弟”。而曹元德是仁裕的内兄，故可称其为“弟”。后一状文的上状人曹元忠是曹义金第三子。上状对象仍是回鹘可汗仁裕。上状时间在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以后。根据这两件敦煌文书，作者考证了：一、仁裕的卒年问题。仁裕卒于周显德二年至宋建隆二年(公元955——961年)之间。二、仁裕在甘州回鹘史上的地位问题。仁裕在位三十多年，其历史功绩可概括为三个方面：（1）奠定了汗国的基础、确立了与中原王朝友好的方略；（2）巩固了汗国的统治；（3）维护了丝绸之路东段的安定，对发展中西交通作出了贡献。三、曹元德“亲到甘州”问

题。目的是商谈通过甘州去中原王朝求取册封爵位，说明甘州回鹘、沙州曹氏父子与中原王朝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四、甘州回鹘与沙州曹氏父子的相互争夺。他们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争夺，尤其对丝绸之路控制权的争夺十分激烈，两个状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者对这四个问题的阐述，具有独到见解。

164 敦煌遗书P2992号卷《沙州上甘州回鹘可汗状》有关问题考 孙修身

（《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五代时期，我国西北的河西走廊地区和中原情况相似，亦处于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在瓜、沙二州，先有张承奉建立的西汉金山国（亦称敦煌国）政权、继有曹义金建立的归义军政权。曹氏历经五世、八节度使，至宋朝而亡，统治瓜、沙诸州长达一百二十余年。在甘州，有回鹘族政权；凉州有吐蕃政权。而凉、甘、瓜沙诸州，都是古代中西交通干道、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这些政权间关系的好坏，对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中西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交流，乃至中原王朝的盛衰，都有至为重要的影响。本文作者通过对敦煌遗书P2992号卷《沙州上甘州回鹘可汗状》（确切的讲应为《曹元德上甘州回鹘可汗状》）有关问题的考释，得知《状》文记载的归义军当权者的甘州之行，是五代时期发生于瓜、沙曹氏归义军政权和甘州回鹘政权间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改变了自张承奉西汉金山国末期形成的与甘州回鹘族政权之间的不和，以及瓜、沙二州对甘州回鹘政权的依附地位，由原来的“父子之国”改变而为平等的“兄弟之邦”关系。同时也使一度由于回鹘族政权梗阻而终断了的“丝绸之路”再度复通，并为史书记载所证实，“使者往还于道”即是最好的说明。

165 回鹘与敦煌 〔日〕森安孝夫著 高 然择译

（《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

回鹘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民族。九世纪中叶之前，居住在漠北蒙古高原，建立过影响很大的回鹘汗国。公元830年以来，因为内部矛盾和自然灾害，以及黠戛斯族的攻击，于840年被迫放弃蒙古高原，四散迁徙。其中一支迁至敦煌以北的伊州（哈密），另一支迁到敦煌以东的甘州(张掖)。从此，回鹘族与敦煌开始有了接触。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对回鹘族与敦煌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证。作者首先介绍了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和《尚书变文（张淮深变文）》的内容，说明张议潮及其侄张淮深任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期间，均曾与回鹘军作战，并取得胜利。公元866年当仆固俊登上西回鹘可汗宝座时，张议潮曾向他表示过祝贺。925年，由于和阗王使从中周旋，双方在敦煌签写文书，明确规定伊州及其以西的纳职为西州回鹘王国的领土，脱离沙州归义军的管辖。但伊州与敦煌的通商关系仍继续保持。到十一世纪后半期，由沙州经罗布泊近端至鄯善，都是西回鹘王国的领土。文章还考证了甘州回鹘的来源和建立回鹘王国的时间。894年沙州归义军已掌握在张承奉手中。到905年，与唐朝脱离关系，自立为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白衣天子。但由于他丧失民心，不久即被曹义金推翻，由曹继任节度使，并自称大王。曹义金实行睦邻政策，与甘州回鹘王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还亲去甘州，与回鹘顺化可

汗举行会议，决定双方派使节团往中原王朝进贡。文章还引证曹义金给甘州回鹘可汗的一封信和《曹义金上回鹘众宰相状》，说明敦煌大王渴望睦邻友好的心愿。937年至940年期间，甘州回鹘与沙州关系不睦，敦煌去中原之路被甘州回鹘切断，只好从瓜州北上，进入西回鹘王国，然后东行去辽国入贡。940年以后，双方关系好转，955年，甘州回鹘带领瓜、沙州使者向后周朝贡。文章还引用敦煌王曹元忠为同族女性开凿的敦煌千佛洞第61窟壁画铭文，进一步说明敦煌与甘州回鹘双方都实行和亲政策，结成了姻亲关系，以巩固其团结友好。文章还对曹贤顺任沙州节度使时将"沙州敦煌"改称"沙州回鹘"的原因，进行了考证。本文引证史料丰富，论述周详，为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译著。

166 新复州回鹘研究 钱伯泉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公元十一世纪初，西域出现了一个新复州回鹘。本文探索了这个政权的来历、地望、与宋朝及其周邻的关系。回鹘原名回纥，今维吾尔祖先。公元744年，创立回纥汗国。曾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并与唐结成"甥舅关系"。八世纪末，回纥改名为回鹘。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发生内乱，黠戛斯人（今柯尔克孜族的祖先）乘机入侵，回鹘汗国灭亡。其败残余部四散奔逃，后来在西方建立了几个分散割据的小政权，如甘州回鹘、高昌回鹘、新复州回鹘等。据宋初历史记载，新复州又作新福州，它是于阗王居住的都城。五代宋初，统治于阗国的是李氏王朝，其中执政时间最久的是李圣天。近代不少学者认为李圣天是回鹘人，而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写的《新疆简史》认为，李圣天很可能是西迁的新复州回鹘。作者否定这种说法，认为李氏是汉唐以来的尉迟家族，于阗的主体民族也不是回鹘，而是于阗族。那么，新复州何在？据宋史记载，拂菻国使者在贡方物时说：其国"东至西大石及于阗王所居新福州，次至旧于阗"。这里的"旧于阗"无疑是指李氏的于阗国，而"于阗"无疑是指旧于阗之西的新复州回鹘。李氏统治于阗时，在它的西北方兴起了喀喇汗王朝。十一世纪初，喀喇汗王朝势力强盛，终于灭李氏王朝，并吞于阗。在此之前的九世纪末十世纪初，西回鹘形成东西两部。西部建都裴罗将军城，东部建都喀什噶尔城（疏勒），东部从属于西部。公元998—1017年，西回鹘国喀喇汗王朝的大汗（西部）为阿赫买德·本·阿里，其从兄玉素甫·卡迪尔汗则在喀什噶尔为东部汗王。玉素甫·卡迪尔灭李氏王朝后，即将于阗置于他的统治之下。此后宋史中出现的于阗国，都是指新复州的于阗回鹘政权。其统治者一律改称"于阗黑韩（汗）王"，始终建都于喀什噶尔。因此，新复州无疑就是疏勒。玉素甫·卡迪尔汗并吞旧于阗国后，立即遣使向宋朝进贡。天圣二年(1025)十二月，新复州于阗派出庞大使团，携带大批货物来汴京，并表示愿以附属国的身份与宋往来。元丰年间（1075—1085）新复州回鹘与宋朝的政治往来和贸易关系达到高峰。新复州于阗和宋朝的密切交往，使与宋为敌的西夏颇为恼火，他们抢劫新复州于阗使者和商人的事经常发生。新复州曾向宋朝请兵进攻西夏。宋未允许，而新复州即单独派兵出击。新复州于阗与宋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宋徽宗末年。

167 唐代吐蕃在新疆的活动及其影响　　马国荣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七世纪初，吐蕃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同唐建立亲密关系。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人送文成公主入藏，同松赞干布成亲，唐吐关系进入新阶段。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贵族不断向唐发动进攻，其中部分势力逐渐深入河西和天山南北地区。直到唐懿宗咸通七年（865年）河西节度使张议潮联合回鹘，收复北庭为止，吐蕃在新疆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一个多世纪，并留下了极大影响。本文记述了禄东赞之子钦陵兄弟违背松赞干布遗愿，为了夺取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对唐发动的一系列进攻。唐玄宗天宝以前，吐蕃势力主要活跃在昆仑山、哈拉昆仑山北麓，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周围，其目的在夺取对安西四镇的控制权。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在攻陷西域十八州之后，联合于阗，围攻龟兹。唐命左威大将军薛仁贵出击受挫，龟兹陷落，安西四镇首次为吐蕃控制。上元二年（675年），唐军在西域各国的积极支持下，迫使吐蕃退出四镇。高宗末年，钦陵勾结西突厥贵族继续与唐为敌。永淳元年(682年)吐蕃又攻占四镇之大部地区，并临近敦煌。武则天临朝之后，唐设在西域的金牙军又恢复了对安西四镇的控制。此后，斗争虽出现反复，但形势基本稳定。八世纪初，唐朝进一步加强了青海、河西一带的防御力量。吐蕃向西发展均未得逞。但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后因安史之乱，吐蕃乘机于广德元年（763年）攻陷河、陇、秦、渭、兰、廓、洮、鄯、岷、成等州。广德二年攻陷凉州。陇右、河西诸郡的大部分地区为吐蕃控制。建中二年（781年）沙州复又陷落。此时，西域地区的使者要绕道回纥才能至长安。八世纪九十年代，吐蕃在河西的统治逐渐巩固，其势力向西北推进，战败回纥攻占北庭，于是新疆北部同河西地区吐蕃势力完全连成一片。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沙州张议朝举兵起义，于咸通二年(861年)将吐蕃逐出河西。咸通七年（866年），张联合回鹘又收复北庭、轮台、清镇等地，使断绝了百余年的古丝绸之路复又畅通。本文主要论点是：一、吐蕃对西域的军事扩张，是吐蕃奴隶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动的，最终以吐蕃奴隶主政权的削弱和各族人民的坚决反抗而告终；二、吐蕃对西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和长期占领，客观上对唐朝中央政府管辖西域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起过消极影响；三、吐蕃在西域活动期间吐蕃和西域各族人民互相交往，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

168 新疆藏文简牍考述及释例　　王尧

（《文物》1984年第9期）

本文论述了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并诠释了简牍中的一些词语。藏文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文臣通米桑布札在公元七世纪中叶奉诏创制的。传世的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有三大类材料：一金石铭刻，二写本手卷，三竹木简牍。这三类材料都是八至十世纪的遗物。由于这些文献及其研究成果的问世，使人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吐蕃时期的语言、历史、文化、宗教，社会、氏族婚姻，民间习俗等各方面的面貌。1973年，在新疆若羌

米兰地区曾发掘了一座唐代吐蕃的古戍堡遗址。在堡的北部房屋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吐蕃文木简和文书，这对研究吐蕃军队在西域的活动、安西四镇的争夺以及"丝绸之路"的风云变幻，都是十分可贵的第一手史料。作者为了弄清藏文简牍产生于新疆的原因，回顾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据《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从公元662年到866年，吐蕃一直在西域驻有军队，与西域部落间结成各种联盟；670年占领西域十八州和安西四镇。755年至866年之间，西域受吐蕃控制，只有回纥成为对峙、抗衡的力量。吐蕃的势力在西域存在二百年，所以在新疆遗留下不少吐蕃文书和简牍。作者引用了四支简牍的原文和译文，并对其中的三个重要语词作了诠释：（1）突（dor或作dor—ka）。为田亩的计量单位，意为二牛抬杠一天所耕的面积。一突等于唐制十亩。（2）Nop—chung即婼羌的藏语对音。唐代又出现了"纳职"县，似应为藏语Nop—ched的对音，即鄯善。（3）mthong—khyab，这一词语的实际含义，学者们认识不一，有的解释为瞭望哨所；有的认为是具体地名；有的认为是一个机构，相当于一个千夫长、一个千户（东岱）；有的译为"通颊"。通颊设于边境，东道节度所辖有十通颊，东西各五。这里的通颊当属西翼。此一语词在吐蕃石刻、手卷和木牍中都有所见，人们弄不清它的含义，产生过许多误解。

169　吐蕃在敦煌统治形态的变迁（摘译）　　〔日〕山口瑞凤著　　朴宽哲摘译

（《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

本文根据史籍的有关记载和敦煌文书中的藏文史料，探讨了吐蕃在敦煌统治形态的变迁。文章共分四个部分：一、敦煌与吐蕃社会。吐蕃攻陷河西走廊八个州后，把这一地区称作德加姆（意为幸福之国）。吐蕃为了加强对河西的统治，设立"德伦议会"，任命了四位大臣，首领是德伦，其中一人称作"悉编"，即"都护"。吐蕃中央政权的组织是：在吐蕃王下设九大臣，其中三人为宰相、副宰相和内大臣，另一名为外戚首领，这四人共同执掌国家政权，称作"四大尚论"。官职最高的宰相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是军队的最高统帅。通常"大尚论"议会批准的事项，则由仅次于大尚论职位的诸大臣中的递送大臣，向"德伦议会"传达国王的"命令"，并以"命令书"的形式发布，使臣民周知。"德伦议会"下设"军团议会"。作者还探讨了依诸部族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而建立的"告身"制度和军团组织，以及与这些制度密切相关的司法和税制。二、吐蕃在敦煌的统治形式。在德伦议会的监督下，吐蕃在瓜州和沙州地区的统治机构中，曾有过统辖这一地区的"节儿"及其以下的行政官和职衔在节儿之上的赤蓬等官职。吐蕃占领敦煌不久，设置了以军人为核心的军政府，录用协助吐蕃的汉人充任官吏。其后，军政府逐渐带有民政色彩，还增加了汉人为行政官员。不久，又把汉人加以组织编入吐蕃军，并出现了汉人出身的吐蕃军团干部。经德伦会议再三要求和吐蕃中央政府的同意，明确了汉人官员的告身、职衔与序列的关系，使汉官的告身待遇普遍有了提高。作者根据敦煌P.1089号文书中的记载，制作了敦煌吐蕃官职名称和序列一览表，并将其中的四个重要职务与《唐蕃会盟碑》上的职务作了排比与考证。三、汉人军二部落的编成。沙州汉人军千户部落的编成和有关的指挥官以及其他行政官的任命，

是"子年"夏大尚论到边境，在陇州召开议会时作出的决定，并产生了沙州汉人职务名簿。作者列出了吐蕃人出身的官员任命名簿和汉人指挥官、行政官员的职务名簿，以及汉人职务的序列。并对这些职务作了分析和考证。四、沙州汉人军二部落成立时期。在沙州以汉人军为基础，二部落的组成是"子年"的事情。但"子年"究系何年，尚不明确。经作者论证，认为起初留驻沙州的军队，把汉人的村落分成左右二区，置于其统治之下。那时汉人居住区已分成上下二部落，上部落有左将、下部落有右将的行政区域。另外还有一个丝绵部落。作者还考证了唐蕃会盟的时间是在公元823年，在敦煌附近的德加尤察尔地方，签订了唐、蕃、回鹘共同参加的三国会盟，并铭刻盟文立碑，更修建纪念会盟寺院，收藏会盟参与人员的盟誓文书。又推断"子年"为公元820年或832年。汉人千户军二部落的成立应是公元832年。作者还对军部落与丝绵部落、沙州三部落等问题作了探讨。

170 关于喀喇汗王朝若干有争论的问题 〔德〕O·普里查克著 魏良弢译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

作为突厥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又称伊利克—汗王朝，或阿夫拉西亚勃王朝)，由于传统、宗教等诸方面的因素，其历史不仅空缺颇多，而且极为混乱。本文就喀喇汗王朝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从伊斯兰历五世纪前半叶的古钱学、世系及年代上提供了答案，并确定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必须明确的是，王朝成员在政治生涯中随职位变迁而具有相应变化的突厥称号，如阿尔斯兰汗、亦纳特勤等，实际上是一种"依次递升的品级制度"。而其伊斯兰教名(伊斯姆、孔亚)则保持不变。本文首先涉及的是关于"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本·阿里·伊利克"。由于"穆罕默德·本·阿里"和"阿尔斯兰汗·伊利克"的字样出现在同一时期的钱币上，所以许多研究者认为他们是同一人，对此，本文作者持否定态度，认为"伊利克"称号完全是与一个不带有"汗"的称号的人相关联，它是一个比"汗"低的称号。而最初作为"阿尔斯兰特勤"，以后是"亦纳特勤"，最后才是"伊利克"的穆罕默德·本·阿里。完全不可能是"阿尔斯兰汗"，而他的三哥，即大可汗阿里·本·穆萨的第三子阿赫马德·本·阿里和纳赛尔·本·阿里的弟弟—曼苏尔·本·阿里。才是"阿尔斯兰汗"他的伊斯兰教名是"阿卜·穆扎法尔·曼苏尔"，并带有"沙拉夫·达自拉"的拉卡博(别号、绰号)。其次，关于谁是"阿里特勤"?作者通过对各种纷乱的资料加以比较、印证，认为玉素甫·卡迪尔汗的兄弟托干汗与阿里特勤的兄弟托干汗必定是同一人，即阿里特勤也必定是卡迪尔汗的兄弟，从而是布哈拉的第一位征服者博格拉汗哈桑—哈龙的儿子，即"阿里·本·哈桑"，并拥有"桃花石"这一绰号。"桃花石·博格拉·喀喇可汗"正是阿里特勤的称号。再次，关于拉卡博"艾因·达乌拉"。作者分析说，拉卡博与"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本·纳赛尔"或"阿尔斯兰·喀喇可汗"是同一人，是河中地区的征服者纳赛尔·本·阿里的儿子，其伊斯兰教名为穆罕默德·本·纳赛尔。最后，关于两个喀喇汗国。作者叙述说，伊斯兰历五世纪二十年代起，建立在双王制原则上的喀喇汗王朝，被伊利克·纳赛尔·本·阿里的两个儿子穆罕默德·本·纳赛尔和伊卜拉欣·本·纳赛尔逐渐破坏。前者在费尔干以乌兹根

为首府，宣布自己为大可汗“阿尔斯兰汗”；后者即获得极大声誉的“桃花石汗”，在河中以撒马尔罕为首府，采用副可汗称号（博格拉汗）。从此，“阿里家族”——即纳赛尔·本·阿里（阿尔斯兰伊利克）之后代，独立于“哈桑家族”——即哈桑——哈龙·本·苏来曼（博格拉汗)之后代苏来曼·本·玉素甫·卡迪尔汗。伊斯兰历433年即公元1041年前后，两个独立的喀喇汗王朝国家形成：东部以巴拉沙兖（后以喀什噶尔）为都；西部以乌兹根（后以撒马尔罕）为都。两国各有一位大可汗（阿尔斯兰汗），一位副可汗（博格拉汗）以及一些其余的统治者（如“阿尔斯兰伊利克”等）。

171　喀喇汗王朝政治史述略　　魏良弢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版”1982年第2期》）

喀喇汗王朝对于中亚社会经济封建化的完成，对于伊斯兰教——突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由于喀喇汗王朝的著作流传很少，历史著作尤为缺少，且记载简略，因而阐明这一王朝的历史，主要应依据其邻近国家或地区的作者的著述，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如下问题：第一、这些著作是以本国或本地区王朝为主体进行编写，只有在军事上外交上涉及喀喇汗王朝时才附带提及。所以缺乏系统完整的材料，连编一张喀喇汗王朝世系表都感到困难多端，更难编写政治史了。第二、对境外作者著作中的喀喇汗王朝史料难于进行系统的发掘和蒐集，这些作者大多又未到过喀喇汗王朝所辖地域，仅凭传闻，殊多舛讹，真伪难于考订。第三、当喀喇汗王朝强盛之时，与周围地区接触频繁，境外有关著作对其之记载较多，相反则记载阙如。这样势必会出现两种情况，即需要详细说明的问题，材料却没有，不需要的却又多又详，其结果是主次不分，甚或喧宾夺主。本文作者不是重新发掘整理资料，而是在前人发掘、研究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归纳写成此文。文章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即：王朝初建时期(840—960)；政治发展时期(960—1041)；经济繁荣时期(1041——1130—41)；衰落时期(1130—41——1212)。文章分别对从回鹘汗国到喀喇汗王朝的建立和王朝初期历史、汗国体制、官制，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征服和田的宗教战争，萨曼王朝的衰落与哈桑汗征服河中，孟塔西尔反抗运动及阿里系统的统治，喀喇汗朝与花拉子模同盟及伽兹纳王朝征服花拉子模，塞尔柱家族的兴起和中亚形势的变化，西部喀喇汗国的形成与东部喀喇汗国的历史，西辽征服七河地区，桃花石汗伊卜拉欣统治下的西部汗国，塞尔柱王朝征服河中及其以后的西部喀喇汗王朝，东部汗国的后期历史，屈出律灭亡西辽，东部喀喇汗朝衰落，花拉子模入侵河中与西部喀喇汗王朝的灭亡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喀喇汗朝的历史，是统治民族的回鹘由游牧民族过渡为农业民族的历史。随着这一过渡的展开而产了各种特定的矛盾，如王朝首领与封地领主之间的矛盾、封建领主间的矛盾、东部王朝与西部王朝间的矛盾、世俗政权与宗教界之间的矛盾、王朝与新征服者间的矛盾等等。而这些矛盾又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因此，研究喀喇汗王朝的历史，就要阐明造成这一系列矛盾的根本原因。回鹘原是游牧民族，它西迁后初建政权的七河地区，也是游牧地区，而以后征服的喀什噶尔、和田和河中地区却是农业区，认识这一点对了解产生上述各种矛盾的原因就会得到合理的解释。历史上游牧民族征服农业民族的初期，一般

都是把庞大的帝国分成许多封地，授给自己的王室成员，喀喇汗王朝也是这样。因此，在王朝建立的初期，就开始了封建领主间，封建领主和王朝首领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而且与整个王朝的历史相始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喀喇汗王朝开始向定居生活过渡，他们不再满足于征收赋税，而是要求拥有土地，这样就同当地的土地占有者，首先是伊斯兰宗教界代表人物直接发生矛盾。因为当旧的世俗政权被消灭时，宗教界高级代表人物不仅未受到损失，反而加强了势力，以至攫取到世袭的世俗统治权。所以喀喇汗王朝与宗教界的斗争，表面上看是政权与教权的斗争，实质上则是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生活的汗室封建主同当地旧有的大土地所有者即宗教封建主之间争夺土地财富的斗争。由于喀喇汗王朝转向定居生活方式，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和利益，需要给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创造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必须限制游牧部落的抢夺活动，从而又引起游牧部落头目的不满和反抗，经常与王朝发生冲突和战争，成为王朝不安定的重要因素。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喀喇汗王朝后期内乱外患加剧，人民不堪其苦，终于在1206年爆发了桑贾尔领导的起义。花拉子模又趁机入侵，存在了近四百年的喀喇汗王朝终于灭亡。

172 喀喇汗王朝的疆域及其境内民族 魏良弢

（《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本文考证了喀喇汗王朝的疆域及其境内民族。由于这个王朝存在的时间较长（公元046年—1212年），疆界经常变动，加以资料贫乏，所以确定其疆域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目前常见的明确标出该王朝疆界的地图有三种：一、普里查克的地图，标准年代为公元1000年；二、《乌兹别克共和国史》的附图，标准年代为公元999年；三、《伊斯兰历史地图集》的公元十二世纪地图。由于这三幅地图所取的标准年代不同，所以边界很不一致。作者认为，确定喀喇汗王朝的疆域，有一个关键的年代，即喀喇汗王朝归并于阗李氏王朝的年代。此问题目前史学界虽有分歧，但至迟在公元1009年。这一年，喀喇汗王朝在东方把于阗李氏王朝并入自己的版图，在西方通过战争把同伽兹纳王朝的边界确定下来。根据《宋会要辑稿》、《宋史》、《西天路竟》、《突厥语词典》等史籍和资料中的有关记载考证，当时喀喇汗王朝的疆域大致是：东南在今若羌县境内，在玉门西的沙漠与西夏王朝接壤；正东在今阿克苏与拜城之间，同西州回鹘以荒山、戈壁为界；东北以阿尔泰山与辽国为界；正北在巴尔喀什湖一线；西北至咸海，包括花拉子模在内；正西和西南以阿姆河为界，同伽兹纳王朝为邻；正南在帕米尔之南，包括瓦汉走廊，以兴都库什山与印度为界。喀喇汗王朝境域内的居民，主要是由突厥语各民族和伊朗语各民族组成。喀喇汗王朝统治时期，在中亚各民族的发展、形成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是中亚各民族相互溶合和异化的过程；一些民族进一步发展壮大，一些民族消失，融合于其他民族，一些民族基本形成，一些新的民族开始形成。本文对喀喇汗王朝境内的一些主要民族的分布及其活动做了概述。这些民族计有：葛逻禄、突骑施、处月、样磨、古斯、回鹘、粟特等。喀喇汗王朝扼居丝绸之路的要冲达五百七十多年。研究这个王朝的历史及境内各民族的变迁情况，对研究丝绸之路有重要价值。本文考证的成果将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

173 论两个喀喇汗朝　　〔苏〕达维多维奇著　徐均平译

（《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本文从钱币学方面探讨了喀喇汗朝首领的称号问题。在喀喇汗朝时代，费尔干纳有三个城市制造铜币，即乌兹根特、马尔金南和库巴。这类铜币现存于伏龙芝市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历史博物馆内的共有184枚。其中库巴制造的钱币有两种类型：第一类，反面：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本·纳赛尔。正面：什哈布·阿特道拉。第二类，反面：阿尔马利克·阿尔斯兰喀喇汗阿米尔·阿尔乌玛拉。正面：法赫尔·阿特——道拉·巴赫拉姆。据文字史料考证，钱币上的穆罕默德·本·纳赛尔和阿卡布·埃恩·阿特道拉是同一个人。学者普里查克认为，阿尔斯兰汗的头衔是属于穆罕默德·本·纳赛尔的。本文作者则认为，他的观点没有根据事实，只是为了证明其臆造的结论，并列举史料驳斥了普里查克的观点。他举出的理由主要有：一、在回历434年（公元1042至1043年）霍占德的钱币上，正面是穆罕默德·本·纳赛尔的尊号"埃恩·阿特—道拉"背面是"阿尔斯兰汗"的头衔。按头衔的位置，它可能属于穆罕默德·本·纳赛尔，也可能属于当时充当宗主的另一个人。二、普里查克认为当时费尔干纳属于埃恩·阿特道拉，因而应当拥有阿尔斯兰汗这一称号。作者引用资料证明，这一称号只是在回历424—425年属于埃恩·阿特道拉，到回历五世纪30年代，这一称号则为他的弟弟易卜拉欣·本·纳赛尔所攫取，一些萨伽钱币也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作者根据具体事实和古钱学资料，证明从回历411年到446年（公元1020—21年到1054—55年），穆罕默德·本·纳赛尔从来没有成为整个费尔干纳有充分权力的独立占有者，在制造他的钱币的年代他只是费尔干纳的领主之一，而且几乎一直承认王朝的其他一些首领为其宗主。当时费尔干纳是阿尔斯兰汗苏莱曼·本·尤素福的辖区。因此，他的钱市是把苏莱曼·本·尤素福做为自己的宗主，象征性地把称号冲制到自己的钱币上了。本文引用古钱学的资料丰富，论证充分，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要地费尔干纳的历史情况提供了重要史料。

174 哈拉汗朝历史简述　　耿世民

（《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喀拉汗朝，是公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初，建立在我国新疆南部（以喀什为中心）和中亚一带的一个突厥伊斯兰王朝。它在我国新疆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的突厥化，特别是伊斯兰化起过巨大作用。哈拉汗朝在新疆维吾尔文化史上也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维吾尔文化的伊斯兰时期。由于汉文史料对这个王朝缺乏记载，所以目前有关我国通史的著作中几乎完全未被提到，即使有关新疆或维吾尔族历史著作中也大都语焉不详。近年来德人普里察克（O.Pritsak）对哈拉汗朝史的研究颇有成就。这份《简述》就是作者根据普氏的有关论著并参考英人包斯窝尔斯和土耳其人阿拉特的论文写成的。

《简述》以大量详实的史料考证了"哈拉汗朝"名称的来源、含义及演变过程，论述了哈拉汗朝的源出、初期历史、以及以后的盛衰兴亡过程。其中对哈拉汗王朝正式分

裂为东、西两部后，她们所创造的灿烂的伊斯兰文化论述更详。

东部王朝领域包括征服河中地以前的地区，即七河地区、喀什、和田以及费尔干的大部分。其东北边界达到库车以南。喀什在整个哈拉王朝时期都是王朝的宗教和文化中心，也是哈拉汗王朝伊斯兰教式陵墓的所在地。王朝初期的几个大可汗都住在这里，所以喀什被称为“王都”。西部王朝领域为河中地，包括西部费尔干。王朝两部分都包括有古老文化地区，西部王朝的两个主要城市(萨马尔罕和布哈拉)是伊朗（——塔吉克）伊斯兰文化的著名中心。东部王朝的首府喀什，在成为哈拉汗朝伊斯兰文化摇篮前，处于唐朝和回鹘佛教—摩尼教文化的影响下。许多著名的文化中心，也是哈拉汗朝各总监督的驻地，同时也是铸造钱币的地方。

这些情况导致在哈拉汗朝，不仅伊朗——伊斯兰文化（首先在河中地）得到进一步繁荣，而且在东部哈拉汗朝，突厥语成了文学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突厥（维吾尔）文化的新时期——哈拉汗朝时期，从而宣告伊斯兰突厥（维吾尔）文学的诞生。马赫木德·喀什噶里的不朽名著《突厥语大辞典》就是1072—1077年编纂成的。巴拉萨究人尤素甫·哈斯哈吉普的著名长诗《福乐智慧》也于1069—1074年问世，并献给哈三·本·苏来曼。这是最早的伊斯兰突厥语文献。

本文文后附有哈拉汗朝世系表，对纷繁的人事递变作了简明清晰的表达。

弄清哈拉汗朝的历史，不仅丰富了新疆地方史的研究内容，也填补了我国通史的空缺。特别喀什一带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所以对“丝路学”的研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75　西辽政治史稿　　　魏良弢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4期）

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三世纪初叶，在我国北方辽朝覆灭、大金帝国鼎盛、蒙古帝国兴起之前，丝绸路上曾建立过一个东起鄂尔浑河、西尽咸海，左右中亚形势八十多年的西辽王朝。史书中对这个王朝记载很少，且零散支离，极不完整。作者蒐集有关史料，经过考证、判断，较完整地编撰出了西辽王朝的政治历史概况，对研究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研究中亚诸国历史，将提供参考价值。

史稿较系统地编写了西辽王朝的兴衰始末，特别阐述了耶律大石创建西辽王朝的历史过程。耶律大石系契丹族辽太祖阿保机之八代孙，文才武略，曾为挽救辽朝的灭亡竭尽其职。1124年7月，在辽朝即将覆灭的前夕，因天祚帝不听“养兵待时而动”的劝阻，耶律大石知大业不可复，遂自立为王，设置北、南面官，带了二万人，从呼和浩特西北的夹山出发，到可敦城，说服七州十八部，得精兵万余。他贯彻“养兵待时而动”的方针，交通西夏，和好达达；宋朝也派人与之联系。经过五年生聚，实力强大后，整旅西征，在叶密立修筑城池，招抚当地突厥语各部族。金朝得知耶律大石主力西征后，曾进攻可敦城，但大败而归。至此，西辽疆土东起土拉河，西到额敏河，户数达到四万。耶律大石在文武百官拥戴下，于1132年2月5日在叶密立正式称帝，按当地习惯，号称菊儿汗；群臣又上汉尊号天祐皇帝；建元延庆。接着，耶律大石统帅大军南进，将回鹘汗国

灭并。又应东部喀喇汗王朝伊卜拉欣请求，于1134年初进入巴拉沙衮，建都于此，号称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三年为康国元年。是年3月，派七万骑东征，欲光复旧物，重建大辽帝国。东征部队行程一万余里，因牛马死伤甚多而还。但不久，又突袭金朝，大败金将粘罕。1137年，西辽军队进入费尔干谷地，击败西部喀喇汗王朝。当时，该王朝是塞尔柱王朝的附庸国，其大汗马赫穆德逃回都城撒马尔罕后，向塞尔柱王朝苏丹桑贾尔求援，并鼓动保卫穆斯林，说穆斯林遇上了灾难。于是，呼罗珊、伽兹纳、西吉斯坦、马赞兰德和古尔的国王们，都带兵加入苏丹桑贾尔部队，达十万骑兵。1141年9月9日，两军在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会战。结果，桑贾尔的军队大败，其妻和右翼指挥官库马吉、左翼指挥官西吉斯坦国王等被俘。从此，塞尔柱王朝的势力退出河中地区。耶律大石释放战俘，领兵进入撒马尔罕。不久，又征服花拉子模，使之成为附庸国，西辽的版图遂基本确定。史稿着力阐述了西辽王朝的国家组织和基本政策，历史地恢复了其面貌。耶律大石亲身经历了赫赫大辽的土崩瓦解，从惨痛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所以他创建了中央集权的西辽王朝，没有分封土地，不许将军们控制军队。根据统治区农牧兼有的情况，沿用了大辽帝国"置北、南面官属"的体制，分别治理。在经济上，对居民的所有权不曾改变，特别是耕地仍归居民使用，没有发生游牧民族征服者惯用的"毁耕为牧"的行为，同时，实行薄赋税政策。在宗教方面，实行开放，各种信仰都得到保护。对附庸国采取羁縻政策，让原来的王朝继续统治本土。因此，某政策深得上、下拥戴，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无疑对推动中亚社会繁荣进步，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历代王朝衰落，都有其规律性。西辽王朝也不例外。在感天后和夷列执政时期，仍然贯彻耶律大石制定的国策，对内生聚，对外弭兵，国力不断加强。但到承天后和直鲁古执政时，统治集团奢侈腐化，法制不整，军纪败坏，对外连年用兵，对内加重剥削，民不聊生，附庸国纷纷自立。西辽历经五代统治，至1211年秋直鲁古出猎被乃蛮王屈出律俘获，耶律大石创建的西辽王朝才告结束。

176 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　　周良霄

（《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

西辽的历史，在中国通史和中外交通史方面都有着重要地位。本文是作者研究西辽史的心得，有些问题与前辈和专家有不同意见，并提出商榷。一是耶律大石北走的路线问题。《辽史》卷30天祚皇帝曰：天祚亡夹山，耶律大石自燕京来依，天祚责其擅立耶律淳之罪，"大石不自安，遂杀肖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据《金史》地理志，夹山在云内州柔服县北六十里，一般认为即今内蒙古自治区萨拉齐（土右旗）西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考定夹山在土左旗之北、武川以西之大青山某地）。自夹山北行三日的黑水究竟何所指，这是多年聚讼的问题。作者在详细考释了《元史》、《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河内李氏先德碣铭》、《成宗纪》、《文宗纪》等史籍的有关记载后指出：元朝在长城以北的漠南地区创建的新路，

除德宁而外，还有应昌、全宁和永昌府，它们是由驸马鲁王和诸王兄必帖术儿所兴建起来的藩府所在。德宁就是汪古部赵王所兴建的藩府新城。今内蒙达茂联合旗址百灵庙北六十里处有阿伦斯木古城遗址，当为元时的赵王藩府。然则此爱不干河（北流为哈尔红河）畔之阿伦木斯(俗称五英雄城)即为元代之德宁路，爱不干河也就是元代的黑河。今百灵庙南不远，金界壕的遗迹尚依稀可见。自萨拉齐西北某地越大青山至百灵庙一带大体可为三日路程。当日汪古部驻金源界外，畔黑水而居灼然可考。二是北走后的驻地问题。大石北走之后，《辽史》谓其“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唐代的北庭都护府在新疆吉木萨尔之北。梁园东怀疑“都护府”是衍之，大石北走后其驻地在“北庭”，即漠北之地。作者列举了四条证据，认为这个意见是符合事实的。根据《金史》、《辽史》、《元史》等史籍的记载与耶律铸“和林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比较，即可明确术外尼所说的古AFrāsiyāb放鹰之揭揭察哈湖之地，即耶律铸所说的回鹘苾伽可汗宫城所在。由此证明,元代和林川地区,即唐代的合罗川，正是回鹘的斡耳朵城与可敦城的所在地。为此，金和南宋资料在提到大石北走时是把斡耳朵城与可敦城两名互用。这也为大石北走后其活动地区是在蒙古地区提供了佐证。三是西征的年代的问题。大石西征，梁园东考定为天会八年（1130年）。其理由有二：1.自天会三年至七年中，所有之二月均无“甲午”日，惟1130年2月22日为甲午，与《辽史》“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合。2.《金史·粘割韩奴传》“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讨大石。征兵诸部，诸部不从。石家奴至兀纳水而还。余睹报元帅府曰：闻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城，恐与夏人合，当遣使索之。”作者认为第一条，《辽史》的记载讹误实多，不足为据。重要的是第二条，《辽史》本传失载，《金史》亦不详其年份,因此粘割韩奴传“八年”之说遂成孤证。作者在求证了宋人的材料后认为，粘割韩奴传“八年”之孤证值得怀疑，而1131年西征之说，似乎较1130年说有较多的旁证。四是有关西征的诸问题。大石西征，《辽史》所记甚简，讹错实多，很难据为信史。作者依靠中亚的史料进行了校正，钩画出一个大石西征的大致轮廓。五是有关西辽的统治问题。西辽的疆土，直接控制地区包括今伊犁地区和谢米里奇的南部、锡尔河上游东北的部分地区。属部则包括河中、喀什噶尔、和阗、和州以及乞儿吉思、康里、哈喇鲁等诸部。西辽是一个以汉族文明为依据的中亚王朝。历朝的古儿汗都实行我国传统的建元纪年；并依照中原王朝的惯例，从户而不是中亚所习惯的从丁来征收税赋，人民以田为业，产物的十分之一输官。不实行分封采邑制度，契丹文字继续在使用；巴托尔德且相信官府所用语言可能为汉语。耶律楚材说大石“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庙号德宗。”只见其汉文化影响之深远。

177　试论耶律大石西迁的原因　　纪宗安

（《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

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建国二百多年的辽王朝，在金朝军队的强大攻势下濒于崩溃之际，一位契丹贵族耶律大石毅然率军西走，行程万余里，历时十余载，终于在中亚建立起庞大的西辽帝国，使辽朝国祚又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并给十三至十四世纪的中亚历史增添

了内容。本文根据《辽史》、《金史》、《续资治通鉴》等史籍的有关记载，论述了耶律大石西迁的原因。文章首先分析了辽朝天祚时期的国内形势，指出它败亡之势自道宗后朝已见端倪。道宗在后期昏庸无道，“谗巧竞进，贼残骨肉，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官吏们大都贪赃枉法，放债营商，恣意役使管内人民，加以连年受灾，人民饥馑，民怨沸腾。到天祚帝即位，倒行逆施比道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于游畋，信用谗谄，纪纲废弛，人情怨怒”。因而农牧民不堪剥削压迫纷纷起义反抗。甚至连统治集团核心人物之一的耶律余睹，也“引兵千余，并骨肉军帐叛归女真。”长期遭受契丹贵族残酷剥削压迫的女真人民，也与内地人民遥相呼应，掀起反抗辽朝统治的斗争。于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汇成一股摧毁腐朽辽朝的强大力量。由于辽朝政治上的腐败、人民的穷困，已从根本上毁坏了辽军的士气和纪律。在斗志旺盛的女真军队的攻击下，数量占绝对优势的辽军屡战屡败，望风奔溃；各地守将纷纷叛降。短短几年内，金军进展三千里，天祚帝率残兵逃亡到夹山。在辽朝国内陷入一片混乱之时，耶律大石与宰相李处温、四军大王肖干等，拥立天祚帝的儿子秦晋王淳为帝，号天锡皇帝，树起了抗金保辽的旗帜，史称“北辽”。在耶律大石的主持下，北辽立国九个月就抵抗住了南宋北上的劲旅，保卫了边境，显示了他超人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外交才能。但此时更为强大的金兵分三路南下，进攻辽国，居庸关失守，燕京危急。朝廷内大臣争论激烈，有的主张降金，有的主张投宋，还有的主张迁都，只有耶律大石决心归附天祚帝。他力排众议，带领七千骑与肖太后投奔夹山。半路上遇金兵交战，失败被俘。五个月后，又伺机携五子逃出金营，沿途招集失散的人马，回归了天祚。后因天祚帝不自量力，再某出兵，收复燕云，大石遂抛开天祚，毅然踏上西迁的征途。文章分析了大石西迁的原因：一是避开宋、金势力强大集中的地区，向西保存、发展实力；二是辽国与西北诸国特别是西夏，保持着长期和睦友好的关系，西迁时少后顾之忧；三是辽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也亲密友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特别是与高昌回鹘的贸易最大，在西迁时会得到他们的友好的帮助；四是辽国西北边防的可敦，尚存有大批有战斗经验的士兵和数十万马匹，可以得到人力和物力的补充。史实证明，天祚朝的崩溃是必然的，大石西迁的决策是正确的。大石所建立的西辽帝国，在中国和中亚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178　西辽疆域浅释　　邓锐龄

（《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

辽王朝为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所创建，初国号曰契丹，公元947年改国号曰辽。到公元1124年，辽濒于灭亡时，辽宗室耶律大石脱离辽廷，自立为王，从黄河河套逃往北方。1130年，又率领故辽北边的部分戍军，包括辽治下的汉人，以及突厥、蒙古、通古斯、唐古特等族的若干部众，自鄂尔浑河畔出发，西行万里，于1132年到达中亚的吹河（楚河）流域，取代由葛逻禄、葱岭西回鹘建立的哈拉汗朝的东支的统治，入居八剌沙衮。在一度谋复故国的东征失败后，他继续西进。公元1141年，在寻思干（今撒马尔罕）附近，大败塞尔柱突厥苏丹桑札儿统帅的西域诸邦联军，降服花剌子模，

拓地及于阿姆河，创立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封建帝国，传祚五世，历时八十八年，1211年才为乃蛮部屈出律所篡夺。这个政权的名称，依《辽史》现称曰"西辽"。在它存在时期，北方及西方诸族称之为"契丹""或"大石"。汉文史籍中，在"西辽"一名以外，还有"大契丹大石"、"后辽"、"大石林牙"、"黑契丹"、"契丹"等名称。西辽先后五个统治者都采用汉文尊号、年号和庙号。实际上这个政权是"辽"王朝在新的民族地理环境下的继续，其立国纲纪，典章制度，泱泱有中华之风。所以金、元以来史家把"西辽"与中原诸王朝并列，记叙其故事，笔法一如中原王朝，从不视为异域。因此，研究我国十二到十三世纪的历史，西辽的历史及其疆域应是一个重要课题。关于西辽的疆域及四至，我国史学家丁谦、岑仲勉等人都做了大量考证研究，中外所绘有关西辽历史地图大致相近，但又缺乏完整明确的记载。作者根据《辽史·天祚纪》、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及其它史籍的记载，探讨了西辽初建时定都拓地的经过，并分析了全盛时代的疆域四至问题。耶律大石奠定西辽版图基础的时间，据《金史·粘割韩奴传》和巴托尔德引用的伊本爱耳提耳的记述，为十二世纪四十年代，而西辽领土开拓最广时则在六十年代。作者就此期间有关西辽疆域内部沿革和周邻各地的边界沿革问题作了简要说明后，指出了公元十二世纪六十年代西辽的边界走向。从它的边界走向，我们清楚的看到西辽的疆域，正处在丝绸之路的中亚中心地带。因此对西辽政权及疆域的研究，无异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79　关于"后西辽"　　　王治来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本文作者认为《辽史·天祚纪》记西辽事，时间颠倒、事实错讹之处甚多。其原因在于《辽史》的编纂者不了解中亚的地理情况，把十三世纪前期哈拉契丹人在伊朗克尔曼建立王朝的材料同耶律大石混为一谈所致。为此，作者简述了克尔曼的哈拉契丹王朝史，并称之为"后西辽"。

关于"后西辽"，多桑《蒙古史》说："突厥斯坦与起尔漫有两个哈拉契丹王朝，后一王朝晚于前一王朝一百多年"。按术外尼《世界征服者史》、维特佛格耳同冯家升合著《辽代中国社会史》所记，起儿漫王朝的建立者为八剌黑。八剌黑和他的兄弟哈迷的不儿都是哈拉契丹人，在西辽为官。公元1210年，西辽在塔拉斯败于花拉子模沙摩诃末以后，八剌黑与哈迷的不儿受到花拉子模沙的信任并委以官职。八剌黑初仕于摩诃末，继又仕于其子加秃丁。加秃丁统治伊拉克之地，八剌黑被任命为伊斯法罕统兵官。蒙古西征，花拉子模沙摩诃末败亡，八剌黑即带兵到伊斯法罕，然后占有起儿漫，并建立了一个历时八十年的哈拉契丹王朝（1224—1303年）。此时他皈依伊斯兰教，并请哈里发封以素丹称号。

八剌黑死于1235年7、8月间。在此前后，其子鲁克那丁与其堂兄忽都不丁在王位继承上，因受蒙古窝阔台汗与贵由汗的分别支持，曾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起先鲁克那丁承袭其父忽都鲁素丹称号，忽都不丁受命到中国效力。贵由汗死后，蒙古汗位转到拖雷系的蒙哥汗手中，形势大变，忽都不丁被封为起儿漫素丹，而将鲁克那丁处死。忽都不

丁在位后，娶八剌黑之妾忽特鲁格·土尔汗为妻。1258年，忽都不丁死，其子哈拉吉年幼，忽特鲁格·土尔汗摄政达十五年之久。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路经起儿漫，正值这位女王在位，最后一位统治者在位二年，至1303年而绝。

180　贵霜王朝的形成　　　阎宗临

（《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1期）

本文论述了古代中亚贵霜王朝建立与衰亡的过程。作者首先指出：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从东方到西方有四个大国：汉朝的中国、贵霜王国、安息王国和罗马帝国。这四个帝国各有其独特发展的历史，在人类文化史上都起过重要作用。中亚是古代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介地带，而贵霜王国的历史发展，直接对印度与安息起着重要的作用，间接对罗马与中国也有深刻的关系。接着，作者考证了月氏民族的历史发展及变迁。月氏一辞是在战国时开始使用，当时他们居住在“雁门之西北，黄河之东”，即今山西北部。到战国晚期，月氏西移，占据了东自黄河，西至瓜州的地带，以后即以瓜州为中心居地，占据河西走廊一带。到秦汉之时，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至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冒顿单于东击败东胡，西进攻月氏，迫使月氏离开敦煌祁连间，向西方迁移，到达塞种人所居的伊犁。时间约在公元前174年左右。此后，乌孙昆莫因月氏曾杀其父难兜靡，在匈奴的帮助下进攻月氏，迫使月氏第二次西迁，约在公元前161年前到达妫水，乌孙则进据伊犁。张骞出使西域，到达月氏会见月氏国王时，约在公元前128年。公元前124年，大月氏侵入大夏。至公元前二世纪末，月氏移居于阿姆河南，设立五个翕候：休密、双靡、贵霜、肝顿与高附。这反映出月氏由游牧转为定居。到公元四、五十年间，贵霜翕候丘就却攻灭其他四翕候，自立为王，建立了贵霜王国。此时贵霜王国繁荣富强，实力强大。丘就却晚年又兼并罽宾。贵霜王国的都城初在呾义始罗附近，后为弗楼沙，即今之白沙瓦。丘就却死后，其子阎膏珍继位，向南部发展，进据旁遮普，一直到贝拿勒斯。这是贵霜王国版图最广的时期，形成大贵霜王国。其后迦腻色迦第二立，约在公元78年至102年间统治贵霜。这时班超出使西域。迦腻色迦欲求汉公主、被班超拒绝，遂派兵攻击班超，被班超打败。此时贵霜王国已成为国际中心，是中国、印度、波斯及希腊文化的汇集地区。贵霜王朝崇尚佛教，很早即向中国传授佛经。公元三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兴起，阿德希（226年至242年）向外侵略，贵霜王朝趋于衰落，仅据有喀布尔地区。公元402年，印度北部为笈多王朝所统治，贵霜王国的疆域已退至兴都库什山以北。至四世纪中叶，贵霜王国经常受哌哒的压迫，波斯萨珊王朝又向东发展，占领了喀布尔，贵霜王国遂趋灭亡。本文对月氏的两次西迁，考证较详，并对伯希和主张贵霜即大夏，而非大月氏的说法进行了考辩。因贵霜王国扼居丝绸之路要冲，研究其历史发展对研究丝绸之路有重要意义。

181　哌哒国在中亚的统治　　　苏北海

（《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

哌哒人是在丝绸之路上有过重要影响的民族。他们曾在公元五世纪二十年代到六世

纪中叶，约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在中亚建立了一个大帝国，统治过康居、大月氏、印度西北部和塔里木盆地部分地区。本文根据史籍有关记载，考证了嚈哒人的来源、族名、建国经过和疆域范围等问题，嚈哒原属车师别种，是柔然的奴隶，居住在阿尔泰山，以游牧为主。其名称是由其国王厌带夷栗陁的名字省译而成。当他们逐步壮大后，经过激烈的反抗，才摆脱了柔然贵族的压迫，从阿尔泰山往西迁徙，经过今哈萨克草原一带，先占据康居地区，再进占河中，然后越过阿姆河征服了大月氏贵霜帝国。经作者考证，认为《魏书》、《北史》的"大月氏国传"中所说大月氏受到蠕蠕族侵略，遂越兴都库什山南逃一事，实为嚈哒族入侵之误。作者指出，美国学者麦高文认为嚈哒西进时先经过塔里木盆地，再征服大月氏贵霜帝国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实际情况是嚈哒人在与波斯萨珊帝国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后，才能集中力量一举歼灭贵霜帝国。六世纪初，又和萨珊王朝订立和平条约，有了二十五年较为安定的时间，才有余力越过帕米尔高原侵占塔里木盆地一部分地区。又因无力驻兵防守，只好保留各国的君位，各国承认嚈哒为宗主国，每年献纳贡品。文章还详细论述了嚈哒人和萨珊王朝时战时和、历时近一百年的战争和交往情况，论述了嚈哒贵族对印度人民的残暴统治，以及印度人民反抗嚈哒的英勇斗争。公元565年左右，突厥贵族联合波斯军队，彻底打败并消灭了嚈哒王国。于是阿姆河以北原属嚈哒的地区为突厥所占有，以南为波斯所占有。文章分析了嚈哒国灭亡的原因，是由于嚈哒保持着氏族部落的组织形式和游牧习尚，而与各属国只是宗主国和朝贡的关系，帝国仅仅是一些部落和部族的集合体，所以嚈哒在国内的统治是不巩固的。文章还论述了嚈哒国在其强盛时，为了控制从中国通向里海的丝绸之路，不仅把势力伸至塔里木盆地，还尽力控制高昌、伊吾通向内地的商道，与柔然、高车两族进行了长期争夺两地的战争。当嚈哒控制了丝绸之路后，便和建立在中原的北魏王朝进行了长期频繁的进贡和经商，从而也加强了中国同中亚的经济文化交流。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和货币流通的需要，嚈哒统治者发行了铸有嚈哒文的钱币。附属嚈哒的一些小国也铸造了自己的钱币。这些都反映了嚈哒国内商品交易的发达。与此同时，嚈哒国的统治者对国内的佛教进行了极大的破坏，僧徒佛寺大量减少，佛教僧侣与之进行了长期残酷的斗争。

182　《魏书·嚈哒传》考释　　　余太山

（《文史》1983年第20辑）

魏收所著《魏书·西域传》于唐宋间早已亡佚，今本《魏书·西域传》为宋仁宗时刘恕等人据《北史·西域传》补入。《北史》出自唐李延寿之手，主要取材于魏、齐、周、隋各代正史，其中《西域传》尤为《魏书》为主要依据。为了恢复《魏书·西域传》的本来面目，许多日本学者先后作了不少研究，他们所用方法相同，但推理方法并不一致，因之所得结论也有差别。本文作者同样采用他们的方法，即将《北史》、《周书》、《隋书》的《西域传》进行排列对比，对所传嚈哒史实作出了较切合实际的诠释。

自北周以来，对嚈哒人的起源日趋模糊，只知嚈哒在中亚的统治中心在吐火罗斯

坦，即原来贵霜帝国的发祥地，此贵霜帝国，东汉起就一直本其故号为大月氏。《北史》误以为嚈哒是“大月氏种类”。《魏书》原文称嚈哒“亦曰高车之种类”。据《魏书·本纪》载，嚈哒使北魏至少有十三次之多，不可谓不频繁，彼此有比较深的了解，《魏书》修成于北齐文宣帝天保二至五年（551—554年），其时嚈哒尚未被突厥、波斯所破灭，因此《魏书》必有所依据，故嚈哒之起源当从《魏书》较为可信。据《通鉴》卷一九三嚈哒条补，嚈哒至自金山而南，“至文成帝时已八九十年矣”。嚈哒首次遣使至北魏在文成帝二年(456年)，由此上推，嚈哒人南迁时约在公元366—376年间，又嚈哒自金山南迁首次到达地点应为“粟特”，即索格底亚那(Sogdiana)。嚈哒原自称“匈奴”，自五世纪中叶名王 Hephthalanus 出，始有嚈哒这一称号，因此，太延三年（437年）北魏使臣董琬、高明出使西域时，只知粟特有匈奴不知有嚈哒。当时统治粟特的是第三代“匈奴”，即嚈哒王名忽倪。

嚈哒本游牧民族，长期逐水草而居，进入中亚后也一直保持着这种习俗，宋云在神龟二年（519年）至嚈哒国时，对此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当嚈哒开始定居之日，它已接近覆亡之时。嚈哒的风俗，各书记载互异，作者根据宋云《行记》、《魏书·蠕蠕传》等资料作了订正。

《魏书·嚈哒传》所据资料应为宋云的《行纪》，《行纪》谓嚈哒“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贺。”牒罗，《魏书》作“叠伏罗”，即今之查布尔（Zabul）。这就是说，嚈哒势力在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南控乾陀罗、查布尔；北达敕勒（即高车）；西侵萨珊波斯，迫使波斯纳贡称臣，并占领波斯帝国部分东方领土；东边势力直达于阗，奄有中亚大片土地，控制四十余国政权，实中亚一泱泱大国。嚈哒还为控制东西方商道，与印度笈多王朝、波斯萨珊伊俟嗣二世(Yazdegerd11，440—457年）以下诸王进行过多次争夺战，并与高车发生冲突，与蠕蠕、吐谷浑抗衡，一时国威盛甚。后突厥兴起，六世纪中叶嚈哒被突厥破灭后，嚈哒之名再不见于史册。

183　嚈哒史二题　　　余太山

（《中华文史论丛》　1985年第2辑）

本文为《魏书·嚈哒传》考释一文的继续和补充，主要对嚈哒控制和统治中亚的方式；嚈哒都城之所在，这两个问题作了深入地研究和考订。关于嚈哒控制和统治中亚的方式，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一是嚈哒和粟特的关系问题。嚈哒南下占据粟特当在366—376年之间，原自名“匈奴”，五世纪中名王 Hephthalanus出，始有嚈哒之名。但《魏书》本世纪却有436—479年间粟特九次朝贡的记载，这显然是个矛盾。第二是嚈哒首次入侵笈多印度的时间应在塞建陀笈多（455—467年）即位之初，据宋云《行纪》推算，嚈哒灭乾陀罗在五世纪六、七十年代，《魏书》本纪载至少在477年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尚属寄多贵霜王，并未为嚈哒所吞并，嚈哒人又怎么可能在塞建陀笈多即位之初就入侵笈多印度呢？第三是《魏书》本纪所载嚈哒统治下的中亚各国朝贡的年代问题，即中亚各国朝魏的年代，同他们被嚈哒征服的时间并不相符，最典型的例子是吐呼罗国

（吐火罗）。作者认为只要将嚈哒统治中亚的方式弄清楚后，上述三个矛盾始能迎刃而解。作者通过大量的中外史料，认定嚈哒自金山南下征服了中亚各国，但并未将这些国家一一消灭，而是强迫他们纳贡称臣。在它统治下的诸小国依然有自己的国君和领土，有贸易和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必须向嚈哒统治者纳贡。嚈哒和粟特、笈多印度、高车、波斯及诸小国莫不如此，即通过操纵王位的废立，扶植傀儡政权之类的方式与手段控制和统治中亚，这从嚈哒本身的游牧生活、经济基础、客观环境和主观愿望都是相符合的，因而也是必然的。

至于嚈哒的都城，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周书·嚈哒传》和《隋书·挹怛传》，前者称："其王治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余里"。后者称"都乌浒水南二百里，……都城方十余里。"但《魏书·嚈哒传》、《梁书·滑国传》、宋云《行纪》等咸谓：逐水草，无城廓。但在568年突厥使臣到拜占庭时，对拜占庭皇帝说："其民居有城廓"。其民既有城廓，其王似应有都城，由此可见《周书》和《隋书》所记应是事实。游牧民族进入农耕区后，也难免要逐步走向定居，嚈哒也不例外。问题是嚈哒都城拔底延究竟在什么地方？这对研治中亚史及丝路之学来说，是必须要弄清的问题。作者根据国外诸家研究的结果，复与中国各有关史籍记载进行了排比，从语言翻译之演变，方位之所在、距离之远近及诸讹误之产生，作了一一考订。认为：拔底延即Balkh；薄提即拔底延，即Balkh；薄提即薄提延（拔底延），非阿缓城（Warwaliz）；阿缓城不是吐火罗人的都城，也不是嚈哒的都城。为此，嚈哒定都当在公元520年及后，其都城只可能是Balkh，公元437年左右寄多罗王迁出后，嚈哒人很可能在此先后扶立吐火罗人和月氏人的傀儡政权，该地遂成为嚈哒人，吐火罗人和月氏人的活动中心。明乎此，则嚈哒都城问题可获解决，中国史籍中有关吐火罗的若干混乱记载也可得以澄清。

184 关于嚈哒的覆亡　　余太山

（《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本文探讨了突厥与波斯联盟消灭嚈哒国的时间、过程及后果。关于这个问题，诸家多有考证。一般认为嚈哒亡于公元562—567年间。有的学者则认为，嚈哒国之破灭，应在558年以前。本文同意后说。据《新唐书·突厥传》和《周书·嚈哒传》记载，突厥首先征服了嚈哒，然后征服阿瓦尔人和Ogor人，故Ogor人被突厥征服必在558年或稍前。至于嚈哒灭亡之过程，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木杆可汗于555年灭柔然汗国，其西境遂与嚈哒邻接。而波斯库萨和一世也与突厥联姻，共攻嚈哒，又据欧提喀俄斯所摘《列王纪》和迪奈韦里的记载，在这次战争中，突厥起了主要作用。其军队除攻略阿姆河以北的嚈哒领土外，还渡河南下，直捣嚈哒国都巴尔赫，摧毁了嚈哒主力。波斯则向阿姆河以南进军。此后，突厥将巴尔赫及其附近地区移交给波斯，两国遂大致以阿姆河为界瓜分了嚈哒疆域。至于两国联军的统帅，波斯方面为库萨和一世，史籍记载一致，似无可疑。唯突厥方面的统帅。据《周书》、《隋书》之记载，均为木杆可汗。而据《旧唐书·突厥传》及唐开元二十年（732年）所立《阙特勤碑》之记载，则应为室点密。盖因木杆当时为突厥最高可汗，故《周书》、《隋书》以破嚈哒之功归之。实

为室点密奉木杆可汗之命，率所部十万人往攻㘓哒。㘓哒既灭，突厥控制了中亚北部，隔阿姆河与波斯为邻。由于丝绸贸易等方面的原因，很快就同波斯发生冲突，两国发生战争，突厥又拓地直至罽宾，占有了全部㘓哒旧壤。而波斯也因受到突厥与拜占庭的夹攻，国力逐渐耗尽，为以后阿拉伯人的占领铺平了道路。

185　粟特国考　　　宪　益

（《和平日报》"南京版"1947年5月3日）

粟特在中国古代史上多有记载，且与中国交往频繁，影响较大。其文字（粟特文或称康居文）曾在丝绸之路上（中亚及新疆一带）成为商业贸易的通用语，在新疆及敦煌多所发现。且回鹘文之创立，源于粟特文。故粟特文明在中亚及新疆一带有巨大影响。关于粟特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日人白鸟库吉曾著有《粟特国考》，刊于1930年女师大出版的《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作者在本文中，根据我国史籍所载，以及外国学者对粟特国研究的有关记载，进行了详细考证，同时对白鸟库吉的一些论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里海与黑海以北，古有Iazyges部族，即中国史籍所称之奄蔡，此族于公元一世纪为东来之Alani族所并。Alani为中国史籍上之阿兰，西方历史上有重大影响之Goth人，亦即中国史上之粟特。此族在公元二、三世纪间，自康居东北西徙至奄蔡、阿兰所居之地，始为大国。公元150年遂侵罗马帝国的北疆。粟特定居黑海以北，又臣服邻近诸国，《通典》引《魏书》粟特："附庸小国四百余城，"可见粟特在北魏时为一大国。粟特臣服黑海以北的古代斯拉夫部族，因此又有温那沙Wenednia，wenesa与特拘梦Salavonia二名。匈奴于公元四世纪西侵时，粟特国王Withimer于公元375年亦为匈奴所杀，至公元454年，粟特王忽倪，此即西史上的walamer击败匈奴而复其国。此后，粟特国多次遣使至北魏，至粟特西征意大利后，不再遣使来中国。

186　《魏书·粟特国传》辨考　　　余太山

（《文史》1983年第21辑）

粟特地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始形成阶级国家，首都马拉坎达（今撒马耳罕），公元三世纪后相继臣属塞流斯、大夏、贵霜、㘓哒诸国。粟特自汉代以后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史书均有记载。本文仅就《魏书》所记进行了考辨。《魏书·粟特国传》记载："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条记载进行了反复讨论，迄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对此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文章首先扼要介绍了几家有代表性的观点，他们是夏德、白鸟库吉、内田吟风、江上波夫、榎一雄。他们的观点大体可分三类：一、"粟特"一名是克里米亚半岛的Sughdak的音译。《粟特国传》全部是关于Sughdak的记载。所传"匈奴"事是指Huns对阿兰的征服。二、"粟特"一名是中亚的Sogdiana的音译。但《粟特国传》中有关"匈奴"事是指Huns对阿兰的征服，其余部分才是关于Sogdiana的记载。三、"粟特"一名是中亚的Sogdiana的音译。《粟特国传》基本

上是关于Sogdiana的记载，仅在名称和地理位置上和“奄蔡”有所混淆，所传“匈奴”事是指哌哒或Chionitae对Sogdiana的征服。作者对这三种观点，根据史书的有关记载，逐一进行详细的考证和评述，并归纳自己的看法：“粟特”一名是中亚的Soghd（So—diana）的音译；《粟特国传》也是有关中亚 Sogdiana 的记载；其中“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是指哌哒对Sogdiana的征服。之所以混入有关奄蔡的记事，主要是由于公元437年董琬、高明出使西域时，传闻“匈奴”即哌哒征服Sogdiana的同时，又传闻H—nus对阿兰的征服，两者在时间上接近，“匈奴”与Huns在名称上类似的缘故。本文引用资料丰富，论证周详，可供研究丝绸之路上民族变迁的重要参考。

187　《魏书》粟特不是俄粟特　　　　肖之兴

（《文史》1982年第15辑）

粟特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民族。1977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和第四册有关粟特的段落中，认为粟特为俄粟特的讹音，略去其首音俄字，并认为俄粟特民族今仍居高加索山系间，即古代阿兰（Alans）或阿思（As）人之苗裔。并说《魏书》、《北史》、《周书》之粟特国为俄粟特的译音，而缺其首音。等等。本文对此观点提出异议，认为粟特不是俄粟特。并从名称原音、译音、汉译法则、居住地区和经济情况等方面，根据史籍文献的有关记载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粟特是南北朝时中国史籍原记载的名称，分布在今苏联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一带。俄粟特是现代译名，指的是现在苏联高加索北沃舍梯自治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南沃舍梯自治省的主要居民沃舍梯人。用拉丁字母记的原音来看，俄粟特为Ossethi，粟特为sogdo，二者并不相同。即使把Ossethi音的首音O略去，这两个词的读音也有明显差别。而且略去首音也不是中国古代的翻译法则。中国史籍中对俄粟特人祖先的译名阿兰，从来没有略去过首音。从东汉到隋朝，俄粟特这一民族都以阿兰为名，外国书籍也称其阿兰。古今中外的书籍都没有称匈奴西迁期间的阿兰人为俄粟特。（俄粟特为现代译名）约在元代前后，阿兰这一名称逐渐被“阿速”或“阿思”所代替。沃舍梯一名乃由阿速（阿思）加“后缀”而得来。《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还认为奄蔡是俄粟特人的远祖。而《魏书》、《北史》、《周书》则记载：“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本文认为，这三本史书关于粟特国的记载，只是同一条材料的再三重复，引起了粟特就是“古之奄蔡”的很大混乱。中外有的学者对此从来就有不同看法。粟特并非“古之奄蔡”。从《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看，粟特和奄蔡是两处方位不同的地方，粟特“在葱岭之西”，奄蔡在“康居西北”。二者不仅在地域上相距很远，在经济生活方面也有很大差别。奄蔡以游牧为生，而粟特则以农业为主，有400多个城市，以善于经商著称。粟特商人在古代曾大量来中国经商。他们不可能来自黑海附近的草原，而应当来自中亚的粟特。我国古文献的记载也证明粟特位于以康国为中心的古代中亚地区。匈奴西迁并未经过中亚南部的粟特。“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的“古之奄蔡”，实际上当指阿兰。经过充分论证，文章概括起来说，奄蔡或阿兰和粟特是不同地区的不同国家，《魏书·西域传》把有关阿兰的内容，误收入粟特国传之中，因而引起了种种混乱。本文还对一些著作把粟特说成是

西徐亚作了考证，否定了这种观点。

188　论吐火罗　　王斐烈

（《学术界》1943年第1卷4、5、6期　1944年第2卷1期）

按本文原载于《中德学报》第5卷1、2期之上，后《学术界》进行了转载。文中就我国史籍所称之吐火罗(Tokahra)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从其名称由来、管辖范围、与中国关系，以及近代学者研究吐火罗存在的问题，都一一进行了分析，并对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吐火罗之名，不论希腊、罗马、叙利亚、亚尔曼尼亚、印度、波斯及古代西藏，均有不同的名称。西方用吐火罗名称，是从斯特拉钵《地理志》引用而来；中国记吐火罗名称，始见于《魏书》。《唐书》又称吐火罗或吐辖罗，《高僧游记》又称都货罗、覩货罗或吐火罗，这均由Tokhara一字之音译。佛经作兜呿罗或兜沙罗，想由梵文转移而来。至于吐火罗之辖境，应在我国葱岭之西，今苏联吉尔吉斯南部，乌兹别克东部，塔吉克之北部，或这三个共和国的全部。据《唐书》所载，唐置吐火罗道，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按本州十六，加领七十二州，县百一十，年府为二十六。此道东西南北均在三千里以上，在唐或唐以前，均为中亚之一大国。这样一个大国，在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做出过重大贡献，因此引起近世学者之注意和研究。近世学者称吐火罗曰土耳其斯坦，或突厥斯坦，但在中古时一般人谓之吐火罗斯坦。“斯坦”犹言地方。在公元七至九世纪隋唐之际，突厥西徙，占领了两河流域，所以人们称之曰突厥斯坦。可是突厥未来之前，为什么会有突厥之称呢？作者根据世界史之记载，先阐述了吐火罗历史的发展过程。从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东征，败波斯，国王大流士东逃朴桃国（Bactria）后于公元前329年希腊军占领该城，并以此为根据地，北定粟特，南征印度，前323年希腊远征军败回归，当时马其顿人塞流息便占领了中亚，至前256年朴桃城的统治者，鉴于塞流息国势不能远达东方之时便宣布独立。建立所谓朴桃国（Bac—trianum）（注）。几乎同时，伊兰系的安息国于公元前248年建立，至前209年塞流息军队击朴桃国，国王宣称如塞流息进攻，将求助药杀水（锡尔河）彼岸之斯克泰游牧民族，于是遂罢。因此，希腊支属的朴桃国得以保存。公元前190年左右，朴桃国威达到鼎盛时期，南征高附，进出五河，占据印北。嗣后约在前150年前后，国内讧起，互相残杀，国力疲敝，此时居住北方的斯克泰人乘虚而入，一举灭亡了希腊族属的朴桃国。据考证，灭亡朴桃国的斯克泰人有四族，其中有Sacarauli，近人有谓此与汉代所称之塞（Saka）是其同名，而Tokharoi或Tokhuri，应是中国史书所称之吐呼罗、吐豁罗或吐火罗。此四族中以吐火罗为最强。当希腊支属的朴桃国内乱时，其西邻的安息国王曾借斯克泰吐火罗的势力战胜了希腊军，所以当时人们以为占领朴桃王国的斯克泰人就是吐火罗人，被灭亡的朴桃王国为吐火罗斯坦。即吐火罗人所占的地方。这就是中古以前中亚称吐火罗斯坦的由来。此名称在西方不曾间断，而在中国却不相同。因为大月氏西迁后，击败了塞王，以而迫使吐火罗及塞等四族南下，并征服了朴桃国。此四族中塞弱，更居中亚西部，故中国史书对塞种所见极少，反之、吐火罗居东部而又强，何以史书

亦不见记载？主要是译名之不同,《史记》《汉书》有大月氏平大夏事,显然大夏应是吐火罗(Tokhara,Tokhari)。作者对吐火罗译音之转化，进行了排比论证,实属可信。但西方学者如李多芬、白雷等人认为“大夏”是希腊支属的朴桃国；大月氏乃吐火罗之同名，因此形成了多年的误解,以致把后来的贵霜王朝也认为是大月氏。据作者考证，贵霜是大夏的一部分，而不是月氏，大夏更不是大月氏。但中国史上有小月氏之名，此小月氏居住在新疆之南，《北史·西域传》有“小月氏国都富楼萨城，其王本多罗子也”。高居诲记于阗之行,在敦煌西南有仲云部,自称小月氏之余种。此小月氏实为寄多贵霜王朝后裔，南迁后，中国改称其名曰小月氏，因受匈奴所迫，西迁后剩下的小月氏，实为大月氏所遗留的余种。东西两个小月氏各不相干，二者毫无关系，从而解决了多年在西域史研究中的疑案。作者在考证上述各种关系之后，证实大夏即吐火罗，否定了西方学者所倡之吐火罗即大月氏，以及吐火罗为大月氏译音之说，并得其结论：一是大月氏绝非吐火罗之同名或同族，“大月氏击大夏而臣之”之大夏，即先灭朴桃国之吐火罗。二是因大夏（T—algha）与Tokhara（Toghara，Toghar）'吐火罗'音声相近，故中国人用大夏为Tokhara（吐火罗）之译名。三是《新唐书·西域传》谓“大夏即吐火罗也”。因此，古代学者以大夏为吐火罗者，应予肯定，现代学者，以大夏当作希腊之朴桃国和大月氏为吐火罗者，应予改正。

研究古代中亚史的演变，清理古代中亚各国之史实、名称及种族、语言等，对研治“丝路”之学至关重要，本文在这方面引证了大量史料，正反做了举例，并得出可信的结论，为研究古代西域和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注）希腊之R.Bactrianum，中国实无相当译名。作者暂以大夏（Tokhara）灭此国不久之后的一类似名称朴桃（古音b'uoktieu）译出。“朴桃”见于《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条下，应为“Bactra”之音转，希腊之Bactrianum王国即建都于此，城国同名，故作者以此国称朴桃国。

189 吐火罗论 杨建新

（《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

吐火罗的民族和地域，一直是西域史学家讨论较多、分歧很大的一个问题。本文认为，吐火罗这个词有几层含义。它既是一个民族的名称，又是一个地区的名称，还指一种政治实体，而且这种政治实体又经常发生变动。文章主要对作为政治实体的吐火罗，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并对吐火罗与大夏、大月氏、哌哒、突厥等的关系，分别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有些史学家认为，《史记》、《汉书》中所说的大夏，就是西方历史记载的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也即吐火罗。也有人认为，“吐火罗即大月氏，因大月氏征服了巴克特利亚，故张骞称之为大夏”。本文对这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巴克特利亚位于阿姆河上游以南，今阿富汗北部。公元前六世纪，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征服了这个地区。公元前328年,希腊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消灭了波斯帝国，占领了巴克特利亚。亚历山大死后，其部将塞琉古一世建立了塞琉古王国，巴克特利亚又成为这个王国最东的一个地区，公元前三世纪中后期，巴克特利亚总督希腊人狄奥多特，脱

离塞琉古王国的统治，初步建立了一个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公元前227年，曾任粟特总督的希腊人欧提德姆，夺取了巴克特利亚的统治权，自立为王，正式建立了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到欧提德姆的儿子德米特里继承王位后，又被军事长官欧克拉提德所击毙，建立了希腊—巴克特利亚新王朝。公元前156—141年之间，新王朝发生内讧，位于锡尔河北岸的游牧民族西徐亚人，以吐火罗部落为主，乘机南下，消灭了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占领了阿姆河两岸，建立了吐火罗王国。后来印度和波斯人又称巴克特利亚地区为吐火罗斯坦。张骞所说的大夏，就是指这个吐火罗王国，而不是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因大夏在我国古籍如《逸周书·王会解》、《左传》中早有记载，在汉文古音中，大夏可读作"驮互"，与吐火罗、兜勒之音相近，故张骞称之为大夏。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后半叶，原居河西走廊，因受乌孙、匈奴所迫、迁居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几经迁徙，这时越过阿姆河，消灭了吐火罗王国，统治了吐火罗斯坦。于是大月氏人才被称为吐火罗人。在《大唐西域记》中，出现了两个吐火罗。一个在阿姆河两岸，被称为"睹货逻故地"；一个在今民丰县安迪尔河下游沙漠之中，被称为"覩货逻故国"。据作者考证，吐火罗故地是指公元五至六世纪中，曾经占据吐火罗斯坦，并以巴尔赫为首都的哌哒—吐火罗王国；吐火罗故国是指贵霜王国破灭后，其一部分遗民东迁至尼雅河至安得悦河一带，建立起的隶属于鄯善国的小政权。哌哒—吐火罗王国约在公元六世纪五十年代，被西突厥与波斯所灭，吐火罗斯坦为西突厥所控制，仍称吐火罗国，可称突厥—吐火罗国。这是另一个政治实体。到公元779年以后，吐火罗为大食所灭。吐火罗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遂即结束。本文引用中外史籍资料丰富，论证有力，条理清晰，对研究丝绸之路上民族历史的演变很有参考价值。

190 吐火罗国史考　　〔日〕内田吟风著　　斯英琦　徐文堪译

（《民族译丛》1981年第2、3期）

本文根据中国史籍文献的有关记载，考察了曾繁荣于古代中亚丝绸之路上的大国吐火罗国的兴亡史迹及其本质变迁。全文分上、下两篇、共七个部分。即序言；大夏与吐火罗；贵霜即大月氏说的八项佐证；大夏族的解放与吐火罗在历史上的出现；西突厥统治下的后期吐火罗国；西突厥系王朝吐火罗国；及结束语。吐火罗位于古代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斯坦，在中国史籍中记作兜佉勒、兜佉罗、吐呼罗、土壑宜、吐豁罗、睹货逻等。吐火罗族曾与印度、波斯及后魏、隋唐时期的中国有过密切交往，在中国佛教发展上起过重大作用。中国典籍明载吐火罗之名是在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后。《魏书》、《隋书》、《唐书》的《西域传》中均有《吐火罗国传》。作者考证，吐火罗即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以来曾灭亡乌浒河南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大夏，亦即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为占有过该地的斯基泰系的种族之一。至公元前128年时，大夏的人口已达百万，臣属于乌浒河北的游牧国家大月氏。作者列举了八条史实，论证了自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六世纪、作为巴克特里亚的主人而兴盛的贵霜王朝，并非被征服民族大夏所建立，而是征服大夏的民族大月氏所建立。贵霜王国先后数次被萨珊波斯击败，对波斯时而臣服，时而背叛。此时大夏族即获得初步解放，吐火罗之名即在历史上出现。北魏时吐火罗国之都城为薄提

(薄底延)城，位于乌浒河之南。五世纪中叶，吐火罗又被哌哒所征服。六世纪初以前，哌哒过着没有固定首都的游牧生活，六世纪中叶夺取了吐火罗国都，进入城市生活。吐火罗及贵霜人均纳入其统治之下。至六世纪后半叶，西突厥与波斯联合攻击哌哒，使其领土落入西突厥手中。在西突厥的宗主权之下，吐火罗国以保有10万兵力的大国姿态再兴。到突西厥室点密可汗时，将其领土分为四部分，将吐火罗旧都拔底延城为中心的西南地带划为四区之一，命自己的儿子统治。唐初，西突厥叶护开始直接统治吐火罗斯坦，以吐火罗人为立国之本的吐火罗国随即灭亡，而以西突厥阿史那氏王朝的吐火罗国成立。唐代的吐火罗国即为突厥系王国，是吐火罗人、哌哒人、贵霜人聚居的国家，与唐交往甚密，唐王朝封其国君为吐火罗叶护、挹怛王，使持节二十五州诸军事月氏都督等。玄奘《大唐西域记》以“覩货逻国故地”称呼若干地区，是指曾为民族独立国家的吐火罗国的旧时领土。

191　察合台汗国初探　　刘志霄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成吉思汗征服天山南北、河中地区和伊朗高原之后，将纳入帝国版图的这一辽阔地区，分封给他的四个儿子。次子察合台分得高昌维吾尔政权—亦都护—以外的天山南部、中亚河中地区以及阿姆河以南的地区。在那风云突变的岁月里，察合台后裔一直默默无闻，但到十四世纪，却成了亚州中部地区一支主要力量，建立了以察合台名字命名的察合台帝国。其活动范围涉及天山南北、河中地区，甚至伊朗高原的部分地区。在中亚历史上，在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史上，均占重要地位。特别是汗国时期形成、并通行於其疆域内的综合性语言——察合台语，对中亚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本文通过对成吉思汗去世后的数十年间，他的诸子后裔围绕神器谁主问题的明争暗斗，叙述了察合台汗国的诞生和在错纵复杂的战乱中盛衰消长的过程。其中对十四世纪上半叶在天山南北和河中地区的察合台汗国的业绩和行将毁掉这些业绩的世俗宗族势力记述犹详。察合台汗国的细节，作者是通过它的行政体制、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内容来描述的。汗国的行政体制是一种双轨的行政体制。其特点是，在草原地区，汗国可汗与其臣民之间，只有一个中间层，即可汗的旨意通过部落酋长或首领实施于这一部分臣民；而在农业地区，则有两个中间层，即可汗的旨意通过总督，再通过各地行政官吏，才能实施这一部分臣民。这种双轨行政体制所维系的是一种松弛的隶属关系。经济方面，起先，元朝积极经营西域，在天山南北多有建树，惜为时短暂。自海都—笃哇与忽必烈的战争后，察合台汗国的社会经济每况愈下。其原因：一是大多因频繁的汗国首脑的更替所引起的战争所致，二是汗国统治阶层对农业的冷漠。文化方面，宗教是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用以弥补其物质力量不足的重要手段，当其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疏远的时期，就是汗国强盛的时期；相反，接近伊斯兰教的时期，则是汗国衰弱的时期，但到图黑鲁·铁木尔以后，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成为清一色的穆斯林。到了贺则尔时期，汗国的全部活动，包括军事的和政治的，都涂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成吉思汗的这批后裔，终于使伊斯兰教普及到了天山南北，达到了它陆路东传的最远界限，而他们自己已逐渐融合于当

地居民之中。在文化上，察合台汗国留下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贡献要算是语言。其巨大作用到了十六世纪以后才显露出来。一代文学巨匠卡尔希、鲁特菲，赛卡克.那沃依的著作都是用察合台语创作的。察合台语一词得名于它通用的地域和时间，即十四世纪的察合台汗国。但实际上所谓的察合台语就是在维吾尔语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性语言。因此，这种语言也称作“喀什噶尔语”。本文强调指出，察合台语的形成，标志着察合台后裔融合于当地居民的最后程序。

192 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 陈连庆

（《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本文根据史书文献记载，论述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关于大秦与拂菻的记载。在中国史书上，一般认为大秦为对罗马帝国之称呼，拂菻为对后来拜占庭帝国之称呼。关于这些名称的由来，学术界也议论纷纭，迄今无一致之见解。作者首先考证了大秦一名的由来和含义，及其自西汉迄隋与中国的关系。早在两汉时期，罗马帝国曾被称为黎轩。大秦一名，首见于《魏略·西戎传》，这是由于在两汉时，外人称中国为秦，罗马的国际地位、文化水平与汉朝东西辉映，故被称为西秦。大秦一名实为东西秦之扩大，大有遥远之义，大秦即远方的秦。西汉时，大秦的一些商人和魔术师已来中国。东汉建国后，班超在西域树立了统治秩序，丝绸之路畅通，中国和西方各国的交往盛极一时，丝绸贸易为其主要内容。罗马成为主要的丝绸输入国。汉朝与罗马均欲直接交往，但因安息为垄断丝绸的中间贸易，极力阻挠两国的直接交往。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至波斯湾，即因安息人之阻挠而未成行。至罗马皇帝安东尼于公元162年至165年征服了安息，统治了美索不达米亚后，遂于东汉桓帝延熹九（66年）遣使朝汉，开始了两国直接交往的新纪元。据《魏略·西戎传》记载，当时从中国去罗马有海陆两路：海路从今土耳其的安塔尼亚，经赛浦路斯、克里特、希腊，而直航意大利；陆路则经叙利亚、土耳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以抵意大利。三国时，大秦商人秦论来中国拜会东吴孙权，孙权送给他短人男女各十名，并派会稽人刘咸送他回国。刘咸中途死亡，没有去成，至晋武帝太康年间，大秦派使者来中国贡献方物。由于大秦的使者和商人频繁东来，加深了中国对于大秦的了解。作者引用《魏略》所记，大秦由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商品，计有金属、动物及其副产品、矿物及其副产品、毛织品、纺织品等五大类，共59种产品。并论述了纺织品、玻璃、珊瑚、金刚石等四种著名商品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接着，作者又考证了拂菻一名的由来。中外学者绝大多数均认为，拂菻之名始于《隋书·裴矩传》中所载的《西域图记序》的记载，即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岑仲勉先生则以为始见于《梁职贡图》，即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作者则引用《太平御览》和《十六国春秋》之记载，拂菻一名出现于史书，当在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当时距罗马帝国最后分裂的公元395年，还有32年，故此时的拂菻仍为罗马帝国，而不是拜占庭。作者还引用文献记载，论述了南北朝至东晋时拂菻与中国交往的盛况。

2.丝 路 重 镇

193 汉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之演进 贺昌群

（《禹贡》 1936年第5卷第3、4期）

本文主要从地理知识角度，阐述了我国人民自汉代以后对世界认识的发展和提高，并以《史记·大宛传》以下各家史籍所载为依据，从时代之先后进行了考叙。文中所涉及地理知识与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对丝路学研究不无参考价值。汉代以前，我国人民对世界的认识，多以想像构成，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但自《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以下史书所记，因多取材于曾身历其境者之耳闻目见，如《大宛传》有一部分系根据张骞所述，《西域传》则多为班勇所述，因此这些材料中，对地理上的方位概念，距离之远近，殊多舛误。魏晋以后，西行求法僧徒和使节，对所经之地，多有著述行世。如法显的《佛国记》（或称《法显传》），此为记中西交通最古之著作，对所经之地，皆记其道里、地名、方位及距长安之远近，较两《汉书·西域传》确切。法显之后名僧大德去西域诸者踵接，秦弘始时有沙门、法猛等十五人西行至印度，元嘉时返回，著有《游行外国传》一卷（今佚）。北魏时复有宋云等西行，其行记在《洛阳伽蓝记》中有简单记载。隋唐之际，中西交通甚盛，裴矩所撰《西域图记》，对西域诸国所记犹详，惜原书已佚亡。唐时于西方地理知识贡献最大者，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此乃中古时期行记中范围广大，内容丰富的巨著。其游踪之广，学问之博，皆前世所无。玄奘稍后，屡使西域印度者有李义表、王玄策等人，玄策行记，今皆不传，《法苑珠林》中多有采摘。据《法苑珠林》记载，王玄策所撰之书似有多种，今均佚亡。又据《唐书》记载，王玄策似在高宗时，曾使康居、吐火罗，而《法宛珠林》却无记载。高宗时往西域印度者有沙门净义，由广州船行至印度，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敦煌石宝还发现有《慧超往五天竺残卷》，唐时于地理学上最大贡献者有贾耽，其《海内华夷图》与《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堪称地理上之巨著，其中对西域各国未明了之地多所改正。宋代以后，甘凉一带为西夏国所阻，中西陆路交通顿衰，而海上交通颇为发达，故记海外各国及海上交通的著作增多。至于陆路交通，元代复又繁荣，《马可波罗游记》，对世界文化影响极大，刘郁《西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等，对西方地理记载详瞻，均为研究丝路之学的重要参考书。

194 汉代令居塞的地理位置 王宗维

（《兰州学刊》 1985年第1期）

自从1978年《历史研究》发表王仁康《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一文涉及浩门水、乌逆水和涧水间的关系，并提出汉代令居塞地理位置后，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产生，主张涧水为浩门水者，认为汉令居塞在今大通河一侧；主张涧水为乌逆水者，认为令居塞在今庄浪河一侧。本文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引证《汉书·地理志》和

《水经注》关于乌逆水、浩门水、涧水的水源、流向和与其他诸水的汇合等情况的记载后指出：《地理志》以县为纲，把乌逆水、浩门水和涧水并列，分置于允街、浩门、令居三县之下，说明此三水并存，不能以此代彼；而《水经注》却以水为纲，把涧水排在浩门水与乌逆水之间，事实上此两水之间并无涧水存在，因此《水经注》的记载有误。这也就是学术界产生分歧的根源。接着作者论述了汉文史籍中关于令居的最早记载：一是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在北线败匈奴后开始屯田之处"地接匈奴以北"，即北与匈奴相邻，此匈奴就令居而言，即元狩二年被霍去病击败之遬濮部，亦即匈奴贵种须卜部。遬濮位置在乌逆水亦即乌周水北，则令居当离此不远。二是元鼎五年（前112年），西羌起兵造反，与匈奴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将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元鼎六年（前111年）汉为保护屯田吏民，修筑令居。《汉书·张骞传》曰"筑塞西至酒泉"，《后汉书·西羌传》为"筑令居塞"。三是令居塞的位置，《西羌传》、《水经注》的记载均有误，而丁谦氏不加详考，就说"令居，汉县，属金城，今平番县北"。《大清一统志》说在"西大通堡北"，董祐诚解释"在今平番县西北土司境"。这些说法均与《史记》所记不符。作者又从汉初通河西的路线走向，考述了令居塞的位置，他否定了薛方昱等的说法，认为西汉初通往河西的主要交通线只有一条，即从今兰州西固城一带出发，过黄河，逆庄浪河北行数十里，经景泰县南古浪县北，即达汉武威郡的东大门揟次县（今武威县东大湾一带），由此即可直达玉门、阳关。汉所设亭塞驿站，就分布在交通沿线，令居塞即其中之一。作者还否定了薛方昱关于令居即今之连城之说，指出其对郑伯津一词解释之不妥，认为令居为连城说和涧水为浩水说均不能成立。作者根据《史记·匈奴传》的记载及张骞从西域返回的路线，断定令居在金城县北黄河对岸不远之处，与金城南北对峙，互为犄角。又据《地理志》载，涧水出西北塞外，至令居县西南，入郑伯津。这里所指涧水，实即今小咸水河。令居塞故城遗址，当在今小咸水河中游地区。作者认为班固撰《汉书》，对涧水和令居塞的位置是清楚的。范晔《后汉书·西羌传》中后半部分提到的令居，与《汉书》所指相符，唯独在前面把《史记·平准书》中的"度河筑令居"，改为"乃度河湟，筑令居塞"，"河"后多加了一个"湟"字，把问题复杂化了。郦道元不加详考，把涧水置于浩门水与乌逆水之间，铸成大错。清代人注史修志，又不细审，依样画葫芦，遂造成今日之争论。

195　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价　　顾颉刚

（《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本文论述并评价了昆仑为酒泉南山的由来。据史书记载，昆仑一名，最早见于《山海经》，为一神话传说的神秘区域。汉武帝开拓西域后，把于阗南山定为昆仑，但为司马迁所否定。认为此地并非《山海经》、《禹贡》里所说之昆仑。四百年后，前凉张骏又根据酒泉太守马岌的提议，定酒泉南山为昆仑。汉平帝时，王莽当政，笼络青海羌酋良愿等率部内属，于此设西海郡。这里有西王母石室、弱水祠和昆仑山祠、仙海（青海）、盐池（茶卡）、须抵池。这些地方均为《山海经》里的神话区域。西王母石室当在青海东部湟水与黄河之间的海晏县和辉特旗附近，酒泉南山为祁连山之一部，山上也有

西王母的石室，称为“王母堂”，附近又有弱水，离昆仑祠和昆仑障均不远，故马岌认为此即古书里的昆仑，得到张骏的认可。但因其与黄河源无联系，又称“小昆仑”。此后一些学者，亦主张酒泉南山即为昆仑，其主要理由是它与弱水相近。《大荒西经》云：“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禹贡》也说：“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合黎即张掖河。酒泉南山为黑河（弱水）与白河（托来河）所包围，与《大荒经》中的弱水之渊环绕昆仑之丘的话相适应。但作者认为，酒泉南山如为昆仑，何以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却记为昆仑在金城临羌？汉武帝因于阗南山有黄河源才确定为昆仑，酒泉南山却无黄河源。故酒泉南山尚不能肯定即为昆仑。

196　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　　马　雍

（《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本文论证了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汉代河西之地本为匈奴所有，其东部属休屠王，西部属浑邪王。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其众降汉，河西遂为汉所有。汉朝在此先后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又在敦煌郡境内设玉门关和阳关。据学者考证，敦煌郡之设置当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玉门关属龙勒县境，在敦煌郡治之西北。近代法国汉学家沙畹根据《史记·大宛列传》中关于李广利伐大宛还师至敦煌，天子大怒，“而使使遮玉门”，“贰师恐，因留敦煌”的记载，认为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址曾有变动，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以前的关址原设在敦煌郡以东，太初以后才移至敦煌郡之西北。此说在我国史学界影响颇广，但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向觉明先生则认为《大宛列传》中所说的“遮玉门”之“玉门”，并非指玉门关，而是指敦煌郡所属以东之玉门县。作者考证，玉门县是罢玉门关屯以后才设立的，当太初二年李广利还师之时，玉门关屯未罢，玉门县还未设立，故“遮玉门”之“玉门”应为玉门关而非玉门县，并进而分析许多学者对《史记》中“遮玉门”与“留敦煌”的记载所以感到矛盾，关键是误以为玉门关即敦煌郡之西界，出了玉门关即不属敦煌郡。实则玉门关并非敦煌郡之西界，关外仍属敦煌郡境。故“留敦煌”乃指留在敦煌郡而言。作者还引证《汉书·地理志》和《史记·大宛列传》中的有关记载，论证了汉代敦煌郡的西境应达今天罗布泊的东岸。至于汉代玉门关的遗址，一般学者均认为即今敦煌县西北70公里之小方盘城。经作者实际考察，感到此城是否确系汉代的玉门关，尚有疑问，认为小方盘城可能是玉门都尉所驻之城堡，而非玉门关本身。汉代之玉门关，似应更在小方盘城以西。这一新的观点还有待于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证实。

197　两关遗址考　　劳　干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3年第11本）

关于两关（玉门关、阳关）遗址的考证，主要是沙畹据《史记·大宛传》关于李广利太初元年伐大宛，败归敦煌一事，发现汉武太初以后的玉门与太初以前的玉门不在同一地方。最初的玉门关应在敦煌之东。由于这一发现，遂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王国维、向

达两先生曾经考证，并有专门论著。王国维在《流沙坠简序》（本文收录于《观堂集林》一书）中，对此考证较详，纠正了沙畹对玉门关址方位计算不准问题。向达先生的《玉门阳关杂考》（初以方回的笔名发表于《真理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后收录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则认为汉代玉门关，在太初以前，即元鼎六年敦煌开郡时，即置玉门关而并无改置之事。但本文作者根据史籍记载，并经自己实际考察，对玉门和阳关的历史沿革、方位所在作了周密的考证。证明太初以前的玉门，不是现在的玉门关。故最初的玉门关应是酒泉郡以西的赤金峡所在，也是汉至唐初的玉门关，而现在的玉门关，系李广利伐大宛以后所设立，即小方盘城是也。至于阳关旧址，应在今日敦煌南湖偏西南的古董滩，而南湖破城子则是汉龙勒县、唐寿昌县所在。作者最后还考证唐初玉门关已东移，开元、天宝玉门关的位置，仍与贞观时相同，而关的东徙，则是天宝以后事。

198　玉门位置辨　　　　方诗铭

（《西北通讯》1947年创刊号）

本文作者对方回先生著《玉门阳关杂考》一文所言：汉代玉门一关并无改置之事，太初以前之玉门，即太初以后之玉门也，其地当在敦煌西北，大宛传所述之玉门，乃系酒泉郡之玉门县，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武帝元封时，赵破奴破姑师，虏楼兰王，于是酒泉列亭障于玉门矣。赵破奴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封为浞野侯，此时之玉门，当指玉门关。是故玉门一关，在元封四、五年间即亦建置。李广利伐大宛在太初元年，次年败归，此时玉门关尚在敦煌、酒泉间，则可知初建时之玉门，当在敦煌以东。作者又对敦煌的建郡年代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汉书·武帝本纪》及《地理志》所称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及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均不可信，因元鼎六年至后元元年其间相差二十四年。但在后元元年前已有敦煌郡之称，如天汉二年（公元前98年）敦煌置酒泉都尉，因当时敦煌尚属酒泉，故都尉不称敦煌都尉，而称酒泉都尉。是故敦煌之建郡，当在天汉二、三年以后。又《汉书·刘屈牦传》称：其随太子发兵以后，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巫蛊事变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上迄天汉二年，其间相隔九年，故敦煌之建置年代，当在此九年之中。至于敦煌之名，始于张骞之言，“乌孙与大月氏共在敦煌祁连间”，事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这说明元鼎六年前，敦煌之名即亦存在，故敦煌之名或为该地之土名。岑仲勉先生曾考证月氏即吐火罗，敦煌即“吐火”二字之对音，故敦煌之名，即取自其地之土名，建郡前之敦煌，亦即指月氏故地也。此种以故地土名为建郡县之称，在河西四郡中不乏其例，如武威之姑臧、休屠，张掖之山丹、居延皆是。最后，作者还根据史籍所载，考知贰师伐大宛前后，敦煌尚未建郡，其地还在国境线之外，天汉二、三年于其地置酒泉都尉，知其属酒泉。既置都尉，则国境线当已前伸，而玉门关之迁徙当其时也。敦煌未建郡时，其地已极为重要，故贰师出师前后，每每提及。因汉人于其地经营已久，初则徙关，继则建郡县，目的都是为了保卫西北边疆，保护东西交通之畅通。凡在中西交通上起过重要作用，对东西商业贸易及文化传递上作过重大贡献，虽系一郡、一县、一关，对研究“丝绸之

路”者来说，至关重要，都不应有所忽视。

199 玉门关与玉门县　　陈梦家

（《考古》1965年第9期）

西汉以来，河西称为玉门与玉门关的约有四个地点，即汉玉门都尉和玉门关，汉玉门县，隋唐玉门关和今玉门县。本文通过对这四个地点的设置时间及具体方位的考订后指出：虽然《史记》以为元鼎六年始筑令居以西，元封四年以前亭障西至玉门，但出土汉简说明玉门都尉之置在元鼎六年置酒泉之后，元封四、五年置敦煌之前。故此玉门亭障及都尉之置应在公元前110—108年间。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是玉门都尉所辖烽燧的东端，向西沿长城故址数十里是玉门都尉治所，玉门障尉、玉门关候可能是不同时代的名称，或仍以小方盘城为治所。玉门候官治所，可能和都尉在一城。此城障就其地势而言，北、西两面皆在长城，恰当入关以后的口内。关口在其西门外之正西。终两汉之世，玉门都尉（障尉、关候）设治于此，把守玉门关，从未东迁，也非从东边迁来。

作者又考订了酒泉出土的汉简与北塞三都尉的地望和从属关系。1913年——1915年，斯坦因曾在今安西县以西、毛目以东的汉长城遗址的烽火台中采获了若干汉简。这批汉简应分别隶于敦煌、酒泉两郡的不同都尉之下。其中有63简属于敦煌郡中部都尉所辖，有105简属于酒泉郡西部都尉和北部都尉所辖，其余则属于酒泉郡东部都尉所辖。今毛目以西、安西以东地区，东西相距约320公里，横跨汉代的乾齐、玉门、禄福和会水四县，今安西、玉门、酒泉和金塔四县，属于汉代的酒泉郡。据《清一统志》，禄福故城今肃州（即酒泉县）治内，玉门故城今玉门县东（县东南赤金堡），乾齐故城今玉门县西南，会水故城今高台县镇夷城西北。由于乾齐和会水的地望已考明，酒泉郡西、北、东部三都尉，亦可约略推定其分属地段。结合史书所记酒泉开发的经过，可知酒泉境内的北塞筑于公元前111—106年数年间，而公元111年酒泉已由开地置为初郡，在公元前111—106年的酒泉郡包括了后来分出的敦煌郡，故在敦煌郡的玉门都尉，最初称为“酒泉玉门都尉。”酒泉北塞既筑成，应随之而置都尉，当在元鼎六年后、元封三年前。在酒泉汉简与玉门县一节中，作者考定了西汉时代的玉门县所在，认为西汉时敦煌郡的玉门关与酒泉郡的玉门县，两地同时并存。由于酒泉汉简的出土，进一步证实此说。

200 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来源　　张维华

（《齐鲁大学国学季刊》 1940年第1卷第4期）

关于张掖郡骊靬县之得名，众说不一，有的认为以字之音义而取名，骊可作丽，靬为干皮，因其地产美丽的干皮，故称骊靬县；有的认为犁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名也；有的则认为以其地置骊靬降人而得名；有的则认为骊靬之得名，原于古代骊山之戎。作者引用了大量史料，进行了考证，并根据古代少数民族语言语音之转移，认为骊靬为祁连之异译。山丹原名焉支，焉支亦为祁连之异译。且河西四郡诸县名称，取诸匈奴语（即胡语）者不少，如姑臧、休屠、居延、觻得等，度此骊靬之名，亦为匈奴语。汉代中西交通繁盛，文化上的影响较大，事实有犁靬眩人留居中国事，但骊靬县就

因此而得名，原无可能。汉唐时代，经“丝绸之路”往来中国的西方人不少，唯独因有过犁靬人，而设犁靬县，殊不可能，也难予置信。

201 锁阳城杂考　　　陆庆夫

（《社会科学》“甘肃”1982年第4期）

锁阳城遗址，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南踏实公社南坝大队附近，地处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中，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城镇之一。现仍残存城垣，城墙周围筑有马面，四面开门有瓮城，城分内外城，外城在北，内城居南。从地面残存遗迹看，规模宏大。本文考察了薛仁贵的传说和锁阳城的来历；吐蕃的进攻路线和张守珪的空城计；从锁阳城的废弃到清代的瓜州城等问题。薛仁贵，唐初名将。据传他曾在此城作战，因饷尽粮绝，被敌兵所困，因是有人献“锁阳”。“锁阳”味美可食，士卒采而食之，精神大振，终于获胜。此城遂称“锁阳”。此事见诸归小说，不见于正史。薛仁贵赴西北边陲作战事，见诸正史的有两条，其一是唐高宗龙朔年间，随郑仁泰到天山一带讨伐叛乱的九姓突厥；其二是高宗咸亨年间，薛仁贵任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将攻打吐蕃败绩被贬。然这两次战事均与锁阳城无关。后于开耀元年（公元681年），薛仁贵又被重新起用，任瓜州长史，旋即提升为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都督。上述兵困锁阳的传说可能发生在薛仁贵任瓜州长史期间。由此说明，锁阳城以产锁阳得名；锁阳城系唐代城堡，并且很可能是唐代瓜州治所。锁阳城在唐高祖武德五年以后不仅为瓜州治所，且为都督府所在地，设有总管府，督肃、瓜、沙三州。唐廷之所以重视此地，因瓜州处于河西走廊西端，系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其西与安西四镇衔接，在军事上互相呼应。又，瓜州紧靠祁连山，山南即为吐蕃所占。唐初吐蕃为一新崛起的强大奴隶制政权，它不断向外掠夺扩张：向西则攻取四镇，向东则觊觎剑南道，向北则直逼河陇诸州。瓜州、沙州以南皆有山口通向青海。沙州以南有当金山口，锁阳城以南不远亦有一山口，今名旱峡口子。这些山口，正是吐蕃进犯之道。唐开元十五年，吐蕃攻陷瓜州城，破坏甚巨，且严重威胁整个河西。史载：“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㚟死，河西恐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余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但新任刺史张守珪足智多谋，“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拾流亡，皆复旧业。”十六年，吐蕃大将末朗又率兵攻掠瓜州城，又被张守珪击败。开元十七年，张守珪和贾师顺率领瓜、沙军队，驱走吐蕃驻沙州西南一带的大同军。如上所述，锁阳城的繁盛期当在唐代，但它何时又走向衰败以至废弃？安史之乱后，河陇的屯防军内调，吐蕃乘虚而入，唐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瓜州沦入吐蕃之手。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785年)，沙州人张仪潮收复河陇十一州，此后直到宋初，瓜州为归义军统辖区域。西夏时期，瓜州驻有军队，并设有监军使。关于元代的瓜州，史书所记，除了讲到该地曾发生饥荒，朝廷予以救济，以后又采取移民措施外，别无他述。可见元代是瓜州历史的衰败期。明朝把西部边防缩至嘉峪关，嘉峪关以西弃置不守，瓜州自然废弃。除了被称为锁阳城的瓜州外，安西县西南另有一个瓜州城，从其形制看，是为清代所建。《大清一统志》称

它为“新瓜州城”，建于雍正十三年，为旧安西卫地。

202 汉魏时期的敦煌　　〔日〕榎一雄著　徐秀灵译　陈国灿校

（《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

本文根据《史记》、《汉书》等史籍的有关记载，论述了河西走廊和敦煌在汉魏时期的情况。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通道，是黄河中流流域为中心发达起来的汉族文化圈的西端。古时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曾波及到这里。河西走廊又正当从黑海、里海起始的草原、沙漠、绿洲、高山、溪谷、台地相连接地带的东端，因而也受到近东文化的影响。河西地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居民的复合性。从战国末期到秦及汉初，河西地区为大月氏所据。到匈奴冒顿单于时，统一了匈奴各部属，东攻东胡，西逐月氏，南面夺回被秦始皇夺去的鄂尔多斯地方，从而建立三起强大的匈奴帝国，称霸于蒙古高原。大月氏被匈奴逐出河西地区后，从敦煌通过楼兰、焉耆、龟兹、阿克苏、喀什噶尔到达大宛（费尔干纳），征服了大夏，遂建国于此。文章认为，大月氏的西迁，从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开始。到征服大夏，共历时36年。其时匈奴右贤王已征服了楼兰、乌孙、呼揭及其附近的二十六国。因此，大月氏的西迁一定是逐个地征服占领经过之地以后再通过的。但史籍却毫无这样的记载。作者对《史记》、《汉书》上记载大月氏西迁的情况提出怀疑。大月氏西迁后，残留在河西的月氏子孙就分布在从祁连山到其南边的湟中、柴达木以至柴达木西邻的山地，北面则分布在凉州、张掖地区和敦煌附近。匈奴驱逐了月氏后的河西地区，东部被昆邪王所统治，西部为休屠王所统治。公元前121年，汉朝的骠骑将军霍去病打败昆邪王，昆邪王又杀休屠王，归降霍去病，使河西地区由匈奴的统治变为汉朝的统治，并在这里设置了郡县，此后便一直为汉族的中央政权所统治。汉族在这个地区逐渐地成了居民的多数。在此以前，羌族、氐族在这个地区居住的人数最多，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发挥着潜在势力的作用。敦煌的地理位置是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青海省之间的连接点，其本身的居民也跟其它地区同样复杂。文章还分析了河西地区富强的原因，在于以牧马、种植谷物为主的农业生产的富饶，并引用了《汉书·地理志》、《齐民要术》、《三国志》等文献中的有关记载，特别是引用了敦煌太守皇甫隆教导农民制造耧犁、改进妇女用裙式样，仓慈改革豪强横暴、农民贫困的不公平的社会状况等史实，说明敦煌的农业生产和服装落后于中原地区。河西的富裕，还有跟西域商人交易这个因素。多数西域商人在由西域进入中国门户敦煌时，滞留了相当长的时间，给敦煌的文化不少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是佛教、祆教的传入。文章还介绍了《晋书》中记载的敦煌各族“敦煌五龙”和索氏五人传，即索靖、索紾、索泮、索袭、索统的事迹，说明五胡十六国时代是河西走廊与敦煌空前繁荣的时代。

203 元代的敦煌　　〔日〕大岛立子著　高　然译

（《民族译丛》1984年第2、3期）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城市，本文重点研究和阐述了元代的敦煌。一　连结东

西的通道。唐末五代，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落入吐蕃族手中，以后归属于归义军张、曹氏统治，到十一世纪又为西夏所据。在此期间，丝绸之路发生了变化，敦煌也失去丝路上重要城市的地位。十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中国形成了宋、辽以后的金及西夏三国鼎立时代，东西交通又有改变。当时的交通路线是：通过塔里木盆地的南缘，避开西夏领土，经由青海进入宋地。这是西方各国对宋朝贡的路线，一般商人，也利用此路。另因西夏对过境商人索取高额通行税，从事东西通商最活跃的回鹘人，只好避开河西走廊传统路线，另辟新路。一条经由内蒙古，通过阴山山脉，走向辽的上京、西京和南京。另一条是通过青海，经由临洮、秦川入长安，最后抵达宋都汴京。西夏盛时，敦煌不仅脱离汉族王朝的统治，同时在东西交通史上也失去重镇地位。敦煌重新归回中国领土，是从蒙古建立元朝开始的。世祖忽必烈时代，在敦煌以西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各城市，都设有宣慰司的行政机构，仍属元朝直接统治。蒙古建立元朝后，迁都于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古泺川河畔）。从首都西行去西域，也不必经由敦煌，于是敦煌不再是东西交通路上的一个都市。在和林时代，蒙古族的西征，前后共有三次。都是以和林为中心的蒙古高原出发，经天山山脉的南麓或北麓而西行的。文章在叙述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耶律楚材所记的西征路线，以及从西方来的旅行者的旅行记录中所记的路线后认为：蒙古民族创业之初，以和林为中心的蒙古高原，当时是东方世界的政治中心。和林时代的东西交通主要干线是天山南路或北路，沿此线东行直接可达和林。因比，没有必要经由敦煌。世祖忽必烈时代，马可波罗、父子第一次东方之行，根据马可《东方见闻录》是在忽必烈汗即位不久，他们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渡过伏尔加河，经由布喀剌、邪米思干、别石把、黑水城、再经天德至上都。这条路是通过天山山脉南麓，沿西夏领土北边东行的。马可波罗第二次旅行路线，是从威尼斯先到耶路撒冷，通过亚美尼亚去花剌子模，从此到巴里黑、喀什噶尔、于端、鄯善、罗布泊、再经沙州、肃州、甘州、额哩合牙（宁夏），最后经天德至上都。这是一条通过塔里木盆地南缘，经由敦煌、安西等河西走廊各城市，走向帝都——上都、大都的交通路线。马可波罗一家从西往东旅行的同时，东方的景教徒勒本·扫马和马可斯两人，开始了向欧洲的旅行，所走的路线是沿袭古代传统老路，经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因为这是一条最方便而路程又最短的道路。这也是恢复使用经由河西走廊这条交通路线的主要理由。另外，作者还从蒙国帝国内讧的角度，探讨了东西交通路线。马可波罗和两位景教徒的旅行，都是在蒙古三十年长期内讧，即所谓“海都之乱”时进行的。旅行者为了安全，毫无疑问避开易于发生战争的塔里木盆地北方，并要尽可能避免与海都发生摩擦。当时，元朝和各汗国之间，除旭烈兀的伊尔汗国，与大汗保持亲密关系外，其他汗国都依附于海都势力之下。伊尔汗国与大汗的联络路线，仍是利用塔里木盆地南边的道路。此时，在南边又重新设置驿站。南边道路再次开放通行，敦煌随之开始恢复了活力。忽必烈时代的后半期，从西方到大都的旅行者，多是通过海路而来东方。（成宗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海都逝世，从此东西交通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当时使节所走的路线是通过塔里木盆地北边，然后由伊州至大都。世祖之后，重新开放塔里木盆地北路，但其通行路线与和林时代有所不同。并非仅一条东行之路，还有经由甘州通往江南的一条路线，来往行人也很频繁。通过上述史实。作者强调，塔里木盆地南边的道路，以及沙州在东西交通上都起过重要作用。但由于陆路东西交通路线的逐渐

增多，从前由陆路进入中原，必须经由沙州的时代终于改变了。同时，在海路东西交通越发发展的情况下，敦煌在东西交通线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日益衰微。

二、边境之地的沙州。以上是蒙古创业以来东西交通路线的变迁情况。文章又对敦煌在元朝的防御地位进行了研究。当时握有实力的西夏，虽曾屡受蒙古军的猛攻，但并没有被打败。从孛鲁开始经过四年的战争，至成吉思汗参加之后又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才逐渐征服了西夏。其土地归入蒙古版图，敦煌也随之落入蒙古族手中。沙州归属蒙古之后，即隶属于拔都管辖之下。至元十四年（1227年）开始成为元朝直接管辖之地。三年后，沙州升格为沙州路总管府，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元朝之前，沙州一带是汉族王朝最西端的一个要塞。元朝版图扩大后，沙州以西的别石把、于阗等地都归属其领土范围。元朝如何看待以沙州为首的河西地区？据《经世大典·站赤》、《元史·成宗本纪》所载史料，原西夏河西走廊地区，元朝也当作边境要塞而予以重视，当时，属于甘肃行省的瓜、沙二州，一定要由诸王、皇亲率领的蒙古军驻守，而且设有屯田。据《元史·武宗本纪》所载，沙州、瓜州驻军屯田可岁收粮二万五千石。唐宋五代，因连年战争，沙州地区的耕地和可耕地的数量锐减，众所周知，元朝初期，对被征服者进行直接掠夺，而沙州是边境要地，有特殊的防御任务，为了设置屯田和驻军，土地被掠夺的情况更为严重。加以徭役繁重，代代相继，永久不变。这样，沙州人民过着非常苦难的生活。

三、沙州的佛教。敦煌莫高窟从南北朝时代开始建造，经历代开凿，数目逐渐增多。其中元朝新修的洞窟寺院至少有八处，还有一些元代维修和兴建的遗迹。安西以南的榆林窟，有七个寺院传说属元代建筑式样。据马可波罗讲，沙州有许多各式佛像的寺院和僧院，人们对偶像，表现出最大的崇拜和信仰。但作者断定佛教在元朝并不盛行。如果从元朝增建了莫高窟的千佛洞榆林窟，以及在西千佛洞存有部分元朝的壁画来考虑，可以理解在元代沙州地区佛教虽没有被废除，也不过是继续存在而已。作者最后在结论认为：敦煌在元朝的确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它在东西交通上的价值确实降低了。但是，作为边界要塞之地，防御的重要性仍然存在。由于防御任务也给当地居民带来种种苦难。

204　误传的中国古王城与其水力利用　　　　岑仲勉

（《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17期）

五代时，大食作家依宾墨哈黑尔（Ibn Mukhalhil），曾留住布哈尔(Bokhara)萨曼朝（Samanid）之那斯里第二（Nasr Ⅱ 公元913—942年）王庭时，适有支那王 Qalin ibn as-Shakhir使臣北来，拟以其女嫁那斯里之子奴亚（Noah），墨哈黑尔（以下简称墨氏）遂趁此机会来华，并有《游记》，其中有支那都城记事一段。然该书早已佚亡。公元十三世纪时曾有人引用，后来论证者有三、四家之多，或解释多误。所称“支那都城”究指何地，尚属悬案。玉尔认为墨氏所称支那都城名Sindabil，汉名最近者为成都府。马可波罗拼作Sindifu，十世纪时曾为蜀之都城。但中国王系中，求其父名Shakhar或Shakhir子名Kalatin相类者没有。考诸五代，实未见有中国公主嫁给西方国家之记载。作者认为成都之说不能成立。张星烺先生根据玉尔本译为汉

文，张氏则拟墨氏所称王城为长安城。但据《长安志》考证，长安城并无城墙顶有川流之记载，且其城名Sindabil与长安城名不符，况墨氏来华　约在后晋天福六年，彼时西安称晋昌军，并无宗室分驻，故作者认为所谓支那都城，绝非指长安城。马迦特则考其地为甘州，而作者据《马可波罗游记》、《甘州府志》、《辛卯侍行记》等书考证，均与墨氏所记不符，因此马加特之说亦不能成立。最后，作者考证结果，认为墨氏所记之支那王城，实即山丹古城，并从九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特别根据《甘州府志》，《辛卯侍行记》等书，对山丹有关文物古迹、水利设施、城墙高厚等之记载，认为与墨氏所记基本相等。又墨氏所谓支那王城Sandabil之音义与山丹亦基本相符。il为突厥之国家、地方、民族、联邦、君主、主权、太平之义，故Sandabil犹为山丹国或山丹联盟。Sandabil前半是汉音，后半是突厥语，本应写为Sandab-il，唯其牵连书之，遂令学者迷惑而拟为印度语。至于墨氏所记之王Qalin，其父名Shakhir，据《新旧五代史》记载，当时回纥可汗为仁裕(突厥文Qualin含有"强壮"、"肥厚"、"许多"诸义)，"许多"即裕，故仁裕即墨氏《游记》之Qalin，不但时代合，义解亦合。凉州境内，开元前早有思结、回纥等部落，思结为铁勒九姓之一，依唐译例，以t代收声r，则Shakhit得与思结相当，意当日称可汗者原思结部人，故名思结。其曰甘州回鹘者，因回鹘之声势大，且部落实有回鹘人也。甘州回鹘信摩尼教，故《游记》所谓"土人不杀牲为食，全不食肉者"即指摩尼教徒。佛教虽注意戒杀，犹不至杀生者死。凡此种种，证明墨氏所谓支那应为甘州回鹘，王城应为山丹古城，所记大佛应为山丹土佛。关于误传的中国王城，多年的疑案，经岑仲勉先生考证，始得以解决。山丹在丝绸之路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即使在五代时，其城市之繁荣，水利之建设，在墨氏《游记》中即可窥其大半。

205　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　　　黄盛璋　方　永

（《考古》1982年第8期）

吐谷浑故都—伏俟城的位置是过去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1960年6月下旬，作者方永在青海湖区进行地貌考查时，曾于湖的西岸布哈河下游谷地南侧发现一座古城遗址。此城遗址位于向科先大队（属共和县黑焉河公社）东北一公里处，正南距赛什曲大队约三公里。当地人民称此城为"铁布卡"。据作者根据各方面的考察，认为这个古城就是六世纪吐谷浑故都伏俟城。《魏书·吐谷浑传》："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此古城东距青海湖岸最短距离约7.5公里，方位、里距与《魏书》所记完全吻合。青海湖附近一带为游牧草原地区，固定的建筑物极少，自日月山以西，都兰以东，再元另外古城。古城遗址在地理上有两个特点：一是靠近海岸，二是当河的最下游，入湖之口。水源问题是任何民族选择城址所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古城北临布哈河，又当下游汇集之口，水量较大；再则位于布哈河支流莱济河的冲积扇上，不受布哈河下游河道活动的影响，且地下水源丰富；同时，布哈河谷地又是青海湖滨平原的组成部分，平原宽阔，水草丰美，适于放牧。吐谷浑究于何时筑伏俟城，确切的年月虽无可考，但作者据《魏书·吐谷浑传》的有关记载，断定伏俟城建立的上限不超过公元481—491年。其废弃时间，今亦无可确考，然必在龙朔三年入于吐蕃之后，伏俟城因为吐谷浑建牙之后，地位渐形重

要，加以吐谷浑当时国势较强，南通巴蜀，北交凉州，西则控制于阗，影响远及西域，并和北朝不断有聘使往来，所以中外商贾多趋集或取道于此。加以河西走廊常被阻塞，西方求法和东来宏法诸高僧，亦不得不取道吐谷浑。唐初由于汉藏、藏尼的联婚，创通了中外交通上一条新道——吐蕃尼波罗道，最初也是通过吐谷浑牙帐所在的伏俟城。伏俟城当时所联系的中外交通路线，一条是西北出于阗，取道柴达木盆地北缘，此道即宋云、惠生西行求法所经。另一条是西南出河源，往西藏以至尼泊尔、印度。此即历史上有名的尼波罗道，全线创通在公元643年。伏俟城遗址的发现，有助于对吐谷浑历史的了解；通过对古城遗址的发掘研究，可弄清古代汉族文化如何影响吐谷浑，而吐谷浑又如何变通创造以适应本民族与自然环境的特点；进一步了解青海道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对于青海湖区某些历史自然地理的变迁的研究，也有很大作用。文后附有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关于“铁卜卡古城”的来信并可参阅。

206　吐谷浑的诸根据地　　(日)佐滕长著　王丰才编译　芈一之校订

（《西北史地》1982年第2期）

本文编译自日本佐滕长所著《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一书的第三章，本章探讨了自南北朝以来活跃在青海东边和南边的吐谷浑的诸城位置及唐代对吐谷浑的作战路线。全文共分三部分。由于吐谷浑的最初根据地是大夏河流域以西的枹罕塬，所以在第一部分，首先以《水经注》记述为中心，考察了大夏河流域的历史地理情况。大夏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在《水经注》中叫漓水。作者经过详细考证认为《水经注》对漓水水系的记述有两个错误：一是水源问题，把支流下哈家河当成正流，而把正流桑楚河当成了支流；二是流向问题，漓水的流向应当是由东南向西北，而《水经注》的记述却变成由东南流向东北。第二部分考察了吐谷浑的根据地，首先是变动过的三个首都。一、赤水城。《晋书》、《同文志》记述赤水在扎陵、鄂陵两湖的近旁，《读史方舆纪要》说它在“今临夏县南边”，作者认为这两说都不对。根据《北史》、《隋书》等史籍记载，确认赤水城就是树敦城。这个城就在乌兰布拉古河畔的恰卜恰处(共和)。二、浇河城。吐谷浑到第六代国王视罴时，又迁到莫何川，即在贵德西侧注入黄河的顿楚河。到第九代国王阿豺时（公元423年），吐谷浑的首都又迁到浇河城，即贵德。三、伏俟城。到第十五代吐谷浑王夸吕时，又迁都到此。根据《魏书》、《周书》、《通监》、《隋书》等记载考证，伏俟城就在布哈河流域，即今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古城。尽管吐谷浑的首都有些变化，但按《南齐书·河南王传》所记，它的重要根据地只有四个：即清水川、赤水、浇河、吐屈真川。清水川即循化县东、由南向北流入黄河的清水河，河口的东面是临津关。所谓清水川就在这个地方。吐屈真川，即屈真川，也叫居菇川，位于今茶卡或其西边的莫河之旁。第三部分考察了唐代李靖对吐谷浑的作战路线。作者根据《通鉴》卷一九四的记事年代，从贞观八年十二月到平定吐谷浑排列出来，然后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等史籍的记载具体分析，指出《通鉴》中所记“中分其军为两道，靖与薛万钧、李大亮由北道，君集与任城王道宗由南道”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当为李靖走的是南道，具体路线是曼头山、赤水源、赤海（赤水）、乌海、蜀浑山、居茹川、突伦川；而候君集走的是

北道，具体路线是破逻真谷、星宿川、柏梁。其所以发生这种错误，可能是由于李靖或诸将对朝廷汇报的情况不确所致。

207　“西域”辩正　　杨建新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1期）

关于“西域”的解译，中外研究者几乎各执一义，认识各异，概念不清。本文作者在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对“西域”范围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作者认为许多研究者通过“正史”中的《西域传》来确定“西域”的地理范围，是不科学的。因为第一，“正史”中大部分史书并无《西域传》。第二、各史《西域传的内容，所涉及到的地区，几乎无一篇是完全相同的。第三，无《西域传》的“正史”，并不否认西域地区的存在。由此看来，各史《西域传》所叙述的地区，与“西域”这一地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各代对“西域”地理范围的认识并不一致。再则，各史《西域传》所包括的内容与“西域”的地理范围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应，也不能以《西域传》的内容来确定“西域”这个地名的地理范围。

“西域”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具有确定含义，表示一定地理范围的概念。它所包含的地理范围，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汉代的“西域”：从汉武帝以后至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开始，“西域”这个地区就是西域都护所管辖的“西域三十六国”，其具体位置“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侧接汉隔以玉门、阳关，西侧限以葱岭”。基本是现在新疆的南疆地区。当时乌孙即天山以北直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不属“西域”范围。葱岭和乌孙以西诸国，当时被称为“西北国”。由此看来，所谓广义的西域，在汉代是不存在的。直到北魏时，太武帝拓跋焘派遣董琬等通使西域回来后，按他的理解，将西域分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自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西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到这时，中亚许多地区才被看作西域的范围。

唐时的“西域”地理概念始明确地有了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西域”与董琬的看法相差无几，范围很广。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都可称为“西域”。狭义的“西域”并不是指汉代西域都护所管辖的新疆南疆地区，而是指葱岭以西到波斯的这一部分中亚地区。唐代在西部设置的都督府州县已远达波斯，当时的南疆被看作是内地，并把这一地区与西域区别开来。这与汉代所说的西域，有很大的不同。明代对西域的概念比较明确，把敦煌以西直到阿拉伯半岛等统称西域。

清代“西域”的范围十分清楚，即东起敦煌以西，西至巴尔喀什湖及葱岭。《大清一统志》所说的新疆即西域的范围是：“东至喀尔喀、瀚海及甘肃界，西至右哈萨克及葱岭界；南至拉藏界，北至俄罗斯及左右哈萨克界。广轮二万余里，北为旧准噶尔部，南为回部”。作者在这里着重指出，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以及浩罕等，不属清代西域的范围。此外，作者还指出，明代“西域”主要是表示一个地理范围的概念，而清代所说的“西域，”不仅表示一个地理范围的概念，也是清朝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的名称。这与汉、唐的情况大体相同。

通过以上各朝代关于“西域”含义的考察，作者对“西域”概念和含义及其使用，得出如下一些认识。

一、“西域”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具有确定含义，表示一定地理范围的概念。它所包含的地理范围，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

二、目前一些著作中说“西域”即我国新疆等说法，既不准确，又不严肃。

三、“西域”一词在汉、唐、清时期，不单是一般地区概念，而且具有地方行政单位的含义。

四、在结合具体历史时期使用“西域”一词时，最好严格按照各时代赋于“西域”一词的含义来使用为宜。

五、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西域”一词时，以清代“西域”一词所包括的地区范围——即清代新疆地区作为“西域”一词的含义为好。

208 西域地名考 苏北海

（《西北史地》1982年第2期）

本文是考证西域地名之作。文章引用了岑参、王维、白居易、李白等唐代著名诗人有关西域的诗作和《史记》、《汉书》、《通典》等史籍的有关记载，以及古代学者游览和研究西域的论述，对哈密、高昌、阴山和塔拉斯等四个地方的名称来源和演变，进行了周密的考证。（一）哈密。这一名称标志着古代部族活动的遗迹。远在公元前乌孙族就活动在敦煌、哈密一带，哈密曾一度成为乌孙的王都，因而是乌孙族活动的中心。乌孙族崇拜天体特别是太阳。乌孙王被称为“昆莫”。在突厥语中，“昆”是太阳的意思，“莫”是“伯”的谐音，是统治者或首领的意思。因此，“昆莫”即“昆伯”，意思就是像太阳一样伟大的首领。哈密在历史上的名称曾有昆吾、伊吾、伊吾庐、哈密力、合迷里、库木尔等不同称呼，都是“昆莫”译音之转。从元朝起才被正式译成“哈密”，原意就是“太阳伯”，即像太阳一样的统治者。（二）高昌。作者对《北史·西域传》和《宋史·高昌传》中认为取名高昌的意思是因该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的说法提出异议，指出吐鲁番盆地是我国最低的一块洼地，而高昌在吐鲁番盆地中地势也不很高，还不如交河故城和鄯善县城高。以高昌命名时，并不是单指现在的高昌一地，而是指的整个吐鲁番盆地。高昌原是车师之地，由于地理环境关系，从古就引用天山的雨雪降水从事农业，周围环境又多戈壁沙滩。当时车师人发明了适合于当地环境的车轮比较高大的大车作为运输工具。所以车师的名称就是指有车的部落。当汉族人陆续去到该地后，见到车师人所用的高轮大车，即概称吐鲁番盆地为“高车”，不知原由者就讹之为“高昌”。以后这种高轮大车普遍为蒙新高原的铁勒族人民所采用，因而铁勒族也被称为高车族。所以高昌实由高车之名而得。（三）阴山。就是天山。实际当时西域的阴山是把天山连同它的支脉都称为阴山。不仅隋唐五代时如此称呼，即在宋辽金元时也是如此称呼。（四）塔拉斯。它既是水名，又是城名。因塔拉斯河北面是草原游牧区，南面是农业区，因而是草原民族和农业民族的交接地带，斗争异常激烈。塔拉斯一名的突厥文原意就是互相争夺。塔拉斯为什么又叫江布尔呢？这是因为维吾尔、乌孜别克等民族

语中，都把汉族的统治机构称为“衙门儿”，而在哈萨克——克卜察克语中却把“衙门儿”称为“江布尔”。所以哈萨克人都称塔拉斯为江布尔，把塔拉斯河以南的吉尔吉斯山脉称为江布尔山。另外，本文还对杜佑《通典》和《新唐书》中，以交河城为高昌郡治和高昌国都的记载，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二者均在高昌而不在交河。同时对这些地名的历史内容和文化发展、民族融合情况，以及唐代经济文化对塔拉斯地区的影响，汉人和中亚各族人民一起对发展中亚工农牧业生产的贡献等，均有较详细的论述。

209　《魏书》本纪中地望不详西域诸国考略　　陈连庆

（《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割据政权林立，但丝绸之路仍畅通无阻。北魏建国之初，太武帝拓拔焘即派遣使臣出使西域，和各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自太延以迄永安（公元435年——528年），前后九十三年，中亚各国、印度、哌哒、波斯、乃至大秦都和北魏通交。葱岭东西，使节、商人和僧侣络绎于丝绸之路，颇极一时之盛。《魏书》本纪中所载国名，有一百多个，但《魏书·西域传》中却没有记载。前人的著作也很少注意这些。本文参考各史西域传和法显、玄奘旅行记等文献及近代有关著作，对这一百多个国家现在的具体地方进行了考证，明确肯定了二十八个国家的名称和地点。这些国家中，在我国境内的有：於师（新疆英吉沙县）、诃槃陀陀（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乌稽乃乌耆之误今新疆焉耆县）、末久半（新疆叶城县哈尔噶里克）等四国。位于中亚地区的有二十国，它们是：（1）浮图沙（阿富汗北部的巴达克山）、（2）石那（阿富汗巴米来安与席巴尔甘之间）、（3）阿袭（为奄蔡、阿袭，阿兰聊、温沙那，皆Aorsiz和Alani之对音）、（4）曹利（阿富汗加兹尼）、（5）阔悉（阿富汗库拉姆河南岸霍斯特）、（6）车多罗（苏联苏尔哈布，当瓦克什河与喷赤河之间）、（7）罗婆（阿富汗拉格曼，在喀布尔河北岸）、（8）太罗槃（阿富汗木尔加布河流域之迈马纳）、（9）舍弥（巴基斯坦奇特拉尔）、（10）伽比沙（阿富汗菲里斯坦）、（11）渴文提（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12）波利（阿富汗瓦尔撒克河附近之法尔哈尔）、（13）胡密（阿富汗东北部之瓦汉）、（14）苏突阇（苏联乌腊提尤别）、（15）伽秀沙尼（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中间的Kashania）、（16）那竭（阿富汗贾拉勒阿巴德地方）、（17）比地（阿姆河西岸之毕地），（18）伽拔但（撒马尔罕北部）、（19）久末陀（今Karategen之苏尔哈布河流域）、（20）不汉（苏联费尔干纳）。位于西亚者有：普岚（即拂菻）、陀拔罗（里海南岸）、斯罗（叙利亚塞琉西亚）、达槃（高加索以南之达尔班特）。这许多国家所以不易考定，是由于译名歧出，文字谬误，特别是史料缺乏，不易洞悉当时的具体情况。故本文之考证具有重要意义、对研究古代西域诸国有参考价值。

210　《水经注》和《法显传》

——纪念顾颉刚先生（1893—1980）　　章　巽

（《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期）

《法显传》成书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早于《水经注》一百年左右，但在

《水经·河水注》中，已充分吸收了《法显传》的记述。《水经·河水注》中引用《法显传》文甚多，北起新疆境，南及印度河和恒河两流域，所包括地区甚大。在《泗水注》中，还记录了法显归国后在彭城的行踪。近年来作者因从事《法显传校注》的编写，曾把《水经注》中所有摘抄《法显传》的文句及有关资料辑录出来，发现《水经注》里面这些有关《法显传》的段落，本身也有许多问题。本文对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几段引文的误讹进行了对勘考释，可供丝绸之路研究或供整理《水经注》者的参考。一、乌帝、�夷和乌夷。《水经·河水注》在述及于阗国时，摘取《法显传》说："释法显自乌帝西南行，路中无人民，涉行艰难，所径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达于阗"。这个"乌帝"地名，两字都有问题。它即《汉书·西域传》中所称的"焉耆"，其治所故址在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附近。此名在多数版本的《法显传》中都作"傿夷"，高丽本里面则作"乌夷"。而在《水经注》的诸本中皆作"乌帝"。经作者考释，现传各本《水经注》中这个"帝"或"傿夷"，"乌夷"的地名，当非郦氏原本书的写法，乃是传刻之误，它应该依慧琳《音义》所见《法显传》的古本改正，写作"焉夷"；或至少也应该依宋、金刻本和古钞本《法显传》改正，写作"鄢夷"或"傿夷"。二、恒水。《水经注》是一部记述水道的名著，郦道元是记述水道的名家，然而郦注对恒水（即恒河）这条南亚著名大河的记载，和《法显传》传文的引述，其中错误很多。作者根据《法显传》的记载，描述了法显在恒水流域旅行的路线，然后一一指出郦注所引《法显传》在关于恒水的记述上发生错误之处。同时也指出杨守敬依《水经注》所作《水经注图》的错误。作者认为郦氏的许多错误，不能仅归咎于未见西域图，实则是由于没有细心读《法显传》，而是主观判断，意为增改所致。三、中国。梵文中有一个字Madhya-qesa，本意是任何东西的中央、中部之意，又指恒河中游的广大地区，相当于我国史籍中所称的"中天竺"。《法显传》中的"中国"，也是这个字的意译。在《法显传》中，对于我国是用"秦土"、"汉地"、"晋地"来称呼，有时甚至也留下了当时印度人用"边地"(Mleccha-desa)的名称来指称我国的记录。可是《法显传》中这个"中国"，在《水经注》引用时也曾被误解。四、新头河。《水经注》引述《法显传》中有关新头河部分的行记，也有一段比较混乱且带错误。作者举其大者予以补漏正讹。如"径中天竺国"，"又径蒲那般河"，"此水径靡头罗国而下合新头河"，"自河以西，天竺诸国。自是以南，皆为中国"等记述都有错误，其中有些显然是郦注引文有差误，而若"又径蒲那般河"一句，其原文在《法显传》中本来是"有遥捕那河"。北宋时《法显传》中这一句未窜入误字，郦道元的原文亦当无误。而至南宋以后，藏经中各本《法显传》，以及一些丛书本的《佛国记》，此句中都出现了误字。这是误钞误印的缘故。五、太子箭泉。《水经·河水注》摘引《法显传》关于释迦牟尼本国迦维罗卫的一段记载，其中第一句"恒水又东南径迦维罗卫城北，故净王宫也"。即有差误。恒水不经迦维罗卫城北，而"净王"乃系"白净王"之误。《水经注》此段还有错简。郦氏原本，当不如是。作者以上提出的只是《水经注》中所见《法显传》文的一部分，已可见问题之不少。

211 唐写本地志残卷浅考　　　　薛英群　徐乐尧

（《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2辑）

敦煌石室古籍书卷的发现，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有其重要意义。特别是这些古籍书卷，对补正我国史籍之不足，更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唐写本地志残卷就是这些大量史料中的一鳞半爪。唐写本地志残卷，现存敦煌县文化馆，最早是向达先生于1943年在敦煌县邮局蔺国楝处见到，曾就真伪、性质、年代、价值诸项作过简要考证。《中国文物》1979年第1期曾发表了影印全文。唐代地志传世不多，唐写本地志残卷，虽残缺大半，仍不失为研究中唐历史的珍贵文献。

本文同意向达先生早年将此卷定名为"地志"的见解。地志首尾俱残，书写年代不明。作者以残卷所记诸州（府）、县名，与两《唐书·地理志》、《元和志》、《通典》参照核对，推断出书写年代的上限与下限，认为地志残卷的书写年代当在天宝初期。

地志残卷中大部分州（府）、县均记有"本"。"本"即公廨本钱，为唐代官府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官府常以公款投入商业或贷放市肆取利，以所得充官俸。过去从未发现记载全国范围州、县公廨本钱的文献。地志残卷在此方面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地志残存的岭南65州（府）中，无"本"的州（府）16个。有"本"而以"两"作计量单位的州（府）33个；以"千"计量的8个；计量单位不明的8个。"两"是银两。说明天宝初期，白银在岭南已是通行货币。据此，作者认为对唐代"银不为币"的问题应作进一步探讨。

作者详列了《地志残卷》、《新唐书》、《旧唐书》、《通典》《元和志》县名差异对照表，参照《地志残卷》，对有关史书作了一些补正。

文章还对"井课"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井课"即户口税，非"矿井课税"。

212 唐代西域诗句释地　　　　刘维钧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4期）

由于唐代对西域的大力开拓和苦心经营，西域诗风靡盛唐。本文作者就岑参边塞诗中所涉及的一些地名阐述了自己的见解。"瀚海阑千百丈冰"（见于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历代注释者都解释为：瀚海即沙漠，阑千即纵横。据《史记·霍去病传》、《括地志》及《太平寰宇记》等文献记载，都对沙漠和瀚海视为两种不同的自然景物，又经作者反复考证，认为"瀚海"乃是"杭爱"或"杭海"的音转异写，是唐代居住在蒙古高原和西域地区的回纥人，突厥人对高山峻岭中险隘深谷的通称，意为"阴崖"。而"阑千"则是古丝道附近居民对驿站的称呼。故"瀚海阑千百丈冰"，意即：在陡峭山崖所形成的陂谷里的驿站附近，一片冰天雪地，雪崖千尺，冰岭百丈。而将"瀚海"误

为沙漠，是由于某些边塞诗中“瀚海”概念模糊引起的，逐渐为后世所公认。“花门将军善胡歌”（见于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作者考证：“花门”源自“花门山”、“花门山堡”，即今居延海北向蒙古人民共和国一百三十公里处。唐时那一带游牧着铁勒人的分支，后融于回纥。所以“花门将军”可解释为回纥将军。从广义角度来说，南起甘、凉二州，北至阿尔泰山南麓，都有回纥花门人栖息。故岑参有“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的诗句。这里的“花门口”指的是花门人开设的“酒家”门前，而非花门山口。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有“赤亭道口行人绝”，以及《火山云歌送别》中的“火山突兀赤亭口”中的“赤亭道口”和“赤亭口”是指同一地点，即今吐鲁番县境内天山东段北脉博格达山的分支吐孜塔格的胜金口，历代文献对此均有记载。而《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中“赤亭多飘风”之句中的“赤亭”则是亭障名。唐政府曾在此设“赤亭守捉”，历代文献亦多记载，具体地点在今哈密县境内。“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出自岑参《银山碛西馆》）这个银山究竟何在？作者考证认为即今托克逊县城西南一百零二公里处的库米什小镇，库米什即突厥语“银”之意。作者认为，作为天山山系支脉的银山，库米什为其东碛口，而焉耆西一百六十公里处的策大雅则为其西碛口。至于“铁门关”，“丝绸之路”上有两个，岑参所登者，显然是古焉耆与龟兹间的铁门关，即今焉耆县与库尔勒县之交的哈满沟。而另一个铁门关，据文献记载，当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南部述尔宾特以西约十三公里处。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诗作中曾多次提及“阴山”。作者认为，这个阴山决不同于王昌龄《出塞》“不叫胡马度阴山”中的阴山，即今内蒙中部之阴山，而在西域范围内。实际上，唐代习惯把天山的北支干脉统称阴山，这一习惯称谓一直延用到元代。

213　岑参“西征”诗地名探讨　　　刘　满

（《西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4期）

岑参的两首“西征”诗，《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共涉及了九个地名，即轮台、渠黎、金山、雪海、阴山、剑河、沙口（一作“河口”）、走马川和车师。学者们对这些地名的地理位置的解释不同，对“西征”诗的作战地域、行军路线就必然产生分歧意见。闻一多先生认为这两首诗是“天宝十三载冬破播仙之作”。而胡大浚在《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一文中却认为是为“征讨越境西侵的回纥而作”。本文作者主要是就“西征”诗中所涉及的地名进一步的进行探讨，以图对其做出正确的解释，从而确定“西征”诗的作战地域和行军路线。文章在《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史料验证、辨析，确定“西征”诗中所涉及的九个地名的地理位置如下：

轮台：在今米泉县；
渠黎：可能在今奇台县；
金山：今阿尔泰山；
雪海：在今米泉县近附；

阴山：指天山东段；

剑河：今叶尼塞河的上游乌鲁克穆河；

沙口：疑为剑河上的渡口；

走马川：指今米泉县境干涸的河床；

车师：即汉车师后王庭，唐为金满县治，今吉木萨尔。

上述九个地名，除金山，剑河和沙口在北庭东北境和回纥西境外，其余均在庭州境内。从地名的地域位置，可以证明西征与回纥西侵有关。“西征”诗是为“征讨越境西侵的回纥”而作。这次回纥西侵，当是越过金山，进入了金山西的玄池州、匐延和大漠州等都督府，即今额尔齐斯河流域一带。西征的作战地域即在这一带。西征的路线由今米泉（轮台）出发东行，经吉木萨尔(金满)，过奇台（渠黎），由准噶尔盆地东缘沿阿尔泰山（金山）西麓西北行，到额尔齐斯河（多逻斯川）下游的斋桑泊（玄池）一带。

214　岑参西域之行及其边塞诗中对唐代西域情况的反映　　卢　苇

（《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1期）

唐代诗人岑参的边塞诗不仅印证而且丰富和补充了史籍的记载，为研究唐代西北边疆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素材。近来从各个角度研究岑参边塞诗的文章发表了不少。本文是对岑参西域之行路线、西域民族关系、战争情景，以及西域政治形势的分析论证。岑参赴西域所经各地，如据其诗作不仅可以考见他到达过的西域地区，还可复原其往来西域的具体路线。岑参从长安出发，经过咸阳到陇山（《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至秦州（《醉后戏与赵歌儿》），渭州（《西过渭州见谓水思秦州》）、金城（《题金城临河驿楼》）过河西之武威（《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张掖（《过燕支寄杜位》）、酒泉（《酒泉忆杜陵别业》）敦煌（《敦煌太守后庭歌》），出玉门关（《玉门关盖将军歌》），赴交河(《使交河郡》)、经银山（《银山碛西馆》）至焉耆（《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过铁门关（《题铁门关楼》）到安西（《安西馆中思长安》）、北庭（《北庭作》)、轮台（《首秋轮台》）西至热海。岑参所经过的上述地区，正是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各个重要据点，尤其是出玉门关至热海一段，正与唐初玄奘西行路线基本符合。

岑参诗作中纯边塞诗有五十余首，内容十分丰富，但比较集中的，一是关于西域风光的描写，为了解唐代西北边疆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最可贵的是诗中对个别地区景色的描绘，如吐鲁番盆地的炎热、银山碛口的大风、铁门关的险峻、北庭和轮台的奇异、热海地区的风光等，都在诗人的笔下得到了生动如实的反映。另外、在《胡歌》《赵将军歌》等诗篇中，还生动的反映出西域少数民族“蕃王”以及他们与汉将的融洽关系。“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这是诗人对西域突骑施首领的描绘，“叶河蕃王能汉语”表明了当时西域地区与内地间的文化交流，汉族语言已经在西域少数民族中获得广泛的传播。对西域少数民族的乐舞在岑诗中更是作了十分生动细腻的描述。

二是关于唐代西域地区战争情景的描述。岑参以“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的身份，长期处在“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鼙”之中，因而他对西域战争的描述最为详实生

动。在这些战争诗篇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诗中描述了唐朝军队与吐蕃发生在西域的激烈战争。关于封常清破播仙的战争不见于两唐书记载，岑参的边塞诗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材料。不仅再现了当时西域有关战争的种种场面，而且也是“安史之乱”前夕唐代西北边疆的整个形势的反映。首先，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唐代西北边疆已明显的呈现出动乱不安的局面。其次，日益强大的吐蕃贵族成为当时唐朝政府在西北边疆方面最大的威胁力量，以至发生了与吐蕃的激烈战争。第三，从诗中反映出当时唐军对突骑施及在播仙激战中的胜利。这就说明了尽管唐代西北边疆在“安史之乱”前夕已经出现动乱，但唐朝政府仍能控制局面。只是到“安史之乱”爆发，四镇边兵被调入内地，吐蕃才乘机占据河、陇，从而阻碍了西北边疆与内地联系。“安史之乱”直接导致了唐朝中央集权失去了对西北边疆的控制。

可见，岑参边塞诗中描述战争的诗篇，对于了解“安史之乱”前夕的唐代西北边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它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了对西域战争情况的反映。

215　葱岭　　　肖之兴

（《西北史地》1985年第6期）

本文论述了我国历代文献关于葱岭的记述。葱岭是我国西端，由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等四大山脉交汇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的山结，也就是举世闻名的帕米尔高原。在汉代，这里是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要冲，扼东西交通的门户，是中国西部的边境重地。从汉朝起，我国历代史册都有关于葱岭的记载。我国古代所以把帕米尔称为葱岭，是因为其上多野葱。《水经注·河水二》说葱岭上的城国伽舍罗逝“总万国之要道”，清代《西域水道记》说塞勒库勒（今塔什库尔干）“为外藩总会之区”，《清朝续文献通考》说蒲犁厅（治所在今塔什库尔干）“为诸戎入塞总会之区”，含义基本相同，都说帕米尔高原上的名城，是古代我国和西方各国往来的陆路交通枢纽。北魏时宋云所著《行纪》，生动地描绘了葱岭的高耸和险峻。唐代高僧玄奘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中，准确地概括了帕米尔高原一带层峦叠嶂、峡谷深邃，许多高峰终年积雪的地理面貌。唐开元中，在帕米尔高原上设立“葱岭守捉”，作为军队戍守之地。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著《马可波罗游纪》记述了高原上气压低、沸点低、食物不容易煮熟的特点。明朝时，葡萄牙人鄂本都在《鄂本都访契丹记》中，也描写了帕米尔高寒山区的景象。清代乾隆朝的《西域图志》和《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都对葱岭有详细描写，并正确说明：葱岭是古代我国西部边境一大高原地区的总称。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景澄在所著《帕米尔图说》中说：从两汉以降，直至清代，我国历朝文献都把帕米术高原称为“葱岭”。现在一般将帕米尔高原上的八块平川分别称为八个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瓦罕帕米尔、和什库珠克(哈尔果什)帕米尔、大帕米尔、小帕米尔、阿喇楚勒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郎库里帕米尔。

216　疏勒名称考　　　苏北海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3期）

古代中国西部有三个同名的疏勒，一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西部喀什噶尔地区；一

在天山以北吉木萨尔附近地区；一在河西走廊西部安西地区。实际都是同一意义，即古突厥语"有水"的意思。本文对这三个地区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及其在中西交通上的重要性进行了研究考证，疏勒这个地名至少是从两汉时就留下的。可见从两汉起由塔里木盆地直至天山以北，再迤东至河西走廊西部已是突厥语系民族为主，尤其是塔里木盆地并非雅利安种伊兰人。由于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地形、整个盆地降水稀少，盆地周围无数的地名都是依水取名，而从汉代起盆地西部最大的绿洲之一便命名为疏勒，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了。疏勒绿洲由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的喀什噶尔河及克孜勒苏河冲击而成，是古代丝绸运向中亚的必经大道。随着疏勒归属汉朝，国力有所增强，直到唐朝，疏勒的所辖范围也逐步扩大，由莎车绿洲到整个帕米尔高原。在唐朝，疏勒不仅是军镇重地，而且特设疏勒都督府听命于安西都护府。作为佛教东传的重要据点，疏勒拥有佛教隆盛的应有成就，《一切经音义》的作者慧琳就是疏勒人。由于疏勒一名系突厥语译音而得，从而产生了如沙勒、佉沙国等不同的译法。自唐以后，疏勒就被称之为喀什噶尔，其原意应该是"统治者的王都"。在著名的喀拉汗朝时，喀什噶尔与巴拉沙衮并列为喀拉汗朝的首都，特别是在喀拉汗朝王室皈依伊斯兰教以后，喀什噶尔更成为中亚伊斯兰教文化中心之一，产生了举世闻名的伟大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和玉素甫·哈什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两部杰出的著作。自喀拉汗朝以后的各朝，喀什噶尔一直是塔里木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军事战略重地。而天山以北的疏勒城，因东汉爱国将领耿恭的固守而为世人称道。作者认为该城在车师后王的金满附近，其名同样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产生的。公元74年，东汉派耿恭屯驻天山以北金满城，同年3月，匈奴围攻金满城，耿恭由金满城撤退至有水有险可守的疏勒城，直到公元76年。有人认为，耿恭守卫的疏勒城是今奇台县半截沟公社麻沟梁大队的"石城子"古堡废墟，也有人认为是今泉子街以南与头道桥之间的"他地道"的出口处。作者认为只有经过考古发掘才能最后确定。至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疏勒河，原称籍端水，又名卜吉儿川，一名布隆吉河。由突厥语译音而称苏赖河、苏勒河、索尔河等，到清康熙时，由于在这一地区擒获了叛乱的噶尔丹部属。清廷为表彰统一西域的武功，就引用历史上西域著名古地——疏勒为名，称河名为疏勒河。以最大的一条河流命之为疏勒河，足见水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正是这条河开辟了敦煌、安西、玉门几块绿洲，满足了西去东来的各国使者和商人的需求，并使古代敦煌成为世界一大都会，而千佛洞正是依靠这条河及其支流创造了举世瞻目、无与伦比的文化艺术。唐代中西贸易频繁，东往西来的商旅僧徒络绎不绝，而疏勒河又是通西域的一条必经之河道。那时称疏勒河为葫芦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之为瓠𤬏河，他书又称之为胡卢河，《辛卯侍行记》认为胡卢河即今日窟窿河，经乱山子以入疏勒河。这一带是唐代国防重地，一方面是通西域的要道，另方面是北防突厥南下的重要关隘，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217 SERES为疏勒说 钱伯泉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1981年第12期）

Seres在中西交通史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名词。它在古代西方人的字典里是"丝国"

或“丝产地”之意。但Seres到底指的是什么地方？却众说纷纭。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许多探讨和研究，得出了各种不同结论。本文综合各家之说，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新的看法，得出与前人有所不同的观点，产生了Seres即疏勒的结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克泰夏斯（Ctasias）的著作中就出现了Seres一词，四百年以后又在希腊地理学著作中，罗马诗歌及历史学、博物学著作中多有记载，但大多带有神秘色彩。到了公元二世纪时，希腊地理学家拖雷美（Clandius Ptolemy）在他的《地理书》中，记载Seres的地理环境较为详实。作者对西方各家之说进行了归纳，大致有以下不同之说：

1.Seres在北印度和西梯亚人的中间；

2.Seres四周有高山环绕，中有两条大河；

3.拔克托里亚（Bactria即大夏）曾经拓境达Seres；

4.Seres有大城赛拉（Sesa），因而得名，并且国境辽阔，国内尚有许多名城；

5.Seres人身材高大，红发碧眼，善经商而名于世。

作者根据上述各家论点，结合中文史料进行了分析后，认为Seres决非指整个中国。因为中国地望不在印度和西梯人之间，大夏国王的势力也从未到达过中国本土，中国人也不是红发碧眼。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另有秦尼国（Sinae或Thinae）之称，又都说它在赛里斯之东，等等。以Seres的地理环境看，它必在塔里木盆地中。从拖雷美的《地理书》与我国同时的历史学家鱼豢的《西戎传》互相对比研究，发现拖雷美所谈的Seres与鱼豢所记疏勒国，许多地名可以相对应。疏勒（Sure）又名沙勒（Sarek）。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Seres即Ssre和Sarek的音转，Seres即疏勒。作者又根据《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疏勒所辖寺院名称、传说故事与史书记载相比照，又将义净所撰《梵语千字文》中把疏勒作娑罗俄（Saraga），“大秦景教碑”叙利亚文中把疏勒作沙洛额（Sarag），以及《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提到大夏为疏勒国质子所建的沙洛伽寺（Saraka即疏勒寺)等，又从语言转变方面相核对，认为这些都是疏勒之不同音译。故Seres为疏勒的结论当无怀疑。至于Seres人红发碧眼，善经商，又颇类中夏等问题，实历史性的误会。所述这些人实即粟特人。粟特是古代中亚的一个重要民族，居住在葱岭之西，康居之南，安息之东，铁门关以北。粟特民族常为外来民族所统治，他们从未建立过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但粟特人善经商闻名于世，他们的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特别是丝绸之路上建立了许多据点，几乎垄断了中西贸易，他们又自称是窣利人。古代遥远的希腊、罗马人从未亲自到过疏勒，更未见到过疏勒人，而把丝路之上贩运丝及丝织物的粟特人，当成了疏勒人，因而说Seres人金发碧眼、善经商。

218 喀什噶尔的历史变迁　　田卫疆

（《新疆史学》1979年创刊号）

“喀什噶尔”，维吾尔语意为“各色房子”，汉族简称“喀什”。在延续两千年的“丝绸之路”上，这里以其特有的自然环境而独具魅力。早在细石器文化时期，人类就在此生息、繁衍。张骞通西域时，这里称“疏勒”（突厥语“有水”之意），后隶属汉

朝，在西域都护府行政管理之下。王莽"新朝"时，称"世善"，役属于匈奴。东汉，这里是西域长史的治所。三国时，此地为曹魏西域长史府和戊己校尉二十道之一。北魏时，疏勒同西域诸国遣使内属。此后，一度为突厥所属。隋唐时，仍称"疏勒"。唐又称"伽师祇里"唐曾设疏勒都督府，隶属安西都护府（府治今库车县），同时作为军镇，与龟兹、于阗、碎叶同称为"安西四镇"。十世纪初，这里是哈喇汗朝首府之一（另一首府为巴拉沙衮）。元时，此地属察合台汗国，名为"合失合尔"，明朝称"哈实哈尔"。清朝平叛后，由参赞、领队、协办三大臣管理此地事务，1883年置省后，设立疏勒直隶州，1903年升为府。民国时，设立专区。此外，"沙勒""佉沙""哈失哈"等名称都是喀什噶尔在古代不同时期的类似译音称呼。解放后，作为南疆西部最大的城市，此地最初是新疆人民政府南疆行政公署治所，后改设喀什专区，辖一市十县，专署治喀什市。今喀什市是1952年在疏附县的基础上设建的。如今，这里是南疆最大的工业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农牧业生产地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219　古代于阗的西城和东城

——于阗古都及绿洲变迁之探索　　殷　晴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6期）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绿洲城镇的位置变迁、兴衰更替，是研究丝绸之路的一个课题。本文就百多年来争论未决的古于阗都城位置及其他有关问题，作者经过长期的考察研究，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看法。

中国史籍对古于阗都城最早记载见于《汉书·西域传》，称于阗有二城，"王治西城"。《魏书·西域传》和《水经注》所记亦在西城。《梁书》和《大唐西域记》均称西山城。唐时之西山城应为汉时之西城。但西城在今什么地方？法人格伦勒等人在和田"探险发掘"后，认为古于阗都城在今和田县额里齐西博拉章区的约特干，英人斯坦因、日本人白井助长等，均著文赞其说，在国际上造成较大影响，至今很多有影响人物仍沿用此说。1929年，我国著名学者黄文弼先生到新疆考察后，曾否定了斯坦因等人之说，并在《古代于阗都城之研究》（载《史学季刊》第1卷1期，现已编入《西北史地论丛》）一文中，认为古代于阗都城在今和田城东北之阿克斯比尔古城，后来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他又推断今和田县南二十五公里处的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为古于阗都城。1957年11月黄先生重来和田，在同书补注中重申并补充了这一看法，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国内著述越来越多的引用这一看法，如《中国历史地图集》，李迁春先生的《新疆和田县买里克阿瓦提遗址的调查和试掘》（《文物》1981年第1期）一文，进一步申述了"这个遗址可能就是于阗国的城府"。

本文作者根据文献记载和本人近年来的实地调查，不赞同上述看法，并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西城或西山城旧址，应在今和田县红旗公社阿拉勒巴格一带，其地有奈加拉·哈奈（Nayqelix·hanisi维语意为吹拉奏乐的地方）土墩，可能系古代于阗都城遗址。按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奈加拉·哈奈的位置正处在两河之间，符合历史文献的记载。由斯坦因等人所肯定的闻名于世的"约特干"都城，可能是魏晋时期的王新寺，唐

代的娑摩若伽蓝遗址，并非于阗王城。此城废弃时间，约在伊斯兰教传入后的十二世纪。黄文弼先生最初提出于阗都城可能在今和田东北的阿克斯比尔古城。近百年来，在这里考古发现的各种遗迹看，在汉唐时，人烟稠密，河渠纵横，是古代于阗经济繁盛的中心，在丝绸之路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它的废弃时间，应在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军占领这些地方以后。后来，黄先生又推断于阗古都在今和田南二十五公里处的买力克瓦提，本文作者认为买力克瓦提应是古代佛教遗址，并非古于阗都城。

于阗的西城和东城，在汉代颇为显要，故中央王朝专门设职管辖。西城或西山城因系于阗都城，以后不绝于书，而东城的名字，西汉以后不复再见。盖因东汉以后，于阗疆域扩展，“大城五，小城数十”，所以东城在史书上不再单独提出。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两城存在的时间都较长，分别延续到十一世纪和十三世纪，在那以前，两城在丝路之上，都有过自已繁华的岁月。

220　于阗媲摩城、坎城两地考　　孙修身

（《西北史地》1981年第2期）

本文对古代西域于阗国境内的媲摩城、坎城两个城镇的名称和位置进行了考证。许多研究者认为：宋云《行记》中所见之“捍摩城”，就是古扜弥城，亦即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条中所记之媲摩城；唐时之坎城，同媲摩城为同一地点。本文对这种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作者引用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一、扜弥国原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在于阗和建德力河（克勒底雅河）流域的东面，国都为宁弥城。《行记》中的捍麼城与玄奘所记的媲摩城不是一个地方。二、扜弥之“扜”，原作“扜”，后来将其误写作“扜”、“捍”、“汗”等；“麼”同“弥”。因这些字不仅音同、形类，且意亦同，“扜弥”、“捍麼”、“汗弥”等名，都是古扜弥国的讹误。故《行记》中的“捍麼城”就是“捍（扜）弥城”，也叫“拘弥城”。三、坎城是于阗境内的一个军事重镇。当时于阗已并有戎卢、扜弥、精绝、渠勒、皮山等五国故地，除皮山国之外，其余四国都在于阗王城的东面。坎城和兰城是于阗的两个守捉城。兰城守捉城至于阗三百里，是指到于阗东界的行程，并非指到王都。故坎城当在于阗治域的东界，也必在克勒底雅河的东面，离其边界名城尼壤城（尼雅城）不远。“坎”字读音与扜、捍、汗等字极为相近，所以坎城镇就是扜弥国之故都城——宁弥城，也就是捍麼城。四、《大唐西域记》中所记媲摩城有雕檀立佛像和《行记》中所记于阗坎城瑞像，画面形象、故事内容、以及于阗国王对佛像的态度、造像的材料、像的高矮等，都完全不同。敦煌壁画中两尊佛像又出现于同一洞窟和同一画工之手。这些情况都说明这两尊佛像属于两个不同的故事和地方，说明坎城镇和媲摩城并非一个地方。根据以上论证，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宋云《行记》中所说的“捍麼城”，并不是玄奘《大唐西域记》里的媲摩城；捍麼城、扜弥城、拘弥城、汗弥城等都是一地的异名，即古扜弥国的都城宁弥城的异名；坎城镇（坎城守捉城）是扜弥国国都宁弥城的讹误，其位置离于阗东境关防尼壤城不远；媲摩城和坎城的两个佛像故事，是两个不同地方的不同故事。本文资料丰富，论证周详，可供研究丝绸之路者参考。

221 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　　史树青

（《文物》1962年第7.8期）

尼雅遗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县城北约150公里的沙漠中，遗址范围很大，南北长达10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四周多被沙丘、沙岭所包围。从这里出土的一部分木简看来，在汉代这里是楼兰（元凤四年即公元前77年改名鄯善，政治中心在今罗布淖尔附近）和于阗（即今和田）之间的咽喉要地，1959年两次调查发现的文物，悉为汉晋间遗物，所以一般推测尼雅遗址是在公元三世纪时期废弃的。隋唐时期的尼壤城，应该在今尼雅遗址以南或东南。尼雅遗址废弃的原因，初步推测是由于流沙南移，河水干涸，居民迁徙所致。从尼雅遗址历次出土的文物来看，当两汉魏晋时期，这里的农业、畜牧业都相当发发达。从发现的冶铁遗址和出土的铁矿石、铁的生产工具等物，可推知在两汉时期，这里已进入铁器时代，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金属冶铸业。自汉武帝以后，中国内地的商人与葱岭以西各国进行丝绸贸易的时候，西方各国的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尼雅遗址发掘出的木简，有不少是汉晋间的“过所”。使用“过所”的人多数是“月支国胡”。此外，这里发现的佉卢文木牍，除一小部分是政府文书和私人信札以外，还有一些是葱岭以西使用这种文字的商人遗留下来的记事、记帐、草稿之类的木牍，说明当时中亚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商人，往来贸易于昆仑山北路的情况。从出土的遗物看，这里当时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弓箭，早期箭镞是铜制的，后期多是铁制。由于内地社会的影响，它和汉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作者推断，在两汉时期，这里原始社会已经结束，其社会形态，当属奴隶制社会。由于这里政治、经济方面是一处“隘狭”之地，所以文化也有相应的发展，主要是接受了中原地区汉族的先进文化。由于内地先进文化的影响，在两汉时期，这里的社会和新疆各地的社会一样，都有显著的变化和发展。今后只要我们有计划地清除建筑内部的积沙，就可全部揭露当时社会生活的真面目。这对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和阐明我国与中亚、西亚及印度、巴基斯坦诸国的传统友好关系，有一定现实意义。

222 新疆出土佉卢文简书内容的考释和分析　　赵俪生

（《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1期）

中国科学院新疆民族研究所曾在1963年打印了一本《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译文集所包括的主要是英国人斯坦因盗取我国新疆古于阗、古精绝之尼雅（古书叫“尼壤”）、古伊循、古楼兰诸遗址上的木简内容。木简使用一种与梵文相邻近的佉卢文字，记述的大体是古鄯善国(包括且末)内之政令、报告、书信，契卷，帐目等等，但年代不明。本文作者通读七百余号简书内容后，与我国史书所载对照，初步判断其中某些主要事件的年代当在公元440年前后，亦即我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向西北扩张势力之时，其主要根据：（一）从简文内容看，当时鄯善与中原的来往并不密切，很似“断塞行路”的时候。西汉时，西域“诸国官皆用其国人，佩汉印绶”；东汉时，西域与中原虽云“三绝三通”，但基本上是通的。故可推断那时鄯善亦必有汉朝加佩印绶之都尉、驿长

等官职，但佉卢文简书中对此毫无记载。由此可以证明，这批简书非两汉时之遗物。

（二）关于十二相属在边远地区的传播问题。在这些佉卢文简书中，其中有一简专记十二相中宜做之事，如第一个称为子（鼠）该日，诸事皆宜，至第十二亥（猪），宜耕种，播种及翻葡萄园等等。查十二相属，中原地区最早起于东汉。佉卢文简书成书时代，十二相属已传至鄯善，所以这批简书必然晚于东汉以后。

（三）在这七百余简中，记述Supi人侵扰之事的就有十九简之多。那么Supi人究竟是谁？这就成研究这批佉卢文简书的关键所在。当时鄯善国时有遭受Supi人侵扰的可能性，而且一度侵扰到且末和凯度多，双方发生战斗，Supi人抢掠了人口和马匹，鄯善国曾为此戒严，并将国民迁入城内。为防御Supi人，鄯善与于阗联合；但也有和于阗发生冲突的反映。译文将Supi人译作鲜卑人。作者认为Supi与"苏毗"二字的声音十分接近。《隋书》和两《唐书》都记有《女国》或《东女国》，其国王姓苏毗，故又称苏毗国。其国西邻印度，南界吐蕃，东与吐谷浑、党项相连，北界恰是于阗国。苏毗国常与吐谷浑、吐蕃联军出击。佉卢文简书记载Supi人侵扰鄯善，极大可能就是《魏书》记记载公元445年8月，吐谷浑王慕利延西入于阗，杀于阗国王、死数万人的事件。吐谷浑很可能与苏毗联军，从苏毗境攻入于阗，侵扰鄯善。鄯善与于阗联合之时，为吐谷浑与苏毗未灭于阗之前；鄯善与于阗敌对之时，乃吐谷浑与苏毗已灭于阗之后。作者经过分析，认为苏毗，这是对Supi人较为妥贴的一种考证。

作者在判断了这批佉卢文简书的年代之后，又根据简书中所见鄯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进行了分析，从社会生产、水利建设及鄯善国的度量衡制度，乃至国家组织，都一一进行了研究。鄯善国当时虽已进入奴隶社会，但买卖奴隶，买良为奴之事，在简文中有不少反映，这大体也和中原的晋、魏情况相同。由此可以推断七百余简书。所反映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生活等内容，其意义极为重大，它显示了我国新疆地区在公元四、五世纪时的社会风貌，还对《汉书》、《后汉书》、《魏书》三个《西域传》做了有力的补充。同时对丝路之上语言文字、民族关系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223　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

——兼论楼兰遗址和魏晋时期的鄯善郡　　马　雍

（《文史》1979年第7辑）

佉卢文是佉卢虱佉文的简称。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使用于印度西北地区和巴基斯坦一带，并曾向北传播，流行于阿富汗、乌兹别克、塔吉克和我国新疆由和田至罗布泊一带。在公元后一至二世纪月氏人所建立的贵霜王朝，佉卢文曾和婆罗迷文、希腊文共同成为当时通用的官方文字。到公元五世纪，贵霜王朝被哌哒人消灭，佉卢文也随之而趋于消亡。1892年以后，法国人杜特雷依·德·汉，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地区、尼雅遗址（今属民丰县）、安得悦遗址（今作安迪尔）、楼兰遗址（罗布泊西北）和甘肃敦煌等地先后发现大量佉卢文书。美国人亨廷顿也在尼雅遗址发现了六件佉卢文木牍，总计共有764件。斯坦因和其他英国人还从和田等地盗走数

以百计的“汉佉二体钱”。这些佉卢文书绝大多数是契券、公文、书信、簿籍等，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风俗习惯，表明新疆地区古代居民曾经使用过这种文字。本文作者将这些佉卢文资料分为四组，第一组是鄯善国文书，第二、三组为于阗国文书，第四组为《法句经》。国内外学者对前三组资料的年代问题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根据文书记载，列出了鄯善国五位国王的纪年顺序表，推算出这五位国王的实际在位年数总和至少为86年。进而讨论了这批文书的绝对年代问题。作者列举了中外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布腊夫和日本学者榎一雄、长泽和俊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和论据，有的主张这批佉卢文资料应属于公元三世纪，有的认为是五世纪，也有的认为应是七世纪。在同一观点的具体年代上也有很大差距。作者转录了长泽和俊将汉文史料中出现的鄯善国王的名字所列成的表，并列出了上述三人对佉卢文书中五位鄯善国王定的年表，看出三人虽大体同意三世纪前后，但上下差距也有半世纪之久。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判断这批佉卢文书大体的时间断限；然后是考定文书中五位鄯善国王在位的精确年代。对大体的时间断限，他同意把这批文书断定为公元三至四世纪之物，并补充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这批佉卢文书绝大多数写在木牍上，有的写在纸张上，说明新疆地区使用佉卢文的时代是在简牍与纸张交换使用的时代，以及佉卢文和汉文在使用木牍和纸张书写方面的共同联系，并论述了我国内地从东汉末年起使用纸张逐渐普及的情况。由此推定这批文书的断代应大体为从魏明帝时起到前凉张骏时止，尤以西晋时期为多。二是这批文书和罗布泊地区、尼雅等地所发现的汉文文书属于同时代之物，并列出了在罗布泊楼兰遗址所发现的有纪年的18件汉文文书的纪年表，从中看出这批汉文文书的年限大体在魏末至前凉张骏时期，即从公元263年至330年，而比较集中在西晋泰始年间（265—274年）。接着，作者引用《晋书》、《资治通鉴》、《三国志》等史书文献和有关文书的记载，进一步考证了佉卢文书中五位鄯善国王的在位年代问题和晋泰始年间曾在楼兰地区设过鄯善郡的问题，推定这五位国王在位时间上下限的最小范围为公元247年至334年。晋朝曾在楼兰城设置过鄯善郡，在汉代至魏、晋、前凉时期，鄯善国都城都在扜泥城（今新疆若羌县附近），而不在罗布泊西北岸的楼兰城。最后，作者还考证了于阗文书和汉佉二体钱的年代问题，认为二体钱上所镌的于阗国王的名字当为《后汉书》中的于阗王安国，这种钱约铸造于东汉桓帝时代。经过充分论证，作者认为佉卢文于公元二世纪中叶传入于阗地区，至三世纪中叶通行于鄯善地区，到四世纪中叶以后即不再使用；鄯善国佉卢文书的年代约相当于曹魏晚期至前凉张骏前期；新疆境内设置郡县始于曹魏末年（公元240年至265年），最早者即为置于罗布泊地区的鄯善郡；楼兰遗址是魏晋时期屯田军的驻地，曾一度作为鄯善郡治，并非鄯善国都所在。本文文字较长，资料丰富，观点新颖，论证周密充分，为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材料。

224　沙漠古国——楼兰考察记　　穆舜英

（《中国建设》1981年第5期）

本文记述了新疆考古队在1979年6月考察古楼兰遗址的情况。楼兰遗址位于新疆塔

克拉玛干大沙漠东沿的罗布泊地区。古楼兰国在西汉时期曾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古代民族的迁徙，丝绸之路的开辟，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都与这一地区有密切关系；西去的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道，即从楼兰开始。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此，在罗布泊西岸发现了古楼兰遗址。继有英国人斯坦因、美国人亨廷顿、日本人桔瑞超，先后到楼兰遗址考察，获取了一批重要文物。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也于30年代到此地的孔雀河北岸考察，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文章详述了考古队从敦煌乘汽车出发、沿丝绸之路古道前往楼兰遗址的情况。他们在孔雀河流向罗布泊的入口处——铁板河三角洲逗留三天。黄文弼曾在此发现一土垠遗址，为一汉代驿站。在土垠遗址西南约二公里处，有两处古楼兰人墓地。1979年冬，新疆考古队曾在此清理了一座墓葬，发现了一具距今6400多年前的女尸，为研究罗布泊地区的人种提供了实物标本。考古队在此拣到一些文物，又从孔雀河北岸渡口到距此28公里的楼兰遗址进行了勘察。古楼兰是一座约300米见方的古城，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古城中央的废墟是古城的统治中心，在东汉时为西域长史的驻地。古城东部有一座高大的佛塔，塔南有佛殿，塔北距古城4、5公里处有一座佛寺，反映了古代楼兰国居民信奉佛教。古城的西南和南部为居民住宅区，屋宇鳞次栉比。在古城城郊、西北和西南面都可见到成片的胡杨林，均已干枯，树杆仍直立在荒漠上，有的树身有两米粗。据分析，楼兰城曾遭受大旱灾，以致河道干涸，树木枯死，土地龟裂，人们逃出古城，后为风沙湮没。考古队在此发现许多陶缸、陶片、木勺、木碗、漆杯、陶盘等残件，以及大量的古钱、小件铜器、各色料珠和玻璃碎片等。其中古钱币有西汉五铢、王莽时期的货币、东汉五铢，还有一枚公元一、二世纪时大月氏人在中亚建立的贵霜王朝时期的钱币。在古城东面一处古墓地中还搜集到一批东汉时代的丝织品，其中有一件"长乐明光"锦。这些都为研究古代楼兰人民的生活情况、毛织工艺水平以及丝绸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实物材料。

225　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　　侯　灿

（《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本文通过实地考察所得，对楼兰古城的确切地理位置、规模、面积等都有新的认识，补正了前人的错误。作者根据在古城收集到的文物标本，认为这里是新石器时代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中楼兰人活动的重要据点，并论证了古楼兰城曾是曹魏、西晋时期西域长史府的治所，探讨了楼兰古城废弃的原因及具体时间。在楼兰遗址区作者采集到许多细石器文化标本，其中以楼兰城为最多。经对这些石器标本的分析，楼兰遗址在新石器时代从使用最典型的细石叶和燧石核开始，中经使用压制细石器、桂叶形石器到使用磨制石器和金属工具，认为这里一直存在着人类的活动。又据中外学者对罗布泊地区新石器时期遗址和遗物的考查材料，文中绘有孔雀河下游三角洲石器文化点分布示意图。重新标定了楼兰城址的位置，并找到了四边的残存城垣。经测定按复原线计算，东面城垣长333.5米，南面长329米，西、北两面各长327米，总面积为108,240平方米，是一不太规则的正方形，这就纠正了斯坦因在1907年初测绘中的一些谬误。城中布局，大致上东北部是寺院区，中偏西南部是官署区，西部和南部是住宅区。从发现木简的绝对年代纪载看，楼

兰城址的最繁华时期，应在曹魏至西晋时期。再从墓葬中出土的许多十分精美珍贵的丝、毛、棉织品、漆器、木制用具以及玉髓质、玻璃质的各色饰珠和来自异域海岸的海贝、珊瑚等物来看，楼兰城确曾是早期“丝绸之路”上的中继都市。楼兰城址的现存形制是在曹魏、西晋时期形成的，这个形制与当时所在的西域长史府治所有直接关系。关于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治，史籍缺载，经作者对城址中出土的大量木简和纸文书进行研究后认为：一、从曹魏齐王芳嘉平四年（公元252年）至前凉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前后78年间，这里与我国封建王朝一直保持着紧密的隶属关系，说明这一时期是经营这个城市最积极的时期；二、木简和纸文书表明，这里就叫楼兰；三、楼兰城是曹魏、西晋时期西域长史府的治所。此外，作者还补正了由李柏文书引起的海头与楼兰的争论中，王国维肯定海头否定楼兰时，把海头的具体地点弄错的问题。关于楼兰遗址的废弃，作者以为与孔雀河下游水源有着直接的关系。孔雀河水源枯竭时间，应在前凉，特别是在“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以后的前凉时期。由于水源枯竭，楼兰屯田生产无法进行，迫使西域长史府驻地迁徙。迁徙地点从李柏文书看，应该在海头。

226　楼兰古城历史地理若干问题探讨　　陈汝国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3期）

1900年，瑞典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北角风蚀地面上发现了一座遗址，后定为“楼兰”，从此，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在学术界开展了讨论，众说纷纭，但至今楼兰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如这座遗址是否为真正的楼兰城？是否为楼兰国都？等等。作者通过对楼兰古城产生的大致年代的探讨，分析了其职能及有关问题。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楼兰国至少建于公元前二世纪，即西汉初期，公元前77年，傅介子刺死楼兰国王，改国号鄯善，楼兰国亡。《汉书》、《后汉书》均有屯田“楼兰”之记载，其时代在楼兰国被灭一、二个世纪之后。在楼兰遗址出土的文物中，除一枚“榆荚线”可认为是西汉初铸造的，其余五铢钱均属西汉晚期和东汉时的遗物；而丝、毛、棉织品及陶器残片等遗物，也几乎全是东汉时期的。至于楼兰遗址出土文书的纪年范围则全在公元二世纪中叶以后。楼兰作为丝绸之路中道必经要地，其城市昌盛时也是公元二、三世纪的事，而楼兰遗址的主要建筑材料——木头，经测定也多是公元前后的。可见作为一个城市，楼兰似应产生于西汉晚期以至更晚一些，即楼兰国被鄯善国取代之后，而并非存在于公元前77年之前的楼兰国都。楼兰城位于罗布泊西北角的孔雀河三角洲，扼中西陆路交通的咽喉，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在楼兰城市产生和发展期间，这里地势平坦、河网密布，地表水丰富，而河水则是城市用水的唯一来源。城市建筑在一条古河道两侧，这条原应是天然河叉的古河道，从西北到东南大致成对角线贯穿城区。至今残存的主要建筑，均分布在河道两旁，其城市布局可划分为三，即中部和东南部为行政区，南部和西南部为住宅区，东北部为军事区（城防区）。从城市产生的大致年代推断，楼兰城不可能是国都，而是从一个小居民点发展起来的以屯田和军事为主的城市，后因丝绸之路“中道”通达，成为古丝道上罗布泊两侧的中继站。晋代，发展成中央政府驻西域长史的驻地，为当时中央政府经营西域的指挥中心之一。可见，楼兰城是从军事和屯田城堡发展起来

的具有交通、政治等多职能的综合性城市。公元四世纪起，楼兰城逐渐衰亡，这里固然有战争频繁和丝路改道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即河流来水日渐减少所致。这可能是由于气候变暖变干，河水减少；也可能是由于河流某段河床缺口，形成分叉河道，逐渐发展成主河道使河流改向。总之，楼兰的废弃是河流断水所致，大约在六世纪，楼兰已成废墟，此后千余年，再也没有恢复过生机。

227 楼兰鄯善问题 冯承钧

（《辅仁学志》1931年第3卷第2期）

楼兰是通往西域之孔道，交通地理位置甚为重要。《汉书》称“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破楼兰杀其王，“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今考证西域古国今地，往往一简单问题，变为极复杂，楼兰即其一例。本文撰写之目的，在于证明楼兰或鄯善的境界。其境东近阳关，南接古之婼羌，西尽巴士什里Vash-shahri，北边移民也曾到过哈密辟展，它的都城也就是现在的婼羌县治。为了证明此一论点，作者曾引用《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水经注》、《法显传》、两《唐书》，以及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所获《沙州都督府图经》等。根据所有记载，最后确认楼兰都城，即鄯善都城，其城在罗布淖尔西南三百余里处。伊循是今之弥朗（Mirsn），扜泥可当今之婼羌县治卡克里克（Charkhlik），新城可当今之巴士什里，且末可当今之且末县治车尔城。作者在证明上述论点的同时，对《魏略西戎传》可记之疑点，予以更正。因《魏略》的记载，中道有一楼兰，南道鄯善所属又有一楼兰国，这样楼兰好象就有两国了。其实中道楼兰，必指楼兰之一旧城，不是楼兰国都。搞清楼兰国都所在，对研究丝绸之路甚为重要。因为楼兰原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站，王国维先生认为通西域之南北二道，问题不始于玉门和阳关，而是至楼兰后始分为二道。由此可知，楼兰则是丝绸之路南北二道之汇总站，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则可知矣。

228 从考古考察与调查论楼兰城市的发展及其环境变迁 侯 灿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7期）

楼兰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匈奴传》。它是我国历史名城，扼丝绸之路南北二道之咽喉，为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过重大贡献。后因河水改道，沙漠侵蚀，其城遂湮没废弃，其事迹亦不见于史籍。本世纪初随着西方“探险”热潮的兴起，先后有瑞典斯文赫定、英人斯坦因及日本人橘瑞超等人在这里进行所谓考察，劫走大量珍贵文物，震惊中外。楼兰文物的出土，不但弥补我国史籍记载之缺乏，同时引起中外学者对楼兰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到目前为止，对一些重大问题，如楼兰王国与王都问题、楼兰王都与楼兰城市问题、楼兰城市的发展与衰废问题等，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本文作者于1979年11月和1980年4月两次深入罗布泊地区，对楼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取得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资料，结合过去出土的一些实物资料，试图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首先根据历年发现石器遗址方位地点绘制了“孔雀河下游三角洲石器文化点分布图”，并论证

早在远古时代孔雀河下游三角洲有着丰富的生存资源可供人类利用。在古代这里既有大的河流，且又河叉密布，具备人类生存条件，是个人类生息繁衍的地方，从石器文化分布点来看，这儿已有村落兴起。其次，对跨入文明时代遗物的分析考证，认为楼兰自新石器时代聚落兴起以来，经石器和金属器共用时期及以后，这里一直有着人类在积极活动，这个城市也一直在发展着。出土遗物证明，时间愈晚中原文化特点愈多。再根据《史记》及前后《汉书》记载表明，尽管楼兰作为王国于西汉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更名南迁，但曾经作为王都的楼兰城，在王国南迁后一直是两汉王朝屯兵戍守的重镇。为了弄清楼兰城市的发展历史，作者在两次考察中进行试掘，发现残存城垣范围呈四方形，东西南北周边各三百二、三十米，城市布局大致可分为三区，即寺院区、官署区和贫民居住区。从所发现的各种遗物绝对年代分析，楼兰故城最繁华时期当在曹魏至西晋，并判定这座故城遗留下来的最后形制，应当在西晋。这个形制与西域长史府所在治所有着直接关系。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及治所，史籍缺载，因此只能从楼兰故城出土文物中进行研究。例如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楼兰故址所获得的大量木简和文书中，记载楼兰绝对年代的木简有17枚，文书7份；明确记载楼兰之名的木简6枚，文书7份；记载“西域长史”和“长史”的木简3枚，文书1份。从这些木简和纸文书的记载可得出这样的认识：从曹魏齐王嘉平四年（252年）至前凉建兴十八年（330年)前后七十八年间，这里与我国封建王朝保持着紧密的隶属关系，特别是曹魏后期和西晋前期咸熙、泰始年号频繁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这是这个城市发展最繁华的时期；从木简和文书表明这里就叫楼兰。这里既有送往迎来的公文函件，也有敕令书信，军事组织、屯田及廪食供给记载，从木简、文书中“西域长史”和“长史”官衔记载，这里就是西域长史府的治所驻地。最后，作者根据楼兰发现的大量木简和文书、对楼兰环境的变迁进行了研究。这些木简和文书中，有不少反映军队屯垦情况的记录，这些记录除涉及军队组织、生产、生活内容外，也记述了军队吏士的粮食供应情况，有些木简反映粮食供应十分严重，有官府累次要求吏士节省口粮的勒令记载，大有朝不保夕之虞。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孔雀河改道，下游水源枯竭所致。这在出土的木简、文书和其他文物所证实。孔雀河下游水源枯竭的时间，根据大量遗物、遗迹分析应在前凉时期，特别是在建兴十八年以后的前凉后期。因河水改道，下游水源枯竭，楼兰屯田生产无法进行，这就不得不迫使西域长史府驻所迁徙，迁徙地点从出土的李柏文书看，应在海头。曾经扼中西交通南北二道咽喉的楼兰，由于河水改道，土地沙化，气候险恶，城市衰败，其结果是开拓数百年之久极为繁盛的丝绸之路迫使改道。

本文发表二年后，经作者对某些文字加工修改后，又以《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为题，发表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但主要论点未变。

229 北魏鄯善镇、焉耆镇考　　苗普生

（《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2期）

鄯善和焉耆是丝绸之路上的两个重要城市。鄯善原名楼兰，扼中西交通之咽喉，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楼兰南迁伊循，改称鄯善。黄文弼先生在《古楼兰国历

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一文中，对鄯善历史沿革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考证极详。焉耆处西域之中心地带，是控制西域的战略要地，唐王朝置为西域的四镇之一。由于它们在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为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必争之地。本文仅就北魏政权在西域的鄯善、焉耆设立军镇的始末及军镇设立的时间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研究，并提出与前人不同的结论。冯承钧先生在《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人之分散》一文中提出：疑在太和十七年（493年）前，北魏罢镇戍”。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在所著《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一文中，提到“……北魏对鄯善的控制，至少在宋云西行之前是一直继续着的”。查宋云西行是在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作者认为高车击破之前，鄯善为柔然所占，此时期是柔然在西域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而北魏最终罢西域镇戍，也应在此时期。至于冯承钧先生所说的高干、高猛虎任职鄯善镇的时间(491—493年)和松田寿男所考证的正始元年(公元504年)、二年（505年）及熙平二年（公元517年）鄯善送八脚羊和献白兔的“鄯善镇”，应是西平郡鄯善镇，而非西域的鄯善镇。

230 焉耆尉犁危须都城考 陈 戈

（《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焉耆是古代西域的一个大国。尉犁、危须是西汉时建立的两个小国，汉以后并入焉耆。这三国都位于新疆中部，丝绸之路的中道干线即经此而过，地位相当重要，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较高。故研究丝绸之路当予以重视。但这三国的都城究在何处，研究者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本文作者于1983年在今焉耆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联系《汉书》、《魏书》、《唐书》、《西域图志》、《水经注》、《大唐西域记》等史籍的有关记述，考证了这三国的都城所在。关于焉耆都城，据作者考证，从汉至唐一直在员渠城，从未变动，惟后汉时称南河城。黄文弼认为自魏晋时尉犁、危须并入焉耆，焉耆都城可能迁徙之说，实无所据。员渠城究在今之何地？作者根据对焉耆地区许多古代城址的重新考察，结合当地地理环境和形势，联系文献记载，从九个方面论证了位于今焉耆县城西南约二十公里的四十里城子古城、亦即博格达沁古城，就是焉耆都城员渠城。并进而从这一古城的结构和出土文物方面作了考察，提出了这一古城作为焉耆都城的五个方面的实物证据。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作者又从反面论证了除四十里城子古城之外的其他古城和地点，其地理位置和形状、大小等因素，均与文献记载不相符合，因而都不可能是焉耆都城。对尉犁和危须的都城，本文也用同样方法进行了考证，认为尉犁国的都城在今库尔勒以南，今新疆尉犁县城以北的夏渴兰旦古城；危须国都城在今新疆和硕乌什塔拉之间的曲惠古城。本文论据确凿，论证周密而详细，旁征博引，资料丰富，观点鲜明，结论扎实有力，对研究丝绸之路甚多裨益。

231 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

——博格达沁古城调查 韩 翔

（《文物》1982年第4期）

焉耆位于汉唐时期中西通道上，扼天山南麓丝路之咽喉，位置十分重要。汉唐时期

有焉耆国，唐贞观时又于此地置焉耆都督府和焉耆镇。弄清焉耆国都、焉耆都府治所和焉耆镇城的确切位置，对于研究汉唐时期西域的历史，研究古代中西贸易史，都是很有意义的。为此，作者于1976年，结合文物普查，做了一些考察工作。特别对有争议的博格达沁古城进行了重点复查。以后又两次对博格达沁古城及其周围古遗址进行了复查。汉唐时期的焉耆国，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焉耆、和硕、和静、博湖四县和库尔勒县的一部分。这一地区的汉唐古城为数不少，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博格达沁古城、唐王城、日喀则古城、哈拉木登旧城、曲惠古城等。其中博格达沁古城的建筑规模最大、建筑形式最突出。古城外围的防卫建筑也是其它古城所没有的。博格达沁，位于今焉耆县城西南12公里处。古城的西偏北12公里处就是著名的七个星千佛洞。古城平面大致呈方形，周长3000余米。城墙已坍毁，但墙基还在。城内风蚀严重，有的地方为流沙所掩，但遗物相当丰富。作者三次调查，都采集到一些金银饰件、料、石珠、古代钱币以及波斯萨珊朝银币等。城内遍布红、灰陶器残片。古城东约500米处，有小城一座，周长约1400米。城墙已圮。古城东约五公里处，有一古墓地，系汉、唐墓葬叠压的古墓区。出土有汉代铜镜、包金铁剑、金带扣和装饰品等。至于焉耆国都、都督府治所和镇城的所在地，《汉书·西域传》说："焉耆国，王治员渠城"。《魏书·西域传》说："焉耆国，在车师南，都员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汉时旧国也"。据此，焉耆国都在员渠城无疑，问题是员渠城的位置。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认为，今和静县的哈拉木登旧城是古焉耆国的国都。他是在确定了尉犁国都城的位置之后，再据以推断焉耆国都的位置的。然而作者引证《水经注》及《晋书》的有关记载，认为黄先生关于尉犁国都位置的结论是不正确的，随而哈拉木登旧城作为焉耆王都也就失去了依据。哈拉木登旧城位于今和静县的西北部，它的北、西两面都是山，南边是开都河。这样一座没有任何防卫建筑、远离交通线（离古道至少有五十里）的偏僻小城，不可能是东吞危须、南并尉犁的焉耆国王都。再证以《水经注》、《魏书·西域传》以及《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作者认为博格达沁古城才是焉耆王都员渠城。唐焉耆王兼任焉耆都督，都督府治所自然也设在这里。至于焉耆镇城的位置，作者以为"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就是以焉耆境内的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城市作焉耆镇城。总之，根据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记载，博格达沁古城在唐以前一直是焉耆国都城，唐焉耆都督府治所在这里，开元七年设置的焉耆镇城也在这里。

232　古焉耆、尉犁国都及四十里城东旧城考　　　陈可畏

（《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古焉耆国，为汉初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其疆仅有今焉耆、和静县地。约在东汉后期，焉耆统治者通过战争，先后兼并了尉犁、危须、山国，统一了焉耆盆地而成为西域大国。焉耆国共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宋朝才为高昌回鹘所灭。焉耆国名在历史文献中又称为"乌夷"、"乌夷"、"乌耆"、"亿尼"、"阿耆尼"、"月氏"等。关于古焉耆国的都城，西汉名员渠城，东汉为南河城，北魏复名员渠城，其后各朝均因此名。关于员渠城的故址，史籍文献记载和学者论说均不一致。有的说在今焉耆西

南的四十里城之东，有的说在清初喀喇沙尔城或其北十余里，有的说在今焉耆，有的说西汉时的员渠城即今和静县西的哈拉木登旧城（现译作“南哈拉毛墩”），东汉时的南河城在今四十里城之东，唐焉耆王城在今焉耆西锡科沁（今译作“七个星”）西北五里。古焉耆国都城究竟在今何处？是否迁移过？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传统的说法认为古焉耆国都在今焉耆西南的四十里城东之旧城博格达沁。《大清一统志》和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均提出这种推测。至二十世纪初，英人斯坦因则对此加以肯定。我国学者黄文弼则认为哈拉木登旧城是汉员渠城遗址，博格达沁旧城为魏晋时期的焉耆新都，唐焉耆王城位于锡科沁（今译作“七个星”）西北2.5公里。即认为古焉耆国都曾经迁移过，两汉、魏晋、唐时的焉耆都城不在同一地点。本文根据史籍文献记载，对上述诸说逐一进行了考证和否定，并看重对黄文弼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黄文弼的观点没有科学根据。据《汉书》、《后汉书》、《魏书》、《晋书》、《隋书》、《旧唐书》等史籍关于焉耆国的记载，证明从北魏、隋至唐，焉耆的都城没有迁移，东汉之南河城即西汉之员渠城，只是更名，并未迁移。据历史文献记载地形、里程等考证，古焉耆国都城当在今焉耆镇。并引用《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等文献中的记载作为补充，其所记焉耆都城的地形、方位、里程均与正史及《水经注》的记载相合。这就证明，今焉耆镇就是古焉耆国都城。

233 库车县古遗址简介　　梁志祥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1期）

库车县的文物古迹较多，因为这里曾是古代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现列为保护的遗址就有五十多处。由于库车地区比较特殊，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一是佛教文化，一是伊斯兰教文化。本文对佛教文化遗址做了重点介绍。

佛教文化遗址主要的是石窟寺。库车县内重要的石窟寺有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玛扎巴哈和森木塞姆四处。石窟寺的分布线上有昭怙厘大寺和博古斯哈纳两个寺院。这里的佛教遗址都分布在北山一线。文章在石窟寺文化中着重介绍了库木吐拉千佛洞。这处遗址当为魏晋至元时期的佛教艺术，即从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中叶。库木吐拉千佛洞具有汉族风格的洞窟较多，现残存的112个洞窟中唐代风的占多数。作者认为，古龟兹地区库木吐拉千佛洞唐代风格之所以较盛，很可能这里就是唐安西都护府所在地。据史书记载，唐在龟兹古城驻兵三万多，这些驻兵及其家属中的佛教徒，可能开凿了石窟，其中一部分石窟中的发愿文都是汉文，并且有大量汉僧题记、题名；也有不少回鹘风格的洞窟。回鹘西迁，唐与回鹘联合防御吐蕃期间，回鹘灭了龟兹，回鹘文化盛行了起来。在这些洞窟中，不仅有回鹘文题记，而且还有汉文和龟兹文并题。由此看来，当时回鹘文化不仅吸收汉文化，而且也容纳了龟兹文化。昭怙厘大寺的主要遗迹是佛塔和佛庙，其最大特点是除塔寺外，还有一部分禅窟。这些禅窟较大，形制也特殊，大的禅窟中有十六、七个供僧人修行坐禅的座位。禅窟中有少量壁画及龟兹文题记。

古城遗址现有十四处。在库车河流域的是龟兹古城，此城所在地原叫皮朗，故又称

皮朗古城。龟兹古城周长七公里，城中有许多遗迹，如皮朗墩、哈拉墩等。龟兹古城当为汉时的延城，唐时的伊罗卢城，此城经黄文弼先生考定为龟兹古城并已得到公认。在库车河流域还有阿艾古城，在库车北八十公里处，为当时冶炼业兴盛之时所建。此外，还有拉伊苏古遗址。它在库车东境，与轮台交界处，拉伊苏河流经这里。沿渭干河一带还有许多小城堡遗址。渭干河下游的草湖地区，也有几处古城遗址。作者认为，渭干河流域的城堡有的可能是唐以前的，是龟兹国所建；有的与安西都护府有关系，可能是为防御吐蕃而建。

烽燧遗迹，分布在库车境内由东而西的两条路线上。一条是以库车的拉依苏河山口起点，沿天山北山脚下一直通到拜城刘平国治关处。这一线的烽燧有代表性的是克孜尔尕哈烽燧，它是汉烽燧遗址。第二条是从轮台境内通到库车，由库车东境，沿现在的绿洲越过龟兹古城，一直通向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库木吐拉。由上可知，汉唐两条丝路都沿北山脚下，一条在山脚下，一条在绿洲上，烽燧的建筑形制也不相同。除上述两道外，还有一条中道，是沿塔里木河下游往西走，进入渭干河下游，再进入羊达克沁尔，因为北魏时，龟兹古城已迁移到羊达克沁尔，所以丝绸之路通过这里也是很可能的。

冶炼业在古龟兹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冶炼遗址在库车河两岸大的有八处，其中铜厂遗址和汉霍加的遗址是炼铜和炼铁的遗址。由现存遗址看，当时的冶炼业规模很大，冶炼点也很多。由此证明中原的冶炼技术，早在汉代就已传到了西域地区。

234　略述龟兹都城问题　　黄文弼

（《文物》1962年第7、8期）

龟兹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市，是龟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都城几经移徙屡有变迁，对它的所在，是研究丝绸之路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作者根据大量史料及古代遗存，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考订。龟兹都城首见于《汉书·西域传》：“龟兹王治延城”，但未说明位置。《魏书·西域传》称：“王都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魏书·西域传》久佚，后人抄自《北史》，而《北史》作于唐初。《水经注》称“故延城”。《水经注》为北魏郦道元所作，在北魏时称“故”，则当时已不都延城。根据《水经注》所述，龟兹城称故延城，正可理解为汉延城，其位置当在东川枝水右出处。今车库皮朗旧城，即其遗址。作者根据《水经注》所述东西川水形势，结合实际考察，证明皮朗旧城即《水经注》之龟兹城，亦即《汉书·西域传》所述龟兹王治所之延城。唐代龟兹都城，《新唐书·西域传》称：“龟兹一曰屈支，王姓白氏，居伊罗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又《通典·边防》龟兹“王治延城，今名伊罗卢城，都白山之南二百里”；又云：“今安西都府所理则龟兹城也”。所云延城，又名伊罗卢城，是唐时龟兹王所居，即汉之延城。盖唐时龟兹王在汉延城遗址上重新修筑，改名伊罗卢城耳。从考古发掘的资料也记明，皮朗旧城即汉之延城，唐之伊罗卢城。至于汉以后唐以前的龟兹都城所在，据《魏书》所记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周书》、《隋书》与《魏书》所记相同，《通典》则云都白山南二百里。今皮朗旧城遗址在库车城东郊，此距雀维尔塔格不过四十余里，与《魏书》所记不合，作者疑《魏书》所记延城是另一地。由于

《水经注》称"故延城"，这是因为龟兹在北魏时已不都汉延城，故称"故"。则龟兹新都必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史书作者不辨新旧，往往以新地而沿用旧名。《晋书·四夷传》云："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隋书》云："都白山南一百七十里，都城方六里，胜兵数千"。其城郭规模均不同于汉延城，亦足证是另一地。作者考查了库车、沙雅、新和境内旧城遗址有三重城墙及位置相当者，认为沙雅北英尔默里北二十里的羊达克沁大城，即《晋书》、《魏书》、《周书》、《隋书》所记的龟兹国都，它与《大唐西域记》所记龟兹大城显非一地。彼为唐时新都；此为北魏时旧都也。至于何时迁至此地？何时又返回库车？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据《水经注》称故延城，则北魏已不都库车；《晋书》称其城三重，则到晋时已迁都此地；而皮朗旧城中不见魏晋遗物，是必在魏晋时已他迁了。故龟兹王都迁回库车，可能在隋、唐之际。龟兹都城由汉时延城、到唐时伊罗卢城几经变迁，从中西交通路线上也可得到旁证。两汉时通西域有南北二道，南道起自"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北道起自"车师前王庭傍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故当时和阗居南道之中心，库车居北道之中心。今库车皮朗旧城，正当这一通道线上。魏晋以后重开中道。"中道"由玉门关西出，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羊达克沁大城适在此一线上。中道至此与北道合，仍沿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至疏勒，这是汉通西域的捷径。隋、唐之际，北道复开，贞观初高昌内属，往西域者转取道伊吾，经高昌、焉耆而至龟兹，即玄奘所行之路。从玄奘路过荒城，距北山仅四十里来看，当时龟兹王都必已返至库车。库车居北道之冲，中西交往频繁，不久安西都护府亦移至库车，而龟兹都城即皮朗旧城遂又为西域政治经济之中心地。宋、元以后政治中心北移，库车昔时之地位遂失。

235 《大唐西域记》中的覩货逻、折摩驮那、纳缚波故国考　　王北辰

（《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

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由丝绸之路南道回国，经今阿富汗境，越过明铁盖山口进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过今塔什库尔干、喀什等地到达古于阗（今和田）。据《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玄奘从于阗东归的路程是：自于阗东行经摩媲城、媲摩川、尼攘城、覩货逻故国、折摩驮那故国、纳缚波故国，进入沙州。关于这些古地的今址问题，虽经中外学者考察论证，但意见不一。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根据史籍文献记载，对于阗以东各古城、古国应是现在何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新的见解。据作者考证，对这些古地的今址得出以下结论：（1）媲摩。英国学者斯坦因经过考察，认为和田专区策勒县达木沟以北一片被当地人称之为Uzun-tati的废墟，即玄奘所述之媲摩，也即《马可波罗行记》中所述之培因。作者认为从玄奘所记里程和地理条件看，Uzun-tati废墟与玄奘记叙的媲摩城的景象均不相合，因而难以令人相信。经过全面比较，媲摩城址应在今于阗县旧城附近。媲摩也即培因。（2）尼攘。作者在考证尼攘的地址时，连带考证了有关的精绝、戎卢和兰城镇的地址，认为尼攘即今之民丰县；精绝即民丰县尼雅河下游的尼雅废墟，于西晋末年废弃；戎卢即民丰南之叶万铁里木；兰城乃尼攘城之不同

译名。（3）靓货逻故国。即斯坦因在安迪尔河下游发现的安迪尔废墟。靓货逻这个地名曾两次出现在《大唐西域记》。另一处则是包括今阿富汗北部和苏联土库曼、乌孜别克两共和国南部的一个中亚古国。（4）折摩驮那故国。位于今且末县城西数里、车尔臣河两岸的高地上。（5）纳缚波故国。中、外学界一致认为纳缚波故国即汉魏时的鄯善国，位于今罗布泊西南方的若羌、米兰绿洲。但关于汉、魏时期鄯善国都城的地址问题，则各说不一。《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又记其国有伊循城，汉军曾屯田伊循以支持鄯善新王。其后，《水经注》在河水篇又说："注滨河又东经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泽在楼兰国北，治扜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因此引起后人的争论，有的说伊循故址在今若羌，扜泥是今米兰废墟。主张鄯善国都在伊循城，伊循在西而扜泥在东，有的则说伊循城在东，是今米兰，而扜泥城在西，是今若羌。有的认为伊循城是今米兰北三十多公里的阿不旦，扜泥城则在今若羌东百余里处。作者对此作了详细考证，把汉、魏、唐各代古籍所记贯串起来进行了对比，确认鄯善国都扜泥城在西，即今之若羌绿洲城；伊循在东，即今之米兰废墟，并指出郦道元《水经注》中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与汉、晋史书及当时的资料记载相矛盾。原因是他注释西域水系，多引用释道安所撰《释氏西域记》的材料。而道安的材料也来自采访。因而在辗转引录的过程中产生了舛误。本文引用资料丰富，考证缜密，论述充分，为研究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材料。

236　高昌麴氏王国郡县城考述　　　侯　灿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5期）

本文依据考古资料，参照有关史籍记载，考述了中古时期建立在今吐鲁番地区的封建割据政权高昌麴氏王国的郡、县、城。第一，前期，即麴嘉承平元年（公元502年）至麴坚章和十八年（公元548年）。史载北凉末期，高昌还是一个郡治时，附近就建立了一些城，如横截、高宁、白力等。到了高昌麴氏时期，无论郡、县、城，史籍都统称之为"城"。据《魏书》记载：麴氏初期"国有八城"。1975年哈拉和卓第90号墓出土文书表明，早在阚氏高昌时期，其行政单位已有田地一县，高宁、威神、白芳（白力）三城。经二十多年发展到麴氏，其地方行政单位分为郡、县、城，郡设太守，县有县令，城有城主。据《周书》《太平广记》的记载，《魏书》所记八城，实为十一城：交河、田地两郡，横截、高宁、威神、白芳、洿林、无半、盐城、南平、安昌九城。文书资料证实，麴氏到第三代王麴坚时，由十一郡、城，发展到十五郡、县、城。其中郡三：交河、田地、横截；县八：白芳、无半、盐城、安乐、永安、柳婆、始昌、洿林；城四：高宁、威神、南平、安昌。第二，中期，即麴玄喜永平元年（公元549年）至义和六年（公元619年）。《梁书》记载，此时麴氏王国置四十城，但仅列十二城名。《周书》记载，此时麴氏有城十六。冯承钧先生《高昌事辑》中认为梁周时期，高昌麴氏应有城十九，本文作者以此说为是。即《梁书》所载十二城：交河、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夸林（洿林）、新兴、由宁、始昌、笃进、白芳及以前的无半、盐城、安乐、永安、威神、南平、安昌，核以同时期的考古资料，除笃进不见外，其余各城基本

合吻，并发现新增永昌一城，合为二十城。其中横截、交河系郡县合治，既有太守，又有县令。第三，晚期，即麹文泰重光元年（公元620年）至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灭高昌为止。《旧唐书》、《新唐书》及《元和郡县图志》均记高昌灭时，有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本文作者对已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检对，认为此数有误。1973年阿斯塔那519号墓出土符文，见有交河、南平二郡，永乐、安乐、洿林、龙泉、安昌、口口口、口昌县。本文作者认为，除缺少一县不明外，“口昌县”应是“始昌县”即“天山县”，并可知南平系新升一郡，安昌系新升一县，龙泉县系新置。文书资料还证实，酒泉县、武城、诸城、于堪均系麹氏晚期所置。此外，由《通典》可知，麹氏晚期还有“东镇城”，但无考古资料证实。综上，高昌麹氏共有郡四：交河、田地、横截、南平；县十二：白艻、永安、安乐、无半、盐城、柳婆、始昌、洿林、新兴、龙泉、安昌、酒泉；城十：高宁、威神、临川、宁戎（由宁）、永昌、武城、诸城、于堪、笃进、东镇城，共计二十六个，不包括王都高昌城。

237　高昌疆域郡城考　　　　黄文弼

（《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1期）

本文考证了高昌的地理沿革。历史上对高昌疆域的记载颇不一致，如《魏书·高昌传》谓“东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北史》作“东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通典·州郡志》、《新唐书·高昌传》作“横八百里，纵五百里”，其他如《周书》、《隋书》、《太平寰宇记》等，记载也不一致。作者认为要证明古地，应根据古迹之遗存与方位之距离，校验无差，则可信为真实。在此思想指导下，作者据史籍之记载，并经自已亲身的勘察，认为《通典》与《新唐书》所记高昌疆域横八百里，纵五百里之数可信，此数应包括东西边外之荒地在内。至于高昌郡城镇，诸史记载数目亦不一致。唐平高昌，置西州都督府，以原有之五大城，改立为五个县，原交河城改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地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作者认为研究高昌沿革，仍以五大城为纲。作者对此五大城的历史沿革，疆域境界，人口变化，名称演变都作了详细考证。最后，还将散见于各种史籍之中，仅有城名，又难明其方位之十三个城镇列表分述，并注明了名称由来，其中除白力城即为白棘城，其地址略可考见外，其余位置均不能确定。本文对高昌国地理沿革考证周详，为研究西域史地较好的参考资料。

238　吐鲁番的高昌故城　　　　阎文儒

（《文物》1962年第7、8期）

高昌故城，在吐鲁蕃东约50公里，胜金口南二堡和三堡的中间。从现在残存的遗址来看，高昌城可分为外城，内城和最北面的宫城三部分。外城略作正方形，四面有弧线式的城垣，西北角向内凹入，东面北半部又向外突出。城垣基址厚约12米左右，城垣残存最高达11.5米，外筑马面。西城垣有两个门，北端的门，还保存了曲折的瓮城；北、东两面的城垣，也可能有两个门；南城垣有三个阙口，如果正中的阙口，也是门的遗迹，那就是三个门，内城在外城的中间，宫城的南面。宫城作长方形，在全城的最北部。因

高昌故城现存的外城垣，已有瓮城、马面，宫城内遗址夯土层又较厚，堡垒内高耸的建筑物与寺院遗址，又都用土坯砌起，这些都是唐或唐以后天山以南各地建筑的特征。所以这个古城应是唐设西州，或系回鹘高昌时代所改建。高昌故城的平面布局，与唐代长安的平面布局相当接近。高昌故城，维吾尔语叫作“亦都护城”，二堡称为哈喇和卓，三堡叫作阿斯塔那。在中国古代史上，高昌城又有“和州、哈喇火者、哈喇火州、喇哈霍州、火州和哈喇和卓”等称呼。亦都护、哈喇和卓、阿斯塔那，是维族今天对故城、二堡、三堡的称呼。高昌故城是高昌国王——“亦都护”的驻在地，因称为“亦都护城”。“阿斯塔那”是维语“首府”之意。哈喇和卓则是以维吾尔国大将哈喇和卓命名的。又据历代文献所记的高昌、和州、哈喇火州、哈喇和绰等名称，究竟是时代的不同而有改变，或者是有地址的区别呢？经作者考证后认为：高昌故城，唐代以前叫作“高昌”唐改“西州”，西州回鹘占领后，辽代有时称“和州”。元代又译作“哈喇火者”、“哈剌霍州”，“哈剌火州”、“火州”和“哈剌和绰”等名称，虽然名称不同，但地点却在一处。直到回鹘高昌灭亡后，才废弃了这个都城。因而元代以前所记的高昌、哈剌和绰、火州等名称，都是指今日的高昌故城——亦都护城。明代火州，因高昌废弃，改移到三堡——阿斯塔那，所以明代火州城，与元代火州，并不是一个地方。今天的哈喇和卓——二堡，是根据维族传说，纪念出征高昌的维吾尔大将哈喇和卓而起的名称，与元代的哈喇和绰——高昌故城，也不是一个地方。把今天的哈喇和卓——二堡，与过去的哈剌和绰——亦都护城混而为一，是完全错误的。

239　高昌王国行政地理区划初探　　郑炳林

（《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本文探讨了高昌王国的行政地理区划。高昌王国即今之新疆吐鲁番地区，为丝绸之路的要冲。西汉在此设戊己校尉，东汉设西域长史，晋设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相继在高昌设郡置守。北魏灭北凉，北凉残部在沮渠无讳率领下西避高昌，并遣使归顺南朝的刘宋，被刘宋封为河西王。公元460年沮渠安周死，蠕蠕立阚伯周为王，是为高昌王国。高昌王国自公元460年建立至640年灭亡，共历时一百八十一年。本文根据史籍文献和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高昌王国时期的文书、墓志等文物的有关记载，引用大量资料，详细考证了高昌王国时期的行政机构和地理状况，明确核定了这个王国行政机构的具体名称、疆域范围和具体地址，对了解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情况很有裨益。据本文考证，高昌王国的疆域：东至白艻城（今吐鲁番辟展），西接焉耆，南与吐谷浑以蒲昌海、鄯善为界，北以天山之贪汗山与铁勒相邻。王国的行政机构分为王国、府、郡、县（城）四级。王国的都城为高昌城。高昌城分四部分、大城、中城、宫城和府城。大城有九个门，除南面有三个门外，其余三面各有两个门。大城之内的四角有四个坊市：东南坊、东北坊、西南坊、西北坊。由大城的街衢及宫城分割开来。在四个坊中，居住着各式工匠，有作坊及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大城之内是中城。中城内有一不规则的小城，是高昌王国的官署所在，即府城。大城北门内有宫城，即国王所居之城。高昌王国下设三府、五郡和二十七个县（城）。三府是：镇西府、平远府、抚军府。五郡是：田地郡、

交河郡、南平郡、横截郡、永安郡。二十七个县（城）是：龙泉、威神、田地、横截、始昌、无半、柳婆、盐城、永安、安乐、洿林、安昌、高宁、宁戎、酒泉、永昌、临川、武城、白艻、交河、高昌、诸城、南平、新兴、由宁、笃进、东镇城。高昌王国时期的郡县制对唐西州的行政区域划分影响很大，唐西州县、乡、里就是在高昌王国时期行政地理划分的基础上作了些调整变动而来的。

240　唐安西四镇考　　　张建候

（《新疆论丛》1948年第2期）

张建候先生原系西北师院教授，专攻历史地理之学，解放后，在院系调整中调甘肃省图书馆工作，1953年病故。本文对唐代安西四镇之建置，移徙及得失年代，进行了考证，特别是对碎叶所在与其隶属安西之始末，以及唐王朝势力自碎叶撤退年代，考证犹详。查西域各国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始自张骞使西域，自骞之后，终两汉之世，虽屡绝屡通，但与中原王朝的亲密关系，始终保存。对此，旧史记载较详，后之考证亦勤，而唐代之经营西域，为时虽较短，而势力所及，远胜汉代。但唐宋时著述，记唐人对西域史事，或为简略，记时与地，或隐约不清，记其得失，或互相矛盾，即以安西四镇而言，互异之处，颇费人探索。两《唐书》和《唐会要》对安西四镇建置年代，不相一致。李吉甫离唐全盛时，不过百数十年，其所著《元和郡县志》对庭州和西州所属后庭县及蒲昌的命名、建置年代又相矛盾。作者有鉴于此，即据各家著作，钩籍参证，乃撰成此文。本文首先考订两都护府、四都督府及四镇之建置、移徙年代。关于碎叶之建置，《新唐书》有贞观末安西统于阗、龟兹、疏勒、碎叶四镇之记载，但太宗之世，西突厥虽朝贡受封，而唐之兵力还未到伊犁河流域，因此不可能于碎叶设镇。显庆二年平贺鲁后，唐之兵力始达十姓地，三年安西都护府由西州徙治龟兹，碎叶之设亦为此年之事。嗣后，四镇有罢有复，直至中宗景龙后，都护牛师奖败死，开元七年（719年）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遂请以焉耆备四镇，从此皆以焉耆、龟兹、于阗、疏勒为安西四镇，与旧之有碎叶无焉耆者，则名同实异。直至天宝、至德间再无改易。安史乱起，镇兵内调，唐之势力，迅即退出西域，四镇失陷年月已无可考，但天宝乱后，旧日四镇不久亦即失陷。碎叶为丝绸之路上之要道，其名首见于《大唐西域记》，显庆三年列为安西四镇之一。高宗时王方翼改筑此城，为四方商胡汇集之地，商业茂盛一时。天宝七年(748)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讨突骑施，此城遂毁。十年，高仙芝兵败怛罗斯，此后，中国史籍再未见唐王朝有事于此土之记载。

241　碎叶是中国唐代西部重镇

——驳苏联所谓中国西部边境"从来没有到过巴尔喀什湖"的谬论　　卫　江

（《文物》1975年第8期）

本文是对苏联伪造历史，公然在政府声明中说什么"在西部中国的边界没有超出甘肃和四川省，更从来没有到过巴尔喀什湖"谬论的驳斥。1969年10月8日，我国外交部文件指出："新疆地区同中国其他部分发生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至少也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远在公元前，中国汉朝就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设有行政机构。八世纪，中国唐朝的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巴尔喀什湖南的碎叶河上的碎叶”。这已为大量史料和出土文物所证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我国西汉时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及帕米尔地区居住着乌孙、大宛、无雷等民族。据《汉书》记载，武帝元狩年间，张骞作为中央政权代表就已到达了乌孙。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王朝在乌垒（今轮台县）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管辖上述广大地区。汉朝还在乌孙的赤谷（今苏联伊塞克湖东南岸）等地屯田。魏晋到隋之间，虽然出现过封建地方割据局面，但中原地区和包括碎叶在内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各族统治者间的政治联系，也从未间断过。随着唐朝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碎叶从一个“商胡杂居”的小城，发展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的政治军事重镇。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中央在碎叶正式设镇。碎叶不仅是唐代在西部的边防重镇，也是唐王朝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政治中心。唐中央在碎叶先后派驻了瀚海军、天山军，保大军，设立了军政机构。碎叶自设镇后，曾先后隶属于安西、北庭都护府，并由唐中央委派官吏治理。随着军政机构的建立，唐中央的政令也有效地在这一地区推行。武则天在载初元年（689年）曾颁布诏书，“令诸州各置大云寺”，远在西陲的碎叶镇也建有此寺，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统一的象征。唐中央在任命镇守碎叶官吏，派遣包括本地人在内的大批戍卒的同时，即开始了碎叶城的建设。《旧唐书·王方翼传》载：王“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西域诸胡，竞来观之，因献方物”。安西、北庭都护府以及碎叶等四镇的设置，也促进了唐代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碎叶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特产——马，大量贩卖到西域。当时的西州，成为突厥马的交易中心。碎叶是“丝绸之路”北道必经之地，又是当时我国西部中西陆路交通的要冲，对于发展我国人民同西亚、地中海东岸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都发挥过积极作用。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设立的以伊犁将军为首的行政机构，还管辖包括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和巴尔喀什湖直至帕米尔等地的军政事务，并定期派遣官兵前往楚河、塔拉斯河、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等处巡查。这些历史事实谁也否定不了。就连帝俄时代1903年出版的《大百科辞典》也明确承认，中国西部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

242　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　　　殷孟伦

（《文史哲》1974年第4期）

碎叶是我国历史地理上的一个名城，在我国新疆地区以西，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以其碎叶水而得名。隋唐时碎叶水或称碎叶川、素叶水、细叶水。所谓碎叶、素叶、细叶，均系突厥语的音译。宋、元以后直至今日，对此水有称垂河或吹河、潮河、楚河等等，其中以楚河较为通用。早在隋唐时，我国少数民族西突厥始于此地筑城建牙，玄奘西行求法曾经过此城，并在《大唐西域记》中载有“……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胡商杂居也”。碎叶为西突厥统治中心，处东西方往来要冲，是当时的国际贸易城市，商贾云集，对中西经济交流和东西方文化的传播，以及巩固边防，保卫西域各族，都曾起到重大作用。唐王朝为巩固西部边疆的安全，高宗显庆时平息贺鲁事

件后，在当时西突厥旧地昆陵（碎叶以东） 蒙池（碎叶以西）设两都护府，并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由于碎叶在东西两府之间，交通及军事地位均较重要，遂于其地设镇，成为安西四镇之一。至高宗调露时王方翼又改筑碎叶城，以加强军事守备。天宝七年（748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讨突骑施时，碎叶城被毁。天宝十年，高仙芝兵败怛罗斯，唐之势力始退出碎叶地区。公元十世纪以后，碎叶在我国西部的重要地位由八喇沙衮所代替。八喇沙衮即唐代的裴罗将军城、西辽在此建立了都城，定名虎思斡尔朵，其地在碎叶东南四十里处，因碎叶城早已毁弃，故耶律大石在此建都。元代初年，耶律楚材受召赴西域时，曾到过碎叶，但已成了废墟。碎叶历史地理等问题的研究，是与唐安西四镇的设置不可分割，但安西四镇的设置，史家记载纷繁，尤以两《唐书》记载互相矛盾，传讹后世，影响颇大。本文是从各种纷繁的历史记载中，力图把产生各种误解的根源，作一梳理归纳，并从碎叶得名由来及其地理位置；碎叶与安西四镇；关于碎叶地理位置的错误说法；焉耆都督府治碎叶问题的产生；碎叶的确切位置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地考证，反复辨析，确证碎叶城地理位置之所在，从而得出碎叶在中亚，焉耆无碎叶的正确结论。

243 李白的故乡——碎叶 马国荣

（《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

本文是对碎叶历史沿革系统研究之作。因为碎叶是唐代丝绸之路和我国西部边疆的重镇之一，是通往中亚、西亚等地的交通要冲，中西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梁。碎叶在现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巴尔喀什湖以南，伊塞克湖以西，楚河南岸的托克马克不远的地方。西汉初年，这一地区是乌孙的属地。隋末，碎叶为西突厥建牙之所，是"诸国胡商杂居"的地方。唐代，碎叶成为东西陆上交通——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之一。当时丝绸之路在新疆的路段，大体上分北道、中道、南道三条。碎叶在北道和中道的交汇点上。两道汇合于碎叶后往西，经怛罗斯等地，直通地中海各国和西欧；往南经石国（今塔什干）通往西亚、波斯和印度。由于碎叶在我国古代西北边疆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所以贞观末年，唐朝在碎叶正式设镇，并在碎叶以西及以东设蒙池和昆陵二都护府。碎叶镇以及蒙池、昆陵二都护府的设置，标志着包括碎叶在内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整个地区，是唐朝中央政权直接管辖和行使权利的行政区划，于是，唐朝政府开始筑城建镇，派官镇守，加强驻防部队的防御力量。唐仪凤年间(公元677—678年)，唐朝平定了阿史那都支等人在安西、碎叶附近的阴谋骚乱以后，副使王方翼以安西都护的身份，亲自驻守碎叶，并修筑了气势雄伟的碎叶城。当时碎叶和龟兹、于阗、疏勒同属安西都护府管辖，镇守碎叶的官吏由各民族担任，但都必须经过唐中央王朝的任命。活动于碎叶地区各少数民族的首领，也大都受到唐中央王朝的封号。为了巩固西北边防，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唐朝政府十分重视安西都护府和四镇的军事力量，当时的保大军就设在碎叶。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十姓可汗居碎叶，安西副大都护、四镇节度使汤嘉惠请以焉耆代碎叶，此以后碎叶不再设镇，但仍在唐朝统治之下，为十姓突厥、突骑施活动的政治中心。从唐肃宗至德以后(公元756年）到唐代宗大历年间，葛逻禄部徙居碎叶。"碎叶、

怛罗斯诸城尽为所踞”。公元十世纪以后，碎叶在西部的重要地位，由哈拉汗王朝的都城之一八拉沙衮所代替。八拉沙衮是唐代的裴罗将军城，西辽在碎叶川以南另建都城，名虎思斡尔朵，这主要是碎叶城早已摧毁的原故。元朝初年时碎叶城早已改名索虏城。直到十九世纪中国的边界还在巴尔喀什湖。一八六零年和一八六四年，沙俄胁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两个不平等条约后，沙俄割占了我国西北边疆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此碎叶划归苏联版图。

244　从吐鲁番出土“氾德达告身”谈唐碎叶镇城　　　吴　震

（《文物》1975年第8期）

唐朝人重视告身。告身是朝廷授官授勋的凭证，犹如近世的任命书。氾德达告身两件，1968年4月出于吐鲁番县阿斯塔那100号墓。据墓志载，氾德达以上轻车都尉（视正四品）死于武周久视元年（700年），终年五十八岁。这两件告身，一是永淳元年（682年）告正骑尉氾德（达）”，存文29行，残损过甚。一是延载元年（694年）“告轻车都尉氾德达”，存文35行，基本完整。这两件告身虽系抄件，但其真实性无可置疑。两告身所联系的历史事件也大致可考。据《资治通鉴》卷二〇二，调露元年（679年），西突厥可汗阿史那都支勾结吐蕃统治者，阴谋叛乱，唐朝以吏部侍郎裴行俭护送波斯王子归国，王方翼为副，同时负责平定阿史那都支的叛乱。行俭曾于西州募“豪杰子弟千余人”为部伍。永淳元年告身中氾德达的出身正是“募人”，他无疑是调露元年召募入伍的西州“豪杰子弟”之一。他入伍以后，由于在拨四镇和破都历岭的战斗中有功而得酬勋(破都历岭和拨四镇事，史籍记载脱漏，据此告身，可补史籍之缺)。斐行俭粉碎叶了都支的叛乱阴谋后，留其副使兼检校安西都护王方翼筑碎叶城。这一年，唐复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王方翼筑碎叶城，是在原碎叶城的基础上加以增筑改建，并非平地新筑，也不是如个别史料所说的留在焉耆境内筑碎叶城。碎叶城只有一个，其方位在热海（今伊塞克湖，意即“热湖”）以西的碎叶川（今楚河）以南，延载元年告身中唐代四镇之一的碎叶城就在那里。作者又进一步分析了误置碎叶城于焉耆的原因，指出了《新唐书·地理志》与《资治通鉴》卷二〇二有关记载的错误，并从四镇建置及其变异历史阐明了误置碎叶于焉耆的根源。王方翼对碎叶城进行了改建以后大约七十多年，唐人杜环经过这里，曾看到碎叶城中的大云寺。载初元年(689年)武则天令“诸州各置大云寺”。碎叶城建大云寺正是按照全国州城之例。唐朝保大军就驻于碎叶。八世纪初，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在碎叶。由此证明，早在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碎叶就是我国的边境重镇，丝绸之路的要道，早就在我国的管辖之下。

245　唐碎叶建置诠索　　　薛宗正

（《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碎叶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碛西名城，至唐建为西北边防重镇，先后隶属于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此城的建置沿革，弃复兴废，反映了公元七至九世纪碛西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动和唐朝西北边防体制的复杂演变。鉴于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足，作者特作了

理蔓清枝，攀巅穷览的全面考察研究。

碛西归唐前，即元公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碎叶已是西突厥汗国治下的重要城市。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伐龟兹后，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始创安西四镇。安西四镇有二名单：一是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二是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现国内外学者大都倾向于公元648年所置四镇有焉耆而无碎叶。对此，作者通过对648年阿史那贺鲁降唐后唐朝是否实际控制碎叶、及唐初相应的边防军事部署的分析，亦同意此说。碎叶的归唐与置镇应分为两个阶段，其城归唐乃高宗显庆三年（657年）唐平阿史那贺鲁、真珠叶护之乱的产物，而其置镇则是调露元年（679年）唐平定阿史那都支，李遮匐之乱的结果。碎叶之所以取代焉耆列备四镇，是由于唐朝西北边防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所致。碎叶名备四镇后，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它在屏维唐朝的西北边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间曾多次废而复置，历尽沧桑。作者认为曾六置六弃，其中五次发生于安西大都护府统辖时期。第一次建置与弃守是在调露元年——垂拱二年(679—686年)。第二次收复与弃守是在垂拱二年九月——天授元年(689年9月——690年1月)。第三次收复置镇和弃守是在天授二年——长寿二年——圣历二年（691—693—699年）。第四次收复置镇与弃守是在武后圣历二年八月—久视元年——景龙二年（699年8月—700年—708年）。第五次置镇与弃守是在景龙三年七月——睿宗景云二年(709年—711年)。第六次弃置当在景云二年，唐西疆大乱，碎叶城为西突厥叛酋都担所据。碎叶城的行政隶属关系，在唐朝治理碛西时前后曾有所变化。原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后归北庭大都护府。以史实核之，公元702年初设之北庭都护府并非同安西大都护府分庭抗礼的平级机构，而是下属组织之一。它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当在公元711年。而碎叶直属北庭大都护府统辖时间只限于开元二年—开元七年(714年3月至719年)，此亦为碎叶的第六次建镇与最终弃置时期。本文最后考察了碎叶镇的交通地位与行政级别。碎叶虎踞碛西腹地，当丝绸之路北道正支，交通四方，具有优越的战略地位，至少有四条大路交会其地。一是安西路，南经拨换，西达安西大都护府治所的龟兹；二是疏勒路，南经拨换，转往唐之西部雄关疏勒；三是北庭路，东通庭州，远达长安，四是怛逻斯路，西经怛逻斯，远交大秦、大食。其中庭州路与怛逻斯路连接起来，即为横贯天山北麓的丝路北道。本文对各路之路线、里程考之甚详。至于行政级别，根据任职管衔，碎叶镇的长管不称镇将而称镇守使。镇守使官阶三品，与都护平级，而与镇将品阶悬殊。历任此职者皆品阶很高的戍边大将。旧说唐之藩镇始于河朔三镇，而安西四镇皆以显官而拥重兵，实开河朔三镇的先河。

碎叶城归唐后的建制沿革以及历届镇守使，文中附有详表，可资参证。

246　碎叶城今地考　　　　张广达

（《北京大学学报》"社哲版"1979年第5期）

本文根据中外史籍文献记载，考叙了唐代碎叶城的地理方位。文章分为：考证碎叶方位的意义；关于碎叶方位的两个疑问；从我国汉文史籍和穆斯林地理文献看碎叶的方位；从考古学资料看碎叶故址等四部分。据文献记载。碎叶城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为唐代安西四镇之一，西域边陲重镇，也是我国古民族西突厥十姓可汗、突骑施、葛逻禄

的政治中心和吐蕃的活动舞台，又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曾经在丝路之上有过繁荣昌盛的历史，在东西经济和文化交流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公元五世纪已有碎叶城，十一世纪时为黑汗王朝的都城八剌沙衮所取代，其后即湮没无闻。今天，研究碎叶的历史沿革，有助于阐明唐代我国西北地区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具体过程。关于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疑问：一是唐代设置的安西四镇中，碎叶时有时无，存在着碎叶与焉耆互相交替的情况；二是碎叶究竟是位于热海以西，或者在焉耆另有一个碎叶。郭沫若更主张有两个碎叶，一在中亚，一在焉耆，迄无定论。作者引用了曾亲临素叶城的唐僧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杜环《经行纪》和《新唐书·地理志》中关于素叶城的记载，以及穆斯林地理文献《道里与诸国志》、《税册》、《世界境域志》、《记述的装饰》中关于怛逻斯到碎叶附近地理情况和道里的记载，证明碎叶的相对位置。碎叶附近有突厥人的圣山，有突骑施汗廷，是汗国的政治中心等情况，这些都证明汉文史籍和穆斯林文献的记载中基本一致。作者又从近几十年苏联考古勘察和发掘出的古物遗存，查找出符合碎叶城地理历史条件的两座大型城镇废墟：一是托克玛克西南的阿克·贝希姆废城，又一为托克玛克以南的布拉纳废城，并根据考古工作者对这两个废墟发掘出的地形地貌和文物，苏、英、法等国学者的考证，再对照中国史书文献关于碎叶城修建和建筑物的记述，认为阿克·贝希姆废城即为碎叶城故址，其位置大约为东经75°30′，北纬42°50′处；而另一座布拉纳废城则为黑汗王朝与西辽王朝的都城八剌沙衮。本文引用资料丰富，论证充分缜密，为研究素叶城址提供了重要参考。

247 铁门关考 刘 伉

（《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的一个新译本。在第一卷第一章中，对正文提到的铁门关，附加了一个脚注，说铁门关“即打耳班关。故址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南部杰尔宾特西约十三公里”。本文对照有关正文，指出译者所加的注文是张冠李戴，把名称相同的两个地方混而为一了。正文说的是里海西岸高加索地区的铁门关，位于欧洲；注文说的是中亚南部地区的铁门关，位于亚洲。二者直线距离一千七百公里，可谓天各一方。为此，作者对这两个铁门关进行了考证。认为中亚的铁门关，是个自古有名的隘口。唐代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成吉思汗西征，长春真人西游，亚历山大东征，均曾由此关通过。关名来源于波斯语，以后译为阿拉伯语，含义均与汉语完全一样。据文献记载，此关山石似铁，且附近有铁矿，峻峭险固，故名“铁门”。高加索的铁门关，即打耳班，与中亚铁门关的外语名同出一词。据《元史·速不台传》记载，北征钦察时，即通过此关，进军伏尔加河下游。此关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译为打耳班和代卫班得，均未以“铁门关”著录；而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俄语含义均为“铁门关”。说明此关之得名完全是因此关襟山带海，形势险要，故以铁名之。作者还引用清代学者丁谦所著《元经世大典图地理考证》和西班牙外交使臣克拉维约所著《东使记》中关于这两个铁门关的记述，说明古人对这两关已分得十分清楚。

248 铁门关、铁关谷和遮留谷　　陈　戈

（《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本文提出：据文献记载，在中亚有两处铁门关，一处在今苏联境内萨马尔干之南，另一处则位于我国新疆境内，并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考证了新疆境内铁门关、铁关谷和遮留谷的具体地址。这三个地名，曾出现于《水经注》、《晋书·四夷传》、《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唐六典》和唐代诗人岑参所作西域诗中。但它们究竟是一地、两地或三地，其地在今之何处，诸说不一。《西域图志》认为铁门关在今库尔楚之东，遮留谷位于库尔楚附近，《新疆图志》认为铁门关和铁关谷是一地，位在今焉耆与库尔勒之间的紫泥泉子；遮留谷为另一地，位于今之哈满沟。徐松、丁谦认为遮留谷为今库尔勒之北约二十里的山岩口，铁门关在其东约三十里的大石岭处，而铁关谷与铁门关为一地。黄文弼认为铁关谷和遮留谷均为今之哈满沟，铁门关位于哈满沟中。岑仲勉认为铁关谷与铁门关为一地。本文对上述诸说均持不同意见。作者曾于1983年8月在焉耆、库尔勒一带进行考古调查，观察了当地的地理形势和文物古迹，对照文献记载，认为铁门是指一处关口，设在铁关谷之中；遮留谷和铁关谷则是各指一条不同的山谷。这三地均位于今库尔勒与塔什店之间的山谷中，相距不远，但具体位置各不相同。在焉耆和库尔勒之间横亘着两条山脉：东面是库鲁克塔格山，西面是霍然山。这两条山脉均在库尔勒与塔什店之间完结，并在二者之间形成一条东北—西南向峡谷，长约二十公里左右，从博斯腾湖中溢出的孔雀河水即穿过此峡谷向西流去。铁门关即位于距峡谷南口约十公里孔雀河水的一个大拐弯处，这条峡谷就是铁关谷，而遮留谷则在铁门关之东约十余里处，亦即哈满沟。这种考定，既与地理形势相符，也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249 唐代"轮台"初探　　林必成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4期）

唐代轮台地望所在，众说纷纭，《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谓即今之轮台县；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唐诗选》（上）的注解认为在今库车县之东；《辞海》轮台条认为今乌鲁木齐与昌吉之间；《新疆图志》谓其地在今乌鲁木齐北古牧地（古牧地清代叫乾德，现在叫米泉）；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新疆简史》谓其地当在乌鲁木齐之附近不远。唐代轮台在那里？文章作者根据历史资料、岑参诗中对唐代轮台的描述及实地调查，并结合新疆地理条件，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以上各说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唐代轮台在今乌鲁木齐市南二十公里乌拉泊水库南面的乌拉泊古城——烂城子。

唐代庭州是北庭都护府首府所在地，包括现今疆北地区至中亚碱海广袤地域，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人们一致认定吉木萨尔城北九公里的破城子为北庭都护府治所，因为从这里到乌鲁木齐，沿途有不少废城遗址，人们统称为唐城，其中以破城子规模最大。但仅次于破城子规模的古城遗址是乌拉泊古城。从古城的建筑规模形势遗迹看，在当时

是一戒备森严的军事城堡，而且与吉木萨尔破城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最初，轮台仅仅是庭州的一个县，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设立北庭大都护府，轮台随即升为轮台州都督府。北庭大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地区，轮台又属北庭都护府管辖，其地望当在天山以北。而现今南疆的轮台，唐代则属于安西都护府的乌垒州。据《新唐书·张守珪传》有关张守珪援救轮台的记载，证明唐代轮台在北疆而不在南疆。再据《新唐书·焉耆传》有关丝绸之路南北二道征收西域贾商税的记载，北道是由轮台征之。新疆是丝路交通要道，东西方往来贸易量很大，征税是当时重要财政收入之一，而征税地点一定是商贾必经之地。但"西域贾"多活动于北庭都护府境内，大多来自碎叶、伊丽等地，且一般多从西北的昌吉经乌鲁木齐、达坂城到西州境（今吐鲁番）。乌拉泊古城正好位于达坂城峻谷北端咽喉之地，为天山南北商贾必经之地，而米泉并无此条件。唐代诗人岑参两次到西域，并在轮台留居达三年之久，写有大量西域诗作，作者通过这些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山川要隘、军旅生活及自然景观等多方面分析研究后，认为唐代轮台，非今日南疆之轮台，也非乌鲁木齐至昌吉之间的某地，更不是今日之米泉，而是今乌鲁木齐市南郊十公里处的乌拉泊古城。这样对多年来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城市轮台地望之争，可望有所解决。

250　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　　　钱伯泉

（《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轮台是汉、唐两朝雄踞西域的军事重镇，又是开展屯田的主要场所；乌鲁木齐是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弄清汉、唐轮台的地理位置和乌鲁木齐的历史渊源，对研究新疆历史和"丝绸之路"都有很大意义。

作者列举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辞海》、《唐诗选》、《新疆图志》、《新疆简史》以及有关学者对轮台地理位置的解说，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乌鲁木齐，过去对其历史渊源既不甚详，解释名字的含义也是岐意多端，无有定论。本文根据文献资料，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论证，认为汉时的轮台国，在今新疆轮台县以南六十里，西域都护和乌垒国都所在的乌垒城，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六十里，而唐朝的轮台县城，就在今乌鲁木齐市南郊的乌拉泊附近。离乌拉泊水库南岸不远，至今留有一处古城遗址，城周约有四里，城墙残高三至五米不等，有四座城门和四个角楼。作者认为这里就是唐朝的轮台县、州和都督府治。在今阜康、米泉及昌吉，还有许多座军队屯田和驻守的子城遗迹，可见唐朝的轮台县范围很大。因而，它就成为保卫西域的重镇和"丝绸之路"的枢纽。

关于乌鲁木齐的渊源，作者从两千一百年前在这里建立的乌贪訾离国起，到三国时期的"於赖城"、唐朝的"轮台县"，归顺元朝的维吾尔族"高昌回鹘国"（高昌即今吐鲁番，乌鲁木齐在其影响之下），明时瓦剌人的统治，明末清初准噶尔的兴起，直到清初平定西域后称迪化直隶州，民国时设迪化市、解放后改称乌鲁木齐止的历史沿革作了详细叙述，对乌鲁木齐名称的含义也有新的见解。作者综合了中古译音的变化，确认其原音应为"Urumtaiqi"。据此，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了乌鲁木齐一词是"团结"、

"优美的牧场"、"好大的围场"、或"格斗"之说。进而从维吾尔语属的突厥语系的Urumtai(乌轮台)Urumdaq(胡禄屋阙)到现代维语的Urumqi(乌鲁木齐)的过程，以及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条件等方面综合分析，认为乌鲁木齐的含义就是"好地方"之义。

251　唐轮台名实核正　　薛宗正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本文针对钱伯泉《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见《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1期,文亦收入本叙录)一文中关于轮台即乌拉泊古城之论点提出商榷意见。作者认为轮台应是昌吉古城而非乌拉泊。其论点有五：1.本文在轮台的原音与本义一节中指出,钱文没弄清轮台的原音本义，生造出匈奴语中不存在的"Urumtai"词，说突厥语的胡禄屋阙乃阿拉塔齐，即乌鲁木齐的对音，实属欠妥。深加研究，轮台之名应为古塞语，其语义亦非"好地方"，而是"上游地区"或"农业地区"。2.在乌垒、乌拉泊对音不符一节指出，钱文考证轮台即乌拉泊的主要方法是对音，然而轮台与乌拉泊之间毫无对音的可能性。本文从逻辑学、音韵学角度论述了乌垒、乌拉泊对音之正讹。认为乌拉泊乃为鄂里巴里(山城)的音译，与轮台意义毫不相干。3.在乌拉泊与轮台地望不合一节指出，轮台应位于庭州之西，碎叶之东的交通孔道上，而乌拉泊地不当碎叶路。再则轮台作为丝路北道关卡所在，理应地扼碎叶至庭州的正路，以设关收税。另外作者重新注释了岑参诗："平明发轮台，暮投交河郡"的本意，而后断定乌拉泊决非轮台。4.在昌八里的定点一节指出,考定轮台地望必先确定昌八里位置。错误地将它同昌吉混为一谈，乃是轮台地望之谜不能揭晓的症结所在。作者从地望不符、语源不同说明昌八里决非昌吉。进而考定昌八里位于今玛纳斯县境即今玛纳斯县治正东三十里之阳噶尔巴逊古城。5.在唐轮台即今昌吉古城一节指出，昌吉古城位于今昌吉县正东，州府区之东北方向，城为方形，城墙形制依稀可辨，犹存当年雄风古韵。比诸庭州故城(今吉木萨尔后堡子)以西的十一座唐城废墟，具有县城规模者非此城莫属。其方位、地貌与史书诗文所记的轮台相符，而且昌吉古城正当碎叶——庭州大路。

轮台地名由古塞人"农业地区"转为汉唐之"屯垦重地"，再转至蒙古人之"山乡"，终至成为今日新疆首府，这一过程不啻是新疆地区两千年来沧桑巨变的历史缩影。

252　唐轮台位置续考　　钱伯泉

(《新疆社会科学》　1984年第4期)

钱伯泉的《轮台的地理位置和乌鲁木齐渊源考》(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发表后，薛宗正的《唐轮台名实核正》(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提出异议。(这两篇文章均已收入本叙录)本文又是作者对薛文中阐述的一些问题的商榷。作者引述了《突厥语大辞典》、《海屯行记》、《经世大典图》的史料后指出，薛文所说的"唐轮台在昌吉"，"昌八里＝仰吉八里、阳巴尔葛逊，其位置在玛纳斯古城"是

错误的。《突厥语大辞典》明确记录着：彰八里和仰吉八里是两个地方。彰八里之“彰”是“大”的意思，仰吉八里的“仰吉”是“新”的意思，“八里”是“城”的意思。一为“大城”，指昌吉古城；一为“新城”指玛纳斯古城，而薛文将它们混为一谈。《海屯行记》和《经世大典图》也明确将彰八里和仰吉八里记作两地，一在东，一在西，中隔古塔巴（呼图壁）。因之，薛文“唐轮台就是昌吉”说，就失去立论基础。作者又引述《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长春真人西游记》史料，认为唐轮台县治并不在昌八剌，而昌八剌就是昌吉古城，并坚持前文论点：唐轮台的县治一定在乌拉泊古城。关于唐轮台县的范围和地望，作者也认为薛文之说没有依据，是用“按纽查韵”一类方法而得的牵强附会之说，轮台是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后，西突厥将领叶护降唐时设置，与蒲类县和金蒲县同属于庭州管辖，其范围有限，东不过今新疆木垒县，西不过今乌鲁木齐市。至于地望，作者引证岑参在轮台所写的十数首记事诗，认为唐之轮台，则非乌拉泊古城莫属，其总的论点是：汉朝天山以南的乌垒国又译为轮台国；魏晋南北朝时在今乌鲁木齐市南建于（乌）赖城，唐朝又建轮台城，唐末宋初称预龙（Urum），元朝称为番委姆，清称乌鲁木齐。唐轮台不在昌吉，而在乌拉泊古城；轮台之音不是塞语或伊朗语，而是突厥语族的匈奴语。其对音既不是ruh或runduai，更不是Janbalik（彰八里，即昌吉古城），而是“乌轮台”（urumtai），唐轮台的音义，只有从乌鲁木齐（Urumq）一辞去寻根溯源。

253 轮台和乌鲁木齐　　　刘维钧

（《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0年第4期）

“乌鲁木齐”这个名称是怎样来的？它的含意是什么？有人说是维吾尔语“团结”的意思；有人说是蒙古语“优美的牧场”的意思。本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证，否定了这两种说法，认为“乌鲁木齐”这个名称源于汉唐，流传至今。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中有一个轮台国。唐代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设立轮台县，今天的乌鲁木齐就是唐代轮台县名的沿用和因袭。只是因为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时代变迁，各民族语言互译，发生了一些音变。轮台，在回鹘语里叫做“窝轮木台”，是轮台的加字加音，前头加个“窝”字，后部加个“木”字。这种译音的音变，造成加字加音的情况，在新疆的地名中是屡见不鲜的。后来，汉族人民又把“窝轮木台”译成“乌鲁木齐”。因此，乌鲁木齐这个名字是各兄弟民族传统友谊的结晶。

254 北庭故城与北庭大都护府　　　薛宗正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4期）

本文探讨了北庭故城历史及名称的演变；北庭大都护府的管理体制；北庭在丝路交通上的重要地位。北庭故城唐以前称可汗浮图城。唐贞观二年（628年）阿史那祝尔败退时“依可汗浮图”，此名始见。此城肇建何时，历来说法不一。有人以今之吉木萨尔即金满之译音，由此断定可汗浮图即汉之金满城。据作者实地考察，汉全满在今县城之南，决非可汗浮图之前身。又有人认为，可汗浮图即汉代之务涂谷，“浮图即务涂之音

转”．“务涂”为突厥语“utun”的音转，其义为柳，所以务涂谷当为《唐书·地理志》之柳谷，从地理方位分析，它与可汗浮图相去太远．综上分析，作者认为可汗浮图城的肇建，当与蠕蠕主伏图可汗有关。几世纪以来，蠕蠕与中原各朝及中亚和天山南麓各城国有广泛的接触，至伏图可汗时，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可汗本人皈依了佛教，并多次图谋与北魏缔结盟好，这时蠕蠕社会由游牧转向定居时期，所以伏图可汗在位时代建立一座城市，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是极其可能的。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可汗浮图城历史可上溯到公元五世纪的北魏时期。唐贞观十四年（640年）置庭州，此时庭州是安西大都护府在天山北麓管辖下的一重镇。武后长安二年（702年）设北庭大都护府，府治庭州，此时北庭大都护府辖有疆北的带及碎叶川西亚洲广袤腹地，并对上述各地进行了有效地经营与管理。天宝十年(751年)，唐与大食在怛逻斯一战，唐军复没；十四年又发生安史之乱，唐朝国势日衰，再无力治理西部边疆，至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庭州陷于吐蕃。唐朝经营天山北麓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而北庭大都护府从设立(702年)至陷落（790年）也有八十八年，其建置特点是在大都护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汉、突厥分治、军民分治的二重化管理体制。在突厥族为主的游牧地区，推行军政合一的民族自治制度；在汉族移民集中地区，建立与内地一样的州、县行政组织，在汉族驻军所到之处，则建立军、守捉、城、镇等屯戍组织。这两条平行的民政、军政体系，保持其各自的独立性，有效地治理天山北麓全境。北庭既是唐王朝在天山北麓的政治中心，又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咽喉与军事要冲，事实上是一条与天山南麓传统丝绸之路相媲美的重要国际交通线。它有西达碎叶的碎叶路，南连西州的西州路，北通回鹘的回鹘路，东接伊州至长安的伊州路。如果将伊州路与碎叶路连结起来，实为长安至中亚及其以西的一条国际丝绸之路干线。自唐迄明初，这条线上国际商人往来不绝。不仅我国的丝绸经此线运往西方，而且我国的重大发明如火药、造纸、印刷术等的西行，西方的摩尼教、景教及伊斯兰教的东播，以及耶律大石的西迁及其建立的西辽，蒙古军的西征，这些震动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都与这条东西国际干线联系在一起。因此对这条干线有关的政治军事，商业贸易、民族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实为丝绸之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255 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

（《考古》1982年第2期）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于1980年10月对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所在地北庭古城的考古调查报告。北庭古城为古丝路北道必经之地，是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的最高军政中心。解放前国内外学者曾多次调查，有一定研究成果。这次调查实测，补充和纠正了过去测图和调查工作中的不足和失实之处。古城座落在天山北麓坡前地带与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相接壤的平原上，南依天山，北望沙漠，扼守东西交通要道。古城东通奇台、木垒、哈密，西经阜康、乌鲁木齐可达伊犁河流域，往南翻越天山，直达吐鲁蕃盆地，向北穿越沙漠至蒙古草原。与天山南麓的高昌，交河两古城遥遥相对。古城是内外两重城，不是三重城。内外城均系夯筑，其形制基本一致，即内城墙随着外城墙的曲直而曲直。城墙周长、残高、夯层、夯径、城门位

置等，本文有实测数据。内外城都有敌台、角楼和较密集的马面，外城还有曲折的瓮城，其北又有羊马城，城墙之外均绕以宽阔的护城壕。马面、敌台、角楼和瓮城等多使用纴木方孔的做法。实测中也取得详确数据，特别是对外城马面的位置、残存大小、夯层结构、破坏程度等列表登记甚详。这种平面布局和构图特点完全反映了我国中原地区传统的筑城技法在新疆地区的广泛使用。而古城规模之宏大、规划之周详、防守之严密是与北庭大都护府的政治、军事地位及其作为北疆地区的统治中心完全相符合的。这次调查中还发现外城和内城的构筑方法有明显区别。这说明外城和内城在构筑方法上和筑城的年代上都有所不同。外城修建年代早，使用时间长。内城修建年代晚，使用时间也较短。现存城内的建筑基址，除6号基址较早外，余皆较晚。从古城的形制和建筑特点分析，马面、敌台、角楼、瓮城和羊马城等的设置不会早于唐代，过梁式木构城门洞盛行于唐宋之时。外城墙的夯层结构和唐两京城都较相似，内城墙的夯层结构与高昌回鹘时期的建筑遗址结构相同。从出土遗物看：早在清代中叶就在古城发现过唐金满县残碑及唐、元两代的造像碣。以后，又陆续出土了大批的唐代文物。这次采集到的遗物大多也是唐代的，如建筑材料和罐、砚台、盆、盘等陶器。但也有属于高昌回鹘时期或元代的陶瓷器。从文献记载看：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在古城设置庭州，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设置北庭大都护府，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改设北庭节度使，管辖瀚海、天山、伊吾三军，而瀚海军就驻在北庭城内。北庭城经两次修筑。高昌回鹘时虽建都高昌，但北庭实际上是高昌回鹘的陪都。元时北庭改称别失八里，也称“鳖思马”大城，先后在此设立了“行尚书省”、“宣慰司”、“元帅府”等重要机构。元后北庭城史传失载。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认为：北庭古城现存的外城墙可能始建于唐初，后经两次修补。内城墙大约建于高昌回鹘时期，在修建内城墙时对外城墙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补和加固。北庭古城的废弃年代大约在元末明初。

256　天山脚下的历史名城——北庭　　　王秉诚

（《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北庭古城遗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城以北十二公里处。这里原是西汉时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车师国。因其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西汉与匈奴为争夺此地而进行的战争延续三十多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后，以天山为界，把车师分为前部（今吐鲁番一带）和后部（今吉木萨尔一带），王都设在金满城。唐朝统一中原初期，这里是西突厥的游牧地。到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西突厥发生内讧，分裂成两个汗国，南北对峙，分而治之，号称“北庭”（统辖碎叶河以东诸部落）、“南庭”（统辖碎叶河以西诸部落）。“北庭”之名即由此而来。公元647年，唐朝在北方草原设置六十八处驿站，开辟“参天可汗大道”之后，又开辟了一条由北庭通往蒙古草原的大道，并与“参天可汗大道”衔接，成为由北方通往唐朝都城长安的又一通道。公元1251年，蒙古帝国为了加强对西域的统治，在别失八里（即北庭）设尚书行省，委派官员掌管西域的军事、行政等事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西域设立的行省。明朝统一中原后，别失八里成为蒙古察哈台后裔的活动中心。其后因内部

火并，北庭故城在战乱中被焚毁。本文详细论述历代王朝时北庭的政治变迁情况及经济情况，对了解丝绸之路上的这一历史名城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

257　关于唐代庭州的几个问题　　　鲁才全

（《西北史地》　1986年第3期）

本文探讨了唐代在西域设置庭州的几个问题。全文共分三部分：一、庭州设置的年代。对这个问题史籍记载颇不一致。有的说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有的说在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有的说在贞观二十二年。经前人探索，史学界已认定贞观十四年为是。但因史籍所记庭州的设置与西突厥的降附有关，有的并指明该叶护即阿史那贺鲁。更因近年来有的论著仍将阿史那贺鲁的降附与庭州的设置联系在一起。作者对此提出异议。并引述《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的有关记载进行分析论证，认为阿史那贺鲁之降唐在贞观二十二年，与庭州之设置无关；并推定贞观十四年以可汗浮图城降唐的叶护极可能为阿史那步真。二、庭州设置后一度废弃又恢复的情况。庭州于贞观十四年九月设置后，在高宗永徽年间一度废弃，直至显庆三年方才复置。作者引用新、旧《唐书》、《册府元龟》等史籍有关记载，论证了庭州的废弃是由于阿史那贺鲁在降唐后又复背叛所致，而庭州的复置则是唐朝三次派军消灭了贺鲁的结果。这一变化既反映出唐朝对这一地区统治的丧失和恢复，也反映出西突厥势力的消失。在这一过程之后，唐朝不仅恢复并强化了对西域的统治，而且扩大了帝国的统一局面。三、庭州复置后的第一任刺史和北庭都护府的设置与庭州的存废问题。经考证，显庆三年来济任庭州复置后的第一任刺史，《旧唐书·来济传》所记显庆“五年，徙庭州刺史”系显庆三年之误。据史籍记载，长安二年，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但是否由庭州设置，庭州存在与否，则有分歧。据作者考证，北庭都护府成立后，庭州似已罢废。何者为是，姑且存疑。

258　关于庭州的位置　〔日〕长泽和俊著　　陈俊谋译

（《西北史地》　1984年第3期）

本文考证了庭州的确切位置。庭州又叫别失八里，是丝绸之路北道的要冲，为唐代北庭都护府的所在地。关于它的位置，学者意见不一。有的说在乌鲁木齐，有的说在阜康县，有的说在奇台县，有的说在焉耆，有的说在吉木萨尔。其中，以清代徐松所考证的庭州位于吉木萨尔的说法最为有力。但日本的安部健夫博士在他所著的《西回鹘国史研究》一书中，又提出了庭州位于古城的说法，否定了庭州位于吉木萨尔。本文则持相反的意见，坚持庭州位于吉木萨尔的说法。安部健夫博士提出庭州位于古城的根据有四条：一、从古城出土了“金满县残碑”，二、古城营和唐墟也在古城，三、古城这个地名乃是“五城”之唐音的讹化而记载下来的形式，四、在中国史料中所见到的里数与现代地图上的里数是一致的。本文引用《西域图志》、《西域水道记》、《槐西杂志》、《阅微草堂笔记》等著作中的有关史料，对这四条根据逐一进行了考证，驳斥了安部健夫的观点，确认了庭州位于吉木萨尔的说法。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观点，本文又引用了

《通典·州郡典》、《新唐书·地理志》和《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纪》、《新疆识略》，以及中国考古学者在吉木萨尔等地进行考古调查的报告等史籍和资料，对吉木萨尔的景致、古地名和古迹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增加了论据。本文引用资料丰富，论据切实，论证有力，对确定庭州的地理位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259 唐蒲类沽名稽址

——庭州领县考之二　　薛宗正

（《新疆社会科学》 1984年第2期）

我国历史上的蒲类有二：一是汉之蒲类国，一是唐之蒲类县，二者同名异地。本文着重考察了作为庭州治下重镇的唐蒲类地望及名称由来。蒲类，本为海名，蒲类海即今巴里坤湖，位于天山北麓东段。《后汉书》载："蒲类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新疆建置志》称，巴里坤即蒲类海之音译，巴里乃蒲类之对音。海之突厥语本为"kul"，蒙古人不明"kul"原义，音译为坤，因于"巴里坤"后缀以"淖尔"（湖），转译为汉语即为巴里坤湖。蒲类本与匈奴异种，其国为匈奴所灭，分裂为三：阿恶、蒲类、蒲类后国。蒲类、阿恶等皆非族名，实乃地名。蒲类人因傍于蒲类海，遂以之名族。蒲类族实际上初系塞人，后因蒲类与月氏人所建车师后国相毗邻，并在汉魏之际为其所并，蒲类亦随之月氏化。蒲类海之名从突厥、蒙古系语言中无索解。作者认为"蒲类"之上古音值为"pale"，而波斯语有（pavi）一词，恰与此音相应，意为仙女、美丽，可知蒲类海乃美丽的湖、仙女湖之意。证诸此湖的景色，甚为确切。《西陲纪略》、清人丁粲《山市》均有所描述与咏赞。

蒲类之名在唐初作为庭州领县之一，成为与轮台齐名的天山北麓重镇。关于蒲类县的建置史，作者认为有两个重大问题宜加辨正：一是蒲类、蒲昌、金蒲、后庭四县名之区别，旧史所载大都十分混乱。作者论证了《新唐书》、《旧唐书·地理志》、《通典》、《元和郡县志》等记载之讹，取清人考证之说，认为蒲类县自建制以来一直为庭州领县，既不曾隶属西州，也不曾改用他名。二是数废、数置的历史沿革，综合各史料，该县与庭州同置于贞观十四年（640年），永徽二年（651年）陷于贺鲁，再置之年不明。开元元年（713年）又陷于默啜，开元四年（原为十四年疑误）复置。据此，此县似曾三次废而复置。日人松田寿男估为两次，而作者认定实为四次。第一次是自贞观十四年（640年）至永徽二年（651年）共十一年；第二次是显庆三年（658年）至龙朔二年（662年），尚不足五年；第三次是自龙朔三年(663年)至开元元年（713年）；第四次是自开元四年（716年）至贞元六年（790年）。这四次变化反映了唐朝天山北麓领疆经历了严竣的考验而逐步巩固起来的历史过程，其兴废变迁乃是唐朝西北边政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可看到此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变迁。

唐蒲类县的地望何在？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认为在木垒，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则以为当在奇台。作者在奇台工作二十一年，曾对大部古城遗址，同史书所载方位相勘，证实李光廷的蒲类——奇台说是正确的。

260　别失八里（五城）名义考实　　　　陈　戈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唐北庭都护府，宋高昌回鹘陪都北庭城和元代北庭都护府的故址均为今新疆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县城北约十二公里的后堡子古城。但北庭又名别失八里，即突厥语“五城”之意。此五城何所指，至今却未有一致看法。作者曾对北庭古城即后堡子古城及其附近地区进行过考古调查，本文是将实地考察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北庭古城的形制结构，就目前已有的调查材料可以肯定是由三部分组成，即主要的外城和内城及附属于外城的小羊马城。但有的同志认为北庭城是由五部分组成，即除外城、内城和羊马城外，还有一个西延城和一个内城中的小城。作为一个城址必须具有四面城墙和城门的理由，作者认为“西延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关于内城中的小城，亦未见有城门痕迹，目前也不能贸然断定。但不论是三部分还是五部分，其建筑时代则有不同，外城和羊马城为唐代所建，内城则是高昌回鹘时所建。这就是说，在唐代时北庭城只有两部分，即外城和羊马城。到高昌回鹘时，又修筑了一部分即内城，或三部分即内城，内城中的小城和内城南城墙外偏东处的小城（此二小城有待证实）。北庭城附近周围地区还有四座古城遗址：头宫古城、位于今吉木萨尔县城东约十公里的头宫附近，西北距北庭古城约二十公里。双岔河子古城，位于今吉木萨尔县城西约十二公里的双岔子河附近，东北距北庭古城约十六公里。奇台唐朝墩古城，位于今奇台县城附近，西北距北庭古城约三十三公里。泉子街古城，位于今吉木萨尔县城南约二十四公里的泉子街之南约六公里处，北距北庭古城约四十五公里。这几座古城在唐以前的汉代即已存在，其下限可能延续到蒙元时代。经作者考辨，这四座古城可能分别相当于历史上的莫贺城，汉钵镇城、蒲类城和石会汉戍，加上北庭古城，则这一带共有五个城镇。如再往前上溯至汉魏时代，吉木萨尔一带为车师后王部地，查诸史籍，车师后王部共有五座城镇，即金满城、候城、且固城、疏勒城和于赖城。这几座城镇与前进几座现存古城的关系，作者根据文献记载亦作了粗略的比定，可能有不当之处。但在汉唐时期，在北庭城附近周围百里之内，包括北庭城在内，共有五个城镇似无疑问。据此，作者认为“五城”（即别失八里）是因北庭城附近周围百里之内有五座城镇而得名，并非因北庭城本身是由五个部分组成而得名。“五城”之称早在唐代即已存在，而非回鹘西迁北庭之时或其后不久才始出现。唐以后的别失八里或泛指包括北庭城在内的较大范围，或专指北庭城本身，但均是最初的“五城之地”的延续称呼。

261　论别失八里　　　　孟凡人

（《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别失八里”是新疆东部天山北麓的名城，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在回鹘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研究唐代中期至高昌回鹘王国初期这段回鹘史中，更具有突出意义。本文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别失八里”课题研究中尚不清楚及有争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别失八里”的名称，突厥语的含义“别失”是五，“八里”是城，故汉译“五城”。作者论证了在公元840年回鹘西迁北庭之前，“五城”与“别失八里”并无必然联系，只是在西迁后两者才等同起来。因而“别失八里”之称实际上应起源于公元840年回鹘西迁北庭之时，或其后不久。别失八里城即原唐代的庭州（后改北庭）城，其位置在今吉木萨尔县城北十余公里的护堡子城遗址。此说已为绝大部分学者所公认。至于“别失八里”城的形制，根据考古调查，护堡子古城是由外城、外城北面的子城、两面的延城、内城、内城中的小城五个部分组成。其中外城、子城、延城建于唐代；内城（相当于皇城）、内城中的小城（相当于宫城）则建于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以后。由此可见，只有当回鹘时期在护堡子古城内建内城和小城后，别失八里与“五城”两者才名符其实的合而为一。

“别失八里”城在回鹘史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早在唐代以前之回纥先世，即后来成为回纥组成部分的一些部落就曾长期在博格达山以北一带（包括别失八里地区）活动过。入唐以后，婆闰参加了唐朝讨阿史那贺鲁的全部重要战役，助唐收复庭州。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以后，由于吐蕃占据河西，西域与内地隔绝，建中二年（781年），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假道回纥朝奏，此道即是历史上有名的“回纥路”。此路开通以后，回纥更加积极地向北庭一带渗透，并逐步控制了北庭。在公元789年至804年前后，回鹘与吐蕃进行激烈的争夺之战，最终占有北庭。公元840年漠北回鹘西迁至北庭，从此北庭又称为别失八里，并成为北庭回鹘的政治中心，实际上的都城。至迟在公元851年，回鹘又以别失八里为基地进据两州，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别失八里一度成为都城，后改为“陪都”。作者着重指出：第一“回纥路”之开，实际上成为漠北回鹘西迁时的一条“生命线”；第二北庭为挽救漠北回鹘的危亡和尔后回鹘的复兴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充分理由认为别失八里是高昌回鹘的发祥地。

262　弓月城和阿里麻里城方位考　　　孟凡人

（《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

弓月城在公元八、九世纪前后，相继为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突骑施等部的牙庭之一，也是唐代通往西突厥各部的要道。阿里麻里城是元代伊犁地区的中心，也是中国内地与中亚联系的枢纽，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两座古城究竟位于何处，中外学者意见不一，迄无定论。我国学者王国维提出两城同为一地之后，许多学者赞同此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关于弓月城方位，作者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西域水道记》等史籍文献的记载，考证了自庭州至弓月城的路线和山川名称，又从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弓月城当时为伊犁地区之中心。结合弓月城的地理环境来观察，至弓月城附近所经过之地区，只有现在的伊宁市所在地区符合史籍所载弓月城的条件。故弓月城当在伊宁市附近。作者在伊宁市周围进行了实际调查，发现在伊宁市东北26.2公里的“阿脱诺克”、即大金场遗址的吐鲁番吁孜古城，其时代、位置和地理环境等，均与文献记载之弓月城极为相似。据此，作者认为，吐鲁番吁孜古城遗址，很可能就是唐代的弓月城。关于阿力麻里城的

方位，作者依据《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有关记述、归纳了中外学者对城址的六种不同意见，逐一进行了分析，认为城址在塔勒奇城北五里破城子一说最为有力。并引证《西域水道记》中关于塔勒奇城和破城子的位置、地理环境等的记载，再对照《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有关地载，景况完全吻合。由此，作者认为破城子为元阿力麻里城遗址的可能性最大。故弓月城与阿力麻里城不是同一个地方。作者在文后还附有《弓月城、阿力麻里城位置示意图》，可供研究者参考。

263　弓月城及双河位置考　　易漫白

（《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

弓月城是唐代西突厥的一个牙帐，又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个重要城镇。过去不少学者对其位置作过考证，迄未定谳。本文作者根据吐鲁番考古发掘出土的《高昌县上安西都护谍》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论证了弓月城和双河位置以及处月部落居地等有关问题。

关于西突厥后期在弓月城建牙事，最早见于《新唐书·西突厥传》的乌质勒传。但探求弓月城地理位置最好的文献资料则是《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所注的碎叶路里程。据原文所载，自庭州西延城西行，经过十个守捉、五河流及一些县、城，“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然后再渡伊犁河，西行千余里至碎叶。庭州即今之吉木萨尔县北的破城子古城，石漆河当为今之精河。再从今天乌苏至精河沿途的戈壁滩、荒草原等情况看，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记“黄草泊、大漠、小碛”正相符合。过石漆河逾车岭就到了弓月城，因此探求弓月城位置，应先对车岭有个正确比定。作者据《西域水道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及清代阿桂奏疏所言等有关资料记载，认为唐代碎叶路的车岭，即指登努勒台山，过登努勒台山即达伊犁河上游。据此，“逾车岭，至弓月城”的碎叶路里程计算，弓月城在伊犁河上流则无疑义。至于弓月城的具体位置，在唐高宗时对西突厥阿史拉贺鲁与车薄的两次战争的史料中提供了线索。文章对此两次战争的性质、经过及地点除据各种史料进行考证研究外，并根据近年考古调查，在今伊宁市东北吐鲁番圩子发现大小金城两个唐代城址，南距雅马渡里数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基本相符，而且正当登努勒台山峡南下的路上，也与《地理志》碎叶路的情况相符，城北不远山峦起伏，为游牧民族游猎之所，与《地理志》所说的贺鲁行猎及奇袭情况相吻合，因此，可以肯定这就是金牙山和弓月城的所在。作者还认为今之雅马渡应为唐代之双河。

264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　　黄文弼

（《考古》1963年第10期）

伊犁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活跃之地。据记载最早有塞种人、月氏人，后有匈奴人、乌孙人，均以伊犁为驻足地。其后为突厥人，契丹人及蒙古人，尤其是西突厥的贺鲁部及突骑施部活动频繁，曾建立牙帐。及至蒙古察合台汗国时，伊犁—即阿力麻里，始终为其政治中心地之一。其具体地点，前人曾进行过调查研究，但各言其殊。1958

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新疆考古队，又到伊犁作了专门调查，发现古城和遗址多处。在多座古城中，尤其以吐鲁番吁子古城、霍城阿力麻里古城、绥定磨河古城、查布查尔海努克古城的发现颇为重要。本文是以阿力麻里古城为中心，兼涉及后两城，探讨了其地理位置及历史关系。近人对于阿力麻里古城位置每多臆测，或不知其所在。作者援引《长春真人西游记》，结合遗迹遗物考证，认为现在克干山南麓的古城遗址，名阿力麻里，本地人称为阿尔泰古城的，即长春所到之阿力麻里城。阿力麻里，在察合台汗国时，为其政治中心地之一。这里曾出土有金、银、铜钱币、石刻及陶器等。三枚银钱经专家鉴定为回历727年（即1327年）年所造，另一枚被定为十四世纪钱币。据布哇《贴木儿帝国》称：在回历721年（公元1321年），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二部，一为河中汗国，一为者台汗国，即蒙古汗国，君临现在准噶尔，同东西突厥斯坦一大部分，一直到回历771年（公元1370年），被贴木耳所灭。此钱币铸造正在汗国分裂以后，又出于阿力麻里城，可能是者台汗国遗物。三块石刻均刻有叙利亚文字，有的上刻十字架纹，显然为基督教徒死后所立之墓碑。而十四世纪阿力麻里城中有基督教徒传教确系事实。因此。亦可得到佐证。另外，旧城东北隅有一遗迹玛扎，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玛扎，是成吉思汗子察合台的后裔，传说玛扎是旧城中主人。这又是阿力麻里为者台汗国政治中心的佐证。阿力麻里城位置既定，则阿力麻里城南之磨河旧城亦即刘郁《西使记》中之赤木耳城，亦可应刃而解。本文还详述了察合台汗国有关阿力麻里的史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察合台汗国及者台汗国有关阿力麻里城的历史知识。

265　略论可汗浮图城　　　孟凡人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1期）

可汗浮图城是唐初天山北麓东部地区的一座名城，因其与许多重要历史事件有关，故为研究西域史和丝绸之路者所注目。作者考证了可汗浮图城的位置、名称、性质和存在的时间与作用。认为可汗浮图城的位置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护堡子古城，唐朝在此设庭州。这里还是高昌回鹘时期的别失八里城和唐代的北庭城。庭州一带是隋至唐初西突厥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特别是在东西突厥彻底分裂以后，以庭州为中心的天山北麓东部地区更显重要，成为东西突厥对抗的主要地区。可汗浮图城则是西突厥射匮可汗和统叶护可汗时设置的“北庭”。此后便成为西突厥在东部天山地区的重镇。可汗浮图城简称浮图城，“浮图”为城的本名，“可汗”则为表明城之性质的附加名词。关于“浮图”一称的来源，主要有两说：即因佛教的“浮图”得名说和“务涂”音转说。作者认为，西突厥并未信奉佛教，故因佛教的“浮图”得名说不能成立。因车师后王居务涂谷，可汗浮图城与务涂谷在同一地区，故因务涂而转讹为“浮图”是完全可能的。作者按照在西突厥射匮可汗和统叶护可汗设置北庭、阿史那社尔占据浮图城和欲谷设占据浮图城三个阶段，简要叙述了可汗浮图城的作用，认为这个城是作为西突厥对抗东突厥及唐朝的基地和前线的指挥中心而存在的。据新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西州图经残卷》等文献记载，可汗浮图城（即唐之庭州城），交通发达，向西有碎叶路可通伊犁河流域；向南越山有道与高昌相通；西南有“白水涧道”通高昌并可转至天山南部地

区；向东通伊吾与内地相连；东北通漠北地区。因此，可汗同浮图城不仅是天山以东最重要的门户，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是丝绸之路的要道。至于可汗浮图城其存在时间大约在公元611—612年以后不久直至公元640年。文章最后还论述了可汗浮图城在庭州城的城建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266　唐代西域裴罗将军城考　　　周连宽

（《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裴罗将军城，最早见于《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谓此城西四十里至碎叶城。清乾隆年间所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重提此城，云城位于碎叶川口，由左骁卫员外大将军回纥骨力裴罗者所建，故称裴罗将军城。关于这一点，本文作者认为缺乏充分证据，因为裴罗是突厥和回鹘两族均有的人名，且两族又都有“将军”之称。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一致认为唐代的裴罗将军城即后来的西辽都城八喇沙衮。对此，王国维有《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论证八喇沙衮即唐裴罗将军城的对音。本文作者通过具体分析认为不能仅凭对音决定回教作家和波斯作家所称的八喇沙衮即唐裴罗将军城的同名异译。必须指出，在辽金元史籍及其他元人著作中，西辽都城从来是以虎思斡儿朵及其同名异译骨斯讹鲁朵、谷则斡儿朵、古徐鬼（儿）国讹夷朵、古续儿国讹夷朵、虎思窝鲁朵、亦堵（六堵）等出现的，惟有大石林牙是以西辽始祖耶律大石之名及原有职衔以称其地的。只是在回教作家和波斯作家的著作中，西辽都城才以八喇沙衮之名出现。王国维以为“虎思斡儿朵者，契丹之新名，行于东方，八喇沙衮者，突厥之旧名，早行于东西二土”。这仍是以八喇沙衮即裴罗将军城的对音为前提的，对音之不尽可靠，则此种解说自亦不能成立。至于屠寄《蒙兀儿史记》谓《元史·地理志》中八里茫一地即八里沙之讹，而八里沙亦即八喇沙衮之省称。作者经考证分析认为，屠氏之说，不特方位不符，且两地读音亦相差很大，八里茫实为另一地名，而非八喇沙衮之讹。作者认为八喇沙衮并不是西辽都城虎思斡儿朵的旧有名称，而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回鹘牙帐的通称。有关回鹘族起源、其开国始祖白库可汗（不可罕或卜吉可罕）及回鹘族西迁的传说，汉文史籍和波斯作家的著述均有记载，除叙其西迁的原因不同外，最主要的差别是波斯作家所引碑文谓回鹘族从开国至西迁，其国主都是白库可汗；而汉文史籍则谓不可罕或卜吉可罕之后，传三十余君，乃至玉伦的厅、玉伦的厅之后又数传，然后西迁。此外，波斯作家的著述提及白库可汗西征土耳其斯坦，筑八喇沙衮城，汉文史籍则无此记载。鉴于回鹘自开国至西迁不可能始终都是一个白库可汗，作者认为白库可汗乃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回鹘可汗的通称，回鹘族屡经迁徙和征战，碑文中所谓筑八喇沙衮城也不可能专指一地而言，而是对回鹘可汗牙帐或行宫的通称。至十二世纪初，西辽建国西部土耳其斯坦，波斯作家又把八喇沙衮附会成西辽都城的专称，八喇沙衮一词源自波斯语言本身，由belad(城)和Sakin（住所）缀合而成，可能与突厥语Baligh（城）和蒙古语Balqasun有关。由于中外学者多误以西辽都城虎思斡儿朵为唐裴罗将军城，故其所论地点，都是根据有关西辽都城的史料，自然不适用于裴罗将军城。作者认为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载裴罗将军城西四十里至碎叶城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能正确

地考定唐时碎叶城所在地，即可推定裴罗将军城的位置。一些中西学者认为今苏联托克马克为唐时碎叶城，作者认为此说泥于八喇沙衮即裴罗将军城之说，前提有失，结论自误。作者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认为碎叶城处于热海与呾逻私城之间的中点，据中外学者的考证，呾逻私城即今塔剌斯河西岸的奥李阿塔城，今苏联地图称为江布尔。根据今苏联地图由热海至呾逻私城不同通路的测度，其中点约相当于今哈喇波尔第与哈林宁斯克之间或其附近地区，这就是唐代碎叶城的所在地点，其以东四十里处即为唐代裴罗将军城的位置。至于西辽都城虎思斡儿朵的具体地点，说者不一，作者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记载，逐一分析否定了前人的观点，认为西辽都城虎思斡儿朵应在今托克马克城西南靠近阿历山大山麓，即今苏联地图岳尔耶夫克与客厥第之间或其附近地区。

267 裴罗将军城考 王叔凯

（《社会科学》“甘肃”1982年第1期）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回鹘汗国为黠戛斯所破，部众四散。西迁的回鹘人之一部，与在八世纪中叶迁到楚河流域的葛逻禄人，在十世纪中叶共同建立了黑汗朝（哈喇汗朝），建都于八喇沙衮城。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十四《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一文中证明八喇沙衮城即裴罗将军城，已为人所共认。但裴罗将军城为何人何时所建，则莫衷一是。本文专就此问题作了考证。过去的说法大致有三种：一种认为是回纥可汗骨力裴罗所建，一种说法认为是Buku Khan所建，第三种说法认为是“西突厥故名”。第一说最早见于清代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然此说于史无证。从《新唐书·回鹘传》的有关记载得知骨力裴罗在位之时（744—747年），草原回纥汗国的疆域未达到阿尔泰山（金山）以西的地区，当然也就无所谓在那里的楚河流域建裴罗将军城了。而开Buku Khan建裴罗将军城说滥觞的为穆斯林作家伊本爱尔阿提尔，波斯学家术外尼从之。以后的多桑和布莱资脊奈法皆承其说。经作者考察，Buku Khan即牟羽可汗（Bögü Khan），而伊本爱尔阿提尔和术外尼等，关于牟羽可汗建裴罗将军城的说法，是以回纥人的一个传说为依据的。按牟羽可汗在位之时，在七河地区最为活跃的是突骑施及葛逻禄。回鹘的西征乃是在第七代可汗一怀信可汗(骨咄禄)在位期间（795—805年）进行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载保义可汗（808—821年）“……攻伐葛（逻）禄、吐蕃，搴旆斩馘或，追奔逐北，西至拨贺那国”。由此可见直到九世纪初，回鹘的势力方达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因此认为牟羽可汗时回纥的势力已达及楚河流域，并建裴罗将军城的说法，也无根据。王国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一文，谓裴罗将军城是“西突厥故名”。查《新唐书·突厥传》以天宝元年（724年）四月，玄宗册封的十姓可汗阿史那昕在俱兰城被突骑施莫贺达干所杀，为“西突厥遂亡”。而在“西突厥遂亡”之前，史籍中从未出现过裴罗将军城之名。因此，认为裴罗将军城是“西突厥故名”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云：“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十一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四十里至碎叶城，北有碎叶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这是关于裴罗将军城的最

早记载。裴罗将军城在碎叶城东仅四十里的地方，一般认为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的托克马克城一带。碎叶为西突厥斯坦的统治中心，因其地位重要，故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新唐书·焉耆传》云：“开元七年龙懒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自此之后，直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碎叶城一直为突骑施苏禄所居，到天宝七年（748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毁碎叶城，自此之后，碎叶就失去了重要作用。因此，大历（766—779年）后，徙居于楚河流域的葛逻禄人，在碎叶故城以东四十里的地方建立了裴罗将军城。由于此城名乃是在葛逻禄突厥人出现在楚河流域之后、回鹘人势力达及该地区之前的八世纪后期成书的《皇华四达记》中才出现的。因此，作者认为裴罗将军城是大历后迁徙到楚河流域的葛逻禄突厥人建立的。

268　中亚地名考略三则　　刘　伉

（《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

本文对中亚地区古代的三个地名进行了考订。《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77页图中的Alexandria Eschata（又作Alexandreschata），译为“亚历山大雷沙塔”；第79页上的Alexandria Eschata（Khojand），译为“亚历山大雷沙塔（科占德？）”，都有误。Alexandria Eschata是中亚的一个古城，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兵锋横扫中亚以后，于公元前329年在药杀水（今锡尔河）畔兴建起来的。城市的原名为希腊语，《地图集》中所引是它的英语音译。其中第二个成份Eschata中，Sch实际上是两个辅音字母，要分别发音。中文版汉译时把它们当成一个字母看待，并笼统地音译为“沙”是不对的。汉译名中的“雷”字也不妥当。因原词虽是“复合地名”的两个组成部分，但无法“连诵”也就无法结合发音，汉译时自应分别译出。因此，这一地名音译为“亚历山大·埃斯哈塔”，方与原地名的构词形式和读音接近。《地图集》第79页中在Alexandria Eschata下面附有“(Khojend)”字样，表示这个城市与后世出现的另一城市“Khojend”可能是一个地方。中文版把它直译为“科占德”也不对。这两者就是同一个地方。所谓Khojend，在我国史书中早有著录，曾用过多种译名，如俱战提、振提、苦盏、霍阐、忽颤、忽禅、忽缠等。因此在汉译这个历史地名时，应从我国古代典籍中找现成的译名，把它译为“苦盏”或“忽颤”。这样既从地名上揭示了我国与这个地方的历史联系，便于与我国的历史记载相印证，起互相参照的作用；还可补国外著述中的疏漏和含糊处。文章对一篇介绍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的文章，附有张骞通西域的示意图中，把大宛国的都城绘在锡尔河上游以南，并标明“贵山城”字样，表示异议。因贵山城一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早有所见。最初出现于《汉书·大宛传》，以后又迭见著录，如渴塞、可伞、柯散、可散等。这座古城的名称和位置，曾经中外学者多方论证，多数人认定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北缘上的卡散，就是古时的贵山城。现在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纳曼干州北部的卡散赛就是古代的卡散。它们都在锡尔河以北，距河30多公里。所以附图上把贵山城置于锡尔河以南是不对的。文章还考订了楚河名称的来历及含义。楚河是中亚的内陆河流，公元六世纪即见于我国典籍。最

初称碎叶川或碎叶水，后作细叶川，素叶水，均为同一河名的不同汉译。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中作吹没辇，《元密史》作垂河。“没辇”是蒙语“河”的音译。吹没辇意即吹河。吹、垂是同名异译，楚河是由俄语名转译，它们都和碎叶川的碎字有语音上的联系。碎为突厥语河（su）的音译。故河名本身即“水”、“河”之义。

亚历山大城、贵山城及碎叶河，都是丝绸之路上的名城大河，其地望所在，流向所经，译名演变等，都是丝路考古和丝路走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对《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某些错误之处作了订正，对丝绸之路研究多所裨益。

269　有价值的中亚地名文献　　〔苏〕哈萨诺夫著　牛汝辰译　林德懋校

（《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

本文介绍了《突厥语大词典》中一些地名的含义。这部词典是中亚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所著。他生于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卒于十一世纪八十年代，祖籍喀什噶里。他的祖父和父亲后来才迁居巴尔斯干和伊塞克湖附近的巴拉沙衮。马合木德在巴拉沙衮读书并受到教育，他懂得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及其文学。他特别勤奋地研究了突厥诸语言，所著《突厥语大词典》手稿，分三卷在伊斯坦布尔发表，一、二卷发表于1915年，第三卷发表于1917年。《词典》用阿拉伯文写成，单词、惯用语及谚语和诗歌都是古代突厥语，它的译文及注释是阿拉伯语。这部词典手稿的发现和出版，被称为是突厥学中的重大事件。《词典》中有一百来个王国和国家、城市和土尔克斯坦村落、山脉和山口、河流与湖泊的名称。对这些名称从词源学上加以解释，并记述了它的历史和地理情况。本文摘引了《词典》中部分地名和解释，并研究了《词典》中作了解释的有关水和土地的词语，同时探讨了中亚地理学中很重要的词“奥库兹”的含义。摘引的地名有：阿尔金山、额尔齐斯、喀什奥库孜、撒马尔罕、塔里木、塔什干等。有关水和土地的词语有：阿尔金，表示“下面的地方”、“下游的地方”、“洼地”等；阿尔特，高山的山口；布隆，表示山峦的隆起部分、山崖；干，具有“村庄”、“城市”、“地区”等意义；卡克，由雨水和雪水形成的湖泊；科鲁格，围起来防止外人侵入的草场；奥兹，山谷、河谷；奥祖克，山谷里流出来的沟、地下水。奥库兹一词的含义是“水、河流”，一般表示流水之意。文章还介绍了马合木德按照外部特征对山脉进行的分类，认为这对地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库兹塔格—阳光照不到的山，阿祖兹山—无法穿越的高山，巴克尔雷克山—铜山，苏甘卢格山—生长野葱的山。中亚是丝绸之路经过的重要地区，研究中亚地名是研究丝绸之路必不可少的课题，本文对此将有较大参考价值。

270　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　　张广达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1、2期）

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中亚史地不可缺少的汉文资料，如正史中的某些列传、政书、地理书、僧侣的行纪等，然后着重介绍了与中亚研究密切相关的出土文书和穆斯林地理著作以及其较好的刊本、录文。作者认为，已有的关于中亚史地的重要著作，绝大多数是搜罗或考释原始史料而形成的，其局限性很大，而依据从上个世纪末叶以来不断

发现、不断出土的文书来研究中亚史地，则既可补史、证史，又可去除疑难。其中《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详细记述了所至国的语言、服饰、物产、气候、宗教、山川、交通等，还记载了许多地区的兵马和王国臣属等情况，甚至还可见大小勃律和安西四镇的情况。此卷不仅填补了玄奘和悟空之间中、印陆路交通文献的空白，而且反映了开元年间突厥、大食、吐蕃和唐在中亚角逐的政治形势。《沙州图经》（即《沙州都督府图经》）和其他一些敦煌地志，展示了既有中亚绿洲文化特征，又保存丰富汉文化的沙州城的基本面貌，这对探讨中亚其他绿洲城市面貌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这些文书还反映了沙州及罗布泊地区的山川道路、烽驿古迹和人物宗教，甚至透露了阿姆、锡尔两河间粟特人东来的消息。《西州图经》记载了西州通往庭州、沙州、处月部和焉耆的十一条道路以及两所山窟和一区古塔。在敦煌石室出土的由藏文和于阗文书写的《钢和泰杂卷》包括三段记事发愿文，一个地名表，一个部族名表，最有价值的当属地名表。它记载了从于阗的媲摩城经沙、甘、凉等州到朔方；由伊、西二州到庭州及其以西的沿途地名。该表由于阗文书写，有助于探讨许多汉文、回鹘地名的语源。《迦湿弥罗行纪》记载了经小勃律到迦湿弥罗都城的沿途城镇名称、山川。桥梁、集市、寺庙，乃至一些动植物的分布，以及迦湿弥罗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和军队状况。《西天路竞》记载了从开封经灵、甘、沙等州，过龟兹、于阗、疏勒、迦湿弥罗等国而到印度的行程。此外，古藏文的《北方若干君王王统记》和粟特语的《国名表》等出土文书，对研究中亚史地也是至为珍贵的材料。关于穆斯林地理文献，作者认为，在九至十世纪阿拉伯地理学的古典时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地理学著作，这些著述吸收多方面的资料，记述行程、道里，收录疆域山川、人口物产及风土民俗，并很快定型，发展成按区域划分，以道路里程为脉胳的人文地理资料汇编。其中相当多的著作都以《道里与诸国志》、《诸国志》为名，后世概称《道里志》派著作。当时西部穆斯林世界有两个学派：伊拉克学派，袭用划分区域的体裁，分区域或按道路安排材料，铺叙事实；巴里黑学派，自绘舆图、自加注解，类似图经，图志。此派最大的贡献是《伊斯兰方舆图》。十世纪，穆斯林东部世界也出现了几部地理著作，如扎伊哈尼的《道里与诸国志》，佚名的《世界境域志》等。古典时期的穆斯林地理著作中保存了不少中亚行纪，颇有研究价值。其中塔米姆·本·巴赫尔·穆陶维伊的行纪提供了阿拉伯世界最早记录中亚陆路行程及中世纪中亚突厥各部的许多情况细节，并叙述了九姓古斯(回鹘)可汗的习俗及九姓古斯的都城。塞拉姆·塔尔朱曼等人的行纪告诉人们，中世纪中亚人东来，既可取陆路，这是主要的，亦可取海路，这并不稀见，这就防止了人们产生只取陆路的偏颇观念。阿卜·杜拉夫·米撒尔·本·穆合勒希勒·杨卜伊的两份《出使记》，第一份记载了公元941—943年间由布哈拉出发，游历中亚河中地区，突厥诸部及中国北部，而后经马来半岛，印度沿岸、塞吉斯坦、呼罗珊返国的行程；第二份报告的是行经北部和西部波斯的情况。行纪之外，古典阿拉伯地理文献对研究中亚的最大作用是验证汉文典籍和十一世纪下半叶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中的道路和城镇名称。参照穆斯林地理文献，还可以看到，当时中亚地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由几部（或三、或四）组成的整体，在此之内，各地政权的君主都被穆斯林世界视为中国之王。

271 安息与乌弋山离

——读《汉书·西域传》札记之一　　　孙毓棠

(《文史》1978年第5辑)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开丝绸之路始，直至东汉晚期，中国和中东、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各国—大夏、大月氏、安息、乌弋山离、罽宾、条支等，曾不断互派使节，进行着密切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史记》、《汉书》曾对这些国家的情况作了记载。多年来，中外研究中西关系史的学者们，曾利用这些记载。但在注释方面往往异说纷纭，不少谬误曲解之处。本文对《汉书·西域传》中有关安息与乌弋山离两国的记载，参诸国外古史，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情况，进行了论述和考订，对一些疑难之处作了解释，以期对中国这部分古代文献能获得较近实际的理解。中国古代关于安息的记载，首见于《史记·大宛传》，次见于《汉书·西域传》。其中所记安息，即中东古史上的帕提亚(Parthia)。"安息"是帕提亚国王阿赛西(Arsaces即Arsak)一词的音译。汉人误以王名为国名，故称安息。当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占据两河流域及伊朗高原的希腊人塞流息王朝已经衰弱。公元前255年，位于其东北边陲的巴克特利亚郡的郡守希腊人狄奥多特斯首先宣告独立，汉代中国称之为"大夏"。公元前250年至248年，位于大夏以西、里海东南的帕提亚郡，在帕提亚人阿赛西及其弟提里达特的率领下，举行了反对塞流息王朝统治的起义，建立了安息国。阿塞西王朝从此统治安息约400年。安息建国后，其疆域仅限于原来居住的帕提亚郡。至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一世(公元前171年至138年)时，东征西讨，使疆域扩展至东自大夏、身毒，西到幼发拉底河，北至里海，南至波斯湾。当张骞于公元前129年出使西域时，正是密司立对提一世的继承者弗拉特二世(公元前138年至128年)的末年，也是安息繁荣强盛的时期。在张骞从大月氏动身回国后不久，安息北边的塞人和马萨革泰人侵入安息东北部，杀弗拉特二世，占据了安息东部诸郡。至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二世(公元前124年至87年)即位后，派遣贵族苏林率大军东征，历时10年，方使塞人诸部落降服，收复了东部诸郡，安息再度强盛。正当此时，汉武帝的使臣于公元前115年首次到达安息，开始了两国货易与文化的交流。《汉书》说安息王治番兜城，《后汉书》说："安息国居和椟城"。城址究在何处，学者意见不一。本文认为当是黑卡同卑罗斯，应在今伊朗的丹凡或沙鲁德附近。文章又译细论述了乌弋山离国形成的过程和疆域情况以及都城名称。认为乌弋山离就是安息贵族苏林降服入侵安息东部塞人诸部落后，在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细亚两郡建立的军事独裁政权，其政治中心在塞斯坦。约在公元19年，乌弋山离国王冈兜发内斯曾使军队攻入南亚次大陆，把疆域扩展到印度河下游的身毒地区和旁遮普西部，向东北直达罽宾。大月氏贵霜王国兴起后，乌弋山离的很多土地被其吞噬，仅保有塞斯坦一带。至三世纪萨珊王朝的波斯兴起后，才被波斯所吞并。文章详细考证了乌弋山离的译音，认为乌弋山离的都城就是塞斯坦的首府亚历山大里亚普洛夫达西亚城(Alexandria—Prophthasia)，乌弋山离即是此城的汉文译音，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市。

272 条支

——读《汉书·西域传》札记之二　　　孙毓棠

（《文史》1979年第6辑）

古代条支的地望问题，百余年来中外史学界异说纷纭，至今尚未解决。最初法国学者认为是埃及，以后李希霍芬、玉尔等人皆认为是里海沿岸某地，嗣后德经、藤田丰八等人又认为是古波斯南部法尔斯（Fars）地方，在今布席尔港（Bushire）左近，夏德则认为在伽尔底湖（Chaldean Lake）边的古代的席拉（Hira）城，而宫崎市定认为是叙利亚的(Seleucia)城之音译。作者认为自张骞出使西域后，及至汉魏三百年间，中国对西方的认识逐步丰富，从《史记·大宛传》两《汉书·西域传》及《三国志·魏志》所记条支地望也逐渐在变化。特别是汉和帝永元9年（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至条支而返的情况，认为上述关于条支地望之说，均不正确。唯沙畹与白鸟库吉认为条支是古代的梅塞—喀拉塞(Mesene—Characene)。喀拉塞人在罗马皇帝图拉真朝降附于安息。作者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唯他们认为条支系波斯文德什特(Desht)和阿拉伯语Gezire之译音，则颇为牵强。并从历史上考证了条支的地望，认为条支即古代波斯湾头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与东欧历厄斯三条河流汇集之处，交通便利的商品集散地喀拉塞。公元前四世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时曾占领此地，并建立城市。后此城为洪水所毁。塞流息王朝时，安条克斯四世于公元前166年亲到此地，重建新城，改名为Antiochia。公元130年，一个阿拉伯酋长占领该地，自立为王，后为安息征服，成为安息属国。故条支二字即Antiochia省去首尾字母之缩译。喀拉塞城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在公元前后二、三百年，希腊、罗马、伽尔底、阿拉伯、波斯、东非乃至印度商舶贾人云集于此。当时它在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仅次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273 中亚条支、条支海考　　　苏北海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3期）

对于条支、条支海的考证，大都根据《史记》及前后《汉书》的记载，把它定在伊朗西南部及伊拉克一带临波斯湾地区。但本文作者认为条支、条支海都在唐朝的西域版图内，即著名的巴尔喀什湖及周围地区。唐代诗人李白曾有"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的名句。而这一名句是与"去年战，桑乾原；今年战，葱河道"联起来写的。公元743年唐在桑乾河地区平定了奚族内迁首领怒皆的叛乱，744年唐又在西域平定了突骑施莫贺达干之乱，这正是"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的历史背景。所以这个条支海是巴尔喀什湖无疑。而把条支海放到波斯湾既不符合历史，也有违于诗意。《北史·铁勒传》记载，"得嶷海"附近活动着"三素咽篾"即三姓咽面等部。有人以为这里的得嶷海是指里海，但本文作者认为当时三姓咽面在额敏河、阿拉湖、阿拉套山一带，位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而非里海附近。故而得嶷海应为巴尔喀什湖。据两唐书

记载，西突厥最初据有乌孙故地西至雷翥海，或云雷翥海为咸海。而两汉时乌孙的西境是巴尔喀什湖，在此以南至咸海一带乃是康居部落的游牧地，无疑雷翥海亦即巴尔喀什湖，而非咸海。当然西突厥极盛时的疆土直至里海。此外，唐朝对巴尔喀什湖的别称还有夷播海、阙哲天吉斯等，天吉斯即湖、海之意。这里，“得嶷”、“雷翥”、“夷播”、“阙哲”以及后来的“瑶池”都是“条支”的同音异译。都源自突阙语，意即甜。可见，在突阙语系的民族中巴尔喀什湖以甜水海之名最为著称和常用。此外，巴尔喀什湖还有库克恰，腾吉思（兰色湖）和铁林库尔（神湖）等不同名称。由于位于干旱的西北和广大的草原区域，一般把泉水相汇，聚而成湖的都称之为海子。约定俗成，因而巴尔喀什湖便得名“条支海”、“得嶷海”、“雷翥海”等。自隋唐到元明时代该湖一直称为条支海，只是在明末清初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占有该湖后，才被称为巴勒喀什淖尔。这个中亚著名的大湖在公元前西汉时期就归入我国版图，只是近代才被沙俄所强占。在唐代曾先后设立了两个瑶池都督府。“瑶池”亦为条支的同音异译，只是注意到了汉名语意的含蓄和新颖。第一个瑶池都督府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任命原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为都督后设置的，当时巴尔喀什湖正位于西突厥的要冲之地，取名瑶池也就意味着以此作为统一西突厥各部的号召。到了圣历中（698—700年）武则天又授突骑施首领乌质勒为瑶池都督，设衙于碎叶，看来第一次阿史那贺鲁所设瑶池都督府治莫贺城离碎叶也不会过远。此外，唐朝在平定西突厥后，还曾设条支都督府，有人以为应在巴尔喀什湖附近。但其时统辖今哈萨克草原的北庭大都护府下设的二十三个都督府中,并无条支都督府之名,只是在统辖锡尔河流域以南地区的安西大都护府所设的十六个都督府中才有条支都督府之名。是以条支都督府并不是设在巴尔喀什湖及哈萨克草原，而是设在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地区即今喀布尔以南加慈尼一带，由此可见条支海和条支都督府不能混为一谈。

274 条支、黎轩、大秦和有关的西域地理 余太山

（《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

本文根据史籍文献的有关记载，考证了条支、黎轩、大秦的地望。这是史学界长期讨论而未取得一致意见的一个问题。问题的核心是汉魏时代的大秦究竟在那里？迄今所持不同意见大致有五：一为意大利，二为马其顿，三为叙利亚，四为埃及，五为阿拉比亚。与大秦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条支和黎轩。对条支意见不同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汉魏史籍中条支所临“西海”一词的解释不同，计有三种看法：一指里海，二指波斯湾，三指地中海。黎轩则因史书有“大秦国一名黎轩”之记载，故论者多结合大秦问题进行考虑。文章首先论述了公元前129年至128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中亚、西亚和有关地区的历史情况。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去世后，帝国分裂为三个独立的王国：位于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位于叙利亚的塞琉古王国和安提柯王国。张骞出使西域时，安提柯王国已亡，帕提亚帝国称雄中亚。其东南为身毒，北有奄蔡、康居和乌孙，南为大夏。大月氏占领阿姆河上游，其东北为大宛。接着，文章详细分析了《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等史籍中与条支、黎轩、

大秦直接有关的记载，对有关地区的地名、方位和相互关系作了细致的考证和译释，特别对安息与条支、黎轩、大秦的方位与关系，对《魏略·西戎传》所载大秦地理的主要部分，考证与注释尤详。并得出以下结论：（1）《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的“条支”，指塞琉古朝叙利亚王国。《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的条支”，主要指曾为该王国统治的叙利亚地区。（2）《史记·大宛列传》的“黎轩”和《汉书·西域传》的“犁靬”，指托勒密朝埃及王国。《后汉书·西域传》的“犁鞬”和《魏略·西戎传》的“犁轩”，是“大秦”的同义词。（3）《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的“大秦”，指罗马帝国本土。本文引证史料丰富，考证缜密，注释周详，为研究丝绸之路西段的史地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275　唐代“条支”地望质疑　　　朱　方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

本文对郭沫若同志所著《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所考释的唐代“条支”地望问题提出质疑。郭老引述李阳冰《草堂集序》中所述李白世家“谪居条支”及李白的《战城南》诗认为：“诗中的‘条支’，与葱河、天山等连文，表示其地望相接，必指唐代条支都督府的条支，而非远在阿拉伯的大食国。此唐代条支，……自当包含碎叶。是则所谓‘条支海’或条支都督府所辖之‘海’，如非伊塞克湖（热海），当即巴尔喀什湖。因而条支都督府辖地即今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一带，是毫无疑问的。“作者认为这个结论值得商榷。特提出对“条支”的地望与“碎叶”关系的看法。

一、唐代条支都督府的辖地，作者在引证了《旧唐书·地理志三》、《史记·大宛传》、《后汉书·西域传》、以及《魏书·西域传》、《隋书·西域传》中的有关记载后，认为应当在汉魏时“条支国”的旧境之内，不会越过天山以北。《旧唐书·地理志三》西域十六都督州府：“条支都督府，于诃达罗支国所治伏宝瑟颠城置，以其王领之，仍于其部分置八州。“条支都督府既然由诃达罗支国其王领之，显然是旧境之地。中外学者一般认为唐志的伏宝瑟颠城即鹤悉那城，在今阿富汗喀布尔西南加兹尼（Ghazni）。其辖八州大致在今阿富汗境内和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境壤，其地位极在南边，不会越过天山以北，与今伊塞克湖，以及更北的巴尔喀什湖相去甚远。

二、郭老考证“碎叶在唐代有两处，即中亚碎叶与焉耆碎叶。焉耆碎叶，其城为王方翼所筑”。碎叶城的位置在哪儿，究竟是一处或两处，需要辨证。作者在研究了当时亲历其境的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和当时曾任鸿胪卿的贾耽的叙述（见《新唐书·地理志·安西下》）后，认为碎叶城的位置，就在今苏联境内伊塞克湖西北的托克马克附近。也就是仪凤二年（公元678年）裴行俭计擒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匐的叛乱“立碑碎叶而还”（见《新唐书·裴行俭传》；即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裴行俭的副手“兼检校定西都护”王方翼就归城增筑的碎叶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市（见《旧唐书·王方翼传》）。至于《新唐书·地理志》：“焉耆都督府”下有碎叶城，这是修书人记载的错误，不能成立。

三、郭老称：“条支是一个区域更广大的大专名，碎叶是一个城镇的小专名，碎叶

是属于条支的。"作者认为从地望看，碎叶位天山以北，条支都督府位天山以南极远，不是飞地，何以隶属？又按唐制，军镇是军事机构，主管官则是镇将或镇守使，统属国防军；都督府是地方政权机构，都督是本部族的首领，皆为世袭。把碎叶城镇作为条支都督府的隶属关系，一是地望不同，二是职掌不同，两者不可能隶属。

至于"条支海"地名，查汉唐书志从未见载，显然是一个乌有的名称而已。

276 《魏书》本纪中所见印巴次大陆诸国改实 陈连庆

（《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自汉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渐盛；至北魏，商人、使节、僧侣不绝于道，中外交往极为频繁。按查《魏书》本纪，有使朝献的国名，有一百个左右。可惜因战乱连绵，典籍散失，史料不全，《魏书·西域传》中挂一漏十，且有一国数传者。如所载印巴次大陆诸国，仅有六个，而小羝与乾陀又实为一国。作者为使当年盛极一时的友好往来不至湮灭，也使曾占有一定时、空的诸国重晓于世，据《魏书》本纪中所见国名，经查证核对，就中亚、西亚部分考出二十八国；印巴次大陆部分考出二十国，并对考出各国的地理位置、幅员大小、宗教信仰、自然环境和物产国情，作了轮廓介绍。如西印度诸中有辛豆国，《魏书·世宗记》有"永平二年(509)正月丁亥……辛豆……诸国遣使来献"的记载。按辛豆古有各种译名，《广志》、《梁书·中天竺传》、《水经注》、《那先比丘经》、《大唐西域记》分别译为新陶、新头、辛头、信他、信度、诸译名均为Sindhu的对音。其国因水得名。Sindhu河即印度河。玄奘访问此地时，有伽兰数百，僧徒万余人。《大唐西域记》载，其地属西天竺，慧超《往五天竺传》作西天国。当慧访问时，其地"被大实（即大食）来侵，半国已损"，佛教陵夷，遂为伊斯教所代替。通过中外零星资料，大致可以考见此国之兴衰概况。由于北魏崇佛，故辛豆频繁通使，可知当时佛教之兴盛。

辛豆国都，阿拉伯文献作Alor，学术界咸认为故地在今巴基斯坦苏库尔地区之阿洛尔（Alor）。据云此城为亚历山大所建，其历史可谓悠久。《魏书》成书较《大唐西域记》早一百多年，其资料价值更应重视。本文考订，不啻是对《魏书·西域传》的补正；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唐以前丝绸之路的盛况。

277 唆里迷考 耿世民 张广达

（《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本文考证了唆里迷一名的方位问题。唆里迷是见于汉籍和突厥、阿拉伯文献中的我国新疆境内的古地名。这一地名的被提出，是与讨论新疆的一种古代语言——吐火罗语的定名问题密切相关的。但关于唆里迷的方位迄今仍未获得明确的解决。文章对学术界提出唆里迷一名的经过、前人对唆里迷研究的成果论述较详。1904至1907年间，由德国人勒柯克等人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考察中，发现了一种用不知名语言写成的《弥勒会见剧本》和内容与之相应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经》，激起了人们研究这种语言的兴趣。柏林的突厥语学家缪勒，根据《弥勒会见经》的一则跋文，把这种不知名的语言定名为

吐火罗语。德国梵语学家西格与西格林在解读这种语言时，也赞同缪勒的命名。随着对这种语言研究工作的进展，一些学者不断对这一定名是否恰当提出疑问。缪勒、西格也继续撰文申述己见。1918年，缪勒又发表了《Toxri与贵霜》一篇论文，文中刊布了三则回鹘语跋文，其中的两则跋文第一次使唆里迷的名字重见于世。此后，羽田亨考定唆里迷即《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中提及的唆里迷国，并推断其地点当在元代别失八里附近，距今乌鲁木齐不远。伯希和完全赞同羽田亨的见解。不久，英国的伊兰语学家贝利从和阗语文献中、恒宁从粟特语文献中，均检出了唆里迷这个地名。恒宁还将唆里迷比定为焉耆。1959年我国在新疆哈密发现了回鹘文《弥勒会见经》序文。本文据此考证，认为唆里迷当为焉耆或在焉耆附近。这样在历史上，焉耆不仅先后叫做偽夷、阿耆尼（唐以前）、恰里斯（明末清初）、喀喇沙尔（清以后到现在），而且在公元十到十三世纪时还叫做唆里迷。

278　从大宛到浩罕的疆域问题　　　苏北海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2期）

本文是对中亚浩罕地区历代归属问题的一篇论证文章。文中所说的大宛到浩罕的领土范围，是指费尔干纳盆地及其塔什干地区在内的疆域。按《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所载，大宛国的位置即今中亚细亚费尔干纳盆地，包括安集延及浩罕等地，其疆域直至塔什干。作者援引自汉至清朝的历代确凿史实，证明浩罕地区两千多年以来，是中外公认的中国领土。只是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清王朝积弱腐败，列强帝国纷纷入侵，于是，沙俄在1854年侵占中国阿拉木图后，即派大批殖民军急速向浩罕地区推进；浩罕地区人民曾与之进行了多年的英勇反抗斗争；直到1867年，才被沙俄凭借武力镇压侵吞了去。

文章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曹魏和西晋都在西域设有戊己校尉及西域长史治理。太康六年，大宛曾遣使贡汗血马。前凉为符坚破灭后，符坚就积极经营西域，大宛曾献天马千里驹等五百余种。到北魏，势力日扩，一统西域。洛那国，故大宛国也，太和三年献汗血马，自此每使相贡。这些都是明确的历史记载。可是，1966年以前出版的各种历史地图，都未把西域绘入魏、晋、南北朝的疆域之内，个别地图至多只绘入了哈密、罗布泊一带地区；1975年出版的八大册《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第三、四册有关西域部分，未把大宛地区绘入魏、晋、南北朝的疆域之内，显然与历史不符。

文章还指出，自十世纪至十二世纪中叶，在中国的中亚境内建立的以回纥族为首的喀喇汗朝，在中亚地区给中国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它的疆域辖有阿母河、锡尔河两河中间的河中地区，北面包括楚河流域，势力直达伊犁河及巴尔喀什湖，东接沙州，南达喀拉昆仑山。论疆域之广、统治人口之多，远在西夏之上，统治时间之长，也与西夏相仿。不仅在中亚史中占重要地位，在中国历史上也必须和辽、金、西夏政权一样地视作割据王朝。喀喇汗朝的回鹘人都自称是中国人；喀喇汗朝的疆土是中国的疆土；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可是，迄今所有中国通史未列喀喇汗朝，是不符于通史之名的。在喀北汗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辽，其疆域基本包括了今天的新疆，在中亚方面则包括有：喇

至巴尔喀什湖，西及咸海，西南界阿母河。所以，也应是中国史上的一个割据政权。

279　浩罕属于古代中国　　　　屈振华　秦江

（《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

古代浩罕位于葱岭之西，地当丝绸之路西段之要冲。对它的归属问题，史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浩罕在被沙皇侵吞之前属于中国；另一种认为在其被沙俄侵吞之前是一个独立国家。本文同意前一种意见，并引用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考证和论述。一、浩罕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中亚细亚纳林河以南，帕米尔以北，费尔干那盆地的广大地区。二、浩罕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汉代称大宛，元魏称破洛那，唐代称宁远，清代称浩罕（霍罕）。汉代属西域都护府管辖。晋和元魏之际，浩罕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加紧密，经常遣使朝贡。唐代初年，浩罕地区为拔汗那国，唐朝政府在费尔干那设立休循都督府，归安西都护府管辖。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国王阿悉烂达干帮助唐朝平定了吐火仙，被封为奉化王，改其国号为宁远。唐玄宗并将宗室女和义公主嫁给阿悉烂达干为妻。至宋代，辽被金灭亡后，到西域建立了西辽帝国，与宋、西夏、金、蒙古为同期並存的政权，浩罕即在西辽境内。元代设立四大汗国，浩罕又归察合台汗国管辖。三、清代出现的浩罕问题。清朝前期浩罕仍然是中国的领土，只是到1884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之后，才被沙俄从清政府手中抢去。俄罗斯帝国的费尔干那省，就是中国的浩罕。四、结论。浩罕在历史上确曾建立过自己的政权，特别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建立了浩罕汗国之后，发展到它的鼎盛时代，并多次侵犯清政府管辖下的色勒库尔地区。但这是我们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间的互相侵犯，它的领土仍然属于中国的版图。因此，浩罕虽曾建立过割据政权，但其所管辖地区是古代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丝路交通

280　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　　裴文中

（《边政公论》1948年第7卷第4期）

从历史上看，中西文化交流始自汉代，东西民族交通，也始于汉代。从此以后，东西文化彼此交流，互相影响，迅速发展。作者认为一种文化的昌盛或衰灭，多半由于与其他文化接触的关系。因之，若论中国古代文化之兴起与衰微，不能不涉及它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也就不能不涉及东西交通问题。从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其目的在于联络月氏，共击匈奴，当时所走的路是河西走廊，否则不会被匈奴所执。但他回来时，为什么要选择祁连山以南羌人所居之地呢？一方面避免再被匈奴捉住，另方面他也可能知道祁连山南也有通道。自张骞以后，武帝知道了西方也有较发达的民族和丰富的物质文明，于是提倡通商，为此目的，整备军事，出击匈奴。由于河西走廊可能易于防守和保护商旅，遂开辟了这条路线，并从这条路线上输出了中国丝及丝织物，通过新疆南部至安息，更进至罗马。从此以后，西方及印度等地许多东西，如农业、物产以至宗教艺术等输入中国。自汉至唐，中西交往一直沿河西走廊旧道，宋朝以后，国势衰弱，这条路线也日渐衰落。为什么会造成这一结果呢？作者认为自张骞以后，这条线路选择不当，因而国势一衰，就不能维持。历史时期如此，史前时期又是怎样？作者相信东西方的交通，决不是由张骞开始，汉以前就有。因为史前时期的文化，东西两方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彩陶，必定是东西文化两相交流的结果。至于史前时期的交通，作者认为由祁连山南，沿湟水而上至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而至南疆，这是主要之道。因为湟水两旁地广肥沃，宜于人类居住，况湟河河谷，文化发达，由史前至汉，皆为人类活动盛甚的地方，史前遗物，到处皆是，与渭河及洮河流域相类似。青海湖以东地区，实等于甘肃的一部分，仰韶、马厂、辛甸、寺洼及沙井各史前时代，人类遗址遗物甚多。汉时的废城，现时所知者不少。由此证明，这一地区为汉代的重要区域，史前时期至汉代，实为中原最西之边陲，为中原民族势力所达到的地区。由此至南疆，再至中亚，仅有柴达木盆地之隔，但距离则较河西走廊为近。作者推测，汉以前的东西交通，是以此为重要路线，或以此为前进基地。故汉以前的文化交通路线，似在湟水流域，而不在河西走廊。最后，作者还绘有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一图，附于本文之后，对研究史前时期的东西交通，颇有帮助。

281 西北交通之史的研究 姚玄华

（《新亚细亚》1933年第6卷第5期）

本文首先概述上古时代中国与西域交通，并从玉的生产与输出，证明古代中西交通问题。玉石产于昆仑山下之于阗，此地之玉东输中国本土，西输西亚诸国，从巴比仑、叙利亚发现古器物所用之玉，以及欧州各国发现石器时代所用之玉皆当为于阗的产物。由此证明，上古时代我国即与西域有交通往来。至于丝绢传入西方，犹太希腊古代史上均有其国人赞美之记载，但自张骞通西域后，我国始有正式记载。其主要路线，则自黄河上游，出甘肃玉门、阳关、经流沙，沿昆仑山之北麓而至于阗，或沿天山南麓而至疏勒，越葱岭而至大宛、大夏，此为上古西戎入侵之路，亦即玉、丝输出之路。直至张骞通西域后，频繁的商贾往来，专由此路，并历千余年始见衰落。作者在本文中，除将西域之南北二道及其所经之具体地名各有所研究外，又将葱岭以西之诸道及其分支路线，作了论述，对张骞、李广利、陈汤、宋云、法显、玄奘等人，赴西域所经之地，都一一进行了考证。

282 西域交通之历史的观察 周谷城

（《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11期）

自汉唐以来，葱岭东西附近之地，常为东西国际贸易市场，因此也成为中国、希腊、印度三大系文化交汇之所。今虽大半为废墟，但就历史记载看，曾发生过重要作用。本文重点在于证实西域之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在中西文化上的贡献。中西交通路线，除历代中国史籍记载外，公元二世纪，西方地理学家拖勒米在其所著《地理》一书中，亦有记载。拖勒米是从他的前辈马利诸士手里得到古代中西陆路交通要道的知识，这些知识，皆由马其顿商人的许多报告中而来，且颇为重要而详尽。我国也有此种记载。隋炀帝时，裴矩掌管中西通商事宜，亦常由商人报告中，得到关于西域诸国的知识，故在《西域图记序》中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而且对三路所经之国，均有详细记载。中国和西方之记载，多出自商贾之报告，后经斯坦因实地考察，而予以证实。商路开拓后，中国与西域贸易日益繁荣，西方商品输入中国者，种类繁多，这从各国所贡之方物，可知其梗概；而中国输往西方之货物，则以丝及丝织物为主，这从考古发掘中得以证明。随着贸易之后，便有文化上之交流，一是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中国使节足迹抵达波斯湾，中国丝物经安息直达地中海，“丝织的中国”美名盛传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心，因而中国文化随之来到，并受其影响。二是希腊文化因素之传入中国，主要经印度之犍陀罗，随佛教而入中国。三是波斯文化因素之传入中国，主要反映在中国丝织物采取波斯图案之上。四是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印度佛教徒沿商路来华布教，中国僧侣沿商路赴印求法，于是中国思想大受影响。故中西商路开拓后，葱岭东西之地，成为东西文化交汇之所，其影响至深且广。最后，作者根据古代中西陆路交通之历史，提出了今后发展交通之见解。

283　历代西疆路程简疏　　岑仲勉

（《西北论坛》1948年第1卷第6期）

本文认为《汉书·西域传》所举之两道，即南道和北道，都系天山以南之道路，而对天山以北之道，《西域传》究取何道，并未提及。作者根据《西州图经》考证，西州通向庭州者有花谷、移摩、萨捍、突波、乌骨、他地六道，其移摩、萨捍、突波三道，人牛车马可通，都由蒲昌县西北合柳谷向庭州。若哈密至巴里坤之道，作者疑是元代初期始通，并非汉代之熟路。《魏略》记新疆之道有三，即南道、中道、西道。《魏略》之西道，《通典》作新道，因两汉之际，新辟者为五船一道，是知《魏略》之新道，即《后汉书》北通伊吾，又通高昌之道。又据《隋书》、裴炬《西域图记序》分析，裴炬所记之中道，即《魏略》之新道，裴炬之南道，仍为《魏略》之南道。

另外，作者对《新唐书·地理志》的错误，进行了考疏。认为欧阳修文字简洁通畅，为后世人所称赞，然《地理志》文，过求简练，易滋误会。欧阳修《地理志》引贾耽原来记里时，往往中间略去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里记，将一百二十里或简为二十里，将二百五十里或简为百五十里，其总里数又不记叙，确犯了从略之弊。况从略又无一定之标准，最易使后世读者误解。

清季以来，西疆路程散见于中外书中者，则不胜枚举，但仍不外裴炬所记之南、中、北三道。至于丁谦的《汉书西域传考证》错误之处，作者也予以指正。按丁氏所谓之第一道，即《汉书、西域传》南道之分支，唐前赴印求法之僧人，率取此道。丁氏所谓第三道，实《汉书·西域传》南道之正道，但由莎车（塞勒库勒）赴大月氏系西南行。非西北行。丁氏谓："前许侍郎景澄著《西北边地考证》，谓汉时天山南道，本由罗布淖尔西达和田，自唐以后，其道遂湮，与余说正合"。但是元代时此路仍通行，马可波罗东来，亦从此道。明洪熙初，李英讨曲先亦从此道，故唐以后，南道仍通行。由此推之，乾隆以前，想此路尚为商旅利用，唯缺乏记载，遂寂寞无闻，并非自唐以后即已湮没。

284　从《穆天子传》和西罗多德《历史》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西交通　　莫任南

（《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

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世称"凿空"，以为是中西丝绸贸易的"开端"。其实在先秦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早已开始，各地考古发掘出的古代文物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先秦著作《穆天子传》和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等文献，对中西交往也有反映。本文就《穆天子传》和《历史》中的有关记载，参照现代学者的著作和《史记》、《后汉书》、《魏略》等史籍中的有关记述，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西交通情况，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时代，过去有人认为是伪书，有的认为是小说，未敢尽信。本文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此书的内容是记述周穆王西游的行程及其见闻，有行程日期、方向、地名、里距以及部落、物产等事实，叙述明瞭，井

然有序，除小部分具有浪漫色彩外，并无荒诞不经之词。对沿途各部落首领的贡献和周穆王的赐赠，从物品到数量，记载尤详。它所反映的实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商队西行贸易情况，只不过作者假托那流传已久的周穆王游巡故事罢了。关于穆天子西行路线及所经地点，学者意见不一，颇多争议，岑仲勉先生考订大体为：自长安出发，过秦、汉之长水（漳水），历华亭西北（钘山）、泾水正流（滹沱）、固原南部（隃）、武威以东地区（焉居）、武威、张掖地区（禺知）到达张掖河流域（阳纡）、居延附近(积石)。周穆王在这里稍事休息，即折向西行，进入新疆，至塔里木河流域，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于阗、叶尔羌，越葱岭，经塔什干，进入中亚西王母之邦，再北行到吉尔吉斯大草原，即为终点。周穆王进入新疆，越葱岭到中亚的这一段路线，就是以后“丝绸之路”的南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商旅行走。对周穆王会见的西王母在何处？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西王母之邦当在锡尔河中上游一带，并提出三条论据：一、公元前六世纪时，中亚游牧部落多有女王，西王母即其中之一；二、锡尔河中上游的地理方位与史籍文献的记载相吻合；三、对西王母的描写反映出游牧民族的某些生活情景。文章还从周穆王沿途与各部落首领交换的产品及其数量，以及见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论证了丝绸之路的存在。如周穆王赐赠给各部落首领的物品，计有丝绢、黄金、贝带、车子、肉桂、生姜等；游牧民族献给周穆王的物品有良马、牛羊、骆驼、玉器、毛皮等。这与两汉时期中原同西域的商品交换品种基本上相同，数量也约略相当。至于中途打猎缺水时饮马血止渴、携归植物种子、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时彼此和唱等，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一般事实。文章还对希罗多德《历史》中所记西方商人东来的路线、居民、交换物品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指出《历史》所记斯吉泰商人从顿河口一市场出发，绕里海、咸海之北，横过中亚，来到阿尔泰山地区，走的正是“丝绸之路”北道西段的路线。作者认为汉代的“丝绸之路”决不会突然出现，而是汉之前若干世纪中东来西往的各国商队走出来的。这说明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之路”早已出现了。

285　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

——《穆天子传》的研究　　　钱伯泉

（《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3期）

《穆天子传》是从战国时代魏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籍之一。作者何人，迄今不详。此书内容对于了解古代中西交往情况，特别是对丝绸之路的研究，确是一份重要史料，并具有一定文学价值。中外学者研究者很多，但迄今尚无权威之说。

本文作者通过研究考证，提出了两点新见解：一是关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和价值，作者否定了胡应麟、日人小川琢治、丁谦等人认为《穆天子传》是信史之说。文中列举了四条持之有据，言之有理的理由，证明历史上就无穆王西征大昆仑之事。《穆天子传》实际上是战国时期魏国文士虚构的小说故事。其体例很象旅行日记，无论行程日期、道路方向、山川地理、风土人情，都记述明白。其中有不少记载与我国第一部地理书《山海经》相合。行文风格俨然出于史家之手，确切、真实而又生动。所以，作者认为《穆天子传》虽是一部虚构小说，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中西交通密切、丝绸贸易

的兴旺景象。

二是从《穆天子传》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西交通和物资交流就很兴盛。作者认为传中的"穆王"实际上是一个战国时期中原商人的"模特儿"。穆王西征的路线，可谓中西交流的"南路"称为"羌中之路"稍北的北路。穆王东归之路则为兽中之路两汉开通西域，此路虽与南道并重，但对此后的北魏、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辽、金及西夏，在中西交通和丝绸贸易上，地位更其重要。文中详细介绍了穆王西游的道路和中西物资交流情况（即各部落的贡品和穆王的赏赐物品）。

此外，新疆地区出土的有关文物，也充分证明春秋战国时期，新疆和内地的交通十分频繁，物资交流非常兴旺。从而可以肯定，早在张骞之前好几百年，中西交通的南北两路即已畅行无阻。所谓"张骞凿空"，只是司马迁的观点。真正开辟这两条道路的是中国上古陆续西迁的少数民族人民，还有东来西往的中外商人。

286　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开通　　　卢苇

（《西北史地》1981年第1期）

丝绸之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通常认为是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本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丝绸之路才实现了繁荣和畅通。作者根据古代中外文献，认为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已经输入印度；公元前三世纪时，已经输入西方。从远古时期，我国新疆地区便和内地互相交通，联系紧密。黄帝、尧、大禹、周穆王等古代皇帝，都曾到过新疆、帕米尔高原、以至吉尔吉斯大草原。我国的少数民族塞种、月氏、乌孙等游牧部落，原先都住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以后沿着天山以北的路线，陆续向西迁徙到新疆以西地区。西域的玉石、马、牛、羊、骆驼、野马、骡等牲畜输向内地，内地的铜器、贝币、丝绸和织锦也运往西域。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一带的交往，也是在张骞通西域以前出现。这和马其顿亚历山大侵略东方有关。亚历山大经过十年侵略战争，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在东方各地建立亚历山大里亚新城，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这和丝绸之路西段的出现有直接关系。丝绸之路出现后，由于民族和国家的纠纷和战争，以及道路遥远、缺乏食宿和安全保障等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繁荣和畅通。西汉时，汉武帝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历时十余年，行程万余里。他在西域期间，详细记载了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具体路线和行经地点以及沿路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真实情况，并和他们建立起友好关系。他的出使，开拓了长期被匈奴阻塞的东西交通，沟通了曾被中断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汉族和西北边疆各民族以及中国人民和亚洲、欧洲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在此期间，汉朝政府又先后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反击匈奴，不断取得胜利，并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立四郡，在西域建立都护，整修和延长长城，设置亭障，保证了来往丝绸之路上人们的安全和食宿。西域都护的主要任务，就是推行汉朝政府的政令，维护和管理丝绸之路，组织管理西域地区的屯田，为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外商人和各国使者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

287 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　　王宗维

（《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4期）

关于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路线，已有不少文字考叙，黄文弼先生也曾著《张骞使西域路线考》。本文所考证的中心乃是张骞第一次出使时所经河西地区的往返路线。对此，《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等文献均有记载，但都很简略。只是说张骞去是“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回时“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以此为依据，首先应该确定其地理位置。陇西，陇坻之西，所谓陇坻即今陕西千阳、陇县与甘肃张家川、清水交界。作者认为，秦陇西郡治在今天水地区，汉初，陇西郡治仍在天水附近，直到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武帝设天水郡，陇西郡治才移到狄道（今临洮东）。所以张骞是由今天水一带西北上，进入匈奴地的。当时，匈奴国家大致分三部分：单于居中，，直辖今山西北部直至阴山之北。左方王将辖今河北北部直至东北。右方王将辖今陕北以西，接月氏、氐、羌等部。后月氏、氐、羌等部被迫西徙，匈奴遂占有河西走廊，进而统治了西域各国。所以张骞所“经匈奴”之部当为与陇西相邻的匈奴右部部落。根据霍去病出兵河西路线的考察可知，庄浪河以北，黄河以西，当时为匈奴须卜氏即速濮部统治。故而张骞是进入该部辖地后为其俘获。被俘后，张骞被送至单于庭(今呼和浩特一带)，即所谓“传诣单于”至于张骞由匈奴逃出西往大月氏的路线，作者具体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及有关资料，认为张骞是从今景泰县境西上（或者从河套地区西南行），沿腾格里沙漠南侧，绕过休屠泽（潴野），然后沿阿拉善山坦地南，龙首山、合黎山北的夹道西过弱水，直至西域。黄文弼先生认为，张骞由单于辖地西走，穿过匈奴浑邪、呼衍二王的领地，进入西域。而浑邪在今酒泉一带，呼衍在今哈密，镇西一带。经作者考证，张骞出使时，哈密一带没有呼衍王部，呼衍王部西迁哈密是东汉发生的，而酒泉以西至敦煌当时仍，分布着小月氏部落，浑邪王的辖地并不在此，而在张掖一带。故而黄氏所考证的路线不能成立。另有一说是张骞由陇西出发，先到湟水，后北上进入河西，在张掖一带被浑邪部俘获，送往单于庭，同样难以成立。首先，当时的陇西郡治不是狄道，而狄道确有大路可通湟水；其次，匈奴右方的骨干力量是须卜氏即速濮部而非浑邪部；最后，作为向导的甘父为西域胡人，对河西较熟，不可能取道生疏的青海。张骞从西域返回的路线，并非如黄文弼先生所说的“南山”为和田南之昆仑山，“羌中”乃今青海地。作者认为，“南山”即今祁连山，位置在河西走廊南。张骞“欲从羌中归”，与“并南山”联系起来，则“羌中”指山北羌人地区，山南并无匈奴。复为匈奴俘，指的是山北匈奴部，或为浑邪部，或为休屠部，也可能又是速濮部。其被俘地点，当在酒泉以东，而非黄氏所言，在鄯善至阿尔金山之间。

288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　　张春树

（《食货》月刊1985年第15卷第1、2期）

本文是美籍华裔学者张春树先生1984年在香港、美国等地几次的演讲，后经作者

整理成文发表于《食货》月刊。文章对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文章认为汉帝国对丝绸之路的开拓，在不同路段采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对河西、青海羌地进行了实地开发，设立屯田，移民百万，使原属匈奴与羌人的土地逐渐成为汉帝国的领土；对西域（指今新疆）则是选择征服某些枢要地区，设立军屯，实为以点制面与“以夷制夷”的殖民地式开拓类型。相比而言，汉朝开拓西域所支付的财力较之用于河西一带为少。至于汉帝国对河西一带的经营过程，经作者考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军事期。这一时期建立烽燧亭障，建立系统都尉区系，最高长官为都尉，兼管军事与民政。第二是移民期。即扩大都尉控制地区，移民屯垦，进行系统开发。第三是郡县期。即发展完成郡县设置，都尉区失去其军事特性，改设郡县后，实行军政分立。这三个阶段即构成了汉帝国开发河西之全过程，特别设计的屯田制度得到很大成功。此举汉帝国不仅控制了丝绸之路河西段，而且控制了丝绸之路今新疆段。此外，文章还认为，丝路文化是混合型文化，丝路上的人种亦是形形色色，有黄种人、白种人、黑色人及介乎三者之间的人。文章利用大量汉简资料具体分析了汉代河西居延人的特征，如居地、身高、肤色、原籍、家庭、男女比例、婚姻及其生活状况。而对戍所和屯田的吏卒的生活、工作状况及汉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邮驿、出入行旅等都一一作了叙述。这对丝路的深入研究无疑起了辅助作用。

289　汉代的西域交通　　　郜　英

（《西北论衡》1940年第8卷第24期）

本文系对两汉通西域的概述。文章首先对一般所谓鸦片战争以前，中国闭关自守的论点进行了批驳，并根据历史记载，考诸古代中华民族不是闭关自守，而是积极进取，早在汉代，已跨越长城而于国外发生了关系。武帝时，匈奴寇边，遂兴师远征，军威远达中亚，于是中西交通，东西贸易，文化交流，从此发生。考汉代西征，主要在军事上欲断匈奴右臂；外交上联络月氏、乌孙，以结同盟；在经济上开边立郡，发展国际贸易，其结果迫使匈奴远遁，造成亚欧民族之迁徙。外交上中西信使不绝于途，经济上国际贸易线畅通，文化上相互交流，遂形成了灿烂的东方文明。为了说明两汉时期的西域交通，作者在本文中就汉代西域范围及种族；汉代通西域之路线；汉代通西域之目的；汉代通西域之经过；以及汉代通西域之影响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重点论述。本文叙述简明系统，对研究“丝路”者来说，却勾划出了研究轮廓。

290　汉朝西域路线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　　　王宗维

（《西北历史资料》1985年第1期）

本文共分四节，首先考叙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的交往，很早以前即已发生，这不仅从大量的出土文物得以证实，而且还有文献的记载。如《竹书纪年》关于周穆王西巡的记载，《山海经》中关于西山经、西海经的记载，以及《管子》、《淮南子》中对西域部族及地名的记载等。另外，西方的历史著作中，也不乏西方人探求东西文通活动的记载，如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对公元前六世纪阿利司铁阿斯

（Aristeas）从欧洲旅行中亚过程的记录，公元前五世纪供职波斯的希腊人克提斯阿斯（Ctesias）所说的“赛里斯”（Seres，意即丝国）。这说明公元前五六世纪，西方就已经知道东方的中国是盛产丝的国家，更说明中国的丝早已传入了西方。

其次阐明了汉、匈因军事、政治原因，汉王朝两次派张骞使西域。尤其第二次使西域后，并与所至各国的使臣到汉庭报谢，从此西方诸国与汉王朝发生了正式接触，开创了中西交通新纪元。文中对张骞两次使西域所经国家及其路线作了详细考证。再次将西汉王朝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如何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等问题，亦作了阐述。最后，对张掖骊靬县的由来，据文献记载进行了详细考证。

关于张掖骊靬县之由来，早在四十年代，张维华先生曾作过考证，但其观点与本文结论不尽相同。随着丝路之畅通，犁靬人随各国使团及商人来华者日众，有的不能返国，寄居于河西，汉王朝为了便于管理，于是设骊靬县是以处之。本文并对骊靬民族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历代从属于大国的情况，都作了较详的考证，从而对张掖骊靬县的设置，得出较明晰的结论。

291　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　　　黄文弼

（《西北史地季刊》1938年第6卷第7期）

本文原载《西北史地季刊》，后《西北论衡》及《甘肃民国日报》分别进行了转载。初在《西北史地季刊》发表时，原文附有“新疆现代疆域图”和“西域国图”两幅，但在《西北论衡》和《甘肃民国日报》转载时均从略。作者在本文中，对前后《汉书》和《魏略》所述之西域路线，除根据两《汉书》及《魏略》论载外，并根据自己两次实地考察、考证，认为《汉书》所记路线，实为后汉通西域路线，与西汉通西域路线略有差异。又《魏略·西戎传》称，“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据《魏略》所述，作者再校以《汉书》，认为《魏略》所述新道，实为《汉书》之北道，而中道为《汉书》所不记。是知《魏略》之中道，即西汉时之北道；后汉时之北道，即《魏略》之新道。班固以后，汉之道路，紊于前后，实则有误。

292　丝绸之路概述　　　孙培良

（《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78年第3期）

“丝绸之路”一词，通常是指汉唐间我国丝绸经中亚、伊朗西运至地中海东岸各地的陆路交通线而言。本文是将我国史传所载以及西方古典和近代著述中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加以整理后，缀集成篇的。丝绸之路是经行中亚、伊朗，横贯亚州大陆的交通路线。这条路是连结了古代各族人民境内的许多商路而成的。这条陆路交通线的开辟，始于张骞，班超使西域并遣甘英“穷临西海”，则是这条路线的进一步完成和完善。这条路线依路程远近和所经地域的特点，可分三段，即东段、中段和西段。东段自长安至木鹿，中途经过帕米尔或阿赖高原的山区。这一路据《汉书》所记有南北道：南道出玉门、阳关，西至莎车，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两汉时，丝绸之路在中亚境内主要是取这条路。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西行至疏勒，西逾葱岭，则出康居、大宛至奄蔡。汉代的

大宛，即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纳州。这条路和两汉南道相比，重要性稍差，但也是丝绸之路中的一条。关于中段和西段的情况，作者综合伊西多尔的《帕提亚驿置记》，斯特拉波的《地志》以及普林尼《自然研究》中的地理部分分析，中段经行路线，基本上在今伊朗境内，横亘东西，北倚厄尔布斯山脉，南濒卡维尔沙漠，路途直而便捷，别无更适之路。罗马时代所记中段经行各地，可与我国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中段的西段是底格里斯河中下游今巴格达东南二十英里的太西丰和塞疏西亚。这条丝路的西段，即以塞疏西亚为起点西北行，有几条不同路线，主要可举出三条：一条是从塞流西亚出发，沿幼发拉底河左岸西北行至阿帕美亚城，转西南行，抵安都城。安都城也就是我国史籍所记大秦国的国都。这条路我国史籍多叫作"中道"。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塞流古王国盛时多取此道。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塞流古王国衰落后，丝绸之路的东段和中段，由于汉代中国和安息建立了外交和商业关系，畅通无阻。但西段因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上游的政治情况却在混乱中，于是在叙利亚沙漠北缘的绿洲上兴起了商队城市帕勒米拉和杜拉·欧罗普。从公元二世纪后期起，使得经行沙漠的这条路线成为丝绸之路的南道。西段南道直到公元272年帕勒米拉灭于罗马时才衰落。西段还有北道。北道东起太西丰，沿底格里斯河左岸北上，经古亚述都城尼涅微，西北行至阿帕美亚城，转西南至安都城。以上是我国自汉至隋的"丝绸之路"。此外，作者还作了两点补充：其一是补述了罗马帝国时期商人从西方到东方来探寻丝绸原产地时走过的路；其二是补充了经行天山北路和东南俄草原的一条丝绸之路。这一条路的开通，一方面由于欧洲对中国的丝绸和其他东方贵重商品的需要不断增加；另方面由于蒙古建国以后，驿道畅通，东西使节往来频繁。尤其经黑海东南俄草原，天山北路来中国的一条路线最便捷兴旺。在欧洲到东方来的新航路发现之前，这是中西交通最重要的一条大道，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93 丝绸之路初探 贾应逸

（《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4期）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传送各国人民深情厚谊的道路。本文对"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的几条路线和"丝绸之路"在东西方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首先是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833—1905年）提出来的。他在《中国》第一卷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间、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叫做"Seiden StraSSen"（德文，直译为绢的街道），"丝绸之路"（Silk Road）是它的英译名。在其中的一幅地图中，他标题为"马利奴斯丝绸之路"。1901年德国的东洋史学家赫尔曼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的著作，主张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的涵义，从中国到河间地域，"进而扩大到遥远西方的叙利亚"。因为这一名称较为恰当地表达了这条道路的特色，很快便被世界学术界和人民所接受。解放以后，我国学者开始使用这一名称。到了六十年代，特别是近几年来，"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才大量见之于我国学者的

著述和报刊宣传之中。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道路，早在先秦以前就已通达。张骞两次往西域，正是在前人走过的道路上西行的。他的西行和出使，使东西方之间的往来，在原来民间往来的基础上，正式开辟了官府往来的通道。新疆位于中亚，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西汉初期，南北两道的分路并不是在敦煌的阳关和玉门，而是从罗布淖尔附近的楼兰开始的。当时南道从敦煌西出玉门，经楼兰，沿塔克拉玛干南缘，昆仑山北麓西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县境内）、扞弥（今于田县境内）、于阗（今和田县境内）、皮山至莎车、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县），跨帕米尔、逾依耐、无雷至大月氏（今阿富汗巴尔赫一带）。当时的北道也是从楼兰出发，沿孔雀河，先到焉耆，再沿塔里木河西行，经轮台、龟兹、温宿、姑墨、疏勒，越铁列克山道，至大宛、康居。到公元76年（东汉章帝建初元年），新北道畅通后，敦煌才代替了楼兰成为南北分岔点，阳关、玉门才成为南北两道的门户。这条路是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避三龙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这三条路线形成后，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一直沿用不改。只是由于民族纷争，时通时绝。这三条道路出新疆后，都分别到达地中海和黑海，再西行到欧洲各国，或从地中海南下到北非各地。作者引用了大量史料，论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欧亚两大洲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东西方各国人民之间和政府之间往来频繁，物资交流兴盛，文化影响加深。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各国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促进了各自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丝绸之路”的盛誉，日益成为当代东西方人民团结友谊的象征。

294 《丝绸之路》 〔瑞典〕斯文赫定著 安应民译 胡清华校

（《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

本文是作者所著《丝绸之路》一书中的第十八节。文章概述了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联合月氏反击匈奴，派遣张骞率领一百人的使团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情况，以及汉武帝为了和西域各国开展贸易并为获得大宛的血汗良种马，而征服大宛的两次战争。通过这两次战争，中国人与西方发生了商品、技术、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匈奴被驱逐出甘肃南部，通往西方各国的丝绸之路从此开通。汉武帝将万里长城向西延伸，并设立望楼，以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沿着这条大路输出商品，无与伦比的漂亮丝绸，成为世界贸易中最供不应求的商品。文章还叙述了丝绸之路各条路线的概况以及沿线重要地点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作者本人在1900年3月28日发现楼兰古城遗址的情况，以及他在丝绸之路上旅行时看到的风光。整个丝绸之路，按直线距离计算总共为4200英里，按实际路程计算则为6000英里左右，即相当于地球赤道长度的四分之一。作者称赞张骞是所有中亚地理探险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交通干线中最长的一条，是连接各民族和各大洲之间最有意义的链条。

295 丝路考察纪略 齐陈骏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

本文系作者1981年7—8月间参加丝路之路考察队考察了兰州至乌鲁木齐一段后的

一些体会和认识。经作者实地考察，认为河西走廊是丝路东段最重要的通道。因为走廊南面，是经年积雪的祁连山不易翻越，祁连以南崇山峻岭，道路艰难；走廊北面的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以外，又是渺无人烟的荒漠地区。在古代条件下，要翻越山岭，或者要穿越沙漠都极为困难。而走廊内部，地势平坦，可耕可牧，自古以来就是人民生息之所，所以行人商队，大多都通过走廊。丝绸之路以长安为出发点，从东往西进入走廊，则有南、北、中三条路线可走，北道经平凉、固原、景泰到武威。这条路线最捷，但经腾格里沙漠边缘，比较艰苦。南道经陇西、渭源、临洮、西宁入扁都口到达张掖。此道绕路最多，但除扁都口一段外，沿途都是农业区，易于行走。中道系由南道衍化而来，即到临洮后，转北经兰州、永登、翻乌鞘岭。此道比北道稍长，比南道便捷，除乌鞘岭较为险峻外，沿途人烟稠密，行旅方便。据史书记载，秦、汉、魏、晋时期，行人多从南北二道入河西，中道似入唐以后，才成为东西主要干线。玄奘、岑参都是取中道入河西走廊的。走廊内部，道路基本固定，但到了安西，一般多去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进入天山北路或南路；但也有不经敦煌而直至吐鲁番的。走廊的南北之间，从酒泉北面的额济纳旗经张掖，至民乐的扁都口一线，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往来的通道；到明、清时代，更成为蒙藏两族交往的干线。足见河西走廊地理位置的重要。

作者参观过的石窟寺，西起吉木萨尔西大寺，东至永靖炳灵寿，都是依山傍水，沿天山、祁连山一带修建。盖因这些地方干旱，人们靠天山、祁连山雪水生活；无水便无法生存。估计古代丝路亦应如此，是沿天山南、北两路的绿州和祁连山而往来的。因此，应重视石窟寺的普查工作，只有充分掌握石窟寺的建设路线，才能对古丝路的走向作出更明确的判断。

在沟通欧亚的丝绸路上，各种宗教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僧侣络绎往来，成书不少，遗留后世的各种经卷中除汉文、梵文外，尚有藏、西夏、回鹘、粟特等文字。随着宗教传播，造像、建筑、绘画艺术、语言文字、音乐舞蹈以及杂技百戏等，也相继交流、融合。作者认为要深入研究丝绸之路，有必要加强宗教、特别是佛教东传的研究，加强佛教石窟寺的考古调查，并且需要培养一些懂得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的人才。

作者考察的地区，是我国古代各民族相互斗争、融合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其中有不少有关的文物古迹。如武威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即西夏碑）、吐谷浑王室先茔出土的不少墓志等，是研究回鹘族起源、西夏历史、吐谷浑王族世系和唐代少数民族政策的极宝贵的资料。应该通过考古，搞清古代这些地区各民族的活动状况，以及迁徙、融合的历史过程；结合现在的民族分布，研究各民族演变、发展的历史，以利于今天的民族团结。

作者还沿途参观、考察了长城、烽燧台、玉门关、阳关、嘉峪关、民乐永固城、安西锁阳城、张掖黑水国城、高台骆驼城、额济纳旗的黑城子、吐鲁番的交河城和高昌城、鄯善柳中城、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等许多故关城堡遗址，对丝绸路上古代的军事设防和城堡建设，都有新的体会和认识。

296　汉代对西域交通与中国文化之影响　　　陈安仁

（《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2期）

汉代通西域之目的，在于联络西域诸国，以夹击匈奴。为此目的，两汉曾不惜人力之损失，财力之耗费，凡四次打通西域之交通。作者在本文中首先概述了汉朝与匈奴之关系及军事上的争夺外，并将两汉四通西域之详细过程进行了叙述。同时，将两汉通西域之范围，西域五十二国国王治所及交通里数，都一一作了详细考证。另外，将汉代通西域后，对中西文化所受之影响，分别予以论述。如西域农产品之传入，中国冶铁和穿井技术之传出，特别是丝绢之输出及“丝路”之形成，更进一步加强了中西物产的交流。胡商贩客之往还，使节僧侣之行迹，从而加强了中西文化之交流。由于丝路畅通，佛教东传，西方艺术、音乐、舞蹈遂被引进，从而使中国原有文化，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东方文化。

297　汉代祁连山路考述　　　王宗维

（《西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3期）

本文主要考证了汉代翻越祁连山的几条可通之道，并对当时河西及湟中地区为少数民族历史及期民族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祁连山耸立于河西地区与湟水水系之间，东西延伸千余里，阻碍南北通行。自古以来，游牧于山脉南北之间的各族牧民，历经艰险，探得了一些南来北往可通路径；大致先秦时期的羌族部落，不少就是通过这些可行山谷进入河西的。据两《汉书》记载，当时可作道路的计有酒泉呼蚕水（上游为托来河）路、张掖弱水（今黑河扁都口）路、姑臧南山路等。汉取河西，断匈奴右臂，河西成了通往西域理想通道，为此设立完整防御体系，隔绝了匈奴与西羌联系，保障了东西丝路畅通。另外，由于有了南北各要隘的设防，有效的阻止了强大羌族势力的伺机北上，也阻挡了山北各族的南移。在这种具体致件下，南北之间难形成可通之途。

作者在研究了祁连山路的同时，不仅考证了匈奴遣使至羌中所经的路径，反映了汉王朝在河西地区与漠北匈奴，以及山南先零羌族斗争的形势，而且还研究了与几条山路有关的小月氏、卢水胡及罕羌、幵羌、种羌、黄羝羌、烧何羌、烧当羌等众多羌族部落的原居地及其活动，迁徙的路线及过程，对了解当时民族变化颇有帮助。

最后作者对《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发表的《丝路羌中道小议》一文提出异议，认为汉代称羌中的地区比较广泛，大致从敦煌至蜀郡是古代西羌人活动的地方，都称羌中，《史记》、《汉书》均无“羌中道”记载。从湟中到西域，或越祁连山经河西，这些路在汉时仅仅是游牧部落活动迁徙的路线，不是商路，与丝路无关。所以称“丝路羌中道”未必合适。

298　古代居延道路　　　　王北辰

（《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本文探论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另一条路线居延路的历史、地理情况。这条路线大致是：从阴山山脉南北两麓向西，穿过戈壁沙漠，经过居延绿洲（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弱水下游），趋向天山南北麓。由于这条路线在古代离经济、政治中心地区既远，地理条件也较差，因而被利用的程度也远不及其它路线。早在公元前若干世纪，这条路线经过的阿拉善高原，东界贺兰山，西界马鬃山，南边是河西走廊，北至中蒙边界，其四周已有不同的民族居住。据本世纪以来中外考古调查发现，这一地区共可分为草原、沙漠、绿洲、戈壁等四种类型。这四个类型的地段互相毗连、过渡，反映出各部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互相交流。西汉初期，居延路在匈奴控制区内，随着汉对匈奴斗争的逐步胜利，居延路才逐步归汉所有。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大军进攻河西匈奴，取得了很大胜利，其进军路线是从今甘肃境内的环江沿岸出发向西北行，抵达今银川平原再沿黄河北行，在朔方郡窳浑县境出鸡鹿塞，向西北穿过乌兰布和、巴丹吉林两片大沙漠，跋涉千里到达居延，然后从居延沿弱水南进，攻击河西走廊的匈奴。汉得河西走廊后，陆续设置了河西四郡，并在公元前104年建置居延城，修复休屠城以加强酒泉、武威的防御，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公元前102年，匈奴又从居延沿弱水南下袭击酒泉，杀了汉酒泉都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率军五千，从居延塞出发北攻匈奴，进至杭爱山东端，遭到溃败，循“龙城故道”向居延塞退却。所谓“龙城故道”，就是从居延到匈奴首府的老路。据《后汉书》记载，公元90年，匈奴北单于曾两次请求从居延路向汉朝贡。这些史实证明，居延绿洲位于大漠之中，形成了东西、南北交通大道的十字路口，是北方民族的交通要冲。东汉末年在此设西海郡，与河西各郡并列。北魏仍沿汉制，并在此安置北方归顺的一部分游牧民族。由于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坦途，故在公元六世纪以前，居延道路仍较偏僻冷落。公元七世纪初，唐朝统一了全国，河西走廊较之往昔更加兴旺。由于漠北先后有突厥、回鹘等族的活动，唐朝对北方门户居延仍很重视，在此设“宁寇军”（军事机构）以统领当地军务。这里的南北通路基本与汉代相同。公元755年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吐蕃夺占了河西走廊，丝路通道为之阻塞，居延道路遂代替河西走廊，成为联系西域与长安的捷径。因当时阿拉善高原属于回鹘，故此路被称为“回鹘路”。迨公元九世纪五十年代（唐会昌年间），漠北回鹘各部大举南移，分别进入河西走廊与天山南北各地，各自建国，不相统属，其中以甘州回鹘及西州（高昌）回鹘为最强。他们扼据丝绸之路之要冲，从事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至宋代，黄河流域陷于宋、辽、西夏对立的局面。在此期间，西域的高昌国（今吐鲁番）遣使到开封通好，宋朝派遣了以王延德为首的使团去高昌答聘。他们往返均经居延路。王延德还写了《西州纪程》，详细记载了所经各地情况，是居延路上一份完整的、珍贵的旅行记。辽代末年，皇族耶律大石率军西迁，也由居延路至中亚，建立了西辽国。辽国与西域各国的政治、商业往来，其交通的一大段也是利用居延路。故居延路在丝路史上也曾起过很大作用，做出过重大贡献。

299 丝绸之路东段述略　　杨建新

（《西北史地》1981年第1期）

丝绸之路是由中国的长安为起点，经过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进而联结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陆路交通通道。为了反映丝绸之路最初的面貌，本文以汉代丝绸之路为基础，兼及以后的发展，介绍了丝绸之路东段的情况。作者根据自然地理和政治上的状况，把丝绸之路从东向西划分为三个段落：从长安出发，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到玉门关、阳关、为丝绸之路的东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到帕米尔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区，为丝绸之路的中段；由此以西，南到印度，西到欧洲，为丝绸之路的西段。作者又把丝绸之路的东段分为陇西段和河西段两部分。陇西段从长安起到黄河；河西段就是河西走廊一带。陇西段共有五条通道：第一条是由长安出发到咸阳，沿渭河、过宝鸡县，再沿千水过陇县，沿陇山东麓北上，越过六盘山，再从靖远地区渡黄河到达武威。第二条是从长安到陇县，然后西行，从大震关或陇关（今清水县东陇山东麓）越陇山，向西北经略阳(秦安北)、平襄(通渭西)到金城(兰州地区)，由兰州过黄河。第三条是由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经陇关，过天水、临洮、河州(枹罕)经永靖到青海西宁，然后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到河西。第四条是从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渡黄河，向西南到凉州（今武威），进入河西走廊。第五条是从长安出发，向西北经咸阳、醴泉、永寿（今永寿西北）、邠州（今邠县）、长武、泾川、平凉，过肖关口，向西到六盘山，经隆德、静宁、会宁到安定（今定西），由安定西北行到达金县(今榆中)、兰州，由兰州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这条路还有一条支路，是从长安向北，经黄陵、延安，绥德、榆林，又向西南过靖边、定边、盐池，经灵武过黄河，再经中卫到古浪进入河西走廊。陇西段的五条主要交通路线越过黄河后，就向一个方向靠拢，成为一条主要的通道，即丝绸之路的河西段。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东西长一千公里，南北宽一至二百公里。走廊的北部是北山（包括合黎山、龙首山等），南部是祁连山（又称河西走廊南山），中间形成一条天然的平坦通道。丝绸之路东段的河西段，第一个大站是武威。由武威西行，过番和（今永昌县城）删丹(今山丹县城)到达觻得(位于今张掖的西北)。隋代将觻得县治向东南迁移，改名为张掖。由张掖西行，可至福禄县（今酒泉县）。从酒泉再往西，就是嘉峪关。这是明代修筑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是明长城的西端。由嘉峪关往西北，过玉门（在今玉门市西北的玉门镇）、渊泉，向西到敦煌(今敦煌西)。敦煌是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军事重镇，它对巩固西北边疆、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的敦煌城，在河西走廊诸城中是规模最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一个城镇，为政治上、军事上联接中原与西域的枢纽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交汇点。闻名于世的莫高窟艺术，就是敦煌历史作用的具体体现。由敦煌西北行，就是著名的玉门关。玉门关是汉武帝时设置的关卡，现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也有人说大方盘城）即其遗址。由敦煌西南行，是著名的阳关。阳关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今称葫芦斯台），有的说在古董滩附近的红山口。两汉时，玉门关和阳关外的广阔地区统称为西域。两关都是由敦煌出西域的必经之地。为了控制丝路交通，南北朝时

将玉门关东移至今安西双塔堡附近。两汉时期的玉门关从此废弃。与河西道平行的还有一条通西域的道路，是由永靖渡河后，经青海湖北部，沿祁连山的南麓和柴达木盆地的北缘，越阿尔金山的噶斯山口（约在今索尔库里）直达若羌。这条路自北魏时期起，就成为商人、僧侣和使者来往于中原和西域的重要通道之一。本文对丝绸之路沿途的重要城镇、关隘和渡口的地址、名称起源和沿革，以及主要的历史事实、名胜古迹等，都引用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作了详细的考证，实为研究丝绸之路的一份重要资料。

300　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　　　鲜肖威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2期）

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是长安至新疆间我国国内交通的主要干线。这条路线究竟经行那些地方，说法颇不一致。作者在经过多年考察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讨论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时，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这条路线从汉至唐不是仅此一条，而是有两、三条。这几条路线在不同时期有主次之分。二是在长安和河西走廊间有号称天堑的黄河阻隔，在讨论陆上通道时就必须同时研究与此有密切关系的黄河渡口。丝绸之路从长安到河西走廊一段大致可分为北线，南线和中线。

北线：又可分为两条，一条是从西安至武威的捷径，沿泾河西北向经陇山，过固原、海原，在靖远县北渡黄河，经景泰直抵武威。此线渡口。在靖远与景泰间，特别是靖远县北石门公社以西、景泰县五佛寺南有地名叫索桥，至今尚有建桥遗址，应是渡口所在。另一条线是沿泾河向西，过六盘山西北向，沿祖厉河而下，在今靖远县城附近渡河北上景泰、再去武威。

南线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而上至宝鸡东，为了绕过宝鸡——天水间的峡谷险道，乃沿千河西北向，过陇县，越陇山，度陇关，到甘肃秦安境，再西经通渭，陇西、渭源越鸟鼠山而至临洮。渡洮河后复向西，经临夏，再沿大夏河北上，在永靖炳灵寺附近渡黄河，西北向青海民和、乐都、西宁，再往北过大通河，越祁连山，过扁都口到张掖。南线渡口在永靖炳灵寺附近。东晋时西秦乞伏氏曾于此处建桥，名为河历桥，隋名临津关，唐称凤林关。

中线。从长安出发到临洮后，北经阿干河谷到兰州，再沿庄浪河谷过乌鞘岭到武威。这条路线的使用比北线和南线稍晚，但最迟在三国时就已开始。中线渡口在兰州，具体位置可能在西固城，后来在河口，唐时称广武梁，以后再移至金城关。

经过河西走廊往西的丝绸之路与古代驿道基本一致。但这条路线除了选择直线外，还和祁连山——阿尔金山山麓水源丰沛的地带基本一致。具体路线是武威——永昌城——绣花庙——山丹城——张掖城——高台城——盐池——临水——酒泉城——嘉峪关——玉门镇——布隆吉——安西城——敦煌城。自敦煌城往西，其道路分为南北二路。

丝绸之路东段是整个丝绸之路路线中还不十分明确的一段。黄河以东的丝绸之路大多经过半干旱地区，线路分歧，不易固定。作者通过艰辛的实地考查并参考大量的实物例证，构划出了一条比较明确的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图，为进一步研究这段路线的走向奠定了基础。

301 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

——兼与鲜肖威同志商榷　　　吴礽骧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4期)

本文作者认为所谓"丝绸之路"即两汉以来的驿道，亦即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以后，汉、唐与西域诸国的交通路线。文章依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和散见史籍中的记载，历代舆地以及明清地方志，并结合古城遗址、古墓葬群的调查，经过考证，给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描绘出了一幅具体的路线图。为叙述方便，又将其分为东、西两段，从长安至张掖为东段，自张掖至阳关、玉门关为西段。

西汉时期，东段主要有南，北两条干线。北线，据1973年金塔汉金关遗址出土的一枚有关长安至河西一带驿置里程汉简，与现今地名对照，平凉以东一段，大致与宋以后的驿道相同。即：从长安出发，沿泾河西北行，经咸阳、兴平、礼泉，乾县，彬县、长武、泾川至平凉。平凉以西，沿颉河，出弹筝峡，沿六盘山东麓，经瓦亭出肖关，至固原（汉高平县治）折向西南，绕六盘山主峰北，经张易堡、马莲川、将台堡，沿乌龙河北上，经硝河城，再沿土木岘河，祖厉河，经郭城驿、靖远北上，由水泉越哈思山向西北，经石门，至小口子附近（索桥渡口）渡黄河，沿大沙河向西北，经景泰，寺滩、裴家营，再折向西经大景、西景、土门，折向西南，理古浪向西，经张义堡向北，经武威向西北，经永昌、山丹至张掖。根据金关汉简分析北线应是西汉时开辟。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冬十月西巡，走的就是平凉——固原——郭城驿路线。东汉初，隗嚣反叛，车驾西征，窦融率河西步骑数万配合，与大军会高平第一城。窦融走的也是北线。

索桥渡口自古即为通往河西的重要渡口，其地址在河东今称小口子，河西今称索桥。明代在河两岸均建有堡，即现存的建桥遗迹。附近有唐城遗址和汉、唐墓葬群，可资佐证。鲜肖威同志认为"乌兰桥"即索桥渡口，当属不确。

南线，大致沿渭河西行，从长安出发，经咸阳、兴平、武功、郿县、宝鸡，折向西北；沿千河，经凤翔、千阳、陇县，折向西，越陇关，溯通关河北上，经马鹿折向西北，经阎家、恭门、张家川、陇城、至秦安，至秦安后似应向西南，经通渭至陇西。东汉明帝永平中，移天水郡治于冀县，更名汉阳郡。冀县故城在今甘谷县治，故至秦安后，可能改向西南，沿渭河经甘谷、武山至陇西。由陇西沿渭河继续西北行，经首阳、渭源，越分水岭，沿东峪沟，经庆坪，尧甸，临洮，渡洮河向西，沿三岔河，经聂家关沿流川河向西北，经广河，沿广通河向西南，经和政县境，沿牛津河向北，渡大夏河至临夏，折向西北，沿小积石山东麓，经乩藏、吹麻滩，至大河家渡黄河，向东北，经官亭、胡拉城、魏家庄，沿隆治沟东北行，至湟水南之下川口，沿湟水西行，经民和、渡湟水，经乐都、西宁、折向北，经大通、门源、俄博、出扁都口，经民乐至张掖，与北线合。南线在汉武帝时即开辟。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入河西，即走此线。隋炀帝大业五年西征吐谷浑至张掖，也走此线。南线在隋代仍是入河西的主要干线。

南线黄河渡口为积石关，即汉之临津城，遗址在今临夏县大河家附近，为汉以来西通西宁的必经渡口。解放后在此发现汉代墓葬，证明确为汉代遗址。

东段除上述两条主要驿道外，还有许多支线，如著名的“回中道”南自雍县，经千阳、陇县、华亭、平凉，北出肖关；又入乌氏至月氏道，西出弹筝峡，越六盘山至隆德。鲜肖威同志所谓的中线，即由金城经枝阳、允街，越乌鞘岭至苍松的路线，早在汉代已经开辟。永登和古浪黑松驿一带的西汉墓群，可资证明。隋唐以来，由于枹罕、乐都以西为吐蕃所陷；同时，祁连山的扁都口一带山势险峻，气候多变，行旅困难，因而临夏——扁都口——张掖线逐为临洮——辛甸——阿干镇——兰州——河口——永登——乌鞘岭——古浪线代替。故此中线实为南线的一条支线。

西段主要指从张掖至两关的路程。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从张掖出发，沿黑河西北行，经临泽，折向西，经骆驼城遗址、明海子遗址、下河清，折向西北，经临水、三墩，折向西南，经酒泉、嘉峪关、大草滩、清泉、赤金堡（汉玉门县治），向西经照壁山北，沿昌马河支流故道，至锁阳城遗址。汉代路线，由此向西，经踏实，折向西北，经破城子，北出红山坡山口，折向西南，经甜水井至敦煌。由敦煌向西北，经下西宁堡、头道沟，折向西，经大月牙湖、波罗湖、大方盘城、小方盘城，出玉门关；由敦煌向西南，经南湖店、党河口，至南湖，出阳关。唐代路线，出阳关者，仍沿汉代路线；出玉门关者，由锁阳城向东北，经兔葫芦至双塔堡，出玉门关，折向西北，经白墩子、红柳园、星星峡，越戈壁（即汉唐所称之莫贺延碛）至哈密。汉、唐玉门关并非一地。汉代玉门关，史学界均认为。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但作者对此有新的见解及论述；唐代玉门关，一般认为在安西双塔堡。玉门关东迁的原因，应与伊吾路开辟直接有关。汉武帝时，车师、伊吾尚在匈奴控制之下，从中原入西域北道，捷径必由玉门关向西北，经罗布泊至龟兹。此道环境严酷，行者必冒大险。东汉明帝时，为了控制伊吾，即开辟从玉门关至伊吾的道路。至迟到十六国时，又开辟了由安西经星星峡至伊吾之道。此道较经敦煌远为安全，因而成为唐人入西域的北道干线；玉门关随之亦东迁。

文章认为河西走廊交通路线比较固定的看法，不符实际。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有过多次变迁。如汉唐间张掖—昭武—骆驼城—临水线，后由于摆浪河干涸，以北农田全部沦为沙漠；五代以后游牧部落又长期占据这一地区，更加深了沙漠化；因而至宋、元时代视为畏途，明、清时改由高台沿黑河南经宣化、黑泉，折向西北，经深沟、盐池、双井子、临水至酒泉。鲜肖威同志所称的路线，即明、清时代的这一路线。又如，汉唐间的赤金堡—锁阳城—破城子—敦煌线，后由于昌马河改道，支流干涸，锁阳一带水源断绝，宋以后，又陷于西夏，作为西域道上重要给补地的作用尽失。尤其明代建立嘉峪关，关西故城尽多废弃，路线亦多有改。

302　西夏时代河西南北的交通路线　〔日〕前田正明著　张金衡　陈宗祥译

（《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公元十一世纪初，丝绸之路的要道河西走廊被西夏所占领，东西交通因而阻塞。这时西域的于阗、龟兹、大食、邈黎，拂菻等国向宋朝贡贸易的路线，不能通过河西走廊，而是走河西南北两侧。一条是通过北方鞑靼的地方，即所谓鞑靼路；一条是经过西域南道到达沙州之前，转向东南方，通过柴达木盆地附近，经过青海湖岸、青唐城、湟水

流域、熙州、秦州等而来到中原，即所谓青海路。本文根据《宋会要辑稿·蕃夷·拂菻国》记载的宋神宗元丰四年十月六日，拂菻国使者向宋朝进贡所走的路线，进行了仔细的考证提出了与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博士和榎一雄教授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关于"种榅"的位置问题，桑田认为种榅即宗哥城，位于现在的青海省乐都县与西宁市的中间，湟水的北岸。榎一雄则认为种榅是经过黄头回纥前往达靼途中所通过的一个地方。作者从达靼的位置以及他们与契丹的关系、回鹘的位置等方面进行了考证，从而断定由达靼到达湟河河边的青唐城（今西宁市）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沿额济纳河南下，从甘州附近穿越南山山脉的山谷，来到湟水的北岸。另一条是从阴山附近起的，经过鄂尔多斯沙漠向南走，再沿湟水流域向西到青唐城。这就是西夏时代河西南北交通的两条主要路线。而契丹和青唐城之间的往来，大多是经由"回鹘路"，即从阴山附近向西走，经过阿拉善沙漠，迂回绕道沙州的西南，经过青海湖岸到达青唐城。这也是一条规模较大的交通路线，在西夏交通上具有重大意义。还有一条路是从阴山山麓经鄂尔多斯沙漠南下，在夏州附近向西南走，沿着横山山麓，再经过六盘山山麓，在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再沿湟水流域往西走到青唐城。这也是一条确实存在的南北交通路线。通过对西夏时代河西南北两侧所展开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研究，作者对拂菻国朝贡记事中的路线进一步作了考证，从五代时有名的高居海《使于阗记》中的记载，"种榅"即仲云。这个部族住在哈密地区，它的统治范围扩展到罗布泊的西南岸。所以种榅并不是宗哥，而应是仲云，也是就现在的哈密地方。另外，桑田认为"于阗王所居新福州"，系指喀什噶尔或叶尔羌（今新疆莎车）据作者考证，新福州应为旧于阗的东方。本文论述有序，考证严密，为研究西夏时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

303　丝绸之路在青海　　　张得祖

（《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1期）

作为古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长期以来人们公认的主要路线是东起渭水流域，向西通过河西走廊分为南北两条，即天山北路和天山南路。然而青海广大地区，在古代中西交通中的情况如何？本文就此进行了探讨。杨衡之所著《洛阳伽蓝记》卷五对北魏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宋云等赴西域取经有赤岭、渡流沙、吐谷浑。鄯善城等的记载。引文中之"赤岭"，即今青海湖以东的日月山。"流沙者"，《水经注》曰："流沙，沙与水流行也"。《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之记载，可见此流沙当在西海（即今青海湖）之南。所谓"吐谷浑城"张星烺说："吐谷浑城似即其国都伏俟城也"。据《北史·吐谷浑传》记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吴景敖在《西陲史地研究》中认为"伏俟城故址在青海西岸今布喀河下游入海处附近小型冲积扇之上，即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讽卑禾羌献西海地置郡处。"关于"鄯善"，汉之鄯善近于今之新疆哈密，唐时则在今罗布泊南三百里。据沙畹在《宋云西行笺注》中考："宋云所言之鄯善城既为从青海赴于阗行程之所必经"，应为后一鄯善。《洛阳伽蓝记》的历史记载，清楚地勾出了一条洛阳到赤岭，沿西海南岸西行，渡流沙，经伏俟城，过今柴达木盆地到鄯善，再沿丝绸古道

(南路)到达西域各国的路线。宋云之行毋容置疑地证明这段青海大道已成为当时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孔道。从历史背景看,魏晋南北朝时,西域各属国纷纷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连年争战不已,河西走廊以及由此分支的二条故道时常阻塞不通。而此时的吐谷浑王国却迅速强盛起来。吐谷浑立国三百五十年,而且占有河湟流域、青海草原乃至新疆南部等广大地区,为青海大道的开辟和发展提供了时间、空间上的充分条件;吐谷浑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又成为青海大道赖以维持的政治保障。关于青海经柴达木盆地至南疆的这条路线,在青海萨拉族人民民间传统说中也有记述。此外,还见诸于《高僧传》记载的乾陀罗人阇那崛多,他于公元559年经由南疆和田进入柴达木、到达西宁,再赴西安。除青海大道之外,穿过青海地区到西域的还有其他一些途径。公元399年僧人法显由长安经今兰州、乐都、西宁、大通、门源越祁连山到张掖,绕过当时战乱的姑臧(今武威),再循河西走廊入西域。公元420年僧人昙无竭(法勇)由靖远经今兰州、乐都、西宁、海晏、绕青海湖北岸,穿过柴达木入南疆,西行求经。公元516年,西域滑国厌带夷栗陀遣使经吐谷浑由巴蜀入贡萧梁。唐以后,又开辟了青海河源地区至吐蕃的唐蕃大道。唐代西行求经的僧徒,有很多是取道河源、吐蕃、尼波(罗即尼泊尔)进入天竺(古印度)。由此可见,和其他古代丝绸之路一样,青海地区的这些通道也为传播人类古代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

304　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　　初师宾

(《西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2期)

丝路羌中道是河西丝路的重要辅线。但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羌中道是一个薄弱环节。对其开辟历史,有学者认为:羌中道为汉武帝时霍去病或公孙敖出征河西的路线。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春、夏,汉军两次出击河西,是年春,霍去病攻焉之山之役,骠骑此行打通羌中道。本文作者对此论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根据《汉书·霍去病传》记述,骠骑春天之战的行军途次是:陇西——(乌盭——遬濮——狐奴)——五王国地——休屠王地——昆邪王地。其中,乌盭等三地和焉支山约在五王国途程中;战于皋兰,亦可能为五王国属地。五王国,指诸匈奴小王领地。据文献所载之地名推测,骠骑春天出兵当自陇西西北行,即从今临洮——兰州——永登——古浪的方向攻入河西,或者是沿祖厉河的方向渡黄河,顺着腾格里沙漠南沿插入今武威地区。夏天的出征路线,其出发点在北地,途中经居延海,似偏北而行。但斩遬濮王,获五王国,似乎又与春天路线部分重合,这也许是去和返所行路线不同所致。这两次出兵皆向西北方向挺进,即由匈奴中通过,无一语涉及过羌中。至于所涉及的皋兰、折兰、乌兰、贺兰等地名,作者以为皆匈奴语音译,当位于黄河以北,决无深入羌中之理。羌中道的开拓,作者认为与征羌人的战争有关,约自武帝元鼎时开始,至宣帝末完成。汉自占据河西之后,羌、胡之间曾几度谋图恢复联系,元鼎五年(前112年)"西羌众十万反,与匈奴通使。"时河西初通,所受威胁极大。于是,元鼎六年汉于河西初置酒泉,张掖郡;同时发数万人"筑令居以西"塞。令居在今永登西,令居塞是通向青海的塞防。这条塞防的走向,很可能沿今大通河(汉浩亹水)流域,或与湟水之间向青海湖延展,其作用明显是为防范羌人向

东北方向侵扰、移动，保护河西诸郡与通道的安全。令居塞的建设是汉军民首次大规模进入羌地，可看作是开通羌中道的第一步。昭帝始元年（前81年）设置金城郡，加强了东边对羌的围堵，成为进一步深入羌中的基地。同时，它又是河西、羌中二道的交汇点，对后来丝路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神爵元年春（前61年）诸羌大叛，汉决心再次征羌。平乱之后，设置了金城属国以统辖诸羌族。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一个积极结果是彻底打通了羌中道。《汉书·赵充国传》对这次战役的路线和胡、羌间的交通记述甚详。根据记载可以说明：

一、武、昭以后，胡、羌隔绝，其联系交往主要是取道西域，通过羌西的狼何、小月氏东入羌中进行的，也就是说西域与羌中道相通连，其往来活动十分频繁。

二、汉军分数路南出张掖、酒泉入羌中，会师青海湖西北，即所谓“鲜水北句廉上”。这是见著史载的羌中、河西走廊间的第一次大规模交通，即羌中道的北支线（南支线入吐蕃）的开辟。

三、宣帝时即辟通羌中道，随之即筑塞、屯兵、垦田，实行战备警戒，措施与河西塞防全同，与四郡塞防并有“北塞”、“西塞”之称。重筑羌中西塞，一方面是为了镇抚羌人，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羌中、河西二道的畅通。又其时匈奴与汉激烈争夺西域，羌中道路、塞防的建设，对于辅助河西道，控制西域，具有战略意义。

305 也谈“羌中道”　　吴礽骧

（《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本文针对“羌中道”之说而作，也是对丝绸之路开拓时间的进一步研究。所谓“羌中”是羌人聚居的地区。汉初，羌居河湟间，景帝时，部分羌人东迁洮河和白龙江流域，武帝至元帝时，羌人屡犯边境，先后有李息、徐自为、赵充国及冯奉世平定之，并使羌人迁徙西海以西，西海以东汉设郡县的地区则为“湟中区”。所谓“羌中道是由羌人聚居的西海西以西，即由西海北，沿柴达木盆地边缘入西域的道路。由湟中北经扁都口至张掖的道路，为丝绸之路北段，不应称为羌中道，如以湟中道命名更为恰当。丝绸之路是中原通西域的大道，是中原汉民族开辟的使节商旅往来西域的必由之路。尽管从西海以西经羌中地区往西域早有交通，但汉王朝使者并不经此道而往西域，故不能称为“丝绸之路羌中道”。作者在阐明羌中地区概念及名实称谓之后，对“湟中道”的开拓又作了考证。湟中道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主要孔道，这条道路的开辟，对确保汉与西域的交通，切断匈奴与羌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这和汉与匈奴的斗争是分不开的。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入河西进击匈奴，取得了很大胜利。湟中区亦于此时开拓。因为元狩二年春，霍去病进军路线是西出陇西，北渡黄河，循湟水，北入长宁谷（北川河谷），出扁都口至张掖，然后折向西北，转战于疏勒河一带。从地势观察研究，此路最为便捷。元鼎五年（前112年）羌人反叛，将军李息和朗中令徐自为平之，为了巩固已取得的胜利，乃于元鼎六年筑令居，置张掖、酒泉郡，徙民屯田，进一步加强河西的开发，并保证这一路线的畅通。据此，湟中的开拓，始自霍去病于元狩二年击匈奴之时，完成于李息及徐自为平羌之后。而湟中至张掖的道路，是在开拓湟中后逐渐完成

的。至于赵充国打通的道路，应该是恢复和确保西域道路的畅通，不能视为开拓。

东汉以后，羌乱频繁，经由湟中的道路被阻，于是开辟了新路至张掖，即由永登，乌鞘岭、古浪、武威至张掖。此路始于东汉安帝时期。两汉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原至西域的交通颇多变迁，北魏至隋唐时，因河西各割据政权的阻隔，于是由西海经柴达木盆北缘至诺羌的道路此时开通，西域贡使及商旅多走此路；中原西去求法者，如宋云等，亦经此路去西域。原羌中地为吐谷浑所据，中西使节、商旅往返于吐谷浑辖区，故多称此道为“吐谷浑道”。

306　丝绸之路东段的另一支线——青海路　　周伟洲

（《西北历史资料》1985年第1期）

青海曾在中西交通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丝绸之路东段的青海路（即吐谷浑路），在中国史书上不乏记载，中外学者对此均有研究。早在1935年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四卷一、二期上载有沙畹撰写的《宋云行纪笺注》，对宋云一行路线，据《魏书》、《北史》、《释迦方志》等书记载，详为考订。我国学者黄文弼先生在1937年《史学集刊》第五期上发表了《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一文，对丝绸之路青海路线进行了系统研究，旁征博引，考证详实。1948年裴文中先生在《边政公论》第七卷四期上发表了《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从甘肃及青海湟水流域考古发掘所得，证明史前时期，中西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湟水流域与西域地区），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所以，裴先生认为由祁连山南麓，沿湟水而至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而至南疆，是史前时期中西交通的一条重要通道。秦汉之际，居住在青海地区的羌族与北方草原的匈奴之间，有着频繁的交往，他们是从青海横切河西走廊，经居延海而与之往来，并威胁汉王朝西北边疆。因此汉武帝有断匈奴右胁，隔南羌、月氏的策略，实际上是断绝他们之间的交通路线。本文是在前人对丝绸之路青海路研究的基础上，对青海路形成的概况，南北朝至隋初青海路的兴起，唐五代时期青海路之衰落，以及北宋时期青海路再度兴盛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对前人在历史地理方面研究失误之处有所订正。同时对近人在丝绸之路上有关民族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益见解，对研治丝路之学可资参考。

307　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　　冯汉镛

（《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夏鼐先生在“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中，谓我国在五、六世纪时，通西域至中近东的“丝路”，除了“河西走廊”一线外，取道西宁沿大通河谷至张掖与“丝路”合，或取道西宁越赤岭经柴达木盆地至西域的一线，也是当时的交通孔道之一。本文对夏先生的这一论断作了一些补充，以期对这一说法能更加充实。我国取道西宁至西域的路线，不仅在公元五、六世纪如此，就是在五、六世纪后的唐宋时代，这条路线仍然是当时的中西交通孔道之一。考唐时从关中出发到西域，必须经过兰州，而兰

州西北行四百里，即抵达鄯州（今青海乐都）。在鄯州所属的威戎军一地，则有大道以通张掖。唐时的中西交通路线，不仅可以从鄯州经鄯城、威戎军至甘州以通西域；同时还可从鄯州取道鄯城，越赤岭（今青海日月山）、大非川（今青海布哈河）、柴达木盆地以通西域。这条路线，是北魏神龟元年（518）宋云西去印度所走的路线。这条路径不仅在唐时畅通，就是到北宋时也是一条商业往来的要道。除此之外，在唐五代时，从西蜀至西域的途径，也同样要经过西宁。按《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说："（茂州汶川县）故桃关，在县南八十里，远通西域，公私经过，惟此一路。关北当风穴，一二里中，昼夜起风，飞沙扬石"。从这段文字看出，在西川有一条不经过关中地区而直达西域的路线，这条直达西域的路线，一定要经过汶川县的故"桃关"。考汶川县属的桃关一地，其位置在今四川灌县西北三十五里，遗址犹存，就是武周时（690—712）所设立的蚕崖关。而蚕崖关地方，《舆地广记》卷三十则称它"扼西山之走集"，为"西山路"要冲。"西山路"与四川直通西域的道路，既然都要经过蚕崖关，同时又"惟此一路"，那么《元和志》所载川西直通西域的路线，就是经过蚕崖关的"西山路"了。作者通过《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韦皋传》的有关记载，认识到唐人所说的"西山"，不仅包括了现在四川藏族自治区境内的高山，甚至连青海，新疆南部的高山，也同样被认为是西山。"西山"既系从彭州导江县起，直至西域南部一带的高山而言，则"西山路"也就无疑是从川西所属彭州到西域的一条路线了。又据《元和志》卷三十二称真州地"当西山要路，请奏置真符营"之语，考证了真州的地理位置，以及作者1954年亲身在松潘的旅引经历，参照黄盛璋同志的考订，完全可以肯定松州至大积石山，在唐时一定有交通路线。松州至大积石山有路可通，那么从大积石山至西域的途程也就不难寻觅。据此，夏鼐先生所谓中西交通路线，除"河西走廊"一线外，取道西宁至西域的路径，也是重要孔道之一的论断完全正确。

308　自汉至唐的草原丝绸之路　　苏北海

（《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

人们熟知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及塔里木盆地南北道，通向中亚的道路。这一条道路主要是张骞通西域，汉武帝先后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以后才畅通的。但是在此以前，不仅我国的丝绸早已西传，同时也较多地输入北方草原民族。从历史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到，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织物已在草原民族中流行了。

草原丝绸之路是早就存在的。丝绸的西去不论是通过河西走廊，或是北方草原，都得先通草原地区，才能到塔里木盆地及中亚河中地区，所以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是先有草原路。汉武帝在河西设立四郡后，经过河西走廊通向塔里木才成为丝绸之路的大道，这条大道畅通以后，草原丝绸之路依然存在。据历史记载，中原各王朝大量供应北方草原各民族的丝绢是历朝都在进行着，汉朝设立河西四郡与西域都护以后，仍然大量给匈奴输出丝绢。但当时游牧于伊犁及伊塞克湖一带的乌孙，与匈奴不和，而与汉结盟。这种情况下，匈奴人进行丝绸贸易，就是走漠北单于庭，西沿杭爱山，经科布多盆

地，穿过阿尔泰山，沿乌伦古河，向西南至塔城直趋塔拉斯及河中地区。这条草原大道，实际上也是古已有之，长春真人西去中亚也是从科布多盆地翻过阿尔泰山的。从两汉时的形势看，当时匈奴族向西贩运丝绸的道路，一是匈奴占据河西走廊时，由草原道直趋天山山间通道，经伊塞克湖一带而至中亚河中地区。二是匈奴退出河西走廊后，位于阴山一带的匈奴，向西越过今宁夏北部、西经居延海、巴里坤湖、吉木萨尔，入天山间草原通道，直趋伊犁、伊塞克湖而达河中地区。即使匈奴退至漠北而与汉朝继续为敌的匈奴贵族，决不会放弃有巨额利润的丝绸贸易。此时的丝绸贸易路线，只能从色楞格河、鄂尔浑河一带西沿杭爱山、科布多盆地，越阿尔泰山经塔城直趋康居，达河中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形成分裂割据局面，北方草原的鲜卑、柔然和高车等民族，不断发生战争，草原丝路难予畅通，相反地在塔里木盆地南北道的丝绸大道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隋唐统一西域，以及唐代丝绸业的新发展，塔里木盆地南北丝路大道和草原的丝绸之路，其规模更加发展，更加繁荣了。唐代北方及西域舞台上活动的主要民族是突厥和回纥，青藏高原是吐蕃族。自六世纪至八世纪中叶，突厥民族活动在漠北的草原地带，处在唐朝、印度、波斯、东罗马四大文明古国之间，控制着中世纪东西交通的孔道，丝绸贸易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活动。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中叶，继之而起的是回纥族，它利用与唐朝在政治上的特殊关系，开辟了草原之路的黄金时代，操纵草原丝绸贸易达百年之久。其时吐蕃占据了塔里木盆地、帕米尔高原和费尔干纳盆地，切断了塔里木盆地南北二道，于是回纥族和中亚的粟特商人奔驰在漠北经庭都护（今吉木萨尔）、伊犁、碎叶通向河中的草原丝绸大道之上，形成了北庭、伊犁、碎叶三个丝绸集散中心。

自汉至唐的草原丝绸之路，除了上述经行天山及阿尔泰山的两条草原丝绸大道外，实际上从贝加尔湖以南向西沿叶尼塞河、鄂毕河上游即唐努乌梁海等，绕阿尔泰山以北直至斋桑泊的林中大道，由此向西南经达康居及河中，也是北方草原民族所经行的丝绸大路。从长安出发向北的草原大道，到唐朝形成为参天可汗道而直达漠北各游牧部落，这包括贝加尔湖周缘及以西直达斋桑泊以北的广大地域。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丝绸，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同时开拓了丝绸之路，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人类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309 宁夏境内的“丝绸之路”

——兼论唐长安、凉州北道的驿程及走向　　鲁人勇

（《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丝绸之路历代走向各不尽同，一般来讲可分东、中、西三段。东段，由古长安至凉州；中段，由凉州至安西；西段，由安西更向西而达西域各国。东段，在唐中叶前又有南北两种习惯走法。其南路，由长安出发沿渭河流域向西，途经天水、临洮、兰州至凉州。北路由长安西北出，经咸阳、彬县、泾川、平凉、然后穿过宁夏的固原地区而抵凉州。本文主要是讨论东段北路的一部分—在宁夏境内的丝绸之路。长安—凉州北路的形成要比南路稍晚，但最迟可追溯到西汉。由关中向西北到宁夏固原地区，秦代就已有大道。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于宁夏南部设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汉武帝

曾六次到这一带巡视，使这里的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到了唐代，由长安经固原而到凉州的大道发展到了极盛时期，是当时最重要的一条驿道。《通典》记开元间国内交通道路时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南至……北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唐代这条驿道的走向前人说是由长安至原州，再到会州，折向西南至兰州，再经鄯州而达凉州。作者认为，唐长安—凉州此道绝不可能绕兰州而走。最简单而又合乎情理的方法是根据唐代所设置的关、津来考证则最为有力。文章引证了《唐六典》资料后，详述了会宁津、会宁关、乌兰关，陇山关、木峡关的地理位置，并把几个通驿道的州、关、津相连，得出了唐代长安凉州北道的走向：泾州至平凉，过陇山关而达原州，再越木峡关到会州，折向西北至会宁关，由会宁津过黄河，再经乌兰关而至凉州。可是对这个结论，结合当地的山川、地形，以及历史记载的原州到会州三百九十里的途程来考察，这条比较平坦的道路仍非唐驿道走向。作者进而根据《宋史·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的有关记载，认为这条原州至会州的大道应由原州先循蔚茹川向北，然后经石门关附近的海原，再向西经河池（今干盐池）至会州。会州到凉州，仍经会宁关、会宁津、乌兰关等地不变。这种走向的理由，作者认为：1.沿途经过，有一些古地可考；2.沿途道路平坦，可通大车；3.宋代至今，这一线路始终是一条交通大道；4.这种走法与390里之数基本相符。至于唐代长安—凉州北道在宁夏境内的驿程，由平凉沿泾水而西，至甘肃陇东的安国镇，驿道随即进入今宁夏境，过弹筝峡，再西北即至瓦亭，瓦亭即陇山关，由此而北至青石岭，即今青石咀，再北至开城、原州治地平高，头营、三营，再西北行经黑城、贾埫、海原、安州，干盐池，唐名、河池，即至甘肃省境。省界又西一百一十里，即抵达会州。这条唐代驿道在宁夏境内共三百九十里。其中固原西北到甘肃省界二百八十里；固原东南至甘肃省界一百一十里。由宁夏到西域的古代交通路线还有几条。如唐末五代以至西夏时期的灵州—西域道，元代的六盘山—兰州—西域道，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走过的武威—宁夏—上都道等。但具有代表性，使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莫过于长安—凉州北道。

310　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　　　黄文弼

（《史学集刊》1937年第5期）

作者在本文中，首先对楼兰的历史沿革，以及楼兰在中西交通上之关系，书之甚详。昭帝四年（公元前83年），楼兰南迁伊循，改称鄯善，但楼兰故址，仍设候烽，以卫商旅。前汉时，中西交通多取于此，实为北道之要冲。哀平之际，中西交通隔绝，此路遂放弃。魏文帝黄初中，楼兰故地交通又行恢复，直至前凉末年，遂又放弃，苻坚灭凉，中西交通转移于鄯善、车师，而楼兰故地之交通路线为之荒废。

其次，作者又将《汉书》中之南北道及《魏略》所述三道，作了详细考证，认为《魏略》中之新道，正是西汉初年之北道。新道除不经罗布淖尔外，南北二道均经罗布淖尔之南北两面，而楼兰、鄯善又为两道之要冲。故汉初尝与匈奴争夺楼兰者，其原因就在于此。自楼兰南迁，鄯善转强，后汉之际，又与匈奴争夺伊吾，南服鄯善为国策。因两

地均系通西域之门户，居交通之咽喉，如被匈奴占领，则不能保证中西使者及商旅之安全。南北两道均开于西汉，历魏至东西两晋。但上述路线，均须经过敦煌，取道玉门关和阳关，故当时之敦煌与鄯善，实为中西交通之枢纽，丝绸之路的咽喉。

中国通西域之路线，除上述三道外，尚有吐谷浑道。作者根据《洛阳迦蓝记》中，宋云求经纪略考证，宋云所行经之路，即为此道，即吐谷浑人出入西域之道。宋云从洛阳西行，经陕西、过天水、陇西，再西北绕道青海之都兰，经柴达木盆地北边，穿过沙碛，经罗阿达格山口（清人称为噶斯山口），而至罗布淖尔南岸之密远（即鄯善）。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进击吐谷浑，也经由此路。作者认为李靖出柴达木盆地之北，沿阿尔金山，过噶斯山口，达新疆之诺羌，此即青海西宁赴新疆之道。此道在唐懿宗咸通间，回鹘取西州，吐蕃亡后，亦随之湮没。

宋室继兴，远隔辽、夏，史册虽记有于阗回鹘尝遣使贡献，实为商贾往来而已，路途所经，无准可记。作者所考者，仅宋太宗雍熙年间王延德使高昌一事而已。王所经路线，似由陕北东胜（即古夏州）西行，经宁夏，过阿拉善沙碛，至甘州渡张掖河，过马鬃山，直达巴里坤（即镇西），转南至哈密（即伊州），再由哈密西行至克鲁沁，达吐鲁番（即高昌）。据此，北宋通西域之道路，不仅不经行南面的吐谷浑之道，且汉唐之南北二道也不经过，而绕道于甘肃边外西行。当时西夏占有甘肃、宁夏一带，王延德所行，均属西夏境域，亦即西夏与西域之交通路线。元太祖崛起漠北，兼并西域，东西交通，遂又复开，但所经路线，则又以蒙古为起点。作者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和《马可波罗游记》考证结果，认为元太祖时之中西交通路线与元世祖时又有所不同。例如长春真人西行时，由克鲁伦河经土拉河，过爱杭山南麓，西南过阿尔泰山，达天山北麓，至唐之比庭督护，又傍天山北麓西行，过伊犁而达撒马尔罕，是为元初与西域之交通路线，此路取北大道。宋人南渡，僻处江南，与西域交通隔绝数百年，至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南宋，地跨欧亚，置驿于途，而中国与西域之交通复开。马可波罗东来行迹，则由波斯进至莎车、于阗、哈密、肃州、甘州，转北过亦乃集城（即居延城），至哈喇和林。所经路线，沙州以西完全经汉之南道，但自沙州后折北行，过额济纳齐而达和林，此又由蒙古至甘肃之南北路线。元世祖建都和林，而中西路线，较元初又有所变更。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冯胜兵至河西，置嘉峪关及甘肃等卫，洪武、永乐中，西域诸国内附，因此，西域之人入关者，皆取道哈密，并以其地，封元裔脱脱为忠顺王，以管辖之。凡使入贡者，悉令哈密译语以闻，是故明代以哈密为中西交通咽喉。明代虽势力不及西域，但交通路线仍保存旧来面目。清代因之，及近代无多变动。嘉峪关大道通行后，古阳关大道也早已荒废。

总之，中国历代通西域之交通，除汉代之玉门关、阳关道外，尚有吐谷浑道和元初之北大道。但自汉道开辟后，至唐代均以玉门、阳关为门户，而鄯善、楼兰扼其要枢。唐代虽移玉门关于疏勒河上，然亦不废阳关大道。自宋至清，则以北道为主，而哈密则为中西交通之咽喉。自明人防边，筑长城于嘉峪关，此地遂为中国西边之门户，中西交通之锁钥。自嘉峪关道兴起，而玉门关阳关古道遂废，所谓楼兰，久以被沙漠所湮没。时代虽已转移，路线已有变迁，但自汉开辟之中西交通，直至唐代，使节商旅络绎于途　东西文化交流盛甚，对世界曾作出重大贡献，成为金光灿烂的“丝绸之路”，中西

人民的“友谊之路”。

311 古代西域南道上的若干历史地理问题 王北辰

（《地理研究》1983年第2卷第3期）

本文根据史籍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有关记载，探讨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丝绸之路南道、和田以东至若羌间的三个历史地理问题：一、塔里木盆地南沿是否有一条“南河”？二、和田以东的绿洲数目是在逐期增多或是逐期减少？三、和田以东出现过几处绿洲城镇废弃和交通路线改线的现象，其原因是什么？关于有无“南河”的问题，作者首先描述了塔里木盆地南沿上的水系形态，追溯了“南河”提出的来源。“南河”首先是在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里提出来的。《水经注·河水二》记叙，河水出葱岭分为两支：一支东北流，注入泑泽即牢兰海（今罗布泊），是为“北河”；又一支自葱岭歧沙谷东流，注入牢兰海，是为“南河”。究竟有无南河？作者从古典文献记载及现代地理考察成果两方面作了探讨。检读引证了从西汉至清朝十四种史书、旅行记、地方志等多种古籍和六种现代地学著作有关西域水道的记述，全无“南河”的记载。这表明“南河”并不存在，不但北魏以前没有南河，北魏以后也没有南河。作者认为，《水经注》提出“南河”的原因，是因为作者郦道元并未到过西域，其注释西域水道依据的是各种古籍，在南河问题上则主要依据《汉书·西域传》与《释氏西域记》。而《释氏西域记》的作者释道安也未去过西域，而是从西域来长安的僧徒的传说中得到的材料。郦道元依据道安的间接材料而注《水经》中的西域水道，以致背离了经文，把于阗河（今和田河）与阿耨达大水（车尔臣河）连惯起来记作为“南河”。南河既不存在，从而证明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的水系自古迄今并未发生过大的变化。关于绿洲数目增减的问题，作者引述了《汉书·西域传》自阳关至于阗间各绿洲国的记载。自东而西依次为：鄯善（东南有婼羌）、且末、精绝、捍弥、于阗。又引证《新唐书·地理志》贾耽记“安西入西域道”沿线的伊循、鄯善、新城、悉利支井、祆井、勿遮水、兰城镇、移社堡、彭怀堡、坎城镇及《大唐西域记》所记于阗以东路程所经之媲摩、尼攘、覩货逻、折摩驮那、纳缚波，以及清末所编的《新疆图志》和《新疆乡土志》中所记和田以东的城、镇、聚落。又依据史书文献的有关记载，进行了详细论证，考完了这些绿洲城镇的具体地址、并把唐代史书所记与汉代史书所记的地点及清末文献所记地点加以比较，判明唐代于阗以东的绿洲城镇比汉代多出了五个：即彭怀堡、移社堡、兰城镇、覩货逻和新城。而清末的绿洲城镇又比汉、唐多出了若干处。这说明两千年来，和田以东的绿洲城镇是在逐渐增多而不是减少，说明新疆各族人民在于沙漠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总的趋势是前进而不是后退，是胜利而不是失败。关于几处绿洲城镇的废弃和交通道路的变迁问题，作者从历史地理角度，对米兰、安迪尔废墟作了探讨。从史书文献的记载中，说明覩货逻、且末、鄯善等城均曾在隋末、唐初荒废，后又陆续恢复，其荒废时间是短期的。其原因并非地理的恶化，而是战乱破坏的结果。至米兰、安迪尔的废弃，则是由于河流改道，绿洲迁移所致并非由于沙漠化。至交通道路的变迁，则是因一些镇城废弃所致。据尼雅废墟（精绝）出土的佉卢文简记载：唐代以前的古道从且末而西曾经过今之

安迪尔、雅通古孜、再趋尼雅废墟，而后沿尼雅河南行，过今民丰、于阗而至和田。后因精绝于西晋末年废弃，旅行者逐改走尼壤而不走精绝。本文最后还探讨了丝绸之路南道以若羌向东至古阳关、敦煌的道路变迁情况。认为系因清代乌鲁木齐不断发展繁盛，入疆官民皆走安西至哈密路线。阳关路乃日趋冷落以至荒废。

312 丝绸之路南道中我国境内帕米尔路段调查 王炳华

（《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古代“丝绸之路”南道的路线，在我国《汉书·西域传》中早有记载：“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又据《后汉书·莎车传》记载，如西越帕米尔高原，其具体路线是从莎车“西经蒲犁、无雷至大月氏”。本文作者先后于1972年至1982年两次到塔什库尔干地区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古调查，并登上自塔什库尔干县去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中亚地区的一些主要山口，对一些古代遗址进行了试掘。本文是这两次调查的成果的介绍。据作者考证，莎车在汉代是处于于阗与疏勒中间的一个大国，位于今天的叶尔羌绿洲地区，包括莎车、泽普、叶城毗连一起的三县。自莎车进入帕米尔有三条道路，一是清代驿路：即自莎车县城西南行，翻越奇奇力克冰达坂，经塔合曼至蒲犁（塔什库尔干）；二是自叶城县至塔什库尔干；三是自莎车经塔什库尔干大同公社至县城。从塔什库尔干出发，前往中亚广大地区如罽宾（克什米尔）、大月氏（阿富汗）和苏联中亚地区，最主要的翻越红其拉甫大坂、明铁盖大坂、瓦赫吉里大坂，也就是去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几条谷道。经塔合曼、苏巴什大坂至喀拉湖，前去苏联中亚地区，也是一条坦途。本文对这些路线所经的地点、地名、地势、自然景观、气候、物产、历史遗迹等均论述甚详。如对红其拉甫大坂通道所经之克孜库尔干，即国内外知名的“公主堡”遗址的地势和现状，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对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塔什库尔干县城进行了认真的考证，用塔什库尔干县城的地势、地形和物产，对照《新唐书·西域传》和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关于渴盘陀国的记载，认定目前塔什库尔干县城所在地区，就是唐代渴盘陀国都城所在，亦即唐代葱岭守捉置镇之处。并对石城遗址的地势、建筑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对试掘情况也作了具体的介绍。作者还认为，渴盘陀国，似为汉蒲犁国地。对“丝绸之路”南道中我国境内帕米尔路段的调查，不仅有助于对这条古老路线的了解，对古代莎车、蒲犁、无雷等今地、疆域的考证，而且对研究帕米尔地区的历史、地理，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313 试论唐贞观年间所开的大碛路

——兼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 郑炳林

（《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周连宽先生所著《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一书，对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论及贞观六年所开大碛路时，似有商榷之处。本文针对此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据《通鉴》、《旧唐书·西域传》载，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焉

耆王突骑入贡，请复开大碛路以便行旅，太宗许之。焉耆与高昌结怨久深，初因北周时焉耆龙姓王复国，赶走高昌派遣的麴姓焉耆王。隋及唐初，焉耆、高昌同附属西突厥，但高昌较焉耆，同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入贡次数较焉耆为多。高昌与焉耆积怨原因，并不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上，而是在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由于焉耆与高昌素有积怨，而焉耆与中原的贸易常受高昌控制，焉耆力图摆脱这种局面，所以提出"复开大碛路"的请求。

唐以前，大碛路即已开辟。据《魏略·西戎传》记载，自敦煌经楼兰达龟兹，称为中道。中道中经尉犁国。尉犁北去焉耆百里，为焉耆边防重镇。北魏取焉耆时，首先攻占尉犁，史书虽未载明道经焉耆，而实际过焉耆国境。此中道即所谓大碛路。具体路线约从楼兰沿孔雀河西北行，经危须、尉犁，然后傍塔里木河西至龟兹。自汉开辟，至北魏沿用不废。北魏开拓西域时，败焉耆国，设焉耆镇；后来车师保焉耆镇，与北魏王朝联系，主要取此中道。北周时，焉耆龙姓王赶走麴姓，保定四年（564年）入朝进贡，也取此中道。当时因北周与北齐激战，无力顾及西域交通，此中道闭塞，故焉耆仅入贡一次。隋炀帝大业年间，丝路贸易十分繁盛。据史书记载，隋与西域诸国有贸易关系的共二十三国（族），其中十九国的关系即在大业年间建立。当时，此路至为兴盛。后因隋的国力衰弱，遂又闭塞。这条道路经莫贺延碛，过白龙堆，行途艰险困难，焉耆一国无力开辟，故请于唐"复开碛路"。复开之后，因直接影响高昌国的过往商税，高昌国与西突厥通好，凡西域朝贡过其境者，咸见掠夺，致使高昌道、伊吾道数年不通。但因大碛路复开，西域贡使仍然不绝，焉耆入贡反而增加。

丝绸路上，自敦煌通西域，过去定论的有三条道路，即：出阳关沿阿尔金山北麓至鄯善、于阗等国的南道；出玉门关往西北越大沙海达高昌的大海道；出玉门关北至伊吾、再西达高昌，再北至天山北麓的铁勒、西突厥的伊吾路。本文通过对北朝，隋、唐时期大碛路的分析，可知除上述已有定论的三条外，尚有出玉门关沿蒲昌海北岸、过白龙堆、楼兰而达焉耆、龟兹的大碛路。这四条道路，并行不废，其中，伊吾路和南道行途较易，而大海道、大碛路险阻难行。尤其大碛路，只有在中原王朝兴盛时期才有力量开辟通行，一旦中原动乱衰落，大碛路也随即闭塞。所以大碛路畅通与闭塞的历史，实际也是中原诸王朝兴衰的历史。

314　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

——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　　　　孔祥星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年第3期）

本文根据新疆出土的唐代文书，探讨了新疆地区交通组识长行坊的组织、任务和制度。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征服了高昌、焉耆、龟兹，统一了新疆地区，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和交通组识，配备了交通工具，形成了较完善的交通网。这些交通机构对保证各级政权组织的密切联系、有效地执行唐朝政府的政策法令，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唐代新疆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唐朝建立以后，发展了前代以来的驿传制度，规定30里设一驿，不是交通大道的叫做馆，全国共设驿馆1639

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的86所。每驿皆设驿长一人，按各驿的忙闲确定马数。新疆地区也按这些规定设置了驿馆。仅从史籍文献中发现有记载的即有20多所。除此之外，新疆出土文书中还出现了一种名叫长行坊的交通组织。这种组织在史籍文献中从无记载，直到有关文书出土并经学者研究之后，才引起人们注意。经作者研究考证并引用出土文书的有关记载，认为长行坊的组识，在州、县均有设置。其时间最早的是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最晚的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这虽不能确切证明长行坊的起始和结束时间，但可反映出这一机构在新疆地区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长行坊放牧、管理着许多牲口，有骆驼、马、驴、牛、骡、羊等，以马为最多，故长行坊也称为马坊。其任务是供官吏及一般人员和家属乘载，不承担大宗运输任务。所谓长行牲口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始发地直达目的地，途中不用换乘其它牲口，完成任务后再返回始发地；二是各州的长行牲口承担着州与州之间的使者乘载任务，以一州为起点，另一州为终点。从现有文书看，各州长行坊的交通路线有：西州至伊州、西州至北庭、西州至焉耆。至于县一级长行坊的交通路线尚有待于更多文书资料的发现。故所谓长行牲口，即是完成较长距离出使任务的牲口。长行坊的机构和人员：有牧马所（接受使回的长行牲口）、长行群（负责放牧牲口）、槽（既是厩、圈，为喂养牲口的设施）。牧马所的人员有典和马兵，长行群有群头和马配兵，槽有槽头。此外长行坊的人员还有马子（马夫）、驴子、兽医、检牧人、押官、长行典、专当官、检校长行使、检校官等。长行坊对牲口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设有多种簿籍，建立申报和审批条例。长行坊由都督府兵曹管辖。长行坊是与驿馆并存的交通机构。它是根据任务和条件所采取的一个制度，是沿袭前代以来行之有效的办法，在承担不太紧急的任务时，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所采取的管理交通运输的措施之一。它承担着繁重的送使任务，有利于各级政权组织的联系和主要交通工具——马的管理。

315　丝绸之路和古代于阗　　殷　晴

（《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

本文是作者在新疆史学会举办的"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材料，后经整理成文并予发表。文章主要内容包括：赛里斯一名起先所指的地理区域；汉代丝绸之路的主线；于阗在丝路交通上的作用、发展变化及对古代于阗地方的影响等。据古代希腊罗马学者的著作记载赛里斯（Serice）即丝国这一名称，起先使用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城国。据称公元前三世纪大夏国王拓土至赛里斯国，赛里斯国的东部与秦尼国接壤，它位于秦尼国以北，世界上极东的地方就是秦尼国。赛里斯国四面环以高山，南部疆界至印度恒河为止。上述地理环境与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于阗诸绿洲城国极为相似。这时的赛里斯国即为古丝道上的中继站——昆仑山北麓诸城国。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方互相增进了了解，当西方人士知道丝的故乡，还在极东中国内地的时候，丝国的这一称号，就逐渐演变为全中国的称呼。据《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时中西交通虽分南北二道，实际上当时在新疆境内以南道为主，它和北道通过支线紧密相连。南道所经之处，由精绝、扜弥、于阗乃至莎

山。当时去北道诸国也往往由南道西行至疏勒后，再继续沿北道而去。有的人认为丝绸之路“所有各路，都在喀什噶尔会合，然后又分道扬镳，”实际不确。南道干线是西行至莎车后，“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而不是北折疏勒。莎车至疏勒实际上是南道移向北道，或者说是把南北二道连接起来的一条支线。当时把南北道连接起来的还有一条路线，通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接姑墨，南抵于阗，这条路线大体上沿于阗河而行，所以能经久不断。作为南道的干线，在皮山、莎车一带分为两路，一路从莎车西行，越葱岭而向大月氏、安息进发。一路从皮山或莎车西南行，经乌秅、涉悬度，入印度次大路，亦可续行至乌弋山离，“转北而东得安息。”后者和莎车至蒲犁即塔什库尔干的路是一致的。它是南道上一条主要的干线，在古代中西交通史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于阗和罽宾的往来路线还有捷径可行，于阗国在迦湿弥罗即汉时罽宾东北过雪山，即可直达。于阗通过北道和罽宾间，不仅有商业往来，还有传播宗教或其它思想文化上的联系。

汉晋以后，南道的通行由于自然（流沙）和政治的影响，已不如从前。走南道的亦往往绕道青海而行，如宋云、惠生是从洛阳西行至赤岭，入吐谷浑境，由其都城伏俟城西过鄯善、且末抵于阗后继续西行，过朅盘陀、越葱岭而入印度。但敦煌至鄯善这条道并没有被废弃，直到宋代这条路依然通行。于阗作为中西陆路交通的中继站，在商业往来上仍起重要作用。这时走南道的西来商人，至于阗东边亦多折向东南绕道青海，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动乱，出于安全上的考虑。

丝绸之路的畅通，使于阗等城郭诸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于阗已开始育蚕植桑，至唐代这里的丝织手工业已相当发展，使得于阗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中继站，而且也是以生产丝绸著名并为输出丝绸的产地。从汉代起于阗作为南道重镇，能自铸货币，开新疆古代铸造地方货币的先例。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于阗成为印度、波斯、希腊和中国四方面文化的会萃点，为我国历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316　关于汉代“丝绸之路”中段路线问题

——与李约瑟、齐思和等专家商榷　　　　英任南

（《世界历史》1979年第5期）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创丝绸之路的新纪元，丝绸之路遂闻名于世，中外著作对此多有记载，后世研究者接踵不辍。但至今对丝绸之路中段的路线，仍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当代英国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认为，丝绸之路从敦煌分南北两路西行，至疏勒会合，然后又分道去大宛和大夏。我国齐思和教授则认为，南北两路至大宛会合，然后西去安息。本文不同意上述二说，并根据中外史籍文献记载进行了考证。据《后汉书·西域传》和公元二世纪希腊学者托勒密所著《地理志》以及隋裴矩所撰《西域图记》的记载，丝绸之路南道从敦煌经于阗至莎车；从莎车折西入葱岭，过蒲犁、无雷、石塔，进入大月氏，经巴克特拉，抵安西东部木鹿城。在木鹿与北道会合后，继续西去安息、罗马等地。北道自敦煌至高昌，经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度葱

岭，又经钹汗（今费尔干纳）、苏对沙那国（大宛贰师城）、康国（撒马尔罕）、曹国（劫布坦那）、何国（屈霜你迦）、大小安国（捕喝）、穆国（木鹿）至波斯，达于西海。在木鹿与南道会合，然后西去安西、罗马。至于南北两道在疏勒会合，汉魏史书概无记载，亦不符合商队贸易利益，故非历史事实。至于齐思和所说南道从莎车到大宛，其依据可能是《汉书·陈汤传》中"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一句，但此通道并非丝绸之路干线，其理有三。一是甘延寿、陈汤分兵进击在康居的郅支单于，北道从乌孙直过，南道从莎车径穿大宛，从军事战略着眼，采取最捷便的直径。这明显是指进军路线，并非指丝道。进军道路与商业贸易大道二者不能等同。二是陈汤传中偶尔提及这条进军路线，其他中外史籍中未有涉及这路线的记载。既是一条主要商道，中外各家在记丝绸之路的著作中，不可能不进行记录或反映。三是从莎车至大宛路远，从敦煌沿南道西去的商品，主要销往大月氏，天竺、安息等地，不会有大量的商品到了莎车后再绕道去大宛销售。故"至大宛而南北两路合"的说法似难成立。

317　汉唐时代中西交通概述　　　　步　履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0年第2期）

本文从汉、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介绍了"丝绸之路"开拓、发展和繁荣昌盛各阶段的简要情况。

汉武帝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开拓与西方各地的贸易交通，于公元前一三八年招募人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应征后，汉武帝派他带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派遣的代表团。这次行动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带回了大量西方各地的地理情况和文化知识，同时也促使汉武帝斩断匈奴右臂、发展河西走廊交通的决心。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率军西进，反击匈奴，打通了河西走廊，为维护国家民族统一和沟通西域交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于公元前一一九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东西方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考察了"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情况；获悉了西方各国和西域地区的人口、物产、交通、气候、风土人情、以及方位距离等。张骞之后，出现了出使西方各地的热潮。汉王朝每年都要派出使团，形成了"使者相望于道"的情景。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和组织统一的防卫体系，汉收复河西走廊后，随即把秦长城加以整修，沿线开荒屯田，并设置酒泉、武威二郡，把长城从令居向西延伸到酒泉。公元前一一一年进一步分酒泉西部之地设敦煌郡、分武威西部之地设张掖郡。公元前一〇八年，又把长城西延至玉门关，在玉门关的东南部并设有阳关。采取了"列四郡，据两关"的防卫措施。到了汉宣帝时，开通了"丝绸之路"北道，并设都护维护地方秩序，保护交通安全。汉代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对维护丝绸之路的安全，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为唐代中国与西方各地贸易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丝绸之路到了唐代，在汉代南北两条道路之外，又增加了天山以北的道路。这条道路上的主要地有庭州、轮台、张堡守捉、石漆河、弓月城、伊犁河、碎叶城。为了保证道路的畅通无阻，唐代从河西走廊的凉州起，直到天山南北各条大道上，在凡是称为军、镇、城、守捉的地方都驻有军队。各地驻军有事作战，无事屯田，不但保护了商旅

的安全，而且开发土地，进行粮食生产。这些驻军加上各种官吏、后勤人员、家属和当地居民，就形成了散落在丝绸之路上的许多繁华城市和富庶地区。“是时中国盛强，有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它是联结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各国的友谊之路，一直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称颂。长安之所以成为秦、汉、隋、唐时期的都城，作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古代中国海上交通尚未发达之前，西安是黄河流域各大城市中与西方各文明古国交通往来比较最便利适中的地方。汉、唐长安的繁荣富丽，与丝绸之路的存在是分不开的。

318　丝绸之路—汉唐时期中西陆路交通　　　赵永复

（《地理知识》1973年第1期）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我国人民和中亚、西亚和欧洲人民就有着友好往来和传统友谊。丝绸之路便是这种往来和友谊的最好见证。本文概述了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的自然风貌、沿线国家、城市及走向，以及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情况。

汉唐时期的政治中心在长安和洛阳一带，国家势力远及帕米尔高原以外，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文章论述了帕米尔高原及其周围的地理形势和国家情况，其中有西汉时的条支、安息、大夏、大月氏、大宛、乌孙、康居、奄蔡。还论述了西汉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情况和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各条具体路线及所经地点。又从近代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我国的丝织品和中外钱币，证实了古代史书关于丝绸之路繁荣景象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交通的盛况。文章认为，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表明了我国和中亚、西亚及欧洲各国人民有着悠久和密切的历史联系，它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梁，是联结东西方人民友谊的纽带，在历史上起着巨大的作用。本文简明扼要、对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情况，论述得全面而具体。文内附有张骞通西域的地图，是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材料。

319　龙门所见中外交通史料初探　　　温玉成

（《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洛阳是大唐王朝的东都，寺院林立，胡贾云集，商业繁盛，实为当时一个繁华的国际性城市，因此中西经济、文化在这里都有所反映。

本文通过对龙门2839品造像记进行了初步探索后，发现了一批涉及中外交通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都是前辈研究者所未曾涉及的。洛阳既是一座国际都市，它的“国际性”，也必然会反映到龙门来。唐代在龙门有著名的“十寺”，其中有三座寺院就是为外国僧人所建。此外还有葬于龙门的一些外国高僧。《龙门山天竺寺修殿记》曾记有：“西京龙门山天竺寺，………唐代宗即位之元年，梵僧五百自天竺来。”这说明唐代龙门寺院有大量的外国僧人。作者从探索造像记中发现有中外交通史料的记载，为丝绸之路的研究另辟蹊径。在这些造像记中，有唐代旅行家王玄照、王玄策二人的；有突厥人阿史那忠和史暕父子的；有朝鲜半岛新罗国僧人和留学生的；有华严宗的开创者贤首法师

法康藏的；有突厥安国人安国泰的；有疏勒国裴婆的；有为康居国各个胡人造像的居士殷朋先的；有吐火罗（即巴克特里亚或大夏）僧人宝隆的；有移居高昌国的汉民张安的。还有一些造像记似为西域疏勒、康国、安国、史国、石国之人，作者也列以存疑，待发现新资料以资断定。这些资料的发现，为证实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景象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并为研究中西交通史增加了新的史实。

320 伊斯兰教产生前香料之路的变迁　　安维华

（《世界历史》1981年第5期）

近年，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往往涉及到西方香料向东方贩运的路线问题。从已有史料记载和人们研究的结果，都认为香料输入我国主要是通过丝绸贸易线而来，宋代以后随着海运的发展，丝绸贸易线以海路运输为主，我国丝绸、瓷器等，从海上源源运往西方，西方的香料、药物及其它物品输入我国。因此对香料之路的研究与丝绸之路的研究关系极为密切。本文重点研究古代阿拉伯半岛香料贩运情况，同时也涉及阿拉伯与印度的交通问题，这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不无参考，故予介绍。

本文一开始就提出如何估计伊斯兰教产生前香料之路的变迁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认为首先需要搞清楚在阿拉伯半岛及其周围，地中海与印度间的商路究竟有几条，波斯与拜占庭的战争对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才能恰当地说明香料之路的变迁同伊斯兰教产生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同丝绸之路并非始终是一条道路一样，香料之路也并非始终是一条道路。同丝绸之路相比，香料之路的历史更要久些，兴衰移易的过程也更长些。古代埃及人在死人身上涂香料防腐，所需香料须经海路到阿拉伯半岛南部买来。最初半岛上的商队贸易从半岛南部向东，经阿曼运到卡提夫附近的盖尔哈，再向北运。后来由于美索不达米亚经常发生动乱，于是就出现了经过阿拉伯半岛南部和西部的陆路。从公元前十世纪起，人们就能够用骆驼商队，把佐法尔地区所产的乳香、没药和肉桂等香料以及来自印度洋的货物经陆路运至加沙，这就是著名的香料之路。公元前三、四世纪，罗马人发展了红海沿岸的贸易，大约在公元前274年，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又大力发展同印度的海路贸易。这样，埃及和罗马的商船得以直通东方，带回过去由阿拉伯人经营的东方丝绸及其它奢侈品。在阿拉伯半岛东边，波斯湾和印度之间的海路，在巴比伦时代便开辟出来了。当公元330年，罗马帝国将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时，在阿拉伯半岛及其周围存在着三条主要商路：从也门经半岛西部向北去的商路、红海商路及经波斯湾和波斯到叙利亚的商路。由于这些商路对周围地区的经济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自三世纪以来便成了阿拉伯半岛周围强大帝国争夺的目标。对商路的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拜占庭与波斯这两大帝国的激烈争夺。波斯帝国不仅控制着通往拜占庭的丝绸之路，而且控制了印度的贸易和通往印度的陆路和水陆。双方为夺取商路的控制权，不断发生战争。由于波斯控制着同印度的贸易并占领了也门，所以波斯湾的贸易则得到发展。麦加大约是在公元400年开始兴盛的，至五世纪末，它已成为阿拉伯半岛上最大的商业中心。麦加商路本身同麦加商路所处的国际环境这两者之间是有密切的联系。商路改道前后，麦加商业虽然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之中。导致伊斯兰

教产生的诸因素中，社会动荡是一重要因素。险恶的国际形势虽然没有导致麦加商业的“日趋衰落”，但却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感。公元六至七世纪初，外族的入侵促使阿拉伯的民族感逐步觉醒和受到激发。为了抵御外族的入侵，保护千万人赖以维持生计的商路，需要确立一种新的宗教，以便用宗教世界的统一促进和实现世俗世界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通商道路的改变，阿拉伯半岛南部城市商业的衰落和毁灭，对伊斯兰教的创立也是一个推动，是“伊斯兰教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香料之路的发展与变迁也有一定的影响。

321 中印交通的演变　　郭廷以

（《世界政治月刊》第7卷第3期）

本文是对中印交通之全面论述。中印交通应分为陆路交通和水路交通。文中对中印水路交通虽也论及，但主要的还是陆路交通。陆路交通又以西域交通为主。本文中除对古代传说中之中印文化关系和中印交通问题，进行了考证外，着重考证了有史以来的中印交通。自张骞使西域至大夏时，见邛杖蜀布，其国人告之来自身毒，此为我国对印度关系之最早记录。武帝听从张骞的报告及主张，决定从西南方寻求去印度的国际路线以达西域，经四年莫能通，而西北方面之道，不久即已畅通。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抵达乌孙后，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数年后，这些副使与各该国人具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这是中印间第一次通使，两国关系至此正式建立。不过在西汉时而东来者，多为商贾，欲通货市，以献为名。东汉时，中印关系愈为密切，所以《后汉书》关于天竺的记载，也较前为多，先有明帝时汉使之西去求法，续有和帝时印使之屡来贡物，所有往来，均遵循中亚陆路。后因西域战乱，陆路为之隔阻，不久又行复通。但在全部中印关系史上，最大问题，莫过于佛法的东传。佛法东渐，虽亦有自海道而来者，但以西北陆路为主。于阗、疏勒、莎车、龟兹、焉耆、敦煌、凉州等地，为中西交通之要道，也为印度佛教东传之要径。印度大僧之东来，中国信使之西去，成为中西交通史上之异彩。自四至六世纪，这些文化使者，前后相望，不绝于途，尤以四、五世纪为最盛。东来的印度名僧有竺佛图澄、僧伽提婆、鸠摩罗什、昙无谶等，西去求法著名的有法净、智严、智猛等，其成就最大、名声显著者则为法显。六世纪初年，又有宋云、惠生之西行。到了唐代，中印间的关系又进入了新阶段，宗教文化方面，有玄奘之伟绩，政治外交方面，有王玄策之丰功，前者超越法显，后者匹敌班超。故四、五世纪（晋宋之际）及七、八世纪（唐初百年），可谓中印交通最为活跃之两个时代。八世纪以后，两国形势均有所变化。北宋初年（十世纪后期），东西往还尚未间断，前去求法者时有之。迨至十一世纪以来，宋室不振，印度亦受回教徒之侵扰，佛法大衰，东西往来之事，几不再闻。但海上的贸易日益发达，中西交通则以海路为主，此后，印度则成为海上中西交通的中继站。

322 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　　范祥雍

（《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

七世纪前期，西方羌族的一支吐蕃（即藏族）强盛起来，其王松赞干布“慷慨材

雄”，唐太宗李世民应其所请，以文成公主许嫁，结成联姻之好。这是汉藏两族建立亲善关系之始。从此长安与逻些城（今西藏拉萨）之间使节和人民来往无阻，其时又新开辟了一条经吐蕃往泥婆罗国（今尼泊尔国）进入中印度的国际通道。作者鉴于我国史籍对此通道未曾注意，虽间有涉及，亦不能详。因此，专就此问题作了探讨。最早记载这条通道的是唐初僧人道宣(596—667年)，在他的《释迦方志·遗迹篇》中，对此通道的起止地点，沿途所经国家城镇里程，以及山川险阻等情有简略记载。但对《遗迹篇》一文向无校释，经作者考证各有关资料，对其中的东道、河州、大河、曼天岭、鄯州、鄯城镇、承风戍、隋互市地、青海、吐谷浑衙帐、白兰羌、积鱼城、多弥国、苏毗国、敢国、小羊同国第二十四条作了详细注释。道宣之文是第一篇记载唐——吐蕃——泥波罗通道全程的文字，所记虽疏阔，但在吐蕃道开辟之始，能记录这份材料，殊为可贵。《新唐书》记载唐蕃交通的有二处，一处是《地理志》陇右道鄯州鄯城下的注文。作者对注文所提到的四十一处地名附有小笺，其中有些条是对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考证的择译。《新唐书·地理志》的注文未明言所据，从内容来判断，（1）记述鄯城至赞普牙帐行程较详，且历记驿名、里数及吐蕃迎使之处，可假定其为唐使入蕃之路程指南书。（2）文内所记唐朝地名最迟为天宝八载更名之天威军，其时代可能为天宝末年，，与历史情况亦相符。作者以为这是依据天宝时唐使入蕃行记记录下来的。道宣记载吐蕃的行程太简，此正可补其缺。另一处是《旧唐书·吐蕃传》记穆宗长庆二年(822年)遣刘元鼎赴吐蕃会盟事，文中节录了有关地理部分。作者在文后也附有地名小笺七条。这段记载对时代和人物交代清楚，大约就是依据刘元鼎本人或其随员所写的行记而作。其时唐已失去河西走廊、安西、北庭都护府等地，吐蕃势张，西道阻绝，唐蕃之间只有外交使节来往。作者还附带叙述了吐蕃和泥婆罗、唐朝和泥婆罗与通道的关系。吐蕃——泥婆罗通道开辟于先，接着唐蕃联姻，开辟唐——吐蕃通道，两条通道连贯一起，就成为中国通往印度的吐蕃道。因之，这条通道不仅关系到唐蕃两族的亲善，也关系到唐泥二国的友好。文中附有“唐代吐蕃道行程略图”。接着作者又继续研究了当时在这条通道上人物活动的情况。自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之后，唐蕃关系密切，双方使臣不绝。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王玄策和李义表，尤其是王玄策曾三次出使赴印度，取道于吐蕃新道，建立奇勋，促进了唐、吐蕃、泥婆罗三方的关系，影响至为深远。另外，僧侣往来也较频繁。原来中国和西域僧侣的来往行途，除少数人由南方航海之外，大多数是循今新疆天山路而行。吐蕃通道的开辟，比起旧道，较多方便。1.旅程缩短；2.只要得到吐蕃政府许可，通行少碍；3.通译比较简易。唐时僧徒经过吐蕃和泥罗国者有玄照、道希、道方、道生、末底僧诃、玄会等人。僧侣之外，蕃商贩卖唐货者不乏其例。

这条通道的开辟，有南北两段，北段为唐蕃线，南段为蕃泥线。把南北两线衔接起来。遂成为一条唐——吐蕃——泥婆罗新的国际通道。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义表、王玄策出使天竺，即经此道。故此通道全线开放至迟不过贞观十七年（643年）。吐蕃通道的关闭当在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入残羁縻十八洲，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唐名将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保护吐谷浑王还国，率师十余万，至大非川，为吐蕃所败，此后这条通道，据作者所知，尽管唐蕃两族曾重新婚好与

盟会过，然而形势改变，原来通道未见再行开放。考唐朝与吐蕃发生关系首尾二百余年，此二百余年的经历，时和时战，“或驰或张”。变化多端。吐蕃长时期为唐大患（尤其在安史乱后），国势受其削弱，但他本身亦因扩张过大，无力控制，终于分裂衰微。

323 粟特人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 （自公元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 芮传明

（《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

粟特人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就已生活在中亚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他们的故乡称为粟特地区或粟特（Sogd）。粟特人自有史以来几乎一直受到外族的控制，亚历山大帝国、塞古流王朝，以及康居人、月氏人、贵霜人、哌哒人、突厥人都曾占领过粟特，在政治上控制过他们。但粟特人却能借助政治上的因素和他们地处东西方交通要冲的地理优越条件，不断加强商业活动。中国史书上常提到的“善商贾，争分珠之利”的康居人就是粟特人。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后，粟特人就和中国有了交往。在敦煌地区发现的所谓“粟特古信”，即可证明在公元四世纪初，敦煌地区已有了大量的粟特移民，商业活动已深入中国内地。但更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和在东西方世界的空前频繁交往，则始于公元六世纪中叶，即我国北方的突厥民族在中亚建立庞大的汗国以后。本文通过中外史料，经过分析研究，揭示了公元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在突厥统治下的粟特人对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引起的作用和贡献。首先在政治方面，粟特人参与了突厥汗国和其它大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如西魏大统时遣酒泉胡安诺槃陁使突厥，致使突厥依靠东方大国摆脱柔然的控制，及至后来发展到双方和亲，往来极密。隋末，李渊借突厥之兵图天下，促成其事的是康鞘利（或康稍利）。据考证安诺槃陁和康鞘利均为粟特人。另外，粟特人在西突厥室点密可汗的外交活动中也极为出色。室点密急欲控制丝路贸易线以图巨利，两次派遣由粟特人组成的使节往波斯，均告失败，后又派使节直接通好拜占庭，并取得很大成功。嗣后粟特人影响并操纵突厥汗国统治者的情况到后期愈益严重。

其次，突厥兴起后，粟特人大规模向东移徙。据考古所得，早在公五六世纪，粟特人就在楚河南岸的阿克贝欣建立了贸易城市。学者们认为阿克贝欣就是中国史籍所称的碎叶城。考古工作者曾在阿克贝欣发掘出用粟特文铸成的突厥钱币，这是粟特人和突厥人共同开发楚河流域经济的见证。粟特人不仅在楚河流域，而且在塔拉斯河、伊犁河流域罗布泊及蒙古草原等处建立了许多移民居地，迄今所知，在罗布泊以南就有著名的艳典城。据史籍记载，唐初粟特人在罗布泊以南建立的移民城镇至少在四个以上，这些人对东西方经济交流都曾起过重要作用。隋唐之世，东西方在丝路之上贸易兴旺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银道”的活跃。所谓“银道”，就是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的向东流通。由于这两种都是国际货币，它们的出现是与东西方贸易相关联，近来陆续在新疆、青海、河西、长安及其它城市均有不少发现，其数目之大即可证明东西方贸易规模之巨。

再次，粟特人对突厥在文化上最大影响是促进突厥文字的创造。据考古发掘证明，

六世纪后半叶突厥人仍以粟特语作为书面语言，一百年后，即七世纪后半叶他们才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字。粟特人对突厥人在文化上另一较大影响是宗教。突厥民族在兴起之前信萨满教，但自室点密与波斯结盗共灭哌哒后，突厥人占据了粟特地区，随着与粟特人交往密切，逐步接受了粟特人所信奉的袄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有“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据此推测，突厥人之信奉袄教约在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中亚地处交通要冲，东西方各种文化在此会集交流，且因中亚地区政治结构松散，当地居民（包括粟特和突厥人）对各种宗教比较宽容，数教并存，互相传播是较为普遍现象，而粟特人所信奉的袄教对突厥人的宗教信仰则发生了深远影响。

324 关于玄奘从跋禄迦国至赭时国的一段行程 周连宽

（《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唐朝高僧玄奘所撰《西域记》是中外交通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玄奘西行所经地点，有许多隐晦难明之处，学者考释意见不一。本文谨就跋禄迦国至赭时国的一段行程中的五个地点，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凌山。《西域记》所谓葱岭北原的凌山，究在何处？有三种说法：一是指今木素尔岭，二是指拔达岭，三是指木素尔岭即拔达岭。作者引用徐松《西域水道记》、杜环《经行记》和贾耽《皇华四达记》的有关记载，对照《西域记》的记述，从方位、距离等进行详细考证，认为以上三说均难成立，玄奘所谓凌山，应为汗腾格里山，他所越过的山隘乃此山西南隅的粟克托尔山隘。（二）大清池（热海）。即今之伊斯色克库尔。但玄奘是否亲到大清池？如果亲到，是走南岸还是有北岸？学者意见不一。经作者考证，认为玄奘曾亲到大清池，并取道北岸至碎叶城。而碎叶城并不在今之托克马克，而应在哈喇波尔第与哈林宁斯克之间或其附近地区。（三）千泉。多数学者认为千泉位于阿历山大山北麓、托克马克与奥利——阿塔之间的大道上，但对其具体地点意见不一。作者认为千泉应位于怛逻斯城（奥利——阿塔）以东约150里的地方，相当于今之阿该托布与泼得果尔诺之间及其附近地区。（四）白水城。对白水城的位置，学者有三说：即今奥利——阿塔西南方的曼肯特城、伊斯非得甲布（相当于今之赛兰）和齐木干特或其附近。这三处地点都在阿利斯河以南、巴达木河以北的区域内，相距不远。但与《西域记》所记之里数不符。作者认为唐代的白水城，不在上述三处，而应位于阿克苏河的上游，约当今的马丹尼或其附近。(五)笯赤建国。中外学者对笯赤建国的位置，不但主张不一，而且含糊其词。笯赤建国即《新唐书》的笯室羯，义为新城。要解决笯赤建国的位置，必须重新考定唐代赭时国都城的位置。作者认为唐代赭时国的都城不在今塔什干城，而在塔什干之西约50公里的旧石城。笯赤建国都城即在塔什干之东约25公里的养吉——巴沙儿。由此地向北约17公里处，在今齐尔齐克与柏尔塔拉齐克之间，即恭御城的所在地。作者根据以上论点，测定了从跋禄迦国都城至赭时国都城的详细路线。本文引用资料丰富，论证周详，对研究丝绸之路很有参考价值。

325　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　　　　黄盛璋

（《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

本文考证研究了《玄奘传》回鹘文译本残卷五中所记述的唐代高僧玄奘自印度取经回国，从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到长安的路程所经之地望与对音。《玄奘传》原名《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共有十卷。前五卷为长期作玄奘译经助手的慧立所撰，记述了玄奘于唐贞观十九年正月还至长安以前的事迹，题名《慈恩三藏行传》，埋藏在地下。到慧立病危时才命门徒从地下挖出而卒。后由玄奘的弟子彦悰补续了后五卷，记述了玄奘回国直到死去的事迹，并改称现名。后又由高昌别失八里僧官详古舍利译为回鹘文，题为《菩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个译本在1930年或稍前出土，落入一商人手中被拆散出售。现在一部分藏在北京图书馆，一部分藏在法国基密博物馆，还有一部分藏在苏联。1980年苏联出版了回鹘文专家吐古舍娃《回鹘文译本玄奘传残卷》，属于原书卷五最后部分，亦即玄奘回国的后半；从进入新疆塔什库尔干开始，直到回到长安。本文考证回鹘文译本《玄奘传》出土的时间和地点，介绍了《玄奘传》撰述经过与回鹘木译者与时代，以及国内外学者研究情况。特别是着重考证了玄奘回程中所经及涉及的地名对音与地望。这个译本原说出土于南疆，出土时间说法不一，经作者研究，认为可能于1930年或稍前出土于北疆的吐鲁番地区高昌故城或其附近。至于译本完成时间，学者看法也不同。我国学者耿世民认为应在九至十二世纪之间；冯家升认为应在北宋；德国学者葛玛丽认为应在十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本文作者则认为应在五代梁、唐时期，最迟不过宋初，定为十世纪之译作，最为妥当。作者先后四次在南疆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玄奘传》残卷五中所涉及的新疆地名，大抵都经亲访。他按照慧立原著，对照译本，引用其他有关语文资料，对译本中涉及的地名进行了对音和地理考实。地名对音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玄奘回程所经之地，这是主要的；另一部分则为回程以外的地名。在第一部分中计有：朅盘陀国、徙多河、葱岭、乌铩国、佉沙国、斫句伽国、瞿萨旦那国、勃伽夷城、媲摩城、泥壤城、覩货罗故国、折摩驮那故国、纳缚波故国、沙州。另一部分计有：铁门、热海、王舍新城、钵罗耶伽国、迦毕试国、波谜罗川、鄯善、沮沫、屈支、高昌。上述各地，绝大部分均为古代丝绸之路南道必经之地。作者旁征博引，集各家之言，述个人之见，资料丰富，考证周详，大部分均得出明确结论，实为研究丝绸之路难得的宝贵著作。文后并附有地图一帧。

326　《西天路竟》笺证　　　　黄盛璋

（《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本文是作者继《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之后，对《西天路竟》的进一步考证之作。前文论证了有关《路竟》的年代、作者、写本来源和各段路程。本文则对具体地名、里程落实定位，核查考证，逐一作出了较详实的辑证注释。《路竟》正文始记“东京至灵州四千里地”，为了补证此问题，作者先后引用了《继业行程》、范大成《吴船录》、高居晦《使于阗记》、《宋史·吐蕃传》、《宋会要辑稿·蕃夷》、明《一统志》、《释

迦方志》、《新唐书·地理志》、《西北丛编》以及和田文书《使河西记》、《使臣奏书》等十余种文献资料，对灵州的历史、中外使节及佛僧来往灵州情况，以及灵州至凉、甘、肃、沙等地的距离远近，少数民族政权在此地区的更迭兴衰等，作了大量的笺注工作。另据《西天路竟》的记载和补正结果，绘制了一幅由宋东京开封至南印度空陀落山路程图，使久已湮没的西天古径，今得再现。

作者在考证中，不仅广泛研究了有关历史记载及其译写，且屡赴《路竟》中的一些古邦古道实地考察。经过爬梳辑证，集有关资料于一书，为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创造了条件。

《路竟》所记虽简，然首尾完整，自宋东京开封直至南印度海边，为唐以后入印行程最长者。故《笺证》对《路竟》之补正、定位定线，对古丝绸之路研究很有裨益。

四、经济贸易

327　古代西北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贡献　　刘锡淦

（《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3期）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我国人民和中亚、西亚以及欧、非人民友好往来历史的见证。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丝绸之路走向、历史名城和世界意义等问题，提出了各种看法和见解，众说纷纭。本文根据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对有关史料进行了认真分析、对比和考证，深入探讨了我国境内丝绸之路的缘起与兴衰，以及我国古代西北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贡献。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丝绸之路的三条道，在汉朝以前就已存在，最初开辟这些商道的是扼据这些地区的羌、匈奴等少数民族。这三条商道的开辟，按早晚顺序排列，中道在前，约在舜禹时期；南道居中，约在西周；北道属后，约在春秋战国之交。二、丝绸之路的兴衰与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在绝通交替中不断发展。而真正繁荣起来，则是在秦汉之后。三条丝绸之路中，首先繁荣起来的是北路，而后是中、南两路。作者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丝绸之路的兴衰情况，指出在西突厥统治西域时期，三条丝路并开，而在唐朝政府统一西域之后，丝绸之路便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三、新疆不仅是丝绸之路的甬道，而且是我国丝绸产地之一。新疆之桑蚕始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当时从高昌到于阗，从伊吾到焉耆，在广阔的土地上已遍布桑蚕。新疆丝织术的创造，最晚始于唐代，出自和田。和田地区桑蚕丝绸生产在唐代就十分兴盛。新疆的丝绸工匠，对发展我国的丝绸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宋元时代，维吾尔族纺织工人创造了织金锦的新工艺，增加了织品的华丽，对我国各地都有影响。元朝政府对这一新工艺极为重视，把三百余户织金锦工人调往甘肃安化一带，设局制作，为织金锦工艺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清以来，新疆的丝织工人吸收先进的纺织技术，精心创造着中亚一带人民所喜爱的图案花纹，受到中亚各国人民的欢迎。

328　中国丝绢西传考　　姚宝猷

（《史学专刊》1937年第2卷第1期）

本文对中国丝的产生，丝的主要产地及丝绢之西传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全文约五万余字，分为（一）古代丝之产地及用途，（二）古代东西交通之路线及丝绢之西传，（三）纪元前后欧人对丝国及蚕丝之观感，（四）塞里斯、塞里克、塞里亚诸字的语源及蜕变，（五）桑蚕种子之西传及西方丝业之发展，（六）古代贩运丝绢之民族，（七）余论，共七部分。作者根据中外典籍的记载，对上述问题作了系统考证论述，史料丰富，引证广博，可资参考。但从丝绢贸易的观点出发，应以（二）（五）（六）三部分为阅读重点。通过东西交通之路线及丝绢之西传，可得知中国丝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已开始西传，而且运丝路线有海陆两道，其中以陆路开辟最早，也最为主要。对陆路交通主要干线、走向、所经国家及重要城镇，都有所详细考证。在桑蚕种子之西传及西方

丝业之发展这一部分，说明蚕丝本为我国特产，我国古时历代政府十分珍视，在严禁桑蚕种子外传的情况下，仍被偷运出境。据《大唐西域记》、《新唐书·西域传》记载，中国公主嫁给于阗国王时，将桑蚕种子，置帽絮中，运至于阗。从此，于阗始有育蚕纺丝之业，后由于阗传至叶尔羌及钹汗，其后传至波斯。至于桑蚕传入罗马事，经中外学者考证，系由波斯景教徒将蚕子藏入路杖之中，带至君士坦丁堡，从此罗马始能养蚕缫丝，后逐渐传入意大利各地以至欧洲各国。关于古代贩运丝绢之民族，由于时代变迁，民族兴亡，对贩丝运绢之商人，究系何种民族，又采取何种方法，虽有记载，但不详细。据作者考证，主要有伊兰民族、突厥民族、大食民族、粟特民族，以及罗马人、印度人等。古代伊兰民族占有波斯、阿富汗、俾路支以及俄属中南部诸地，其中因波斯国最为强盛，所占地理位置又极重要，所以贩运丝绢，又以波斯商人最为主要。我国丝绢输出，除一部为亚洲各国人民购去制作其他之用外，绝大部分为罗马人购去。当时输入罗马的商品还有印度的宝石、香料等，但以中国丝绢为最主要；而罗马的输出，则不及商品输入总值的百分之一。由于丝绢的大量输入，对罗马社会及经济影响颇大，丝绢在罗马市场，十分昂贵，上等丝料每磅竟值黄金十二两，丝绢与黄金的比价相同。由于黄金大量外流，罗马末年之财政极度困难，而罗马帝国之崩溃，则与此有密切关系.

329 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季羡林

（《历史研究》 1955年第4期）

养蚕缫丝是我们祖先的一大重要发现和创举，是我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丝绸就已传到西方，并受到西方人民的极大欢迎。汉代以后，为了加强东西方的丝绸贸易，遂有丝路交通的开拓，这一路线开拓后，对东西方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横亘欧亚的丝绸古道，无论其发生的历史，道路的变迁，经济的往还，文化的交流，民族的移徙等等，均为世界学术界所注目，并成为当今世界之显学。本文仅就中国丝绸传入印度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为了说明问题，文中还涉及到中国古代蚕丝的发现；中国丝绸在古代西域的传布；中国丝绸传入波斯，以及传入印度的过程，特别是丝绸传入印度的时间及传入印度的不同路线等。作者根据中外文献记载及语言文字的演变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证研究。

古代波斯由于丝绸贸易的原因，和中国关系较为密切，文化交流也较频繁。中国丝绸输入大秦、罗马，须经过波斯为中转站，而波斯为了控制丝绸贸易，采取各种手段阻隔汉与大秦进行直接的丝绸贸易，其结果一是大秦开辟海路直通中国，二是促进了中国蚕种的西传。据西方史籍记载，是印度的僧人将中国蚕种由新疆地区传到了罗马，从此西方世界才开始了养蚕，此乃公元六、七世纪以后事。至于中国丝绸传入印的时间，从印度古代著作中不难找到。生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憍胝厘耶所著的《治国安邦术》一书中，就有“脂那的成捆的丝”的记载。这里不仅说明印度有丝，而且说明了丝的产地，由此证明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丝绸已传入印度。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中间纂成的《摩奴法典》、《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古代印度著作中，都有关于中国丝绸的记载，而且古代印度人民早就知道丝由一种虫子吐的，可是希腊、罗马人对丝的认识，

大多是一些离奇古怪、不着边际的幻想。

关于中国丝传入印度的道路，作者根据我国文献及考古发掘结果，证明丝绸传入印度共有五条道路。一为南海道。我国的《汉书》，印度的《那先比丘经》及西方著作《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中均有记载。二为西域道。中国丝绸传入印度要比通过“丝路”传入波斯更为有利，况在和阗一带发现的和阗语(或称北雅利安语)是用印度字母写成，却不是印度语；而和阗附近尼雅地方发现的尼雅俗语，却源于印度西北部，是一种印度俗语，这说明和阗一带曾为说印度语的人所统治。中国蚕种最先传入和阗，和阗又是新疆著名的丝产地，说印度语的统治这一地区，那么丝绸从这里传入印度，则是很自然的。三为西藏道。此道由于山岭绵亘，交通不便，利用最少，但王玄策及玄照法师都是经过此路往返印度，中国丝绸从此路运到印度也是可能的。四为缅甸道。缅甸介于中印两国之间，中缅、印缅间的交通很早就已发生，否则张骞在大夏所见蜀布邛杖何以传到印度。张骞想由蜀道通印度，为滇王所阻，而商人们往来贸易并不一定受阻。五为安南道。关于这条道路，在贾耽的著作和两《唐书·地理志》中，均有较详记载。这五条道路中，以西域道和南海道开拓最早，利用时间最长，利用率最高，是中国丝绸传入印度的主要路线。从时间上来看，大致唐以前，以西域道为主，唐以后多从海路，到了宋元明时，几占垄断地位了。西藏道及安南道虽有丝路输往印度，但因其非主要道路，其数量则微不足道。中国丝绸传入印度，特别养蚕缫丝技术传入印度后，对促进印度文明起了极大作用。目前印度的丝绸闻名于世，薄如蝉翼的印度绸，使丝绸原产地的中国人民也极珍视，从而证明中印两国人民友谊之悠久，以及文化交流成果之丰硕。

330 华丝传入欧洲考　　朱杰勤

(《文史汇刊》 1935年第1卷第2期)

丝为我国最早最著名的产品，对人类文明有较大的贡献。我国何时有丝，或丝产生于何处？本文开始对此作了考证。据《通鉴》载：“西陵氏之女螺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始治蚕以供衣服”。可知中国之有丝，距今已有四五千年历史。至于蚕如何发现，中国典籍无详细记载，只有《搜神记》中神话传说而已。丝产地，按《禹贡》所载，则有兖州、青州、徐州、扬州等地，可见中国古代产丝之地，多在东北部诸省。当时因制造惟艰，产量较少，故不普遍。至春秋时代，文化进步，技术改良，丝的生产也有了发展。作者认为古代中西交通，实以丝为开端，西方知有中国，也以丝为前提，西方人称丝织物为塞尔基(Serge)，称中国为塞里加(Serica)，称中国人为塞里斯(Seres)。当公元前五世纪许，中国的丝缯已越帕米尔至印度、波斯，及亚力山大东征后，复经叙利亚人之手输入欧洲。罗马与中国通商，大抵以丝为媒介。考诸记载，实始于汉代，并以东方诸小国为导线。张骞在大夏，见到中国的蜀布邛杖，说明在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印度等西部亚洲，已有中国货物出现。《汉书·张骞传》有“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发使抵安息、奄蔡、犁轩(犁轩者外国记之大秦也——岑仲勉)、条支、身毒……”，中国人的足迹已到了波斯、罗马。当时所谓使团者，非纯粹的官员，必有无数商贾杂于其间，《史记》及前后《汉书》，对此都有所记载。中国生丝缯帛，初由安

息入罗马，然安息世与罗马为仇，安息凭借山河之险阻，拒罗马兵不能东下，故欧洲市场之贸易，均为安息所垄断，且常与罗马为难。甘英抵条支，临大海，欲渡，为船人所阻，中国欲通罗马亦为所梗。安息人为独获重利起见，不欲使中、罗两大国交通，而独自垄断，居间中饱。直至公元162年罗马破安息，取道海路，由波斯湾经印度洋，直抵中国南海，至公元166年中国与罗马，才正式直接交往。当时丝运往罗马，因其道路险阻遥远，实非易事，故罗马市场丝的价格，约略与黄金相等，非皇室贵族，不能用之，致使罗马帝国在经济上大受影响。中国丝及丝织物，大量传入欧洲，其运丝路线如何？此一问题我国古籍虽有记载，但是很少，直至斯坦因在新疆进行发掘调查后，对东西交通及丝绸之路，始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和研究。本文对此有简要的介绍。另外，对养蚕缫丝技术的西传，文中也进行了考证。认为养蚕技术传入欧洲，系景教传入中国以后事。因景教在唐太宗时及其以后，受到礼遇，初修波斯寺，后因波斯景教，本出大秦，遂改波斯寺为大秦寺。可知景教出自大秦。而教徒多波斯人，彼等除来华传教外，不排除私运蚕种之使命，历经危险，遂将蚕种偷运至欧洲。初及君士坦丁为中心，后传至意大利、法兰西及英、德等国，直至今日，整个欧美之地，所有养蚕事业，无不源于中国。由此可知，中国蚕丝事业对世界贡献之大。

331　两汉与罗马丝贸易考　　　袭　骏

（《文史杂志》 1942年第2卷第5、6期）

本文首先肯定了中西交通及贸易在西汉时代早已存在，张骞在大夏，所见蜀布邛杖，即可证明。然因匈奴之侵盗杀略，使中西交通无法产生，商品运转更难实现。武帝击匈奴，远拓西域，开古代中西交通的新纪元。武帝开拓西域的目的，论说莫衷一是，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初通月氏共击匈奴，再厚赂乌孙，以断匈奴右臂。故作者认为，武帝通西域除军事目的外，再无其他用意。但其结果，则是开中西交通，商路建立，贸易勃兴，西方各国从自与中国发生了直接关系。西方珍奇异物输入，印度佛教东渐，中国丝缯远销罗马。但汉室究竟何时正式通西域，据作者考证，当在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左右，其交通路线，原有南北二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则汇于疏勒。还有一条经天山北麓而至伊犁之道，《后汉书·西域传》之"后部（车师后国）西通乌孙"之道，此道隋唐时为西域交通孔道。《唐书·地理志》所载北庭（济木萨）经伊犁河而至碎叶的一路，大体上与汉代由车师后国通乌孙之路相同。西域交通自武帝元狩三年开始，至汉末（公元190年），约三百余年，其间维持正常关系者约二百年，而与西域交通畅通无阻者有一百二十年之久（即武帝元狩三年至元帝末年"公元前33年"，又自后汉明帝末年"公元74年"至和帝末年"公元106年"），中国在葱岭东开辟了南、中、北三条运丝路线，而以疏勒为汇总点。由疏勒出发，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这条线大致上由疏勒经大宛的贵山城，然后经康居而又分为二路，一路入奄蔡，一路入安息。此外，莎车与中亚亦有直接交通，即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这两条路都要经过安息，故安息则为中国与罗马丝绸贸易的集中点。安息为了从中谋求利益，对丝的贸易曾多方阻扰。作者认为，中国运往罗马的丝，其过程异常复

杂，交通方面非出一道；交易方面，历国四、五，且运输工具幼稚，道路又不平静；时间上旷日持久，其它种种波折更难料及。虽经如此周折，但中国丝还不能直接运往罗马应市，中间还要经过叙利亚。叙利亚是否为中国史称为大秦，尚无定论，但自公元64年以来，即为罗马属都。因其地位关系，由东方运去的丝，无不集中于此，因而成为罗马帝国东部的丝库。丝至叙利亚后，经过一番加工改制，始能运往罗马市场。至于罗马于与中国直接发生关系，始于公元二世纪下半叶，即罗马破安息后，取波斯湾头，海道始通，并于桓帝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等，始乃一通。因此，罗马攻取波斯湾头，其动机难免不是为了开辟丝源所促成。作者在本文中，还对印度在中、罗丝贸易上的地位，丝贸易对罗马经济影响都作了阐述。特别是安顿时代（公元161—180年），中国丝到达罗马后，其价值比重与黄金相等。由于罗马人姿意耗用，财源大量流入东方，结果造成罗马帝国后来经济竭蹶原因之一。总之，本文对两汉时代与罗马丝的贸易考证较详，对研究"丝绸之路"者来说，实为一篇重要的参考材料。

332 上古时期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莫任南

（《湖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本文根据史籍文献的记载和考古资料，探讨了上古时期我国与西方各国的交往历史，并对西方学者的一些舛误作了分析批判。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分别论述了中西使者、商人的相互交往；商品和商道；中国文化的西传和西方文化的东来；以及世界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据考古发掘，早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约当我国周朝，我国与欧亚广大草原就有了联系。公元前四世纪我国与印度已有商业贸易关系。先秦文献《穆天子传》记周穆王西游，至西王母之邦，穆天子向西王母献玉石、丝绸；西王母则贡马、牛、羊、犬等。即反映了当时中西贸易的事实。秦汉时，我国同西方的交往有进一步的发展。汉武帝时，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中西交通，开拓了中西商道，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经木鹿、和椟，西达条支。班超经营西域三十年，对西方各国始终奉行和平友好方针，对中西交通的发展，殊多贡献。在山西发掘出的罗马帝国钱币和在陕西扶风发掘的安息钱币，都证明汉代中西交通频繁，西方商人已深入中国内地。两汉时，中国与西方海上贸易也已开始，西方文献对此亦有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经海路到达中国，中国与罗马的交往进一步密切，至隋唐时期，东罗马和中国的交往更为频繁。中西往来主要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海路则由南方出发，经印度支那半岛航海到锡兰、印度，再西至波斯湾上陆至报达，或经红海达开罗，转叙利亚。我国对西方的商业贸易，输出的主要是丝织品、铁器、漆器、黄金、白银、镍、皮革、软玉等。其中丝织品最受欢迎。自西方输入我国的商品主要是善马、毛织品、毛皮、珠宝、药物、香料和各种奇兽珍禽。本章在论述中西文化交流时，主要谈了我国的凿井术、铸铁炼钢术、造纸术、育蚕、缫丝、织绸技术、数学和医学，以及经济作物、艺术、音乐西传的情况及其对西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论述了西方的养马法和骑马作战

术、家具桌椅、经济作物、制琉璃的技术等传入中国的情况及其对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所起的影响。特别是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同时，西方艺术和犍驮罗艺术也随之输入，另外，还有音乐舞蹈和杂技，使中国原有文化吸收了不少外来成份。至于佛像的雕塑，石窟的开凿，佛寺佛塔的建筑，更是在我国传统建筑雕刻艺术基础上，吸收了西域外来的成分，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文章认为，从中西交往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世界各民族和国家都是在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的道路上前进的，对人类文化宝库都有一份贡献，共同创造了人类文明。最后，文章还对西方一些学者贬低我国古代文化影响的谬论进行了驳斥。

333　汉代丝绸贸易考　　　〔荷〕胡四维著　　耿　升摘译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1期）

本文论述了汉朝政府向中亚扩张的动机。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主要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汉朝政府必须采取防卫措施以抵御匈奴人的入侵；另一种则认为强大的汉朝政府试图向附近弱小或不发达的民族地区进行扩张，需要冲破国内市场的界限而去寻求国外市场。文章列举了许多中外学者著作中所持的上述观点。主张对这些资料不要轻易的概括归纳，指出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盲目使用概括归纳法的危险性，不要把从西方史料中引来的归纳法运用于中国史学，不要为中国史的发展乱贴标签。文章认为，汉朝向中亚扩张只有一种动机，即希望阻止匈奴人的入侵，"断其右臂"，即夺取匈奴人在西部地区的基地。那种认为引起中亚臣服汉朝的主要原因是丝绸贸易的观点是错误的，其错误的原因之一是随便进行归纳概括。文章概述了从公元前四世纪以来中原汉族与北方其他民族的关系，指出自汉高祖以来，即从公元前200年到汉武帝即位初的70多年间，匈奴持续入侵使汉人遭受生命财产的破坏之外，还必须向匈奴人纳贡，其中很大一部分贡品就是丝绸。汉朝所以如此驯服地长期忍受匈奴人的入侵而不积极反击，是由汉朝国内的政治局势造成的。一直到汉武帝时，中国还有三分之二的领土是在诸侯国君们的统治之下，他们拥有范围很广的自治权力。汉帝国在没有排除这些封建诸侯国君从背后攻击的威胁之前，无法对匈奴采取行动。这就使汉朝在公元前145年之前无能为力，只是到公元前127年左右才有了采取行动的可能。汉朝在公元前133年马邑战役中第一次对匈奴采取了攻势。最后一次反击以征服鄂尔多斯而告结束，建立了朔方和五原都尉府以巩固其征服成果，并强迫10万居民迁徙到那里。张骞通西域的目的就是在与匈奴为敌的胡族中寻找盟友，这说明汉朝还不能单独地对付匈奴人。在公元前111年，汉朝才第一次控制了甘肃省的河西走廊，并向沙漠边沿的敦煌地区移民，从这里远征中亚。汉朝在公元前109年征服楼兰，104至102年征服大宛，公元前60年征服吐鲁番绿洲，并任命西域都护府都护，具体表现了汉朝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文章还列举大量史料，论证了汉朝政府把越来越多的丝绸运到匈奴和中亚其他地区。这些丝绸是没收大地主和富商的财产，这些财产是群众用丝绸缴纳的赋税。汉朝政府限制而不是鼓励对外贸易，丝绸是由政府的代理人、而不是由商人运出国境的。中国丝绸运到罗马，是由西方和西域商人转手运去，而不是汉族商人运去的。由此可见，丝绸贸易从来不是汉朝向中亚扩张的动机之一，更不是其主要原因。

334　河西四郡新农业区的开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关键　　谷　苞

（《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

本文论述了西汉时建立河西四郡对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所起的作用。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知，内地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从殷周时代就已开始。但因受政治地理条件的限制，规模较小。春秋时期，中原华夏族与戎狄等族杂居；华夏族的农业区与戎狄等族的游牧区犬牙交错，斗争激烈。到战国时期这些民族有的与华夏族融合。秦并六国后，把原来燕、赵、秦所修的长城连接起来，东起辽东、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从秦至汉初，长城以内是以汉族为主的农业区，长城以外是匈奴、东胡、西羌等族的游牧区。河西处于北方与西方游牧区相衔接的细腰地带，具有宜牧宜农的优越水土资源。这里曾是大月氏人和乌孙人的游牧区，他们被迫西迁后，又成为匈奴人的游牧区。汉武帝时，降服驻守在河西的匈奴休屠王、昆邪王，其部众四万余人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河西从此无匈奴。西汉政府在设置河西四郡中，除派大量军队屯戍外，还动员大量汉族贫苦农民和少数氐人到河西开荒种田，从事手工业生产。据《汉书·地理志》载，当时河西四郡共有移民71,270户、280,221人。他们到河西后，开垦荒地，引水灌溉，迅速发展了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建立起发达的封建文化。公元前121年以后，西汉政府除陆续在河西设置了四郡外，又于公元前60年在新疆设置了西域都护。由于将河西从原来的游牧区建成了新兴的农业区，从而使中原与天山以南的老农业区连接起来，并进而与中亚、西亚、南亚的农业区连接起来。这就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因为农业区有固定的旅店、驿站、城镇等设施，商队及旅客旅行安全，食宿方便，并可补充需要物资，进行贸易。因而通过河西四郡农业区至天山南路农业区的道路，始终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道路。文章详细论述了丝绸之路上两个方面的经济文化交流，即国内各地区民族间的交流和中国与外国的交流。前者对加强国内各民族的联系与团结、巩固祖国统一，起了重大作用；后者对有关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中国的四大发明、冶金技术、中医、中药、茶、桃、梨及乐器等，传到了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各国；西方各国也将一些植物、动物、家俱、乐器和佛教、伊斯兰教、景教、袄教、摩尼教等传入中国。至于国内的交流更为频繁，龟兹乐即其显例。文章还论述了河西的两条长城，即汉武帝时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县）附近至玉门关以西所修的一条长城，及在弱水（黑河）以西直达居延城的长城，和西汉、东汉两朝沿祁连山北麓修筑的长城。但对河西南侧的长城，因史书记载甚少而且零碎，故需进一步研究。长城的修筑，对丝绸之路的畅通，起到了重大的保护作用。

335　河西走廊对沟通中西商务之贡献　　萧静安

（《新商业》1945年第1卷第4期）

作者在本文中，首先概述了河西走廊之地理位置以及在中西交通上的贡献。认为河西走廊地处要冲，自古以来就为商业往来之孔道，中国丝绸等商品之西去，西方货物之

东来，均经其地。自张骞通西域，始开西行之路。当时中西交通以敦煌为其总汇，然后由敦煌西行，分南、北、中三道，其中以中路为最捷，即由敦煌渡疏勒河，经白龙堆至楼兰，当时为运丝大道，烟敦相望，往来频繁。后因罗布淖尔变迁，楼兰古城荒废，交通乃移于南北二道，下迄隋唐，形势依然。关于古代中西通商事件记载不多，但作者汇集了诸书之零星记载，对汉至明清时代之中西商业贸易盛况，作了概括叙述。汉代康居为求商而纳侍子，罽宾为互市而奉献，安息之遮道，为独擅丝绢之利，身毒、大秦之汎海，亦无非款求贸易。所以《后汉书》有“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记载，可想昔日塞下商业之繁盛。当时西域输入中国的货物，有宝石、药剂、香料之类，而中国输往西域者，以丝绢为主，其次是漆器和铁器，以及黄白金等，尤以丝及漆器，最博得西域人之欢迎。特别在罗马，丝及丝织物价格，与同重量的黄金相等价。隋炀帝时，武威、张掖、河西诸郡，已成为中西贸易之中心点，西贾之求售于此者，达四十余国之多。唐初，中西陆路交通更为繁盛，其时凉州为河西都会，商旅往来，或无停绝。唐平西突厥后，交通更为便利，中西商人，络绎于途，于是唐乃置互市监，掌握诸蕃国贸易事务，征收关税，又于西域山南四镇和山北之轮台等地，亦各置机构征收西贾商税。由此可知古代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之发达，商品交易之盛况。唐五代以后，因海运大开，中西陆路交通遂衰。宋明以来，陆路商业贸易，虽时断时开，但与汉唐兴旺之形势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336 曹魏时期河西经济恢复原因浅析 陆庆夫

（《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4期）

古代河西，原是少数民族杂聚之地，经汉武帝破匈奴，置四郡，移民屯田，开通西域，不断经营，直至东汉，河西一直是一个安定富庶的地方。但到东汉末年，由于马腾、韩遂等军阀混战，使河西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后来，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河西这块曾经繁荣一时的地方重新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经营范围。史载：“魏文帝即位，分河西为凉州”，“其刺史领戊已校尉，护西域”。由于曹魏政权的重视，河西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本文论述了曹魏时期河西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原因，首先在于推行了“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这从《三国志》所记曹魏时期河西官吏的治绩上可资证明。《三国志》所记凉州刺史主要有二人：一是魏文帝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的张既，另一个是魏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233年）的徐邈。史称张既精于吏道，“治为三辅第一”，在朝中很有威信。黄初二年，凉州卢水胡伊建妓妾、治元多等反。魏文帝以张既“谋略过人”，“非既莫能安凉州”，就派他为凉州刺史。张既到凉州后，很快就平息了混乱。他任凉州刺史多年，不仅以“政惠著闻”，还给酒泉、敦煌等郡物色了有才干的官员。在张既以后的徐邈，在官期间，发展生产，推行教化，致使“百姓归心”，“荒戎入贡”。再就河西地方的吏治看，各刺史、郡守在官兴利除弊，皆有一定作为。其次，在于对羌胡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一系列民族问题。曹魏政权在河西处理民族问题的作法之一，是对在战乱中四处流亡的羌胡部众加以招抚，使其安居乐业。另一作法是：对战乱时期发生的所谓“兵变”，通过分化，以争取多数

胁从的羌胡百姓。在安抚羌胡的同时，还辅之以法治，使“弹邪绳枉，州界肃清”。第三是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1.兴利除弊，劝课农桑。具体做法是：招怀流亡，教民耕种；挫抑豪族，扶持贫困；修盐池水利，募百姓屯田；改进技术，提高产量。2.招抚羌胡游牧部族，发展畜牧业。如《三国志·苏则传》说，苏则“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再是交通西域，发展商业。河西是中西交通的孔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西汉时，“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东汉末年的战乱，使这种繁荣一度遭到破坏，但在曹魏政权建立以后，很快便扫清了丝绸之路上的障碍，与西域恢复了交往。大批商人来往丝路，不仅使商业很快得到了发展，也促进了曹魏政权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总上所述，由于曹魏政权建立以后，在河西地区推行了较为可行的用人政策、民族政策和经济政策，使境内吏治清明，民夷粗安，因而经济能够迅速恢复与发展，并一直延续到西晋十六国，至南北朝而不衰。

337　五凉时期的河西经济

——兼论汉代河西开发的历史趋势　　　　武守志

（《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孔道，又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曾经是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研究河西的经济问题，是研究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汉魏以来河西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出发，对五凉时期河西经济的主要形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和经济技术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古代对河西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是从西汉武帝时开始的。汉武帝开发河西的主观动机主要是从切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义上作决策的，因而具有政治性开发、内向性开发和单一性开发的特点。所谓政治性开发，即出于政治军事战略目的，从政治方面考虑的多，从经济方面考虑的少。所谓内向性开发，是指河西屯田的生产面向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所谓单一性开发，是指河西屯田片面发展了单一农业经济。汉代对河西的开发引起了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即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由驻牧地向郡县区域的转化，最后是河西地区的封建化。这一历史趋势，影响到以后河西经济的发展；五凉时期的河西社会经济现状，正是这一历史趋势在几个世纪中演进的结果。随着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变化，形成和发展了分割性的世族地主经济，河西地区也出现了地域性的世族地主集团——西州大姓。他们是支配五凉政权的政治势力。五凉政权借助西州大姓而保据河西，西州大姓借助五凉政权的保据河西而保存家族。他们有些是以经营农业经济为主，有些是以经营畜牧业为主。西晋永嘉乱后，中原有很多世族也逃到河西避难，重新攫取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保存自己的家族和政治势力。由于河西相对安定的环境和五凉政权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使河西经济在总体上获得了发展；而五凉交替，内部争权，又破坏了河西经济的持续上升。特别是后凉吕光死后，诸子争权，自相残杀，政事败坏，使河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所以，五凉时期，河西社会经济便显示出一种迂迴发展、缓慢上升的状态。农业受到重视，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也占有相当比例，民用、军用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也有相当发展，丝绸之路保持畅通，西域商人也常到河西贩货。当时河西

县城大增。随着郡县的增置，一些郡县治地特别是作为都城的姑臧、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增多人口，城建更新，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丝绸之路的贸易重镇。

338 论唐初河陇地区经济的繁荣 黄新亚

（《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1期）

唐河陇地区泛指陇右道内河西、陇右两大军镇所辖地区，古称雍州或凉州。本文就唐初这一地区经济繁荣的成因，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河陇地区作为古代中国整体的一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的一部分。在唐以前的历史中，羌、匈奴等族曾主宰此地，其时，这里几乎是完全的畜牧业区。汉至魏晋时期，中原人民不断迁徙、逃亡至此，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以及汉族的文化，促进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北魏、隋统一后，统治者因势利导，实行一系列恢复、发展、管理经济的措施，加之丝绸商路的通达，使河陇地区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故而构成了唐初河陇地区经济繁荣的基础，即具有多种经济活动的特点。有农业、畜牧业及丝绸商路收入。唐河陇地区的农业，依其历史传统和自然条件，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及关内河套地区。唐初河陇形势较为稳定，农业发展处于最有利的时机，唐政府积极推行屯田、营田事业，粮食贮积也达高峰。但这仅表明河陇作为北临突厥，西连吐蕃的要地，军队屯田数量多、规模大、军需量也超过全国其它地区。而对农民，国家推行和籴法，实际上是对农民食粮的变相强征。河陇人民在全国仍处于相对穷困地位，其农业仍落后于内地。至于说河陇地区经济繁荣基于农业经济的说法，作者认为难于成立。河陇地区的畜牧业因其特殊的地理条件，远较内地发达，主要集中在河西祁连山区、陇坂山地、黄河九曲等三个大牧场之地。唐政府所控制的畜牧业主要集中于陇坂山地，这里距关内道较近，便于控制。唐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冲突频繁，唐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的马匹与之强大的骑兵抗衡。河陇地区作为国家的牧马基地，深得重视。故唐政府放宽了政策，提高私人养马的积极性，并加强了绢马互市。畜牧业日渐恢复，为全国之冠，在河陇地区的经济繁荣中，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河陇地区在丝绸商路上的收益大约可分三个方面。一是唐政府通过在丝路征收商税而获益；二是随丝路繁忙而起的驿站、旅店、驮运、保镖等服务业对河陇地区是一种特有的经济收益；三是河陇商人以得天独厚的条件，利用大量涌入的西方货币和奇珍异宝，行中间贸易以牟利。这也是唐初河陇经济繁荣的因素之一。总之，河陇经济繁荣与其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唐政府经营及各族人民的努力有关，其农业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其畜牧业达到全国首位，丝绸商路上有过巨大收益。正是这三种经济活动相互补充，促成了唐初河陇地区经济的繁荣。

339 论唐代河陇地区经济的发展 梁勤

（《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4期）

唐代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辖区，包括今甘肃省（除六盘山以东地区）和青海省东南一部分，著名的“丝绸之路”就经过这里。唐代河陇地区的经济，经历了一个由萧条

到最富庶的较为长时期的转变过程。贞观年间，由于长期对吐蕃用兵，“所损巨万”，以至到了开元十七年，“河西、陇右，百姓疲竭。”这种情景到了天宝年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但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一种是基本同意史料记载；另一种认为还未达到全国最富饶区域的程度。作者同意前一种看法。河陇地区在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张骞经营西域以后，就起到了“断匈奴右臂”的作用。到了唐代，河陇地区“断隔羌胡”、“断隔吐蕃、突厥”的作用依然存在。其战略地位，决定了它是抵抗突厥、吐蕃的前哨阵地和经营西域的可靠后方。于是就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的畜牧业，大量繁殖战马，从而成为畜养战马的中心地。贞观十五年，张万岁掌管群牧，以公母马三千“徙之陇右”予以繁殖，前后二十三年，共繁殖到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武则天垂拱年间，由于吐蕃、突厥不断入侵，致使“马潜耗太半”。到玄宗初年，剩牧马二十四万匹，后经玄宗任命亲信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到开元十三年，终又发展到四十三万匹，牛羊不计其数，加上民间畜养数，则更为可观。所以，河陇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其数量、质量均居全国之冠。河陇又是唐政府的屯田所在，在从西北到东北几千里边防线上，唐政府实行大规模军屯。到了天宝年间，不但改变了“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赡”，粮食供不应求的状况，反而有了剩余。余粮由船载运，顺黄河而下，送到关中。河陇屯田的收获量超过了河北、河东之总和。其中最显著的还是陇右。此地多山，又是养马中心，屯田收获竟然名列第二，可见唐代军屯为保卫和建设河陇，繁荣河陇地区经济做出了显著贡献。关于民间农业生产情况，可从贞观十三年开始在全国设置的常平仓储粮数字中看出其富裕程度。根据文章所列各道常平仓按人口计算的平均数，河陇道最高，相当于河东、河北、河南各道的一、二十倍。这就证明河陇是当时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河陇地区在农业上超过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平原、河南、河北、河东诸道。作者认为主要在于人口增殖和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问题，另外还有社会政治、自然条件、生产技术等因素。河陇自古就处在“丝绸之路”的交通道上，再加上唐重视西北政策，苦心经营，东西方先进生产技术都易学得，所以河陇反而较中原富庶。

340 甘州回鹘与中西贸易 高自厚

（《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1、2期）

本文根据文献记载，论述了甘州回鹘汗国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甘州回鹘自庞特勤于九世纪中叶在河西走廊建立汗国政权，被李唐王朝册封时起，至赵元昊于1028年攻破甘州止，建国时间170年。在此期间，他们雄踞河西走廊，扼守丝绸之路的孔道，对五代、北宋时期的东西方贸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河西走廊自古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两汉以来，这里又成为丝绸之路的孔道，欧亚陆路交通的咽喉，敦煌就是丝绸之路的总枢纽。河西又是天然牧场，发展畜牧业条件优越，从秦汉时期的月氏、匈奴，到唐末的吐蕃等少数民族，都把河西走廊作为发展畜牧业的重要基地。甘州回鹘占领河西走廊后，利用其畜牧业生产的丰富经验和良好的条件，发展民族经济，其特点

有二：一是游牧的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饲养马、骆驼、牛、羊，而以马、驼为最多。仅据史籍有记载的就曾向五代、北宋进马二十八次，数量达二千五百六十七匹；进驼六次，数量达五百八十九峰，说明其畜牧业的发达。二是商业经济很发达，而以“进贡”、“朝贡”为进行贸易的手段。回鹘具有经营商业的历史传统，占领河西后，发展商业的条件更加优越。他们经营商业的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商业经济的地位也更加重要。由于历代中原王朝迫切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的战马和玉石等物品，但禁止民间交易，故甘州回鹘等少数民族采取“进贡”、“朝贡”等方式为其重要的贸易手段。这种进贡的商业性质，表现在进贡的次数多，商品种类多，数量大，参与进贡的人数多，有时多达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有些回鹘人还挈带家眷，到中原后久居不归。这种进贡的实质是以进贡为名，行贸易之实。因为中原王朝收到贡品后，必须“给价钱”。还因为自汉唐以来，历代中原王朝规定，凡各国来贡，沿途驿站要负责接待迎送，到京城更要隆重接待，有时皇帝还要亲自接见贡使。回鹘商人充分利用了这种有利条件。接着，文章论述了甘州回鹘根据其地理条件与经济特点，决定其必须依附五代、北宋王朝，疏通丝绸之路，发展东西贸易的基本国策。他们从四个方面加强了与五代、北宋的联系，即：可汗受五代、北宋王朝的册封；向中原王朝称臣称甥；各级官吏、功臣、贡使受五代、北宋王朝加封；要求北宋派使臣或孔目官常驻甘州。由于甘州回鹘采取了这些措施，和五代、北宋王朝保持了融洽的友好关系，成为丝绸之路上活跃的商业队伍，在发展中西贸易中发挥了桥梁作用。甘州回鹘的足迹西到波斯、阿拉伯，东到中原各地及契丹，把中原各地的丝织品运往西域各国，把西域各国的玉制品、药品及本地的畜产品、手工业产品运往中原各地，往返贸易，充分发挥了中西交流的桥梁作用。文章还具体论述了甘州回鹘对五代、北宋、辽国和西域的贸易情况。本文引用史料甚多，文内并附有多种统计表，即：甘州回鹘向五代、北宋出售牲畜情况表；受五代、北宋王朝册封的六世可汗表；五代、北宋王朝加封甘州回鹘官吏表；五代、北宋派往甘州回鹘的使节表；甘州回鹘向五代、北宋王朝贡物的种类与数量表；甘州回鹘换取中原丝织品及装饰品表；甘、沙州回鹘对辽贸易表；甘州回鹘运往中原各地的玉制品及其它商品表。本文旁征博引，史料丰富，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经济贸易的重要参考资料。

341　历史上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　　《新疆通志·商业志》编辑室

（《新疆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2期）

本文根据我国史籍记载，考叙了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与西域的商业往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商品交换即已发生，如《逸周书》提到莎车、匈奴及月氏各民族地区所产的白玉、骆驼、骡最为有名。《穆天子传》提到穆王西巡，曾以丝绸、铜器分赠各酋长事。希腊、印度古代史籍记载公元前四、三世纪，我国丝绸已运销到那里，“丝绸之路”就是从那时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张骞使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新纪元，使内地与西域的丝绸贸易不断繁荣。汉朝政府常派使者去西域，这些使者除担负着政治使命外，还担负着物资交流的使命。随之汉族商人也参加了与西域的交往，西域的商人也随着他们的使臣到长安通商。中原人民生产的丝织品、铜镜、药材等不断运到西域，西域的皮

毛、于阗的玉石、龟兹的毡毯，以及被称为“白叠子”的棉布，成了长安市上的珍品。曹魏时，敦煌太守仓慈为便利西域商人入关做生意，特发给通行证，并“使吏民护送道路”，保障西域商路畅通，便利了西域商人在内地通商。

南北朝时期，西域商人为了避开河西地区的战乱，绕道吐谷浑地区，开辟了吐谷浑道。由于西域与内地商业往来频繁，各国商人大量涌入。据《洛阳伽蓝记》载，出现了“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的繁荣景象。隋代，西域来内地经商者更加频繁，在朝庭设有专管少数民族和外国事务的鸿胪寺，专设“西戎使者”“掌其方国及互市事”。同时还开拓了由武威到哈密的一条贸易捷径。

唐朝重新统一后，“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由此可见内地与西域商业往来之盛。唐朝还在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税西域胡商以供四镇”，还规定对来往丝路北道商人“税赋轮台”。当时天山南北路上商队之多，贸易额之大可想而知。安史乱后，河西诸地为吐蕃所据，但东西方的贸易并未停息。宋时，居住在新疆境内的回鹘人，经常借入贡之名公然贸易，久留不归者有之。一次于阗运往内地的乳香有“三万一千斤，得钱四万四千余贯，乞减价三千贯卖于府库。”当时回鹘商人的足迹到河北、河南、山东，特别是汴京（开封）、燕京（今北京）都有回鹘人的足迹。

元朝开疆拓土，地跨欧亚，遍设驿站，极大的便利了东西方商人，中西贸易称盛。同时，明清时期，中原与西域的贸易情形，特别是商品种类、名称及总的贸易额等，都进行考叙，对丝路之上的商业贸易研究多所裨益。

342　古代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商业来往　　徐伯夫

（《新疆史学》1979年创刊号）

在古代，新疆的商人常把本地特产运往内地，换其所需。而发达的内地商业，极需边疆的销售市场，故而内地商人亦把商品运往新疆销售。本文引用了大量史实和考古资料，叙述了自汉唐到明清，新疆与内地商业往来的概况。汉时，中原王朝强盛，中西交通发达，经济来往频繁。那时，从内地到西域的使者很多，有的使者，本身就是商人，更有装扮成使者的商人。他们携带大量货物，不仅在新疆经商，甚至越过葱岭到中亚，而西域的商人也常到内地经商。西域各国派往内地贡献的使者，当然有其政治意义，但更主要的是为了贸易。有的西域商人，久居京师，不再思返。三国时代，西域的商人常到北方的曹魏交易，官方采取措施以保障西域商路的畅通。南北朝时，西域商人绕道吐谷浑前往西凉经商，有的西域商人甚至在内地任官为臣。隋时，西域商人到内地经商者更加增多，政府对此相当重视，设专门机构加以管理。唐代，中西贸易日繁，西域贾商日增，唐王朝还在丝路南北二道的重要城镇，专设征税机构多处以征收税赋。安史乱后，尽管吐蕃占据了河西走廊，但商业往来仍很密切。宋朝，新疆境内回鹘人常以入贡之名在内地贸易，其足迹遍于河北、河南及山东。元时，新疆畏兀儿人往内地交易，元政府对此提供了很多方便。明时，政府鼓励新疆各政权朝贡，这些贡使多为商客。维吾尔、瓦剌等部与内地商业往来尤为密切。总之，古代新疆与内地的商业来往是任何封建割剧势力都无法阻止的，其间，内地的丝织品、棉布、茶叶及铜镜、漆器、木器、磁器

等日常生活用品传到了新疆；新疆的许多特产如马、牛、驴、骡、羊、骆驼及皮毛，以及著名的玉石、葡萄、棉花等也传入了内地。这种频繁的商业往来、商品交流对内地和新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丝织品和棉布增加了新疆人民的衣着品种，茶叶等生活用品既改善了新疆人民的生活，又促进了新疆人民的健康，铁器工具传入新疆对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同样，新疆的马、牛、驴、骡、骆驼对内地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以及军事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由于这种经济交流，使内地与新疆，在经济上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整体。随着商品的交流，生产该商品的技术也得以传播，养蚕技术和冶铁技术随丝织品和铁器传入新疆；而新疆的棉花栽培和葡萄种植技术则传入内地，从而促进了内地与新疆的生产发展及经济繁荣。

343　汉代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　　马国荣

（《新疆史学》1979年创刊号）

随着张骞出使西域及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新疆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进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本文正是集中反映了两汉时期新疆与内地的这种关系。当时，中西交通畅达，仅新疆境内就有两条路线把敦煌、疏勒、伊吾、乌孙以及其它各地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而新疆与内地的商业贸易就是沿这些路线进行的。新疆各族政权，多以“使者”身份携带土特产品前往内地；汉王朝派往新疆的使者也多兼做商业。政府为使商路畅通，并保护使者、商人安全，修建了许多城垒和烽燧台，并设置关卡稽查行旅。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丝绸织物在内地与新疆商业贸易中，数量最多，深受各族人民喜爱。为建立自给自足的根据地，汉王朝还在新疆设立屯田，从此，内地先进的冶炼、凿井术以及各种手工业工艺制作技术不断传入新疆，使其冶炼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制作技术有所改进。新疆人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将凿井技术加以发展创新，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为了改变新疆的落后面貌和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内地的各种手工业制品深受新疆人民的欢迎，制作技术和艺术风格逐渐为新疆人民广泛吸收，创造出具有新疆特点的各种手工业产品。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扩大，使其农、牧及土特产品，源源不断输入内地，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经济生活，增添了内地农、牧产品种类，扩大了农、牧业经营范围。特别是内地艺术创作的内容，出现了许多以新疆各民族风格特点为素材的新作品。如棉织和铜铸出现了葡萄形态，而有的铜铸和石雕则出现西域马、骆驼的形象。苜蓿、黄蓝、石榴、胡麻、胡豆、核桃、大蒜等也于汉代传入内地，逐渐为人们广泛栽培。此外，具有民族特色的毛织物品，也大量运往内地，繁荣了内地的商业市场。新疆和内地在经济上的互相促进和影响，使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关系日益深入和发展。新疆人民喜欢的音乐和创造的琵琶、觱篥、箜篌、笛、横吹等各种乐器陆续传入内地，使内地音乐、歌舞为之一新。西汉末年，佛教由新疆传入内地，大量佛经被译成汉文，深刻地影响了内地人民的思想文化。其它如医药、历算、语言及艺术等的输入，其影响至为深远。而纸张的西传，为汉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及内地与新疆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更为可贵的贡献，尤其是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及冯嫽等人在政治上对加强新疆各族人民和内地人民在团结友好关系上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344　唐代“丝绸之路”上的纺织品贸易中心西州　　孔祥星

——吐鲁番文书研究

（《文物》1982年第4期）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出土了大量的丝织物、麻织物以及一些棉织物。此外，古墓中还发现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提到纺织品的文书，为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研究吐鲁番出土的古代纺织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根据这些出土文书，研究分析了唐代西州纺织品贸易的若干问题。

“丝绸之路”在汉唐时最为兴盛。地当中西交通要冲的西州（吐鲁番地区），随着唐朝经济繁荣、国内外交往频繁而日益兴旺，纺织品贸易也不断发展。吐鲁番唐墓曾出土了一些反映当地物品价格的文书，其上记载了许多行名、各行物品的种类及价格。本文称之为交河郡物价表或物价表（天宝元年时改州为郡，西州名曰交河郡，后来又复郡为州）。物价表中，纺织品的名称和价格占有相当比重，内容之丰富、材料之集中、格式之完整，是目前研究吐鲁番纺织品贸易发展的最重要材料。本文列举了物价表中有关纺织品的内容。从各类纺织品的名称，可以看出吐鲁番不少的纺织品来自内地。文牒中明确提到的有益州、梓州、河南府、陕州、蒲州、常州等。这些地方分别属于今四川成都、三台，河南洛阳、陕县，山西永济和江苏常州。回顾这些产地的纺织史，可以看到吐鲁番销售的不少纺织品是国内著名产品。除了内地运来的纺织品外，价格表中一部分未标明生产地的纺织品中，无疑会有新疆地区和吐鲁番本地的产品。

西州位于中西交通的要道，物价表所列物品的种类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如产于东南亚一带的香料，夏鼐先生所称的“波斯锦”，都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多次看到。因而，西州成了唐代纺织品的重要集散地。

西州由于集中了国内许多地区的纺织品，因此墓中出土的纺织品和文书中记载的纺织品种类丰富、数量很大，而且各类纺织品本身又据其规格、质量、颜色作了进一步划分，尤其是质量划分更为严格。对纺织品原料和纺织品作如此严格的划分，一方面反映了纺织技术的发展和人们需求标准的提高，另方面也说明纺织品数量的增多。纺织品种类增多，流通量加大，需求提高，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西州纺织品“行”的发展。交河郡物价表残留的行名计有果子行、菜子行、谷麦行、米面行、铛釜行、彩帛行、帛练行等，涉及到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行的大量出现，是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发展的一个标帜。交河郡物价表从某些侧面反映了当时西州交易物品种类之多和工商业的发达。从交河郡物价表还可看出，它们在度量衡制和产品价格方面也严格地遵循唐政府的有关规定，与内地有着极大的一致性。

统一的唐代，加强了中央集权，使经济文化繁荣，国内各地联系密切。交河郡物价表再一次证明：西州纺织品贸易的发展与整个唐代纺织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唐代是我国纺织史上的辉煌时代，纺织品贸易获得巨大发展。正是这些有利条件，才有可能使大量的纺织品源源不断运到西州，保证了国际、国内市场的需要，促进了西州纺织品生产的发展和纺织品贸易的繁荣，使西州成了“丝绸之路”上的纺织品贸易中心，为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345 略述唐朝对西域的商业贸易管理　　　雷学华

（《敦煌学辑刊》1983年创刊号）

唐王朝统一西域后，推行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管理制度；对商业贸易也作了许多规定，实行了管理。这是前所未有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为研究唐对西域的商业贸易管理提供了直接可信的原始材料。在市场管理方面，唐时各州县设市，西域的州县也不例外。出土文书不仅说明西州有市，而且还记载了许多行业，如果子行，彩帛行，米面行，帛练行等，这反映经济的发达和商品交易的繁多。《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二月西州兴胡米禄山卖婢市券公验》表明，在西州市上卖一婢女成交后，按唐律"给买人市券"。市券是盖有市印的凭证。落款中除当事人外，还有五个保人、两个史和掌判市事、签发市券的丞。《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三月瓜州、沙州给石染典过所》中，还可见到"诸事勘问，市令张休"的记录和沙州的印记，说明管理市场的机构是健全的。

在执行"钱帛并用"的货币规定方面，唐朝商品都以钱数标价。但是钱帛并用。这在西域也毫无例外。而西域使用贵重金属货币比内地较为普遍，这说明商业货币经济的进步和发展。这主要是因西域地处丝绸之路，对外贸易发达的缘故。在物价管理方面，按唐代规定，诸市"依令，每月旬三等估"，使物价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波动，不致发生太大涨跌。在西域，有关物价的规定也得到贯彻执行。从一些物价文书看，商品是分细、次、粗三等定价，每等中又有上、中、下之分。有些文书印有官印，说明物价是经过官府核定的。

征收商税是唐王朝和西域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西域的征税方式可能与内地不完全相同，但有相通之处，如买卖奴婢、牛、马、骡、驴等皆须立券，"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上述契券，为征税提供依据。唐在西域的税率为多少，尚不清楚。征收的商税，是用来补充安西四镇巨大的行政和军费开支。这体现了唐对西域的实际统治权，也为经营西域提供了经济保障，对促进丝绸之路商业经济的发展是有极大好处。

346 唐代中原与西域间的商业贸易关系　　　雷学华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丝绸之路贸易兴盛的时期。本文对唐代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关系的阶段、特点和社会作用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文章首先把唐代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到640年唐灭高昌，此为渐兴期。由于隋末的社会动乱，经济萧条，交通不畅，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活动也不多。唐初李世民执行了安定政局，休养生息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贞观九年后，西突厥分裂，为唐朝势力进入西域提供了便利条件。贞观十四年，交河道大总管侯君集帅师灭高昌，揭开了丝绸之路贸易的新篇章。第二阶段：从640年唐设西州到787年唐失安西、北庭，此为繁荣期。在此期间，唐朝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消灭了东、西突厥，统一了西域，打通了隋末闭塞的丝绸之路，并在

西域设立了一整套行政、军事机构；在丝绸之路上实行驿馆制，便利商旅往来；较好地处理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全国政局稳定，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天宝盛世，使中原与西域间的商业贸易达到空前兴盛的局面。第三阶段：从787年到907年唐朝灭亡，此为衰落期。此间由于战乱不息，中原与西域间的商业贸易急剧衰退。787年吐番占据安西、北庭，阻隔了丝绸之路，则是贸易衰退的主要原因。文章论述了唐代丝绸之路贸易的特点：一是唐朝对丝路贸易进行直接的经营和管理，二是行业和行会的出现，三是丝路贸易达到高峰，成为最辉煌的时期。最后文章谈到唐代丝路贸易所产生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增进汉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了解和团结，起了积极作用；第二，促进了双方经济的联系、发展与进步，各自从中收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第三，加强了中原与西域间的经济联系和政治关系，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地位。

347　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

——唐代马价绢新探　　　马俊民

（《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在我国历史上，唐与回纥的关系，可以称为古代兄弟民族间友好往来的典范之一。然而对中唐、后唐与回纥进行的大量绢马贸易，传统之论却多有贬词。关键是对绢马互市的产生及长期维持的社会根源剖析不足。本文着重揭示唐政权坚持绢马互市的真正原因，同时辨正了互市中的相关问题，从而对这一历经九个唐帝、长达八十余年的古代兄弟民族间的贸易问题，作出了比较正确的估价。唐与回纥的友好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唐初，太宗与吐迷度就奠定了友好关系的基础。贞观三年，回纥“始来朝，献方物”，双方沟通了联系。此后，于贞观二十年、二十二年进一步密切了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武、中、睿三朝，双方联合对抗东突厥，直到开元时“助唐攻杀默啜”。天宝年间回纥建立起统治大漠南北的汗政权，也与唐的支持有关。安史乱后，回纥助唐一收长安，两复东都。肃宗为了酬谢回纥，一则把宁国公主嫁给葛勒可汗，开有唐以来“天子真女”和亲之始；二则每岁赠绢七万匹；三则约定绢马互市，即从乾元时起，双方开始了大量的绢马贸易。由此看来，绢马互市是唐与回纥传统友好关系的继续和发展，这一贸易对双方都有利。中原盛产丝绢，很早就受到罗马等西方民族的喜爱，著名的“丝绸之路”已为众所周知的中外历史佳话。回纥在贸易中得到大量绢帛，一则满足本民族的生活需要；再则由于当时吐蕃占据河西、陇右，东西交通必取“回纥道”。因此，回纥承继了历史上“中亚之游牧”“居间贩卖”丝绢的地位，在东西方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同时，大量的绢马贸易必然要求提供充足的马匹，也就刺激了回纥畜牧经济的发展。绢马贸易也是当时唐政权多方面的迫切需要，首先是军事上的急需，文章列举了史籍中唐急需回纥马匹充实军骑的许多例证。其次，是对外政策的需要：第一，回纥在唐对外关系中地位极为重要；第二，唐之实现“北和回纥”之策，根本的措施就是长期与回纥维持绢马贸易。再次，是预防、打破河朔方镇及吐蕃与回纥结盟。尽管唐在财政支出上本已拮据，但仍坚持绢马互市的深刻原因就在于此。为了正确地评价唐与回纥的绢

马贸易，作者又探讨了互市中的马价问题。旧史文人论此多痛斥回纥贪婪，马价昂贵；近代学者有的也认为“比实际马价高数倍”，简单斥之为“不等价交易”。经作者仔细研读有关史籍，认为并不完全如此。据史载资料，中唐后以四十匹绢买一匹回纥马，其马价与开元时买突厥马的马价基本相同。又据《唐会要》大和七年记载刘源所说河西马匹低于买回纥马价一倍余的问题，作者以卖马者运输路程远近不同而影响马价的理由作了阐释。因此，唐购买实力强盛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马匹价格，无论中唐前后皆如此，并非回纥乘势讹诈，致使马价昂贵。至于唐朝为什么始终以较高马价购买回纥马匹，一则其其马质量优良；二则必须考虑长途运输和沿途马匹的消耗；三则即可以羁縻对方，又可在军事上增加自己实力，所以经济上宁可吃亏也须购买。关于元和时期唐买回纥马的价格问题，作者对陈寅恪和岑仲勉两位先生对《白氏长庆集》卷四〇《与回鹘可汗书》中一文字的理解作了辩证，认为两位先生的理解皆有不确之处。为了弄清此问题，作者段过对文中四个数字所指及“方圆支”的含义作了考释。认为岑先生指出陈先生误把二十五万匹绢作为六千五百匹马的价钱是正确的，但把“方圆支”之“方”改为“先”字则是错误的，并证明陈先生所说“唐室则减其马数而依定值付价”是难以成立。接着还辨正了陈、岑二先生关于绢马互市中“贱价倾售”论之不当。为正确评价互市，作者对唐买回纥马后死亡较多及唐以劣绢充马价问题也进行了探讨。认为唐买回纥马后死亡率高，一是所买马中难免有质劣马匹，二是水土不服。而唐以劣绢充马价也是局部性的问题。因此，若把这一长达八十余年的绢马互市从全局上概括为“彼此俱是贪诈行之”，未免言之过重。从当时全局看，绢马互市不失为相互有利的贸易，况且以互市形式实现兄弟民族友好关系本身应值得肯定。

348　唐与回纥经济往来述论　　崔明德

（《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

唐与回纥的关系最为密切，经济往来十分频繁。在唐朝存在的近三百年时间里，与回纥的经济来往未曾间断。其中既有唐对回纥的馈赠，也有回纥对唐的朝贡，又有双方之间的贸易。回纥输入唐朝的大宗商品是马及其它土特产品，唐朝运往回纥的大宗商品是绢帛、金银、锦绣、缯器、粮食和茶叶等。在双方的交往中，唐朝输往回纥的财物大大超过回纥入唐的财物。尤其是回纥在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中，对唐朝财物大肆掠夺。安史之乱平定后，回纥又恃功对唐朝进行不等价的绢马交易，成为唐朝后期财政困难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时吐蕃也乘唐朝内乱之机，侵占了河西、陇右等地，阻塞了丝绸之路的交通。唐为了与中亚诸国交往，只得假道回纥，受回纥盘剥。唐与回纥除统治阶级之间的经济交往外，还有回纥大臣与唐的互市，以及唐使者与回纥的私人交往。安史之乱以后，“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这些人在长安经营商业，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唐与回纥的经济往来，是在不同的背景下进行的，且有相当复杂的关系，但在客观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一、稳定了回纥内部的政治局面。回纥以游牧经济为主，有其不稳定性，遇到天灾人祸尤其如此。回纥在得到唐朝大量的物质财富，使其经济基础得到稳固，从而使政治局面也得以巩固。二、加速了回纥经济的发展，导

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回纥自唐获得大量财物，为回纥与西域诸国交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在交易中获得巨额利润，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由游牧向定居生活过渡，从而也使内部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三、促进了汉人与回纥人的融合。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无论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均较发达。回纥与唐朝的长期交往，以及回纥与汉人的杂居、通婚，双方习俗互相影响，促进了汉人与回纥人的融合，这是历史的进步。文章对上述观点，均引用史籍资料，予以充分论证。同时也指出了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所夹杂的一些落后现象和消极因素，这些都或多或少地损伤着双方之间的感情。

349　回鹘与丝绸之路　　　樊保良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4期）

在我国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中，与“丝绸之路”关系最为密切者，当首推回鹘。本文论述了回鹘的发展壮大过程，并围绕“丝绸之路”探讨了回鹘与唐、五代、宋、辽的关系。自公元七世纪初以来，回鹘在反抗突厥贵族统治的过程中，在同周围各民族的不断分化融合中，日益发展壮大起来。其酋吐迷度称雄漠北后，立即遣使入唐，要求归附，正式接受唐中央王朝的统一管辖和册封。回鹘汗国存在百年间，基本与唐王朝保持和好关系，这对回鹘发展强大具有重要意义。回鹘是个游牧民族，迫切需要以自己的牲畜和畜产品，换取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每年都要以一定数量的牲畜，特别是马匹，来换取唐朝的丝绸、茶叶等物品，这就是盛极一时的“绢马贸易”。回鹘每年以马交换来大量的丝绸、茶叶及其他用品，除部分自用外，其余则转运至新疆、中亚以及西方各地销售。这样，回鹘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日益密切。当时的丝绸之路，正达到最为繁荣的黄金时代。唐代的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为中西交通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等军政机构，为丝绸之路的开发经营，提供了可靠保证。绢马、茶叶贸易，使回鹘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又使回鹘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更加密切。八世纪中叶后，河西诸地被吐蕃控制，西域官商客旅，经由北庭绕道长安。此即丝绸之路的“草原路线”。八世纪末，吐蕃又截断北庭通道，为夺取这一交通枢纽，回鹘与吐蕃展开了殊死搏斗，终于在九世纪初，战败吐蕃，重新打开东西商路。公元841年回鹘汗国灭亡，部众大部迁居天山南北、河西走廊及葱岭西以后，其所居之地，都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这对回鹘发展东西方贸易非常有利。回鹘控制这一交通枢纽，无论五代、宋、辽以至西夏，要通往中亚各地，必须经过回鹘，此时贸易经济在比漠北时期更为重要。但后来由于西夏同北宋关系恶化，回鹘进入中原的使节和商人，常遭西夏阻挠抢劫，回鹘与西夏在丝路之上的斗争，势不可免，其中甘州回鹘与西夏在河西之争夺战，激烈而持久。甘州回鹘虽在斗争中失败，但西州回鹘、于阗回鹘以及葱岭西回鹘等，仍同中原宋、辽王朝，保持密切关系。回鹘使节、商旅或绕道青海，转经陕甘而入宋京；或直接走北面“草原路”而入辽京，仍照常入贡，进行绢马贸易。回鹘之所以在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其原因一是同中原各朝，始终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贡使往来不绝；二是不仅经商人数众多，且善于经商，由于回鹘在很大

程度上操持丝绸之路上的对外贸易，乃引起辽朝对甘州回鹘的多次征讨，而且有西夏相助，以至甘州回鹘最终为西夏所并。西州回鹘及于阗回鹘，因位处丝绸之路枢纽，所以，辽、宋在此既有争夺，又经常互派使节加强联系，并建立了一定的密切关系。上述回鹘同五代、宋、辽各朝贡使往来的情况，既有政治意义，又有明显的商业属性。回鹘不仅与五代、宋、辽有密切朝贡、贸易关系，而且同西方各国的商业活动也很频繁。总之，回鹘控制东、西通道之咽喉，操纵丝路贸易之特权，并以自身经商之特长，同中西各国各族人民一起，为共同疏通丝绸之路及发展东西方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350　突厥诸民族在中国的贸易活动　　陈庆隆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9期）

突厥诸民族以游牧为生，也从事商业和农业。当他们崛起于中国北方之时，就开始在边境与中原汉族进行丝绢贸易。他们的政治力量越强，贸易活动就越频繁。作者从历史背景、商业交往和贸易路线三个方面，对突厥各民族与中原的贸易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突厥族与汉族的贸易活动，是在匈奴时代建立起来的。据历史记载，汉与匈奴单于和亲，以维持边境安宁；匈奴则以牛马与汉族交易，以维持自身发展。这样畜牧经济与农业经济互相依赖，商业往来成为必然行动。这种传统也自然被突厥人继承下来。突厥人还深受中国西部商人的影响。大宛、安息和撒马尔罕人都善于经商，贸易活跃繁荣。后西部被兰突厥人征服，并由西部人把丰富的商业知识传授给他们。直至唐代，因突厥人出兵助唐，加速了贸易关系的发展。在商业交往方面，作者概述了自隋至明各朝突厥、回鹘、坚昆等族与中原汉族贸易和在中原各地设立市场的情况。突厥人的大宗贸易货物是牲畜和玉，汉人的则是丝绢、茶叶和粮食。突厥人的贸易制度因时因地而异，有时他们以货易货，有时使用钱币，有时两种方式兼用，更经常的方式是利用朝贡进行贸易。双方的贸易一般由各自的政府垄断。在贸易路线方面，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所谓“丝绸之路”，西起叙利亚首府安条克。它在耶拉波利斯（汜复）穿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安息，再经过哈马丹、赖依、沙赫鲁德、木鹿进入大夏和帕米尔，商队和商人聚集在科米台山脚下进行交易。然后由乌浒河上游前往喀什噶尔，从那里分为两路，北路通往库车，南路通往楼兰，然后它们在玉门关会合直趋敦煌，最后到达敦煌。作者列举了这两条丝绸之路经过的主要市镇和交易地点。同时又论述了各个时代因政治原因商路变化的情况。作者认为，由于突厥各民族和中原汉族之间贸易的繁荣兴旺，东、西方之间的货物得以经丝绸之路而流通，宗教也沿丝绸之路传入内地，这又大大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351　王延德行记与天山硇砂　　张承志

（《文史》1983年第20辑）

硇砂之名自魏晋以来直至清代，常见于诸种史籍与药书。硇的异体字有硇、铙、硐、硇，硇等，硇砂又名“北庭砂”，品种有二；一为白硇砂，主要成分为氯化铵(NH_4Cl)；

一为紫硇砂，主要成分为氯化钠（NaCl）。硇砂产于西域，日本学者松田寿南在其名著《古代天山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一书中，对硇砂史料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和考证，提出了"王延德龟兹西行说"，认为宋代王延德出使高昌时，曾继续西行，到过远距高昌千里以外的龟兹（今库车）。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王延德出使高昌回鹘，雍熙元年（公元984年）返回，撰写《西州程记》一篇，成为元初所修《宋史·高昌传》之史源。《西州程记》中，有"北庭北山中出硇砂"的记载。因北庭之北并无山脉，故史学界多以"北山"二字为"南山"之误。但松田寿南则认为并非"北山"之误，而是"北庭"应为"安西"。王延德所见产硇砂之山，应为龟兹（唐安西都护府）之北山，即天山南麓。王延德之行记在收入《宋史》时已非全文，而是一个有佚脱错简、或已被删改的残本。其中王延德自高昌至北庭继而西行直至龟兹的描述已佚。行记中对北庭城内景物的描绘，也更接近于龟兹的特点。其根据是，历代文献从未见北庭一带有出产硇砂之记载；而龟兹出产硇砂，却早有大量文献记载。1928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库车北山发现并调查了硇砂洞，从而彻底确定了这一硇砂产地。本文对松田寿南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他对史料的使用存在着下列问题：一是王延德出使西域，目的地仅有高昌回鹘，并无西去龟兹之命；二是《西州程记》并未题及安西或龟兹；三是行记描写细致，但自高昌至龟兹物异路遥，并无记述；佚落错简之推论，并无可靠的证据。作者根据《元史》卷十二关于别失八里城附近存在铁矿和冶铁工厂的线索，于1980年在吉木萨尔县境内发现了博格达山北麓的水西沟冶铁遗址，并根据我国地质学界对水西沟煤矿、铁矿的研究，发现早在1945年已在水西沟发现了硇砂并细致研究了它的生成原因，乃系侏罗纪地层中的煤层自然所生之产品：硇砂、硫黄、明矾及雄黄。天山山脉中已知的有煤层自燃的地点至少有吉木萨尔、库车、乌苏、乌鲁木齐、巩留、吐鲁番、托克逊、和硕、焉耆等地，即新疆天山南北麓各地点，都存在生成硇砂的条件。据地质调查资料，已确认曾发现硇砂的地点，有库车、吉木萨尔、奇台、叶尔羌、莎车等处。由此可知，硇砂分布范围遍及天山南北两麓，自有史以来一直是天山特产。接着，作者又引用史书文献中关于硇砂出产、运输和用途之记载，认为天山硇砂进入中原的主要途径是进贡，并论述了唐至明代西域向中原王朝进贡硇砂及贸易的情况，探讨了硇砂一词的语源问题。最后结论是：宋代王延德所撰之《西州程记》，即《宋史·高昌传》这一史料是可靠的，目前尚不能找到怀疑它的有力证据。

352　西夏社会经济及其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地位　　白振声

（《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从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三世纪二十年代，在我国西北地区，以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平原为中心，建立了地跨今陕、甘、宁、青、新和内蒙古六省（区）以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的党项羌族为主体的西夏国。其立国时间，长达二百年之久。本文根据一些零散的文献资料，从经济史的角度，对西夏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发展和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地位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和分析。文章首先谈了党项羌人早期的社会状况。据史书记载，党项羌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六世纪后期，党项羌居住

在今青海东南部及与甘肃、四川交界的山地草原地带，过着单纯的游牧生活，处于原始氏族部落制社会发展阶段。到七世纪中叶的唐代前期，党项羌人已迈入阶级社会的大门。七世纪中叶，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奴隶主政权逐渐强大，消灭了立国于青海地区达一百多年的吐谷浑，使党项羌人深受胁迫，陆续迁往内地。到八世纪中期，最后在今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和陕西北部及其附近的内蒙古河套一带定居下来。公元897年，党项羌的拓跋氏首领李继迁，联合并统一了各部族，发起抗宋战争，建立了独立于祖国西北地区的西夏王国政权。党项羌人社会也完成了向封建经济形态的过渡。西夏建国后，首先发展了畜牧业和农业，大量储备了粮食。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又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毛纺织和毛皮加工业及采矿、冶炼、金属制造等手工业也相继发展。此外，采盐、陶瓷、砖瓦、金银器加工等手工业也各具自己的特点和风格，技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农牧、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商业的繁荣。产品除国内市场交换外，主要是与临近的北宋、辽、金之间进行贸易。特别是与北宋的贸易空前兴盛。贸易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官市（榷场）、民市和贡使贸易。西夏与辽、金的经济交往也相当频繁。由于西夏控制着河西走廊这条丝绸之路孔道，当时天山南北的回鹘人和中亚的阿拉伯人与宋、辽贸易，往返必经此地。他们过境的货物，都由西夏强征10%的实物过境税，致使往来商旅纷纷逃避，另择祁连山南麓、柴达木盆地或由海路而行。文章对西夏经济发展的原因作了分析，对贸易形式作了解释，对西夏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作了扼要的论述，认为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对祖国西部的开发，对社会进步，对元朝大统一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西夏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353　元代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白　钢

（《民族团结》1964年第5期）

元朝的统一，在我国历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重大作用，特别是沟通中西交通，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就元代蒙、维吾尔、藏等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作了全面的阐述。元代各族人民的经济联系，是随着元朝政府“移民实边”和“屯田”政策的贯彻而逐步加强的。元承金制，在“海内既一”的情况下，“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以资军饷”，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甘、肃、瓜、沙“皆因古制以尽地利”；蒙古地区也“或以地所宜，或为边计，虑至周密，法甚美矣”。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畏吾儿地区，大力屯田，以别失八里（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斡端（于阗）等地称著。元朝政府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是采取扶持的态度，这些地区偶遇灾荒，便给予赈济。这种赈济，实际上是汉族人民对兄弟民族人民的物质援助。另方面，西北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因应军役，来到中原屯田的为数也不少，对发展内地的农业生产也作出过贡献。此外，西北的兄弟民族还把当地的农作物品移植到内地来，加以栽培推广。我国的棉花栽培，在元代得以普及，其来源之一就是自畏吾尔地区传入中原的。经济联系的加强，还在兄弟民族的手工业部门里表现出来。元朝主要是官手工业，除中央设有官手工业局院外，太子后妃位下也都设有各种手工业局

院。那里几乎集中了全国各地的手工业工匠，进行强制劳动。这些出身不同的名工巧匠，交流了生产技术和经验，同时在劳动中也结成了兄弟般的友谊。元朝在全国各地开辟驿道，广置站赤，交通十分发达，自大都至全国及西域各地，站赤很多，中西交通称便，为东西方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商品经济在元代空前发展。在元代，汉族与西北各少数民族也在文化上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呈现出文化大交流的局面。文化交流的突出事例是蒙古文字的创制。远在成吉思汗时代，就曾敕令塔塔统阿依据畏吾儿字母拼写蒙古语，教育贵族子弟。中统元年世祖又授权藏人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按汉人方块字格式创制八思巴字（即蒙古新字）。这两种文字的创作，是维吾尔、蒙、藏三族文化交流的最好例证。汉字也对蒙古新字产生了重要影响。移居内地的蒙古人、畏吾儿人中的上层分子，很多人深受汉族儒学的影响成为儒者；更有很多人工于文学，成为著名的诗人或文学家。另一方面，西北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也随着他们移居内地而传入，对汉族产生了影响，丰富了祖国的科学文化艺术宝库。元代是我们伟大祖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提高，同时也加强了彼此间的传统友谊和祖国的统一。

354 元代色目人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贡献　　匡　晔

（《史学月刊》1958年第9期）

“色目”一词最早见于《唐律疏义》，是各种类的意思。约至唐末，”色目人”已成为中国人对入华的外国人的一种专门称呼。元代所谓色目人，仍袭用唐、宋以来的含义，指除蒙古族以外的入居中国的少数民族。据说元代的色目人共有三十一种。这些民族现在有许多住在我国西北各省和西藏地方，其中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多；也有些分布于内地各省。文章认为，这些少数民族是组成我国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因而，研究元代色目人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贡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是如何以自己辛勤劳动，与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了我国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从而推动我国历史前进的。接着，文章列举具体事例。从两个方面，对元代色目人在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贡献，作了简要论述。在经济方面，就农业、兴修水利、工商业和西域经济作物的传入进行了考叙。由于色目人应征军役，入中国屯田，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如回回炮手在南京屯田；斡端、可失合儿工匠1050户在甘肃、陕西屯田；乞儿吉思在合思合屯田；合剌鲁军士在襄阳和南阳屯田。而规模更大的是钦察和斡罗思人在各地的屯田。当时的钦察卫和宣忠扈卫亲军万户府，就是专门管理他们屯田的机构。色目人的手工业本已发达，尤其在毛织业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当蒙古军占领撒马尔罕后，就掠获该城工匠三万人，分赐蒙古王公贵族为工奴，这些西域工匠很多到了中国内地，从事手工业生产，后来专为设官置司，管理色目人生产，从而将西域手工业技艺传入了内地。至文化方面，主要对蒙元初期色目人在文化科学上的贡献分别作了考叙。在天文历算方面有札马鲁丁的万年历。所谓万年历就是回回历的异名。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又根据万年历造授时历。在医药方面还专设机构以司其事。如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设广惠司，专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至元二十九年又设“大都、上都回回药物院二……，掌回回药

事”。当时掌领这些机构的并不一定是回回人，如广惠司的首创人爱薛是穲菻人，广惠司卿聂只儿也是也里可温人，他们接受了回回医药科学，并对传播回回医药科学起了一定作用。其它如音乐、艺术、制炮等方面的传播，很多得力于西域色目人。色目人在中国的文化科学活动，不仅将西域，特别是回回的文化科学传到中国，使中国文化科学得到新的因素，充实了中国文化的内容；而且色目人还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科学传统，和汉人一起担负了推进中国文化科学进步的任务。

355　古代维、汉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　　玉素甫·丁

（《民族团结》1964年第2、3期）

古代维、汉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有很多记载。远在公元一世纪，为了抵御匈奴人的压迫，维吾尔人的祖先—丁零（以后称铁勒）部落，就曾配合汉朝政府共同抗御匈奴。公元四至六世纪，铁勒部落同拓跋、宇文、南朝、隋朝已经有了比较频繁的物品交换关系，此后维、汉两族人民的往来愈繁，经济、文化交流愈多，相互影响也日益加深，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七世纪初叶，遭受突厥汗国奴役的铁勒部落中的韦纥、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为反抗突厥人的暴虐统治，组成了强大的回纥部落联盟，并与唐朝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军事上的友好合作，增加了抵御侵扰的能力。政治上的友好合作，为增进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唐代，马绢贸易是回纥与唐朝之间最主要的一项交易。随着马绢贸易的发展，回鹘商人进入内地经商的日益增多，在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各地，到处都能见到回鹘商人的足迹。他们沟通有无，在增进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回鹘及其他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八世纪中叶，回鹘汗国被黠戛斯灭亡，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徙，分别在吐鲁番盆地和南疆地区建立了汗国。回鹘汗国与内地的中央政权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由于受汉族先进经济的影响，发生了从游牧的畜牧业转变为定居的农业的巨大变革，因而促进了回鹘地区的迅速发展。同样，回鹘对汉族经济也有影响，如西瓜及其种植方法，就是由回鹘地区传入内地的。十至十二世纪，回鹘与宋、辽、金的贸易未曾中断，而贸易活动则以“朝贡”、”互市”等方式进行。这种频繁的贸易活动，对回鹘和汉族及其他各族都有其重要意义。在这时期，回鹘文化也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在回鹘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在迅速发展的回鹘文化各方面中明显地看到先进的汉族文化影响的痕迹。十二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维吾尔族地区处于西辽的统治之下。十三世纪初，强大的蒙古兴起，维吾尔人便摆脱了西辽的统治而转属于蒙古。蒙元时代，维吾尔族地区和内地的政治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忽必烈继汗位以后，在高昌置行尚书省，派元帅出镇别失八里，还设立了北庭都护府、宣尉司、御史台等机构，使维吾尔地区处在元朝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成为元朝政府的一个行省。十三、四世纪时，中西交通便利，贸易兴盛，维吾尔族地区正是中西交通的孔道，维吾尔人有经商传统，因而他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也就愈加显著和重要。由于政治、经济联系的发展和加强，维、汉两族人民文化的联系和影响也进一步得到密切和加深。汉族文化对维吾尔人影响最深、意义最大的是活字印刷术的

传入。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大大促进了维吾尔人文化的迅速发展。这个时期，由于维吾尔人受汉族先进文化的深刻影响，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者和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在促进维、汉两族文化交流以及同汉族学者一起共同促进祖国文化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作出了重大贡献。古代维、汉两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断发展、巩固和扩大，促进了维吾尔族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祖国悠久历史的内容和光辉灿烂的文化。

356 从经济方面看中亚研究史 〔日〕山本光郎著，姜镇庆译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7期）

本文从经济方面评述了中亚地区历史研究情况。现在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中亚地区历史的发展是通过沟通亚洲东部和西部的中转商业而取得的。过去在中亚地区，虽然其他各种产业都很发达（农业、手工业和中转以外的商业）但不如中转商业那样重要。本文对此提出了异议。文章把日本学者研究中亚史的情况分成四个阶段进行了探讨。（一）日本对中亚史的研究，是由白鸟库吉、藤田丰八、桑原骘藏等人开始的。尽管他们的研究范围包括了东西土耳其斯坦，但主要从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的观点来研究公元前一至公元二世纪的中亚史，虽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但由于研究的时代和地区有限，故不能描绘出中亚的真实形象。而藤田丰八指出古代中亚地区有栽培棉花技术知识，从经济观点来说值得注意。（二）羽田亨和松田寿南突破了白鸟库吉等人从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研究中亚历史的概念，进一步对中亚地区的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羽田亨认为中亚曾存在过固有的很高的“西域文明”，指出粟特地方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景象，并对粟特人经营商业的天才给予肯定评价。对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认为只有相毗连的地区之间有了交通方能做到，这是形成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松田寿南则着意研究中亚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经济史，认为中亚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就是连结亚洲东西两方的中转商业。作者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辨证，认为这一观点形成一种倾向：否定农业、手工业和中转贸易以外的商业所造成的发展，而认为这种发展是低级的发展。（三）在羽田亨和松田寿男之后，研究中亚史的方向基本上分为两个方面：羽田明、嶋田襄平、佐口透等人是填补羽田和松田两人在研究上留下的空白；而嶋崎昌、榎一雄、山田信夫等是继承和发展羽田和松田的研究。作者介绍了这些人的研究情况，并加以评论。特别指出佐口透对东土耳其斯坦史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他根据对生产关系的考察，阐明：1.在十六至十八世纪，东土耳其斯坦社会具有封建性质；2.在十八至十九世纪，东土耳其斯坦地区的农业有了发展；3.十六世纪以后，在俄国、中亚以及中国之间国际中转贸易发展了起来。嶋崎昌研究了中亚地区“水”的问题，阐明了吐鲁番地区坎儿井的灌溉方法是在十八世纪末从波斯方面传来的。（四）第四期是最近对中亚地区的研究，其主流是填补羽田和松田二人留下的空白，如加藤和秀、堀直、真田安等人对中亚地区的手工业、中转贸易以外的商业进行研究，把中亚地区经济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最后，作者从经济方面来考察中亚史的研究，认为中转贸易在中亚地区的问题，要从它的重要程度这个角度来重新探讨，为此，必须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农业、手工业以及

中转贸易业以外的商业问题的研究，认为小玉新次郎提出的在中亚社会，近处的生活必需品贸易所占的地位比远处中转贸易更为重要的意见是非常宝贵的。本文对日本研究中亚史的情况作了全面介绍和评论，这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357　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　　王冀青

（《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第二次考察中亚期间，于1907年在甘肃敦煌附近的T.XII.a号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八封粟特文信札，从1911年后，欧洲一些学者相继对这批信札进行了整理和解读。匈牙利学者哈尔玛塔集诸家研究之大成，于六十年代初读通其中《二号信札》全文，1962年12月和1963年11月，先后在德国柏林洪堡特大学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进行宣读。十几年后他又将研究成果整理成《前伊斯兰教时期中亚史粟特文资料》一文，于1979年发表在由他任主编、由十四国学者任编委、并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资助出版的《前伊斯兰教时期中亚史资料绪论》一书中。近年来，日本和中国学者也对《二号信札》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在国内至今当未全译。本文根据哈尔玛塔的解读成果并参考其他学者的考证，将信札全文译为汉文，并对信文作了必要的注释。《二号信札》是研究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早期活动的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据作者分析，这个信札的收信人纳奈德巴尔住在粟特某地，是向写信人出资或发放贷款的粟特巨商。写信人纳奈凡达克，是纳奈德巴尔的商务代理人，是住在中国姑臧的一个庞大的粟特商团的首领。这个商团至少有150人左右，活动范围遍及河西走廊、黄河中游地区和淮河流域。信中提到的地方就是敦煌、酒泉、姑臧、金城、长安、洛阳、黎阳、南阳、淮阳、蓟城等。信文还反映出粟特商人经营的商品。他们在中国销售大麻织物、毛毡（毛毯）、香料等；从中国则收购丝绸、麝香等。信札是向收信人报告在中国的经商情况和中国的政治形势。对信札的断代问题中外学者分歧很大。作者认为，从信的内容分析，信札写于东晋初年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发现的八封信札都折叠整齐地包裹在丝织品信袋中，有的还用线绳捆缠着，故可断定它们是被邮驿人员或捎信商旅遗落在敦煌的，没有送到收信人手中。

358　中古时期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关系　　郭庆昌

（《复旦大学学报》1959年第9期）

乌兹别克斯坦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位居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本文首先介绍了乌兹别克斯坦在中国史籍中名称之沿革，汉代称康居，唐代称康国，元魏称悉万斤，辽时称寻思干，元代称薛米思干或撒马尔干，明代称撒马尔罕。据苏联托尔斯托夫教授考证，古代的康居、康国等名称与花拉子模是同一名称。汉唐时期，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主要依靠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南北二道。南道循昆仑山北麓，越葱岭，向南到达印度、安息；北道即从敦煌玉门关西北行，沿天山南麓，西逾葱岭，直到大宛和康居，再经过黑海到希腊领域。乌兹别克斯坦正当这一丝绸之路的孔道。西汉时张骞通西域，联合各国以“断匈奴右臂”，康居即于此时与中国结成政治联盟。此即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

历史上第一次友好往来。从此，中、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就逐渐密切起来。东西方各种商品如丝绸、瓷器及葡萄、药材、珠宝、碧玉等，畅销中亚和近东以及中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公元六、七世纪时，唐王朝在东方建立了强大帝国，乌兹别克也与此时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康国，即中国史书上的昭武九姓。康国人善商贾，不少人来中国经商，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当时的长安和洛阳成为国际贸易城市。为数众多的乌兹别克商人在长安"殖赀产，开第舍"。由于长期居住经商的关系，有的人加入了中国国籍，如何国人何稠，他祖父于六世纪初入中国，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何稠父亲何妥为隋代名儒大师，何稠又是将中亚制造玻璃技术传入中国有贡献的人物。再如隋唐时代的曹妙达、康昆仑、米嘉荣等人，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都有重大贡献。至于中国对世界文化科学上的伟大贡献，如纸、火药、罗盘、印刷术等，都是经中亚乌兹别克等地传往世界各地。文章论述了自汉唐迄明代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商业、科学技术、音乐舞蹈、医药、天文以及建筑等方面交流情况和著名人物及其主要事迹。这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359　中世纪时期阿塞拜疆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关系　〔苏〕寇　瑟著　君　石译

（《历史研究》1958年第2期）

本文是作者于1957年4月18日在巴库阿塞拜疆科学院为纪念万隆会议二周年的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作者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论述了中世纪时期阿塞拜疆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关系。阿塞拜疆位于里海西岸，居丝绸之路的孔道。公元前二世纪，近东和西方各国就已经开始和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以生丝和丝织品、香料、香剂、瓷器以及宝石为主的中国商品，通过商队越过中亚细亚运往里海，然后再渡过里海，沿库拉河及里昂河运到滨海的城市法舍斯（今波蒂）。从考古发掘中所获丝织品残迹分析，公元五至七世纪，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已经输往阿塞拜疆各城市。从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初，中国的丝织品在东方各国包括阿塞拜疆推行很广。在《雅伊布·阿德·杜尼亚》这部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的地理著作中，曾叙述在大不里士城的商品中，就有中国的金线织锦缎。阿塞拜疆的各个城市不仅从中国输入精美的丝织品，而且还输入各种其他的商品，其中以贵重的瓷器占重要地位。有一种叫"马打万"的浅绿色瓷器，在东方十分名贵。有一种瓷盘、盘底绘制着一条深青色的龙，有的瓷器上还有中国的戮记。阿塞拜疆人也模仿中国瓷器进行制造，瓷器上的花绘图案深受中国画的影响。这种粗瓷器叫"契尼"，意思就是中国的。这个专名词很快就列入了阿塞拜疆和其他许多东方国家的语言。这些事实证明，在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阿塞拜疆同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极其广泛。阿塞拜疆对中国输出的商品中，还有土耳其和伊朗的地毯，这在旅行家伊本·巴图达的著作中曾有叙述。伟大的阿塞拜疆诗人尼萨梅在诗歌中还叙述了中国可汗和古尔国巴哈拉的战争，并对美丽的中国城市刻意加以描述。其后，蒙古人征服并统治了伊朗和阿塞拜疆，建立了伊儿汗国，大批工程师曾随同旭烈兀的军队到达阿塞拜疆并居留于此。他们修筑桥梁，建立碉堡，而且在战役中管理中国制造的子弹。伊儿汗国的国王在即位时要经中国皇帝的批准和册封，和中国经常有信使往还，还互相交换使节。公元1285年，

在伊儿汗国阿古思时代，曾经有一个中国代表团到过阿塞拜疆。同去的还有一位钦差大臣是驻伊儿汗国王宫的全权代表，曾先后充任阿古思、格萨汗及奥耶都的顾问，并任阿塞拜疆驻马拉加的一个图曼（一万军队）的统帅。之后又被任命为希尔万的封疆大吏。他此后就居住并死于希尔万。在这一时期，中国同近东各国，特别是同阿塞拜疆在科学方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中国学者在马拉加天文台工作，有两位学者参加了《史料汇编》一书的编写。还有许多医生在阿塞拜疆的医院里工作，他们曾治好过伊儿汗国国王旭烈兀、格萨汗和其他许多人的病。格萨汗曾派信使到中、印两国把草本和木本植物的种子带回来，移植在台不里斯。来自印度、中国的佛教徒在阿塞拜疆的许多城市和地方建立了庙宇，中国的雕刻、绘画和建筑也对阿塞拜疆有很深的影响。

360　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　　　乌廷玉

（《历史教学》1957年2月号）

本文是研究隋唐时期国际贸易问题的一篇专文。隋唐时期，国际市场较南北朝更加扩大繁盛，东方与新罗、日本贸易频繁；西方与中亚诸国及欧洲一部分国家直接通商；西南与波斯、大食、东非洲；南方与印度洋沿岸诸国，都有商务往来。作者还具体介绍了陆路和海路通商路线，西北陆路又有通往中亚、西南亚及欧洲的南、北、中三条大道。“北道”从敦煌出发，循天山北路，经伊吾（哈密）、蒲类海（巴里坤）、突厥可汗庭（巴勒喀什湖南部）到欧洲的东罗马，出地中海。“中道”走天山南路的北道，由敦煌经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疏勒，越葱岭而达波斯。“南道”走天山南路的南道，由敦煌经鄯善、于阗（和阗），过葱岭及吐罗火，到北婆罗国（今印北度）。隋唐时期，因国际贸易发达，国外商贾及商品大为增加，为了有效的进行商业贸易，政府设有专门管理机构。隋朝在京城建国门外设有四方馆，四方馆下设有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置、互市监等，具体掌管国际贸易事宜。到了唐朝国际贸易又有新发展，特别是海上贸易空前繁荣，为了有效的进行管理，除设置陆路贸易管理机构外，又在广州设立市舶使。

在隋唐国际贸易中，虽有私人交易，但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封建国家、即皇族地主集团。交易形态主要表现为“朝贡”与“回赐”。所谓“回赐”，就是对外国商品所付的价款。当时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绸，而丝绸的来源一部分由官营手工业场坊生产，一部分是封建中央政府对各地人民剥削来的贡品，并由国家垄断。用丝绸换回的商品主要是珍珠宝石、香料、犀角、象牙之类。这些商品昂贵；只有极少数皇族地主和大官僚能享用。作者认为，这种国际贸易虽然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但在促进社会生产上有很大局限性。当时的统治阶级，因能从中获得许多珍奇奢侈品，并能籍以提高威信，对外商采取积极态度，实行优待政策，故大食、波斯、新罗、日本以及中亚、南洋诸国商人来往者日众，留居国者甚多，从而促进了中西国际贸易的空前发展。

361 结绿和埃及宝石贸易 沈福伟

（《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辑）

本文着重追溯了古籍中关于宝石名称与后来各国的译名及名称演变，考释了各类宝石的源流关系，同时也展现了埃及宝石贸易的脉络。是一篇有关中西贸易和中西交通史颇有学术价值的考据文章。

古代埃及是各种宝石的宝库，宝石的雕琢、镶嵌十分发达。古代埃及人曾向世界各地寻求黄金、红玉髓、猫睛石、蓝宝石和青金石，同时也输出各种宝石。正是通过这种宝石贸易，埃及和中国有了最早的接触，其交往，至少可追溯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75—221年）。

我国在先秦时就有埃及宝石传入。西周以来，青碧色的玉石从西方输入的宝石中占据显著地位。最早传到中国的埃及宝石叫结绿。《史记》卷七九记范睢说："且臣闻周有砥砨，宋有结绿，梁有县藜，楚有和朴，此四宝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作者对从域外输入的名贵宝石—砥砨、县藜、结绿等的原产地、开采史，形状、质地、色泽特征，名称沿革，使用价值，以及贸易史、贸易途径等作了详尽考释。特别是对四宝中的结绿，即现在的绿宝石考释尤详。结绿晶莹澄清、色泽鲜艳，与光泽明丽的金刚石媲美，和具有夜光的县藜相仿佛，又足以和随侯明珠并列。左思《吴都赋》描述三世纪后东南沿海和印度、埃及的海上航路沟通以后，印度和非洲的珍货奇宝都充溢孙吴的都城建业（南京），因而战国时代名闻天下的随珠、结绿也难以独占鳌头。埃及的绿室石在罗马时代，向印度、中国输出，东汉时传入中国的这种绿宝石，却另有一个印度名称叫"木难"。但木难的老家却非印度，而是大秦。木难这种绿宝石，在公元五、六世纪时已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沈怀远《南越志》说："木难，金翅鸟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国珍之。"金翅鸟传说是印度佛教故事。大秦国的木难一变而成印度故事，说明木难从大秦运到中国，必须经过印度，因之前半段走的是海路。这正是后汉以来，埃及积极发展印、中贸易时，绕过波斯而采取的最主要的贸易途径。绿宝石的传入中国，在东汉时代所以要蒙上一层金翅鸟传说的外衣，也正好显示出大月氏贵霜王朝统治下的北印度，在中国和罗马贸易上所起的桥梁作用。唐、宋时代，绿宝石的贸易也未中断。明代杨慎《升庵外集》说碧色的木难是祖母禄。祖母禄出自波斯语、阿拉伯语。元、明以来，贩运绿宝石的都经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手，绿宝石的阿拉伯和波斯名称又流行起来。

本文的第二部分，对璊玫、玫瑰、瑟瑟、甸子等不同称谓的青色玉石，也作了极为精详的考释。战国时代以前，古人难以分辨西来的碧色玉石，便一概以璆、琳相称。璆琳所指宝石，既可包括绿松石，也可泛指绿长石、玉髓、橄榄石、绿帘石、透辉石、蛇纹石以及孔雀石等。文章对绿松石这类青碧色玉石（半宝石）的形成、化学成份、产地、用途、出产国及各时代名称沿革、贸易路线地点、传入中国的时间等，论述极为详尽。

第三部分是论述《魏略》中的埃及宝石。公元一至三世纪，罗马东方贸易正处于全盛时期，各种罗马货物都由埃及外运。建国于阿姆河流域和恒河流域西部的月氏是中国

和埃及之间的商业桥梁，在中埃贸易中起到了枢纽的作用。正始、嘉平(公元240—253年)年间写成的《魏略·西戎传》详细列举了大秦的物产，是一张极为难得的罗马亚历山大省（埃及）的出口货单。货单对矿物、动物、珠宝、织物、香药、各色玻璃等都分门别类，一一举出，这些货物也都是运到中国的罗马物产。其中珠宝一项，涉及的宝石就有玛瑙、符采玉、琥珀、珊瑚、璆琳、琅玕、水精、玫瑰、碧五色玉等九种。各种宝石多是埃及和地中海、红海之滨的名产。文章对各种埃及宝石的形状、名称沿革、产地、贸易市场等也一一作了论述。上述埃及宝石大都经过努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西部的贝贾人转送，由红海各港向中国输出。埃及和中国的贸易源远流长，西周以来的璠玟，起源于埃及孔雀石的古称。璠玟名称的传播和铜的开采有着一定的关联。绿松石和孔雀石常难分辨，所以中国古代最早对绿松石的称呼，应该就是璠玟。到了战国晚期，开始对绿松石采用“玫瑰”这个新名词，同时更有埃及绿宝石“结绿”的传入。古代埃及对中国宝石的贸易，始终居于前列的是绿色宝石和半宝石的输出，直到元明时代，仍然继续不息。

362 从大黄、茶叶贸易看十五世纪后的中亚交通 潘志平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本文通过对我国大黄、茶叶贸易的研究，探讨了公元十五世纪后中亚交通的历史地位。大黄西运最早可追溯到汉代，但成为中亚贸易上的重要商品则是十世纪以后事，直至十九世纪仍然兴旺不衰。大黄西运自古以来就走陆路。海路贸易兴起后，也有少量走海路，但大黄忌怕潮湿，不适于海运。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人阿科斯塔说“大黄（一种珍贵的药品）只有中国出产。……由海上运输不多，因为大部分受到损害（大黄在海上容易腐烂）。从陆路运输先到鞑靼地区，又从乌兹别克地区转运到忽鲁模斯……再转运到欧洲各地。”据俄国档案资料记录，在公元1403年或1404年6月间，共有六百头驮载中国商品的骆驼到达撒马尔罕城，其中可能有一百至三百头驮载大黄。茶叶贸易亦始自中国，中国有悠久的饮茶历史。茶叶贸易主要通过海运，然而从中亚到俄罗斯内陆地区所需茶叶仍走中亚商路。中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八至十九世纪，中国的大黄、茶叶在中亚贸易上的地位愈来愈重要。这从公元1827—1831年清政府与中亚浩罕国围绕大黄、茶叶发生的贸易战中就可看出。按一般看法，自公元十五世纪东西海路贸易兴起后，中亚陆路交通衰落。但作者认为，第一，海路交通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陆路交通，如中世纪以来的东西陆路上的大黄、茶叶贸易即其例证。所以十五世纪以后的中亚仍是东西方陆路交通的枢纽。当时东西方往来的贸易中心是肃州、西宁及附近的多巴。随着俄罗斯的兴起，由此往西的商路逐渐北移，这里自古以来就有一条从花拉子模、布哈拉，沿着里海北岸到乌拉尔、伏尔加的商路。商队经由这条路从花拉子模到伏尔加河的保加尔，然后到喀山。在从亚洲通过乌拉尔的山路上有一座商业城市秋明，所以这条山路也叫“秋明通道”。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后，往中国的贸易由托博尔斯克沿额尔齐斯河而下，托博尔斯克便取代秋明、塔拉成为贸易中心。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俄国通过恰克图建立了一条更偏北的通往中国的商路。但原先经中亚的传统商路并未废弃。第二，十五世纪以后，信仰伊斯兰教的乌兹别克、维吾尔族商人在中亚贸易上起着古代粟特商人那样的重要作

用。当时统称他们为“布哈拉商人。”他们的活动范围东起北京、恰克图、西宁、肃州、西至阿斯特拉罕、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塔拉、秋明这一广阔地区。作者认为十五世纪以后中亚交通断绝论，首先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提出的，是有偏见的。事实上这条路的某些路段在某一时期因战乱中断是可能的，但整个陆路交通并不会因此完全中断。因为它是由许多平行的纵横相联的网络构成的。从东西交通史看，往返欧亚东西两端行程万里的商队，为数极少。他们的经济活动不是“马拉松”式，而是逐站传递的“接力赛”式。中亚绿州间的短途贸易、中转贸易融进这一东西方向的贸易河流。丝绸、大黄、茶叶等中国商品在某一时代的兴旺，成为这一河流的标志。所以，无论海道如何发达，欧亚内陆腹地的这种交通、贸易不会断绝或停止。这就是对十五世纪后中亚交通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这种观点，对丝绸之路历史的认识不无参考。

五、文 化 交 流

363　上古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齐思和

（《历史教学》1964年第4期）

本文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较全面地阐述了上古时期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已发生的友好往来关系。作者分别国名，列举事实，说明通过友好往来，中国的生产技术、工艺制造和学术思想对各国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同时，中国也从国外学到许多东西，引进许多动植物品种，丰富了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些都是通过横贯中亚的丝绸之路来进行的。

在先秦文献中，就有不少关于中亚地名记载。如"大夏"之名，早见于《吕氏春秋·古乐篇》与《山海经》。《逸周书·王会篇》有渠搜、康、大夏、月氏等名称。大夏，希腊人称为巴克特利亚；渠搜即汉代的大宛，今之费尔干；康即汉代的康居。晋代初年发现的《穆天子传》，其中记述周穆王西游故事未必真实，但反映出战国时期人们对中亚、西亚的地理、历史知识已经有所掌握。这些知识来自人民，说明人民之间已有交往和商业交易。至张骞通西域，政府之间也正式有了往还。伊朗当古代中国与欧洲间的交通孔道，张骞派副使访问，受到伊朗国王隆重接待；归还不久，伊朗派使臣来中国答聘，并带来罗马幻术家和驼鸟蛋。从此，亚洲东部和西部两个强大帝国间发生了外交关系。张骞出使西域，带去"牛羊以数万，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归来时又与西域使节和商人同来。通过友好往来和商品交换，中国先进生产技术传入西域，对西域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促进作用。据《汉书·西域传》载，当时大宛人只知从河渠中汲水，不知凿井利用地下水；汉人教以凿井汲水，供饮食、灌溉农田。自大宛以西，不知铸造冶金；汉人教以冶炼，制造兵器。同时，中国也从西域传入汗血马、苜蓿、葡萄、琉璃等等。

育蚕缫丝，织造绸缎，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就已运到西域，在希腊时期已经传入欧洲。到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贵族服着丝绸已成风尚。罗马人沿袭希腊人的习惯，把中国称为"赛里斯国"、即产丝的国家。当时，欧洲人不会育蚕缫丝，所有丝绸依靠居住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的西域商人，从中国贩运到欧洲。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沿途又出现了敦煌、和阗、费尔干，布哈拉等一系列繁荣兴盛的城市，成为汉、唐时期具有国际意义的商业都市。"丝路"象一条亘长的彩带，将中国和中西亚及欧洲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东西方经济的繁荣，并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364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　　阎宗临

（《建设研究》1941年第6卷第2期）

本文共分九段，第一二段论述了文化的概念及其形成，批判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认

为中国文化西来说之论点，颇近乎形而上学。实际上中国文化秦汉以前是独立的，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文化才起了巨大变化。至于《穆天子传》所述穆王西至昆仑，见西王母事，系根据《竹书纪年》，而《竹书纪年》则不十分可靠。《逸周书》也曾提到来朝各国，除大夏，余皆汉以后西域国名，《管子》中虽也提到大夏，根据向达先生考证，也系汉人所加。第三、四、五段则论述中西交通之形成和中国丝传入西方问题。西方古代典籍中，曾记载公元前545年至539年间，波斯大帝西流士向东进兵，大夏失陷，康居粟特称臣，伪水一带，包括Margiane与Ouvarazmiya悉为波斯所有，直至新疆附近。公元前330至328年间，亚力山大步西流士后尘，向东进发，沿途建立了许多城市，著名的有麦西德（Mesched）、健陀罗（Kandanar）、撒马尔干（Samarkend）等。作者认为西方史籍中之记载，只可视为中西交通之接近，而真正为中西交通开辟新纪元者，实为张骞之使西域。张骞使西域，在外交上虽无所获，但其精神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他从西域带回许多经济和地理知识，给中国留下了巨大影响。张骞死后，汉使数至西域各国，当时中西交通最繁者，以大宛为最。其后，汉与大宛国交破裂，李广利取大宛都城贵山城(今之Uratepe)，大宛献马求和，因饲马需要，遂输入苜蓿，并移植蒲桃（《史记》作蒲陶）。蒲陶系希腊文Botrus之译音。汉镜以蒲桃为图案，即可证明受希腊文化之影响。后汉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使大秦，安息人为了垄断中国丝的贸易，当甘英至条枝（安息属地），因安息人阻挠而返。但是中国丝早在秦汉以前，即已传入西方，希腊罗马作家，都曾有歌诵"丝"的诗。当时贵族们争相竞取，以着丝为光荣。因丝之大宗输入西方，将原有对中国的称呼Sinae抛弃，而代之以Seres，其意为蚕吐之丝或产丝之地，从而证明中国文化之西传。第六至九段，则分别将佛教、火祆教、景教、摩尼教之创立兴起及传入中国问题，进行了较详叙述。同时，上述宗教传入后，在中国的兴衰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都作了系统的考证，对中西文化史和宗教史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365　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日〕长泽和俊著　张英莉译　胡锡年校

（《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

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非大陆上人类主要交通路线的统称。在古代，东西方一切文化都是经过这条路线传播的。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动脉。"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先创用，他把连结西土耳其斯坦与中亚丝绸贸易线称作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是Silk road的英译）。其后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先后在中亚各地进行考古中发现许多中国丝织品，1910年德国汉学家艾伯特·赫尔曼把这条路线由中国延长到了叙利亚。本文是作者以概括简洁的笔法，论述了丝绸之路的起源、具体路线和它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意义和作用。丝绸之路是人类自古使用的远距离贸易路线的总称。今天人们把所有的东西交通路线和南北交通路线统称为丝绸之路。由于这条路线连结着三大大陆，其地域极为广阔，规模极为宏大，情况也极复杂，不少民族与之发生关系，也可以说它是人类文明的见证。世界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就是发生在这条道路之上或其周围地区。今天我们在丝绸之路所经由的各个地区

所发现的累累遗迹，正是人类历史交往和文化传播的见证。文章还论述了丝绸之路的三条干线和连接南北的五条路线。这三条干线是：一、草原路。从华北出发，越过戈壁沙漠至蒙古高原，再从这里穿过西北利亚森林地带南方的大草原，最后到达咸海、里海沿岸地区。二、绿洲路。从华北经甘肃河西走廊，过塔里木盆地越帕米尔高原，然后分为两股：一股从帕米尔高原北部穿过，经费尔干纳到达土耳其斯坦；另一股从帕米尔高原南部穿过，途中又分作南下抵达北印度和西向到达阿富汗斯坦的两条支线。到达土耳其斯坦和阿富汗斯坦后，再向西进便是伊朗，在这里道路又分为二：一条沿安那托利亚大道向西北到伊斯坦布尔；另一条向西南到达伊拉克，再过叙利亚沙漠，到达地中海东岸诸城市，最后从海路抵罗马。三、南海路。从华南经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到达波斯湾、红海。这三条干线中连接南北的路线共有五条：一是连接草原东端的漠北鄂尔浑河流域和长安或幽州的道路；二是从西藏经塔里木盆地至准噶尔的道路；三是从西土耳其斯坦经阿富汗斯坦到印度的道路；四是以地中海东岸为中心，北至高加索、安那托利亚，南达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道路；五是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南由海路达埃及和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北向则一至波罗的海，一至莱茵河流域。由此可知，丝绸之路是由一个庞大的交通网构成的。它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可概括为三点：第一、即作为欧亚大陆的动脉，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第二，是世界主要文化之母。特别是在它的东西两端，产生了诸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成为后来世界文明的先驱。在宗教方面，如琐罗亚斯德教（袄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也都在这里诞生，而且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第三是东西文化的桥梁。在丝绸之路经过地区所产生的文化，被使节、商旅和教士传播到各地，在传播中虽有某种程度的变化，但却使各地的文化得到了促进和提高。这是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上所发挥的各种作用中的最重要之点。接着，作者还在本文中对史前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和以上三条干线上的东西文化交流，都分别进行了详细论述。本文观点新颖，论述简明，对了解丝绸之路全貌多所裨益。

366　少数民族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　　齐思和

（《历史教学》1953年第7期）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组合而成的伟大民族。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成员中各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为阐明这个问题，作者引述了我国少数民族在农业、饮食、服装、居住、战术、音乐、美术、语言、科学及学术思想等等方面对于祖国文化的伟大贡献。如中国古代音乐比较单纯，曾有"听古乐则睡"之说。后各族相互交流，特别自汉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日渐繁盛以来，西域音乐、舞蹈、杂技相继传入中原，中国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就音乐来说，外来音乐节奏复杂，曼妙动人，很受欢迎，时人称之曰俗乐，以区别于庙堂之上的雅乐。再经过吸收融合，丰富了音乐内容，增强了歌舞优美感，逐次发展成为今日独具特色的东方乐舞。

佛教传入，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起了深刻作用，不仅在宗教信仰方面发生了变化，其他方面也深受影响。如语言学方面，反切方法，四声区别，三十六字母的发明，

都因学习梵文、翻译佛经而引起。唐代俗讲和后世通俗文学的起源，是受了佛教传说故事的影响。佛典术语如"平等"、"过去"、"未来"、"时间"、"空间"等，丰富了我们的语汇。美术方面，雕塑艺术、绘画风格，以及佛塔建筑等等莫不受其影响。这些影响虽来源印度，但都经过西域才传入中原。隋唐以后，西域佛教渐衰，回教随即传入，西域又成为阿拉伯文化传入的桥梁。特别到了元代，阿拉伯医药及天算的传入，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另外，自张骞通西域后，各种农作物及栽培技术的引进，对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品种的增加，都作出了贡献。棉花即其一例。其它还有苜蓿、葡萄、芝麻、蚕豆、胡萝卜、安石榴、胡荽、番红花、红蓝花等；饮食有葡萄酒的制法和生活用品方面的胡床等。这些都对丰富、发展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起了重要作用，是各民族人民对祖国文化的伟大贡献。

367 关于《大唐西域记》　　季羡林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4期）

本文系《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一书中的一个章节，作者考察了《大唐西域记》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与同类书籍进行了比较，研究能帮助我们解决多大问题，以及在实践中究竟用处多大。文章从这些方面对《大唐西域记》进行了评价。作者认为，中华民族不但是一个酷爱历史的民族，也是一个酷爱地理的民族。玄奘以前，历代史地成书极多。玄奘在交通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所以能历尽艰险，足迹遍及印度，写出《大唐西域记》，自然也受中华民族这一优良传统的影响，这除玄奘本人的天才与努力外，也与当时唐太宗欲雪突厥欺国之耻、客观需要了解西域地理情况这一历史因素相关。

丝绸之路自汉代开拓以来，中印僧侣就互相往来。我国赴印的僧侣中，不少人也都写有记传，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但与《大唐西域记》相比，无论质量之高，材料之翔实，均都望尘莫及。外国人到过印度的也很多，也留下许多记载，但在玄奘以前，所记都较简略；即使以后的一些著作，也无法代替《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不仅是僧侣活动对西域地理的贡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更重要的是研究古代印度的历史最为可靠的资料。它除对确定佛陀生卒年月起过作用外，还对印度中世纪以前历史上的许多大事件都有记述。特别是玄奘所在时代，印度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等方面，书中都有非常翔实的论述。对佛教史的记述犹为丰富。全书包括了一百多个"国"，这些"国"的幅员大小、都城所在、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几乎都有记载。所以，要了解七世纪以前的古印度，只能依靠《大唐西域记》。世界上凡是研究印度古代问题的书，几乎没有一本不引用玄奘所记述的史料；凡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不论他是哪一国人、代表哪种观点，都对《大唐西域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特别是玄奘对古代西域及各国的语言文字做了精心的观察，所到之处，极为留心，无论长短，总要记述几笔，从而为我们研究古代西域各国的语言文字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上世纪末至现在，从新疆地区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不少有关各种文字的残卷，经各国语言学家，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考释读通，证明玄奘记载的正确性，这对研究丝路之上文化交流极为重要。

368 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 王明哲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对战国两汉时期北疆游牧民族活动的基本情况作了简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考古资料对古塞人文化进行了探讨。战国时期或者更早，在北疆的西部和西北部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带，是塞人的世居地。《汉书·西域传》称乌孙国，“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此外，在帕米尔地区也有塞人活动。《汉书·西域传》载：“休循国……在葱岭西，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苏联学者认为，“从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开始，在东帕米尔就居住着萨迦（即塞人)诸部落。”在北疆的东部和东北部，即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流域，则是呼揭人的天下。公元前二世纪上半叶（约公元前177～176年）匈奴冒顿单于致汉文帝信谈：“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这说明战国或更早时期的北疆草原基本上是塞人和呼揭人。进入汉初，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月氏和乌孙人相继从河西走廊西部迁到伊犁河流域，驱逐塞人南迁葱岭。公元前160年左右，大月氏又为乌孙所逐，从此终两汉之世，伊犁河流域为乌孙人所据。二是随着匈奴政治势力的扩及新疆，匈奴族人逐渐移居到东部天山巴里坤草原一带，而原活动于此地的呼揭人，则退处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上游。鉴于乌孙文化与塞人文化是活动在同一地域交叉和相接的两个文化系统，作者在对乌孙的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后，对于最近几年发现的两批塞人文化资料有了初步认识。认为它们既有各自的特征，又有相互的联系和影响。塞人文化遗存一是在特克斯和新源县发掘的部分墓葬以及早年的昭苏部分墓葬；二是尼勒克县古铜矿及伊犁地区出土的有关铜器。新源黑山头和特克斯墓葬与已发现的乌孙文化有异；而它们本身又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遗存，其时代上限到战国，下限到西汉初中叶，这是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的早晚期遗存。至于尼勒克奴拉赛铜矿遗址的发现和伊犁河流域铜制器皿的出土，可以认为，从公元前一千年到战国时期左右，大体是塞人活动期间，青铜文化已比较发达，其后期已开始使用铁器。除伊犁河流域外，1976—1977年在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墓地发掘的四十座古墓，从其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来看，时代初步定为春秋战国，其族属问题，作者认为应将火葬与土葬分别研究。土葬的出土器物与伊犁河流域墓葬出土文物有共同形体特征，应为塞人文化遗存；至于火葬墓，因无陶器出土尚难具体分析。

本文可与王炳华《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1期，已收入本叙录）一文参照阅读。

369 丝路撷琐 刘铭恕

（《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本文是有关丝绸之路研究中的札记，对前人研究中的疑问，多所补订。

一、唐代归化人罗好心

罗好心的事迹，由于研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的撰述者而被探索。但对罗好

心出生国藉如搞不清，就对他推荐景净、般苦二人译经的意义，不可能作出透彻说明。唐人所谓毕、白、曹、罗四胡姓，毕为迦毕试国，罗为吐火罗，按归化人命氏通例，以毕、罗取姓，事虽不多，然亦不无其例。智慧（即般若）为罗好心的表兄弟，为迦毕试（罽宾）国人。按《大唐西域记》有迦毕试国，其文字同覩货逻国，习俗语言颇异。似此，可知迦毕试为吐火罗范围内的胡国，则罗好心亦为吐火罗人。

二、兴生胡

循丝绸之路东来的西域商人，历史上通常称为贾胡商胡；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却有兴生胡之称，或简称兴胡。按兴生胡的兴生一辞，为六朝以来习惯用语，其意义除搞商品买卖外，还兼营高利贷。胡商中有为中国的豪门富商担任"经理""买办"者，不单管金钱，还营运牟利。这种为达官豪富经营买卖的胡贾，就是兴生胡。他们已由牵着骆驼奔波于丝绸之路上的行商，变为中国富人的经理、买办了。这一现象似乎始于南北朝，到了唐代，有些摩尼师，不仅传教，且兼营商业，与中国富商大贾的交易关系很不正常，而是狼狈为奸。元代更是变本加利。元蒙贵族将金钱交由这种胡商代为经商或代放高利贷而坐享其利，这种经济关系术语叫作斡脱钱。

三、长安有无胡姬

日本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氏，对唐代长安深感兴趣，写有《唐代长安之胡姬》等专辑。向达先生虽不免有所怀疑，但也不自觉的掇拾成章，收入《长安与西域文明》之中。但唐代来自西域的归化人和商人等虽多，而青少年妇女经营酒店、当垆卖酒一事，求之史书，绝无确据。那么，长安多胡姬之说从何而来？作者具体分析了一些唐诗，认为：东汉辛延年的《羽林郎行》，原是描写霍光的一个家奴，仗着主人势力，欺压流寓长安市上的少数民族少女。而后来，刘琨摸拟《羽林郎行》，作《胡姬年十五》诗，突出胡姬，又和酒密切联系，加以夸张渲染；而后，又感召了豪放不羁、嗜酒成癖的李白。随后张祜、鲍明远、岑参等又继之，踵事增华，遂成故典。综观歌泳长安胡姬的诗篇，都是东汉辛延年描写当时都会酒肆胡姬之翻版，而不是唐代长安的真实情况。不理解此等胡姬诗的先后模仿因袭关系，遽视太白等诗所描写的为当时长安之真人真事，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四、丝绸之路上的丝绸

作者研究了有关记载番练、蕃彩、胡绢等名称的古藉和使用波斯绵情况的出土文书，认为隋唐时代确有专门织造供外销的一种丝绸。上述名称的丝绸，即是外销货，而非舶来品。

370　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　　　汪宁生

（《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本文利用新疆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包括帝国主义盗掘去的资料，就汉晋时期西域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探讨了这一时期祖国文明在西域广泛传布的问题。这是对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巴·奥克拉德尼科夫说我国最近出土文物是"中国考古学伪造的新东西，……"烂言的驳斥。西域的农业，在汉武帝以前已有一定基础，汉武帝以后，又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武时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不断派遣士卒戍守西域并进行屯田。屯田移民不仅带来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还带来了各种手工业技艺，使西域冶金、制陶、纺织等部门的面貌为之一新。至于商业，西域和内地之间早在西汉之前就有联系。汉武帝以后由于西域正式列入祖国版图，以及本地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西域和内地之间商业活动更加频繁。为了克服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汉族和西域少数民族互相学习和使用对方的语言文字。西域少数民族使用的各种文具、书写材料和工具都受到内地的影响。由于西域各族人民和内地人民的长期交往，在生活习俗方面，也逐渐摹仿内地，无论是服饰、饮食、居住、婚姻或丧葬等，都和内地有共同之处。总之，作者认为，从公元前二世纪末开始，西域就列入祖国的版图，不仅在政治上受中原王朝直接管辖，就是在经济上、文化上也一直和内地保持血肉联系。内地的经济文化影响不仅遍及西域全境，且已到达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在伊塞克湖之滨早就有屯田移民的活动。今天费尔干纳地区象冶铁、凿井等生产技术都由汉族士卒传入。中国对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不仅设有行政机构进行统治，就是在经济文化上自古以来就和中国有密切关系。西域是个多民族地区，从公元前二世纪末开始也有大批内地汉民移居这里，他们共同缔造了祖国的历史，也分享光辉灿烂的祖国文明。

371 汉唐间西域之交通及其文化 常任侠

（《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创刊号）

作者在本文中，对汉唐以来中国通往西域之道路作了概括叙述，不仅介绍了中国去西方之路线，且将西方来中国之某些路线也进行了考证。自汉以来，中国去西域者颇多，作者将最著名最有影响之人物，如法显、玄奘等人之行迹一一作了记述，从而使我们对汉唐以来之西域交通路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作者还在本文中，对东西方文化的传播，人种的变迁，语言之形成，都有所叙述。从文中可得知自秦汉以来，中国即与西域发生文化关系，历魏晋南北朝，愈趋密切，至唐而臻极盛。就其影响所及，包括诸多方面，但在宗教艺术方面却大放异彩。故西域文化与中国文化之交流、融合，对东方中古文明之形成关系极大。

372 略论十六国时期凉州地区的文化教育 施光明

（《兰州学刊》1984年第2期）

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混乱动荡的时期，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的摧残。但在西北边陲的凉州地区，这一时期却儒学发达，名家辈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兴盛时期。本文对其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可供研究“丝绸之路”者参考。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封建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其中建都于凉州地区的有汉族张轨建立的前凉（301—376）、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385—431）、氐族吕光建立的后凉（386—403）、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397—414）、汉族李暠建立的西凉(400—420)、匈奴别种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

401—439）等六个割据政权。这些政权，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推崇和倡导儒学、兴办学校、重视儒家知识分子，从而使凉州地区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除了官办学府之外，凉州境内私人讲学之风也十分盛行，一些著名学者纷纷开馆延学，传授各门学业，出现了拥有学生数百至上千人的私学。大量私学的兴办，不仅扩大了教育面，而且，由于私学的授业者大都是名儒，使得其学术能够代代相传下去。这样，通过官学和私学两条途径，使凉州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凉州诸割据政权，还十分重视发挥儒家知识分子的作用。如前凉的张轨曾令有司将凉州境内那些"高才硕学，著述经史"的名儒宿学"具状以闻"。将大批儒家知识分子收进前凉政权。继前凉之后兴起的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诸政权也都继承了这种做法。儒家知识分子进入统治政权后，许多人担任了"儒林祭酒"、"博士祭酒"、"著作郎"之类专门负责文化教育工作的职务，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发展文化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凉州地区在十六国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史称："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这些学者致力于各种学术研究，撰写了大量著作。其中有经学、史学、名人文集，也有文字学、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著，如赵𢿱所著《甲寅元历》，最早提出改革闰法，对南朝祖冲之论定《大明历》很有影响。凉州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不仅保存、继承和发展了两汉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而且对以后北魏乃至隋唐的学术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十六国时期，北方文化教育中心从中原西移到地处西北边陲的凉州地区的原因，作者认为：一是统治阶级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凉州诸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不论国祚长短，都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而且统治者本身大都很注意自身的文化学习。这种风尚，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二是凉州地区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前凉政权从公元301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起，存在了76年，是十六国割据政权中享国最久、历世最长的一个政权。前凉亡后，凉州境内出现了几个割据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但和中原相比，战乱还是较少。从而使前凉奠定的文化教育事业，得以继续发展。三是凉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凉州地处西北边陲，汉魏以来中原地区的浮华奢侈风气对之影响较小；另方面，凉州位于中西交通要道上，处于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点，能够广泛吸取他人文化的优秀成果。这是凉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73　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　　　黎尚诚

（《西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3期）

本文论述了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及其对北魏、南朝的影响。所谓五凉，即十六国时期先后建立于丝绸之路通道的河西走廊的五个割据政权，亦即汉人张轨建立的前凉，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匈奴人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和汉人李暠建立的西凉。五凉共历时139年，大略与十六国时期相始终。十六国时期是中原大动乱的历史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民族轮番入据中原称王。战乱相继，政权迭变，生产和文化遭到极大破坏。当时河西虽也战乱不断，但较之中原还算平静。前凉

和北凉立国都比较长久，前凉76年，北凉43年，治国理民，比较注意生产和文化的发展，使河西在乱世尚能呈现升平景象，故中原士人多避乱凉州，促进了河西文化的繁荣。本文所说的河西文化，主要指的是前凉和北凉的文化。认为前凉提倡儒学，北凉提倡佛教。南北朝以后的儒佛合流，并行发展，河西文化实为先声。文章介绍了河西儒林的江琼、宋谶、郭荷、索袭等二十人的简历及著述，论述了五凉时期的佛教传播、河西文化对北魏及南朝的影响。认为五凉时期河西佛教的发展，对南北朝佛教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并分析了佛教盛行的历史原因，考证了河西佛教石窟的开凿和寺院的兴建，以及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天竺高僧昙无谶翻译佛经事迹。北凉的儒学、佛教和音乐、历法对北魏和南朝均有很大影响，文章论述较详。特别是河西僧人大量翻译佛经，对南北朝佛教的大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文章最后论述了河西文化的历史地位，认为河西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为北魏的文化发展储备和输送了大批人才；使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在河西交流、融合，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各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族与汉人的融合。由此可以看到河西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巨大影响。

374　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　　张广达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

在隋唐盛世，中原文明的特征之一是它与周围地区，特别是与西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隋唐时既善于归纳前期中国文化的成果，又善于博采外来文化的长处，多种文化交流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本文内容未涉及人们所熟知的许多事实，主要考察了这一交流过程中的某些侧面。人们在考察隋唐时期西域的多种文明交流情况时得到的突出印象是：这里受着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向中原输送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宗教、艺术和某些科学技艺。文章列举了西域文化，如音乐、舞蹈等艺术对唐代中原地区发生的深远影响。作者认为唐代长安受西域文明浸染的情况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是唐朝因为注意多方面吸收外来文化因素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二是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并非一律兼收并蓄。中原和西域的传统文化各随自身的需要而摄取对方的相应成份，这是当时文化交流的特征之一。五代宋初僧人赞宁（919——1001年）在公元982——988年间纂成《宋高僧传》一书，凡三十卷。该书卷三末尾有《论曰》一篇，是对译经经验的概括和阐述赞宁本人翻译见解的一篇理论性文章，他揭示出翻译“新意六例”，六例之中，赞宁就“胡语梵言”、“重译直译”、“粗言细语”三例举出一系列现象，这些现象不仅值得研究佛经翻译史者的注意，也值得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者的注意。由于“新意六例”的揭示，过去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无论语言或教义，都存在着障碍。因而早期传来东土的佛教并非面目全同于印度的佛教，而是流行于西域的佛教，或经过西域中介而为汉人揣摩、体会的佛教。即便是当时流行于西域的佛教，也不是纯粹印度的面貌。这正好说明了东西文化汇聚与相互融合的情况。据此，作者认为，文化的交流实际上是各民族在各种形式的交流中互相影响，并分别作出各自贡献的过程。交流过程是相关民族各自发挥特长进行共同创造的过程，这是当时文化交流的特征之二。隋唐时期，西域

很早就流行戏剧，作者列举了各地发现的佛教戏剧残本后判定，西域存在戏剧脚本和流行演戏应早于中原地区。可是戏剧没有像百戏杂技、音乐舞蹈那样很早传入中原，其原因令人费解。会不会当时中原存在某种类似西域的戏剧文艺体裁已经失传，或尚未被人们所认识？这不能不令人进而思考是什么因素决定着文化交流中的取舍问题。交流不等于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拣选乃至舍弃，此为作者对本课题考察观察到的特点之三。隋唐王朝通过西域而和印度、伊朗、大食、拜占庭等文明国度，以及相邻的突厥等游牧民族建立的强大汗国保持着往来联系。隋唐王朝通过成为多种文化汇聚地区的西域吸收文化营养，从而有助于隋唐王朝创造出灿烂的文明。研究历史上中国人民如何使固有的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相应成份相接榫的经验，不仅富有科学旨趣，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375　成吉思汗与塔塔统阿

——兼谈历史上的蒙维文化交流　　樊保良

（《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塔塔统阿原是乃蛮国的掌印官。成吉思汗消灭乃蛮国后，塔塔统阿“怀印逃去”，被活捉回来后，成吉思汗问他，为何背印逃跑？他回答说：“掌印是我的职责，我要死守此印，把它交给主人。”成吉思汗夸奖他是忠臣，遂留在自己身边，仍命他掌管文书印鉴并让他教育蒙古皇子诸王用维吾尔字母书写蒙古语，从而创造了蒙古文字，在蒙维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不朽贡献。这种维吾尔字体的蒙古文，经过以后长期的发展变化，不断改进，遂形成现在所使用的蒙古文字，这对蒙古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文章在分析成吉思汗与塔塔统阿的关系时认为是二人巧遇机缘除了塔塔统阿天资聪慧，善于说话，有才能，精通本国文字，以及成吉思汗很有远见，重视知识，欢迎和尊重知识分子，爱惜人才，善于吸收先进文化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些因素以外，更主要的是封建的忠君思想，使两人有缘结合，君臣相契。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大汗国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强化封建新秩序，首先要在政治上加强大汗的权力，在思想上树立封建伦理和纲常观念。因而塔塔统阿忠于故主、忠于职守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便为成吉思汗所赏识和称赞，成为一位很理想的人物，对他重用不疑。文章还列举了一些史实来证明这一观点，并对成吉思汗重用维吾尔族人才、创制蒙古文字的重大意义和功绩，对塔塔统阿传授文化知识、在蒙维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进行了充分的评价。

376　由考古学上所见到的新疆在文化上的地位　　黄文弼

（《禹贡半月刊》1935年第4卷第6期）

新疆为东西陆路交通枢纽，在海运未开以前，东方民族西去，西方民族东来，均须经过新疆。新疆因其地理历史原因，其所有文化皆系外来。但因何而来，应为研究的问题。一般公认新疆文化的来源，一是中国本土，一是伊兰高原，二者居新疆东西两侧。但二者何以能够汇通，此必借诸于军事政治之力。军事政治未必即为文化而发生，但文化之传播，确受军事政治之影响。作者在本文中，概括地提出了新疆文化的形成和

古代民族迁徙之关系，如大月氏和乌孙的西迁，以及大月氏又迁印度西北部，是否就发生了文化交流，难予推猜，但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此二事为推动中西文明交流的最大原因，则无疑问。由于马其顿征波斯，又进兵印度西北，遂将希腊文化传入。当时佛教文明已转入印度西北，于是印度西北受两种文化的推动，遂形成了犍陀罗之佛教文化。后因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击大宛，于是波斯与印度文化源源传入，如新疆佛教洞窟和庙宇的建筑，多模仿犍陀罗式，而洞壁绘画，庙宇泥塑，最古期者多为希腊风格。这些都可说明新疆文化受外来影响之深。至于语言文字方面，除发现古回鹘、梵文外，并发现为世人所不识之几种文字，后经西方学者研究，一为粟特语（Sogdische），亦称康居语，通行于妫水流域。因康居人多习商贾之业，常往来于东西各地，其语言遂成为中亚各地之通用语。二为吐火罗语，通行于塔里木河北岸，因所出之地不同，而分为龟兹、焉耆语，以上均属印欧语系。三是于阗语，当时通行塔里木河以南，系伊兰语系。四为作者发现之一种文字，既不同于龟兹语、也不同于于阗语，因其出土地定为佉沙语。作者在本文中告诉我们新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之贡献，并指出中西文化传播之原因，以及古新疆语言文字之流行等，从而使我们得以掌握新疆文化形成之概况，对研究“丝绸之路”者将获益不浅。

377　新疆在东西文化上的估价　　吴蔼宸

（《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31期）

本文作者曾任新疆外交特派员，熟知新疆史地，并著有《新疆游记》一书。作者认为古西域（即新疆）为东西文化相互传播之陆上唯一交通地。汉武帝令张骞使月氏，实为中西交通之始，然在张骞通西域前已有私人往来，并将中国工艺品输往印度、波斯各地。彼时交通有南北二路，两路均以敦煌为会合之地，故中国文化西渐或西方文化东来，西域皆为必经之地，而各自波及东西。本文除简要介绍西域之民族、语言外，重点阐述了文化东传问题，并从佛教、基督教、回教、科学、文化、美术、幻术、乐器、植物、动物十个方面，分别作了具体叙述。上述十个方面自西域传入后，对中国文化影响至为深远，如佛教传入后，使中国思想界为之改观，影响了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诸如文学上俗文学的产生，音韵学的发展，诗词、戏曲的形成，无一不受佛教之影响。再如西域音乐传入后，使中国原有而濒于消亡的音乐，增添了新鲜血液，产生了伟大的唐代音乐。总之，西域文化之东渐，影响十分巨大。至于东方文化西传问题，仅作了扼要介绍。本文虽简明扼要，但涉及了文化交流的全部内容，为研究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378　养蚕织绢的技术是怎样由内地传入新疆的　　谷　苞

（《新疆日报》1962年7月22日）

我国是丝绸的祖国。蚕丝产品一向以绚丽灿烂而著称于世，养蚕织绢的技术达到十分巧妙精湛的境界。自公元前二世纪，张骞两次通西域后，丝绸便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

一项主要商品。丝绢首先贩运到新疆及当时的中亚各国，再经由波斯和印度商人之手转运到欧洲罗马帝国出售。丝绢传入新疆的时间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养蚕织绢的技术传入新疆的时间最迟不晚于公元七世纪，在《魏书·高昌传》中就已谈到吐鲁番地区"宜蚕"的记载。公元644年，玄奘从印度取经返回长安途经于阗时，曾采访到一则有趣的故事，记载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从求。时东国密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词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词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惟王女帽不敢以检。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鹿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养之。自时厥后，桑树连荫。……"《新唐书·西域传》中也记述了这个故事。描述这个故事情节的壁画，也于1914年在和田县丹丹威里克地方的一个废寺中发现。汉族公主把养蚕织绢技术传到新疆的故事，记述了新疆农业生产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发生是通过和亲来表现的，这就深刻体现了自古以来汉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亲密联系。养蚕织绢作为农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增加农民收益，改善生活。自公元六、七世纪以来，新疆南部就成为一个桑蚕生产很发达的地区。南疆丝绢不仅供当地使用，还可能是外贸商品。和田生产的丝"白克散绸"、丝绒地毯等一向闻名于国内外，近百年来丝及丝织品一直都是出口的大宗商品。

379 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 贾应逸

（《考古》1985年第2期）

养蚕缫丝和织制丝绸的技艺何时传入新疆，新疆丝织技艺有无自己的特点等问题，是研究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课题之一，也是探索新疆发展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对我国丝织技艺西传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也有重大意义。过去，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者大多是根据出土遗物和有关文献的记载来推测的，在时代和内容上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甚至作了曲解。本文根据新疆出土文物，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例如1959年在巴楚县脱库孜沙来遗址的唐代文化层中，发现一团乱丝和三个蚕茧，1980年，在尼雅遗址也发现蚕茧一只和大量枯桑。尼雅遗址是汉代精绝故址，大约废弃于公元三世纪，最迟不晚于四世纪。出土蚕茧都被蚕蛾咬破，这与《大唐西域记》、《于阗国史》中所记的："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极相吻合。这些都可证明，这一技艺晚于公元前后佛教开始弘布和田的时间，早于尼雅遗址废弃之前，大约在公元三世纪左右。另外，从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文书中记载的蚕桑、织绸资料来看，在公元五世纪，新疆境内已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龟兹锦、疏勒锦等。那么，织锦技艺的传入不会迟于公元五世纪，也许早在四世纪已经出现。这要比瑞典学者西尔凡所设想的时间早了近二个世纪。新疆出土的汉唐丝织遗物，无论是经纬线、组织法、图案纹样等都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有一些丝棉混合织物，具有新疆毛、棉纺织物的特点。作者就新疆丝织品的经纬线、织锦的组织法、图案纹

样、计量单位和幅宽等特点进行了详细分析。新疆丝织品的经纬线，继承了毛棉织物的传统，一般都要加捻。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织物的经纬线均未加捻，或稍微加捻，且捻向均为“S”。这与中原地区相同。另一种是经纬线都以“Z”向加捻，且捻度较大的织物中，有许多丝棉混合织物。这是新疆生产丝织品的经纬线特点。新疆出土的这部分经纬线加捻较紧的织锦，其组织法也和中原地区的经线显花法不同，它们大多是采用纬线起花法。作者描述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三件采用纬二重平纹组织法的织锦工艺过程及几件斜纹组织法的工艺技术，并将这些织物的组织法与毛织物作了对比，认为新疆织锦继承了自己毛纺织的传统，较多的采用纬线起花法，因而形成了新疆织锦技艺的又一特点，这种具有新疆纺织特点的织锦中。最早出现的花纹图案是在图案化了的“流云”或波浪纹上，显出或立或卧着的祥禽瑞兽，富于装饰意匠效果。在这种织锦中，往往还点缀着一些四瓣花纹以活跃锦面。四瓣花及其变体图案是新疆地区的传统纹饰，被称为塔里木盆地绿洲居民的“种族标志”。公元六世纪以来的织锦中还有一种遍地散花散点和植物的图案，是毛织品图案在丝织品中的运用。此外，还有条纹、格纹和联珠纹图案的织锦。新疆丝织品的计量和幅宽也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我国中原地区丝织品的计量单位是匹、丈、尺、寸。新疆的计量单位则是张、尺、寸。作者通过对新疆出土文物，如蚕茧、文书，尤其是大量丝织品的观察、分析与初步探讨，并和古代毛织品相对比，可以看出：（1）中原地区的蚕桑丝织技艺，不是象一些学者提出的于公元419年传入新疆，而是早在公元三、四世纪，新疆人民就学会养蚕缫丝、织制丝绸了。（2）公元四、五世纪时，新疆已能生产组织复杂、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锦。（3）公元五世纪前，新疆境内形成了龟兹、疏勒、高昌、于阗等丝织中心，并且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织锦，如丘慈锦、疏勒锦等。（4）蚕桑传入新疆后，这里的人民要等蚕蛾飞尽，再用残留的破茧缫丝。（5）新疆人民把自己传统的羊毛纺织技艺运用在丝织生产上，形成了自己的织锦特点。

380　试论我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　　　*石声汉*

（《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5期）

张骞通西域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早在张骞以前，西域之路已开，但在他先后至大夏、乌孙以后，才把整个中西大陆连成一线，即由长安起，经甘肃、新疆到达中亚各地。这样，在旧大陆上出现了畅通的“丝路”。丝路畅通后，为前汉多次出使、出兵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汉甘英使大秦提供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丝绸、冶铁、漆器及造纸、火药、印刷术等，都通过这条道路传到了西方；与此同时，西方的宗教、文化、艺术尤其是西域的某些栽培植物传入关中，并向东南发展而遍布全国，对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增加了内容，丰富了项目。所以丝绸之路堪称文明之路，友谊之路。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张骞通西域，传来了不少西域植物，增加了我国植物品种，据各书记载统计达十种之多，如葡萄、苜蓿、红蓝花、胡麻、蚕豆、葫（即大蒜）、胡荽、胡瓜、安石榴、胡桃等，都是经由张骞从西域引进的。但张骞究竟从西域带回来多少植物，本文作者遍寻正史后，终未发现可靠记载。相传张骞在西域带回的植物中，最重要的有葡萄和

苜蓿，但《史记》、《汉书》所记事实是：张骞自域返回后，向汉武帝说起过大宛有葡萄可酿酒，马嗜苜蓿，并未提及张骞自西域带回葡萄和苜蓿问题，而是张骞死后若干年，才由汉使采取回来的。将葡萄、苜蓿引入之功第一次归于张骞，第一次见诸文献的是后汉王逸，其后有晋张华、陆玑等人，至于相传中的其余各种，作者通过大量资料，一一进行了考订，对资料的始见出处以及其它各书先后转载情况，详为列表说明之，在条分缕析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初步认为：所传由张骞从西域引入中国内地的十种植物中，有九种是晋初即已发生，如《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引王逸、延笃所说，以后，诸如《本草经》、《博物志》、《述异记》、《艺文类聚》等书都作了转载，特别是《本草纲目》更为系统详尽。由于历代各书记载相沿，于是张骞从西域引进植物的传说，固定了下来。其中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除将胡豆特指蚕豆外，又增加胡瓜一种。所有这些植物，没有任何直接史料可以证明的确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贬低张骞开拓西域之功。正因为张骞开通西域，上述有关西域的栽培植物，才得以沿着丝绸之路带到长安，并传布各地，从而充实了人们的物质文化，后世人们为了纪念张骞的伟大功绩，遂将西域植物传入我国之功，统统归之于张骞。

381 葡萄考 谭少惠

（《遗族校刊》1947年第4卷第2期）

关于葡萄，中国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和《汉书》。《大宛传》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西域传》称：“大宛左右以葡萄为酒”。嗣后，在《本草纲目》、《齐民要术》、《种树记》等书上，均作葡萄，而《太平御览》、《酉阳杂俎》、《洛阳伽蓝记》又作蒲萄。这些不同之名词，均证明葡萄乃系译音之不同耳。作者从园艺学的角度研究葡萄传入中国问题，但范围则涉及语言文字、文学、考古学及中西交通史等方面。本文中将葡萄一名最早出现的有关记载，作了引证，复又查证了葡萄产地之各种记载，但其重点是研究葡萄输入中国问题。在此问题上，作者引证各家之说，认为各家之说的共同点是葡萄传入中国，乃张骞通西域以后事，分歧点在于是否为张骞亲移入？因为张骞以后，汉使数至西域，与大宛交流频繁，或为张骞以后人移植中国。可是对葡萄传入中国后，对栽培方法亦有所记载，在《元史》中还记载了安邑进贡葡萄酒及晒葡萄干的故事。实际上中国酿制葡萄酒始于公元七世纪，唐本草记有其事。葡萄传入，不仅是中西交通和农业史上的一件重大问题，也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一大事件，鉴于本文重点在于考证葡萄传入中国问题，故介绍于有关人员参考。

382 葡萄、葡萄酒传入我国的考证 张玉忠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24期）

葡萄是地中海东岸和小亚细亚、中亚细亚地区最早经过人工培植的植物之一，酿造葡萄酒的技术也被那里的人民最先掌握。远在距今五千年以前地中海东岸一些国家就已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并由此传播到希腊和意大利，罗马人又把它传到了高卢（约在

今法国）及莱因河流域。我国种植葡萄和酿制葡萄酒是从中亚细亚经新疆传入内地的，大约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的汉代。葡萄，为希腊文batyus或伊兰语budawa的译音，曾以“蒲陶”、“蒲桃”、“蒲萄”等出现在我国史书上，后来才逐渐使用“葡萄”这一名称。汉魏时期，内地已开始种植葡萄，大约在东汉末，中原地区已可自酿葡萄酒。到了唐代，中原地区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册府元龟》第一次明确记载内地用西域兄弟民族的方法酿制葡萄酒。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后，高昌马乳葡萄传入长安，增加了内地葡萄的种类。随着葡萄种植业的发展，葡萄酒也在长安流行开了。当时山西、河北一带还产一种名为“乾和蒲桃”的葡萄酒，甚至葡萄酒还是太原府的土贡之一。唐以后，我国的葡萄种植业迅猛发展，据历代文献记载，此时葡萄品目繁多，有水晶葡萄、紫葡萄、琐琐葡萄、云南葡萄、马乳葡萄等近十种，产地也不仅限于中原，南方一些地区也栽培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品种，除酿酒、制糖、作醋外，有的葡萄还有药用价值。历代农学家都对葡萄栽培、加工等作过科学总结。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系统记述了葡萄栽培法、采摘法、贮存法和凉制葡萄干法等。此外，元代的《农桑衣食撮要》、明代的《农政全书》和《便民图纂》等农业著作中也都有比较详尽的论述。葡萄传入中原后，人们不仅用于鲜食、酿酒，而且还是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画工把它画在画面上，工匠们把它铸在铜镜上，纺织工则把它的图样织在各种华丽的锦缎上，葡萄装饰图案成为我国人民喜爱的编织纹样。文学家也以此写诗作赋。作为我国最早种植葡萄和酿制葡萄酒地区的新疆，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就已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看，西汉时期的且末、焉耆、龟兹、于阗、伊吾等地都盛产葡萄。南北朝时，吐鲁番的葡萄已很有名，高昌王向南朝的“贡品”中就有葡萄干和葡萄酒。唐代，新疆的园艺业十分兴旺，象罗布淖尔以南一带土质较薄的地方，也大种葡萄，康艳典所筑葡萄城就是以盛产葡萄而得名。元代阿力麻里、别失八里也都盛产葡萄和葡萄酒，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对葡萄的栽培节气、方法等都有很具体的总结。综上可知，葡萄是张骞使西域后，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并对我国农作物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383 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 胡澍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根据《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的记载，葡萄引入内地的时间在宛王蝉封时。蝉封即位当在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于是两汉时人们认为，汉武帝天汉元年以后，内地始有种植葡萄的历史。然《史》《汉》两书都没有记载从大宛带回葡萄种人的姓名。而在汉代，最早出使西域的是张骞，于是人们都把通西域所得到的好处附在他身上。据作者考证，张骞根本没有从西域带过葡萄种。葡萄在内地的种植，并不始于汉通西域。根据之一是司马相如于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所作《子虚赋》中就写道：“……樱桃蒲陶，隐夫郁棣，……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这里的蒲陶即今之葡萄。这个时间比武帝天汉元年早四十四年，比张骞第一次出使回国（前126年）早十八年。根据之二是葡萄酿酒的时间大为提前。汉魏之际的曹丕说：“中国珍果甚多，”葡萄“掩露而

食，”又“酿以为酒，甘于甘蔗”（《全三国文》卷六）。可见在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即已掌握葡萄酒的酿制方法，而过去说是始于唐代。根据之三是《西京杂记》卷三载："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还以蒲桃锦四匹”。此处的“蒲桃”与“蒲陶”一样，都是希腊“Botrus”的音译，即葡萄。高祖时人们能以葡萄图案入锦，说明汉初葡萄已在内地种植。根据之四，咸阳秦宫殿遗址发现的壁画上绘有葡萄。据考古发现，“丝绸之路”在汉代以前便已有商队往来。秦国西部边界达到今甘肃中部，和西域的联系早在统一前即已开始。统一后，这种联系更加频繁密切，因而西域的葡萄早在秦代已引入内地。但人们并未真正认识到葡萄的价值。葡萄只是作为皇宫后院的点缀品，所以影响甚微。至汉武帝开西域，从大宛引进葡萄良种，广为栽种，始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佳果。东汉末年，又从西域引进了葡萄酒的酿制方法。这就是内地引进、栽种葡萄的历史。

384　棉花、瓜果、蔬菜及其它

——古代西域和内地农作物的交流　　　谷　芑

（《新疆日报》1962年8月8日）

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多民族国家，其政治、经济、文化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当然，丰富多采的农业生产，各族人民也都有各自的贡献。本文仅就西域农产品传入内地问题作了概括介绍。棉花、胡麻、蚕豆、西瓜、黄瓜、石榴、大蒜、玉葱、芫荽、苜蓿、葡萄、核桃、胡萝葡、红花等等，都是古代从西域传入内地。把这些农作物中的大多数带到内地来的是公元前二世纪两次出使西域的张骞。这些农作物对丰富我国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棉花自汉唐传入，迄至元明大量种植以来，使我国人民的穿着原料起过一次革命性的变化。明人邱浚在其所著《大学衍义补》中说："盖中国自古以来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接近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国朝，其种乃遍于天下，地无南北皆种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百倍焉。”在由西域传入内地各种农作物之时，内地也传入新疆许多农作物，如花生、洋芋、茄子、白菜、韭菜、芹菜、辣子等。同时，内地先进耕作技术与农具的传入更加促进了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国农产品的种类包罗万象，农业生产经验极为精湛渊博，此乃我国各族人民所做之伟大的贡献。

385　新疆的坎儿井　　　王鹤亭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坎儿井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发和利用地下潜流进行自流灌溉的一种地下暗渠，历史悠久。但对其起源尚无定论。本文探讨了目前三种说法的可能性。其一说，坎儿井起源于汉代陕西洛河龙首渠的“井渠”（约在公元前140年左右），《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初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此始”。

史学家王国维在《观堂集林·西域井渠考》引记上述记载，认为坎儿井源于“井渠”，并引《史记·大宛列传》中的一个关于秦人“穿井”的故事予以佐证。“井渠”或“穿井”是否是坎儿井的起源？作者分析研究了开挖方法，认为三者基本相同，坎儿渊源于汉代的“井渠”，可能性很大。其二说，新疆坎儿井由当地人民所创造，根据新疆的特殊地理条件，新疆各族人民与干旱作斗争，积累了掏泉引取地下水的经验，因而创造了坎儿井这种适合当地特殊自然条件的水利工程。其三说，新疆的坎儿井起源于中东或中亚，起源于波斯。有人推测，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坎儿井也传到新疆。新疆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心，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汇的地方，坎儿井的形成和发展，不能排除来自中国内地和古代波斯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但若肯定由波斯或中东、中亚传来，则尚无确凿佐证，作者认为，新疆坎儿井的起源，以第一、二说可能性较大，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386 新疆省坎井来源析疑 张之毅

（《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10期）

坎井是一种地下渠道，利用地下水潜流予以引导，借以灌溉农田。新疆坎井，无论在开凿技术上，灌溉管理上，均达较高水准，是为文化上的一大贡献。关于新疆坎井来源，中西学者认识不一，意见分歧，伯希和、斯坦因、拉铁摩尔等人，持来自波斯说，而王国维首持否定态度（见《观堂林集》第十三卷《西域井渠考》），他引证《史记·河渠书》、《大宛传》、《乌孙传》等资料，证明坎井是由我国在汉时传于西域，并非波斯传入。不少人同意此说。但本文作者却认为波斯传入一说较可信。其理由一是坎井字源来自波斯；二是自唐以后，内地与西域隔绝，至左宗棠建省后，才恢复往来，认为乾隆时坎井传入新疆之说不可信，因彼时中西尚在隔绝状态，焉能将此法传入。三是坎井全在沃州，新疆沃州与波斯、阿拉伯在地理条件上大致相同，因而断定坎井是由波斯传入。作者立论如何，有待于学者进一步考证研究，但坎的开凿，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387 新疆坎儿井的来源及其发展 黄盛璋

（《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新疆坎儿井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巨大成就。研究坎儿井的来源及其发展，是我国水利史、历史地理和科技史上的重大课题。它来源于何处，起于何时？学术界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就有争论。西方学者大抵主张来源于波斯，传自中亚；国内学者则大多主张导源于汉代关中井渠。本文作者在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多年搜阅典籍、实地考察以及考古等方面的确凿证据，对坎儿井来自关中井渠说进行了探讨，并试图对若干关键性问题提出了肯定性的意见。作者在叙述了最初提出坎儿井导源于汉代井渠的陶葆廉及《新疆图志》林则徐“增穿井渠通水”之说，以及王国维的《西域井渠考》、黄文弼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序言》、秦中行的《秦郑国渠渠首遗址调查记》和戴应新的《关中水利史话》等著述中，一直断定坎儿井来自井渠之说后指出：考古上

发现汉代关中井渠遗迹从表面上看好象和新疆坎儿井面貌相似，而在实质上两者却毫不相干，开凿的目的和用途完全不一样。汉代关中井渠，据郑国渠渠首发现的遗迹，目的是为防渠口水冲易崩，从地下开渠，需要开凿直井以便取土、通风。目的、作用与坎儿井不同。关中井渠没有向外传出的证据，也没有沿用下来。至于汉辛武贤在敦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之渠，乃是为通漕运谷的，是明渠，同井渠与坎儿井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新疆坎儿井最早出现于吐鲁番，时间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后，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前，大致可定为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导源于波斯Karez，此名现仅用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原中亚布哈尔与浩罕等地。从新疆坎儿井名称的来源、地理地位与交通贸易，以及与中国政治关系等方面综合考察，可能从浩罕辖境传入。吐鲁番坎儿井最初发展很慢，直到1845年左右仅有三十余处，道光二十年林则徐在新疆大兴水利，第一次予以有计划的发展，扩建到吐鲁番盆地西部伊拉里克及托克逊等地，最后增加六十余处。1880年左宗棠等又增开185处，盆地东部辟展（鄯善）从此也出现了坎儿井，1916年已有三十多道，吐鲁番多达八百余道。二十世纪初，库车、哈密都曾开凿坎儿井。此外，天山北麓奇台、阜康、巴里坤与昆仑山北麓、皮山县也有少量坎儿井，大抵都是从吐鲁番传入。至于阿图什有坎儿井遗迹，时代应在道光二十四年林则徐履勘水利以后。王国维《西域井渠考》的结论是错误的。西方学者认为新疆坎儿井来自伊朗，主要根据Karez之对音，日本岛崎昌进一步从新疆坎儿井记载年代论定来自中亚及其时间上限，贡献较多。本文在他研究的基础上，论定井渠与坎儿井作用不同，新疆的坎儿井传自中亚，并确定时间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传到吐鲁番，而后又向外地传播。

388 关于石窟寺艺术和它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 阎文儒

（《新建设》1954年第7期）

中国中世纪的石窟寺艺术，分布在全国各个角落。由于当时的艺术工作者发挥了最大的创造力，不仅运用自己民族伟大的艺术传统，而且能够接受外来文化，吸收融化，才使石窟寺艺术成为中国自己民族形式的艺术。石窟寺艺术，就是中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开凿的许多石窟，以及石窟内各种人像的雕塑和壁画。石窟的开凿，开始于佛教盛行以后。在北印度犍驮罗国地方，由于大月氏贵霜王朝迦腻色迦大王（公元一世纪左右）的信佛，因而中国西部西域各国(新疆和中亚地方)首先接触了佛教，同时也传入了石窟寺艺术。今天新疆天山南路库车、焉耆以至吐鲁番等地，都有石窟寺遗址。由西域向东，敦煌的莫高窟，由三世纪下半世纪起开凿，直到十一世纪没有中断，其中的塑像和壁画，是中国最重要的艺术遗产。敦煌以东，有张掖的马蹄寺、武威的天梯山、永靖的炳灵寺，再东则有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等。石窟寺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究竟占什么地位？作者指出，库车千佛洞的壁画中早期的也许是三、四世纪时的作品。那些壁画不仅在题材上完全属于西方佛教的系统，就是在绘画作风上，也与印度阿旃陀石窟内的壁画相接近，塑像也和犍驮罗雕刻作风相近。这说明早期传入西域的佛教艺术还带有与印度和犍驮罗相似的艺术风格。中华民族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他们使外来文化成为具有自己民族形式的文化，石窟寺艺术也不能例外。今天云冈第五窟、第六

窟、第十一窟，以及洛阳龙门、敦煌莫高窟、巩县石窟寺等各地同时代所凿的石窟，和窟内所雕塑的佛、菩萨、飞天等像的衣冠服饰，完全趋向于中国民族形式。在北魏以后，经过北齐、北周、隋三朝的长时间的锻炼，石窟寺艺术到了唐代才具有现实主义民族形式的特色。唐代石窟寺雕刻艺术已进入民族形式的成熟时代。石窟寺艺术，还包括绘画。莫高窟的壁画，从北魏到隋唐，多至几百个洞，都有大幅的佛故事画。从这些大幅画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的人物画，也可以看出山水树石和各种建筑物的画法，以至当代的生活。还可看出从北魏到宋、元绘画演变的过程。这更足以说明石窟寺艺术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

389　龟兹壁画的人体画法　　　　禹　谛

（《新疆艺术》1984年第4期）

本文探索了龟兹壁画人体的画法特点和嬗递演变，以认识龟兹壁画的艺术性及其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并作为今天绘画创作的借鉴。作者论述了龟兹壁画的特点，认为人体的丰富和精美，是新疆龟兹千佛洞壁画的一大特色。全裸的、半裸的佛陀、菩萨和伎乐形象，千姿百态，曲尽其妙。据画史记载，隋唐之际以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为代表的西域画风，曾给当时的中原绘画以重大影响。龟兹壁画则向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一千多年前西域绘画的风彩。特别是它的人体画法，与画史记载的尉迟跋质那父子的画风特点相吻合。作者具体论述了龟兹人体壁画的画法，认为其基本画法是“屈铁盘丝”，但在具体描绘中，又有多种不同的创造性表现。一种是“凹凸法”，另一种是“线描法”，第三种是将上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线描勾勒之后，不是从四面向中间染，而是只染半边，另半边仅作轻淡微染，显得肌肉的凹凸立体。第四种是“刻划法”。作者详细介绍了这几种画法的具体特点及其影响，认为龟兹千佛洞人体绘画，主要受到希腊、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但在总体上仍属于古代西域画工的贡献和创造。从这些绘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画家对于人体解剖已经具有较深的理解和认识。所画人体的比例、结构都正确无误，从而创造出鲜明的地区风格和特色，又东传中原，促进了内地人物画的发展。

390　古代和田派美术初探　　　　王冀青

（《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所谓古代和田派美术，是指在佛教影响下的古代于阗美术。本文是对古代这一地区美术的研究之作。因一千年前这一地区被伊斯兰教势力占领，地面上佛教遗迹早已荡然无存；研究资料基本依靠本世纪初斯坦因等人发掘、考察报告中有关的图版和文字著录。

和田地处丝绸之路南道要冲，是古代东西文化荟萃之地。其美术是本地美术受地中海沿岸、波斯、印度、中亚和我国美术的影响，发展呈现为混合风格，成为中亚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西美术风格的交流影响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在绘画方面，其显著特点是多种外来风格，经过溶化，混合为一，形成同时表现多种风格的和田绘画艺术。作者举出两件作品，分析说明多种外来风格混合前后的状况。第一件是一块彩绘木板，

正面绘一个三头四臂神，全属模仿印度式样；反面画一单头四臂菩萨像，却全运用波斯绘画手法。正反两面呈迥然不同两种风格。这是外来风格未溶混前的状态。另一件是一幅残壁画，画的是古于阗国关于龙女求夫的一个传说。这幅画展现出印度本土、犍陀罗、西亚和我国中原等四种艺术风格的巧妙融合。

在泥塑方面，其作品风格也呈多样性。但占绝对优势的是犍陀罗风格。如像面安祥，双目微闭，鼻梁直通额际，发呈波状等。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衣褶用醒目的凸线表示，从身体突出部位下垂，优美自然，既表现出衣物的质感，又显露出身体轮廓。这种犍陀罗风格，是古代东西方两大艺术体系相互影响的证明。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亚历山大王远征印度河流域，将希腊文化传播到印度西北。希腊艺术表现形式与当地佛教思想内容相结合，渐次形成犍陀罗艺术。随着佛教东传，这种风格也传至我国和东亚各国。和田是这一东渐的第一大站，也是最主要的中转站。

公元八世纪前，和田地区画人物鼻子，是用一根线沿鼻梁而下，先描出鼻头，然后朝下向鼻槽部分弯曲，穿过人中，圆滑地接在上唇，此线与勾勒鼻孔及小鼻的线完全分开。用一根线条巧妙地完成鼻体、鼻槽和上唇的造型，使人感到奇特风韵，也可更好地表现鼻槽周围筋肉的高低起伏。这种画法极为奇特，首先影响了中国唐画，随后也传至日本，据文献记载，隋唐之际，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入质中原王朝，是他们将和田艺术带进了中原，他们又将中国的线描技法与印度凹凸画法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派新的风格。《唐朝名画录》记载乙僧“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外国之物象，非中华之威仪”。所谓外国之物象或即和田派风格画法。和田画风与龟兹画风有别，后者凹凸对比更为强烈。这样，印度凹凸画法究竟是通过丝路南道抑或北道传入内地？这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需要探求的问题。

391　克孜尔石窟壁画画法综考

——兼谈西域文化的性质　　　吴　焯

（《文物》1984年第12期）

自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我国西北地区“考察”以来，对古代西域文化性质，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西域文化是希腊、印度、波斯和中国的“混合文化”。作者根据近几十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的考古发掘以及学者们对古代新疆民族、历史、语言、文字、宗教、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根据自己两度赴克孜尔石窟考察和临摹壁画的体会，从克孜尔石窟壁画画法的角度，对西方学者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作者对克孜尔壁画的制做方法、起稿步骤、壁画色彩、晕染特点、线描等均论述甚详。克孜尔壁画有两种：绝大部分是干壁画，少数是湿壁画。干壁画壁面的制法是：先把洞窟岩壁凿出平整的糙面，在糙面上抹搀合了麦秸和草的粘土泥，抹平之后压实、打磨，在其上刷一层带胶的白浆即成。湿壁画壁面的做法是：先把岩壁的糙面磨平，再直接在岩石上刷上白浆。干壁画和湿壁画的区别仅在壁面制做的不同，其画法都是一样。其步骤基本上是：先以土红线勾稿，然后铺色晕染，最后用墨线和较深的色线沿最初勾画的土红线重复勾勒。这种程序在中国绘画中称为“勾勒法”，其勾勒的线条则基本属于

"铁线"描画法。即唐初入质中原的于阗画家尉迟乙僧创造的一种人物画线描技法。作者在对克孜尔壁画的画法作了详细分析和阐述之后，认为世界上任何形式的绘画都是以其民族文化为基础的。西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统一体的组成部分，它的绘画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的艺术传统。从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画法上，可以看到它所接受的外来影响，更可以看到它本身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古代西域在历史上曾经是希腊、中国、印度这三大文明碰头汇合的地方，它本身包含有多种文化因素，但它始终有一个主导的文化体系，有显而易见的传统的继承性。从历史的沿革看，西域与内地联系紧密。丝绸之路开通后，文化交往更加频繁。西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内地文化的风貌，逐渐形成与内地统一的文化体系。克孜尔壁画作为西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尽管具有多种因素，但从根本上，它仍然属于中国文化范畴，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分支。

392 谈丝路石窟壁画中的荷花形象 陈履生

(《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荷花作为一种寓意之物，一种文化标志，在丝路石窟壁画中表现出千姿百态，分别装饰于佛像莲花座、壁画、龛楣、边饰、藻井上。其中有以花头为单体的；有花茎叶同时表现的折枝形；也有以荷花为中心，组成一定纹样的装饰图案。作者绘制了十四类、六十二幅具体画样，展现了这种丰富多姿。这些荷花，写意传神，笔简意长，造型不一，风格各异，形成荷花形象发展的一个完整序列，反映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风貌。隋代的丝路石窟艺术，渐趋于写实，是承先启后时期，荷花形象也由早期的朴达拙重转向婉雅俊逸，颇有南朝士大夫"秀骨清像"的遗风。唐代更重写实，初具推晕设色方法。丝路石窟艺术已从对来世幻想、祈求，转向对世俗生活描写和对人世天堂的歌颂。象征佛义的荷花，也脱去扑朔迷离形象，成为现实生活写照。茎干由扭曲虚幻变为"中通外直"，亭亭玉立；叶由抽象变态变为"碧叶如规"、荡风流雾；整个形象成为夏日红莲吐秀、碧叶舒英了。这和美术史中唐代成为专科、形成一定高潮的花鸟派有关；同时，也是唐代经济文化发达的反映。唐以后，荷花形象即无创新。如安西榆林窟中元代壁画中的荷花，茎枝细弱，花瓣尖瘦，失去唐代丰润饱满风骨，反映了衰落时期的艺术风格。作者还对荷花作为艺术表现的气质、品格与造型手法，都反映着浓厚的民族情感与鲜明的民族面貌。佛教虽来自印度，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找到印度壁画影响中国石窟壁画的线索。以荷花言，丝路石窟壁画中的荷花，也比印度阿旃陀壁画中的荷花形象更加纯洁净化，丰富多彩，斑烂纷陈。荷花生植于中华大地，由来已久。从现有材料看，早在周代，荷花就已成为我国人民喜用的装饰图案和造型；汉代又进一步广泛用于建筑装饰。至于吟颂荷花的篇章，见诸古籍者更多。这说明汉以前，荷花已进入汉民族的艺术表现领域。由于汉文化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传播的程度不同，壁画中的表现也不同，地处丝路西端的克孜尔石窟，反映龟兹民族的文化面貌，其荷花数量与水平均不及敦煌莫高窟。敦煌各个时期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同，也有不同艺术面貌。十六国晚期(相当于西凉到北凉时期)的荷花形象，其造型手法，既不见于域外，又不见于本土，当属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类型，

荷花在佛教中象征“西方净土”、“天宫”，在我国广大人民心目中则象征理想人格——君子品质。其共同点都是借取它那出于淤泥而不染的躯体。可以想像，在我国这样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国度里，如果佛教不适应我国人民的愿望，不是规劝人们弃恶从善，不是追求“快乐逍遥难可比”的彼岸理想境界，怎能从异域传入我国并受到重视？同样，如果荷花在中华民族中不具有深厚情感，它的形象怎可能在中华的佛国天地中得到尽情表现并为之增辉？从丝路石窟艺术中可以看出我国人民是如何接受外来文化，并融合它、改造它，形成本民族独特风貌的历史轨迹。这一融合外来文化、保持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经验在今天仍可借鉴。

393 试论南北朝前期佛教服饰的主要变化　　杨　泓

（《考古》1963年第6期）

佛教早在汉代即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发展，出现了建寺造塔、开窟造像的风气。由于佛教由外国传入，所以佛教造像从题材到技法，都受外来影响。但佛教艺术要在中国生根繁殖，就必须和传统的民族风格相适应。因此，中国的佛教艺术不是外来艺术的简单移植，而是在中国传统艺术上的再创造。南北朝前期造像的发展变化，正反映了这样的再创造过程。

本文考察了大量的石窟寺内的大型雕塑品、石造像、小型的鎏金造像以及墓葬中的有关明器，论述了自十六国初期到北魏太和改制以后佛像服饰方面所表现的时代特征。作者根据造像特征的主要变化，把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六国初期到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以前。这一阶段，作者取材的造像有：后赵石虎建武四年（338）造像、夏赫连定胜光二年（429）造像、元嘉二十八年（451）造像、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造像等。以上四件纪年明确的标本，在服饰方面的特征是相同的，皆为广袖通肩大衣，衣纹处理亦大致相同。犍驮罗艺术的晚期作品，佛教常常披缠着通肩袈裟，以后和恒河流域的传统艺术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抹菟罗式的造像，其特征是披着通肩袈裟轻薄缠体，衣纹细密，线条柔和。我国早期造像披通肩大衣，是受抹菟罗式造像的影响，但在衣服特征和衣纹处理方面，两者却有分歧，这正是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风格。南北朝前期造像所呈现出来的与健驮罗艺术（或抹菟罗式）不同的特征，是继承了汉代传统艺术手法的结果。第二阶段从和平元年到北魏孝文帝太和中（490年左右），也就是从云冈石窟开窟造像开始到太和改制的一段。第二阶段佛像的服饰，基本上可分两类。一类是承继了第一阶段的传统，即披着通肩大衣。另一类是这一阶段新出现的式样，它反映了民族风格的进一步发展。垂鳞式衣纹的通肩大衣的造像，是拓拔族进一步和中原地区传统文化融合以后，在佛教艺术中显出的变化。在这一阶段中，继承第一阶段的通肩式服饰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在吸收外来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出现了具有新的特征的斜披式服装，而且成为造像的主要服制。最初佛教僧侣都是袒露右肩，但从北魏起，中国僧侣的服装有了改进，在肩上半搭偏衫，把裸露的肩部遮住，后来就逐渐改穿有袖的僧衣。这种斜披袈裟、肩上半搭偏衫的服饰，具有民族特征。第三阶段是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由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在云冈开凿的第5、6两

窟里，佛像服饰又有了新的变化。在第5窟里，还可以看到第二阶段那种典型的斜披式服饰。但是，窟中比较主要位置处的许多佛像，却变成穿宽博的大衣，两袖很肥大，由衣领可以看到里面的内衣，内衣缚有衣带，在腹前打一结，结下双带下垂，也有的把衣带甩向右手的手腕上。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褒衣博带"形式。在6窟中，更清楚的看出佛像服饰的这一变革。北魏造像服饰的这一新变革，应与孝文帝太和年间改服制一事有关，也就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在造型艺术方面所引起的反映。由于孝文帝锐意学习汉族文化，就必需向南朝学习。具体到佛像服饰的变革，应该也是摹自南朝的。因此，我们如果认为由僧人的裸袒右肩改为加披偏衫，是根据中国传统礼俗的变革；那么佛像服饰再由斜披袈裟、肩搭偏衫的僧装，进而改成一般士大夫所穿的褒衣博带式服装，应该是佛教造像更进一步民族化的表现。通过对这一阶段佛像服饰的分析，对南朝物质文化各方面对北朝的影响问题，又提出了一个论据。

394 西域绘画所见服装的研究 〔日〕原田淑人

（《美术研究》1958年第1期）

本文根据西域考古文物中的绘画和史籍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考证了唐、五代以及宋初中原和西域的服装问题。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叙述了西域的范围、本文写作的缘起和唐至宋初西域地区各民族的斗争、变迁和相互关系的情况，指出西域包括中亚以至西亚。在中国境内则指天山南北广阔的地域。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和中国、印度、伊朗等文化混合之处。这里汉、突厥、吐蕃、回纥、党项等民族相互斗争，治权常时转移不定。第二章详细考证了西域绘画和陶俑所见汉人服装。计有皇帝、皇后、太子、妃和群臣、妇女的服装、一般群众和小儿的服装，以及武将和兵士的服装。第三章考证了西域各国的服装。其中有高昌、焉耆、龟兹和于阗的服装，并对这些国家的服装一一作了考叙。第四章着重考证了唐代的所谓胡服的问题。认为唐宋衣冠自北朝以来即受了胡服的影响。"胡服"二字的意思是当作外民族服饰的意义使用下来的，其所指不一定限于一个民族。开元天宝年间的胡服也可能是西域式的服饰。西域发现绘画上所见到的服装，补充了中原资料之缺。随着资料的继续发现，还可继续进行考证。本文引用资料丰富，考证细密，论证清楚，为从服饰方面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395 中国纸的发明 傅振伦

（《历史教学》1955年8月号）

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本文专就纸的发明、发展及其外传情况进行了考证。

纸未发明前，记事或传播文化，最初是结绳，后用甲骨、再后简帛。公元一世纪时，首先是我国劳动妇女在水中漂洗布帛时发明了用敝绵制成的絮纸。后蔡伦发明用废鱼网造麻纸，因原料易得，成本较低，造纸方法遂渐次改进，纸的质量不断提高，产量不断扩大，东传朝鲜、日本，南传印度支那和印度，西沿丝绸之路传至西域、大食、非洲、欧洲，对传播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东汉班超定西域，五十余国纳贡内属，此后汉令通行西域近百年。班超与蔡伦系同时代人。在此期间，纸随使者也传入西域，考古学者在新疆多处都有发现。楼兰出土有纸写的文书、信扎、有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年号；还有公元二世纪写成的《战国策》残卷，还发现公元五世纪以后在中国纸上书写的畏吾儿文、吐火罗文、波斯文、粟特文、希腊文等外国文字书写的文书、译经，以及六世纪以后用焉耆文、龟兹文及梵文所写残卷多有发现，由此证明纸的西传及广泛的使用。公元652年，纸传入波斯；706年传到麦加；八世纪初传到阿拉伯。至于造纸术的西传则是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七月怛逻斯战役中，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被大食战败后，虏去的战俘中有造纸工匠，造纸术遂被传到撒马尔罕。后随着大食势力的扩张，公元793年于报达设造纸厂，大食东南沿海和大马士革也相继建起造纸厂。公元900年左右，埃及从大食学会造纸术；1100左右又传到摩洛哥；1150年传到西班牙，并在札迪法设立欧洲第一所造纸厂，此时已距蔡伦改进造纸术一千年矣！此后，法国于1189年在比利牛斯山麓爱拉地方设立造纸厂；意大利于1276年在蒙忒凡诺初设纸厂；德国于1300年在美因斯和科伦初设纸厂。而英国的第一所造纸厂创于1494年；美洲的第一所造纸厂创设于美国的费城，这已是公元1690年之事了。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的造纸术都是从中国学到的，从而说明中国造纸术在世界文化上的贡献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396 新疆出土古纸研究

——中国古代造纸技术史专题研究之二　　潘吉星

(《文物》 1973年第10期)

近六十年来在新疆一带沿着"丝绸之路"出土了许多我国古代优美的丝织物，而在丝织物出土的地方，总伴随有我国古纸的出土。新疆出土的古纸象敦煌的一样，多为字纸，有汉文的，也有回纥文(古维吾尔文)的，这些纸本文物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从造纸技术角度对近年新疆出土的一些古纸进行了研究探讨，并与甘肃敦煌出土的古纸作了一些技术对比。所研究的古纸，计二十六种，其中晋纸六种，南北朝纸一种，隋纸二种，唐纸十七种，其时代从晋到唐，即从公元四世纪到九世纪末，中间经历五百余年。其中以吐鲁番出土者占大多数。这些古代字纸上多有具体年款，没有年款或年款不明确者，则依其字迹及考古发掘情况，通过历史考证，进行了鉴定。特别对早期晋纸，如建兴三十六年、升平十四年文书用纸的时代问题作了重点考查，证明其为前凉遗物无疑，从而为研究前凉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纸的原料，根据作者的鉴定和检验，与敦煌出土古纸一样，仍然是我国传统的造纸原料，一为麻类，二为树皮。而麻类纤维并非直接取自刚沤制的生麻，而是以废旧的麻头、故布、旧鱼网、敝履等麻织物的废料，经一系列物理化学加工而提制出来的，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麻类废料的综合利用。文中附有"新疆出土古纸检验结果一览表"，包括纸本名称、纸之时代(朝代、年款、公元年代)、纸之尺寸、原料、出土地点、纸之物理化学结构观察等内容。纸的抄造技术，与敦煌石室纸一样，分为两种类型，一为布纹纸，二为帘纹纸。从技术上看，由布纹纸模到帘纹纸模是个革新，而由粗帘模到细帘模则是个改进。新疆出土的这两大类型的实物标本，生动地说明了我国古

代造纸工艺发展的历程，丰富了我们对古代造纸技术的认识。至于纸的加工，敦煌石室写经纸中加工纸较多，主要是染色、入潢、加蜡、砑光等，而新疆出土的加工纸则较少。这是因为前者多用于书写宗教经典，而后者则多为日常用的官方籍帐、民间契约及文教用纸。但新疆也出土有高级加工纸，如晋代写本《三国志·孙权传》、吐鲁番出土的《三国志》，以及1969年新疆吐鲁番一座唐墓出土的纸本设色花鸟画，都是用了漂亮的本色加工纸。这些纸本文物，除有重要史料价值外，还生动地反映出我国在汉、晋时期已相当发展的造纸、制墨技巧，而且纸张和造纸技术伴随着丝绸的输出，传播到西域及中亚各地，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397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季羡林

（《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

纸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推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汉和帝时蔡伦发明了造纸方法，纸很快地就在中国传播起来。以后沿丝绸之路逐渐传到现在的新疆，从新疆传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传到非洲北部、再传到欧洲，最后终于传遍全世界。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文章引用大量史籍文献和考古发掘中关于纸的资料，论证了印度古代的书写材料；纸在古代西北一带传播的情形，以及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等问题。印度古代没有纸，用木板、竹片、桦树皮、棕榈树叶、棉织品、皮子、铁板、铜板等书写。但最主要和常用的是棕榈树叶tāda-tāla，中国旧译作“多罗”。另有“贝多罗”之称。“贝多”是“贝多罗”之缩写，就是梵文Pattra或Pātra，本来是叶子的意思，随着佛教的输入，这个字也传到了中国，就是所谓的贝叶。“多罗”和“贝多罗”在梵文里区别很大，但传至中国后涵义完全一样，这是因不懂梵文的佛教徒把两者混淆起来了的缘故。从各史料记载，无论中国佛教徒到印度取回的佛经或印度佛教徒送到中国来的佛经，几乎都是贝叶经。在《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等书中，都没有用纸抄录佛经的记载，证明七世纪初印度还没有生产纸，其书写材料多用贝叶。自汉武通西域后，中西交通畅通，中国丝绸、漆器及冶铁技术传到了西方，西方的物产及宗教文化输入中国。西汉末年，丝绸之路虽一度受阻，及至东汉初丝绸之路复通，并在班超父子经营下，使汉朝号令通行西域达百年之久。东汉和帝十七年（105年），蔡伦总结前人造纸技术上奏造纸法，从此，纸不仅在国内首先所采用，而且随着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人传到了西域。从十九世纪至本世纪初，中外考古学家从我国新疆的楼兰、高昌、焉耆、库车、巴楚、叶尔羌、和阗及甘肃西部敦煌等地，发掘出了大量的木简及用纸书写的残卷。这些写书残卷所用纸的种类不同，写成的时代先后不一，证明公元二世纪中叶纸已传到了今日的新疆地区，并为当时西域各民族所采用。因此，在文字方面也是多种多样，既有汉文，也有其它如粟特文、突厥文、和阗文、吐火罗文、波斯文、回鹘文等。由此证明蔡伦发现明造法不久，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各交通要道的主要城市。公元七世纪末，在净义所著的《梵语千文》中首先有了梵文“纸”字，并有四种写法，即Kākali，Kakali，Kakari，śaya。其中除śaya无法稽考外，其余三种均非梵语，也在七世纪以前的任何

梵文著作中无法找到，它们都是外来的借字。究竟借用何种文字，学者们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借自波斯文，因为波斯人把纸叫做Kāghaz或Kāghiz，阿拉伯称纸为Kāghad。但本文作者认为印度所用“纸”字是借用粟特文而来。至于造纸法西传主要是唐天宝十年怛逻战役失败之后，中国士兵中的造纸工匠被大食俘掠后，才把中国的造纸术传给了阿拉伯人，先从撒马尔罕开始，随着阿拉伯人势力的扩张传到了开罗，终于传遍全欧洲。自从纸传入西域后，用纸的人包括了各种民族，其中可能就有印度人，或有与印度关系密切的其他民族，而且新疆又与印度的交通颇为方便，这些用纸的各族人民把纸带到了印度。况自东汉末年朱士行西行求法以后，中国佛教徒接踵去印度留学、求法，他们有可能将纸带去抄录佛典，故在净义去印度前，印度就有了纸，并且借粟特文而创立了印度的“纸”字。至于印度掌握造纸之法和建立造纸工业，也是怛逻斯战役以后事，并且也是由阿拉伯传入印度的。传入时间最早也在公元十五世纪之初。本文旁征博引，考证详实，从各种语言和语言的衍变，论证了印度“纸”字创立的时间和来源，以及中国纸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是一篇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资料。

398 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 黄盛璋

（《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纸的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之一，它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至于纸和造纸法何时由何路线传入印巴次大陆，至今尚无明确结论。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论证，确认中国内地纸和造纸法于公元650年左右先传到西藏，继即迅速传入尼泊尔和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作者首先论述了纸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当时的中印交通路线时指出：中国僧人义净在公元671年赴印时，印度纸的使用已非常普遍。而玄奘于公元645年自印度回国时，印度还没有纸，采用贝叶书写。故可断定：纸的传入印度当在645年到671年之间，为时只有20多年。此时正当吐蕃与尼泊尔、唐朝建立友好关系，与尼、唐联姻之际。吐蕃弃宗弄赞于639年迎娶尼泊尔赤贞公主，641年迎娶唐朝文成公主，从而促成了吐蕃（西藏）泥波罗(尼泊尔)新的丝绸之路的开通。这条新道由尼国都加德满都至西藏拉萨，又由拉萨至长安。这一新道的开通，立即代替了原来的丝绸之路天山南北两道，至670年新道阻塞，其通行时间和纸传入印度的上下期限正相一致。接着，作者根据史书文献记载，论证了纸和造纸法传入西藏和尼泊尔的时间和路径。中国纸和造纸法于650年传入西藏，由于藏尼联姻关系，又很快传入尼泊尔。作者列举了四项实物来证明这一论点：一是尼泊尔造纸用瑞香科植物作原料，据考古发现，证明最早利用此种植物造纸是在西藏；二是尼泊尔造纸所用工具、程序和方法，基本与西藏相同；三是尼泊尔纸加工所用原料方法等也和西藏纸有一脉相承之处；四是尼纸和西藏纸特性相似，宽广而坚韧。由此可见，尼泊尔造纸法是由西藏传入。有人认为中国造纸法先传到印度，再由印度传到尼泊尔，这是倒因为果。再次，作者又论证了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路径。认为由于吐蕃、泥波罗道的开通，即成为中印陆路交通的唯一通道，国使往来和西行求法僧人均走此路。其原因则为此路近捷，唐王朝与吐蕃、尼泊尔相互友好，而纸和造纸法又在此期间通过此路传入西藏和尼泊尔，而尼泊尔又与印度平原相

连，无高山阻隔，因而又很快传入印度。其时间当在650年纸传入西藏后和670年吐蕃、泥波罗道闭塞之前。对此，作者又进一步作了分析考证，从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所著《瀛涯胜览》和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中所记榜葛剌国（今孟加拉）的造纸情况，以及《南海寄归内法传》、《真腊风土记》等文献关于印度用纸情况的记述，证明印度、孟加拉在七世纪后期即能造纸并普遍使用，并从外国文献的记述中，论证了瓜哇、麻六甲、菲律宾群岛、越南中部和南部，至十七、八世纪，造纸法尚未传入，用纸皆由中国进口。至十八、九世纪，中国造纸法还未传过越南中部沿海大城会安、顺化，因而根本未从海路传播。孟加拉的造纸法不仅非由海路传入，且与中国南方的造纸法不同，而与北方黄河流域的造纸法相似，即用桑树皮造纸。文章列举了明代地方志中关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用桑皮造纸的记载。由此证明，孟加拉的造纸是由中国北方的陆路传入，而非由南方海路传入。由北方陆路往印度、孟加拉，虽有传统的丝绸之路西域道，但造纸法传入撒马尔罕是由于751年怛罗斯战役俘获中国造纸工匠，而印度、孟加拉早在七世纪中叶即已掌握造纸法，故它不是由西域道传去，而是由吐蕃、泥波罗道传去。经过考证，作者认为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比传入阿拉伯约早一个世纪，故欧洲和印度学者认为造纸法在十二、三世纪由伊斯兰教徒传入印度的说法不能成立。

399　纸张和印刷术在新疆的传播　　徐伯夫

（《新疆日报》1962年12月12日）

造纸术是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重大发明之一。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我国内地已开始造纸。到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从此纸张得以大量生产。据1933年黄文弼教授在罗布淖尔发现公元48—49年的麻纸残片后推断，在蔡伦宣布他的新法造纸前五十年光景，纸已经流行到甘肃、新疆一带。汉族人民不仅把纸运入新疆，还把造纸技术传播给新疆人民，其时间最迟应在七世纪前后。七世纪新疆有些地区用纸数量已很大，而价格又相当便宜，很可能是当地制造的。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七月，唐将高仙芝曾率军和阿拉伯人在怛逻斯交战失败，许多士兵被俘，其中有些人会造纸，造纸技术就由他们传播给阿拉伯人了。古代新疆在没有纸张以前，曾使用木简、羊皮、牛骨等作为书写材料，这些东西书写困难，又不便保存流传。自从采用纸张后，对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印刷术也是古代汉族人民的一大发明，大约在六世纪至八世纪，我国内地已用雕版印刷，到十一世纪中时，毕升发明活字印刷，印刷术大为发展。印刷术传入新疆的确切年代目前还不能断定，但从地下发掘的文物资料看，十三、四世纪吐鲁番的印刷事业已很发达。由此证明，在此之前印刷术已传入新疆。外国学者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认为，当时吐鲁番的雕版印刷已有回纥文、汉文、梵文、西夏人、藏文、蒙文六种之多，他判定这是古代汉族人民直接帮助发展起来的。到了元代，肯定活字印刷已传入新疆。在敦煌石窟中曾发现元代维吾尔族文的几百个木活字，印刷术传入新疆，对发展兄弟民族文化无疑曾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400 印刷术的发明和演进 张怀礼

（《历史教学》1955年7月号）

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作者经过考证，专文介绍了印刷术的发明、演进过程及其西传情况。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就用印章；殷墟甲骨文笔画中就使用了墨涂；公元前91年汉武帝时就有特制的纸。印章、墨和纸的发明、使用，这对发明印刷术创造了物质条件。因此，北齐时已有一尺多长的"督摄万机"印；到公元835年唐文宗时，剑南两川和淮南刻版印的历书便布满天下。公元868年，有个王玠为父母求功德，请人雕印的《金刚经》，全书六页，每页一版，粘连为一卷，卷首有雕版画一幅，刻印相当精巧。该卷原藏敦煌石窟，后被斯坦因盗走，存于伦敦英国博物馆，这是世界现存板书最早的一种。足见一千多年前中国印刷术的精湛。公元1041—1048年间，毕升发明的活字印书方法，用胶泥刻字，一字一印，一改过去的板刻，使印刷术飞跃到新的高度。宋元之间，有铸锡作活字者；十四世纪初，山东王桢又用木活字印刷，并创造了排字用的转动轮盘，随后，铸铜、铸铅活字相继出现。

我国最早的印刷物，现今可见者多发现于敦煌石窟以及居延海附近黑城遗址和吐鲁番等地，多是内地印刷后传去。吐鲁番发现十三世纪维吾尔文、汉文、梵文、西夏文、西藏文、蒙古文等六种文字的印刷物，无论哪种文字，页数均用汉文，足见是汉族工人刻印。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征服维吾尔，全盘承受维吾尔文化；而维吾尔族又是熟悉印刷术的。此后，蒙古军队纵横欧、亚，交通无阻，欧亚商人、传教士往来很多，因而印刷术传入西方。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占据俄罗斯时，俄国货币多半印为皮币花样。1294年波斯大不里士城印行纸币，汉文"钞"字也印在上面。埃及发雍地方发现十四世纪中叶以前的印刷物数十件，印刷方法全与中国相同。宋元之间，中国盛行纸牌。十四世纪末叶以后，欧洲也流行印刷的纸牌。欧洲最初印刷的书籍，也是雕板，印刷、装订都与中国相同。直到1450年左右，谷腾堡才从用木活字改为金属活字，从而加快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自从印刷术传入欧洲，书籍印刷大大加快，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德国宗教改革发生了很大影响。

401 我对张骞出使西域与药物输入的看法 宋向元

（《新中医药》1957年第7期）

中药里面的葡萄、苜蓿、安石榴、红蓝花、胡荽、葫、胡桃、胡瓜、胡麻、胡豆等，据《本草纲目》的记载，都说是从"西域"输入，而且均谓由张骞出使"西域"带回国的。作者认为以上十一种药物，最初都来自西域，是没有问题的，但说都由张骞带来，却成为问题。为了搞清此问题，关键在于弄清张骞生前的主要活动及其年代。据《史记》和《资治通鉴》载，张骞曾出使两次，随军出征二次，并参与开通西南夷一次。第一次出使大月氏，中途为匈奴所留，十几年后脱逃西走大宛。最后到达大月氏，归国途中又为匈奴留有年余，才得机会回国，时当西汉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第二次

出使乌孙，他到乌孙国后，又派出许多“副使”分别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身毒、(印度)于阗、扜罙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国。随军出征的第一次，是以校尉的职位随卫青大将军出击匈奴。“是岁，元朔六年也”。第二次出征当为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张骞的生平活动既明，那么苜蓿和葡萄是否由他最初带入也就明确了。他第一次归国是从匈奴逃出，不可能带回什么东西。第二次出使他只到乌孙，并未到出产葡萄和苜蓿的大宛，所以也不能带回大宛的土产。张骞第二次出使归国（公元前115年）之后，不久就逝世了。那么，此后的“汉使”决不是张骞。据《史记·大宛列传》及《资治通鉴》载：苜蓿、葡萄的传入中国是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此乃是在张骞死后之事。因而很可能是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后，由其他“汉使”带回来的。至于红蓝花等九种药物，论始于张骞之说，就更无可靠根据。从本草上看，上述十一种东西都列入药物类，但实际上除红蓝花外，都是瓜果蔬菜之类。我国西域交通开辟之后，东西方面的使者往还不绝。那么，这些药品或食品的来源，除了由“汉使取其实来”之外，也可能由西域诸国“献方物”；而较大的可能，则是由于商人作为商品而输入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古代文献都说是张骞带来的呢？其原因：一是歌诵张骞通使西域的业绩，对一些新的事物，往往托始于张骞。二是汉代及后世的封建社会，都保持着重农轻商政策，古代知识分子虽明知西域产物是由商人贩运而起，但格于政令，也不便具实宣扬，故托之于张骞。

402　中国古代金丹术的医药化学特征及其方术的西传　〔英〕李约瑟著　韩怡凡译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

本文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文学院院士、剑桥东方科学技术史图书馆馆长、本世纪的世界名著之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传士，于1978年在瑞典乌普赛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et）建校五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所作的一篇学术报告，原题为“中国的金丹术与古代化学”（Alchemy and Early Chemistry in China）。

中国的金丹术和古代化学，都离不开“丹”这个概念。“丹”似可译为elixir。elixir是一种使人长生不老的药，“丹”字本身就有长生不老的含义。丹可分为外丹和内丹两种：外丹由无机物构成，含有金属盐和重金属以及各种无机药物，其中有些是剧毒品；而内丹则颇似瑜伽术，它是指由有机体本身的体液，分泌物或组织成份所形成的长生不老药。

从中国的金丹术中得到两个术语：即炼丹术（炼制长生不老药的技艺）和炼金术（嬗变黄金的技艺）。作者采用三个新的名词：即长寿术、赝金术和药金术及其含义，讨论了中国炼丹术和炼金术的性质。长寿术是一种炼制和寻找仙丹的方术，而炼金术却有赝金术和药金术之别。赝金术指纯属欺诈为目的的伪造黄金和其他贵重物质；药金术则指人们深信能成功地用其他物质制得黄金。中国对炼丹术和炼金术这两个观念常混为一谈。认为用其他物质嬗变成的黄金所制的炊具饮酒，即可变成神仙。这样，人造黄金与长生不老两种概念就互相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在旧世界文明中延续，直至霍恩海姆的巴拉塞尔修斯时代（Paracelsus of Hohenheim），然而，所有药物只能使人保持或

恢复健康，长生不老药无非是把这种想法推至极端而已。

中国的金丹术和古代化学都与道教密切相关。道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唯一不极度反对科学的自然神秘主义。无论你在哪里发现金丹术或古代化学，就能在哪里发现道家，他们总是在丹房里进行着世界上最早的实验。从冶金学的角度看，道家所炼出的物质，最大的可能是制得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黄铜。因为铜、锌和锡三者混合时，外表酷似黄金。其次如把砷铜降低砷的成份，也很象黄金。中国人真正突破之处，是发现了铜镍合金。这个发明或许可追溯到公元二、三世纪，也许更早。中国金丹术和古代化学中最大的成就应当是硫化高锡的发现，硫化高锡能形成美丽的金色片状结晶。中国金丹术士所提到的“金液”，即所谓饮用金，其实就是硫化高锡的悬浮液。这可以和希腊古代化学家的最重要成果即多硫化钙的制备及对于金属的强大作用等相媲美。这两种硫化物或许是中世纪初这些特殊领域中最有意义的发明。作者指出，上述两种文明存在着一种平行的发展过程，但中国的金丹术则起源更早。中国金丹术的黄金时代是唐朝，而希腊在此时却几乎无甚进展。

中国从公元前350年到公元1500年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在金丹术的研究方面，作者认为有以下特征：第一、中国的炼金术和古代化学得到了政府的资助；第二、许多中国妇女也非常热衷于金丹术，其人数要比欧洲多得多；第三、中国印刷了世界文明中第一部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悬解录》。

作者在本文中还介绍了美国费城席文（Nathan Sivin）所著一书中关于中国中世纪金丹术理论的专章。他曾把炼丹家想制备的药物概括为“控时物质”，其中心思想是希望利用某些化学物质来控制时间。作者认为，“控时物质”的概念非常重要，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天文学和自然哲学中所具有的不同长度的联锁周期，例如行星运行以及闰年、日食和月食等及其他许多天文周期性现象，它们都互相联锁着。“控时物质”的概念认为假如人们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即希腊人所谓“混融”（Krasis）的境界，就再也不受那种周期性变化的影响，即人们若能获得绝对完善的阴阳物质组合成分，他就会极其长寿，甚至达到“肉体永存”的境界。

作者还介绍了金丹术士所用的器皿，着重谈了三种不同型式的蒸馏器，即希腊式、中国式以及印度式。其中中国式的蒸馏器构造十分古老，其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关于炊器“甑”的作用。因此不可能由外域传入。与此有关的一个重大问题，即究竟那一个民族首先发现烈性酒。作者指出，中国从公元700年左右唐朝时就已经蒸馏烧酒，而欧洲萨勒那的老师傅们在公元1155年左右才首次蒸出烈性酒。

最后，作者研讨了“比较长寿法”的问题。“比较长寿法”即中国传至旧世界的有关灵丹妙药观念的一个术语。他在列举许多事例后，指出第一个具有道家思想的欧洲人罗杰·培根，曾在有关老年的著作《耆年防患》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能更多地了解化学，那么就会有许多方法以免除或延缓衰老。

十五世纪末叶霍恩海姆的巴拉塞尔修斯有一句名言：“金丹术的宗旨不是冶炼黄金，而在于为人类疾患研制药品”，从而完全同中国第一代的金丹术士李少君和邹衍联系起来了。他也同其后医药化学和化学治疗的历史联系起来了。作者深信整个医药化学源于中国。这也是李约瑟博士学术报告的重点。

403 中央亚细亚出土的本草集注残简文献学的研究 〔日〕渡边幸三著 储天任译

（《上海中医药杂志》1957年11号）

在二十世纪初期，有两本古写本本草书出土。一是敦煌出土的《本草集注序录》，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一是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所谓中央亚细亚出土的《本草集注》残简，只存虫兽部下品豚卵以下四条的断片，现藏德国柏林普鲁西学士院中。本文论述了本草残简的文献学价值，可供研究者参考。《本草集注》残简的书写时间，作者推断为唐初或唐以前的作品。其字体是端正的六朝风格，且保持着陶弘景朱墨杂书的本色，因此，可解释为照六朝书写本而书写的。这《本草集注》属七卷本系统，是卷六虫兽部下品的断片。这个残简的药品排列是根据陶弘景药品排列原则的，由此可知《本草集注》药品类次排列的一般。残简本的体例完全和《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相同，这说明陶弘景对《神农本草经》改编以后的具体形式，是形成后来《新修本草》与《证类本草》的基础。由于这个残简的出现，也订正了森立之在《重辑神农本经·序》上所谓"今本以别名置条末者，系苏敬所改"等片面论断。关于《本草集注》残简的朱墨杂书，在陶弘景《本草集注·自序》中说"朱墨杂书"，是本经的文朱书，名医别录的文墨书。这个朱墨的形式，经唐代的《新修本草》传至宋代的《开宝本草》。《新修本草》的朱墨杂书本在英国博物馆、巴黎图书馆都有收藏，但敦煌出土的《本草集注序录》，已将朱字一律写成墨书。这个残简是唯一的朱墨杂书的《本草集注》，因此，它的文献学的历史价值很高。同时由于有毒、无毒、采集、修治、制使等体式，在文献学上，也都起了启示的作用。在集注的形式上，明确了陶弘景当时"子注"的意义，且由集注内容暗示着《新修本草》等在文献学上的向前发展。同时这一成果也随着丝路之畅通，传到了西域地区，由此可以窥视中西文化交流之一斑。

404 中印文化交流 季羡林

（《光明日报》1954年10月20日）

中、印两国都是亚洲大国，都有绚丽的古代文化。两国从远古时候就互有文化、贸易往还，如两国古代天文学上都有"二十八宿"理论，中国约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年即有此理论。以此推算，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印度古书上有关于中国的记载，中国古书至今也有很多关于印度的记载，由此亦可看出中印两国人民很早就互有所闻、互相往来。公元前二世纪，中国四川的竹杖和布匹已输入印度并转运到大夏，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蚕丝就已输入印度，可见那时中印之间的交通已经开始。印度的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初已传入中国，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印两国交通日益发展。中国僧人法显（五世纪）玄奘（七世纪）和义净（七世纪）到印度求法，他们的游历记述，成为今天研究印度古代史的重要文献。来往于两国之间的还有外交代表和商人。有许多印度侨民留居中国，两国文化交流随之大大加强。印度文化曾对中国文化发生很大影响，如文学方面五世纪到七世纪的鬼神志怪书籍、唐代的"传奇"小说，以及另一种新文体"变文"都与佛经故事有关。"变文"是以诗歌和散文合组而成的一种通俗生动的文体。

“变文”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大事，中国的声韵学也受到印度影响。在艺术方面，无论是绘画、雕塑和音乐或多或少受到印度艺术的影响，如云岗石窟、敦煌石窟的壁画上都可看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中国的医学里也有一些印度成份，公元三世纪直到十世纪的中国许多旧医书里都有一些印度医学的色彩。中国文化传到印度，自然也对印度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小影响，如造纸术至少在七世纪已传入印度，用纸张印刷书籍，加速了印度文化的传播。中印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彼此原已十分光辉的文化，并且建立和加强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本文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地分析研究。

405　中印文化的交流　　常任侠

（《新建设》1951年第5卷第3期）

中国与印度，是世界最古的两个文明国家，在古代文化上都有伟大的创造。两国文化不仅在宗教、哲学、文学上互相照耀，就是在艺术的各种表现上，也互为影响。印度文化是随着佛教兴盛以后，到中国的东汉时代，才由中央亚细亚经陆路传入，并从此沟通了中印文化的关系。由于宗教，更传播了印度人的哲学、诗歌、传说、寓言、民间故事、音韵学、医学、武技、幻术、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等，特别是后四种艺术，在中国土地上生了根，开放出更美丽的花朵。本文着重论述了在东方独具异彩的艺术成就。一、音乐：音乐从印度的吠陀时代，就很被人民喜爱。声乐与器乐，在很早的梨俱吠陀时代，就已经并行了，到佛教时代，乐器的种类更多，如《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所记“箫、笛、琴、箜篌、琵琶、铜镜钹”等，俱见于敦煌壁画与云冈石刻中，可知很早便已传入中国。其中箜篌一种，在汉代已能仿制，隋唐时盛行于时，继又东传日本。西域的又一主要乐器琵琶，是古代印度与波斯所共有的，相传也在汉代传入中国。琵琶在汉唐时期的文献中种类很多，其中四弦曲项琵琶，又称为龟兹琵琶的传习，与七调的输入，对中国的中古音乐变迁影响甚大，作者叙之甚详。中印在中古时期的音乐上，彼此的韵律相通，声情互应，成为亚洲音乐的一个特色。二、舞蹈：印度的舞蹈也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中国与印度舞乐的接触，最早可以上溯到汉代。东汉以后特别是北朝，天竺的舞乐，纷然随宗教而来，占取了中国古舞的地位。《旧唐书·乐志》所载，北朝自西北传入的舞蹈，有六面、拨头、踏摇娘等几个舞曲。在隋唐时期，外来的舞乐最盛，隋九部乐，唐十部乐，天竺乐都居最重要的地位。龟兹乐、高昌乐、西凉乐、疏勒乐等，实际上是天竺乐的化身。印度乐舞传到中国，经过融化吸收，产生了新的乐种，如著名的”霓裳羽衣舞”，便是从西凉乐曲改制的，“秦王破阵乐”驰名域外，东传日本，西达印度，可说是中国吸收外乐后的一个伟大的创制。中国在艺术方面，吸取印度的很多，印度的舞艺与中国原有的舞艺混合孳生，成为一个新种，在艺坛上独具姿态。三、雕刻：印度雕刻与中国雕刻，在古代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到东汉以后，佛教传入，恰当印度的犍陀罗期与笈多期，这时印度雕刻艺术才波及于中国，在中国雕刻上，沾染了印度的风格色彩。印度雕刻巨大的佛像，多在石窟中，如阿笥达与爱楼罗，是其较著名的作品。这个凿窟造像的方法，到中国仍然保持着，从北魏到隋唐，成就了不少

伟大的工程。如新疆的万佛峡、伯孜克里克、敦煌的千佛洞、大同的云冈、太原的天龙山石窟、磁县的响堂山石窟、义县的万佛洞、巩县的石窟寺、洛阳的伊阙龙门，以及四川的广元、大足、江南的摄山等，都是这个艺术的传播发展。在这些石窟的群像中，可以看出中印文化的结合，精诚相通，成就之伟大。四、绘画：印度绘画艺术的传入，从西北陆路与西南海路双方并进，南朝与北朝都各有发展。壁画与绢素，都各极其妙。至隋唐而南北合流，在中国艺术史上，展现出中古时期光辉灿烂的成绩。古印度在绘画理论上也有所贡献，对于中国的画论，可能也有一些影响。在文化上，古代印度人送给中国不少礼物，古代中国人对于印度的文化，也有丰富的回礼。特别是印度古史的再建，多依据于中国古代赴印巡礼者的记录。如法显的《佛国记》慧超《五天竺游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传》等等，对印度文化发展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

406 略论印度龙与中国的关系 胡国庆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在印度佛典或印度传说中，“有无量诸大龙王……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天龙一鳞虫耳，得一渧之水，散六虚以为洪流”，“龙得小水以降大雨”。在中国神话中，“应龙畜水”，”应龙……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神计蒙处之，其壮人身而龙首，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等。由此可见印度龙与中国龙都有兴云布雨的神力，都具有“龙”的特征。考诸史料印度龙与中国龙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本无龙，印度龙是在中印文化交流，特别是佛教文化交流初期由中国传入的，经与印度实际情况结合，即形成印度龙种。最早的中国龙的考古物是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墨绿色玉质雕龙，距今约五千年。我国最早有关龙的文字记载大概距今约有三千年历史。而印度龙的最早考古材料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壁画《龙王及其家族》（阿旃陀第10窟），和公元前后的《龙族向菩提树礼拜》（阿旃陀第9窟），晚于三星他拉村玉雕约三千年。而文字记载始见于公元三世纪左右龙树所著《大智度论》中，晚于中国一千年。有人把在此之前印度著作中的Nāga误为龙，这是由于忽视了Nāga一词在历史上的演变情况而造成的误译。作者通过对梵语地狱（Narka）和梵语那伽（Nāga）关系的研究，阐述了“那伽”（Nāga）是如何演变为“龙”的起源时代及起因。认为在龙树之前，印度已有关于中国龙的传说，并肯定在公元二世纪之前中印文化已有了交流。龙树及其著作《大智度论》即可证明在此之前印度无龙；同时亦能证明龙树本人是印度龙的缔造者，《大智度论》是产生印度龙的胚胎。从质的方面看，印度龙继承了中国龙的基本特征，但更多的是借鉴中国龙的传说而利用印度神话传说给印度龙赋予新的职能。中国龙是多种动物复合的图腾物，是至高无上的；印度僧人虽也力图赋予印度龙多种动物的特征，但印度龙不是图腾，从未有过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龙是由具体到抽象，因此反映到量上，便是由多减少。印度龙则是由抽象到具体，因此反映到量上，便是由少增多。印度龙和中国龙之所以在质和量上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佛教的服务对象是现实社会中各阶层的人们。印度龙一开始便是为人服务的，它从未成为崇拜物，它仅仅是一般的神怪，是“佛”的工具，它是释迦牟尼所济渡的“众生”之一。中

国龙从“图腾龙”到“帝王龙”都是一种神性的象征，它是为“神”服务的；作为自然权力化身的“图腾龙”和作为社会权力化身的“帝王龙”，都必然集各种神性于一身。

407　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　　　黄盛璋

（《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历史研究》1961年第二期发表了陈翰笙的论文《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本文认为这篇文章取材于汉文献和西方汉学家整理尼泊尔的历史文献，其中有些前人错了，陈文也随之发生差错，有些不该遗漏的重要史实遗漏了，故提出了一些补充资料和商榷意见。这些意见共有十一个部分，现将有关重要论点及史实，简要介绍如下：（一）拘尸那竭为释迦牟尼佛最后涅槃的圣地，凡是西行求法巡礼的大多都要到此瞻礼圣迹，法显、玄奘都到过，但这个地方并不在尼泊尔。伽悉亚是印度北方省哥拉浦尔县的一个地方，在此以北一英里半的地方则是释迦牟尼的涅槃地。（二）法显访尼和佛驮跋陀罗来华为中尼友好关系史上树立了最早的标志。法显访尼是在公元406年，佛驮跋陀罗到中国则在408年。佛驮跋陀罗对中尼文化交流最主要的贡献有二：一是译经，特别是和法显合作翻译六部著名的经典；二是对禅学传播和发展的影响。据《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记载，他所译的经有15部117卷。其中有两部经是他和慧观在庐山译的，其余主要是和宝云等合作在建康道场寺译的。（三）玄奘以前西行求法高僧只到达迦维罗卫、论民园，并未进入加德满都谷地的泥波罗。玄奘在印度留学时，于公元635年亲自访问尼泊尔平原佛教诸圣地，所以《大唐西域记》中关于尼波罗的记载是玄奘亲自采访所得。（四）王玄策曾三次出使尼泊尔，为古代中尼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第一次出使尼泊尔、印度，是和李义表同去的，时间在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三月。第二次出使为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第三次出使在显庆二年（657年）。这次回国所取路线可能是海道。（五）七世纪中叶，中西交通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吐蕃、泥波罗道，它是从西藏经拉萨越喜马拉雅山入加德满都谷地，经泥波罗首都而入印度。这条道路分南北两段：南段从拉萨至加德满都，北段自青海至拉萨。这条道路的开辟是吐蕃弃宗弄赞迎娶尼泊尔赤贞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的结晶，它对于中尼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纸和造纸法，就是经这条路由西藏传入尼泊尔、再传到印度的。（六）元代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入仕中国，对中尼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很大。他最大的贡献有三：第一是建筑。建筑之中分佛塔和殿宇，而以佛塔居首。据《凉国慧敏公神道碑》记载，他修了三座佛塔：一座在西藏，是他为八思巴而建的；一座在北京，即今阜成门内白塔寺的白塔；一座在五台山，即塔院寺白塔。他还修建“大寺九、祠祀二、道宫一”。第二是造像。造像又分铸铜和泥塑两种。阿尼哥所造的主要为佛像。中国佛像铸造有汉（唐）、梵两式，汉式是直接受印度的影响，梵式即受尼泊尔的影响，创始于阿尼哥。阿尼哥所创造的梵式造像，经其弟子河北蓟州宝坻人刘元之手，又有所发展。第三是仪器的修造。最显著的就是天文仪器的铸造。元代司天监所用之简仪、浑天仪等，其设计虽出于郭守敬，但具体制造者则为阿尼哥。他还把传至宋代残缺已久的针灸铜人修补起来，使这件传统人体模型能够流传至今。文章还对玄奘以后西行求法走吐蕃、泥波罗道的情况，宋代高僧

继业去印度求经回程经泥波罗的路线史实，明太祖于洪武十七年派高僧智光出使尼泊尔的原因，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与尼泊尔的植物交流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本文引用史籍资料丰富，论证周密，为研究中尼关系和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

408 中印历史上的医药关系 刘成基

（《中医杂志》1958年第4期）

中西文化交流涉及各个方面，中西医药的交流即其之一。我国古代的医药，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印度，一是阿拉伯，其中受印度影响尤深。印度医学传入中国，和佛教的东来有着密切的联系。佛教东来，约在东汉孝明帝时，至于佛经之东来，为时更早。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接见大月氏王使伊存，曾亲受其口授的浮屠经。东汉明帝时，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出使天竺，抄写浮图遗范，愔与沙门摄摩腾及竺法兰东迁洛阳，除将拜跪之法传入以外，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印度医学发明很早，在公元前1540年到前800年的吠陀时期，有四部智慧的文献，即《大唐西域记》所说的一曰寿，二曰词、三曰平、四曰术，当时认为疾病是起于恶精，治疗是善精之力，除僧侣外尚有特别的医师。到公元前800年至公元1000年的婆罗门教时期，医术离开巫僧而独立，分医师为上下两级。那时最重要的医学文献叫《阿由尔吠陀》。印度古代的外科医术，有相当成就，在早期文献中，就有开脑术和破腹术的记载。耆婆是印度的医王，大约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和我国扁鹊之年代相仿。耆婆在印度医术之神奇，如同中国之扁鹊。耆婆之名，在我国医籍中多有记载，如《千金方》耆婆万病丸，《崇文总目》载有耆婆《五藏论》等。可见我国医学受印度影响之大。中国医学受印度医学的影响，到东汉后才较明显。因为随着佛教的东来，印度医学由僧人翻译后传入中国，在《隋书·经籍志》里就载有十一种。在北朝时，有跋陀罗译《五明论》合一卷，唐朝义净三藏更介绍了印度的重要医籍——《医方明》。中国医学之病理观，原以五行为主，而印度病理观，认为人体是由四大构成，患病是由于四大的失调。这种病理生理观，全由中国医籍所吸收。印度医学对中国医学之影响，在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医术，都混入了印度的医学，宋代的医学，亦不例外。印度医学影响中国极大的，莫过于眼科。所谓龙树是印度的眼科医生，也就是中国人所称的眼光菩萨，并有不少医书都冠以龙木、龙树的名字。而且在唐王焘的《外台秘要》中，又记载了传自印度的“金针拨内障法”，同书中记载了印度的眼科药物，以及印度眼科医生来中国治病事例。印度不少的药物亦输入中国，促进了我国本草学的发展。同样的我国有不少药物输入印度，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印度称之神州上药。由此可见中印医药文化交流之深。

409 汉魏南北朝从国外传入的医药文化 陆曼炎

（《新中医药》1955年第6卷第3期）

自汉武通西域，创丝绸之路新纪元，从自中西交通频繁，中外文化交流日盛，交流

项目日益增多，其中医药方技的传入，对丰富我国医药内容，改进对病疾的诊治，都曾起过重要作用。首先，作者在文中对中国医学史上的外科解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三国志·华佗传》记华佗医术精湛，不但能处方，能针灸，更能做外科割治剖腹手术，致使后人惊叹不已。二千年前，科学尚未发达，如此精明的医疗手术，难免后人怀疑。华佗的外科手术虽无足够文献留传后世，但剖腹医术绝非虚构。因为在他之后，解剖医术，史籍多有记载，如《三国典略》记徐之才运用解剖方法，取出人体上的寄生物，又如《高僧传》记刘宋一个和尚，自剖其腹自行医治之事。这样高明的医术究系自己发明或受外来影响？作者进行研究后，在华佗之前，中国史籍无外科割治之法的记载，但在印度的佛教医生中早已盛行。并有很多记载。如《㮈女耆域因缘经》记载着耆域向阿提梨宾迦罗学医，并且精研解剖，能治人体脏腑各种疾病，曾为人治愈因游戏而受伤的结肠病痛，也曾剖腹因骑马堕地致肝脏戾转而恢复原位的记载。由此可知古代印度早有了外科解剖手术。佛教在东汉时由印度传入我国，随宗教而传入的各种学说，总称为“五明学”即内明、声明、工巧明、因明和医方明。我国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对技艺之事存在偏见，因而工巧明和医方明为一般人所不重视，以为对我国学术影响不大，因之史载缺略。究其华佗的外科手术，绝非凭空产生或自己创造，而是受印度医术的影响，并融中外医术于一炉，才形成自己的医疗技术。魏晋以后，外来医药文化随着佛教的大量输入而进入我国，佛教僧侣为了取信于人们的信仰，以医术为手段进行宗教传播，当时一般传教的所谓“胡僧”，大都懂些医术，在《高僧传》中记外来僧人行医习医之事，不一而足。由此可以想见外来医术对我国医学发展较有影响。

其次，作者对域外药物传入及对我国药物的影响也做了研究。自张骞通西域，带回许多新异的植物种子，丰富了我国植物品种，魏晋以后，动、植、矿物品种不断从国外输入，从我国史籍及各家本草记载，知许多方药产自西域、印度及南洋各国，至今还保存着由外国方言直译名称。如兜纳香（出大秦，见《魏略》）、必思答（产回回国，见《饮膳正要》），等等。此外，自汉以后，历代由外域传来的药物，每每冠以“胡”、“番”、“海”、”洋”等字眼，如“胡枣”、”番红花”、海红豆”、”洋虫”等，其它如波斯枣、安息香、突厥雀之类，都加上出产国名，一望即可知为国外传入之物。

总之，自汉魏以来，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繁盛，仅就西方医药文化传入后，丰富了我国医药技术和品种，形成了我国璀灿多彩的中医药学，尤其药物方面，至今还为我国人民的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

410 宋代以前的外来药物及其在方剂中的应用　　穆德全

（《上海中医药杂志》1957年第9期）

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的前辈医家，对外来的医药知识，一向乐于吸收和采用，从而使我国的医学和药物学得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唐宋是外来药物输入很活跃的年代，特别是南洋各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药物大量输入，即为当时医家们在方剂中所应用。宋以前，伴随着中西交通的开展，西域的药物逐渐输入中国。公元前二世纪的汉代，输入的有大宛的苜蓿和胡麻，波斯的胡桃等。公元三世纪魏晋时代，西域的苏合

香、胡瓜也输入了。公元七世纪唐代起，波斯的没食子、莳萝、千年枣、巴旦杏、无花果、橄榄、皂荚、水仙等和中亚的胡芥、番红花及阿芦巴等相继输入。这些外来药物及其在方剂中的应用，到了宋代便有了更详细的记载。据《宋会要稿》记载，自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的218年中，外国来宋朝贡的凡633次，其中明确的记有药物的凡98次。文章列举了几十种进口药物如乳香、没药、丁香、檀香、龙涎香等的产地，包括大食（阿拉伯）诸国，三佛齐（苏门答腊岛南端）及其属国，阇婆（爪哇）及其属国，占城（越南南部）、真腊（东埔寨）、渤泥（婆罗洲）、木俱兰（巴基斯坦和伊朗）、细兰（锡兰）、麻逸（菲律宾、吕宋）、交趾（越南北部）、天竺注辇（印度南端）和非洲东岸等国。宋代在朝贡贸易中输入的药物不仅名色繁多，而且数量非常巨大。其中尤以乳香为最多。宋代外来药物的税收占市舶总收入中很大的比例，正由于此，也刺激了宋政府开展这方面的经营。宋政府规定外来药物中，除由官家专买专卖以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货于民”。在民间，药物的用途，主要作为方剂治病之用。文章详叙了宋代方剂中使用外来药物的名称、性能及主治症候等。其中尤以《圣济总录》一书中，以外来药物标名汤头的方剂最为丰富。从这些方剂中得知，外来药物在宋代确已被医家们普遍应用起来。关于使用外来药物知识和对其经验的传播，一方面和医家及劳动人民的使用有直接关系，而外国商人对各该商品品质、效用、服法等知识的介绍也有一定作用。由于宋代外来药物的扩大及其在方剂中的应用流传，使我们的药物学更为丰富。随着外来药物的输入和中西交通的频繁，中国的药物和医学知识也更多向外国交流，这对于世界医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起了重大作用，并对人类的文明和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

411　中国和阿拉伯的医药交流　　　宋大仁

（《历史研究》1959年第1期）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就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保持着密切的友谊联系。本文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详细论述了中国和阿拉伯在医药交流方面的情况。全文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阿拉伯医药传入中国的情况。自唐高宗永徽（公元650—655年）以后，阿拉伯国家屡次来中国贡献方物，其中药材很多，对中国的药物学有很大影响。许多药物为中国药物学界所采用，采用香药的本草书也有十多种。随着大批药材输入中国，大批阿拉伯卖药商人也到中国开设药铺，许多阿拉伯医方也传到中国。阿拉伯的花露水和阿维森纳创始的金银包裹丸药的方法、外科手术包括开脑术和兽医等，也由阿拉伯传入中国。在元代，更有阿拉伯医生主持广惠司，这是阿拉伯式的中国卫生行政机构。在公元1270年设立京师医药院，聘阿拉伯医生爱薛主持，配制回回药物，以治疗患病的卫士和人民。至元十年（1274年）改为广惠司，其中主要职官有２０多人。在元代、中国境内曾设立过三个阿拉伯式的医学机关，当时阿拉伯人在中国卫生行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唐至元朝，在中国开业的著名的阿拉伯医生有李摩珂（唐）、李珣（五代）、爱薛（元）、拉施特（元）等。阿拉伯人遗留下的方书有李珣的《海药本草》，共有海药124种，绝大部分为外国运来。还有一部《回回药方》，共四册，内容包括内

科、妇科、儿科、外科、正骨、针灸及药剂学等。可惜全书散失，仅留四册残本。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医药在阿拉伯的传播。中国医学对阿拉伯的贡献有炼丹术、脉学及中国药输入阿拉伯等。炼丹术在公元前二世纪发明于中国，到了唐朝达到顶峰。公元八至九世纪，炼丹术由中国传入阿拉伯，十二世纪再由阿拉伯传入欧洲。中国脉学在十一世纪即已传至阿拉伯。波斯医生拉施特约在公元1313年编辑一部《中国医药百科全书》，举凡脉学、解剖学、胚胎学、妇产学、药理学等，都有论及。他还著作了一部《脉经》，渗有中国的脉学思想。阿拉伯的解剖学，也有一部分是从中国人处学得的。因中国的名医扁鹊，实行尸体解剖，并建立一种脉学。阿拉伯医生阿维森纳在其所著的《医典》中，已经采入中国脉学，他在诊脉方面，详列48种脉法、其中有35种脉法与中国的脉经相同。中国药物输入阿拉伯的有60多种。阿维森纳的《医典》中，所列药物有800余种，其中不少是中国产的。中国的牛黄约在十二世纪时传入阿拉伯，再转入欧非诸国。中国的名医华佗的麻醉药麻沸散也由波斯商人传到阿拉伯国各国。阿维森纳的《医典》，是摄取了东西各国医学的精粹，写成的不朽名著。其中许多内容是从中国医学里获得的。

412　对宋大仁先生《中国和阿拉伯的医药交流》一文的意见　　郭庆昌

（《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

本文对《历史研究》1959年第1期发表的宋大仁先生《中国和阿拉伯的医学交流》一文，提出了两点不同的意见：一、认为宋文对"西域"、"回回"名称，用得异常含混。这两个名称在中国古典文献里没有固定和清楚的含义。如"西域"一词，通常在狭义上是指今新疆之地；广义上则泛指中国以西的地方，包括苏联中亚细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以及近东各国。如按宋文的解释，则古代的中亚细亚、中国的新疆、蒙古高原皆属于阿拉伯系统的文化，显然解释不通。二、认为宋文称阿维森纳是"阿拉伯最有盛名的医师"，这是错误的。因阿维森纳是苏联中亚细亚民族人民文化的代表者，并非阿拉伯民族的文化名人。据苏联史籍文献记载：阿维森纳是中亚人民杰出的哲学、医学、自然科学家和诗人。他的最伟大的著作是《治疗论》、《医典》、《知识论》。他的父母都是鞑靼人。他诞生在现今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布哈拉城附近的阿富山村，于公元985年他家由此移居布哈拉城，并在此受教育成长。他是塔吉克人。由此可见，阿维森纳确是一位中亚塔吉克族人民的学者。宋大仁先生把他认作是"阿拉伯最有盛名的医生"和和阿拉伯民族的文化名人，这是错误的。

413　中外医药交流的一些史实　　耿鉴庭讲　　刘　从　记录

（《中医杂志》1958年第3号）

我国医学体系的形成，是各地区、各民族医药学术和经验的总和。中国医学的对外传播，由来已久。早在汉朝，随着中外交通的频繁往来，带进了外面的有效药物，我国的药物和医疗方法也陆续传出。到了南北朝，中外医学的交流更进一步。后魏时敦煌人宋云西行求法，于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十二月入北印度乌场国，曾对其国王讲述管辂善卜，

华陀治病，左慈方术等，可见在六世纪初，印度已知中国早有杰出名医。公元562年，吴人智聪，携明堂图及医书往日本，为针炙传入日本之始。唐代义净法师，自述在印度二十年，以祖国方药，为人治愈疾病。至于祖国医药为兄弟民族服务，更是唐代医家的美德。唐代对吐蕃的协助中医药是其中之一，曾由文成公主亲自领导译述方书。唐代海上交通相当发达，药物除由海路来往运输外，有些宗教人士往往由敦煌经今日之新疆、转往印度、波斯、阿拉伯。他们一方面把中国医药带到国外去，同时又传入国外医药。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把医药学和其它科学技术知识传授给日本人，促进日本医学发展之事，至今仍受到日人的崇敬。宋代曾大力把中国医学介绍给高丽。号称中东医圣的阿维森纳，摄取东西各国医学的精粹，写成不朽名著《医典》，其中有许多记载是从中国医学里获得的。宋代自开宝元年（公元968），诏置舶市，互市药物。中国的许多特产药品，如牛黄、人参、茯苓等儿十种，经过市舶司，由阿拉伯人运往西方。中国药物出口，在元代也很旺盛。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谈了不少医药问题，间接的对中国药物向欧洲做了一次介绍。明朝初年，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南洋和西洋，足迹到达欧、亚、非三洲，把大量中药带去赠送外国人，并带回海外许多新的植物品种，丰富了中国本草的内容。十六、十七世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欧洲国家曾竞相翻译。十七世纪，更有很多医籍，为西人翻译印行。国外输入中国的医药，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北周明帝二年（公元558年），曾译《五明论》一部，乃系统传入的印度医学，惜此论早佚。又梁《七录》有摩诃出胡国方十卷，隋志更著录汉译胡方十一、二种之多。文章还介绍了几位在中国行医的宗教家的事迹。如传说中的晋于法开，南北朝时的支法存、深师等人。到了唐代，来到中国的胡医，更见增多。尤其是眼科方面，自从印度的《龙树菩萨眼论》译成中文后，印度的手术与中国固有的药物整体疗法结合起来，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药物方面，因中西交通的频繁，输入的日见增多。郑虔的《胡本草》、五代时汉化波斯人李珣的《海药本草》是外药中药化的研究成果。到了宋代药物制剂方面因受阿拉伯的影响，有了许多改进。如“丸衣”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医理和实际，产生了许多新丸药。再如糖浆、花露等的制法，都是在吸收国外良法后，在祖国医学理论的指导下，变化为药用制剂的。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国吸收融化外来医药文化，形成祖国医学体系的光挥事绩。

414 火药的发现及其传入欧洲的经过　　冯家升

（《光明日报》1952年6月7日）

本文对火药的发在、军事用途、发展、西传阿拉伯国家，再传洲欧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讲述，首先分析了火药的三种成份硝、磺、炭的功用，和称其为药的缘由，进而探讨了药怎么会着火而称为“火药”的过程。作者认为火药是在制造某种药时偶然产生的。制造药的人大抵不外医药家和炼丹家。炼丹家善于冒险，肯于大胆的探求，因而往往能发现新的东西。炼丹家在制造药物，在炼黄金的过程中，可能无意之间发现了火药；尤其在变化金石的方法当中，可能因炼丹家一时的失慎，把药料燃着而得名，意思是“着火的药”和“发火的药。”火药在发现后，有人认为先用于娱乐，而后用于军事。作者认

为先用于军事，而后才为民间供神或婚丧之用。火药初用于军事，是基于旧日火攻法的发展。火炮、火球、火蒺藜、火箭等都是旧日火攻用的东西。火药发现后，即把火药制成的小型火球射出去，以引起燃烧。攻守城池或追踪敌人时，则用以焚烧敌人的楼橹、攻城器械、柴草积聚。火药到了十一世纪中叶，有明显的进步，北宋时有了制造火药的工厂。《武经总要》中记有三个火药方子：一是“毒药烟球法”，凡八种成份；二是“蒺藜火球法”，凡十种成份；三是“火炮火药法”，凡十四种成份。这些成份具备了毒性的、燃烧性的、爆炸性的药料。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火药的发展不外三种：一是燃烧性的火器，二是爆炸性的火器、三是射击性的火器。火药最先由中国传入回教国家，传入时间大抵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公元1225年—1258年，中国的火药与烟火传入；第二阶段是从公元1258年—1305年，中国的火药、火器都传入。尔后，火药又由回教国家传入欧洲，在时间上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三世纪下半期，欧洲的学者从亚拉伯文书里得到火药的知识；第二阶段是十四世纪上半期，欧洲的几个国家因和回教国有军事的行动而使火药传入。中国使用火药早于欧洲三百余年，不仅欧洲的火药是由中国通过回教国传入，就是火器也是由中国而至回教国，再由回教国传入了欧洲。

415　火药的发明、发展及西传　　冯家升

（《化学通报》1954年11月号）

本文是将上文讲稿整理后另行发表的。文章论述了火药的由来，火药的发展和火药的西传等问题。火药之名称是“火”字与“药”字组成的。火药里的主要成份是硝、硫磺和炭。硝、磺、炭自汉以来就有，把它们组合起来成为火药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医药家，一类是炼丹家。但医药家比较稳健、保守，而炼丹家却是好奇、冒险、肯大胆探求。所以，作者认为把火药的发明归之于炼丹家是比较合理的。炼丹家可能在两种条件下发明了火药，一是直接在制造某种药时，发生了火药的作用，从而发明了火药；二是在间接变化某种药料时，发生了火药的作用，从而发明了火药。变化药料的方法很多，其中有一种叫伏火法，如硫磺伏火法，矾伏火法。原来炼丹家应用伏火方子，并不在求方子本身直接所发生的结果，乃在求石药的变化。火药的发明本来不是为了军用，不求在军用上如何有效。火药的效力达到某些有效的程度，乃是火药转入军事家之手后，不断的改良与发展的结果。至九、十世纪时，火药已经到了军事家之手。十世纪以后，火药在黄河流域十分发达，北宋政府因为北方有强敌辽与西夏，对兵器的发明与创造极力鼓励。宋敏求《东京记》里说，开封有个国防兵工厂叫“广备攻城作”分11目，其中即有“火药窑子作”，专门制作火药、火器。《武经总要》更记载着几种火药火器。火器如火箭、火药鞭箭、火球、火药蒺藜等；火药方子，则有“毒药烟球法”，“蒺藜火球法”，“火炮火药法”等。由此可知，这时的火药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十二世纪以后，开封成了中国北方制造火药、火器的中心。十三世纪爆炸性的火器十分发达，不只有像今日的小型炸弹，也有如今日的大型地雷。在黄河及长江流域都能大量的生产。十四世纪火器的特点是射击性管形火器的发达。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淮水流域的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创制出一种管形火枪叫“突火

枪”；《宋史》说它是巨竹筒子，内安“子窠”，先放火焰，后放“子窠”。这是子弹的先声，是火器上的一大发展。元代，“火筒”为军事上的重要火器，“火筒”也叫“火筩”，明人则称“火铳”。火铳有大小，大的是长型大铳，小的二、三尺叫“手铳”，大小火铳有铜制的，有铁制的。铜管易冶铸，铁管则较难。十四世纪时，我国有铁铳出现，这说明我国不但在火器的制造上有了高度发展，而且在冶铸术上也有了大的进步。至于火药的西传，原先不是直接由中国传到欧洲，也不是蒙古西征时把火传药到欧洲；而是经丝绸之路先传入回教国，再由回教国传入欧洲。中古时，三个回教王国先后横跨于欧亚两大陆之间，其中最兴盛的是黑衣大食。据英、美、法炼丹史家说中国的炼丹术传入回教国是在八、九世纪。据有关史料考证，火药由中国传入回教国是在宋理宗宝庆元年至淳祐八年（1225和1248）之交。不但火药而且有些火器也是由中国传入回教国的。火药火器传入回教国之时，正是欧洲人翻译亚拉伯文著述运动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因之，亚拉伯文有关火药的记载不久即译为拉丁文而传入欧洲。欧洲的一些知识分子知道了火药，不等于欧洲就有了火药。欧洲一些国家真正掌握火药的制造与应用，还在于回教国与欧洲一些国家在军事上接触的结果。

416 蒙古西征用过火药吗　　冯家升

（《历史教学》1952年第3期）

十九世纪以来，西洋的火药史专家们极力从欧洲、亚拉伯和波斯的中古文书内寻找蒙古西征用火药的证据但未找到；中国的文书内也同样没有找到。本文是对这个久悬未决问题的研究。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西征，灭了乃蛮屈出律，进讨花刺子模。1219年，成吉思汗分军四路进取诸城。其第三军围守将帖木儿灭里Timour-Melik于忽毡Khodjend细浑Sihoun河中的一个堡垒。《世界侵略者传》说蒙古军曾用“火攻之器”。我们从成吉思汗西征有炮手的记载，不能不联想到由抛石机发出去的火炮。霍渥尔斯说蒙古军所用的还有“毒火罐”。接着又说蒙古军在任得Jend曾用“原始式的大炮”和弩炮，不知何据。多桑只说为弩，《蒙兀儿史记》作弩炮。弩炮是中古欧洲攻城的一种机械，能抛掷檑木，也能抛掷石头。霍渥尔斯又记成吉思汗兵过乌浒河，曾用一种“毒大罐”，元史作“火箭”。1222年，拖雷进攻你沙不尔，多桑引有关史集的记载，描写攻守的配备中有“投射火油罐”。十三、四世纪时，回教国说蒙古军用Naphte，很可能不是亚拉伯人的真正Naphte，即指石油制造的“希腊火”，而是火药。蒙古军的炮手是汉人，很可能他们就是运用火药的专门技术人才。公元1235年，蒙古军决定西征窝尔加河以西之地。第二年诸王率军西向，势如破竹。1240斡罗思，1241波兰、匈牙利和日耳曼东南部，先后被攻破。波兰和昔烈亚西史家论他们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蒙军用一种妖术。这里所说的妖术或者是一种毒气，也就是《武经总要》所记“毒药烟球”一类的东西。波兰人不知其为火药，乃误会为妖术。同年，在匈牙利有沙油之战，马尔丁说蒙古军用火炮与火箭。勃老丁以为在这一战役里蒙古军所用的火攻法是火药。1845年法国拉努和法伟作了一本《火炮史》，他们极力避免说火药传自中国，又极力否认火药由亚拉伯传入欧洲。但在字里行间，却说火药最早用在由里海至匈牙利的某地，大概他们也相信蒙古军在匈境有用火药的事实。1251年蒙古

诸王大会议定决派忽必烈经营南宋，旭烈兀西征波斯。第二年旭烈兀西行，《拉施德集史》关于旭烈兀的战具中有Naphte和弩炮抛手共一千人。但抛手弩手既然是由中国去的，那么所谓Naphte的火攻法很可能是被误会的火药了。Naphte或Naft本来是用石油制的火攻法，但十三、四世纪以后亚拉伯文书中有时候指火药而言，好像中国的“炮”“砲”宋元前为抛石机，宋元以后便指火炮了。旭烈兀经营波斯的目的在灭木刺夷，1257年扫除木剌夷，随后又想灭报达。1258年1月围报达城。《拉施德集史》记载蒙古军中有“装Naphte的罐”或“装Naphte的瓶”，这是十四世纪欧洲瓶形火炮之前身，拉努以为亚拉伯一种抄本书中的“铁瓶”，即中国的火炮。火炮《金史》作“震天雷”其形如匏状而口小，在中国都是以火药制的。其实，火药在正式传入后，欧洲人常把火箭当作希腊火，亚拉伯人常把Naphte当火药讲。蒙古西征时虽然用过火药，但“用过”不等于“传入”。火药是军事上的秘密，绝不肯泄漏于人。同时，蒙古在欧洲的军事行动是一面倒，欧人四散奔逃，绝没有机会知道蒙古军中最宝贵的秘密。无怪蒙古征欧后，差不多百年之久，在欧洲文书里，找不出欧人有用火药的证据。

417　中国丝绢的输出与西方的“野蚕丝”　　　　戴　禾　张英莉

（《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

养蚕织绢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精美的丝绸也是古代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一种主要产品。关于丝及丝织品开始输出的时间，史学界看法不一。本文根据考古资料和中外文献记载，对中国丝绸开始输出的时间、公元前六至四世纪西方的丝织品是否是“野蚕丝”织品，以及中国丝绸品输出的路线等问题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据西方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四世纪，中国丝绸不仅已输出国外，而且远达欧洲，传入遥远的古希腊和罗马，出现在印度和苏联。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中，曾记述养蚕的情况，并认为丝织品是小亚细亚南岸的科斯岛上的人帕姆扑莱首先发明的。公元前一世纪的普林尼的《博物志》和中国史籍如《后汉书·大秦国传》也有类似看法，认为希腊、罗马所出现的丝和丝织品都是本地所产，也有人认为是本地野蚕丝及其织品“杂色绫”。经作者考证，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认为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中国已能养蚕织丝，科斯岛上丝织品的发现，比中国出现丝绸晚了几千年。中西文献记载说明，西方的丝织品并非本地所产，而是从中国输入的。罗马所产的“杂色绫”，也非野蚕丝织品，而是利用输入的中国丝织成，或是用中国丝织品“解而重织”的。关于中国丝绸运往西方的路线，一般认为，自西汉时起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经西域、中亚、西亚的陆路，即著名的“丝绸之路”；二是自广州出发由海上经东南亚诸国、印度的海路，即“海上丝路”。但海上丝路因受造船及航海技术所限，使用较晚。中国与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交通、不早于公元前二世纪。陆上丝路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就基本上是通的。传入西方的丝绸，也许是从这条路上运去的。除了这两条路之外，还有一条“草原路”，即东起蒙古高原，西至黑海沿岸，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的一条古代交通路线，它的大体方位在北纬50度附近。它的具体路线是从亚速海的塔纳伊司，经过里海、咸海、巴尔喀什湖北部地区，到达阿尔泰山之南、天山以北地区，与匈奴的贸易路相衔

接。希罗多得的巨著《历史》中关于这条路线的记载及中外考古资料证明，公元前五、六世纪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已通过这条路线进行。早期中国丝绸输入西方，主要是从这条路上运去的。本文引用资料十分丰富，论证周密，是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材料。

418 唐代中国和亚洲各族的文化交流 方 循

（《历史教学》1956年第3期）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丝绸、纸张、瓷器、茶叶以及其它工艺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到了唐代，随着唐帝国国势强盛，中外经济文化交往频繁，仅贞观年间长安的国子监（国学）中，就有西域各国及吐蕃、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国留学生达八千余人之多，汉族的先进文化、技术以及社会制度等，对亚洲各族人民起了广泛而又深刻影响。本文除叙述了与日本、朝鲜、越南、缅甸的有关情况外，还介绍了与中亚、西亚诸国，通过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的情况。

西域自归入唐的版图后，中原的学术知识、生产技术便大量向西传播，在高昌、交河、龟兹等地的遗址中，曾先后发现写本《论语》、《史记》、《汉书》残片，同时还发现唐钞《针经》、《神农本草》等医书。回纥在登里可汗时仿效内地式样，改帐幕为宫殿，妇女仿粉黛文绣之饰。加以与唐互市，留京师者常数千人。吐蕃自松赞干布与唐通婚后，遣贵族子弟入长安学诗书，约内地识文字者入吐蕃，内地的造酒、造碾硙、造纸笔和养蚕缫丝等随之传入。

唐文化西传最广、影响最大者为造纸术与蚕丝两项。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唐与大食争夺石国（塔什干），751年怛罗斯之战，唐高仙芝部战败，其中有些造纸工匠被俘，并送到撒马尔罕设厂造纸，造纸术开始西传。随着大食势力的扩张，793年在报达设造纸厂以后，大食又在东南沿海一带和大马士革造纸。公元900年左右，埃及从大食学会造纸术，1100年左右又传到摩洛哥，后传到欧洲西班牙等地。造纸术的广泛使用，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古代西域没有蚕丝，最初传到西域去的除通过商人之手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赏赐的办法，传到了西域各国。到唐代，运往西域的蚕丝，无论数量质量都有了提高。当时西域各国中，有的有桑不会养蚕，有的有蚕不会缫丝。中国养蚕缫丝技术最早传入于阗，后在东罗马帝国时，再由于阗传入波斯，以后再传入印度和欧洲。在唐文化影响周围文化的同时，制糖、造酒等技术，以及西方的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也相继传入中国。另外，在宗教方面，除佛教早在中国传播盛行外，其他如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也于唐代先后传入我国。唐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加以融合发展，成为我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佛教自西域传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唐代已形成中国化的独特佛教理论，对日本、朝鲜、越南、缅甸的佛教发展，起了深刻影响。

419 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 魏良弢

（《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本文认为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是继汉、唐之后的又一高峰。作者首先论述了汉文化对周邻民族和辽朝影响的情况，认为汉文化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以汉族为代

表的一种古老而又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在历史上，它对周邻民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不断地扩大着文化圈。同时汉民族也受到周邻民族文化的影响，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文化。契丹族在北中国建立的辽朝（公元916年至1125年），是一个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王朝。统治集团的重视和接受汉文化，与契丹国家的进入封建社会相适应。随着契丹国家封建化的加强，契丹人民的汉化程度也在加强。西辽王朝的创建者耶律大石，通晓辽、汉文，是一位具有高度汉文化修养的契丹贵族。当大辽帝国在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的打击下土崩瓦解时，耶律大石因与天祚帝在抗金问题上意见不合，率兵北走，自立为王。经过十多年的征战，于公元1130年建立起东起土拉河上游、西至咸海、北越巴尔喀什湖、南抵阿姆河的地域辽阔的西辽帝国。作者从一些文献史料的记载中，论证了耶律大石的部属及其西征的队伍，主要是由契丹人组成，但其政府机构和行政区划可看出汉人也有相当数量。西辽军队中，汉军也是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这样多的汉人和契丹人涌进中亚地区，必然对当地文化发生巨大的影响。接着，作者论述了西辽王朝在各方面表现出受汉文化影响的特点：在行政方面，取消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在军事方面，由皇帝直接控制军队，收回将军们的兵权；在赋税方面，实行户赋制度，轻徭薄赋；在生产技术方面，把中原的汲水器、冶炼术、建筑和造型艺术等均传至中亚。在其他方面，西辽政府的官方语言文字曾使用汉文，信奉汉化的佛教；在生活习俗方面也保持着汉人传统。根据这些方面的特点，作者得出以下结论：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是汉、唐之后汉文化向中亚传播的又一个新浪潮、新高峰。汉文化的传播也促进了中亚社会的向前发展。

420　古丝路道旁的中亚艺术　　　　唐恒尧译

（《故宫文物月刊》1983年第9期）

本文追溯了十九世纪末，一些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其周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埋藏在地下的城镇，在与世隔绝的峡谷中，发现了数百个庙宇、寺院和洞窟，以及许多壁画、绢画、原稿、黏土和雕刻。这些出土文物成为中亚艺术的宝藏。文章描述了丝绸之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行进的南北两线及经过地点和印度悉达多（释迦牟尼佛为净饭王太子时之名）创建佛教，以及佛教由南方海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情况。对中亚艺术，文章着重介绍了库车和吐鲁番这两个绿洲的佛教艺术。认为塔里木盆地内各种不同的民族，熔成了一个特殊的佛教艺术形式，其最早来自西方，而后受到东方许多艺术的影响。来自西方的最重要的影响则是印度，特别是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而犍陀罗艺术则受到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库车有一种绘画的形式，则是来自印度和伊朗萨珊艺术的影响。文章详细描述了库车的喀什尔地方洞窟中壮丽的壁画，认为这是中亚艺术的最高成就，其内容多半表示佛生活的重要事迹。其中有牧牛童难陀、金刚手菩萨坐像，摩河迦叶和国王阿阇世，小木制坐佛和一较大的坐佛雕像。文章论述了第九世纪维吾尔帝国对吐鲁番和库车的统治，描述了在贝西克里克大庙附近出土的维吾尔王子和公主的肖像，以及大庙里一个托灯的恶魔像。文章还描述了德国探险家在龟兹发掘出的摩尼教的经典和绘画，以及景教庙宇的遗迹和壁画，特别是在吐鲁番发掘出的布

（绢）上的佛画和庙旗上的画，并论述了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中国对佛教的迫害和伊斯兰教对中亚的统治，以及佛教艺术的衰落。这都是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材料。文内还附有十八幅中亚艺术的插图。

421 中国画法的西渐与伊朗细画 孙培良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论述了中国画法的西传及其对伊朗绘画的影响。国外有的学者认为，早在南北朝时，西域画法就影响中国，而中国画对西域的影响则无记录或遗物。有的说，“库木吐拉代表了中国文化在丝绸之路西向进展的极限”。还有的认为，晚唐时中国画法系“出于伊朗的传统手法”。本文对这些看法均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南北朝时期健陀罗画风，以及随后伊朗艺术的某些成分随着佛教传入西域是事实，但不能说这一时期就没有中国绘画影响西域的记录或遗物。文章引用北魏时宋云去印度求经，所撰《行纪》的记载和库车西南库木吐拉的阿波萨拉洞的飞天、克孜尔孔雀洞的降魔图等，均有中国画风。这些均为公元五世纪到17世纪的作品。文章还论述了西方绘画的“明暗法”（凹凸法）和中国绘画“铁线描”的区别。认为“铁线描”乃六朝绘画的共同特征。说尉迟乙僧的“铁线描”画法“出于伊朗的传统手法”，纯属臆说。至于“明暗法”画法采用的则始自梁张僧繇，而非尉迟乙僧。关于中国文化西向进展的问题，文章认为，事实证明库木吐拉决非中国文化西渐的极限。中国的绘画艺术很早就已在和阗地区出现。文章引用罗马大学马利欧·布萨格利教授关于丹丹乌里克丝公主等绘画和丝绸之路北道上土姆宿克壁画的论述，说明在六至八世纪时，伊朗、印度和中国的画法在丹丹乌里克同时并存。而土姆宿克的壁画，则证明为印度、粟特和中国画法相融合的一个实例。这两处绘画已经否定了库木吐拉为中国文化西渐的极限的说法，并对苏联考古学者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西北部发掘喷治肯特遗址所发现的壁画《伎乐图》和《男女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这些壁画有强烈的中国影响，从而进一步证明，早在公元七世纪中叶，中国艺术就已经西逾帕米尔传入粟特。文献也记载了中国绘画在七至十一世纪流行于粟特和中亚西部、呼罗珊的情况。文章还详细追溯了伊朗绘画的历史，论述了伊朗壁画和最有代表性的细画的内容、特点和演变，以及其固有传统。特别是公元1258年，旭烈兀率蒙古军队征服伊朗和伊拉克后，建立伊儿汗朝，使伊朗的艺术家因此得与高度发展的中国绘画接触，从而在拜占廷影响下解放出来，开始转变画风。至十四世纪，拉施特丁撰的《史集》写本中绘制的插图，则体现着伊朗画风的根本变革，已为中国艺术所渗透，文章详细介绍了拉施特丁的出身、经历和所撰的《史集》，以及他在大不里士东郊修建拉施特坊的过程，说明拉施特坊的写本插图确是彻底接受了中国的画法，它的影响普遍深入的在伊朗传播开，使中国画法跟伊朗的固有传统融为一体的。文章还论述了十四世纪六十年代末，帖木尔崛起河中，建立大帝国。因他特别欣赏中国画，使伊朗细画深受中国画的影响。还介绍了伊朗最享盛名的细画艺术家毕赫扎德的生平和事迹，以及他的门徒的画风和作品，其中有些人成功地掌握了中国绘画的精神和技巧。文章认为，中国画法对伊朗绘画的真正“渗透”，是在帖木尔时代以后，许

多优秀的中国画风的作品是在十六世纪出现的。为了证明作者自己的观点，文内还附有十幅伊朗古画的照片。

422　中国艺术对回教艺术的影响

〔埃及〕　Dreaky Mohammed Hassan著　　马继高　译

（《西北通讯》1947年创刊号）

本文中涉及到中国造纸技术传入西方问题。由于造纸技术的传入，使回教艺术，即绘画方面，起了崇高的地位。回教初期，回教东方的艺术家，都去模仿中国艺术作品，此种模仿之风延续到回历十二世纪（公元十八世纪）。特别是陶器制作和陶器上釉粉绘画等方面，受中国艺术影响较大。其次在绘画方面，中国的画法、图案、画题，均受到一定影响，考诸中国理想动物的画题，如龙、凤、麒麟、仙鹤等，也曾传到波斯，从而在巴格达的宫殿墙壁上，画了类似理想动物，在波斯地毯画上之行猎图及各种禽兽图像，充分显示出受中国之影响。通过作者详细考证，说明中西文化交流之广，中国艺术对回教艺术影响之大。

423　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　　夏　鼐

（《文物》1963年第1期）

中非人民在遥远的古代就开始了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本文专就作为古代交通关系证据的中国瓷器，在非洲的大量发现，对中非人民的友好关系进行了详细介绍。中国和非洲的间接交往,始自大约二千年以前的汉朝,至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友好往来的物证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瓷器。自古以来瓷器是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中国产品之一；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它是和丝绢占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在埃及的福斯特（即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发掘到许多宋代（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青瓷器，其中早期的可早到晚唐和五代，也有少量元明时代的青花白瓷片。这些工艺品显然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本地陶瓷艺人多有仿制。初期（十一世纪及以后）仿制青瓷，到十四、五世纪时也仿制青花瓷器。仿制品的陶片，在福斯特遗址中也发现不少。福斯特古城是公元641年建立的，969年现今的开罗城建立以后，政治中心移至开罗，但工商业中心仍在这里。元代的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1304——1377）在他的游记中，曾说中国瓷器远达他的故乡摩洛哥。明初的文献记载中也提到中国瓷器，远达非洲东部沿海的木骨都束（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竹步等地。十九世纪在上埃及尼罗河畔的底比斯、库司、库夫特和红海沿岸港口的科塞尔，也都发现过时代较晚的中国瓷器。1888年在桑给巴尔有中国瓷器和宋钱出土。1950年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交界处的三个古城废址中，都发现过十三至十六世纪早期的中国瓷器，其中青瓷较青花瓷为多，也有少量釉里红。在苏丹境内的爱丹皮废址中（这港口是1426年被毁的），也发现了许多中国青瓷碎片和早期青花瓷器。怯尼亚麻林地附近的给他（Gedi）古城和其他几个遗址，都是十三世纪才建立的居民点，最早的文化层中没有中国瓷器，而在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的文化层中，都有中国

的青瓷、白瓷、褐色粗瓷、青花、“广东罐子”出土。怯尼亚以南的坦噶尼喀境内沿海一带，1955年前后的考古调查中，曾发现在46处古代遗址中有中国瓷器，而且为数很多。发现中国古代瓷器的地方，还不限于东非和北非，而且包括了西非。刚果境内离大西洋岸不到二百英里的姆班萨（Mbanza）地方，近年也发现过十七、八世纪的中国瓷片。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塔那湖的一个岛上的古代教堂内，一个精美的明代瓷罐装盛着死于1597年的国王顿加尔（S.Denghal）的内脏。十七世纪的公达尔（Gondar）的宫殿废址中也有许多中国瓷片。由于瓷器的发现，我们重温中、非之间友好往来的旧事，不能不更感到欣慰。

424 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 陈竺国

（《暨南学报》1936年第1卷第2期）

本文将我国接受异域（主要是波斯、印度及西域诸地）色料之史实，进行了考证。从这些色料输入的时间，使用范围及对我国文化上的贡献，作了系统阐述。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即秦汉以前，分颜色为两大类，即正色与间色。正色与间色又各有五种。正色为人们所尊崇，间色为人们所厌恶。直至魏晋以后，西方各种色料输入，于是不再因袭旧观念的支配，而间色亦逐渐流行。本文系统的论证了色料输入之历史，并按颜色的不同，分为白、黄、红、蓝、黑五大类，进行了详细考证。

在白色一类中，首先考证了我国古代所用的白色即粉的用处，有傅面或涂物两种，这种粉都是用米研磨成细粉后再傅面或涂物，其简陋情况可想而知。后汉时虽有胡粉即铅粉的传入，但并不知做法。在晋代，我国始能制造铅粉。张华的《博物志》说：“烧铅锡成胡粉”即可证明。晋以后，胡粉别名锡粉、铅白、白粉、水粉等名称，而且还有“波斯铅白为天下第一”的记载。制造铅粉的副产物有密陀僧（黄色和白色）“密陀僧出波斯国，又名没多僧、密陀、没多，并胡语也”（《唐本草》）。唐初，又有“胡粉炒为黄丹，黄丹淬为密陀僧”的记载。因此，密陀僧与胡粉、黄丹（或称铅丹）有密切之关系，都被用作绘画颜料。在黄色颜料中，尚有天然矿物原料雄黄、雌黄、空青等，都以西域传入为最佳。在我国认为最优越的黄色颜料是藤黄，又名草雌黄，有毒素，不变色，历来为我国绘画界所重视。据记载，此颜料似由南海邻国传入。此外，尚有西域牦牛黄、姜黄和天竺的竹黄等。

红色颜料以胭脂为最佳，流传亦最普遍。燕支一名最早见于《史记》，且匈奴歌有“……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可知汉时燕支产于匈奴，匈奴用作增饰妇女的颜色。燕支有胭脂、燕脂，焉支、烟紫、脂支、燕肢等名，显系异域音译之不同。查燕支乃一种植物的花，名叫红蓝花，《博物志》称“红蓝花乃张骞得种于西域，今魏地亦种之”。红蓝花作为色彩，在古代西域盛行，后传至匈奴，复由匈奴传至中国北部。又西域古代红色颜料，更有采取麒麟血和地血的。麒麟血又名血竭，出大食国，地血则是茜草的别名。更有一种红色染料，就是指甲花，又名凤仙花，晋代时传入，唐宋以来，成为妇女们的妆饰色彩。

蓝色在我国使用较早。作者考证古代所用蓝色都是蓼蓝，汉以后才有青黛的蓝色从

印度传来，这青黛就是蓝淀，俗称靛青。此外有铜青、又名扁青、绿青，还有石青，即空青，据《唐本草》及《海药本草》称“出波斯国”，说明这些颜料都由西域传来。

黑色在我国古代用在衣服、旗帜及其他事物上，当时的黑色原料为黑土、墨鱼、马墨等。在两汉三国时，以石墨为最显著的黑色原料，到三国时始有松烟墨出现。曹植曾有：“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古人感鸟迹,文字有改判”的诗句。这说明已用松烟墨和兔毫笔写字,从而显示出中国文化进步之状态。至子墨的传入当在后汉,因和帝时有异域献墨的记载。这些外来文化,启示了魏晋仿作松烟墨的制造,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大进步。这种文化上的发展与雕板印刷术的发明,具有同等重要性。此外,还有印度传入的黑色染料庵罗果,波斯的皂矾及乾陀木皮,后者为褐色染料，无疑由佛教徒为着染衣而传入。

总之，我国自魏晋六朝以来，西域色料不断传入，色料种类逐渐增加，色彩使用起了变化，制造色料和染料技巧也大有进步，从而促进了我国文化的演进。此为研究中西文化史者应予注意的问题。

425　七曜历的起源

——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　　　刘世楷

（《北京师大学报》“自科版”1959年第4期）

七曜历是受有印度七曜占候术影响的一种历法，它在汉晋之前即随佛教传入中国。本文论述了七曜历的概念、内容和起源问题，是研究中西文化及中国天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七曜是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总称。日月五星称为七曜，早在春秋《穀梁传》已有之。汉以后屡见此词。本世纪初年在敦煌石室发现的“七曜历日”历本及“七曜占星”书，都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星之名名七曜；其七曜次序与佛经所载相同，和七曜日历的记日法一致。但佛经上的七曜次序与中国古时的七曜次序不同，七曜记日法更是中国所无。安息僧人安清于东汉桓帝初年（约公元148年）来华传法译经，僧祐《出三藏记集》十三，称其“……外国典籍莫不该贯,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在这以后大约经过二十六年，中国就有七曜历出现。《续汉书·律历志》“熹平（汉灵帝）三年(公元174年）刘洪上七曜术”。这个七曜就是七曜历，是中国第一个以七曜命名的历法著作。此后，由魏晋以至隋末，中国学者对于七曜历的著述很多，陈代和隋初推行七曜历之盛及南北朝关于七曜著述之多，已到空前绝后境况。隋至唐代初期，七曜历仍在民间流行。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曾明令禁止民间私有七曜历。但七曜历并未完全禁断，到五代末际，又引起后周太祖的禁止。七曜历初出于东汉末，盛行于南北朝，经隋唐五代以至北宋初期，都在民间流行，至南宋末年，才完全消沉。关于七曜历的内容，从唐高宗、代宗及后周太祖三次禁令看来，可知七曜历是日月五星之历，民间私习流用，由它占卜吉凶，忘测祸福，煽惑人心，为害闾阎。此历特点最突出的在于七曜占侯。从有关七曜历著作人的史传杂记来看，可知七曜历一方面具有数术性质（迷信的),一方面也有天象测算（非迷信的）。从现存历本实物来看,七曜历也有要求合于日月五星运行规律的年法、月法、日法闰法及推定节气的方法，如象纯正历法的格局。不过它的日法采用了中国从来

所无的七曜记日法，具有由七曜占侯吉凶的宜忌历注，因而以日法特点命名为七曜历。所以，七曜历可说是由数理的历法与迷信的数术相互揉和而成的。七曜记日法及宿曜占候术为中国所无，但用干支记年月日的方法、二十四节气的划分法、以及七十二物候的规定法，也非外国所有。故七曜历既非整套外来品，也非纯粹的土生儿，它是受西方（主要是佛教徒）的影响而产生的。关于七曜历的来源问题，沙畹、伯希和二氏以宿曜经中对于七曜的胡名乃康居语的音译，而摩尼教徒用康居语，用日曜日为礼拜日，故二氏引七曜历本上注有“密”字为证，认为七曜历是摩尼教徒传到中国来的。近人叶德禄作《七曜历入中国考》，结论谓七曜历入中国在汉晋之间；姜亮夫在所著《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中说七曜历是佛道入中土后，由佛教徒传入的，此两说较近事实。作者认为日本薮内清《支那の天文学》一文的观点，与印度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形不合，对中国古代七曜历本质的认识也不够全面。作者分条论述了摩尼教入中国比佛教徒传七曜入中国为晚；历本日序上注“密”字的意义，并不如沙畹、穆勒、伯希和诸人所说的那样简单，它不是摩尼传七曜入中国的确证。作者对沙畹、伯希和、穆勒、羽田亨、薮内清诸人的旧说解释，持否定态度。其结论是：七曜历不特不是摩尼教徒传入中国的，也不是由印度整个搬来的；它只是受有印度七曜占侯术影响的一种历法；成熟产生于东晋南北朝时代。七曜占侯术则早于汉晋间随佛教输入中国。七曜历本上注有“密”字或“蜜”字，或是指日曜日所在，或是指佛教的吉祥日，并非摩尼教徒传七曜历入中国的充分证据。

六、民族宗教

1.民　　族

426　商周秦汉时期甘肃境内的氐羌月氏和乌孙　　曹怀玉

（《甘肃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3、4期）

本文对商周秦汉时期今甘肃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作了考察研究。本文所表示的“民族”概念，是指林耀华在《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一文所说：“无论什么社会发展阶段或是什么类型的人们共同体，只要它具有最一般的共同语言、初步形成的共同区域以及共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算作民族”。作者认为，以此概念考察我国秦汉以前在今甘肃地区居住的氐羌、月氏和乌孙是科学的。氐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汉前的古书多氐羌并提，商代卜辞以“羌”总称古代居住在西北高原的一些游牧部落。商周时期氐羌的社会形态尚处在部落阶段，战国初期，羌人开始逐渐南下和东徙，是羌人开始和汉族错居时期，同时也是氐羌开始分化的时期。汉代以后则氐羌有别，氐人分布在秦陇之西南，南近巴蜀；羌人散居在秦陇之西北，北连匈奴，其社会形态，在两汉时期，大部分羌人尚处在原始社会的部落阶段。羌人在战国初期为何南下和东徙？氐羌此时为何开始分化？作者结合整个商周秦汉时期氐羌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况作了详尽论述。月氏一作月支。月氏之族源无定论，《后汉书·西羌传》有湟中月氏胡的记载。《魏志》引《魏略》说：“敦煌西域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支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据此，月氏早期亦当为我国西北高原之一游牧部落，居地在敦煌祁连之间。西迁以前，所谓“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西迁后，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变化。月氏为何西迁，何时西迁？中日学者论述尤多，但大抵不出史、汉有关记载。乌孙本居敦煌祁连之东，其族源解说纷纭，甚难探讨。乌孙后来西迁至伊犁河畔的原因和过程，史汉记载亦详略不同，且有出入。作者结合《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对《史记·大宛传》及《汉书·张骞传》所载张骞说武帝之言进行了考察，认为《汉书·张骞传》和《西域传》关于乌孙西迁过程和迁徙地点的记载大体可靠。即汉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左右，匈奴老上单于把匈奴攻杀过乌孙昆莫之父的罪名转嫁给月氏，约乌孙共同攻打早已迁居在伊犁河畔的月氏，月氏再次西迁，伊犁河畔的牧地从此又被乌孙所占有。乌孙从此也就成了西域的强国之一。自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西域各国和汉廷的使臣往来不绝，大大加强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着彼此的生产经验和生活内容，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促进了祖国历史的不断发展和前进。

427　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及其分布　　王宗维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

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是秦至西汉前期，所指河西地区，既包括河西走廊，也

包括走廊两侧的山谷地区和沙漠草原。文中所说的“民族”，泛指各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组织，包括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群体，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不同。作者旨在把这个新的课题提出来供学术界研究讨论。有人根据《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张骞传》的记载，认为汉开河西前，河西地区的民族就只有乌孙、月氏、氐、羌、匈奴，而不言其他。事实上，当时河西地区的民族，远远不是上述几种，而是很多。过去，人们比较注意研究河西地区在东西交通和东西方民族迁徙方面的地位和作用，而不大注意南北民族的迁徙交往活动。实际上，南北方民族向河西的迁徙极为频繁。据《管子·封禅篇》、《山海经》、《汉书·地理志》载、春秋战国时活动在这个地区的民族有崞端、玺唤、大夏、竖沙、居繇、月氏等族。秦代未留下河西诸族活动资料。作者根据《史记》、《汉书》提供的民族状况资料，重加考证，补漏正讹，恢复原意，认为秦汉之际，活动于河西地区的民族大约有以下十余种。1.羌人、2.匈奴人、3.月氏人、4.单桓部人、5.居延（居繇、朐衍、车延）戎、6.义渠戎、7.焉支（雁疵、焉耆）人、8.卢水胡、9.张掖（涿邪、处月）人、10.敦煌（敦薨）人，11.乌孙人、12.塞种人、13·龙勒（楼兰）人、14.氐人。文中对以上列举的十几种民族二十多个部落的族源、名称沿革、迁徙来历、活动的地理位置、范围、兴衰过程、宗教信仰，与其它民族的关系等作了详细考证。有不少地方否定了前人研究的结论，具有精辟独到见解。如关于卢水胡的名称、族源问题，周一良、姚薇元、唐长儒、马长寿等先生都已有专门论述。但作者认为以上诸家之说，都难以成立。他提出卢水胡人至少在西汉初年已居于姑臧西部，汉开河西时又迁至显美县、属张掖属国都尉管辖，卢水胡向湟水流域迁徙，不会早于东汉初年，其得名与卢溪水无关。至于“水黑曰卢”，这是当时对卢奴县城一水池的特殊解释，与张掖临松黑水毫无关系。卢水胡曾受月氏统治，但族源与敦煌、祁连间的小月氏人无关。再如张掖（涿邪、处月）人，《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条下注释云：“张国臂掖，故曰张掖”。《元和郡县图志》：“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张中国之掖”，故名。然而，张掖一词，实为译名，是“涿邪、作野之别译。武帝元鼎、元封年间，汉朝和涿邪人发生关系，称涿邪人居地之山为涿邪山，其位置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尔泰山东端达朗扎德戛德一带。该部在匈奴西迁时又向西迁移，活动于今新疆东部。丁谦氏地理考证认为涿邪就是隋唐的处月，又译为朱邪。涿邪、作野、朱邪都是张掖的同名异译。以上材料充分说明汉开河西以前，河西的民族成分是十分复杂的。汉开河西时，大批汉人迁居河西，从而改变了民族成分和各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428　关于匈奴人在河西走廊地区活动的几个问题　　白凤岐

（《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第2期）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在匈奴奴隶制政权存在的过程中，河西走廊地区不仅在行政、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与匈奴族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本文探讨研究了匈奴人在这个地区的活动。河西走廊在先秦、西汉时期，月氏、乌孙、氐、羌以及匈奴等游牧民族，都先后在这个地区驻牧。匈奴人入据河西走廊地区的具体时间，约在公元前176年前后。但匈奴人是沿哪条路线进入河西走廊的？作者分析了当时匈奴人以阴

山一带作为自己经济、军事重要基地的情况和额济纳河流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后，认为匈奴人是通过居延地区循额济纳河流域的天然通道入据河西走廊地区的；汉王朝从匈奴手里夺得河西走廊地区，首先也是控制居延地区，尔后循额济纳河流域通道进军的。匈奴人控制了河西走廊以后‘原来在秦汉之际就已相当发达的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就成了匈奴社会经济的重要织成部分。发展畜牧业在河西走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汉书·地理志》就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记载。匈奴人的手工业，主要是军事手工业和木器制造业，其制造中心，一个在阴山地区，一个就是河西走廊地区。因河西走廊地区的祁连山、焉支山都盛产木材，为制造箭杆和车辆等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匈奴人的商业活动是以牲畜和皮毛为主要商品，同汉族和与其相邻的各族进行交换，互通有无。另外，匈奴人通过战争手段，劫掠汉人和其它各族人民以为奴隶，因此在它的商业活动中，买卖奴隶也是其中的一项。最后，作者还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河西走廊地区在匈奴军事行动上的战略地位问题。首先，河西走廊因为黄河和其它特殊地理条件，在军事上具有进可以扰动甘、陕，退可静观大局的战略地位。其次，从匈奴的政权机构形式看，河西走廊属匈奴右贤王庭统辖，是右贤王“份地”的一部分，右贤王是“份地”内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历史上河西走廊地区及西域诸国称为匈奴奴隶制政权的“右臂”，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通额济纳河流域可与匈奴单于王庭联系；南可与羌族结成临时军事同盟；东可侵扰汉王朝，与北方的入侵构成犄角之势；向西可以统领西域诸国。第三，从汉、匈间的斗争看，其决定性的战争发生在武帝元狩二年和四年(公元前121年和119年)。元狩二年，西汉王朝打通了河西走廊，控制了西通西域的咽喉。元狩四年，迫使匈奴势力更向西域退却，出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此后，西汉王朝便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加强了对这个地区的行政管理。匈奴人对失掉河西走廊耿耿于怀，一旦有机可乘，便以武力相扰。不过，这种侵扰已成了强弩之末，从公元151年（桓帝元嘉元年）以后，北匈奴的侵扰活动，已不见于史籍。自匈奴入据至退出这个地区，汉、匈间进行了长达三百年的斗争。

429 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和匈奴及河西四郡的设置　　潘　策

（《甘肃师大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3期）

月氏、乌孙都是我国历史上活动在河西地区的古老民族，但史书对这两民族的活动地区记载不同，引起史家争论。作者依据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分析，认为月氏在乌孙之东，占有河西大部分地区；乌孙在西，乃小国也。据近年在河西东部的天祝、古浪、永昌、张掖等县沙井文化的发掘分析，这一文化的内涵是铜石共存，相当于殷商时代；最近还发现铁器，说明下限延续更晚。从地区和时间看，沙井文化与古籍所载月氏活动的地区和时间相吻合，当属月氏留下的文化遗存。另在酒泉、玉门一带发现骟马类型文化遗存，从分散区域看，恰与古籍所载难兜靡统治时期的乌孙活动地区相吻合，可能是乌孙留下的文化遗存。

作者依据《汉书》《史记》等有关史料分析，认为月氏、乌孙与匈奴同俗，都属游牧民族，秦汉之际都已进入奴隶社会。但当时月氏强大，侵夺乌孙，杀乌孙王难兜靡，

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难兜靡的儿子昆莫被匈奴单于收养。正当月氏与乌孙相互争夺之际，大约在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以前，匈奴战败月氏，其势力伸入河西，迫使月氏的大部分迁徙至伊犁河流域。昆莫被匈奴抚养长大后，统领逃亡在匈奴的乌孙旧部，为报杀父之仇，向匈奴请求西击月氏。结果，将月氏又从伊犁河流域驱逐到阿姆河流域。汉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在昆莫率领下，在伊犁河流域建立了乌孙国。

匈奴在战国后期，逐渐成为我国北方的一个强大游牧民族，经常南下攻掠燕、赵、秦境。到秦、汉之际，控弦之士达三十余万，雄踞我国北方和东北；继而占据河西，控制西域，南服诸羌，给西汉王朝造成很大威力，逼迫采取和政政策。武帝时，经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强盛，改变了对匈策略，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经春、夏两次战役，夺取了河西走廊，并设置酒泉、武威二郡；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增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从此，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夺取了西域，保障了西北边境安全。另外，打通丝绸之路，使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得到较大发展。

430 郁夷大月氏的来源和迁徙　　任光岳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郁族，又作禺夷、嵎夷、郁夷，也作禺氏、禺知，是归姓东夷的一支。它起源山东、江苏交界地方，约当公元前五、六千年时，他们沿黄河南岸西迁，一支居于河南中部的洧水一带，建立有国，另一支沿黄河东岸北迁，经河套到河西走廊，称为禺知，后又叫大月氏。中外学者对大月氏历史研究颇多，但对其氏来源地则论证较少。《书·尧典》称：帝尧“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禹贡》有“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书经》两处提到嵎夷，可见它是个古老的部族，在帝尧时，已散布于东方海滨青州一带的强大部族。郁夷的地望，《后汉书·东夷传》、于钦《齐乘》、薛士龙《书古文训》皆谓在山东半岛尖端的海隅登州、牟平一带，此说已多为近人所承认。还有谓嵎夷在朝鲜、在辽东、辽西、在日本、在连云港市之说。这些说法都有可取之处，但也过于片面。作者认为原始民族为了生活和生存的需要，而不断地迁徙。嵎夷起初当分布于山东的登州、牟平一带，汉曾于附近置郁秩县，即今平度县，以后有一支渡过渤海海峡，由庙群岛至旅顺的铁山，再迁入朝鲜；另有一部分则渡海迁入日本。还有一支则从山东半岛沿渤海北迁，经河北到辽西。大部分则沿黄河南岸西迁，其中有一支定居于河南中部的洧水一带，建立有国；一支继续过着游牧生活，沿黄河东岸北迁，经河套到河西走廊，称为禺知，后叫大月氏。随后大月氏被匈奴所迫，除一小部分老弱留居祁连山一带称小月氏外，大部北迁于伊犁河流域。后来又被敌国乌孙所败，西迁至中亚的阿姆河及阿富汗一带，建立强大的大月氏帝国，并侵入印度河及恒河中上游一带，与当地印度人结合，形成拉其普特部族，分别建立了许多王国，给印度的历史带来很大影响。本文分有族的来源、嵎夷首领的被神化、嵎夷的西迁、禺氏的西迁于豫中建立有国、有国的名义、郁(有)夷与禺氏的继续西迁、大月氏帝国的建立及向印度的发展、小月氏人的迁徙、郁人的南迁等九节，对学术界有人误称大月氏是伊兰族之说予以否定。对郁夷、大月氏的

来源和迁徙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证。认为有族与大月氏是原属归夷的一支，与夔、胡、河为同族。它起源于山东、江苏交界的地方，约当公元前五、六千年时，逐渐沿黄河南岸而不断西迁的。

431　小月氏和尉迟氏　　〔日〕榎一雄著　斯英琦　徐文堪译

（《民族译丛》1980年第3、4期）

本文分上、下两篇，分别考证了从西汉至三国时期小月氏这一民族的分布地区和活动情况。月氏是活动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民族。据《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月氏原来居住在敦煌、祁连间、被匈奴打败后，西迁中亚，有一部未西迁的则进入祁连山与羌族杂居，号为小月氏。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征伐匈奴，开拓了湟河流域，并将其地划入西汉的势力范围。此时的小月氏已居于湟水流域。西汉元鼎3年（公元前114年）设置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县一带），内设月氏道，为月氏部族所在的行政区划。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当时小月氏已分布于湟水西的柴达木盆地西北端，扼处柴达木盆地到塔里木盆地东南端的出口，以至帕米尔高原的阿尔金山脉、昆仑山脉南麓。作者认为，这个地区原来就是月氏的领域，当月氏西迁时，这一地区的月氏没有移动。到了后汉，小月氏分布于湟中、张掖、令居(今甘肃永登县)等地，号“湟中月氏胡”。有七个大种，有常备兵九千多人。到三国时，在武威的多种民族中，也有小月氏人。安定郡的月氏城，即西汉时的月氏道，此时仍为月氏族集居。至西晋以后，小月氏的踪迹即变得杳然不明。作者又考证了小月氏后裔的情况，对周一良教授认为卢水胡沮渠蒙逊属于小月氏部族，加拿大的蒲立本教授认为尉迟氏即小月氏的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沮渠蒙逊属于羯胡，尉迟氏属于鲜卑族，两者与小月氏均非同族。并对此作了详细论证。

432　汉代羌族的活动　　〔日〕佐藤长著　王丰才编译　芈一之校订

（《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羌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民族，主要活动在青海、甘肃和陕西的北部和西部。本文译自日本佐藤长著《西藏的历史地理研究》一书的第四章。作者以确定羌族活动地区的地名和族名为目的，对前、后汉时羌族的活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羌”字是“羊人”两字的合写，是牧羊人的意思。所谓羌族，就是一个以牧羊为生的民族。关于羌族的来源，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秦历公时（公元前471年—444年），羌族人爰剑被秦所虏，当了奴隶。后逃亡，被秦人追捕，藏在一个洞窟里，秦人用火烧之，爰剑未被烧死，出洞后，与劓女在荒野相会，结为夫妻。羌人因他未被烧死，把他视为神圣，并推举他为首领，他的后代也相继成为首领。由于黄河、湟水地方少五谷，多禽兽，羌人都以狩猎为生。爰剑就教给他们农耕和饲养牲畜的方法，深受羌人的敬爱。到了爰剑的曾孙忍时，秦献公(公元前384年—362年)即位，进军到渭水水源地带，灭狄豲戎，忍的叔父卯惧怕秦的威力，率领种人南下，到了赐支河曲以西数千里的地方，从此与众羌分离，不再往来。其后，他的子孙们分成几个集团，各自定居下来，成为牦牛种

的是越嶲羌（四川省越嶲县），成为白马种的是广汉羌，成为参狼种的是武都羌，只有忍及其弟舞留在湟中。他们都各娶妻生子，忍生九子成了九种，舞生十七子成了十七种。嗣后羌族繁衍生息兴盛了起来，发展到八十九种。作者对《汉书》，《后汉书》，《通鉴》等史籍中有关羌族的记载，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考证，以烧当羌，先零羌和罕幵羌为中心，详细论述了羌族和汉王朝的战争情况，以及他们活动地区的地名和族名。在西汉时，汉武帝为了打通西域的道路，在河西设置四郡，作为通西域的门户，并隔绝匈奴与羌族的联合。此后汉王朝与羌族时有战争。至在东汉时，与羌族的战争连年不断，如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与烧当羌的战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与先零羌的战争；元初五年（公元118年）以后，又不断发生其他羌人的叛乱，特别是在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曾发生了东西羌的联合进攻义。这一系列的汉与羌的战争直到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才平定下来。本文对这些战争的情况和羌族活动的地区，都有较详的论述，这对了解东汉时期，在丝绸之路上的羌族活动问题多所裨益。

433　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　　胡昭曦

（《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羌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兄弟民族之一，至今在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茂汶羌族自治县，仍是羌族聚居的地方。自殷商以后，氐人和羌人都住在中国西部地区，许多地方氐羌错居一起。故在历史文献上多氐和羌并提，致使有些学者认为二者是一个民族，造成混乱。本文根据史籍文献的记载，首先对氐族图腾、语言、文化和婚姻关系，生活习惯等方面，详细作了考证，论述了氐人和羌人的区别，说明他们是两个氏族，而不是一个民族。关于冉駹，因汉武帝于此设汶山郡，郡治汶江，即今茂县。唐朝有些文献认为冉駹即唐之茂州，即后之茂县。本文认为此说不足为据，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冉駹是氐族，在龙涸和白马之间，即今四川松潘与甘肃文县之间，而不在茂县。据《史记·大宛傅》载，似分冉駹为二。但《汉书·张骞傅》之记载，则与《史记》不同。经考证，冉駹是一个整体，不是两个部分。《史记》之说是后人传写之误。冉駹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多民族的联合体。曹魏时，张既至武都，将氐人五万余落迁至扶风、天水界，冉駹氐人也随之北迁，其地后为吐谷浑人所占。自唐宋以来，居于汶山郡故地的居民主要是羌人，而不是汉代的冉駹氐人了。至于羌族，在东周以前，大致分布在我国西北地区，战国时居于青海境内湟水与黄河之间的地方。秦献公时，河湟羌人分为南北两大支，南支迁往青海南部积石山一带，与河湟之羌隔绝。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兵不西行”，羌人乃“得以繁息”。西汉时，羌人已发展到陇西、金城、安定等郡。到了东汉，羌人已进入中原地区，及魏晋南北朝时，陇右南安烧当种羌的一支姚氏强盛起来，后灭前秦，于长安建立后秦，立国三十二年，至公元417年被刘裕所灭。接着宕昌羌与邓至羌又兴盛起来，他们与南北各朝时有交往，而与其西的吐谷浑和其东的仇池氐人相峙并立，直至北周，历时百四十年而灭亡。魏晋南北朝时，在西方的吐谷浑日益强大，立国长达三百五十年之久，绵亘于青海、四川西北及甘肃南部，占据了原来羌人之地，广袤四千余里。隋唐时期，青海南部的白兰、舂桑、迷桑等羌，相继为吐蕃

所灭。隋炀帝大破吐谷浑，其首领伏允“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唐初以后，因为吐蕃强盛，向东逼进，吐谷浑及其西南的党项皆受到威胁，党项的许多部落向东迁徙。吐谷浑北迁后党项东迁至吐谷浑故地，到达松州附近一带。唐松州都督府之羁縻州共104州，皆羌人之地。太宗之后，吐蕃东侵，扩地甚广。吐谷浑为吐蕃所灭。河西陇右州县皆陷吐蕃。在这些地区的党项羌与藏族逐渐混合。四川西北地区的羌人遂为藏族所约属。至宋代，命松潘及茂县一带的羌人首领为节度使，团练使，并设祺、亨二州以羁縻之。他们对宋时向时背，元、明、清各王朝统治者有鉴于此均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文章还论述了古代羌族社会经济情况及与汉族的关系。文内并附有蒙文通先生的按语。本文引用资料丰富，论证缜密，为全面了解氐羌族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434 乞伏氏出于高车补证 陈仲安

（《文史》1985年第25辑）

本文对唐长儒先生在1954年发表的《魏晋杂胡考》一文中，关于西秦乞伏氏源出高车的论断表示同意，并又补充了一些证据，对其何以被称为鲜卑作了推论。作者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论证了当西秦的先世由漠北迁居大阴山之南时，是由乞伏、斯引、出连、叱卢四个部落组成的联盟，而以乞伏部落之帅如弗为盟主。这便是后来西秦国的前身。这四个部落中，乞伏、叱卢两部，即属于《北史·高车传》中高车族十二姓中之二姓。其他二部也有痕迹可寻。斯引部即《高车传》十二姓中的俟分氏；出连为“乞袁”之音转。故二者均可能为高车姓。又在西秦政权中任显赫职位者有三个姓翟，而翟为丁零大姓，丁零为高车之同族，亦证明西秦与高车有密切关系。作者还从西秦建国过程中与鲜卑部落进行频繁激烈的军事斗争，夺取鲜卑的地盘，来间接地反证乞伏原本不是鲜卑族。但自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以后，各史书都称乞伏氏为鲜卑，盖由于乞伏氏南迁以后经长期演化，在其生活、语言、风俗等方面已经同化于鲜卑，故在刘宋以后，逐渐把他们视为鲜卑族了。当汉末魏晋之际，有许多鲜卑族部落迁居至陇右、河西地区。乞伏氏与鲜卑部落的斗争中，夺取了他们的地盘，合并了他们的部众，遂逐渐接受他们的影响，经过几代人的演变，抛弃了高车人的习俗。又乞伏氏曾受过鲜卑秃发氏的统治，也促进了高车族的鲜卑化。

435 汉代卢水胡的族名与居地问题 王宗维

（《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

卢水胡是我国西北地区古老民族之一，它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较大影响。本文对卢水胡的族源、族名、发源地和汉代卢水胡的分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东汉、北魏、刘宋等朝代，都曾多次发生过卢水胡起义。十六国时期，张掖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建立过北凉政权。对卢水胡民族历史的研究，有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史学界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卢水胡的族源是小月氏，族名源于卢水。对卢水的看法也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湟水水系的卢溪水，又称卢川、卢水；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张掖的黑河，“水黑曰卢”，故曰卢水。即一种主张卢水在青海湟中，一种主

张在甘肃张掖。第二种观点认为卢水胡是杂胡，其主要成分是匈奴；卢水胡的发源地就在张掖弱水，即黑河。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本文引用了居延汉简、《后汉书》、《三国志》等史料中有关卢水胡的记载，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点结论：一、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张掖属国的卢水胡；二、河西卢水胡势力较大，曾在汉至魏初两次发动大起义；三、湟中见卢水胡较晚，而且不久就被称为"杂胡"。由此可见，河西是卢水胡的本部和根据地。关于卢水胡的族源问题，本文根据史籍记载，考察了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和民族迁徙情况，认为既不源于匈奴，也不源于小月氏。因为匈奴各部落分布的地区最西仅及汉觻得县（今张掖县）。小月氏人在西汉统治河西时不在张掖郡，也未进入湟中，因而他们和属国卢水胡不可能有承袭关系。对卢水胡的族名来自卢水的说法，本文也进行了考证。认为卢溪水名称的出现晚于卢水胡名出现数百年，西汉时湟水流域为羌人所居，而卢水胡是胡，不是羌。张掖有黑河之名，为时更晚，故以后期命名的黑河来解释西汉时的卢水胡是不妥当的。西汉时卢水胡的居住地应在姑藏境内的谷水上游。古代"谷""卢"同音，卢水就是谷水，也即狐奴河。此河的名称也很可能是因狐奴部落居此而得名。后因匈奴休屠部势力强大，卢水胡臣服匈奴，首领任匈奴左沮渠官，部落向西迁到张掖、武威交界处的显美（今永昌县）地方。到东汉初年，王莽派人抢夺羌人所占青海湖周围的土地，激起羌民反抗，并由湟水东下，占领金城郡治所允吾，使青海湖以西以北地区一时空虚。于是显美的卢水胡便分出一支，越过南山，向青海湖以北方向发展，进入湟中地区。到东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显美卢水胡反叛，遭到邓训镇压。魏黄初初年，又受到张既的讨伐，遭到惨败，损失万人以上，残众便离开显美，逃入南山，直到沮渠蒙逊的祖父辈才出山为官。说明这个部落恢复元气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本文还考证了匈奴沮渠官的情况，进一步论证了卢水胡不是匈奴。

436　关于卢水胡的族源及迁移　　赵永复

（《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我国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即为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从汉代到南北朝，活跃在这里的卢水胡便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在十六国后期，居住在河西的卢水胡沮渠蒙逊曾建立北凉政权，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对这一古老民族的族源，论者意见不一，有谓与小月氏有关，有谓源于匈奴，也有谓为杂胡。至于它的迁移，一般认为是由河西向四周扩散的。本文对上述诸说持怀疑态度，并根据史籍文献记载，对卢水的位置、卢水胡的分布、族源、迁移和民族特性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和论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首先论证了卢水胡原居湟中卢溪水、张掖黑河、武威谷水（今石羊河）诸说之误。接着论述了河西、湟中、蜀西北、陇右和陇东、陕北等地卢水胡在历史上的分布情况。由此可以看出，河西卢水胡见于记载虽最早，但主要集中在张掖一带，且受属国统领。陇东、陕北卢水胡见于记载虽较晚，但活动频繁，分布面广，西起今甘肃平凉、镇原，东到陕西黄河西岸，南至关中平原北缘，北达榆林一带，都有其踪迹。而陇右、湟中、蜀西北等地，卢水胡呈点状分布，并未连成一片。因此作者认为，卢水即今平凉泾河北岸支流的大路河与小路河，故卢水胡的原居地当为陇东陕北。河西的卢水胡即由此迁入，然后

由河西再迁入湟中以至蜀西北。对居延汉简记载的"属国秦胡卢水"中的秦胡，学术界亦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秦和胡，有的认为是秦时、秦地之胡。经作者考证，认为秦胡是战国时秦的传统地域内或其附近之胡，是某些少数民族的总称，卢水胡也属于秦胡。属国则是主管少数民族的机构。史籍中北地卢水胡则是聚居于秦北地郡（今甘肃庆阳西南）的卢水胡，与卢水胡是秦胡的概念基本相同。至于史籍中所记"黄石"一名，也是地名，在今宁夏固原东南，原属秦境，也是卢水胡的聚居地。关于卢水胡的族源，许多学者根据《晋书·沮渠蒙逊载记》、《宋书·氐胡传》的记载，沮渠氏祖先曾任左、右沮渠或大沮渠，而匈奴有此官职，故认为沮渠氏的祖先为匈奴或曾役属于匈奴。本文则认为，这些官职其他民族也有。卢水胡的族源并非匈奴，而是源于春秋战国时居于秦北地郡的义渠族。据《后汉书·西羌传》记，春秋末期，聚居于今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和陕北一带的少数民族中，以义渠、大荔最强。到战国初，秦厉公灭大荔，唯余义渠，与秦对立相争达170多年，至秦昭王35年（公元前272年）才消灭义渠。此后义渠成为秦人的一部分，一部分融合于汉族，还有一部分保留着本民族特性。他们与氐、羌人相近，应属氐羌语系。卢水胡则是义渠部落集团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部族。至于卢水胡迁移到河西，大致在西汉末年以后。卢水胡的特性为：多分布于山区，从事"畜牧田作"，分为许多种属，各有酋长，不相统一，有很高的文化，这是长期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本文引用史料丰富，论述周详，为研究丝绸之路民族情况的重要资料。

437 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的研究 王尧 陈践

——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探索

（《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

P·T·1083、1085号敦煌写卷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P.指伯希和劫走者，T.代表藏文写卷，1083、1085为顺序号），录文收于1980年巴黎版《敦煌藏文文献选》第二辑，属社会经济文书。作者对两文书记载进行了考释，从而使我们得以了解吐蕃陷敦煌后的政治设施及民族关系等问题。1083卷，藏文横书，为当时敦煌流行书法，下有大将军敕令之印，字样作扦翅飞狗图案。内容如下：

亥年春，大论于陇州军帐会议上用印颁发之告牒：

兹据唐人二部落使禀称：此前，沙州汉户女子每为吐蕃、孙波（部落）及个别尚论以婚配为名，抄掠而去，（实则）多佣为奴婢。凡，已属赞普之子民均已向上峰呈报，不得随意抄掠，应如通颊之子女，不予别部婚配，而允于部落内部婚配。云云，等因准此，（迩后）不准无耻之辈持印牌前来择配，而允其自行择偶。

告牒如上，用印发出。

1085卷，藏文横书，为敦煌文献习用的正楷，下有亨迦宫敕令之印，图案为扦翅飞鸟，内容如下：

辰年冬十一月上旬，亨迦宫用印颁发之告牒，

令下沙州节儿：

据沙州二唐人部落之民遮禀称：沙州每年定期向宫廷及大行军衙交纳年贡礼品"冬

梨”一次，王廷虽已拥有果园多处，但仍要增加（年贡）。以往，蒙圣神王臣之恩典，我等蛮貊边鄙之民户，每户修筑一座果园，且从未交纳年贡礼品及岁赋。（如今）节儿长官等经常不断欺压掠夺乃至霸占（果园）。为今后不再发生掠夺、侵占民庶园事，恳求颁布一严厉诏令，并赐以印告牒云云，等因准此。

大尚论以下论恐热，论腊藏悉通均用印并按指印颁发如上。

公元八世纪八十年代，吐蕃陷敦煌（沙州）后，吐蕃人遂拥有整个河西走廊。吐蕃统治者按其固有的制度和习惯来改造新占领区，将汉户编成“唐人部落”，开始可能只有两个，故1083和1085卷中称“沙州唐人二部落”、“沙州二唐人部落”。后部落陆续增加。当时见于文书的沙州唐人部落名称有擘三、上、下、丝绵、行人、阿骨萨（纥骨斯、纥骨萨）、悉东萨、宁宗、撩笼等。部落之下，分为若干“将”，将设将头。部落所属每户均立有户口手实。在一些敦煌汉文写卷中，以东岱（千户）来对译部落，以千夫长对译部落使。在有些卷子中，也把万户对译为部落。在当时，编为部落的措施受到若干汉户的欢迎。但吐蕃、孙波军人继续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汉户，为所欲为，制造紊乱。这正是1083卷和1085卷产生的历史背景。在收复沙州的年代上，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是在八四八年。而沙州陷蕃的年代，主要有三种说法，七八一年、七八五年和七八七年，现在以为七八七年之说较为可信，用来解释藏文卷子时间较贴切。敦煌被占后第一个午年即七九〇年，始编汉户部落，如此，1083卷中的亥年可能是七九五或八〇七年；1085卷中的辰年可能是七八八或八〇〇年。1083卷及其它户口手实证实当时客观存在的几种婚姻形式：同部落娶嫁、本将娶嫁、别部落娶嫁。1083卷在申诉中要求本部落择配，实质上是反对“吐蕃、孙波”和“某些尚论”以婚配为籍口强迫佣为奴婢的不平等待遇。吐蕃、孙波，是指吐蕃本部嫡系部队。吐蕃，在藏文古文献中有“农业人口”的含义，悉补野家族以农业部落统驭全藏，逐渐以这名称为整个“部落联盟”的称谓。孙波，又作苏毗，本为今拉萨以北地区的部落，为吐蕃吞并，在吐蕃享有某种特权。通颊，是吐蕃在沙州及于阗一线唐人地区新设的专门管理汉户的机构名称，相当于千户。亨迦宫，又作登迦宫，吐蕃王廷宫殿之一。1085卷中亨迦宫，似为吐蕃王廷处理公务的办事机构，加盖其印铃，表示特殊作用。节儿，藏文意为一寨之主，相当于一州之节度使。将军，是吐蕃在公元七——九世纪在敦煌一带设立的政府机构名称，译为“军镇会议”。1083和1085卷，都盖有殊红钤印，不仅是驿传的标志，也表明发文机关级别的差异和权威性。至于1085卷中的“论恐热”和《资治通鉴》会昌二年（843年）所记“论恐热”，恐非一人。

348　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　　汤开建　马明达

（《敦煌学辑刊》1983年创刊号）

历史上的河西地区，是多民族纷争之地，民族问题极呈复杂，演至五代宋初、益见纷乱。

“安史之乱”后，河西先后被吐蕃统治。唐宣宗大中以后，虽建立起由张义潮领导的、以汉族为主的沙州归义军政权，但经吐蕃统治七十年，除沙州“人物风化，一同

内地”外，河西地区的绝大部分汉人已经吐蕃化了。这是汉族人民融合于少数民族的一个典型例证。如以“嗢末”自号的部落，就是汉人沦为吐蕃豪室的奴隶，乘吐蕃内乱，“奴多无主”而啸合到一起的一个部落，居然成为河西西部六支少数民族的势力之一。

大中以后，瓜沙二州重为汉人控制，但“四面六蕃围”。六蕃之一，就有回鹘。回鹘势力在张义潮时期就开始向瓜沙州渗透，多次进犯归义军。特别是甘州回鹘，兵强马壮，最后打败“金山国”，张承奉被迫尊甘州可汗为“父大王”“天可汗”，于是，回鹘对瓜沙州的渗透益以加深，出现了“回鹘化”趋势。但当时沙州并不隶属甘州回鹘，仍是独立政权，直到天圣六年，西夏赵元昊破甘州，甘州回鹘西撤者多入瓜、沙州，瓜州王以千骑降于夏，沙州回鹘政权才正式出现，并一直延续到金太宗时还有使者向中原王朝进贡。

地处甘、沙之间的肃州，与甘州回鹘是何关系？有人认为肃州是回鹘人居住地方。作者认为，从史料看，肃州是突厥系的龙族人，回鹘人似乎从未在肃州居住过。唐代末期，回鹘与龙族先后在甘州，肃州分别建立了自已的政权。五代时期，这两个政权相安无争，各自为政，都与中原王朝保持一定联系。辽、宋时期，为了对付瓜、沙政权，甘、肃联合，肃州龙族承认甘州回鹘的领导，成为甘州回鹘的属部。但从元昊破甘州，甘州回鹘未去肃州，从退至西州及瓜沙和祁连山的情况看，肃州龙族隶属于甘州回鹘后，仍保持着本民族的独立性。

吐蕃自唐代宗广德以后攻占河陇，大批吐蕃部落迁入。吐蕃王朝崩溃后，这些部落仍然分散留居，而河西西部东至玉门关、西至瓜沙，仍是河西地区吐蕃集中居住地及牙帐所在地。入晋汉后，这一地区的吐蕃部落，又大规模集结于凉州，以凉州为中心，积极开展政治、经济活动，与瓜沙州曹氏、肃州龙族、甘州回鹘分段控制河西走廊，并列共存几十年，基本和睦共处，为五代宋初中西交通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439　河西回鹘略论　　　林　干

（《社会科学》“甘肃”1981年第3期）

本文论述了回鹘的西迁；西迁后的分布及其统治范围；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以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与党项(西夏)的斗争及其政权的覆灭。回鹘为我国古代游牧民族之一，它兴起于公元八世纪中叶，在以漠北的乌德鞬山为中心，建立起庞大的回鹘政权。公元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鹘为黠戛斯所破，诸部逃散，有一支南下，有一支西迁。西迁的一支中，有一部分迁至葱岭以西，有一部分迁至西州，有一部分则迁至吐蕃。所谓吐蕃，并非吐蕃本土，乃指当时被吐蕃控制下的河西走廊。这次西迁河西的回鹘人由谁率领，新旧《唐书》所论颇为模糊，而《新唐书》前后亦不一致。大体有三说：一是庞特勤率众迁至葛逻禄（在今葱岭以西）；二是庞特勤在安西（今新疆东部）称可汗；三是庞特勤在甘州（今河西走廊）称可汗。因无更多资料参证，尚难确断迁至河西走廊的回鹘人是否以庞特勤为首。迁到河西走廊的回鹘人牙帐设在甘州（今甘肃张掖），故通称这部分回鹘人为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河西回鹘的分布很广，在九至十世纪期间，以甘州为中心，西至肃州（今酒泉县）、瓜州（今安西县）、沙州（今敦煌县），东南至凉

州（今武威县）、兰州（今兰州市）、秦州（今天水市），东北至贺兰山（在今宁夏境），西北至合罗川(今额济纳河)，都有回鹘人居住。在上述回鹘人分布的地区，大概在一定程度上都建立起回鹘的统治。但河西回鹘政权统治下的疆域，较之回鹘人分布的地区略小。大抵东起黄河，西迄瓜、沙，南临祁连（山），北瞰大漠，都是其所管辖的范围。回鹘原是游牧民族，西迁河西后，自然仍以畜牧业为主，但因受汉人经济文化的影响，逐渐学会农耕或转向半农半牧。同时，河西回鹘，特别是处于中心区的甘州回鹘，因地处中西交通要冲，不仅与中原、西域贸易频繁，甚至与西方的波斯、天竺（古印度）、大秦（罗马）都曾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商业交往。河西回鹘在十世纪以后，大概已进入封建社会。史载，甘州和合罗州等地的回鹘，各分成好几个部落，均有"君长"为封建领主，领主在其领地内有管辖"族帐"的权力。其官制，在西迁后，除仍有宰相、都督外，还出现左温、枢密使等官名。而其饮食起居，也随着由游牧经济转向半农半牧、趋向于定居。其风俗习惯，国相拜见可汗时，依礼须脱帽、披发然后入。女子梳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帽裹之，出嫁后则加毡帽。宗教信仰，以摩尼教为主。十一世纪初盛行佛教。河西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都很密切，经常遣史朝贡，并接受五代各王朝的册封和回赠，还经常以"朝贡"的名义和方式，进行贸易活动。从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中原除宋、辽王朝对峙外，在河西回鹘之东党项族兴起，到公元1038年，以李元昊为首，建立"西夏"政权，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在李继迁统治时期，征服了贺兰山以西、陇山内外及黄河以东各族"蕃户"（包括回鹘人）后，从公元1001年开始，把进攻矛头指向甘州回鹘和吐蕃地区。宋大中祥符年间，回鹘与党项先后发生了五次较大战斗，党项均败北。自1016年（大中祥符九年）后的十余年间，回鹘与党项仍时有战争。最后于宋仁宋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德明二十六年），甘州城被党项元昊领兵袭破，甘州回鹘政权亡。随后元昊续攻凉州及瓜、沙肃三州，至景祐二年（1035年）河西回鹘全被征服。河西回鹘与党项的斗争，为时达三十余年(1001—1035)。从840年西迁至甘州陷落，政权存在将近200年，共传十可汗。

440　关于甘州回鹘史中的几个问题　　　李　萍

（《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本文对甘州回鹘的渊源、世系和统治疆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甘州回鹘的渊源问题，史学界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公元840年回鹘庞特勤西奔为始；有的认为是公元七世纪后期东突厥兴起、漠北回鹘迁徙于甘、凉一带为始。还有的认为公元一世纪时，漠北的丁零人定居于甘、凉一带为始。文章对这些观点提出异议，并引用《史记》、《魏书》、《北史》等史籍的有关记载，论述了战国秦汉时的丁零人和隋唐时的回纥族并非同一族的问题。丁零长期隶属于匈奴，匈奴衰亡后，原驻牧地被丁零、鲜卑、柔然等民族所占领。到汉末魏晋时期，当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南迁时，也有一部分丁零人南下入居中原。各族入居中原后，有的发展壮大，有的被融合同化，丁零则属于后者。另外，回纥是铁勒的一支。铁勒共有六氏、十二姓，其中只有袁纥是回鹘的嫡系祖先。因此，铁勒和回纥不能相提并论，丁零与回纥也不能等同，把一世纪丁零人迁往河西定为甘州回

鹘之始是站不住脚的。文章根据《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的记载，认为回鹘人在河西的活动自唐代开始，即公元七世纪至八世纪初。尤以武则天时（公元684—704年），东突厥复兴时迁往河西的回鹘部落较为真实可信。关于甘州回鹘的世系问题，对庞特勤是否为甘州回鹘政权的第一世可汗，文献记载颇为模糊，同一书中也前后矛盾。作者认为，公元842年时，吐蕃已占领河西陇右，把回鹘人驱散各地，到850年，张议潮即收复甘州，被唐朝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而庞特勤称可汗受到唐朝册封是857年事，提出庞特勤是甘州回鹘第一世可汗的看法应重新考虑。庞特勤是率领西迁部众进入新疆地区后在安西称可汗的。文章还对禄胜是甘州回鹘的第六世可汗和夜落隔通顺是最后一代可汗的看法，进行了考证，认为禄胜是西州回鹘可汗；夜落隔通顺不是最后一代可汗，因其后还有一代可汗叫宝国夜落隔。关于甘州回鹘的疆域问题，历来认为是统治了整个河西走廊。文章考查了有关史书记载，认为回鹘被吐蕃驱散后，分布地区很广，情况复杂。张议潮赶走吐蕃后，和凉州的吐蕃嗢末部经过反复斗争，才占领了凉州。但为时不久，凉州即脱离归义军政权而独立。凉州有回鹘人驻牧，但不受甘州回鹘政权的控制，而是在吐蕃六谷部和者龙部的控制之下。直到西夏攻取了凉州，对甘州造成很大威协时，甘州回鹘才夺取了凉州。据史书记载，甘、沙州为张、曹两家所统治，与甘州回鹘政权并列。可见当时河西至少存在着三个政权，甘州回鹘是较强的一个。

441　甘州回鹘世系考　　　　高自厚

（《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清末以来，研究甘州回鹘历史的著作较多，其重要者均涉及甘州回鹘的世系问题，并用不同方式排列了甘州回鹘世系表，而以冯家升教授等三人合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第三章第二节所排之表最为清楚和完整。本文即以这个世系表为主，对甘州回鹘世系的姓名、年代、世系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补证。在姓名方面，作者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宋史》、《宋会要辑稿》》等有关史料的记载和突厥文、古回鹘文、现代维吾尔文的拼音方法作了考证，认为回鹘第一代怀远可汗庞特勤，应为"已庞历特勤"，可简称庞特勤。突厥碑文"勒"是"勤"之误，"特勤"是官号，不是姓名。表列第三的仁裕，注解为"本名"'狄银'，是狄银（卒）阿咄欲的简称"，也是不对的。因"狄银"是"特勤"之异译，也是官号，仁裕本名阿咄欲，仁裕是汉名。表中所列"夜落纥"、"夜落隔"都是部落名称，亦即姓氏，而非人名。表中的"夜落纥密礼遏"、"夜落隔归化"、"夜落隔通顺"，才是全名。即夜落纥、夜落隔为姓氏，密礼遏、归化、通顺为人名。对史料中年代记载矛盾之处，作者进行了考证，认为已庞历称可汗在唐大中元年(847年)底到大中二年（848年)初，止于大中初年以后。仁美的在位年代为924年前，即后唐同光二年前。仁裕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年）继位，至显德六年（959年）卒。对夜落隔、夜落隔归化，夜落隔通顺等的在位年代，都作了与表列不同的确定。关于回鹘的世系，作者根据《宋史》和《宋会要辑稿》的有关记载，认为表中所列夜落纥和夜落隔并非二人，实为一人。因二者都是姓氏，并非真名。"纥"和"隔"

是同音的异译。表中如列为二人，在年代上就出现了矛盾；看作一人，矛盾即迎刃而解。经过详细考证，甘州回鹘的世系就只有九世，而不是十世。根据考证结果，作者又重新排列了一个“甘州回鹘世系表”。本文论证严密，考证周详，实为研究回鹘历史的新成果。

442　甘州回鹘余部的迁徙及与西州回鹘之关系　　　汤开建

（《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赵元昊率领的西夏军攻占甘州后，以甘州为牙帐的回鹘政权宣告结束。其余部的下落问题，学术界的权威说法是投降了居于湟水流域的角厮罗政权，尔后向西北方向迁移，逐渐独立而称“黄头回纥”。本文批判了这一“张冠李戴”的传统观点，认为在青唐吐蕃政权属下，投奔唃厮罗的数万回纥种人是属于凉州的回鹘部落，是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八月之前，与厮铎督同降唃罗的，厮铎督是继潘罗支之后的西凉六谷大首领。而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之前，甘州回鹘还在鼎盛之时。另外，作者还从河湟与甘凉的地理位置，以及由东向西推进的西夏军事形势，肯定甘州回鹘余部末降唃厮罗，降者乃是服属于潘罗支、厮铎督的凉州回鹘。至于“黄头回纥”的来源，作者分析了有关史料后指出，“黄头回纥”是于阗以西诸国对“回纥”的另称。十一世纪，在于阗的东面，吐蕃的西北面均为西州回鹘境，而位于于阗东面的“黄头回纥”，就只能是西州回鹘。西夏占领甘州之后，即调转兵锋，南指河湟。甘州回鹘余部从明道元年（1032年）到景祐三年(1036年)这四年中，大举西迁进入瓜沙，与当地回鹘人合力推翻汉人曹氏政权，重建以沙州为中心的回鹘政权，但不久又为西夏军所摧毁，而原甘州回鹘除留一部分在沙州外，其余又继续西迁，由敦煌出玉门关经哈密到达西州与西州回鹘汇合。甘州回鹘余部之一支，还沿黑水北行，进入今之额济纳旗一带，过着游牧生活。作者通过对《长编纪事本末》、《宋会要辑稿》、《西夏书事》、《宋史·回鹘传》等史籍有关记载的分析阐明了以上观点。这两支迁徙的甘州回鹘余部，给西州回鹘带来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西州回鹘的可汗继承人发生了变化；二是西州回鹘的边境发生了变化。宋仁宗之前，尽管高昌、龟兹都称西州回鹘，但实质上是两个回鹘政权。然而，在甘州回鹘余部进入西州后，却成功的完成了一次政变，由原甘州回鹘的毕勒哥登上西州回鹘的汗王。《辽史·天祚帝纪》载：“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西行。先遣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旱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由此可证，毕勒哥原是甘州回鹘可汗这一支系人，为乌母主的后裔。至于西州回鹘的疆界，在甘州回鹘余部进入后，不仅将高昌、龟兹统一于一的回鹘政权，而且使东部疆界沿着河西走廊的南北向东延伸。据《长编纪事本末》、《元史》的记载，西州回鹘东境已越过伊州，而与“酒泉郡”南接，原北徙额济纳旗一带的甘州回鹘也已归附，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回鹘政权，在西方人和蒙古人的称呼中即高昌亦都护畏吾儿王国。

443　党项在中原与亚洲内陆关系中的作用　　〔美〕陆宽田著　乐赛月译

（《民族译丛》1981年第5期）

本文论述了党项族在中原与亚洲内陆关系中的作用，特别是在丝绸之路中的控制作用。从北朝以来，党项一直居住在中国的西北边疆。八世纪中叶，吐蕃帝国把他们从四川西部地区赶到甘肃黄河北面的大河套地区。当唐朝黄巢起义时(公元874至884年)，党项与回鹘曾帮助唐朝打败了起义军，党项首领拓拔思恭被唐朝封为河西地区的节度使，并赐姓李氏，封为夏国公。由此党项即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发挥作用达四个世纪。至公元939年以后，党项为扩展势力，对通过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实行侵略政策。宋朝建国后，党项曾与北汉国交战。公元984年，党项国王李继捧表示效忠宋朝并把全部领土献给宋朝。但不久，他的族弟李继迁宣布他是党项新统治者，开始对宋朝作战，扩展了领土，建立了西夏帝国。这对宋朝、契丹、回鹘、东藏各部都起了重大的影响，作者简要论述了从公元984年至1044年期间西夏与宋朝、契丹、回鹘、东藏的关系，特别是西夏控制丝绸之路，阻断宋朝与回鹘贸易联系的情况，以及西夏王李继迁、李德明和李元昊的主要事迹，直至公元1044年西夏同宋朝签订和平条约，开始了20年的休战状态。

444　以敦煌为中心的诸民族之动态　　〔日〕梅村坦著　陈俊谋译

（《民族译丛》1982年第5．6期）

本文论述了从西汉至元代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地区诸民族之动态，介绍了这一地区的政权更迭、政治形势和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及斗争情况。文章首先概述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就是各种民族杂居之地，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从长安至西域，伊吾、高昌、鄯善是其门户，而敦煌则是“咽喉之地”。西汉时，在张掖、酒泉、敦煌、武威设置了河西四郡，成为汉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根据地。据《后汉书》记载，当时张掖有8,8731人，酒泉有76,726人，武威有76,419人、敦煌人口最少，只有38,335人。至五胡十六国时代，河西成为各族竞争之地，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等政权都先后统治了敦煌。在前秦苻坚末年，徙汉族两万户至敦煌，增强了自汉代以来敦煌的汉人社会。吕光在武威建立后凉时期，曾将武威、张掖以东的数千户迁置敦煌、晋昌。敦煌太守李暠建立的西凉，可以说是敦煌汉人的独立。公元439年，结束了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北魏，统一了河西，使丝绸之路得以畅通繁荣。从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开凿即可窥其一斑。这些石窟的营造是随着佛教的东传，在十六国时从中亚，经敦煌、河西走廊然后扩大到中原一带。敦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丝绸之路的要冲，莫高窟则是由内外各族商人和各种权力、各种势力共同维持建造的。文章论述了粟特、藏系诸族、回鹘、蒙古等民族在中亚附近和在河西地区的动向，以及他们对敦煌所起的作用。并根据敦煌文书、碑铭、塑像、壁画等史书文献的记载，论述了吐蕃、回鹘和蒙古等族对河西及敦煌的统治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情况。八世纪末期，吐蕃统治了河西和敦煌，但敦煌仍以传统的汉人社会为主。至九世纪中叶，吐蕃对敦煌的统治开始

动摇，汉人士豪张议潮，征服了吐蕃、回鹘、吐谷浑，在敦煌建立了独立政权，成为唐朝的归义军节度使。十世纪初，张氏政权由曹议金所取代，并与甘州回鹘和于阗建立了密切关系，互相通婚，共同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还经常互派使节一起向中原各王朝进贡。十一世纪末，敦煌及河西被党项族的西夏所统治。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崛起，征服了西夏，统治了河西和中西亚，后半期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元朝。文章通过对元代在莫高窟建造的《莫高窟造像记》和《重修皇庆寺记》两碑碑铭的考证，研究了敦煌当时的面貌、碑铭中的人名和有关的官衔，表现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和蒙古王室统治河西的真实情况。

445　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与分布　　　　周伟洲

（《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第1期）

自魏晋十六国以来，居住在今蒙古草原及东北一带的鲜卑民族，一批又一批的向内迁徙，规模之大，路途之遥，在我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而且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先后在北方建立了代、前燕、西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吐谷浑等八个政权，是五胡之中建立政权最多的一个民族。本文主要是研究鲜卑族向西北地区（即今陕、甘、宁、青、新地区）的迁徙及分布。因为魏晋以来，内迁西北地区的鲜卑族部落繁多，分布很广，势力强大，除著名的慕容（吐谷浑）、段氏、拓拔、秃发、乞伏等外，还有不同种类的部落。他们东起陕西潼关，西至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南到四川西北，北至河套一带，几乎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随着北魏、柔然和吐谷浑政权势力向西北扩展，新疆东部的伊吾、高昌、鄯善、焉耆、婼羌、于阗等地，也成了鲜卑族人统治的地区之一。在这些鲜卑族部落中，以乞伏、秃发、吐谷浑势力最强，曾在今西北地区建立了西秦、南凉和吐谷浑三个政权，对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对丝绸之路的繁盛，有过重大贡献。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西北地区分为四部分，即陕西关中地区，关中以北六盘山、陇山以东地区，陇西地区和河西地区。对每一地区内鲜卑种族族名、驻地分布、迁徙时间、路线等，都详为考订。最后还附有“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迁徙及分布表”，对了解西北地区鲜卑族名称、分布等情，极为便当，对研究丝路之上民族问题可资参考。

446　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　　　　周伟洲

（《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吐谷浑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民族。本文根据《晋书》、《宋书》、《魏书》、《三国志·魏志》等史籍的有关记载，考证了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等问题。吐谷浑是慕容廆的庶长兄，他的父亲叫涉归。他的祖先最早是从东胡鲜卑中分出来的一支，秦汉之际住在今内蒙东部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的鲜卑山。东汉桓帝时为檀石槐部落军事大联盟之一部，住在右北平（今河北平泉）以西至上谷（今河北怀来)一带。曹魏初年，慕容廆的曾祖莫护跋由右北平西至上谷一带，向东迁至辽西。至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莫护跋跟晋宣帝（司马懿）伐公孙渊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始迁于辽水

西昌黎郡的棘城（今辽宁锦州附近）之北。到慕容廆的父亲涉归时，于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又迁到辽东北（今辽宁彰武、铁岭一带）。晋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又从辽东北迁回到辽水之西昌黎郡徒河青山（今辽宁义县),元康四年（294年)又从徒河南迁回棘城。涉归生前，给他的庶子吐谷浑分部众一千七百户。涉归死后，嫡子慕容廆嗣位统领部众。由于吐谷浑与慕容廆两个部落因马群争斗，发生纠纷，吐谷浑遂从辽东迁出。涉归死于晋太康四年（283年），故吐谷浑的迁出当在太康四年至十年之间 。吐谷浑迁徙的原因，表面上是因为两个部落的马斗，实际上却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当时慕容部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部落联盟，在涉归去世前后，在慕容部西北游牧的有宇文鲜卑，在东南有段氏鲜卑。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三个部属之间经常发生争夺人口、牲畜和牧场的激烈斗争。当时慕容部还较弱小，占有的牲畜、牧场十分有限。吐谷浑与慕容廆二部之间的马斗，正反映了因牧场狭小而引起的深刻矛盾。这是吐谷浑率部远徙的根本原因。吐谷浑离开辽东，向西迁到今内蒙河套北的阴山山脉，在那里游牧了二十多年后，当西晋永嘉之乱时，于永嘉六年（312年）左右，又向西南迁徙，越过陕西陇山，向西到了枹罕（今甘肃临夏附近）西北的罕拜原，不久又向南和向西扩展。据《晋书》记载吐谷浑死后，“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作者认为此句有脱讹。因西零即今青海西宁一带，而甘松在枹罕东南之甘松岭一带，并不在“西零已西”。白兰在西零、甘松之西，即今青海柴达木盆地都兰、巴隆一带。如将此句改为“据有西零、甘松、已西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则全句可通，且与其它史籍的记载基本相符。本文还考证了吐谷浑的语言系属、语族、“吐谷浑”的读音和意义、吐谷浑由人名变为姓氏、部落名称和国名的原因，以及吐谷浑被称为“河南”国、“河南王”、“阿赀虏”、“阿贽虏”、“退浑”“吐浑”等的由来，引用资料丰富，论证充分，结论可取，对了解吐谷浑这个民族建国三百五十年的历史发展和变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47　吐谷浑与唐、吐蕃的关系　　胡小鹏

（《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吐谷浑与唐、吐蕃的关系是唐代西北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贞观八年（634年）唐派李靖出兵大破吐谷浑，吐谷浑王伏允自杀，余众投降。有一种观点认为吐谷浑从此分裂为东西二部，文章对此重新做了考订。作者认为贞观九年战争结束后，吐谷浑并没有分裂，唐王朝通过它所扶持的诺曷钵政权统治着吐谷浑。但大多数吐谷浑贵族对唐怀有敌对情绪，想利用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摆脱唐的统治，这使得吐蕃势力乘机介入，唐与吐蕃的斗争围绕吐谷浑而展开。贞观十年松赞干布向唐王朝请婚，唐拒婚后，吐蕃不满，归罪于吐谷浑，愤而出兵。这是蕃、浑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战争发生在吐谷浑南境入吐蕃大道的旁侧乌海（今冬给措纳湖）河源一带。吐谷浑战败，北走青海，当地部落未随诺曷钵政权撤退，降附了吐蕃，吐蕃将其编入乌海东岱(千户)，由当地吐谷浑首领达延莽支统治。所谓吐谷浑分裂两部的真象是贞观十一年蕃、浑交战后，吐谷浑分裂为乌海以南臣服吐蕃的部分，和为唐藩属的诺曷钵政权。第二年，在吐蕃的强大威力下，唐指

望吐谷浑捍御西南已不可能，遂改变政策，继弘化公主出嫁吐谷浑之后，于贞观十五年又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与吐蕃和亲。唐、蕃、浑三方面相互联姻，形成唐初民族关系中罕见的复杂局面。唐利用唐、蕃、浑渐趋稳定的局面，得以腾出力量，东征高丽，西平突厥，特别对西域的经营有深远的影响。吐蕃之所以与吐谷浑联姻，起初是因为吐谷浑是雄踞吐蕃北方的大国。直至唐高宗显庆四年，吐蕃进攻吐谷浑，至龙朔三年吐谷浑战败后，部众分为两部，诺曷钵率少数部落逃往凉州，后又徙往灵州，留在故地的吐谷浑并未瓦解消亡，而是作为吐蕃属国继续存在，但仍拥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吐蕃需要借用它的力量向外发展，所以吐蕃不但保留吐谷浑政权，而且继续与浑联姻。但吐蕃作为宗主国，对吐谷浑的统治是比较严厉的。吐蕃派大臣统兵驻扎青海，吐谷浑的军队听其指挥，境内的城堡要塞由吐蕃直接控制。吐蕃常利用吐谷浑的人力、物力向外扩张，使吐谷浑蒙受了巨大牺牲。长达一百多年的唐蕃战争，消耗瓦解了吐谷浑部落，吐谷浑集团逐渐解体。公元842年，吐蕃内讧，各奴隶主自相残杀，在吐谷浑故地展开混战，吐谷浑部落也被卷入。战后，又爆发了导致吐蕃奴隶制政权崩溃的各族大起义，经过这次动乱，河湟“五千里间，赤地殆尽”，残存的吐谷浑部落也流离失散，不能复聚，分化为各不相统一的若干部落，与吐蕃、回鹘等族杂居。吐谷浑之名从此消失，不复见于史册。

448　从李土司族谱谈到吐谷浑与土族的关系及土族族源问题　　　　李一之

（《西北史地》1981年第2期）

关于青海土族族源问题，学术界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以元朝在今互助地区格日利特率领的驻军为主，融合了原来的霍尔人（吐谷浑人）而形成土族。第二种认为，以历史悠久人数较多的吐谷浑人为主，融合了人数较少的蒙古驻军而形成土族。第三种认为土族源于沙陀突厥，其主要论据是依据民和的《李土司族谱》。本文持第二种观点，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考证。一、对《李土司族谱》和《李英神道碑》等史料分析后指出，一个以拓跋鲜卑为始祖，一个以沙陀朱邪为始祖，牵连到鲜卑、突厥、党项羌三个古代民族，互相矛盾。二、论证了《族谱》中把李思恭与李克用同列为土族的祖先是荒诞无稽的，因这两人不是一个民族。三、根据史料分析了属于鲜卑族慕容部一支的吐谷浑，从徒河之青山（今辽宁义县），于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永嘉时）西迁到青海，建立畜牧经济为主的封建王国，历时三百五十年，于公元663年被吐蕃奴隶主灭亡。吐谷浑王室先迁到凉州，后又迁到灵州（今宁夏灵武），这就是李土司的祖先。四、详述了吐谷浑自亡国后一直到公元1230年西夏时吐谷浑的情况。五、着重考证了《族谱》中称作鼻祖的李克用的世系，说明李克用后嗣已绝，不可能有子孙担任土族土司。六、从民族名称、语言、生活习俗、宗教等方面论述了土族与古代吐谷浑人的相同之处。经过考证，作者认为，土族的族源，是以当地吐谷浑人为主体，融合了元初在威远镇一带蒙古驻军格日利特所部三千人而形成土族。本文引用史料丰富，论证充分严谨，为研究丝绸之路和青海、甘肃土族历史的重要资料。

449　如何正确处理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　　林　干

（《西北史地》1982年第2期）

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这个学术领域，苏联、蒙古的御用学者，摭拾老沙皇时代和日、德帝国主义时代的唾余，鼓吹反动的霸权主义观点，制造了“黄祸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蒙古一贯独立论”等许多谬论。本文根据史籍记载，论述了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批驳了这些谬论，并阐明了正确处理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关系的原则。一、对外蒙古关系的处理：现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原属我国领土的一部分，自清朝康熙以来称为外蒙古。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宣布独立，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承认，直至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鉴订雅尔塔协定后，才于1946年1月5日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故现时研究古代北方民族史时，应以1921年蒙古宣布独立为界限，在此以前属于中国历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在此以后则属于外国史和外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关系问题。二、区分国内民族与国外民族的界限：在我国古代北方地区活动过的少数民族。那些算国内民族，那些则不算？这首先要确定一个国界，凡在界内活动的才能算作国内民族，界外的则否。这个国界应以清朝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国界为准，凡历史上在此疆界范围内活动过的北方少数民族，均属国内民族。三、对国内民族之间关系的处理：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大家庭中，汉族是主体。汉族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它的经济文化始终居于领先的地位。但组成中华民族的各兄弟民族应一律平等，谁都有权建立自己的政权，都有资格入主中原、在政治上当家作主，都可以代表中国成为中央政权，都是正统王朝。历史上出现过的无数次的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战争，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都是国内战争。文章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和历史事实，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充分论证，并对国内民族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民族气节、维护祖国统一与反对分裂割据，以及清朝统一蒙古地区、对噶尔丹等人叛乱的平服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评价。因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流动和迁徙，与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建设有密切关系，故应为丝绸之路研究者所关注。

450　柔然与西域关系述考　　余太山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在蒙古草原兴起的又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从公元402年其首领社仑自建可汗起至555年被突厥破灭，支配蒙古草原达一个半世纪．由于史料缺乏，柔然汗国与西域关系的始末，国内外学者尚无一致意见。本文对此作了全面述考。据《魏书·蠕蠕传》，柔然首领社仑统驭部众之后，日益强盛，“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于是自号丘豆伐可汗”。柔然立国伊始，就从敦煌、张掖以北的王庭不断向河西地区施加压力。它假手唐契、唐和乃至高羔子等傀儡，控制伊吾直至五世纪八十年代末；至迟在五世纪四十年代初，更从伊吾向高昌发展，先后通过阚爽、沮渠无讳兄弟、阚伯周控制该地，把“丝绸之路”东端的两个重要据点掌握在自己手中

柔然向西扩张曾同当时在准噶尔盆地以西活动的乌孙和悦般发生冲突，《魏书·乌孙传》称："乌孙国，居赤谷城，在龟兹西北，去代一万八百里。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日人松田氏对此表示怀疑，曾据《魏书·序记》所载，认为乌孙西迁是因鲜卑或拓拔氏向西扩张而非受柔然侵扰。作者不同意松田之说，认为柔然在社仑可汗时，已有可能自准噶尔盆地向西侵犯乌孙，迫使乌孙西迁，随即又同占领乌孙旧地的悦般"相仇仇"，终于也迫使悦般西迁。柔然与南北道诸国的关系，据《宋书·芮芮传》载："芮芮，一号大檀，又号檀檀，亦匈奴别种，自西路通京师三万余里，僭称大号，部众殷强，岁时遣使诣京师，与中国抗礼；西域诸国：焉耆、鄯善、龟兹、姑墨，东道诸国并役属之"。对此，作者亦否定松田之说。认为早在社仑可汗时代，焉耆、鄯善、龟兹、姑墨等南北道诸国已役属于柔然。其间虽有中断，但至少在公元460年后，再次进入柔然的势力范围。此外，嚈哒、大月氏、高车族都曾役属于柔然。嚈哒，亦称滑国。《梁书·滑国传》载："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魏书·大月氏传》载："大月氏国，都庐监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落城，去弗敌沙二千一百里"。这说明柔然在嚈哒勃兴以前，势力曾扩至索格底亚那和吐火罗斯坦。高车役属于柔然后，固不堪诛求，其中副伏罗部于五世纪中叶叛离柔然，西迁中亚。对此，作者与松田之见解亦不同。结论是五世纪八十年代末高车叛离柔然西迁，柔然的西方经略已濒临破产。事实上到六世纪初，柔然与西域的关系便基本结束。最后国势每况愈下，终于不堪突厥一击，国遂破灭。

451　隋唐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的关系　　吕光天　古清尧

（《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隋唐时期居住于漠北地区的民族有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拔野古、骨利干等，它们都是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民族。隋唐时期的突厥，以阿尔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占据中亚一带，东突厥占据贝加尔湖地区和北蒙古地区。隋文帝为巩固和发展统一事业，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乘东突厥内部统治者矛盾之机，进兵打败沙钵略可汗，使之归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隋末唐初，东突厥由始毕可汗统领，势力强大，曾率领数十万骑围攻隋炀帝于雁门（今山西省代县）。唐朝建立以后，曾因受其侵犯，不得不几次迁都逃避。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乘东突厥内战之机，与薛延陀结盟，派兵打败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东突厥遂告覆亡。薛延陀在唐扶植下崛起于漠北，与唐建立了臣属关系，其首领夷男被唐封为真珠毗伽可汗，迁牙帐于独罗河（今土拉河）南。唐恐薛延陀继续强大，难以制驭，乃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把安置在黄河以南的十多万突厥人，迁到黄河以北至白道川一带，以节制薛延陀势力，加强对漠北诸族的控制。薛延陀亦生疑虑，立即发兵30万南下攻唐，为唐兵打败。夷男死后，其骑兵不断南下扰掠，唐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派兵将其消灭。此时长期驻牧于贝加尔湖西南仙娥河（今色楞格河）与温昆河（今鄂尔浑河)之间的回鹘又崛起，联合反薛延陀诸部助唐攻薛延陀。薛延陀亡后，回鹘乃并有其地，其首领吐迷度自称可汗。由于吐

迷度可汗于贞观二十年归附唐朝，贝加尔湖周围的拔野古、都播、骨利干、多览葛等铁勒十一部首领亦皆来归附。从此唐朝的统治机构从漠南直接设置于漠北各地。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唐朝政府又应各部首领请求，在漠南至贝加尔湖地区开辟“参天至尊道”，沿途设置六十八个馆舍，供给来往“使客”。唐代在贝加尔湖地区各族中设置的行政机构有：一、在贝加尔湖以西叶尼塞河上游剑河（即谦河）流域的黠戛斯设坚昆都督府；二、在贝加尔湖东岸巴尔古津河和鄂嫩河之间拔野古部置幽陵都督府；三、在贝加尔湖沿岸及安加拉河和勒拿河上游一带骨利干部地置玄阙州；四、在贝加尔湖周围及其西北、东北叶尼塞河和勒拿河之间的多览葛部置燕然都督府；五、在土拉河下游的阿跌部设鸡田州。此外，在斛薛、奚结、思结等部中，唐朝政府也设置了州，县等等行政机构进行管辖。唐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各州府的领导，又于公元663年（龙朔三年）将燕然都护府改为瀚海都护府，并将治所从漠南移至漠北的土利河畔的回纥部落中。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又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继续执行着中央政府对各州府的领导职权。作者详细论述了在各行政机构管辖区内各民族的发展过程和社会经济情况，以及与唐朝政府的关系。隋唐时期由于突厥，薛延陀、回鹘、黠戛斯等政权都统一于中原王朝和唐朝政府对统治这些民族行政机构的不断完备，使这些民族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而且对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452　“羯胡”、“柘羯”、“杂种胡”考辨　　黄永年

（《文史》1980年第8辑）

本文对陈寅恪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在记述安史之乱的文献里，有“羯胡”、“柘羯”等名词。陈寅恪根据《大唐西域记》两《唐书》的有关记载，认为文献里的“羯胡”、“柘羯”都是指中亚月氏种昭武九姓胡。当时河朔地区已有很多昭武九姓等中亚胡人，他们是安史武装集团的主力。作者认为这种说法还需商榷。根据文献记载，唐代杂居在河朔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奚、契丹。安史集团中少数民族部队的主力也是奚、契丹。在较原始的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史料中，就不曾提到昭武九姓胡。对这个问题，作者另有专文论证外，本文则对“羯胡”、“柘羯”等名词究应作何解释，进行了详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引证了汉至唐代史籍的有关记载，论证了“羯”这个词的来源与演变。羯是古代的少数民族，源出于中亚月氏，东徙聚居于上党的武乡，先世曾附属匈奴，因而被称为“匈奴别部”。时日既久，“羯”这个词就成为指斥北方少数民族的用语，并由专名而变为泛称。最迟在西晋未年到南北朝以至唐代，“羯”已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在记述安史之乱的文献和杜甫的诗中，提到的“羯胡”、“胡羯”和“羯”，仍旧是对北方少数民族敌忾之称，不是种族的专用名词，不能据以推断安禄山部众多为昭武九姓胡人。“柘羯”这个词在记述安史之乱的文献里见得更少。据《大唐西域记》和《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载，“柘羯”和昭武九姓胡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安国人中勇健而充当战士者之称。这实际上已成为北方少数民族中精骑猛士的泛称，并不专指那个种族。在记述

安史之乱的文献里，还出现过“杂种胡”一词，陈寅恪也认为是昭武九姓胡。本文则认为自晋南北朝以来，“杂入”、“杂户”、“杂夷”、“杂类”、“杂胡”、“杂种”等词在文献里时常其现，多数不是指西域胡，只是若干少数民族的统称。月氏余裔以至昭武九姓胡种姓不一，自可称为“杂种胡”，但“杂种胡”则不一定是月氏余裔昭武九姓胡。这在唐代还是如此。《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还认为唐代河朔地区有多数昭武九姓等中亚胡人，并推测昭武九姓大量东迁到河朔地区有三个原因：“其远因为隋季之丧乱，其中因为东突厥之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本文根据史书文献记载，对这三条原因逐一进行了论证，认为这种说法颇涉附会，难于成立。并指出西域的月氏人擅长经商，哪里富庶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到那里，这和大量迁徙河朔是不同的概念。河朔在唐初已是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地区，昭武九姓胡到这里来经商是很自然的事情。对此史书已有明确记载。本文引用资料丰富、结论明确，可供丝路之上民族问题研究者参考。

453　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　　　　周连宽

（《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丁零是苏联南西北利亚古代的一个种族。当其最盛时，曾占有东起贝加尔湖，西达鄂毕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在汉代已成为匈奴的劲敌。本文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参证近代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发现，对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各民族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文章分汉代及汉以前、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三个时期，对丁零的情况和语言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作出了有力的结论。文章认为丁零在人种的发展历史上经过长远而又复杂的变化过程。当纪元前三千至二千年间，丁零的远古祖先是单一的长头欧洲人种，通用的语言可能属于原始的乌拉尔——阿尔泰语。到纪元前一千二百年至七百年间，大批的中国移民到来，于是在原来的长头欧洲人种中，渗入了蒙古利亚人种的因素，其远祖的语言也受到中国语言的影响。到纪元前七百至二百年间，丁零的蒙古利亚种的特征削弱了，塔格尔期的圆头人已回复到单一的欧洲人种的类型。从加拉苏克期起，丁零人即在崖壁和墓石上刻着各种符号，后来又渗入外来的中国文字符号和卢文符号，他们可能使用这些符号来代表他们的语言。当塔什特克期，丁零因受匈奴的影响，又渗杂了蒙古利亚人种的因素，这种人种的成分已很显著。同时在语言方面也受到匈奴的影响，因而渗杂了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因素。从公元后三至六世纪，丁零又不断被来自东南方的种族如鲜卑、蠕蠕等所侵扰，因而蒙古利亚人种的因素更加严重。当高车盛时，丁零归其役属。蠕蠕和高车相继衰微之后，突厥称雄于漠北。丁零与突厥发祥地相近，二者发展过程也极相类似，但并非同族。当第六世纪上半叶，丁零西南的坚昆向东迁移，在叶尼塞河流域与丁零结成联盟，两族混合为一，形成一种新的人种类型，被称为黠戛斯，即现代叶尼塞吉尔吉斯（哈卡斯）人的祖先。这就是丁零族在人种上发展的整个过程。本文在论证过程中，还考证了与丁零有关的匈奴、突厥、铁勒、高车、蠕蠕等民族的人种与来源，以及他们的活动和变迁情况，认为诸史书所说丁零是匈奴的别种，或高车就是丁零；或丁零就是铁勒；或高车就是铁勒；或丁零就是突厥；或回鹘

就是高车，都是不正确的。指出造成这种混淆的主要原因：一是对音太滥，二是把部族的统治氏族与被统治部落的人种混为一谈，三是把部分当作全体，本文引用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对研究丝绸之路上诸民族的活动和变迁情况有重要参考价值。

454　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传统友谊　　　白寿彝

（《人民日报》1955年9月25日）

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末，人民的往还、物产的交换、生产知识和文化生活的互相影响不断增加。在经济生活上，双方各以自己的经济活动，给予对方的经济生活以很大影响。汉族的丝和丝织品络绎不绝运到新疆，不仅丰富了当地的商业市场，而且还转售给波斯、罗马。公元二世纪初，蚕桑和养蚕方法已由汉族地区传入哈密一带。七世纪前和阗成为养蚕中心，并织出很好的缯紬。汉民在新疆的屯垦，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总产量，而且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新疆水利的发展，也与关中的井渠有关，吐鲁番一带"坎儿井"的修建方法是从汉族地区传入的。至于物产的互通有无，更是品类繁多。由汉族地区输入新疆的主要有丝、茶、瓷器、药材、调料、油漆、布匹等，由新疆输入到汉族地区的有是食用、药用和装饰品，有工业原料，交通工具兽力等，范围广泛。有些物资如丝织品和铁器，都是各取所长，新疆虽从汉族地区输入，但新疆的特种丝织品和特种铁制品也输入汉族地区。特别是新疆棉花给予汉族人民的影响极为重要。在文化生活上，汉族的文房四宝、建筑形式、衣着服饰、琴棋书画等，新疆人民无不受其影响，其中有些仍保持汉人作品的风格；有的则具有汉人和西方的混合风格。和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造纸术和印刷术，都由内地先后传入新疆，有些更向西传，以至传播于全球。同样，汉族也从新疆各族人民那儿得到不少文化方面的东西，如宗教信仰、音乐绘画、石窟艺术等，都对汉族文化的发展起过显著作用。汉人和新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的联系也一直是密切的。汉族地区的统一往往有助于新疆社会秩序的安定，汉族地区的变乱也往往引起新疆社会的波动。新疆多次的反清运动，有的和汉族人民的某些反清运动，在性质上是相同的，特别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新疆反清运动，同当时的太平天国反清运动遥相响应，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基础。近百年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彼此间的友谊更是与日俱进。

455　新疆之伊兰民族　　　王日蔚

（《禹贡半月刊》1935年第3卷第11期）

新疆在中世纪前为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各种宗教之会萃地，亦为各色人种争夺之场所。本文作者根据中外学者从语言学、人种学研究结果，认为天山以北各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大半属突厥族，以游牧为生。天山以南，唯一的伊兰民族即塔吉克。按塔吉克与古大夏为同一音之异译。汉唐时，天山南部实为伊兰民族活动场所，突厥族入天山南路者，为唐末被黠戛斯所破之回纥。但伊兰民族何时进入新疆，为尚未解决之问题。二十世纪初，各国学者在新疆考古发掘，得古西域文字多种，

其中除汉文、梵文、藏文、佉卢文、回鹘文外，尚有三种为人们所不识之文字，后经学者们研究结果，确定一为窣利语（即粟特语、康居语、索格特语），为古代妫水流域大夏、康居所通行之语。二是龟兹语，通行于吐鲁番、焉耆一带。三为于阗语，通行于阗一带。此三种语言皆属印欧语系，而后二种与印欧语相近，故多数学者名于阗语为东伊兰语，则其语言另成为一系统。玄奘《大唐西域记》对葱岭以东诸国文字亦多记载，于阗文字虽与焉耆、龟兹同取印度，然"语异诸国"，且风俗习惯亦异于漠北诸国。由此证明，天山南路在唐以前通行东伊兰语，当为印欧语系。汉唐时天山南路除伊兰民族外，突厥人、西藏人、汉人都曾数次统治此地，然均属政治上的关系，并未能与该民族同化，故在汉唐时，天山南路则以伊兰族为主，而此民族对中西文化交流贡献殊大。作者考证西方五大宗教，即佛教、景教、火祆教、摩尼教、回教等之传入东方，伊兰民族实为之中介。此伊兰民族，应包含葱岭东西之伊兰民族，固不限于天山南部之伊兰民族。摩尼教、祆教为波斯所创，此二教则由葱岭西之伊兰民族，传入葱岭东之伊兰民族后，然后再传入中国本土。佛教虽创自印度，然初传入中国亦由伊兰人为中介。汉代译经之名僧安世高，居洛阳二十余年，实为伊兰民族安息王之世子。魏晋间中国之译经名僧，或出康居，或出大月氏，在葱岭以东者，如龟兹之罗什三藏等，皆系伊兰民族。回教兴起较晚，由海道传入中国者，大都为阿拉伯人，但传入葱岭东西，则借诸突厥人，而执宗教上之职务者，大多为伊兰族人。故新疆之伊兰民族，不但本身有较高的文化，而且对中西文化之沟通与传播贡献较大。

456　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　　王炳华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塞人"在古代中亚历史舞台及新疆古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对塞人的研究，迄今还很不足，为此，作者广泛搜集和分析研究了古代新疆塞人的历史资料，以供国内外研究者参考。根据《汉书》中有关塞人的记录，可以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汉以前塞人在新疆活动的主要地域，就是汉代乌孙、休循、捐毒等国居住活动过的伊犁河流域，并及于天山和更南的阿赖岭、东帕米尔等地；二是公元前三世纪末大月氏西迁伊犁河流域前，这里本为塞人领地，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政权，最高统治者称"塞王"。要把新疆古代塞人的历史研究清楚，掌握考古资料是其关键。文中详细介绍了有关塞人墓葬的形制、随葬品、出土铜器、铜矿遗址等。对这些考古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后，认为均属塞人文化遗存。这批考古资料从多方面揭示了塞人历史内容，诸如活动地域，不仅印证了《汉书》的有关记载，而且使我们明确沿巩乃斯河上行进入天山，直到阿拉沟东口（包括于尔都斯草原），可能都是塞人活动基地。再如墓葬中发现的铁刀、铁镰、木器、毛纺织、制陶等，说明铁矿的冶炼、铁器的加工，以及家庭手工业已经出现。特别是矿冶，金属加工业已成了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奴拉赛矿冶遗址，对我们认识塞人王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状况是十分重要的资料。从阿拉沟竖穴墓及巩乃斯河南岸所见的塞人遗物，还可窥见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图案设计讲究对称、平衡，内容除极少数植物花纹图案外，大多是各种野兽图案。出土物中还有漆器、丝织品，

这说明塞人与中亚广大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凡此，都填补了文献记录的空白。本文还介绍了另外两批有关塞人的资料，其一是在帕米尔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北四公里，塔什库尔干河谷第二台地的香巴拜，曾经发掘的四十座墓葬；其二是在罗布淖尔地区，解放前曾发掘过的一种土著人的墓葬。从上述的三组考古资料得知，伊犁河流域的塞人文化，以及可能与塞人有关的帕米尔山区香巴拜墓地及罗布荒原上戴尖帽的土著人文化，虽然他们之间有其不同的文化特点，但与古代波斯碑刻及古希腊文献提供的塞人概念，却可以相互印证。

457 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 王炳华 王明哲

（《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战国秦汉时期，从河西走廊以至新疆广大地区，乌孙民族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她对新疆地区历史的发展，对缔造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都曾有过重要建树。关于乌孙历史的研究虽多，但至今未获明确、统一结论。作者结合文献、考古资料，对其中几个意见纷歧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乌孙在河西走廊的活动史，作者综合分析研究了《史记》、《汉书》的有关史料，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汉以前，月氏与乌孙分居于河西走廊东西两端，西为乌孙，东为月氏，二者大致以张掖为界；乌孙西迁之前的一段时间政权夭亡，亡国之日即昆莫新生之时，而其失国年数正是昆莫由生到"及壮"、"既健"（大约十七、八岁）的成长过程；乌孙西迁之日乃在昆莫"壮"、"健"（十七、八年）之后不久；在此期间，作为一个"国家"的乌孙实已不存，但作为一个民族或部落，大致保持其内部原有的组织形式和血缘纽带。西迁时的人口，大约十七万人左右，这是我国早期民族迁徙史的重大事件。西迁年代，当在公元前161——160年。西迁路线，当从敦煌西北进入哈密绿州，然后再循天山山脉西进。

乌孙西迁伊犁后，社会经济逐步发展。《汉书》称乌孙的社会经济特点是"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作者还从当时的住室(除毯幕外)样式、饲养牲畜的种类、墓葬形制、农业、手工业生产、金属的冶炼、陶器的制造、毛纺织业等方面论述了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在生产关系上有一条很值得注意的记录，即西汉后期，当雌栗靡为乌孙大昆弥时，颁布了一条法令："告民牧马畜，无使入牧，国中大安和翁归靡时"。这实质上是一项调节生产关系的重大措施，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乌孙的社会性质、政治制度问题，作者认为：西汉时是一个宗法性很强、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奴隶社会。乌孙因长期受匈奴的统治和奴役，可算是匈奴统治下的部落奴隶。乌孙社会内部也实行奴隶制度。《汉书·西域传》、《乌孙传》中说，"与匈奴同俗"。乌孙在西汉时期，存在一套简单的政权、军事、社会组织，虽有氏族社会阶级的印痕，但却已凌驾于社会之上，存在超阶级强制的一套制度。

乌孙是汉代西域地区最大王国，在不长时间里，它从匈奴的羽盟转变为和西汉王朝结盟，并很快归属西汉王朝统治，是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乌孙归属汉王朝的历史进程中，汉的和亲政策，细君、解忧公主和冯嫽夫人在乌孙王国的活动，起过积极作用，对

乌孙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有一定意义。乌孙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缔造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历史，曾发挥过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458　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　　杨建新

（《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2期）

乌孙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民族。公元前二世纪以前，他们劳动、生息在河西走廊一带，公元前二世纪初，移居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在西汉时期，乌孙就与汉朝政府建立了隶属关系。汉武帝曾先后两次将宗室女嫁给乌孙王，以加强和巩固汉朝政府和乌孙的关系。汉朝政府直接管理着乌孙，乌孙每年向汉朝政府朝贡，乌孙贵族也经常到内地学习和居住。本文根据《史记》、《汉书》、《新唐书》等史籍的记载和当地的考古资料，对乌孙的原住地及其西迁、西迁后住地的范围、乌孙与汉朝政府的关系、乌孙社会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乌孙原住地，作者对《汉书》上“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的记载作了分析，认为乌孙原与大月氏的一部分部落共同游牧于张掖到敦煌之间的广大地区。汉初，乌孙被大月氏击破，乌孙归附于匈奴。以后又在匈奴的支持下，击走大月氏，占据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对于乌孙西迁后住地的范围，作者认为是：天山以北直至塔尔巴哈山，东至玛纳斯河，西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中游。同时肯定了乌孙首府赤谷城的位置在今伊塞克湖东南。关于乌孙与汉朝政府的关系，作者分为汉朝政府设立西域都护以前和以后两个阶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指出在设立都护以前，主要是在汉朝政府统一指挥下，互为犄角，抵御匈奴贵族的侵扰。在设立都护以后，汉朝政府就对乌孙实行全面管理。对乌孙社会的性质，作者认为公元前二世纪至一世纪为奴隶制，公元前一世纪后半叶就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乌孙这个民族，对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对开发和建设中国西北边疆、对缔造统一多民族的国家，都起了积积作用。研究乌孙历史，对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和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459　也谈汉代的乌孙　　刘光华

——《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商榷

（《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3期）

对乌孙民族的研究，关系到古代西北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和汉朝在西域与匈奴斗争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前人和当代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有不少研究成果见诸于报刊。本文仅就《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2期杨建新同志的《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了商榷，并从乌孙西迁前的居住地问题，关于乌孙和汉朝的关系以及乌孙的社会性质等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于乌孙居住地问题，我国古代学者说法各异，近代国内外学者的看法也不一致，本文主张应将乌孙居住地分为：难兜靡时乌孙的居住地和难兜靡儿子昆莫西迁以前的乌孙居住地两个阶段进行论述，似较为宜。基于这一认识，文章征引了各种史书记载证明：第一、难兜靡时月氏的活动地域在后来的酒泉、张掖、武威一带；第二、后来月氏

才占有敦煌。可见难兜靡时乌孙与月氏的居住地是有明确划分的。乌孙在月氏之西，活动在敦煌一带；月氏在乌孙之东，旧居酒泉、张掖、武威一带，约可以今之嘉峪关作为东西居地的划分线。不似杨文所主张的“两族共居”同一地域。至于昆莫西迁前乌孙的居住地，据《史》、《汉》记载，月氏打败乌孙并杀死难兜靡后，占有其地，部众大批逃往匈奴，难兜靡儿子昆莫也被匈奴收养。昆莫既长，冒顿“使将兵，数有功”，因而“复以其父之民，令长守西城”。这个“西城”就是昆莫西迁前乌孙的居住地。但“长守”的“西城”在何处？杨文认为“西城”的具体地域就是额济纳河流域。本文作者认为，所谓令昆莫“长守于西城”，就是令他管辖、守卫“西域”。西城应是地域概念，而非具体地点。据《史记·匈奴传》和《史记正义》记载“定楼兰、乌孙、呼揭及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乌孙、呼揭)二国皆在瓜州西北。乌孙战国时居瓜州。”战国时的乌孙居地，当指难兜靡及其以前的居住地。文帝初年匈奴西击月氏一战，控制了广大西域地区，而且西域地区东界，即从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因此昆莫“长守”的“西城”应在瓜州西北，即汉代的敦煌县及其以北方向。所谓“西城”不是具体的城，也不是额济纳河流域，而是指天山以东阿尔泰山南麓至敦煌一带的广大地区。

关于汉与乌孙的关系，是汉王朝非常重视的问题。联络乌孙是武帝通西域“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为此，不惜以汉朝公主远嫁异族。当汉朝将细君公主嫁给昆莫的同时，匈奴也遣女妻昆莫，存心破坏汉乌关系。在此情况下，乌孙表现了对匈奴的畏惧和与汉结盟缺乏诚意，而是骑墙观望。汉朝为了争取乌孙的诚意，当细君死后，又将解忧公主妻岑陬，直至武帝晚年乌孙和汉匈之间“持两端”。昭宣之际是汉乌关系发展的转折时期，特别是西域都护府设立以前的汉乌关系，据作者分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张骞使乌孙到宣帝本始三年以前，是双方确立关系，汉朝主动与乌孙结盟“共灭胡”的阶段，这一时期中，乌孙与汉匈的关系是持中立态度；从宣帝本始三年至元康二年间，是汉与乌孙在政治、军事上结盟的阶段。这期间汉乌采取过联合军事行动出击匈奴和服属匈奴的于阗，这说明乌孙在行动上已背离了匈奴；从宣帝元康二年直到西汉末年，是汉乌关系的第三阶段，即乌孙隶属于汉朝阶段。武帝时汉与乌孙、匈奴与乌孙都有婚姻关系，这种政治婚姻，既不能说明乌孙隶属于汉朝，也不能说明乌孙隶属于匈奴，只能说明乌孙与汉匈间持两端态度，很难说“加强和巩固汉朝政府与乌孙的关系”。

关于乌孙西迁后的社会性质，作者根据各种史料记载对杨文提出了五点质疑。其中心思想是如何正确对待史料和运用史料问题。认为史学研究，必须在占有丰富史料基础进行。对史实的叙述也必须以史料为根据。因此本文的撰写依据了大量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了科学分析，是研究乌孙民族问题可资参考的材料，如与杨文对照阅读，可进一步掌握丝绸之路某些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

460 汉代乌孙居地考 苏北海

(《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

两汉时代的乌孙族主要活动于伊犁河流域，但并不是原来就在这里。它的原居地究在何处，这是长期争论未决的问题。本文作者对此作了新的探索。《汉书·西域传》

载："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汉书·张骞传》载："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敦煌、祁连间，小国也"。这里指明乌孙原居地是在敦煌、祁连间，但又说大月氏也在那里。作者列举了历代学者研究此问题的观点后指出，敦煌原来的土著居民是瓜州戎、允姓戎、塞种。他们被月氏吞灭后，月氏才占有了瓜州之地。日本白鸟库吉在《乌孙考》中认为月氏并吞的允姓之戎，即乌孙，允姓为乌孙的同名异译。《汉书》所写大月氏击破乌孙是正确的，张守节《史记正义》实已正确地指出："乌孙，战国时居瓜州"。又说："乌孙，本塞种。"日本桑原骘藏说乌孙故地在匈奴的昆邪王故地，属张掖郡，断定月氏故地在乌孙的西方，显然不能成立。乌孙被月氏逐出敦煌，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已指出，不少乌孙人民为匈奴所收留。匈奴收养乌孙的昆莫后，"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那末昆莫猎骄靡时代的乌孙居地又占有那些地方？作者引证《通典》、《旧唐书》、《太平寰宇记》的有关记述，基本上都是肯定庭州之地为乌孙的旧壤，伊吾一带也是西戎居地。唐人心目中的庭州区域包括东自蒲类，西至轮台，直达乌贪訾离，即自今巴里坤直达玛纳斯一带，都是乌孙被月氏赶出敦煌后的居牧地域。乌孙活动在今哈密及吉木萨尔一带，还从哈密这个名称的来源中得到进一步的佐证。由此可知，原居敦煌、祁连间的乌孙，被月氏族赶出敦煌地区后确是迁到了哈密、蒲类、庭州一带游牧，主要是在玛纳斯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后月氏又为匈奴所破，只好远逃西迁。其大部逃往葱岭以西的伊犁河流域，小部分留在祁连山、昆仑山而成为小月氏，混入羌族游牧。公元前176年左右，匈奴已基本上征服了西域。但匈奴和乌孙仍最切齿仇恨大月氏，都想继续报仇雪耻。于是在匈奴老上单于时期（前174—160），乌孙与匈奴联军击败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迫其于公元前160年左右，徙居到阿姆河左岸。而乌孙族即从哈密、北庭一带迁到了伊犁河流域，并收纳了未逃的大月氏及塞种人，于是乌孙族更为壮大。当时乌孙族有63万人，占有整个伊犁河及西天山的广大地区。其牧地的疆域：东境以玛纳斯河为界；北境以塔尔巴哈台山迤西直至巴尔喀什湖；西部到巴尔喀什湖及其以南穿过楚河、塔拉斯河中游，向东直至南林河、克孜勒苏河上游；南境包有焉耆以西的天山中草原。乌孙的住地范围弄清后，与此相联系的乌孙首府赤谷城的位置究在何处，也至为重要。关于赤谷城的位置，国内外已有不少人考证过，但迄无定论。归结起来，不外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赤谷城在特克斯河流域，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伊塞克湖地区，其中主张赤谷城在伊塞克湖东南地区者为多。那末赤谷城在特克斯河流域的意见是否错误？作者认为并无错误，不过不叫赤谷城，而系另一首府，即现在的昭苏盆地，乌孙也曾在那里建都。作者同意赤谷城在伊塞克湖东南地区，又同意昭苏盆地也是乌孙首都。这是由于在游牧人民中向来都有夏都、冬都之分。乌孙的冬都在赤谷，夏都在昭苏盆地。文章对这两处的地理环境，游牧条件，交通道路等都作了详细叙述。

461　乌孙及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　　　林　干

（《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本文内容与王炳华、王明哲撰《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一文大致相同，

研究者可参照阅读。作者简述了乌孙西迁的过程：乌孙在难兜靡为首领时，受月氏族进攻，难兜靡被杀，部落四散，人民逃往匈奴，难兜靡之子猎骄靡（即昆莫）刚刚诞生，为匈奴单于所收养。后来长大，欲报父仇，老上单于遂帮他西征月氏，杀其王，月氏被迫再次西走。乌孙因此在今伊犁河上游留居，政治中心在赤谷城（今新疆温宿县西北纳伦河上游）。此后昆莫势力逐渐增长，遂脱离匈奴而独立。关于乌孙的种族问题，作者列举了《汉书·西域传》、《新唐书·黠戛斯传》的记载，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乌孙考》的论证，认为其先属突厥种，后来则混入塞种和月氏种，殊为混杂。社会性质是处于原始氏族末期至阶级关系形成的过渡阶段，私有财产早已出现，阶级分化十分明显，作为阶级统治的机构亦已建立。但婚姻习俗仍有原始群婚制的遗风。作者继而论述了汉王朝与乌孙在共同抵御匈奴的侵扰中所结成的政治联盟、和亲关系。乌孙与汉结亲，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细君、解忧公主相继出嫁，首先沟通了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解忧西嫁后，乌孙与汉的友好关系，还扩大到西域各国。结亲的另一意义是乌孙在汉朝的帮助下，击退了匈奴的侵扰和进攻，而汉朝在西域的政治、经济基础也得以巩固的建立起来。这对于汉族的先进经济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在西域和中亚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后附有西汉时期乌孙昆弥世系及细君，解忧两公主子女表，可供研究者参考。

462　西域的羌族　　　钱伯泉

（《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

羌族是古代西域占地极广、人口众多的一个民族。他们曾为开发西域，创造我国历史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根据《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羌传》、《三国志·魏书·鲜卑乌丸传》、《太平御览》等史书的有关记载，详细论述了羌族的起源、种落、分布地区，对维护祖国统一和开发西域的贡献，以及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羌族在商朝时居住在陕西、宁夏和甘肃东部，是商族的劲敌，双方经常发生激烈的战争。商王俘虏的羌人多数被杀，少数作了奴隶。羌人原为姜姓氏族，商末周初，羌族与居住在陕西中部的周族为邻，关系密切，周王多娶姜姓之女为妻。周族和羌族互相联合，推翻了殷纣王的统治，建立了周朝。东周时期，关中地区的秦国不断强大起来，经常举兵进攻西北方的羌族，羌人被迫往西转移。秦厉公时，有个名叫爰剑的羌人，在战争中被秦兵俘虏，成了奴隶。后逃跑被秦人追赶，钻进了一个山洞，秦人放火烧之，未被烧死，后亡匿到今青海东北部，被当地羌人推为首领。爰剑把在秦国学到的农牧业生产技术传授给羌人，受到羌人的尊敬和信任。到了爰剑的曾孙忍时，秦献公为了扩张领土，发兵西征，直向青海一带的羌人，忍的叔父卬畏秦之盛，领了一部分羌人迁到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另一部分羌人则翻越祁连山，迁到张掖、酒泉和敦煌一带、忍仍留居湟水两岸。他因其部族逃散，人数大减，便积极提倡一夫多妻制，繁育后代。忍生了九个儿子，他的弟弟舞生了十七个儿子，每个儿子领一个部族，共分成二十六个部族，以后便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遍布于从青海到塔里木盆地的南缘。秦末汉初，匈奴崛起，西域诸国皆属匈奴，羌人也成为匈奴的附庸。到了汉代，汉族统治者又多次征讨羌人，迫使他

们继续流入西域。羌人在西域分布的地面很广，部族很多，其中最大的一支叫婼羌，住在阿尔金山、昆仑山和祁连山等地直至葱岭以西。还有一小部分住在塔里木盆地，过着定居或游牧的生活。其他主要部族有：葱茈羌、白马羌、黄牛羌、赤水羌、苏毗羌等。在帕米尔高原和葱岭以西，羌人还建立了西夜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阿钩羌国、波路国等几个小国。羌人在中原与汉族杂居时，已积累了丰富的畜牧业生产经验，又学得了伐薪烧炭，采铜炼铁、制造生产工具和兵器等技术。他们迁居西域后，对开发西域的经济和文化、维护祖国统一建立了伟大功绩。隋唐以后，西域的羌人逐渐融合于吐蕃、回纥、汉、吐谷浑等民族中，不再以独立民族的形式存在了。本文论述全面系统，对了解丝绸之路上民族变迁情况很有裨益。

463　突厥族　　林　干

（《历史教学》1981年第2期）

突厥为铁勒族之一。铁勒即战国秦汉时期的丁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敕勒（又名高车），铁勒即敕勒的音转。本文叙述了突厥的社会、东西突厥的分裂及突厥文字的创立等。突厥原为柔然“锻奴”，公元552年大败柔然后，建立起突厥汗国。木杆可汗时（公元553—572年），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及奚，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族，辖境辽阔。“东自辽海、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尔加湖）五、六千里皆属焉”。公元581年木杆可汗弟它钵可汗死后，兄叔互争，五个可汗各立一方，其中沙钵略为大可汗。隋初，突厥奴隶主贵族，不时侵扰边境，人口被虏，破坏经济生产，隋文帝发兵征讨，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大败沙钵略和阿波，阿波遂与隋结盟。沙钵略因此又袭击阿波，杀其母，阿波投奔玷厥（达头可汗）。玷厥联合西部势力，攻打沙钵略，从此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二部。东突厥沙钵略向隋请和，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率部南渡沙漠，寄居白道川（今呼和浩特平原），受隋统辖。至始毕可汗时（公元608—619年），东突厥又形强大，曾率骑数十万围隋炀帝于雁门；唐初，仍不时侵扰唐境，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突厥又发兵四十万大举进攻中原，直逼渭水桥北，威胁唐都长安。因战争连绵，民不堪命，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原役属于突厥的薛延陀反叛，建起薛延陀汗国。唐借机北连薛延陀，于贞观三年分兵六路反击突厥，至贞观四年俘颉利可汗，东突厥政权覆亡。唐将其原统治的漠南分为六州，并置二都督府，分命突厥贵族治之。

隋末唐初，西突厥政权在射匮可汗(公元611—628年)和统叶护可汗（公元618—628年）期间最为强大，统叶护可汗死后，分裂为弩失毕和咄陆两大部分，自立可汗，但因连年互相争夺，使自身力量大为削弱。公元630年东突厥政权崩溃后，唐在西域初建伊州，公元640年，唐为防止西突厥的侵扰，保持丝路畅通，先后在西域设置伊州、西州、庭州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镇，隶属安西都护府。唐高宗永徽和显庆时（651—657年）平定西突厥叛乱、俘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灭西突厥政权。又在其故地设昆陵、濛池二都护府，隶属安西都护府。此时唐之行政管辖达中亚巴尔喀什湖以西广大地区。原西域东部之安西都护府和焉耆镇不能驾驭西域全境和中亚一带，故于显庆三年（658年）移安西

都护府于龟兹；调露元年（679年）又筑碎叶城以代焉耆，碎叶遂成为西陲四大重镇之一。重镇西移，对巩固国防、维护丝路交通，都起了重要作用。

突厥约在五世纪时创立了文字，是我国北方民族中第一个创造文字的民族。字母约三十五个，有元音五个、半元音两个，辅音分硬性、软性和流性。字母各有几种不同写法，字与字之间介以一个或两个小圆点。通常自右向左横写，也有自左向右横书者。留于后世的突厥文有《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等，这是研究突厥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464 从突厥内徙看唐太宗的民族政策 张 雄

（《民族研究》1980年第3期）

在唐太宗统一全国的事业中，妥善处理突厥问题，对巩固唐王朝政权有着重要意义。唐太宗在逐个消灭中原割据势力的同时，对突厥采取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解决了唐初的突厥问题，从而安定了北部边疆，发展和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李渊父子初至太原密谋起事时，就把同突厥维持和好，作为实现"经邦济时"计划的基本方针之一，曾派刘文静赴突厥，建立了良好关系。但当李渊父子兵定关中，废隋帝侑，公开举起大唐旗帜，开始统一全国的事业之后，突厥贵族对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曾不断派兵南下，勾结中原分裂割据势力，骚扰唐朝后方。唐太宗对突厥贵族的骚扰，在军事上采取守势，在政治上尽可能延续、维持和好关系。为争取突厥贵族内部主张同唐朝和好的势力，太宗与突利可汗结为兄弟，孤立了大搞分裂的颉利可汗。贞观四年，李靖彻底消灭了隋朝残余势力，并生擒屡背盟约援隋反唐的颉利，于是突厥广大部众纷纷内徙"归国"。对内徙突厥部众及其首领，唐太宗采纳了中书令温彦博主张，仿"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的办法，把他们置于河南朔方之地，"令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的安抚政策。在其内徙"归国"后，于朔方之地，从幽州（今北京市）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南），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今山西平鲁）都督府，右置云中（今山西大同）都督府，任其本族首领为都督。突厥首领分别得到任用和安置。就是对颉利可汗也采取了宽恕政策，"诏还家口，馆于太仆"，"廪食"养之。后来授颉利虢州刺史、右卫大将军，赐以田宅。死后，依突厥俗礼而葬之。突厥各部首领凡来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他们"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几乎占唐廷朝士的一半。由于唐太宗对内徙的突厥人，"从其所欲"，"任情居住"，因而进入长安居住的突厥人近万家。唐王朝对内徙突厥的妥善处理，极大的提高了唐中央政权的威望，结束了各族并立、群龙无首的局面。贞观四年三月，西域、北部边疆各族君长纷纷诣阙，请尊唐太宗为各族共同的大首领"天可汗"，并从此正式确立了对边疆各族首领嗣立的册封制度，大唐成为我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证明，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中，没有拘泥于重诸夏、轻"夷狄"的传统观念，在封建社会中，执行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积极贡献。

465 九至十三世纪初突厥各部的分布与变迁　　蒋其祥　周锡娟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九至十三世纪初，即唐末至蒙古贵族远征中亚期间，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的政治形势变动很大，突厥各部流动迁徙频繁，情况极为复杂。本文根据《世界境域史》、《突厥语大辞典》、《世界征服者史》及《史集》等史籍的记载，结合汉文史料和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此期间突厥主要部族的分布与演变作了概括论述。

古斯——乌古斯(土库曼)这支突厥人，其前身为乌护，从六世纪起自东向西迁移，经热海（伊塞克湖）迁居到里海、咸海一带，称为"古斯"、"乌古斯"。后来向南向西迁徙，嗣后亦称"土库曼"，在十一至十三世纪发展壮大，强盛一时。蒙古贵族远征中亚后，形势有所改变。畏兀儿部主要由九世纪回鹘汗国崩溃后西迁的一支所构成，主要指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分布地区、管辖范围，虽然随着国力强弱而有不同的变化，但其基本分布区是一致的。《史集》与《世界征服者史》都提到畏兀儿亦都护所属，有哈剌火者及别失八里等城。这说明高昌回鹘基本居地没有大的变化，但在回鹘汗国和十三世纪初，畏兀儿人对楚河流域、伊塞克湖一带有过较大影响。葛逻禄、炽俟、踏实力均突厥诸族，三部原居于阿尔泰山以西，即东起乌伦古河，西至阿拉湖以东以北一带。八世纪中叶迁至伊犁河以南，碎叶、怛罗斯一带，取代突骑施汗国而雄霸中亚。九至十世纪中叶，葛逻禄主要分布于楚河流域，塔什干河以南及乌什与今阿克苏一带也有葛逻禄人。炽俟为葛逻禄部族之人，主要分布于伊塞克湖南北一带，十一世纪还分散在怛罗斯附近库牙斯、喀什噶尔及伊犁河流域。踏实力主要分布在炽俟西南，楚河以北至伊犁河一带。洋磨为九姓古斯之一部，大致分布于今新疆西南部喀什噶尔一带和纳伦河以南部分地区。十一世纪左右，部分洋磨人已西迁到伊犁河一带。黠戛斯亦突厥部落之一，九至十三世纪初，除少数部落迁徙散居各地外，主体一直在叶尼塞河一带。另外，突厥部落还有：寄蔑、钦察、可萨、佩切涅克、察路克、拔悉密、巴什基尔、楚磨勒等。

综上所述，九世纪左右，突厥部落相继西迁，九至十三世纪期间，突厥部族的活动中心已转移到中亚，包括苏联中亚、我国新疆、阿富汗北部及伊朗等地。西迁后，突厥各部族的发展变化较大，如乌古斯部迁到里海、咸海一带，十世纪末向河中、伊朗扩展，一直发展到小亚细亚等地。葛逻禄部势力也较大，初在楚河流域原十姓故地，十二世纪在伊犁河流域、八剌撒浑、花拉子模等地都有活动。畏兀儿、黠戛斯部主体虽未有大的移动，但也有少数部落扩散到其他地区。

中世纪时期，突厥民族向西移徙流动频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对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等关系影响颇大，对丝绸之路上民族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本文仅就突厥族的分布、变迁，为丝绸之路突厥民族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参考资料。

466 初期葛逻禄族史之研究 〔日〕内田吟风著 陈俊谋译

（《民族译丛》1981年第6期）

葛逻禄亦名卡尔鲁克，是七至十二世纪活跃于中亚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突厥系民族之一。它在突厥、回纥、蒙古诸族的兴亡过程中曾起了重要作用。但有关葛逻禄族的各种记载，大多分散零碎，尚无能够显示该民族一贯历史踪迹之材料。本文根据《隋书》、新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有关文献的记载，论证了葛逻禄族的历史发展情况。葛逻禄一名最早出现于唐贞观初年（公元627年），《隋书》中已记载有构成葛逻禄三姓中的薄落、职乙两族。他们游牧于哈密以西、焉耆以北的天山北麓，归附于当时东突厥新兴的薛延陀族的真珠毗伽可汗夷男的统治。至贞观十三年（639年），葛逻禄又处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统治之下，相继受叶护阿史那步真和阿史那贺鲁的直接管辖。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咄陆可汗被射匮可汗打败逃亡到吐火罗国之后，射匮可汗又攻打贺鲁，贺鲁即带葛逻禄之一部南下投奔于唐之庭州，住在莫贺城（在今吉木萨尔），被授以瑶池都督称号。葛逻禄的另一大部分则向东迁移到金山以西，处于东突厥新兴的阿尔泰地区的车鼻可汗统治之下。葛逻禄的酋长被车鼻可汗封以俟利发的官号。但因突厥车鼻可汗与唐朝不和，曾杀害唐朝使臣。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将高侃率回纥、仆骨诸部兵攻车鼻，葛逻禄的酋长泥孰阙俟利发等相继背叛车鼻，率部落归降唐军，并协助唐军讨伐车鼻。永徽元年（650年），车鼻被唐消灭，于其地设置单于、瀚海二都督府，葛逻禄族重新迁移至乌德鞬山（今杭爱山）地区，唐朝在此设置浑河州，同时把住于狼山的葛逻禄右部作为狼山州，以葛逻禄族出身的酋长任刺史、都督。永徽二年（651年），原归降唐朝，住在庭州莫贺城的阿史那贺鲁又叛唐，率部众西走，称沙钵罗可汗，建牙帐于千泉（在今塔拉斯与托克玛克之间）。庭州的葛逻禄诸部也一起西迁。显庆元年（656年），唐将苏定方、程知节平息了贺鲁的叛乱，将其部众遣返原地，葛逻禄也返回到其故地庭州以北、金山西麓的额尔齐斯河畔。显庆三年（658年）便以葛逻禄的三部中的谋落部族置阴山都督府、炽俟部族置大漠都督府，踏实力部族置玄池都督府，以其族长为都督。至天宝年间，葛逻禄的住地已向南扩展至北庭附近。弄清葛逻禄族的历史，对研究突厥、回纥等族的关系和丝绸之路的历史，均有重要意义。

467 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 马长寿

（《历史研究》1958年第3、4期）

突厥是我国北方古民族之一。公元六世纪强大后，东、西突厥汗国疆域囊括整个蒙古草原、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中亚绝大部分和南西伯利亚一部分，对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仅从社会制度变革角度，专文阐述了突厥人及其突厥汗国的发展变化。突厥人最初起源于叶尼塞河上游的谦河流域。分布于跋斯处折施山，后被邻部所侵，遂南下迁于新疆中部的吐鲁番盆地高昌国北山，向附近铁勒人学习，从事锻铁和畜牧业生产，产生私有制，开始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公元五世纪中叶，高昌北山的突厥部落受柔然汗国侵掠，又迁阿尔泰山之阳，为柔然统治阶级的锻奴，公元

487年，高车十二姓十多万落西迁，经过阿尔泰山，到吐鲁番盆地建立高车王国，此后柔然与高车在阿尔泰山附近进行了三十多年战争。六世纪突厥人借机脱离柔然奴隶主羁绊，锻铁业和畜牧业都有发展，以其产品在西域、中亚和西魏广泛交易。公元523年柔然奴隶主曾一度复国，突厥人重又回到柔然的统制之下，公元546年突厥与西魏正式通商，并联合高车国残部东攻柔然，终于在552年复灭了奴隶制的柔然汗国。突厥酋长土门自称伊利可汗。伊利可汗即国家可汗。六世纪后半叶，又征服许多国家、部族，建起幅员辽阔的突厥汗国。至土门之子它钵可汗时，封其兄之子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又封其弟褥檀可汗子为步离可汗，居西方，从此突厥则分为东西两部。

东、西突厥汗国，先后均由奴隶制走上封建制的道路，但西突厥进入封建制度的时间较东突厥为早，因为西突厥所统治的西域、中亚诸城郭国家，早在公元三、四世纪时已进入封建社会。征服者虽然熟悉柔然汗国统治时期的奴隶制度，但军事力量不可能改变社会发展方向，所以西突厥汗国较东突厥汗国早几百年便实行了封建管理制度。东突厥统治下的东部蒙古草原当时虽是奴隶制度，但封建制已在萌芽。随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尖锐矛盾，到八世纪苾伽可汗进行复国运动时，不得不废除奴隶法。在促使奴隶法废除过程中，草原上的奴隶们进行过反复斗争，不断叛离，直至使突厥亡国。中国封建制度和汉族劳动人民在促进突厥汗国走上封建主义道路中起了积极作用。公元550—581年，北周、北齐畏突厥势力，竭民生之力，倾府库之财，每年送给突厥大批绘絮锦彩，争相与之交好。这些锦帛除供突厥贵族使用外，大部分经粟特商人之手，统销中亚、波斯及东罗马，繁荣了丝绸之路，发展了突厥经济。公元599年，突厥内讧，隋文帝为分裂突厥，大力支助突利统辖的部落迁于黄河以南夏、胜二州，帮其发展经济。隋末唐初，中国汉人没于突厥者八万口以上；同时，又“子女玉帛，相继于道”送给突厥。自突厥亡国（公元630年）到复兴前约六十年间，有一百二十万突厥人和铁勒人降服中国，被唐朝安置于河套南北；随后降者日多，唐又安置在丰、胜、灵、夏、朔、代六州之内。唐武后年间，突厥默啜可汗要求归还投降唐朝的河曲六州降户数千帐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唐惧其兵势，一次就赠给草原牧民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具、铁四万斤，使一部分牧民改变生产形态、兼事农业。大量人力、物力给予突厥，对提高突厥汗国的生产力起了重大作用。另外，唐对大批突厥和铁勒人归降后，安置于河套一带，并设顺、祐、化、长四州，拜部民首领为将军、中郎将统治之。公元646年薛延陀汗国灭亡后，又对漠北铁勒和漠南突厥诸部，分别设置州府和都护府统治之。凡此数十年间，突厥、铁勒诸部称都督、刺史而食唐之王侯俸禄者，代有其人。中原王朝的一套封建管理制度，在突厥汗国废除奴隶法前，早已在草原的政治制度中产生了影响，对东突厥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迈进起了促进作用。

468　试论回鹘史中的若干问题　　林　干

（《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第1期）

在中国通史及其它论著中涉及回鹘与唐朝的关系时，对于回鹘助平“安史之乱”的评价，往往褒多贬少；对于回鹘政权被颉戛斯族击灭，回鹘人分三支西迁虽有叙及，但

对于南下的一支则多付阙如。本文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了新的探索。回鹘是游牧民族，狩猎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回鹘的社会性质是奴隶制。由于这方面的史料奇缺，其具体情况不详。但与回鹘同族并长期统治过回鹘的突厥族，它的奴隶制轮廓却是清楚的。回鹘的政权组织，主要沿用突厥制度。此外，回鹘由于长期接受唐朝政府的领导，因受中原政治的影响，也采用了若干唐朝的官制。回鹘也如突厥一样，除可汗汗庭直辖地区外，把其余统治地区分为左、右二部，分别派遣左杀与右杀前往分管。可汗、贵族、匐（伯克、牧主贵族）是统治阶级，他们享有各种特权，占有大量的牲畜和奴隶。他们还凭借政治势力，“各有分地”，控制游牧地区。回鹘与唐朝经常互市，主要以马匹交换茶叶和丝绸。这是以官方公开交易或用“朝贡”和“回赐”的方式进行。在地方上，回鹘与唐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贸易关系。回鹘与唐朝的关系，基本上是和好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回鹘可汗遣使至唐请助讨安禄山，至德二年（757年）秋，唐军在回鹘兵的支援下，收复了西京（长安），宝应元年（762年）冬，回鹘又助唐收复东京(洛阳)。回鹘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是对唐王朝的一大贡献。但是唐朝统治者不惜牺牲人民的人身和血汗作为争取回鹘援兵的交换条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作者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其弊端。回鹘助唐平乱的全过程，其利弊得失，《旧唐书·回纥传》史臣论之甚切；“肃宗诱回纥以复京畿，代宗诱回纥以平汉朔，戡难中兴之功大则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干，不能供其求取；朝庭之法令并驰，无以却其凭陵。忍耻和亲，姑息不暇。……比昔诸戎，于国之功最大，为民之害亦深。”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政权被黠戛斯族所破，诸部逃散，有三支西迁，两支南下。南下的两支，一以嗢没斯为首，一以乌希特勤（后立为乌介可汗）为首。嗢没斯与宰相赤心、仆固、特勤、那颉啜各率部众南逃至天德军（治所在大同川西，今内蒙古五原县境）塞下，请求内附。会昌元年（841年）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之议，运谷两万斛以赈济之。随后嗢没斯以赤心狡黠杀之，并杀仆固。那颉啜收赤心之众七千帐东走，屯于横水，旋又退屯释迦泊东。会昌二年四月，嗢没斯率其特勤、宰相等二千二百人归附。武宗以嗢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同年五月，那颉啜东犯幽州，为唐所破，后为乌介可汗所杀。六月，嗢没斯入朝，唐以其所部编为归义军，任命嗢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担任归义军使。八月，诏赐嗢没斯及其弟阿历支等皆姓李氏。名李思忠、李思贞等。另一支于会昌元年（841年）春二月，回鹘十三部之接近可汗牙帐者共立乌希特勤为乌介可汗，南保错子山。其时乌介可汗之众虽减弱，尚号称十万，建牙于大同军(治云州，今山西大同市）北的闾门山。乌介可汗屡次向唐提出无理要求，均遭拒绝。会昌三年春正月，乌介可汗率众侵逼振武，为唐将石雄所破。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室韦之一部），其溃兵多至幽州降附，会昌六年（846年）秋七月，其宰相逸隐啜杀乌介，立其弟特勤遏捻为可汗。后遏捻所部被室韦七姓瓜分。不久黠戛斯破室韦，尽收回鹘余众归漠北。回鹘由于长期与唐接触，故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回鹘地区于公元八世纪中叶开始建筑城市和宫殿，走向半定居的生活。回鹘由于与突厥同族，故其风俗习惯，很多和突厥人相同。回鹘人原先信仰萨满教，后改信摩尼教。回鹘语属突厥语族，在西迁前使用突厥文。在此期间，唐京师和洛阳周围，甚至宫人，也深受回鹘风俗习惯的影响。

469 从车师族到高昌回鹘 苏北海

（《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维吾尔族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为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作用，对丝绸之路的畅通做出过重大贡献。自唐至今对维吾尔族族源、迁徙、分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多所研究，认识和观点亦多有歧，本文则论证了新疆维吾尔族的来源、发展和变迁的情况，说明维吾尔族在这一地区源远流长，至少从两汉时起就是新疆地区的主体民族了。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论述了汉朝政府与匈奴贵族争夺车师的战争。由于车师族居住在现在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东部地区，是通西域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汉朝西进，匈奴南下都必须首先降服车师族，才能在西域有立足的根据地。所以汉朝与匈奴在车师的争夺战特别长久而激烈。在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和匈奴贵族三百多年争夺车师的战争中，到汉桓帝元嘉六年（公元151年）终于获得了全胜，为统一西域作出了贡献。从此以后，北匈奴再也无力侵扰车师了。第二部分，论述了匈奴退出漠北及阿尔泰山草原区域后，鲜卑贵族又发迹于东北，逐步占领了蒙新草原，在东汉末年已有一些鲜卑人到车师族地区，而原在漠北的高车、丁零、匈奴等族，都受到鲜卑贵族的统治，其后拓跋鲜卑部还建立了较强大的北魏。随着鲜卑贵族争夺中原政权的成功，柔然族又崛起于漠北，入居匈奴故庭十年。这时散布于蒙新高原的铁勒族又受到柔然贵族的奴役。因而铁勒族人民又展开了和柔然贵族的斗争，互有胜负。自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的高昌及北庭一直控制在铁勒贵族手中，并倾心于北魏，遣使朝贡，受到中央政权的册封。从车师族起就逐步混融了在高昌、北庭地区活动的各部族，而扩展成为高车族、铁勒族，以及唐代称雄中亚及漠北的回纥族。第三部分，论述了车师、高车、铁勒名称的演变，考证了这些民族都是维吾尔族一脉相承的先祖。而回纥就是在铁勒发展过程中的总称。唐开元中，又融合了拔悉密、葛逻禄两部落。公元786年，在北疆的回鹘被吐蕃贵族打败。公元840年，漠北一部分游牧的回鹘人，被黠戛斯贵族击败，西迁天山南北，壮大了原有回鹘人的力量，从而在短时期内联合各族人民，进击吐蕃贵族，动摇了吐蕃的统治。特别是以庞特勒为首的天山东部维吾尔及河西维吾尔人民于公元848年发动起义，一举推翻了吐蕃贵族的统治，使做了近百年奴隶的各族人民重见了天日。从此天山南北的统治权又回复到唐中央手中。第四部分，论述了吐蕃贵族于九世纪中叶被维吾尔族为首的各族人民赶出西域后，随着唐政权十世纪初被破灭，维吾尔人就在原来唐政权的基础上，建立了以高昌、北庭为根据地的回鹘政权，统一了西域地区，管辖着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河中及帕米尔的广大疆域。尽管那时中原处在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期，高昌回鹘却始终心向中原，向割据在中原的梁、后唐、晋、汉、周都遣使朝贡，回鹘国王受到中央王朝册封，以公主下嫁回鹘可汗。到宋朝统一中国后更是如此。公元1218年元太祖时西行的耶律楚材所记《北游录》和1221年西行的丘处机所写《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的记载，他们在各地所见居民及迎接他们的首领，在元初已尽是维吾尔族了。两汉时代在高昌、北庭地区的车师族，经过一千多年的融合和发展，到元初已都以回鹘为共名。由此可知车师、高车、铁勒、回鹘，尽管名称有异，其族则一，均系维吾尔。

470　关于回鹘的西迁　　　〔日〕森安孝夫著　陈俊谋译

（《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

公元840年，东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推翻后，大部分人向南方和西方迁移。对西迁部分的行踪及其建立西回鹘王国及河西回鹘王国的经过，学者们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河西回鹘是从安西迁移去的。本文根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对回鹘的记载，以及波斯学者加尔底吉所编《地理书》的九姓乌古斯（即西回鹘）一节与用伊朗语写的摩尼教《赞美诗集》等文献的记载，着重考证了建立西回鹘王国的安西回鹘。西迁的回鹘共十五部，大致分散于三个地区：葛逻禄（天山西部）、安西（天山东部）和吐蕃（河西走廊）。作者认为，所谓安西，既指唐的安西都护府，也指置安西四镇的地区，即以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为中心的天山——塔里木地区。回鹘首领庞特勤等所据的安西则是以焉耆为中心的地区。作者还从焉耆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上与匈奴、突厥、回鹘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庞特勤据居此地的原因。经过考证作者对西迁回鹘的行踪及活动，得出以下结论：西迁回鹘十五部出漠北后不久，即有一小部分岔向南方，经花门山堡进入河西。到达天山东端的折罗漫山以北时，又有一小部分越过折罗漫山走向伊州——纳职地区。其主要部分继续前进到北庭地区，大部分人即留居于此，其余部分继续西进。其中拥戴庞特勤的一支自轮台南下，占领了以焉耆为中心的地区；其余自天山北麓西行，进入当时葛逻禄的领域。庞特勤在焉耆建立了根据地，成为整个天山回鹘的可汗，并在北庭和高昌驻有代官以统治各该地区。至公元866年，北庭回鹘的仆固俊兴起，其势力扩展到乌鲁木齐、吐鲁番、伊州以至焉耆地区。此后焉耆即丧失了作为西回鹘首都的地位。作者认为，河西回鹘并非自安西迁来，而是自漠北直接进入河西的。

471　唐及五代时期的回鹘族　　　林　干

（《历史教学》1981年第4期）

回鹘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维护和繁荣古丝绸之路方面，在发展我国文字和天算等方面都作出过积极贡献。本文重点介绍了回鹘族的渊源、历史及其在唐和五代时期的发展变化。

回鹘原居住漠北，称回纥，是九姓铁勒中之一支，由九个部落组成。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依附薛延陀时向唐朝贡。贞观二十年（646年），唐趁薛延陀内乱出兵灭薛延陀，回鹘归附唐朝。八世纪中期统一漠北诸部，建立回鹘政权，唐朝也曾三次将公主嫁给回鹘可汗。玄宗天宝三年（744年），唐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此时回鹘政权达到鼎盛时期。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回纥首领蔼道曷里禄设弭施合昆迦可汗遣使，求得唐朝许可，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改称回纥为回鹘。至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渐次衰落。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可汗被黠戛斯人所杀，政权瓦解，大部分回鹘人分三支向西迁徙。最远的一支迁至葱岭以西，于公元十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期间，在葱岭西建立过强大的哈喇汗王朝，都城设在八拉沙衮（今中亚巴尔哈什湖南吹河源西南）。

辖境包括今之疏勒、莎车、于阗一带。一支迁入河西走廊，牙帐设在甘州，十世纪以后吐蕃势衰至十一世纪西夏攻占河西以前，曾控制西域与内地的交通孔道河西及河、兰两州一带，史称甘州回鹘政权，其后裔为今之裕固族。另一支迁至西州，以高昌为中心，建起高昌回鹘政权，至十世纪末，控地西接葱岭，东至甘州、肃州，北界天山，南越戈壁，直至十二世纪中叶西辽兴起，回鹘政权为西辽所控制。公元1209年降归成吉思汗，西州回鹘从此称"畏兀儿"，即今维吾尔族的祖先。

回鹘原居漠北时，就和中原经济往来十分密切，经常商贾千人，足迹远至长江、珠江流域，以马匹换取丝绸与茶叶。其中不少人在唐都长安肆美利，殖资产，甚至与汉人婚娶生子。及至西迁，三个回鹘政权控制了丝绸之路的漫长途境，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西州回鹘，在高昌开导水源，灌溉田亩，农业相当发达；手工业中的纺织、锻铁、皮革、玉器制造和酿酒业等，都有显著发展；商业也很繁盛，其商人足迹东至燕京和辽的上京，西至波斯和印度等国。西州回鹘与中原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年都以朝贡名义输送马匹到汴京，五代各朝和北宋时都"估值回赐"，给予价款，或者榷场互市，把白布、细毛织品、珠、玉等货物售予宋人、辽人和金人，换回大量绢、帛、丝、茶和白银。

回鹘西迁以后，废弃突厥文字，逐步采用粟特字母创制了"古回鹘文"，使用地区远达葱岭以西。十三世纪蒙古人又采用回鹘字母，创造了蒙古文。自伊斯兰教传入西域后，西迁的回鹘改信伊斯兰教，遂又废弃古回鹘文而改用阿拉伯字母了。

472 高昌回鹘亦都护谱系考　　程溯洛

——西域时代回鹘史札记

（《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

回鹘民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民族，从公元八世纪中到九世纪中，曾在漠北以鄂尔浑河流域为中心，建立了回鹘汗国。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左右，回鹘汗国因天灾、内部矛盾和黠戛斯人的进攻而崩溃。在其首领宠特勤率领下，分三支西迁，并和早已住在河西走廊、西域的同族或近族人相汇合而建成甘州回鹘、喀喇汗朝和高昌回鹘这三个政权。其中高昌回鹘政权是建立最早、绵延时间最长的一个。这个政权从唐末开始建立，历五代、北宋、西辽、元朝各代，历时五百年，在维吾尔族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但其史料、文物因遭兵燹损失甚大，特别是政治情况很少遗存，连其王室的世系也未为世所知。本文根据《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和宋元两代有关史料以及波斯史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初步列出了高昌回鹘王室的世系及其相关的大事，高昌一名起于西汉年间，以其地有汉时建筑的高昌垒，"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故址在今吐鲁番县城东南约六十里处，维吾尔人叫做"亦都护城"。"亦都护"是维吾尔人民对其首领的称呼，义为"幸福之主"。本文也以亦都护概称高昌回鹘的国王。文章共列出亦都护系谱十八代，即：庞特勤、仆固俊、禄胜、智海、毕勒哥、月仙帖木儿、巴尔术阿而忒的斤、怯失迈失、萨仑的、玉古伦赤的斤、马木剌的斤、火赤哈儿的斤、纽林的斤、帖木儿补花、篯吉、太平奴、月鲁帖木儿、桑哥。第五代毕勒哥时，在公元1130年，高昌回鹘成为西辽的属国，直至1211年西辽灭亡。蒙古太祖四年(公元1209年）

第七代巴尔术阿而忒的斤时，杀了西辽在高昌的“少监”（即“监国”）而归附于蒙古。到第十三代纽林的斤时期，高昌王都已移至永昌（今甘肃永昌县）。到第十四代帖木儿补花时期，亦都护已完全移到元朝内地。其后高昌亦都护事，大都是在元朝大都遥领的，高昌回鹘已名存实亡了。本文在考证过程中，采用以人系事的方法，将有关史实附在人名之下，并尽量保存一些史料原文，便于读者鉴别推敲。文后又将高昌回鹘亦都护的谱系表列为附录。这对研究回鹘民族的历史和研究丝绸之路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473 铁勒与突厥的关系及铁勒是否可以被称作民族的问题 段连勤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铁勒与突厥的关系，即二者是一个民族还是各别为族，铁勒是民族专名还是包括许多民族在内的民族“通名”，至今中外学术界分歧颇多，尚未得到完满解决。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理论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不仅有其学术价值，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者在叙述了我国有些学者和日本汉学家认为铁勒和突厥是同一民族之说及其根据之不妥后指出：铁勒与突厥绝非同族。首先，铁勒与突厥的居地不同。《周书·突厥传》说柔然汗国时，突厥居“金山之阳”、“高昌北山”，《隋书·突厥传》作“世居金山”“高昌西北”。其地在天山东脉博格达山与阿尔泰山之间。而当时铁勒（高车）主要居漠北蒙古高原。其次，铁勒与突厥虽同操突厥语，但仍有方言的不同。第三，从经济上看，突厥虽也经营畜牧业，但它的锻铁手工业特别发达。而高车则“乘高车逐水草”，主要从事游牧业，手工业则以制造高轮车为主。铁勒与突厥的婚丧习俗亦有很大区别。在隋唐史籍上，铁勒自是铁勒，突厥自是突厥，二者从未混淆。铁勒同突厥早在柔然汗国时期，就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利害关系。当时高车人在漠北和准噶尔盆地同柔然汗国展开激烈的斗争，而突厥人在“金山之阳”为柔然贵族“锻铁”，始终未参加高车反抗柔然的斗争。在突厥汗国建立后，突厥是统治者，铁勒是被统治者，在整个突厥汗国时期，铁勒和突厥都是互相对立的。隋唐两朝的统治者常支持铁勒反抗突厥的斗争。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铁勒薛延陀部酋长夷男建立的薛延陀汗国，就是唐太宗大力支持的结果。薛延陀汗国的建立，促使前东突厥汗国迅速走向灭亡。前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唐朝从铁勒与突厥两个不同民族的利益出发，采取了划疆而治的政策。铁勒诸部与突厥诸部以漠南漠北为界，分地而居者达五十余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五章《回纥国》里说：铁勒与突厥“是不同的种族，各有本族独立的历史。”铁勒是否可以被称作民族的问题，作者对主张铁勒为民族通名之说的论据，予以一一反驳，认为均无使人信服之据。作者的结论是：铁勒是民族专称。

铁勒和突厥是丝路之上的两个主要民族，都曾为丝路的畅通、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搞清这两个民族的族源及历史，对丝路之上民族关系研究颇有裨益。

474 葱岭西回鹘考 王日蔚

（《禹贡》1935年第4卷5期）

关于葱岭西之回鹘，中文史料较缺，故一般学者皆谓葱岭以西并无回鹘。清代和近

代著名学者如洪钧、陈垣等人均持此说。本文作者根据中外史料记载，对此持否定态度。据《唐书·回鹘传》记载，回鹘被黠戛斯破后，一部分逃往葛罗禄，而葛罗禄居葱岭之西，即可证明葱岭之西就有回鹘。同书又谓唐至德时，葛罗禄寝盛，曾与回鹘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碎叶、怛罗斯诸地。碎叶、怛罗斯均葱岭西之名城。西方史家谓九、十世纪时，突厥族Tagazgaz即回鹘种，其疆西达花剌子模，证明回鹘至葱岭西以后，不仅臣属葛罗禄，并取而代之。《王延德行记》谓回鹘之西境，西南抵波斯大食，这与西方史家记载基本相合。又《辽史》、《宋史》均有阿萨兰回鹘和阿斯兰汗之记载，《金史》又有葱岭西商人自言其为回纥部记载，其他如《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均有关于葱岭西回纥人居地的记载。据此，本文作者认为今苏联乌兹别克、土库曼等地，其民族意识、语言文字、宗教、风俗等，均与新疆之回鹘族同，且自认为是回鹘之后。因此，关于葱岭西回鹘问题，中外史籍均有记载，可以肯定回鹘族之一部即于唐末迁往葱岭之西，并由此可以窥见丝路之上民族迁徙之概况。

475 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 钱伯泉

（《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关于裕固族族源，以往学者多从甘州回鹘之说，近来又有源于以黄姓突骑施为主体的西州回鹘之说，但本文作者提出了裕固族源于龟兹回鹘的新观点，并依据史料，探讨了龟兹回鹘国的建立及其演变为撒里畏兀儿曲先部的历史，同时分析了裕固族的族源。十一世纪初，有回鹘可汗名禄胜者，向宋朝遣使朝贡，愿进攻西夏，为宋朝效力。对此，《宋史》的记载似让人理解禄胜为甘州回鹘可汗，《续资治通鉴》和《西夏书事》则明确记载禄胜为西州回鹘可汗。本文作者依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认为禄胜是“龟兹回鹘”的可汗。龟兹回鹘是九世纪初，回纥汗国保义可汗西征时迁往唐安西都护府所辖地区的，故又称“安西回鹘”。回纥汗国崩溃后，安西回鹘归吐蕃所统。因唐朝与吐蕃关系恶化，安西回鹘也与唐朝敌对，不断冲击沙州，企图向东发展，十世纪末，其势力进入沙州，并建立了强大的龟兹回鹘国。公元1001年，其王禄胜已自称“大回鹘安西州都督府单于军克韩王”，甚至叫作“沙州可汗”，并向宋纳贡。史载安西回鹘曾和甘州回鹘共抗西夏。禄胜之后，继任可汗名智海。公元1036年，西夏灭甘州回鹘国，龟兹回鹘国依然存在。公元1127年，其可汗活剌散，曾遣使入贡于金。史载龟兹回鹘国国境，东至青海湖西南的黄河，西至东部天山及于阗国，北至沙州，南至昆仑山，包括今新疆东南部、青海西北部和甘肃西南部地区。龟兹回鹘国并不立国于西域龟兹国故地。其第一个可汗有时虽称“西州可汗”，但并非指唐朝的西州即高昌回鹘国，而是指宋朝的“西方地区”。龟兹回鹘国以沙州为其统治中心，故其可汗又称沙州回鹘可汗。十一世纪后期，安西回鹘的另一分支黄头回纥活动在今新疆且末一带，十二世纪时，黄头回纥与龟兹回鹘国合并，十三世纪初，他们共同以撒里畏兀的名称出现。撒里畏兀是突厥语，意为“黄回鹘”，义同“黄头回纥”。北方民族常以颜色区别部族，回鹘人崇尚“黄色”，故安西回鹘（龟兹回鹘）自称为“黄回鹘”。撒里畏兀儿的主体部族是曲先部，元朝又译为苦先，乃龟兹的异译，此外还有阿端、阿真、帖里等部。据考证，元朝

的撒里畏兀儿地区和明朝在撒里畏兀儿所设的阿端、安定、曲先三卫的位置，正处于宋朝的龟兹回鹘国境。十五世纪时，由于吐蕃、蒙古等势力的不断侵扰，阿端、阿真、帖里等部不断流亡，逐渐融合于其余民族，曲先部几经磨难，勉强保持了本部的独立存在，并向东发展，征服了沙州罕东左卫的蒙古部众。这部分蒙古人遂改称自己为“撒里畏兀儿”，成为融入裕固族族源的最大“族流”。明朝统治者把这批东来的撒里畏兀儿安置在金塔寺和白城山一带住牧。清朝，撒里畏兀儿又被译作“西喇古尔”，直到现代，其居住地区变化不大。1954年，撒里畏兀儿（西喇古尔）改称裕固，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裕固族人民自称“尧呼尔”，这是回鹘的音变；或者自称“西拉玉固尔”，这安撒里畏兀儿的音变。无论从民族自称或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裕固族原是回鹘的后裔，其祖先是龟兹回鹘。裕固族之所以不同于维吾尔族，是因为他们东迁后，继续保持了佛教信仰，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也与维吾尔族多不相同，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476 关于《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一文的几点看法　　汤开建

（《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3、4期）

本文以从未有人使用过的关于黄头回纥的新材料，论证了钱伯泉的观点：黄头回纥既不是西迁的甘州回鹘，也不是退至沙州西南的河西回鹘，而是公元十世纪末就开始向东发展的龟兹回鹘。作者认为，钱伯泉将龟兹回纥与西州回纥完全分开，将龟兹与西州视为两个从来就独立的回鹘政权，是难以解释的。第一，文献中明确记载龟兹回鹘就是西州回鹘。第二，在文献中，龟兹回鹘与西州回鹘可以互换，在此称“龟兹”，而在彼则称“西州回鹘”。第三，从西州回鹘的领地也可见龟兹回鹘应属西州回鹘。第四，《宋史》记载，甘州、西州、于阗三个回鹘政权都有称号，唯独龟兹回鹘没有，这是因为西州与龟兹是同属一个政权，故龟兹就不另提。综上可证，西州回鹘与龟兹回鹘是一个政权，即龟兹隶属于西州。作者认为，黄头回纥即西方人对西州回纥（龟兹回纥）的另称这一提法应该是正确的。在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西州回鹘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不仅部落已分布到青海湖畔的黄河边，而且沙州也是西州回鹘的势力范围。在这一时期的西州回鹘应该是包括龟兹回鹘在内的政权。作者认为，西州回鹘与龟兹回鹘存在着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不少资料透露，到十一世纪后期，西州与龟兹似乎是分成了两个政权。《宋史》、《宋会要》等文献都将西州与龟兹分作两国叙述，且分别立传；在苏州文庙南宋《地理图》上标河西走廊之北为回鹘，甘、凉州之南为龟兹，似乎可以理解为两个政权；《突厥语大词典》的记载表明西州领地已不包括龟兹；《史集》记载表明龟兹在十三世纪前已变为一个伊斯兰国家，而此时的西州回鹘仍是一个佛教国家。作者同意：“唐退出中亚后，龟兹地区经历了回鹘统治（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两个阶段”的观点，认为龟兹隶属于西州回鹘，应是突厥化的阶段，而龟兹与西州是两个不同的政权，应是龟兹伊斯兰化阶段的表现。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直至十一世纪中后期还信奉佛教的龟兹回鹘开始分化，很可能是一部分龟兹人倒向喀什噶尔，致使龟兹地区走向伊斯兰化，并建立了伊斯兰化的“龟兹国”。而另一部分龟兹人由于反对龟兹的伊斯兰化，开

始东迁，从于阗边境一直到青海湖边都散布着龟兹回鹘人族帐，并建牙于祁连山北麓，成立了新的龟兹国。这部分龟兹回鹘人，就是文献中所称的“黄头回纥”，元代又称撒里畏兀儿，即今天的裕固人。

477 维吾尔族　　　乌衣古尔·沙衣然　史　众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1期）

本文对维吾尔族历史渊源、民族的形成与当时中亚各民族之关系、回鹘政权的建立、文化的发展、宗教的递嬗以及经济上的发展及贡献，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是研究维吾尔族历史较为系统的一篇参考资料。

维吾尔是本民族的自称，一般认为含有“联合”、“协助”的意思。在汉文史籍中，公元前三世纪称之为丁令，公元三世纪以后称为狄历、敕勒、乌护、韦纥、回纥、回鹘、畏兀儿，均为不同时期对VYGHUR一词的不同的汉字的译音。

公元以前，丁令分布的地区在匈奴辖区以北的地方，主要在贝加尔湖一带，也有一部分在当时西域的额尔齐斯河流域。这一时期的丁令人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公元一世纪，有一部分迁移到了今甘肃西部地区，到了公元三世纪，丁令人分为北、西两部分，北丁令分布在贝加尔湖一带，西丁令分布在西域额尔齐斯河流域。公元五世纪初，丁令人的主体仍然游牧于贝加尔湖一带，其后被迫迁移至大漠以南进行游牧，并开始兼营农业。这时西域的丁令人（或称铁勒人）大量增加，主要有三支：一支分布在沿天山由伊吾（哈密）至焉耆一带；一支分布在金山（阿勒泰山）西南；另一支则分布在昆仑山北侧由鄯善(若羌)至于阗一带。在五世纪末，丁令曾统治过昆仑山北侧的广大地区，直到七世纪，居住在蒙古境内的和西域的铁勒人均受突厥汗国的统治。后来回鹘人消灭了突厥汗国，建立了回鹘汗国（公元744至840年），其辖境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统治着我国北方草原的广大地区。回鹘汗国与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两次出兵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唐朝曾三次将公主嫁给回鹘可汗，回鹘可汗也接受唐朝的封号，并与唐朝进行着大规模的绢马、茶马贸易，使这一时期的商业贸易有了空前的发展。公元839年，回鹘汗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其统治阶级内部不断争权内讧，黠戛斯人乘机进攻，回鹘汗国遂亡，并分两大支迁移：驳职与庞特勤为首的十五部向西迁移到了葛逻禄地区；以乌介为首的十三部向南迁移。以后由回鹘人和葛逻禄人等先后建立了西州回鹘、甘州回鹘和喀喇王朝三个政权。西州回鹘是由西迁的十五部联合原来居住在当地的回鹘人、铁勒人共同建立的。早在公元一世纪河西就有大量的丁令人，约在七世纪末又有一批回鹘人迁移到甘肃河西地区。十世纪河西的回鹘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一百多年后被西夏消灭。喀喇汗朝的建立有较长的历史渊源。喀喇汗的统治民族主要是葛逻禄人。葛逻禄人原属于突厥，后成为回鹘十一部之一。原来居住在天山以北和更西地区，后寝盛，与回鹘争雄，尽有碎叶、怛罗斯诸城，后来又占据八拉沙衮城与喀什噶尔城，并于十世纪中叶建立了喀喇汗朝，两个半世纪后，即公元1213年为西辽所灭。

这些都是维吾尔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对维吾尔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

由游牧业为主转变为以定居农业为主；二是天山南北原来的各民族逐步被回鹘同化了。伴随着这两方面的变化，使维吾尔族的经济、文化都出现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高昌与喀喇汗王朝在商业贸易上有很大发展，与五代、北宋、契丹以及印度、阿拉伯各国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

回鹘人在八世纪时采用粟特文（窣利文）字母创立回鹘文。喀喇汗朝在十世纪中叶改信伊斯兰教后，逐步采用了阿拉伯字母的回鹘文。在高昌及喀喇汗朝时，曾流行过多种宗教，如摩尼教、佛教、景教、祆教和伊斯兰教。十世纪中叶后，喀喇汗朝境内逐步改信了伊斯兰教，高昌回鹘在十五世纪时仍信佛教，哈密地区直至明朝末年（即十七世纪初年）始改信伊斯兰教。随着上述诸方面的变化，维吾尔族的居住地域及宗教信仰已基本定型，经济、文化也得到了发展。作者在文章中还详细的记述了自明代以后至新中国成立，维吾尔族历史的变迁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对研究维吾尔族的历史甚有裨益。

478　元代维吾尔人对于祖国文史的贡献　　　程溯洛

（《历史教学》1964年第3期）

维吾尔族是我国的一个优秀民族，千百年来，它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本文专就维吾尔族在文字传播，宋、辽、金三史的修纂等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了阐述。古代蒙古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最初仅用刻木结草记事。自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于1204年灭乃蛮部，擒乃蛮掌印官维吾尔人塔塔统阿，令他教太子诸王用畏兀儿文（即回鹘文）字母传写蒙古语，创造了“蒙古畏兀儿字”。以后几经修改，逐渐形成今天使用的蒙文。当时除塔塔统阿外，还有哈剌亦哈赤北鲁、岳璘帖木儿、撒吉思、昔班、孟速思等人。因此，当蒙古未建立元朝（1271年）以前，其统治阶级内部已盛行畏兀儿文。且蒙古草原与西域为邻，蒙人时有至西域贸易者，因而用畏兀儿文也习以为常。由于当时蒙古统治者东征西伐和许多不同语言系统并用不同文字的民族发生关系，因而蒙古人当时所用文书，也随地而异：行于西域的用畏兀儿字，行于东方契丹、女真的旧地以及南宋汉人之间的则用汉文等。由此可见，元朝建立以前，蒙古民族不是单一地或普遍地使用畏兀儿文字。但畏兀儿文字已成为蒙古的“官书”，后来则流传发展形成今天的蒙文。在元代，由维吾尔人教授蒙古贵族拼写蒙古语所用的畏兀儿字母即回鹘文字母，成为元朝一代蒙文的主体，亦即今蒙文字母的远祖，而后之满文又从蒙古字母产生。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始命额尔德尼、噶盖等借蒙古字母创造老满文，以后清太宗天聪六年（1632年），满族人达海又加以改进，称新满文。所以说元维吾尔人用畏兀儿文（回鹘文）直接产生了蒙文，而间接产生了后来的满文，这是维吾尔人对祖国的一种文字传播的重要贡献。另外，关于“正史”的修纂方面，在元朝末修宋、辽、金三史前，所谓“正史”实际上只有十七部。到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宋、辽、金三史相继完成，合旧十七史而成为二十史。元朝在辑修宋、辽、金三史方面作出一定贡献，而在这三史的修纂中，都有维吾尔人参加。现行百衲本《宋史》，卷首列有元朝右丞相监修国史阿鲁图的《进宋史表》，其中所列

提调官”二人：“资德大夫参议中书省事”岳柱、“承德郎刑部侍郎”全普俺撒里。他二人都是畏兀儿人，这从《元史》和《新元史》的列传中可以得到证明；现行百衲本《辽史》，卷首列有元右丞相都总裁脱脱的《进辽史表》，其中所列“纂修官”四人，首名为“正议大夫兵部尚书”廉惠山海牙；“提调官”十四人，第七名为“大中大夫中书左司员外郎”偰哲笃。这两人也是畏兀儿人，《新元史》有关列传可证。总之，在元代，有不少维族人入仕中枢，他们参加元朝修纂前朝国史的工作。这是元代维族人对修纂祖国正史的重要贡献。

479 维吾尔族先民回鹘与匈奴、突厥关系考辨 苏北海

（《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3、4期）

回鹘和匈奴、突厥都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古代民族，他们在历史上曾长期发生过政治和经济关系。在我国的一些史籍的记载和中外学者的论著中，认为回鹘和匈奴或和突厥是同一种族。本文根据史籍文献进行了考证和辨析，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他们是不同的种族，而不是同一种族。文章概述了回鹘、匈奴和突厥的来源、演变和兴衰的过程，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回鹘来源于丁零、铁勒，是一个远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就有记载的古老民族。在匈奴未统一北方草原以前，丁零即已分布在贝加尔湖以南、以西直至额尔齐斯河、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广大地区，且在内蒙古和山西、陕西北部，以及天山南北一带也有分布。当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回鹘即已以天山为中心建立汗国，并在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从事农业。匈奴的发祥地在阴山和河套地区。当公元前318年第一次出现匈奴名称时，匈奴已久居于此，势力相当强大。至公元前312年（周赧王三年），匈奴势力益强，不断南扰，以致赵国筑长城抗御。至秦始皇灭六国，复增筑长城，并使蒙恬统率几十万重兵守御河套一带，以防匈奴。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立为单于后，国力愈强，有军队三十余万，大力向四周扩张，使其疆域从原来的河套、阴山扩大到北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至天山南北，东至辽东平原，南至河北北部及山西、陕西北部的黄河以东以南地区，在我国北方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在征服天山南北后，匈奴日逐王还特设僮仆都尉，向西域各族勒收赋税。由于匈奴的不断侵扰、掠略，使周围各民族遭到重大损失，西汉王朝也面临着严重威胁。汉武帝乃集中力量，于公元前127、121、119年三次遣将卫青、霍去病征讨匈奴，给匈奴以沉重打击，平定了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汉在河西设立四郡，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匈奴主力被迫退出河套、阴山一带，逃往漠北，势力日衰。公元60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五单于争立，互相屠戮兼并，最后形成呼韩邪与郅支对立。呼韩邪降汉，郅支西奔康居，于公元前36年为汉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所灭。到后汉时，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降汉，北匈奴仍与汉朝对抗。公元一世纪末，又经汉将与南匈奴及匈奴周围各族的联合攻击，北匈奴单于已无力抵抗，只好向西逃遁，其故地遂为崛起于我国东北的鲜卑所占有。而丁零仍为一人数众多的部族，五世纪末仍活动于历史舞台。五世纪后，丁零之名为铁勒所代替，后铁勒之名又为回纥(回鹘)所代替。故史书再无丁零之记载。公元六世纪突厥族崛起，当时铁勒已为漠北中亚之强大部族，但在和突厥族的长期斗争中失

败。突厥原住在金山以南，在著名酋长土门可汗时期，突厥结交两魏，攻击柔然汗国，兼并铁勒五万多帐落，由此而强盛。突厥贵族野蛮残酷地压迫奴役铁勒族人民，激起铁勒人民的英勇反抗。突厥汗国终于在铁勒和其他各族人民的不断起义、在唐朝军队的不断打击下，趋于灭亡，其地全归唐朝统治。由是回纥族雄踞漠北及中亚，在唐朝的统一号令下，发展经济和文化，成为中亚地区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民族之一。到了元朝初期，突厥之名在中国境内已经消失。史实证明，回纥与匈奴、突厥是三个不同的种族，各有本族独立的历史。文章引用国内外学者混淆回鹘与突厥两个民族的言论，并从语言、文字、面貌特征、风俗习惯、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等方面，以史籍文献的有关记载，论证了回鹘族与突厥族之间的区别，进一步阐明了二者并非同族。

480　丝绸之路与维吾尔族　　　　刘志霄

（《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

本文对丝绸之路的发生和发展、丝绸之路的繁盛与衰败、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走向，以及民族迁徙等都作了论述，特别是对维吾尔族在丝绸之路上的贡献论述较详，对丝绸之路的研究颇多参考价值。

安史之乱使唐朝丧失了陇右及河西走廊地区，这不仅使唐朝在天山南北的军政机构孤悬塞外，而且使“丝绸之路”陷于瘫痪，这一巨变所导致的结果是：延续“丝绸之路”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在了维吾尔族的身上。

维吾尔族建立的回纥汗国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与和睦的关系。回纥的可汗是受唐朝册封的，这表明回纥汗国对唐朝是从属关系。这一时期回纥汗国已是“丝绸之路”东段的中继站，主要是进行绢马交易。回纥汗国于公元840年崩溃，一部分维吾尔族部众南迁至长城一带，绝大部分则向西迁移，逐渐定居在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周围，以及中亚草原地带。维吾尔族西迁得到了唐朝的支持，因为唐朝要播威于西域各地；要获得异域物品；要在天山南部构成对吐蕃新的军事态势。西迁后的维吾尔族建立了三个政权实体，即河西维吾尔政权，西州维吾尔政权和葱岭西之喀喇汗王朝。这三个政权的管辖范围，东起河西走廊，西至布喀拉绿州，正好包括了“丝绸之路”的绝大部分枢纽地带。九世纪中叶以后，维吾尔族与“丝绸之路”的联系构成了这一时期维吾尔历史活动的重要内容。三个回鹘政权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重新沟通了因五代十国的战乱而中断了的“丝绸之路”，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他们还使印刷术沿着“丝绸之路”继续西传；产生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随着“丝绸之路”向东传入维吾尔族地区；伴随伊斯兰教而来的阿拉伯字母，成为十五世纪以后维吾尔族长期使用的字母；维吾尔文化，主要是语言也沿着“丝绸之路”进入到中亚地区。

金朝灭辽以后中原又陷入战争。古丝道上各政权之间的战争，使“丝绸之路”再次消沉。成吉思汗的西征及蒙古族统一全国后重新疏通了这条交通线。维吾尔是蒙古帝国的第一批有文化的臣民，因此他们在帝国的新疆境内担任了各种公职。这一时期维吾尔在帕米尔以西古丝道上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活动时间更加增长。明朝建立后，在天山南北形成了察合台后裔统治的一系列政权实体。明朝先后和别失八里、哈密、卫拉特、

火州、柳城建立了隶属关系，沟通了古丝路。但到了十六世纪，察合台后裔势力与明朝争夺哈密及河西走廊，明朝于1529年作出了关闭嘉峪关，断绝贡道的决定。从此以后，丝路古道之上政权林立，相互对峙抗衡，成为一座座森严壁垒。从十七世纪起，这条数千年来沟通亚、欧大陆的宏大陆上交通线为之衰落，失去了昔日繁荣的光辉情景。

481 维吾尔族源流新考 苏北海

（《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1期）

文章着重讨论了维吾尔族族源、分布、语言变革及民族同化等问题。作者认为，维吾尔族是塔里木盆地最古老的主要民族之一，其次是羌族、汉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匈奴、鲜卑、柔然、哌哒、突厥、契丹、蒙古、塔吉克等族有一些先后融入维吾尔族。古代的伊兰人、印度人也都融入于维吾尔族中。

维吾尔族来源于丁零族，而丁零族远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就存在。匈奴没有统一草原以前，丁零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以南及西至额尔齐斯河、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广大地域，同时在山西、陕西、内蒙一带也早有分布，并且人数众多。匈奴统一漠北，丁零族受到残酷压迫，因而不断地起来反抗。到公元一世纪八十年代，匈奴势力被彻底扫清时，丁零族已成为漠北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魏晋南北朝时丁零族译称铁勒或高车，高车有十二个大的氏族，这时东部的一支丁零主要游牧在贝加尔湖及其迤南的色楞格河流域，西部的一支在巴尔喀什湖、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天山南北。公元399年至509年间高车族与当时强大的鲜卑及蠕蠕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公元399年高车第一次遭鲜卑打击，一部分被迫迁到塞南内蒙地区，一部分西徙，还有一部分仍游牧于贝加尔湖周围。公元492年魏世祖时，游牧于贝加尔湖周围的高车族，再次受到打击，大部分被迫徙居漠南。经过这两次重创，东部的高车族部落基本上被鲜卑贵族所统治，并有不少部落变成了鲜卑族。柔然势力控制吐鲁番盆地后，高车族曾将族人迁往焉耆东及东北部山区。高车王于公元497年、508年、518年三次向北魏请求举国内徙，以防阻柔然族的侵并。经过高车族和柔然族的长期争战后，残留在高昌地区的柔然人、匈奴人、车师人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融合进高车族，使高车族发展成为当时该地区的主体民族。回纥是铁勒族的总称，广泛的分布于中亚地区。回纥部落本身由九个大氏族组成，即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素、药勿葛、奚耶勿，其中以药罗葛氏族为最大，回纥可汗都产生在该氏族中。回纥族由回纥、薛延陀、契苾、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洁、斛薛、都播、骨利干、多览葛、奚结、阿跌、白霫十五个部落组成。东汉至唐，龟兹王室一直由白姓统治，其姓氏来源，史书都未指明。向达和冯承钧先生都曾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讨论，但作者认为理由都不够充分。他认为龟兹白姓是铁勒族中“仆固”部落的简写。仆骨、固仆、布古尔都是仆固部落的同名异译。最后作者以大量史实证明维吾尔族是新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批判了那种认为维吾尔族不是新疆的土著民族，或认为塔里木盆地原有人种是伊兰人的观点。

482 维吾尔族汉译名称源流考　　　苏北海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

作者根据史籍文献记载，对维吾尔一词的历史沿革和含义作了详细论述。认为维吾尔乃“联合”、“协助”之意。由于语言不同，因而译成汉语名称时，自然有各种不同译法，加以维吾尔族与汉族在远古就有往来，因而在二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同名异译者很多。维吾尔名称最早出现在汉文书《商颂》上，被称为韦顾。汉时译为乌揭，元魏时称为袁纥。到南北朝及隋时又译作韦纥、乌护、乌纥，唐时译为回纥。这些名称都是同名异译的不同写法。至于把回纥改成回鹘，却非译音之不同，而是反映了当时维吾尔族和汉族间的具体历史关系。唐肃宗时，吐蕃侵扰，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维吾尔族出兵助唐打败吐蕃，平定安史之乱，势力日强。到回纥顿莫何可汗时，就向唐德宗提出：要把“回纥”改为“回鹘”，意为他们武力强盛，如天空中的鹘鸟一般。唐德宗同意了这一更名。公元840年，回鹘因受黠戛斯族的攻击而分为数路迁徙。在五代及宋辽的历史上，即因居地不同而有西州回鹘、甘州回鹘、阿萨兰回鹘等称。九、十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学者称维吾尔族为桃花石，十三世纪时西方人又称之为达尔赛。从辽、宋以后，回纥与回回两个名称常被混用，作者对此作了分析，认为回回为回纥与回鹘之转音。其后即渐加区别，以回回泛指中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至成吉思汗西征时，区分已很明显：回回专指葱岭以西的花剌子模国，回鹘族并不包括在内，但花剌子模国却已成为伊斯兰教向东发展的重要根据地。当成吉思汗统治天山南北后，维吾尔族的名称基本上分成两种：凡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均称为回回，仍信仰佛教和摩尼教的，则称为畏吾尔、畏兀儿、畏兀、伟兀等同音异译的名称。在元代，维吾尔的不同译名更多，如辉和尔、辉和、畏吾、畏兀、畏吾儿、畏兀儿、乌鹆、委吾、瑰古、委兀、伟兀、畏午、畏午儿、卫兀、卫吾、外五、畏吾而、卫郭尔等，都是维吾尔的同名异译。到了明朝，回鹘与回回两名仍然并用。清朝初年，有人把维吾尔一名译为威乌尔、乌衣古尔。因当时维吾尔族绝大部分已信仰伊斯兰教、即以回回一名概称。有的人则以帽子的颜色和头缠白布而称为红帽回、白帽回、缠头回。国民党统治时期主要以缠回称呼维吾尔族。经维吾尔人民一再反对和多次斗争，终于迫使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在1933年取消“缠回”之名而恢复维吾尔的名称。

483 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　　　谷　苞

（《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本文作者原任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现为兰州大学客座教授，为研究我国民族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著名专家。本文是对新疆维吾尔族源的专论。关于新疆维吾尔族的来源，史学界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公元840年回鹘汗国被黠戛斯人打败后，向西迁移至甘州、西州和葱岭以西，这就是维吾尔族唯一的或主要的族源。本文在分析研究古代文献有关记载的基础上，对上述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在公元三世纪时新疆北部就已有大量的维吾尔族，特别是在公元五世纪以后，在新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都有了

大量的维吾尔族。作者首先对冯家升教授等三人在所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中，认为回鹘在公元840年左右，从鄂尔浑河流域分三支向西南迁徙尔后形成为维吾尔族的主体的说法作了考辩。认为从公元三世纪居住于新疆的丁令，公元五世纪以后居住于新疆南部的丁令与新疆北部的铁勒，以及他们在长期历史中与当地各民族的融合，是形成维吾尔族的主体。九世纪中叶西迁的回鹘，只是与这个主体会合了。作者还从西汉时期直至唐代，我国北方民族斗争和迁徙的情况，论证了在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以前，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以及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早有丁令人、铁勒人、回鹘人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而且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分布在天山以北的铁勒人的人数，也远远超过由大漠南北草原迁来的回鹘。公元840年以后回鹘的西迁，主要是一支共十五部，投奔葛逻禄。因为葛逻禄原来就是回鹘十一个部中的一部。而进入吐蕃、安西的只是“残众”，不能当作另外两支。作者又引用《三国志》、《南齐书》、《北史》、《旧唐书》的有关记载，说明公元五世纪以后，天山以北已有众多的铁勒人；伊吾、高昌、焉耆曾长期受铁勒人的统治；铁勒人的部落联盟中有乌护部落和韦纥部落，而乌护、韦纥均为回纥。由铁勒人组成的三个部落联盟，构成了回纥即以后维吾尔的族源。作者认为，民族是历史的概念，种族则是生物学的概念。匈奴、突厥、回鹘都不是一个种族上的人们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历史上的人们的共同体。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流动性很大，民族间的融合经常发生，民族发展的过程往往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愈是人数众多的民族，其融合的范围也就愈广。840年以后，回鹘迁入新疆，并不是造成当地南疆各地农业居民回鹘化的主要原因，而只是进一步促进当地居民回鹘化的一个次要因素。不仅丁令、铁勒和回纥是维吾尔族的重要族源，而且被维吾尔族融合了的原来居住在南疆的各农业民族，也是构成维吾尔族族源的重要部分。本文论述充分，考证周详，为探讨维吾尔族的族源问题，开创了一条新路。

484 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演变考 王日蔚

（《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4期）

维吾尔族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关于维吾尔名称载于中国史籍者，不下二十余种，演变繁复，含义混淆。1934年时，经当时新疆省政府第三次会议决议，废除其他名称，通称为“维吾尔”。顾名思义，当生爱国爱家爱民之义，此名正式确定后沿用至今。为了澄清维吾尔名称之演变，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资料中，对维吾尔族的不同称呼一一析出，再根据这些资料记载，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宋神宗时（公元1068年）维吾尔族就有回回之称，想即为回鹘、回纥之转，但无回教徒之意（事见沈括《梦溪笔谈·乐律》一条）。回回一词之含有伊斯兰教徒之意，是元至元以后事。由于名称的演变，既涉及到民族的迁徙和演变，又涉及伊斯兰教的传入和信抑。故从事“丝绸之路”研究工作者，有必要了解此一问题。本文资料丰富，其中“维吾尔族名称演变表”甚为精详，为研究伊斯兰教史的可贵材料。

485　关于维吾尔族历史的几个问题　　　冯家升讲　黄树仁记

（《新疆日报》1957年6月21日）

本文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维吾尔历史专家冯家升先生对新疆学院史地系师生作的“关于维吾尔族历史的几个问题”专题报告。报告分新疆在历史上的地位、维吾尔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维吾尔族历史的研究情况三个部分。可供研究新疆史、维吾尔族史者之参考。新疆和内地别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它在历史上是文化区”，自从纪元前二世纪初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民对西域便逐渐有较全面的了解。当时新疆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同时还有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例如传播很广的佛教是先经新疆，然后传到内地。音乐方面的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都有其独特之点。由于新疆是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中西文化交流汇集地，所以从各种材料证明，维吾尔族文化溶合了各种文化而成，如写字有汉族用的羊毛笔，亦有木笔和鸡毛笔等。新疆又是东西交通的要冲，从汉代以来，便以有名的丝道著称。古丝道有二；一由玉门阳关经罗布淖尔至库车、疏勒；一则由玉门阳关经密远（鄯善）以至于阗。汉族的丝织品、造纸术等，经新疆传到欧洲；同样，西方许多东西亦经由新疆传入内地。由此可见，新疆在历史上地位之重要。新疆最主要的民族维吾尔，其先祖叫做丁令（当公元前二——三世纪之交），它的区域在贝加尔湖以南。丁令从出现在史籍上开始，即参加了汉帝国驱逐匈奴的运动。北魏时鲜卑人称丁令为“赤勒”或“敕勒”，汉人则称为高车。隋代又改称“铁勒”，亦即《唐书·回鹘传》中之“回纥”，元明时译为“畏兀儿”，即今维吾尔。当公元744—840年时，回纥人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鄂尔浑河流域建有一强大汗国，公元840年左右，因天灾、瘟疫及内部阶级变化等原因，被迫分三支向外迁徙，并分为高昌、河西走廊与葱岭以西三部。回鹘在西迁前原已信奉摩尼教，西迁后，因西域佛教盛行，遂改信佛教，其影响较大，时间较久，直到元代尚未衰歇。公元十至十一世纪间，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直至十五世纪，伊斯兰教才占有统治地位。维吾尔人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很多，如西瓜自公元十世纪时传到长城以北，十三世纪才传到长江流域。其次是与人民生活有极重大关系的棉花，是从新疆吐鲁番地区输入的。此外，古维吾尔族的文字—古回鹘文还成为契丹小字、蒙文以及老满文创制时的依据。在印刷术方面，与王桢（元时）发明活字的同时，维吾尔族人已使用木活字，这些都对祖国文化有重要影响。被视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的《辽史》、《宋史》、《金史》，都有维吾尔人参加甚至领导编纂工作。关于维吾尔族的历史研究，应注意三个方面的材料：首先是维吾尔本族的资料和维吾尔族人自己编写的历史。由维吾尔族人自己写成的历史最早的有《喀什噶尔史》。近代维吾尔族学者亦有不少历史著述，如乌鲁木齐地志博物馆藏有黑汗王朝信仰伊斯兰教的第一可汗《沙兔克布格拉汗史》，公元十五世纪传入新疆伊斯兰教派的《阿伯和加史》，叙述十九世纪伊犁起义的《阿扎提待尔木卢克》以及关于阿古柏祸乱新疆的好几种书。此外，还有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藏的维吾尔史家写的有关维吾尔族近代史等。其次，在汉文材料中，与维吾尔族历史有关的从《史记》、《汉书》开始，直到辽、金、元、明等史都有不少的记载，还有许多记载维吾尔历史情况的专书，如王延德《使高昌记》、《长春

真人西游记》等。第三方面便是外国人对于维吾尔族历史的研究。这方面最早的有波斯史家拉施得的《史集》，欧洲人法王特使卢伯鲁克等。自十九世纪以来，欧洲人对维吾尔族史的研究成为所谓“突厥学”的一部分，但他们除了考古学、古文字和语言而外，成就有限。国人自己在新疆考古的有黄文弼先生，他根据发掘材料编有《高昌砖集》等书，对研究维吾尔族历史很有价值。总之，维吾尔族史料还十分缺乏和分散。解放后，有关部门曾作了不少努力，如《南疆农村社会调查》、中央民族学院编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黄文弼所著《吐鲁番考古记》、冯家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元代畏兀儿文契约》等，都是很有分量的专著。作者最后还建议以维吾尔族历史为中心而以其他突厥语系民族的历史为辅，采取六个具体步骤，分别先后进行研究，从而使维吾尔族历史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486　维吾尔族居新疆考　　　樊　啸

（《光明日报》1955年9月29日）

本文引证许多资料，考察了今维吾尔族进入现今新疆的年代，以及以后的居住史。现住新疆省的维吾尔族，发源于斡儿寒河（鄂尔浑河）、土拉河和薛灵哥河（色楞格河）三河流域。最初维吾尔族的祖先居住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和它以北的地区。现在维吾尔族集中居住在我国新疆省。关于维吾尔族移居新疆的年代，过去史学界一直认为从公元840年（唐开成五年）以后开始，作者对这种说法提出不同意见。从维吾尔名称的历史演变来说，“维吾尔”这个名词的使用，仅是二十年前之事，唐时叫作“回纥”或“回鹘”，而在唐之前就有几种称呼。据《汉书》记载，两千多年前匈奴是中国北部的强大部族，它的北面有丁令，西有坚昆，在匈奴与坚昆之间的国家叫车师。《魏书》载，汉代的丁令，到南北朝时称“勑勒”、“高车”或“丁零”。《唐书·回纥传》的记载，与此稍有不同。我国史书上一直把回纥说成匈奴的后裔，但据近代中外史学家的研究，认为他们是属突厥的一支。据《新唐书》的记载，铁勒是敕（或勑）的讹称，唐朝的回纥，也即元魏时的高车或铁勒。据《隋书》和《西域记》的记载。今青海以东以北，阿尔泰山山脉的西南，都是铁勒部族居住之区。那么，今维吾尔族的祖先，远在公元四世纪就居住新疆。他们大批移居漠南和漠西，是由于南北朝时期被元魏强迫内徙的结果。据《通典》记载：“高车所住金山千余里，正是北虏往来之要冲，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据此，天山山脉的广阔地区及吐鲁番一带，都是高车居地。这又说明高车的势力在五世纪时已达吐鲁番一带。南北朝时的高车各部，到唐时大部并入回纥，唐太宗时，回纥曾因叛离突厥，双方大战于天山。其后回纥的部族不仅有很多居住漠南，而且有的还越过贺兰山进入甘肃东部。武则天时（公元684—704年）回纥因与突厥发生战争，很多部落被迫移居到甘凉一带。回纥在唐时，是中国北部最大的藩属，它对巩固唐朝边疆及平定内乱，都曾起过一些作用。唐朝国势逐渐衰落的时期，亦即回鹘逐渐强大的时期。公元730年左右，回纥与唐曾发生战争，被唐打败后，被迫迁出甘肃西部和新疆东部。此后，回鹘可汗的牙帐就靠近乌德犍山（今杭爱山支系），为期约达一百年。回鹘何时重回新疆东部，史无可考。但作者肯定在公元790年

以前，回鹘就又重新统治这一带了。据《唐书》记载，公元790年，吐蕃攻陷北庭以后，回鹘才又把居住在西州（今吐鲁番）的部落重新迁回到乌德犍山之南。此后，新疆东部曾被吐蕃统治了较长一段时期。到公元840年（唐开成五年），回鹘被黠戛斯击破，才又大举移居新疆。回鹘被黠戛斯击破的确切年月，新、旧《唐书》的《回鹘传》及《文献通考》等书，都无肯定日期。《唐书·北狄传》中则说，回鹘破灭在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这里所指当是回鹘西迁后即位的乌介可汗破灭的年代。据《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一，回鹘灭亡的年代则是840年（唐开成五年）。后世史家多以此为据，误把回鹘西迁作为九世纪内事。根据上列史料，远在九世纪之前，亦即远在回鹘破灭西迁以前，回鹘族中已有大批人长期居住在新疆。如据《文献通考》“车师前后王即高昌”的说法，以及《宋史》的有关记载，至少在公元八世纪初叶，高昌也可叫作回鹘。至于历史上为何把高昌一带一直分别叙述，而不与回鹘同篇作记，则是由其经济生活所决定的。作者的结论是：今维吾尔族进入新疆的年代远在公元九世纪以前；大量进入新疆是在南北朝时期或公元四、五世纪；其举族迁入新疆，则是公元840年（唐开成五年）的冬季。

487　对于樊啸同志“维吾尔族居新疆考”的几点意见　　冯家升

（《光明日报》1955年9月29日）

樊啸同志的“维吾尔族居新疆考”一文，与本文同时在《光明日报》上刊出，文前编者加了按语。本文作者的意见共十一条。1.关于维吾尔族起源的神话传说，作者作了详细补充。这段神话原出自虞集所撰《高昌王世勋之碑》，这段神话也见于波斯人拉施得《史集》，可见他们都是根据高昌畏吾尔的材料。文中“二水”“神光”等等表现出摩尼教的色彩。布古汗即《唐书》中的牟羽可汗。牟羽是回纥汗国的第三可汗，也是回纥摩尼教之始祖，此见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信摩尼教的高昌王所以把牟羽可汗作为其鼻祖者，正如维民信伊斯兰教后曾把穆罕默德作为其始祖的理由一样。2.“它(匈奴)的北面有丁令、西有坚昆。在匈奴与坚昆之间还有一个国家，叫作车师”。此句有语病。按《汉书·西域传》说天山有六国，是匈奴与坚昆之间绝不只一国。3.匈奴绝不是单纯的一个族系的大国，它包含许许多多族系的小国。至于它的统治阶级是属于蒙古族？抑属于突厥族？至今还无定论。4.说“唐朝的回纥就是元魏时期的高车”并不错。但如按樊啸所说，高车等于铁勒（这是对的），铁勒等于回纥（按《隋书》所说，西海之东的些部落，傍白山的些部落，金山西南的些部落，傍阿得水的些，得嶷海的些，拂菻以东的些，北海以南的都波，虽姓氏各别，总谓之铁勒）。试问回纥部落岂能这样分布之广吗？5.《隋书·铁勒传》的“西海”樊啸同志以为今日之青海是不对的，不论古今，青海东岸绝没有维族。6.吐鲁番不是高车的居址如樊啸所说。高车是在吐鲁番西北，当今之乌鲁木齐一带。7.樊啸同志说又经过了五十年到公元840年，回鹘……才又大多移居新疆。这与史实有出入。按公元840年是回鹘汗国灭亡之年，回鹘人必然辗转流徙才到了北庭。其始也，吐蕃尚强，回鹘无可乘之机；待后吐蕃内乱，张义潮奉凉州归唐，回鹘才得取西州。8、樊啸说唐太宗时回纥还有越贺兰山进入甘肃东部的，但迄举材料

并不能证明。根据新旧《唐书·太宗本纪》和《回纥传》的记载，回纥不但没有到了甘肃东部，到灵州(今甘肃灵武)的也只是些部酋和使者及其随从。9．新旧《唐书·回纥传》指出武后时徙甘肃的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而不是“很多部落”。10．樊啸说730年左右（开元中？）回纥为唐所败后，迁出甘肃西部和新疆东部。此事《旧唐书·王𡙡传》所记较详。自武后时，回纥一支迁于甘凉间，至开元中仍在甘凉间，并不记迁入新疆东部之事。11．樊啸根据《文献通考》“车师前后王即高昌”一语，于是假定“远在西汉以前，今维吾尔的祖先就居住在新疆了”，并肯定的说“历朝的高昌仅是地理名词，而人则是回鹘”。各史所以把高昌和回鹘不“同篇作记”的原因乃是因为经济生活有所不同。马端临是宋末元初人，他的《文献通考》标题“车师前后王即高昌”乃是把汉代车师前后王的地方比作宋末元初高昌的地方；并不是说车师前后王的人民即等于宋末元初高昌的人民。回纥汗国时代，高昌地区已有回纥部落毫无可疑（唐令要卷七十三）。西迁以后史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自此以后至今高昌地区（即吐鲁番盆地）始终为回鹘后人（维族）所居。

488　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樊保良

（《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西州回鹘位于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地位十分重要。本文论述了西州回鹘于九世纪期中自漠北迁至土鲁番地区后，到十二世纪中期沦为西辽属国的三百年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及所起的历史作用，并称之为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作者根据史籍文献的有关记载，说明回鹘西迁后，由原来单一的畜牧和狩猎经济发展为农业、畜牧业、狩猎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多种经济，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发展为定居生活。其原因首先是回鹘人勤劳智慧的民族精神及民族特性是决定因素；其次，有利的地理条件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西州回鹘还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积极发展了自己的工艺美术，精巧别致的文绣、纺织、金银匠作等工艺业有很大发展。绘画艺术兼有中国、印度、波斯风格。在文字方面，开始使用突厥文，以后又使用粟特文。公元十至十一世纪初，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传入，又逐渐使用阿拉伯文字。在宗教方面，回鹘人原信奉摩尼教，以后又信奉佛教、祆教、景教，最后终为伊斯兰教所取代。其文化发展的原因，在于经济的繁荣兴盛，人民生活改善和当地原有文化的丰厚基础和多种宗教的互相影响。喀什噶尔回鹘人马赫木德·喀什噶里所著《突厥语大词典》，被誉为世界语言学界罕见的巨著；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写成的韵文叙事长诗《福乐智慧》，成为维吾尔古典文学发展史上的丰碑。这些都代表了西州回鹘文化发展的高峰。对西州回鹘的历史作用，本文归纳了三点：一、加速和促进了维吾尔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二、维护和增强了东西方经济、文化联系；三、对祖国西北边疆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489　试论回回民族的来源及其形成　　　林　干

（《新建设》1952年第2、3期）

本文系统的论述了回回民族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多有独到见解，是一篇研究国内

少数民族史的力作，可供史学界和民族学研究者参考。作者在前言部分叙述了中国历史上，主要是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对回回民族的误称或不正确称谓，如“汉回”、“东干回”、“缠回”、“西回”、“萨拉回”等，其中有些不受回回民族欢迎，有些则是过去的汉族统治者歧视回回或是否认回回民族的存在的饰词。接着作者否定了关于回回来源的几种不正确说法。如来自回纥、回鹘说；来自突厥说；“汉回同源”说等。正确的答案是：回回民族主要是在元代由波斯、阿拉伯及中央亚细亚等地迁移到中国来的回回人。作者列举了《正字通》、《甘肃通志》、《读史方域记要》、《明史列传》、《辽史·天祚皇帝本纪》、《元朝秘史》等的记载，都说回回是大食国人，即今之波斯、阿拉伯、中亚细亚一带，其中提到的寻思干、起儿漫及花剌子模，也是指今日的波斯一带，而默德那或默底那，就是今日的麦地那，即古代阿拉伯帝国的首都。由此可见，回回并不是回纥、回鹘的音转，也不是突厥族的演变，更不是与汉族同源，而是原属外来的人种一大食人种。他们是怎样到中国来的？唐、宋时期，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及阿拉伯人就有人来到中国，其中除少数“贡使”外，大多数是商人。直到元初，回回大量进入中国，他们及其后裔就掺杂到回回中去，这样才汇成了回回民族的源流。

南宋末年，成吉斯汗大举西征，新疆、波斯、阿拉伯及中亚一带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及欧洲东部的各族都被征服。为着要征服中国，灭亡南宋，蒙古族于是签发被征服了的西域各族人民组成各种“卫军”和“亲军”——探马赤军，随同蒙古军开赴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南宋亡后，这些“卫军”和“亲军又被派驻中国各地担任守护皇城、京师、近畿、防戍库藏、漕运及屯田等任务。被签发的各军中，以回回人为主的西域亲军人数为最多，据说有二三百万之众。这些回回军是回回民族的主要来源。元代移入中国的回回除军人外，还有归附元朝的回回贵族，回回官僚及回回学者，此外，还有回回商人、回教教长、星相家、医生、音乐家、文学家、诗人、建筑师以及技艺百工之流，尤其是一般的回回人民，当亦不少。回回移入中国之后，首先随同蒙古军侵略中国，并随军事进展散布到各地。其次，则因回回军进入中国时，最先征服的是中国西北部，这就是新疆、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各省回回特多的原因。再次，回回上层的达官显宦及其随从部属，分仕各地，子孙繁衍，也是原因之一。因此，作者认为：中国的回回主要是在元代进入中国的回回军、回回贵族、官僚和学术人士、回回商人及一般的回民，他们散布各地，长期留居，子孙繁衍，而逐渐形成为回回民族。

作者还论述了回回的民族成分、形成回回民族的特征，以及生活习惯与宗教信抑问题。回回民族，主要是在元代由中亚等地移入中国的回回人及他们的后裔，此外还掺入了一些汉族、回鹘和蒙古等其他的民族成分汇合而成。这些掺杂进去的民族成分，虽曾给予回回民族以若干影响，但绝非形成回回民族的决定因素。元代回回移入中国时，曾把波斯的天文学、阿拉伯的医药学与回回炮等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来，而回回移入中国之后，也不断的吸收中华各族的优秀文化，从而相互结合，相互交流，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益加灿烂，益加发展，并影响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至于这些来自西域的回回人，在其移入中国之后，如何形成为一个民族？作者认为共同的农业经济是回回形成为民族的一个特征。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是回回在中国形成为一个民族及其后生存和发展的两个经济基础，其中以农业经济为主。回回有了共同的农业和商业的经济生活，这就奠定了

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物质基础，具备了形成一个民族的特征。共同的汉族语言是回回形成为一个民族的又一特征。由于中国本土是汉族数千年来生聚的地区，且人口稠密，回回进入中国之后，在日常生活上，非习用汉族语言，殊感不便，而当时回回的文化程度，一般的实较汉族为低。回回的经济生活既受以汉族为主要的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直接影响，那末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上，必然会受汉族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在明代朱元璋的大汉族主义政策之下，在回回被迫“汉化”的过程中，也促进了回回以汉语作为共同的语言形成过程。回回既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字，这就奠定了形成为一个民族的另一基础，具备了形成为一个民族的另一个特征。本文最后论述了共同的地域及生活习惯以及关于宗教信仰问题。回回在中国的住居，有所谓“大分散小集中”的说法。“小集中”是由于面貌、语言和生活习惯的相类，容易推动和吸引他们形成为一个民族，何况这些不同种族或民族的回回人，原都信仰同一的伊斯兰教。由于种种教规的约束，使得各个教徒之间，渐次形成一种共同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並使不同种族或民族的同教者渐次消失了自然血统的界限，演变成为血统的结合。在这样一种宗教的纽带中，这些不同种族或民族的回教徒是容易由宗教所赋于的特点而形成为一个民族。回回形成为一个民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被统治，被压迫和反抗压迫而奋起斗争的过程。每经一次反抗斗争，宗教的观念就进一步加深，回教无形中成为回回生存的标志，大有“回教存则回回存，回教亡则回回亡”的心态。共同的宗教信仰不是一个民族的特征，但回回在形成为一个民族的过程中，宗教所演的作用却特别巨大，这在一般民族的形成过程上，可说是稀有的特殊现象。

综上所论，回回民族在元末已具雏形。及至明代，作为一个民族所必需的特征，大体上都已具备。清代回回因反抗斗争而民族意识更为明确，更为强烈。

490 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　　白寿彝

（《新建设》1957年第11期）

回族是祖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曾做出了重要贡献。作者白寿彝先生是回族著名学者，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对回族问题的研究殊多贡献，著作极为丰富。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十九世纪中叶前的回回民族。

1．回回民族的来源和特点：作者认为回族不是由中国境内的氏族部落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民族。回族的主要来源是十三世纪初叶开始东来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自成吉思汗开始西侵，到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蒙古贵族先后征服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随着战争的胜利，大量的被征服者迁徙到东方来。同时，由于东西交通大开，西方的商人也不断的到中国来。元代官文书把这个广大地区的人通称作“回回”，经常与蒙古、汉、畏兀尔、乃蛮、唐兀、契丹等名族并列。这些外来人到中国后，大部分是做军士、农人和工匠，一小部分人做官、经商、做宗教职业者。回族的第二个来源是曾经久居在中国对外贸易港上的阿拉伯商人。回族中还有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犹太人成份，还有的是因为通婚的原因，有的是因为社会的、经济的和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原因。有人认为回族的来源是唐代的“回纥”或“回鹘”，这是

错误的。“回纥”或“回鹘”是现在维吾尔族的祖先。由于回族是由外来人所构成，它的民族特点就和这一历史情况密切联系起来。大分散，小集中，在全国来说，是回族的地域特点。语言方面，回族虽然使用汉语为共同语言，但也保留一小部分的原有词汇，这是回族的语言特点。回族的共同心理特点，首先是伊斯兰宗教生活的特点；其次，回回有学习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的历史传统；第三、回回在文化上不断地吸收汉族的东西。回回的民族自觉感是很显著的，这经常表现为族内的团结。这种自觉感在某种意义上往往是回族发展的推动力。

2．回回的初期活动：作者把十三世纪初到十四世纪中叶的活动，叫做回回的初期活动。在此期内，战争和农耕占很重要的地位，同时，商人的活动也很活跃。由于屯戍和商业经营，逐渐达到回族经济条件的初步形成。在政治上，不少回回在元朝政府中有担任各种高低不等的官职的机会，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政治家。在宗教活动上，相当普遍地建立了礼拜寺。在学术上，回回从西方输入天文历算学、医药学和制炮术，此外，回回尚有音乐的输入，并在别的学术领域里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回回初期活动的许多方面，表现了回回适应新环境的创造性，使回族的地域条件、经济条件有了一定程度的雏形，而共同心理状态，包括民族自觉感和文化共同性在内，也达到早熟的边缘。

3．回回民族的形成：十四世纪中叶以后的两百年中，回回民族逐渐形成。从十四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回回的经济条件、地域条件和心理条件都已达到可以形成一个民族的程度。并且在同一时期，回回逐渐习惯于以汉语作为本民族的共同语言。汉语成为回回使用的共同语言，是回回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

4．回回民族的初步发展：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是回族在封建社会里的发展时期。在此期内，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各地回回出现了更多的文武官员和学者。这时，也有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新的历史产物，如“门宦”的创始；经堂教育的提倡；教义汉文译著的编印。这三百年间的发展，是在很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明中叶以后，越来越腐败的政治，尤其清代的民族压迫，给回回民族的正常发展带来了困难，从而激发了回族人民的反抗和斗争。

491　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　　　　黄　靖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公元前二世纪中，生活在甘肃西北部的月氏，迫于匈奴和乌孙的压力，在半个世纪内两次西迁，使中亚、南亚的历史发生剧变，影响广及西亚以至东欧，极大地促进了中西交通的发展。本文就此历史事件进程及其直接影响作了深入探讨。学术界对大月氏西迁的时间和路线，一直存有争论。作者在论证了日本学者中较有影响的白鸟库吉、藤田丰八、桑原骘藏的研究结论后，认为桑原之说更为合理，即第一次西迁时间在公元前172—161／160年，第二次西迁时间在前139—129年。大月氏的西迁引起了整个中亚地区的一场民族大迁徙。首先受大月氏西迁冲击的是居住在伊塞克湖和伊犁河上游的塞人。《汉书·西域传》乌孙条下载：“大月氏西破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罽宾条下载：“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

为数国，自疏勒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塞人的罽宾国给印度和希腊巴克特里亚都造成一定压力。《汉书》言其为大国，《后汉书》载它同天竺、安息一样，是左右西北印度形势的一支重要力量。继塞人的东端南徙之后，居住在西端锡尔河下游和楚河流域的塞人，也受大月氏西迁冲击向西南方向移动，进入索格底。最后，以大夏—吐火罗—人为主体的一支，公元前150年越过阿姆河，占领巴克特里亚，希腊巴克特里亚随之毁灭。《史》、《汉》等书中所载的大夏地方，即巴克特里亚，亦即吐火罗斯坦。大夏名称的由来，至少在战国时即已存在。至于地望，作者赞同王国维的观点，即大夏原居于阗、且末一带，其故地当在鄯善以东，莎车以西，正当“丝路”南道。大夏人离开故地而迁至巴克特里亚亦起因于大月氏的第一次西迁。大夏人进入巴克特里亚后，中亚形势相对稳定，但占据河间地区的塞人，常给安息带来麻烦。公元前138—128年，安息国王费拉特二世终于制服塞人，挥戈西征，于前130年冬击败塞流古军。就在此时，大月氏在乌孙打击下，又一次西迁至中亚河间地区，此即第二次西迁，使中亚局势又一次发生了巨变。塞人在大月氏的驱赶下被迫离开河间地区，向西和西南方前进，入侵安息，安息彻底失败，费拉特二世战死。直到密斯里达特二世（公元前124—87年）继位，才阻止了塞人的入侵。而塞人迁徙浪潮又折头南下，在德兰癸亚那（即今锡斯坦）站住了脚。这些塞人中的一部分后来又侵入西印度，对印度历史发生一定影响。大月氏在“地肥饶，少寇”的索格底安营扎寨。《史记·大宛传》载，大月氏“随畜牧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一、二十万”。借此，它与兵弱、畏战”的大夏建立了宗主关系，从而使中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492 略论大月氏贵霜帝国的建立及其族系问题　　水天长

（《西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4期）

在公元前后的几百年间，亚欧大陆出现了四个大帝国，即汉朝的中国、贵霜、安息和罗马。本文对大月氏贵霜帝国的建立及其族系问题进行了论述。地处安息和汉帝国之间的贵霜帝国，是由我国甘肃境内古老的游牧民族月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但有些外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月氏属于印欧语系人种；有的认为月氏属于中亚土著马撒该塔伊人；也有的认为贵霜帝国为希腊化国家大夏所建立。作者根据我国史书文献的有关记载，对月氏西迁的经过及其对大夏的征服、贵霜帝国的建立及其族系进行了较详的论证。认为月氏为我国古代西北边境的游牧民族，贵霜帝国为月氏西迁至中亚后所建立。月氏在我国古代文献《管子》、《逸周书》和《穆天子传》中被称为禺氏、禺知。汉代以前，活动于甘肃河西走廊的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广大地区。秦汉之际，由于月氏势力强大，不断侵夺和他同处于敦煌、祁连一带的乌孙部落，杀了乌孙王难兜靡，夺去乌孙在河西的牧地。难兜靡之子昆莫投靠匈奴，由匈奴单于收养。匈奴冒顿单于杀父自立，势力迅速强大，于公元前174年前后（汉文帝初年）首次击败月氏，迫使其西迁至伊犁河流域，赶走了当地的塞种人，至匈奴老上单于（约公元前174年至161年）统治时的末年，乌孙首领昆莫在匈奴单于帮助下，进兵伊犁河流域，打败大月氏，杀了月氏王，月氏被迫越过帕米尔高原，于公元前130年左右到达中亚的索格底亚那地区，并使公元前三世

纪建立的大夏（巴克特利亚）成为属国。至公元前91年至80年，月氏人又进一步越过阿姆河占领大夏，将大夏的都城蓝市城作为自己的都城。此后，大月氏人即以定居的农耕生活代替了游牧生活，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建立了大月氏王国。被大月氏人所占领的两河地区，不仅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商业贸易繁荣，而且自古以来就是肥沃绿洲农业地带，生产条件十分优越。此后，大月氏王国即分裂为五个小王国：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高附，每部封一翎侯分治各地。五部翎侯中以贵霜部最强，它通过一百多年的征服活动，到公元一世纪上半叶，贵霜翎侯丘就却最后征服了其它四部翎侯，自立为王，进一步创建了统一的贵霜奴隶制帝国，并不断向外扩张。他死后，其子阎膏珍继续对外扩张，使贵霜帝国进一步强大起来，至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统治时期，国力达于极盛，建立了纵贯中亚和南亚的庞大帝国。其领土东至葱岭，西至伊朗高原，南至中印度的文迪亚山，北至咸海、里海沿岸。帝国首都也由巴克特利亚迁至“富楼沙”（今白沙瓦）。帝国内多民族共居，多种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并存。由于其处于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故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作者还引用《史记》、《汉书》中有关大月氏的详细确实的记载，论证了五翎侯之一的贵霜部是大月氏的一个分支，被贵霜帝国取代的大月氏国，是大月氏国内部的政权交替。五部翎侯的出身都属于大月氏系统。从而对一些外国学者认为贵霜帝国为大夏所建的错误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493　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　　　齐思和

（《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

匈奴是古代著名的游牧民族，曾长期活动在我国北方草原和丝路之上。公元374年，匈奴人西迁至欧洲，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欧洲人长期不知匈奴人的来源，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法国学者德·揆尼才根据中国历史记载，指出这支匈人即中国历史上的匈奴。美国历史学家吉朋亦主此说，但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本文根据中国和罗马史籍文献中关于匈奴西迁的原始资料，论证了匈奴的历史发展，探讨了匈奴西迁的具体过程和它在欧洲的活动及其历史意义，并对“匈人”是否为匈奴的争论予以评述。匈奴在殷周时称为鬼方，周代称为混夷、玁狁，獯鬻、春秋时称为戎、狄，战国、秦汉以来称为胡或匈奴。在周、秦和汉初，匈奴就经常与周围的部落和东周、秦、汉进行战争，捉捕俘虏，掠夺财富。到战国末年，匈奴头目头曼，联合各部落联盟，号称单于。公元前209年，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夺取政权，把匈奴的部落联盟分为二十四个国，把全境分为三个大政治军事区。单于统治着中部诸国，左贤王统治东方诸国，右贤王统治西方诸国。到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实行抗击策略，取得一系列胜利。公元前58年，匈奴分裂为东西两部：呼韩邪单于居东方，屠耆单于居西方。以后西匈奴又分裂为四部，互相混战，结果剩下两个单于：郅支单于徙居单于庭，呼韩邪单于驻漠南光禄塞。公元前51年，呼韩邪率部降汉，居于朔方诸郡。北匈奴郅支单于仍坚持反汉。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都护陈汤，率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进攻北匈奴，擒杀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遂统一匈奴。公元48年，匈奴又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仍臣服于汉，北匈奴单于仍与汉对立。公元87年，鲜卑族进攻北匈奴，迫使北匈奴单于于公元91年离开漠北单于庭，率部西

迁，到公元四世纪70年代出现于东欧，历时280多年。北匈奴的西迁，共经过四个阶段。（一）悦般时期（约公元91年至160年）。北匈奴占领悦般后，又掠夺西域，进攻东汉内地，被汉军击败。后在鲜卑人的压迫下，才离开悦般。（二）康居时期（约公元160至260年）。北匈奴离开悦般后即攻占康居。康居位于中亚阿姆河流域，原为匈奴属国。以后可能是受到大月氏贵霜王朝和康居人的联合攻击，又继续西迁。（三）粟特时期（约公元260至350年）。北匈奴离开康居后，又征服了位于咸海附近的粟特国。可能是由于柔然（即蠕蠕）族侵入中亚锡尔河流域，迫使匈奴再度西迁。（四）阿兰时期（约公元350至374年）。阿兰原名奄蔡，是粟特的一个部落，分布在黑海北岸顿河流域的草原上。匈奴人从顿河以东进攻，征服了阿兰国，到达欧洲东境。从公元374年开始，他们又先后征服了日耳曼人的东、西哥特国和北边的日耳曼部落，夺取了匈牙利平原。到公元434年，匈奴的边疆东起咸海，西至莱因河，南至阿尔卑斯山，北至波罗的海，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公元447年，匈奴在国王阿提拉的统领下进攻东罗马，迫使其割地纳款，使匈奴帝国的疆域又扩展到西至大西洋岸，南至多瑙河。公元451至542年，匈奴又两次进攻西罗马帝国，连遭挫败。公元453年，阿提拉暴卒，他的儿子们因瓜分帝国而互相交战，各附属国也纷纷造反。吉皮底国王阿达利克组织联军，于公元455年大败匈奴人，匈奴帝国遂彻底瓦解。匈奴对东西罗马的进攻，加速了这两国的衰落和灭亡，促进了欧洲奴隶制的瓦解。史实证明，进入欧洲的“匈人”即匈奴人。他们是黄种人而非白种人。但至今仍有人坚持“匈人不是匈奴人”的说法，这是割断历史的错误看法。这种观点似与“白色人种优越论”不无关系。

494　关于匈奴西迁过程的探讨　　　　肖之兴

（《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匈奴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民族，在世界古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外学者关于匈奴史的著作也陆续不绝。《历史研究》1977年第三期刊载了齐思和先生写的《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匈奴在亚、欧两大洲的历史及其西迁过程，认为匈奴西迁的过程可分为悦般、康居、粟特、阿兰四个时期。本文对这些具体过程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齐文说公元91年匈奴北单于从漠北先逃到悦般，占领了该地，约至公元160年。根据《北史》、《汉书》、《后汉书》的记载，悦般并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名称。在公元91年至160年的东汉中期，史籍并无悦般的记载，直到公元91年以后三百多年的南北朝才见于《魏书》和《北史》。据《北史》记载，悦般原为匈奴北单于之部落，在北单于西迁时，有少部分羸弱不能去者，留在龟兹北，经过长期发展而成为“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万”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个地方正是乌孙故地，而不是乌孙西北。故在东汉匈奴西迁时，还没有出现悦般，因而也不能有一个“悦般时期”。其次，齐文说北单于在乌孙邻近住不下去了，又率部西迁到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康居。本文认为匈奴西迁经过康居是可信的，但汉代康居并不在阿姆河流域。据《史记》、《汉书》、《北史》、《魏书》记载，康居位于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其东界大约在今苏联中亚江布尔附近塔拉斯河东二十多公里外不远的地方。

康居的首府是卑阗城，在今塔什干或以北的奇姆肯特。这表明康居在中亚北部，而不在西南的阿姆河上。再次，齐文认为北匈奴曾迁居粟特，而粟特位于咸海地区。本文根据《北史》、《后汉书》、《大唐西域记》等史籍和有关资料考证，粟特亦名窣利、康国、粟弋，位于泽拉夫善河流域。它既不在咸海附近，匈奴西迁也没有经过粟特地区。故齐文论证的匈奴西迁的第三阶段“粟特时期”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其致误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北史·西域传》误把粟特和阿兰（奄蔡）两个不同国家的材料合到了一起，以致把阿兰的位置说成了粟特的位置。

495 嚈哒民族的起源 〔日〕榎一雄著 刘永增译

（《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

本文探讨了嚈哒民族的发祥地和勃兴始末等问题。关于嚈哒民族的起源，据《梁书·诸夷传》、《后汉书·西域传》、《通典》、《北史》等史书记载，说嚈哒是大月氏或高车、康居的类族，起源于阿尔泰山。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并据《西域图记》序文、《唐会要》、《大唐西域记》、《慈恩传》等文献记载，认为滑国即活国，也即活路城、遏换城，也即《周书》、《北史》中记载的拔底延城、即王舍城。这里位于乌浒水南二百余里，是嚈哒的都城，是嚈哒人聚居的一个中心。嚈哒的另一个中心是《西域记》中所记的呬摩呾罗国，它位于钵铎创那国即费扎巴德之西，讫栗瑟摩国之东。其所记情况与《洛阳伽蓝记》中所记嚈哒国的风土人情基本一致。故可认定呬摩呾罗国即为嚈哒王庭，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也都是嚈哒民族的居所。由于呬摩呾罗和活路两地，作为嚈哒王庭及都城，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说这里大概就是嚈哒民族的发祥地。从公元五世纪中期到六世纪中叶，嚈哒的势力强盛，拥有以乌浒水上游为中心，包括西北印度、东西土耳其斯坦之大部。据《魏书本记》记载，嚈哒初次向中原王朝进贡是在太安元年十一月（公元456年），第二次朝贡是在正始四年十月（公元507年）直到太昌元年六月（公元513年）共计十五次来朝。据《梁书》记载，对南朝的朝贡在梁的天监元年（516年）和普通元年（520年）。这说明嚈哒和中原的交往，从进入六世纪以来突然频繁起来。这是在高车独立、蠕蠕衰退等新形势下，嚈哒势力扩展到东土耳其斯坦方面的结果。这时嚈哒极为强盛，“北尽敕勒，东被于阗”，四十余国前来朝贡。这都是五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文章还根据太延三年（公元437年）遣使西域的董琬、高明的报告和《魏书·西域传》的记载，论述了吐火罗斯坦贵霜王朝与波斯萨珊王朝、萨珊王朝与东罗马之间的斗争，以及贵霜王朝和新兴的寄多罗王朝对吐火罗斯坦的统治，并翻越兴都库什山，侵占北印度等情况，证明寄多罗王朝兴起于公元四世纪后半期，而嚈哒的兴起则在五世纪末以后，勃兴的本土地是在吐火罗斯坦和犍陀罗接近的地方。嚈哒的活动，首先开始于这两个地方，然后到达北方。嚈哒兴起的直接原因，就在与萨珊王朝抗争的寄多罗王朝的衰退上。文章还对日本学者松田寿南认为库车北部山地的悦般国就是嚈哒的看法提出异议，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并认为嚈哒人种可能与贵霜、古尔同属于土著伊朗种。

496 古代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　　依不拉音·穆提依

（《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

本文是作者为新疆“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撰写的论文。文章着重从语言学角度介绍了“丝路”之上的几个古代民族。

（一）粟特人

粟特是中亚的古代伊朗民族之一，公元前五、六世纪至公元十世纪，粟特人对中亚各民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曾起过重要作用。粟特人聚居区的南部边界是铁门关；西边和阿姆河下游的花刺子模人为邻；北面与康里人相接；东面紧邻大宛。此外在别失八里、吐鲁番、七河区、天山南北的各重要关隘，罗布泊地区及河西走廊，一直到唐朝的都城长安，都有经商的粟特人村落。

粟特人在中亚细亚从来没有建立过独立的王朝，但在丝路之上，对东西方经济和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很古以来，粟特人就过着以农为主的定居生活，为开发中亚绿州贡献了力量。粟特人信奉的主要宗教是袄教，在大夏和贵霜王朝统治时期，佛教曾传播到粟特人中间。此外，摩尼教、景教也曾传入粟特地区，但都遭到袄教的排斥，始终没有变成粟特人的主要宗教。这些教派只好前往“丝绸之路”上的粟特村落进行宗教活动。从库车、吐鲁番、敦煌、楼兰发现的用粟特文写的佛教、摩尼教和景教文献证明了这一点。

粟特语属于一种古伊朗语，是以撒马尔罕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文学语言，粟特人有过自已的文字，是从地中海一带的闪文，或者说阿拉美文演变而来的。老粟特语使用的是这种阿拉美文，而新粟特语则使用的是从上向下写的另一种粟特文。从六世纪起突厥人使用的鄂尔浑文以及后来古维吾尔人使用的古回鹘文，就是从粟特文里借来的字母。从七世纪到八世纪，粟特语成了“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学语言或共同交际语，各族商人，知识分子都使用这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

（二）吐火罗人（Toharlar）

公元前二世纪，灭亡了大夏帝国的部族吐火罗人居住在吐火罗斯坦（Toharasitan），他们的故乡在甘肃河西地区，后来迁徙到了伊塞克湖一带，以后又到了阿姆河流域，居往到现在阿富罕北部的拜勒赫与拜达克善之间的地区，这部分人被称作大月氏。在这次迁徙中，有部分未能迁徙的叫小月氏，仍然留在和田之东的罗布淖尔与甘肃河西地区。“吐火罗”是种族名称，由他们建立的国家是“贵霜王朝”。吐火罗语属于东伊朗语族塞克语组，是早先贵霜王朝的语言，文字是由二十五个婆罗迷字构成。

（三）回鹘人

回鹘人就是维吾尔人。他们从匈奴时代起，就和“丝绸之路”发生了关系。从公元五世纪起，铁勒人（即回鹘人）就已经生活在中亚广大地区，公元六世纪突厥汗国占领中亚时，回鹘人又跟着来到中亚地区，并且参加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突厥汗国灭亡以后，回鹘汗国统治了漠北，与唐朝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有着正式的贸易往来，他们用马匹交换丝绸，同中西亚甚至跟欧洲等地进行贸易。

回鹘人建立的回纥汗国、高昌回鹘、哈拉汗朝等政权，都是属维吾尔——卡尔鲁克语组的各突厥部落所建立的汗国。从七世纪到十五、十六世纪期间，维吾尔文学语言已经成为中亚细亚所有突厥部落的共同文学语言。古代维吾尔人使用过的主要文字有鄂尔浑文和古维吾尔文（回鹘文）。

回鹘人从汉族人那里学到了印刷术，并且将其改进成为适应拼音文字的印刷术，并把它介绍给了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

以上三个民族都曾在“丝绸之路”上创立过光辉的业绩，他们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媒介。同时在这种交流中他们发展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对当时中亚细亚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创建与发展，也起过重要作用。这对于后世研究当时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以及“丝绸之路”等都有其重要价值。

497　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　　〔法〕哈密顿著　耿　升译

（《敦煌学辑刊》1983年创刊号，1984年第1期）

对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中外学者多所研究。因为这些民族原居蒙古高原，先后向西移徙，曾在中亚建立过强大政权，对东西方经济的繁荣、文化的交流，做出过重大贡献。本文对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的历史，根据中外史籍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对此问题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作了补订，是研究丝路之上民族问题的一篇重要参考资料。在蒙古高地发现的用鲁尼文字撰写的古突厥碑铭，充分证明在公元八世纪上半叶，曾经有过一个叫九姓乌古斯的民族(或者简称乌古斯)，从九世纪开始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并向西部进行了扩张。从汉学家到芬兰——乌戈尔学家，到处寻觅乌古斯民族的古代踪迹，而且都倾向于将该民族追溯到至今尚不太明朗的突厥人种起源时代。从一切迹象看，现代东方学似乎都不恰当地受到了有关乌古斯汗著名传说的影响，认为乌古斯汗就是使乌古斯民族获名的一位神化祖先。然而，有关这一传说现有形式的起源，最早不会超过元代，而且还可能是深受蒙古人在十三世纪进行征服的影响。而该传说在伊斯兰教徒中的流传，肯定是由于乌古斯人在十世纪左右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原因。

作者从研究乌古斯这一名称入手，引用、分析了伯希和、拉德罗夫、梅南特罗斯、拉斯特的有关著作，以及《隋书》《通典》《唐会要》《唐书》等汉籍，还引用了拜占庭的有关资料，并参照了摩尼教经文、基督教史料等等之后认为：不仅九姓乌古斯确实存在过，而且还有个十姓回鹘也确实存在过。回鹘部族即是十姓回鹘部落的简称。最早不超过公元400年左右，铁勒部族以十姓回鹘（很可能是指“十姓联盟”）的名义而形成。在五世纪时，由于中亚的政治冲突和动乱，十姓回鹘部中的一部分离开了他们的故乡，即蒙古高原，开始西迁，最后在咸海以西的草原地区，尤其是在高加索以北的草原定居。这次民族大迁移，可能是由十姓回鹘的各部落相继进行的。从七至八世纪开始，西部的回鹘部族开始在新的迁徙和与民族接触中发生变化和分化，特别是这次向欧洲方向迁徙，以至于最后丧失了他们回鹘人的地位和东突厥人的特点。至于九姓部的情况，时代已经相当晚了。事实上，九姓乌古斯联盟是由蒙古高原和中国突厥斯坦的铁勒部族所组成，其时间可能为七世纪初年。在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当他们的汗国在回鹘人的领导

下大举扩张的时候，九姓部的一部分越出了其西部边界，最后在咸海一带的草原地区定居下来。该部族与他们的发祥地断绝了关系，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又伊斯兰化了，所以被人们称为乌古斯、古斯或乌斯，逐渐与他们的东部同宗兄弟们不同了；但西方史料还一直称他们为九姓乌古斯。在后期对其统治部族主要是称之为回鹘。这一变化主要是同其它民族接触、尤其是同很久以来就居住在西部地区的突厥民族接触的结果。他们后来又与新的政治集团融合在一起。最后由于向欧洲和小亚细亚迁徙而分散开了。

498 关于Toquz Oγuz 与"九姓"的几个问题 〔日〕片山章雄著 章 莹译 吴大山校

（《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

本文探讨了汉文史料中所记载的"九姓"、"九姓铁勒""铁勒九姓"的问题。据《旧唐书》记载,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以后,"九姓"、"九姓铁勒"、"铁勒九姓"三种提法并存。与此同时，在新、旧《唐书》中又出现了"九姓突厥"与"突厥九姓"的记载。以后又出现了"九姓思结"、"九姓拔曳固"、"九姓同罗"、"九姓回纥"等称呼。作者根据日本和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整理和解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汉文史料所谓的"九姓"、"九姓铁勒"或"铁勒九姓",实际就是突厥碑文上所记的Toquz Oγuz，虽在日本学者中已成定论，但不能这样简单地认定即可解决。从汉代到南北朝，从蒙古高原到阿尔泰山一带的铁勒族，即丁零、狄历、敕勒等名称，都是tur(ü)k的译音，到了隋代，这些名称仍被继续使用，同时也成为除突厥以外的tür(ü)k各部族的总称。"铁勒"一词就这样沿用下来。而汉文史料中出现的突厥，也是tür(ü)k中的音译。但铁勒和突厥是有区别的，突厥是统治部族、政治名称，实体和名称同时延续；而铁勒是被统治的各部族和种族的名称，实体部分延续下来，名称部分以后消失。故汉文史籍将二者并记是理所当然的。"九姓"、"九姓铁勒"、"铁勒九姓"这三种表示方法中，"九姓"是正确的表示法，是Toquz Oγuz的直译。这是因为突厥把分布在其北方的铁勒中的一个联合体称为Toquz Oγuz，所以中国把它直译为"九姓"而记载下来但。因"九姓"表示联合体意义不甚明确，故使用了"九姓铁勒"、"铁勒九姓"这样的表示法。而"九姓突厥"、"突厥九姓"则系"九姓铁勒"之误。至于在开元三年（公元715年）以后出现的九姓加部族名，如"九姓思结"、"九姓拔曳固"、"九姓同罗"、"九姓拔悉密"、"九姓坚昆"、"九姓阿跌"、"九姓仆固"等，是因为各部落属于"九姓"，所以被记成九姓加部族名。其中所含的"九姓"是应当始终抓住的实体。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以后出现的"九姓回纥"，也是这种表示法的沿用，即"从属九姓，统治九姓"而产生的名称。作者还列举了新、旧《唐书》和《唐会要》中所记的回鹘九姓和铁勒九姓的不同名称，并概括介绍了日本学者桥本增吉对这一问题的观点，认为二者的关系是部落名与姓的关系，即用部族名来列举和用其酋长的姓来列举的九姓，并引用敦煌出土的和阗语史料《钢和泰卷子》文书中关于九姓的记载作为旁证。

499 西突厥的形成、属部及其它诸问题　　杨建新

（《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

西突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政权。但对它的出现时间、部落组成、汗位继承和疆域范围等问题，我国史籍记载和学者论证，均说法不一。本文根据有关史料考证了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西突厥出现的时间及其领导人，《北史》说达头旧为“西面可汗”。《隋书》、《通典》均说阿波可汗为西突厥之创立者。本文认为，这种记述混乱而不足为证。实际情况是阿波可汗受到东突厥汗位继承者沙钵略可汗的袭击，从东突厥逃到西突厥投靠达头可汗，并非东西突厥分裂之始，阿波更不是西突厥之祖。《新唐书》对上述说法已有所匡正，认为到达头可汗时，“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一般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在具体表现上也不一致。有的认为西突厥的创立应在公元582年(即达头可汗时)；有的认为应在公元611—612年（射匮可汗时）。本文经过论证，认为西突厥作为一个政治、地域和民族实体的出现，并不始于六世纪八十年代，而是六世纪中叶，即在达头可汗的上辈室点密时。关于组成西突厥的各部，本文对《新唐书》中记载的“十姓部落”进行了分析论证，指出“十姓部落”前后有两个含义，指的是不同的内容。早期的十部有：都陆、弩失毕、葛逻禄、处月、处密、伊吾等诸种。其后因各部落自身的繁衍，大量吸收其它部落，实行众子分封制等原因，使原来的十姓部落发生了新的变化和新的组合，到同娥设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时，设立左右厢，咄陆部、弩失毕部各自重新组合为新的五部，成为西突厥可汗直接统辖的主要部落。从此，这十部就“通谓之十姓部落”。所谓十姓可汗，主要就是指统治这十姓部落的可汗。这与西突厥前期的十姓部落已有很大不同。《新唐书》中提到的突厥可萨部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和民族实体，并不属于西突厥。关于西突厥前期的汗位继承，本文明确了两个问题：一、阿波可汗不是西突厥可汗。因他仅是投奔西突厥达头可汗的一位东突厥首领，他的活动都在东突厥领土上，他的后代也与以后的西突厥首领没有关系，故不应归入西突厥可汗之列。二、泥利可汗与达头可汗的关系。达头可汗在公元597至598年，率师东进侵袭东突厥和隋王朝时，被泥利可汗篡夺了汗位。在达头失败后，不能回西突厥，只好流亡于吐谷浑。关于西突厥的疆域问题，经本文考证，认为应是沿着天山山脉向西，经康国（费尔干纳盆地）、石国（今塔什干）北，到锡尔河中游时，才包括锡尔河两岸直到咸海的广大地区。

500 柯尔克孜族的故乡及其西迁　　杜荣坤　郭平梁

（《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柯尔克孜族是我国的古老民族，历史悠久。据1980年统计，共有十万九千人，百分之八十分布在新疆南部克孜勒苏自治州，其余分散在天山南北的阿克苏、温宿、拜城、乌什等县；黑龙江富裕县五家子屯也有少部分。但这些地方都不是他们原来的故乡。其先祖故乡，是历史上原居我国北方地区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今苏联土瓦自治州）。

本文详细考证了柯尔克孜族原来故乡的地理位置、隶属及民族名称的演变；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信仰、衣食风俗等情况。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他们的活动就和汉族历史结合在一起，从未间断。两汉时，该族称“鬲昆”、“坚昆”，分布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属匈奴管辖。汉朝征服匈奴时，随着匈奴的西迁，开始影响到古柯尔克孜人民的分布，使部分柯尔克孜也迁移到中亚天山一带。北魏至隋，称“纥骨氏”、“契骨”。六世纪中叶，受突厥统治时，常联合周围受役属部落打击突厥，有助于唐朝统一北部。唐代称黠戛斯，拥众数十万，胜兵八万，势力强盛，与唐朝的政治，军事联系密切，往来不绝，从而促进了黠戛斯和中原各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他们以马和珍贵野生动物皮毛向唐朝纳贡和换取丝绸。唐朝的丝绸织品也常贩至黠戛斯及其辖地吐蕃、葛逻禄、大食等地区。十至十二世纪辽、宋时期，在乌什和喀什噶尔的北方已有柯尔克族。元代称“乞尔吉思”或“吉利吉思”。元朝曾将一部分吉利吉思人迁至今东北松花江建肇州地，还将居于缙山(今北京延庆)的乞儿吉思迁至山东，使之从事农业生产。明代沿称乞儿吉思，属瓦剌管辖。十六世纪，东蒙古向瓦剌大举进攻，迫使瓦剌退居西北，一部分柯尔克孜人也迁至天山南北的伊塞克湖和阿克苏、喀什一带。清代，称布鲁特，曾一度服属于喀尔喀蒙古的扎萨克图汗，后隶于准噶尔。公元1702年准噶尔统治者属于沙俄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强迫柯尔克孜族从叶尼塞河上游河谷地区迁到西部伊塞克湖地区，后来有一部分又逃到中亚塔什干、费尔干盆地，一部分到了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一带。公元1755年清朝在统一准噶尔达瓦齐政权的过程中，曾把准噶尔军中被裹胁的少部分柯尔克孜族迁至今东北富裕县境内，这就形成今天分布情况。

柯尔克孜被赶出世代居住的故乡，根本原因在于北邻沙俄的侵略扩张。本文详细叙述了沙俄从十六世纪末一直到十八世纪初，变本加利的对叶尼塞河、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的侵略扩张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柯尔克孜人反抗沙俄侵略的英勇斗争情况。

501　叶尼塞吉尔吉斯的西迁与中亚吉尔吉斯民族的形成　　马曼丽

（《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

中亚天山一带的吉尔吉斯（柯尔克孜）民族，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民族。他们原先是从叶尼塞河地区迁徙来的。早在两汉时，中国的史籍就记载他们为“鬲昆”、“坚昆”，以后又称为“契骨”、“黠戛斯”、“柯尔克孜”、“布鲁特”等。最初，他们活动的地区在叶尼塞和额尔齐斯两河上游之间的地区，后来迁徙到中亚天山一带，成为吉尔吉斯民族的祖先。关于吉尔吉斯民族的形成，有的学者否认十世纪前叶尼塞吉尔吉斯人曾向天山迁徙，只说是十三到十五世纪蒙古帝国时期的一次迁徙，便最终形成了吉尔吉斯民族。本文探讨了这个问题，并对此说持否定态度。认为至迟在公元六、七世纪，已经有叶尼塞吉尔吉斯人向西迁徙，留居天山一带和我国西北其他地区。十三到十五世纪蒙古帝国时期，由于成吉思汗的后裔发生内讧，阿里不哥与海都反对忽必烈。叶尼塞地区属于阿里不哥的领地，因而他们的部队中都包括有吉尔吉斯部众。后因阿里不哥与海都失败，这些吉尔吉斯人便溃散或迁往天山一带。经过这次西迁，在天山一带集聚的吉尔吉斯人，数量日增，开始了中亚吉尔吉斯民族天山分支的形成发展阶

段。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初，由于沙皇俄国实行侵略扩张政策，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进而将侵略兵锋转向中国厄鲁特蒙古以及叶尼塞吉尔吉斯，逐渐占领了吉尔吉斯人的领地。吉尔吉斯人对沙俄的侵略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时间长达一世纪之久。吉尔吉斯人民遭到沙俄残酷的屠杀。以后终因寡不敌众，于公元1703年全部吉尔吉斯人翻越萨彦岭，迁徙到额尔齐斯河东南草原。在迁徙过程中，除少数人留在萨彦岭与唐努山之间的河谷地区外，大部分人均迁到西部伊塞克湖地区。这样，天山与叶尼塞两大吉尔吉斯分支，最终融合在一起，才有了较明确和稳定的共同活动地域，这才是中亚吉尔吉斯民族最终形成的阶段。本文观点鲜明，论证清楚，对吉尔吉斯民族史研究可资参考。

502　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　　　杨志玖

（《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本文共分三部分，即：元朝建立前的回回人、元朝建立后中书省的回回人和行中书省的回回人。文章较系统的探讨了中亚回回人在元朝的政治地位、作用等问题。回回一词，在元代主要是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回回人是元代色目人中人数较多、势力较大的一种。元朝建立前，回回人就和蒙古人有接触，其中主要是商人。有的商人曾参加过成吉思汗的创业活动。成吉思汗西征前，经丝绸之路与中亚通商的也是回回商人。蒙古人几次西征后，丝路交通非常发达，中亚和西亚的回回人通过各种途径（被俘、投降、经商、求官、应召）大批来华，其中不仅有商人，还有工匠、技师、军官、兵士、教士、贵族、平民、妇女等各色人，不少人还在政治上取得了较高的地位。回回商人中有些因善于经营，得到皇帝信任而进入仕途的。这种亦商亦官、以商为官的情况，是元代回回人的一个特点。回回官吏也多以善于理财或搜括财物而受到重用。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可汗位，是为元世祖。他即位前即接近汉人，延揽了不少汉族知识分子。即位初期，依靠的主要还是汉人。但此前来华的回回人仍然散据中央及地方，形成一个颇有实力的集团，元世祖对之也要加以笼络和利用。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立中书省，以汉人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后因王文统因参与李璮叛乱事件被诛，汉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大受打击。回回人阿合马继任中书省平章政事，代替王文统主管财赋之事，后一度还当过左丞相，当政十九年，颇受元世祖的信任与赏识。一门子侄，并列要津。省部官中，其党羽共七百多人，且多数为回回人。后因阿合马仗势为奸，专横跋扈，引起汉人朝臣及广大人民的怨愤，为益都千户王著等刺杀，其亲党也多伏诛或罢黜。但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并未动摇，仍有执政于中书省者。至元英宗（1320—1323年）时，回回人皆遭罢黜，无一任职中书省者。英宗被杀，泰定帝即位后，又以回回人倒剌沙为中书平章政事，寻升左丞相，泰定二年曾一度为御史大夫。元廷的行政、军事及监察机构中，都有回回人执政掌权，回回人之地位盛极一时。泰定帝死，文宗即位后，因倒剌沙拥立天顺帝，反对立文宗，遂与其亲属俱被诛杀。文宗在位五年，朝中宰臣无一回回人，其在政治上的势力遂一蹶不振，直至元朝灭亡。文章对中书省主要的回回人的事迹作了论述，对在各朝任职回回人的姓名、官职和年代均列表说明，对在各行省任职的回回人亦列表说明。计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

浙、江西、湖广等十省。其中以江浙省的回回人最多，共14人；次为江西，共11人；再次为云南，共9人。其余各省依次为：河南7人，陕西6人，岭北4人，辽阳、甘肃各3人、四川、湖广各2人。文章认为，回回人任职中书省及行中书省者为数不少，对元代的政治发生了一定影响；有些人受皇帝信任，位尊势重，对元代政局及社会影响较大。

2.宗　　教

503　西域佛教之研究　　〔日〕羽溪了谛著　许敦谷译

（《燕京学报》1928年第4期）

羽溪了谛对西域文化颇多研究，为日本研究西域文化史的著名学者，早年著有《西域之佛教》一书，由贺昌群先生译出，由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1956年再版。本文是有关西域佛教的专论，文章根据考古资料和其它论著，论述了西域佛教的源流、文化、艺术和经典。西域一词，自前汉始用，其范围乃指玉门关与阳关以西之地，包括今新疆、撒马尔罕、土耳其斯坦、波斯和印度等地。自十九世纪末叶以后，因俄、德、英、法和日本的中亚"探险家"，在新疆地方发现了许多为世人所不知的古代语言文字所写的佛教文书和佛教艺术品，促进了学者们对西域佛教的研究。文章追溯了各国"探险家"在中亚进行考古发掘的主要人物、地点、过程、收获和论著，并根据中国史书、经录、僧传、西域旅行记等文献和中亚考古发掘的研究资料，着重研究了新疆地区塔里木盆地，主要是于阗、龟兹和高昌的佛教。文章论述了新疆地区佛教的源流。认为从公元前260年顷，由统一印度的阿输迦大王派高僧末阐提，将佛教由中印度传布于印度西北境，继而蔓延到阿富汗斯坦、土耳其斯坦及波斯北部；同时论及迦湿弥罗及犍陀罗在公元一世纪中叶并入大月氏版图，佛教渐兴，至二世纪中叶迦腻色迦王时代臻于极盛，使佛教普及于北印度全部。这两系佛教互相交涉，开始东进，将佛教传播至新疆地区。对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文章根据史籍文献的记载和考古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于阗、龟兹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二道的要冲，从西汉时即与中原王朝有交往，更为中国与西域交往必经之地、印度佛教在公元前一世纪时，由迦湿弥罗国的罗汉毗卢折那将小乘佛教传入于阗，至公元三世纪中叶，大乘与小乘二教已经势均力敌，至四世纪末，于阗已成为纯粹的大乘教国，成为中国大乘教的策源地。至于佛教传入龟兹，当在公元纪元前后。从公元三世纪中叶以后，此国王族出身的沙门、居士及官吏，在弘布佛教的事业上十分活跃，在中国的记录中，凡姓白或帛的西域人均为龟兹王族。说明佛教在龟兹上流社会中已占很大势力。龟兹佛教也曾经历了一段大、小二乘并行不悖的时期，其后逐渐演变成纯粹的小乘教国。高昌因地理关系，佛教的传入较于阗、龟兹为迟，在公元一二世纪以前已传入，至四世纪后半叶，佛教已成为高昌国教，为大乘教国。文章最后论述了在塔里木盆地南北两边及敦煌所发现的用古代语言文字所书写的佛经。这些语言大体可分为伊兰语系、印欧语系及突厥语系三种。属于伊兰语系的有粟弋语及于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有龟兹语及覩货罗语；属于突厥语系的有突厥语。作者对这些语言文字的来源、演变和传播，以及用这些文字所写之佛经，均作了详细的论述；对各国学者从事语言文字研

究情况和对各语种语系之归属亦作了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还对佛教大乘、小乘教派流行的原因和佛教艺术的传播进行了分析，说明了情况。本文篇幅较长，引用资料丰富，论证细密，是研究丝绸之路上佛教传播情况的一篇重要参考资料。

504　佛教下之西北　　　　顾颉刚

（《西北通讯》1947年第7期）

佛教传入我国时期，说者不同，有谓汉哀帝时，有谓汉明帝时，其说虽不一，然东汉初期，久为中土所知，是为不可怀疑之事。然佛教传入中国，最初循陆路而来，此陆路即张骞"凿空"所通之西域大道。西域一隅，不啻中印文化交通之媒介地，传播文化之桥梁。因此，研究"丝绸之路"，研究西北史地，对此不能不予注意。作者在本文中，对佛教传入之时间、地点、条件等，均作了简要论述，并且对佛教在西域得以自由传播、发展的历史背景有所分析。同时对东汉以至于唐代，来我国传教的西域佛僧之国籍，也有所叙述。另外，对于我国河西以至高昌之间，名僧辈出的原因也作了考查。盖因河西之地，为西域通内地之孔道，其当地人士多谙胡语，信佛法，自然受佛教影响及熏陶，较其他地方为甚。

505　佛教东渐的传说　　　〔日〕白鸟库吉著　朱彤樵译

（《西北论坛》1948年第1卷第4期）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问题，历来争论较大，众说不一。有谓在秦始皇时即已传入，有谓汉武帝时传入，有谓汉明帝时传入，后世学者主张哀帝、明帝时传入者较多。本文作者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当在后汉明帝建白马寺之前，而在西汉末年，公元前二、三年事。因为楚王英奉佛，祀浮图，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在后汉之初毫无疑义。至于佛教传入中国之道，作者认为非止一道，但主要传入之处，当是《汉书》所称之"罽宾、乌弋山离道"。因为，自古以来，希腊、波斯等国，对中国丝绢要求炽烈，为求丝绢而最早来往者常经此道，后遂成为中西交通之要冲。此道不仅在汉时，且后世屡被纪录，如法显、昙无竭、宋云、玄奘等人，均由此路入印。所以罽宾国（即乾陀罗）与中国交通，一直到王莽时代与西域断绝交通前，非常频繁。由于西方诸国对中国丝绢十分热望，贩运丝绸商人络绎于途，而佛教僧侣，随着丝绸贸易人群，遂将经卷传入中国，后为楚王所信，此即佛教传入之始。

506　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序

（《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任继愈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现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写的序。概要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传播的

社会原因和发展历史。认为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受中国封建经济基础和政治的制约，而且要与传统的宗教、哲学和其它文化思想进行交流和融合，其中受儒家的影响最大。宋以后，三教会同，佛教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而日益衰微。

早期佛教是为当时的印度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后期的佛教大乘则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佛教开始传播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以后南到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细亚。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佛教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为了在中国站住脚，先要与中国本土的宗教迷信特别是道教相融合，中国人也用看待道教的眼光来看待佛教，初期的佛教虽说佛、道融合，实际上是佛教融于道教。南朝慧皎在评论三国魏地佛教时，认为很不符合佛教的规矩。

中国佛教史的发展，主要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汉唐和封建社会的后期宋元明清历史时期进行的。因此，中国佛教历史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斗争的关系至为密切。佛教传入时，所依靠的社会力量是汉代的皇室及上层贵族。在宫廷帝王及贵族们的特权垄断之下，神仙长生，祠祀求福，也是一种奢侈的精神享受特权，一般老百姓办不到。三国时，佛教传播更为广泛，广大群众只是被作为特权贵族施舍的对象才接触到它。

中国哲学史，以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历史断代来划分。佛教史接触涉及的问题和中国哲学史有许多共同或相关的地方，因而对佛教史的分期力求和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一样。哲学史、佛教史所讲的内容分属两个领域，但它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同一个中国社会。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二次大一统王朝的重建，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对当时世界文化有过积极贡献。佛教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南北朝时期的滋长发展到盛大，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许多宗派。宋元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社会政治条件的改变，中国的封建主义从思想意识的各方面都在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也更趋强化。经过隋唐时期三教鼎立，走向宋明以后的三教会同，形成了以儒为中心的儒教。佛、道两教形式上走向衰微，实际上佛道两教的宗教精神已渗透到儒教内部。儒教之成为宗教，多得力于佛、道两教为其支柱，而在两教中，佛教则起着重要作用。清末民初，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也起了相应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佛教在社会上仍有影响，某些佛教宗派又有所抬头，但这时西方现代思潮涌进中国，佛教所服务的对象及其社会作用也与古代佛教有所不同，它是欧亚现代思潮汇合时期的佛教。

佛教属于唯心主义宗教体系，它的逻辑分析、心理分析相当细致，辩证法思想也相当丰富，佛教哲学比起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和中国的封建主义哲学都更精密。正是由于佛教的输入，才使得中国的宋明理学改变了它的面貌，完整地构造了儒教的思想体系。也正是由于佛教的传播，才使得中国的道教在某些方面吸收了佛教的内容，形成了佛教道教交互影响的局面。中国佛教是在中国发展成长的，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

伴随着佛教的宗教活动，同时丰富了我国的音乐、舞蹈、绘画、建筑、文学等各个领域，而且也推进了我国与邻国的文化交流，加深了与邻国友谊和了解，研究佛教史不

仅对古代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有重要意义，对今后的国际文化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507 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　　吴焯

（《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

佛教先传入古代西域的于阗、龟兹等地，然后再传入内地，这是中外学者多年来研究的成果并已成为定论。但本文作者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作者运用考古发掘所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后，提出了新的观点，得出了佛教传入内地较传入西域为早的结论。此结论颇有新义，可供宗教史和丝路学研究者参考。

从位于丝路南道的于阗、鄯善发现的汉佉二体钱和在西伯尔汗贵霜早期墓葬中的大量副葬品的时代、艺术表现等方面考察，只有到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贵霜迦腻色迦王即位真正信佛后，佛教才可能随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交往，在塔里木的绿州地区发挥影响。从于阗、鄯善一带发现的寺院遗址、内部的壁画雕塑考察，这些遗物均不早于三世纪。从民丰县尼雅遗址东汉墓中的蜡染棉布上的朦胧佛教艺术考察，是目前新疆发现最早的佛教艺术品，时间在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初。在此之前，在无寺院和佛像情况下流通佛教，时间也不会早于二世纪。

在丝路北道，疏勒唯一的佛教遗存三仙洞，时间不会早于四世纪。龟兹的克孜尔、森姆赛姆等千佛洞，窟形建造是仿照印度支提窟的形式，与库什的巴米扬石窟相似，时间也相差不多，可以肯定佛教是经巴米扬进入龟兹。龟兹绘画侧重于萨珊波斯影响，画中几种纹样是公元266年以后才固定下来。故龟兹石窟不会早于三世纪；佛教传入应在二世纪中期较为可信。

班超自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出使西域，历时近三十年。班勇自小随父在西域生活，后又在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至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经略西域，经常往来于西域诸国。如此时西域流行佛教，班勇不可能不知。联系班勇的西域见闻考虑，西域诸国在一世纪末二世纪初并未流行佛教。

佛教传入内地的时间，“永平求法”之说基本可信，故可定在一世纪后半叶。但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并未马上流通，而是到二世纪中期的桓帝以后方得传开。“永平求法”系汉明帝派专使去大月氏“写取佛经四十二章”，是洛阳与大月氏之间直接往来。佛的译名“浮屠”，是来自印度的古代方言。“佛”却来自龟兹语。比“佛”更古的“浮屠”并未经过西域语言的媒介。只有到汉末三国时，西域高僧来内地传教，西域才对佛教入华真正有了影响。既然如此，就不存在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比内地早的问题。另外，从四川乐山的东汉崖墓中的石佛坐像、武昌莲溪东吴墓中的陶俑、以及湖北鄂城、湖南长沙、浙江武义的铜镜等佛教文化遗存考察，皆系二至三世纪遗物，其年代和佛教艺术形式规范化的程度，均不晚于新疆；特别是江南一带传入时间，还比西域要早。

508　从《张骞出使西域图》谈佛教的东渐　　　孙修身

（《敦煌学辑刊》1981年第2集）

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国内外学者大致有三种意见，即明帝求法说，伊存授经说和武帝获金人说。从明帝求法说者较众，似已成为定论。但本文作者则持武帝获金人说。因为敦煌壁画为此说提供了一条形象的资料。

敦煌一唐初开凿的洞窟，有一幅由四个画面组成的《张骞出使西域图》，一为汉武获金人后，率其僚臣拜谒金人的情景；二为汉武送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佛名号的情景；三为张骞往大夏时的旅途生活；四为张骞到达大夏国时情景。汉武获金人并派张骞使大夏问佛名号，虽不见《史记》和《汉书》，但《魏书·释老志》却有记载。作者根据《释老志》及《张骞出使西域图》及其榜题文字，做了对照研究，从佛教的发展和传播、佛教崇拜偶像和偶像的制作、佛教东传时间等三个方面，对汉武获金人说，进行了补充论证。认为在西汉初年，匈奴强盛时曾控制了河西走廊及西域广大地区，其势力还达到葱岭以西，《史记·大宛传》有："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的记载。当时安息、大夏早已是佛教到达的地方（本文内容对此有所考证）。这些地方亦开始了佛教偶像的制作。当匈奴骑兵掠夺西域各国时，将佛像作为战利品带入河西，加以膜拜是极其可能的。所以《史记》、《汉书》有"匈奴祭天金人"之说。汉与匈奴在河西之战，祭天金人又成了汉军的战利品而带入长安，这样，西域佛像要比佛经早一个世纪传入了中原。至于伊存授经，只能说是佛经传入中原的开始。

509　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任续愈

（《光明日报》1963年2月15日）

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乔达摩（公元前565—483年），相传为净饭王太子。他生于加毗罗卫（现尼泊尔王国），一生活动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释伽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号。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和佛经传入中国。初期只在皇族及上层贵族地主阶级少数人物中有影响，他们认为佛和中国的黄老之术差不多，是方术中的一种，造祠奉祀可以祈福永命。当时，也有少量佛寺，那是为满足西域来华商人的宗教信仰而建，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不大，在哲学理论上也没有表现出它独特的思想体系。汉代人所理解的佛教，可以说就是道术，是以宗教精灵不灭的观点理解佛教，认为它有宗教奇迹，能不死、不伤、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汉武帝曾令方士求不死之术，《淮南子》也讲"全生保真"，主张炼形炼神，以企肉体飞升，这与佛教原意大相径庭。佛教从来就反对炼形炼神、长生不死之说。释伽牟尼在鹿野苑初次说法，就从分析物质世界变化无常入手，提出四谛、十二缘生的宗教学说，教人不要相信有无常不变之事物，更不用说有长生不死之人可以飞升。汉代传译的"四十二章经"，是编译者用当时中国黄老之学和道术理论去理解它，所以涂上道术思想和黄老思想色彩。"因果报应"之说，虽系印度传入，但对其理解也非印度佛教本意。作者引用大量事例，说明当时佛教传入以后，

由于中国宗教占统治势力的是祠祀，所以，佛教也被改造为祠祀的一种，而佛教的大乘、小乘理论并没有被人们接受。魏晋时期的佛教理论，在玄学唯心主义流行的社会基础上，受到统治者的提倡。从魏到东晋的二百年间，共译出佛教典籍七百零二部，一千八百八十八卷，不论部数和卷数都较东汉为多。这时的佛教哲学思想得到重视是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在哲学界引起注意、发生影响的是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般若学说是印度小乘佛教进一步向彻底唯心主义的发展。这种学说是用否定的思辩方法（所谓负的方法）以论证现实世界虚幻不实。当时，中国的学者和僧众，並未完全按印度般若空宗的理论去理解，而是用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去理解。认为般若学的基本涵义是阐明"本无"的原理，"无在无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当时的佛教重要领袖道安、慧远即其代表。正由于此，道安学派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支持，並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南北朝时门阀士族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上长期存在着极严重的不平等，这时佛教从维护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解释这一不平等现象，它与中国固有的儒家封建观念十分吻合，于是就形成佛教和中国唯心主义相结合的哲学思想。儒家封建观念，一直宣扬被统治者要无条件的为统治者效忠，宣扬"贫而无怨，富而不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涅盘佛性学说，则描述人死后成佛的可能和成佛的途径。涅盘这个精神世界的特点是"常、乐、我、净"，只有快乐，没有痛苦。他们宣称真正的幸福，在地上並不存在，故意地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苦"平列起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南北朝成为最有毒素的麻痹广大人民反抗意志的口号。

佛教经过南北朝的广泛传播，寺院经济有所发展。有了独立雄厚的寺院经济，佛教宗教哲学有条件进行创造性的发挥。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已基本上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不再靠翻译外来的经典了。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广泛发展后的最繁荣昌盛阶段。这时的佛教哲学思想，仍然和中国当时封建统治者有密切联系，成为中国的宗教哲学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积极为它的基础服务。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哲学思想有它的历史特点。唐朝统治者借鉴隋亡于农民起义的教训，强化了思想意识的统治。唐代对儒、释、道三教都很重视，唐太宗自己不信佛，但他利用僧人玄奘，调用国家人力物力，帮助翻译佛经，到处建寺、度僧。唐朝的几个主要宗派的建立、发展和当时统治者支持有关。在统治者大力支持下，出了不少有学问的和尚，建立了几派不同的学术体系。当时各家各派都在不同的角度论证"成佛"的可能，而且一般都作了"保证"。从东汉到隋唐，将近一千年的漫长时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按照中国当时的哲学思潮和当时的社会需要，来接受和宣传这一外来宗教哲学的。它不是死搬硬套印度经院哲学的法相宗，而是经过引申发挥，甚至在印度佛教学说中很少根据的一些宗派，如天台、禅宗也相续产生。正是由于中国佛教哲学有这种特征，它便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最后论述了今天研究佛教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510　六朝时代中国境内之西域佛僧　　江应梁

（《新亚细亚》1936年第12卷第4期）

六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纷乱不安定的时代，但西域却有许多高僧于此时来到中

国，中国士大夫为之倾倒，努力学习佛教教义。因而使佛教哲学，在此纷乱年代扎根开花，实为中国文化上之一大奇迹。作者根据历史记载，对晋永嘉时（公元307年）至元魏肃宗正光后（公元524年）二百余年间，中原佛寺及僧侣数量增减情况作了比较。认为造成当时佛寺佛徒在数量上高度发展之原因，主要是当时的统治者笃信佛法，积极倡导，更兼远道东来的许多西域僧人，宣扬佛法所致。故《洛阳伽蓝记》载有："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乐中国风土，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比化之民，万有余家"。洛阳如此，中原及南方各郡县莫不如此；比化之民如此，传法僧侣，亦莫不如此。隋唐时，中国有大批僧侣去西域求学，虽亦有高僧东来，但对印度文化输入、传播、发展，十有八、九是中国僧侣之力。六朝却与此相反。隋唐以后，西域来中国之僧侣，除文化上发生关系外，对政治上丝毫没有影响。唯六朝时期来中国的西域僧侣，不仅将印度文化带入中国，并发扬光大，且多对中国政治发生直接关系，此乃为当时之一特殊情况。作者对这一特殊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六朝自西域来的高僧，绝非一般庸庸者流，彼等有学识，有灼见，不仅能以宗教思想取得帝王及士大夫的信仰，且更能以政治才能，作其传教之阶梯。所以西晋及南北朝帝王士大夫，不仅奉佛，更欲利用西域僧侣之政治才能，作为治理军国大事之襄助。例如符坚欲得鸠摩罗什，固然钦佩罗什的学问，同时也想借重他的政治才能。符坚死后，罗什便做了吕光的高级军政顾问。浮图澄参赞石勒军务而取得信任，昙无谶成为沮渠蒙逊和后魏拓跋焘的政治牺牲品。当时东来僧侣，虽非人人都直接对国家军政大事发生关系，但多数与帝王士大夫间有密切交往，如帛尸梨密、求那跋陀罗、求那跋摩等。由于此种关系，对国家军政大事总会发生一定之影响。因此，六朝自西域东来之佛僧，对中国政治有深切之关系。作者还对西域佛僧带到中国来的文化，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佛经的传入及翻译，使印度和中亚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渗透；另一种是佛教艺术传入，对中国千余年之绘画、雕刻、建筑等方面，给予了极大影响。作者还就晋初迄南北朝末三百年间，西域东来佛僧，对中国文化有特殊贡献，而又为史书上可考见的二十余人，对他们学问上之造诣，所翻译之经典，分别列表予以说明，从而对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一目了然。六朝时西域高僧所以大量东来，且能与中国政治发生关系，作者认为一是中西商道之畅通，一是民族的迁移，从而造成西域佛僧对中国文化政治上之极大影响。

511 汉唐时期新疆佛教流行情况述略 陈 戈

（《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佛教在新疆历史中占有极重要的一页，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曾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迄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为此，本文对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流行情况及其不同教派作了概括论述，是研究新疆古代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据有关的考古资料，分析了佛教图像、寺庙、石窟等出现的时间，以及《大唐西域记》、《于阗国授记》等书的记载，认为佛教大约于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前后，即西汉昭帝、宣帝之时开始传入新疆。经百余年到东汉时期，已得到普遍的传播和信仰。其所以普遍流

行，并在大部分地区占了统治地位，乃由于各地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和倡导。在和阗及其附近地区，据《魏书·西域传》记载："于阗国，……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法显记云："于阗……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喀什及其附近地区，据《魏书·西域传》载"疏勒国……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释迦牟尼袈裟一，长二丈余"。国王将袈裟作为贡品，国内的佛教盛况可想而知。库车、焉耆及其附近地区，均是丝绸之路北道必经之地，这个地区的佛教盛行情况与和阗地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晋书·四夷传》："龟兹国……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魏书·西域传》："焉耆国……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吐鲁番地区，古时称车师和高昌，佛教在这里同样盛行。据《魏书·高昌传》、《北史。西域传》及《隋书·西域传》均记载这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天山以此地区的吉术萨尔，古称车师后国或金满，唐于此设北庭大都护府，佛教亦很流行，上述地区所存的佛教遗迹很多，主要有寺庙、佛塔、石窟寺等，其中有的塑有各种佛像，有的绘有精美的壁画。于此可见，汉唐时期新疆地区寺塔林立、僧徒万千的社会生活面貌。

新疆各地流行的佛教教派既有大乘教、也有小乘教，不过各地对大、小乘教偏重程度有所区别。以库车为中心的焉耆、拜城、阿克苏、及其西南的喀什、塔什库尔干和其东南的婼羌等地以小乘教为主，同时兼行大乘教；和阗、莎车及吐鲁番、吉术萨尔等地则以大乘教为主，同时亦兼行小乘教。另外，在库车、和阗、吐鲁番等地区有密教流行。彼地流行大乘教，此地奉行小乘教，主要是由于各地统治阶级对大、小乘教的不同贬褒态度所造成，也与各地区统治阶级的不同历史情况有关。

512 《于阗教法史》 王尧　陈践译解

（《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于阗教法史》是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最著名的卷子之一，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的《于阗国授记》互相印证，对于了解于阗的历史和佛教史颇有价值。本文是根据法国科学院西藏学研究中心和巴黎国立图书馆联合出版的敦煌藏文写卷的影印件翻译的，並参考《历代名画记》、《宋高僧传》，对国外学者托玛斯和埃默瑞克的英文译文和研究成果补充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有：（一）于阗名称的变动。据史籍和文献记载，于阗的名称还有：瞿萨旦那、涣那、屈丹、于遁、豁旦、地乳、五端、兀丹、斡端、忽炭，唯独藏文称李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于阗国王在唐朝被赐李姓，以王姓冠于地域，遂称"李域"。（二）地乳一名的来源。与藏文Sa-nu一样，都是Khotan一词的意译。据《大唐西域记》记载：于阗国王年老无子，便向天神祈祷求子，神像额上迸出一个婴儿；又祈祷天神养育，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饮吮，因而长大当了国王。因他是地乳所育，便把国号称为"地乳"。《于阗教法史》的记载又与此不同，说是印度天竺国阿育王带着儿子和随从到于阗，因嫉妒儿子会超过自己，便把孩子扔在那里。当时北方天王和吉祥仙女使土中流出了奶汁喂养王子，才将性命保存了下来，因而把王子取名为"地乳"，以后当了于阗国王。（三）于阗王室的续统。国王姓尉迟，又作伏阇，都是

同字异译。文中共考证出十五代国王的名字和一些流寓到唐都长安的王族人员。如著名的尉迟敬德，被唐朝封为鄂国公，一门显贵，煊赫无比。（四）文成公主病死的原因。汉藏历史文献中都没有记载，而《于阗教法史》却透露出她因患天花而死。《于阗教法史》虽为佛教神话传说，但仍可从中窥知一些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情况。

513　龟兹佛教与石窟　　姚士宏

（《新疆艺术》1984年第2期）

本文论述了龟兹佛教与石窟的关系。源于印度的佛教，约在公元前后由丝绸之路传入龟兹，至三世纪中叶已得到广泛传布，大约到十二、三世纪后，由于龟兹回鹘改信伊斯兰教，佛教在龟兹始告结束。佛教在龟兹流传一千多年，其间虽因民族战争受到打击或压抑，但总的状况是兴盛不衰。又因鸠摩罗什大师的影响，兴盛过大乘佛教，但长期占据龟兹佛坛的是小乘佛教。直到安西都护府时期，因受中原佛教思想的影响，龟兹佛教才由小乘转为大乘。故龟兹实为我国小乘佛教的一大中心。佛教的兴盛，必然促进佛教艺术的发展。现今存留的克孜尔、克孜尔尕哈、森姆塞木和库木吐拉四大石窟，便是当年龟兹盛行佛教的重要见证。文章详细介绍了这四大石窟的窟教、年代、形制、塑像、壁画的情况及特点。克孜尔石窟编号的有236窟，窟形尚完整的有135个，其中有90个是供僧侣巡礼观像和讲经说法的支提窟；45个是僧尼居住并充作禅室的毗诃罗窟；还有一些异形窟。克孜尔石窟的主体塑像多已损毁，仅存几身残躯，保存壁画的石窟有80个，壁画题材主要有佛本生、因缘和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取材广泛，内容丰富，现可识别的有七、八十种，保存之多，居全国之首。整个壁画反映的是小乘有部思想内容。克孜尔尕哈石窟编号的有46窟，在窟形尚完整的38个窟中，支提窟和毗诃罗窟各占一半。现塑像无存，保存壁画的有10个窟。壁画题材和风格比较接近克孜尔。森姆塞木石窟编号的有52窟，目前能看出窟形的有30个，多为支提窟，毗诃罗窟很少。塑像也无存，保存壁画的窟有20个，多绘因缘故事，多取动物题材，是龟兹石窟中动物画最著者。从壁画内容看，此处仍是以小乘有部造像占优势的石窟群。库木吐拉石窟编号的有110余窟，目前窟形完整的约有60个左右，多为支提窟中的中心柱窟和方窟，毗诃罗窟较少。目前保存壁画的窟有40多个，在少数窟内还保存有塑像。壁画内容以因缘故事为主，列佛和千佛壁画也比其他石窟增多，明显地反映出向大乘佛教转变的痕迹。这里还有一批汉风窟，壁画内容已明显转入大乘佛教系统。壁画的造型特点和画法，都具有唐代绘画艺术的风格，有的窟还直接画出汉人顶礼膜拜的形象。这都是龟兹石窟中特有的现象。这里还有一批龟兹回鹘时期的窟，壁画也多属大乘佛教思想内容，画风接近敦煌莫高窟唐末五代宋初时期的作品，题名款式也都采用中原手法。有的窟并用汉文、回鹘文、龟兹文合壁榜书。总之，龟兹石窟不仅在时间上互相蝉联，而且内容丰富多样，犹如一部完整而形象的龟兹佛教史，可以看到龟兹佛教的始末和演变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514　古代库车的佛教与佛教遗址　　　买买提·木沙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

库车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从公元前二世纪起，它就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在汉文文献中，古代库车被称作"龟兹"、"丘慈"、"拘夷"、"屈茨"、"屈支"、"丘兹"、"归兹"、"鸠兹"等。本文介绍了古代库车的佛教与佛教遗址。古代库车的区域，包括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专区全部和库尔勒专区的部分地区，曾是一个佛教十分兴盛的地方。公元前273年，佛教文化即已传入龟兹。在公元三世纪时，佛教在龟兹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并把佛经传入中原，为中原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到公元四世纪时，龟兹的佛教大盛，并培育了著名的佛学大师鸠摩罗什。他于公元344年生于龟兹，其母为龟兹国王的妹妹。公元384年，他去中原传布佛教，公元412年死于长安。他在这28年中共翻译佛经98部485卷，还培养了800多个弟子，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到公元七世纪时，龟兹更成为天山南麓的一个佛教大国，有伽兰百余所，僧徒5000余人。由于古代库车佛教兴盛，因而留下了大量的佛教石窟遗址。在库车县境内有库木吐拉千佛洞、森木撒姆千佛洞、克孜尕哈千佛洞、玛扎伯哈千佛洞和苏巴什千佛洞；在拜城县境内有克孜尔千佛洞、台台儿千佛洞、温巴什千佛洞和托乎拉克店千佛洞；在新和县境内有托乎拉克埃肯千佛洞。这些石窟和壁画艺术，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古代库车的社会生活，内容丰富，风格独特，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为研究古代新疆历史的无价之宝。作者还简要介绍了五个主要千佛洞的具体地址、洞窟数、壁画内容和建筑形式等。这些石窟艺术是古代库车人民的伟大贡献，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515　库车发现的卵石佛像及藏文题刻　　　刘松柏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卵石佛像发现于昭怙厘大寺遗址以南二十多公里的库车河的主泄河床之西沿。很可能卵石刻像的原处位置即在昭怙厘大寺的某座寺院内，大寺遗址就在库车河出山口两岸。卵石质坚沙细、灰色、椭园呈三角形，佛像刻线多存，形态清晰可鉴。藏文题刻横书于佛像左腰际。用卵石作为佛像刻画的材料在库车地区还是首次发现，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创造艺术。卵石线刻佛像因材施刀，随形构图，刀痕线劲流畅，形态适中丰润，神采庄重端严，堪称线刻佳作。与龟兹壁画比较，它有几个独有特点，一、头上肉髻，大髻上刻小髻；二、莲叶内刻绘勾回线条；三、藏文左侧横刻。若除去这些特征，在风格上与晚期龟兹风格的库木土拉28、29窟顶方格坐佛形态完全一致。由此不难推测这是库车佛教文明与西藏佛教文明的融合物，并意味着两地间佛教文化的联系。关于藏文题刻经专家甄别，即为汉文的"华吉祥"佛。此即唐朝密宗高僧不儿(705—774年)所译《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刊之三十五尊佛中的第二十四尊。三十五佛刻塑的端像极为罕见。西藏佛教格鲁派宗喀巴大弟子，第一世达赖喇嘛僧成（1391—1474）书写善巧，精于刻铸，为建集密诸像曾刻三十五佛，并书佛名号。可见藏地是有刻塑三十五佛并书名号的传统。所以库车发现"华吉祥"佛线刻卵石应是库车佛教时代从藏地移植过来的密教文

化遗物。至于刻石年代，作者分析了在库车古代漫长的宗教文化史上，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盛衰交替的过程后，认为其相对年代可以限定在佛教昌隆的赤祖德赞普统治时期，即公元815—836年之后。

516 魏晋时代的鄯善佛教 陈世良

（《世界宗教研究》 1982年第3期）

鄯善原名楼兰，为西域古国。自东汉至三国，塔里木盆地互相兼并，仅存五国，鄯善为其之一，至两晋末未尝有变。魏时鄯善领属有且末、小宛、精绝、楼兰诸地，从尼雅等地出土佉卢文书证明，晋代鄯善仍领有以上诸地。它东临敦煌，西接于阗，南界婼羌，北交焉耆、龟兹，正当丝绸之路塔里木盆地东端咽喉通道。西汉时属西域都护府管辖，东汉时则属西域长史，直至东晋十六国时，历代中央王朝及地方割据政权，都与鄯善保持着程度不同的隶属关系。因而与内地必然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影响。本文专门论述了魏晋时代鄯善佛教及其对中原的影响。

佛教何时传入鄯善，无史可据，但佛教传入于阗和内地时间约在公元前五十年左右。传入鄯善的时间应晚于于阗，早于内地。对鄯善地区佛教传布作较全面介绍的有《法显行传》。当时鄯善国王虔信佛法，并有僧众四千余人。据《魏书·且末传》记载，当时鄯善有户八千余，在八千余中有僧四千余人，可见佛教势力之大。再参照出土佉卢文书，佛教已成为当时鄯善的"国教"。佉卢文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在古代印度西北及巴基斯坦一带地区所使用，它是印度语系中的西北俗语。公元前后，随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佉卢文已在我国于阗、鄯善一带流行，公元三世纪前半期，佉卢文已成为鄯善地区的通用文字。到了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前半叶，随着贵霜王朝的复灭，无论于阗或鄯善才停止了佉卢文的使用，并成为一种"死文字"。佉卢文的流行，肯定与佛教有关。公元三、四世纪即曹魏西晋时，是鄯善佛教极盛时期。法显路经鄯善时"悉小乘学"。但据鄯善所处地理环境和其它材料分析，大乘佛学在鄯善也有过影响。因为鸠摩罗什在西域传布大乘佛学十有余年，各国深受影响，鄯善不可能例外；罽宾沙门昙无忏到鄯善传布大乘学不无可能；大乘流传内地须途径鄯善，且来往大乘高僧及佛典甚多，鄯善定会受到影响。从发现的大量佉卢文书来看，大乘学在鄯善还有一定势力。但是在法显路经鄯善时，为什么悉小乘之学呢？据作者分析，因鄯善地处丝路东段咽喉，受南北二道即于阗和龟兹佛教的共同影响，可能大小乘并存。最早小乘传入，曹魏之前又传入大乘，到了西晋时大乘势力有了很大发展，当鸠摩罗什离开龟兹后，小乘复又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当法显路过鄯善时"悉小乘学"了。魏晋时代鄯善佛教情况，还可从考古发掘的佛寺、佛塔遗址及佛教艺术遗物得到证明，而且还可证明鄯善佛教艺术与内地文化艺术的关系十分密切。

另外，还有很多佉卢文关于僧人不守佛门纪律进行处罚非常有趣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处罚多用经济手段，如罚绢、罚谷物、罚绵羊等。从而证明当时僧人拥有自己的财产，并且也有极为发达的寺院经济。甚至还记载着有的僧人在百姓家藏有谷物，有的从事交易，有的大量放债，有的买卖土地、奴隶或人口，僧人们不但娶妻生子，而且还

购买养子、养女，这与宗喀巴改革西藏僧侣的腐化情景何其相似？这种情况形成了少数僧侣地主剥削压迫大多数贫困僧侣的悲惨情景。这可以说是魏晋时鄯善佛数的一大特点。

517 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　　耿世民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78年第2期）

在新疆约两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佛教文化占了一千多年。对吐鲁番、库车地区来说，佛教文化甚至统治了一千五百年。因此，了解佛教在古代新疆传播的历史，对研究新疆佛教和内地佛教的关系，以及新疆古代历史、文化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佛教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公元前245年后，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支持下，佛教开始传入克什米尔、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公元后70年，月氏族丘就却在阿姆河以南建立了以佛教为基础的贵霜王朝。丘就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在位时。佛教已传入南疆和田地区，到了迦腻色迦王时代（约公元125—150年），佛教不仅流行于新疆，而且也传入了内地。关于迦腻色迦王以后南疆地区佛教流行情况，在法显和玄奘的《佛国记》、《大唐西域记》中都有记载，从中得知南部的和田地区流行大乘教，而北部的库车、焉耆则流行小乘教。新疆出土的以古代库车语、焉耆语写成的佛教文献及大量佛教为内容的壁画、雕塑和其它佛教艺术品，也都证明了公元后一千年里佛教在南疆的盛况。公元六世纪中期，突厥汗国兴起（公元552—744年），其西部领地包括新疆南部和中亚广大地区。公元582年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当突厥佗钵可汗在位时(公元572—581年)，佛教已经传入突厥，当时曾有不少北齐、北周僧人在突厥宏扬佛法，解译佛经。195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的突厥时代的碑铭证实了这一点。但与南疆古代民族不同的是，突厥最早是通过汉族认识佛教的。汗国分裂后，西突厥领有伊犁河以西及库车一带和阿富汗北部及印度西北部。这些地方自古就是佛教盛行地区，所以西突厥很早就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公元八世纪中期，回鹘（维吾尔的祖先）取代突厥，建立回鹘汗国(公元744—840年)。而回鹘人全面接受佛教，是九世纪中期西迁新疆以后的事，因在当地居民的影响下，逐渐由游牧而转入定居生活，同时也逐渐接受了佛教。早在八世纪前，就有一部分突厥人进入吐鲁番，并信仰了佛教，尤其是高昌、北庭一带。从许多回鹘时代的佛教寺院遗址、千佛洞的发现及其它佛教遗物的出土都说明了这一点。公元十世纪伊斯兰教正式传入喀什，十一世纪时其势力已扩展到和田一带。由于信仰佛教的高昌一带回鹘人民的坚决抵制，伊斯兰教在长期未能越过库车一线。直至公元十五世纪左右，佛教在新疆最终被伊斯兰教所取代。回鹘西迁新疆后，逐渐废弃了古突厥文，而采用源自粟特文的回鹘文。回鹘文佛经有三个来源，早期的回鹘文佛经译自古代库车语和焉耆语；还有许多佛教著作译自汉文；后来在元代也有一些佛经译自藏文。回鹘文佛典主要为大乘教文献，也有小乘教文献；回鹘文佛经主要为写本，也有元代刻本。考古工作者曾发现用回鹘文翻译的藏文大藏经中的经、论残卷，说明在高昌鹘时期，佛教之盛行和对佛经翻译工作的重视，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丰富发展了回鹘书面语。回鹘文佛教文献是维吾尔族的一份重要文化遗产，值得重视研究。

518 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　　孟凡人

（《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1期）

本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高昌回鹘佛教中的一些问题，可供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者的参考。

回鹘在漠北时期，最初信仰萨满教，继之又崇奉摩尼教，而在接受摩尼教之前又与佛教发生过密切关系。时间大约在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初。九世纪中叶，回鹘西迁高昌后不久即改奉佛教，一直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高昌回鹘何时始信佛教？作者否定了有些学者的宋初说。认为当在九世纪晚期至十世纪初左右。其没落与终结时间，当在公元1283年高昌回鹘王室被迫东迁甘肃永昌后，其原辖境内各封建王国的佛教始先后终结。若以终结时间最晚的吐鲁番王国为准，大致在十五世纪中叶左右。

作者继对高昌回鹘主要佛教遗迹的分布，如吐鲁番地区、吉木萨尔和哈密地区、焉耆地区、库车地区的寺院、石窟寺等遗址内发现的佛教壁画、经卷遗物作了简要阐述后，着重介绍了回鹘文佛经残卷的发现和二次大战前，德、俄、日、法、英、土耳其学者及战后中国和美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及译著。最后，作者论述了回鹘佛教与外界佛教的关系。由于高昌回鹘信奉佛教较晚，而其地又处于东西交通要冲，因此，它在形成自已独特的佛教文化过程中，必然与外界佛教发生较密切的关系。如佛教艺术方面与内地，特别与敦煌千佛洞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可以说高昌回鹘的佛教文化是汉族和回鹘两个兄弟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是研究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又因佛教与高昌回鹘王室相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高昌回鹘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因此，成为研究高昌回鹘史和文化史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

519 炳灵寺石窟与西秦佛教　　杜斗城

（《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

炳灵寺石窟在丝绸之路佛教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考古工作者曾在此石窟中发现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题记，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石窟造像题记。由此证明在建弘元年之前，炳灵寺石窟已开始修建了。炳灵寺石窟的造像、壁画，也是较罕见的早期佛教艺术。如"西方三圣"题材的造像，这在早期的其他石窟中还未发现。"西方三圣"中主要是无量寿佛，主张人们一心一意只念"阿弥陀佛"一句，以达"极乐世界"。说明这种"净土"信仰，早在西秦时便在西秦境内流行。隋唐以来的净土宗，主要宣扬的就是这种观点。炳灵寺壁中还有《维摩经变》。《维摩变》虽在我国现存石窟中保存很多，如敦煌莫高窟保存有唐代的就达四十余幅，但时间却都很晚。炳灵寺壁画中的《维摩变》画的是维摩卧病，在病中维摩与智慧第一的文殊相对辩论，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清谈风尚。文章介绍了炳灵寺石窟艺术的价值，也阐述了西秦佛教盛行的历史条件。西秦国祚甚短，仅只四十七年，佛教其所以甚盛，主要是统治者出于需要和大加倡导。据史载，西秦王仁，尊事沙门。圣坚行化至西秦，国王崇敬，即播释风，仍令翻

译。圣坚译佛经一十五部、二十四卷，大都流传至今。西秦境内不仅修石窟，译佛经，还流行“禅学”。当时，高僧中的玄高，昙弘、昙摩毗等都来西秦活动；高僧玄绍就在炳灵寺“蝉蜕而逝”。昙摩毗还出现在壁画之中，并有题记。禅学主张坐禅修道，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这无疑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欢迎。另外，西秦位于中西交通要点，炳灵寺一带是当时黄河的重要渡口，著名高僧法显、法勇等都在西秦立国时路过其境，这也给西秦佛教兴盛带来有利条件。

520 火祆教入中国考 陈垣

（《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期）

陈垣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史学家，一生从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曾任北大、北师大辅仁、燕京等大学教授、校长。建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等职。生平治学精勤刻苦，对宗教学、民族学、元史及校勘、辑佚等学均有开创性的成就。一生著述较多，特别是一些工具书的编纂，对史学研究贡献颇大、影响殊深。本文是我国学者对火祆教研究的开创之作，影响较大。

公元前五、六百年，波斯人苏鲁阿士德（Zoroaster），因波斯国有拜火俗，遂倡善恶二元之说，谓善神清净而光明，恶魔污浊而黑暗。人应弃恶就善，弃黑暗而趋光明。以火、以光代表善之神，因而崇拜之，故名曰拜火教。因为拜光、拜日月星辰，中国人以为拜天，故名之曰火祆教。祆者对天神之称，不称天神而称祆者，明其为外国天神也。公元226年，波斯国萨珊王朝时，火祆教为之大兴，一时盛于中亚，于南梁、北魏间，始名闻于中国。公元625年大食灭波斯，占有中央亚细亚，祆教徙遂移往东方。唐初，采取开放政策，西域商贾僧徒来中国者，日益增多，西京及西域诸州遂建有祆祠。祆字之由来，即起于此。唐武宗时（公元845年）佛教遭禁，并斥外来诸教，于是火祆、摩尼、景教均受株累。武宗末，禁渐驰，历五代两宋，祆祠仍有存者。作者考诸史籍，认为火祆之名，自北魏南梁始，其初为天神，《魏书》称高昌国俗事天神，又称焉耆国俗事天神。所谓天神者，以其拜天，其实是矢拜日月星辰。拜日月星辰，无异拜天，故中国名为天神。中国之祀胡天神，始自北魏。灵太后时（公元516—527年），胡天神初列祀典，其尊崇程度即可想见。胡天之祀，自魏开始，北齐北周继之，唐初遂设官置祝。火祆原称天神、火神、胡天神等，皆唐以前之称。唐初，祆字出现，始有祆之称。据作者考证，唐代之崇火祆，颇有类于清人尊崇黄教。唐代两京之有火祆祠，犹如清代在京师各处之有喇嘛庙一样。另外，唐代特为火祆祠设官，所谓萨宝、萨宝府祆正、萨宝府祆祝、萨宝率府、萨宝府史等，皆唐代为祆祠所设之官。由此可以想见该教在当时与国家政治之关系。唐代传入中国之外教，除火祆外，尚有摩尼、景教与回教。回教在唐代尚不称盛，记录亦绝少，但其他各教均有记载。大秦教在唐代本名景教，为基督之别派，即聂斯托尔派。因该教派不容于西欧，乃转而传播于波斯及中亚，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入中国，寺称波斯寺。波斯灭后，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改波斯寺为大秦寺，故人们称其教为大秦。摩尼教起于公元后二百年，波斯人摩尼取火祆教、基督教、佛教诸教义而成立，武后时传入中国。唐中叶，数次借兵于回纥，其教依回纥人

势力，颇盛一时。作者还考证了唐代火祆、大秦、摩尼三教不同之处。大秦、摩尼均有传教举动，且有翻译经典流传于世，信奉其教者，有外国人和中国人。火祆教则不然，其人来中国并不传教，也不译经，故其教只用胡人，而无汉人。敦煌石宝发现有大秦、摩尼二教经典，而无火祆教经典，即可证明。又大秦、摩尼寺均称寺，而火祆祠独称祠，间有称庙者，但与大秦、摩尼有别。火祆、大秦、摩尼虽有上述之不同，但后来却有人混为一谈，原因出自《通典》注将三教混淆，致使后人遂误为一。

火祆教为住中国的西域人所崇奉，并不向外传教，与大秦、摩尼不同，本可不受异教之攻击。但在唐武宗时，罢黜佛法，并毁外来诸教，于是火祆、大秦、摩尼同时被排斥。宣宗复兴佛法，外来诸教被禁松驰，火祆教遂历五代及两宋。作者据有关记载考证，南宋以后，中国典籍，则不见祆祠之名，从此火祆教则绝迹于中国。火祆教和其他宗教一样，是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故治“丝路”之学者，应知其各该教历史渊源，流传中国始末及其影响。本文在此方面提供了较丰富完整的资料可供参考。

521　魏晋南朝火祆教钩沉　　　王　素

（《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

关于火祆教传入我国问题，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有陈垣先生的《火祆教传入中国考》一文发表，对我国宗教史的研究影响颇大。该文认为火祆教约在北魏南梁时传入我国，准确时间在公元516—519年间，理由是火祆教在“晋宋以前无闻也。”火祆教传入我国后，早期只在北魏流行，南朝无流行迹象，理由是《魏书·灵太后传》和《隋书·礼仪志》仅有北魏、北齐、北周奉祀胡天事迹，南朝尚未发现。但本文作者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文章首先追溯了火祆教创始时间、火祆教教义，以及传入我国后的名称演变等。因其拜火，我国称之为拜火教；因其拜天，又称之曰胡天。火祆教的“祆”字，据说是“天神”二字之缩写，并对魏晋以来史籍中，有关火祆教称谓的“妖”、“祆“等字都作了证订。其次，对火祆最早传入我国的时间，根据有关史籍进行了考订。早在公元226年波斯萨珊朝建立以前，火祆教就在中亚一带盛行，随着丝绸之路上佛教僧侣和商旅的往来，有可能经他们介绍为我国所知了。因此在慧皎的《高僧传》中就有维祇难信奉“火祠”的记载，并记有维祇难与沙门斗法的故事。因沙门神力胜己，佛法降服火法，维祇难遂皈依沙门，以后于黄武三年（224年）与同伴至武昌。据此可知，在三国时火祆教就为我国所知。至东晋十六国时，火祆教已在我国北方流行。据《晋书·张轨附张实传》及《石季龙传》记载，在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及成帝咸康三年（337年），先后有火祆教徒刘弘及刘光在凉州天梯山、长安南之终南山聚众起义和建立祆神庙的记载。东晋时期，在淮北的彭城（今徐州）地区至少发生过两次火祆教徒起义事，即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年）的刘黎起义和太元十八年（393年）司马徽起义。再次，文章不仅论述了十六国时，火祆教已沿丝绸之路由高昌、凉州、长安、陈留很快流行到彭城，而且对南朝时火祆教的流行情况又做了考证。据《南齐书》、《梁书》、《南史》等书均有关于火祆教的记载。如天监九年（510年）宣城郡吏吴承伯挟祆道，聚众攻宣城杀太守事；大同八年（542年）安成人刘敬躬挟祆道，聚党据郡，进攻庐陵，取

豫章之记载。作者认为南朝火祆教徒的起义，除社会黑暗原因外，一直把火祆教列入异教淫祠，长期受压的地位。北朝则不同。北魏灵太后“废诸淫祠，而胡天则不在其列”；北齐后主“躬自鼓舞，以事胡天”；北周“拜胡天制，皇帝亲焉”。火祆教如此受到尊崇，岂能有不满而发生起义事？根据上述史实，作者认为火祆教是沿丝绸之路而传来我国，经佛教徒的介绍，早在三国之初就为我国所知。西晋动乱年代，为火祆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十六国时开始流行北方一带，南朝时已深入江南，由建康、宣城一直传到安成、豫章等地。故此，火祆教不是北魏南梁时才传入我国，也不是最初只在北朝流行。

522　摩尼教入中国考　　　陈　垣

（《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2期）

摩尼教（Manichaeism）为中世纪亚洲之一大宗教，对人类文明有较大贡献，对传递东西方文明颇有功绩，尤其对回鹘在政治上、文化上更有特殊影响。摩尼教虽已早亡，但国内外研究者不少，国内著名学者有王国维和陈垣等人。王国维曾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刊载于《亚洲学术杂志》第一卷二期之上，陈垣先生的专著即是本文。两文对摩尼教研究论点基本一致，史料的引证也略相同，但本文对摩尼教史事的考证更为详尽。文字虽有二万字之多，但条理清晰，叙述周详，为研究摩尼教在中国传播之较系统完整的材料。摩尼教于公元三世纪创于波斯，据基督教史家称，摩尼其人精通天文、善绘画，习幻术。该教取波斯拜火教、基督教和佛教教义而成。该教初创，为波斯不容，乃转而于罗马东境及印度北境。其后，虽一度得到传教之自由，但不久又因波斯旧教的攻击，复遭迫害，摩尼也遭极刑惨死。摩尼死后，其教传播极速。公元三至六百年，中亚及地中海沿岸，皆为摩尼教流行之地。据作者考证，摩尼教之始通中国，当在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吐火罗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之大慕阇，并请求令其供奉，置法堂。作者考诸慕阇、拂多诞，乃摩尼教师的一种职名。《通典》又记有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七月，有敕禁末摩尼教之记载，此为汉文最早有末摩尼一词之始。末摩尼或称末尼或摩尼。天宝以前，摩尼教徒至中国者，为波斯和吐火罗，至德以后，传摩尼教至中国者为回鹘。摩尼教初入中国，无建寺传教之记载，至大历三年（公元762年），才有“敕回纥奉摩教者，建大云光明寺”的记载。因回鹘有功于唐，摩尼教于回鹘有功，故京师为之立寺。摩尼教传来，始于波斯，而波斯到中国，有水陆两道，摩尼教由陆路而来。其后吐火罗、回鹘传来，亦均由陆路，先至京师，然后由北而南。此为研究“丝路”之学，所应注意之点。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3年），即摩尼教传入中国一百五十余年后，摩尼教被禁，教徒也遭迫害。据《佛祖统纪》载：敕天下摩尼寺并令废罢，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国回纥诸摩尼，流配诸道，死者大半，此实摩尼教之一大难。摩尼教虽遭此厄运，但并未禁绝，历五代、宋、元、明仍有活动。据作者考证，该教因其治教极严，待人极恕，自奉极约，用财极公，深得人心，虽遭厄运，并未断绝，几百年后仍有活动，原因就在于此。中古时期，西方宗教之传入，均沿丝绸之路而来，故研究丝绸之路者，对此应有所了解或深入研究。

523 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 林悟殊

（《文史》1983年第18辑）

摩尼教为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它何时传入中国，学者意见不一。传统的看法根据宋代释志磐所撰《佛祖统纪》的记载："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认为摩尼教是在唐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之后才传入中国的。沙畹、伯希和我国史学大家陈垣等人均持此说。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应把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推前。有人推测当在周隋之际，有的认为当在晋代。本文则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摩尼教传入中国的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对传统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摩尼教之始通中国，应比延载元年早得多。延载元年只是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国公开合法传播的开始；在此之前早已在民间流传。文章首先分析了《佛祖统纪》中的记载，认为拂多诞以私人身分朝见皇帝并呈献摩尼教的汉文经典，说明该宗教已在中国有相当的影响，该传教师已在中国取得了传教经验。接着，文章对唐以前史书文献中，有关摩尼教在中国的痕迹和影响的记载，进行了论证；对早期摩尼教传播的历史及当时丝绸之路交通的情况作了考察，并对国外一些持传统看法的学者认为从四世纪到六世纪之间，哌哒人阻断了丝绸之路，排斥佛教和摩尼教，使摩尼教不能继续东传的说法进行了反驳。摩尼教在公元240年刚一创立便开始东传。摩尼把世界划分为四个部分，即波斯、罗马、埃塞俄比亚和中国。从公元244年至261年间，摩尼派了许多布道团到全国各地和国外传教。摩尼在世时已派许多布道团在前三个部分传教，也可能到中国传教。文章列举了许多史书记载，证明从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间，丝绸之路虽经常出现种种障碍，但民间仍照常往来，中西经济和文化交流并未中断。据统计，在此期间，从西域到中国的佛教高僧就有67人。摩尼教徒也可能绕过哌哒人的阻隔而来中国。从公元450年到614年，中国有十起农民起义也与摩尼教的影响有关。即在四世纪初，与摩尼教有关的农民起义，也在《晋书》中和其他如《宋书》、《魏书》、《北史》、《隋书》等史籍中不乏记载。作者经过充分论证，认为延载元年拂多诞来朝只是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国得到官方承认，开始公开传播而已，但在此之前，摩尼教已在民间流传多年了，很可能在公元四世纪初，中国内地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了。

524 摩尼教寺院的戒律和制度 刘南强著 林悟殊译

（《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期）

本文根据东西方有关摩尼教史料，论述了摩尼教寺院制度、教阶等级和苦行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变化。文章着重探讨了中亚和中国摩尼教寺院的情况，对《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和我国新发现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中的资料作了分析和对比，认为摩尼教于公元八世纪时由于受到统治者的崇信和庇护，地位发生变化，从而放松了苦行主义，转而积极参与了社会和经济生活。我们从奥古斯丁的记载得知，摩尼教会确有教阶组织，其最上层系由一教主和十二位法师所组成；下边又有七十二位主教，主教又再指派长老和执事。摩尼教更强调的是选民和听者的区别，而不是选民中的等级区别。一个人所选择的

选民等级越高，其负担和世俗家务势必也更多地转到别人身上。新发现的《摩尼古卷》中记载，摩尼自称为"唯一出生者"。《古卷》也说明摩尼是在麦柔一个犹太浸礼派教团中长大的，该教团就具有教阶组织的某些形式。甚至更有意思的是，在《古卷》中把摩尼父亲帕提格所拥用的称号院主，归为传教师巴雷斯所有。通常，东方的摩尼教寺院制度才有这个称号。根据这一发现，《古卷》的编者认为寺院的组织及其制度，在摩尼教早期传播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他们甚至认为，摩尼在与伊尔查塞教派决裂后不久到印度的传教旅行中，已经看到了佛寺，这对他自己苦行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摩尼教寺院制度之全盛是在中亚，在查士丁尼迫害灭绝西方摩尼教之后的三个世纪里。摩尼教史的一个大转折点是公元762年回鹘突厥可汗改宗该教。当840年第一回鹘帝国被黠戛斯击败而崩溃时，摩尼教仍盛行于新疆。从一本用多种语言写成的摩尼教祈祷忏悔书中，我们得知以高昌为教主所在地的东方摩尼教区，显然有寺院和教团的组织，里边有院主、法事主、传教师、唱诗班、写字僧以及从事杂役的男女僧侣。对摩尼寺的结构和组织能进一步有所了解的文献是《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它是在公元731年奉诏译成汉语的，原文系一种中亚语，很可能是伊朗方言。此件是敦煌石室发现的大量卷子之一。《仪略》证实了奥古斯丁《外通》一书中所提到的摩尼教等级。此外，《仪略》在"寺宇仪第五"中还描绘了摩尼寺的蓝图，并开列了寺内主要僧职的名单。五十年代初中国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发现的文献中，有一篇用回鹘文写的文书，细致地描绘了回鹘王国鼎盛时摩尼教寺院制度的情况，以其与《仪略》规定的摩尼教戒律作比较，虽然两个文献相隔近三个世纪，但这份回鹘文文献对于《仪略》的许多戒律仍加以承认。作者对这篇文书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这篇文书并非某一寺院的教规，而是一份王家颁发的文件，对一些寺院和世俗之间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上的关系以及这些寺院的内部组织，作了某些规定。文件须经王家批准，这既表明寺院在回鹘王国的社会和经济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也表明摩尼教为了传教而依靠王家庇护的程度。高昌新文书无可辨驳地证明了摩尼教寺院积极地卷入了回鹘王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虽然"管事"负责寺院土地和供应的实际管理，但该职在寺院等级中所居的高位，说明了摩尼教的苦行观念及其特权地位调和的程度。我们从新文书中可以看到，摩尼教派为了使自己适应空前的特权地位，是如何放松或者忽视该教苦行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

525　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　　　耿世民

（《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摩尼教为公元三世纪波斯人摩尼在祆教、佛教和基督教影响下所创立的宗教。它是一种主张明（善）与暗（恶）两种势力斗争的二元论宗教。公元762年后传入当时居住在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地区。公元840年回鹘西迁新疆吐鲁番、库车一带后，仍继续流行了一段时期。摩尼教传入回鹘后，曾得到统治者的大力保护，在漠北时期，并曾一度被尊为国教。摩尼教僧侣在那里享有种种特权，甚至参与政事和出任使节。回鹘文为我国维吾尔族在公元八——十四世纪使用的一种文字。本文所解释的这种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是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进行考古时所得。原件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馆，虽然残

损，但整个内容清楚。它是高昌地区回鹘官府颁发给摩尼教寺院的文书。作者将回鹘文原文用拉丁字母转写、翻译成汉文，并附有词汇表。这件文书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规定了摩尼教寺院占有的土地和享有的种种特权。文书反映出当时摩尼教寺院对依附农户的惊人剥削，农民除向寺院交纳大量的实物和货币地租外，还被迫做无偿的劳役杂工，如放牧、砍柴、制毡、养鹅等。而高级摩尼僧人则是高人一等，处处享受特权，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生活。通过这件文书，我们可具体看到当时回鹘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如何赋于摩尼教寺院以大量土地和种种特权，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豢养一批所谓"涂了圣油的警犬"，妄图以此来麻痹广大回鹘劳动群众的阶级意识，放弃反抗剥削的阶级斗争。

526　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之痕迹　　　柳存仁著　林悟殊译

（《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集）

本文对火祆教和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作了新的考证，提出了与已故史学家陈垣先生不同的看法。第一、陈垣先生认为中国之有火祆教始于六世纪初，把最早年代考定在公元516～527年间（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至孝昌三年），并认定火祆教对中国固有社会未产生影响，"来中国者，并不传教，亦不翻经，故其教只有胡人，无唐人。"多年来人们多接受这种看法。第二、传统认为摩尼教在唐武则天统治期间，即长寿三年（694年）传入中国，各史家均根据《佛祖统纪》的记载坚持传统观点。虽然著名学者蒋斧、罗振玉、张星烺及沙畹、伯希和等人都偏于相信或怀疑摩尼教传入当在武则天统治时之前，蒋斧曾认为在隋代(581—618年)至少已建有一二摩尼寺，陈垣先生仍坚持传统观点，并驳斥了蒋斧的举证。本文作者对火祆、摩尼两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对传统观点持否定态度，并在所有众多历史资料中着重引用《道藏》中的《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它有十多个修订本，大多附有注释。其中陈景元在十一世纪时所编的四卷合注本最为著名，不仅包括了唐代著名三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元英的注解，而且还有南齐(479～501年)学者严东的注释。作者引用该经中的许多资料，证明严东时代的道士对火祆教确有所知，然后又据《魏书》、《北史》有关北魏灵太后的记载，确证了当时华北火祆教的存在。如太后杀害能言胡语的密多道人一事。查密多二字并非人名，而是波斯语的音译，意指密多拉（Mithra）僧侣。密多拉为古老的伊朗神，已汇入正统的火祆教之中。据《魏书》记载，灵太后不仅信奉火祆教，吟诗赞圣火，而且以巨金建佛寺，修佛塔，太后父女都被描述为佛教的笃信者。但当时的各种宗教业已混合。随着北魏宫廷的信仰火祆教，必有一批火祆教僧侣仕于北魏，所以波斯的绣花、地毯、宝石、玻璃等物为中国人所用，北魏末帝孝武喜骑波斯的黑鬃栗马，北齐宫廷喜爱波斯犬，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火祆教如何排外，但说它一点也没有对中国人产生影响是难以置信的。

至于摩尼教的传入中国，学者们一直定为武后统治时期（即公元694年），他们都同意920年陈州毋乙之乱肯定是摩尼教徒发动的，因为史书有明显的记载。但对五至七世纪初的十多次叛乱是由摩尼教徒所促进或疑由他们所促成，其认识并不一致。盖因这

些叛乱史书记载不详所致。作者对五至七世纪初的十多次叛乱都一一做了引证，从大量事例以及《道藏》中的许多记载证明摩尼教早于南北朝时就已传入中国，多次叛乱之中都有摩尼教促成的痕迹。从宗教习俗看，摩尼教尚白色，服白麻衣重于一切，正式僧侣皆服白衣。但白衣在当时中国认为是丧服，是不祥之物，虽庶民百姓都在避忌，可北齐统治者高欢父子均喜白色，服白衣，隋炀帝亦"恒服白衣"。作为统治者的天子不仅喜白色，还"好令宫人以白越布折额"，"又为白盖"，"恒服白衣"，作者认为这种现象除了某些宗教原因外是无法解释的。另外隋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将延兴寺改名光明寺，这些事例都说明摩尼教于唐代以前早已传入，非武后时才传入。关于这一问题，本文译者林悟殊先生亦多所研究，见下文。

527　唐代摩尼教与中亚摩尼教团　　　林悟殊

（《文史》1984年第23辑）

摩尼教为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于波斯西部巴比仑所创立的宗教，在唐代之前即已传入中国。但得到中国官方承认，能够公开合法的在中国内地传播，乃始自武后时代。据史书记载，摩尼教曾两度在唐代中国合法传播：一在开元20年之前，一在天宝之后，而天宝之后尤盛。但此摩尼教究竟从何而来？一般认为来自波斯西部巴比仑一带的摩尼教团。作者则认为唐代中国流行的摩尼教，乃直接来自独立的中亚摩尼教团。本文论述了唐代中国内地流行的摩尼教和中亚摩尼教团的关系。由于摩尼所要建立的是一个世界性宗教，故在国内外均建立教团。公元三世纪末，罗马帝国的东方行省，埃及和北非有大量的摩尼教徒在活动。当时的亚历山大城、安条克、博斯特拉、埃德萨、耶路撒冷、萨隆那和提贝德等城市，都建立了摩尼教团。当时摩尼派往东方的传教团则越过了帕提亚（即安息）东部边城木鹿，进入阿姆河一带，并在此赢得了大批粟特信徒，从而形成了中亚教团，隶属于巴比仑法王领导。但自公元277年摩尼被波斯王瓦赫兰一世处死后，波斯境内的摩尼教徒惨遭迫害，大量越境东逃，汇入中亚教团，加以粟特信徒日增，遂使中亚教团成为最强大的一个教团。至公元六世纪末，该教团在来自巴比仑的领袖撤特—奥尔米兹的领导下，以登那瓦尔斯的名称宣告独立，直至八世纪初才重新接受巴比仑法王米尔的领导。因中亚接近中国，是丝绸之路的通道，故摩尼教由此传入中国，势属必然，史书文献亦多有记载，说明唐代流行的摩尼教与中亚教团有着密切的联系。作者的论据是：一、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一部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驻在唐朝京城的摩尼传教师奉诏而作的一个解释性文件，作者来自中亚摩尼教团，因其中所使用的文字，不少是中亚语言的音译。《仪略》所述的摩尼教徒五个等级的名称和寺院诠简三人的音译名称，均为中古波斯语的音译；其所述内容，也反映了当时中亚教团的实际。如摩尼教寺院的结构、戒律和组织等。二、在另外两部唐代流行的摩尼教残经上，有些文字是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亚文的音译，而这两种文字则是中亚的教会用语。三、在已知的一些史书文献如《册府元龟》、《九姓回鹘可汗碑》和《牟羽可汗入教记》的记载上，也明显提到在中国传教的是中亚摩尼教师。四、中亚教团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他们把佛教的术语、概念吸收到自己的经典

中。这是该教传入中亚后才发生的现象，而原始的摩尼教中却无佛教的明显烙印。作者还引用了东西方学者对摩尼教成分的不同解释，考证了中亚摩尼教团的寺院制度，说明唐代中国摩尼教进一步发展了原来中亚摩尼教团的特点，使摩尼教的佛化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这种佛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深的，敦煌发现的三部唐写本摩尼教残经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个渐进的过程。经过充分论证，作者认为唐代中国流行的摩尼教系直接渊源于具有浓厚佛教色彩的中亚摩尼教团；同时又在这个教团的佛教色彩上进一步加深了佛化。

528　试论摩尼教与回鹘的关系及其在唐朝的发展　　　文尚连

（《西北史地》1981年第1期）

摩尼教，也叫明教，是公元三世纪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关于这个教与回鹘的关系及其在唐朝的发展，有些学者认为是公元八世纪中传入回鹘，九世纪初又由回鹘传入唐朝。本文对这种看法提出异议。认为摩尼教首先是由波斯僧人和信奉摩尼教的“九姓胡”，于公元七世纪末（694年）传入唐朝，八世纪中（763年）由唐朝传入回鹘，被回鹘奉为国教，成为回鹘汗国的统治思想，渗透到回鹘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然后回鹘又从公元768年开始，复传教于唐朝，使摩尼教在东方的发展达到全盛时期。作者还论述了摩尼教经回鹘传播而在唐朝又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认为除凭借回鹘的政治力量外，更深刻的原因则是植根于回鹘汗国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回鹘在登里可汗时代，曾出兵助唐讨平内乱，与唐联姻，给唐朝出售马匹，获得绢帛等大量财富，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回鹘为了发展既得利益，加强同唐朝的密切关系，便把摩尼教作为联系的纽带和谋取更大利益的工具。因而便挟政治力量传教于唐，使摩尼教得到迅速发展，并从黄河流域发展到江淮流域。作者还论述了摩尼教在唐朝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发展过程，直到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及公元843年唐武宗下诏宣布废除摩尼教，教徒遭到流放和屠杀，摩尼教遂趋衰微，但并未绝迹。到五代时期，摩尼教又重新活跃起来，一直流传到南宋乃至元明时期。本文引用了大量史书和有关文献记载，详细论证了摩尼教的兴衰和对唐朝政治、经济的影响，文字流畅，有说服力。回鹘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民族，研究摩尼教对回鹘政治经济的影响，以及唐朝与回鹘之间的往来传播经过，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有其重要意义。

529　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　　　林悟殊

（《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

本文以吐鲁番考古发现的摩尼教资料，对照其他有关文献记载，论证了摩尼教促进高昌回鹘封建化的有关问题。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它对现实采取否定、消极的态度，把世界当为罪恶、黑暗物质的生成物，把人类当为囚禁光明的肉身。认为这样的世界和人类越快毁灭越好。它的经典中开列了六十条道德规范，对教徒的道德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被赞为“治己极严，待人极恕，自奉极约，用财极公，不失为一道德宗教。”现代一般学者都认定在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

摩尼教由官方正式传入漠北回鹘，随后又被回鹘可汗奉为国教。会昌年间，漠北回鹘为黠戛斯部所击破，一部分回鹘人向西南迁徙：其中一支西去新疆，以高昌(今哈喇和卓)为中心建立政权，被称为高昌回鹘。这一支回鹘人西迁高昌后，一部人虽然改信了佛教，但其统治者对于摩尼教的热情不衰，摩尼教和佛教并行流传了几百年时间，直到十四世纪绝迹。但这些情况，长时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知。本世纪初，由于德国学者在吐鲁番的考古探察，发现了摩尼教的遗址、遗物和大量的摩尼教文献残片；与此同时，中外学者又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了汉文摩尼教残经，经过与汉文史料相印证，才使回鹘人信奉摩尼教的历史昭然于世。本文认为，吐鲁番的考古发现，不仅证明了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流行，而且证明了高昌回鹘时的摩尼教已被彻底改造，蜕变成地道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考古发现证明，公元九至十二世纪的高昌回鹘，是世界摩尼教的实际中心。在世界各地备受迫害的摩尼教徒，在高昌回鹘时却享受到最大的信仰自由，得到可靠的政治庇护。其原因就是由于这个宗教能忠心耿耿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早在漠北回鹘时期，摩尼教的高级僧侣便已活跃在回鹘王庭的政治、外交、军事舞台上了；他们已在政治上取得了特权，成为回鹘上层统治阶级的人物。但因当时取得国教的时间不久，地位还不巩固，特别是回鹘还没有过渡到定居的农业生活，阶级分化还不明显，故不能形成其封建化的经济基础。只是回鹘人迁到高昌后，在当地优越的农业自然条件下，才过渡到定居的农业生活，从而加速了高昌回鹘的封建化，也为当地摩尼教的封建化提供了经济基础。高昌回鹘时的摩尼教会与回鹘西迁前已大不相同。它拥有封建地产，经营封建庄园，拥有大量缴纳实物地租的寺户，还实行劳役地租，从而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僧侣们得以过着地道的剥削生活。这就决定了教会封建阶级的属性，成为封建主阶级的宗教。这集中表现在教会组织上，把原来朴素的“五级仪”，按教徒修订造诣的深浅分为五级变成了封建的教阶制，即成为五个封建等级；把教徒们原来较为平等亲密的关系变为阶级统治压迫的关系。为了证明这些观点，作者引用了许多考古发现的摩尼教经典、文书、祈祷文、祝辞，旗幡、壁画等资料和《新唐书·回鹘传》、《资治通鉴》等有关史料，进行了充、分论证，颇有创见，是研究宗教史的一篇可资参考材料。

530　中世纪维族与摩尼教的关系　　　苏北海

（《新疆日报》1949年2月15日）

摩尼教于公元三世纪初，为波斯摩尼所创。该教系以袄教学说为基础，参酌基督教、佛教诸教学说而自成一教。摩尼教规甚严，尤以酒肉被列为大禁，凡欲入教，戒律至为严格，有所谓戒律十条，禁律七种。其道德标准，则是去恶存善，去邪除暴。但该教当时不容于波斯，摩尼被处死，教徒四散。在西方由于基督徒查护甚严，只好走向东方，通过康居索格底（即撒马尔罕）至新疆。时新疆为回纥所据，摩尼教即往依之，回纥王非但信之，且奉为国教，臣民上下，一致尊敬。摩尼教师康居人为多，并常与回纥王论政，且常随回纥使者来唐。天宝末年，安史之乱，回纥因助唐有功，居京师内外者，骄横特甚。代宗时在长安为摩尼教建“大云光明寺”，嗣后，又在荆（湖南江陵）、扬（江苏江都）、洪（江西南昌）、越（浙江绍兴）等地建寺。宪宗时，又在河南府及太

原建寺，可见当时在黄河、长江流域摩尼教之盛况。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乘回纥衰落，禁止摩尼教师传教，并将赀入官，于是摩尼教始衰。但新疆直至五代宋初，仍以信奉摩尼教为主。作者除根据中国史书记载考证外，还就吐鲁番考古发现甚多之回鹘文摩尼写经残卷，亦复考证之。摩尼教严谨之生活，崇高的道德，则使信教的回鹘民族之人生道德，由游牧而入于礼义化。回鹘民族曾逼迫南迁至吐鲁番、迪化、奇台一带时，仍坚信摩尼教，并以教规道德标准行事，因而很快建立别失八里克王国（即维吾尔王国）。在严格的道德标准中，在与东西方各种文明处境中，吸收佛教、基督教之所长，融合而成回鹘文明之特征。因此，摩尼教对回鹘民族之生活、道德、文化影响极为深刻，此为研究中西文化及丝绸之路者，应为深入了解的问题。

531 《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 林悟殊

（《文史》1983年第21辑）

本文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所获，论证了《摩尼教残经一》的本名及其出于摩尼何典的问题。《摩尼教残经一》原本出敦煌莫高窟，今藏北京图书馆。有的学者认为该经即波斯摩尼僧献给武则天的《二宗经》。经作者考证，《残经一》并非《二宗经》。据《佛祖统纪》及其他史料记载，《二宗经》是摩尼教义的代表性著作，早在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已呈献给武则天。但在此后三十多年撰写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即《摩尼教残经二》）上，竟只字未提这部经典。《仪略》中记载了摩尼所写七部经典的名称，其中也未提到《二宗经》。这就证明《二宗经》并非源自摩尼这七部著作，而应另有所本。根据古代东西方留下的摩尼教资料，摩尼在创立他的宗教时，用古叙利亚语撰写了七部著作。此外，摩尼为了启迪当时的波斯王沙卜尔一世接受摩尼教，特地将他的教义加以辑要概述，用中波斯语写成一部新书叫《沙卜拉干》献给沙卜尔，赢得沙卜尔的欢心，允许他在波斯全境传教。本世纪初在吐鲁番发现的大量摩尼教文献残片中，也有一些《沙卜拉干》的残片，有几片上还标有中波斯文"二宗/沙卜拉干"的字样，而"沙卜拉干"的词干正好是沙卜尔的名字，故"二宗/沙卜拉干"的意思恐应为"献给沙卜尔的二宗经"，汉译时便简略为《二宗经》。经作者比较对照后，有两点证明《残经一》不是本自《沙卜拉干》：一是《残经一》并非对摩尼整个教义的概括，而是专题讨论教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是《沙卜拉干》对摩尼的末世说所述甚详，但《残经一》却只字未提。故《摩尼教残经一》不可能是《二宗经》。接着，文章论证了《残经一》也不可能是摩尼早期弟子整理或自撰的著作，更不可能是象《摩尼光佛法仪略》那样，由在中国的摩尼传教师自己撰写的著作，而应是本自摩尼本人的另一部著作。作者对《仪略》开列的七部经典，逐一进行了考察，认为最有可能是《残经一》原型的摩尼经典，应是"第五钵迦摩帝夜部，译云证明过去教经"。并根据《残经一》的体例，说明它与《证明过去教经》一致，同属专题论文；又考察了《残经一》的内容，认为它切合《证明过去教经》这一题目。由此得出结论：《残经一》的原名很可能就是《仪略》所提及的摩尼第五部经典《钵迦摩帝夜》，即《证明过去教经》。但它与摩尼在公元三世纪中叶所写的原著已有相当不同，使用了大量的佛教术语和概念，笔法模仿佛经。这正是汉译摩尼经

典的特点。说明摩尼教在东传时，为了适应东方浓厚的佛教气氛而逐步佛教化。《钵迦摩帝夜》是摩尼教的重要文献，如其汉译本即是《摩尼教残经一》，则其资料价值更大。

532　摩尼教《下部赞》汉译年代之我见　　　林悟殊

（《文史》1984年第22辑）

《下部赞》是本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书中检出的三部汉文摩尼教残经之一，于1907年被斯坦因带至伦敦大英博物馆。1916年被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该馆发现，收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德国学者瓦尔茨米德和楞茨最早对《下部赞》进行了专门研究，将部分内容译为德文并作了注释。1943年，该经除三段音译文字外，全部被译成英文发表。本文考证了摩尼教残经《下部赞》汉译之年代。《下部赞》是中国摩尼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时用的赞美诗，计有七言诗1254句和少量四言诗、五言诗，还有音译文字三段和其他一些说明。它是研究摩尼教教义、宗教仪式及其在中国变化的重要资料。据西方学者研究，三段音译文字中，第一段系出自中波斯文，其它两段出自帕提亚文。《下部赞》中《叹明界文》一诗，即为公元三世纪时所作帕提亚文摩尼教赞美诗《胡威达曼》第一首的汉译。《下部赞》究译于何时，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经文本身的分析，根据摩尼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参考其它有关文献，划定了一个大体的年代。敦煌藏书石室于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封闭。安史乱后，摩尼教借回鹘势力在中国盛行。会昌初回鹘败于黠戛斯，国破西迁，唐武宗乘机查禁摩尼教。会昌三年唐武宗大举镇压摩尼教，使其遭到毁灭性打击。武则天时摩尼教受到优容，得以在中国自由传播。但撰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是在华摩尼传教师奉诏而作的一个解释性文件，其中未提到《下部赞》。《下部赞》中，摩尼一律写为"忙你"，而《仪略》通篇未出现"忙你"一词。《下部赞》中佛教用语甚多。较《摩尼教残经一》和《仪略》佛化程度为深。由此可知，《下部赞》的汉译时间应较《残经一》和《仪略》的流行时间为晚，当在武后时代之后。据史书记载，摩尼教自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后，凭借回鹘势力，大举向中国内地传教，其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均远远超过武后时期。为适应大量汉人摩尼教徒举行宗教仪式的需要，把摩尼教赞美诗译为汉文，乃是势在必行。根据上述情况，本文判定：《下部赞》的汉译时间，上限为大历三年（768年)，下限为会昌二年（842年），即唐代后期的译作。

533　六到八世纪突厥人的宗教信仰　　　樊　圃

（《文史》1983年第13辑）

对于公元六至八世纪在北方兴起的突厥人的宗教信仰，中外学者论述较多，且有不少争议。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对突厥人的宗教信仰作了较详的考证和论述。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和他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并受其它历史条件，如以前民族的宗教信仰、周围民族和统治民族宗教信仰的影响。据作者考证，在突厥以前北方各少数民族，如匈奴、柔然、通古斯等均信仰萨满教，中国史书叫"巫"。柔然与北魏互相通婚，关系密切，北魏佛教盛行，因佛教的熏染而使柔然的宗教信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

化。南北两方人民的相互迁居和使臣的往还，所引起的文化交流更为明显。柔然与西域的关系亦甚密切。柔然势力曾达大月氏之北，高昌亦曾臣事柔然。柔然和焉耆、疏勒、于阗这些盛行佛教的国家亦有接触，并曾侵入于阗，与哌哒有婚姻关系，有和佛教直教接接触的机会，促使其宗教信仰发生一定变化。作为曾被柔然人长期统治的突厥人，亦当受到柔然和这个地区传统宗教势力的影响。突厥人最初也信仰萨满教，崇拜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草、木神灵，特别是崇拜具有无限威力的处于诸神之上的天神。突厥人破柔然后建立了汗国，东征西侵，扩张国土，至第三代木杆可汗时，国势极盛，已广泛与外界接触，尤其与中原地区的接触更为频繁。从北魏到隋唐，是中国佛教最盛的时期。突厥与中原关系密切，受到佛教的熏染，已开始信仰佛教。公元572年，木杆可汗卒，其弟佗钵可汗立。佗钵笃信佛教，一些贵族和劳动人民也信仰佛教。至隋开皇时期，已有突厥人在长安舍宅建寺。其后的庵罗可汗、沙钵略可汗、颉利可汗时期，均有信奉佛教之记载。隋末乱离，突厥人南迁和汉人北徙者甚多，隋与突厥也多次通婚，文化交流迅速发展，宗教信仰互相影响。文章还论述了西突厥自公元552年击败柔然，进入西域之后，在563年至567年消灭了哌哒，国力强盛。至统叶护可汗时，国势之强达于顶点。西域诸国，均受其统属。到公元598年左右，西突厥仍信仰萨满教。唐玄奘往印度取经时，曾会见统叶护可汗，受到隆重接待。表明统叶护可汗对佛教发生了崇敬。西突厥由于受到西域一些盛行佛教国家的影响，信仰佛教的人日渐增多。至八世纪中期，西突厥的佛教已经很盛，行无遮大斋、施舍、造寺，已成为贵族的嗜好，受到他们的影响，群众信佛的也大大增多。

534 试论回纥宗教思想的演变与改宗摩尼教　　杨圣敏

（《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

回纥人的历史发展同其它民族一样，经历了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和部落联盟。与此相适应，他们的宗教观念依次经历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的各个阶段。立国以后，就改信了一神教。回纥在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已不可考。有的学者根据《魏书·高车传》和《新唐书·回鹘传》的记载，认为回纥的图腾是狼。本文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回纥认狼为祖的最早记载是在四世纪即北魏以后，当时回纥人已处于父系社会，这时崇拜的对象不能确指为氏族的图腾。在我国北方草原的古代民族中，以狼为种的有乌孙，突厥，薛延陀和蒙古人。可见，以狼为祖乃是流传于漠北草原上一脉相沿之旧说，这与草原上的狼害有关，非回纥人所自创。作者对回纥人宗教思想的演变提出两种假说：一是“鹘”说。因回纥原属丁零，而丁零曾以翟鸟为图腾。这是一种有利爪，轻捷善飞的黄色猎鹰。回纥顿莫贺可汗曾在元和四年（公元788年），向唐朝请求改回纥为回鹘，可能是以鹘为图腾的痕迹。二是“大树”说。高昌回鹘曾于庙中祭祀大树，可能是曾以大树为图腾，也是他们曾生活于森林中的反映。到了父系社会，回纥已建立了在酋长领导下的部落组织，回纥人已崇拜祖先，并信奉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观念，崇拜高山、大树，石头等。随着回纥从部落向部落联盟发展，他们所信奉的萨满教，也从以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为核心，向天神崇拜为核心的阶段演进。这已带有一神教的某些特征和阶

级的烙印。隋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回纥联合仆骨、同罗、拔野古等部，建立了部落联盟。到了唐初，这个联盟发展到“有众十万，胜兵半之”的规模，成为漠北最强的部落。到公元744年回纥正式建国，就从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到完全转化为阶级社会的国家时，宗教就成了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天神崇拜的萨满教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到公元763年，回纥牟羽可汗改信摩尼教，摩尼教遂成为回纥的国教。其原因就是萨满教存在的基础已经崩溃，新的社会，新的秩序，需要一种新的宗教来维护。因为摩尼教产生于阶级社会，揉合了佛教，基督教和锁罗斯德教的教义而成。它崇拜光明之神，有成文的经典，有教会组织和严格的教规，有宏大的寺庙和脱产的神职人员。这都是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矛盾的反映，是适应建国后的回纥社会。文章详细分析了回纥建国后商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各部落的联系和统一，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分析了回纥经济发展的原因，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和斗争，摩尼教对维护回纥汗国的作用等问题。这对回纥历史和宗教演变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35　中古时代中亚细亚及中国之基督教　　〔法〕伯希和著　陆　翔译

（《说文月刊》1939年第1卷第12期）

本文系伯希和重游中国时在上海中法联谊会上的演讲稿。原文刊载于1932年12月18日《上海法文日报》，以其中史实足资研治宗教史之参考，因即译之。本文首叙欧亚两洲，自古即有商业贸易之往来，各种思想，随着商业而传播。故世界各大宗教，如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等，皆由国际商道越新疆之大沙漠而传入中国。敦煌石宝中发现之卷本有上述诸教之经典，即为最好的证明。考诸亚洲沙漠中所发现的各种文籍，基督教传入中国，其初期蒙摩尼教之仪轨，其教堂渐为中国式。此教盛行于七世纪，降至十七世纪渐渐泯灭，不为人们所知。至公元1625年，西安发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实为举世仅存之珍品，对学术界裨益甚大。然初发现时，多误作是碑为耶苏会教士所伪造，后经考证，皆公认为真迹。根据此碑考证，当公元七世纪时，基督教派已传于中国。此碑满刻华文及叙利亚文，碑中叙述基督教在中国成立时间，为公元781年（唐德宗建中时）。此碑发现后，历久沉寂，不为学术重视。至敦煌石宝卷本流露，其中有“三位一体赞”，皆直录《圣经》中语。当时基督教盛行一时，以后遂遭浩劫。盖自公元840年唐武宗应道教法师之请，尽灭来自外国传入之宗教，至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下诏铲除摩尼教，条例严酷。摩尼教徒素昵华人，尚能保存残势，而纯系外国人之基督教徒，不胜摧残。当公元千年时，全体复灭，致中国境内无人信基督教者，惟新疆境内尚有残留。

536　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白寿彝

（《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11期）

怛逻斯战役发生在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这次战争，不论对唐在西域的发展，或唐与大食的关系，以及关于中国造纸术的西传，都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通过这次战役之后，关于伊斯兰教的情况，才有了最早之汉文记录。对怛罗斯战役结果，各人有其

不同看法，作者根据中国历史记载，对怛逻斯战役之实际情况，怛逻斯战役对唐在西域的影响，怛逻斯战役在唐和大食国际关系史上的意义，都作了详细考证说明，并对此一战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他人提出的“由怛逻斯河之败,中国国势遂绝于西方”，“故中国国势遂一蹶不振焉”持不同意见。本文史料充足，立论严谨，凡治中亚之学和伊斯兰教史者，不可不读。至于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亦为此次战役中事。造纸术西传，实为中国对世界文化之一大贡献，但在本文中未作详细考证。本文最后对伊斯兰之最早汉文记录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怛逻斯战役中，有位名唤杜环的人，随军西征，为大食所虏并带到西海，宝应初年（公元762年）才附商船，由广州回国。他在大食及附近国家生活十一、二年之久，对大食诸国风俗习惯了解颇详，著有《经行记》，原书早已佚亡，但《通典》却有引述。把伊斯兰教最重要部分，即从安娜之信仰，礼拜斋戒，行为规范，饮食禁忌，都有所提及，这在中国史中实为最早的关于伊斯兰教的最早记录。

537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考　　　　王日蔚

（《禹贡半月刊》 1935年第4卷第2期）

新疆宗教复杂，在伊斯兰教未传入前，佛教、摩尼教、火袄教、景教等，均在新疆有相当的发展，尤其佛教深入该地区有千余年之久，其影响新疆文化及艺术至为巨大。伊斯兰教传入新疆最晚，但其宗教势力及传教之广泛，则占其统治地位。目前除汉族和蒙古族外，其他如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等民族，均信奉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何时由何地传入新疆？作者根据中外各种史书记载，经考证研究认为：

1.公元十世纪至十一世纪之时，伊斯兰教始入新疆西南部的喀什、叶尔羌、于阗一带。和阗一带素为佛教之根据地，据称伊斯兰教初入时期，和佛教徒进行过二十四年之久的战争，此宗教战争可谓持久、剧烈，影响较大。

2.公元十三世纪之时，其教势力逐渐东渐，并达至库车。

3.元代（公元十三、四世纪），新疆伊斯兰教徒，借其政治之力宣传宗教，从而得到迅速发展。

4.元末明初，伊斯兰教势力，始进展至新疆东部。

5.清初（公元十七世纪），新疆南路已尽为伊斯兰教势力之下。

6.乾隆镇压准噶尔回部后，移回部于北路，于是伊斯兰教之势力乃入北部，从而北部大都为伊斯兰所占据。

本文史料丰富，考证周详，为研究伊斯兰教史的可贵参考材料。

538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考　　　　苏北海

（《新疆论丛》1948年第2期）

关于伊斯兰教由陆路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各说不一。陕西西安府天宝元年创建清真寺碑谓：“隋开皇中，其教传入中国”，但后人研究结果，认为有误。以唐代传入说则为可靠，但唐代何时传入，仍有纷岐。有谓高祖武德中传入，有谓太宗贞观二年传入，有谓高宗永徽二年传入。本文并非研究伊斯兰教传入的时间问题，而是说明传入新

疆的实情，以作校正史料之证明。自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败绩后，大食人进入天山南路，伊斯兰教亦随之传入。玄宗末，戡定安史之乱，曾向大食求援，与西域各国兵平定之。大食兵进入中国后，必将引起宗教影响。此后，唐室衰微，五代继起，国内纷乱，西域之地，国力难达，而大食仍强，于是直接以兵力胁迫天山南路人民信教，这是伊斯兰教进入新疆之始。自十世纪以至十四、五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传播过程，作者根据大量史料，引证了不少事例，说明了该教在新疆传播的全过程，对伊斯兰教史研究工作者可资参考。本文论点与上文（即王文）基本相同，但本文所引历史事件较多，可视为上文之补充。

539　伊斯兰教在新疆发展之商榷　　　柏　南

（《西北论坛》1947年第1卷第4期）

东汉初年佛教传入新疆，逐渐渗入天山南北广大人民之中，并影响人民生活之各方面，故历千年而不衰。南北朝及唐代佛教在新疆之盛，可从法显《佛国记》和玄奘《西域记》得知其全貌。唐中叶后，摩尼教、景教和波斯拜火教逐渐兴起并传入新疆，但上述教派与佛教不同之处是未普及于基层人民，故无坚固之基础。在这些宗教输入的同时，伊斯兰教也随之进入新疆，致使佛教逐渐衰微。新疆佛教势力衰微之原因，作者认为一是民族部落兴起与覆灭，对宗教之兴废关系极大。如统治焉耆的龙氏，笃信佛法，自公元二世纪，历经魏晋南北朝以迄于唐，享国七百年之久，终因龙氏国力之衰弱，佛教亦随之消逝。其他如和阗、库车、吐鲁番均如此。二是佛教起到各沃州王室连系线索作用，而未造成政治上统一之作用。伊斯兰教则与此相反，其政治性远高于佛教，故伊斯兰教一经传入，首先在政治作用上排挤并摧毁佛教，致使佛教衰落不振。至于伊斯兰教何时传入新疆，传入后又何原因得到迅速发展？作者在本文中均有所考证。特别是阿拉伯帝国东征；高仙芝兵败大食；唐朝又借兵回纥、大食以平安史之乱，此三事遂促成伊斯兰教在新疆之发展。公元十一世纪若干年代，伊斯兰教虽为新疆回鹘所接受，但在十四世纪蒙古大帝国灭亡以前，伊斯兰教仅占有一部分势力，还未代替佛教及其他教派。蒙古灭亡直至明永乐后，伊斯兰教始统治了新疆之大部，因明季势力未达新疆，伊斯兰教遂得以顺利传播。永乐中，阿拉伯派穆罕默德第二十六世孙玛木特玉素及其兄弟诸人，分赴各国传教，玛木特玉素自麦加迁居喀什噶尔后，当地原信伊斯兰教之群众，以圣裔奉之，并以此为起点，一路从莎车向叶城、和田、于阗，远及且末、若羌，另一路从阿克苏、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传教，并与第八、九世纪原已信奉伊斯兰之势力连结在一起。最后在明正德年间（公元十五世纪），吐鲁番王莽肃尔征服了哈密，嘉靖年间，向北又征服瓦剌，从而伊斯兰教在新疆得到了更大发展。

540　一千年来伊斯兰教（回教）在新疆的发展　　　苏北海

（《历史教学》1952年第9期）

本文首先论述了伊斯兰教未传入新疆前，在新疆地区各种宗教活动情况，从最古的萨满教到祆教、景教、摩尼教、佛教等，都被各族人民信仰过。尤其是佛教，远在公元

一世纪就已传入，并在戈壁的绿洲中占有绝对优势，其中龟兹、高昌、于阗、疏勤等地为佛教中心。八世纪前后，摩尼教、景教也渐兴起，但没有象佛教一样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自七世纪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后，至翁米亚王朝瓦尔德第一时，其势力越过阿姆河，东征花拉子模、撒马耳罕等国。另外，由于伊朗十叶派教徒受翁米亚王朝的迫害，到处逃窜，其中有一部分逃奔新疆地区寻找生路，结果引起中国与阿拉伯在中亚发生战争。据《通鉴》记载，仅在开元三年和五年就发生过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阿拉伯军队受到了阻截，直至天宝十年（751年），唐与阿拉伯在怛逻斯大战中，唐军大败，从此大食势力进入西域。唐至德二年（757年），安史之乱时，唐又借兵大食和回纥以剿平安史叛乱。由此可以看出：阿拉伯帝国的东征，十叶派教徒的东逃，唐与阿拉伯的几次战争，以及向大食、回纥借兵平乱，打下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发展的基础。安史乱起，吐蕃奴隶主贵族趁机将其势力伸入西域，陷高昌，占北庭，对伊斯兰教向东发展受到了阻拦，从而在西域发生了一百多年吐蕃与阿拉伯的直接冲突。唐懿宗咸通九年（867年），阿拉伯才彻底摧毁了吐蕃在西域的势力，扫清伊斯兰教向新疆发展的障碍。阿拉伯在军事上虽取得了胜利，但宗教信仰并不普及，直到公元960年以哈拉汗国的沙托克布拉汗为首的宗教统治集团形成后，伊斯兰教遂在维吾尔民族中生了根，改变了新疆地区的宗教信仰势态，疏勒变成了伊斯兰教的根据地。公元十世纪伊斯兰军进攻佛教中心于阗时，受到信奉佛教的各民族人民的抵制，从而进行了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宗教战争，双方损伤极为惨重，最后伊斯兰教军终于获胜。但伊斯兰教的统治并不稳固，所以在公元1049年于阗佛教徒又有起义反抗之举。据文献记载，十至十一世纪时，除喀什、叶尔羌外，其它各地仍以佛教势力为主。十二世纪初，西辽建国中亚后采取信教自由政策，其后西辽政权被乃蛮屈出律篡夺。屈出律原信仰景教，后皈依佛教，对伊斯兰教采取残酷镇压政策，当成吉斯汗大军于公元1281年进入喀什后，宣布信教自由，一向受压迫的伊斯兰教徒群起进攻屈出律军队，屈出律被杀。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建立后，伊斯兰教在新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十四世纪初察合台后裔托可乐克铁木耳时，将原信仰的喇嘛教改奉伊斯兰教后，使伊斯兰教在新疆又得到了大的发展。但在今乌鲁木齐、奇台、吐鲁番、哈密等地依然是佛教占据优势。据《明史》记载，哈密地区于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伊斯兰教始占有统治地位。清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迫使天山南部农民北迁伊犁河流域垦种后，伊斯兰教在天山以北才得到了发展，嗣后逐渐普遍到全疆各地，并在新疆占有统治地位。

541　新疆佛教由盛转衰和伊斯兰教兴起的历史根原　李泰玉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本文从新疆佛教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伊斯兰教传入以前新疆历史的变化；伊斯兰教传入后同佛教的斗争和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伊斯兰教在新疆大发展并取得统治地位等四方面论述了新疆佛教由盛转衰和伊斯兰教兴起的历史根源。是研究新疆宗教史的重要资料。

佛教何时传入新疆？其说不一。作者根据史料，大致确定在公元前八十年左右，沿

"丝绸之路"南道，从迦湿弥逻国（今克什米尔）传入。约在公元四到五世纪，在天山以南各绿州进入全盛时期，在塔里木盆地南北交通要道上形成了于阗和龟兹两个佛教中心。但到七世纪后期，由于袄教、景教的流行，佛教已趋衰落。十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佛教在新疆西部地区完全衰败。但在今库车（古龟兹）以东地区，回鹘高昌王国，却长期盛行不衰。直到十五世纪以后，佛教在东部地区也渐衰落，伊斯兰教遂占优势。

新疆佛教的盛衰和伊斯兰教的兴起，是同新疆历史的发展变化分不开的，是受着社会制度变革的制约。公元前二世纪，新疆已进入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曾有三十六国之众。汉唐以来，随着"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不断增长，沿线各国经济日趋繁荣，内地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也直接影响这些地区。大约在四世纪前后，已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人们的宗教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于是佛教在四世纪中叶以后特别兴盛起来。七世纪以后，袄教、景教兴起，佛教渐趋衰落。八世纪初阿拉伯人占领中亚，伊斯兰教随之传入，到九世纪，新疆的西北和西南地区，伊斯兰教已很普遍。十世纪末，哈拉汗朝与信佛的于阗国发生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十一世纪初，于阗战败，于是新疆整个西部和西北部基本伊斯兰化了。十四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末的二百余年内，因发生了蒙古征讨西辽的战争，以及窝阔台汗之孙海都联合察合台汗的后裔都哇掀起的持续四十年的战争，造成了经济上的大破坏，社会的大动荡。十五世纪初，又有玛合图木·阿杂木以"圣裔"身份进行传教活动，所以及至十六世纪末，伊斯兰教已遍及天山南北，取代佛教成了统治地位的宗教。

本叙录中已收入孟凡人《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耿世民《哈拉汗朝历史简述》，其中对佛教的盛衰，伊斯兰教的兴起均曾论及，可互为参考。

542 回回教入中国考　　Issac Mason著　　朱杰勤译

（《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2卷第3、4期合刊）

本文考证了回回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对此问题，学者见解不一，如回教传入时间上，有的认为在隋开皇间，有的认为在唐代；在路线上，有的认为先由丝绸之路传入，有的认为先由海路传至广州。因广州有一著名之回教寺名怀圣寺，相传为圣徒雪域加司所建。其傍有一古墓，即为此圣徒之墓。中国回教作家刘智在其所著《至圣实录》一书中，对此均有记述。另一回教文书《西来通谱》，则谓雪域加司为谟罕默德所派遣，自丝绸之路来中国。而《初哲实录》一书则谓雪域加司由海路至广州。本文经考证研究，认为上述记述均为伪说，陕西西安回教礼拜寺之碑，实为各种野史谬误之总源。此碑立于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作者引用了碑文全文，并作了分析。认为碑文中所说回教在隋开皇中（公元581至601年）传入中国绝不可信。因谟罕默德接受第一次天启是在公元610年。又如称阿拉伯为天方，在唐代则称大食。西安府当时称长安，但碑上刻有万年县之名，乃属于后周（公元951年至960年）之名。碑文语气，纯属宋明以后语，与唐代语气不同。且摩诃末译为谟罕默德，此为元末明初人译音。故我国学者陈垣先生认为此碑为明朝时所伪造。至其谓回教于公元601年前传入中国，则由于中回日历

核算之不同。因回历与中历每年有七日之差。史书记载，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有一回教总天文师曾奉诏订正华历，未察回历与华历之不同，由华历反推回历，以致造成误差。如回教纪元本在公元622年，却误算为599年，相差23年。故作者断定，西安回教礼拜寺之碑当刻于1369年之后。文章引用《唐书》和一千年前曾至中国的两名阿拉伯旅行家所写的游记中的有关记载，论述了唐安史之乱时，回纥、吐蕃、大食均应唐肃宗之召助唐平乱，一些阿拉伯人留居中土，娶妻生子，以后又多次渗入，遂成今日中国西部的回教人口。又叙述一回教旅行家于公元878年到中国，在其游记中记述了877年在广州发生的大乱，屠杀了回回、犹太、基督等教徒十二万人。此书作者又记述他迂到一阿拉伯人名伟伯者，久居中国，并曾到西安见过中国皇帝，向皇帝谈了阿拉伯和谟罕默德的情况。作者认为，此伟伯与广州之古墓或有关系，世人以伟伯之事迹沿饰雪域加司的神话，以致张冠李戴。文章经过论证，认为回教人第一次正式通中国当在公元651年回教主奥夫文遣使通聘中国之时。这位使者由麦地那出发，可能自海路而来。回教统一阿拉后，不断向东扩展，其势力进于中亚，并由丝绸之路到达中国之边疆，然后深入内地。特别是元朝忽必烈大用波斯及中亚色目人，其中多为回教信徒，为时既久，回教在西北遂占优势。

543　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　　白寿彝

（《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早在公元651年8月25日，哈里发派第一个使节到长安朝见唐高宗开始，伊斯兰教便在中国逐渐传播并发展起来。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悠久岁月里，中国穆斯林跟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历史，并在许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章从科学、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介绍了中国穆斯林著名人物和他们的主要事迹。如天文学家札马剌丁创造了浑天仪、天球仪、地体仪等天文仪器，马沙亦黑翻译历法、经纬度、天文诸书；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公元十一世纪七十年代写成长达一万三千二百余行的叙事诗《福乐智慧》和包括三百四十首歌曲的《十二木卡姆》。公元十三至十四世纪高克恭、萨都剌的诗和画；十六世纪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李贽；清代四大宗教著作家王岱舆、郁速馥·马注、刘智，以及后来的马德新等。公元1894年和朝鲜人民一起反对日本侵略、英勇保卫平壤的将军左宝贵；1900年在天津和北京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将军马福禄；组织领导回民支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马本斋，于1944至1949年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建立革命政权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公元1405至1433年间，率领巨大船队，七次访问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郑和等。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有维吾尔、回、哈萨克、东乡、柯尔克孜、撒拉、塔吉克、乌兹别克、塔塔尔、保安等民族。他们同汉、蒙、藏等民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一起，共同发展了西北地区和其它地区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交流生产经验，发展文化事业，并开展与各国穆斯林间的友好往来，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

七、语言文字

544 新疆之语言文字 王日蔚

（《新亚细亚》1935年第10卷第3期）

语言文字是人类相互交往传递信息的工具。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贸易的往还，语言文字亦随之沟通传播。新疆是丝绸之路的孔道，中西文化交流之要冲，因其气候干燥，地理条件良好，所以保存了不少文化上的宝贵材料。作者仅就新疆保存下来的古代文字，进行了研究。认为新疆古代语言，在世界语言学上给予了不少指示和修正，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不可磨消的性质，在中国文化史上更有其巨大贡献。古称之为西域的新疆，与中国内地早已发生关系，其语言文字的交流，见于史书记载当自汉始。《汉书》曾称“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互相知晓也”。据此，可推定葱岭以西至安息，语言相同，但葱岭东之语言状况，则无从推测。魏晋南北朝史及两唐书，均无关于新疆语言之记载，惟玄奘之《西域记》对新疆语言之记载颇详。因此，作者据《西域记》考证结果，认为在古代新疆之语言，在新疆南路者，文字均取法印度，一为沙漠北之焉耆、龟兹、疏勒语，一为沙漠南之于阗语。在葱岭西北，为撒马尔罕一带之窣利语，一为铁门南之吐火罗语，此为中外学术界已所公认。至于新疆北路，史无明文记载。北路为突厥所统治，故其语言必属突厥语系。窣利语通行于康居一带，故一名康居语，又名粟特语，字源二十有余，竖读其文。因康居人善经商，丝路之上，商业贸易多此种人，故其文字流行范围较广。覩火罗语，字源二十有五，自左至右，尽以横读。唐时，回纥极盛，其高级官吏，多摩尼教士，而摩尼教士又多为康居人，其教徒当时在长安经营商业盛甚。由于摩尼教徒之布道，商业贸易之发展，窣利语在丝绸之路上广为应用。故在新疆考古所得，除佛典外，摩尼教、景教经典，尚多窣利文译本，由此可知古代撒马尔罕文明之盛。丝路之上商业往还，文化传递，多赖彼等之力。回鹘由蒙古进居新疆之后，以回鹘语代替了原有的语言。回鹘族文化最为发达，摩尼教则借其力传入中国本土。回鹘初信摩尼教，后改信佛教，最后为伊斯兰教所代替。元世祖入定中原，始依回鹘文字改制蒙古字，回鹘文的应用渐衰。伊斯兰教代佛教而兴，于是回鹘文亦渐消灭，最后回鹘文为阿拉伯文所代替，回鹘文遂亡。回鹘文虽为阿拉伯文所代替，但与语言实无关系，盖以阿拉伯字母拼写语言而已。故其文字虽易，而语言则仍旧。由唐末至今千年之间，新疆实为回纥语所支配。本文仅就新疆语言文字的衍变，说明丝绸之路上宗教竞争之激烈，商业贸易之繁盛，文化传播之深远。

本刊中还有法国人Robert Gauthiot所著《窣利语字母之研究》一文，对此语言之发见及属性，以及字母之读法，文法之结构等，均做了较为深入之研究，读之，对了解丝路之上语言文字的演变递嬗及作用等，当有更多更大之帮助。

545 新疆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　　耿世民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3期）

作者在本文中首先概述了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国家以所谓“探险队”，“考察队”之名，公开掠夺和盗窃我国新疆、敦煌等地大量古代写本和珍贵文物。这些各种语言写本，对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和语言文字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学者利用这些文献资料，研究发表了大量著作，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并不断培养新生力量从事研究工作。反观我国，在这方面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有的甚至阙如。因此，作者通过本文，希冀能够引起学术界反思，从而促进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其次，文章论述了我国新疆古代众多民族的形成以及各种语文情况。由于我国丝绸早在公元前的几世纪就已传入罗马帝国，深受统治者的欢迎，而这些丝绸最早是通过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二道输向西方的。历史上曾有来自东西方不同的民族，穿过南北两条商道贩运丝绸，或有的定居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州上，并形成一些各有特点的城廓之国，在公元之后数百年间，这里住有说伊兰语（喀什到和田一带）和印欧语（即所谓的“吐火罗语，约于阿克苏、库车、焉耆、吐鲁番一带)的民族,有说印度语系（古代鄯善、即从尼雅到罗布泊一带）的民族和有说藏语的民族。当突厥族（即回鹘人，亦即古代的维吾尔人）在公元七、八世纪从北方进入新疆之后，逐渐形成为当地的主要民族，突厥语代替了其它各种语言，终于占据了统治地位。文章在这部分里，将十九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所谓“探险队”、“考古队”的发现及所获，按照时间先后一一进行了叙述，从而使我们了解到我国古代文献资料被掠夺的基本情况。文章的最后部分，着重介绍了本世纪初期以来，各帝国主义国家从我国新疆及敦煌一带劫走的数量惊人、且具有重大意义的古代写本及木版印刷文献。这些文献的形式、内容和所用材料是各种各样的，作者对此作了全面介绍。特别在文字方面有汉文、婆罗迷文、佉卢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西夏文、巴思巴文等。在语言方面至少有十几种以上，如汉语、梵语、古代和田塞语、哌哒语、古代库车语、古代焉耆—高昌语、粟特语、古代叙利亚语、回鹘语、中古波斯语、安息语、阿拉伯语、蒙古语、藏语、西夏语等。文章将这些语文的发现、解读、定名经过，以及近年新的发现和当前世界各国对这些语文研究的现状、水平及研究成果做了考评，以期引起各方面重视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及人才的培养。

546 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　　方壮猷

（《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1卷第4期）

本文对古西域语的发现，古西域语之考释及中国古籍对西域语之记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考证。特别是古西域语发现之后，对世界语言学之贡献及对史学上的影响，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这些问题，对研究丝绸之路者来说，至关重要。

自十九世纪中叶后，西方旅行家游历新疆者，无不为古代西域文明所吸引。光绪十

六年（公元1890年）英国巴维尔上尉（Captain Bower）在库车（古龟兹国）获桦树皮上所写的佛典残卷后，又在光绪十八年，法国格列纳氏（M.Grenard）在和田（古于阗国）得古圣经的片断，运往西方后，遂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从此以后，西方探险考古工作者，接踵而来，麇集新疆，进行考古挖掘，尤以斯坦因、伯希和等所获至巨。特别是敦煌石宝发现后，遭斯坦因、伯希和之劫掠，而将最有价值之各种写经绢绘运往西方，对学术界的影响可谓空前。西方探险考古工作者，在西域及敦煌石宝所获之物，有佛教（在敦煌石宝所得古文献书卷中，佛经几占百分之九十）、景教、摩尼教经典，有汉籍，有汉晋木简，有佛画、雕刻、塑像、建筑等美术品。此外，尚有更重要者，即古西域语之发现，其中除梵文、佉卢文、回鹘文外，尚有不可辩认的古西域文字三种，即为窣利语、焉耆、龟兹语和于阗语。

窣利语（亦名粟特语，又名康居语）：此为三种古西域语中创通最早者。此种语言与葱岭一带之语言，亦颇相似，断定此种语言为妫水（Oxus River）流，域古代大夏、康居等国之通行语。从伯希和、斯坦因所获之窣利语文书中，有明言书于唐代长安者；有窣利写语文所的商业文书，并在窣利语文书中，得知窣利国人于公元七世纪初，在罗布泊之南曾建立过一个殖民地，经一世纪之久，仍保存其政治体的组织，可见窣利国人行迹之广，窣利语流行范围之大。

龟兹语：此语定名，莫衷一是，有谓覩货罗语，有谓疏勒语，有谓北方阿利安语。此种语言就其发现之地点及通用之范围，又可分为二类，在吐鲁番、焉耆一带所发现者，其流通范围，似在新疆北部，且此类语言，流行时代较早，故定名为甲种吐火罗语。在库车、敦煌等处所发现者，似流行于新疆中部南部一带，且流行时代亦较晚，故定名为乙种吐火罗语。根据西方学者考证，此种语言用于商旅出入的通行证，且龟兹国的教团中，也多用此种语言，成为生活中的日常用语。经考证，此种语言以库车为中心，而成为通俗语言，所以定名为龟兹语较为恰当。

于阗语：据考证这种语言为于阗地方的土著语言，自公元一世纪初，早已流行于于阗地方，并以于阗为中心，而通行于塔里木盆地之南缘，所以名为于阗语。

至于中国古籍关于古西域语之记载，唯玄奘之《西域记》最为详备。故西方学者在研究古西域语时，多所启发，多所依据，实为创通古西域语之关键。按《西域记》所载，葱岭以西文字语言分两种，铁门以北，为窣利语文通行之地，铁门以南，印度以北，为覩货罗语文通行之地。葱岭以东，大体又分为二类，以大戈壁为界，戈壁以南，以信大乘教之于阗为中心，自成一类，戈壁以北，以信小乘教之焉耆、龟兹、疏勒三国为宗，另成一类。在三种古西域语之研究中，对窣利语、龟兹语、于阗语的研究考证，已有定论，惟覩货罗语作者提出异议。据史书记载，覩货罗既与速利国（即窣利国）同为北方胡国，则覩货罗语与窣利语，当同属伊兰语系，且《唐书》所记吐火罗语书类浮图语，则与印度语又相近。今西域发现之龟兹、焉耆语与印度语、伊兰语皆不相类，而与欧洲语之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色尔巴特语相类似，故虽名覩货罗语，其实果系古代之覩货罗语否，亦颇可疑。作者还就古西域语之发现，对世界学术上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印度欧罗巴语系（即阿利安语、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之总称）之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十九世纪下半期大有进步，因其地理分为十种，认为

十种外，更无复属于此语系之语言。但古西域语发现后，十种之分，不能不有所增加，不能不予打破。因地理之分而又将此十种语言更分为两大类，即东方派，以印度、伊兰等国属之，欧洲语言则属于西方派语。但龟兹语之数词，却与希腊、拉丁语相类似，而与东方派之印度、伊兰语又不相似，故东西两派之分，又不能不予打破。

第二、对文学，特别对宗教史之影响最大。古西域语所写之文籍，以佛典为最多，景教、摩尼教经典均有之。自古西域语发现后，始知佛教初入中国，自西域间接传来，非由印度直接传来，中国开始翻译经典，非由梵文直接译来，大致是从西域诸国语言，如龟兹、焉耆语间接译来，以后遂导致南北朝及隋唐高僧直接去印度取经的活动。

第三、佛教经典之外，如景教、摩尼教经典，除汉语译本，波斯语译本，回鹘文译本外，还有窣利语译本。这不仅对宗教史有很大影响，而且对东方史、中亚史也有其重要的关系。

第四、中国所传七曜之名，乃始于不空所译之宿曜经，经中所列的胡语、波斯语、天竺语。其胡语谓日曜曰密，月曜曰莫，火曜曰云汉等，皆音译之名。自古西域语发现后，才知道密、莫等皆窣利语译出，至今中国东南福建地方，亦通行日曜曰密之语，由此可知窣利语影响中国文化之深远。

第五、中国北方各族，如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之文字，大抵取法于回鹘文，根据所发现之古西域语，始知回鹘文字，又大抵取法于窣利文字，故窣利文字对中国北部民族文化的影响极大。

此外，关于美术史，风俗史种种方面的影响颇多，但作者仅就上述诸点作了概述。就这些材料，对了解丝路之上语言文字的流传和运用，以及这些语言文字对丝路的发展和繁荣关系之大。

547　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　　黄盛璋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本文是伯希和在敦煌石室所得的卷子中，将有关和田塞语文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考释。和田塞语文书原写在《金光明经》经卷的背面，内容包括七件文书，即：《与沙州枢密使书》、《与沙州曹氏某书》、《沙州祈愿文》、《甘州可汗与于阗王书》、《上于阗王庭书》、《朔方王子上于阗王书》、《朔方王子与母书》。对于这些文书，英国学者贝利曾做过研究，并转抄于1954年出版的《和田文书》中，1967年又加译注，并刊于《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院刊》之上。贝利致力于和田塞语研究近五十年，为当代和田塞语研究权威，对此七件文书在研究和翻译方面，都作了最大努力。后又有加拿大学者蒲立本，对和田文书中的汉语对音释读、于阗王统及和田文书年代的考订，又做了大量工作。英国学者韩密顿，在蒲立本的于阗王统年号与文书年代考订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这些学者对和田文书的翻译、解释颇多贡献，但多限于语言学的比较研究，虽也涉及文书年代的考证，对文书所涉及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问题，均未曾讨论研究。本文以贝利的英译本为基础，复又转译为汉文，这样辗转翻译，难免影响原文书的文义和内容的准确性。

本文首先考订了七件和田文书写成的具体年代，其次，对七件文书进行了汉译，并详细作了考释。通过考释，第一可知前三种文书是与沙州曹氏有关，是写给曹氏，并皆有关沙州曹氏事。其中有关当时沙州宗教辞语与汉文记载宗教辞语，经比较研究是一致的，如《沙州祈愿文》提到那八位bodhisattivas、Paripaiakas，那四位Lakapalas、Vaisramna及其他神、王国诸神、王宫诸神。这无异是汉文记载中的“龙天八部”、“梵释四天”及监护诸天神之名，有监护王国、王宫诸神，这对和田文和汉文的比较研究很有价值；同时在一般问候信中，说明沙州曹氏与于阗王室数世通婚，当时沙州地区的许多汉人来往、居住、仕宦在于阗，他们精通和田塞语。第二，在《甘州可汗与于阗王书》中，提供了当时沙州和于阗的重大政治变动。由于双方的王与可汗的退位或亡故，使两地的政治关系终断了十年，如此重大政治问题，《宋史》甘州回鹘记载最缺，此信与其他文书结合，可补《宋史》在这方面之不足，对研究甘、沙州的历史、地理很有帮助。第三、即最后三件文书的最大价值是提供了西夏早期的史实。首先是记甘州可汗与夏人的交往，派僧俗使节代表甘州政府出使夏国的情况；文书中提到Tha-Sa，又称Hara，实为大夏，证明当时夏国确又称大夏。其次，作为夏国信使与于阗交往信中提到Thamhtta（党项），唐古特即党项，与夏国分别为二，这与《宋史》分夏国与党项为二完全相合，证明二者并不等同而是有区别的。

总之，七件和田文书都涉及到丝路之上的甘州、沙州、于阗及西夏的历史、地理、政治、语言文学、民族关系及宗教信仰各个方面，为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从不见史籍记载的宝贵资料。

548 吐火罗语略说 子 范

（《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9、10期）

本文作者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文中对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新疆考古所得之三种古代语言，即窣利语、于阗语和吐火罗语的发现经过，作了简要叙述。认为这三种语言发现后，在世界学术界影响很大，而吐火罗语对印欧语言学的贡献，尤为重要，于是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作者在撰写本文时，全国正处在对日作战的艰苦岁月，一切情报不能互通，国外研究成果又无法获得，所以只能根据战前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对各家之说作了概括对比，对各家学说关于语言的命名，流行区域及说这些语言的民族，以及吐火罗语的文法与属性等，都作了细致的考证。因此，作者认为吐火罗语的发现区域是库车、龟兹、焉耆、吐鲁番一带，而这一带又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印度佛教的东渐，常由龟兹等地直接传入。南北朝时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就是龟兹人。我国早期，即公元二世纪，许多佛教经典，是从龟兹语（吐火罗）翻译成中文的。所以《多笈多添品妙法莲华经序》称：“昔敦煌沙门竺法护于晋武之世，译正华法，后秦姚兴，更请罗什译《妙法莲华》，考诸二译，定非一本。护以多罗之叶，什以龟兹之文，余检经藏，备见二本。多罗则与正法符会，龟兹则与妙法允同”。由此可见吐火罗语与汉文关系之一斑。且中国翻译经典之名词，颇受吐火罗语之影响，故列维氏在《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国语考》中说：“中国佛教之初译，在纪元二世纪时，

其间有关佛教之用语，非印度之原字所能对照，惟用龟兹语始能解释其译音，如“沙门”，梵语为Sramana，龟兹语为Samane，中国之译音与前者远，与后者近。而就义译方面言之，亦即如此。由此可见吐火罗语对中国佛教语言影响之大。反之，汉语对此种语言，既有接触，则必然会有影响，此为今后研究中西文化史及语言学者，应引为注意的问题。

549　论吐火罗语　　　王斐烈

（《学术界》1944年第5卷第2—4期）

本文最先刊载于《中德学报》5卷1、2期之上，后《学术界》又进行了转载。文章分为：新疆古语之发现；所谓吐火罗语与龟兹语；“吐火罗语”之本名“Ārsi”；真吐火罗语与阿耆尼及龟兹；结论等五部分。首先叙述清朝末年，即光绪十六年（1890年）英人包维（Power）在库车搜集到用梵文书写之佛典后，接着德人格纳勒(M.G—renard)于光绪十八年在和田（古于阗）获得佛经残片多件，从而引起欧洲学术界对我国古文献的注意。从此以后，俄、英、德、法及日本等国学术界，以“探险”、“考察”为名，对我国民族文化大肆掠盗，至1900年以后，各种名目的考察团，一批又一批的麇集到我国西北边陲地区，进行所谓的考古发掘，使我国古文化典籍损失惨重。在这些被窃取的文献中，有不少为当时人们所不认识的语言文字，归纳起来，可分为五种，当时学者们称之为第一种语言，第二种语言，乃至第五种语言。后经各国学者辩认，不久即认知第三种语言为粟特（Soghd）语，第二种为于阗语，第五种为西夏语，惟第一和第四种语言，不能有一正确之名称，第四种语言用希腊字母书写，至今仍为悬案。第一种语言又可分为甲、乙两种方言，假定为吐火罗语，即甲种吐火罗语和乙种吐火罗语。根据西方语言文字学家的研究结果，认为古代天山南北有一种属于印欧语族的语言（第一种语言），此种语言又分为甲、乙两方言，甲方言所在地约在焉耆、高昌一带，中国古称焉耆语，梵文称之为阿耆尼（Agni），回纥经文称之为Toxri语，与西方吐火罗无关，而与甘肃西部之Ttaugara相连系，仍为Tocharisch（吐火罗）之方言A（Arsi）。乙方言所在地约为龟兹一带，中国古称龟兹语，梵文称屈支（Kucha），回纥经文称之为Kusan（苦先、曲先），也有人称之为库车语（Kutcheen），另有人则称之为Tocharish（吐火罗）语之方言K（Kuča）。上述为西方学者研究所得结论，但我国学者近年对吐火罗语多称之为焉耆、龟兹语。上述各种语言文字，均发现于我国新疆南部一带，通过这些语言文字，可进一步了解古丝绸之路上人种之复杂和语言文字之各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乃“丝路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关人员颇具参考价值。

550　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季羡林

（《语言研究》1956年第1期）

古代新疆一带是东西文化汇流的地方。这里曾住过许多人种不同、语言不同的部落或部族。中国各时代的历史学家对这一带有过一些记述，但从这些记载里却看不出这些国

家是什么人种，究竟使用什么语言。中国的宗教家和旅行家对这一带语言文字的情况记述得比较详细，但它们究竟是些什么语言？什么文字？在十九世纪末叶以前，几乎是毫无所知。但自二十世纪初年起，对这一带的知识及其语言文字的了解与日俱增，千年未解之谜终于为我们解开。作者详细记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旗帜下，派遣一批一批的所谓"学者"到我国新疆一带"探险"、"考察"，盗窃了我国大批的珍贵文物（包括壁画、石雕佛像、古代碑刻、丝织品、各种古代文字残卷等）的劣迹。但从他们发现的材料中，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亚古代的情形。本文主要考释了新发现的几种民族语言，并着重叙述了吐火罗语的发现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在发掘出来的语言残卷中，有些是认识文字而语言系属也明确的，但也有只认识文字而对语言的性质最初毫无所知的。其中有一种就是德国学者劳于曼（Leumaun）所谓的"第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残卷是用婆罗谜字母写的。劳于曼觉得它的语法结构同其他的印欧语言不同，所以说它是"非雅利安的"。后来又改称"北雅利安语"，但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承认。1907年缪勒（F.W.K.Müller）根据一个回鹘文的题款把这种语言定名为吐火罗语。1908年德国学者西额（E.Sieg）和西额林（W.Siegling）发表论文，赞同这个名称。在这篇论文里，他们对吐火罗语的语法结构作了初步的探测，他们肯定了它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同时还指出，吐火罗语有两种语言不同而内容相同的残卷，他们称之为A组和B组。两组用的字母相同，但在元音发音法和辅音发音法以及词的变化方面却有着显著不同。然而这只是两种方言，而不是两种语言。进一步研究发现，甲方言残卷发现地点几乎只限于焉耆，而乙方言发现地点主要是在库车。到了1913年法国学者列维（Sylvain Levi）就主张把吐火罗语乙方言改称龟兹语，以后经考证，所谓吐火罗语乙方言者实际上就是龟兹语。1921年西额和西额林把甲方言的残卷影印出版。1921年《吐火罗语法》的出版在吐火罗语的研究上是一件大事。这部语法是西额和西额林在比较语言学家舒尔茨（W.Schulze）的协助下费时二十多年写成的。有了这样一部书，吐火罗语的研究才算是真正有了基础。不过，本文作者怀疑"吐火罗语"这个名称的正确性，但目前也没有更恰当的名称。

至于吐火罗语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作者列举了几个汉语里面的外来借字，如对梵文Gaṅgā，早期音译为恒(河)，中期译为恒伽(河)，晚期译为殑伽（河），而唐代的许多书籍都有对早期和中期的音译的批评，认为是"讹也"，"皆讹也"。在吐火罗语甲方言里Gaṅgā变成Gaṅk，在乙方言（龟兹语）里变成Gaṅk或Gaṅ，这同中文"恒"字完全符合。作者的结论是：吐火罗文就是中文音译"恒"字的来源。其他如须弥(山)，吐火罗语甲方言里是Sumer，乙方言（龟兹语）同。无疑，这也是"须弥"的来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期，我们两国不完全是直接来往，使用吐火罗语的这个部族曾在中间起过桥梁作用。今天我们都认识到中印文化交流对这两个伟大民族所起的作用，饮水思源，我们不应忘记那些曾经构通中印文化的吐火罗人。

551 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国语考　　(法)列维著　冯承钧译

(《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1卷第4期)

鉴于本文原未分节，且文字约有一万五、六千之多，为读者易于明了起见，依其内容析为三大节，第一节考证木简文字，第二节引证中国历代史籍之外国列传及外国游记中属于龟兹国的记事，本节内容，几占全文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第三节则为本文之结论。

在第一节中，经作者对发现之龟兹语文进行考释后，提出此语为龟兹国固有之语抑或为外来侵略种族之语，如泥婆罗(Népal)之Parbatya语与土人之Névari并行呢？但玄奘《西域记》明言"其王屈文种也"，则其必为土著无疑。且中国史籍所载，龟兹自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皆白氏一姓相承，尤足以证明为土著。可是在古代也必有亚利安(Aryen)种族一支于新疆，自立为国事，应为研究之问题。

在第二节中，作者将中国史籍记载龟兹之事，并参考他书之所得，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汉武帝时，龟兹已与中国发生关系，当时龟兹已为西域一文明大国，能铸冶，有铅。至汉宣帝元康时，龟兹王绛宾及夫人多次来朝，乐汉衣服制度。由此可知，前汉时龟兹与中国关系之密切。自汉以来，龟兹与中国关系，虽有时中断，但不久又有恢复，在千年来之历史中，龟兹与中国文化影响最大者，莫如佛教之传入与佛经之翻译，以及音乐之输入。中国佛经之初译，在公元二世时，当时所译佛经，非由梵文译来，而直接由龟兹语译来。如沙门、沙弥等专用名词，均由龟兹语音转移而来，其他如出家、外道等词，皆由龟兹语义译来。由此可知，龟兹语实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媒介，对佛教之贡献可谓巨大。至于中国有龟兹乐，始于吕光灭龟兹(公元283年)得其声，至隋唐时，中国音乐因受龟兹乐的影响，为之改观，且婆罗门人曹姓，世习其业，为龟兹琵琶弹奏之名手。龟兹音乐输入后，经隋唐之吸收、融化、创造，形成了伟大的唐代音乐，影响之大，可得而知。

本文在结论中，叙述了龟兹之衰亡情况，认为在公元八世纪末叶，龟兹佛教学术及音乐仍尚昌盛，此后二百余年，龟兹历史沦为黑暗时代，至公元1001年，龟兹之名重见于中国史书时，中亚与东亚情况已有巨大变化，唐室已亡于藩镇，其强敌突厥、吐蕃、回鹘已次第瓦解。宋朝建都开封，中国北方为契丹所据，回教徒已侵取西域于佛教徒之手。龟兹虽数次派人贡方物(最后一次是宋哲宗绍圣三年即公元1096年)，但距消亡之期不远矣。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可知信奉佛教之信心已改，昔日佛教之西域，一变而为回教统治下之西域，龟兹过去之亚利安历史，至是遂告终结。

本文有关龟兹语的研究，引证了龟兹与中国关系的全部历史及龟兹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龟兹在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沟通中西交通，发展东西方贸易，传递中西文化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故熟知龟兹之历史沿革，对研究丝绸之路有很大帮助。

《女师大学术季刊》另有一篇列维所撰之《龟兹语及其研究之端绪》一文，内容包括：对龟兹语发现之经过；龟兹语研究之经过；对覩货罗语之批评；库车发现之龟兹通行证；龟兹语属Italo—celtgue语族；由考古学上证明印欧文明影响中亚之早；龟兹语法句经；Bae—tria为希腊印度之媒介，等等。内容丰富，考证详实，实为本文之姊妹

篇，可一并读之。

552　吐火罗语与尼雅俗语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在乌鲁木齐市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　季羡林

（《新疆史学》1979年创刊号）

本文系季羡林先生在乌鲁木齐市所作的关于吐火罗语和尼雅俗语的学术报告。本世纪初，外国人在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所谓考古发掘的同时，发现了两种人们从未见到过的文字，因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一种叫吐火罗语，所用的字母为婆罗迷字母，从左向右横写，字母虽已认识，但语言不懂。当初有学者起名为第一种语言，但并不知道是什么语言。后由德国学者缪勒定为吐火罗语，而法国学者列维认为吐火罗语B（此种语言分A、B两种），应该叫作龟兹语，因其在龟兹地方发现，应以龟兹命名。嗣后德国学者西额和西额林二人于1921年出版了《吐火罗语法》，实即吐火罗语A，英国学者白雷认为吐火罗语A，应叫作焉耆语，B语应叫作龟兹语，都各以其发现地之不同而命名。但因这两种语言十分相像，便又叫作吐火罗语A、B。吐火罗语的发现，首先打破了十九世纪以来人们对印欧语系的传统分法，即印度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东支，而欧洲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好象东西分明，音变规律清楚，并已成了定论。但吐火罗语发现后，这种传统分法被打破，直到现在，学术界仍无统一的认识和结论。其次，吐火罗语发现后，人们对中印文化交流和佛教传播的认识，起了根本的转变。原来佛教最初不是由印度直接传入中国，而是经过吐火罗民族或说吐火罗语的人为媒介。因为早期的佛教经典上的名词和印度的地名等，都不是由梵文译来，而是由焉耆语或龟兹语译来，这就否定了中国佛教最初由印度传来的说法。当时发现的另一种文字叫尼雅俗语（俗语即百姓的语言）。尼雅俗语是用佉卢文书写，写法是从右到左。这种语言属于印度俗语里的西北方言，它流行在到印度西北部，后传到了新疆，并受到周围焉耆语和龟兹语、波斯语的影响，结果尼雅俗语具有了焉耆语和龟兹语的成份，成为新疆特定地区内的特有语言，原来印度语的痕迹完全消失。焉耆语、龟兹语残卷记载以佛教内容为主，而尼雅俗语则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情况，这一点实属可贵。上述这两种文字的发现，不仅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关注，而且对丝路之上民族的移徙、宗教的传播、语言文字的转化等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其重要的意义。

553　焉耆——龟兹文及其文献　　李　铁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

焉耆——龟兹文旧称“吐火罗文”。二十世纪初发现于新疆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字，所用字母是印度的婆罗迷字母斜体，所记录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Centum语组。这种文字有甲、乙两种方言：甲方言主要使用于焉耆——高昌(今吐鲁番)一带，被称为“甲种吐火罗语”；乙方言则限于古龟兹(今库车)地区，被称为“乙种吐火罗语”。当焉耆——龟兹文写本发现后，中外学术界对其定名问题争论不休。最初称为“第一种语言”（或北雅利安语），后又称“喀什喀尔语”、“吐火罗语”、“龟兹

语”、“安西语”、“焉耆语”等。至40年代，英国学者亨宁先后发表《粟特语杂考》、《焉耆语和吐火罗语》等重要论文，论证了所谓“吐火罗语”就是古代龟兹、焉耆民族的语言。其后比利时、丹麦、美国、日本等国学者都参加了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70年代。我国学者季羡林在《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的著名论文中，论证了吐火罗语即焉耆——龟兹语，指出了它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曾起过桥梁作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考古队已发现“真吐火罗语”，故1980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会上正式把旧称“吐火罗文”改称“焉耆——龟兹文”。新疆出土的焉耆——龟兹文文献，绝大部分都被各国“探险”队运到国外，现在分别藏在柏林、巴黎、列宁格勒、伦敦、新德里、东京等地。本文概略介绍了各国已刊布的文献名称和整理经过，并分类简介了文献名称和战前国外对焉耆——龟兹语的主要研究者。有关各家论著，可参阅施文特纳编的《吐火罗语著述目录（1890—1958）》和齐默的续编。

554　于阗文及其文献　　　黄振华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

于阗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国家。本文概述了于阗文及其文献的情况。于阗文字来源于印度婆罗迷字笈多正体，是于阗地区塞族居民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有楷书、草书、行书三种，有很多字母与古藏文相似，附加元音符号也与古藏文相同。有的文字学家认为，于阗文字也可能是古藏文之所本。用于阗文字记录的语言今称于阗语或于阗塞克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根据已发表的材料，于阗文文献的出土地点在今新疆和田、巴楚、图木舒克、木头沟和甘肃敦煌等地，年代约属六至十世纪。但在于阗地区，还曾发现约属三世纪的一种汉文与佉卢文并用的“马钱”；在现存佉卢文文献中，也有属于于阗地区的文书和佛经。这说明早在使用于阗文以前，于阗地区就曾流行汉文和佉卢文。现有的于阗文文献，有不少文书掺用汉文，使用汉文年号，甚至使用汉文和于阗文共同书写。于阗文书中还有许多名称采用汉语。这说明汉文始终通行于于阗地区，而当时于阗与内地政权的政治文化关系相当密切。当十九至二十世纪之际，各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争夺我国西北边陲，竞相派遣“探险队”前来从事所谓考古和地理考察，掠走我国许多珍贵文物，包括多种古西域民族文字文献，于阗文文献便是其中之一。最先在我国掠取于阗文文献的是俄国和英国驻喀什领事彼得洛夫斯基和马继业。1901年德国梵文学家霍恩勒首次发表的于阗文文献，就是马继业等人所获文卷。帝国主义掠走的于阗文文献，现藏巴黎、伦敦、列宁格勒、斯德哥尔摩、京都、加尔各答、新德里、柏林、不来梅、费城等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的贝利教授从事于阗文研究40年，自1946年起已将各国所藏大部分于阗文文献转写发表，原件也已影印刊布。文章详列了贝利及其学生厄麦里克、德雷斯登已发表的于阗文文献目录，并认为这些文献对研究于阗史、佛教史、西域史都有重要意义。

555　浅论粟特字母的传播与回鹘文的创制　　　王叔凯

（《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3集）

古代维吾尔人（回鹘人）采用粟特（又作窣利）字母拼写突厥回鹘语的文字，称为

回鹘文。历史上，随着伊斯兰教文化的东渐，阿拉伯字母式的维吾尔文逐步取代了回鹘文。但在此前，契丹人曾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另制新字，称契丹小字。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灭乃蛮国，获乃蛮太阳汗师畏兀儿人塔塔统阿，依据畏兀儿文制成蒙古文。清太祖努尔哈赤，又命噶盖额尔德尼依蒙古文制满文。后来，锡伯族又将满文稍加改变，创制了锡伯文。这些史实，说明回鹘文在东方文化史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那么回鹘文是怎样产生的呢？过去，史家几乎一致认为是和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即景教）有密切关系。作者认为与景教无关，而与佛教、摩尼教在西域和古代蒙古草原地区的传播以及粟特人的商业活动直接有关。

粟特或窣利，是Sogd的不同译写。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时，阿奇明尼德王朝有一行省索格迪亚那（Sogdiana），与巴克特利亚（今阿富汗北部）毗邻。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产生于北印度迦毗罗卫国的佛教，在传入巴克特利亚地区后，为希腊裔的大夏人所信仰。当时大夏国的版图包括索格迪亚那。月氏人征服大夏后，继承这一传统文化，粟特人中便出现了许多佛教徒。佛教东渐，北方草原地区也受到佛教文化浸润，柔然、突厥、回纥都曾统治过北方草原，都有信奉佛教之事。

索格迪亚那是古代东西方贸易必经之地，从而促使这一地区产生了发达的贸易经济。随着粟特人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在突厥汗国时代，移居蒙古草原的粟特人数量相当可观，同时也在汗国政治、经济活动中产生很大影响，突厥汗国用突厥文，也兼用粟特文。回纥统治蒙古草原时，粟特文仍是官方语言。位于天山东部的高昌，扼中西交通要冲，早有回鹘人定居。1979年出土的“代人”木牌，证明起码在五世纪末，高昌一带操突厥语的部族已开始用粟特字母拼写突厥语了。而粟特文在高昌传播，除粟特商人贸易活动这一经济因素外，也包含宗教因素。因西域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先后占据过高昌政权的统治者，都尊重佛教。而转译为中亚各族语文的佛教典籍中，又主要是粟特文佛典。这些佛典东传，导致粟特字母在盛行佛教的高昌传播。据亨利·裕尔《古代中国闻见录》记载，在鄂尔浑河、图拉河流域游牧的克烈部于十一世纪初皈依景教。此时，回鹘已西迁一个多世纪。但远在六世纪末的突厥佗钵汗时代，粟特文已在漠北广泛使用。而高昌“代人”木牌的出土，进一步证明用粟特字母拼写突厥文字的产生，与景教的传播无关。

三十

556　回鹘文字来源及其演变　　　　李符桐

（《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5期）

文字是纪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对人类文明的促进起了很大作用。它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完善。回鹘本为塞外部落，原无文字，及灭薛延陀，称雄漠北，西通西域，南聘于唐，事务频繁，文字日渐需要，乃由信奉摩尼教教士，仿其乡邦文体，创成回鹘文字。关于回鹘文字的创立，各说不一，有谓唐时天主教人自西里西亚东来传教，授以西里西亚文字；有谓文出于天方。作者根据史册记载，认为回鹘文仿自西亚固属正确，但非创自景教徒，而为摩尼教徒。在回鹘旧部哈喇巴尔格森（Karabalagosun）发现九姓回鹘碑，碑文有汉文、突厥文和康居文三种，据学者考

证，回鹘文或即仿康居文所造。但康居与粟特并非一地，据白鸟库吉考证，康居指住在锡尔河北岸者，为行国，其民族属突厥，系外来者。粟特指居住在阿姆河流域者，有城郭之居，经营农商，文化亦较发达，其民族为伊兰种，为土著。因此，作者认为回鹘文字来源于康居，实不如说来源于粟特更确切。《西洋美术东渐》称："回鹘文字出谁制作一点言之，这是摩尼教徒从索格特（Sogd）文字合并出来，所以回鹘文字和索格特文字是极相类似的"。索格特文字，今仍行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这是中央亚细亚多摩尼教之关系。摩尼教向东方传播，索格特（即粟特）文字便传到西域。摩尼教兴于萨珊王朝，后摩尼教被禁，其教徒多往东部撒马尔罕一带避难，且回鹘统治新疆建畏兀儿王朝时，其高级官吏多摩尼教徒，故作者认为回鹘文仿自索格特，其中介者则为摩尼教徒。回鹘文创立后，对以后契丹、金人之文字，均受其影响，尤其蒙古字的创立，则取之于回鹘文，故回鹘文字影响之大便可知矣。

总之，回鹘文字为摩尼教徒所创，仿自索格特语（即粟特语）。由于语言之演变，辽、金文字虽受其影响，则属间接，蒙古则直接受其影响而创立蒙文。因此，语言文字随着时代的变化、商业贸易的发展而发展演化，相互影响。粟特语由于摩尼教的东徙而传入西域，从而影响了回鹘人民，并创立其文字，故粟特文明，在中古时期对人类文明有较大贡献，粟特语又为丝路之上的通用语，此为研究"丝绸之路"应予了解认识的问题。

557 粟特文及其文献　　黄振华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

古代粟特国位于今苏联塔吉克北部和乌兹别克南部，地处阿姆河中游两岸及泽拉夫善河流域。曾先后归属波斯阿契门尼德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汉时为康居属国，称为粟弋，《魏书》始称粟特。其国王自魏文成帝初年以后，曾九次遣使朝贡。隋唐时其地为昭武九姓所居。八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人入侵粟特，遂灭其国。本文论述了粟特文的来源、特点发现经过及其文献。据语言学家研究，粟特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粟特文出自波斯时代的阿拉美文字草书，只有19个音节字母，是一种没有标明元音的音节文字，只用弱辅音字母兼表元音。在景教文字的影响下，粟特文也按其在词中位置的不同而改变写法。后在汉文影响下，又把从右到左横写改为从上到下竖写。粟特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同中波斯音节文字一样有阿拉美借字。粟特人在历史上以善贾著称，是中亚丝绸之路上的中介，其足迹东及新疆、甘肃、蒙古、陕西、河南和江苏等地。因此粟特语文曾一度为中亚地区所通用。迄今所发现的最古粟特铭文属于公元一世纪。粟特文的消失约在公元11世纪。粟特文的发现始于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他们自1902年至1905年在吐鲁番连年发掘，获得粟特文经典多种，此后法国的伯希和、英国的斯坦因、俄国的鄂登堡则从敦煌窃走大量粟特文献。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以西汉代烽火台遗址获得著名的粟特文书《粟特古书简》。1932年在粟特本土发现了著名的粟特文献穆格山文书，据说这是八世纪时被阿拉伯人俘杀的粟特国王德瓦什梯奇的档案。此外，苏联考古学家还在喷赤干发现粟特钱币1500多个，以及粟特文印章、有粟特文题记的壁画。总之，现存粟特文文献主要有宗教文献、社会经济文书、钱文、印章、碑刻、壁画

题记、书简等。此外还有粟特文文学作品，有粟特铭文的器物。这些粟特文献现藏英、法、德、苏等国。文章介绍了各收藏国粟特文献的研究者和23种粟特文佛典及其主要研究著作。特别是介绍了国外学者研究 斯 坦 因 在汉代烽火台发现的六封粟特文书信，尤其是其中第二封信的情况。并将原信第11至16行译为汉文，信中述及洛阳被焚，天子出亡、匈奴入据洛阳事。作者认为这可能是记述曹操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的事件。若此假设不误，则写此信的年代当为建安六年（公元201年）。 这封信内容丰富，涉及粟特人进入河西和中原经商的规模、范围、商品、行市等情况，为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

558　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　　　　道　布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1期）

本文根据史籍文献记载，论述了回鹘式蒙古文的来源、特点、演变及其文献。蒙古族在古代多数是草原游牧民，一部分是森林狩猎民，原来都无文字，以刻木记事。蒙古族最初曾借用汉字和回鹘字母来拼写自己的语言，但以后史料很少提到用汉语拼写蒙古语的情况。据《元史·塔塔统阿传》记载：蒙古族采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是在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之后。当时俘掳了一个精通本国文字的回鹘人塔塔统阿，就让他教太子诸王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这种文字就是回鹘式蒙古文。回鹘字母来源于粟特(即窣利)字母，共有19个。回鹘式蒙古文的拼写法基本上沿用回鹘文的规则。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即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通称八思巴字）。这是脱胎于藏文字母的竖写拼音文字，大多数字母与藏文字母相同或相似，少数新造的字母也以相应的藏文符号为基础。蒙古新字于公元1269年正式颁行，遂限制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到元朝后朝，回鹘式蒙古文又逐渐通行。经过元、明两代，到十七世纪初，回鹘式蒙古文发展为两个支派：一支即现在通行于我国蒙古族大部分地区的蒙古文，另一支是只在新疆蒙古族中使用的托忒文。这两种蒙文在字母或拼写法方面都同回鹘式蒙古文有明显区别，现存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不多，计有写本、刻本、碑铭、印文、符牌等几大类。文章详细介绍了这几类的主要文献及其内容、来源、现藏地点，并指出这些文献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559　突厥文及其文献　　　　陈宗振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1期）

“突厥”（Turk）一词为我国西北地区古代民 族 的名称，有广狭两义：狭义专指公元六至八世纪在北方建立突厥汗国的突厥族；广义包括突厥、铁勒各部落。在语言学上，把古代突厥、回纥以及黠戛斯等古代民族的语言以及现代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几十种民族语言划为一类，称为突厥语族的语言，简称“突厥语”。“突厥文”是古代突厥民族使用的拼音文字。突厥汗国、回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都曾使用这种文字，黠戛斯、骨利干族也使用过这种文字。据《周书·突厥传》的记载，突厥族当时已有文字，但人们一直不了解这种文字的具体情况。从十七世纪以来，荷 兰、瑞 典 和 俄

国的一些学者，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和中亚七河流域等地发现了一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石碑。直到十九世纪末，还无人能解读这些碑文，也不知道它们属于什么民族。1889年，俄国考古队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了刻有汉文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人们始知这些碑铭属于突厥汗国，碑文为突厥文。1891年，俄国考古队又在蒙古翁金河畔发现了《翁金碑》。俄国突厥语言学家拉德洛夫和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二人同时解读了这些碑文，对研究突厥文做出了重大贡献。数十年来，又有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对突厥文文献进行了研究。突厥文碑铭和写本在西伯利亚、蒙古、叶尼塞河流域、新疆和中亚都有发现，其使用时间大约在七至十世纪之间。突厥文有40个字母，其中一半以上都有见于不同文献的变体。突厥文文献主要是一些碑铭，另一部分是写本。本文详细介绍了一些碑铭和写本的名称和发现的时间、地点。并简略介绍了一些对历史研究有较大价值的碑铭的内容，即《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和《铁尔浑碑》。文章最后还介绍了苏联、德国、日本、土耳其、瑞典、丹麦等国研究突厥文的主要人物和著作。

560　尼雅新出的一件佉卢文书　　　邵瑞祺著　　黄盛璋译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3期）

新疆发现之佉卢文书以"尼雅遗址"为最多，在波义耳等刊布的764件文书中有709件。后来布罗又增译1930年斯坦因在新疆被扣下的18件，共727件，连同其他遗址发现的已有782件。本文介绍的这件佉卢文书是1981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吴景山骑自行车独自考察"丝绸之路"时，于"尼雅遗址"拾得，交由民丰县委保存的。当时本文译者也沿"丝绸之路"南道进行历史地理考察，承民丰县委允予拍照，鉴定原物知为佉卢木函文书，但不能释读。1984年译者赴美讲学，特请华盛顿大学研究佉卢文并精通梵文的邵瑞琪教授，释读获得成功。本文即是邵教授研究的成果。

新出的文书系常见的所谓"楔形双片木函"的上片，端点有一绳孔，靠近中部有一容纳泥封印与绳的方槽，封泥已不存在，木片损坏相当严重。木片上有墨书文字于两边，和同类木函一样，正面（即盖泥封的外边）为受书人，里面（背面）有三行正文，系一公文的继续。按楔形木函的惯例，正文是从木函下片正面开始。但因破损或模糊，全文释读已不可能。经作者与其他同类文书对比，基本可恢复原貌，特别是和斯坦因在他的《古代于阗》一书中所描述的一件文书比较，可以确认是它的已失去的前半。此两片文书合译，其内容大致是关于Kaḱe与Lipýe把它们几匹牝马放牧在Opǵeya地里吃草，被萨毗人从那里偷走，国王用泥封文书谕令镇官进行调查，如申诉属实，将马匹还给物主，而不要向Opǵeya赔偿。如发现指控有误，或不能断决，似对此进一步有所指示。文书最后一行是常用的谕令：要按已定法律作出决定。本文文后附有译后记，为使读者易于理解，将文中有关之处作了详细说明。

561　古代维吾尔族文字和文献概述　　　耿世民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3期）

本文概要介绍了古代维吾尔族历史上曾使用过的几种文字和现存的主要文献。古代

维吾尔族在历史上称为回纥、回鹘。他们在公元七至十四、五世纪约七、八百年间，曾先后使用过四种文字，即突厥文、回鹘文、摩尼文、婆罗迷文（也称古代焉耆——龟兹文）。此外还有少量用粟特文、藏文和叙利亚文写成的残卷。在这些文字中以突厥文、回鹘文使用较普遍，曾取得民族文字的地位。维吾尔族人民曾使用这些文字记录，保存下了一部分有关社会历史、经济、语言、医学、天文学、宗教、文学学等方面的文献。但在伊斯兰教于公元十世纪下半期首先传入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到公元十四、五世纪左右在整个塔里木盆地取得统治地位后，各种非伊斯兰教文献曾遭到大规模的毁坏，故现存文献可谓"劫后余烬"。回鹘人在漠北游牧时期和西迁新疆后的初期曾使用过突厥文。而回鹘文是古代维吾尔人在采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以前使用最广、目前保存文献较多的一种文字。它在历史上曾为不同信仰的维吾尔人所使用，也用于一般世俗文献中。回鹘文一直使用到公元十四、五世纪，对周围民族的文化发展起过巨大作用，曾被钦察汗国用作官方文字，蒙古文和满文也是由它演变而来。漠北时期的回鹘统治阶层曾奉摩尼教为国教，西迁后摩尼教仍流行过一个时期。故回鹘摩尼教徒也用摩尼文书写文献，但数量不多。回鹘西迁到新疆后，又从当地焉耆、龟兹人中接受了婆罗米文，同时增添了几个新字母。这种文字源自印度的婆罗米的中亚斜体，文字从左到右书写。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多为佛教内容。文章还介绍了这些文字的来源、字母、发音和标点符号，并详细介绍了现存的主要文献。这些文献计有：（一）历史作品：有碑铭、史书和其它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二）文学作品：有诗歌、格言谚语、剧本和故事；（三）宗教文献：有佛教、摩尼教、景教的文献；（四）其它：有字书、历法、星象学、医学、占卜和社会经济文书、信札等方面的文献。

八、音乐百戏

562　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　　　阴法鲁

（《新建设》1957年第11期）

本文系统的论述了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过程。其中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曾经把西域的乐曲传到长安，对当时的音乐界发生过较大影响，有关这部分的历史，对研究“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及我国古代音乐史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商代以前的音乐，历史上缺乏记载。商代已进入奴隶制时代，社会有了阶级的分化，音乐也渲染了阶级分化的色彩。现在已发现的商代乐器有磬、鼓、铎、埙等。据出土文物，可以推测那时的音乐已相当发达，也有了一定的乐律知识。在商代大概已经出现了世袭的“乐人”——职业音乐师。西周仍然处在奴隶制时代，《诗经》中的诗，大半是西周时期由政府采集并整理过的作品，一部分是贵族的乐歌（雅、颂），大部分是各地的民歌（国风）。《诗经》这部书的本身，就是西周音乐发达的证据。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春秋时期，以诗经音乐为主的“周乐”保存在鲁国。战国时期，楚国的地方音乐兴盛起来。在其后期，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搜集民歌进行加工，并以民歌为基础创造新的诗篇，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情绪。据《汉书·礼乐志》记载，西汉初年，楚声——楚国的乐曲仍然流行。武帝时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叫“乐府”。乐府所搜集的音乐和歌词也都称为“乐府”。汉代的乐府音乐也称为“清商乐”或“清乐”，盛行于两汉、魏、晋及南北朝时代的南朝。张骞通西域，把西域乐曲传到长安，影响了当时的音乐界。南北朝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由于民族的迁徙杂居，文化的频繁交流，中国音乐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清商乐流行于南朝。在北朝，除了北方各地的民间音乐陆续地被发掘整理之外，西域（包括新疆、中亚细亚、印度等地）的乐舞伴随着佛教传来。南朝和北朝的音乐也有交流，北方的民歌和西域音乐传到江南。北周天和三年（568年），武帝娶了一个突厥族皇后阿史那氏，“西域诸国来媵，如龟兹、疏勒、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人令一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随同这个乐团来的龟兹人苏祇婆，擅长琵琶，他把龟兹琵琶七调传授给长安的音乐家郑译。隋代统一之后。在整理音乐方面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次辩论继续了好几年，最终音乐的发展是走的“华戎兼采”的路子，在乐律方面，龟兹琵琶七调成了隋唐燕乐（宴乐）乐调的基础。隋文帝设置七部乐，炀帝大业年间（605—615年），改为九部伎，而把清乐（清商乐）列为第一部。唐代不但继承和发展了南朝和北朝的文化传统，而且不断吸取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以丰富自己的社会内容。这给音乐的发展又创造了有利条件。唐初，沿用隋代的九部乐，到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改为十部乐，而把燕乐伎列为第一部。这十部伎，朝廷举行宴会时，坐在堂上演奏的叫“坐部伎”，立在堂下演奏的叫“立部伎”。除清商伎外，各部伎所用的乐器，大部是西域传来的。一小部分是中国固有的。经过无数次的审音试验，中国乐器和西域乐器配合了起来。由于中原音乐和外来音乐长期地接触融

合，由于广大职业的和非职业的乐工和舞工的努力，从而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唐乐。唐乐不仅为当时的中国人民所喜爱，而且也传到各邻邦如印度、朝鲜、日本，为外国人民所喜爱。宋代的音乐都是继承唐代的而又加以发展，但教坊的规模则远不及唐代。北宋已经出现了杂剧，到南宋逐渐盛行起来。在南宋偏安江南时，金人统治了北方的广大地区。一方面它继承了一部分北宋的音乐；一方面北方各地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民间乐曲。在金代，“诸宫调”很盛行，董解元的“西厢”就是诸宫调体的代表作。元世祖灭宋以后，把南宋朝廷的乐工、乐器都运到北方来。元代的版图横跨欧亚两洲，外国人迁入中国的很多，因此中国音乐又增加了新的成分。当时流传在北方的杂剧采用了北方的乐曲，使用北方口语，因而逐渐演变成“北剧”，即“元杂剧”。当时除了创作戏剧之外，还涌现出许多新的民歌，历史上称为散曲。在元代，北剧盛极一时，而南戏则比较消沉。明代许多地方戏都发展起来，南戏尤为盛行。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朱载堉发明“十二平均律”，比德国人魏克迈斯特的同样发明，约早一百年。这时欧洲音乐也开始传入中国。明末清初，欧洲音乐虽然传到中国来，但影响并不大。明清两代的乐谱保留下来的很多，而且有许多乐曲依然流传在民间。

563 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 〔日〕岸边成雄著 邹仲华译

（《新疆艺术》1984年第3期）

本文论述了古代西域的乐曲名称及其传入中原的过程。文章首先概述了隋唐时代西域乐曲流传的情形。隋代九部伎乐曲名称，已经使用了外来语的汉译名称。西域十八个乐曲中，有十五个被译成汉音名称而广泛使用。唐代的乐曲中，西域乐曲所占的数量很多，据《太乐署石刊》、《教坊记》、《羯鼓录》等文献记载，共有乐曲676首，其中很多曲名有重复，但也有同名不同曲的。此外，《通典》、《乐府杂录》等文献中，也记载了许多曲名。唐玄宗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七月十日，将变更曲调的名称通令天下，并刻在石碑上，这就是太乐署石刊。其内容是将胡乐和俗乐融为一体，是唐代音乐史上的一个重大变迁。接着，文章根据太乐署石刊、《羯鼓录》、《教坊记》的记载，用胡名列记了西域乐曲的名称。并对《婆罗门》、《苏莫遮》、《浑脱》三个乐曲的内容作了说明。文章还考证了《隋书·音乐志》中，关于龟兹音乐家苏祇婆创立七调理论并传入中原的史实。北周时，突厥公主阿史那嫁给武帝，苏祇婆随同来朝，将七调、五旦理论传入中原，柱国沛公郑译受到启发，建立了十二律七声八十四调的理论，并呈奏皇帝。事实是建立八十四调理论的是乐工万宝常，因万宝常是奴隶，其成果却被郑译据为已有。印度马德里以北、布托考泰州的库台米亚马来衣库的岩石壁上，雕刻着七调，其名称和顺序都与苏祇婆的七调相符，年代为七世纪、比苏祇婆晚一个世纪。而苏祇婆七调的曲名是梵语的汉字音译，故作者认为，苏祇婆七调的发源地应是印度。

564 八世纪前中国乐舞与西域乐舞之递禅 常任侠

（《新西北月刊》1940年第2卷第3、4期）

本文对中国乐舞之发生与发展考证甚详。前半部阐明秦汉以后中国音乐舞蹈之盛

况，特别是自汉代以来，乐舞寖盛，故有雅乐与杂舞之分。雅乐用之于郊庙朝飨，杂舞用于宴会。在雅乐之外，又有西曲歌与散乐，在其中亦有舞曲。西曲乐有石城乐、乌夜啼等十六曲，散乐有俳歌辞与凤凰衔书伎二种。上述雅舞、杂舞、西曲乐、散乐等，大率吴楚之音，为南朝所尚，均为中国所固有。西域乐舞，虽盛于隋唐，而在张骞通西域后，得横吹胡笛，传其法于长安，自为中国改变乐舞之始。隋文帝时，整理乐章，集域外诸国之伎，总为七部，大业中又复增为九部，至唐太宗平高昌，收其乐，自是初有十部乐。据《隋唐乐志》、《通典》、《通考》等书，考之十部之乐，无一不以域外音乐为主，龟兹、西凉两部，殆居首要。故唐十部乐中，天竺、于阗、龟兹、疏勒、康国、安国、西凉、高昌诸国之乐皆有，都属西域乐舞而粲然盛于中国者。即或有自治，仍往往受外域之影响。作外域之乐者，亦效外域之妆，故开元天宝之际，长安、洛阳胡化甚盛。当时国势强大，人民生活安乐，乐舞之盛，仅其一端。唐代尚有燕乐一名，并有大曲、杂曲之分。大曲凡四十七种，杂曲二百七十八种。大曲与杂曲，多源于西域，如拓枝、龟兹乐、醉浑脱、菩萨蛮、南天竺、西国朝天之类，皆明示所出，余或本域以外之乐，而冠以华名，或借胡乐节奏为之。如玄宗所谱霓裳羽衣，最为大曲，实则为婆罗门曲。该曲传自西凉，为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唐玄宗润饰其词，而易以霓裳羽衣之名。《全唐诗》载杨贵妃善霓裳舞，侍儿张云容赠之以诗云："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观此轻盈袅娜，知霓裳羽衣之美妙。由此可知汉唐以来舞乐之梗概。故自汉以来，西域乐舞传入中国，至唐而臻极盛。唐对外文化又极力吸收，复经融合创造，遂成为东亚中古光辉灿烂之文明。

本文考证详湛，引论广博，从本文中得悉中国古乐舞之发生与发展。更重要者，则可知西域乐舞传入后，中国乐舞之变化及对世界文化之影响。故研究中西文化史和"丝路"之学以及中国乐舞史者，可资参考。

565 中印两国在音乐文化上的关系　　杨荫浏

（《人民音乐》1955年第7期）

中国与印度在音乐文化交流方面，从很早就已开始，并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自后汉（公元25—220年）以来，中国僧人与非僧人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为了彻底掌握印度梵文，曾研究印度利用字母拼音的方法，写作了"婆罗门书"，从而促成了中国音韵学的建立。这一学科对中国的声乐曲调影响很大。乐器方面，南北朝时由西域传入而成为隋唐以后有名的弹弦乐器之一的曲项琵琶，可能与印度早期的音乐有着源流关系。这一乐器在中国开始传播是在第五世纪，其后结合中国旧有汉琵琶（即阮咸）的音位和演奏技术，音位由四柱发展为十六柱、十七柱以至今日的二十四柱，演奏由用拨的技术发展为左右两手变化无穷的手弹技术，曲调也结合了中国历史故事和生活内容而产生了很多伟大作品。音律方面，公元六世纪时，中国音律曾受到外来琵琶定音方法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其中印度音律的成份可能较多。歌唱方法方面，三世纪三国时文学家曹植已据印度梵呗的唱法制成"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音乐和舞蹈方面，除宗教音乐外，民间音乐在四世纪也传入中国。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中都有"天竺伎"，所用乐

器中的凤首箜篌与铜鼓为印度音乐所独有。唐代九部、十部乐中的“龟兹部”也大量吸收了印度音乐。名曲“霓裳羽衣曲”可能是中国人在印度曲调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还有普遍流行的古琴曲之一“普庵咒”，是以印度梵文的华文译音为歌词，由此可见中国音乐与印度音乐关系之密切。

从多方面来看，过去两国在文化上的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互相滋养、互相促进，结合了各自独立的创造与发展，形成亚洲文化史上灿烂光辉的一页。

566　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新疆乐舞　　周菁葆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3期）

关于古代西域音乐文化之传播，早年有向达、贺昌群、常任侠和近年杨荫浏及谷苞等先生颇多研究，成绩斐然。本文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先秦、两汉三国和两晋南北朝三个时期，对我国古代华夏民族与新疆各族在音乐舞蹈方面相互交流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研究。

作者依据新疆地区出土文物分析，认为远古时代新疆各族就和华夏民族有着友好的经济文化往来。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末期，黄帝部族联盟首领轩辕氏巡游四海，登昆仑山，令伶伦作律。那时，新疆人民就用“嶰谷竹”制作管乐器，也给伶伦送了十二根音管，代表“六律六吕”，谱各种曲调。到殷商时，诸侯八泽而来者千八百国，其中西部最远的是葱岭以西五百里的渠搜国；当少康、后发即位时，诸夷都献乐舞。周灭商后，成王会诸侯于镐京，渠搜、康国、昆仑、莎车都献礼品。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会于瑶池之上，伴奏乐器达十种。其中篍、管两件属西北少数民族乐器。周初制定《六代舞》《四裔乐》，宫廷有鞮鞻氏掌四夷乐，其中西方称“株离”，说明新疆乐舞此时已传入中原，并在宫廷中演出。炎帝神农中有“奏九天之和乐，百兽率舞，八音克谐”之说，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上有形象资料。舞者分三组，每组五人，牵手起舞，服饰带尾巴。这说明先秦以前的舞蹈基本是图腾形式。两汉时期，张骞通西域，带回“摩诃兜勒”大曲，李延年因此造新声二十八解。东汉明帝时，佛教乐舞随佛教传入中原。但佛教乐舞中经新疆，受其影响很深，有的已成新疆乐舞，如《于阗佛曲》《龟兹佛曲》等。三国曹魏与西域关系密切，也进一步促进了乐舞交流。当时，曹植就擅长“柏弹胡舞”，“拍弹”表演中的“弄眼”、“作头脑”等，在现今维吾尔舞蹈中仍可得见。西晋、东晋都与西域关系进一步加深。前凉第一次在高昌地区设置郡县，促进新疆在政治制度上与中原趋向一致。前秦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吕光平龟兹，带回鸠摩罗什，也带回龟兹乐。北魏时，又将吕光带回的龟兹乐改为西凉乐，同时又将疏勒、安国等乐舞吸收了进来。北齐后主更喜胡戎乐，新疆的乐工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等享有很高待遇，竟相继封王开府。新疆乐舞中，突出代表是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于阗乐、悦般乐和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西凉乐，其中尤以龟兹乐“特善诸国”。南北朝时龟兹的苏祇婆精通乐理，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总教习白智通传授排练龟兹乐舞，也促进了中原乐舞艺术的发展。

在研究龟兹乐中，中外学者多数认为龟兹乐来自天竺，或者类似印度。这种论调多以佛教东传为依据。龟兹乐舞与天竺乐舞明显不同。作者认为宗教并不等同于艺术。

在新疆乐舞东传中原的同时，中原的乐舞也西传新疆、中亚一带。周穆王会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当时西王母能用中原的笙、簧伴唱，说明中原乐舞已传入西域。春秋时，秦穆公三十四年（公元前651年）给西戎王送去女乐二十六人，西戎王受而悦之，终年不还。公元前110—105年之际，当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时，随从数百人中，就有不少乐舞艺人，把中原乐舞带到赤谷城。之后，又将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翁归靡；约在公元前69年，解忧公主的女儿来长安学鼓琴，回归途中与龟兹王绛宾结婚；公元前65年，绛宾和弟史一周来长安朝贺，宣帝又赐给歌吹数十人。随着丝绸之路交通繁荣，特别在南北朝时期政治动乱，民族迁徙频繁，促进了乐舞艺术的交流。关于乐舞形象资料，在石窟壁画中，在出土文物中都有。丰富的形象资料，说明中华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流传、融合，源远流长，形成无数篇富有诗意的动人乐章。

567　两晋南北朝是各族乐舞大交流的时代　　王克芬

（《舞蹈》1979年第1期）

两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繁，民族迁徙复杂。随着西北兄弟民族内迁，大量兄弟民族和外国乐舞传入中原。本文作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介绍，认为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乐舞，影响颇大，约在公元384年后传入，深受中原人民欢迎。北周、隋、唐时代的许多舞曲也都采用《龟兹乐》。疏勒(今新疆喀什噶尔和疏勒一带)、安国（今苏联布哈拉一带)的乐舞，也在公元436年后传入中原。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娶突厥女子阿史那氏为后，她带了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今苏联撒马尔罕一带）的乐舞和艺人，使西域乐舞在中原受到更大影响。在南北朝时期，另一种影响较大的《西凉乐》也传入中原。西凉在今甘肃一带，其乐舞吸收了汉族和西域其他民族地区（主要是龟兹）的乐舞，形成其独特的风格。从南北朝到隋、唐数百年间，《西凉乐》盛行不衰。这些兄弟民族和外来乐舞的传入，为隋、唐乐舞的繁盛打下了基础。起源于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北周时创制的《城舞》（唐称《安舞》）等，都曾传至唐代，并有新的发展。汉代盛行的“百戏”，南北朝时期仍广泛流传在南方和北方的民间、宫廷和宗教活动中。随着汉族政治中心和大量汉族人民的南迁，汉族传统乐舞传到了江南地区，当时江南一带的民间歌舞也十分兴盛。《前溪舞》相传起于晋朝，流行于南朝各代。南朝统治者一向崇尚歌舞作乐，大量的民间歌舞，被宫廷贵族采用。汉、魏、六朝流传在汉族地区的传统乐舞《清商乐》，在东晋以后传到南方，南方原有的民间乐舞(西曲、吴歌)又不断充实了《清商乐》的内容。北魏时，流行在南方的《清商乐》也传到了北方。随着时代的发展，《清商乐》的内容逐渐扩大，包括了南方、北方的许多民间歌曲、乐曲和配合舞蹈表演的舞曲、舞歌。如汉代的《巴渝舞》、《公莫舞》、《鞞舞》（鼓舞的一种）、《铎舞》，东吴江南地区的《拂舞》、《白纻舞》，晋朝的《明君舞》（即昭君舞）等。这些舞蹈在南朝时，有的已用于郊庙祭祀，逐渐仪式化。如西南少数民族豪放矫健的《巴渝舞》，魏改称《昭武舞》，晋又改称《宣武舞》，都用于祭祀；有的经艺人加工

提高，成为优美、精致的舞蹈。如《白纻舞》本是江南民间舞，因舞衣用白纻（纻麻）制成而得名，后传入宫廷，从晋直到隋、唐，盛行五、六百年。各代诗人写了不少描叙《白纻舞》精彩表演的诗歌。总之，南朝盛行《清商乐》，而北方的"胡乐"、"胡舞"（少数民族与外国乐舞）也不断传到南方，陈后主还专门派遣宫女到北方去学习箫鼓，叫"代北"。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等地的出土资料和绘画、雕刻等，保留了为数不少的乐舞形象，充分显示了南北朝时各族乐舞大交流的历史面貌。正是这些风格不同的民族民间乐舞在中原地区的流传，大大丰富了我国舞蹈艺术，为唐代舞蹈的高度发展准备了条件。

568　汉唐间外国音乐的输入　　贺昌群

（《小说月刊》1929年第20卷第11期）

本文对汉唐以来，外国音乐输入之经过和影响，中国乐制形成和发展等，进行了全面论述。认为汉以前中国音乐和舞蹈，与普通文学无密切之关系，汉以后，文学与乐舞逐渐结合。音乐是以声表情，舞蹈是以容表情，声之流露是音乐，容的姿态是舞蹈。音乐舞蹈起源于同时。在古代中国，乐舞成举国通行的大典，不过古代乐舞，多由郊庙祭祀而设，在广大群众之间多不通行，这可能成为舞蹈暂行消灭之原因。秦汉以后，乐舞亦不振，此时中国的乐舞遂告一段落。张骞通西域以还，与西域诸国发生关系，从此西域音乐传入中国。崔豹《古今注》称："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京，惟得《摩诃》、《兜难》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横吹古谓之横笛，是鼓吹乐中之重要乐器，《隋书·乐志》载西凉乐器有横笛。根据《文献通考》，则知横吹即横笛。至《摩诃》、《兜难》二曲之渊源，作者认为系外国音乐音调，最初传入中国时，都是译音。此二曲疑非西域音乐，或从印度而来，因梵文中之Mahā(之大意)与摩诃音极相近，《摩诃》、《兜难》二曲或为梵语之译音。古代印度与龟兹早已交通，二曲由龟兹、康国而转入中国，实为可能之事。此种音乐输入既久，便逐渐华化。魏晋以来，中国与西域诸国交往更加频繁，自葱岭以西，远至阿拉伯、东罗马，商贾往来不绝。南北朝时，西域的乐人舞工，从龟兹、于阗、安国而来者，日益增多，尤其北齐、北周与西域关系密切。如曹氏自北齐至唐，父祖子孙兄妹皆为琵琶名手，北齐名画家曹仲达亦来自曹国。隋代承北齐、北周之后，胡乐广被民间，其盛况概可知矣。故自汉之乐府成立，在中国音乐史上开一新纪元，而自南北朝至隋初，又为一新纪元。尤其是龟兹苏祇婆琵琶传入后，为中国音乐史上一重要开端。经作者考证，苏祇婆琵琶的七调五旦，原为印度音乐，由印度至龟兹，再至中国。故南北朝后，印度西域乐器、乐律不断流入，而当时中国乐制亦极混乱，所以隋统一后，始下功夫进行整理，开皇初总括为七部，大业以后，复增为九部。作者对此九部乐的源渊、乐调、乐曲及所用乐器都作了考证。唐初，乐制仍沿隋制，但此时对所输入的外国音乐，经过吸收消化，遂起了明显变化。由于皇帝的爱好和提倡，音乐舞蹈充溢民间，在中国音乐史上可谓全盛之时。太宗时，又将隋之九部乐增至十部。作者又根据史书记载，将隋唐以来十部乐中所用乐器，列表作了说明，可谓周详备至，一目了然。自高祖至玄宗百数十年间，外国音乐不断输

入，中国音乐亦不断发生变化，致在词曲上有长短句的兴起，在戏曲上影响宋元戏曲之形成，故唐代音乐对后世影响极为重要。在唐代乐舞中，玄宗颇有突出贡献，因为他很有音乐天才，不仅对音乐有精明的鉴尝力，而且还能创作新谱，同时还改作了许多乐器。他根据从印度而来的西凉“婆罗门曲”，改为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最为当时所讴歌，而影响后世亦极重要。关于此点，作者在文中也作了详细介绍。

总之，本文内容丰富，考证详周，为研究中西文化史之重要参考资料。与本文有连带关系和同等重要的文章，尚有向达所著的《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该文原刊于1926年《学衡》第五十四期，现已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之中，一并介绍给有关人员参考。

569 关于隋唐时代吸收西域音乐的历史经验　　　　马　可

（《人民音乐》1956年第12期）

本文在关于民族音乐的讨论中，牵涉到隋唐时代吸收西域音乐的历史经验问题，作了全面论述。作者认为有些同志在谈到这段历史时，片面强调外来音乐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民族音乐的固有传统和人民对外来音乐的吸收、改造过程；也有些同志力图缩小外来音乐所起的作用，甚至谈它只是少数统治者为享乐才提倡的，对人民没有什么影响。这些意见都有不够全面和不够实事求是之处。隋唐时代吸收西域音乐的历史条件与我们今天比较起来，有相像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像的地方是，国家统一的局面和新的经济高潮的酝酿。而不同的是，由于隋唐时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人们在主观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没有失掉信心，他们欢迎西域音乐但并不把它拿来全盘代替中国传统音乐。而在今天对外来音乐拒绝的保守态度不能说没有，但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恐怕还是对传统音乐认为落后、不科学而实际上是否定它，对外来音乐则片面强调其科学与先进而实际上是“全盘西化”的态度。另外，隋唐时代的西域音乐和今天的西方音乐也不能混为一谈，尤其不能作简单化的类比。隋唐时代的西域音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和今天的欧洲音乐对我们的关系不尽相同，因之隋唐时代的历史经验不能机械地搬到今天来。中国音乐，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对外来文化所起的作用的估计，既不应缩小，也不应夸大。西域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一是在乐制（乐律和音阶）方面，二是在乐器方面，三是在创作方面。中国音乐的新高潮是在唐玄宗时代形成的，是在中国人民吸收、消化了西域音乐并有了大量的创作时才形成的。尽管西域音乐在高潮的形成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它毕竟不是最主要的方面。隋唐时代吸收西域音乐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外来的音乐不应该有盲目排斥的情绪，也不应该从外来音乐的提倡者（皇帝、贵族）的动机出发而否定它在中国音乐发展上所起的实际作用。此外，从隋唐时代吸收西域音乐的历史经验中看到：音乐艺术是有它自身的一些特点的，它是艺术，但同时其中包括一些技术的和与自然科学有联系的部分，这一部分与民族风格问题的关系不大。隋唐时代的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在创作上一定要大胆吸收，但同时一定要保持民族的特点。隋唐时代的音乐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我们应该正确地接受这些经验。

570 隋唐时代汉族人民学习西域音乐的故事　　刘兆云

（《新疆日报》1962年12月20日）

西域音乐自汉武帝时传入内地后，对我国音乐的变革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古代汉族人民学习西域音乐以隋唐时为最盛，特别在唐代，长安和洛阳两地都设有歌舞“教坊”，家家户户几乎都学习西域音乐。西域音乐和内地音乐一经汇合，就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唐乐”。本文介绍了几则隋唐时汉人学习西域音乐的小故事。1.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命大臣整顿国家乐队，因当时崇拜周乐，召来一些熟悉周乐乐工改换声律，以创新乐。与此同时，柱国沛公郑译也请命召集主管礼乐大臣创作新乐。但因音律不合，大臣各持己见，议而难定，终未创出。后柱国公郑译向文帝推荐随突厥皇后来长安的龟兹乐师苏祗婆。此人擅长琵琶，七声俱全。他主张采用七声来写乐曲，创造新乐器。但遭邳国公子苏夔反对，他主张采用当时流行的五音。文帝遂令大臣按各自的理论制乐，以择善而从之。后来，参照西域音乐创作的乐曲占了上风。但因另一大臣何妥的破坏，终未采用七音。2.西域音乐发展最盛之地是龟兹和高昌。公元568年，高昌派乐队向隋文帝献“圣明乐曲”。但在接见前，文帝派杨广带乐师，在高昌乐队的间壁偷听演奏，加紧练习，正式接见时，国家乐队先演奏“圣明乐曲”，高昌人颇为惊奇。3.唐时又一次出现学习西域音乐高潮。朝廷把国家歌舞机关分为十部，统称为十部伎，其中有五部就是练习龟兹、高昌、疏勒等西域歌舞的。4.唐德宗时，幽州（今北京市周围）王麻奴，吹得一手好觱篥，名扬河北，因此，骄傲非常，认为除西域音乐家外，汉人无人能超过他。后听人说，长安尉迟青将军的演奏是古今绝唱，麻奴不服，亲至长安，往尉迟将军宅前，早晚用心吹奏，尉迟将军未予理睬。麻奴着急，行贿门人，进见将军，为他献出全部本领，他用高调吹完一曲，早已汗流夹背。尉迟将军说：“何必费劲乃尔”？接着，他取出一管镶银觱篥，用中音奏了一遍。王麻奴听后说：“某生于边远之方，偶有寡艺，今日幸闻天乐，方悟前非”。从此，摔碎乐器，不再提觱篥之事。由此可见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之盛况。

571 隋唐燕乐的成立、递变和流传　　潘怀素

（《人民音乐》1954年第1期）

本文论述了隋唐时期燕乐的成立、递变和流传情况，认为对隋唐燕乐应当进行研究，以发扬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燕乐是以民间音乐为基础，吸收当时西域音乐的优点，提高了原有音乐的艺术性而产生的。在中国音乐艺术史上，隋唐燕乐曾达到当时发展的高峰。盖自汉晋至南北朝之间，清商乐和鼓吹乐为中国人民音乐的两大主要形式。北齐与北周则大兴鼓吹乐，而以西凉伎与龟兹伎为主。隋唐燕乐就是在舞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舞乐为主的西域音乐，是从西汉张骞得“摩诃兜勒”一曲开始而流传中国的。龟兹乐则以吕光灭龟兹后传入。而西域音乐之盛传中国则在丝绸之路畅通与佛教东传以后。唐有十部伎，统称为燕乐，其中七部均为西域音乐。龟兹为传播西域音乐的中心地带，而龟兹乐则以天竺乐为其根源。尤其是周隋时龟兹人苏祇婆把属于四、五世纪印度

音乐系统的七声五旦琵琶调传来，成为隋唐燕乐二十八调的基础。至盛唐时，中国音乐家的改编和创作，即融化了西域音乐的气氛和情调，仅大曲就有四十六曲之多。唐代的燕乐，最初盛行于宫廷、贵族和士大夫之间，以后才逐渐流传到民间。就地域说，首先在长安和洛阳流行，然后传播到其他地方。至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乐制改革臻于极盛。当时调名被改称的有十四调，包括二百二十五曲，并包含四十六大曲。作者还分析了燕乐流行和更改曲名的原因，是由于当权者的大力鼓励和提倡，以及西域曲名不易为人所理解。同时文章并论证了燕乐的递变和流传至朝鲜、日本的情况。认为曾经被前代人民所爱好的乐曲，可能至今仍有被埋没于琴曲、戏曲、说唱曲、吹打曲牌、佛曲、道曲或其它音乐之中，应予以发掘、整理和运用。

572 苏祇婆的“五旦”理论 何昌林

（《新疆艺术》1984年第1期）

本文论述了由隋朝柱国沛公郑译转述的龟兹音乐家苏祇婆的“七声”、“七调”、“五旦”理论。作者引用郑译所说龟兹琵琶上可以“一均之中，间有七声”、“调有七种”；然后说“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最后说“旦者，则为均也，其声亦应黄钟、大簇、林钟、南吕、姑洗五均”；并强调十二律中的“以外七律，更无调声”。并对“声”、“调”、“均”、“旦”、“调声”等词，根据史籍文献记载，逐一作了考证和诠释。认为由隋至宋，“均”、“韵”、“运”三字，不仅读音相同，而且含义相通，指的是“律”或“音”。郑译所说的“旦既均也”，此“均”字应理解为“律”。“旦”即“均”，“均”即“韵”（律），故“五旦”即“五律”。此“五旦”即黄钟旦、太簇旦、林钟旦、南吕旦、姑洗旦。十二律中的“以外七律”便是“五旦”以外的大吕、夹钟、仲吕、蕤宾、夷则、无射、应钟。作者还考证了“旦”字的语源、“七调”和《辽史·乐志》的“四旦”问题。认为“旦”的语源是龟兹语Tano甚至梵语Drone。但中国早有“七同”、“六同”之说，“同”即“旦”、即“音”、即“律”，“五旦”也即“五同”。由此可见中原古文化对西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影响。关于“七调”，历来认为郑译、万宝常的八十四调理论源出苏祇婆的“龟兹七调”。但据《魏书·乐志》记载：北魏太乐令崔九龙已于普泰年间（公元531年）提到“声有七声，调有七调”，比郑译于开皇七年（公元578年）介绍“龟兹七调”早50多年，比苏祇婆由龟兹来长安（公元568年），还早37年。从《左传》、《淮南子》等文献中记论乐所说的“五降”、“五变”及“一律生五音”等，可知苏祇婆“五旦各七调”的理论，应当是先秦至西汉的音乐理论的发展。对《辽史·乐志》中所载云“大乐”（即唐燕乐）的“四旦二十八调”中“四旦”的含义、性质、次序，自清代以来的燕乐学家一直迷惑不解。经作者考证，认为此“四旦”即四个“同”（Ton——音）：若干调试音列中的四个“调声”（主音）。据燕乐二十八调理论之定格，这四个“旦”（主音）是“般涉旦、俟利箑旦、沙陀力旦和鸡识旦。由此再演变为二十八调。本文对龟兹音乐与中原音乐的交流、融合与发展稽考甚详，论证缜密，见解独特，为研究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参考材料。

573　从新疆的古老音乐探索燕乐及其调式音阶理论　　关也维

（《音乐研究》1984年第2期）

隋唐燕乐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风格，以及高度的艺术成就，在祖国音乐文化史上闪烁着夺目的光辉。经过长期艺术实践而逐步形成的燕乐调式音阶理论，则对汉族音乐理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多年来国内外音乐学者对燕乐理论的研究甚多，但对燕乐的实际音高、调式音阶的构成，以及各调式之间的关系等，迄今未能辨识清楚。本文从新疆地区保存的某些古老音乐出发，对照汉族文献上的各种记载，探讨了燕乐及其调式音阶的形成、演变及其规律等。作者首先论述了燕乐的含义及其由来。所谓燕乐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燕乐即指隋朝的七部乐、九部乐、唐初的九部乐、十部乐，以及唐玄宗时的坐、立部伎，甚至包括当时宫廷宴会上所奏的各种音乐和部分散乐、杂戏；而狭义的燕乐，则指唐之九部乐，十部乐，以及坐部伎中的第一部。本文所论燕乐即广义的燕乐。隋唐燕乐，原由清商乐与胡乐等多种不同体系的音乐所组成。清商乐是指汉族南北方的民间音乐、以及源于清商的道调、法曲等。胡乐多指国内汉族以外的西北各少数民族音乐、部分汉族雅乐和天竺、高丽、扶南等外国音乐。其中尤以龟兹乐影响最大。唐玄宗以前，宫廷宴会上的清商乐与胡乐等皆分别演奏，各不相混。但已出现清商乐逐渐胡化、胡乐不断汉化的趋势。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玄宗诏令道调、法曲与胡部新乐合奏。使“燕乐”一词，从多种音乐组合的称谓，进而演变成为一个独立乐种的名称，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接着，作者以龟兹乐使用的九孔小觱篥为准，考证了燕乐的音高；以龟兹苏祇婆调式音阶为基础，考证了燕乐音阶；根据文献记载，考证了燕乐二十八调的形成及其演变，并对燕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本文考证细致，论述清晰，观点明确，文内附有多种表式和曲谱，为研究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574　唐代音乐与西北之关系　　吴荣曾

（《西北通讯》1948年第3卷第6期）

张骞通西域，得一横吹马上乐摩诃、兜难曲，这是域外音乐与我国发生关系之始。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边地民族纷纷移入，随之音乐也被带来。隋唐时，这种音乐在中国已扎根，兼之帝王的倡导，定雅乐，极大地吸收了西域音乐；这些音乐，对濒于衰退之原有中国音乐，无疑增加了新鲜血液，使中国音乐再生，从而形成了伟大的唐代音乐。然对唐代音乐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则是龟兹乐、西凉乐和北乐。龟兹乐以琵琶为主。琵琶为印度所发明，龟兹琵琶即从印度传来，惟龟兹人最善琵琶。唐代以燕乐最为发达，而舞曲则全用龟兹乐，故《唐书·音乐志》称：“周隋以来，鼓舞曲多用龟兹乐”，立部伎中的八部，其中有五种全用龟兹乐。足见龟兹乐曲对唐代音乐贡献之大。西凉指甘肃河西一带，当时为丝绸之路要隘，既有中国文化，也有西域文化，而西凉乐是融合了中国古乐与胡乐。《唐书·音乐志》称“其乐具有钟磬，尽凉人所传中国旧乐，杂以胡羌之声，魏世隋世咸重之”。由此可证明西凉乐，具有东方和西方之长处。魏隋之世皆被重视，唐

朝则更甚。但西凉乐则用管弦曲，见于舞曲者惟庆善舞。故《唐书》称“惟庆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雅闲”，所以《唐书·音乐志》谓：“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多用西凉乐曲”。自天宝之后，乐曲多以边地之名名之，如甘州、凉州、伊州，这些或多与西凉有关。北乐指鲜卑和吐谷浑的音乐。乐器多在马上吹奏，与龟兹、康国、疏勒所不同者，多管弦乐中的笛、铜角、筚篥等，汉时用于军中乐，马上奏之。自唐以后，鼓吹用作仪杖，宋朝因之，后来婚丧也用鼓吹，以迄于今。总之，唐代音乐，完全受了龟兹、西凉、北乐之影响，并取其所长，经过融化而成为一种新的音乐，即伟大的唐代音乐。故研究音乐史者，应了知其源渊。本文在这方面，概括予以揭示，可供有关研究工作者参考。

575　唐代的音乐艺术　　　阴法鲁

（《人民音乐》1959年第3期）

中国音乐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有很高的成就，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遗产。在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各有其音乐发展的最高成果，每一成果都是那个历史阶段及以前的各个历史阶段音乐发展成就的总的积累，而又是下一阶段音乐发展的起点。在音乐艺术发展的长河里，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新出于陈，日益丰富多彩，但却始终保持着民族音乐的传统。本文着重论述了唐代的音乐艺术，并追溯了汉代和南北朝时代的音乐艺术。汉武帝设立“乐府”，为音乐管理机构，它搜集整理民歌，成为“乐府”或“清商乐”，盛行于汉、魏及西晋。南北朝时，西域的音乐伴随着佛教经丝绸之路传进中原。所谓西域乐舞即我国西部各少数民族的乐舞以及中亚和印度的乐舞。由于民族的迁徙杂居，文化的频繁交流，中国音乐酝酿着巨大的变化。隋朝统一中国，按照“斟酌缮修，华戎兼采”的原则，继承南北朝的文化，整理了音乐。龟兹琵琶七调成了隋唐燕乐（常用于宴会）乐调的基础。唐朝建立后，国家版图扩大，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搜集民间乐舞的范围更加扩大，对外国乐舞艺术的交流也更为广泛，给音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扩大音乐管理机构，设置“教坊”五所，宫庭里还有“别教院”，即“梨园”、“宜春院”和“小部”。梨园的乐工是最优秀的，称“皇帝梨园子弟”。各州郡及贵族豪门也都有伎乐，乐工总数达几万人。唐代的乐队规模很大，所用乐器很多，也很复杂，一部分是中国固有的乐器，一部分是西域传来的乐器，如琵琶、五弦、箜篌、筚篥、笛、胡笳、羯鼓、腰鼓等。二者配合起来，形成了我国器乐的特点。唐代乐曲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大部分来自民间，还有边疆少数民族乐曲、古典乐曲、外国乐曲和乐人创作的乐曲。乐曲大致分为“大曲”和“杂曲”两类。用“大曲”演唱故事逐渐演变成“杂剧”。最初用五言或七言诗配在乐曲里唱，以后逐渐依照乐曲的节拍而填制歌词，句子或长或短，当时称为“曲词”或“曲子词”，成为唐宋词的开端。唐代的乐谱是世界上最古的乐谱。唐代的舞蹈分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等类。文章还介绍了各类舞的特点。唐代的乐舞对当时以及后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为当时的中国人民所喜爱，而且也传到各邻邦如印度、朝鲜、日本等国，为外国人民所喜爱。因此，唐代的乐舞不仅使当时我国乐舞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对世界乐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76　唐代西域音乐的流行　　　赵抱善

（《新疆艺术》1984年第2期）

本文论述了唐代西域音乐在中原流行的情况，认为西域音乐在唐代、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流行极盛，从宫廷到民间均有很深的影响。作者考证了唐代音乐发展的总趋势：传统的雅乐日益衰退，从西汉到南北朝时期形成的清乐也失去原有的地位，燕乐成为唐代音乐的重点。所谓燕乐，系指宫廷宴饮、娱乐时所奏的音乐，其构成乃以中原民间音乐为主，又融合清乐和西域音乐，从而形成了唐代音乐的主体。唐代的燕乐，为太宗时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加上高昌乐组成的十部乐，即：燕乐(指狭义的宴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其中除燕乐、清乐和高丽乐外，西凉乐乃是中原音乐与西域音乐结合的产物，其余全是西域乐。由此可见西域乐在燕乐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唐代乐工中有不少西域人，其中有许多是当时有名的西域音乐家。至于在教坊和梨园中供职的西域乐人也不少。西域乐谱流入中原的也很多，据作者估计，在唐代流行的一千首乐曲中，西域乐曲即有二百首以上，至开元、天宝年间，西域乐的流传更为炽烈。作者分析了西域音乐在唐代出现极盛局面的原因，认为西域音乐流播中原的历史源远流长，从西周即已开始，至汉代丝绸之路开拓后，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往更为密切。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社会动乱，出现了各族文化大融合的局面，天竺、龟兹等乐纷纷流入中原。这对西域音乐在唐代出现极盛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一、开明的民族政策、繁荣的经济状况是基本原因；二、唐王朝对各种学术思想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思想比较活跃；三、唐代的帝王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对西域音乐的偏爱，当时游宴乐之风以及文化事业的空前繁荣，都对西域音乐的流行起了推动作用。作者对这些原因均作了充分的论证后，并指出：西域音乐在唐代流行，只是丰富而不是取代中原音乐，并有一个汉化过程。它不仅丰富了唐代和后世的音乐，而且对唐代的文学，乃至宋、元的词、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77　漫谈唐代的音乐　　　阴法鲁

（《光明日报》1953年3月24日）

唐乐是中原音乐和西域音乐相融合之后的综合性的集中表现，是有国际意义而同时又是中国新的民族形式的高度艺术创造。唐乐代表了隋唐的“燕乐”，它常用在宴饮和娱乐的场合。本文是根据笔者以前发表的《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一文的缩写。主要讨论了唐乐形成的过程和它的内容。汉武帝时，从各地搜集音乐，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乐府”，因而这时所搜集的音乐称“乐府”，也称“清商乐”。清商乐盛行于两汉、曹魏、西晋及南北朝时代的江南。隋统一南北，设立“清商署”，并组织七部伎，后来扩充为九部伎，七部伎和九部伎中都有“清商伎”。唐代因袭隋制，所用九部伎及后来的十部伎中也都有清商伎。清商乐的乐舞旋律，舒缓悠闲，有浓厚的田园意味。乐器体形大，不便应用，或发音过于单调、沉闷。南北朝时，西域人陆续内迁，其

中的乐人促进了西域音乐向中原的传播。到第六世纪，西域乐器已很普遍，其特点是：形体小，携带方便，声音响亮，便于调整音高，能保持正确发音；他们的乐舞，节奏显明，活泼愉快。这恰恰弥补了中原音乐的严重缺陷。隋代音乐家郑译，把西域乐律和中原乐律结合起来，明确了隋唐乐调的组织形式。唐初沿用隋代九部乐，公元640年后，改为十部或曰十部伎。十部伎，在“朝廷”举行宴会时，常归并于坐立两部中。坐部在堂上坐着演奏，立部在堂下站着演奏。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设置“教坊”五所，内教坊在皇宫里；外教坊西京两所，东京两所。皇宫里还有“梨园”和“宜春院”，这都是搜集民间音乐，并安置、训练各种乐工的所在。中原音乐和西域音乐交融汇合，选择扬弃，出现了新的艺术。唐代演奏的乐器，其中保留了一部分中原旧有乐器，采用了一些西域传来的乐器，两者配合起来，相得益彰。唐代乐曲来源也是多方面的，长的叫“大曲”，短的叫“杂曲子”。从唐至宋，乐曲有名目可考的三千余个。大曲蜕变为杂剧，杂剧导致中国戏剧的产生，杂曲子也流传很广很久，在今天的民间音乐中，还可能见到它的痕迹。唐代人民批判地接受了南北朝的文化，不断吸收其它各民族的文化，以世界规模丰富了自己的社会内容。在当时，新的音乐曾充实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因而促成了唐乐在世界音乐史上应有的崇高的地位。

578 新疆歌舞与唐代音乐 阴法鲁

（《光明日报》1953年4月13日）

本文论述了新疆歌舞和唐代音乐的关系。新疆和中亚一带古代统称西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一向爱好并擅长音乐。从公元第四世纪，新疆人和中亚细亚人就不断地把“西域音乐”传播到中原地区。西域音乐大规模东传是在公元568年之后，其时周武帝娶阿史那氏为皇后，从西域带了一个由新疆的库车、喀什噶尔和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方派人组织成的乐团，由库车人白智通率领，来到长安演奏了不少西域乐曲。中原音乐家郑译随乐团另一成员苏祇婆学弹琵琶，得其乐调新声，乃系统地介绍给中原乐人。西域音乐和中原音乐结合的结果，形成了隋唐“燕乐”——也就是著名的“唐乐”。当时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经常交流，后来“唐乐”就随着中原人的西迁，又流传到西域。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公元629—645年），天竺国王就和他曾谈到唐乐大曲“秦王破陈乐”。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曲谱里，也有许多曲子是唐教坊演奏的。直到今天新疆乐舞和唐代的乐舞还有许多相似处，如舞姿、表情、眼神、服饰以及乐曲等都保留着唐代乐舞的特点。后来唐代音乐因为经历了几次社会动乱，加之逐渐脱离群众，于是艺术生命就逐渐枯竭。而新疆乐舞，却始终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结合在一起，随时随地发展并丰富自身的艺术内容，所以能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579 《西凉乐》与《伊州乐》

——我国西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与汉族音乐文化相结合的乐种 谷苞

（《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西凉乐》与《伊州乐》都由地区而得名。伊州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部，凉

州和甘州均位于甘肃的西部，即河西地区。古代的龟兹与凉州，都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了《凉州乐》与《伊州乐》。这两个地区的乐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融合了龟兹乐舞和汉族音乐文化，以及当地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文章根据大量的史料分析，经过《西凉乐》与《龟兹乐》的对比，说明《西凉乐》的渊源为《龟兹乐》，并吸收了汉族音乐文化和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较之《龟兹乐》，《西凉乐》拥有更多的汉族乐器，其中特别突出的为编钟、编磬；《龟兹乐》与《西凉乐》中的琵琶（曲颈四弦琵琶）、箜篌、贝（海螺、贝蠡）、铜钹等都是从古代印度、波斯、埃及等国家传入我国的。

凉州乐舞对我国戏剧的发展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据王国维著《宋元戏曲考》一书云："两宋官本杂剧二百八十本，用大曲者一百有三本。"其中一眼看出为伊州大曲者五本，即：《领伊州》、《铁指甲伊州》、《闹五伯伊州》、《裴少俊伊州》、《食店伊州》。又有《三索梁州》等凉州大曲六本。由此可见，宋代杂剧中的唱腔是采用了《伊州大曲》与《凉州大曲》。其后在北剧、南剧中都吸收了新疆与凉州的乐曲。由于南北朝以来《龟兹乐》和《西凉乐》在内地的盛行，对于词——这一新的韵文体裁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许多敦煌曲子词，为研究《凉州乐》与《伊州乐》的歌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元曲为元代文学的代表，可元曲的渊源和词一样，起先也是出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歌，同时与唐宋大曲和宋词也存在着历史继承关系。元朝人周德清在所著《中原音韵》中记有元杂剧三百三十五曲的曲名。据王国维先生考证，认为"则其曲为前此所有者几半。更分析之，则出于大曲者十一"，"出于唐宋词者七十有五"，"出于诸宫调各曲者二十有八"。其中的《小梁州》、《伊州遍》、《八声甘州》等，都是《凉州乐》、《伊州乐》和《龟兹乐》中的曲子。在沈璟所著的《南九宫谱》中，载有南戏的曲名五百四十三个，其中出于大曲者二十有四。在这些曲名中，一眼可以看出，《梁州令》、《梁州序》、《舞霓裳》等原来都是《凉州乐》和《龟兹乐》的曲子。这更进一步证明《西凉乐》、《伊州乐》对于我国戏剧、词曲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深远影响。

580　试探《西凉乐》民族之源

——暨论"变龟兹声为之"　　郝毅

（《音乐研究》1985年第3期）

《西凉乐》是我国古代居于今甘肃一带地区的各民族音乐文化艺术。从西汉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凉地区音乐和中原、西域等民族音乐进行了广泛的交融，被当时的宫廷以及后来的佛教寺院所利用，从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形成了我国古代自南北朝至唐朝数百年间盛行不衰的具有西凉地区独特风格的音乐文化艺术。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在论述《西凉乐》的来源时，认为它是以《龟兹乐》为主要基础而形成的，还有些同志将盛唐之际西凉地区所产生的《凉州》、《甘州》、《伊州》等大曲，也说成是《西凉乐》。本文不同意这些观点，认为《西凉乐》是自汉至唐数百上千年间，西凉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音乐艺术，并引证大量史籍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述了汉至晋时西凉民族的历史，证明西凉一带自古即为我国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聚居之地。

早在汉武帝统一北方时，就将西凉民族音乐带回长安宫廷，列入乐府，作为宫廷乐舞中经常演出的节目之一。汉以后，河西仍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十六国时，吕光平西域，带回西域三十余国的民族乐舞艺术，对《西凉乐》的发展与提高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这三十余国中，有一部分民族如塞种、月氏、乌孙等，本来是由河西地区迁往西域的，因而很易容和当时的西凉乐舞艺术相融合。据一些有关民族音乐的文献记载可知《西凉乐》本身并不是某一个民族的音乐，而是古代西凉地区各民族音乐艺术的总称。它最初是以符坚秦国氐羌民族和中原汉族的音乐为主要基础，随后又吸收了西域"胡戎之声"和西凉匈奴人沮渠氏的音乐，然后在魏周期间增加了大量鲜卑民族的音乐，所组成的一部大型伎乐。文章还考证了盛唐之际所产生的《西凉乐》诸大曲的来源，即《伊州大曲》、《凉州大曲》、《熙州大曲》、《石州大曲》、《渭州大曲》和《甘州大曲》，认为这些大曲都是西凉各州的音乐家采用当地人民所创造的音乐作为主要素材创作出的新歌舞大曲，又以各州名为乐名。经过充分论证，文章得出结论认为：古代西凉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一向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汇和交流之处，《西凉乐》即在此条件下产生发展，经过数百上千年，由小而大，自少而多，由各民族人民不断增加新内容、新形式，共同创造的乐舞艺术。本文引用资料丰富，论证细致，观点明确，为研究丝绸之路民族变迁和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581　也谈《西凉乐》

——兼与郝毅同志商榷　　　　牛龙菲

（《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3、4期）

《西凉乐》，是魏晋隋唐时代产生于凉州之地的地域性乐舞流派。隋唐乐舞，多取法西凉，所以，《西凉乐》又成为领导隋唐乐舞潮流的代表性乐舞流派，其最高成就便是体现道家"羽人升天"理想的《霓裳羽衣舞》。今天人们常说的"敦煌乐舞"，实际上，即是反映在敦煌壁画形象资料之上，以《西凉乐》为其主要代表的隋唐乐舞。《西凉乐》在形式上，遵循两汉"因秦、楚之声置乐府"的传统，一方面保留了汉代以楚声为代表的中原音乐文化，一方面又吸收融化了西域各族各国的民族音乐。这里的"各族各国"也有一些是"汉乐府遗声"的保留之地，如龟兹，曾在汉代认真地学习、接受了楚、汉音乐文化，使"变龟兹声"为"秦汉乐"成为可能。《西凉乐》在美学指导思想上，从礼的附庸的"雅乐"，向抒情达性的"燕乐"（即"宴乐"）转化，逐渐成为娱悦人生的、自觉的、美的艺术。在艺术表现原则上，则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的特别是荆楚巫乐载歌载舞浪漫抒情的特点及汉文化所独有的风格，大胆吸收借鉴了来自西域和其他地区的乐舞文化，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世人为之倾倒的艺术水平、并在当时中国风靡一时的乐舞艺术流派。《西凉乐》创立以来，不但深刻影响了隋唐之后中国乐舞艺术的发展，而且将其影响广被于世界其它地区。直到今天，《西凉乐》仍然保持着生命的活力。对《西凉乐》的专题研究，日本、中国学者都有论述，本文作者亦有《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乐器考》问世。郝毅同志也在《甘肃民族研究》1984年1、2期和《音乐研究》1985年第3期上发表名为《甘肃古代民族乐舞〈西凉乐〉溯源》和《试探〈西凉乐〉民族之源》的文章，其观点与本文作者迥异。本文作者认为，郝毅同志文章的立论，其

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和间接资料都并非如其所引。如其所引《新唐书·礼乐志》"周隋始兴《西凉乐》杂奏"，本文作者认为，郝文在这里去掉了主语"北狄乐"，又错将"舆"（与）字读作"興"（兴）字，使"北狄乐"变成了《西凉乐》，将魏晋时代即已形成的《西凉乐》变成了"周隋始兴"。又如，郝文说，酒泉丁家闸五号晋墓壁画中共有五种人种形象，而其下文则给人以错觉，似乎"壁画中"的"乐伎"也分"五种人种"。本文作者认为，郝文引据的是吴礽骧《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壁画内容考释》中的内容："壁画中的部曲，其形象共有五种"。而部曲，本为军队编制之称，与"乐伎"毫无关系。且原文作"形象共有五种"而并非"五种人种"。综此，本文作者认为，郝毅同志的立论颇多失误，似有商榷余地。

582 精美的西凉乐舞 李根万

（《新疆艺术》1984年第3期）

本文论述了西凉乐舞的来源，形成及流传过程。认为古代所谓西凉，即甘肃河西走廊一带。这里是多民族杂居之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融合的中心。十六国时(公元317年至420年)，前秦苻坚的将领吕光、沮渠蒙逊率兵西征，破西域龟兹等国，聘招并携带大批龟兹乐及歌舞伎还军时，趁中原大乱之际，割据凉州（今甘肃武威），建立后凉政权。龟兹乐传入凉州后，兼收并蓄融汇了中原音乐及其它少数民族音乐，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颖别致、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西凉乐，又称作秦汉伎、国伎。故西凉乐实为中原音乐、龟兹音乐及其它各少数民族音乐融合发展的结晶。北魏时，西凉乐传入中原，演奏十分频繁和流行。隋朝统一中国后，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局面。开皇初年（公元581年），又将南北朝纷乱繁杂的音乐加以收集、整理、归纳，编置为七部乐，隋炀帝又改制增定为九部乐，西凉乐被列为演奏之首，兴盛一时，为人民所喜爱。因其具有庄严、肃穆、典雅之感，成为隋代朝廷宴享、仪礼等重要的宫廷音乐。唐代音乐演奏在继承隋代九部乐的基础上，又发展成为十部乐。西凉乐的演奏蔚然成风，盛极一时，流行民间，雅俗共赏。其乐器有19种、乐工27人，为唐代十部乐中乐队编制规模最宏大的一部。在历史发展中，西凉乐积累了一批丰富的演奏曲目。唐代乐舞高度发展，西凉乐舞是其最重要的乐舞之一，并以其为人们喜闻乐见而流行于民间。当时颇有影响的《狮子舞》，概出自西凉乐。西凉乐舞又以其高雅俊逸的艺术情调成为唐代重要的宫廷音乐。《婆罗门曲》本为西凉大曲，经西凉节度使杨敬述献给朝廷，由唐玄宗润色，并创配歌词，改为《霓裳羽衣曲》，又根据此曲编排成《霓裳羽衣舞》，体现了西凉乐舞精美的艺术风格。作者还对西凉乐舞的形式、内容、情调及其与龟兹乐舞的区别，作了较详细的论述。认为西凉乐舞本出自龟兹乐，是我国古代西域各族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的产物，是我国古代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晶。它为丰富、繁荣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583　古代龟兹乐的巨大贡献及其深远影响

——在新疆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谷　苞

（《新疆史学》1980年第1期）

关于中西音乐文化交流问题，国内学者早年有所研究，其影响较大、造诣较深者有向达先生。他的研究成果有《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论唐代佛曲》等，均载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之中。向达先生的主要论点是：龟兹音乐受印度影响最深，其乐器多源于印度，故龟兹音乐实源于印度。本文作者对向达先生的论点第一次提出不同看法。作者仍根据向达先生曾经所引五种史籍，即：《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唐六典》、《通典》中所列龟兹乐与天竺乐所用的乐器，作了分析比较，所得结论与向达先生迥然不同，不仅龟兹乐与天竺乐大不相同，而且龟兹乐所用乐器，比天竺乐远为丰富。天竺所有而龟兹乐所无的乐器仅寥寥一、二种，龟兹乐所有而天竺乐所无者，多出十种以上。这十种以上的乐器中，有四种是汉族传统乐器，是由国内传往龟兹的。其余有七种以上的乐器，因文献不足，无法判定是国外或国内其它地方传往龟兹。所以，龟兹乐与天竺乐所用乐器，异多于同。作者认为龟兹乐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汉族和国内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也受到国外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优秀的音乐文化。龟兹乐中，曾接受了印度音乐中的个别乐器，接受了若干演奏技巧和佛曲、七调等，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龟兹乐承袭了天竺乐。恰恰相反，龟兹乐是新疆各族人民在祖国音乐文化上的伟大创作，它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从而形成了光辉灿烂的隋唐音乐文化。

作者还在本文中就龟兹乐在国内各民族中的递禅和在国外的传播及其影响等，都进行了精湛的考证和研究，尤其对龟兹乐产生的时代背景，龟兹乐器的特点和汉族乐器在世界各地的传播，直至现在的使用情况，也都一一作了介绍。同时，本文中对新疆各民族的发展情况，特别是维吾尔族的族源问题，也作了概括的阐述。本文是近年来对西域音乐文化较系统全面地研究成果，引证了不少资料，提出了新的论点，在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研究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为研究我国音乐史不可多得的材料，是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资料。

584　从古今字谱论龟兹乐影响下的民族音乐　　　潘怀素

（《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为了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的优良传统，本文对于民族音乐的古今字谱，作了一番试探性的研究。我国民间音乐的乐谱有工尺谱，还有潮州音乐的二田谱，福建泉州的南乐谱字，以及敦煌发现的唐人手抄琵琶谱。作者主要研究了这几种乐谱的来历和性质。我国民族音乐与其他文化艺术一样，不断吸取外来好的因素，以提高或丰富原有水平，尤其从汉魏两晋六朝至隋唐，随佛教而来的文化交流，其影响非常巨大。《隋书·音乐志》说："龟兹乐起自吕光灭龟兹（382年），因得其声。吕氏亡（403年），其乐分

散”。龟兹乐工苏祇婆随突厥皇后阿史那至长安，传来胡琵琶七调。这种音乐理论对于当时的雅乐与俗乐，都发生了极大影响。当时西域的乐种，与龟兹乐性格最相近的是天竺乐。《隋书·音乐志》说：“天竺乐起自张重华（327—353年）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旧唐书·音乐志》：“后其国王子为沙门来游，又传其方音”。因此，天竺乐的影响与龟兹乐并驾齐驱。隋唐燕乐是当时所能达到的有高水准的音乐艺术，其十部伎，是一部综合艺术的大组曲。因为组成大组曲的各部伎有专用的乐器，也有通用的乐器，所以在乐律上、宫调上、音韵上、演奏法上，自然会产生混乱情形。为了处理这种混乱情形，“贞观之初（628年），太宗命太长卿祖孝孙正宫调，起居郎吕方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祖孝孙以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接着作者研究了十部伎的声律和宫调等，在“平其散滥，为之折衷”以后所起的变化，以及表现十部伎的声律和宫调，是用什么样的乐器作为标准的问题。关于十部伎通用的主要乐器，文中列有十部伎乐器使用表，从中看出十部通用的主要乐器，在管类中是笛和筚篥，在弦类中是琵琶和五弦。作者列举了四条例证说明在隋唐燕乐管弦合奏上，筚篥实是主要器乐，且解决俗乐二十八调声律的关键，不在琵琶，而在管色，尤其是管色中的头管、或筚篥。由于龟兹乐对我国音乐的影响很大，所以作者又着重讨论了龟兹乐乐律与苏祇婆七调问题，对苏祇婆七调的性质及其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影响，从苏祇婆七调与印度古音阶；苏祇婆七调与唐代燕乐半字谱；苏祇婆七调影响之下的雅乐与燕乐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本文论古今字谱一段，作为余论写在文后。文中所谈古字谱，包括敦煌古琵琶谱的谱字，以及来自同一渊源的日本雅乐的龙笛谱，朝鲜宋乐的“肉谱”。日本的筚篥谱、筝谱、笙谱、还有日本风笙“和声”法，据说均由中国传去。虽然这些谱字已失传，但以这些谱字传下来的乐曲，还有数十曲之多，从中还可了解一些隋唐音乐的气息。此外，作者还讨论了我国古老的特种音乐，潮乐和南乐。

本文是一篇系统研究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历史及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对我国民族音乐发展成就及其影响的研究成果之作。文章引用史料丰富，论述有据，特别是论及龟兹音乐影响我国民族音乐问题更为精彩，实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篇重要参考材料。

585 《龟兹乐》与《十二木卡姆》

——为纪念维吾尔族著名音乐家吐尔地阿洪诞生一百周年而作　谷苞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1981年第13期）

吐尔地阿洪是新疆维吾尔族杰出的民间艺人，一生坎坷，但却积累了渊博的民间音乐知识，精湛的表演艺术。1951和54年曾两度应邀参加《十二木卡姆》的抢救工作，并以饱满的热情为这部音乐巨著的出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十二木卡姆》是祖国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深受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喜爱。但对它的名称来源、历史演变、演奏风格，以及与中原汉族音乐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多年来却鲜为人们研究。本文是为纪念吐尔地阿洪诞生百周年而作，文中对《十二木卡姆》的历史渊源等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对了解中西音乐文化关系有所裨益。有

人说《十二木卡姆》只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的历史，也有人说《十二木卡姆》是由阿拉伯传至新疆的，因“木卡姆”一词是阿拉伯字。作者认为《十二木卡姆》的历史远在唐及唐代以前。因为唐代以前新疆各族人民就已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于阗乐、伊州乐等，其中龟兹乐最为著名，且对我国音乐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每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发展，无一不与周围的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而发展，地处丝路要道的新疆，一向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之地，其情况更是如此。在古代以龟兹乐为代表的新疆各地区音乐文化的发展，主要是新疆各族人民具有能歌善舞的历史传统和艺术才能，在此基础上才能吸收外来音乐文化的长处，在国内又能吸收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长处。光采夺目的龟兹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十二木卡姆》不是简单地继承了龟兹等乐，而是继承后又有新的发展，所以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且是土生土长的。由于十世纪以后维吾尔族改信了伊斯兰教，因而受到了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影响，在演奏乐器方面不仅采用了伊斯兰教国家的一些乐器和乐曲，而且还借用了一些阿拉伯词汇，木卡姆——大型组曲一词就是这样演变而来。文章还对《十二木卡姆》继承龟兹乐、伊州乐等乐舞的问题，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引证了《教坊记》、《唐宋大曲考》、《隋书·音乐志》、《唐书·地理志》，及《宋史·乐志》等书的有关记载作了考订。同时将《十二卡姆》和唐宋大曲的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十二木卡姆》是十二套大组曲，其中每一个木卡姆由三部分组成，如《十二木卡姆》第一组成部分——《琼拉克曼》（意即大曲），和唐宋大曲中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散序》在结构上基本相同。《十二木卡姆》的第二组成部分——《达斯坦》，和唐宋大曲第二个组成部分——《排遍》，在结构上也是基本相同的。《十二木卡姆》的第三组成部分——《麦西热甫》，和唐宋第三组成部分——《入破》，在结构上也是基本相同的。由此可以看出《十二木卡姆》和唐宋大曲间的密切渊源关系。它们都由三个部分组成，在器乐合奏、歌唱与舞蹈的结合上，这三部分又都是基本相同的。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唐宋大曲渊源于《龟兹乐》、《伊州乐》以及“变龟兹声为之”的《西凉乐》。《十二木卡姆》又与唐宋大曲极为相似，由此可以证明《十二木卡姆》是龟兹等乐舞的继承和发展。它们间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586　龟兹乐与木卡姆　　　周菁葆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3期）

近年来研究龟兹乐与木卡姆的文章较多，这篇文章试图从龟兹乐的兴隆；龟兹乐的乐器；龟兹乐的音乐结构；龟兹乐的乐曲；龟兹乐的乐律；龟兹乐的乐调；龟兹乐的舞蹈；龟兹乐与维吾尔族的关系等八个方面的研究，来说明龟兹乐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西域音乐除于阗乐外，其他的均兴起于公元四世纪之后，因此作者将龟兹乐的兴隆期定为四——八世纪。龟兹乐所用乐器，是弄清龟兹乐性质的重要环节。过去中外学术界把龟兹乐器说成是印度系或伊兰系，作者对龟兹乐乐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探索，列举大量史料，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将龟兹乐器分为四类；即：膜鸣乐器、弦鸣乐器；气鸣乐器；

体鸣乐器。认为西域音乐所用乐器，虽然吸收了中原的乐器笙、箫；埃及、西亚的竖箜篌、琵琶；印度、西亚的铜钹等，但从总体上而论，仍以本民族乐器为主，羯鼓被列为八音之首。现今的木卡姆音乐中，仍保持了龟兹的乐器结构，即由膜鸣乐器、弦鸣乐器和气鸣乐器组成。由此可知木卡姆继承龟兹乐是论之有据的。龟兹乐的音乐结构，由三段组成，一是声乐曲、二是器乐曲，三是舞蹈曲。这三段体的音乐结构在西域音乐中普遍流行。"解曲"是当时西域音乐中的特殊音乐结构，而尤以龟兹乐常用。这种歌曲——解曲——舞曲的音乐结构与现今木卡姆有密切关系，虽然在编排上有微妙的区别，但从整体上看，木卡姆的确是继承了龟兹乐的音乐结构。关于龟兹乐的来源，应是以本地音乐为主，吸收融合了波斯、印度的音乐而产生的，是东西方音乐的融合。在乐曲上有反映摩尼教内容的，也有反映佛教方面的。但是主要强调了本民族乐曲，把"疏勒盐"放在压大轴的地方。在乐律上，基本上是接受了中原先秦的乐学体系，采用五度相生律和纯律。

维吾尔族早在公元前就已分布在天山南北，是新疆最古老的民族。龟兹音乐就是维吾尔族在本民族能歌善舞的基础上，接受中原理论，吸收融合印度、伊朗的某些因素逐渐产生的。龟兹音乐就是维吾尔族音乐。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木卡姆继承了古代龟兹的传统；维吾尔木卡姆音乐和龟兹乐有着血缘关系；龟兹乐对木卡姆的形成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那种认为维吾尔木卡姆是源自阿拉伯的说法，仅是从宗教的角度来推断，缺乏历史根据。维吾尔族虽然信奉了伊斯兰教，使用了阿拉伯字母，但其艺术绝不是阿拉伯艺术的翻版。

587 龟兹乐舞史话 霍旭初

（《新疆艺术》1983年第１、２、３期）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玄奘去印度取经，途经龟兹，耳闻目睹龟兹乐舞，后来在《大唐西域记》中载：屈支（即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此外，在不少史书、传记、诗词、笔记和传说中亦有龟兹盛行音乐舞蹈活动的记叙。龟兹音乐舞蹈艺术的兴旺发达，造就出许多杰出的艺术人才，如苏祇婆、白明达、白智通等人。苏祇婆是南北朝末北周时进入中原的，他精通音乐理论，善弹琵琶，到中原后，传播了龟兹乐调，给中原音乐艺术以重大影响。龟兹乐舞被视为西域艺术的代表，特别是乐器编制上，西域各部都以龟兹乐队为模式。龟兹乐舞艺术中，音乐艺术成就最为显赫。据《隋书·音乐志》载：龟兹音乐有"歌曲"、"解曲"和"舞曲"。即声乐、器乐和舞蹈伴奏曲三大类，具备了多样化的音乐表现形式。它使用着七声音阶和多种调式，苏祇婆在中原传授的"五旦七声"就是龟兹所实行的乐制。在乐器上，它把各方面的优秀乐器汇集起来，并依据龟兹音乐发展的需要加以改革和提高。龟兹乐舞中的舞蹈艺术也极丰富。群众性的舞蹈活动主要在盛大节日、传统性活动和佛教行像时举行。其中场面浩大，气势辉宏的"苏幕遮"，也叫"乞寒舞"，传入中原后，在民间广泛流传。还有"狮子舞"从龟兹传到凉州，成为《西凉乐》中一种独特的节目。龟兹舞蹈艺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把各方成份巧妙地揉合在自己的舞蹈艺术中，形成了自己"浓丽

多姿”的艺术风格并自成体系。公元383年，前秦符坚的大将吕光进攻西域，征服龟兹，东归时带回一大批龟兹乐舞艺人。他东归时占据凉州，建立了后凉政权，龟兹乐便在这里开始与中原文化艺术交流融合，从而诞生了新的艺术品种——《西凉乐》。北朝时由于龟兹和西域各国乐舞艺术大规模传入中原，龟兹乐舞曾风靡北朝。公元581年隋统一全国，南北文化汇集一起，龟兹乐舞更是西域艺术的班主。隋代流行的“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三部龟兹乐大盛于闾闬。唐代是一个豁达大度、兼容并蓄的时代，以龟兹乐舞为代表的西域乐舞艺术，也得以在中原尽情驰骋。代表国家艺术的“燕乐”，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五代十国都沿袭唐制设宫廷乐舞，及至960年宋朝建立，社会相对安定，经济迅速发展，龟兹乐舞已与中原艺术融合一起。至于它的传播，早在隋唐时，就以其特殊的艺术魅力，流传地域广及中原及亚洲诸国，时间长达一千余年。龟兹乐舞是我国艺术园地里一束艳丽的奇花，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588 唐乐《部落稽》考源

——暨论匈奴音乐文化艺术之流传　　　郝　毅

（《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3、4期）

作为族名“部落稽”见于《唐会要》，作为该族的音乐艺术《部落稽》见于《唐书·礼乐志》。关于该族的来源、族名的出现及其民族音乐艺术与甘肃古代乐舞艺术《西凉乐》等正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史载部落稽为北周、隋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一强大的集团名称。其先祖为古匈奴屠各人，即西汉时驻牧于河西地带的匈奴休屠部。东汉起，该部逐渐东移，到了西晋，屠各人自河西散布北方地带，成为北方最强盛的部族。西晋末，族人刘渊建立过“汉——前赵”政权。此后，屠各人一直活跃在北方及西北各地，直到北魏时期。到了西魏年间，屠各人突然不见于史，而出现了与其所处地理位置相同的“山胡”“稽胡”族称。专家认为：匈奴部落遁居山中者曰稽胡，亦曰山胡。北周时，稽胡又逐步强大，常与北齐相抗，北周灭北齐统一后，全力讨伐稽胡，稽胡部众尽降于北周。到了唐代宗大历年后，稽胡渐渐不载于史，很可能大部分汉化，小部分北入突厥、西入党项、吐谷浑诸族之中。就其称呼而言，西汉为休屠，东汉为休屠各，晋为屠各，南北朝初为山胡，后为稽胡，隋唐为部落稽，异写为步落坚、拔也稽及步落稽。部落稽的先祖匈奴是一个喜好音乐文化艺术的民族，匈奴人民创造了胡笳和鞞鼓等乐器，并流传到中原地区，为汉人所喜爱。匈奴人尤其是河西休屠部还擅长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随着历史的发展，占全部匈奴人口总数一半的未西迁的匈奴人以休屠部为主，联合其它匈奴部众逐步在我国西北形成屠各——山胡——稽胡（部落稽）之民族。他们继承了其先祖的音乐艺术并加以发展，在北周时进入宫廷演奏，使北周宫廷乐舞艺术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内容也更加丰富。隋唐宫廷乐舞中也都有部落稽的音乐成份。史载《部落稽》常与《西凉乐》杂奏。据考《西凉乐》即为古代甘肃及周围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乐舞艺术的总称，北魏时东传。《部落稽》能和《西凉乐》杂奏，主要是由于部落稽族为古西凉地带匈奴休屠之后裔，故其音乐风格有所共同，方可进行杂奏。至于匈奴音乐的流传，学者们发现裕固族西部民歌与匈牙利民歌有七个共同点：五声乐阶、四度——五度框架、五度结构、转位的附带点节奏型、变节拍、以曲首音贯穿全曲、

终止式。由于西部裕固人是和古匈奴人族源关系密切的古丁令人的后裔，所以其民歌保存的古代特征，不仅是丁令（敕勒）、回鹘民歌的特点，也是突厥、匈奴民歌的特点。匈奴西迁后，不仅带走了本族的音乐，而且也包括丁令人的音乐成份。考古资料证明，裕固族民歌中的羽调式四音音列，可能曾被丁令人和匈奴人共同采用。这种四音音列，在我国古代音乐音列特征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至今保存的某些古老乐种中也仍有反映。据学者研究认为，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族和裕固族民歌的共同因素是五声音阶和五度结构，而河北、陕西、西藏民歌的调式、结构、旋律、节拍都与匈牙利民歌相似。可见，古代匈奴民族所创造的音乐文化艺术，不仅在古代为中华民族的音乐发展起到过重大作用，而且至今仍大放其彩；同时为东欧一些地区的音乐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

589　法　曲　　　丘琼荪

（《中华文史论丛》1964年第5辑）

自两汉魏晋以来，外来文化逐渐传入我国，又逐渐为我国所吸收融化，到了隋唐时期，一面大量吸收，一面又融化创造。以音乐文化来说，已传入的外来音乐继续流行，新的又在传入；而在自己方面，中国旧有清乐一方面在流行，另方面将清乐与外来音乐相结合，创造了法曲和“胡部新声”，形成我国历史上音乐歌舞的极盛时期，尤以开元天宝为最盛。当时盛行的音乐有所谓法曲，而千古绝称的《霓裳羽衣》即是法曲。开元天宝之音早已消逝，霓裳曲谱久已沉湮，但法曲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音乐，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即：法曲的来源；法曲的成长与演变；法曲音乐的特点；法曲所用乐器；法曲和大曲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论证。文章引用大量资料，首先考证了法曲的渊源。法曲出自清商，起于隋而盛于唐。法曲之初即佛曲，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法曲以中国清乐为本，羼杂一部分外来乐曲，又有道曲和佛曲。道曲模仿佛曲，佛曲为外来乐，在一般的乐曲外另成一派。道曲唐代始有。所谓道曲，实类佛曲，道其辞而佛其曲。当顶礼道家时，便仿效佛家仪式，且仿佛曲而制新辞，便成道曲。其文辞是中国道家的，其音乐及音调很多是印度佛家的，名虽道曲，实则还是佛曲。

其次，根据各种史料对法曲作了深入研究。法曲类名似较繁多，现可考者仅二十有五曲。文章对此二十五曲的来源及内容进行了阐述，对二十五曲从时代、产地、乐种进行了分类考证，还对法曲与清乐、燕乐、西凉、龟兹各部所用乐器及歌舞人数作了排比分析。同时对二十五法曲所属宫调其中唐调可考者十五曲，又一一进行了考证，得出了较正确的结论。例如二十五法曲之一的《霓裳羽衣》为大曲，原名《婆罗门》，当是印度舞曲，凉州节度使杨敬述进献。据白诗自注谓为“杨敬述造”，经过杨敬述“造”，不免华化了一部分，又经唐玄宗的润饰，更加华化了，更多地搀进了华声的成分，又以法部奏之，锺磬筝筑齐鸣，故属之法曲。白诗“法曲法曲合夷歌，夷音邪乱华声和”。白自注云：“法曲虽似失雅音，盖诸夏之声也”。则法曲之为“华声”，乃不容置疑。

再次，法曲内容非常广泛，有汉晋六朝的旧曲，有隋唐两代新声，有郊庙用的乐舞，有文曲，有武曲，有大曲，有杂曲，有软舞曲，有劝酒曲，有琵琶曲，有胡部化和

道曲、佛曲化的中国乐曲，有华化的外来乐曲，古今中外，雅乐俗乐，歌曲舞曲，无不具备。从区区二十五曲中可以窥见唐代音乐之盛。把各种不同内容，不同性质，不同旋律，不同感情的种种乐曲，用法曲的乐器和特有风格去演奏，这就是极为发达的唐代乐曲，是光辉灿烂的唐代音乐文化。

最后，文章在谈到法曲与大曲的关系时认为：凡遍数较多而称"大遍"者为大曲，否则为小曲为次曲。法曲有大遍也有小遍，故法曲中有一部分为大曲，但不尽是大曲。法曲之异于其它乐曲者，主要在音乐，声音雅淡，与喧嚣之龟兹乐迥然不同。大曲在遍数上区分，与音乐无关。故大曲中有法曲，有非法曲，法曲中有大曲，有非大曲。大曲中之法曲以音乐立异，法曲中之大曲以遍数区分。《霓裳羽衣》为大曲，因其有十二遍，亦为法曲，因其有雅淡的音节和特有的演奏风格。所以大曲和法曲不是对立的，而是交叉的。

本文是研究唐代音乐文化的一篇较系统的资料，是研究中国史、中西文化史的一篇重要材料。其中所涉及的佛曲问题，向达先生早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论唐代佛曲》一文，后又收录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可一并参考。

590 《霓裳羽衣曲》考 杨荫浏

（《人民音乐》1962年第4期）

本文根据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考证了《霓裳羽衣曲》的曲体结构、表演形态和流传情况等问题。《霓裳羽衣曲》是唐代有名的《法曲》，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大曲》。法曲和大曲，原来都是歌舞曲，乐曲结构形式无大的差异。但在所用乐器方面稍有不同。法曲演奏效果较文雅，大曲则较粗犷。白居易对此曲非常熟悉并曾积极传播。据作者考证，《霓裳羽衣曲》中，有一部分是唐玄宗于开元年间(公元712年至741年)在唐代的西都长安所创作的曲调，又有一部分是在吸收了西凉所进的印度《婆罗门曲》之后续写而成。《霓裳羽衣曲》部分地采用了佛教音乐素材，表达了与道教神仙故事有关的思想内容，在当时造成一种新鲜的印象，为人们所欢迎。故此曲一半为创作，一半为改编。全曲大体分为散序、中序和曲破三个部分，共三十六段。在唐代，此曲曾传至杭州、苏州和洛阳等地。开始，此曲可能是双人舞，至唐宣宗时（847年至859年），已成为数百人的队舞。到了宋代，又成为由歌曲和乐器演奏合成的音乐节目。表演《霓裳羽衣曲》时所用乐器计有：铙、钹、钟、磬、箫、琵琶、琴、瑟、筑、跋膝、笙、竽、箜篌等。作者还对近百年来出现的两个"霓裳"为标题的乐曲进行了辨异。一个是1895年出版的李芳园《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中的《霓裳曲》，实为《月儿高》。另一个是1926年凌纯声、童之弦合编的《霓裳羽衣》，在其中的十多个曲牌中，除《舞霓裳》可能与唐代的《霓裳曲》有关外，绝大多数曲牌都是宋、元以来的作品，与唐代的《霓裳曲》毫无关系。

591 关于《泛龙舟》 陈文成

（《音乐研究》1984年第2期）

本文对日本《博雅笛谱》中所载《泛龙舟》曲谱的来源及流传情况作了考证，并用

线谱对曲谱作了翻译。据《隋书》卷十五记载，《泛龙舟》是由隋炀帝作词、乐工白明达作曲。《唐会要》、《教坊记》等记载，白明达是龟兹人，曾活到唐高宗时。隋时把《泛龙舟》列于龟兹乐中，《通典》和《唐会要》的记载《泛龙舟》在唐时属清乐部。《教坊记·大曲名》和敦煌曲子词中均载有《泛龙舟》。作者将隋炀帝《泛龙舟》和敦煌曲子词《泛龙舟》作了比较，敦煌《泛龙舟》全曲的体制和炀帝的词相近。《泛龙舟》可能流传到宋初。据《宋史》卷一四二记载，在《小曲》双调下有《泛龙舟》，乐调与唐世不同，这个《泛龙舟》与隋唐《泛龙舟》究竟关系怎样，无从稽考。宋以后再没有演奏《泛龙舟》的记载。在公元724年至938年间，《泛龙泛》传到日本，属雅乐，为中曲。因为成书于公元931～938年之间的日本的《倭名类聚钞》卷四《曲调类》水调曲下有《泛龙舟》。另外藤原师长（1137～1192年）的《三五要录》也载有《泛龙舟》并注明是"新乐"。日本在圣武（724～749年）、孝谦（749～758年）两朝输入的"雅乐"为"新乐"，《泛龙舟》传到日本自是724～938年间事。在其它日本文献中，对《泛龙舟》的体制资料也有所记载。至十三世纪初期，《泛龙舟》在日本已不再受欢迎。到十七世纪中期，《泛龙舟》便不再演奏了。文章对《泛龙舟》的曲词、乐器、节拍等均作了考证。

592 中国古代舞蹈艺术 常任侠

（《新建设》1955年第11期）

本文比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古代的舞蹈艺术史。前一部分叙述了舞蹈的起源，原始的乐舞形式，以及氏族社会的巫舞，由巫舞发展为楚舞的过程。这时的乐舞，主要歌颂劳动群众的勤劳、勇敢与爱情生活。秦灭六国后，舞蹈艺术便为奴隶主和封建主服务。但在民间却一直保持着生气蓬勃的力量，不断产生优秀成绩。汉以来，民间乐舞有长足发展，并且吸收域外舞乐，更加丰富了中国古代舞蹈艺术的内容。鼓吹乐始于班壹，横吹乐传于张骞。并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造新声二十八解。自此以后，乐府传习，用于宫廷，并给边将。这是汉乐沾染外乐之始。汉乐为魏晋所承，并无多大改变。到公元四世纪初年，晋代东迁，北方成了五胡统治的地域。南北朝分立，北方由于胡族的爱好，胡戎伎乐大盛，鲜卑族建立北魏政权后，曾以悦般国的乐舞，记于乐署。北齐文宣初，未改旧章，胡乐已渐流行。胡乐胡舞进入中原，有丰富的文献记录，并在当时的石刻和新疆、敦煌的壁画中，有不少图象遗存。作者引用《隋书·音乐志》的记载，说明伊兰系的乐舞，经由西凉转介传入中国的情形。《魏书·太祖记》、《旧唐书·音乐志》的记载，说明龟兹、疏勒、安国、康国等小亚细亚、中亚细亚的乐舞，大举来到长安的情形。域外的乐舞与中国的乐舞相结合，创造出新的艺术，为隋九部、唐十部乐舞培养了人才并打下了基础。北朝乐舞中故事性、戏剧性的舞蹈"代面"、"钵头"、"踏摇娘"，都受到域外的影响。由这三个古典的小舞剧开始，其后产生了唐宋的大曲，金元的院本杂剧。隋唐时代，有不少来自域外的乐舞与中国自汉以来的古典舞艺相结合，发生了新的艺术面貌。隋九部与唐十部乐，其中除西域少数民族的艺术外，也还保留着外国乐舞的名称。隋代九部乐是：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

高丽、礼毕。其中出于西北的乐舞，九居其六。唐初仍隋旧制。太宗时，削去礼毕乐，增高昌乐，是为十部乐。唐代的十部乐中，包括天竺、于阗、龟兹、疏勒、康国、安国、西凉、高昌等西域乐舞，它同汉魏以来传统的古代乐舞相混合，使中国古代乐舞在性质上发生很大变化，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盛况。唐玄宗李隆基本人擅长音律、爱好乐舞，他总结了中国古代乐舞，吸收了域外各国乐舞，创造出新的艺术，使古典舞乐得到很大发展。他还设立教养乐工舞人的机构，培养了不少乐舞人才。唐在中国古代乐舞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为后代乐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93 隋唐的舞蹈 常任侠

（《人民日报》1962年1月7日）

隋唐时，中国长期分立的局面趋于统一，国力盛张。在文化艺术方面，吸收域外各民族的精华，孕育培养，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新风格。在舞蹈艺术上，由于引进的西域乐舞与中国原有舞蹈艺术紧密结合，发展创新，从而奠定了东方舞蹈艺术的基础，达到过去封建文化的高峰。隋朝统一南北，聚旧乐于一处，分雅俗两部，加上域外乐舞，总为七部。大业中又增为九部，即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其中清乐、礼毕为中国原有，另除高丽一部，余均来自西域。唐初，继承隋制，乐工舞人，无大变化。唐太宗时，增高昌一部，遂为十部乐。玄宗时，分乐舞为立部伎（堂下立奏）与坐部伎（堂上坐奏）二部，坐立部都用龟兹乐。唐代的十部乐中，以龟兹乐为首。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说：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龟兹乐舞，吸收了北印与波斯两地的技艺，并有高度的发展，因此在隋唐的宫廷和民间，盛极一时。著名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都属这一系舞蹈，无论在地域和风格上，正是现在新疆舞蹈的历史传统。急管繁弦，舞步迅快，是这种舞艺的特色。文章对胡旋舞、胡腾舞传入中国的沿革、舞蹈的动作节奏、舞姿与舞服等，通过《南部新书》、《通典》、《乐府杂录》、《唐书·礼乐志》等典籍及唐诗的记载，钩稽描述，读之仿佛如见。隋唐时，东方舞蹈艺术，汇聚于中国，发展得相当丰富多彩，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本文简要的只举了其中一、二，可供丝绸之路研究者参考。

594 试谈唐代舞蹈 欧阳予倩

（《舞蹈》1959年第3—5期）

本文共分六个部分：一、对前代舞蹈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二、外来舞蹈艺术的影响，三、和国外以及兄弟民族舞蹈艺术的交流，四、唐代的舞蹈创作，五、舞蹈艺术来自民间，六、唐代舞蹈的衰败。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唐代的音乐舞蹈，以及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问题。每个部分，作者根据历史文献、各类图片、明器等，并参考现在民间、各民族以及东方诸国的舞蹈，均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文章认为，唐初，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学艺术也得到很大的推进，音乐舞蹈空前繁荣。唐代舞蹈艺术集周、秦、汉、魏、晋、六朝以来舞蹈艺术之大成，并有很大的发展。宋代的乐舞，绝大部分继承唐制，元、明、清三朝对舞蹈艺术很少发展，而且日趋衰落。因此把唐代的舞蹈艺术弄清

楚则上及周、秦，下至明、清的舞蹈都容易找到线索。文章首先论述了唐代乐舞的源流。北朝的乐舞盛行着中亚和新疆一带传来的胡乐；南朝保持着汉族乐舞的传统。隋朝统一中国，把南北朝的乐舞加以集中整理，组成了七部乐：国伎、清商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文康伎。到隋炀帝把七部乐加上疏勒、康国两部乐发展为九部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礼毕，清商是汉族的音乐，即所谓中原旧乐。国伎，就是西凉乐，这是汉族音乐与西域音乐混合起来的音乐。无论是七部乐、九部乐，每一部都有好些曲子，有的曲子有舞，有的曲子没有舞。百戏当中除杂技之外也有歌舞，有些舞是由杂技演变而成的。隋炀帝于大业六年在洛阳端门街大陈百戏，参加的艺人有一万八千。炀帝把乐工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太常寺，招了许多学生称为博士弟子，传授技艺。唐灭隋后，把隋炀帝所集中的乐舞艺人接收过来，把晋以来流传下来的乐舞技术全盘吸收。唐太宗时，又把隋的九部乐增加了高昌乐而成十部乐。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的东西，同时进行创作，也不断从外族吸收新的乐曲和舞蹈。到了高宗朝（公元677年左右），十部乐就改变为坐部伎和立部伎。立部伎八部：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坐部伎六部：宴乐（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这些乐每一部都有舞，舞的规模有大有小，性质也有不同。天宝十二年（754年），太乐署把许多外来乐调的名称全部改成中国名称，促进了外来乐调的汉化。唐代丝绸之路畅通和国外的来往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跃。十部乐中有六部是外来的。唐代的舞蹈创作多半是先有乐曲后有舞蹈，而这些舞曲大半掺杂着西域音乐的成分，外来的音乐和乐器给唐代的舞蹈艺术以很大的影响。唐代舞蹈的创作，从文字记载中可找到名称的约有四五十个，而且传播的范围相当广。唐太宗创作了《破阵乐》和《庆善乐》，唐高宗创作了《上元乐》、《一戎大定舞》和《光圣乐》、《龙池乐》。这说明皇帝对乐舞的爱好和重视。唐朝小型娱乐性的舞蹈有健舞、软舞之分。大体凡动作比较爽朗快捷刚健的称为“健舞”；动作比较舒徐安详温婉而表情比较细腻的便叫做“软舞”。这两种舞多半是单人舞。还有一种交际舞，谓之“打令”；是宴会时行于宾主之间的一种舞蹈。在谈到舞蹈的起源时，文章认为，舞蹈起源于劳动，原始时代舞蹈和劳动是紧密结合着的。后来舞蹈的性质逐渐有变化，形式也越来越复杂。所有舞蹈艺术的积累不是靠封建统治者而是靠艺人。创作、传授、继承、发展、传播都离不开艺人。宫廷的艺术无不从民间而来，有的是经过专业艺人加工美化了，也可能反过来影响民间，有的僵化了便趋于衰落以至灭亡。只有在人民中生了根的东西才能够维持久远。历史最长、从远古到现在还保存着的可以算是“傩舞”和“巫舞”。唐朝乐舞最盛时期只在初唐一百年中。其后随着唐朝政治的腐朽衰落，又经过742年至820年七十余年朝廷与藩镇的长期战争，以及继起的农民起义，唐朝日益衰落，乐舞也随之衰败了。本文对唐代乐舞的论述比较系统、全面而且细致，为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595　唐代舞蹈续谈　　　欧阳予倩

（《舞蹈》1960年4期）

本文为了加深对唐代舞蹈的研究，还追溯了自周至隋的舞蹈发展情况。认为我国的

舞蹈艺术从周朝已很发达，那时在民间有反映劳动和狩猎生活的舞蹈，男女相爱的舞蹈，还有对自然作斗争驱逐疫鬼的《傩舞》和《巫舞》等。在宫廷里有宣扬文、教，歌颂君王德化的文舞，也有夸耀武功的“大武”之类的武舞，还有锻炼身体、教育贵族青年的舞勺、舞象。总的看已经脱离了舞蹈的原始形态，进入艺术的领域。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倡优侏儒的表演。当时盛行女乐，音乐更加发达，各族文化交流增多，歌舞艺术有新的变化和发展。汉代百戏盛行，主要是杂技，也有幻术、歌舞和器乐演奏等。娱乐性的舞蹈也很盛行，许多豪门贵族养有舞伎。汉代的百戏有许多是从西域传来的。到了南北朝时代，西域乐舞大量流入，其中有现在新疆各族的乐舞和波斯、中亚、印度的乐舞。这些乐舞和中原的乐舞逐渐结合，互相影响，不断变化。隋文帝统一中国，把各种音乐舞蹈和散乐百戏集中起来，成为七部伎，后又发展为九部伎。七部伎比汉代的百戏更多的包含着各民族的和外来的音乐舞蹈。及至唐代，全部继承了隋朝的音乐舞蹈。由于国势强盛，幅员广大，丝绸之路畅通，和西域的交往更加频繁，加强了文化交流，也就大量吸收了外来的和各民族的音乐舞蹈，丰富了原来的舞蹈艺术，并创作了许多新的乐舞。利用了许多有成就的艺人、作曲家、演奏家和舞蹈家，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如太常寺、教坊等，培养了大批演员和乐工，表演艺术和技巧不断得到提高。唐代的舞蹈艺术超越了以前各代，曾经发展到一个高峰，一直到宋、元、明、清，都没有超过它。文章还对舞蹈起源于民间，宫廷与民间的舞蹈，礼教对舞蹈艺术的扼杀，歌舞对戏曲形成的影响，以及唐代舞蹈艺术在安史之乱后的衰败等问题，均作了概括的论述。

596　唐代舞蹈浅述　　　　秉　勋

（《群众歌舞》1979年第2、3、4期　1980年第1、2期）

繁荣发达的唐代舞蹈艺术，不仅吸收了民间舞蹈，而且融化、改造了外来舞蹈，重视创新而不固守旧章。本文通过对唐代舞蹈的具体介绍，展示了其基本面貌。霓裳羽衣舞，是唐代著名的代表性舞蹈。初为佛曲，名《婆罗门曲》，由天竺（印度）经河西传入，经玄宗润色，改称《霓裳羽衣曲》。据传杨贵妃善跳此舞。白居易曾有诗描述此舞不同凡响的意境和特色。破阵乐舞，在唐代闻名中外，初为民间《秦王破阵乐》。贞观七年（633年），太宗创制《破阵舞》，阵容宏伟，烘托出战争激烈紧张的气氛。后改称《七德之舞》，取意文武之道随时势而变更，至玄宗时即已衰落。柘枝舞，源自石国（今苏联塔什干一带），属健舞。所谓健舞，刚劲激烈，以区别舒缓柔软的软舞。此舞在唐代极为普及。此舞鼓乐伴奏，舞者或单或双，异族装扮，形式别致。专跳此舞的舞伎称柘枝妓，著名的有萧炼师和关盼盼。驱傩舞，源自古老的民俗，是一种带着面具的民间舞蹈，原具有驱邪和娱乐的双重性质。舞中的形象有各种怪物、神仙，有传说中的人物和历史人物。此舞为唐宫廷的正式乐舞，每年由太常寺（管理国家礼乐的机构）主持举行一次，舞员众多、场面壮观。剑器舞，属单人健舞，动作迅疾多变，突起突落，需要极深的造诣。此舞是八世纪著名舞蹈家公孙大娘创造的。作为动的造型艺术，公孙大娘的剑舞曾启迪过诗人、书法家的灵感。苏幕遮舞，八世纪初从天竺、康国（今苏联撒马尔罕一带）经龟兹（今新疆库车）传入长安。据说苏幕遮是梵语聚会之意。此舞是一种

队舞，既有祈禊吉祥的意思，又带有竞赛和游戏的性质。此舞鼓乐伴奏，舞者着胡服，带面具，分为两队，互相欢叫追逐，还用事先装在油囊里的水向对方泼撒，故当时又称此舞为“泼胡乞寒”戏。此舞盛于武则天末年，规模浩大。胡旋舞，八世纪五十年代由康国传入，属健舞。其特点为急遽旋转，由鼓、铜钹和笛子伴奏，据传杨贵妃和安禄山均善跳此舞。胡腾舞，是石国和凉州一带少数民族中的民间舞蹈，是以腾跳见长的男子独舞。舞者为胡人，舞姿强劲激烈，主要乐器是横笛和琵琶。绿腰舞，又称“六幺”、“录要”、“乐世”等，本是唐时一首有名的琵琶曲。此舞属软舞，舞姿轻盈，富有抒情性。春莺啭舞，属女子单人软舞，曾流传到朝鲜。凌波舞，源自《凌波曲》，想必此舞飘飘欲仙，极富意境。《代面》、《拔头》、《踏摇娘》都是唐以前根据现实事件创作的。《代面》舞的音乐名为《兰陵王入阵乐》，此舞赞美了北齐兰陵王英勇作战的形象。此舞曾流传日本。《拔头》也称《钵头》，由胡人传入，是根据恶虎伤人事件创作的的舞蹈，属单人舞。《踏摇娘》，一名《谈容娘》，是颇具规模和故事情节的歌舞剧，表现一个酒鬼丈夫和受虐待的妻子的故事。具有反对夫权、反对压迫妇女的进步意义。字舞，是唐代宫廷中一种御用的集体舞，主要用于大庆时的歌功颂德。狮子舞，是我国源远流长的一种民间舞蹈。中唐时流行的狮子舞，还敷衍着某些故事情节。《竹枝》，是流行于巴、渝一带的民间歌舞，带有赛歌性质，短笛伴奏，击鼓指挥。歌舞者多为儿童，没有固定程式，均为即兴创作。此外，还有一种妇女的集体歌舞——“踏歌”。总之，唐代舞蹈，盛况空前，成就突出。这些舞蹈有的是经过吸收、消化外来的舞蹈而形成自己的特点；有的继承了我国古代原有的舞蹈形式，经过改造创新，在原来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从而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唐代乐舞文化。

597　唐代——古代舞蹈艺术高度发展的时期　　　王克芬

（《舞蹈》1979年第2期）

唐代是我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为繁盛的时代。在文化方面，仅唐代乐舞艺术的成就，曾对世界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按照唐代乐舞原有的分类，具体详细地介绍了其主要内容。第一，《九部乐》和《十部乐》。唐代继承了隋代的《九部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增删为《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和《高昌乐》。除《燕乐》和《清商乐》为汉族乐舞外，其余八部都是来自民族地区和外国各地的民间乐舞，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最著名的是《康国乐》中的《胡旋舞》，舞姿急促多变，旋转如风。第二，《坐部伎》和《立部伎》。是以中原乐舞为基础，吸收融化国内兄弟民族和外国乐舞创制的新的乐舞节目。以乐曲名为乐部名称，属宫廷燕乐，内容都是歌功颂德的。每个乐部都有舞蹈，吸收了多种民间舞蹈形式。《坐部伎》在厅堂内演出，规模小，艺术水平较高。《立部伎》大都在室外演出，规模大，气势雄伟。《破阵乐》是坐、立二部中最著名的，也是唐代变化较多，影响较大，应用范围较广的舞蹈。此舞根据歌颂唐太宗李世民统一国家武功的歌曲

《秦王破阵曲》编排。舞员120人，持戟，着盔甲；舞分三段，每段四次变化阵势，具有浓厚的战斗气息和雄壮的气势。后改名《七德舞》，公元656年又改名《神功破阵乐》，用于祭祀。《坐部伎》中的《破阵乐》是四人表演的小型舞蹈。《立部伎》中的《太平乐》，也叫《五方狮子舞》，人们装扮成五个不同颜色的狮子，表演狮子的各种情态，另有二人逗弄狮子，旁有140人伴唱，相当壮观。第三，《健舞》和《软舞》。唐代小型舞蹈分健舞、软舞两大类。健舞快捷刚健，以《剑器》、《柘枝》、《胡旋》、《胡腾》较为著名。《剑器舞》可能是从民间武术“剑术”发展而来。唐代著名舞伎公孙大娘最擅长此舞，影响很大。《柘枝舞》是从中亚传来的民间舞，节奏强烈，变化丰富，既刚健明快，又婀娜柔美。《胡腾舞》，从石国传来，以跳跃和急促多变的腾踏步为主，动作激烈豪迈。软舞优美柔婉，以《绿腰舞》最为著名。第四，歌舞大曲。是音乐、舞蹈、诗歌相结合的多段歌舞曲。开始是一段节奏自由的器乐演奏叫“散序”，接着是慢板的歌唱（有时插入舞蹈）叫“中序”，最后是节奏急促、起伏变化的舞曲叫“入破”。《霓裳羽衣》是唐代著名的大曲，由唐玄宗部分地吸收印度《婆罗门曲》改编。《霓裳羽衣舞》根据此曲排编，以杨贵妃的表演最为著名。在唐代宫廷的不同时期此舞的表演也有所不同，有独舞、双人舞和队舞。第五，民间歌舞戏。用歌、舞、戏相结合，表现一定的人物和情节。《大面》（《代面》）、《拨头》（《钵头》）、《踏谣娘》（《谈容娘》）是唐代最著名的歌舞戏。《大面》源于北齐，表现北齐兰陵王因容貌俊美而戴假面作战的情节，曲为《兰陵王入阵曲》。《拨头》由西域传来，表现父被虎吃，儿子上山寻找父亲尸体并捕杀猛虎的情节。这两个节目，都由单人表演。《踏谣娘》则由多人表演，表现丑陋、酗酒的丈夫殴打妻子和妻子向人哭诉的情节。总之唐代舞蹈多色多彩，不仅继承传统，而且吸收各民族民间舞蹈和外国舞蹈，大胆创新，从而创造了我国封建社会时期舞蹈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

598 西安地区部分出土文物中所见唐代乐舞形象　周伟洲

（《文物》1978年第4期）

长安是汉、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起点，也是我国地下文物的渊薮。解放后，由于考古事业的巨大发展，在这里出土了大量文物，从而对我国古代史的研究，或补证历史事实，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通过西安地区出土的石雕、陶俑、三彩等实物，证实唐代乐舞之形成，以及西域乐舞对内地之影响，并由此得知我国新疆（即古代之西域）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在文化发展上的杰出贡献。

本文首先根据两件石雕，即乐舞石座和白观像，两石座四周所雕刻乐舞伎造型、服饰、冠戴等，断定为盛唐初期或中唐时期之遗物，其中一石座乐舞形象与敦煌莫高窟中属初唐的220窟南北壁画西北净土变壁画极为相近，特别是两个起舞的舞伎，不论服饰、姿态都极为相似。两石座乐伎所持乐器有琵琶、拍板、横笛、箫、腰鼓、筚篥、铜钹等，基本上是胡乐乐器。从表面上看，两石座乐伎与龟兹部更为接近。

龟兹是丝路之上的要道，历史上这里人民以能歌善舞著称。龟兹乐是当地人民在原

有传统乐舞基础上，吸取外来乐舞的一些特点，创造发展成为具有本民族风格的乐舞。吕光灭龟兹，最早将龟兹乐传入内地，后凉灭亡，龟兹乐也随之散失，及后晋至隋，随着丝路之畅通，龟兹乐便大量传入内地，对内地乐舞影响较大，从西安出土的两个唐代石刻，可资证明。

其次，在西安地区出土了较多的唐代乐舞俑和三彩，作者对其中两组乐舞俑进行了比较研究，一组是西安西郊插秧村出土的乐舞陶俑；另一组是西安中堡村出土的三彩骆驼载乐舞俑。此两组乐舞俑均为八人，其一，男舞俑二人，乐俑六人；其二，三彩驼背载乐俑有女舞俑一人，男乐俑七人，两组乐舞俑所持乐器、舞姿、神态都极相似，且乐舞者均为汉民族，并着汉族衣冠。据此，作者认为在唐代西域乐舞不仅传入内地，为内地人民所接受，而且所谓"胡部新声"，经河西传入内地，大盛于开元、天宝之际，并正式升其乐于皇室堂上，列入宴飨音乐之内。这种盛于开元、天宝时之胡部新声，始于新疆地区，沿丝绸之路传入河西，再经河西人民加工改造，融合了汉族乐舞特点而创造成立，它以新疆地区乐舞为主体，但又具有河西和内地汉族乐舞的特点，成为唐代音乐文化的特点。

本文最后还对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舞马衔杯皮囊式银壶，作了考证。在李唐乐舞发展到极盛时期的玄宗时代，举行盛大宴会或宴请外国使团和国内各少数民族首领时，都有大型歌舞、技艺表演，最后还有舞马节目。马身披挂华丽锦绣，络以金银饰物，在"倾杯曲"乐中，"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地舞蹈。最后还有壮士举着床榻，马静立于榻上，衔杯曲膝下，周围还有乐人演奏。出土马衔杯皮囊正是表现了这种马舞。查皮囊壶最早为中亚游牧民族所使用，随着中外贸易往还、文化交流，这种皮囊工具随之传入我国，我国能工巧匠再据此仿制成精美工具，从这里反映出了中西文化交流之繁盛。

599　龟兹舍利盒乐舞图　　　　*霍旭初*

（《新疆艺术》1984年第1期）

本文论述了龟兹舍利盒的乐舞图，并详细介绍了这个舍利盒发现的经过及其体积、结构和形状。龟兹舍利盒是1903年日本人大谷光瑞探险队在库车东北的苏巴什古寺（昭怙厘佛寺）挖掘出来的，与其他文物一起被探险队盗往日本。这具舍利盒是木制，为圆柱体，盒盖呈尖顶形，盒身原来被红、灰白、深兰三种颜色覆盖，还镶有一些方形金箔做装饰，一直未为人们所重视。直到半个世纪后，有人发现颜色层内有绘画的痕迹，经剥去表面颜色，才露出盒身周围绘有一队形象十分生动的乐舞图。乐舞图以一男一女手持舞旄为先导，向右依次为：六个手牵手相连的舞蹈者，随之是一位舞棍的独舞者，紧接着是一组由八人组成的乐队，最后又是一持棍的独舞者，并有三位儿童围绕其身，整个乐舞图由21人组成。作者根据这个乐舞图的照片资料，详细描述了这些图像的装饰、姿势、乐器等细节。并根据新、旧《唐书》和唐代僧人慧琳所撰《一切经音义》、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等文献的记载作了考证，确认这幅乐舞图是龟兹世俗乐舞生活的真实写照，是西域流行的"苏幕遮"舞蹈的一部分。对乐舞图中出现的大鼓、竖箜篌、凤首箜篌（弓型箜篌）、排箫、鼗鼓与鸡娄鼓、铜角等六件乐器的来源和演变，也作了详细

的考证和论述。据日本学者研究测定，此舍利盒为公元七世纪之物，正当唐代盛世。安西都护府置于龟兹，辖四镇，统十六府、七十二州，龟兹成为天山以南、葱岭以西广大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迅猛的发展，音乐舞蹈艺术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这幅乐舞图就是当时龟兹繁盛乐舞的一个缩影。它也反映了处于丝绸之路中枢的乐兹在艺术上汲取了东西方文化营养而发展了自己的艺术，形成自己乐舞艺术的特色。龟兹又是当时西域佛教中心之一，昭怙厘又是龟兹冠首之大寺。这个大而华丽的舍利盒，很可能盛着一位德高望众的高僧的骨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盛况。本文引用资料丰富，分析细致论证周详，文内并附有舍利盒乐舞图的照片，为研究丝绸之路音乐舞蹈的重要参考资料。

600　胡腾舞何时传入中原　　　周　到　　刘建洲

（《舞蹈论丛》1982年第1辑）

关于胡腾舞传入中原的时间，过去有不少学者认为，胡腾原为中亚塔什干的民间舞蹈，于唐代传入中国，开元、天宝以后盛行于长安，后更遍及中国各地。本文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文章根据出土文物并引用了四幅出土的乐舞图，即：河南省安阳县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瓷扁壶上印的乐舞图；西安东郊唐苏思勗墓壁画中的胡腾舞图；河南省禹县白沙宋墓壁画中的乐舞图；河北省宣化辽墓壁画中的乐舞图，还叙述了陕西省兴平县霍去病墓地保存的一件石刻佛座上雕刻的乐舞图等。作者对这五幅图画上的人物形象、服装、舞蹈姿势、使用乐器和绘画时代等，均作了详细描述。认为从这五幅图画中，特别是北齐黄釉瓷扁壶和兴平北朝石佛座上胡腾舞图的被发现，打破了胡腾舞“唐代传入中国”内地的旧说，雄辨地证明了至少在北朝后期，这种乐舞已传至中原的长安和邺城，而且把这种乐舞的图象作为装饰，刻印在生活用具上，雕于佛座上，表明人们对这种乐舞的喜爱。这是和北朝统治集团对这种乐舞的爱好和提倡分不开的。作者引用《隋书·音乐志》的有关记载，证明北齐统治集团爱好胡乐，尤好胡乐中的胡腾舞。并认为胡腾舞应属西凉乐。西凉乐为甘肃敦煌地区的民间歌舞吸收西域胡乐和中原汉族乐舞而形成。整个北朝时代把它作为“国伎”，并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胡腾舞也是西凉乐的一部分。唐李端、白居易亦有诗句证明。由此可见，胡腾舞属于西凉乐，自北朝后期传入中原，盛于唐，至宋、辽时代仍有胡腾舞的存在。

601　胡腾舞考　　　激　川

（《新疆艺术》1984年第3期）

本文探讨了胡腾舞的类型、来源、民族、流传等问题。西域乐舞是唐代举国崇尚的乐舞艺术。胡腾舞属于唐代健舞，是广为流行、颇有代表性的西域舞蹈类型。胡腾舞不仅对我国古代舞蹈产生过深远影响，还曾经由丝绸之路传播至亚洲的许多国家。因此，胡腾舞已成为中国古代舞蹈史和丝绸之路文化艺术史的重要研究课题。作者从三个方面对胡腾舞作了考证：一、关于胡腾舞的文字记述。主要从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和唐代诗人李端、刘言史、李白等关于描述胡腾舞的诗中，考证了跳舞者的外貌特征、服饰装

束、舞蹈动作方式和技巧，以及伴奏乐器等，认为胡腾舞是来自西域的一种男子独舞，主要伴奏乐器有横笛、琵琶、铜钹等。它追求迅急敏捷、纷繁复杂的舞步，轻巧灵活、惊人目眩的舞蹈技巧，展露出刚毅奔放的雄健之风。同时又强调肢体的软度，显示出另一种柔美的艺术格调。二、各种历史文物中反映胡腾舞的图像资料。古代西域文化，是由各个绿洲的地方文化共同组成的。各大绿洲文化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以龟兹、疏勒、于阗、高昌和昭武九姓诸国为代表的各大绿洲文化中心，都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由于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多种因素，他们之间往来密切，在文化艺术上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甚至直接借取，形成了西域各大绿洲文化所共有的典型特征和美学风格。龟兹舞蹈即是采诸家所长之集大成者。从龟兹石窟壁画中所反映出的龟兹舞蹈的发展和演变，就是古代西域舞蹈所共同走过的历史进程。作者从早期龟兹石窟壁画中的舞蹈图像，即公元一世纪至三世纪的舞蹈图像、河南安阳县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瓷扁壶上的舞蹈图像、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北朝绿釉印花人物扁瓶上的舞蹈图象、以及克孜尔千佛洞77窟的一幅舞蹈图像中，分析了胡腾舞的舞蹈动作、姿态和节奏韵律，说明胡腾舞是西域舞蹈进入鼎盛时期所涌现出来的瑰丽花朵，成为这一时代西域舞蹈的杰出代表。三、至今仍流传于世的，含有胡腾舞遗风民间舞蹈。胡腾舞集中体现着西域民族的性格、气质，表达着他们的情感、理想，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对西域其它舞蹈产生强烈的影响，至今仍在新疆的民间舞蹈中闪现着它的风姿。作者对维吾尔族男子表演的民间舞蹈《夏地亚那》、塔塔尔族的男子舞蹈等，从舞蹈的类型、动律特征、结构方式、表现手法，以及音乐的节奏、情调、色彩等方面作了分析比较，找到了它们与胡腾舞的许多共同点，发现了它们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说明新疆一些民间舞蹈仍然保留着某些胡腾舞的遗风。文章分析细致，论证清楚，并附有舞蹈图像，为研究丝绸之路的乐舞提供了重要参考。

602　唐代舞曲《屈柘枝》

——敦煌曲谱《长沙女引》考辩　　　何昌林

（《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被法人伯希和劫持而去、现藏巴黎图书馆的《敦煌琵琶谱》中，有《长沙女引》这一曲名，史书、乐籍不曾记载，有人以为此即唐代名曲《六幺》（《绿要》）。作者经过考辨，认定是《屈调·柘枝引》。

述说唐开元年间伎乐事的《教坊记》中，有《柘枝》大曲与《柘枝引》。宪宗元和年间，故姑苏太守韦应物之女流落长沙，席间歌舞《柘枝》。湖南观察使李翱与韦应物系“姻旧”，知之，将韦女认收他适。“姑苏太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枝”，即殷尧蕃或李翱《谭州席上赠舞柘枝妓》的诗句。与此事相联，还有关盼盼或舒元舆的《献李观察》之作。此事曾出两首诗，涉及四个作者，可谓轰动一时；且该韦女或关盼盼系柘枝舞妓，这就为某一首柘枝词改名为《长沙女引》提供了有力依据。

温庭筠有《屈柘辞》之作。《屈柘辞》者，乃《屈调·柘枝辞》之略语。“屈调”者，“屈指调”也。即将原曲之“宫”音降为“变宫”，复以“变宫为角”而产生新的

曲调，此乃由来已久的一种民间作曲技法，一种转调法、旋律派生法，湖南花鼓戏老艺人至今仍称之为“屈”调法。新曲是在旧曲基础上，取“属向旋宫”的同主音能调手法而产生《屈调·柘枝引》，即以《柘枝引》为基础转调而成。作者译出的敦煌曲谱《长沙女引》是F宫调式，与早在唐代即传入日本的《宫调柘枝》，实为异名同曲。而日本的《宫调柘枝》，实即是由羽调《柘枝曲》用“屈”调法派生的宫调《屈柘枝》。

关于柘枝舞源出石国还是“南蛮”的问题，作者引举了咏柘枝舞或与该舞有关的诗句，其中均脱不开一个“蛮”字，刘禹锡尚有“柘枝本出楚王家”之句。近人杨宪益列举九证：用蛮鼓，穿孔雀罗衫，服从南诏人所贵之红紫二色，系金银镂花锦带，戴卷簷帽，穿紧袖罗衫，用云南之木连，配缅人辟邪之金铃，对舞姿态与骠国乐相似等，证明柘枝舞来自南诏。公元802年骠国王来献骠国乐时，中国早有柘枝舞。即使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高仙芝攻破石国之前，中国已有柘枝舞了。译出的《长沙女引》，音调与现今的花鼓、花灯音调十分相近。这一方面证明此曲即流播在巴蜀湘沅间的《柘枝曲》音调，同时又证明千年以前的柘枝曲并未消亡，就在当今的花鼓、花灯之中。为此，作者颇有感触地写道：“这里，不仅仅可以使孟夫子的‘今之乐犹古之乐也’的卓见得到应验，同时，也向学术界再次提出了这个老问题：《柘枝舞》真的是从中亚细亚的石国传来的吗？”

603　秦王破阵乐的来源　　杨宪益

（《新中华》复刊1946年第4卷6期）

秦王破阵乐是唐太宗时军中流行的武舞。《旧唐书》称：“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又称：“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太宗制破阵图”，“自破阵舞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享郊庙，以破阵为武舞，谓之七德。”由此可知破阵乐是太宗时军中的一种武舞，用来摹拟阵战动作，以宣扬太宗的武功。但据《隋唐嘉话》和《通鉴》记载，破阵乐虽为太宗贞观七年所造，可实际上太宗为秦王时便已流行军中，而前代无此种乐舞之记载。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在太宗时移植于中国的西域乐舞。因为即位前后，以平定突厥之功为最著，而突厥西疆直达东罗马帝国的边境，当时中国文化里突厥成分相当大，尤其在军士的服饰、音乐方面。突厥文化既占有相当成分，所以破阵乐由突厥民族传入中国，完全是可能的事。作者根据古代西方文献记载，作了深入地考证。古罗马诗人魏吉（Virgilius公元前70—19年）所著史诗里，有关于罗马古代武舞的记载，这种武舞在罗马名突罗戏，来源甚古，可能是希腊传来。因为希腊也有一种与此相同的武舞，叫雳霹戏。霹雳戏名起源于希腊名王阿戏留（Achilleus）的儿子霹雳（Pyrrhius）。他在攻打突罗城时建立战功。死后，国土又为突罗后裔所得。相传罗马人就是突罗人的后裔，突罗戏相传也是突罗人流传下来的。从罗马史诗的记载，突罗戏与破阵乐十分相像，二者都是摹拟战阵的武舞。都用戟击刺，都有金或银的胸饰，都有若干人为一队作战阵状，都有交错屈伸之变，以及往来急徐击刺之象。又都作出“声震百里，动荡山谷”。而且破阵乐的“破阵”，也可能是霹雳的音译。这样看来，

破阵乐可能就是罗马的突罗戏或霹雳戏，经过丝绸之路。由突厥人传到了中国。再由唐太宗吸收利用并发扬之。

604　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　　　耿世民

(《文史》1981年第12辑)

本文论述了哈密写本《弥勒会见记》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内容结构。《弥勒会见记》是公元八至九世纪用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一部原始剧本。于1959年4月在新疆哈密县天山人民公社脱米尔底地方的古代遗址中出土。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这个剧本不仅是我国维吾尔族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也是我国各民族现存最早的剧本，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共分六部分，分别论述了新疆维吾尔族的前代信仰宗教变动的情况、《弥勒会见记》发现经过和翻译抄写情况、剧本内容、剧本性质和对《会见记》的研究情况等。我国维吾尔族在古代被称为回纥、回鹘和畏兀、畏吾尔。公元八世纪中期，取代在漠北地区的突厥汗国而建立了回纥(后改称回鹘)汗国。公元762年回鹘正式奉摩尼教为国教。九世纪中期，回鹘汗国被黠戛斯人所攻灭，回鹘各部西迁。其中重要的一支迁到新疆的北庭(吉木萨尔)、吐鲁番盆地和焉耆、库车一带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他们在具有较高文化的当地居民的影响下，逐渐从游牧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发展了城市和商业贸易。同时在当地盛行已久的佛教影响下，逐渐舍弃原来奉行的摩尼教而改信佛教，在文化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此时期，回鹘人采用了以粟特文为基础创制的回鹘文来取代漠北时期使用的古代突厥文(鄂尔浑文)，同时进行了规模颇大的佛教典籍的翻译工作。这些佛典译自古代焉耆——库车语(吐火罗语)、汉文和藏文，主要为写本，也有木刻本。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丰富发展了回鹘书面语，使之成为当时新疆和中亚地区广泛通行的语文之一。到公元十四、十五世纪左右，佛教在新疆最后被伊斯兰教所代替，回鹘文逐渐废弃不用，而代之以阿拉伯字母的文字。用新疆古代各种民族文字写成的佛教典籍也遭到大规模的焚毁。所余残篇从此掩埋于颓垣流沙之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由于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各处进行考古发掘，才有用新疆古代民族文字写成的宗教典籍和世俗文献出土。《弥勒会见记》写本形式为梵筴式，长44公分，高22公分，用黑墨书写。写本共约293页(586面)。写本似由三人抄成。据第一幕末尾跋语所记，它先用圣月菩萨大师根据印度语原本改作成古代焉耆语。以后又由智护法师从古代焉耆语翻译成突厥语。写本的施主为一人名叫曲·塔思·依干都督的人，应属于高昌回鹘王国的高级官吏。在三个抄写者中，一人名叫法尊萨里，一人名叫土克·促帕·阿凯。写本共由一幕序文和二十五幕正文构成。序文内容主要为一般的佛教教义说教，正文主要讲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均证明，新疆塔里木盆地从古代起不仅以歌舞著称，而且戏剧表演很早也已产生。回鹘文本《会见记》的对话式文体也说明这是用来演出的。本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也获得回鹘文《会见记》的几个抄本的残卷。对《会见记》进行研究的有：德国学者缪莱、葛玛丽，中国学者冯家升和土耳其学者色那西·特肯。对《会见记》和其它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的研究，将使我们进一步了解长期扼居丝绸之路要冲的高昌回鹘王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情况。

605　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　　　　季羡林

（《文　物》1983年第1期）

本文论述了新疆博物馆收藏的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流行情况、内容和意义。在这本吐火罗文A即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发现以前七八十年，欧洲的所谓探险家已从新疆拿走了一些《会见记》的断简残篇。这说明《会见记》在新疆一带流传的异本很多，规模很大，也说明弥勒信仰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在当地传布很广，影响很大。在吐火罗文《会见记》发现以前，1959年发现了回鹘文本《会见记》残卷。计有293页586面，比吐火罗文《会见记》的篇幅多，两个本子互相对比，故事线索就基本清楚了。其内容大略是：年已120岁的婆罗门波婆离受天神启示，想去拜谒释迦牟尼如来佛，遂派弟子弥勒同伙伴16人，代表他谒佛致敬，并告诉弥勒等说，如来身上有三十二大人相，只要看到这些相，就可提出疑难问题考验如来。弥勒等来到释迦牟尼那里，果然在佛身上看到了三十二相。这个故事，在汉译《贤愚经》中早有记载，可见这故事在印度流传已久。对吐火罗文《会见记》发现的意义，作者认为：它不仅在于弄清故事的线索，更重要的是能够丰富已知的词汇，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一些过去根本不认识的词，确定一些过去不太确切或含糊不清的词义。在谈到剧本这个形式的影响时，作者指出：戏曲这种文学体裁在中国虽然萌芽很早，但是大规模的发展却在宋元以后。据一些学者的意见，回鹘文本《会见记》大概写于九至十一世纪之间，它是从吐火罗文本译过来的。吐火罗文本写成于六至八世纪之间，比回鹘文本约早三四百年，即在中国隋唐时代，比内地的剧本约早数百年之久。在古代新疆，还有佛教大师马鸣用古典梵文写的剧本《舍利佛剧》，时间大约在公元二世纪左右，比吐火罗文《会见记》还要早几百年。这说明戏剧这种形式在古代新疆早已盛行。

606　古代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及新疆的几种乐器
——略谈角、茄、笛、觱篥、琵琶的产生及其演变　　　　谷　苞

（《新疆史学》1979年创刊号）

“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们正是从劳动的节拍以及对喜爱和艺术加工中创造了各自的音乐、舞蹈，从自己使用的生产工具中发展出了各自的乐器。本文详尽地论述了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及古代新疆少数民族的几种乐器——角、笳、笛、觱篥、琵琶的产生及演变过程。这些乐器在汉朝以后陆续传入内地，但并非在汉时才在新疆出现，而是很早就有了。汉朝以后的汉文文献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些乐器当初的形状、质地和制作技术以及不断改进的情况。角、笳、笛这三种乐器都是羌、匈奴等我国北方古代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发明创造的。在古代新疆就有大量的羌人和匈奴人从事游牧业。角，初为羌族牧马人的乐器，以天然牛角加工制成，后演变为内地鼓吹乐中以皮革或竹、木制成的角，而在高昌乐中则是形如牛角的铜角，以后又演变成内地民间鼓吹乐中的大喇叭，又称号筒，与维吾尔族、藏族民间流行的号筒相近。笳，又称胡笳、箛、吹鞭，是匈奴牧马人的生产工具——马鞭，同时又是乐器，以羊骨或羊角为管。传

入内地后为军乐的主要乐器，多为木制。笛，即篴，又名篪、吹鞭、横吹，是古代羌族牧人的乐器，最初也是用羊骨或鸟骨制成，以后改为竹制。两千年来，笛子流传不衰，深为各族人民喜爱。在古代箛和笛又被称为吹鞭，就是一物二用——既可作策马的鞭子，又可为吹奏的乐器。这里由生产工具——马鞭，演变为吹奏乐器——笛的过渡阶段。觱篥，又称筚篥，悲篥，笳管，头管，管子，简称管。是一种簧管乐器，由古代龟兹（今库车县及邻近地区）人民发明创造的，现在内地民间流行的八孔和九孔的管子就是由此演变而成的。筚篥最初为骨制，后为竹制，其构造比较复杂，是在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簧，并吸收了笛的指孔。琵琶在我国种类繁多，古代最流行的有两种，一为秦时汉人所造的秦汉子；一为龟兹传入的琵琶和五弦。一般龟兹人把四根弦的叫琵琶；五根弦的叫五弦。有人以为琵琶和五弦是由印度或波斯传入的。作者认为，龟兹的四弦、五弦琵琶与印度、波斯的四弦、五弦的相互关系，有待继续探讨。但可初步断定，直颈的五弦琵琶是龟兹人创造的。龟兹琵琶出世时，只能以皮革、动物的筋、肠衣为弦，以后逐步发展为丝弦。所用丝弦，不外两个来源，即从内地运来和新疆自制，正如新疆人民后来吹奏的竹制笳、笛、觱篥一样，或从内地运竹在新疆制作，或在内地制成运来新疆。这从侧面说明了内地各族人民与新疆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友好交流，同时也是对祖国音乐文化的巨大贡献。这些乐器从创造、改进以至完善，我国各族人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功绩不应湮灭。

607　龟兹筚篥的流传及其艺术特色　　　霍旭初

（《新疆艺术》1984年第6期）

本文对龟兹乐器筚篥的起源、制作、流传情况及艺术特色作了较详的考证。筚篥是古龟兹创造的一种吹奏乐器，它制作简易，音乐表现力很强，一诞生就很快得到普及与流传，逐渐成为西域各地通用的乐器。筚篥是用芦苇制做，大约在公元四世纪传入中原。因其是芦苇做成，故被称为“苇管”。筚篥传入中原后，沿着两个途径发展：一是按龟兹的样式用芦苇制作，流传于市庶之间，直至晚唐才逐步消失。一是经城市艺人和宫廷的重视，改用竹子做筚篥的管身，扩大了管径，增大了音量，一直沿用至今。筚篥继续向东向南传播，又出现了木制筚篥，在我国内地流传。在朝鲜半岛和我国西南地区，有用杨树或桃树皮卷筒制作筚篥的，叫做“桃皮筚篥”；有用两只管并起来吹的“双筚篥”。唐代还有较细管径并镶银的“银字管”，以及加有涂料的“漆筚篥”等。筚篥随西域各地乐舞陆续东渐，其势力与日俱增，特别是在宫廷中影响很大。在隋唐燕乐里，与琵琶同为主要旋律乐器。至宋代，筚篥进一步发展，在宫廷中的地位更为显赫。筚篥还流传至日本、朝鲜、缅甸、越南等国，均受到重视。其所以能普及流传，原因是筚篥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功能。筚篥通过气息支撑，可以表现出圆润不断，委婉起伏的持续音。它音色深沉、浑厚、凄怆，对人们思想感情具有强烈的激发力，特别是表现悲忿、激昂情绪时有独到的功能。文章还引用了唐代诗人白居易、杜甫、刘禹锡等歌颂筚篥的诗句和涌现的吹奏筚篥的能手，并论述了筚篥在现代的发展演变情况。

608　唐代的琵琶技法　　　曹安和

（《人民音乐》1962年第7期）

琵琶是唐代音乐中的重要乐器，当时它的演奏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它在大曲中居于领奏地位，同时也用以独奏大曲。作者首先介绍了唐代杰出的琵琶演奏家段善本与康昆仑在长安市上比赛琵琶的有趣故事。段善本不仅长于演奏，而且也长于移调及作曲。他的演奏技能，“其妙入神”，“昆仑惊愕，及拜请为师”。康昆仑也是一位善翻调的琵琶名家，早被长安群众誉之为“第一手”，可见在当时已是位琵琶演奏家了。他们都为发展唐代琵琶演奏技术做出了贡献。文章还对《新唐书·礼乐志》中所记裴神符把用拨子弹琵琶改为用手弹的事进行了考证，认为中国传统的琵琶，是公元前一、二世纪产生的乐器，它是圆形、长柄，有四条弦，十二个柱，是用手弹的。这种琵琶因晋朝的阮咸善于弹奏著名，在唐代又叫做阮咸琵琶，简称阮。还有一种犁形曲颈的琵琶，是由西域龟兹传入的，又称龟兹琵琶。它在南北朝的北魏（公元439年至535年）时流行于北方；公元555年前又流传到南方。这种琵琶原来是用拨子弹奏的。由于汉唐文献记载不同，出现了琵琶演奏方法上的弹与拨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古人各自记载了他们各自的不同时期里，在他们各自所称的“琵琶”的乐器上的不同的演奏情况。两种不同的演奏方法，存在于不同来源的两种不同的琵琶系统中间。据《唐语林》中有关琵琶的记载可知：周武帝时（561至578年），五弦琵琶已经用手弹了。敦煌千佛洞的北魏壁画和隋代壁画中，无论是四弦曲颈琵琶、阮咸琵琶，或五弦琵琶，都是用手弹而不用拨子弹。由此可见，用手指弹琵琶的方法，早在汉代就随着汉琵琶的演奏技术而产生发展起来；以后龟兹琵琶传入，又逐渐被人运用到五弦和四弦曲颈琵琶上面，经过长期选择，用拨子弹奏的方法终于被用手搊弹的方法所代替。故“弃拨用手”并不是唐贞观时裴神符所首创。

609　火不思乐器考略　　　关也维

（《新疆艺术》1984年第1期）

火不思是古代北方草原许多游牧民族使用过的一种乐器。本文根据史籍文献的记载，考证了火不思的名称、起源、演变和流传等情况。火不思在汉文史籍中，有过多种不同的译名，如浑不似、胡拨四、虎拨思、琥珀词、和必斯等，都是从古突厥语Kopuz一词音译而来。古代北方的其他民族，因语支或方言的差异，出现了各种变化的称谓。如柯尔克孜语称为Komuz，哈萨克语为Kobus，蒙古语读Khobis或Hobls。据后汉刘熙《释名·释乐器》和宋俞琰《席上腐谈》记载，可知至迟在公元前一世纪时，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已使用过名为火不思的弹拨乐器。据考古鉴定，在唐代火不思还由回鹘人传至吐鲁番盆地。公元九世纪中叶以后，北方草原上的一些民族先后向西迁徙，维吾尔人逐渐舍弃了原来使用过的火不思乐器，而柯尔克孜人直到目前仍使用一种名为库木孜的弹拨乐器，保持着火不思的显著特征。至元代，火不思不仅在蒙古民间广泛流行，还用于当时统治中心大都（今北京）的宫廷乐队，又经蒙古人之手传至云南地区。公

元1253年，忽必烈远征川滇，占领丽江纳西族地区，相传当忽必烈率军离去时，曾将随军的部分乐工与乐器，赠给当地首领木土司，其中包括火不思与筚篥等乐器。现今丽江纳西族保存一种与火不思型制相同的乐器，名为色古笃，即为火不思。明、清之际，火不思不仅用于蒙古族人民的歌舞音乐，还曾在汉族北方戏曲音乐中加以应用。清朝宫廷乐队使用的火不思乐器，制作工艺精细，选材考究，是一种经过加工改革的四弦弹拨乐器。辛亥革命以后，火不思在蒙古族人民中业已失传，在汉族北方戏曲音乐中亦不复应用，只有新疆和中亚的柯尔克孜族人民中，广泛地流行着三弦的火不思（即库木孜）；云南丽江纳西族保存着四弦的火不思（即色古笃）。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对火不思进行了研制工作，使业已失传的火不思重获新生。作者还对法国伯希和认为火不思为汉代箜篌一名之源，日本村赖栲亭认为火不思即蒙古乐器的三弦等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610　汉唐间西域百戏之东渐　　　　常任侠

（《青年中国季刊》1941年第2卷第2期）

百戏者，诸杂伎艺之总称。隋以前称之百戏，隋以后谓之散乐。角抵百戏，始于六国秦时。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史记·李斯传》载二世在甘泉，作觳抵俳优之观，至汉武帝时，角抵之戏益盛。但自张骞通西域，所谓善眩之术，始入中国，颜师古《汉书·张骞传注》曰："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此为西域百戏东渐之始。《史记·大宛传》称：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既传入汉土，为当时统治者所好，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后益繁衍于世。作者根据史书记载考证，认为武帝时国家强盛，既取胡戎之乐，复纳奇幻之术，所以状异域之观瞻，扬国家之威望，游乐之盛，为前世所无。直至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因关东连年遭灾，饥寒疫疾严重，始罢角抵。然西域善眩之术既入，流传后世，支派亦复不少。自魏以来，祆教传入中国，每岁胡商祈福，除烹猪杀羊，酣歌醉舞外，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如霜雪，以刀刺腹，刀刁出于背，并仍乱扰肠肚，血流如注。嗣后，喷水念咒，平复如故，此皆西域之幻术。后印度佛教徒传道来者渐多，而奇谲诙诡之术，亦挟之俱来，《酉阳杂俎》对此记载较详。北朝时，统治者多北方少数民族，因其地接西陲，百戏特甚。隋统一后，虽令太常统一乐制，禁杂乐百戏，但炀帝统治时，好舞尚乐，每岁正月，各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以示中国之盛。至唐初，鉴于隋有失德体，首除百戏。高宗显庆时，又禁人为幻术者，中宗景龙时，曾有人上书，谏禁胡戏，不纳。嗣后，散乐杂戏之类，盛行于时。大抵散乐多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自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幻人入中国后，幻术历代有之。唐代四方之乐，大量输入，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玄宗在位，其本人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遂开梨园，以习音律。从此之后，中土重胡乐而转胡伎，华乐与胡乐融合，而有新声。音乐此时极为发达，并与百戏分离，而独立演奏。但其它诸戏，仍继续流行。当时又有泼胡乞寒之戏，盛于两京。另据《通考》所载，尚有瞋面戏、冲狭戏、

蹴鞠戏、踏球戏，藏挟伎、杂施伎、弄枪伎、蹴瓶伎、杈腰伎、飞弹伎等等。其中大多来自西域，其术流传至今者亦复不少。

总之，作者认为在隋炀帝时，百戏已登峰造极，至唐代时，诸伎分化，如音乐、戏剧，如同文学、绘画、雕塑等，各自发展，成为有唐一代之盛事、各种艺术，分途发展、而百戏亦散之于民间，流行于后世，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611 汉唐间西域传入内地的杂技艺术　　常任侠

(《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本文对中国的杂技艺术史以及汉唐间西域传入内地的杂技艺术，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证。

中国的杂技艺术，历史悠久。原始社会的角抵戏，来源于种族部落间的斗争，相传出于黄帝与蚩尤之战，这是中国最早杂技的基础。西汉时，加入各种杂技和西域幻术，称为“百戏”。隋唐改称“散乐”，即今之杂技艺术。角抵戏的文献记录，始于六国秦时，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始以黎轩善眩人至中国。据颜师古《汉书·张骞传注》说：“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此为西域杂技东渐之始。武帝时，国势盛张，既取胡戎之乐，复纳奇幻之术。所以壮异域之观瞻，扬帝国之威望。游乐之盛，前世所无。张衡《西京赋》和李尤的《平乐观赋》为研究百戏的重要资料。至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以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疫疾，始罢角抵。但西域善眩之术，即入内地，流传后世，支派分披，遍于社会。至魏晋以迄隋唐，西域幻人之入内地，时见记载。《新唐书·武平一传》载，大抵散乐杂技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幻怪之技，五花八门，本文记之甚详。魏较前汉国势颇卑，而骄奢逸乐，或且过之。晋承魏后，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视与雕文游畋之具同科。其在北朝，统治多胡戎之主，地接西域，杂技更盛。隋时，高祖始令太常散乐，并放为百姓，禁杂乐百戏。隋炀继统，弥好淫奢。其哀管新声，淫弦巧奏，皆出郸城之下。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隋代百戏杂技之盛，工巧过于已往。唐时，以为隋有失德，首除百戏，昭示所猷。然因深中时好，莫之能改。迨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又禁胡人为幻戏者。中宗景龙中，武平一上书再谏，不纳。嗣后散乐杂戏之类，更盛于时。凡十四国的乐舞，八国之伎，皆列于十部乐。玄宗在位，本人皆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教于梨园。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子弟。从自是之后，中土已重胡乐，而轻幻术，胡乐与华乐混合，而造新声。音乐舞蹈，至此与百戏杂伎分离，独立演奏，日有改进。如《霓裳羽衣曲》、《破阵曲》、《苏幕遮》、《泼胡乞寒戏》等，尤盛于唐。

作者认为散乐杂技，隋炀时达于极盛。至唐则吸收西域乐舞、四方技艺，加以融合创造，各种艺术，分途并进。如音乐、戏剧以至文学、绘画、雕塑等，各自发展，蔚成有唐一代艺术盛况。而百戏杂技，亦散之民间。今犹见之于各地。

作者1939年任教重庆中央大学时，曾写成《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略》。本

题录中已收入作者发表在《青年中国季刊》1941年2卷2期上的《汉唐间西域百戏之东渐》一文，本文实为《百戏之东渐》之继续，可一并参照阅读。

612　说汉唐间百戏中的“象舞”

——兼谈“象舞”与佛教“行像”活动及海上丝路的关系　　贾　峨

（《文物》1982年第9期）

本文通过考古材料揭示汉唐百戏中曾经存在过的“象舞”，探讨了“象舞”与当时佛事活动的关系，从而证明汉唐之际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考古材料中见于著录的汉唐时期的“象舞”图像或明器为数不少，从作者列举的“象舞”资料中得知，自公元一世纪后期至公元九世纪间，北起河北定县，南至河南南阳，东自江苏连云港一带，西至新疆吐鲁番，都曾流行过“象舞”。文献中所见汉唐间的“象舞”史料也很多。《汉书·武帝纪》云：“元狩二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应劭曰：“驯者，教能拜起周章，从人意也。”张衡在《西京赋》里追述长安平乐观百戏演出的盛况说：“大驾幸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临回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囷……”这段文字，把西汉时平乐观百戏表演的盛况写的淋离尽致。而象舞节目却排列在百戏节目出场顺序的中央部位，说明它在演出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首都洛阳与西汉长安的百戏演出盛况相比，并不逊色。李尤在《平乐观赋》中说：“方曲既设，秘戏连叙，……禽鹿六驳，白象朱首。鱼龙曼延，蝘蜓山阜，龟螭蟾蜍，挈琴舞缶。”曹魏时，模仿汉代西京时的制度，在岁首观赏巨兽，“鱼龙曼延”……。直到西晋时，江左仍然流行“巨象行乳”等节目。隋代诗人薛道衡吟咏当时的“象舞”和其它杂技表演的实况云：“杨柳百兽舞，盘跚五禽戏；狻猊奔斑足，巨象垂长鼻，青羊跪复跳，白马回旋骑。”象垂长鼻是其中引人入胜的节目。唐时，“巨象行乳”等节目仍常出现于巷头或寺庙中。汉唐间的“象舞”与佛教“行像”活动的关系，表现在佛教利用“象舞”的特殊表演形式，形象化地宣扬佛教思想。所谓“行像”就是佛教的僧侣教徒于每年四月举行盛会，庆祝释迦牟尼诞辰日（四月八日）。六牙白象负释迦的“佛像”活动，就是以大象载驮着佛教或佛牙沿街串庙，通过演出百戏的形式，向群众展出佛像。象舞是“行像”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关于佛教思想及其艺术输入中国的途径，除以长安为起点通向里海沿岸的丝绸古道外，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中西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佛教可能从朐县附近的港口输入我国北方滨海地区以后，以徐州为中心向周围扩散。佛教的“行像”活动习见于印度、克什米尔、斯里兰卡和古代的西域，当然也可从海陆两条线路输入中土。法显在于阗国、狮子国所见的“行像”活动；玄奘在屈支国（即古龟兹、今新疆库车）、印度迦摩缕波国的曲女城所见的“行像”活动等文献史料，证明汉唐之际的西域、中南半岛和东亚大陆滨海地区的佛教“行像”活动和“象舞”艺术的联系。汉唐时期是我国政治生活比较安定的年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我国人民通过海上、陆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在人类文明史上立下了丰碑。

613 民间保存的唐西凉伎　　　杨宪益

（《新中华》复刊 1946年第4卷第1期）

作者根据明代顾景星所著《蕲州志》中，关于地方社戏的记录，并结合白居易《西凉伎》一诗，而联想到西凉伎传入中国问题。西凉即今之甘肃河西一带，自秦汉至隋唐被氐族所盘据。氐族具有高度汉化，对音乐尤有天才，他们的统治势力，几度南达川滇。唐代南诏也源于南迁之氐族。在唐代，氐族的音乐，由北方之凉州和南方之南诏传入中国，对中国音乐影响极大，而且使中国文学产生了词曲。西凉乐是西域音乐与中国音乐融合而成的一种音乐。据《隋书》、《唐书》音乐志记载，隋大业时之九部乐中有西凉伎，唐武德时之九部乐有西凉伎，唐太宗时之十部乐中也有西凉伎，而且白居易诗有"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全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我国民间狮子舞，就是从域外传来，即由印度传来。我国本无狮子，关于狮子知识，都来源于印度。狮子之名，原系译音，锡兰岛原名僧伽罗（Simhala），意为狮子国，大食人又名其岛为Sielediba或Sirandib。中文狮子之名，恐不根据梵文，而根据大食人读音转译而来，因其古代大食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媒介之故。我国民间狮子舞，大概始于唐朝，恐为西凉伎流传民间而始有之。顾景星的记载，则是很好的证明。作者对顾的记载评价较高，认为不但在民俗学抑或音乐史之观点论，都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若干重要事实。一是当地社戏中神名唐明皇等来看，此西凉伎约在天宝年间带到了湖北一带，且在南方山区保存了千年以上，并有许多乐曲被保存下来，值得现代音乐家注意；二是西凉伎中所用歌曲，"非诗非词，长短成句，一唱众和，呜咽哀惋"。此可证明民间歌舞，尤其是甘肃、四川、云南之氐族歌舞，是词曲之起源。至于氐族音乐如何影响中原音乐问题，作者认为问题复杂，涉及面大，另当研究。本文仅就西凉伎传入后，对中国音乐之影响进行了初步研究，可供研究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有关人员参考。

614 康居泼寒胡戏传入中国考　　　刘铭恕

（《新亚细亚》1937年第13卷第4期）

关于古代西域传入中国之音乐戏剧及其伎乐，如拨头舞（可参见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打球(可参见罗香林所著之《唐代波罗球戏考》一文)以及胡旋舞、破阵乐等，大致都有人进行了研究，但胡伎之一的泼寒胡戏（又名乞寒胡戏）尚未有人提及，原因可能是此问题不为人们所注意，抑或材料太少。作者鉴于上述情况，特对泼寒胡戏的传入及影响，进行了考证。据《旧唐书·康国传》记载，"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泼寒胡戏源于康国，十一月天气寒冷，何以在此冷天乞寒，及水相泼？原因是康国所处之地特别干燥，而对云雨所起的一种欲望。最初，以咒术仪式出现，而后遂衍变为一种戏乐。康国在汉代已与中国交往，但乞寒胡戏之传入却较晚。究竟何时传入，还待进一步考证。

西域文明输入中国虽早，而在唐代却极盛，乃因唐代对外政策，采取积极吸收态

度。泼寒胡戏既传入中国京城，于是贵人们以乞寒为辞，大事表演，以为娱乐。第一次则是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为庆贺中宗即位而举行。《旧唐书·中宗本纪》载“乙巳，御洛阳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此即证明泼寒胡戏传入后，皇帝也登上城楼观看，则可想知在当时达官显贵们竞相提倡仿效之情。但指斥攻击者亦复不少。因此，当泼寒胡戏演毕后，便有人议论其非，“且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浑水投泥，失容斯甚！”但因帝王爱好，此戏已盛行民间。玄宗即位后，从张说之谏，明令禁止，但未能禁绝。至宋代时，似仍在表演，不过表演方式有所改变。据《司马温文公集》，有请停裸体妇人相朴为戏札子来看，此实为唐人之泼寒胡戏。何以在十月隆冬，竞要乞寒？据王延德《使高昌记》说法，是为了“压阳气去病”，如此解释，对人们多年来之怀疑终于得到解决。故作者认为此戏之出现，乃系康居人为预防冬季抗旱，发生疾疫起见，所作之一种游戏，此种游戏，毋宁说是“咒”为合理。咒的意思是祈祷云雨来临。作者还认为时至今日，民间还有此戏之遗迹可寻，即中国儿童游戏中之一种水枪战，或由泼寒胡戏脱变而来。此戏惟日本、印度有之，而在欧洲未尝见到。此戏如系西域传来，则足可证明西域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远。

615 唐代波罗球戏考 罗香林

（《暨南学报》第1卷第1期）

本文就波罗球(毬)戏之传入中国；波罗球戏之规则；唐代君臣之打球；唐代波罗球戏之分布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查隋唐以前，中国早就有蹴鞠之戏，但都以步行足踢为主，与波罗球戏以骑马杖击者截然不同。隋炀帝使裴矩出张掖，掌管西域交市。由于开贸易市场，西域商贾遂竞相来华，这样，西域文化也随之东传，不仅使中国音乐、绘画、百戏以及服饰器用受其影响，即击技游艺亦骤起变化。唐兴，百多制度，沿用隋制，西方商贾来华更趋繁盛，人民生活受西方影响更甚，其最著者，则为波罗球戏之传播。考波罗球戏，发源于波斯，其后西传君士坦丁堡，东传中亚及至新疆，复传至中国本土，然后再传至西藏、印度诸地。朝鲜、日本之有波罗球戏，系得之于中国。波罗球之得名，已难确考，但在中国史上有“破罗”、“颇罗”、“菠逻”及“波罗”诸名，均系译音之不同。波罗球之“球”，在波斯原名Gui，唐人易之为“毬”，即Gui之对音。唐以前中国各书，似不见毬字，凡毬类，皆以球或鞠称之，无称球者。由此可知，打球之戏，为隋唐之际，受西域影响而起。中国原有蹴鞠之戏，蹴鞠之鞠，与球字近音，故往往称打球为击鞠。波罗球既为一种骑马杖击之戏，此种游戏必须具备球场、球、球杖、良马，这是波罗球戏之基本工具。工具不齐备，则不足以言击球。为了工具而不立规则，比赛则无纪律，更不足以言胜负。有了工具和规则，还要有掌握熟练击球技术的人，在这些方面，作者在本文中作了详细考证。唐代上至皇室宫女及新贵之属，都喜击球，而倡导者则为太宗。太宗“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此打球之戏遍及宫内外。据作者考证，唐代皇室中，击球称著者有玄宗、宣宗，僖宗等，而玄宗球马之精，尤为当时人称道，虽吐蕃名手，也不能敌。玄宗不但嗜好球马，且尝以击球为兄弟及臣下相提倡。玄宗后，唐室诸帝嗜好击球者不胜枚举，穆

宗因打球得疾暴死，敬宗年仅十八，因击球被弑惨死，其后文宗、武宗、宣宗均喜打球，而武宗、宣宗嗜球犹酷。宣宗以后，僖宗、昭宗善击球，而僖宗犹以球术自夸。是时藩镇大员之授除，且以击球胜负定之，其荒谬之情，实属罕见。至于贵臣宠幸及宫女，其嗜击球，比之天子皇室而无逊色。唐代打球之盛，莫过于长安，天子宫城内外，均有球场，所谓三殿十六王宅，皆打球之地。此外，各郡邑藩镇所驻之地，皆盛行击球之戏，由此可知唐时击球风气之普遍。传播既广，影响至深，为当时倡导者所未能料及，其结果，祸及全国，殃及皇室。藩镇之乱，敬宗、昭宗被弑，虽不完全由击球所致，但祸乱之起，确与击球有关。

616　唐代西藏马球戏传入长安　　　　阴法鲁

（《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

本文考证了西藏马球(毬)戏传入长安的情况。在中原地区，从战国时起，就有一种踢球的游戏，称为“蹴鞠”或“蹋鞠”。这种球用皮制做，里面填着毛，游戏时以脚踢为主，有时兼用手打。唐代初年，又从西藏传来一种“波罗”球戏。这种球大小如拳头，用坚韧的木料制做成，当中挖空，外面涂成红色，有的还加上一些装饰品，故称为朱球、珠球、画球、彩球、七宝球或木球子。游戏时骑在马上用球杖打，称为打球、击球或击鞠。球杖长数尺，雕饰精美，打球的一端作弯月形。马球戏都在球场上举行，场地宽阔平滑，偶而也在比较宽敞的马路上打球。球场两端设置球门，打球入门者为胜。打球的人分为两队，骑马入场，回旋驰骋，击中一球，即得一“筹”，把筹插在球门上。隆重的马球比赛，往往用龟兹乐伴奏。到唐玄宗时，打马球的风气大盛，驸马武崇训、杨慎交甚至“洒油以筑球场”。此后许多皇帝和文臣武将都曾沉醉在这种游戏里。西安大明宫遗址曾发现一块石碑的碑文里刻有兴建马球场的记载。马球戏在内地盛行于唐、宋、元、明各代，到清代即无记载。民国年间，北洋军阀的军队中有马球队，燕京大学也举行过马球比赛，但这是从欧美传来的。许多学者认为波罗球戏源出于波斯。本文认为波斯语并无“波罗”球这个名称，也无取得球字意义的语根，波斯语球字guy大概是借用汉语的“毬”字或“鞠”字。波罗一词是从藏语的线球“波朗”演变而来的。欧洲各种语言中的马球，大都是借用的波罗这个名称。古阿拉伯语和俄语均借用英语。

附　关于“波罗球”一词的商榷　　　　若　思

（《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

本文对《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阴法鲁先生所写《唐代西藏马球戏传入长安》一文中，对于“波罗球”一词的用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波罗球”一词乃是外文Polo后来的音译，在有关唐代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只称为“打球”，“击球”或“击鞠”。马球戏在宋、金、元、明各代依旧盛行，但在文献记载中也从不称为“波罗球”。欧洲的Polo与唐代的马球尽管是同一种游戏，也可能是同一个来源，但名称上却没有什么联系。

617　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　　　　　　金维诺　李遇春

（《文物》1976年第12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第206号墓，即张雄夫妇合葬墓，清理出彩绘木俑和绢衣木俑七十多件，另外还有木马残腿、木俑手脚二百件。这些俑的形象和制作都别有特色，是值得重视的初唐文物。张雄是高昌王麹文泰时的左卫大将军、都管曹郎中，一个“入筹帷幄，出总戎机，纬武经文，职兼二柄”的人物。张雄死于贞观七年（633年，高昌延寿十年），其妻麹氏死于垂拱四年(680年)，前后相距五十五年。张雄死时的随葬品，较多地反映了高昌小王朝的典章制度，麹氏死时的明器是张怀寂为其母送葬制作的，除仪仗人马外，还有大量不常见的舞乐戏弄俑。本文专就这类墓俑作了简要探讨。这批绢衣木俑制作特殊，形象、表情、装饰都不同于常见的殉葬俑人，它不是一般藏于墓室的明器，而是“雕木为戏”的傀儡，过去的研究工作者根据文献记载，认为汉唐时期统治阶级丧葬中用傀儡表演歌舞伎乐，是当时流行的“乐丧”习俗，所以这些绢衣木俑不是单纯为了殉葬埋进墓室，而主要是送葬时炫耀于路人，用以表演的“丧家乐”。这些绢衣傀儡表现的形貌，男女老少各有差异，性格情态各有不同，明显地是装扮各种各样的角色、表现有一定故事内容的傀儡。根据形象、服饰来考察，似乎这时表演的内容已与盛唐时期的“弄参军”有一定联系。“弄参军”即“弄馆陶令”。“弄馆陶令”是嘲弄后赵石勒参军周延，因贪污官绢而下狱的滑稽戏。这些初唐时期“弄馆陶令”木偶的发现，对于了解参军戏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形象的印证实物。舞俑从服饰、容态，都可以想见是表演中原流行的乐舞，这和张怀寂的成长经历及政治态度是相同的。木偶的服饰、形象完全同于内地，题材内容也多取材于内地的传统故事。这种情况出现在边远的多民族地区，正体现了初唐的中央政府执行联合、统一政策在文化上所显示的成就。这批初唐傀儡的出土，在戏剧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否定了过去研究者认为用傀儡表演有故事、有情节的戏剧始于盛唐以后的说法，而以实物证据把这个时期提前到了初唐。

618　板桥三娘子　　　　杨宪益

（《新中华》复刊　1946年第4卷3期）

唐孙颀《幻异志》中有《板桥三娘子》的故事，这是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一段资料。故事是叙述唐代汴州西有板桥店，店主三娘子，寡居三十年，亦无亲属，然家甚殷富。元和中，有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此店投宿，夜半诸客醉卧，闻娘子屋中有悉窣声，窃窥之，见娘子从箱中取出一副耕具，并木人木牛各一，大约六、七寸，作法命木人牵牛并驾耕具，就床头一席之地耕作，木人以数粒荞麦籽种之，须臾，开花结果，并命木人收之，遂磨成粉，做饼数枚。晨起，供诸客早点，季和甚疑，未食先走，遂潜回户外窥之，见诸客食饼后，均变成驴，三娘尽驱户外，而尽没其财。据作者考证，此故事源于西方，最早记此故事是希腊的《奥迭修记》（Odysseia）史诗中的巫女竭吉（Kirke)的故事。故事记竭吉是埃雅岛巫女，能使人变猪，故事情节与《板桥三娘子》

基本相同。此故事又见于罗马阿蒲流（Apuleius）的《变形记》，记女巫潘昆累（Pamphile)使人变驴的故事，类似故事欧洲流传较多，这两个是最早最著者，清王士祯的《陇蜀余闻》，对《板桥三娘子》虽有考证，但不得要领。据《宋史·食货志》载："板桥濒海"，"商贾所聚"，"元和三年，乃置密切板桥市舶司"，由此可知，板桥在唐宋间是交通要衝。大食人由南海到中国贩卖黑奴及货物，多经此地，板桥三娘的故事，显然是大食商人经由板桥，为行人述说的故事，从而流传了下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保存下来的一段史料。

三十四

九、丝路人物

619 《西王母》新考　　库尔班·外力

（《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3期）

西王母的传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早在战国时代就有文字记载。但对西王母的研究，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百年来，其结论都不一致。为此，作者作了这一新的考证。作者批评了以往的研究者坚持西王母是地名说或是人名说。在研究方法上以往的研究没有将中国史料与外国史料作比较，中国史料记载的西王母在"昆仑丘"即今昆仑山地区，此地区应包括印度在内，因之，也必须重视印度的史料。另外，一些学者在对中国史料中出现的外国地名和人名的语言复原方面，没有坚持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因而诸多谬误。作者经过对中国传说中的西王母和印度传说中的"乌摩"（Umā）在内容方面作了比较之后，认为西王母的传说与乌摩的传说同出一源，西王母就是乌摩。作者又通过对"西王母"、"乌摩"二词的语言分析；西王母、乌摩与突厥女神乌玛衣的比较；对"昆仑丘"地理位置的考证，以及西王母与乌摩在中国和印度成为传说和载入史册的时代大致相同等情节，进行了考证。

"传说"是战国时代记载历史的一种形式。从"西王母"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代的中西交往端倪；看到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物资交流情况；也可以看出古人在对"西王母"传说的记载和整理中所表现出来的大胆的科学幻想精神。

620 张骞与西域　　张仲和

（《成大史学杂志》1930年第1卷第2期）

张骞"凿空"通西域，实为中华民族的一件伟大壮举。此举不仅沟通了中西交通，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其影响于后世，关系极大。本文对张骞出使的动机；张骞奉使年代；西域诸国之概况；张骞奉使对东西交通和文化上的影响等方面，考证较详，记载完整。汉武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为联络大月氏，张骞第一次出使大月氏，含辛茹苦，历十三年之久始返。政治目的虽未达到　却使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认识有了发展，始知中国之外，尚有富饶繁盛的西方世界。为了打开通往西方的道路，于是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有第二次奉使之举。由于张骞在大夏时，见到过由身毒传去的蜀布邛杖，因此，欲从西南方寻求通身毒之道，终莫能通，遂罢。至元狩四年（公元119年），张骞为中郎将，又第三次出使去乌孙。至乌孙后又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及诸旁国。张骞第三次出使，政治目的仍未达到，但他本人及所遣副使，皆与所使之国人具来，于是西域诸国始通于汉。张骞三次出使，政治目的均未成功，但对东西交通及文化上的影响极大。据记载，公元前五、六世纪之间，中国丝已辗转于西方，西方称中国为Serice，即丝之产地。中国与印度也有往来，张骞在大夏所见蜀布邛杖即来自身毒。在张骞之前，中西虽有辗转贸易，但非正式

交通，中西正式交通，要以张骞使西域为始。自此之后，中西交通频繁，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自汉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达到鼎盛时期。此千年间，东西人民一切往还，概以张骞所开拓的陆路为主，举凡西方宗教之东传，商业贸易之开展，绘画雕塑、音乐百戏之传入，以及中国丝绢、漆器、冶金和造纸技术之西传，莫不沿此路进行。此路历经中西人民千年的苦心经营，成为中西人民的友谊之路，即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之开拓，实始于张骞。作者在本文中，对张骞的事迹考之甚详，可供丝绸之路研究者参考。

621　张骞通西域　　　　姚　鉴

（《历史教学》1954年第10期）

张骞通西域，对发展、繁荣丝绸之路具有深远意义，史书传为佳话。本文介绍了张骞通西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经历。

西汉兴起时，北方匈奴也强大起来，攻占河西和天山北路广大地区，统辖天山南路城郭诸国，南联羌族，侵犯汉室边境，给西汉帝国造成很大威胁。汉武帝在开设河西四郡之前，想联络西域，断匈奴右臂。西域诸国不堪沉重压迫，也想摆脱匈奴统辖。因而，历史地产生了张骞通西域的壮举。月氏、乌孙原都居于敦煌、祁连之间。乌孙被月氏击败，逃奔匈奴。后匈奴大袭月氏，杀其王，迫使大部分月氏人逃往伊犁附近。此时，乌孙乘机报复，又攻月氏；月氏被迫二次逃亡，最后征服大夏，才安居下来。汉武帝听说月氏想报匈奴之仇，便派张骞率百余人，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联络，以夹击匈奴。张骞等出陇西不久便被匈奴捕捉，羁留十多年，在匈奴地娶妻生子，后伺机偕同部下逃走，过葱岭，由大宛国王护往康居，又由康居送往月氏。此时，月氏已经定国，情况变化，未能达到联盟目的，只得又去大夏，并留居一年多。返回时，鉴于出使时受匈奴捕获的灾难，想从羌地通过。但羌族也在匈奴影响之下，张骞又被捕捉。拘留一年多后，幸遇匈奴内讧，乘机和他的胡妻及堂邑父一道，于公元前126年逃回长安。汉王朝为了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招来大夏诸国，于公元前115年派张骞率三百人携带大量牛羊财帛，第二次出使西域。到乌孙后，张骞劝其王昆莫东居故土，但未达目的，于是又派副使去相邻诸国传达汉廷旨意进行外交活动。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原定任务都未完成。但因当时西域诸国商贸已较发达，中国又是东方大国，物产文化深受赞誉，所到之国，都愿与汉通好，因而开拓了“通西域”的历史任务。自此，丝绸之路大开，并日渐繁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在里海西北岸，高加索、帖木儿汗苏喇等地出土的汉代连弧文镜，镌刻的铭文，证实了中西文化交流深远，汉使远达奄蔡、黎轩诸国的史实。

622　试论张骞通西域　　　　张　戈

（《新疆史学》1979年创刊号）

内地与西域的关系由来已久，而作为官方使者前往西域却是从汉张骞开始的。汉王朝自高祖起休养生息六十年，到武帝时国富民强，其实力足以与王朝正北面的匈奴王庭

相抗，于是汉武帝以主动攻击代替了以往的和亲政策。此时，若能割断匈奴与西域诸国的联系，联合西域诸国共抗匈奴，那么击败匈奴便成为可能。本文论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背景、行走路线、所经国家，以及张骞通西域的伟大意义。公元前138年，为了联络受匈奴攻击被迫由敦煌西迁的大月氏合击匈奴，张骞第一次应募出使西域。这次出使大月氏，往返时间长达十三年之久，来去途中都曾为匈奴虏去。去时百余人，返回只两人。由于大月氏已安居乐业、不思迁返，不想与匈奴为敌，所以，张骞此行未能与大月氏盟约。为了继续在西域寻求同盟，联络原来也居住在敦煌一带的乌孙迁回故地共击匈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由于乌孙内部发生了激烈争端，这次出使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张骞随行的许多副使得以由乌孙派往西域其它国家。张骞两次出使，虽不尽如愿，但却带回了有关西域地理、物产、军事诸方面的知识，加强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乌孙的关系，打击了匈奴势力，促进了祖国统一。张骞之后，汉朝与西域道路畅通，使者、商人络绎不绝。汉朝还在西域建置使者校尉，专事屯田积粟，保护、管理通往西域的道路。内地的丝绸、纸张等物品以及凿井、冶铁、养蚕、缫丝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了西域，对西域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而葡萄、苜蓿等其它一些蔬菜果品以及皮、毡、毛织品等生活用品和夜光璧、明月珠等奢侈品，陆续传入内地，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而由西域传入内地的佛教、音乐、舞蹈及乐器也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深刻地影响了内地文化的发展。总之，由张骞开始的“丝绸之路”，不仅在当时，更重要的是在他以后漫长的年代里，都发挥了无可比拟的历史作用。

623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徐伯夫

（《新疆日报》1962年8月19日）

西汉初年，匈奴经常寇边，因汉建立不久，尚无力阻止匈奴劫掠，乃以和亲赠送财礼办法，作为缓和之计。到了西汉中叶武帝时，国势盛张，于是制定反击匈奴战略：东方切断匈奴与各族之联系，西方切断与羌族之联系，并遣使联络西域共同抗击匈奴。为实现此战略，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即派张骞随带百余人出使西域，以联络与匈奴仇深的大月氏人。但当张骞及随从甘父等途经河西走廊，为匈奴人所俘。十余年后，才伺机逃脱，继续西行，沿途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大月氏。但大月氏此时已占有原属大夏的地域多年，安居乐业，无意再返故乡与匈奴作战。张骞未达目的，遂即启程回国。在归国途中，不意又被匈奴人所俘，一年后由于匈奴内乱，才同甘父一道逃出返回长安。这次出使西域共历时十三年，曾先后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区，见闻颇广。武帝为表彰他的功绩，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封甘父为奉使君。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是为与屡遭匈奴攻打的乌孙国结盟，以切断匈奴“右臂”。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他带领随员三百多人，经过汉朝在河西设立的四郡，顺利到达乌孙。然此时适值乌孙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内乱，无暇考虑结盟问题，只派专使到汉朝答谢，遂播下发展友好关系的种子。当时张骞还派副使分道赴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地区进行政治活动，开始建立汉朝与天山南北及中亚地区的友好关

系。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长安，翌年逝世。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时十八年，对西域各国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交通路线等了解甚详，这不仅为汉朝反击匈奴提供了有利情报，而且促进了内地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相互了解与来往。《史记·大宛列传》载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曾把大批丝织品带到西域，促进了内地与西域各国人民之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他也从西域带回许多农作物种子，丰富了祖国的农业生产。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对丝绸之路的畅通，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624　西汉经营乌孙的三个女外交家——刘细君、刘解忧、冯嫽　　　杜　裔

（《女青年月刊》1946年第3卷第1期）

本文首先对西汉初年的北方形势作了简要介绍，然后将三位女外交家的活动及贡献作了叙述，汉初匈奴强盛，北方领土屡遭侵犯，甚至连开国皇帝刘邦，在白登被围七日，仅身免一死。当时因国内连年战争，民穷国虚，无力抵抗匈奴的侵扰，高帝遂采纳刘敬和亲政策。至武帝初年，汉与匈奴共进行过七次和亲，终不能解决匈奴之侵犯。武帝时代（公元前140—87年），为了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便采取了战争政策，与此同时，还运用外交方式，联络乌孙共同夹击匈奴。并采用通婚办法，先后将细君、解忧两公主嫁给乌孙昆莫。她们忍受着远离家乡，思念亲人的个人痛苦，远嫁西域，建立汉与乌孙的亲密关系，终于共同击败了匈奴。她们寻求友谊，立功异域，对汉朝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汉朝与乌孙通婚，中原文化传播到了西域。如汉武帝为了减轻细君的孤独与悲痛，每年派使节慰问，并将一些帷帐锦绣等用品带到乌孙，又如解忧为了传播汉朝文化，曾将自己的女儿送到长安，学习汉朝的音乐，从而加强了中西文化交流。冯嫽虽是解忧公主身边的侍女，却代解忧到西域各国执行和平外交使命，沟通了西域人民与乌孙，以及和汉朝的友好联系，并博得很大声誉，被我国西北各族人民称为"冯夫人"。

625　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冯嫽　　　其　平

（《新疆日报》1962年12月23日）

公元前一、二世纪，汉族与乌孙的和亲，是建立在共同抗击匈奴这一政治要求之上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是为求西域各国联盟，以夹击匈奴。张骞第二次到西域曾访问过乌孙，认为乌孙可争取作为联盟国。当时乌孙处国于伊犁河流域，"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在西域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乌孙不愿再继续作匈奴的附庸，加之"其使见汉人众富厚，"也很想依重汉朝，以对抗匈奴。基于这种原因，乌孙于公元前105年遣使到汉朝提出"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并以乌孙天马千匹作为聘礼。汉武帝允其所请，将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作为公主嫁给乌孙王猎骄靡为右夫人。汉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赠送甚盛。"细君公主在乌孙只生活了四、五年便去世了，曾生一女名少夫。细君公主去世后，汉朝又把楚王刘

戍的孙女解忧作为公主嫁给乌孙王军须靡。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生有四男三女，长男元贵靡为乌孙大昆弥（大王），次男万年为莎车王，三男大乐为左大将，四男鸱靡夭亡，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二女素光为若呼翎侯妻，以后解忧公主的孙星靡、重孙雌栗靡、孙伊秩靡曾相继为乌孙大昆弥。从其显赫家世，即可想见解忧公主对乌孙和西域政治影响之大。解忧公主在乌孙的长期活动，对乌孙和西域各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很多政治活动应归功于她的侍女冯嫽。冯嫽既懂汉文史书，又熟悉西域情况，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在解忧公主居留乌孙期间，她曾代表公主访问过天山以南各国，深得各国的敬重和信任。在乌孙国争夺王位的纠纷中，她从中斡旋，化干戈为玉帛，有效地维护了汉朝与乌孙的联盟。其后又帮助星靡治理国家。她的这种既爱汉朝，又爱乌孙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汉朝与乌孙和亲结成联盟后，在战略上形成夹击匈奴的局势，这对保障汉朝与乌孙的安全十分有利。本始三年（公元71年）汉、乌联军共同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一次大胜利。“和亲”的结果，还限制和削弱了匈奴奴隶制统治者对西域各国的侵扰，密切和扩大了在当时代表进步势力的汉朝封建文化的影响，这对乌孙与西域各国都具有巨大进步作用。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冯嫽是民族友好团结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也是先进的汉族文化的传播者。

626　段会宗在西域活动的年代背景及其评价　　刘光华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中国古代史论文辑刊1983年1月）

段会宗字子松，西汉天水郡上邽（今甘肃天水）人。《汉书·段会宗传》载，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段氏以杜陵会被五府荐举为西域都护，此后二十年中，他两为西域都护，并四次专使乌孙，后以75岁高龄死于乌孙。本文考订了段会宗在西域活动的年代、背景及评价。作者研究了《汉书·段会宗传》、及《陈汤传》《西域传》等史籍关于段氏第一、二次都护之出任年代和任期；第一至四次专使乌孙之年代、事迹后，认为明确断定段氏四使之具体年代有困难。于是引用了间接资料和以逻辑方法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段会宗传》记载：“西域诸国上书愿得会宗，阳朔中复为都护。会宗为人好大节，矜功名，与谷永相友善。谷永闵其老复远出，予书戒曰……。”对这段话作者进行了分析考证，主张将段氏第四次专使之年从元延二年（前11年）向后展延一年，即暂定在元延三年，而其死年暂定为元延四年，其生年从元延四年上推七十五年，是为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这样，段氏再为都护之阳朔三年为六十二岁，与谷永之说也相吻合。依据上面考订年代，段氏在西域活动之系年应为：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第一次出任西域都护。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第二次出任西域都护。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段氏离都护任。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第一次专使乌孙。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第二次专使乌孙。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第三次专使乌孙。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第四次专使乌孙。元延四年（前9年），会宗病死乌孙，享年75岁。在考订会宗在西域活动年代的过程中，作者引证了许多乌孙内部斗争的史实，其中有小昆弥部内部为争夺小昆弥位置的斗争，也有小昆弥和大昆弥间的斗争。从甘露元年(前53年)汉廷册封两昆弥到竟宁元年，乌孙内部尚能平安无事；然而

从章宁中段会宗为都护开始，乌孙内部便频繁地发生内争。这时北面的康居，对乌孙事务又伺机插手，使内争更加严重、扩大。段会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次去乌孙，处理其内部斗争的。作者认为，段会宗是汉廷一位很受西域诸国欢迎的边疆大吏。西域人民对他的尊敬、爱戴，在西域都护中实属罕见。在我国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中，"内诸夏而外夷狄"的陈旧观念占据统治地位，但也有一些有识的高级官员，对"夷狄""待之以诚，喻之以礼"。段会宗就是这样的一位边疆大吏，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做出了贡献。班固专门为之立传，详叙其事迹，使他的光辉业绩留芳后世。

627 班超与西域 秦卫星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1期）

本文着重对班超在西域成功的原因和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以求对其有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班超的西域活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在西域的功业，主要在于断匈奴右臂，恢复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使中断数十年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班超在西域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作者认为主要是西汉末年匈奴再次入侵西域，西域人民遭到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残暴统治。而西域人民没有忘记和中原人民的友好关系，他们怀念昔日都护统治下的安定生活，希望摆脱匈奴贵族的残虐统治。这种政治上的向心力，远远超出了军事方面的力量，这是班超在西域能够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当然也与他个人杰出的政治、军事、外交才能，以及他那顽强的民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是分不开的。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在中西关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通西域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联合西域各国赶走匈奴，使西域人民摆脱了匈奴贵族的残暴统治，创造出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推动了西域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二、扩大东汉的疆域，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治。当时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中国的政治力量向西扩展，竟远达帕米尔地方以外。三、打通中西交通的孔道，保证了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整个东汉一代，西域所谓"三通三绝"，其中两次是由于班超的积极活动而打通的。通西域，无疑给中西双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巨大的推动，但最主要的是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因而班超通西域的历史意义就更为重大。四、为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班超在西域三十年，安抚各族人民，和西域人民友好相处。在这种友好的关系之下，相互的交往从内容到形式都日益丰富。各民族间的同化，改变着民族的血统，促进着民族间的大团结。班超把自己毕生的经力和才华都献给了西域，献给了西域人民，对西域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

628 班超投笔护西域 刘维钧

（《新疆日报》1981年1月18日）

班超（公元32—102年）东汉扶风人，其父班彪一生搜集史料，志在续写《汉书》，

但事未竟而早故。其兄班固在京为校书郎，官微职小，收入有限。超为帮兄养母，遂代为缮写。一日，掷笔慨叹曰："大丈夫应如付介子、张骞志在边疆，创业立功，岂能终老笔墨之中。"乃毅然"投笔从戎。"当时西域各国遭匈奴压迫，纷纷遣使东汉，要求出兵保护。汉明帝遂派奉车都尉窦固率兵西征。班超于此时参军任该军假司马，不久因立战功为窦固所器重，乃派他偕同从事官郭恂到西域去办外交。他两率壮士三十六人出关，先到鄯善国（今若羌县）。初，国王招待甚周，未几，忽而冷淡。班超与部下分析原因，认为是匈奴来人离间之故，即诈问侍者，果然不出所料。乃同部下商议对策，众皆曰："愿听尊命，"班超断然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商定于夜间偷袭匈奴使臣营帐。是夜天黑风大，人们都已入睡，班超带领随从三十六人，潜入敌营附近，顺风纵火，擂鼓呐喊，匈奴人不知虚实，不敢应战，即被全歼。鄯善王乃解后顾之忧。事后，窦固将此事奏明朝廷，不久皇帝下诏，任命班超为行军司马驻守西域。班超来到西域，正值匈奴人唆使于阗王攻破莎车，在附近一带称雄霸道。于阗王崇信巫神，国王有事必先请巫师求神问卜。这次班超到来，又请巫师卜问吉凶祸福。巫师受匈奴贿赂，借机装神弄鬼，要国王杀掉班超的坐骑祭祀他，才能消灾免祸。班超洞察其奸，而让巫师亲来牵马。等巫师到来，班超遂杀了巫师，并提头来见国王，当场揭穿了匈奴阴谋。于阗王大悟，乃杀匈奴使臣，和汉朝重归于好。于阗国安定之后，龟兹国王仗匈奴之势，杀掉疏勒国王，立龟兹人兜题为国王。班超了解其情，即赶赴疏勒国附近，先派随从田虑劝降，并授意田虑，如不肯降即缚国王。田虑见到兜题，兜题因田未带兵而轻之，田却乘其不备而缚之，左右大臣皆惊逃。班超闻讯立即赶到，召集疏勒文臣武将说明来意，并仍立旧王室人为王。班超和西域人民共处三十一年，因其机智勇敢，解决了西域诸国矛盾，共同抗击匈奴侵扰，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做出了杰出贡献。

629　班超对中西交通的贡献　　　　　　　　莫任南

（《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本文针对西方史学家误用中国文献，曲解史实，对班超出使西域，重新打通塔里木盆地南北"丝道"，发展对外关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功绩，所做的歪曲，展开了批判，并对班超在西域的功绩给予了正确的评价。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匈奴侵扰西域，"丝绸之路"被切断，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止，东汉明帝末年，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于是又开始了反击匈奴的战斗。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执行断匈奴右臂任务。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初步完成了这一任务，基本扫清了匈奴在南道的势力，恢复了中断五十余年的汉与西域交通。嗣后班超留居西域，以疏勒为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继续联合各个地区和部落的各种力量对匈奴残余势力和叛军开展了争夺战。自建初三年至元和四年（公元78——87年），班超配合汉军不断清扫南道匈奴残余，使南道畅通。永元元年至永元六年（公元89——94年），班超又一次配合汉军拔除了匈奴在北道的据点，"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北道从此也畅通无阻。

在反击匈奴错综复杂的斗争中，班超对西域都护府管辖外的西方各国，始终奉行和平友好方针，以争取它们的支持，共同推进中外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班超经营西域数十年，其兵马从未逾越葱岭侵犯邻国领土，也不曾干涉西域都护府管辖外的各国内政。但西方学者说班超曾“征服”花拉子模、并用武力使贵霜，“臣服”是没有根据的。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对于建初六年(公元81年)班超在发疏勒、于阗兵进击莎车的战争中，劝说康居罢兵事的误解而造成的。另外，西方学者对永元二年（公元90年）班超击退月氏七万大军的侵扰，战后月氏复与汉友好如初，“岁奉贡献”，便认定班超用武力使贵霜“臣服”，更是荒谬。这种“贡献”，与战后月氏向汉“贡奉珍宝、符拔、师子”中的“贡奉”是同样含义，都是指贸易而言。古代中国各王朝同域外各国的友好贸易，都是在“贡献”、“贡奉”、“赐赠”等名义下进行的。正是由于班超经营西域时执行了一套成功的政治、外交活动政策，联合西域各地区和部落，驱逐了匈奴，打通了“丝路”，才使条支、安息、月氏、天竺、蒙奇，兜勒等国纷纷来汉，进行频繁的贸易交换与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这种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作用。在这人类的进步事业中，班超有其重要的贡献。

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是一次和平、友好、非军事的探险活动，并非以武力对付大秦。甘英出使虽莫能抵达大秦，但其重大历史意义不能湮没。首先，“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现甘英首次到达条支，把张骞的探险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招来象条支，蒙奇、兜勒一类过去未曾接交过的远方国家，扩大了国际交流。其次，甘英所经过的地方，象阿蛮国，斯宾国、于罗国等是前汉没有走过的地方。他的所见所闻极大的丰富了汉人对西方风土人情、社会制度，及其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为班勇作《西域记》及范晔写《后汉书·西域传》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使之成为今天我们研究西方国家历史的重要文献。总之在中亚历史上，班超的活动是非常精彩的一幕，班超也是最值得肯定的人物之一。

630　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　　徐伯夫

（《新疆日报》1962年8月26日）

西汉中叶以后，对西域的统治大大削弱，特别是王莽篡汉后，作出了断绝西域的错误主张，于是造成匈奴再次侵犯西域的机会。西域人民在“敛税重刻（苛），诸国不堪命”的情况下。盼望得到汉朝的保护。东汉中兴，鄯善、车师前王、焉耆等十八国曾派人到汉朝请设都护，但因东汉政权建立不久，无力对付匈奴，未获允许。到明帝时，条件成熟。东汉与西域各国都有联合共同抗击匈奴之要求，遂决心出击北匈奴。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东汉派遣窦固，耿忠率兵向天山东麓进军。同时派班超到西域进行政治活动，以配合军事行动。

班超扶风平陵人，少有大志，博览群书，长于辩才。永平五年（公元62年)，其兄班固为校书郎，即随母同到洛阳，那时，匈奴经常犯边，班超乃“投笔从戎”，在窦固军中为假司马。因屡立战功，窦固颇为赏识，就派他到西域进行联络各国共同抗击匈奴的活动。班超到西域时，只率有随从人员三十六人，但由于他的机智勇敢，首到鄯善国，就

以三十六人灭强敌匈奴百人的战功，使鄯善摆脱匈奴的奴役；继到于阗，又智斩巫师，使于阗和汉朝重归于好。其后，班超又在疏勒仗义废黜龟兹人立的国王兜题，另立被龟兹人杀害的故王的侄儿忠为疏勒王，深得疏勒国人的拥护。由于班超在西域的活动和东汉军攻击匈奴取得的胜利，到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西域大部地区脱离匈奴统治，于是东汉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及戊己校尉府。但匈奴并不甘心失败，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攻陷戊己校尉府。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东汉政府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等国兵，击败匈奴围军。但在这次战役中，因中原连年遭灾，政治上、财力上都感困难，即决定撤走都护及戊己校尉，并诏班超回洛阳。然而，这时匈奴已占据了天山以北和山南北道广大地区，切断疏勒通往内地之路，使班超孤立于包围圈中。班超在此情况下，于建初三年（公元78年）率疏勒、拘弥、于阗等国兵一万人，攻败役属匈奴的姑墨石城，解除匈奴威胁。建初五年（公元80年），东汉章帝采纳班超建议，派兵增援班超，逐渐削弱匈奴势力。公元89年，匈奴被窦宪打败西迁。永元三年，（公元91年），东汉政府又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府，任命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班超自明帝年间出使西域，到和帝时已三十多年，年近七十，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遂告老，返回洛阳，不久则病逝。班超回朝后，继任人选不当，加以东汉政治日趋腐败。至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派班超之子班雄和班勇率兵迎接西域都护和吏卒回朝后，西域又陷入匈奴统治。十多年后，东汉安帝采纳敦煌太守张珰建议，又派班勇出击西域。从延光三年到永建元年（公元124～126年），班勇先后联合龟兹、鄯善、疏勒兵击败匈奴。永建二年，在攻焉耆之役中，班勇以失期晚到罪名征还下狱，后死于家中。班勇一生大部时间在西域度过，他将所见所闻写成《西域记》一书，对西域地理环境、物产、风俗、各国政治制度都有详细记载，范晔著《后汉书》时将其收入《西域传》内，是研究古代西域的珍贵史料。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几十年的活动，击败了北匈奴，使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奴隶制统治；恢复了中西交通，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使西域成为东汉帝国的组成部分。他们为增强各民族的团结和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31　班勇生平考　　　柳用能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78年第2期）

东汉班超以其经营西域的卓著功绩而名垂青史。他的儿子班勇，继承父业，是东汉"扞抚西域"的建策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本文基于这种观点，利用各方面的史料，尽可能详尽地考证了班勇的生平。班勇是班超最小的儿子，出生于疏勒，时值公元82年前后。他的母亲，是班超驻守疏勒后娶的夫人，按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位少数民族姑娘很可能是疏勒王的亲属。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晋升为西域都护，代表东汉政府总管天山南北、葱岭东西"五十五国"的军政事务。都护府治龟兹，班勇也因此跟随父亲来到龟兹。直到公元101年，班勇才得以跟随安息进贡使臣第一次入关。这时班勇，年已二十余岁。次年（公元102年），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返抵京城洛阳。数年以后，由于继任都护施政严苛，造成"西域反叛"，班勇以军司马营救都护任尚回朝。这时班超

已故，抗御匈奴，“扞抚西域”，维护统一的责任自然落在了壮志未酬而又年富力强的班勇身上，班勇主张，恢复敦煌驻军，恢复西域副校尉，派西域长史带兵进屯楼兰，防御匈奴，保护交通，但因当时东汉势弱，此主张并未付诸行动。直到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政府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重返西域。西域长史，事实上就是当时西域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班勇归来，立即展开政治、军事和经济诸方面的工作，首先，重奖带头归服东汉的鄯善，说服龟兹、姑墨、温宿归服，收复吐鲁番，从而控制了天山东部的战略要地，为进一步解决西域问题打下了基。础其次，屯田积谷，扩充军储，大破车师后王军，接着又解决了东且弥问题，使天山东北一带复归东汉。然后于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冬进讨北匈奴，呼衍王大败，次年，进讨焉耆，使焉耆降归。班勇回到西域，前后仅用四年时间就解决了举朝棘手、公卿无策的北匈奴和天山南北问题，使西域复归东汉统辖，“丝绸之路”也由此通达无阻。班勇“扞抚西域”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代表和反映了西域各民族和汉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当然也不能低估他个人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和所起的主导作用。他生长在西域，熟悉西域的山川地理和民情，他热爱西域，自幼与各族人民呼吸与共，对解决匈奴和西域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符合历史规律的指导思想。因此，在东汉国势已日趋衰败的情况下，得以顺利地完成抗击匈奴，保卫西域的事业。然而，班勇却因此获罪，身陷牢笼。后虽免于服刑，但终生不获任用，老死内地。班勇曾著有《西域记》一书，已佚亡。其中有关西域各地情况的部分，经范晔整理补充，编入《后汉书·西域传》，成为研究西域史地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

632 甘英出使大秦考 龚骏

（《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8期）

《后汉书·西域传》对甘英西使行经之国家，记载不仅简略，且相互交错叙述，致使后世读者难于辨清。本文作者根据有关记载，首先析出甘英出使大秦之往返路线及所经国家，其中关于条支的解说，后世人们争论较大，归纳起来共有六种之多。各家其所以有分歧，显然是对西海的解释不同而引起。认为西海即地中海者有之，波斯湾者有之，黑海者亦有之，但作者认为条支当在波斯湾上之说最为有力。条支为安息所属小国，甘英使大秦至条支，因安息西界船人劝阻，未能达其目的，于是对大秦的传说及其位置，遂众说纷纭，而大秦即罗马之说则较可靠。

作者认为大秦之名，来源于达西亚或达谢之转音。因达西亚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至成帝间），在欧洲已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国势较罗马为强，直至公元二世初（东汉和帝末年），为罗马所灭，仍名达西亚。当西汉宣帝时期，中国、安息、罗马成为欧、亚三大强国。安息建国四百余年的历史中，恰是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罗马鼎盛时期。安息又处在两大帝国之间，自然成为中西交通之要冲，且其国人颇长于外国语，又善经商，政治态度和人民信仰完全自由。当时中国输往西方之丝绢，在罗马市场上，其价之贵与黄金相比重。故安息商人垄断了中国丝绢贸易，从中梗阻，不让中国商贾直接将丝绢运销罗马市场。甘英在西海受船人劝阻的原因，也出于此，因而中国输往罗马之丝绢等物，

均以安息东界之木鹿城为集散地。

甘英于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出使大秦，所经条支、安息等国，往留时间多久，史无记载，但往来行程（假定从焉耆出发再回到焉耆）约三万八千里左右，路上所需时日，约需十个月之久，所以甘英返回可能是永元十一年，因为在永元十二年班超上疏时有“仅遣子勇，随献物入塞”之语。所谓献物，则为安息所献之狮子等。

张骞通西域被称为我国历史上“凿空”事业，甘英通安息，是继张骞之后的又一壮举，前者开拓了西域交通，后者完善了西域路线，故此二人对丝绸之路开拓、形成的贡献殊大。对他们事迹的研究了解，实为治丝路之学应注意的问题。

633 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及其贡献 莫任南

（《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

东汉甘英是继西汉张骞之后，中西交通史上的另一个杰出人物。他奉班超之命出使大秦，梯山渡河，深入西方数万里，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本文就甘英出使大秦的目的、路线及其成就作了专门研究，旨在弄清历史事实，并对甘英出使作出了正确的评价。班超为什么要派甘英去大秦？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分析东汉政治军事形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汉自张骞“凿空”以来，中外使者商旅沿“丝绸之路”，往来极为频繁。可是自王莽篡权后，北匈奴乘机役属西域，“遮杀”行旅。“丝绸之路”被严重破坏，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断。班超使西域，企图重新打通南、北“丝道”，恢复中西交通，这是东汉社会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章和元年（公元87年）班超攻下莎车，把“南道”打通；永元六年（公元94年）又攻下焉耆、尉犁、危须，打通了“北道”。于是中西使者商旅又可相互往还。在这种情况下，班超为了打破安息对丝路的垄断，探寻直接同大秦贸易的商道，并宣扬汉威，招来外域使臣，于是选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无明确记载，作者掇拾《后汉书·西域传》各段所记，大体上勾划如下：甘英自龟兹它乾城奉命出发，经疏勒、莎车、西入葱岭，过蒲犁、无雷至大月氏，再西出木鹿、和椟、阿蛮国、斯宾国，抵达条支的于罗，面临波斯湾，无法渡海。归来路线自条支东行，经乌弋山离、罽宾、悬度、乌秅、皮山至龟兹它乾城报命。文中附有甘英出使大秦路线示意图。甘英于永元九年（公元97年）出发，按照自皮山“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推算，往返时间当在一年以上，加上在西方各地停留时间，约近两年。他大概在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自皮山回至它乾城。甘英从波斯湾折返，为什么不继续前去大秦呢？作者批驳了几种不正确的说法后指出：甘英不能渡海，乃因受到安息阻梗，得不到海上航行设备和船人支持所致。那么为什么不舍弃海道取陆路前去呢？作者认为同样是由于安息人的阻梗。甘英虽未能到达大秦，但他并非“无结果而还”。他取得的成就，大致有三：一是把张骞的探险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二是扩大了国际交往，推进了中西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三是增加了东汉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进一步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甘英无著作传世，他出使回来时的报道，通过范晔作的《后汉书·西域传》和班超之子班勇的《西域记》而流传下来。这是中西交通史上很可庆幸的事。甘英出使大秦，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和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值得后世永远纪念。

634　氐人吕光和他的后凉政权　　　齐陈骏　郭　锋

（《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

十六国时期，在丝绸之路的要道河西走廊，继前凉、前秦之后，氐族吕光建立了后凉政权，统治河西十八年（公元386——403年）。本文探讨了吕光立国的始末、政策的得失和历史作用等问题，对了解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情况有一定帮助。在吕光建立后凉政权以前，河西曾被前凉统治七十六年。以后前凉被关中的前秦所灭，河西被前秦苻坚统治十年。公元383年，在淝水之战中，苻坚失败，前秦随之土崩瓦解。吕光是苻坚的大将，奉命带领七万五千人从长安出发西征西域，使西域三十余国降伏。当他带兵东返行至高昌时，得知苻坚已在淝水战败，国内纷乱，便打起"赴难"的旗号急忙东进，至玉门到达酒泉、打败凉州刺史梁熙军队的抵抗，进入姑臧。以后又凭籍军事力量，经过三年的东征西讨，镇压了各处的反抗，占领了河西地区，建立了后凉政权。这个政权主要是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由于吕光及其继承者只相信军事镇压的力量，不重视政治、经济的作用，搞得内部人心离散，战乱不断，生产破坏　百姓流离，后凉政权也很快灭亡。文章详细分析了后凉灭亡的原因：一是政治上不能团结内部，而采用严刑重宪的手段进行统治，失去了河西士族和人民的支持；二是不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只知收掠已有粮食，破坏了河西的农业，造成经济上的极大困难；三是不重视文化，杀戳凉州名士，不敢任用前凉留下的士人，却信任那些胡言乱语的术士。不重视儒学和佛学，使后凉政权成为一个愚昧落后、野蛮残暴的统治机构，遭到人民的唾弃。总计后凉共历三主、十八年，与前凉、西凉、北凉相比，是有国最短的一个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河西地区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经济、文化遭到破坏，人民大量死亡，离散。因此文章认为：后凉政权的统治，是河西历史的一次倒退。

635　裴矩功过述评　　　齐陈骏

（《敦煌学辑刊》1983年创刊号）

舞剧《丝路花雨》中的二十七国盛大交易会，取材于隋代历史。此次盛会，虽是隋炀帝主持，实由裴矩组织。裴矩在隋文帝时，在平定岭南叛乱，促使东突厥内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他的主要活动，还在于加强隋王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关系。隋对西域的经营，是从大业初年炀帝命裴矩至张掖主持与诸胡交市时开始的。裴矩利用与胡商接近之便，了解了西域各国山川险阻，风俗人情，撰写了《西域图记》三卷。此书虽已佚亡，但从序言中可以看出，裴矩记录了当时通西域的北道、中道、南道三条道路，阐明了伊吾、高昌、鄯善并为西域门户　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的道理，是我国最早最系统的丝绸之路通道的记载。另外，此书还分析了西域形势，提出经营西域的方略。认为西域各国早就愿意交好中原王朝，只是由于吐谷浑、西突厥阻挠，"故朝贡不通"。主张派遣使臣，交好西域各国，然后运用西域各国的力量，共同歼灭吐谷浑和西突厥在西域的势力。在实施这一方略中，裴矩出使高昌铁勒，败吐谷浑，出奇兵占伊吾后，在汉伊吾城东又建新伊吾，成为隋唐时期丝绸路上一个重要城市。接着又运用一系列外交手段，最

终瓦解西突厥，开通了西域。

裴矩以善于外交著称，为官也较清廉。所以《隋书》称："学涉经史，颇有干局，……与闻政事，多历年岁，虽处危难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但他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他身上必然存在着一些历史上统治阶级所特有的弊病。为了取悦于君主，保住爵位，不顾人民死活，为了夸耀隋的强盛，奢侈浪费，矫饰夸张，加重了人民负担。如在二十七国交易会后，又在洛阳举行了一次更大的集会，进行了更大的挥霍。特别是隋炀帝统治后期，迎合炀帝贪得无厌、好大喜功的要求，在突厥内附后，裴矩又提出利用东突厥的力量胁迫高丽入贡的计略，引起炀帝接连发动侵略高丽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

我国历代史家对裴矩的评价不一。总的说，隋唐评价尚好，到宋以后，将他看成一个大奸臣。原因是宋自立国，国内战争连绵不断，所以主张让外先得安内，对周边侵掠采取妥协投降政策。裴矩受到严厉贬责，当和宋时这一情况相关。

636　王玄策使印度及其勋业　　郑师许

（《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19期）

王玄策在唐初是中印关系史上颇有建树的一位外交家，曾三次出使印度。当他在第二次出使印度时，适值印度国内发生叛乱，他曾向吐蕃、泥波罗借兵，平息了印度的内乱，为安定印度国内政治，做出了显著贡献，其勋业堪与班定远相媲美。但两《唐书》均未立传，故其业迹鲜为后世人所知。王玄策出使印度所经路线，与法显，玄奘诸人不同，不走天山南北通道，而直接经由吐蕃、泥波罗，以抵达中印度。盖因当时吐蕃王弃宗弄赞尚唐文成公主，与唐交亲，关系密切，故玄策选择由吐蕃直径印度的路线。查王玄策三次奉使印度，曾撰有《中天竺行记》十卷，惜其书久失，而名亦不传，但在高宗总章年间，道世纂《法苑珠林》时，曾引用了二十一条，致使后代研究者有所依据。据其所引，或名《王玄策行传》，或名《西国行传》，或名《西域行传》，均似《中天竺行记》之残文。早在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成书的《西域志》，亦名《西国志》，共六十卷，其中有图四十卷，乃取材于王玄策和玄奘游记诸书，此书中的材料，亦散见于《法苑珠林》中。

关于王玄策事迹的研究，近代学者颇多注意，认为王玄策的功绩，较之班超、甘英有过之而无不及。法显、玄奘游历印度事迹，诸史均多记载，为后世人们称颂不已，惟玄策事迹诸史都罕道之，岂不异哉！似此在外交上建立奇功，沟通中印交通，并为中印友谊建立勋业之人物，不予立传，不为后世人们所知，岂非一大憾事？本文在这方面作了较细的研究，对研究中印关系和正确认识王玄策的贡献及勋业，有所启示。

637　唐五代瓜州张曹两世家考

——《补唐书张义潮传》订补　　姜亮夫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

唐五代的瓜、沙州，即唐天宝、至德年间改称的敦煌郡。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是两汉隋唐时"丝绸之路"的门户。张、曹世守河西，自唐至宋，历世朝贡，其保卫边

防之功、影响一方文化风习者甚大。且敦煌是佛教圣地，而两氏对佛教艺术的造就最为宏伟。上虞罗叔言著《补唐书张议潮传》与《瓜沙曹氏年表》，有功于史学为众所周知。然敦煌所出卷子，有关张、曹两家者甚多，莫高窟题名尤为第一手资料，罗氏多不得见。本文是作者根据罗氏所著，重订其事迹，是者证之，缺者补之，误者订之。且引证壁画、绢幡及请功德之有关佛教艺事的记载，对张、曹两氏的家世纪录甚详，是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现将张氏世系的考订材料予以介绍。

唐天宝末，吐蕃乘安史之乱，攻陷凉.陇诸州，建中二年（781年）又陷沙州。大中二年（848年）为张议潮收复。文章在概述唐五代有关瓜州材料后，又根据各史籍所载，特别是敦煌出土文书及敦煌壁画题记，对张氏世系从新做了补证，对前人所补"张议潮"传失误之处又予考订。就张议潮的名字、籍贯等，各史书记载互有差异。如《五代史·吐蕃传》曾有"吐蕃人陷凉州，张掖人张议潮募兵击走吐蕃"的记载，则当时有以议潮为张掖人者。按《五代史记·吐蕃传》、《东都事略》所记其名为"议潮"，《旧唐书·宣宗、懿宗纪》、《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作"义潮"，《李氏再修功德记》石本及敦煌写本，亦作"义潮"。大中五年《赐沙州僧政洪䛒敕》、杜牧撰《沙州使吴安正等授官制》、《通鉴考异》引《补国史》又作"议潮"。按敦煌题识，皆作"议潮"则"议潮"之名为是。至"义潮"等名则远传闻失实。查敦煌有一卷子，凡存文三段，第三段为无名歌，末尾题"未年三月二十五日学生张议潮写。"在斯坦因盗去的敦煌卷子中，编号S6973卷载，议潮卒时年七十四。议潮卒于咸通十三年（872年）壬辰，则生于贞元十五年(799年)己卯，时沙州已陷于吐蕃，故不再奉唐正朔，于是称年不冠年号，但言甲子。由此可知议潮生后的第一未年为贞元十九年，议潮才只四岁，不可能抄写此文件，第二未年为元和十年（815年）乙未，议潮年已十四，正附寺观为学生时，所以此卷抄写时，议潮为学生时最为有据。沙州自汉以来为西陲重镇，汉家经营不遗余力。张、索均系望族，其先人或多为汉之将校士卒，或仕于边防之官吏无疑。所以《通鉴》以为议潮为沙州人者较为可信，故多从之。关于张议潮收复瓜沙年代问题，罗叔言先生则列于大中四年，但据S3329卷记载："敦煌晋昌收复已讫，当时大中二载。题表修笺，纡道驰函。"则议潮收复年代当在大中二年。又据S3329卷于"纡道驰函上达天闻"有注云："既破吐蕃，大中二年，遂尽押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已献天子，上达天闻。"由此证明议潮收复瓜、沙为大中二年无疑。文中除对张议潮生平事迹详予补订外，还对张怀深、张承奉、索勋等人事迹均予一一补订。通过本文不仅对张氏世系及其保障边疆之功进一步有所了解，同时也对当时敦煌及河西地区的民族关系进一步加深了认识。

638 瓜沙曹氏世谱 姜亮夫

（《浙江学刊》1983年第1期）

本文作者认为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末附《谯郡曹氏世系表》，列议金三世及宗寿一系二世，简略无可取，且讹误时见。《五代史》、《宋史》皆简略不尽，为习西北史地者之一大憾事。然曹氏之守瓜州，祖孙父子叔侄兄弟 皆参与期间，而议金祖孙又

多与回鹘、于阗通婚，则其家世与当时各民族政权关系之密切可知。经作者详考莫高、榆林诸石窟寺题识及敦煌卷子中之文书题跋，考察了瓜沙曹氏世谱，从中可了解曹氏统治方术之一端。曹议金事迹，已详于作者所著《莫高窟年表》，其勋爵职守之见正史者，亦已备于表中。而本文全部资料均为题识，无一得之正史。曹之勋爵职守结衔，石窟题名有三处，其中有为中朝所授，有为地方自称。议金凡三（四）妻，在六十二窟、九十八窟的壁画和题名中均有所见，有李氏、索氏、宋氏。从画像服饰看，李氏为回鹘人。画像中还有一姓氏不详者，其服饰为中国装。按S1177卷抄写《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女弟子太夫人张氏”，依其称谓，在光化三年，已尊享荣禄，称太夫人，恐非议金妻莫属。再从张议潮当时之地位看，作者疑议金为张氏女夫。关于议金四妻所生子女及其生平，作者在研究了六十一窟、九十八窟的供养人像及提衔后列有一表记之：张氏，生一男，名元端（早死），无女。李氏生二女一男，长女嫁甘州圣天可汗，生有两女；次女嫁于阗国王，生有一女，归议金孙元忠子延禄。男为元德，生子延恭。索氏生一男，即元深，娶一媳，为樵县夫人。宋氏生四女一男，长归翟氏、次归阴氏、三归□氏、四归翟氏；一男，即元忠，生女延鼎，归慕容氏；子延禄、延瑞。接着作者又对议金诸子及孙辈的职位，家室等，通过对榆林第十窟、文研所一〇八窟、六十一窟、二四四窟、五十五窟、四五四窟、四二七窟、四三七窟、榆林二十六窟、十二窟等供养人像、题衔、题名的分析研究，作了详细考释。曹元德，议金长子，嗣议金为归义军节度，当为议金第二妻回鹘李氏所生。又嗣元忠之延恭称元忠为叔父，当为元德之子。元德妻索氏见于议金夫妇出行图，可能为议金第三妻索氏之侄女。曹元深为议金次子，嗣兄元德为节度。考敦煌、榆林诸窟供养人像列，元深不仅有勋衔，而且有妻室，惟去世早，后嗣不昌，遂无可考。元深为议金第三妻索氏所生。曹元忠嗣元深为节度，元忠为议金第四次子，乃宋氏所生。元忠妻翟氏，亦敦煌望姓，曹延恭嗣元忠主沙州归义军，延恭为元德子，为元忠侄，延恭妻为慕容氏。曹延禄嗣延恭为节度使。延禄为元忠长子，其妻为于阗公主，乃议金次女为于阗皇后所生之第三女，与延禄为中表。曹延晟不知为元字辈或人之子，乾德四年为归军节度监军，太平兴国五年，宋朝以延晟为瓜州刺史。曹延瑞当为延禄弟，为节度副使守瓜州团练使。此外，本文对议金外孙、外孙女，以及议金之兄曹乙及其妻室等的关系均有详记。

639 谈与瓜州曹氏世谱有关的几个问题　　孙修身

（《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第5期）

瓜沙曹氏自后梁乾化四年（公元914年）代张氏统有瓜沙后，到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结束其统治，历时一百二十余年。对曹氏一门统治时期历史的研究，近年有不少新作问世。本文是对姜亮夫先生《瓜沙曹氏世谱》一文中所提问题的商榷意见。关于曹议金代张氏之因，有如下两说，其一是王重民先生之说：盖奉自为狄银所败，臣服敌国，国民之爱戴既失，政权亦渐转移于长史曹议金手。奉卒后，州人遂推曹议金为帅。……”其二是姜亮夫先生之说：“张议潮为瓜沙大姓，人才辈出，即在（张）承奉前后，如张景球、张禄、张大庆等，皆一时名宿。而议金乃得为长

史，继且主一州政权，此张氏诸婿之所为也。”作者在对张、曹双方情况作了研究后认为：由于张承奉割地称王，同回鹘作战“败北”，“父子之国”关系的确立，和由此而招来的国内州镇不全，人们的怨恨等等，西汉金山国这个割据小王朝，已为人们所唾弃，其被代替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另一方的曹氏，则是刚刚兴起，握有重兵，外结四邻，内修政治，持法公允，轻徭薄赋，团结当地世家大族，受到各阶层人们的拥护，所以他的代张也成为势之必然。更兼甘州回鹘在败张承奉后，在金山国扶植亲己的人选上，和甘州回鹘一向友好，且有翁婿之谊的曹议金自然是其最为理想的人。这即是作者对曹氏代张氏之因的看法。另姜先生新作《瓜沙曹氏世谱》中还谓：“议金凡三（四）妻”，“故余疑议金亦当为张氏女夫，因之颇疑斯1177号卷抄写《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女弟子太夫人张氏’，……。恐非议金妻莫属”。文中又列表指出此张氏生元端等。对此新论，作者表示不敢苟同。经作者对有关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后得出结论说：曹议金有妻室三房，即李、索、宋氏三人。曹议金有元德、元深、元忠三子，别无元端其子。至于曹议金和张议潮的关系，过去已考定其为张议潮的外孙婿，索勋的女孙。对于瓜沙曹氏的世系，作者撰有《瓜沙曹氏卒立世次考》一文（未刊），文中不仅考察了曹氏世系，对于他们的母出和姻亲关系也作了研究。姜先生的新作中也列出了一些人的母出，但详加研究，则知臆测者多，可信者少。先生在文中指出敦煌莫高窟61窟“北壁女像十七身，其一、二两身称‘故娣’，皆谯县夫人，当为延恭、延禄妻，与东壁二人同：第四、五……皆称‘侄小娘子，延□、延阴、延□’等，则两谯县夫人所生之女也”。作者按照姜先生所指，在该窟中进行了校核，结果证明先生所指者，不在北壁而在南壁。并对各人的提名结衔作了校核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作者认为先生所指的两个“谯县夫人”不是曹延恭兄弟的妻室，他们之间的关系当是：此二女供养人，是曹议金的第十五和十六女，是曹元忠夫妇之娣，延恭、延禄之姑。姜先生指其为延恭兄弟妻室是难于成立的。

640 敦煌李姓世系考　　孙修身

（《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敦煌是西北地区的历史名城，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古代，许多人因遭遣谪、做官、避乱、经商、传教等原因，来到敦煌而成为敦煌人。这些人从内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很多人及其后代成为大官、名人，使敦煌成为人物荟萃的中心。有的人由于代代做官，绵衍不衰，成为世家大族。本文对敦煌李姓的一个世家大族进行了考证，弄清了他们的世系，这对研究河西地区尤其是敦煌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莫高窟现存的供养人题名、敦煌遗书和石刻碑文里有关李氏家族的资料，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研究和核对，排出了李姓一族在唐代的世系表。但在唐代以前，李氏的世系又是怎样的？据《大历碑》和《乾宁碑》及《墓志铭》所记，敦煌李氏原为“陇西李氏”，是西凉武昭王李暠和李宝的后代，是李唐王朝的宗室。作者根据《魏书·李宝传》、《北史·序传》、《新唐书·高祖纪》、《新唐书·宗室世系》、《汉书·李广传》等史籍，进行了详细考证，得出明确结论：敦煌莫高窟所见的李姓，是李陵、李穆的后代，属于

代北李，不是陇西李；它与西凉武昭王兴圣皇帝李暠及其孙李宝，是毫无关系的，跟李唐宗室也无关系。碑文中自称“唐宗子”、“陇西李氏”、“兴圣皇帝十三代孙”者，全是自己攀附贵族，抬高身价之辞。作者根据考证结果，对李暠、李陵的世系，均分别列出了详细的世系表，为了解这些世家大族提供了明晰的资料。

641 阿史那忠在西域

——《阿史那忠墓志》有关部分考释　　郭平梁

（《新疆史学》1979年创刊号）

本文主要依据近年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并参照《阿史那忠碑》初步整理出阿史那忠作为唐朝命官，在西域及青海一带的活动，使之与当时的有关史实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同时也是对《阿史那忠墓志》的有关部分有考释。太宗贞观年间，焉耆统治者在西突厥贵族的挟持下叛唐，与焉耆邻近的西突厥属下的处月、处密二部首领亦乘势与唐为敌。贞观十八年（644年），唐朝派安西都护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率安西都护兵力讨伐焉耆；同时从中央派军，由阿史那忠为主将，任西州道抚慰使，抚慰处月、处密及焉耆。贞观十九年（645年）五至九月间，阿史那忠回朝复命，唐平定了焉耆之乱。高宗总章年间，吐蕃与唐关系紧张，双方就吐谷浑（原分布在今青海至新疆东南一带）及其故地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此时吐蕃对唐的武装侵扰，已由疏勒、于阗而东进到青海。在这种形势下，唐朝政府命阿史那忠出征青海；同时遣刘审礼为西域安抚大使出使西域，配合阿史那忠。此次用兵，缓和了局势，但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到了高宗咸亨年间，吐蕃及弓月等部变乱，安西都护府等机构处境极为困难。为了平定这次叛乱唐朝政府除派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出征外，还派阿史那忠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此役薛仁贵大败于大非川，阿史那忠也收效甚微。由以上事实可见，唐朝政府似乎有个惯例，每次出征都派两支军队，一支“讨伐”，一支“安抚”。而阿史那忠作为“讨伐”或“安抚”大员，在青海、西域一带的活动是三次，而非一般所说的两次。其时，唐对西域的统治并不仅限于今新疆南部，龟兹、疏勒、于阗、碎叶为当时的安西四镇。到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后，在天山以北诸游牧区及中亚农业区，普遍设立了都护府、都督府州，统归安西都护府管辖，其辖境北至阿尔泰山，西北包括巴尔喀什湖，西面至楚河、塔拉斯河、锡尔河、阿姆河等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安西四镇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起历经高宗，直至开元七年（719年），才由焉耆代替了碎叶，列为四镇之一。

642 唐朝的少数民族大将契苾何力　　郭平梁

（《新疆日报》1962年12月20日）

据《旧唐书·契苾何力传》载，契苾部落在迁入内地前，主要活动在阿尔泰山及天山一带。契苾何力是唐朝一位著名的少数民族大将军，新旧《唐书》都曾为他列传。“何力”是他的名字，“契苾”是他所属部落的名称。契苾何力成年后和母亲一起率部迁入内地，他一生驰骋疆场，英勇善战，为唐朝立下许多汗马功劳。他的远见卓识，恢宏

大度，一向为人们所称道。公元635年，唐与吐谷浑发生战争，唐将薛万均、薛万彻兄弟始而轻敌冒进致败，得契苾何力营救幸免于难；继而又怯敌不战，契苾何力当机立断，勇往直前，大破吐谷浑。但当唐太宗派人劳军为其庆功时，薛氏兄弟却诽谤契苾何力，企图窃取功劳。契苾何力愤极，欲拔刀动武，经众将劝解而罢，遂置个人曲直于度外。军队班师，唐太宗了解其原委后，下令解除薛万均官职，并转授契苾何力，可是契苾何力没有接受，很有见地的说服了唐太宗。他说："以臣之故，而解万均，恐诸蕃闻之，以为陛下厚蕃轻汉，转相诬告，驰竞必多。又夷狄无知，或谓汉臣皆如此辈，固非安宁之道也"。契苾何力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奉命到游牧于今甘肃境内的契苾部落探亲，但却被蓄谋挟持他母弟叛唐投薛延陀汗国的首领们一同带到薛延陀汗国，他在薛延陀可汗面前，拔刀面向东方大呼："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即举刀割去左耳，以示不屈。唐太宗闻知甚为感动，许以与薛延陀和亲为条件，换回契苾何力。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九姓部落叛唐，契苾何力率军镇压，知其为部落头目所为，乃以精壮骑兵五百，出其不意冲至九姓部落住地，乘势向九姓部众宣布："国家知汝被诖误，遂有翻动；使我舍汝等过，皆可自新；罪在酋渠，得之则已"。部众听后，群起抓住自称"叶护"、"设"、"特勤"等的肇事分子，叛乱遂平息。契苾何力任唐将前后共46年，他的一生，是为维护唐朝的统一与兴旺而英勇战斗的一生。他曾参加过平吐谷浑、高昌、龟兹、西突厥的战争，对唐王朝政治的安定，边患的解除，以及加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极大贡献。

643　略论郭元振　　　张启揆

（《社会科学》"甘肃"1981年第1期）

郭元振是唐代安史之乱前一位颇负盛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鉴于研究他的人甚少，今又值他诞辰1225年之际，本文就其生平和功绩，特别是他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卓越成就进行了论述。郭元振名震，唐魏州贵乡人，生于公元655年。18岁举进士，为通泉尉，后被武则天擢升为左武卫铠曹参军。公元696年，与唐屡有战争的吐蕃以罢安西四镇戍兵、分西突厥之地为条件请和，武后派郭出使吐蕃，观其虚实。郭洞察吐蕃之内部矛盾后向武后献策，每年可派和亲使者去吐蕃，而吐蕃权臣钦陵不允，因而会引起赞普不满，君臣猜忌，不战自乱。数年后，果如郭所言，吐蕃内讧，钦陵被诛，其弟赞婆来降。公元701年，武后拜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凉州是唐西北战略要地，它西通安西四镇，北抵东突厥，南临吐蕃。郭上任后，首先加强凉州的防御力量，以对付吐蕃；又在北边置白亭军，以防御东突厥。另外，还致力于发展生产，使凉州"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夷夏畏慕"。公元706年，郭迁右骁卫将军，任安西大都护。除管辖疏勒、于阗、龟兹、碎叶四镇和西突厥十姓之地外，还包括西域十六个附属国。郭元振治安西五年，加强了唐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公元711年，郭奉命还朝，初任太仆卿，后曾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公元713年，郭因助李隆基，登基为帝，以功封代国公。不久，玄宗为了巩固统治，翦除功臣，借口郭元振"军容不振"欲杀之，后赦死罪流放新

州。郭郁愤而卒，终年58岁。纵观郭元振一生，主要经历了武后、中宗、睿宗三朝。而这三朝恰是唐前期政治上最动乱的时期。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边塞防务也相对削弱，而边塞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此情况下，一部分民族继续忠实于唐，一部分民族如东突厥和吐蕃，则经常兴兵寻衅边庭，给唐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郭元振在动乱的西北地区工作了十年，他出任凉州都督、安西大都护，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且正确地分析了边塞形势，因而在凉州和安西的种种军事和政治行动，都能获得成功。作者认为，郭元振的最大功绩在于他在凉州和安西，较正确地对待西北各民族，恰当地处理了各民族间的纠纷。对此，作者主要从四个方面作了重点论述。由于郭元振在处理一系列民族问题上的成功，因而赢得了从凉州至安西各民族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644　高居诲《使于田记》笺证　　钱伯泉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22期）

《使于田记》为公元938年至942年，后晋张匡邺、高居诲出使西域于阗后，高居诲所写的行记。行记记载了出使的路线、沿途风土人情及于阗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对新疆史、民族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正是对高氏行记的笺释和考证。安史乱后，吐蕃趁唐西部边防空虚，占据河西及绝大部分安西都护府管辖地区，唐与西域的联系从此中断。公元848年，张议潮在沙州（今甘肃敦煌）起义，收复河湟十一州。唐在其地设归义军，张议潮为节度使，唐朝势力又及河西。张议潮死后，回鹘、吐蕃、羌等族混战不息，河西道路复又阻隔。十世纪初，回鹘据甘州（今甘肃张掖）称雄河西。公元924年，曹议金继任归义军节度使，与甘州回鹘、于阗等国修好，疏通了丝绸之路南道。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于阗国王李圣天遣使入贡，皇帝石敬瑭册封了来使，并派张匡邺、高居诲出使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由于当时陇西大路为与于阗、归义军交恶的吐蕃所据，晋使不得不从汴梁（今河南开封）经长安，绕道灵州（今宁夏灵武县），渡黄河，越贺兰山，穿过黑山堡东（今甘肃民勤县南）的大沙漠，渡过白亭河（今名白塔河），进入听命于后晋的河西腹地凉州(今甘肃武威)，过甘州、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今甘肃安西县）、沙州，当时的沙州刺史曹元德出使迎接了晋使。遂穿越党项羌、小月氏、回鹘、沙陀、吐蕃、仲云（处月异译）等部牧地，西入丝路南道，到达于阗国都（今和阗西南二十里什斯比尔）。带有汉族血统的于阗李氏王朝统治者，深受内地文化的影响，其国农业、园艺业、酿酒织布等手工业都较发达。佛教为其国教，政治制度则完全仿照唐朝，其国下领十州：绀州（今于阗县城北）、安军州（今新疆策勒县），银州（今和阗城南四十多里库马提）、卢州（今新疆民丰县南沙吾则克乡）、湄州（今新疆策勒县南努尔乡）、玉州（今和阗西南赛图拉）、碛南州（约在今新疆泽普县境）、培因州（今新疆策勒县卜纳沁）、福州（约在今新疆墨玉县境),此外，还有一州名待考。张匡邺、高居诲此行历时四年，行程万里，是自唐末以来内地与西域的第一次使命往返。本文对高氏行记的笺证，无疑有助于研究者对此行意义和当时丝绸之路上民族政权情况的了解。

645 关于“西域”“回回”和“阿维森纳”问题
——答郭庆昌先生　　宋大仁

（《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

《历史研究》1959年1月号发表了宋大仁的《中国和阿拉伯的医药交流》一文，6月号又刊载了郭庆昌的《对宋大仁先生〈中国和阿拉伯医药交流〉一文的意见》。认为宋文对“西域”、“回回”名称用得异常含混，如照此解释，则古代的中亚细亚、中国的新疆、蒙古高原，皆概属于阿拉伯系统的文化，显然解释不通。又说宋文把苏联中亚细亚塔吉克族杰出的科学家阿维森纳认作是阿拉伯最负盛名的医生，是错误的。本文就是对郭庆昌所提意见的答复。文章共分两部分：一、关于“西域”和“回回”的含义问题。认为西域是泛指中国以西的各国而言，故《汉书》、《隋书》、《唐书》的《西域传》分别有身毒（印度）、波斯和拂菻。回回乃古代回教诸国的总称，如《辽史》称回回国王即花剌子模王，元代称花剌子模为回回国。《职方外纪》称中国以西的撒马罕、革利哈大乐、加非斯当、杜尔格斯当、查理、加木耳、蒲花剌得，都是回回国，都信仰穆罕默德之教。“西域”一词，应包括：新疆、中亚西亚（大食、波斯）、西南亚细亚（条支）、乃至罗马（大秦）、印度（身毒）等地而言。西域并不包括蒙古。二、关于阿维森纳（979—1037年）的国籍问题。作者认为郭先生确定阿维森纳为苏联人的看法，是非历史观点，不够全面。阿维森纳生于现在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内的布哈拉城，但在一千年前阿维森纳生活的时代，还没有苏联，布哈拉城属于阿拉伯帝国的版图，故不能说他是苏联人。文章详细引用了苏联史籍文献中有关布哈拉城在公元十世纪前后的情况、俄国的情况和俄国人进入中亚的经过。证明阿维森纳生活的时代，是在阿拉伯国家时代，可称为阿拉伯人；而布哈拉城位于波斯境内，故亦可称为波斯人。因为阿维森纳是十至十一世纪的人物，而俄国于公元1865年起占有布哈拉城，将其列入俄国版图，距今不过九十四年，故在一千年前诞生于布哈拉城的人，就不应称为苏联人。

646 王延德与《西州使程记》　　顾吉辰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王延德是北宋前期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与理财家。他撰写的《西州使程记》是他出使高昌等地的见闻笔记。其中对契丹、党项、鞑靼、高昌等地风土人情、物产资源，地理环境以及人民生活状况等记述甚详，历来受到中外研究我国西北史地的专家、学者的重视。特别是行程中有关九族的叙述，更为珍贵。本文较详细地叙述了王延德的生平事迹；研究了其出使西州的目的；《西州使程记》中的族属；《西州使程记》中记述的内容等。王延德一行百余人奉太宗之命，于太平兴国六年（1081年）出使西州高昌的目的，作者引证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有关记载，认为不仅是为了对高昌国王师子王遣使来贡的礼节性回访，更重要的是为了积极联络高昌、党项、鞑靼各部，以达到牵制反对和削弱北方强敌契丹势力的政治任务。关于九姓部族的族属问题，南宋人王明清于孝宗隆兴二年(1165年)所写的《挥麈前录》中记述甚详，但作者认为其中“……次至达干于

越王子族，此九族鞑靼中尤尊者”有误。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元脱脱的《宋史高昌传》等典籍又互相辗转抄袭，以讹传讹，以至近现代人在研究鞑靼史、回鹘史时又承袭此说，更加是非不明。为何说王明清误述九姓部族为九姓鞑靼？首先，李焘《长编》没有关于九姓鞑靼的记载，此并非李焘之疏漏，而是对其怀疑不书之故。第二，王明清记载的所谓“九姓鞑靼”，并不全是鞑靼。作者进行考辨后指出，属于鞑靼族的有：1.卧梁劾特族，2.达干于越王子族，3.屋地目族，4.拽利王子族，5.阿墩族。余下四族是党项和回纥族，即：①都啰啰族，②茅家娲子族，③茅女王子开道族，④太子大虫族。第三，王明清将自唐至北宋史册上记载“九姓鞑靼”或“达旦国九部”一事与王延德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出使高昌历叙所见九部族帐混淆起来。《西州使程记》记述内容除王延德出使的路线外，还详细介绍了高昌国的各种情况，如地理位置、气温条件、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统辖族属、矿产资源等。这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

647 耶律楚材及其《西游录》杂议 樊保良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耶律楚材是我国蒙元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他辅佐蒙古最高统治者数十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所贡献。本文围绕耶律楚材和他的《西游录》一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耶律楚材从小就深受儒学濡染和熏陶，“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他“以儒治国”的政治主张和“致居泽民”的宏大抱负是受到家学渊源的直接影响。他还受其父影响，从小喜佛教读佛书。后在京师，“谒万松老人，杜绝人迹，屏斥家务，虽祁寒大署，无日不参，焚膏继晷，废寝忘餐者三年”。此三年佛门生活，对楚材的思想形成影响很大，即在“儒记”烙印上又加了“释记”烙印。楚材不仅深通儒学和佛理，而且能取其精华，互相贯通，将佛教“慈悲”宗旨，融合于儒家“重民”思想和“仁政”主张之中，并以“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之说统一起来，作为他帮助蒙古统治者经邦安民的指导思想。公元1218年，耶律楚材应成吉思汗征召任顾问，翌年扈从御驾西征。1224年成吉思汗班师，楚材随之东归。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幼子拖雷监国，楚材尚逗留甘肃河西，是年冬楚材受命来京。1227、1228年间，因“里人问异域事，虑烦应付，遂著《西游录》以见余志。其间颇涉三圣人教正邪之辨”。《西游录》上、下两册的内容，是在1227、1228年两次来京答客问“谈话纪要”基础上写成的。《序》是1229年写的。上册记述了作者从燕京应诏北上成吉思汗行宫，从漠北随西征大军经今新疆到中亚的沿途见闻，特别是中亚诸地的山川形势、物产气候、风土人情记之甚详。下册内容一问一答约十四对，其中十三对涉及宗教问题，除一对是佛教派别问题，即“释氏之邪”外，余均为抨击邱处机和全真教。《西游录》序对邱处机之攻击不遗余力，这是当时宗教派别斗争的反映。《西游录》有原本和节录本两种，原本连《序》共分三部分，五千余字。节录本是元代盛如梓著《庶斋老学丛谈》时，节录了西游地理部分，仅八百余字。《西游录》一书的价值在于对十三世纪西域诸地道里、山川、物产、民俗的记述，是研究当时西域历史的可贵资料。本文还介绍了向达先生对《西游录》的全面评价。

648 关于李暹及其西行　　　　鲁　深

（《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本文论述了明代旅行家李暹的生平及事迹，并对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把李暹误为李达进行了考证。据焦竑《征献录》和陕西一些地方志记载：李暹，字宾旸，陕西长安人。洪武己卯举人，官至户部左侍郎。性刚严，事母孝，处兄弟友。明成祖永乐年间，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同时，他奉命随陈诚从陆路五次西行，出使丝绸之路沿线诸国，最远到达中亚帖木耳帝国的名城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李暹在出使西域过程中，沿途逐日记下了日记，这就是《西域行程记》。他们又将沿途各国的风土人情、习俗和物产详细地记载下来，这就是《西域蕃国志》。这两部书是了解丝绸之路和西域情况的重要资料。他们五次出使西域，对加强中国和中亚各国的友好往来，扩大贸易关系，增进文化交流，都起了重要作用。谢国桢先生在为《西域行程记》所写的跋文中说："李暹。明史作李达。""明史不为陈诚立传，李暹作中官李达。"并推断说："李暹或为李达之误。"以后在学术界形成一种肯定的意见，说"按明史李暹作李达。"作者根据《明史》、《明太宗文皇实录》等史籍的有关记载，确认李达当时是太监，李暹是户部主事，他们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

649 中西方历史上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　　　　佘士雄

（《历史教学》1981年第8期）

中世纪以前，往来于丝绸之路的除商贾僧侣外，中西使团占有很大比重。马克·波罗是中西使团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他是十三世纪后半叶由威尼斯出发，历经西亚、中亚来到中国的一位杰出的中西友好使者。本文介绍了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历史意义及其功绩。

中国作为"丝绸之国"，早在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即引起欧人注意。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皇帝安敦·马克·奥蕾留遣使来中国，这是载入史册的中、意两国首次直接交往。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拂菻王波多力又遣使东来，经高宗、武后、玄宗各代，都有使节往来。中唐以后，由于割据分裂，丝路一度萧条。到了元朝，经蒙古统治者三次西征，建立了以和林为中心（后迁都到大都），横跨欧亚的大汗国。并在其管辖范围内，建起完备的驿站制度，并驻军保护。丝绸之路复又由衰转盛。马可·波罗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跟随他的父亲、叔父以及元世祖派往罗马教廷的两位副使，历经艰险，过伊朗、越帕米尔，取道新疆、甘肃，于公元1275年到达上都。他年青有为，很快熟知元朝礼仪，学会四种语言。元世祖派他为钦差大臣，巡视过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许多地方；还出使过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尼、爪畦、苏门答腊等国。1291年，马可·波罗带着元世祖写给法、英、西班牙等国国王的国书和护送远嫁给伊尔汗国的阔阔真公主的任务，取海路返回威尼斯。

马可·波罗不仅当时在增进中外友好方面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后来口述的回忆录——《马可·波罗游记》，将经历过的中亚、西亚　东南亚情况，特别是元初时的中

国社会情况，高度发达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丰富了中世纪人们的地理知识，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

650　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　　　向　达

（《旅行家》1956年第4期）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罕西征后，建立了蒙古大帝国，使东自中国，西至欧洲的东西交通畅通无阻，至十四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东西使节、商旅“道路相望，不绝于途”，这是中西交通上的一件大事。这些使节、商旅留下了不少记载，叙述了他们所见所闻，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丝绸之路的宝贵材料，其中《马可·波罗游记》尤著于世。它在古代地理学史上，在亚洲历史的研究上，无疑是一大贡献。他打开了中古时期欧洲人的视野。本文除对马可的事迹进行了系统论述外，并对《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及影响，亦作了介绍。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哥伦出发探险之前，已读到了《马可·波罗游记》。当他发现了美洲大陆，以为是到了《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述的满地黄金的日本国，并且把墨西哥当作马可书中的“行在”。《马可·波罗游记》共四卷，第一卷记述马可诸人东方沿途之见闻，直至上都为止。第二卷记述以中国本土为主，首先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城市的记载，对当时北京的繁华概貌和人口众多情况，以及风景之美，赞叹不置。其次是关于当时西北、西南和东南城市，特别如苏、杭等城市，马可赞不绝口，称杭州为行在、为天城，称苏州为地城。“行在”是南宋对杭州的一般称呼。天城、地城者，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一般译称。第三卷记述中国以外的日本及东南亚国家见闻，所述日本黄金满地，富庶异常，为中古时期西方人士所垂涎。第四卷则记蒙古诸汗国事及西亚、中亚的历史地理，是研究中古时期中西交通的重要材料。

《马可·波罗游记》较全面地记述了中古时期的中西交通、历史及一些城市的面貌，是研究丝绸之路的一部重要参考书，而马可本人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传播东西方人民友谊等方面，做出了伟大贡献。

651　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　　　唐锡仁

（《世界历史》1979年第3期）

在古代历史上，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和罗马帝国，由丝绸之路联系了起来。至十三世纪的蒙古帝国时期，丝绸之路畅通，东西方往来盛况空前。其中欧洲人来中国的以意大利人为多，而以马可·波罗最为著名。本文概略介绍了马可·波罗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游记的内容及价值，马可·波罗于公元1254年出生在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威尼斯。他的家庭也是以商业为生，他的父亲和两个叔叔经常到地中海东部进行商业活动。公元1271年11月，他的父亲和叔叔携带17岁的马可·波罗来中国。他们从威尼斯渡过地中海，沿丝绸之路行进，历时三年半，于1275年夏抵达元代上都（今内蒙古多伦），以后又到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他们在中国旅居17年，于1291年初离开大都，以福建泉州由海路回国，历时三年半，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曾几次到国内和东南亚

一些国家游览和访问，并在扬州担任官职三年。文章详细介绍了马可·波罗来往中国所经陆路和海路的具体地点；他在国内外游览访问的具体路线和地点；以及他著述游记的过程。马可·波罗回威尼斯三年后，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在1298年9月8日因市场竞争矛盾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马可·波罗也加入了威尼斯的战斗行列，并在一条战舰上当了舰长。激战结果，热那亚人获胜，马可·波罗受伤被俘，被关进热那亚的监狱。他在狱中经常向同狱的人叙述东方各国的奇风异物，引起了同狱的比萨人鲁思梯谯的注意。此人曾写过小说，精通法语。他征得马可·波罗的同意，将他的口述用法语记录下来，这就是《马可·波罗游记》最初的本子。马可·波罗被囚四年后获释。此后他便安居威尼斯，娶妻成家，继续经营商业。1324年，马可·波罗在威尼斯逝世，终年70岁。他留下的宝贵遗产，就是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游记。文章接着论述了游记的流传情况、内容和价值。六百多年来，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这部游记，许多学者对之做了大量校勘注释和整理研究工作。我国学者也翻译了四种。1935年冯承钧译的《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卷，二百二十九章，记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和一百多个城市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书中以一百多章的篇幅，记载了我国四十多处城市地方，对其自然和社会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他的游记，在中古时代的地理学史、亚洲历史、丝绸之路史和中意关系史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对十五世纪前后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哥伦布开辟由欧洲到美洲的新航线，即是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启发。

652　《马可·波罗游记》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中西交通的贡献　　　余士雄

（《读书》1980年第7期）

《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情况，从而扩大了西方人的眼界，促进了东、西方交通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与西方人民，特别是中、意人民的友谊，马可·波罗来中国和沟通中西交通，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公元前139年至公元前126年，中国使臣张骞奉命通西域后，中国人到西方去的逐渐增多。当时从中国到欧洲，有一条经过天山、中亚、伊朗、两河流域直达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公元一世纪后期，班超再次通西域，并从西域派遣副将甘英赴罗马帝国。公元二世纪初期，罗马帝国在东方的疆界已经包括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因而，罗马商人得以从波斯湾渡海，经印度洋来到东方。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国和东罗马帝国已有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其中最重要的事迹便是中国育蚕缫丝法的西传。从公元七至十一世纪，阿拉伯人垄断着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贸易，他们的足迹遍于亚、非、欧三洲。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就是经阿拉伯人之手逐渐传布到西方。十三世记，蒙古游牧封建贵族肆行武力扩张，把亚洲的大部分和欧洲东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蒙古贵族进行远征的结果，出现了一个以和林为中心的、横跨欧亚的大汗国。一向不曾处于统一控制之下的东、西交通，到这时已畅通无阻。这时地中海区域因第四次十字军东侵（公元1202—1204年）以后，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航运和贸易。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和蒙古帝国衔接起来，这种形势便有利于欧人的东来。马可·波

罗就在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漫游世界的。约在公元1271年11月，马可·波罗跟着他的父亲和叔父从地中海东岸的阿城出发来中国，一路上跋山涉水，穿过叙利亚和两河流域，横越伊朗全境，由此上到阿姆河上游，行至中亚沙漠地带，翻过帕米尔高原，再迤逦东行，经过喀什、于阗，掠过罗布泊，到达敦煌、酒泉、玉门、宁夏一带。他们在中国境内所走过的这段路程，大致上就是唐玄奘赴印度取经所走之路。1275年5月，波罗家族这三位旅行家终于到达蒙古大汗驻所上都，并亲见大汗忽必烈。从1275至1292年这十七年间，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一直在元朝供职，马可·波罗除在京城大都视事外，还经常奉大汗之命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他每到一地，总要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物产状况，回来向大汗报告。1292年初，这三个威尼斯人连同随从六百余人，护送忽必烈为波斯汗阿鲁浑选定的王妃阔阔真前往波斯。一行六百余人绝大多数都在途中失事或病故，只有阔阔真、波罗家族三人和其他四人到达波斯。1295年末，波罗家族这三个旅行家回到他们在威尼斯的故居。1298年在热那亚与威尼斯之战中，马可·波罗任舰长的一艘战舰被热那亚人俘获，他本人也被投入热那亚狱中。马可·波罗在狱中把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见闻，口授给同狱的一位名叫鲁思蒂谦的人，此人用法文笔录下来，这便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游记》全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记述了马可·波罗东来沿途所经过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第二部分记载了元朝初年的政事和大汗忽必烈所进行的战争。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邻近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第四部分讲成吉思汗后裔蒙古诸汗国之间的战争和俄罗斯的概况。马可·波罗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海陆兼程旅行家，他的著作，在世界史、亚洲史、中西交通史、中意关系史和地理学史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尤其对十五世纪左右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653　略论鸠摩罗什　　　殷　鼎

（《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2期）

本文介绍了中国杰出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的生平，探索了他对促进中国内地与新疆地区的文化思想交流及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影响。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与真谛、玄奘齐名。他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沙雅县一带），七岁时便随母亲出家，接受佛教的启蒙。九岁时，随母亲到罽宾国(约在今克什米尔境内)，接受了小乘佛教的思想。十三岁时返回龟兹，又到莎车国（今新疆莎车一带）学习大乘空宗学说，完成了由佛教小乘到佛教大乘的思想转变。他从莎车回到龟兹国后，大力宣扬大乘空宗思想，促成了龟兹国大乘佛教的兴起。他的名声远播到中国内地，前秦主苻坚派其臣吕光率军队攻取了龟兹，带鸠摩罗什入关。前秦在淝水战败后灭亡，吕光便在姑臧自立为王，建立了后凉。鸠摩罗什在姑臧留居十五年，学习和掌握了汉语，为他以后译经打下了基础。他在公元401年，被后秦皇帝姚兴迎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开始了译经活动，并为姚兴著有《实相论》二卷。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等原因，佛学发展缓慢，加以佛经传译失真，僧侣运用中国思想的义理和名词去附会佛学，造成佛经理论的混乱和分歧。鸠摩罗什在长安共译出佛经七十

四部三百八十余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印度佛学的思想体系，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繁兴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鸠摩罗什还是一个宗教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他的宗教哲学思想是大乘空宗的典型代表。他否定一切主、客观现象，主张人的主观世界为虚妄，介绍了一种变即不变、运动就是静止的理论。他否认生命是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客观过程，反对区别生死。他在辩论中注重逻辑推理，充满了诡辩的气味，极大地武装了宗教唯心主义。鸠摩罗什是当时我国边疆地区兄弟民族的一个文化代表，他对于促进我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文化思想交流，加深各兄弟民族之间的了解，起了积极作用。研究鸠摩罗什是研究丝绸之路和中国佛教不可缺少的一环。

654 鸠摩罗什年表考略 陈世良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11期）

鸠摩罗什是我国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佛学家，后世人们把他和玄奘、义净，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翻译家。他早年深受小乘佛学之熏陶，青年时改宗大乘，其后，主要从事弘扬大乘佛学活动，对当时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佛教产生过巨大影响。公元401年（晋安帝隆安五年，后秦姚兴弘始三年）到达长安，秦王姚兴聘为国师，并从事译经工作。作者认为由于鸠摩罗什大量介绍印度大乘学说，并译出了许多经论，从而改变了我国中原一带佛教依附于道教和内地佛学家对大、小乘之间不甚清楚的状况。可以说鸠摩罗什在促使中国佛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使之成为“中国佛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罗摩罗什所译经数，《菩萨波罗提木叉后记》、《僧佑录》、《高僧传》、《开元录》等各说不一，一般认为三十余部三百余卷之说较近真实。罗什以其博大精深的学说，严密慎重的态度，从事译经工作，在翻译技巧和内容精确等方面，都达到了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谓开辟了译经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他无论在中国翻译史上或中国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一位杰出学者。关于鸠摩罗什生卒年月有两种说法，一是慧皎《高僧传》说：“以伪秦弘始十一年（409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是岁晋义熙五年也。……然、什死年月，诸记不同，或云弘治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或寻七与十一，字或讹误”。僧肇《鸠摩罗什法师诔》云：罗什于“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癸丑之年即弘始十五年（413年）。《开元录》采此说法。尔后学者又或否定这一说法。作者认为弘始十五年为卒年说法较可信，并列举出八条理由予之论证。且《鸠摩罗什法师诔》是罗什高足僧肇所写。肇自称随罗什十有余年，罗什死后的第二年肇也去世，因此肇的记载最为可信。在确定罗什卒年以后，由此可推算出生年，即公元344年（晋康帝建元二年，前凉张骏建兴三十二年），鸠摩罗什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由此作者将罗什生平事迹逐年进行了考订。关于罗什由小乘学到大乘学的转变时间、地点，历来说法不一，有谓十一、二岁，或谓十三、四岁，有谓在疏勒，或谓在龟兹。作者根据各家记载，经过缜密分析，认为罗什改信大乘，当在二十多岁时；不在疏勒而在莎车，并阐明了这一思想的转化过程，以及当时龟兹等地社会历史条件。公元382

年（晋孝武帝太元七年，苻坚建元十八年），车师前部王弥第、鄯善王休密驮朝于坚说坚请兵西伐。公元383年坚遣骁骑将军吕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焉耆诸国。临发，坚谓光曰："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朕甚思之，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公元384年吕光破龟兹，获罗什并载之东归。时罗什四十一岁。公元386年（晋武帝太元十一年，即吕光太安元年），吕光东归凉州，闻符坚被杀，于是建立后凉国，都姑臧(今武威)。罗什同至姑臧。公元401年(晋安帝隆安五年，姚兴弘始三年)姚兴西伐吕隆，隆军大败归降，迎罗什入关。时年罗什五十八岁。自苻坚建元十九年（384年）吕光破龟兹得罗什，至姚兴弘始三年（401年）入长安止，首尾共十八年，如从385年入凉州算起，罗什在凉州也有十七年之久，其间一方面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另方面了解内地佛教传布和佛经的翻译情况，为以后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基础。罗什到长安后，姚兴以国师之礼待之，甚见优宠。公元402年(晋安帝元兴元年，姚兴弘始四年)，罗什五十九岁，在长安译经弘法始，至413年罗什七十岁逝世，作者对其间所译经典，按年一一进行了考订，对无法考订年代者列出目录及卷数，并予介绍。通过本文可对鸠摩罗什生平事迹，及其对"中国佛学"的发展和所做贡献，得以全面了解。

655　法显是怎样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　　　谭吴铁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6期）

根据语言学者们对"塔克拉玛干"词源的解释，可以认定塔克拉玛干的自然条件并非从来都很恶劣，在古代也曾有一段繁荣时期，自然也有道路可通。那么法显具体是沿着怎样的路线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呢？据《法显传》记载，法显由"乌夷国"（今焉耆附近）出发，"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而后抵于阗（今和田附近）。有人认为"乌夷国"是指龟兹（今库车附近），从此南下可到达和田河汇入塔里木河的河口，再沿和田河即可达和田。从今天的地理形势看，这似乎是从北面穿越塔克拉玛干到达和田的唯一路线。但乌夷不是龟兹而确实是焉耆，历代典籍中都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所述尤详。由于和田河是穿越塔克拉玛干的唯一通道，不少人认为法显从焉耆只能先西行到龟兹，再沿和田河才能到达于阗，如此，与"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不符。从《法显传》的记载看来、法显走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由于《汉书·西域传》南、北两道的记载，使人们产生了塔里木盆地诸国沿沙漠边沿的绿洲线分布，成一环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没有道路，道路只是绕边沿前行的观念。但从《汉书·西域传》中也不难看出，虽然塔克拉玛干南北诸国之间隔着沙海，却仍有详细的直线里程。如西域都护治所乌垒（今轮台东小野云沟附近）位于北道中段，必须有穿越沙漠通往南道诸国的道路，方能如《汉书·西域传》所载"于西域为中"。看来乌垒与南道各国都有穿越沙漠的捷径，其中的一条，就是法显斜穿沙漠抵达于阗的道路。1929年，黄文弼先生在和田河西岸红山嘴、白山嘴间发现向西伸入沙漠的古道，并认定这是从于阗通往疏勒的大道，但这比从于阗沿沙漠南沿直达疏勒要远三分之一的路程，似乎不太现实。1895年斯文赫定的冒险旅行尽管受挫，却足以证明在适当的季节，沿麻扎塔格（以红山嘴、白山嘴为起点，向西略偏北伸延的小山脉）前进，是可以穿过塔克

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而到达和田河畔的。本文作者认为，法显斜穿沙漠，是沿着一条穿越沙漠的河道前行的，河道可指示方向，河水则可饮用。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和《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中推测，和田河在古代不是现在这样向北流，而是向东略偏北流，现今这里的居民以河道定方向，刚好与实际方向相差90度，这只能解释成古时河水是东略偏北流的，后来向北流了。如此，和田河故道正好可以被法显利用"直进西南"。近代勘测资料证实了古代和田河径直流向东北的地理条件。勘测资料还发现了古时与和田河汇流的克里雅河干河道。本文作者经分析认为，当年和田河和克里雅河的汇流点在著名的卡拉当格古城附近。这样，法显当年行走的路线，是从焉耆向西南行经乌垒，再渡塔里木河，继续西南行，沿克里雅河末流河道到达卡拉当格古城，再沿和田河故道采红山嘴、白山嘴，继续向南抵达于阗，这与《法显传》的记载相吻合。至于红山嘴、白山嘴间西行的古道，显然是从东边沿和田河故道来此的行人，直达疏勒的捷径，比从此南至于阗，再沿沙漠边沿到疏勒要节省近三分之一的路程。如此看来，当年通过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恐怕不仅仅是南北两道了。

656 宋云行纪笺注　　〔法〕沙　畹撰　冯承钧译

（《禹贡半月刊》1935年第4卷第1、2期）

宋云，敦煌人，后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偕同沙门惠生往西天求经。十一月冬，从洛阳出发，行经赤岭（今青海西宁之西），过吐谷浑城，至鄯善。复由鄯善至左末城（即且末城）、于阗，翌年七月抵朱俱波国（今叶城），九月中旬入钵和国，十月入厌哒国，十一月入波斯（今之 Zebak），中旬入赊弥国，十二月初入乌苌国，至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四月达乾陀罗国，惠生留乌苌二年，于正光三年（公元522年）二月始返，此次西行，宋云、惠生皆撰有《行纪》，《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有宋云《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然已佚亡，幸有《洛阳迦蓝记》记其概略。按《洛阳迦蓝记》为后魏杨衒之撰，其撰年约当公元547年前后，第五卷记城中二寺之后，言及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因兼及宋云与惠生向西域取经事。衒之谓"惠生《行纪》事多不尽录，依《道药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沙门道药，于魏太武末年（公元424年至451年），从疏勒到僧伽施国，还作传一卷，今已不传，唯散见《洛阳迦蓝记》宋云、惠生《行纪》之中。作者在本文中，将《行纪》进行了疏证，考订了《魏书》、《北史》、《释迦方志》、《佛祖统记》等，有关宋云、惠生之记载，对《行纪》错乱之处，作了说明，对《行纪》所载之地名、国名、山川、要隘作了详细注疏，考订了历史沿革、方位所在，以及古名称之变更。对《行纪》所载佛教事迹，佛的故事传说及其佛教建筑艺术，都作了系统的阐述。

另外，译者对作者疏证未尽之处，复又作了补证，也对前人及《行纪》错漏之处，进行了考订。故本文为研究宋云、惠生西行求经最为翔实可靠的材料。通过本文，可进一步了解中西交通线上的历史名城及沿革，对"丝绸之路"研究者，实为一重要的参考资料。

657　宋云丝路之行初探　　马曼丽

（《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宋云，敦煌人。在北魏时曾为管理某系统或部分僧侣的僧统，据《洛阳迦蓝记》载，宋云一行于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十一月西行天竺，正光中，即公元522年左右返回北魏首都洛阳，历时约五载，本文探讨了宋云西行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行经的路线和有关地区情况，以及居于丝路要冲的吐谷浑和哌哒两个民族在南北朝以来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北魏是对我国历史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鲜卑民族政权。它采取一系列汉化政策，促进了当时各民族的同化和接近；它经营西域、提倡佛教的活动，也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北魏末期明帝元诩在位时，由于年幼，其母胡充华以皇太后身份总揽朝政。胡充华执政期间，极力提倡佛教，到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仅洛阳的寺院就达五百所。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对佛教经律的研究也随之加强。由于各教派各取所需，以自己派别的主张解释经律，莫衷一是，这就需要到佛教经律的发源地求取真经。为此，胡太后选宋云等人，前往天竺取经。此外，胡太后派宋云西去求经，也有宣扬国威、结好与国的使命。宋云等从洛阳出发，西行路线大致是：经陕西、陇东，并由当时的河州渡河，经青海柴达木盆地，过若羌，沿昆仑山北麓越帕米尔、兴都库什山，经今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宋云在西行记中对此有所记录。南北朝时，吐谷浑与北魏疆域相连，保持了长期的隶属关系，到明帝——胡太后执政时期，吐谷浑对北魏仍频繁奉献，称藩纳贡。宋云等奉命西行，本可经传统的河西走廊，但时值秦州人莫折念生起兵反魏，凉州人万于菩提等率众响应，北魏对河西地区失控，宋云等只好通过当时还臣属于北魏的吐谷浑——青海道西行。宋云一行在吐谷浑王都吐谷浑城（今青海都兰）住了几日，然后西行到达鄯善城（今新疆若羌境）。从鄯善西行，经左末城、捍麼城。由捍麼城继续西行，进入著名的于阗国，其都城即今和田县。离开于阗，于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七月二十九进入朱驹波国。八月进入汉盘陀国界，由此经葱岭进入钵和国。神龟二年十月初，越过兴都库什，进入今阿富汗境内，十一月中旬，进入今巴基斯坦境内。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四月中旬，进入以健陀罗艺术而著名的乾陀罗国。继而到达其都城，即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宋云等至此大体完成了参礼佛迹，求取大乘佛经的任务，遂于正光二年（公元522年）二月回到洛阳，得大乘经一百七十部。宋云当时所行经的丝绸之路沿途要冲，主要由吐谷浑和哌哒所控制。据宋云所记西行时，从赤岭到鄯善这段路属吐谷浑地区的通道，于阗以西直到旅行终点健陀罗一带，几乎都是哌哒的控制区。而且在他西行之时，无论哌哒，或是吐谷浑与中原的交往都处在相当隆盛的时期。宋云留下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当时丝绸之路沿途的史地与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资料。尤其是他顺利完成使命，一定程度上借助于给哌哒的“诏书”，借助于吐谷浑道的中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北少数民族在丝路发展中不应忽视的作用。

658　关于敦煌人宋云西行的几个问题　　杜斗城

（《社会科学》“甘肃”1982年2期）

北魏一代，佛教风行，孝明帝时，曾派宋云（甘肃敦煌人）、惠生向西域求经，这

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宋云西行的许多问题学术界至今还存在着不同说法。本文主要讨论了宋云西行的年代问题；宋云所经吐谷浑城的位置问题；相传吕光所造"无胡貌"的佛像问题。关于宋云西行的年代，由于史书记载各异，至今无统一说法。但以周祖谟先生考订《洛阳伽蓝记》说法为是。黄盛璋先生等主《魏书·释老志》之说，直至最近，有些文章还持此说。作者引述了《洛阳伽蓝记》、《魏书》、《北史》、《隋书·经籍志》、《资治通鉴》、《释迦方志》中的有关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宋云等人出使西域的年代有神龟元年、熙平元年、熙平中三说。作者认为周祖谟关于宋云出使年代为神龟元年，即以《洛阳伽蓝记》的说法为是。持《伽蓝记》之说的还有《释迦方志》和《资治通鉴》。前者是佛教徒所著的专书，而后者取材之严也为史家公认。宋云西行所经的"吐谷浑城"应在何处，这是一个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宋云这次西行，并没有走"河西走廊"这条大道，而是经统治在今青海北部的吐谷浑国。作者否定了"吐谷浑城"即今青海湖西岸、布哈河下游南侧发现的"伏俟城"，即宋云所经的"吐谷浑城"之说。作者认为，宋云所经的吐谷浑城，应在青海都兰更西南的巴隆一带。因为巴隆地处柴达木盆地南沿，河流纵横，绿洲密布，这和《伽蓝记》中"唯土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的记载相符。又以行程考之，从赤岭至此，"二十三日"可达。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有人考证被吐谷浑几代首领视为军事要地的"白兰"就在巴隆一带。作者同意此说，并认为"吐谷浑城"就是文献记载的白兰，问题不会太大。至于青海湖西岸的伏俟城，则应是吐谷浑从夸吕开始所居的都城。关于相传吕光所造"无胡貌"的佛像问题，《洛阳伽蓝记》卷五说宋云"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所作"。宋云所经"左末城"虽非近代新疆且末县治，但不可能距此太远。佛教艺术刚刚传入中国后，还没来得及完全中国化以前，其西方因素很多。如属云岗石窟第一期的18、19、20窟，麦积山的78窟，炳灵寺的169窟中西秦建弘元年的造像，都保留有较多的西方因素。在敦煌早期的石窟中也具有这种风格。但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及其装饰日益增多"。然而宋云西行时在左末城看到的"乃无胡貌"的佛像，相传是"吕光伐胡所作"，却令人费解。"吕光伐胡"当指吕光伐龟兹击西域一事，其事在公元383年，，即十六国早期的前秦时代。属于这个时期"乃无胡貌"佛教造像在我国还没有发现过。作者推测，这可能是左末城的"古老"搞错了。但是，宋云的发现却证明在宋云西行之前，在今天新疆腹地就有中原式的佛教造像了。

659 杰出的学者玄奘　　吴　晗

（《人民文学》1961年第6期）

唐玄奘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作为一个著名的旅行家，已为人们所共知。但作为一个勤勉努力，毕生追求知识，在哲学领域内达到很高成就的学者，一般人就比较生疏了。本文专门讨论了作为学者的唐僧。玄奘法师（公元602—664年）俗姓陈，名祎，河南维氏（今河南偃师县）人。十三岁那年隋朝政府在洛阳度僧时出了家。初在净土寺跟景法师废寝忘食的学习《涅槃经》，又跟严法师学《摄大乘论》，听一遍，读一遍，就

可完全掌握。隋末战乱，玄奘和长捷离洛阳到长安，经子午谷到成都，从道基、宝暹二法师学《摄论》、《毗昙》，震法师学《迦延》。在二、三年时间里，就掌握了佛教哲学的基本知识。二十一岁时在成都学《律》。并到荆州天皇寺讲《摄论》、《毗昙》各三次，很受欢迎。继又北游相州，从休法师学《杂心摄论》，到赵州，从深法师学《成实论》，到长安，从岳法师学《俱舍论》，玄奘不仅勤听勤抄，勤学强记，还能够在领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见解。接着他又从当时最有名的法常、僧辩二大师学《俱舍》、《摄大乘论》，从玄会法师学《涅槃经》，学问日益精进，名誉日渐传开。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学得越多，越不满足，便决心到印度游学，解决疑难，求得《十七地论》(即《瑜珈师地论》)，提高学术水平。为了克服语言、文字隔阂，他专心致志地学会了梵文。贞观三年，玄奘二十九岁，请求出国未许，即决定私逃。他从贞观三年八月离开长安，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过玉门关，渡莫贺延碛（沙漠）到高昌，历经西域诸国，游历了今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诸国，经过一百十几个地方，历时十七年之久，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才回到长安，这年他已四十四岁。在十七年的旅行中，他随时随地访求著名学者，虚心学习。在那烂陀寺，请戒贤法师讲《瑜珈论》、《顺正理》、《显扬》、《对法》、《因明》、《声明》、《集量》、《中二百论》等论，学婆罗书，钻研各学派经典并学习梵文，历时五年；以后又到伊烂拏国、南骄萨罗国、驮那磔迦国、建志补罗国、钵伐多罗国游学，最后又回到那烂陀寺，首尾共两年。那烂陀寺是印度最大的寺院，经过六代国王的不断营建才建成的。寺中通经论二十部的有一千多人，三十部的五百多人，五十部的十人。其中之一就是玄奘。长老戒贤法师是印度当时最伟大的学者，精通一切经典，玄奘从他受学，成为高足弟子。玄奘在印度把汉文本的《起信论》译为梵文，流传五印度。回国后，又奉唐太宗之命，译《老子》为梵文，流传印度。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玄奘辞别戒日王归国，于贞观十九年正月到达长安。他带回经典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从贞观十九年三月起，一直到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十年中，玄奘全力翻译，总共译出经论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用一生的力量学习和介绍佛教哲学思想和语言文字学，逻辑学等学问。他在取经以前，用十七年的时间，求师学习，打下扎实基础，并学习梵文。在出国往返的十七年中，克服一切困难，勤学勤问，求得新知识，发表了独创性的学术论文，取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为祖国争取了荣誉。取经回国后，又以二十年时间，从事翻译工作，质量数量都达到很高水平。通过他的努力，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对哲学、语言文字学、逻辑学、文学各方面都起了有益的作用。他的《大唐西域记》，对研究我国新疆境内各民族，和葱岭以西诸国的历史、地理、物产、交通、宗教信仰等等，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学者，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和学习。

660 玄奘三藏之行脚与取经 郑师许

（《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7期）

玄奘自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西行印度取经，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返回长安，历时十九年。本文对玄奘在这十九年的活动，作了简明扼要

的记载，对沿路所经国家路程及沿途辛苦状况，都有所记述，尤其是在五印度的行脚，采取图表形式说明，对研究玄奘在印度的活动，可谓一目了然。玄奘印度之行，不仅深入研究佛教各教派的著作，同时还带回了佛教各种经卷达六百五十七部，以及各种实物资料，这对我国佛教和艺术影响至大。由于他的治学精神刻苦严谨，从而收获巨大，造诣很深，当时在印度就享有至高声誉。他精通印度各种文字，翻译了不少经卷，对中印文化交流，对中印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特殊贡献，为中印人民世世代代所歌颂。他所著《大唐西域记》，直至今日，仍是研究中西交通、治"丝绸之路"的学者，最宝贵最可靠的资料。至于他的治学精神永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在迦湿弥罗国时，以寻读无本，由国王给书手二十人，令写经论，玄奘除诵习自修之外，又须选辑督造。又如归途在迦湿弥罗国信渡河上失经，遣人往乌仗那国抄写，这些工作极复杂繁重。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玄奘取经的标准，以搜集原本、初本为宗，如不能得，即从事抄写。如此不畏艰辛，严密治学之精神，则成为后世之楷模。

关于玄奘取经事迹及所撰《大唐西域记》，世界各国学者研究颇多。向达先生也于1955年在《旅行家》第4期上发表了《玄奘法师》一文，从旅行家角度考述了玄奘的行脚及事迹，均可作为研治丝路之学的参考。

661 论玄奘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　　　石　峻

（《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

本文根据有关史传和佛教典籍的记载，论述了我国古代的大旅行家、高僧玄奘留学印度和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玄奘原姓陈，名祎，河南洛阳人，生于隋文帝开皇16年(公元596年)，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享年69岁。他在前代著名僧人旅行家法显、智严等"西行求法"事迹的鼓舞下，于唐太宗贞观初年私自出国，经历千辛万苦，到印度学习佛经，历时17年才回到长安。玄奘在印度入那烂陀寺，向戒贤大师学习。后在当地好几次大规模的学术辩论会上，他都取得胜利，因而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但他始终不忘祖国，对许多印度友人的挽留均婉言谢绝，毅然回国，并带回大批印度的文化典籍和各种佛教艺术品乃至花木种子，曾在长安公开展览。他回国后不久，就与他的弟子辩机合作写成了有名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此书详论了138国的见闻，是今日研究古代中亚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他谢绝了唐太宗要他从政的劝告，专心翻译他从印度带回来的大批佛典，有暇则兼事教学。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共译出经论1335卷，还跟印度友人智光、慧天等互通讯问，交换学术情报。又应各方面的要求，把中国的古典哲学《老子》和印度已经失传的《大乘起信论》译为梵语，在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联系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思想继承性方面，探讨了玄奘"西行求法"的动机、目的，及中国魏晋玄学如何过渡到隋唐宗派佛学等问题。认为玄奘在出国以前，曾向国内一些知名法师求学，主要学习了真谛一系的《摄论宗》，兼习《地论师》南北两派的学说。玄奘对他所承受的一派思想学说，乃至当时各家不同的解释，皆有所怀疑，这便是他游学印度的动机。目的是要从佛教的发详地取得佛学的真谛，借以调解中国佛教内部思想的纷争，为统一的祖国服务。本文对佛教各派争论的问

题，如有关佛经的翻译、“当常”与“现常”的分辨、正因佛性、“地论”师的相州南北两派之争等问题，以及玄奘的贡献、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魏晋玄学思想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影响等问题，均作了详细的解释、分析和评述。

662 唐玄奘和他的《大唐西域记》 方 循

（《历史教学》1957年第4期）

唐玄奘是中国佛教徒西行求法，成就最大，译述最多，影响最深的杰出人物。他的《大唐西域记》是记述丝路各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最为详瞻、千古不朽的著作。它记述了玄奘不避艰险留学印度的全过程，是一部研究中古时期有关西域各国及印度历史的重要资料。

玄奘大约生活于公元600—664年，本姓陈名祎，河南緱氏人。他为研习佛典，不畏杀身之祸，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偷离唐都长安西行，路经秦州、兰州、凉州、玉门、伊吾、高昌、焉耆、库车，经中亚细亚、阿富汗，登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在北印经历了滥波国（阿富汗东境拉格曼地方），那揭罗曷国（巴基斯坦西北边省北部）、健驮罗国（巴基斯坦北夏华城）、迦湿弥罗国（克什米尔一带）等十多国。入中印度，到了释迦牟尼降生地劫比罗伐窣堵国（今尼泊尔南境），参观了已颓毁的释迦牟尼父母净饭王和摩耶夫人的正殿和寝殿。到了那烂陀寺、曲女城等等佛教名寺，足迹遍及印度各地区。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离印，645年回到长安，历时十七载，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后主持译经，共译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多卷。他除翻译佛经外，还把我国老子的《道德经》译为梵文，把印度失传而有汉文译本的《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并传往印度。

《大唐西域记》系玄奘西游时将西域各国及印度各地见闻材料，口授给当时参与译经工作的大总持寺僧辩机撰写，最后由玄奘亲自校正、修润而成。据贺昌群先生考订，宋代以前的版本无“玄奘译”记载。后世所称“玄奘译”者，可能是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开雕蜀版《大藏经》时所误。《大唐西域记》成书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七月，共十二卷。内容是“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随所游至，略书梗概”；撰写目的是为后世读者可以“想千载如目击，览万里若躬游”，并用以“补阙地志、山经”。此书叙述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由距唐帝国较近的阿耆尼国（新疆焉耆）开端，共记西域、印度一百三十八国。其中玄奘亲践者一百一十国；听传闻者二十八国。叙述体例一般是先记各国面积、都城、山川、气候、交通、物产概况，再记社会习俗及地方特点，注重佛教寺庙、僧侣、佛教活动、佛教故事及其传说。其中，尤以记述中亚及印度各国历史、地理称著。因此，该书是研究古代印度、中亚地区历史的珍贵材料，对我国古典文学也具有重大影响。

663 试论玄奘法师出生、西行的年代问题 郭元兴

（《现代佛学》1964年第3期）

玄奘法师是曾往返丝绸之路上的一位世界性的古代文化伟人，是从事国际文化交流

工作的光辉典范。他不畏艰苦、求学取经的英勇精神和翻译佛经的伟大成就，均为世人所赞扬。但关于他在世的年龄却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本文引证史籍文献的有关记载，对玄奘法师出生、出家及西行年代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首先列举了对玄奘世寿的十种不同说法和依据，并略加解释。这十种说法包括从56岁至69岁。接着文章从玄奘自长安西行及从西域回到长安的时间等五个方面的史料，论证了玄奘的年龄不能小于“68岁”。并对玄奘在唐高宗显庆二年和四年先后两次所上《请入山表》和《重请入山表》中所述的“行年六十”和“六十之年”作了分析，认为这两种说法，并不是指某一年是60岁，而是泛指60至69岁的一段期间。又从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刘轲的《大遍觉法师塔铭》的记述中，论证了玄奘的世寿应为69岁。进而详细考证研究了玄奘的出家和西行年代。关于出家年代，文章根据道宣的《续高僧传》和《慈恩传》的有关记载，从人事、地点和时间等三个方面作了考证，确定玄奘出家时的年龄为12岁。关于西行年代，文章从《慈恩传》、《大唐西域记》、《续高僧传》和道世的《法苑珠林》等文献记载中，引证了有关资料，并对玄奘西行中的四件事作了考证：（一）因霜灾而敕道俗四出就食时离开长安；（二）在凉州会见都督李大亮；（三）到素叶城碰到突厥的叶护可汗；（四）在谒见叶护可汗时，有汉使来通国书和信物。结果确定：玄奘于贞观元年八月间离开长安，九、十月间在凉州遇见李大亮，以后在高昌过冬，大概在贞观二年春夏之交，在素叶城碰上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并见到汉使及信物。同年末，叶护可汗被杀，从而证明文献中一致记载的玄奘在贞观三年开始自长安出发西行之说不能成立。认为《西域记》中贞观三年的“三”字乃“元”字之误，遂致以讹传讹。经过考证和分析研究，文章最后对玄奘法师的出生、出家、西行及其享年，确定为：他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大业三年（607年）正月二十八日，时年12岁于洛阳敕度为僧；32岁，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朔旦自长安启程西行；50岁，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二十四日回到长安；69岁，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五日卒于玉华。本文引用资料丰富，考证缜密，论述清晰，可作研究玄奘生平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664　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　　　　游　侠

（《现代佛学》 1964年第3期）

本文介绍了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翻译佛经的业绩，并作了评论。玄奘沿丝绸之路赴印度求取佛经，周游西域17年，备尝艰险，于公元645年回国，带回三藏梵本657部。他回国后的主要事业，就是翻译经论。从645年春组织译场，入夏开始翻译，一直到他于664年入寂的前一个月为止，前后历时将近20年，始终专志不懈地献身于译经工作。他从最初住弘福寺，创译《大菩萨藏经》开始，中间经过移住慈恩寺、西明寺的翻经院，直到最后定住北山玉华宫，译完《大般若经》为止，先后译出大小乘经、律、论等，共75部，总计1335卷。另外，他还在回国的第二年（646年），应太宗要求，就其见闻所及，口授门人辩机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一部，共十二卷，详述游历西域见闻及各国的疆域、史迹、风习、物产等，保留了丰富的古代史料，为国际学术界所珍视。他还于

647年，应东印度童子王的请求，将中国古籍《老子》译成梵文，流传于迦摩缕波一带。公元648年译出印度外典属于婆罗门正宗六论中之一系的《胜宗十句义论》一卷，又应西域僧人的要求，将《大乘起信论》由汉文译为梵文。文章将玄奘的译经事业分为三个阶段，即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公元645至649年）；唐高宗永徽元年到显庆四年（650至659年）；显庆五年到麟德元年（660至664年）。并详细介绍评述了各个阶段的主要译著及其意义。作者认为玄奘在译经事业中，注意各家学说的来龙去脉，介绍完整，规模广阔，内容丰富，译笔精确透彻，学术性强，成就空前卓越，对中印思想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他对事业专勤不苟、坚持不懈、艰苦奋斗、穷源竟委的精神，永远值得继承和发扬！他留下的译著，永远是汉译佛典中最宝贵的遗产。

665　玄奘与印度佛学

——从玄奘在印所著的三论说起　　　　吕　澂

（《现代佛学》1964年第4期）

我国有许多佛教徒先后去印度求法，但能够穷究印度佛学的精微，并发抒创见作出贡献，给印度佛学以一定影响的，只有玄奘一人。这主要表现在他学成即将返国之时（约当公元641年），连续用梵文写出的三部论著——《会宗论》、《制恶见论》和《三身论》。本文根据《续高僧传·玄奘传》、《慈恩传》、《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等文献的记录，分别论述了这三部著作创作的背景、缘由和过程，以及著作的影响和作用。《会宗论》是为了解决佛教大乘佛学中观派与瑜伽派两派的事端而作。早在玄奘到达那烂陀寺时，寺中已形成了两派对峙局面，玄奘师事的戒贤是瑜伽行护法的嫡传，而持反对议论的师子光则属于中观派清辨一系。他们各执己见，在那烂陀寺似已无人再作调和之想，但玄奘到来后，提出予以会通的主张，并造《会宗论》，融会瑜伽、中观之微旨，以静大乘之纠纷。《会宗论》在那烂陀寺流行后，一时间平息了中观、瑜伽之争，但并非两派从比再无争论了。据义净所传，直至玄奘离开那烂陀寺近三十年，其争论依然存在。《制恶见论》是给反对大乘佛学的一切小乘、外道的一个总答辨。此论写作经过，据《续高僧传·玄奘传》的记载，先是有南印度摩腊婆国王师般若掬多（慧藏），系小乘正量部学者，他作《破大乘论》七百颂，东印度各国小乘僧徒作为武器来向大乘挑战。玄奘对此写了《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当时中印的统治者戒日王见此大为称赞，遂邀玄奘参加有十八国国王和各国大小乘学者、婆罗门、耆那教徒等，连同那烂陀寺的部分僧众，共有六千人参加的曲女城大法会，会上玄奘的主张大获全利，玄奘的声誉也从此远播四方，为当时宏扬大乘佛旨之第一人。《三身论》现已知是赞扬佛德的作品。从当时印度情况看，在较大的佛教寺院里，礼佛之次都有短赞，也少不了朗诵长篇。一般所用有《四百赞》、《一百五十赞》、《杂赞》以及《糅杂赞》等等。玄奘在酬答鸠摩罗王有关佛德之问，不取现成的赞佛作品，而另写《三身论》，显然是要突出三身的重要意义。本文认为：这三部著作，对当时印度佛学的关键性问题，都作了精湛的阐释，重新论定了大乘佛学的意义，对宏扬当时印度佛学起了重要的作用。玄奘也因比而获得很大的荣誉，被佛教群众推尊为“解脱天”和“大乘天”，从而声名远扬。

666 苏祇婆其人 何昌林

（《新疆艺术》1983年第3期）

北朝有三位著名的音乐家，即：苏祇婆、郑译与万宝常。郑、万二位，《隋书》中有传，身世甚明，唯有苏祇婆，除郑译在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曾对隋文帝说："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祇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曰：'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世代传习，调有七种'"的记载外，别无任何材料可查。然而，无论是研究隋唐音乐史，中国乐器史，还是研究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的交流史，及燕乐宫调理论等，都免不了要涉及苏祇婆的龟兹琵琶及其"五旦七调"的龟兹宫调理论。因之，作者专门探讨了苏祇婆的身世、行踪。常任侠在《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一书中引用杨宪益关于苏祇婆身世的假设考证，证实苏祇婆即曹妙达。作者引证《北史·后妃传》、《旧唐书·音乐志》的有关记载，认为杨宪益的《关于苏祇婆身世的一个假设》不能成立，苏祇婆非曹妙达。桑原骘藏《隋唐时代来往于中国的西域人考》中认为，白明达是"随北周突厥皇后入中国之一乐人。"因此，白明达会不会是苏祇婆？本文作者指出：白明达是隋炀帝的"乐正"，他一生历隋炀帝、唐高祖、太宗、高宗两朝四代，从年龄上看要比苏祇婆晚一辈，因此，只可能是苏祇婆的后代，决不可能是苏祇婆本人。那么，苏祇婆其人究竟为谁？《旧唐书·音乐志》载：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儿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经作者对白智通与苏祇婆来长安时间、任职、与郑译的关系、族属、姓名取义等各方面核对，龟兹琵琶家与龟兹宫调理论家苏祇婆，只可能是当年长安的西方诸国之乐的总教习白智通。

667 关于苏祇婆身世的一个假设 杨宪益

（《新中华》复刊1945年第3卷11期）

杨宪益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对西方文化研究造诣较深，对中外文化交流多所贡献，他第一个把我国名著《红楼梦》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其影响颇大。先生于1945年前后，为《新中华》杂志连续撰写中西文化交流专著，本文对中国音乐文化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苏祇婆的身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而又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苏祇婆是将西域音乐介绍到我国的重要人物，对促成中国音乐的改革做出过重大贡献。因此，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向达先生的《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就是早年研究的成果之一。《隋书·音乐志》对苏祇婆的身世虽有记载，但只知他是龟兹人，北周武帝时从突厥皇后来华，其余多所阙略，因此推测他的身世，实殊困难。作者根据《隋书》、《周书》、《北史》、新、旧《唐书》以及国外著作等大量史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即：苏祇婆就是北齐的曹妙达。曹妙达之名，如果根据梵文译成中文，正好是苏祇婆。据史书记载，苏祇婆来华是公元568年，而曹妙达开府封王是公元570—576年的事，这样在同一时代，差不多在同一地方，居然有了两个善

弹琵琶的西域人，都名叫苏祇婆，世间恐无此巧合之事。因然，杨宪益先生作了这样的假设：北周的苏祇婆就是北齐的曹妙达，他的父亲名僧伽达沙，是西域曹国名僧，曾在伽湿弥罗国治声明及大乘学。苏祇婆幼年为突厥所虏，因家学渊源，精通乐理，周武帝天和三年（公元568年）或前数年，以突厥皇后的随从乐人来到北周，后又到北齐，遂认识了万宝常。公元570年后，因善弹琵琶，得北齐后主宠幸，位至开府封王。公元579年又入北周为乐工，与万宝常同为郑译门下客。公元581年北周亡后，他又随郑译归隋，公元582年，郑译根据他的理论，作四十八调。后因隋高祖不喜胡乐，一度同其他乐工均遭遣散，但不久仍为隋朝政府所重用，为隋乐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苏祇婆本人不但对隋朝音乐有重大贡献，而且他的后代，都为唐朝琵琶名手，如曹保、曹善才、曹钢等，对唐代音乐均有很大贡献。西域音乐的传入，是中西文化交流上的一件大事，而最早传入西域音乐文化者，当属苏祇婆。因此探讨苏祇婆的身世、贡献，以及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影响，对研究中西文化史，中国音乐史有其重要的意义。

668 康昆仑与段善本 杨宪益

（《新中华》复刊1946年第4卷第1期）

查《乐府杂录》有一段关于乐人斗艺的故事，记唐贞元年间长安大旱，祈雨斗乐。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敌。及昆仑登楼度曲后，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仍以昆仑所度之曲奏之，及下拨，声如雷，妙入神，昆仑惊咤，乃拜为师。及女郎更衣出见，乃庄严寺段善本也。在这段记载里所提康昆仑究系何人，来自何国？除《乐府杂录》、《国史补》、《幽间鼓吹》等书所记皆以善弹琵琶称著，而未提及籍贯，姓氏及来华年月。根据康昆仑姓氏来看，他应为西域康国人。既为康国人，为何又叫昆仑？本文作者认为，昆仑命名可能与大食人在我国贩卖黑奴有关，因为唐宋间被大食贩运而来的黑奴，统称之"昆仑"，所以他被名昆仑，也是正常之事。关于他入唐的时间，据作者考定，当在天宝末年。因玄宗喜音乐，广求乐人，康昆仑又是琵琶名手，如果他于开元或天宝来中国，一定会与李龟年，贺怀智齐名，但当时的记载并无他的名字，故他入唐可能在天宝末或至德初年以后，而在大历十二年之前。因为《旧唐书》记乾元元年五月，黑衣大食遣使朝贡，六月吐火罗、康国遣使朝贡，这是自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怛罗斯战后，大食与唐朝第一次往来，康昆仑来华，可能就在这年。白居易的诗里说到康居天宝间进献乐伎，这可能是康昆仑来华的机会。由于他善琵琶，入唐后为元载长子伯和的门客，当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元载父子赐死后，昆仑成为一时琵琶名手，得到德宗的宠幸，直到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因长安大旱，段善本与之祈雨斗乐，

至于段善本，只知他是庄严寺的和尚，其身世不见于史籍。庄严寺为隋文帝时所建，原名禅定寺，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名庄严寺。关于段善本事迹可考者，仅《次柳氏旧闻》和《酉阳杂俎》，从这两书的片断记载看，知他弹琵琶技艺，决妙时贤，受到明皇的宠幸。后经丧乱，遂隐姓埋名，不求显达，三十年后，这位老乐师改妆红颜少女，在广众之中，一显身手，以绝妙的技艺压倒了西域的昆仑儿，实为我国音乐史上的一段趣事。根据有关记载，康昆仑曾请善本传授他的乐曲和技艺，遭到善本拒

绝，只得到《梁州曲》的一半，并将此曲和《羽调绿腰》传于后世，这是他对我国音乐史上的一大贡献。

669　康昆仑与摩尼教　　杨宪益

（《新中华》复刊1946年第4卷12期）

关于康昆仑的国籍、身世、来中国的时间等问题，作者曾在《康昆仑与段善本》（见上文）一文中，进行了考证，以为康昆仑来中国是在唐天宝末至大历十二年间；与段善本斗乐是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康昆仑命名可能与大食人在我国贩卖黑奴有关，唐宋间被大食贩运而来的黑奴，统谓之曰昆仑奴，所以昆仑之名可能由此而来。在本文中作者根据有关资料，对前说作了订正。首先，昆仑与段善本祈雨斗乐的时间，应在唐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四月，因为《唐会要》记“贞元十五年，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旧唐书》说“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阴阳人法术祈雨”，《乐府杂录》云在“贞元中”。据此，可以认为祈雨斗乐是贞元十五年的事。唐代摩尼教徒在传递中西文化方面颇多贡献，古代康居的七曜历，就是被摩尼教徒于八世纪时带到中国的。而其在音乐方面的贡献犹多，如名曲《穆护子》就是Makgu的译音，其意为摩尼教或袄教的教师。康昆仑可能是摩尼教徒，因为《唐会要》载有“回鹘可汗王令明教僧进法入唐，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六月二十九日敕赐回鹘摩尼为之置寺。”这与康昆仑来中国的时间相合，故可以认为康昆仑是明教僧（即摩尼教徒），于大历三年来中国的。关于康昆仑之命名，作者原考订昆仑是黑奴的意思，后经审订，昆仑应是“骨咄禄”，即Qutlug的译音，其意为“庄严”或“幸福”，这是摩尼教徒常用的名字。至于天旱祈雨斗乐，因康昆仑是摩尼教法师兼乐人，出场演奏是合乎情理之事（关于唐代乐舞用于祈雨之事，甚为普遍，作者在《新中华》第4卷6期上另有一篇《柘枝舞的来源》作了考证）。但奇怪的是段和尚何以六，七十的高龄化了妆来与康昆仑斗乐？这不能不与宗教斗争相连系，此二人的斗乐，实际上是佛教与摩尼教斗争的最好例证。另外，《新中华》第4卷21期中还有作者的另一篇考证宗教斗争的文章《鹘打兔》，可供研治中西文化与宗教史者参考。

670　来自中亚的北齐画家曹仲达　　吴焯

（《新疆艺术》1983年第3期）

东汉末年，印度佛教经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继而进入内地，至南北朝时，佛教寺院已遍及大江南北，图绘寺壁的佛像画得到空前的发展，许多来自印度和中亚的画家参加了绘制佛像的活动，北齐曹仲达即其突出代表。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国朝宣律师撰《三宝感通记》具载仲达画法之妙，颇有灵感。僧悰云：“曹师于袁，冰寒于水，外国佛像，亡竟于时”。曹国，在今苏联撒马耳罕西北，为昭武九姓之一。昭武九姓之入籍中原，早在北魏之前就已开始，至北魏达到高潮。仲达的祖辈即在此时或稍后来到洛阳。仲达虽善画佛像，然记载中流传下来的佛像画迹却甚少，在唐代已是凤毛麟角。《历代名画记》记录他的

作品共有六幅，但无一佛像画。这六幅画有三幅为肖象，三幅为描写贵族演武、游猎生活的画面，画中人物皆北齐贵胄。由此肯定他为一宫廷画家无疑。宫廷画家须受皇家限制，不能随意创作和应承寺院壁画业务，因此佛像画稀少就不足为怪。仲达之画至宋已绝迹，实属憾事。画史中记载的曹画风格，见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其后北齐曹仲达、梁朝张僧繇、唐朝吴道玄、周昉各有损益。圣贤肸蚃，有足动人；璎珞天衣，创意各异，至今刻划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斯万古不易也"。北齐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又就其中的"曹、吴二体"作了具体论述：曰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曹衣出水"是以细密的线条，依循身体的结构起伏进行刻划，衣服象水湿过似地贴在身上，从而显示人体的健美。本文作者认为，新疆即古代西域一带具有龟兹风格的壁画，最接近于曹仲达的画法。作者还认为，看待曹仲达不能囿于他个人的艺术成就，而应该把他和他的"曹衣出水"式的画法放到一个特定的画派当中去考察，才有实际意义。曹仲达的佛像创作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事实，大抵中国本土的佛像画最初都是依印度或中亚的佛画蓝本制作的，此种作法一直继续到唐代。中国早期的佛像画家，一方面直接依天竺、西域的蓝本仿制，一方面融合这种外来画法单独创作，终于形成具有中国风貌的佛像画，所以曹仲达"曹衣出水"式画法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佛教画艺术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十、丝路考古

671 斯坦因与亚洲极中部文物　　周谷城

（《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本文简要介绍了斯坦因在亚洲极中部的考古旅行及其所搜集的考古文物与著述，并论证了古代亚洲极中部的交通道路、国际贸易和文化地位。斯坦因在英领印度政府工作时，利用印度政府的支持，于1900年至1933年，曾到亚洲极中部与中国西北部作过四次考古旅行。旅行路线是：从印度出发，到克什米尔、帕米尔、到新疆的疏勒，沿昆仑山北麓，经和阗、于阗、且末、婼羌等地，到甘肃的敦煌。由敦煌到玉门、酒泉，越长城旧址，经毛目，沿弱水到内蒙古的居延海。然后回到甘肃，向西北行，再入新疆，沿天山南麓，经哈密、鄯善、吐鲁番、轮台，库车等地，再到疏勒，经帕米尔回印度。他在中国西北部、印度西北部，伊朗东南部各地的考古旅行，搜集到大批文物，仅在中国西北部即得文献数千卷、木简数百枚，还有大量实物，包括石器、陶器、金属器、丝制物、艺术品等。斯坦因对其旅行经过及所获文物，写成许多著作。计有《中国土尔其斯坦考古旅行初步报告》一卷，《和阗沙迹中的遗物》一卷，《迦泰荒墟的遗物》二卷，《古代的和阗》二卷，《亚洲极中部》四卷，《塞林地亚》五卷，《古代中亚之遗迹》一卷，《印度西北与伊朗东南考古记》一卷，《印度、伊朗边境的考古》一卷，《亚历山大东征印度的遗迹》一卷。此外还有许多论文刊登在考古学及史地学等杂志上。文章认为，沿丝绸之路大量丝制物品的发现，证明这些地方丝绸贸易的发达，并引起各地文化的交流汇合。在汉唐时代，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交织于中亚达一千年之久。文章还对斯坦因的旅行，对古代印度西北五河流域的交通要道和中国西北部与葱岭以西的交通要道的论证，作了论述。认为斯坦因对公元前四世纪时，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翻越兴都库什山远征印度的路线的考察结果，完全为可靠的事实。并对丝绸之路开通后，汉朝在敦煌以东、天山南麓和昆仑山北麓设立屯田军区，以维护丝绸之路安全的意义作了说明。

672 从出土文物看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　　李遇春

（《民族团结》1964年第9期）

从原始社会起，新疆和祖国内地就发生了相互影响和联系。新疆境内的“细石器文化”遗存，是我国北方各省细石器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出土的许多细石器遗物，与内蒙古、东北的出土物质的料、制作、用途完全相同，证明当时各民族间联系甚密。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磨制石器、彩绘陶器、两尖状黑陶器等，与内地出土的同类器物的形制大同小异。这说明新疆与祖国内地远古文化间的相互渊源。殷、周时代，新疆是戎国羌族等民族的居住地。汉代，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与西北各族（国）建立了密切关系，汉朝

政府的领导权正式通行于西域。当时西域各国大小官员所用的印章，都由汉朝统一颁发，以为“征发符信”。汉在西域屯田积谷之事，说明中原与西域联系日密。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汉王朝在乌垒城建立了都护府。从此，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匈奴贵族落后制度的束缚，与中原的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新的一页。从汉、唐至明、清，历代朝庭设在新疆的行政领导治所，曾多次易名和更改驻地，但是，代表历代中央政府统辖新疆地区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作用，是始终如一的。考古调查中，乌垒一带的几处遗址，曾发现碎陶片、红色素陶器，均为汉初之物。唐朝安西与北庭两都护府的建立，进一步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间的亲密关系。在北庭都护府金满遗址，屡次发现开元钱，以及类似唐长安城出土的花方砖、金器、铜器及陶器。证明古城在唐代是很繁荣的城市，也是传播中原先进文化、沟通汉族和新疆各族联系的重镇。解放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内地和新疆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遗物。从中原交流到新疆的有丝织品、纸张、藤器、铜器、生产工具等；新疆的民族文化影响于内地的，有：印染技术、植棉技术、绘画艺术、音乐舞蹈等。内地先进的经济、文化对促进新疆的社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古代新疆各族的经济、文化也同样影响到内地，从而成为我国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另外，汉族自古就是新疆多民族成份中的一员。据历史文献记载，汉族迁往西域，远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已开始，其中有的因随从汉公主与乌孙联姻到了西域，有的因屯田到了西域。隋炀帝末年，中原混乱，西北各省人民除纷纷逃往突厥外，有很多人逃到高昌地区。高昌的历史文物证明，这里历晋、南北朝、隋、唐到宋代以后的悠久岁月中，都居住着大量的汉族人民。以上事实证明，从遥远的古代起，新疆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678 新疆考古概况

——中国考古学专题报告　　　向　达

（《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2期）

本文是作者于1953年9月在第二届考古人员训练班上所作的专题报告，概述了新疆的历史地理和一般考古情况，附带涉及河西走廊和邻近地方的考古。内容分为新疆的历史与地理；北疆略记；南疆考古行记；以及总结等四部分。新疆的地形北部到阿山、塔城区，西以葱岭为界，南以昆仑山为界，中间横贯天山，分为南北二部：天山北为天山北路，是为北疆；天山之南为天山南路，是为南疆。南、北疆地势不同，北疆是草原区，南疆是沙漠区；北疆气候寒冷、南疆天气炎热。新疆以维吾尔族人最多，此外有哈萨克、蒙古、塔塔尔、柯尔克兹、塔吉克、回族、汉族、俄罗斯、满族、锡伯、索伦、乌孜别克等。新疆在十二世纪海上交通未开以前，曾是中西交通的大门或桥梁，以通往今天的阿富汗、印度及苏联地区。新疆为交通要道，绿洲也很富饶，因此，在古代南疆一带有众多小国分部其间，各见于《汉书·西域传》。这些国家因位于中西交通要道，所以文化、历史也非常复杂。汉唐时通过新疆中外文化互相交流，中国丝绸经新疆抵欧洲。因此称这条道路为丝道。这条丝道经兰州，过乌鞘岭，到了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由敦煌西行，自罗布淖尔分二道：北沿天山南坡西行　经吐鲁番、焉耆、库

车、阿克苏、喀什噶尔，再西越葱岭到苏联境内；南沿昆仑山北坡西行，经婼羌、且末、于阗、和阗过葱岭到阿富汗、印度。这两条路上，西汉时有城国三十六国，东汉时有五十二国。古代无论由西到东或自东到西都要经过敦煌，因此敦煌就成为咽喉之地。沿此二路，有许多遗址，这是本文着重叙述的。北疆考古重点可分为：一、天山北路的古城遗址：在今之镇西，有巴里坤湖，汉时为蒲类海，为汉与匈奴大战之地。今镇西城内关帝庙有唐太宗攻打高昌的纪功碑。唐金满城，今名古城子，唐北庭都护府所在地。汉疏勒城，汉时匈奴击车师，汉将耿恭守疏勒，此城在今乌鲁木齐附近。二、伊犁及阿山、塔城区：阿山、塔城一带与南西伯利亚地域邻接，民族相同。苏联在南西伯利亚发现了丁零文化（斯基泰文化）。斯基泰民族活动中心在黑海，西及巴尔干半岛，东及蒙古，其文化特点是以动物图案装饰在带钩小刀上。阿、塔区域包括在斯基泰民族活动范围内。又哈萨克民族中的乃蛮，乞烈二部原属成吉思汗初起时的十三翼。当时他们信仰景教，此教唐时即到中国，宋、元时盛行于中国边疆，后来他们并入哈萨克，到十三、四世纪后哈萨克改信回教。作者对南疆的考古记叙甚详，南疆在古代是几个国家互相争雄的地区。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的南疆，印度、伊兰（摩尼教、景教）文化颇盛，公元前二世纪以后，汉文化向西发展，特别在高昌，七世纪(唐)时，中国势力更漈漫南疆，八世纪为阿拉伯所败，一直到十四世纪左右，新疆逐渐成为回教文化区域。南疆的古代遗迹有胜金口、吐鲁番的石窟寺，高昌国都、交河城遗址等，均为考古重地。由吐鲁番西行抵耆焉，此为古时大国，佛教胜地。更西为库车，古龟兹国都，多石窟寺遗址。自六朝以至唐代，西行僧人皆曾经过此地。由库车西行到喀什噶尔，此为南疆大城，北道之最后一站。经此翻越葱岭，即入中亚诸国境。自九至十四世纪，凡五百年，景教曾在此地盛行。由喀什噶尔南行抵英吉沙、莎车（叶尔羌）、和阗，古代景教文献中皆记有教区所派主教驻此。十二、三世纪时，西辽（黑契丹）疆域及于莎城。和阗与印度近，公元二、三世纪时，中国班超与印度贵霜王朝在此互争霸权，最后中国胜利，此地为南道中最重要之地。从和阗东行为于阗县，再东为且末、婼羌。于阗、且末、婼羌三县，过去发现古代寺院遗址、古文书（汉文、佉卢文）甚多。最后部分叙述了近五十年来欧洲及日本对南疆文物的掠夺行经。同时，作者回顾与展望了新疆的考古工作：新疆考古过去多为帝国主义分子们所做，着重于军事、政治目的。真正从历史、考古方面所注意则是从1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开始的，但还有很多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有待我们继续发现和发掘。

674　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　　　武伯纶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

天山南路西以葱岭为界，与苏联、阿富汗、印度为邻，南以昆仑山与西藏、印度相接，北以天山与北疆毗连，中间是塔里木盆地。古代在盆地边缘依水草田建立的许多城国，在两千年前已进入农业社会，手工业发达的程度，与当时的汉朝略同。天山南路由于历史上进入文明领域较早，同时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聚居和东西文化接触溶汇的重要场所，因此在地面地下遗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文物古迹。

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组于1953年9至12月调查了这个地区的文物遗存。本文是以作者个人名义发表的调查概要。

天山南路的千佛洞是这次调查的主要对象。天山南路是国内接受佛教文化最早，佛教信仰最盛的区域。这次调查的千佛洞主要是分布在吐鲁番、焉耆、库车、拜城等县的，共计13处，660个洞窟。作者为清楚起见，特分名称、位置、简单情况等栏目列表作了介绍。这十三处千佛洞的共同点是异常残破，原因不外三点：一是自然力的破坏，二是农民的破坏，三是帝国主义文化盗劫分子的破坏。十三处千佛洞大致分为两个区域，一是以库车为中心的龟兹区，一是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区。两区的洞窟形式，壁画作风和内容，残存经文等显然不同，龟兹区接受的印度文化成份多，高昌区受关内文化影响深。其次调查的是废城遗址。在天山南路的沙漠戈壁中，到处可见废城遗址。这次调查的主要属于库车区。作者也就名称、位置、简单情况这三方面，列表作了介绍。这些废城遗址，作者认为如高昌、交河等古城，视其建筑形式，显然是古代的政治军事中心，而在今库车七区草湖中的唐王城、桑达姆等则可能是屯田和粮仓的遗址。再从库车车废城遗址的分布地区看，可以想见当初的东西通道，大致是沿着塔里木河以北走的，现在的公路则向北退了很多。当地群众说，库车迤南，属于今新和、沙雅两县的废城遗址有数百处之多，足证过去在这一带人们活动的中心，是在今新和、沙雅两县，而不是在今库车。这些古城遗址的存在、废弃或破坏年代，很难确定。须有更多的实物材料和经过较详细的比较研究，才能作出结论。另外，还调查了天山南路的玛札尔和坎儿井。玛札尔是维族信仰伊斯兰教后的王或者是圣人的祠墓。这些玛札尔除其图案花纹和建筑形式令人注意外，对于了解维族的历史也很有帮助。坎儿井在南疆特别是在吐鲁番地区很多，关于坎儿井的来源，清朝人根据《汉书》说是由关内传去的，但从《马可·波罗游记》中知道中亚一带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作者认为这种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需要而出现的创造，很难说是由那些仿效的，而是象征新疆人民和自然斗争的伟大工程，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675 "丝绸之路"新疆路段考古述略　　王炳华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0期）

本文系作者在新疆外事干训班上的讲课教材。作者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了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具体路线，并根据各地文物古迹和地下发掘所得，对丝绸之路在新疆地区南北两道上的历史名城，如南道上的楼兰、尼雅、于阗、莎车和所谓中道的伊吾、高昌、交河、龟兹，以及北道的巴里坤、吉木萨、昌吉、轮台、弓月城等，及其周围的石窟寺院，一一进行了考证，从而得以了解丝绸之路在新疆段的具体走向，这些城镇在古代丝路之上的繁荣景象，以及宗教盛行状况。同时，本文还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经济、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了解掌握丝绸之路的全貌和从事丝路之学的研究颇资参考。

676 新疆考古的发现 黄文弼

（《考古》1959年第2期）

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新疆考古队，于1957年9月至1958年8月，对两个专区，两个自治洲，二十四县，两个市内的古城、遗址及寺庙约一百二十七处，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在焉耆、库车作了一些发掘工作，采集实物颇丰。本文是对这次调查工作概况的报告。一，焉耆专区的调查与发掘：焉耆专区包括和硕及和靖、焉耆自治县。四面皆山，北、西为天山，南、东为库鲁克山，中为博斯腾湖，西、北两面隆起大平原，海都河流贯其间，古代的危须、尉犁、焉耆三国分布在海都河沿岸及博斯腾湖的西北边。初都为小国，到魏晋以后，危须、尉犁并于焉耆，焉耆始为大国，东与高昌接，西与龟兹接，南与鄯善接，北界天山，而与匈奴、乌孙为邻。在焉耆共调查古城十一座，土墩寺庙、古坟等九处。重要的古城如曲惠旧城，萨尔墩旧城，可能是古代焉耆、危须二国地。四十里城子旧城，作者认为是魏晋以后的焉耆新都。锡科沁旧城，原为尉犁国地，后为焉耆所并，尉犁即改为焉耆之一县，唐王城疑即焉耆之尉犁县。历来学者对于焉耆、尉犁、危须三国的位置模湖不清，焉耆都城何在？亦无定说。今据作者实地勘查的几个旧城，配合文献，作了上述推断。考古队在焉耆发掘遗迹二处，一为明屋，二为唐王城。明屋沟南发现有佛头八十余件及佛身、佛饰、木件等，沟北有壁画七、八块、墨写老维文木简二件，大型佛头三件，模型四件，陶罐二件及残木件等。通过对这些遗物的考证，认为耆焉佛教艺术，早期的接近西方艺术，而后期的则又受了东方艺术的感染，彼此交流融化，丰富了焉耆的民族艺术。唐王城中发现有谷物多种，这对研究焉耆农作物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二、库车的调查和发掘：在库车、沙雅、新和共调查古城和遗址十六处，内有古城四座。又西行到喀什、和阗，发现古城五座，遗址五处。库车为古龟兹国地，汉唐都护府均设在龟兹境内。二千年来，在政治与文化方面，即与内地建立了密切联系。考古队以四个月时间，在库车进行了发掘和调查。发掘的古城有苏巴什古城、龟兹古城。苏巴什古城的发掘报告详见《考古通讯》1958年5期《新疆考古三个月》。龟兹古城当为古代龟兹国的延城，是一个历史悠久，非常繁荣的城市。哈拉墩的发掘中发现三十三个大陶缸，本文分三组就其埋藏时代、内装器物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述。还有石器、骨器、陶片及铜钱、铜片、铁片、象牙等器、其中以石器、骨器、陶片较多，作者均根据其形制花纹，探讨了为何时期人们所遗留的问题。这对我们研究新疆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677 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 黄文弼

《考古》1960年第2期

伊犁历来为游牧民族必争之地，首见于中国记载者为塞种、大月氏。塞种自西来，大月氏自东往，匈奴、乌孙接踵而前，莫不以此为乐土，繁殖生息其间而留其残迹。前者以乌孙居此时间较长，与中国关系亦多；稍后者，则为突厥、突骑施、契丹、蒙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与内地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作者于1958年偕同志调查了伊宁、绥

定、霍城、特克斯、察布察尔，昭苏等六县，发现古城十余座，玛扎寺庙数处及古塚石雕人像等若干处。本文即为这次伊犁考古的调查报告。调查中所发现的古城比较重要的有四座，即吐鲁番吁子旧城，在伊宁东北约26.2公里，有两个旧城，一名“阿脱诺克”，译为大金场；一名“克其克阿脱诺克，”译为小金场。因在1936年曾设金矿局，掘挖古城寻觅金子，故名金场，并非古城原名。在这两座旧城中发现少数彩陶片，就其分布路线来说，东自哈密、吐鲁番、焉耆，西达库车、拜城、伊犁，东西形成一线，对于研究彩陶的来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磨河旧城，在绥定西北7.5公里有两座旧城，一名塔基，即清初所建伊犁九城之一的塔勒奇城。一名阿脱洛克，在塔勒奇城北2.5公里，城中亦有红陶片堆积，还有破碎玛瑙。从这些遗物来看，可能自八世纪至十三世纪，此城仍有居民；阿力麻里城，维族称之为“阿脱诺克”，皆是出金子之义。根据地表残存的红陶片、无孔金银钱及石刻、陶器等判断，此遗址在十四世纪时还继续有人居住；海努克古城，在察布查尔县海努克乡北偏东6.6公里，地表也残存有红，青陶片及上刻阿拉伯文字的无孔铜钱及铜件等，可能与霍城阿力麻里大城时代相同，而为十三世纪前后之遗址，直至清初又恢复活动。寺庙较大的有金顶寺废址，维族称为“孔塔已”，在伊宁市东北郊3.6公里，位于高岗上。还有大西沟中石窟寺三处，其时代都不很早。古塚在伊犁、昭苏察布查尔两县的草原上，排成行列，大小高度不等，俱作梯形。表铺鹅卵石，极类似陕西汉唐陵墓，以古代在此地活动的民族来观察，这些土塚也许是乌孙或突厥族贵族陵墓。石雕像在伊犁共发现四处，其中昭苏的二处是石雕人像；霍城的二处，一是人像，一是动物像，大都是在原石上用极简单线条刻划而成。此类石象分布至为广泛，作者判断是八世纪前后突厥民族在墓前常用的标志。

本文系原作者《新疆考古的发现》一文的续篇（已收入本叙录）可参照阅读。

678　从新疆出土文物中探索新疆古代的科学技术　　穆舜英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期）

造纸和纺织、冶铁技术的发明，是我国人民对人类文明所作的伟大贡献。本文作者从事新疆考古工作多年，对新疆考古事业颇多贡献。本文通过新疆考古发掘所得，对我国古代造纸、纺织及冶铁技术的西传，以及古代新疆地区的造纸、纺织及冶铁业的发生和发展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在古代遗址和墓葬中保存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我国造纸技术是东汉蔡伦发明的，但在西安灞桥却出土了西汉时期的麻纸，由此可以相信早在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时，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了纸。东汉时蔡伦主持官府造纸作坊，对改进造纸原料和工艺，对造纸技术、规模及提高纸的质量，做出重大贡献。新疆的最早的麻纸，是本世纪三十年代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烽燧遗址中发现的，与此同时还发现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的木简，由此即可证明这纸当为西汉时的遗物．两汉时期纸已从内地传到了新疆，这显然和西汉政府在新疆设立政权机构——西域都护、屯垦戍边、建立烽燧这一历史事实有密切关系。在新疆出土的古纸，两汉时期的数量较少，却都在烽燧屯田遗址中发现，这时的纸是直接从中原带来的。新疆造纸

究竟何时开始？中原造纸术又是何时传入？说法不一，有谓约当公元四世纪东晋十六国时，吐鲁番已经生产纸张了。但在吐鲁番阿斯塔拉167号唐代古墓中，有一记载囚犯发配到纸坊去作劳役的文书残卷，这说明至迟在唐代，吐鲁番就有了造纸的手工作坊。至于我国造纸术的西传，都认为八世纪时通过新疆传到撒马尔罕及阿拉伯各地。但在吐鲁番阿斯塔拉155号墓中曾出土了一件用粟特文书写的文书，同墓出土的还有记有麴文泰延寿五年(628年）年号的文书，由此可以推断早在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纸就已传到了中亚各地。丝绸纺织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又一伟大贡献。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代甲骨文就有蚕、丝、桑、帛等文字，这说明丝绸的发明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新疆发现最早的丝织品出土于乌鲁木齐阿拉沟相当于春秋战国时的古墓中，其后又在民丰、楼兰遗址及古墓中发现了东汉时期的丝织品，在吐鲁番地区的晋唐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晋唐丝织品，特别是精美绝伦的唐代织锦出土数量较大，织造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新疆出土的古代丝织品，很大部分直接来源于中原各纺织中心，但在新疆何时才出现本地的丝织品呢？从吐鲁番地区阿斯塔拉、哈拉和卓及古龟兹地区出土的《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严福愿从阚金德赁蚕桑券》、《失火烧毁财物账》、《承平八年翟绍远买婢券》、《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等文书记载分析，早在公元五世纪初新疆就有很发达的养蚕育桑业，有丝绢织机；从建初、承平和永康等年号分析，至迟在公元五世纪中叶新疆已有了织锦作坊，掌握了高难的织锦技术；新疆古代的织锦中心在龟兹、疏勒和高昌，而且龟兹、疏勒锦已成为著名的商品。至于我国丝及丝织品，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已传入西方，并通过古代中西交通，即丝绸之路大量运销世界各地。冶铁技术的发明，在人类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据《尚书》、《诗经》记载，早在西周初期我国就已掌握冶炼熟铁的技术，到了春秋时出现了冶炼生铁的技术。在江苏六合县曾出土一块这时期的生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物标本。在乌鲁木齐阿拉沟的春秋战国墓葬中曾发掘出新疆现存最早的铁制小刀，虽无法断定是生铁或熟铁，但《汉书·西域传》确有新疆各地冶铁情况的记载。考古工作者在库车、民丰、洛浦等地已发现汉代冶铁遗址多处，经测定库车在汉代确已开始了铸铁。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大宛以西至安，……不知铸钱（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这说明我国先进的冶铁技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了西方。作者仅从上述三个方面，对我国科学技术的西传进行了研究考证，从考古学角度对中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材料。

679　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　　武　敏

（《文物》1962年第7、8期）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丝织技术的国家。自汉、唐以迄明、清，我国丝织品在世界上一直享有盛名，丝织业一直很发达。本文研讨了1959—1960年先后出土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大批丝织物的织造工艺，对研究我国丝绸西传问题颇多参考。作者将这批丝织品分为织锦、织绮、缣绢、纹罗、染缬、刺绣六大类。以彩色经纬织作出图案花纹的，称为织锦，出土的织锦以花纹不同来分，共三十四种。为了便

于比较研究，将全部织锦统一编号，分名称、田野编号、尺寸、组织、图案（彩色和花纹）、时代、出土地点等栏，纪录于表一“织锦标本登记表”中。表一中1—3号出自民丰尼雅墓葬的织锦，时代定为东汉。其余出自阿斯塔那的高昌至唐代的墓葬中，时代当为北朝至唐代初期。作者就东汉和北朝至唐初两个阶段，分别就花纹图案、织纹和显花技术研究了它们之间的异同，从而对汉——唐织锦的发展、演变有了初步的认识。我国织锦在隋唐之际，从织纹到图案都有了新的、重大的变革和发展。这无疑与东晋开始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长期混战，至隋唐之际政治局面出现新的统一，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对外商业、交通也空前发达的时代背景有关。织绮是一色素地织纹起花的提花织物，也有称它为提花绢的。民丰和吐鲁番阿斯他那出土的东汉至唐代初期的这类织物甚多。作者整理出纹样不同的十种，也附有“织绮标本登记表”，记录了织绮的名称、尺寸、织纹组织、图案、时代、出土地点等。根据分析，汉绮在花纹风格上与汉锦基本相同；而北朝至唐初的绮在花纹风格上也接近于同时期的织锦。在起花的织纹上，汉绮是经畦纹；而北朝至唐初则是二至三枚经斜纹，两个时期迥然不同。纹罗是在一种没有“纠经”的织机上织出的经纬组织显椒眼纹的织物，罗地不起花的称为“素罗”；起花纹的称纹罗，民丰出土丝织品中，纹罗只有一件，是染成绛色的菱纹罗。这种织物的织纹比较复杂，作者特意把罗地与罗纹的编织方法、过程，作了图解。绢和缣在民丰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丝织物中为数很多，绢和缣同属平纹织物，根据实地观察，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差异：绢为一般平纹织物，经纬密度大致相等，其织纹与现代的平布纹相同。缣虽与绢同为平纹织物，但其致密厚重，接近于现代最好的纺绸。染缬，凡染色显花的织物称为“染缬”。染缬的丝织品只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有纹缬、夹缬两种。文章分别介绍了其染色方法。关于刺绣，作者选取了八件标本予以研究，这八件刺绣品中，除一件为平针绣外，全为锁绣。据对出土物的分析，可以认为：刺绣技术是由锁绣开始的，在汉代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大约在隋代至唐初，平针绣的针法才逐渐普遍。

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不仅对我国汉、唐时期丝织品可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且对于今天继承和发扬我国丝织工艺的优良传统，也有一定现实意义。

680 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　　　夏鼐

（《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最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阗东面的尼雅遗址和吐鲁番附近的阿斯塔那墓地，发现了东汉（公元25—220年）和北朝至唐初（六到七世纪）的丝织品遗物。这两处都位于新疆境内古代“丝路”的沿线。尼雅古城位于今民丰县城北面，当为汉代的精绝国。1959年10月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这个古城遗址发掘出汉五铢钱、汉镜、“佉卢文”木简、木制和铁制的工具，和本文所描述的丝织品。作者根据亲眼看到的实物，参照前人研究成果，探索了这些丝织品中几件标本的织造技术：一是“汉绮组织”，分为二种：汉绮的第一种显花组织法（类似斜纹组织）的织造技术，和汉绮的第二种显花组织法（汉式组织）的织造技术。“汉式组织”的汉绮，曾在罗布淖尔、诺音乌拉和叙利亚的帕尔来拉等地发现。帕尔来拉是“丝路”西端的一个贸易都市。1933年和1937年在这里

发掘的古墓中，出土了好几件“汉式组织”的暗花绮。这些墓葬的年代是公元83—273年。有些人不同意这些是当时中国制成输出的，但就制作技术和花纹图案而言，作者肯定是汉代或稍晚在中国制成而后输出的。二是汉锦、汉代的丝织物中更为令人喜爱的是五色缤纷的彩锦。为了更好地了解汉锦的特点，作者就它的织法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其中有二色彩锦和三色彩锦的织造法。1959年在内蒙古扎赉诺尔的东汉墓中也有发现，它和尼雅的彩锦，在纹样上大同小异，它们可能是同一织坊的制品，而输出到东西相距三千多公里的两个地方。三是刺绣，汉代的刺绣和织锦齐名，常常是“锦”“绣”并称，被视为珍品。刺绣与织锦和暗花绮不同，它的花纹不是织成的，而是在已织好的织物上面以针刺添附了各色丝线，绣出各种绚丽的彩色花纹。尼雅出土的几件汉绣，都有非常精美的花纹。这些汉绣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和熟练的技巧。就纺织技术而言，汉代暗花绮和彩锦，较刺绣更为重要，因为它们代表当时世界上纺织技术的最高水平。西方对于中国丝织品的需求是刺激近东纺织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为了满足西方市场的需要，在隋代和初唐，中国丝织品的图样有些采用波斯的风格，在织锦技术方面，有时也受到波斯锦的影响。1959—1960年，新疆博物馆在吐鲁番附近的五到八世纪阿斯塔那墓地的发掘中，发现了大批六到七世纪的丝织品。这里也有刺绣、暗花绮和多彩的织锦。暗花绮的织法，实际上和汉绮的第一种织法相同。花纹和北朝至唐初的织锦，风格也相同。作者就织锦的织造技术、花纹图案等问题，作了重点讨论。最后，作者总结说：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首先发明了缫丝为织物原料，后来根据丝线的特点，在纺织技术上有了许多创造发明，在织物图案上也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这些成就经过“丝路”传到西方，促进了西方纺织技术的发展，后来我们还吸收了西方纺织技术的优点，也采用了西方一些美术图案，使我国的丝织物更臻完美。新疆发现的丝织品，为研究纺织技术发展史以及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了新的资料。

681 “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 新疆博物馆

（《文物》1972年第3期）

公元前三世纪我国即以盛产丝织物而闻名于世、被称为“丝国”，这反映了我国丝织物很早就成为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迄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间，张骞出使西域，和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一些国家建立了联系；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他第二次出使时，就“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用作馈赠的礼物。此后，在中西交通的大路上，便不断有大量的丝织物向外输出，这种盛况一直继续到唐代中期。当时，我国与西方陆路交通，主要有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再往西可达条支、大秦等国。北路从敦煌经车师前王庭、龟兹、疏勒等地，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再往西南经安息，而西达大秦。从汉到唐的千余年间，这两条路都曾是运销丝织物的主要通道，后来中外历史学家称之为“丝绸之路”。本文探讨的是从1959年至1969年，在河西走廊的武威、敦煌，新疆南路的民丰、于田和北路的吐鲁番、巴楚发现的汉唐丝织物。汉代织物出土于甘肃武威和新疆民丰两地。东晋到北朝的织物，出土于甘肃敦煌、新疆于阗、巴楚、吐鲁番四处。唐代织

物出土于甘肃敦煌、新疆吐鲁番、巴楚三处，以吐鲁番发现的丝织物最重要。“丝绸之路”上除了不断发现汉唐织物外，还发现了与织物有关的文字资料。其中《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较为重要。从这些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知道，第一、当时通过今天新疆西部运输丝织物的数量相当大，动以百匹计；运输的工具除了常在唐代明器中见到的驮负卷帛包裹的骆驼外，还有牛、驴。第二、“丝绸之路”的北路上还有一条从龟兹到弓月城及其以西的支线，这是一条过去未曾注意的“丝绸支路”。第三、我国商人在弓月城贮存了一次竟可举取二百七十五匹这样巨额数字的大量丝织物，而且还是向“丝绸之路”北路上的重要地点龟兹运送。弓月在今新疆西部伊犁河北伊宁附近，由于地居要冲，已于主要的“丝绸之路”之外，形成另一个丝绸贸易中心。《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的重要价值，不仅为“丝绸之路”提供了新史料，更重要的是，它还记录了早在一千多年以前我国唐代的军、政机关，在今天新疆东部一直到西部，均有效的行使其职权。“丝绸之路”上的无数发现又一次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82 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它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

（《文物》1972年第12期）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是总汇丝绸之路南、北两路，连接河西走廊的“咽喉之地”，在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位置。1965年在莫高窟130窟窟内和122、123窟窟前分别发现属于盛唐时期的丝织物一批。本文是对这批丝织物和其它遗物的分类介绍。丝织物共六十余件，其中有发愿文绢幡二件，染缬绢幡九件，纹绮九件（包括纹绮幡四件），锦幡一件，缀花绢幡一件，完整和残破的各色大小绢幡二十一件，帷帽一件。文后附有“莫高窟发现唐代经幡等丝织物登记表”，对丝织物的名称、尺寸大小、形制和现状、组织、颜色与纹样，都有详细记载。经幡的做工都极为精细，色彩、图案、花纹也极为鲜丽精美。在122窟窟前，与丝织物同出的还有残文书、捺印佛像、塑像饰物泥模、漆器等。丝织物大部分出于130窟第一层壁画下。此窟之开凿大约始于开元，竣工于天宝年间。因此，这些丝织物应为开元、天宝年间的遗物。122窟的丝织物和塑像饰物泥模、漆碗等，也同为开元、天宝年间遗物。全部丝织物以绢和彩绢为最多，次为纹绮，纱和锦最少。对这几类织物的组织、花纹及印染技术等，本文都作了概括说明。丝织物就其形制来说大部分是幡，它们是僧、尼和世俗佛教信徒进行宗教活动的产物。斯坦因从藏经洞中盗去的五箱绢画、幡、刺绣等物中，画幡占有一定数目。大量造幡，必然消耗大量丝织物，当时敦煌可能有一定数量的蚕丝生产，但大量丝织物还仰仗内地供给。从这些丝织物的质量来看，说明唐代丝绸的生产在继承汉代丝织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丝织物上的几种印染方法，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巧，对于研究古代丝绸生产和印染技术发展史有重要意义。敦煌发现的丝绸，也显示了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我国人民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人民所建立的友好关系和共同为世界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683 吐鲁番考古研究概述 穆舜英等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3期）

吐鲁番盆地是我国著名的重点考古地区之一，在世界上也久负盛名，历来受到从事历史、地理、民族、考古、宗教、艺术、语言文字等各方面学者的关注。本文试图就吐鲁番地区近百年来已经进行过的考古工作，作了一个历史的回顾，一方面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派遣所谓探险队、考古队的掠夺行为，另方面对这一地区考古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以求助益于吐鲁番地区的考古研究。

吐鲁番位于新疆东部，是河西走廊进入西域的一个门户，为东西交通必经之地。吐鲁番地区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也是古代新疆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代民族在这片地区活动频繁，东西文化在这里交流会萃。吐鲁番盆地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使这里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在这里可以看到古代新疆地区各族人民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可以看出中原地区文化与印度、伊朗、希腊等国文化在此交流的影响。据已发现的考古材料，吐鲁番地区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吐鲁番地区已进入阶级社会，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文章对这片地区的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1.车师王国时期；2.高昌郡时期；3.高昌王朝时期；4.唐代西州时期；5.高昌回鹘时期；6.吐鲁番王时期。最早记载吐鲁番地区文物古迹的是宋代王延德的《使高昌行记》一书。公元十八世纪中国的金石学家和边疆史地学家，更有意识、有目的地注意考察吐鲁番地区的文物古迹。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出现了“探险”热潮。各帝国主义国家，派遣“探险队”、“考古队”麇集到新疆进行所谓考古活动，其中主要是俄、英、德、美、法、日、瑞典等国的“探险队”。文章对这些国家的所谓考古活动的人物事迹，盗取文物的活动方式及数量和他们的研究成果等做了概括性的介绍。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考古学家从事吐鲁番考古而成绩突出者是黄文弼先生，文章对其成果做了简单介绍。解放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考古发掘，最突出的工作是对吐鲁番高昌古城北郊哈拉和卓和阿斯塔那古墓区的发掘工作，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五年共进行了十一次，发掘了415座古墓葬，出土大量的文物资料。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又在阿拉沟、鱼儿沟古墓区发掘早期古墓近80座，发掘出土的各种文物资料，对研究吐鲁番地区的古代文明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远较史籍的记载丰富多彩，可补我国正史记载的缺漏。文章分门别类对发掘的出土文书；墓志、碑刻、题铭；城址、石窟、寺院；各类纺织物；农产品和作物栽培；艺术品；天文历法；医药学；造纸、印刷术等方面的考古研究成果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同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可贵的建议。

684 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 竺敏

（《考古》1972年第2期）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早在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我

国劳动人民就已掌握了相当成熟的丝织技术。到了汉代，我国的丝绸生产技术已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中国丝绸远销中亚、西亚和欧洲，而横贯亚洲大陆贩运丝绸的商路后来也被称为“丝绸之路”。新疆维吾儿自治区的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中间站。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朝在这里设置了戊己校尉。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前凉在这里建立了高昌郡。丝绸之路的兴旺，促进了高昌地区的繁荣。高昌古城（现名哈喇和卓）北郊的阿斯塔那，有一大片公元四世纪末至八世纪的墓地，埋藏在这里的随葬品中有许多这个时期的珍贵丝织物。本文介绍的就是最近几年在这里出土的部分丝织物。作者通过对北朝时代（公元五至六世纪）套环“贵”字纹绮和蓝地兽纹锦的织造法和花纹的研究，认为这个时候已开始采用波斯锦的斜纹组织纬线显花的织法，花纹也带有波斯萨珊朝的风格。到了隋和初唐时代（公元六世纪末至七世纪中叶），带有波斯风格的新织法、新花纹的斜纹锦采用更多。盛唐时期（公元七世纪中叶至八世纪中叶），吐鲁番地区人口增加，生产发展，它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更显重要。阿斯塔那墓地发现的盛唐丝绸，品种增多，图案绚丽，反映了当时丝绸工艺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有几件丝织物的图案，虽然带有波斯风味，但仍是中国织工所织造。这些中国织工采用波斯锦新织法和新图案织成的丝织物，是我国当时由丝绸之路向西方输出的，这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佳例。唐代的丝绸生产，在染缬方面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这次吐鲁番新发现的染缬丝绸，在染色方法上有不少创造，代表了当时艺术的高度水平。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巧，对于深入研究我国悠久的丝绸生产历史，有很重要的价值。同时，这些古代丝绸说明，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不仅互通有无，进行贸易，而且不断地互相学习，促进了文化交流。

685　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　　　武　敏

（《文物》1984年第6期）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先后出土了大批精美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的时代大都是清楚的，但其产地则绝大部分有待研究。作者对丝织品中的蜀锦，按时代先后，选取了20件有代表性的标本，逐件加以分析，再作综合探讨。作者首先分析了南北朝时期的八件标本，对其出处、色彩、花纹、织物组织等均作了详细描绘，然后就织物组织结构及纹样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南北朝时期的织锦组织仍沿用汉代的结构。在四个类型的纹样中，一种为汉锦风格的延续，三种是这一时期的新纹样。接着作者对隋唐时期的12件标本作了分析，论述了这些标本织物组织结构与纹样的特征。最后，作者认定这些标本为蜀锦，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1）成都地区是我国织锦最早产地之一。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在统一巴蜀后，即于当地置锦官。说明在此以前，蜀地已有相当规模的织锦业。两汉时期，蜀郡织锦业居全国第二。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人民流散，生产破坏。而成都地区则相对安定，蜀锦生产得以继续发展，成为全国仅有的织锦产地。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初。故属于此期的标本只能是蜀锦。（2）唐人张彦远于《历代名画记》卷十中记载：陵阳公窦师纶，兼益州大行台，创瑞锦、宫

绫，蜀人称为“陵阳公样”。所谓“瑞锦”，即以祥禽瑞兽为主题的织锦。这实际上是在蜀锦原有的纹样基础上作出的总结和发展。从所举唐代以前的标本纹样中可以窥知：“陵阳公样”无疑是当时蜀锦的纹样典型。（3）从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看蜀锦贩运西域的可能性。汉唐时期，朝廷设有织室，织造绫、锦等高级丝织品，主要供宫廷消费，并不外销。蜀锦则除了作贡赋进纳宫廷外，还有相当部分作为商品远销国内兄弟民族地区及国外。文中所举标本，大都是作为商品从四川辗转贩运到吐鲁番地区的。蜀地与西域的商道，远在张骞通西域前就已开通，蜀郡生产的纺织品早已运至中亚。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蜀地与西域的商业交通一直未断。故文中介绍的标本为蜀锦，也符合史实。

686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几种唐代织锦 陈娟娟

（《文物》1979年第2期）

1958年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沿古“丝路”在甘肃河西走廊的武威、敦煌及新疆的民丰、于田、吐鲁番、巴楚等地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发现了许多汉、唐的丝织物，为研究我国汉、唐时期丝织技术的发展和当时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文就1968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唐代云头锦鞋鞋面“宝相花斜纹经锦”（与大历十三年即公元778年文书同出土）和鞋里“晕裥花鸟纹锦”，以及“花鸟斜纹纬锦”为标本，对盛唐、中唐时期我国的织锦工艺作了分析研究。这双云头鞋鞋面“宝相花斜纹经锦”系用四重经丝织成的经斜纹提花织物，工艺条件复杂。为了探讨唐代织锦工艺及丝织提花技艺的发展，作者剖析了这件文物标本。这件织锦的工艺规格，文中附有“一览表”，分经丝、纬丝、花纹单位、织物组织、经丝的排经顺序等栏目作了详细说明。对其织造方法，特用二十五倍立体显微镜观察研究，有极其具体细致的阐释，并对基本组织结构及上机情况，绘图作了分析。唐云头锦鞋鞋里“晕裥花鸟纹锦”是用两组彩条的经丝与两组本色纬丝交织提花的“经二重织物”。文中附有“晕裥花鸟纹锦”表层经丝色条排列一览表。作者解释，在经色条上，各以不同色彩的散点花鸟纹相配，宛如彩虹万道，彩云千朵，五花十色，绚丽缤纷，反映了公元八世纪时我国丝织工人在染丝、配色和牵经等方面高超的设计能力和艺术水平。唐“花鸟斜纹纬锦”和云头锦鞋同时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这种织锦系由一组红色地纬及四组彩色纹纬与一组本色单丝地经、一组本色双丝纹经交织成的纬五重重纬织物。文中也附有工艺规格一览表及组织结构和上机情况分析图。这种高级织锦，是封建贵族用来作衣着边饰或袜子的织成料。作者通过对“宝相花斜纹经锦”、“晕裥花鸟纹锦”和“花鸟斜纹纬锦”的分析，认为这几件唐锦，不但花纹是中原地区流行的，织物组织更和汉代的平纹经锦有直接的关系。唐代的斜纹经锦、斜纹纬锦和晕裥花鸟锦，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据文献记载，我国至晚在公元前八世纪，就已知道用染练的熟丝织造提花织物。从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许多种类的织锦实物，也进一步得到佐证。从东周到战国、西汉、我国劳动人民经过六、七百年的生产斗争实践，锦的品种不仅有双色提花锦、三色提花锦，甚至有四色提花及起绒提花的织锦；锦的纹样内容不仅能织各种几何纹，而且能织各种动态的动物和流动的云气纹、山岳纹，及以当时的吉祥语为内容的文字。再从丝绸之路上历年出土

的丝织物观察，我国魏晋、北朝时期，绫锦织机制造曾有过重大的改进。提花楼机的发明，是织机手工提花装置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唐代，中国进入封建时代的全盛期，当时官府手工业、地主庄园手工业、城市作坊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都有相应发展，提花楼机普遍推广，纺织品的提花技术也进入一个普遍提高的新阶段。

687　唐代西州墓中的绢画　　　金维诺　卫　边

（《文物》1975年第10期）

吐鲁番地区在南北朝时期形成高昌割据政权。唐朝削平高昌割据政权后，在高昌置西州，并在吐鲁番西北的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随后统一天山南北，移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库车），而西州作为唐朝在西部地区的一个重镇，在军事、政治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介绍的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初唐时期当地豪族张雄及其后裔的墓葬中出土的绢画。这些文物既暴露了封建贵族的豪华奢侈，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时我国西部地区文化发展的面貌，是初唐政治统一的一个侧面反映。第二三〇号墓即张礼臣（张雄之孙、张怀寂之子）墓出土的绢画舞乐屏风天扇，是初唐时期的绘画精品。绢画上的舞伎，与第二〇六号墓即张雄夫妇墓出土的垂拱年间(公元685——688年)的女舞俑，风格、服饰以至面型都极为相象。从服饰图案、乐伎所用器乐、以及舞者情态等，都说明内地和边区在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张雄之子张怀寂曾在中原接受文化教育，其家族墓中的绢画，可能出于他们幕府中的文人或画工之手。这些具有高度水平，而且与中原绘画有共同时代风格的艺术作品，显示了初唐西州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阿斯塔那一八七号墓也属张氏家族，墓中出土表现贵族妇女的围棋仕女图和骑马女俑，也是艺术精品，女俑帽沿垂有纱帷，这和武则天时期在内地流行的帷帽是一致的。它反映了当时边疆地区也流行贵族妇女帽垂纱帷、骑马驰骋的风气。围棋仕女图较骑马俑为晚，与内地或盛唐时期作品风格相近，画上所表现的人物、习俗也大都与内地相同，可以确定为开元前后的作品。代替壁画用来装饰墓室的绢画，大都表现死者生前的事迹或生活，画面服饰与死者家属身份也正相符。这幅围棋仕女图所表现的是盛唐时期这一地区贵族妇女游乐生活的景象，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有一定价值。从美术史来看，这类以现实生活景象作为题材的图画的兴起和流行，显示了在画风上的重要变化。文艺“为世用”，绘画反映现实景象，这无疑是初唐比较进步的政治占优势引起的变革。唐代西州古墓绢画的出土，初步弥补了美术史上这个时期绘画实物的欠缺，为了解我国绘画发展增添了珍贵史料。这些绢画是中原文化和边疆地区文化交流的产物，既有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传统画法，而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区特点。

688　试释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绢画伏羲女娲像　　　刘凤君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3期）

在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麴氏高昌（公元531——640年）和唐代墓葬中，经常发现绢画伏羲女娲像。这是中原的神话传说通过丝绸之路西渐传播的一个具体例证。早在五十年前，黄文弼先生曾在吐鲁番地区搜集到一幅绢画伏羲女娲像，在他的

专著《吐鲁番考古》一书中，做过较详细的考证。

伏羲、女娲，始见于战国时代的经、子之书．在经、子论述中，都是分别提及，二者并无瓜葛。但传至汉代，就经常并提，逐渐变成一对缔姻而繁衍人类的先祖，并成为中原和南方地区画像中普遍流行的题材，随风俗习惯而成为葬品．所以，在河南、山东、湖南、江苏、四川等地发掘的许多汉墓中，都画有或雕刻伏羲女娲像．随着时代衍变，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曾在中原和南方地区普遍流行的伏羲女娲像几乎不见了，而在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和唐代墓葬中却出现很多．从吐鲁番出土的绢画看，构画特点是继承了汉代中原地区伏羲女娲像的传统风格，更加突出了山东地区和苏北徐州一带伏羲女娲相亲的特点，体现了伏羲女娲始创人类的思想。同时，它还兼取了洛阳、南阳、重庆等地的某些特征，把日、月放在二者头、尾中间，用线连接起来．画面上的日月星宿和二人手中执着的规、矩，可能是补天造地，通理阴阳思想的反映。

汉代中原地区始创人类的这一神话传说，之所以到了南北朝、隋唐时期对吐鲁番地区产生很大影响，作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随着文化交流，这一神话从中原传到这里。从有的绢画把伏羲绘成“多须”的少数民族形象看，这一神话已经扎根、变成吐鲁番地区人民的神话了。二、传说中“女娲补天”是补西北方的天；《独异志》等古代文献记载伏羲女娲相爱成婚初创人类的时候，是在西北的昆仑山．吐鲁番地处西北，所以这一带的人们容易接受这一神话。很多墓葬中都出土这种绢画，说明麴氏高昌和生活在吐鲁番地区的唐代人们，生前对伏羲、女娲十分崇拜．因为崇拜，死后才将图像放入墓中以示思念，或者企图使自己的灵魂升天，回到先祖身边．从伏羲女娲像在吐鲁番的大量发现，证明中原文化西传的影响。

689　吐鲁番出土丝织物中的唐代印染　　武敏

（《文物》1973年第10期）

吐鲁番在唐代称西州，地当“丝绸之路”中西交通的要冲，因唐朝经济空前繁荣，国内外交往频繁，商品贸易兴旺。1959年以来，先后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区出土了大量晋——唐丝织物。这给研究我国古代丝织物的织造和印染工艺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文是对选取的几件唐代丝织印染标本作了化学分析和工艺试验后，就染色、印花工艺技术两个方面所作的探讨。

我国有关丝织物练染的实践和理论，古代文献早有记载。《周礼·〈天官·冢宰〉〈地官·司徒〉、〈冬官·考工记〉》记述了丝织物练染的生产分工管理和配方及工艺操作方法。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印染物与文献所记基本相符。从这些丝织物中所见到的色谱，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四色之多。作者从中选了具有三种原色（红、青、黄）和一种间色（墨绿）的标本六件，进行了化学分析和试验。证明：猩红色绮片（标本１）与绛紫绮片（标本２）同为茜素所染。根据当时条件，此种茜素是从茜草根提取的。标本１和标本２的染色鉴定结果表明，至迟在唐代，我国印染工人就已掌握了用一种媒染染料，以不同媒染剂染得不同色光和色阶的化学印染技术。标本３的藏青绢和标本４的天青绢是两个色阶的青，同为靛蓝所染。靛蓝又称蓝淀，是染蓝的主要染料，由木蓝属植

物蓼蓝、松蓝、马蓝、吴蓝等的茎、叶发酵而成。由于靛蓝的染色要利用还原剂的作用，所以叫做“还原染料”。我国很早就对靛蓝染色有了认识，并将木蓝属植物作为经济作物种植。用靛蓝染色，需多次浸染。浅色要染二、三次，深色要染八、九次。由于靛蓝染色牢度很高，所以出土的靛蓝染色织物历时千余年至今都还色泽鲜艳。标本5的黄地花树对鸟纹纱，根据色光，经多次试样，以黄栀得色与其基本相符。标本6的绿地狩猎纹纱，作剥色处理后，证明是槐花、靛蓝套染。在研究唐代丝织物的染色工艺中，作者还对丝帛漂、练所用物质作了探讨，因练丝、练帛是染色前不可或缺的准备工作。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物中，有为数不少的印花织物。为了弄清其印染工艺，作者也选取十件标本进行研究，并对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作了化学分析和试验。这十件标本中，过去已经发表过的有九件，但都被定为“蜡染”，作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经对标本1—4的试验，证明均为碱剂印花。其工艺过程除标本1印花后不染色外，其余三种均于印花后染色。这种印花方法可暂名为“碱剂印花法”。这种印花方法，巧妙地利用了碱对蚕丝的化学作用及其因而产生的物理作用(生、熟丝不同的折光效果)达到显花，这是唐代丝织印染工人的一项创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碱剂印花法既未见于文献记录，也未见流传于后世。再从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以及将化学和物理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的情况看，说明这是在一个具有一定规模、技术设备较为齐全的专业作坊生产的。还有标本5—9的几件印花绢，过去也都定为“蜡缬”发表。经对标本5的观察，作者认为它是以先印花后染色的防染印花法印制的。从黄、白两色花纹叠印的情况判断，是先以第一套花版印白色花纹，再以第二套花版印黄色花纹，最后染以地色。标本10的印花罗，是迄今为止吐鲁番出土的丝织物中唯一的一件直接印花罗织物。直接印花的特点，是在素白地上显以彩色花纹。直接印花一般是一色彩浆一套花版，但标本10可能使用一套花版，将两种彩浆分别涂印在花版的不同花色部位而成。从标本1—10的花纹观察，绝不是用木版所能雕刻出来的，作者认为这种印花版是用一种特别的纸版镂刻成的。这些印染标本表明，至迟在盛唐以前，我国丝织印染工人就已完成了以特制镂空纸花版代替镂空木花版的改革。

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唐代丝织印染物，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为文献所不备的宝贵资料，不仅丰富了我国古代印染工艺史，同时，对我国古代丝绸纺织的精湛技艺和丝绸西传提供了实物资料。

690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　　沙比提

（《文物》1973年第10期）

丝和棉的发明，以及丝棉织物的创造，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是丝和丝织物的故乡，对世界文明所作的贡献为众所周知。但中国的棉和棉织物何时产生，来自何方？这是研究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作者根据考古发掘，对此问题作了论证。1959年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发掘出来的东汉合墓葬里，出土了大批织物，其中有些是棉织品。这说明一千七百多年以前，新疆地区已经使用棉布了。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3号晋墓出土的一件布俑，身上穿的衣裤也是用棉布缝制的。1960年4月，吐鲁番阿斯

塔那309号高昌时期（约当六世纪）墓葬中出土的几何纹织棉，是用丝、棉两种纤维混合织成的。属于这个时期的墓葬中，还发现有纯棉纤维织成的白布。除棉织物以外，在阿斯塔那高昌时期的墓葬里，还发现了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借贷棉布（叠）和锦的契约。显然这些棉布是当地生产的。这说明吐鲁番一带植棉并用于纺织，不迟于南北朝时期，即公元五至六世纪。在这同一时代，除吐鲁番外，于阗一带也发现了棉织品。到了唐代（七——九世纪），吐鲁番绿洲的棉花种植和纺织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在喀什地区也有发展。1959年在巴楚县脱库孜沙来遗址的晚唐（约当九世纪）地层中，不仅发现了棉布及花纹美观的蓝白织花棉织品，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棉籽。棉籽经鉴定，认为是草棉，即非洲棉的种子，这说明非洲棉引入新疆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清朝末年，陆地棉引入我国以前，草棉（即非洲棉，也称小棉）分布于新疆及甘肃省的河西走廊区域。我国其他地区栽培的则都是中棉，即亚洲棉。关于草棉的原产地，英人华特（George Watt）1907年在其所著《世界野驯棉种》一书中说：（草棉）原产地或为阿拉伯，由回教徒自阿拉伯传至小亚细亚及埃及，然后至欧洲；又自波斯、印度之边境而传至亚洲。棉种经由阿拉伯先后向东（亚洲）、西（欧洲）传播之说，大约是可信的。但棉花自阿拉伯传入我国，实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决不是“回教徒”传至亚洲的。通过以上事实，作者认为：一、新疆地区至迟在东汉末，即公元二世纪至三世纪初，已经使用棉织品；在南北朝时期，即距今一千四、五百年前，已经植棉并用棉纤维纺织，棉织品的使用较前普遍；到了唐代，即七——九世纪，新疆地区的植棉和纺织业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纬线显花的棉织物，棉布制品并被征调到内地以充军需。二、新疆地区最早引进并长期栽培的棉花品种是非洲棉。非洲棉是古代非洲和阿拉伯人民长期辛勤劳动培育出来的，它因地制宜地引种到中国西北边疆，是非洲和阿拉伯人对中国文明的一大贡献。

691　唐代的复面和胡部新声　　　武伯纶

（《文物》1961年第6期）

本文是对《文物》1960年第6期发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59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发掘的六个墓葬的报导一文和1960年第8、9期所刊的《唐苏思勗墓壁画舞乐图》一文有关的商榷。前文作者报导了出土有和平元年（551年）墓志和永徽四年（653年）墓志的尸体的复面。报导说，302墓男尸复面已失，从残存迹象看，上压眉、下护嘴、四角有带子以束系，眼部开洞。报导中并附302幕出土的男尸复面想象复原图，死人复面是中国的一种葬俗，秦汉以前就已有了。在唐代有一种说法，死人复面是用于生前行为有亏的人。但本文作者认为死人复面在唐代似乎是很普遍的，并不关有无失行。由于新疆博物馆在吐鲁番的发掘，证明至少在四至七世纪，死人复面的葬俗，在今吐鲁番一带同样盛行。但是，发掘记录和文字叙述均有缺陷，如302墓男尸复面已失，如何又能据以想象复原呢？且302墓1女尸的素绢复面，亦残破难见原形，因此复原图和说明，就不免有所错误。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支诺皋》上，有关复面的一则记述事实虽系无稽之谈，但所反映的习俗，即关于复面（这里称为面衣）的制法，是确实的，即开

的洞，是在口部，不是在眼部。后文作者熊培庚在《唐苏思勗墓壁画舞乐图》文中断定“此墓壁画的舞乐图可能就是胡腾舞的舞容”，“胡腾舞大约出于石国，舞此者多为石国人”。本文作者提出，西安附近出土的有关舞乐材料，除壁画外尚有舞乐俑。文中列举了两件“骆驼载乐俑”和一组唐墓出土的乐舞俑，连同苏思勗墓壁共四组舞乐图象。其意，一是证明我们现在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希望能够综合研究论述。二是从上述四组材料，比较起来，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是舞俑有男有女；其次是原来虽是胡舞，但很快就被中国固有的乐工所吸收和掌握；第三是人数多少的不同；第四是四组所用的乐器相同，如都有琵琶、箜篌、萧、笛等。因此，作者认为以上四组壁画、陶俑所表现的即是受了西域舞乐影响经唐人融合过的所谓胡部新声。至于苏思勗墓壁画所表现的内容是否就是熊培庚同志所说的胡腾舞，因材料太少，尚难肯定。

692　复面、眼罩及其他　　　　王　澍

（《文物》1962年第7、8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曾先后于1959、1960年两次在阿斯塔那墓区作过发掘清理，共清理墓葬四十座，出土复面三十二件。从出土的有关墓志及纪年文书来看，这些墓葬时代均在麴氏高昌及初唐阶段。所谓“复面”，它并不是一种“上压眉，下护嘴，两边齐腮，四角有带子以束系，眼部开洞”的复布式的制品，而是一种帽套式的面衣。本文着重介绍了322号墓出土的“复面”材料。322号墓为三人合葬墓，出土复面三件，皆锦面绢里。锦面图案：两件为走鹿，一件为立鸟；四周均为大联珠环纹。这三件“复面”均附有一种眼罩。眼罩为铅质，极薄，厚约0.5毫米，用锦片滚边，长14.5厘米，眼部宽4.5厘米，鼻梁部分宽3.5厘米（均连边）。眼罩用针线缝连在“复面”的绢里相当眼的部位，锦面则复其上。通过实物和有关文献材料，可得出如下几点看法：所谓“复面”，当时人们通用的称呼应是“面衣”。根据面衣、眼罩、握手等多方面材料，结合《仪礼》上有关“布巾”、“掩”、“瞑目”和“握手”等记述，使我们明确新疆吐鲁番地区在唐代前后与中原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是广泛而深刻的。《北史·西域传》记述高昌情况是“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古代的礼制，是植根在社会生活基础上的。面衣等等葬俗，也就是当时冠服制度在死人身上的表现。《事物纪原》载：“又有面衣，前后皆用紫罗为幅，下垂，杂他色为四带垂于背，为女子远行乘马之用，亦日面帽。按《西京杂记》：‘赵飞燕为皇后，女弟昭仪上襚三十五条，有金花紫罗面衣’。则汉已有面衣也”。《晋书·惠帝纪》中，“帝……行次新安，寒甚……尚书高光进面衣，”则面衣又有驱寒避风的作用。而且，男子一样可以服用，并不限于女子。唐玄奘西去印度求经路过高昌，临别，麴文泰为他准备了足够的旅途用品，“制袈裟三十套，因为西方寒冷，又造面衣、手套、靴袜等……”，以助其远行。也很能说明问题。面衣锦面上的一些装饰图案，也别具风格。如猪头装饰图案，曾在中亚地区很流行，因此，它是研究我国和中亚广大地区文化交流的极好材料。

693 中国早期的玻璃器皿 安家瑶

(《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本文从考古实物上研究了我国早期的玻璃器皿。解放后，我国各地陆续出土了一批西汉至北宋时期的玻璃器皿。本文作者收集了48处、187件早期玻璃器皿的材料，并对其中104件玻璃器皿作了实物考察，利用几个单位对31件完整器物和21件残片的成分所作定性或定量分析的资料，对这批玻璃器皿进行了归类。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西汉至北宋玻璃器皿的生产及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作者通过对这批玻璃器皿的形状、纹饰、色泽、透明度、质量、成分和制作工艺的分析研究和比较，发现自西汉至北宋我国一直存在着两类不同系统的玻璃器皿。一类玻璃器皿的器形有我国的传统特征，自成体系，从早期到晚期有继承发展关系。另一类玻璃器皿的器形在我国出土物中罕见，与同时期的中国器物的器形和工艺没有明显的渊源关系，而相同或相似的玻璃器皿在国外有所发现，年代也比较接近。作者认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玻璃器皿，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来源：国产和进口。文章对进口玻璃器皿、分为罗马玻璃、萨珊玻璃和伊斯兰玻璃，对国产玻璃器皿，按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等时间顺序，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器物，对其出土地点、形状、色泽、工艺等，分别作了详细描述。并参考史籍文献的有关记载，对我国早期玻璃器皿制造的几个阶段、特点及其用途、钠钙玻璃、新疆地区的玻璃器皿残片、新疆以东早期玻璃器皿的生产地点和进口玻璃器皿的输入路线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考证和论述。认为国产玻璃器皿的出现不晚于西汉中期，吹制玻璃器皿的出现不晚于北魏。国产玻璃器皿以铅玻璃为主要体系，自汉至宋，连续不断。其间也有发展变化，最晚在隋代，高铅玻璃开始取代铅钡玻璃。钠钙玻璃器皿和铁棒技术的出现不晚于隋代。这些新技术的采用和钠钙玻璃的出现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东西交往频繁有关。新疆地区位于丝绸之路要道，发现了大量玻璃残片，这些残片可分为三类：一是罗马玻璃，二是萨珊玻璃，三为熔制质量较差、没有纹饰的玻璃残片。前两类玻璃器皿均系通过丝绸之路输入我国。第三类玻璃残片数量多、分布较广，其它地区也未发现这种玻璃，故可能是新疆当地所生产。至新疆以东的玻璃器皿生产地点，汉代较多，主要是宫廷作坊；西晋时为广东、广西附近；北魏至初唐为皇室御用手工业和某些寺院生产。至宋代，玻璃生产已走出宫廷作坊，开始比较普遍的生产，如洛阳、北京附近均生产玻璃。至于进口玻璃路线，两汉时期多为海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仍以海路为主，北方多依靠丝绸之路。隋唐时期则主要由丝绸之路输入伊朗高原的萨珊玻璃器皿。宋代则由海路输入伊斯兰玻璃。玻璃器皿不仅作为商品通过海路、陆路输入我国，更重要的是，西亚的玻璃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对我国的玻璃制造业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引证出土实物材料甚多，描绘细致，论证缜密，文后并附有《解放后出土的玻璃器皿一览表》和《部分中国早期玻璃器皿工艺比较表》，对研究我国玻璃生产和丝绸之路，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694　若羌县巴什夏尔遗址出土的古代玻璃器皿　　　　张　平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巴什夏尔遗址位于若羌县巴什夏尔乡西南十二公里，南北长约二公里，东西宽约一公里。1978—1979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曾两次调查并试掘了巴什夏尔遗址。其中出土了一批相当丰富的玻璃器皿和大量玻璃残片及其废料。这对研究我国玻璃生产以及制造技术方面的中西交流情况极为重要。本文着重介绍这一发现和有关文物，以助进一步研究。作坊遗址位于遗址的西南部，范围约二百平方米，是一处残存有数间房址相连的建筑遗址。墙垣附近遗留有大量红烧土块和木炭，地表集中散露着玻璃瓶罐残片和熔块废料等。清除流沙，发现玻璃器皿多件。无疑这里曾是一处工匠集中，分工较细、可熔制多种玻璃产品的手工作坊遗址。经整理、修复较完整的器皿共10件，根据器形和用途，可分为瓶形器和罐形器两大类。瓶形器6件，器形基本相近，小口细颈凹底，无模自由吹制成型。罐形器残片4件，器型亦基本相近，无模自由吹制成型。其时代相当于宋——元初期的玻璃器皿。工艺技术和造型风格，与古代波斯中世纪的阿拉伯玻璃器皿有相当多的共同特征。这种工艺相同，型制相近的玻璃器皿在中原地区的遗址和墓葬也曾发现，这表明，它们之间应有着一定的承传和发展的关系。但是，据喀什、和田、阿克苏地区考古发现的大量玻璃制品来看，还不属于古代新疆更早期的吹制玻璃制品。据对玻璃残片的化学定性、定量分析，都属钠钙系玻璃，而且各类标本中的氧化物含量十分接近，是同一钠钙玻璃系统。

巴什夏尔遗址，是南丝道东端上的一处重要遗址，它曾是唐代新疆史中记载的“新城”，或谓之“弩支城”，是当时中亚粟特人居住、生活的中心。唐代以后，南丝道上存有两个地方割据政权：以今喀什为中心的喀拉汗王朝和以于阗为中心的于阗李氏王朝。十一世纪初，于阗李氏王朝被喀拉汗王朝所征服。但无论是两个政权同时存在还是纯属喀拉汗王朝时期，都与中原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友好往来，特别是商品经济的交往更为密切。宋元时期塔里木盆地的南丝路更是一个东西政治活动往来、商品经济和文化交流融汇的重要通道。其时随着华丝的西去，地中海沿岸、伊朗高原等地的“殊方异物”也不断东来。璃玻制品及其制造技术的传入就是其中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条东西交流的“丝绸之路”也应该是“玻璃之路”。

695　新疆的石刻艺术　　　　王子云

（《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

新疆在我国汉唐时代，是东西交通的走廊，因此东西文化交流的遗址、遗物特别丰富。作者于1953年参加西北行政区文化部新疆文物调查组。本文重点介绍了新疆古代的石刻艺术。在新疆伊犁专区的昭苏、霍城一带，有很多古代石刻，主要是石人的遗存。它们的造型和风格与内地汉代石刻相对比，在某些形体结构和雕刻手法上，都很接近。它们有的刻出立体的形象，有的仅在四棱石柱的尖端刻出脸的轮廓及简单的眼、鼻、口。一般多是身着翻领外衣，两手交置胸前，有类汉、唐陵墓前侍立的翁仲。而其形象刻划，

都突出地表现出了中亚民族的特有面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撒姆塔什的石人，虽然造型古拙，但对于人物性格的表达，非常明确肯定。在人物面部的鬓、眉、鼻部分以及整个的脸型，使人一看就能认识到这是一个体质魁伟的伊兰族形象。霍城二区特勒克脱地方的石人，其形象更显得古拙单纯。这些石人造像，它们的造型及制作风格，主要是雕塑者按照人物属性的不同内容而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石像多半是面向东立，这可能与日出的方向有关。所以这种石像很可能是新疆古代游牧民族的一种被崇拜的偶像。而就它的制作风格和意义来说，似乎与中原文化有着若干的联系。作者引述苏联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记载的资料："1885年魏谢洛夫斯基在中央亚细亚进行发掘时，发现了散布在中央亚细亚的立岗，他正确断定这些立岗是住人的，是由建筑的残余堆起。他也解决了历经百年来争论不决的"石像"时间问题，他证明这些散布在东欧和西北利亚的石像，是属于突厥游牧民族的雕像。……"霍城和昭苏位于新疆西北边缘，紧靠苏联哈萨克共和国，也就是中央亚细亚和西北利亚的交叉点。所以这些石刻造像，很可能是与魏谢洛夫斯基所见到的石像属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制作。根据这些雕像的造型及在西汉时中国与西域匈奴的接触关系，特别是与当时游牧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的接触关系，很可能说明当时两者之间是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的。关于以上所说造像的年代估计，据捷克东方美术史专家路博尔·哈谢克博士说，在东欧和西伯利亚一带，确有这种雕像，并据考古学家的鉴定，大约是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或者更早的制作。

另外，在新疆西北部的霍城、昭苏和特克斯以及南疆和田邻近的皮山，都曾发现有刻在崖石上的记事画，所刻内容多半是一些牛羊牧群或骑马射猎等日常生活的描写，线条粗壮，形象单纯，这些崖石刻画中，较突出的一处是由喀什去和阗中途——皮山县桑株镇以南，即越过昆仑山通往印度克什米尔的山道入口，就在通道边的一块崖石上，刻画着很多射猎的图画。虽然刻法古拙，但其形态却栩栩如生。依据石刻画的制作形象、风格来说，它可能与同一地区的石刻造像都是同一游牧民族在同一时代的制作。而这些石刻画所以多半刻在山谷口的交通要道的原因，可能与牧区的时常迁徙和牧群的往来交通路线的标记有着直接关系。

696　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　　张学荣

（《文物》1983年第6期）

麦积山石窟是我国解放后勘察发现的一个大型石窟寺，它的发现对我国佛教史及雕塑艺术的研究具有特殊价值。但它创凿于何时，因缺乏记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麦积山石窟的创凿年代，作者就目前所见的七种不同说法，归纳为三点：第一、"始自东晋起迹"；第二、"六国共修"、"七国重修"；第三、"始建于□秦，成于元魏"。此说或以为姚秦所开，或则明确提出为后秦皇帝姚兴所凿。事实上，这三种提法，并无多大矛盾。只是在后来的研究中，往往偏重于对某一记述的考订或推断，未能很好地对照石窟现状和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全面的分析，因此，便得出不同的结论。对各种不同的说法，作者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根据《高僧传·玄高》记载，玄高隐居麦积山时那里的佛事已有相当规模。

为此，弄清玄高在麦积山的时间,对研究麦积山石窟的创凿便有了根据。这里,作者否定了冯国瑞《麦积山石窟大事年表》中所记，玄高于公元424年到麦积山，427年离开麦积山之说。作者论述了麦积山当时的隶属关系，以及玄高离开麦积山的时间及其徒众人数所引起的纠葛后证明,玄高之来麦积山,应在417年10月以后；离开麦积山当在419年年底以前。仅仅两年时间，其徒众即达二、三百人之多,可见当时麦积山佛教之盛。此前天水麦积山一带，一直为后秦姚兴所有，417年10月以后，始正式归入西秦。因此，麦积山石窟之开凿，当在西秦以前。其次，"始自东晋起迹"之说比较明确，而"始建于□秦"之说比较笼统。按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其统治势力从未直接到达天水,在此开窟造像当然不可能。但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后秦和西秦都先后统治过天水。因此，这三秦中不论哪一家开凿了麦积山石窟，从时代上来说，即可直称□秦，也可统称东晋。那么,麦积山石窟为姚秦开创的说法仍然可行。第三,关于"六国共修"和"七国重修"问题。一种是以朝代纵向解释，一种是按历史年代横向解释。纵向解释者认为从唐代开始上推经隋、北周、西魏、北魏到后秦，恰好六代，是姚秦时开凿的。作者认为把隋、唐两朝说成"国"显然不妥,且先后相距四、五百年,也无法"共修"。至于横向说者所谓"六国"是同时共存且割据一方的小国。但东晋时期有"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有"北魏三十六国"，"西域三十六国"和"岭东六国"。那么"六国"究竟是指哪六国？作者初步认为，"六国共修"和"七国重修"的提法，是说曾有六个或七个国家一起创建了麦积山石窟。据《玉堂闲话》和《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碑中记载推断，此"六国"和"七国"应在东晋以后，隋、唐以前，当在十六国中间。作者研究了《十六国春秋》的有关记载后认为，十六国后期,特别是玄高到麦积山之前,与后秦同时并存的诸国中，有西秦、后凉、北凉、西凉、南凉、仇池、北燕、夏和代（北魏）等九个小王朝，这些小王朝或一度臣服后秦，或一度与后秦结好。在此期间，秦主姚兴南和东晋，西结柔然,且与北魏（代）通婚结好,同时大兴佛教。而"地处关陇之会，介雍凉之间"的天水麦积山，风景秀丽，西秦、南凉、北凉、后凉、西凉、仇池诸国来朝长安，多经此地，在诸国友好往来之际，"共修"和"重修"麦积山石窟，不但可能，也可说是必然的。因此，所谓"六国"、"七国"当指这几国而言。最后，作者的结论是：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当始于东晋十六国的后秦，时间在公元400年至410年这一阶段。

697　麦积山石窟的分期　　　董玉祥

（《文物》1983年第6期）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现存194窟，历代泥塑、石雕造像共7800多尊，壁画900余平方米，是我国规模较大的石窟之一。该窟约始创于后秦,历经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不断地开凿和修缮。本文主要依据窟龛形制、造像内容、造像特点及有关的历史文献和造像铭文，对麦积山石窟进行了分期。这些石窟基本上可分为十六国（包括后秦、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八期。其中以北魏、西魏、北周三代凿窟最多。麦积山现存编号为74、78、70、71、165等窟，可能是后秦到西秦间开凿的，时间约自公元384—431年左右，为麦积山石窟第一期。这一期窟龛形

制主要有三种。一是平面近方形的平顶大窟；二是平面近方形的平顶窟；三是平面方形的券顶龛。窟内造像雄健高大，布局谨严。题材以三世佛为主，还有交脚、思惟等菩萨。壁画则以千佛为主。从造像特点看，佛多作阴刻水波纹高肉髻或磨光高肉髻，面相方颐，眉细眼大，鼻高耳垂，咀小唇薄，肩宽腰细，具有一种古朴敦厚、挺拔庄严的神秘色彩。北魏时期麦积山开窟造像盛况空前，造像精美，造窟龛数目最多，这是麦积山石窟的第二期，其中又可分为三期。一期约自魏太武帝神麚四年到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31—499年）。其窟形种类有平面方形、平顶、低坛基；平面方形、平顶、左右两壁各开一大龛或左右两壁大龛内又开小龛等。造像题材仍以三世佛为主，并突出正面诸佛的地位。北魏二期，约自魏宣武帝景明初到延昌年间（500—515年）。此期间开窟数目比以前大有增加。这一时期比较普遍的窟形是：平面方形、平顶，左右两壁各开一圆拱形龛；平面方形、平顶低坛基，窟内正面及左右各开一大龛，四壁上方又并列开小龛等。造像题材仍以三世佛为主，也出现了塑于门楣上的七佛和二弟子的新题材及满雕四壁的立佛、菩萨和供养人的影塑象。壁画题材除千佛外，又有诵经和尚、双翼仙人等。造像特点进一步民族化。北魏三期，约自北魏孝明帝熙平年间至北魏亡（516—534年）。麦积山现存的北魏石窟，无论规模和数量，都以这一时期最盛，其窟龛形制有：平面方形、平顶、低坛基、三壁开龛或窟顶雕凿凹入两重或三重套斗式藻井；平面马蹄形、穹隆顶。此外还有模仿中国古建筑形式的崖阁式窟以及规模较大、工程艰巨、占据两崖最高点东西两侧险要位置的大窟。造像大部分仍以三世佛为主，在佛的两侧塑有夹侍菩萨，有些窟龛内还配有二力士。壁画内容除一般的祥云、荷花、飞天等装饰性较强的图案外，还出现了在窟顶及四壁彩绘大型连环画式的佛本生故事画，以及大型的维摩诘经变、两方净土变等。公元534年，北魏为西魏所代.西魏虽仅存二十二年，但奉佛之事仍很盛行。这一时期出现了进一步仿中国传统木构宫殿式建筑的崖阁，窟龛大部仍为北魏晚期流行的方形平顶窟。造像题材除了三世佛外，还把维摩、文殊分别置于窟内两壁对称的显著地位和把童男童女塑造成与菩萨同高、置于佛的夹侍地位的现象，西魏时期的窟龛没有北魏以来的满壁影塑，而代之以彩绘的莲枝、莲叶等装饰性极强的图案画。公元557年宇文觉灭西魏建立北周。僧侣多达百万人，寺院有万余所。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灭佛。至578年周武帝死后不久，佛教又行大盛。这一时期出现了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宏伟的崖阁式大窟，这反映了当时对佛教信仰的热衷程度。到了北周，麦积山石窟造像，完全摆脱了北魏晚期以来清俊秀美的瘦削型，开辟了一种敦厚壮实的崭新风格。在塑造技法上出现了塑与画结合的形式，这在麦积山石窟的各代造像中，也是一种创新。隋代统一中国后，对佛教也极力提倡，麦积山开窟造像继续盛行。造像更趋于写实和世俗化。唐时，中外交通更加发达，佛经大量传入，佛教艺术在中国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麦积山现存窟龛，却没有唐代开凿的，为数不多的唐代塑像和壁画，也多是补在前代窟龛内。宋代也没有新开的窟龛，但留存的造像为数却不少，大部分造像都是在原有的窟龛内重塑、补塑或改塑。麦积山石窟就其内容来说，均为佛教题材，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从艺术创造而言，又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我们民族伟大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698 丝绸之路东段的几处佛教石窟

——泾川王母宫与南、北石窟寺考察　　马化龙

（《西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4期）

泾川古称安定、泾州，是周、秦以来中原通达西北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东段靠近古都长安的重镇。佛教通过丝路东传，佛教石窟也沿古老丝路广泛分布。甘肃除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等名窟外，在陇东也有较多表现中原艺术风格的泾川王母宫和南、北石窟寺。本文是作者考察陇东石窟遗存后的记述。

王母宫相传为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之处。位于泾川县城西二里泾、汭交汇处的石岩绝壁上。今存一大窟，称大佛洞。洞为中心塔柱式，四面各造佛龛。东大龛保存较完整。佛像类似云岗早期造像；窟形、规模和装饰，都与云岗第六窟非常类似，属北魏风格。估计此洞系北魏声势显赫的灵太后率百官到泾川一带巡游时主持开凿。灵太后，安定临泾人，宣武帝元格之妃，孝明帝元诩之母，曾独揽国权，亲理万机；大兴寺塔，民不堪苦。

南石窟寺位于泾川县城东约十余里的泾河北岸，现存东、西二窟。西边小窟，宋代改雕为十六罗汉，称罗汉洞。东边大窟称东大洞，系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史奚康生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修建。当初开窟时的《南石窟寺之碑》尚存。窟顶为复斗型，现存石雕主要为七佛及胁侍菩萨、交脚弥勒。七佛分立于东、南、西三面，约高六米，占据洞窟主要位置。这种排列一堂格式，在国内诸大石窟中均未所见。七佛头、手大于正常比例，体型较肥矮，朴实健壮，表情严峻豪迈，微露笑容，呈北方民族气魄，与同时期流行的秀骨清象有明显差异。佛旁胁侍菩萨共十尊，约高二米，比例恰当，细眉秀目，姿态活泼，宛似妙龄少女，与佛的庄重威严成鲜明对比。

北石窟寺位于西峰镇西南约五十里的蒲、茹两河交汇处，为奚康生于永平二年修建。修建最早的165洞，其佛像配列与南窟东大洞非常类似，但规模稍大，内容更丰富，保存很完整。七佛更加简朴粗犷，带有早期造像的特点。胁侍菩萨则较多地表现了龙门造像的风格。西壁洞口骑大象的普贤菩萨等，甚为精美，高度体现了善与美的境界。与普贤菩萨对称的西壁洞口，不是一般佛洞配列的骑狮文殊菩萨，而是一位三头四臂、结跏趺坐的阿修罗天护法神，三个面孔各异，左愁相、右忿怒，中间慈祥温和，颇具漫画意味。

北石窟寺在北魏以后，西魏、北周、隋、唐、宋、清各代都有造像。现存窟龛275处，大小雕像2125躯，其中唐代窟龛占70%以上。各代风格不一，均具时代特色，本文作者主要介绍了唐代一些遗存的风格。

陇东地区石窟遗存，过去较少为人注意，仅上述三处即已丰富了人们对丝绸之路东段石窟艺术的了解。陇东地区因接近中原，南北朝时期，与北中国统治王朝关系密切，艺术风格上受云岗、龙门诸大石窟影响较为显著，较多地表现了中原地区的艺术面貌，同时，又受着沿丝绸之路而带来的西域艺术风格的一定影响，形成以北石窟寺为代表自成一格的风貌。

699 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　　阎文儒

（《文物》1962年第7、8期）

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与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新疆石窟调查组，调查了天山以南各石窟。参加这次考察的有北大、敦煌文物所、中国佛学院及新疆博物馆的有关人员及专家学者。本文是根据当时调查材料所写成。在天山以南，银山（今库木什一带）以西的各地方，大致从公元一百年前后，就开始信仰佛教，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佛教遗迹。如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库车的库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子喀拉罕、玛扎伯哈等石窟，以及焉耆的七格星明屋和石窟。在天山以南，银山以东，今天吐鲁番、鄯善县一带，也有许多佛教遗迹，如木头沟内的柏子克里克、鄯善县西的吐峪沟、交河城旁的雅尔湖石窟，以及胜金口的寺院遗址等等。天山以南银山以西的石窟，按古代地理说主要在龟兹境内，其次是焉耆境内。拜城克孜尔石窟在拜城东约50公里的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戈壁悬崖下，东距库车约67公里。根据1953年的编号，这个窟群一共有二百三十五窟，分布在山的前后，其中许多窟已残破。只有七十四处较完整，并有较好的壁画。这些石窟除残破的220窟有"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大历□□□四月"（公元766—779年）的题记，222窟有"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等汉文题记外，其余各窟题记文字，都是古代的龟兹文或是近代的维吾尔文。壁画的艺术风格、手法、虽然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显然是当地的民族风格，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艺术创造。至于窟中的佛像，因遭到破坏、盗窃，一件也看不到了。各窟的创造年代，根据七十四个较好的石窟，分作四期。文章就各期的窟形、壁画内容、壁画用色、艺术风格等作了详细介绍。根据分期，克孜尔石窟的开创时间，应在东汉末期，废弃时间，约在元代。其中有些窟，早在唐代已废弃。至于全部废弃时间，当在伊斯兰教统治南疆的时代。森木塞姆石窟在库车城东北约40公里处库鲁克达格山口东西两岸的山腰上，较完整的有五十二个。石窟大部分被破坏，尤其是壁画被剥掉了很多。今天比较完整，能据之而分期断代的仅有十九窟。从壁画题材与风格，结合窟的形制，也分为四期。这四期窟的形制、壁画的题材和风格，与克孜尔石窟的分期大致相同。在天山以南银山以西的石窟中，还有克子喀拉罕石窟、库木土拉石窟、焉耆七格星明屋与石窟。山天以南银山以东的石窟有：柏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的寺院遗址、吐峪沟石窟、雅尔湖石窟等。这些石窟群中原有的石窟，多半崩圮。现存较完整的洞窟，在窟形，壁画等方面也多有独到特色。如玛扎伯哈1号窟穹庐顶上四角，画出佛在鹿野苑说法，白鹿听经的图像，是其他窟群所未见的。克子喀拉罕石窟的24号窟，在窟形方面是七角形平面，正中有中心柱，左右有甬道，后壁有隧道，而又是平顶的支提窟，其形制也属独创。作者认为，天山以南的各石窟，根据它本身的发展规律，并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其开创年代，在东汉的末期，衰落期在元明之际。从这批材料中不仅可以探讨这一地区当时佛教信仰情况，而且也可从故事画中所画的耕作图、日用陶器、手持铜炉，以及发掘出的残余织品和铜钱等物，探讨当时龟兹诸地的生活、生产情况。至于各期壁画的画风，不只可以说明龟兹诸地绘画艺术的发展过程，而且也可以补正中原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规律。因而天山以南的各石窟，应当是研究银山东西当时城郭诸国历史的最好资料。

700 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分期问题浅探 朱英荣

（《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4期）

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不仅是新疆境内各石窟的发祥地，也与全国各地石窟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解决克孜尔千佛洞的分期问题，对深入研究我国丰富的石窟遗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世纪初，德国人格伦威德尔、雷库克，在其著作中，对克孜尔千佛洞的分期进行了最早的尝试。1961年，北大教授阎文儒在《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一文中，也对克孜尔千佛洞进行了分期。此后，学者们就此问题各抒已见，分歧很大，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本文对克孜尔千佛洞分期问题再次进行了探讨。一、从建筑形式看大区域的分期。克孜尔千佛洞已编号的石窟共有236个，分布于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四个不同的大区域内。这四个区域是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而划分的。作者从建筑形式方面就四大区域之间的时序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四大区域内，虽然已有编号236窟，但窟形较完整、尚存有壁画和汉文、古龟兹文题记以及塑像残躯的石窟不到一百个。作者分别就中心柱形支提窟、方形支提窟、毗诃罗窟、大像窟、一种窟打破另一种窟几种类型的石窟编号、分布区域、主室顶形状等作了记述后得小结说：显然，克孜尔千佛洞的中心柱形支提窟是仿照印度的支提窟而建造的，只是根据新疆的自然条件作了改变。券形顶的中心柱形支提窟是从印度传入支提窟的最初形式。以后，随着石窟建筑上的民族化，出现了受波斯文化的影响、模仿帐幕形式的穹庐顶。再以后，由于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出现了平棋顶、套斗顶和仿椽子一面坡顶的建筑形式。但券形顶中心柱形支提窟并非克孜尔千佛洞最原始的石窟。作者论述了原因后认为，毗诃罗窟是早于券顶中心柱形支提窟的。毗诃罗窟是克孜尔千佛洞最早出现的石窟。大像窟实际上就是巨型的中心柱形支提窟。根据阿富汗中部的巴米羊大像窟来判断克孜尔千佛洞几个大像窟的时代，把它们定在公元三至五世纪左右。方形支提窟晚于中心柱形支提窟，作者以宗教性的建筑物似乎都存在三个发展阶段为理由作了阐释，这样在克孜尔千佛洞的发展史中，最早的石窟为毗诃罗窟，次为券顶的中心柱形支提窟，再次为大像窟，又次为方形支提窟。参照各类石窟在四大区域的分布，作者对克孜尔千佛洞的时序问题得出如下结论：谷西区集中了大量的早期石窟；谷东区在时间上比谷西区稍晚，似乎是谷西区石窟群的发展和延续；谷内区石窟似乎受到某种外来文化影响，正处于变化之中，可划为中期阶段；后山区的石窟表现比较混杂，时间上较晚。二、从壁画看各类石窟的分期。菱格画是克孜尔千佛洞别具一格的绘画形式，为国内其他石窟所罕见。菱格画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供养故事和千佛故事等。从这些菱格画中，可以看出时代上的先后次序。文章在叙述了本生故事的内容、种类及其主题思想后指出，本生故事反映了接近原始佛教以表现释迦在深山讲述他前生施舍的事迹来宣传涅槃思想的某些教义。因此，本生故事是佛教艺术中出现的早期作品。从本生故事画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壁画艺术和建筑形式之间在时代的关系上存在着相当大的一致性。从时间上来说，早期本生故事出现在菱格画中的是因缘故事。因缘画是运用绘画的形式，劝喻世人，敬信佛法，多作好事，以积累善因，得到善缘。这些窟都是供养故事画，是宣传大

乘佛教思想的一种艺术，它的出现时间应该晚于因缘故事画。千佛故事内容的菱格画在时代上是最晚的。据此，作者认为菱格画的时代顺序大致是：早期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供养故事、晚期本生故事、千佛故事。另外，说法图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占据很大的比重。根据说法图的变化发展情况，作者从另一个侧面探索了克孜尔千佛洞的分期问题。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还有一些天象图，尽管数量不多，但画法各异，分成好几种类型。这些图象大都出现在早期和比较早期的石窟中，后来，为须摩天女图所代替。最后，作者在结束语中指出了德国人把克孜尔千佛洞分为两期之不足之处。希望考古工作者用科学手段解决克孜尔千佛洞时代分期问题，这将对中西文化史、宗教史、建筑史等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701 克孜尔新1窟试论 许宛音

（《文物》1984年第12期）

克孜尔石窟位于天山以南的古代“丝绸之路”上，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城郭之国——龟兹所遗留下来的一处著名佛教遗迹。这个石窟现有编号洞窟236个，根据洞窟的分布位置，分别称为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新1窟位于谷西区的东侧，1973年为克孜尔文物保管所发现，1974年作了清理。窟内保存了三躯残缺不全的塑像，值得珍视。作者分别对克孜尔新1窟的洞窟形制、雕塑与壁画、年代推测以及若干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探讨。新1窟分为前室、主室和后室三部分。作者对各室的面积、建筑、雕塑、壁画逐一作了详细具体的描绘与论述。并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将克孜尔的塔柱窟分为四组，即塔柱窟发展演变的四个阶段。根据新1窟的形制推断，应属于第三阶段，其年代应与第207窟及第77窟比较接近，估计开凿于公元500年至600年之间。作者还引用北距克孜尔石窟约13公里处的由18个洞窟组成的台台尔小型石窟群作为旁证。经碳14测定，该窟的年代为公元630年±75年，比克孜尔新1窟稍晚一些。作者还根据文献记载，对照克孜尔石窟的总体情况，认为石窟中小乘教的题材占有压倒的优势，这类洞窟不仅数量多，而且延续的时间长。虽有几个大乘教题材的洞窟，在许多方面也仍然未脱小乘教洞窟的窠臼。新1窟开凿的年代，正是大乘佛学处于鼎盛的时代。新1窟主室顶式的改变，曲折地反映出小乘势力在龟兹的衰弱及其学说理论地位的下降。新1窟所体现出的变化也具有社会生活方面的原因。因六世纪中叶突厥崛起之后，龟兹附于突厥。突厥几乎囊括整个中亚地区。突厥人重视贸易，从中国内地到西域、萨珊波斯至东罗马的“丝绸之路”上商旅使团络绎不绝。数百年来，这条陆路上的交通要道不仅给龟兹古老的佛教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且为龟兹带来了巨大财富。富裕安宁的生活使人们自然地倾向于较易成佛的大乘教学说，而对小乘劝人抛弃家室、剃度出家、到山中过禁欲生活的热情大为减退，并产生失望与厌倦情绪。这是出现变化的开端。新1窟是龟兹佛教史上比较开放、比较活跃、宗教思想有所变化的时期的产物，它对于探索这一历史时期龟兹的佛教思想，以及大乘初期佛教艺术在龟兹的表现形式，都给了有益的启示。

702　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　　郭沫若

（《文物》1972年第8期）

本文论述了1924年新疆鄯善县出土晋人写本陈寿《三国志·吴志》残卷与1965年新疆吐鲁番出土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的异同，并进一步就王羲之所写《兰亭序帖》真伪问题，与章士钊《柳文指要》中所持的观点，进行了辩析。1924年新疆鄯善县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共有八十行，中有残损，存一千九十余字。关于这一份残卷，张元济在所著《校史随笔》（1938年）中论述甚详，他曾将古写本与宋刊本《三国志》对校，大有收获。1965年新疆吐鲁番新出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存四十行，五百七十余字，中有残缺，内容是《孙权传》，存建安二十五年的后半和黄武元年的前三分之二。两种残卷比较，字迹十分类似，捺笔极重，隶书气味很浓厚。但两者决非一人所写：从书法角度看，乙种字迹优于甲种；从文献角度看，乙种却不及甲种有所贡献。作者曾把乙种和宋刊本核对，在文字上彼此小有短长。有的同志推测：乙种“写本所用纸”可能是“左伯纸”。写本用纸究竟是否为“左伯纸”，不能肯定，但写本是晋代所写，毫无问题。就字迹来看，乙种写本当比甲种较早，可能乙种是西晋抄本，甲种是东晋抄本。作者看到两种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又联想到七、八年前曾经热烈辩论过的《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当时作者认为不仅帖是伪造，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现在看到这两种《三国志》的晋抄本，又为帖的伪造添了两项铁证。但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却十分坚持《兰亭序帖》非伪，《兰亭序文》为真。作者辩析说，《三国志》的晋写本既是隶书体，则其它一切晋写本都必然是隶书体，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是隶书体，则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在天下的书法都是隶书体的晋代，而《兰亭序帖》却是后来的楷书体，那么，《兰亭序帖》必然是伪迹，这样的论断正是合乎逻辑的。作者又进一步针对《柳文指要》中《柳子厚之于兰亭》一文中有关“兰亭”或《兰亭序》的文字指出，《兰亭序文》的伪迹是在后半段自“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以下。前半段正畅叙欢乐，后半段却突然无端悲痛起来，既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的《临河序》所无，也和王右军的性格与晋人的达观不相契合，故可断言为后人所窜入。另外，作者又指出，《与吕恭书》中严斥《墓中石文》为伪作。其文意曰：“《兰亭序帖》本来是伪迹，而你伪造《墓中石文》的人还去效法它，岂不是自露马脚？”柳宗元的文字也并不是鄙薄王右军，而是鄙薄作伪者，明知其伪，却不敢直斥其伪而已。李白的诗句：“《兰亭》雄笔安足夸”，以及《草书歌行》中，不仅点破了王右军书多伪迹，而且也点破了张伯英书也多伪迹。作者认为，《兰亭序帖》虽伪，并不贬低它的价值，只是它不是王右军所书而已。不仅字迹不是王右军所书，序文的后半段也不是王右军所书，

703　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说明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

（《考古》1972年第2期）

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是1969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发现的。本文考察了这部残卷在文献学上的重要价值，及其出土地

点的地理历史背景，说明新疆自古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论语郑氏注》残卷，出土于一座唐墓中。这个残卷，原为《论语》的前五篇。发现时，《学而》的全篇和《为政》的大部分已缺。现存《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以及《为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十五行。每篇的篇题之下都书明"孔氏本，郑氏注"。这卷郑注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写完的，写书人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时年十二岁。《论语郑氏注》是唐以后佚而不传的一部书。敦煌写本《论语郑氏注》，主要为《八佾》、《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颜渊》、《子路》等篇的残卷或残片，其中《述而》至《乡党》四篇残卷的卷末，有龙纪二年（公元890年）的纪年。吐鲁番新出《郑氏注》写本，其年代早于有明确纪年的敦煌写本《郑氏注》一百八十年，并且这几篇都是过去未曾发现或未曾完整发现的。因此，在文献学上有较重要的价值。卜天寿写本中的《论语》本文，经与通行本和若干日本较早版本校勘，除可以确定的别体字不计外，有一百五十余条差异。其中属于误字、漏字和避讳以及句末或句中少一"也"字者，占十分之八以上。其他各条差异中，写本的《论语》本文往往与《经典释文》等书所引郑本相合。这进一步证实，见引于各书之郑本大体是可信的，郑本确为"以古正鲁"。卜天寿写本中所见郑注，包括注文残缺不全者在内，共有一百四十七条、其中前所未见的佚文，计《为政》六条、《八佾》二十二条、《里仁》二十五条、《公冶长》二十六条，共七十九条。这是写本中最难得的一批新资料。写本中可以与散见于各书的郑注相对照的注文，计四十四条。其中全部合于写本或基本合于写本的占大多数，也有少于写本，或与写本有一定出入而不如写本文意完善者。值得注意的是写本中有三十八条注文，与散见于各书的《孔氏训解》、《包氏章句》、《马氏训说》等他注一致或基本一致，而以孔、包居多。过去有人将这种情况认作前籍征引时"误以郑注为他注者"。卜天寿写本的校勘说明，这并非个别现象，因而，偶然致误的推断是难以令人置信的。《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说，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那么号称集大成的郑注包含有孔、包、马等注的内容，也就不足为怪。敦煌写本发现以前，人们只能通过辑佚窥知《论语郑氏注》的一鳞半爪。现在，把敦煌、吐鲁番二地的写本残卷联系起来，则可看到二十篇《论语》中十一篇郑注的全部或一部。这对于进一步研究"郑学"、考察儒学的汉、宋转化，无疑是可贵资料。新疆地区在南北朝时期，从属于北朝，特别是麴氏高昌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最为密切。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在高昌设立西、庭二州，并置安西都护府。《北史·高昌传》记载，北魏孝明帝时，高昌王麴嘉"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明帝许之"。初唐时高昌私学诵读根源于河北本的《论语郑氏注》的发现，正反映了这段历史事实，也反映了"郑学"在当地的影响。由此可见，新疆自古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很早就同内地一致，而且在文化教育上与内地也是完全相同的。

704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　　文物出版社

（《文物》1972年第2期）

本文考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在古代书籍、文献、文物方面的价值，并介绍了一些关于《论语郑氏注》的问题和这卷的特点。这卷唐代写本《论语郑氏注》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卷中有两处写着抄书人的名称，一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一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景龙是唐中宗李显的年号，四年是公元七一〇年。出土地方，即唐代西州高昌县境。解放以后吐鲁番出土的古代书籍中，以《论语》为最多，但大都是一些残片，字迹风格比唐代还早，而这一卷却较完整。从古书的发现来看，足以说明在古代当地的文化教育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论语》也是主要教材。《论语》的“郑注本”自唐代以后就已失传，而这卷出土以后，加上以前所出的零片和残卷，就可复原到一半以上，这是它在文献方面的价值。一种古书的宋代刻本即视为珍品，唐代前期的写本，其文物的历史价值就更高了。另外，卷后附录的《三台词》和五言诗，是古代民间文学资料。抄书人的籍贯、履历、是古代历史、地理方面的资料，十二岁小学生的书法水平，又是艺术史上的价值。

《论语郑氏注》的每篇题目下都写着“孔氏本、郑氏注”。按《论语》传到汉代，有三个系统的本子：在鲁地流行传授的本子叫“鲁论”；在齐地流行传授的本子叫“齐论”，在孔子旧宅发现的古文写本，由孔子后裔孔安国作了“训解”，叫“古论”。汉成帝的安昌侯张禹用“鲁论”为底本，参校“齐论”，写成汉代第一个合校本，称为“张侯论”。汉末，高密人郑玄，又用“张侯论”为底本，参校“古论”写成第二个合校本。郑玄在此校本上加上注解、便是“郑氏注”本。郑玄校本题称“孔氏本”，是由于他的校本上许多字是改从“古论”的，据记载共有五十处。汉代以后，曹魏时人何晏等作了一本《论语集解》，杂取汉代各家的注解，加上他们自己的意见。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氏注》中，虽有许多错误和遗漏，但它总算保存了“郑注本”的面目。古代书籍只凭传抄，字句随时有增减歧互的可能。本文对其中的误字、异文和脱漏处，都作了考订。卷后余纸上抄者附写了《十二月三台词》，下注“新”字。正月一首是六言八句，可惜只写到二月两句。按“三台”是晋代以来流行的乐曲。这篇十二月联章的《三台词》，属首次发现。它使这种古代曲调的形式得到新的证据。另外所附录的五言诗，虽多错别字，但却给“俗字”、方言的研究提供了绝好资料。卷末还有小楷书《千字文》一行。这足以反映唐代文化教育的统一。

705 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　　郭沫若

（《考古》1972年第1期）

卜天寿所写的《论语郑氏注》抄本，1969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的一座唐墓。关于它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性，以及卜天寿写本的优缺点，作者已在《“论语郑氏注”残卷说明》一文中详细叙及。本文是对《郑氏注》残卷末尾卜天寿写的一些诗词和

杂录的补充叙述。第一种，《十二月三台词》：大概是新制的《十二月三台词》，故在《三台词》下带上一个“新”字。所抄写的是流行歌曲，可惜只抄了正月一首和二月的一句半。这《三台词》无疑是从内地传过去的，因词中有“梅林”二字。北方无梅，更说不上成林。卜天寿全凭记忆，写了好些别字。作者为其补漏正讹，并对其中的动名词、典故等作了考释。第二种，五绝六首：第一首是卜天寿自己做的。十二岁的孩子便能做诗，而且平仄韵脚大体上合乎规律。诗中第三句是“明朝是假日”，看来当时西域的义塾已有一定的假期，想内地也同样。二、三、四首，作者认为是民间流行的旧诗，不象是十二岁孩子所做，思想老成，不离俗套。作者对其中错讹之处都作了校勘。以上四首诗，每一首开始都有“㐃”字样，疑是五言的省略。在这四首诗之后杂写了三行，了无意义。但其中有几个寺名，足见当时西域佛教之盛行。然而义塾中所教的课本仍是《论语》、《千字文》之类，和内地的情况没有两样。这三行杂写之后又有两首五绝，但首句上都没有“㐃”字样。这两首五绝，看来也都是抄写旧作，其中也多有错别字。在第一首后又写了“开觉寺学景龙四年五月（下缺）”一行，这表明义学设在开觉寺内。在《论语》抄本写好之后交了卷，经老师批改发还，故卜天寿又能在卷尾随意杂写，距前记“二月一日”已隔三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首五绝的诗意纯是儒家思想。义学虽设在佛寺内，却毫无佛教的影响。第三种，卷尾杂录四行：前两行写的是卜天寿的籍贯年岁，第三行写的是《千字文》的开头五句，共二十字。以上三行里没有一个别字，前两行由于是自己所熟悉的事项，后一行则足证平时诵读很熟，也足证唐代西域同是以《千字文》之类的书籍作为发蒙的课本。最后一行完全是有意仿效官样文书。卜天寿是西域人，年仅十二岁。十二岁的孩子便能以比较正规的书法抄写《论语》，又能基本上平仄合辙地赋诗述怀，而且他是在义学里读书的私学生，并不是豪门子弟，这可充分说明：当时西域的文化受内地文化影响之深，以及汉文化在西域的深入和普及。

706　就斯坦因在我国新疆丹丹乌里克、磨朗遗址所发现几块壁画问题的新评述　阎文儒

（《现代佛学》1962年第5期）

本文对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发现的几处壁画作了新的评述，对斯坦因的评论和解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作者首先概述了我国佛教艺术特别是石窟艺术的情况。认为佛教艺术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全国各地特别是新疆和甘肃，都保存了许多佛教艺术中的石窟艺术。从这些石窟开凿的时间来看，最早的为龟兹（今新疆库车、拜城）境内的石窟，应在东汉的末期，最迟的在元代；个别地区也有少数明代的石窟。在这一千多年间，中国社会各阶级多数人信仰佛教，因而代表佛教艺术的石窟也到处开凿。虽然佛教艺术的题材是宗教的，但其艺术形象却是根据当时人们的各样生活而创造，故具有充分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成为我们研究这一千多年社会的历史、佛教史、艺术史的最宝贵的资料。接着，作者对斯坦因发现的壁画作了评述。1900年12月，斯坦因在新疆丹丹乌里克的寺院遗址中，发现了几块画版。其中一块上画一鼠头神，左边画一高髻、大耳环的有须人，右边一人作斜视状。据斯坦因的解释，此即《大唐西域记》所载鼠垠墳的故事：某次匈奴入侵瞿萨旦那国，赖鼠群咬断匈奴马具，因而敌军大

败，保全了国家。国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以求福佑。作者认为斯坦因这样解释，是由于他对佛经不够熟悉。并引用《百喻经》和《经律异相》中关于鼠的故事的记载，认为这幅画跟《百喻经》中金鼠狼的故事十分接近：有一人在路上拾得一只金鼠狼，放在怀中；过河时把衣服脱了放在地上，金鼠变成毒蛇。这人又把毒蛇放到怀里，结果又变为金鼠。另一块画版上画了四个人，从左自右：第一人类似菩萨装，第二人是唐代标准的菩萨装束，第三人一头四臂，第四人与第一人装束相同。四人均头有项光。斯坦因认为这是《大唐西域记》中所载于阗古代传说，东国君女，远嫁于阗王，把蚕子放到帽絮中，带到于阗国的故事。作者认为这样解释显然是错误的。在佛教造像中，只有佛、菩萨、护法等，才可能有象征发慈心、做善事的项光，一般世俗人不可能有项光。画中有一标准的菩萨像，有一四臂护法像、四人全有项光，说明此画应为佛教故事画，不可能是人间故事画。还有一块画版上，正面画一有力量的男子像，反面是一三头魔王坐在两头昂首俯身的牛身上。斯坦因认为前者为波斯式菩萨像，后者是罗斯旦战胜群魔为他效忠的一个魔王的形像。作者则认为前者为佛教造像中的护法像或明王像，也可能是“四臂的不动明王”像。后者可能是《大智度论》中所说的“八臂三眼骑白牛”的摩醯首罗天（大自在天）或阎鬘德迦像。1906年末至1907年初，斯坦因在诺羌东北的磨朗遗址，发见了七尊有翼神像的残壁画。他认为此画渊源于希腊有翼的爱罗神。是犍达婆的一般飞天。作者根据史书文献及佛经等有关记载考证，认为此画渊源于印度的迦陵频伽，唐代改造为“霓裳羽衣舞”。犍达婆是乐神，只是“飞天”的一种；并不是“飞天”都叫作犍达婆。真正的犍达婆也没有翅膀。作者还批驳了斯坦因认为这两地发现的壁画和塑像的风格是希腊式佛教美术的犍陀罗作风的看法，认为犍陀罗的佛教艺术是在古代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吸收希腊艺术的精华，在犍陀罗自己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不是希腊式佛教美术。本文考证周密，论述清晰，有很强的说服力。文内还附印有关图像。

707　龟兹五铢铸币考古发现及其有关问题　　　张　平

（《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本文介绍了龟兹五铢铸币的发现，并探讨了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龟兹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个绿洲国家，位居丝绸之路东段要冲，历史悠久，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早自汉武帝时代，龟兹就与中原王朝有了正式交往，汉、唐两代的西域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曾设在龟兹。随着丝绸之路上贸易的兴盛，促进了龟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丰富了我国多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1980年6月，在作者参加的一次文物考古调查中，在新疆轮台县的轮台古城遗址中，发现并采集到窖藏的一批龟兹五铢铸币，完整的有220枚，分有红铜质和黄铜质，浇铸。铸币园形，方孔，均具有狭缘、广串、薄肉的特点。币面铸有龟兹文30，背面铸有汉文“五铢”。其特征与中原地区所流通的东汉中后期的五铢铸币形制比较接近。这是迄今为止在龟兹地区发现铸币最多的一次。在此前后，1928年，我国考古学者黄文弼在库车县遗址中曾采集到一枚五铢铸币，其主要特征为素背，即“五铢”与30同铸于币面。1957——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在库车县苏巴什遗址发掘出八枚五铢铸币，1983年，新疆博物馆文物队

调查巴楚县故遗址时采集到两枚五铢铸币，其一为素面。此外在龟兹境内仍有零星发现，尚未统计在本文之内。综上所述，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现，在轮台、库车、巴楚等地出土的龟兹五铢铸币共有231枚，其特点为：圆形、方孔，都铸有五铢和30字样，可分为素背和非素背两类，以及黄铜质和红铜质，以红铜钱居多，非素背类型钱币又可分为四式。这些特点明显反映出龟兹五铢铸币存在着铸地、流通时代等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对此，本文根据史籍记载，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这些铸币均为龟兹本国所铸造的地方货币，其流通时代为三、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龟兹地区一种重要的法定货币。这一较长的历史阶段正是龟兹商品经济不断繁荣发展的时期。铸币从形制、重量、质地、铸文等都明显地存在着类型的差异，这不仅表现为铸地不同的横向区别，而且反映了时代早晚的纵向联系。龟兹五铢不足价的铸币和足价铸币一样流通，有可能是这种铸币在龟兹流通过程中实际变成了价值符号或货币符号的一种客观反映。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记述焉耆、龟兹两地“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黄文弼认为龟兹五铢即“小铜钱”。本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龟兹五铢的辅币才是“小铜钱”。在龟兹地区出土的一种素面、素背、无钱文的陶质小钱范，就是这种“小铜钱”。龟兹五铢铸币的出现，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是我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

708　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　　　夏　鼐

（《考古》1978年第2期）

本文是作者1977年10月31日在伊朗德黑兰召开的第六届伊朗考古年会上宣读的论文。中国和伊朗都是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两国人民很早便有友好往来。到了萨珊王朝时（公元226—642年），中国和伊朗的友好交往更为频繁。萨珊朝最后的一个国王伊斯提泽德三世于642年为阿拉伯人所击败，不久被杀，国亡。他的子孙和许多伊朗人来到中国，或做官，或经商。当时直接或间接输入中国的萨珊朝文物不在少数。本文所介绍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已可反映当时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发达。萨珊朝时代，联系中国和伊朗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国的丝绸及其他货物，沿着这条“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西运。而波斯等西亚和中亚的国家，也将银器、香料、宝石、玻璃器、毛织品等输入中国。今天在中国发现的萨珊文物，以银币、银器和波斯锦为最多。萨珊朝银币，据作者统计，共出土34起，总数达1178枚，出土地点大部分是在“丝绸之路”上，或者在它东端的西安到另几个首都（洛阳、大同）的延长线上。另外两处是广东的英德和曲江，当是沿着海道来的。萨珊银币的发现反映了萨珊帝国的权力起落和经济兴衰，也反映了它作为中国和东罗马（拜占廷）之间的贸易的中继站的地位。萨珊朝的工艺品中，以金银器和纺织品为最突出。在唐朝以前，萨珊朝波斯的金银器便输入中国，到了唐朝初期输入更多，同时中国的金银匠人也模仿制作。也可能有伊朗匠人在中国制造。一般中国制造的仿制品，器形和伊朗人所制的大致相同，但是花纹的风格，常是唐代中国型的。中国手工艺人不仅在金银制造的容器模仿萨珊朝式的，并且在瓷器、漆器和铜器中，也有模仿萨珊朝式的。可见当时中国人民对于萨珊朝

艺术品的喜爱。丝绸是“丝绸之路”开辟以后中国的主要输出品。汉代（公元前一世纪初至公元三世纪）的丝绸曾在中亚和西亚发现过。到了萨珊朝时候，伊朗人从叙利亚迁来纺织工人，开始制造丝绸，后来也能织锦，并且倒流输入中国。中国人称之为“波斯锦”。最后，作者介绍了一件1955年西安出土的汉文婆罗钵文合璧的墓志，即袄教徒苏谅妻马氏（849—874年）墓志。墓志虽是九世纪的文物，但是仍可代表典型的萨珊朝文化的传统。婆罗钵文字在安西王朝开始使用，在萨珊朝时更为盛行。在后期的书体是所谓“婆罗钵行走体”。在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上都有这种文字的铭文。石刻上的这种文字，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发现。这墓志反映了当时中伊两国人民的友谊。

709　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夏　鼐

（《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夏鼐（1910——1985年）现代著名考古学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以研究生身份留学伦敦大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北大，并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建国后历任中科院考古所所长、国务院学部委员、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职。早年发表考古文章，纠正了西方学者对我国古文化的错误论断。近年主持和指导北京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工作。曾获英、美、德、意、瑞典及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荣誉称号。一生著述颇多，本文是对五十年代在西宁发现的波斯银币的研究考证之作。

关于西宁发现波斯银币的经过，1958年《考古学报》第1期进行了报导。1956年青海粮食厅在西宁城隍庙街工地挖地基时，挖出一批银币。共76枚。其中已残破4枚。依照银币正面王者肖像的不同。分为二式：A式的王冠前一新月，冠的后部有一雉堞形饰物，共15枚；B式的王冠上的前后都有翅形物，共61枚。本文作者根据青海文管会的拓片、照相和说明，对这批银币进一步作了考释。这批银币都是波斯萨珊朝卑路斯（457——483年）的银币。A式几枚正面都是王者肖像，王冠侧面和后部的雉堞形饰物，是波斯宗教中“天”的象征，也是袄神奥马兹德的象征。冠顶和前部都有新月各一，冠顶的新月还托住一个园球，冠后有两条飘带。由脸前近肩部处开始，有婆罗钵文的铭文一行，意为主上、卑路斯。A式的背面花纹，是一般萨珊朝银币的拜火教祭坛。坛上有火焰，祭坛的两侧各有祭司一人，相对而立。右侧祭司的背后有铭文，是表示铸造的地点。B式的特点是王冠的后部没有雉堞形饰物，却换上一对翼翅；冠顶后面没有两条细飘带。而在面前却增加了一条由肩上飘起的带形物，和髻后的一条相对称。波斯的宗教观念，以鹰鸟作为太阳的象征，犹我国称太阳为金乌。这一对鸟翅可能代表太阳，或以为是屠龙之神未累什拉加那的象征。但波斯的宗教观念，“日、月、行星”的“三重天”，王冠上常有新月和象征“天”的雉堞形饰物，这些翼翅象征太阳似乎更为恰当。B式的背面花纹和A式相同。波斯萨珊朝通使中国，第一次见于记载是在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卑路斯即位的前二年，其后在461、466、468、476各年都曾通使中国，都是卑路斯在位的时期。当时中国和波斯交通频繁，所以有这样大批的卑路斯银币在我国境内发现。波斯钱币在中世纪的中亚和西亚流通很广，起有国际货币的地位。在波斯国境外所

发现的银币，一部分是由于私人带回作为纪念品，甚至作为随葬品；另一部分，尤其是大批在一起的发现，是作为商品的等价物被携带或者窖藏；所以它们被发现的地点，常可表示当时的贸易和交通路线。在西宁发现这样大批银币，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作者认为从第四世纪末到第六世纪时，尤其是第五世纪中（包括卑路斯在位的年代），西宁在中西交通的孔道上，它的重要地位在当时决不下于河西走廊。据文献记载，法显在东晋隆安三年（399）由长安西行的路线，作者推定是由靖远经兰州、西宁、西北行度越养楼山至张掖，并不经过河西走廊的东段乌鞘岭和武威。昙无竭（法勇）于刘宋永初元年（420）西行求经，他所走的路线，和法显大致相同。一个世纪后，宋云等于北魏神龟元年（518）由洛阳赴西域求经，他的路线可能由柴达木盆地北行度当金山口至敦煌，然后西行今日新疆。在宋云以后，乾陀罗人阇那崛多东来长安，他所经的路线，是由今日新疆和阗（古于阗），经过青海柴达木盆地而达西宁，乐都，然后东行赴长安。凡此，都可记明青海西宁在当时中西交通路线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710　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夏　鼐

（《考古》1966年第4期）

新疆吐鲁番从前曾出土过几批波斯萨珊朝银币，作者在《考古学论文集》中曾加以描述。最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又发现两批，并由该馆将两批银币的拓片和资料交本文作者鉴定，本文系鉴定后之考释。一、哈拉和卓高昌古城出土的一批，20枚，这20枚可分为三个类型，分别属于沙卜尔二世(310—379年)计10枚，阿尔达希二世(379—383年)计7枚，沙卜尔三世(383—388年)计3枚。沙卜尔二世在位时间达69年之久，在他的统治下，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他的银币，除库思老二世以外，是发现最多的。就三种银币所占的比例推论，这一批大概也是属于沙卜尔三世初年所埋。这时正是前秦苻坚命吕光率众七万西征（382年），经高昌、焉耆而攻灭龟兹，吕光威名著于西域的时期。吕光返师东归，途中闻苻坚淝水之败，当是太元九年初（384年）事。吕光至高昌，太守杨翰迎降。太元十四年（389年）吕光自立为三河王，以他的儿子吕覆为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关于高昌古城的波斯银币，大约在沙卜尔三世时(383—388年)埋入，可从这一历史背景来考虑它们在中西交通史上的意义。二、阿斯塔那高昌古墓出土的一批，是在1959年10月至1960年11月期间，是新疆博物馆在阿斯塔那先后发掘的40座墓中所获得。其中有8墓共出土波斯银币10枚。作者仅据M302墓（出土有永徽四年即635年的墓志）的二枚拓本，和M338墓（出土有乾封二年即667年的墓志）出土的一枚进行了鉴定。M302墓的二枚分别出于Ⅱ号和Ⅰ号女尸口中，田野器物号为M302:025和M302:027。两者正面都是半身的王者像，脸向右，发髻束成球形，悬于颈后。两肩上又各飘一条纽结形的带。婆罗钵文的铭文，在这两条纽带的上方，排列法都是由上而下，右侧为王名，译为耶斯提泽法。左侧两行，上行为复合的单体字，乃“王权”之意；下行为“昌盛”之意。联珠形园圈的外框以外的边缘上，左右两侧和下方都有一个抱着五角形的新月。二枚的不同处是：025的王像，脸上有须，联珠形外框共有二道，框外的下右边缘有铭文，即“良佳”之意；027无须，外框仅一道，无铭文。二枚的背面，中央为拜火祭坛，坛的基

部为三级，坛的两侧各有祭司一人。坛上火焰的左侧为一五角形，右侧为一新月。右侧铭文为铸地，左侧为年份，周围绕一联珠形外框二道或三道，框外的边缘上，左右上下各有一个抱星的新月。二枚的不同处是：025的铸地为伊拉克，年份可能为十一年。027的铸地不明，年份即十一年，相当于公元642年，即贞观十六年。据上所述，这两枚都是耶斯提泽德三世所铸。此外，M338出土的一枚，作者确定它是库思老二世（590—627年）的银币。耶斯提泽德三世，便是我国史书中的伊嗣俟，或作伊嗣侯，是萨珊朝的末代国王，在位时期为公元632—651年。《旧唐书》说伊嗣侯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遣使入贡，当时前来请援。这表示当时中国和波斯的关系密切。波斯亡后，当有许多波斯贵族和富人向东逃奔。故位于丝路交通孔道上的高昌，这时和稍晚的墓葬中有较多的波斯银币出土。这次出土波斯银币的八座墓中有七座可以确定年代，其中除一座为延寿三年（626年）之外，其余六座分别为653、656、657、663、665、667等年份，即可作为旁证。

711 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　　夏鼐

（《考古》1966年第5期）

1964年12月，河北省定县城内东北隅华塔废址底下石制舍利函中，发现了大批北魏时代的遗物，包括金银器、铜器、琉璃器、珠玉、五铢钱和波斯银币。石函上有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的铭文，记载这批遗物埋入的年代。本文是对其中波斯银币的考证说明。这次发现的银币，一共41枚，都是萨珊朝的"法拉克麦"银币。根据正面的半身王像所戴王冠的样式和铭文中的王名，可分为二型三式。Ⅱ型即卑路斯（457—483年）的银币，分为A式（王冠的中央和后面为雉堞形，前面为新月形）和B式（王冠中间有雉堞形，前后饰以一对翼翅）。关于这两式的正、背面的花纹，作者在《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中已有详细考释。Ⅰ型只有一式，是耶斯提泽德二世(438—457年）的银币。耶斯提泽德是卑路斯的父亲，二者的时代相衔接。这一型在我国境内是第一次发现。据作者考证，王像两侧有婆罗钵字体的铭文，译意为"主上，耶斯提泽德，万王之王"。背面中央是拜火教祭坛，两侧祭司手持长矛，背后各有铭文，右侧为简化的王名，左侧为铸造地点。文中对这41枚银币的大小重量、铭文等，列表作了说明。这41枚中，Ⅰ型的共4枚，Ⅱ型A式31枚，B式6枚。这37枚卑路斯银币中，纪年铭文有3年、5年的各一枚，6年的4枚，9年的6枚，14年的一枚。卑路斯在位共26年，他的14年相当于公元470年，即北魏孝文帝即位的前一年。贮藏这批遗物的石函铭文说："太和五年（481年）……二月舆驾东巡狩，次于中山，御新城宫，北幸唐陂……帝后爰发德音，……造此五级佛图"。这时北魏都城仍在今山西大同。太和十八年（494年）才迁都洛阳。中山即今定县。北魏在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以前的26年间，曾记载波斯国"遣使朝献"达五次之多。这批银币的发现，可作为当时中、波两国交往频繁的物证。但当时并非流通市面上的货币，而是和金、银、珠、玉等物一起，作为"御府"中的宝藏。这批银币中特别可注意的是耶斯提泽德二世的银币，正面联珠纹园框以外的边缘上，右边有—S形符号，下边有一行铭

文。不是波斯婆罗钵文，而是哌哒文。哌哒民族，据我国史书记载，是“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日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哌哒盛时，“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又说“自太安（455—459年）以后，每遣使朝贡。……永熙（532—533年）以后，朝献遂绝。”哌哒国自铸的银币，也是模仿波斯萨珊朝的银币，但王像不同，铭文采用本国文字，也有采用婆罗钵字或印度婆罗谜字的。另一种是在波斯的银币上打了哌哒文字的戳记，表示可在他们国境内流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枚打上哌哒文戳记的波斯银币，是和一般的波斯银币一起于481年埋入舍利石函。这枚银币是我国境内第一次发现的和哌哒有关的实物史料，可以肯定是经波斯或哌哒使臣之手由丝绸之路带入的。

712　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夏鼐

（《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中、伊两国人民自公元前二世纪以来就有了频繁的友好往来；经济上互通有无，两国文明互相影响。萨珊朝时代（226—651年）联系两国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国的丝绸和其他货物源源西运，波斯等西方国家的玻璃器、香料、宝石、银器、毛织物及一定数量的萨珊银币也大量输入我国，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在我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的发现概况、出土地点、铸造年代、历史背景、埋藏年代、铸造地点及用途等问题的分析研究。解放前在新疆吐鲁番和库车两处一共发现四批萨珊银币，仅只六枚。解放后新发现的有二十九批之多，共达千枚以上，连同解放前出土的共三十三批，总计达1174枚之多，分别在十二个地方（县）出土。文内列有“中国出土的萨珊银币一览表”，对其出土年份、地点、埋藏时间、数量、银币年代、资料出处、出土情况等有详尽记载。根据表中的出土地点一栏，作者绘制了一幅分布图，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境内这些萨珊银币大部分出土于“丝绸之路”沿线，新疆乌恰947枚、吐鲁番63枚、库车1枚、青海西宁76枚、陕西西安（包括长安）12枚，耀县3枚、河南陕县2枚、洛阳16枚、山西太原1枚、河北定县41枚。此外，广东省的英德和曲江二处，分别出土3枚和9枚，这可能是沿着广州和波斯湾之间的海上航线而来。青海西宁发现的76枚卑路斯银币经作者考证，在第四世纪末至第七世纪初，由于西宁是中西交通的孔道而传入。至于萨珊朝波斯和东方的海道交通，据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记载：第三世纪阿尔达希一世创业时，曾遣士兵到波斯湾建立海港，五世纪时，波斯便有海船东向和印度、锡兰直接通航。然后转舵东北行至东南亚和中国。中国的丝绸即由这一航线西运。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包括由沙卜尔二世至伊斯提泽德三世等共十二王的银币。波斯的阿尔达希一世于公元226年推翻安息王朝后，建立了萨珊王朝，开始铸造萨珊式银币，这种银币的样式，反映出波斯原有文化的复兴。银币两面都有用模子打压的花纹。银币正面是国王的半身像，背面正中是波斯国教袄教（拜火教）的祭坛。祭坛的两旁为婆罗钵文的铭文。萨珊银币以库思老二世的传世最多，其次为沙卜尔二世、库思老一世和荷米斯德四世。在我国境内出土的，也以库思老二世为最多。综观萨珊朝的历史，这一朝代自沙卜尔二世（四世纪）起，和外界的交往较为频繁，这时期我国的西北方，最初是前凉割据时代。

后来前秦于376年灭前凉，遣使西域，而大宛、康居和天竺也都遣使来朝。我国所发现的萨珊银币以沙卜尔二世的为最早，数量也较多。五世纪时，萨珊朝由于内乱外患而中衰，至五世纪后期，在对外战争中，卑路斯曾为哌哒人所俘，后割地赔款才得赎回。卑路斯和他的前王的银币所以能传播到中国，可能是由于哌哒人以所获得的波斯赔款转向东方购买货物。不过五世纪后半期至六世纪初，中国和波斯还经常友好往来。六世纪中，库思老一世在位（531—579年），萨珊朝复兴。库思老一世的铸币地点达八十二处之多，所以他的银币传世之多，仅亚于库思老二世。它的传播范围很广，东面远达我国黄河流域西安附近的耀县和洛阳附近的陕县。库思老二世时(590—628年)经济更加繁荣，贸易更为发达，其铸币地点达一百二十处之多，他的银币成为萨珊朝银币中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多的一种。这三十三批波斯银币的埋藏年代，有的是在公元651年波斯亡国以后才入土的，并且有的印铸或附加压印的年代也是在651年以后。反映了651年波斯亡国后，翁米亚王朝（萨珊朝皇室支系）传代四世才被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所灭。银币铸造年代时间差距长短不同，其中时距最短的只有十年左右，长久的达百年有余。文中列有“萨珊银币埋藏年代表”，对埋藏时间、银币年代、相差年数均有记载。另外一些银币，没有共出的遗物，出土情况又不明，只能根据钱币年代来估计其埋藏时间。不过从八世纪中叶（即萨珊朝亡国后约一百年）以后，波斯银币在我国境内已甚罕见了。萨珊银币的背面加有铸造地点始于巴朗五世(421—438年)，以后便成常规。我国发现的这三十三批中，铸造地点可以确定的并不多，其中有些的铸造年代在巴朗五世以前。在新疆乌恰发现的窖藏银币中，有281枚是阿拉伯翁米亚王朝的库思老二世样式。这些银币都是阿拉伯帝国东方各省，尤其是最东北的呼罗珊省所铸。这里离中国边境最近，所以流到我国的较多。至于这些银币的用途，作者根据出土情况分析，萨珊银币当时在中东、近东和东欧，和拜占庭金币一样，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广泛通行使用。根据我国这三十三批银币的出土情况，有的是作为货币而以某种原因暂时窖藏；有的则是搜集古钱和外币爱好者的藏品；有的则是象其他货币一样作为随葬品。萨珊银币的另外一项发现，是在佛教寺庙的舍利塔基中，它是造舍利塔时，由“善男信女”施舍的金银饰物和钱财，作为“功德”和舍利同埋于地下，以求“善果”。综观出土情况，萨珊银币当时传入中国很多，分布也很广。有的地区（如高昌）是曾流通使用的，但在其他广大地区，则是作为银块或银制装饰物看待的。这些银币是中西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极好物证。

713 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朱捷元　秦波

（《考古》1974年第2期）

陕西西安在隋唐时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集中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里多次发现过隋唐时期遗存下来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这是古代中国和波斯友好往来的见证。本文是对近几年在陕西长安、耀县出土的两批波斯银币的报道。1965年12月，在长安县王家庄公社天子峪国清禅寺附近的残舍利塔内发现一件白瓷钵，内装骨灰和大小套装的二个银盒及一个小金盒。大盒内装小银盒和七枚波斯萨珊朝银币。长安县天子峪，离现在西安城约40余公里。隋唐时称“梗梓谷”或“便子谷”，以后讹为

“天子峪”。在隋唐时峪内西坡曾有一处著名寺院，名至相寺。据史籍记载，隋唐时曾有僧人在峪内西坡寺院建塔、塑像。参照其他遗存物判断，发现波斯银币的舍利塔应是唐天宝以前楩梓峪至相寺僧人的舍利塔。另一处是1969年4月，耀县照金公社寺坪队发现的一座舍利塔基下的舍利石函，石函盖面上篆书“大隋皇帝舍利宝塔铭”九字。塔铭置于石函内，铭十二行，行十二字，记年为仁寿四年四月八日。塔铭下的函洞内一铜合中除骨灰、舍利、铜钱、金、银、玉环外，还装有三枚波斯萨珊朝银币，在另一铜合内，也装有骨灰及其他布施物。据塔铭可知此地为隋神德寺遗址所在地。此舍利塔当是仁寿四年，隋文帝在宜州宜君县神德寺“奉安舍利”所建的“灵塔”。长安县天子峪舍利塔中发现的七枚波斯银币，其中六枚与1955年11月在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库思老二世的银币相同。但细加审视，其纹饰及婆罗钵铭文又各有微小差异，这可能是因铸币的时间和地点不同所致。另一枚银币，应为萨珊朝布纶女皇（630—631年）时的铸币。按萨珊朝自627年库思老二世被杀后，发生互争王位的内战，此后四年（628—632年）内，先后换了八个国王和女王，布纶女皇就是其中之一。这枚银币的铸造年代为630年，传入中国当在630年（贞观四年）之后，从而可以断定长安县天子峪舍利塔的建造时间当在贞观四年以后至天宝以前的这一段时间内。唐代长安是中亚和西域商人集聚之处。在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上，中国和波斯的使臣和商人，络绎不绝。因此数量较少的布纶女皇的银币完全有可能通过两国的使臣或商人传到长安。耀县照金公社寺坪隋舍利塔中出土的三枚波斯银币，其中一枚系库思老一世(531—579年)时所铸，与1956年秋在河南陕县隋墓中出土的库思老一世银币相同。另外两枚是卑路斯（457—483年）和卡瓦德一世(488—532年)时的铸币。这三种银币的铸造年份都在隋仁寿四年（604年)以前。综观解放后我国出土波斯萨珊朝银币的地方，在西北通往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和地区出土最多。这是符合隋唐时中西交通和友好往来的历史的。尤其在长安县天子峪舍利塔中发现世界上较为罕见的布纶女皇时所铸的银币，它更进一步证明了古代中国和波斯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为中西交通史又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文后有夏鼐先生的附记一则，对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各枚背面铭文的考释作了说明。

714　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　　夏　鼐

（《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本文考释了1953年在西安附近的咸阳底张湾一座隋墓中出土的一枚东罗马（拜占廷）帝国的金币，这是中西交通史上很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枚金币两面都有图像和铭文，正面是王者的正面半身像，右手执王杖，左手所执似为一园球物（地球？）。铭文由王像右手侧开始。背面为一戴盔胄的女神像，坐于一宝座上。右手执杖，左手托一地球，地球上有一十字架。座下有铭文，另有一铭文，由女像右侧下方开始，由下而上，几乎环绕一周。查这枚金币是东罗马皇帝查斯丁二世（565—578年）的。铭文是拉丁文，经作者复原，全文译意为：查斯丁二世，我们的主上，祖国的父亲，至尊。背面的铭文中，座下是铸造的地名，是“印铸于君士坦丁堡”的意思。女像右侧下方的铭文译意为“至尊们的胜利。”末尾E字，是所谓“厂局记号”。英国不列颠博物院的《拜占廷

古物指南》一书中，印有查斯丁二世的一枚金币，作者将随墓发现的金币相比较，从图像到铭文都相同。所以这枚也是查斯丁二世的。据《文物参考资料》张铁弦的文章说，这枚金币是独孤德公（罗）墓中发现。据墓志记，罗死于开皇十九年（599年），次年二月下葬。他是隋文帝独孤后的长兄，曾做过总管凉、甘、瓜三州诸军州凉州刺史。马克思曾指出，在东罗马帝国时，君士坦丁堡"在发现直通印度的道路之前，始终是个巨大的贸易市场"，并称之为"沟通东方与西方的黄金桥梁"。查斯丁二世时（565—578年，即北周武帝保定五年至宣政元年），东西方贸易仍掌握在波斯人手中。查斯丁二世想避开波斯而打通直到东方的贸易道路，于568年曾遣使臣蔡马库斯到西突厥汗庭。在这以前，查士丁尼帝曾由中国输入蚕种，在东罗马推广了育蚕缫丝方法。当时中国也知道拜占廷帝国，我国史书称为"拂菻国"。"拂菻"一名，始见于《隋书》。从裴矩《西域图记序》及《隋书·西域传》可以知道当时我国和西方交通的情况。作者依据《隋书·裴矩传》并参考他书，绘制了一幅隋代中西陆路交通图，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和拜占廷间"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带"的关系。其中北道接近君士坦丁堡的一段，便是上述的东罗马使臣蔡马库斯前往突厥可汗庭所经过的路线。拜占廷的货币流入我国的情况，据《隋书·食货志》说，北周时代(557—580年)"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在这里作者指出了桑原骘藏在一篇论文中说的"由于伊朗人使用金银货币很早"，而将金币和银币混为一谈的错误后，认为当时西域许多胡商前来河西诸郡交市，西域的金银币也流入了该地；北周时甚至于被采用作为该地区的通用货币。葬在西安附近的、曾在隋初做过河西地区高级官员凉州刺史独孤德公的墓中发现东罗马的金币，正是反映了这种经济情况。

本文最后附带讨论了相传清代山西灵石出土的罗马铜币问题，作者对它的可靠性进行了考订。认为它们决不是汉晋时代商人携入我国的，也不是南北朝时代"流通华北的遗物"，根据它们来推论汉晋或南北朝时的中西交通，显然是不妥当的。

715　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廷式金币　　　夏鼐

（《考古》1961年第8期）

本文对1956年西安市西郊土门村唐墓中出土的一枚拜占廷式金币进行了考释。这枚金币正面没有铭文，仅有半身像。图形和拜占廷的希拉克略(610—641年)所铸的金币相同。两个像中，左侧较大的是他自己，颔下有须；右侧年轻无须的是他的儿子希拉克略第二君士坦丁的像。两人都头戴王冠，冠上有十字架，身上有披于肩上的甲袍。两个王冠之间的空隙处有一十字架。背面中央为一个末端丁字形的十字架，立于一个地球的上面，下面又有一个四级的座子。这十字架的左侧有一马尔太式十字架，右侧有八角星。背面边缘有铭文一周，字不可识。作者与希拉克略的金币相比较，断定是希拉克略型的仿制品。年代大概是公元七世纪的中叶。铸造地点，大概是在中亚细亚的国家所仿制。铭文和希拉克略金币的原型，完全不同，也有待考释。根据金币出土的墓葬墓形，墓内壁画中仕女服饰，同出的器物如开元钱的形制等，推断这墓的年代是唐高宗或武后时期，即第七世纪后半叶。这一时期（公元六—七世纪）的中西交通频繁，在古钱学上有许多证

据。除了这枚金币之外，咸阳隋墓中曾出过一枚拜占廷皇帝查斯丁二世的金币，河南陕县隋墓、西安唐墓和新疆吐鲁番的高昌墓等，都曾有波斯萨珊朝银币出土。这些都是在我国境内所发现的中古时代西方国家的货币。反过来，我国当时的货币，也曾在苏联境内的中亚细亚出土。例如：在撒马尔罕城东68公里的片治肯特古城遗址中，曾发现过一枚北周时所铸的"布泉"钱。这城当时属于康国，公元八世纪初为阿拉伯军队所毁。此外，在这古城遗址中，还发现大批康国七一八世纪的铜钱。钱上铸有粟特字的铭文和徽号，但钱形是模仿我国的方孔钱。这些古钱的发现，都可和文献记载相印证，表明当时中西交通的繁荣和东西方贸易的活跃。

716 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廷金币　　夏　鼐

（《考古》1977年第6期）

1975—1976年石家庄地区文化局在河北省赞皇县的南邢郭发掘了东魏上党太守赠司空李希宗（501—540年）夫妇的墓。在女性尸骨附近发现了三枚拜占廷金币。本文是对这三枚金币的详细考释。

公元330年（东晋成帝咸和五年），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把京都罗马城东迁到拜占廷城，并把新都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共和国的伊斯坦布尔）。有些史书上称新帝国为拜占廷帝国或东罗马帝国。在南北朝时拜占廷便和我国有了交通往来。隋唐史书中的"拂菻"国，便是指拜占廷帝国。解放前后，新疆吐鲁番、陕西咸阳、西安市及内蒙古都曾出土拜占廷金币和它的仿制品。这座东魏至北齐的墓中（这墓虽建造于540年左右，但金币当是576年崔氏死后随同尸体埋入的）又发现这种金币三枚，为当时中国和拜占廷的关系提供了又一批物证。

1号金币是狄奥多西斯二世（408—450年在位）的金币"索里得"，正面是皇帝的半身像。手持兵器，铭文由右手处开始，依时针旋转方向排列，共17个字母，译意为"我们的主上，狄奥多西斯，虔敬的幸福的至尊（皇帝）"。背面为胜利女神像，侧身向右作前行姿态，右手持长柄十字架。头部与十字架有一颗八芒的星，脚下一条横线，下面及其两侧都有铭文，译意为"君士坦丁堡的标准（黄金）"，"宣誓典礼二十年增加到了三十年"。拜占廷皇帝名为狄奥多西斯的，还有一世（379—395年）、三世（716—717年）。二世即位，上距一世的死亡，相隔只有十三年。二者金币正面的帝名和帝像都很难区分。但金币背面两侧的铭文，却只见于二世的而不见于一世的。因此，可以确定这是狄奥多西斯二世的金币。2号金币是查斯丁一世舅甥共治时（527年）所铸的金币。正面并列两帝的正面坐像，查斯丁一世占较尊的位置，坐在右边。头部的背后，都有背光，表示皇帝是和天主及天使一样，具有神圣的圆光；右手都持有球体，表示皇帝替代上帝统治全球。两帝的头部之间有一十字架，周围的铭文，由左下角开始，依时针旋转方向排列，译意为"我们的主上，查斯丁和查斯丁尼，长生不死的至尊（皇帝）"。背面中央为正面站立的男像，右手持长柄十字架，左手持上立十字架的球体。立像的两侧有铭文，可译意为"至尊（皇帝）们的胜利女神，第四〔局〕"。有人根据铭文以为这背面图像即胜利女神，但这像是男像而非女像，所以现今一般认为是天使像，可能是圣

米克尔像。图像已变，但铭文仍旧不改。3号金币也是查斯丁一世舅甥共治时所铸，正面为两帝的坐像，头部背后也都有背光，头部之间也有一个十字架。但这里两帝并坐于同一宝座上，则和2号金币不同。铭文基本上与2号相同。查斯丁一世（518—527年在位共四个月），晚年选择他的外甥查斯丁尼一世（527—565年）共治国政。这两枚金币当是这时期内所铸。两枚的直径和重量，都不及1号金币；由于剪边的关系，面积仅及1号的一半。

这次发现，对于中西交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物证。七世纪初，隋代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便曾详述由敦煌至拂菻（即拜占廷）的商道。这批576年埋入的拜占廷金币，证明在第六世纪时两国交通往来便已频繁。《隋书·食货志》说，北周时代（公元557—580年），“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大概是指东罗马金币和萨珊朝银币。但远处东方的赵郡（即今河北赞皇一带）是不会使用这些“西域”金币的。1号金币钻有两孔，显然是作为佩饰之用。至于剪边的两枚，重量几乎减少到原来的一半，更不能再作为法定通货之用。作者推猜这两枚原来可能是放在死者口中，或握在两手中，这是当时的一种葬俗。

717 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　　夏鼐

（《考古》1979年第6期）

1978年9月4日意大利召开的第廿六届欧洲汉学会议上，作者在《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一文中，介绍了解放后我国出土的有关中，意两国关系的几件文物。

一、扬州拉丁文墓碑第1号。1952年夏初，在扬州南门水关附近发现一块墓碑，编号为第1号墓碑。碑身为长方形，上部两角作园肩，顶部已毁。碑面上半为天主教中使徒列传的故事图，下半为拉丁文墓志，周缘为卷草纹花边。墓志的字体是典型的老式哥特字，字迹工整。译成汉文为：“以主的名义，阿们，这里卧着（埋葬着）喀德邻，维利翁尼的故（过去的）多密尼先生（主人）的女儿。她卒于主的（耶苏的）纪元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六月”。按耶苏纪元1342年为我国元顺帝至正二年，也是罗马教皇使节马黎诺里抵北京的一年。时距马可·波罗离华恰五十年。维利翁尼是家族名，威尼斯档案文件中有维利翁尼这一家族。十六世纪时意大利热那亚也有维利翁尼这一家族。多密尼·维利翁尼大概来自威尼斯或热那亚，这两地的商人很多来过东方经商。墓主喀德邻可能是随父亲来华，或生在中国。他的兄弟也埋在附近，可见他们一家都住在扬州。碑面上部的图像，是描绘基督教中死者保护神“圣喀德邻”的殉教事迹。可能由于墓主的名字和这保护神相同，所以这保护神的圣迹便被采用以装饰墓碑。顶部的图像是在中国所发现最早的“马顿那（圣母马利亚）和婴儿（耶苏）像”。

二、扬州拉丁文墓碑第2号。1952年夏，在第1号墓碑发现后，“不数日，就其地续得一方，亦是卧置，且较完整”。这墓碑高、宽。大小较第1号墓碑为小，但形状大体相同。志文和图像则风格相似，而内容不同。译成汉文为：“以主的名义，阿们，这里卧着（埋葬着）安东尼，维利翁尼的故（过去的）多密尼先生（主人）的儿子。他淹化于主的（耶苏的）纪元一千三百四十四年”。公元1344年为元顺帝至正四年，较第一

号墓碑晚二年。因二墓均无墓主年寿，无法确定二人的关系是兄妹或是姊弟，但可断言二人为一父所生。这墓碑的图像，是“末日审判图”。如果对照第1号墓碑，这图像当是象征圣方济各派僧侣将死者灵魂奉献于上帝。

上述二件墓碑，反映了十四世纪前半期的扬州基督教情况。从有关资料中得知，当时扬州有天主教圣方济各派僧侣、教徒和教堂。来华的圣方济僧侣，多属意大利人。这二墓碑的主人一家，当是这派的信徒，死后便葬在教堂的墓地中。

三、广州出土威尼斯银币。1964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在广州东山清理了一座曾经盗掘过的明太监韦眷墓，残留的随葬品中有外国银币三枚。经作者鉴定，其中一枚是威尼斯银币，为1457—1462年威尼斯总督帕斯夸尔·马利皮埃罗所铸。另二枚为满剌加（今孟加拉）国培巴克沙于1459年所铸。为威尼斯共和国所铸叫做“格罗索”或“格罗塞拖”的银币，正面为威尼斯的保护神（圣徒）圣马可像和总督部·马利皮埃罗像，圣马可把一面军旗交给总督。两像周围有拉丁文铭文，前者是总督的姓名，后者是“威尼斯圣马可”，旗下有“领袖”两字。背面为救世主耶苏像，周围的铭文译成汉文是“赞颂和荣誉属于您”。墓主人韦眷是当时驻在广州的提举市舶太监。《明史·韦眷传》说：“眷为广东市舶太监，纵贾人通诸番，聚珍宝甚富。”这三枚外国银币以及同出的红珊瑚，便是他侵蚀外商所得。这枚威尼斯银币的发现，一是可印证十三、四世纪时威尼斯在欧洲与东方的贸易中所占的地位。二是广州当时在海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当时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的腐败。总之，由于这枚威尼斯银币的发现，结合前述二块扬州拉丁文墓碑，可看到十四、五世纪时中国和意大利两国在经济、宗教和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718　中国发现的十五世纪威尼斯银币　（意）毛里齐奥·斯卡尔帕里

（《考古》1979年第6期）

本文以在广州发现的一枚十五世纪的威尼斯银币为标本，考察了在第一批葡萄牙船只抵达印度(1498年)和中国(1516年)之前这一时期内欧洲与东方的钱币史。在广州明太监韦眷(死于公元1495年或稍早，译者注)墓发现的这枚银币，是在帕斯夸尔·马利皮埃罗总督统治威尼斯期间(1457—1462年)铸造的。这枚银币叫做格罗索或格罗塞托。作者通过对现藏于威尼斯市博物馆，由帕普多波利—阿尔多布朗迪尼收藏的一枚同期所铸威尼斯银币正背面图像、铭文的描述，补充了夏鼐《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一文中，因图像模糊而未予描述的一些细节。希腊和拜占庭艺术对威尼斯格罗索银币的图像有很大影响，它不仅表现在题材方面，而且还表现在长袍的式样和人像的姿势方面。威尼斯格罗索银币的起源可追溯到恩里科·丹多洛时代(1192—1205年)。这种币制的确立是具有极其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整顿了当时混乱而质劣的货币，有利于日益增加和兴旺的各种商务活动(尤其对东方)，因而大大提高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声望和加强其政治经济势力。格罗索很快便成了确定货物价格的标准钱币和通货的基础。因此，有人说铸造格罗索钱币是为了满足贸易的需要，主要是满足东方贸易的需要，而在东方贸易方面威尼斯居首位。然而，在保持金、银币之间固定而永久的关系方面，每种货币制度常常

遇到困难，也因当时国内外政治局势的恶化，威尼斯银币很快就衰败下来。1472年5月20日元老院通过一条法律，明文规定禁止这种银币的铸造。在1472—1973的两年间他们通过了很多法令和决议以稳定货币，制止伪造和银币剪边。这些伪造和剪边是有害的而且流行太广。他们从市场上收回格罗索银币，但是这一决议却使国库花去了一百万（枚）杜卡托金币。从这时起格罗索银币失去了全部法定价值。在其280年的历史中，格罗索银币就其成分、重量和价值而言，经历了各种变化。由于很多伪造币和仿造币，共和国政府通过了很多法律反对这些欺诈行为，这就给威尼斯贸易带来巨大的损失。

广州发现的这枚威尼斯银币一定是在1457和1462年间铸造的。可能是由阿拉伯商人带到中国，或是由中国旅行者带回去的。在较晚的几个世纪，东亚国家与中近东国家的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在十五世纪下半叶这些往来大大减少。中国的航海冒险者在那个世纪初就已经抵达非洲大陆沿海国家。十四世纪初，威尼斯实行法律禁止从陆路输出格罗索银币，只允许由威尼斯商人由海路带出。但作者也不排除这枚银币经由与威尼斯通商的国家，由陆路带到中国的可能性。这枚银币的墓葬年代是1495年，墓主是当时势力很大的太监韦眷，他在沿海一带经商，所以在他的墓里发现这枚银币和别的外国银币并不稀罕。作者认为，这枚格罗索银币或许是在1472年之后，它已失去法定价值、在东地中海地区已不宜用于贸易而带到中国的。在帕斯夸尔·马利皮埃罗总督统治期间铸造的格罗索银币十分罕见，在广州发现的这枚银币可以作为一个很难得的标本。它再次证明在每个时代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着频繁的接触和交流。

719 “和阗马钱”考　　夏鼐

（《文物》1962年第7期）

本文是对黄文弼先生1929年在和阗北的阿克斯比尔旧城所发现的一枚“和阗马钱”的形制、铭文、铸造年代和它发现的重要性等问题的研究考释。黄先生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对这枚铜币曾加描述和考释。作者对其错讹或不准确处进行了补充和纠正。这枚铜币的花纹和铭文，不是镌刻的，也不是浇铸的，而是打压成的。这是中亚各国的古币继承希腊铸币传统的造币方法。马像的周围有一圈佉卢文的铭文，共二十字。作者译意为：“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矩伽罗摩耶娑”。另一面的铭文是汉字篆文一圈，计六字：“重二十四铢铜钱”。中央的花纹，或以为是“月桂树的环”，或以为是“贝”字。依中亚古钱惯例，马像一面为背面，这面当为正面。这枚铜币和斯坦因发现的一枚，铭文和花纹几乎完全相同，它们当为同一时期内所铸造和流通的钱币，这一类型的铜币，有大、小二种。本文所讨论的这一枚是大钱。另有小钱，重量约合大钱的¼，一面是汉文篆书“六铢钱”三字，另一面中央为动物像（马或骆驼），周围有佉卢文或20字或13字。这种小钱当是和大钱属于同一时代。这些铜币近数十年来在和阗地区出土很多。这类铜币虽大多数为马纹，但也有骆驼纹的，似不能概称为“马钱”。它们主要的共同特征是：一面为汉文，另一面为佉卢文。作者以为可名之为“汉佉二体钱”。“汉佉二体钱”的年代问题，各说纷纭，现仍未能完满解决。作者列举了福赛斯、赫恩雷、德微利亚、托马斯、榎一雄等人关于铸造年代的诸种说法，以为都有可商榷之处，

作者认为，就现有的证据而论，这种和阗汉佉二体钱的铸造和流行，当在公元73年班超到于阗以后，在公元第三世纪末佉卢文不复通行以前。因为钱币上的王名在文献中找不出来，又未能推定他们相当于文献中的那一个王，所以无法断定它们精确的年代。”汉佉二体钱”是古于阗人民的创造。于阗西部及西南部毗邻中亚诸国，汉时与大夏、大月氏（贵霜国）、旁遮普一带塞种诸国关系密切，所以一度采用佉卢文作为文书及铸币上的文字，后来才创造自己的“于阗语文”。在自己没有铸币以前，也采用中亚诸国的货币单位“德拉克麦”和“四德拉克麦”。后来于阗国王自行铸币，因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密切关系，所以便标明“六铢钱”或“重二十四铢”。这种汉佉二体钱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表示当时该地人民和汉族的亲切关系。他们吸取汉族的先进文明，使用汉文字。在经济上也利用货币作为纽带，和汉族结成密切联系。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在文献上证据很多；这钱币正面采用汉文，也可为证。由此可见在遥远的古代，我国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720　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物概述

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文物》1977年第3期）

从1959年起，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地进行了十三次发掘。1973年秋季的发掘有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二十余人参加。历年来一共发掘清理晋——唐墓葬近四百座，获得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大量汉文文书。本文是对这批文书概况的介绍。这批文书除一部分是以文书的形式直接随葬（如“衣物疏”、“功德录”、“告身”及部分契约等），比较完整外，大多被剪裁成给死者穿戴的鞋靴、冠帽、腰带和枕褥等服饰，以及部分俑的构件，多已残损。总共二千七百多件，其中不少有年号，最早的是西晋泰始九年（273年），最晚的是唐大历十三年（778年），前后历时五百年。计晋十六国时期的一百多件，约占全部文书的5％；割据的高昌王朝时期的七百多件，约占30%；其余为唐代文书，约一千七百多件。从文书形式看，有契约、籍帐、官府文书、私人信札、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直接、生动的资料。文书所见古代高昌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业生产及经济状况，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其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体，但畜牧业也较发达。手工业方面，至迟在五世纪已有棉、丝纺织业，这是吐鲁番地区各族劳动人民对祖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再从频繁的贸易往来、官府租税、货币流通来看，封建经济有了显著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所削弱，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显著增长。文书也反映了高昌封建社会深刻的阶级矛盾。官府的租税和徭役，僧俗地主的高额地租，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等阶级矛盾和斗争，贯穿在出土文书所处的整个时代之中。文书对古代高昌地区的思想文化也有所反映。文书中有不少古籍抄本是儒家经籍、封建法典、医药方剂、宗教经文等，这些不仅是珍贵史料，有些文书本身还具有书法价值。文书也说明古代高昌是我国汉族和兄弟民族聚居之区，他们共同参加了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斗争。同时大量官府文书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从高昌设

郡县以后，这里的政治、军事制度和经济、文化生活，都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唐统一高昌后，置西州，下分高昌、交河、蒲昌、柳中、天山等五县。文书中不少钤有西州都督府和这五个县的文牒。由此可知，唐朝政令有效地施行于西州。这对苏联所制造的“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中国的西部边界从来没有到过巴尔喀什湖”等谰言，是一个最有力的回击。

721　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

（《文物》1978年第6期）

哈喇和卓古墓群，位于著名的火焰山南麓，高昌古城的东北，在今吐鲁番县火焰山公社境内。1975年春，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发掘了其中的四十座古墓，出土文物五百余件。本文是对这批古墓群的发掘简报。这次发掘的墓葬主要是张氏墓茔、贾氏墓茔和宋氏墓茔。这批古墓早年均被盗掘，有的被窃掠一空；有的仅存一、二件残破陶器；有的墓内文物明显地是从其它墓中混入。四十座墓葬的形制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有十一座，相当于十六国高昌设郡到柔然控制高昌的早期（即阚氏高昌阶段）。第二期十六座，属于麹氏高昌时期。第三期十三座，属于唐朝西州时期。简报对各期墓葬的形制、棺木结构、墓志纪年、墓室壁画、出土文书、出土文物等都做了详细记述。并就出土文物与历代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作了探索。吐鲁番地区在汉朝时就是屯田的中心地区之一。汉朝的戊己校尉驻此。在其境内的高昌故城，汉时称高昌壁。魏晋的戊己校尉仍驻此。东晋时，我国北方出现了许多地方割据政权，先后有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前凉。张骏于东晋咸和二年在高昌首次设郡，后前秦等沿袭此制。公元五世纪，北凉为柔然灭亡，柔然汗在高昌地区建立了阚氏地方政权，继后又有张氏、马氏、麹氏相继建立政权，其中以麹氏割据时间最长。公元640年唐朝统一西域，在高昌设西州。这一段历史完全为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所证实，同时又为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简报对出土的西凉文书、北凉文书，北凉与夏的关系，柔然和阚伯周、马儒和麹嘉的年号等问题，作了专题研究。还有属于十六国时代的哈喇和卓古墓壁画，其画风与我国内地魏晋古墓中壁画画风完全一致，这是一批研究北凉以来高昌社会生活习俗的形象材料。由于古代高昌，是著名“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因此在吐鲁番地区的历次考古发掘，都发现了大量丝织品以及毛、棉织品。简报对这次出土的比较突出的几件织物专门作了介绍。

722　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　　　赵俪生　温玉成

（《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

1981年春，在洛阳龙门煤矿以东、伊阙香山的北麓，发现唐初西域归化人安菩萨与其妻何氏的合葬墓。墓中有随葬文物一百多件，已全部破碎。还有一方石刻墓志，高42公分、阔43公分，碑文444个字。本文引用墓志全文，对之进行了分析考证。认为墓志所记，均与史书相符，并可补充史书之不足。安、何两姓，均属西域“昭武九姓”。来自西域安国和何国，归化已久。汉代、北齐、北周、隋、唐等朝史书，均有安姓人名，

大抵著籍为武威（凉州）人或长安人，个别有著籍辽东者。何氏在北周、隋、唐史书均有记载的人名，都是归化之何国人。这个墓志，又提供了安菩萨与何氏二人。碑文中所记，还涉及到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十二月，唐将苏定方征讨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大破贺鲁于金牙山之事。时安菩萨年方五十七岁，曾参加了征讨。志文中说何氏被封为金山郡太夫人。此金山系金牙山之省称，即弓月山，位于伊犁河谷中之库尔札一带。安菩萨的儿子安金藏已完全归化，史称其为“京兆长安人”，在武则天时为太常工人。因武则天令来俊臣迫害其子唐睿宗，安金藏剖腹明志，使武则天停止了对睿宗的迫害。神龙年间，旌表其门。新、旧《唐书》之“忠义传”均记载其事。但未提其父为安菩萨、其母何氏之事。故此墓志之发现，可补证安金藏为西域归化之人。

723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　　　　黄文弼

（《文物》1964年第2期）

本文叙述了对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残碑的复原过程，并据《武威县志》所载碑文与其他史籍所载碑文互为校勘，恢复了原来之旧，是研究高昌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作者于1943年赴新疆考察，路过武威，在县文化馆曾见此碑下半段，残高1.8米、宽1.62米，卅六行，行残存四十字（原碑每行九十字），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文。1964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建立高昌陈列室，作者将此碑拓本奉赠，并复原碑文一并陈列。历来金石志著录此碑者不多、惟虞集《道园学古录》（简称《道园集》）载此碑全文。以后如《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邵远平《续弘简录·也立安敦传》，皆据《道园集》碑文写史传，《元文类》录全文，大致与《道园集》同。《甘肃新通志》仅载铭文，《陇右金石录》虽全录碑文，但亦根据《道园集》任意删增。惟乾隆刊本《武威县志》所载“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文，与现存石碑下半段文字大致相同，而与《道园集》所载碑文微有出入，增加了太平奴嗣位以后事迹。校对行款亦复一致。因此作者根据《武威县志》所载碑文，补写上半段，恢复石碑原来之旧。再参考《道园集》及《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互校，作了校记，并稍加解释。

此碑文叙述回鹘人起源和流派，较他史为详。盖得之回鹘谱系，原始朴素，为历来史家所诊视援引．例如《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续弘简录·也立安敦传》皆取材于此，确为研究回鹘史之第一手资料。但回鹘人起初没有文字及历史记载流传下来，对于祖先故事，盖得之于口耳相传。因此在传说中每保存若干神话的传说。尤其以回鹘起源与西迁二事，传说特别多。但在传说中同时保存有若干史实。作者列举碑文中有关回鹘起源与西迁二事的神话传说，与多桑《蒙古史》、《中西交通史料》、《史集》、《新唐书·回鹘传》所述对照，多有吻合之处。作者认为，每一民族对于他的起源和流迁，多有若干神话传说，不独回鹘为然。其他有关此碑若干史事解释及其文字差异，均附有详细校记。如碑名，《道园学古录》作“高昌王世勋之碑”，而《武威县志》载作“亦都护高昌王世勋之碑”，当以《武威县志》所载为是。其他如对虞集撰写碑文、赵世延篆额之补正，“传四十余君凡五百二十载，是为阿力秘毕立哥亦都护可汗，亦都护者其国主号也”的补漏正讹。再如“乃迁诸交州东别失八里居焉，统交州，交州今高昌

国也”的这段石碑记载，与《武威县志》同，而《道园集》、《元史》的记载，却与石碑不同，足证《武威县志》碑文是抄自石碑的核正。等等。本文文后附有高昌王世勋碑文复原图，可供参考。

724 杂胡官印考 黄盛璋

（《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本文汇集、考释了杂胡官印三十方。计有屠各官印、卢水官印、单称胡的官印和支胡官印四大类。“胡”原为中原汉族对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通称，最早见于战国。其来源可能是他们的自称。至秦汉时以匈奴最强大，与中原王朝接触最多，有些胡部又多加入匈奴的部落联盟，因而便以胡称匈奴，包括它所属各部，以后为区别匈奴主部与属部，就在“胡”字前面加上部落名；非直接隶属者，则在“胡”字前加“东”、“西”字样。在匈奴东者称东胡，史称为杂种胡、杂胡；在匈奴西者称西胡。匈奴无文字，今所见的匈奴官印皆为汉字，大多冠有各朝名称，证明皆为中原王朝所赐。杂胡官印也是这样。这些官印是研究北方民族历史及其和中原王朝关系的一项重要实物资料。因其中有些与丝绸之路有关，故亦可供研究丝绸之路参考。如屠各官印中的屠各，即为休屠各的简称。休屠各原为匈奴大部，其牧地在河西武威及酒泉一带，西汉武威、酒泉两郡原就是以休屠王故地设置的。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率众四万余人降汉，汉朝将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郡的长城以外，所以这些地方都有屠各的踪迹。其后不断内迁，范围日广。至魏晋以后即达太行山、凉州、秦陇、渭北等地区。1973年在陕西麟游县周家堡晋墓出土铜印二方，一为“晋率善屠各佰长”印，一为“晋率善胡佰长”印，即属于渭北区，证明西晋时此处已有屠各首领。他们大抵都是从凉州迁来的。又如卢水官印之卢水，即卢水胡，原为匈奴一部，居于张掖临松卢水。沮渠蒙逊即在此发家建立北凉政权。有的学者认为卢水即湟水支流卢溪水，并以为卢水胡之居地，恐为依水名比附。卢水胡后虽至湟水流域，但非原来根据地。卢水胡的根据地当在张掖、武威。再如支胡官印中的支胡，是月支胡，也是杂胡中唯一不属于匈奴别部的部族。按大月支早在汉初即已西迁，其留居祁连山下故地者称小月支，又称月支胡。以后又入居湟中，称湟中月支胡。渭北的月支胡即可能由湟中迁来。“晋支胡率善仟长”印，证明支胡为渭北较大部落。作者根据史书文献记载，对各类杂胡官印考释较详，引用资料亦较丰富，有的内容可补史籍之缺，可作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文后并附有各类杂胡官印之印模。

725 唐代胡俑，骆驼与“丝绸之路” 孙迟

（《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胡人”一词，唐代泛指国内各兄弟民族，也包括毗邻的各国人民。凡是这些地方传来的事物，往往以“胡”为名，以区别于汉族传统。带“胡”字的事物，几乎和人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关系，因而也就影响着内地人民文化艺术生活和物质生活。当时各族人民文化的交流融合 促进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展。正因为胡族文化

与内地人民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唐墓出土的陶俑中就大量出现了胡俑。据考古资料，胡俑从高宗显庆以后逐渐增多。昭陵博物馆发掘的显庆二年的张士贵墓中，有四个站俑，四个牵马俑，六个骑马俑，它们的形象和服饰都属胡俑。四个站俑，脸型很象新疆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是唐时西域回纥的一个部族。他们的先祖居祁连山之北昭武城，约在今张掖附近，后迁居亚美尼亚地区。九姓国族人善经商，他们和回纥人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转运、传播作用。张士贵墓出土的骑马胡俑，身着翻领袍，有的戴折沿帽，有的满脸髭须，扭头列项，双手如舞，可能是泼寒胡戏的形象。1957年西安南何村鲜于庭诲墓出土骑骆驼舞蹈俑，背上五人，四人屈腿坐持以奏乐，一人中立演唱，其面形服饰都是胡人。这形象地说明西域的音乐舞蹈，通过"丝绸之路"的驼队，向内地传播。1971年在昭陵陪葬的郑仁泰墓中，发现大批极为罕见的彩绘釉陶俑。其中有两件载运丝绸的骆驼，驼囊上架一驮丝，还挂有盛水胡芦和沿途猎获的野鸡、兔子等，表现了"丝绸之路"驼队长途跋涉的情景。唐越王李贞墓出土一批三彩俑中，仅有一件女骑马俑，着胡服胡帽，但面容不像胡人，应是一个着胡服的贵族妇女。诗人元稹在《法曲诗》中写道："女为胡妇学胡舞，伎进胡音务胡乐"。可见，当时仿行胡俗是一个时髦的风尚。昭陵博物馆还单独陈列着一件三彩骑马胡俑，其面型很像现在的伊朗人。伊朗在唐称波斯，是和中国发生关系较早的国家之一。今伊朗的伊斯法罕城，就是当年"丝绸之路"的一个很重要转运站，唐墓中出土的胡俑，往往和骆驼一起被发现。说明波斯商人和西域商人的驼队，通过"丝绸之路"络绎不绝来往于长安。因而，胡俑，骆驼，就和"丝绸之路"紧密地关连在一起。

十一、敦 煌 文 化

726　汉魏时代之敦煌（摘译）　　　　〔日〕榎一雄著　陈俊谋译

（《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第3期）

本文论述了汉魏时代敦煌郡的独立与发展；河西之富强与敦煌的关系、敦煌之文化等问题。根据日比野丈夫的最新研究认为，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置河西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左右，置酒泉郡。元封年间（公元前110—105年）将河西郡改名为张掖郡。于太始、征和之交（公元前93、92年）置敦煌郡。敦煌郡的领域为酒泉郡的一部分，于是年独立，升格为郡。其原因估计是因为正值李广利征伐大宛（太初元—四年，公元前104—101年）之时，敦煌为其兵站基地。但作者认为，敦煌之所以被选为征伐大宛之基地，是因为它距西域最近。据《史记》记载，征伐大宛是为获得在大宛都城贰师城中饲养的名马。讨伐大宛之后，汉朝便在敦煌设置了酒泉都尉，在直到盐水（罗布泊）的各地设置了亭障，并在仑头置屯田兵数百人及使者。酒泉都尉的设置意味着敦煌的军备及军事力量的加强，设置亭障与增置仑头之屯田及使者意味着确保塔里木盆地的交通。据日比野丈夫所说，于是敦煌便在太始、征和之交从酒泉郡中独立出来。从前汉之经营西域，到王莽之治世，直至后汉末期，历三国而迄魏晋，位于西域出入口的敦煌始终繁荣未衰，并促进了对西域经营的进一步发展。河西地区所以富饶，其原因是以产马和以谷物为首的农业生产的丰富所致。另外，西域商人的贸易可能是一个因素。自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塔里木盆地纳入汉朝的统治，朝贡使节和商人们便纷纷从西域各地来到中国。这些西域商人的目的在于到长安或洛阳与中国政府进行贸易。他们在河西地方虽然也进行贸易，但是次要的。敦煌作为从西域进入中国的门户，长期以来居留有大量的西域商人，他们无疑会给敦煌的文化以不小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佛教、袄教等宗教的传入。汉魏时代敦煌发展了什么样的文化，史籍资料十分贫乏。但敦煌居民除汉族外，还有以匈奴、月氏、羌为首的西域系的几个民族。这些非汉民族除要求学会中国文化外，他们也有其自身的传统文化。佛教一旦在敦煌传播开来，在信仰佛教方面也开始出现优秀人物。作者列举《水经注》及《晋书》等有关敦煌的文献，列举了敦煌文化人物，如敦煌索氏等。这些人物的文化修养看来虽系统各异，但却都是西晋时代崭露头角的人物。这意味着，在这一时代具备着如索氏诸门出世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具备了充分接受中国知识界人物教养的环境；此外还意味着具备了能充分利用这一环境的财力。索氏活跃的时代正处于五胡十六国时代前不久，而五胡十六国时代则是河西及敦煌空前繁荣的时代，也是敦煌的佛教空前发展的时代。据《高僧传》卷一竺摩罗刹（竺法护）传，此人乃月氏人的后裔，本姓支民，世代居住敦煌郡，他于晋武帝时（公元265—290年），赴西域学习外语三十六种，带回许多梵经。在五胡十六国时代以前的敦煌佛教界中已能够从土著居民当中产生如此的佛教人士，这说明其环境已臻于成熟。

727 敦煌石室　　卫聚贤

（《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

本文作者于1941年9至12月，在敦煌、安西等地，作了为时三个月的考察，在返回途中，路经兰州、西安、城固、成都及重庆等地时，对各大学和有关部门作了关于敦煌石室的报告。本文系将讲演稿整理成篇，发表于《说文月刊》西北文化专号之上。本文在阐明敦煌石室之前，对敦煌的历史沿革作了考证。由于敦煌在汉唐之际，为中西陆路交通咽喉，凡出关入关之商旅、僧徒及使节等，均须经由敦煌。敦煌石窟之开凿，据记载当在秦符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因出入关者繁多，出关者多向莫高窟佛象祈祷，托神佛保佑，并作许愿，追平安归后，根据所许之愿，或献以写经，或建以佛龛，或建造大洞。到了唐代窟室已达千余龛，以是名为千佛洞。所以在本文第二部分，对石窟的开凿及发达的原因，均作了介绍。第三部分重点介绍敦煌石室写经之发现及被盗之经过，以及国内散佚及保存情况。本部分，对敦煌石室写经之被盗，经卷之佚存，介绍比较详尽系统，对了解敦煌石室经卷所遭厄运情况有所帮助。最后，作者对敦煌石室的价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敦煌佛像、壁画，在吸收融合了印度、希腊、波斯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即所谓敦煌文化。敦煌文化不独是中国文化，而且是世界文化。盖因敦煌为中西交通要道，扼西域之咽喉，为东西商业集散地，中西文化交流的汇总处，它闪烁着中西文化的灿烂光辉。因此，人们誉丝绸之路为中外人民友谊和智慧之光的项链，而敦煌则是项链上的一颗明珠。由此则可想见敦煌文化在世界文化上之价值。故研究丝绸之路，则对敦煌史地，敦煌文化不能不作深入研究，本文收录的目的就在于此。

728 敦煌莫高窟在东方文化上的地位　　王子云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8年第35期）

西北地区因其气候干燥，交通闭塞，保存了不少古代文物，尤其敦煌文物之盛，保存之富，为东方之冠。敦煌艺术，不仅在我国佛教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即一般文化方面，亦有特殊价值。作者在本文第一部分中，认为莫高窟现有壁画、雕塑，上溯晋魏隋唐，纵非出自名家之手，但保存的完整和年代之久远，在东方文物宝藏中，实无能有与之并称者。故敦煌石窟，实为一部完整而珍贵的东方艺术史料。尤其在佛教艺术方面，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取希腊、波斯、印度之精华，再加上中国固有的民族艺术，遂形成绮丽不朽之杰作。敦煌壁画虽属佛教范围，但其内容包括甚广，举凡中国古建筑、音乐、服饰、习俗，以及西域风尚，都可据以考证，实为研究东方文化史之绝好资料。至于敦煌石室写经，更为东方文献上之一大宝藏。在写本方面有佛、道、儒三家经籍，及文史音韵古本，范围至为广博。其文字则有汉文、梵文、藏文、回鹘文，以及西域各国之古文字，其关系到语言文字学者，极为丰富。对如此丰富的文化宝库的形成，在本文的第一部分都作了扼要介绍。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敦煌石窟之形成，敦煌石室写经之发现与强盗，以及国际上“敦煌学”之确立。第三部分着重介绍了莫高窟壁画的

作风，形式和技巧。作者认为，元魏之世，继两晋纷扰之后，人心厌乱思静，朝野笃信佛教，形成风气，佛教艺术得有空前的发展。当时在佛教造像与绘画方面，多受外来之影响，致保存了“犍陀罗”作风。唐代，国势盛甚，民族思想发达，对外来文化，吸收融合，不遗余力，当时久已流传的佛教艺术，已蜕变为东方固有的形式，成为中国民族本质的产物，此时绘画、雕塑作风，与北魏迥然不同。故在唐代，除绘画技术外，其他文化均呈繁荣，思想也极自由，从而使唐代文化达到了光辉灿烂的境地。另外，敦煌石室藏经，不论对古文献学、历史学、宗教学以及音韵学等等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并由此考知当时地处边陲的民族，尊崇汉文化及所受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既可补足前代历史记载之缺，又可订正前代历史之误。所以敦煌宝藏，无疑是一部完整的东方文化宝库，占世界文化史之特殊地位。故治丝绸之路者，自应加以注意。

729 敦煌艺术概论 向 达

（《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4期）

向达号觉明，土家族，湖南溆浦人。先生尽瘁学术研究，著作丰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中西交通史的学术权威，是我国西域学和敦煌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本文是关于敦煌艺术的简要论述。

敦煌艺术导源于印度的石窟寺（Cave temples），是以佛教的传说为中心题材的一种艺术。近几十年来，虽有敦煌学（Tunhuanology）的创立，而在艺术方面的研究著作并不很多。本篇题为概论，分三部分论述了敦煌之历史和地理；敦煌艺术内容之大概；敦煌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之地位和影响。古代敦煌本不属于中国，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取匈奴所有河西地置武威、酒泉二郡，时敦煌属酒泉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武威、酒泉置张掖、敦煌二郡，敦煌始为河西四郡之一。唐分敦煌为瓜、沙二州，元为沙州路，明初改置沙州卫，嘉靖中叶嘉峪关外不齐。清雍正初始复归中国版图，称敦煌县，而唐瓜州境则改为安西县。敦煌自古以来人口稀疏，然在历史上及地理上却占有重要位置。汉武帝时于敦煌建玉门关和阳关。《汉书·西域传》说西域诸国“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因为敦煌所邻接的西域是受印度文化最深的地方，所以古代敦煌的文化也表现了不少印度文化的痕迹，这一文化中最显著的是佛教，而佛教中又以大乘佛教为最盛。所谓犍陀罗派的佛教艺术，其所表现者大都属于大乘佛教中的传说。本文所讨论的敦煌艺术，包含三个单位，即西千佛洞，有壁画者尚存十六洞，鸣沙山东头的千佛洞，有壁画者尚存四百六十九洞；安西城南的万佛峡，存四十洞，有壁画者二十洞。西千佛洞与万佛峡创建年代无可考。千佛洞的创建则在公元四世纪时便已开始，到唐代称为极盛，达千余室，宋元以后逐渐衰微，前后共计近一千年。在艺术内容方面，着重考叙了石窟的构造，壁画的内容，艺术特征等。敦煌艺术自元魏以至蒙古，历时千年，包含魏、隋、唐、五代、宋、元，凡六个大的时期。内容除大乘佛教的传说以外，山水台阁、人物车马、花鸟图案、塑像之类，无一不备，真是天造地设唯一无二的艺术博物院。它不仅为研究中国艺术史添加了一大批材料，供人们研究、欣赏、观摩，而且给我们以一种可靠的尺度，用来衡量传世的所谓六朝、隋、唐作品。其在中

国艺术史上的地位与云岗、龙门鼎足而三，比之印度的阿旃陀石窟，毫无逊色。敦煌艺术的本身固然永垂不朽，而其影响也光景常新。自敦煌石窟开凿以后，影响东被，凉州石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泾县石窟寺，可说是敦煌的嫡系子孙。云岗、龙门是从凉州分出来的别支；广元大足的千佛岩，又是传自天水的苗裔。脉络分明，历历可考。敦煌艺术影响之大，由此可想而知了。

730　谈敦煌艺术　　吴作人

（《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4期）

敦煌莫高窟的艺术，不是一家或一代的作品，也不是历朝善男信女的功德，而是无数劳动人民的匠心经营。自从前秦苻坚建元二年起（公元366年），就开始凿窟绘壁，历南北朝一直到元代，前后将近一千年。明初，因吐鲁番人东侵而退守嘉峪关，从此窟寺就屡遭毁弃，庙貌已被摧毁无遗，塑像也遭破坏。现存有壁画的洞窟四百余，就是世界上仅存的最伟大的中国古画陈列馆了。中国宋以前的画已难得见，更早期的更为茫然。而敦煌艺术，不仅从南北朝到元代上下一千年各时代的艺术有系统地保留陈列着，并且通过敦煌前期的绘画更启发了我们对汉魏两晋绘画的推论。在这个基础上吸取了外来文化的优点，加以适合我们民族性的蕴育，而演变成为唐代艺术无比的高潮。作者把敦煌艺术（绘画部分）概分为前后两期。一、隋以前期（汉风为主的阶段）；二、唐以后期（承前启后吸收外来的优点而掀起的唐代高潮，一直到衰落）。尽管说印度的佛教间接带来了“希腊佛教艺术”的影响，但是很显明的在这四百多布满了绘画的洞窟里，可以看到冲激澎湃，扩放腾动，风逐电驰，凡隋以前的壁画都充分地表现了这种中国古代民族雄猛的生命力。显然，这种风格是在敦煌早期壁画之前的汉晋画风的流传。作者引证鸭绿江北岸的辑安县通沟古塚的壁画，就其年代与作风，说明当两晋南北朝年代。像敦煌前期的壁画，和通沟古塚内的壁画这种奔放生动的作风，就是中国当时的绘画风格。这种利用线条表现飞舞运动，在造形上简炼而强力有势的风格，同样在汉墓石刻画像中也可看到。这种古拙犷放的表现形态并不限于敦煌，而在高昌、库车，都还可以找出汉绘画传统与装饰纹样的流传。在这向西发展的一路上，蕴演成为唐代艺术无比的高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盛世的艺术形式，渐渐把犷放改为整饬，走上了雍容华贵的境界。五代宋元因袭唐代的光辉，没有什么新创。辉煌无比的敦煌艺术，我们不能单纯当作宗教画来看，而是劳动人民一千多年来的艺术制作，这充分说明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深厚的文化基础与雄强的创造力。

731　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　　常书鸿

（《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4期）

汉武帝时，敦煌就是一个总绾东西“华戎所支”的都会。为了探讨敦煌艺术的来源，1943年由夏鼐、向达、阎文儒诸先生主持的考古发掘队，曾在佛爷庙附近墓穴中发现保持汉画风格的六朝前期的彩画墓砖数百块，已获得若干在佛教艺术前期敦煌艺术作风的启示。当然敦煌艺术应该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三个地区的一个系统来

看。今天研究敦煌艺术的人，不免都要说到它与希腊、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关系，但却忽视了它与祖国民族艺术一脉相传的事实。实际上中国艺术的成长与发展，早在三代、周、秦时期。到了汉代，在造型的具体表征上进一步达到生动活跃的境界。可以说中国壁画艺术在距今二千余年前已达到成熟的叙事史画的高度艺术标准。就在这时，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中华民族是具有无比丰富的融合汲取与感化异族文化的力量的。例如莫高窟表现最多的阿弥陀佛经，当其在北魏初期传入中国之后，就索性改为无量寿佛了。羽田亨在他的《西域文明史概论》上说："西域的佛教事实上已不是纯粹的印度佛教，而是经过了一些变化的佛教"。作者认为，假如到今天还存在着南北两疆在西域通道上的佛教艺术，那简单的就是受了汉唐文化影响的传统缘故。敦煌，不特是现今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而且是汉唐民族保留传统的都城；敦煌，不但保持了民族传统的特点，而且因为地处古代中西交通的要道，也自然形成了中西文化荟粹的都市。敦煌是远处边陲的民族文化的前卫，也是首先给复杂的外来文化以冲刷洗练的第一站。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出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之后的演变情形。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之后，中国艺术无论在思想内容、技术各方面都曾受着相当的影响，但这个影响是仅止于各别的"流"的方面，而不是本源问题。莫高窟的修建年代，应该介于353年与366年之间，包括第四世纪的北魏一直到十四世纪的元朝一千年间。现存有画壁及造像的石窟共469个。这许多不同时代创建的洞窟，在洞窟结构及壁画造像形式方面，都具备着各不相同的特点。敦煌壁画虽以佛教内容为核心，但因佛教宣传对象是人世间的，所以重要表现内容是以人物为主。从北魏初期的故事画一直到唐、宋间大规模的近千余人的构图场面，每一幅都是经营布置得非常紧凑而生动。构图的艺术在敦煌壁画中，从六朝经过隋唐，一直到中晚唐的时候，因为供养人像地位的改变，与重要性的增加，使壁画内容也都起了变化。唐代大规模经变的发挥，一直到五代宋初的几百年中，经变画慢慢从初期的简单形式，发展成为大的完整的形式。作者为了使读者对敦煌艺术内容有了比较具体的概念，列举了壁画方面的经变构图、故事画、曼荼罗、佛像；图案方面的藻井、佛光、座饰、边饰图案；塑像方面的魏塑、隋塑、唐塑、五代塑，宋塑、西夏塑、元塑、清塑的名称和数量。这些内容，是以宗教为中心的造型表现主题，它把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前后一千年中华民族的艺术传统，在敦煌长达二十五公里的巨大的壁画上连贯不绝地纪录着。它补足了过去美术史的残缺，它充实了民族文化史的内容，使祖国伟大而丰富的艺术传统发出了无限的光芒。

732　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　　　贺昌群

（《东方杂志》1931年第28卷第17期）

本文作者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早在三十年代，就翻译出版过《西域佛教之研究》一书及其他学术专著。解放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于1956年出版了《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一书。本文系作者三十年代初的研究专著，直至今天仍为研究敦煌艺术可资参考的材料。本文共分九个部分，从敦煌的历史沿革；敦煌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敦煌千佛洞的开凿形成；千佛洞雕塑绘画的源流；六朝和唐代风格不同的原

因，以及唐代佛教文化的盛况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考证。作者认为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交通遂有南北两路，公元一世纪左右，大月氏迦腻色迦王尽力宏布佛教，西域南北两路的国度，完全沉浸于佛教崇拜气氛中。北道以龟兹为最盛，南道以于阗为中心。敦煌扼南北两道枢纽，当时敦煌在宗教上为西域佛教传入中国本土的桥梁，而且在政治上、商业上皆为重镇。自魏晋，历南北朝而至隋唐，西域诸国的佛教徒接踵东来，中国僧侣亦多赴西域求经或巡礼圣迹。六朝三百多年间佛教征服了全中国，这时，不仅佛教教理转变了中国原有思想和人生观，且佛教艺术传入，使中国原有质陋素朴的艺术，起了变化。其流波所及，影响了中国文学、音乐、音韵等学的发展。特别是西域佛僧东来，实为六朝佛教艺术产生的前因。开石窟，建寺院，均始于此时。这期间，佛教艺术中最重要的题材，即佛传和本生说的经典，已翻译了不少。本生说在佛教艺术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印度的佛教艺术，自初期至最后，一切题材，都取之于本生经，不仅雕刻艺术，举凡绘画、文艺、戏曲等，莫不如此。六朝佛教传入的初期，佛教要得到民间的信仰，不能不把教理通俗化，而最好的方法，只有绘画、造像等，才能感动人们，到了成熟时期，自然便趋于文学的宣传方式。所以到唐代，佛教的民间文学特别盛行，原因就在于此。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只是缓慢的进行，佛教艺术，也只有几种方式，到了唐代，有如朝花怒放，极其绚丽夺彩，呈现出中国佛教文化空前绝后的盛况。敦煌艺术的发展，系统地证明了此点。作者为了进一步说明敦煌佛教艺术的时代特点。还对伯希和所编著的《敦煌图录》六册的内容，简略地作了介绍，这对了解敦煌佛教艺术的发展过程很有帮助。但本文在发表时，因篇幅所限，将文中提到的附图，在附印时均予删去。

733　敦煌佛教艺术和古代于阗　　孙修身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古代于阗和沙州（敦煌）是近邻，同为“丝绸之路”重镇。因此，于阗的许多历史故事、佛教传说，都成为敦煌石窟佛教艺术的表现内容。这些美术品，不仅是两地友好往来的见证，也是研究两地历史文化和中西交通史的可贵形象资料。敦煌莫高窟的于阗故事画，其出现时间起于沙州陷蕃之后的中唐时期，止于西域回鹘政权占据沙州前后，即自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至北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前，历时近两个世纪。其内容多为佛教史迹故事（包括佛教故事和瑞象图）；佛教经变画；供养人画像和题名结衔等。这些都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于阗和沙州地方史、佛教东渐史的重要资料。于阗故事画的种类繁多，作者列举了于阗居民战天斗地、求取生存的故事画《毗沙门天王决海》；于阗建国的传说故事画；佛教传入于阗及其东渐等故事画的画面和形式，阐述了敦煌佛教艺术和古代于阗的概貌。供养人和供养人题名结衔的壁画，以莫高窟第九八窟为代表，该窟是归义军节度使曹义金，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前后建成的一座“功德窟”。此窟不仅高大，而且内容十分丰富，保存供养人题名之多，居于众窟之首，共计有一百六十余条。其他为六十一窟、四四四窟、二四四窟，其供养人和题名结衔，有的是于阗国王和王后，有的为于阗公主、有的为于阗国皇太子。其中许多于阗国供养人的衣着服饰，与内地相同，足见其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和中原王朝的关系

之密。有些绘画的内容已佐证了有关史籍的文字记载。若以文献记载，结合有关画像进行研究，就可补文献记载之简略，或矛盾错讹之处。总之，莫高窟供养人画像和其题名结衔，为研究于阗的历史、于阗和沙州、中原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734 形象的历史

——谈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　　　段文杰

（《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2月）

本文作者从事敦煌艺术研究数十年之久，造诣较深，对敦煌文物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现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并任院长之职。本文通过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对其历史价值进行了全面探讨。

敦煌壁画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是艺术价值、二是历史价值。壁画的历史价值，虽为学术界所公认，却很少具体而全面的进行研究和探讨，本文在这方面作了新的尝试。文章通过大量的举例，说明敦煌壁画尽管在创作上受到佛教思想的局限，但由于它与现实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涉及的范围很广，直接间接地反映了中世纪各个阶级的关系、工农业经济、各种战争、宗教思想、民族关系、中西交往、封建官僚制度，衣冠服饰演变、音乐舞蹈的发展、劳动人民的各种生活，以及风俗事物、建筑历史，科学技术和美术史等各方面的资料。透过这些具体的艺术形象，可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矛盾斗争。因此敦煌壁画不仅是艺术，也是历史，而且是一座珍贵的历史资料宝库。

敦煌壁画以形象化的语言，为我们记载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活动场面，许多为史籍所不载。这些壁画的内容，虽然没有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但却间接而客观地反映了某些现实生活的侧面。这个领域，蕴藏丰富，尚待深入细致地发蕴钩沉。作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文章以壁画与史籍记载对比的手法，论述了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文章指出在故事画和经变中，可以看到为数不多但却极为重要的中外使者和商旅的形象，直接地反映了丝绸之路的兴旺景象。"张骞出使西域图"，虽然把张骞出使西域与佛教拉在一起，使这幅画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它依然反映了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这一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敦煌石窟正是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因此在敦煌壁画中出现了张骞出使西域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敦煌成了中西交通的枢纽，商旅使者东来西去都必须经过敦煌，因而敦煌壁画出现了许多西域使者和商旅形象。北周时代的商旅图，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交往的频繁，映证了北周推行的"结姻于北狄"，"通好于西域"的政策。隋代的胡商遇盗图，又充分反映了中外商贾、使者，万里迢迢传播人民友谊的艰苦生活。唐代是丝绸之路最为畅通的时期，因此唐代壁画中反映中西交通的画面更多，这些中亚、西亚商旅使者往来的场面，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的形象。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在音乐舞蹈、美术、衣冠服饰上也是最丰富多彩的时期。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舞蹈画面成百上千，几乎无窟不有；服饰资料，更是浩若烟海。在这些方面，敦煌壁画为我们留下了真实客观的形象历史影照，非常现实的为我们描绘了古代中原文化与各兄弟民族和中亚、西亚等外国优秀文化

融汇变通的过程。作者在文章中对这一部分做了非常详尽的介绍。

敦煌壁画大量的是佛、菩萨等神的形象和它们活动的“佛国世界”。神不是别的，只是人的升华，“人的映象”，没有人也就没有创造神的材料。离开了现实世界，“佛国世界”也就不存在了。马克思说过：“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射”。当然这种反射并不是象现实历史那样具体真实，而是经过想象，幻想加工的。但它仍然反映了封建社会制度的最根本的东西：阶级划分、等级制度和封建生活仪节，这就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

735 莫高、榆林二窟杂考 向 达

（《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敦煌千佛洞古名莫高窟，安西万佛峡古名榆林窟。二者创建之年代既相去不远，壁画之系统亦复同流共贯。两窟壁画塑像蕴蓄繁富，自经变中之佛经故事以至于历代宫室服饰之制度，皆属考古者无上可信之资料。本文杂记数事，可供治敦煌学者参考。一、论莫高窟创建时代者，多据武周《李君修佛龛记》，谓始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因《修佛龛记》纪称：前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僔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又于窟侧更即营建。莫高窟P17号窟窟外北壁上有唐末人书《莫高窟记》，所记创建情形，与《李君修佛龛记》同。《修佛龛记》所记东阳王事，贺君昌群在其《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一文中曾举出《魏书》卷十《敬宗孝庄帝纪》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八月“丁卯，封瓜州刺史元太荣为东阳王”一事，证明《修佛龛记》中之刺史东阳王乃元太荣其说是也。太荣刺瓜州时，曾广写佛经以为功德。贺君文曾引日本中村不折上藏太荣所写律藏分第十四卷经尾题记予以佐证。按太荣所写经，北京图书馆亦有藏本。作者又引《周书》申徽、令孤整诸传，记述了太荣的诸多事迹。就以上诸传观之，自永安二年至大统十年太荣守瓜州前后凡十六年。太荣大约卒于大统十年，子康嗣位壻彦篡乱，当在大统十年至十一年间，申徽室乱即在大统十一年。太荣为瓜州刺史，疑在永安二年以前，二年始封东阳王。二、榆林窟俗名万佛峡，在今安西南一百四十里。斯坦因书中所云之小千佛洞即在此。小千佛洞位于踏实河转向处之两岸峭壁上，南岸存十窟，北岸存一窟。南窟大率为五代及宋时所开或重修。自西向东第五窟有中心座，以莫高窟形式证之，皆元魏遗制。疑榆林窟创建时代与莫高窟应相去不远。小千佛洞水北只存一窟，窟内壁画，线条刚健婀娜，赋色沈丽，盖晚唐高手所作，非宋人所能企及。榆林窟即在水硖口南三十里，石窟位于河之两岸，为数四十。有壁画者张大千氏凡编二十九号。东岸十七号窟窟门外南壁天王像下方有唐光化三年题名。东岸十三号窟窟门外南龛西壁又有宋雍熙时之题名。十七号窟为中唐高手所作，保存极佳，为全榆林窟冠。十三号经宋人重修。原来当亦是唐末或五季时所开。十号窟窟门外甬道北壁上有西夏人所书榆林窟记一长篇。系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所记。文后的年月为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十二月十七日题记。国庆为天赐礼盛国庆省书，乃西夏秉常年号，癸丑为国庆三年，当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五年为乙丑非癸丑）。至于榆林窟开创时代，虽乏石刻或文字记载，然如十九、二十号诸窟形制与莫高窟诸魏窟洞相比较，疑亦始创于六朝。各窟题名，其有年代

可考者，自光化三年以至国庆三年，俱在九世纪至十一世纪之间。斯坦因谓榆林窟创于九至十世纪，题名率为元代云云，其说不足据。又榆林窟一至三号以及二十号四窟壁画，出于元人之手，所用线条皆是世所称兰叶描。清新飘逸，远胜于莫高、榆林诸宋人画之沈滞板拙。三、敦煌之西千佛洞莫高窟，安西之小千佛洞榆林窟，在历史上彼此有关，艺术上亦为同一系统之作品，故总名之曰敦煌佛教艺术。作者认为敦煌佛教艺术渊源西域彰彰明甚，就技术以及画理方面列举例证，以为解纷理惑之助。在论画壁制度一例中，作者指出，今莫高、榆林诸窟画壁，俱先以厚约半寸之泥涂窟内壁上使平，泥上更涂一层薄如卵壳之石灰，亦有极薄如纸者。彩色施于乾燥之石灰面上，其画法亦应属于Tempera而非Fresco。印度画壁制度与新疆库车、吐鲁番以及敦煌所见者相同。阿旃陀石窟约创于公元一世纪左右，早于敦煌者凡三世纪。此种画壁技术自印度经新疆而传至敦煌，唐代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制度，则又承袭敦煌而加以恢弘扩大。在论粉本比例以及其他一例中，作者指出壁画以及普通绘画，俱有粉本，并详述了印度画家绘制壁画及普通绘画的初步手续。而中国自六朝以迄隋唐的画家亦用粉本，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搨写法，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记翊善坊、保寿寺之先天菩萨之画法，皆用搨本或画样，凡此皆可见古代敦煌制作壁画或普通绘画，其初步手续几与印度全同。作者又在论天竺传来之凹凸画法中，论述了凹凸法技术自印度传至新疆，由新疆以至于敦煌东西文化交流之史实。在论绘画中之空间观念中，作者指出，印度阿旃陀诸石窟壁画与我国六朝、隋、唐之作，若合符契。可见敦煌佛教艺术之渊源西域，毋庸置疑。最后，作者根据龟兹诸石窟壁画中有所谓画家窟者，有西域画家之自画像及题名之旁证，阐述了制作莫高、榆林壁画之艺人中亦有西域画家从事其间，汇合中西以成此不朽之作的观点。

736　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　　　史苇湘

（《文物》1983年第6期）

莫高窟的佛教史迹画的内容涉及宽广的地域，它们描绘了天竺、大夏、尼波罗、锡兰、月支、于阗、坎城、龟兹等地的圣迹、瑞像；随着内地佛教西传，也描绘了吴郡、沪渎、幽州、交州、濮州、五台山、大兴城，直到河西四郡的凉州、张掖、酒泉等地的佛教史迹与瑞像。本文记述了从六世纪到十一世纪河西盛传高僧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的事迹。巴黎藏敦煌石窟遗书P.3570，2680，3727三件《刘萨诃和尚因缘记》，已由法国国立远东学术院院士陈祚龙先生的《刘萨诃研究》及海伦韦尔克的《刘萨诃在莫高窟》，提供了研究线索。这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圣者”出生于并州西河离石，出家后足迹历东南丹阳，会稽，吴郡，建业等地。他还游历过五天竺。太武帝太延元年又西行凉州，至酒泉，死于酒泉城西七里石涧中。P.3570等《因缘记》上说：“莫高窟亦和尚受记因成千龛者也”。可见他与莫高窟的兴建也有一定的关系。从有关资料看，他是继沙门乐僔，法良之后在莫高窟最有影响的一位僧人。莫高窟从七世纪晚期起就开始绘塑与他有关的造像题材，最著名的当首推“凉州瑞像”。第98窟（五代），第61窟（五代）壁画中的背屏画面内容，即《刘萨诃因缘记》与梁，唐《高僧

传》上所谓“（萨诃）性好游猎，多曾杀鹿”，第72窟《刘萨诃与凉州山开出像因缘变》壁画为“凉州瑞像”的产生作了形象的说明。斯坦因的《千佛图录》第34图，是一幅极为珍贵的刺绣画。这幅刺绣也是敦煌石窟彩塑、壁画之外较早的一幅凉州瑞像。从男施主和女供养人的衣着服饰来看，应属武周时代作品，最晚也应在开元之际。《千佛图录》第13图是残存的半幅《刘萨诃与凉州瑞像变》。本文作者在这里纠正了斯坦因和日本讲谈社《西域美术》把这幅残卷画解释为《鹫山说法》和命名为《灵鹫山释迦说法图》之不当。莫高窟第203窟西壁山峦影壁龛内的初唐塑倚山立佛像一躯，就是“凉州瑞像”。此外，第300窟（龛）的倚山立佛也是类似的凉州瑞像。第323窟西龛原来的山水影壁与南、北、东三壁的壁画，应是一个一气呵成的整体，南壁的部分题材，又与刘萨诃有关。从莫高窟塑像、壁画与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敦煌绢画、刺绣艺术品中可以看出，刘萨诃与凉州瑞像在敦煌、河西、陇右群众中很有影响，至少从隋代起就受到关陇、河西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信仰者的崇拜。道宣法师在唐初亲往游历调查后，在《慧达传》中，以及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记载中，对刘萨诃都有详细记载，乡人崇拜之，称为“胡师佛”。它反映出佛教在我国各民族杂居地区发展的特有形态。刘萨诃是稽胡人，生长在漠南沿边城市，疑为南匈奴族人的后裔。刘萨诃的故事给佛教史、美术史和民族文化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依照《高僧传》推算，他应生于东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太延元年（435年）在陇右、河西一带活动。若436年卒于酒泉，他活了92岁。据《因缘记》的有关记载，他应当是与法显在公元400年同去天竺游历的慧达。据《法显传》记载，慧达应在公元400年前后为旅行天竺道经敦煌，约在公元403年回国。若以公元366年为莫高窟创窟之始，慧达到敦煌时，莫高窟已经创建四十年了。今日尚存的第268，272，275一组洞窟，应是刘萨诃在河西、敦煌活动时凿成的。刘萨诃由一个胡人出家"成圣"，在大西北地区受到汉胡各族人民的崇敬，这件事在地域与民族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737 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　　阎文儒

（《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4期）

敦煌是中国古代西北边境上的门户，东西交通的枢纽。敦煌莫高窟的佛教遗迹，是全中国佛教凿窟最多的一处，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共有窟469个。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开始凿窟，到元时止，共有一千年的时间。开凿石窟，渊源于印度。印度石窟，可分两种：一是昆诃罗（Vihara），也叫精舍，也叫僧房。二是制底(Caitya)，也叫支提，原意是“塔庙”，或是“舍利殿”。这两种石窟的构造，都是佛教僧徒为纪念释迦，为学释迦苦行而凿成的。精舍多是一个大洞，正方形的，后面有一佛堂，左右都是小石室。制底窟的构造形式，和精舍不同，它的后面凿成半圆形，并有一小塔（Dagaba），塔的左右，都凿有八角形的石柱。塔式是覆钵形，前面为方形或长方形的礼堂。佛教凿窟造像的艺术传到敦煌，开始就选在莫高窟凿洞。开凿最早的洞窟，今天已无法知道。但从佛像的造型和内地石窟造像比较，最早的可能在北魏中期。现存469个洞窟，初期开凿的约有十分之一。在从北朝中期到晚期（太和元年到大象二年）的104年期间，无论凿窟的形式，或是塑像壁画的作风都是一样的。莫高窟初期造窟的形式，不外两

种：一是印度“制底”的形式，在悬崖上凿窟，多为正方形。窟中心稍后一点，凿成方柱，上连窟顶。方柱四面开龛，内塑佛像。方柱前面，造成人字形起脊式的石屋。中心方柱是印度“制底”中心舍利塔的变形，而起脊式人字形石屋，则接近中国木构建筑固有形式。二是印度昆诃罗形式的方形石窟。窟的后部设佛龛，内塑佛像，左右两壁，凿成一排或上下两排的小佛龛，内塑佛像。窟顶有的凿成起脊式人字形，有的凿成覆斗形的中心藻井。这两种石窟形式，从敦煌东传，经张掖、武威到麦积崖、泾县，再东传至大同云岗。云岗石窟，中期的多数和莫高窟初期的构造相同，而敦煌北朝的石窟，在形式上，几乎没有一个像云岗初期的凿窟，却都和中期相同。在佛像的作风上，也和中期相同。作者认为，敦煌北魏中后期的作品，它的粉本，可能是先从敦煌传到内地，经过一个阶段的改变，再把改变后的粉本传到敦煌。为此，作者重点就敦煌莫高窟的凿窟造像艺术和内地各石窟作了详细的比较研究，展示了互相影响的脉络。莫高窟的造像全为泥塑，这是因为莫高窟的地层，系玉门系砾岩，不能雕塑。现全国各地，除吴县角直镇保职寺有残唐泥塑外，其余地方，很难找到。而莫高窟竟然保存从北魏到隋、唐、宋、西夏、元、明、清、前后一千四、五百年的泥塑，这确为艺术史上的一个宝库。隋代自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统一全中国后，一切制度都有显著变化。表现在艺术上则是融合了南北各地的文化。在石窟的构造和塑像形式上，虽然用西方的粉本，但却进一步接近自己的生活方式。然隋代由于时间短暂，在艺术方面仅有一个初步的演变。到了唐代，将近三百年的悠远时间。在艺术上自成一种格式，其演变过程，可分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可谓莫高窟最兴盛时代。从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到宋皇祐四年(公元1053年），前后一百三十年，在敦煌是曹义金世袭割据时代，莫高窟在此期间也相当兴盛。到元时，因统治者的宗教信仰不以佛教为主，所以在莫高窟的历史上，失去了艺术上的辉煌。

738 敦煌壁画与佛经　　周一良

（《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4期）

本文对敦煌壁画与佛经的关系作了概括介绍。有关佛教的壁画性质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单纯的佛、菩萨或者罗汉的像，近似一种人物画。另一类是把佛经里的故事用图表达出来。在佛教术语里，凡是用绘画或雕刻表现出佛经中故事的场面，叫作“变现”、“变相”，或者称为“变”。壁画中这种“变相”或“变”又可按照它所依据的经典，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根据某一部经典，把它里面所叙述的信仰中心，用绘画表现出来。当时佛教信徒们最信奉的经典，表现在壁画上的机会也最多。七世纪以后，阿弥陀佛西方净土的信奉占优势，所以壁画中多有根据罗什译《阿弥陀经》的阿弥陀净土变相。净土宗很注重利用图画描写极乐世界，借以引起信徒响往的热诚。有些净土变相不是依据《阿弥陀经》，而是依据畺良耶舍译的《观无量寿佛经》。还有两种净土常作壁画的题材，就是药师净土变相和弥勒净土变相。唐代《妙法连花经》的信仰盛行。《敦煌劫余录》所著录八千多轴经卷中，罗什译《法华经》竟占一千六百九十八轴。敦煌壁画中法华经变相的图样也最为丰富。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讲在家的维摩诘腾过出家的佛弟子，

是南北朝以来学佛的居士们所喜欢的经典。《敦煌劫余录》著录《维摩诘经》四百四十九轴。千佛洞第149窟右壁，第1窟左前壁，第8窟左右前壁等，都是维摩变相。变相的第二种是图绘释迦牟尼一生事迹。所根据大都是《佛所赞行》，《佛本行经》，《佛本行集经》，《太子瑞应本起经》等佛传的经典。记载中所称唐代寺院壁画的本行经变，降魔变，涅槃变等，皆属此类。第三种变相是本生故事。佛教相信轮回，所谓本生，是指释迦牟尼降生净饭王家为太子以前的许多世的故事。如135窟右前壁所画须大拏太子变，左前壁所画摩诃萨埵本生，110窟左壁的九色鹿王本生，以及后汉时译的《大方便佛报恩经》里的几段故事，敦煌壁画也常用作题材，其中尤以最长最富小说意味的恶友品较为流行。与佛经有关的壁画第二大类佛像画，是华严经里所说的教主昆卢舍那佛。千佛洞135窟左壁和135C窟右壁都绘有此佛。第76窟南北两壁绘有十六罗汉图。自从八世纪以后直到十一世纪，中国各阶层人民信仰密宗，这种信仰也表现在敦煌壁画上。其所画的佛像或菩萨像多奇形怪状，三头六臂之流。文章后部还附带介绍了壁画与唐代人民大众所欣赏的俗讲的关系。唐代寺院中常举行一种俗讲，是用通俗的语言解说佛经，尤其是描写具体生动的故事部分，并且间以歌唱或念佛。俗讲所常用的经典有《法华经》，《涅槃经》，《华严经》等，敦煌发现的写本背面有记载俗讲仪式的。另外，还有由讲经文发展而来的变文。因为讲经文的内容多少受佛经原文的限制，不易发挥渲染。于是渐渐脱离经文，发展成为独立的变文体裁。变文自由地讲述佛典中的故事，也用作举行俗讲时讲唱的底本。寺院壁画大部分固然是以经典为依据，但在变文发达之后，也可能受它的影响，而根据变文中夸张渲染的描写来制作壁画。千佛洞里的劳度叉斗圣变相便有这种可能。

739　阿旃陀和敦煌　　　常书鸿

——纪念印度阿旃陀艺术1500周年

（《光明日报》1955年9月12日）

阿旃陀和敦煌——中印两国佛教艺术宝库的创建、成长和发展，是标志中印文化交流关系的许多重要事件之一。作者长期从事敦煌艺术研究工作，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多年。是国内外著明学者，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和介绍，做出了杰出贡献。1951年曾以访问印度文化代表团团员的身份，详细观看过阿旃陀瑰丽精致的壁画。从阿旃陀和敦煌两个石窟群创建时代来说，阿旃陀早于敦煌约五百年。从两个石窟群壁画制作的时代来说，敦煌壁画早于阿旃陀壁画约一百年。1951年阿旃陀壁画的创建历史已满1500年，1966年敦煌壁画的创建历史已满1600年。敦煌是汉代河西四郡之一，是通过新疆到达印度和中亚以西各国的枢纽，它在中西文化，尤其是中印文化，经济交流的历史上有着重要作用。敦煌石窟是在公元366年中印文化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开始修建的，从早期修建的洞窟形式、塑像和壁画的风格，都可辨认出中印两国文化交光互影的迹象。阿旃陀石窟创建于公元前二世纪，阿育王提倡下的佛教正在发展的时期。地点选择在孟买东北483公里德干高原的大彼帝河畔，远离世俗的山林深处，并且把此地命名含有“世外”意思的阿旃陀。自此以后，在不同时期继续开凿石窟，一直到玄奘于

公元638年到此巡礼时，总共修建了29个神殿和精舍。这29个石窟，大体都是模仿印度早期木构建筑特点，在整座石山中凿刻而成。石窟内部除早期的舍利塔及晚期的造像和富丽精致的柱梁浮雕装饰外，窟顶与石壁上均有壁画。据1879年的调查报告，有壁画的洞窟还有16个，但经八、九十年的摧残，而今只剩六个洞窟了。这六个洞窟壁画的制作年代约在从四世纪到七世纪的四百年中，按制作年代及画风，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其内容包含了两个主题：第一是释迦牟尼出世前的本生故事；第二是释迦牟尼在世一生行传的故事。两者都结合了神话传说和佛经上的譬喻，用现实的人生活动体现出来。应该说，一切从佛传或佛本生故事内容组织结构出来的阿旃陀壁画的画面，象敦煌壁画所具有的特点一样，全是从人民生活的角度来描写的。阿旃陀和敦煌——中印两大民族佛教艺术宝库的壁画内容，大都取材于佛传故事和佛本生故事，它们是采用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民族技巧而描写下来的古典艺术的杰出代表。当四世纪敦煌艺术开始创建的时候，艺术家们同阿旃陀的作者一样，知道批判的吸收与扬弃，因此经过北魏和西魏的融化演变，终于达到李唐时代民族艺术发展的高潮。最后作为中印两国艺术家共同遵守的六个创作原则：生动的追求，线描的运用，构图的组织，色彩的传染，形象的捉摸等等，不期而合。一两千年来两个民族的艺术文化的交流和密切关系可考见一斑。

740　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　　段文杰

（《文物》1978年第12期）

敦煌早期壁画，一般指的是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时期的作品，即北朝时期的作品。作为佛教艺术的一种形式，它是外来的种子在我国土壤上栽培出来的花朵。本文是对敦煌早期壁画中的民族传说和受外来影响的研究。敦煌石窟早期壁画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佛经故事画，第二类是以中国神话或神仙为题材的绘画，第三类是装饰图案。佛经故事画是敦煌早期壁画中最主要的内容。早期的故事画多以修“六度”为内容，要求人们忍受各种迫害凌辱、困穷疾苦而不生怨恨之心。反映在画面上，就是充满恐怖和悲惨的气氛。这一套东西，固然是来自西域的经典和佛教艺术，然而在当时大量出现在敦煌，却决不是偶然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强盗成佛”。这个故事在西魏、北周时代一再出现，这和北魏后期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是有密切关系的。此例足以说明，一个阶级采用外来的东西，其目的总是“为我所用”。而在采用之中，为了把佛教哲学和神学思想化为具体的形象，自然地要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相结合。在这一类壁画中的表现形式，十六国时代，多采用主体式单幅画并列的组画形式，一幅画只表现主体人物的主要情节。北魏时代，多为横卷式连环画，画面出现几个到十几个情节。到了北周时代，故事画有所发展，内容越来越丰富、曲折，画面愈拉愈长，有的两条平列，有的三条重叠，有的甚至六条合在一起，表现一个故事内容，另一类壁画，是表现神仙思想的民族传统神话题材，主要画在249、285两窟的顶部。249窟画的是西王母、东王公的故事；285窟画的是伏羲女娲的故事。这类传统神话题材，在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中、洛阳卜千秋墓中、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中、河西走廊魏晋墓画中、特别是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壁画墓中都有发现。这充分说明敦煌壁画中的神话题材，与墓室壁画有密切的关

系。这类土生土长的题材经常和佛教故事画在一起，形成了“中西结合”或“土洋结合”。还有一类壁画是装饰图案，主要是平棊和藻井，它是我国古代建筑顶部的装饰。总之，无论是佛教故事画、传统神怪画或者装饰图案，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具有中原汉民族艺术的传统和西域少数民族艺术的特色；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外来佛教艺术的影响。敦煌早期壁画，在绘画技法上充分利用了民族民间绘画的成就，以表现外来的佛教内容，并在适应新题材、新内容的制作实践中，又转而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技法，创造了新的时代风格。一个伟大的民族创造自己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决不排除而且必然地会借鉴一切外来的东西，而后加以咀嚼、吸收，转化为自身机体的营养。敦煌早期壁画，正是我国各族匠师以当时的现实生活为源，以传统的艺术技巧为流，又汇集了若干外来的支流而形成的一条艺术长河。

741 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　　金维诺

（《美术研术》1958年第1期）

佛教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其事迹及有关传说早有文献记载，并经常为绘画所表现。敦煌第323窟是初唐窟，在窟的南北两壁，画有隋文帝以前佛教流传的故事，这可能是遗存下来的最早的有关中国佛教事迹的壁画。故事画按照所表现的内容分为七组，北壁四组，南壁三组，各组又按情节分为若干幅。其中第六组壁画的主要部分已为帝国主义分子瓦尔纳盗走，只能通过以前所摄照片来了解原画。本文详细介绍了这些壁画的图景、内容、情节，抄录了题榜，并引证史籍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加以说明。例如从北边起为第一组，绘汉武帝讨匈奴，获二金人列于甘泉宫，帝为大神常行拜谒。图中画殿堂，内列二立佛，殿前左右各一树，汉武帝执香炉跪于阶下，周围有臣属六人。在此下方画武帝遣张骞使西域，在题榜上径书作使张骞往西域问名号。从这里可以看出史实在传说中的再演变。同时比较奇特的是图上遣使一幕，竟画作送别时的情景。汉武帝骑马上，周有缴盖侍从，张骞跪于马前。第二组记大夏佛迹。右侧画释迦牟尼右手提衣，前有仙女化地为池；左侧画一大方石，一婆罗门以足污石，遭雷击倒地，另有二天洗石，两图均有榜文。第三组下方画阿育王拜塔，一塔崩倒；中部画一帝王坐观一僧施法，僧指端出乌云，于远方降雨灭火，均有题榜。图上方为一七级浮图，前一僧向二人谈话。另外尚有侍者二人，题榜字已不可辩。看图所画似为佛图澄斋日至水边洗肠。其余各组均画有图，并有题榜。这里除大夏佛迹和阿育王拜塔外，都是见于中国文献的佛教故事。这些杜撰的故事，曾被作为宣扬佛教的工具。但从另一个角度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片断。这七组画是利用青山绿水巧妙地衔接起来的，因此分布在南北两壁的画，整个看来是一个完整的横卷，从部分看又象是各自独立的画轴。构图的这种组织方法表现了画家按照内容的要求，来寻求新的处理方法的创造精神。这些作品不仅是优美的风景画，也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某些方面情貌的风俗画。特别是对劳动人民的形象处理得更是亲切动人，在简单的色调与情态里，表达了人物的生活与情感。由此可以看出，当作为人类虚幻幸福的宗教，不能不利用人间的花朵来装饰自己、来争取群众的时候，它用来作为宣传工具的经典与艺术，也就不能不在矛盾的状态里显示出当时人们的苦难与愿望，显露

出现实的贫困与宗教的空虚。这些故事画不仅对研究佛教史提供了材料，而且给研究唐代以前人民生活某些方面的情貌以及研究当时表现现实生活的绘画，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742 敦煌壁画祇园记图考　　金维诺

（《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

本文考释了祇园记图的流变大概，从中可以明瞭这一种经变的发展情况。祇园是祇树给孤独园的简称，它是释迦牟尼去舍卫国说法时与僧徒停居的地方。祇树给孤独园精舍的建立以及名称的由来，有着一段传奇性的故事。故事主要内容是：舍卫国有一大臣名须达，乐善好施，救济孤贫，因此都称他为给孤独。须达因去王舍城为子娶妻，得见释迦牟尼。听说法后，恳请释迦到舍卫国说法，释迦乃遣弟子舍利弗同往选地建立精舍。舍卫国祇陀太子有园甚为适合，须达许以足够布满园地的黄金购买，太子见须达心诚，乃应允，并及树木捐献。六师闻知，要求捔力，如沙门得胜才让兴建精舍，于是"舍利子随事摄化，应物降伏"，终于获胜。精舍建成，释迦牟尼来说法，因命名为祇树给孤独园。因此祇园记实际上包括以下两个部分：一、给孤独长者以黄金布地买祇陀太子园。二、外道六师与舍利弗斗法。祇园记与佛传故事的其他部分一样，很早就被表现在雕刻与绘画作品中。从印度现存的佛教艺术遗迹，可知纪元前二世纪左右，就已在雕刻上出现了祇园记图，如巴拉胡提塔的石栏与佛陀迦耶的石栏都有祇园记的浮雕。在巴拉胡提搭石栏上，布金买园一节表现在一个圆形的画面里。这是世界上遗存下来最早的有关祇园记的美术作品，它告诉我们祇园记图开始出现时的一些特色。在中国佛教美术作品中也有相同题材的壁画。根据已知材料，祇园记图出现在北朝末年以前，以后经唐、五代，一直延续到宋。祇园记在中国，不但一开始就采取了与印度不同的处理手法，并且经过历代艺术家长时间的琢磨，形成了佛教艺术中一朵特殊瑰丽的花朵。这批祇园记图集中保存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与安西万佛峡。从这些时代不同的作品里不但能知道祇园记图在中国的演变与发展，同时也可看到过去杰出的民族艺术家如何学习前人的成就，如何发挥创造性劳动，使作品更加充实、完善。中国现存的祇园记图以敦煌西千佛洞的一铺最早。它是以连环画的形式出现，由上下二列十个连续性的情节所组成。这时候还只是平淡地排列故事过程，没有显示出故事本身的特色，色彩也很单调，主要依靠人物的动作来表明事态。但它却意味着佛教艺术的中国化，意味着新的处理手法有可能获致更大的成就。祇园记图采取连环画的形式出现，它的重要不仅在于整个故事内容获得了表现机会，还在于它是由平板的叙述转移到表现戏剧性情节的开始。把它与以前和以后的祇园记图相比，就很明显地看出它是两者之间的桥梁，是从"给孤独长者买祇陀太子园因缘"到"劳度差斗圣变"的过渡。紧接西千佛洞祇园记图出现的"劳度差斗圣变"是在莫高窟第335窟。这画与前不同处有两点：一是全部内容只集中表现劳度差与舍利弗斗法，一是全画虽仍然表现很多情节，但是已形成了以劳度差与舍利弗为中心的完整构图，并且它是被安排在相对称的两个壁面。这两个特点也就标志着新的成就。祇园记图从这时起以"劳度差斗圣"作为主题，而使自己显明地具备了独特性与丰富性。莫

高窟第9窟是大顺元年张承奉修建的。南壁的祇园记图是现存最早的一铺晚唐作品。晚唐到宋初虽然整个祇园记图在构图上、情节上还有一些变动，但基本上是按第9窟的同一范本制作的。第9窟祇园记图在图的两侧与下部开始表现给孤独长者以金布地买祇陀太子园，而在图的中部表现劳度差与舍利弗斗法的。从整个构图看，它比335窟的更加完整统一，从内容看，它所表现的情节更加详细。还从壁画题记上，看到文学与绘画结合的具体事实。这里已经是按照民间文学——变文在作画，这不仅标志着宗教壁画逐步在摆脱宗教经典的限制，也显示着宗教壁画在从更多方面汲取现实生活的营养。五代、宋初还一直按照这一优秀的范本作画，只是在中原似乎还有另外的粉本。这也正可看出中国民间画家不墨守成规，敢于大胆创造，用各种形式来表现同一题材。我们从这一经变的发展中也可得到启示，即如何从古人的接受遗产、从事创造中吸取一些有益于我们的东西。

743 祇园记图与变文 金维诺

（《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

本文通过对莫高窟壁画“祇园记图”以图文结合形式，使变相与变文密切联系起来的研究，阐明作者为什么把“祇园记图”不简单的称为“劳度差斗圣变”的原因，并论述了我国古代把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密切结合的优秀传统。“祇园记图”的定名，不只是因图画内容不限于劳度差与舍利弗斗法，也包括须达舍金铺地买园的情节，而且在变文方面也有这种定名的依据。巴黎所存伯字第3784号卷子就是描述同一内容的变文，其尾题即标名为“祇园因由记”。同时在敦煌第9窟祇园记图左上方题榜中也有“祇园记”的题名。其所提供的资料，还进一步证实了变相与变文间的密切联系。伯希和盗劫到巴黎的4524号卷子一面是变文，一面是图画，这一变相正是表现劳度差与舍利弗斗法的故事，而每节图画都和变文相应。这幅画不仅直接说明了变相与变文的联系，而且以其完整的图象说明了祇园记图在盛、中唐期间的流行和表现形式，它标志着变文与变相相互汲取营养、丰富着形象塑造的过程。敦煌335窟壁画祇园记图以风的威力来刻划劳度差的狼狈，这一创造性处理，启发了变文作者选择了以风树之斗作为结局性之战斗，而变文对斗法时人物的生动刻划又反过来影响画家创造性的刻划形象。第9窟祇园记图进一步提供了变文、变相密切结合的实例。图上的题榜不和其他经变一样照写佛经原文，而是由佛经演变而来的变文与变文中的唱词。经变上的变文不仅证实了壁画是按照变文描绘的，同时也提供了祇园记变文（降魔变文）的另一新底本，这一不同的底本，显然对于民间文学变文方面的研究与校勘有着一定价值。祇园记变相与变文在壁画上的密切联系，使我们依据题榜上的文字，能够明确了解每个部分所描绘的内容。题榜的变文与说明还能帮助我们识别故事情节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斗法场面的了解上。在斗法的画面上，我们可看出变相是依照变文描绘的，但变相并未停留在变文所达到的成就上，变相在这里并不是作为文字的简单图解而出现，而是进一步发展与丰富了作品的形象性与戏剧性。这些东西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最后一个回合——风树之斗与劳度差降伏后的心理刻划上。第98窟祇园记图的题榜，告诉我们风树之斗开始的细节。画家为了表现风的威力，除了画出被风摧伐的大树，还画出了外道徒众形形色色的狼狈象。画家通过外道徒众在

暴风中各种不同的睿态，来侧面揭示出风的威力．画面的风，使你不能不随时联想到莫高窟周围的狂风。只有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艺术家，才能描写出这一场面．画家所以高妙，还不在于他真实的描写了自然现象，而在于他敏锐的观察与创造性构思的基础上，巧妙地组合各种现象来集中反映了一个中心事件．因此画面不仅多样、富于变化、具有强烈的戏剧性，而且呈现了一个完整统一、互相联系、激动人心的瞬间。祇园记图的这一创造性成就，充分说明古代民间艺术家的伟大才能，也显示出我国古代敦煌就有着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密切结合的优秀传统。这种结合孕育和发展了创作上的乐观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是与现实、与生活、与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密切相联系的。

744　敦煌乐舞资料的历史背景　　　阴法鲁

（《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

本文探索了敦煌莫高窟乐舞资料产生的历史背景。敦煌莫高窟的古代乐舞资料，包括大量壁画中的乐舞图及1899年藏经洞中发现的曲谱、舞谱以及音乐文学作品曲子词、变文等。文章论述了自远古至五代时，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和敦煌的地位，以及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经丝绸之路结合的情况。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镇，是中原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接触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枢纽。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历经北魏、隋、唐以至元代，历代均有扩建，现共有492窟。据文献记载，敦煌原有永安寺、开元寺、大云寺等寺院17所，有僧尼1200多人，还有各寺所占的大批"丁壮"及其家属等。后唐时，敦煌有寺院121所。从远古时代起，西域和内地就开始了经济和文化交流。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上的使节商旅，往来不断，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立四郡，在西域设置"使者校尉（宣帝时改为西域都护），保证了丝路的畅通，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东汉明帝时，印度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洛阳，至南北朝时，西域音乐和中原音乐在河西地区结合起来。由于这时佛教盛行，寺院也成为乐舞文化交流的一条渠道。印度的佛教音乐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隋朝统一中国，整理乐舞，在宫廷乐舞中设"九部乐"，即包括龟兹、疏勒、河西、中亚、天竺等地的音乐。唐朝建立之后，在西域设置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在河西设立沙、瓜、肃、甘、凉五州和凉州都督府；唐玄宗时又置河西节度使，统管河西的军事。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和驻军都有乐舞人员，寺院林立，也成为乐舞活动的场所。这种社会现实，就成为敦煌石窟壁画创作的依据；其它乐舞文献和音乐文学作品，也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唐代的敦煌是一个富庶繁华的城市。从敦煌壁画和其它乐舞资料可以看出，西域音乐传到河西地区，和当地以及中原音乐又有进一步的结合。西域音乐传入中原，成为唐代音乐的一个组成因素。唐代音乐是以中原民间音乐为主体，继承了传统音乐，吸收了西域和其它各地的音乐因素，经过长期酝酿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音乐，历史上称为"燕乐"。唐玄宗扩充的官方音乐机构"教坊"，曾大规模地搜集整理民间乐舞有三百多曲，称为"教坊曲"，其中也有从河西或经由河西传进来的。敦煌的曲谱和舞谱，大多数是教坊曲。唐代乐舞发达，流行的乐曲很多。配合这种乐曲的唱词，盛唐以前主要是歌诗，即齐言诗；中唐则流行曲词，即长短句，大部分出于民间。

总之，本文对敦煌乐舞资料的历史背景论述比较全面而周详，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乐舞和说唱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745　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　　阴法鲁

（《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4期）

唐代的乐舞是中原的乐舞和西域乐舞相融会之后的综合性的集中表现，是有国际意义而同时又是中国新的民族形式的高度艺术创造。作者为了说明唐代乐舞的历史，首先论述了中原古乐舞的演变过程。从《三分损益法》的乐律学的发明，《诗经》的创作，教科书《乐经》的编写，到汉魏时期《清商乐》的盛行，隋、唐七部伎，十部伎的产生，以及西域音乐伴随着佛教在中原的盛行，从而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了新的艺术。作者认为，如果没有西域音乐的东传，中原音乐不会有大的发展；相反，如果没有中原音乐的基础，西域音乐也不能成就这样完整的体系与庞大的规模。这伟大事业是在唐代完成的。接着作者论述了西域音乐的内容和传入经过。所谓西域音乐，一部分是中国西部各兄弟民族的音乐，一部分是中亚和印度的音乐、它们是从纪元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时开始东传的。后来到南北朝时，西域人陆续迁到北魏领域，他们带来了西域文化，带走了中原文化。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中，无疑促进了西域音乐向中原的散播。敦煌石窟的北魏壁画有伎乐图，其中已有了从西域传来的乐器。唐代的乐队规模很大，用的乐器很多而且很复杂。作者对十部伎所用的乐器列表作了比较。敦煌壁画上的乐队，最少的两个人，最多的十八个人。文中选有几幅插图，展显了他们所用的乐器。人数较多的乐队都有鼓，鼓的位置常排列在前面。打羯鼓（或其他鼓）的人是乐队的指挥。作者把壁画上所见到的乐器，如腰鼓、都昙鼓、毛员鼓、羯鼓、鸡娄鼓、答腊鼓、齐鼓、琵琶、五弦、阮咸（直项琵琶）、筝、箫、筚、篥、笛、笙、铜钹、铜铙、方响、拍板、法螺等的式样，来源、音响、演奏法等都作了说明。关于乐工和舞工的服饰，唐代的“朝廷”也有规定。唐代的舞蹈有“健舞”、“软舞”的区别，姿势雄健的叫健舞，姿势柔软的叫软舞。有些规模特别宏大的舞蹈，如“霓裳羽衣”舞者可以多到三百人，只有“朝廷”可以举办，普通的舞蹈就是一人或两人。作者列举了几幅有舞蹈动作的壁画，就其衣着、服饰、舞姿等与现在新疆维吾尔族的舞蹈和一些戏剧节目中的舞蹈动作作了比较，说明其源流关系。唐代批判地接受了南朝及北朝的文化遗产，不断吸收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及国外各民族的文化，以世界规模丰富了自己的社会内容。在当时人民生活中，新的音乐和舞蹈曾鼓动了无限的喜悦，形成“唐乐”在世界音乐史上的崇高地位。

746　敦煌壁画和唐代舞蹈　　董锡玖

（《文物》1982年第12期）

本文是对敦煌壁画中有关乐舞画较系统的研究。敦煌壁画是我国舞蹈艺术史资料的宝库，唐代乐舞壁画更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敦煌壁画是佛教艺术。壁画中的乐舞形象，不管是以“神”的面貌出现的“飞天”、“天宫伎乐”和“经变画”的乐舞菩萨，还是世俗乐舞中的人物，来源都是现实生活，是当时辉煌灿烂的舞蹈艺术的真实写照。

隋代曾把中原和少数民族及外国的乐舞集中整理，初称“七部乐”，后增为“九部伎”。唐初继承了隋代的乐舞，后又增为“十部伎”。十部伎中的清商是汉族民间乐舞，西凉乐是古老的汉、晋乐舞和西域乐舞互相融合的产物，高丽、天竺两部为外国乐舞，其他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等部乐舞都来自新疆一带西域少数民族。九、十部伎中的西域少数民族乐舞，以龟兹乐舞最为突出。南北朝以来龟兹乐舞已有较高的发展，到唐代尤盛。龟兹乐舞，在龟兹故城——新疆库车的库木吐喇和拜城克孜尔等千佛洞的乐舞壁画中保存了生动的形象。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要站，也是龟兹乐舞传入中原的必经之路。因此，龟兹乐舞的形象在敦煌壁画中进一步得到展现。在“九部伎”“十部伎”的基础上，唐朝宫廷乐舞又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坐、立部伎演出的规模和形式，在莫高窟的“经变画”的乐舞场面中有具体表现。规模最大的见于莫高窟148窟（盛唐），共四组乐队两组舞蹈。还有220窟（初唐）是驰名中外的乐舞窟。北壁“东方药师净土变”中间舞伎四人一铺的经变画，在敦煌壁画中是独一无二的。坐部伎的节目中有《龙池乐》，是唐玄宗所作的一部典雅绚丽的乐舞。敦煌壁画中看到的许多形象，正是《龙池乐》、《云韶乐》等舞姿和当时的宗教艺术相结合的反映。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是受到广泛赞美的艺术形象。飞天即“香音神”，是能奏乐，善飞舞的神，佛说法时散花舞蹈，即“天雨花”。飞天的形象以唐代为最美。唐代教坊中的舞蹈有“健舞”、“软舞”。敦煌壁画中唐代以及其后的乐舞，特别是“经变画”中的乐舞，也很明显的有这两大类舞姿。在敦煌壁画中还有一种独特的反弹琵琶舞，从舞姿看也应属于健舞类。琵琶在唐代最为流行。琵琶成为舞蹈道具，都是敦煌乐工舞伎的创造和画工的发挥。从唐到五代一直到西夏的壁画中都有舞琵琶的形象。在五代南唐顾闳中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描绘了舞伎王屋山舞《六么》(《绿腰》)的情景。在莫高窟445窟（盛唐）“弥勒经变”的嫁娶图上看到了相同的舞姿。唐代舞蹈中有一部分发展为表现一定人物和故事情节的歌舞戏，最著名的有“大面”、“拨头”、“踏谣娘”，其中“大面”和“拨头”都是戴面具的舞蹈。在敦煌壁画中，面具形象在唐代之前北魏的洞窟里已经发现。唐代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舞蹈艺术鼎盛的时代，除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外，还因为统治者的着力提倡和拥有从事舞蹈艺术的雄厚力量。敦煌的画工生活在乐舞繁盛的时代，用他们在神笔勾勒了美妙的形象，在乐舞历史宝库中留下了光彩夺目的奇珍。

747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艺术

——“丝绸之路”上的乐舞之一　　董锡玖

（《舞蹈艺术丛刊》1980年第1、2期）

敦煌的佛教艺术，一般是指莫高窟和敦煌县西的西千佛洞，安西县的万佛峡（又称榆林窟）三处。本文把敦煌佛教艺术——壁画中丰富多彩的乐舞，归纳为三类加以介绍。第一，表现人间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的乐舞场面和舞蹈形象。这类壁画，从北周、隋、唐直到五代、宋都有，这有助于了解当时的风俗、舞蹈、乐舞制度及衣冠服饰。这类壁画数量不多，绝大多数在画中所占位置很不显著。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如晚唐的

《张议潮统军收复河西图》和张议潮妻子出行的《宋国夫人出行图》以及五代的《曹义金统军图》和曹义金妻子出行的《回鹘公主出行图》中，都有世俗的乐舞场面，舞姿生动，民族风格浓厚。反映民间生活、风俗的，如217窟西壁下的折柳场面，中唐360窟东壁南侧《维摩诘变》和宋代61窟北侧维摩变中，都有在酒店中宴饮歌舞侑酒的场面。还有一类《嫁娶图》中的乐舞场面，生活气息浓郁，富有时代感，如盛唐445窟《弥勒变》中的《嫁娶图》，正是唐代婚礼的真实描绘；榆林宋代38窟《婚娶图》则生动描绘了宋代婚娶的习俗。第二，"天宫伎乐"、"飞天"、"伎乐天"、"力士"的舞蹈形象。这部分乐舞形象，虽表现佛国的仙乐仙舞，但都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加以想象绘制的，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如北魏248窟、249窟、288窟、435窟（包括西魏的一些洞窟）洞顶部、藻井四周以及洞窟上部都是"天宫伎乐"。"天宫伎乐"在西魏开始，有的变成了"飞天"。它们绕窟一周，有的从栏杆中飞出来，边舞边演奏乐器。其乐器十分丰富，中原、西域、外国传来的都有，大约近三、四十种。北魏、西魏、北周洞窟的下部一圈都是"力士"或称"药叉"、"金刚力士"、"地神"。有的奏乐，有的舞蹈，粗犷雄浑之中又富有妩媚。隋以后的洞窟下部就没有"力士"出现，而以供养人取而代之。北魏时已出现的"伎乐天"和"飞天"，到隋唐时代，它们更加自由自在的在空中翱翔。这些都是佛经所说西方极乐世界里面专散香气，能奏乐，善飞舞的神仙，印度称为"健他婆"，中文译为"香音神"。北魏、西魏时的"飞天"，古朴生动，唐代"飞天"则更具特色，舞姿多变，技巧纯熟，色彩绚丽。除徒手舞外，以长带、花绳、鲜花、花盘、璎珞为舞具的最多。手执乐器边奏边舞的"飞天"即名"伎乐天"。第三，礼佛、娱佛的乐舞。用图象表现佛经及变文内容的"经变画"中，有大量礼佛、娱佛的场面，自唐代一直延续到宋、西夏和元代。在"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变"、"牢度叉斗圣变"、"天请问变"、"金刚经变"、"报恩经变"、"金光明经变"、"涅槃变"等都有乐舞场面。乐舞在唐代的"西方净土变"中有着突出的位置，完整的乐舞场面开始出现，而且愈来愈丰富，这无非是现实生活中人物、形象、舞姿、场面的美化，这无疑有助于了解宫廷和上层社会的乐舞生活。最具代表性的是，初唐220窟，盛唐205窟、172窟、320窟，中唐159窟、201窟、112窟，晚唐156窟等。这些乐舞形象有队舞、双人舞和独舞，从不同的风格上又可分刚健雄武的健舞和婀娜轻柔的软舞。演奏的乐器有琴、筝、琵琶、方响、箜篌、拍板、齐鼓、筚篥、铜钹、腰鼓、横笛、鼗鼓、阮咸等等。总之，敦煌壁画中的乐舞，继承了汉至魏晋以来的乐舞艺术成就，经过北魏、隋、唐至宋、西夏、元代的演变和发展的各阶段，自成一个具有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风格特色的乐舞艺术体系。反映了千余年来中国人民在民族与民族、中国与外国和平相处、文化交流活动中的辉煌成就。

748 敦煌乐史资料概论 　　牛龙菲

（《新疆艺术》1984年第5、6期）

本文论述了敦煌乐史资料之分类、价值和研究概况。敦煌乐史资料共分文献、形象两大类。在文献者，有元嘉二年（公元152年）东汉简牍乐谱残片，这是迄今发现的最

早的古代乐谱；还有伯3808长兴四年(公元933年)抄本《五代敦煌曲谱》、伯3539《琵琶二十字谱表》、伯3719本卷《尔雅白文》背面抄写的一段《浣溪沙》曲谱，此外尚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散·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著录的《琴谱》。除乐谱外，还有"舞谱"二卷六调。"二卷"为伯3501；斯5643。"六调"为：《遐方远》、《南歌子》、《南乡子》、《双燕子》、《浣溪沙》、《凤归云》。此外，散见于敦煌遗书中的有关音乐的史料，更是不计其数。在形象者，有三个部分：1.492个洞窟的总计约四万五千余平方米的壁画；2.敦煌藏经洞所出之"敦煌遗画"，其中斯坦因劫取部分共536幅，伯希和劫取部分共216幅；3.敦煌第437窟中心龛柱正面上部残存的伎乐天人影塑。作者分别论述了敦煌乐史资料的一般价值和特殊价值。认为乐史资料共有音响、乐谱、乐器、文献、形象、民俗等六个方面。而贯穿整个音乐历史的，只有乐器、形象两项乐史资料，而形象资料又较乐器资料为完备。它揭示了许多史籍语焉不详的细节，弥补了音响、乐谱、乐器、文献资料之不足。其时间的连续性，使梳理全部乐史脉络的企图有了实现的可能。敦煌乐史资料中，现有年代最早和较早的乐谱，又有关于古代音乐生活、乐人、舞伎、乐队、乐器的许多文字记载，还有无数量的连绵千年之久的关于古代乐史的形象资料，它在中国、乃至世界乐史研究方面的价值，都是极其重要的。敦煌乐史资料又因其地理位置而具有特殊价值。早在公元前1600年之前，这里便存在着以玉门大烧沟出土的夏代陶埙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音乐文化。作者概述了自春秋战国以迄魏晋，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发展交流的情况，指出敦煌地处丝绸之路咽喉，中西交通孔道，东西音乐文化交流，在其文献文物中每每留影造型、叙录刻铭。古河西陇右之地，作为中国音乐文化的源头之一，作为楚汉音乐文化的传存重镇，作为华夏之声西播的前沿，作为西域文化东渐的首站，在敦煌文物文献中多有反映。敦煌所处的特殊地域，使其壁画成为了解古代西域诸国音乐的重要史料，具有很高的乐史资料价值。最后，作者还详细介绍了中外学者研究敦煌乐史资料的概况及著述。

749 三件敦煌曲谱的综合研究 何昌林

(《音乐研究》1985年第3期)

本文对三件敦煌曲谱资料作了综合的考证研究。文章首先介绍了莫高窟藏经洞与三件曲谱的被劫情况，然后考证了三件曲谱的由来。敦煌莫高窟位于敦煌县城东南方鸣沙山东麓，共有一千多个洞窟，约相继开凿于公元366年至1368年期间。目前，保存完好的有492个洞窟，其中保存着历代壁画45000平方米，彩色塑像二千余身。清代末年，莫高窟分为上、中、下三寺。上、中二寺在南，住喇嘛；下寺在北，住道士。公元1900年农历5月25日，道士王圆箓忽然在下寺底层之北壁发现了一个久被封闭的小窟（今16窟内之"北耳窟"——第17窟），内藏经卷文书四万余件及许多绢画、铜佛等。后来，人们就将这个洞称作"藏经洞"。"藏经洞"原为唐代三界寺的"廪室"（粮库），后该寺住持、河西都僧统吴洪䛒于公元862年去世后，就改廪室为殡仪室。后又改殡仪室为"影室"（吴洪䛒纪念堂）。九世纪末，使用较为方便的折叶式经卷已从内地传入敦煌，故敦煌三界寺僧侣遂于公元1002年稍后将寺内的卷轴式经卷及零散古物、杂物集中起来，

存放到吴洪䛒的“影堂”中去。此即“藏经洞”之由来。“藏经洞”所出四万余件经卷文书中，有曲谱资料三件，但全部被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劫往巴黎，现藏巴黎图书馆东方部。这三件曲谱资料为：《琵琶二十谱字表》、残乐谱《浣溪沙》和《敦煌琵琶谱》二十五首。作者对这三件曲谱作了详细的考证与译解，得出以下结论：（1）《琵琶二十谱字表》是莫高窟寺院中一位赶车人于公元866年至890年期间所写，书写地点即在寺院。（2）残乐谱《浣溪沙》，书写时间不会晚于第十世纪。本曲为盛唐舞曲，仍属唐琵琶谱谱式。该曲之词分齐言、杂言两类。作者还对本曲之调名、节奏韵律、左手技法等进行了探讨。特别对琵琶“促柱”法的使用及其记号“复”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3）《敦煌琵琶谱》，共有二十五首乐曲。所谓“敦煌曲谱”、“敦煌大曲谱”、“敦煌琵琶谱”，均指本件。作者对此考证甚详，认为此件为敦煌僧侣梁幸德之三位助手，于公元934年闰正月，根据成都传至湖北江陵的王贞范作序的《王氏女琵琶谱》之洛阳抄件，在洛阳再度过录，转抄成现存的《敦煌琵琶谱》。史实是：《王氏女琵琶谱》的材料，是唐末的中原乐工带入西川，并传授给前蜀黔南节度使王保义之女，由王氏女辑成乐谱。王氏女许配给南平国国王高从诲的儿子高保节，遂将这部乐谱从成都送至湖北江陵赠给高从诲，作为定亲礼物，并由王氏女之兄王贞范（南平国推事官）为乐谱作序，然后隆重地勒石纪念。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九月九日为后唐明宗李亶的生日“应圣节”，在洛阳中兴殿举行讲经活动。明宗之子秦王李从荣负责安排讲经活动事宜。高从诲应李从荣之约，遣荆州玉泉寺僧侣到洛阳担任明宗应圣节的“僧道对讲”活动。《王氏女琵琶谱》即在这年献入洛阳。同年，敦煌僧侣梁幸德也奉归义军节度使曹义金之命，带领三位助手入贡洛阳。他们参加了讲经活动，并由这三位助手抄写了《王氏女琵琶谱》。934年闰正月，梁幸德被后唐闵帝李从厚敕封为“临坛贡奉大德、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由于梁幸德由洛阳回敦煌途中，在张掖遇盗身亡，故《敦煌琵琶谱》原先当不止一卷。但在张掖丢失时，仅侥幸保存了一卷共二十五曲。作者还考证了《敦煌琵琶谱》与福建南音的关系，从八个方面作了对比，发现相同之处甚多，证明《王氏女琵琶谱》传入闽南的可能性极大，并提出了译解唐琵琶谱的五个环节；即：“二十谱字”记谱法、定弦法、“寮拍”（板眼）记号、右手法、左手法等，其目的是希望将这些曲谱尽可能译的准确以免产生谬误。

750　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　　陈庆英　端智嘉

（《社会科学》“甘肃”1981年第3期）

作者于1980年6月，在敦煌县文化馆检阅了该馆收藏的敦煌古藏文写卷资料。其中“十万般若颂”写本的数千经页中，有一份吐蕃时期的驿递文书，抄写在经文的上下及字行的空隙处，其内容对了解吐蕃驿站制度很有帮助。本文将全文译出，并参照新疆米兰出土的吐蕃木简的有关内容作了注释，可供研究吐蕃史和驿站制度者的参考。公元七世纪初，在青藏高原上兴起了吐蕃王朝，在两个多世纪内国力强盛，称雄西方。吐蕃在西北面与唐王朝争夺安西四镇，在东北面进攻湟水流域，南面曾一度占有尼泊尔的地区，西面曾控制大小勃律，东南面与唐王朝交兵剑南，并曾一度使南诏归附。特别在唐

安史之乱以后，攻占了河西、陇右及安西四镇的大片土地，并曾一度进入唐都长安。吐蕃依靠武力扩张，统治过幅员辽阔的大片土地，统治敦煌地区达六十七年之久。在这期间，敦煌成为吐蕃统治河西地区和安西四镇的基地。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吐蕃王庭是如何与派驻这些地区的官员和军队保持有效的通讯联络？一直是关心吐蕃史者注意的问题。从有关记载看，吐蕃王庭与各地的联络是依靠一种驿站制度，但关于驿站的组织和工作情形，文献记载缺略。作者通过对在敦煌发现的这件驿递文书的翻译和注释，对吐蕃的驿站制度，有以下几点认识：1.吐蕃时期有一种驿站制度，即在各条交通线上设有驿站，负责接送过往信使官员，传达政令，递送公文、书信、报告等，以此保持吐蕃王庭与各地官员和驻军的联络。在敦煌和安西四镇地区亦有严密的驿站组织，这说明吐蕃管辖的所有地区都实行驿站制度。2.吐蕃驿站的组织，设有置顿官、置顿官的副手、书吏、伙夫、护送骑士等。信使在各站可以住宿、换马、办理通行手续等。每个驿站只对所管的一段路程负责。3.信使在路上持有一种驿递文书，凭此在沿途驿站得到食物供应、马匹、护送人员等，对不同的信使接待规格不同。信使的行程记录在驿递文书上，并须各驿站加盖印章作证。4.王庭在派遣信使时对前往的目的地和途径的路线、到达日期、沿途供应标准等预先都有规定，如出现遗失信件、延误日期、失密等情况，信使和驿站官员要受到处分。5.吐蕃在边境地区的驿站除传送书信、护送过往信使外，还要负责本地的侦察巡逻等事项，在战争时期又可起到军事上的作用。

751　试论“敦煌学”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和意义　　　周丕显

（《甘肃日报》1962年6月16日）

本文作者首先介绍了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敦煌学”创立的因由，以及“敦煌学”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和意义。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部，是汉武帝夺取匈奴河西后，所建最早四郡之一。它南接青海，西控新疆，是汉唐时代丝绸之路南北二道的分合点，东西方文明荟萃的枢纽和东西交通的咽喉。汉魏之际，西域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很深。因敦煌邻接西域，也深受其影响。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上起北魏，下迄宋元，前后千年左右，成为西陲佛教信仰者的圣地。佛教徒们开挖洞窟，塑造佛像，在洞壁上彩绘佛画，形成了敦煌佛教艺术。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发现了自北魏至北宋的二万多卷写本古书和一些刻本材料，内容包括佛经、道经、四部书（经、史、子、集）、俗文学、文书档案和其它艺术品织绣、版画等；文字种类也很多，除汉文外，还有梵文、藏文、康居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等。敦煌书卷的发现，为我国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和历史资料。但不久即为帝国主义分子所盗劫。1907年英国斯坦因盗劫了一部分。1908年法国伯希和又盗劫了最精华的部分。到1910年，清政府学部才令兰州制台，将劫余的八千多卷运解北京，现藏北京图书馆。所谓“敦煌学”，就是指对敦煌佛教艺术和莫高窟古籍书卷的研究。它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包括我国两千年的文化发展、民族兴衰和东西方文明智慧的交流和传播。它不仅为我国学术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丰富了人类文明。接着，作者就史地、古宗教、社会经济、文学等方面，引用史书记载和敦煌古籍材料，论证了“敦煌

学”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和意义。作者认为敦煌历史材料对史学的研究，在校勘、训诂、补正、辑佚方面，都很有价值。敦煌写本地志材料，不仅有文献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其中有些是有关河西地理的专门著作，对今天建设敦煌，规划治沙，都很有价值，并为研究唐代舆地的重要典籍。在古宗教方面，敦煌是中古时代佛教圣地，莫高窟书卷也以佛教经典为最多。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的统计，佛经占90％以上，道教典籍有六十多种，摩尼教、火祆教、景教材料最少。这对研究我国宗教史，特别是在校勘和辑佚佛经方面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对进一步探索我国唯心论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也有很大作用。在社会经济方面。敦煌社会经济资料，有户籍、名籍、名牒、地亩、契约文书等，其内容包括人口、物价、劳动力、借贷、税赋、土地关系等方面，对研究唐代社会关系和经济生活有很大价值。在文学方面。敦煌文学资料，对我国文学史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曲子词和俗讲变文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曲子词解决了词的起源问题；变文资料是研究有关宋代说话人、话本起源和宋以后白话小说起源的直接资料。敦煌变文不仅有文学史研究上的价值，还保存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文章认为，“敦煌学”象学术的海洋，是学术研究上的无价之宝。随着科学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敦煌学”将愈来愈发挥它的作用。

752　敦煌遗书概述　　　周丕显

（《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2期）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地扼中西交通之咽喉，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集散地和分会点，“是华戎所支一都会”。由此可知其地在中古时期经济、文化繁荣景象。嗣因战争频仍，生产破坏，繁荣于中古时的中西陆路交通为之衰落，极盛一时的国际城市——敦煌，也逐渐荒芜。但由于这里地处干旱的西北高原，却将我国古代的大量文化典籍保存了下来。上世纪末及本世初，帝国主义文化间牒，以“考古”、“探险”为名，进入我国新疆、甘肃及内蒙一带，进行所谓探险及考古发掘。英人斯坦因于1906年窜入敦煌后，在莫高窟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将敦煌石室所藏我国古代大量的古籍文献盗窃而去，轰动了世界学术界，并引起帝国主义的注目。从此各帝国主义国家组织所谓“考古”、“探险”队麇集敦煌，大肆窃掠，使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典籍遭到浩劫。

本文作者对敦煌学颇有研究，对敦煌石室遗书多有论述。本文除全面概述敦煌石室遗书被盗经过及被窃情况外，并将石室遗书，按其内容分儒家典籍、历史学及古地理资料、古文学资料、宗教经典等四部分，并进行了考证研究。这些古文献资料，除大量的汉文书写经典外，还有不少是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粟特文写本，其中不少文字早已湮没无闻，但足以说明在中古时期丝路之上民族之复杂，语言文字之繁多，也说明中古时期敦煌为东西民族和文化荟萃的重要之地。

753　敦煌经卷在中国学术文化上之价值　　　姜亮夫

（《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

本文作者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专家，论著颇多。作者在撰写本文时，中国人民

正处在抗日战争的最艰苦年代。当时参考资料极少，欲想搜求亦极难得，因此，对敦煌经卷在整个文化上的价值，难于作出全面估计。尽管困难多端，但作者终于完成了本文的写作，仍可作为敦煌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参考材料。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上的几次大发现，如殷虚甲骨文书，汉晋西陲木简，无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博，影响之大，都比不上敦煌石室经卷之发现。这是中国史上所发现文献最可靠，最宝贵的一次，也是空前的一次。这些经卷，绝大部分是抄写佛教、道教和西方诸教以及儒家、杂家的经典书籍，同时还有不少变文、诗词、信扎、帐簿、户籍、契约、祭文、祝词、医药方剂，也有图画、图案等。文字方面，除汉文外，有梵文、藏文、回鹘文、窣利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等。作者为了证明敦煌经卷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贡献和价值，将全文分作佛家经典；道家经典；儒家经典；韵书的发现；重要文学史事之发现等五个部分，并作了深入的考证研究。通过本文，使我们得以了解：敦煌经卷所涉及的面最为宽广，最为精深，无论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戏曲、绘画艺术、生活习俗等等，无不有所记载，无不有所涉及，真正是东方学术文化上之伟大宝库。惜遭帝国主义分子的窃掠破坏，仅经卷一项，国内所残存者，估计仅有原藏经卷的三分之一，且精湛完整者，为帝国主义分子盗去，并藏于伦敦、巴黎和苏联等处。如此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如何形成？这和丝绸之路的兴起，各种宗教的东传和中国文化的西渐是分不开的。此为研究丝绸之路者应予注意的问题。

754　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姜伯勤

（《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著，唐长孺教授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全书共收论文17篇，约30万字。本书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最近期间的重要收获之一。在带有国际性的敦煌吐鲁蕃学论坛上，本书的研究方法显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评价了该书在晋唐期间社会结构研究上的新进展；高昌典制源流与若干中原典制方面的新认识；西域形势与四镇问题的新论证；以及古文书研究方法上的新启示等问题。五十至六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对部曲、田客、荫户身份的研究。本书中的有关论文，标志着这项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朱雷《论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一文，首次系统研究了初次发见的六世纪高昌麹朝的私属"作人"。他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创见，即指出高昌私属作人与南朝宋齐的"十夫客"相似。由于作者找出了两种身份的相似性，将会促进今后对此一类型中古依附身份奥秘的进一步揭示。在《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一文中，唐长孺先生对"部曲"和"乐事"两种身份有重要发现。其可贵处，在于它超出了一般籍帐考订的范围。除了透过户籍帐考察了唐朝全套地方行政、土地赋税制度、军事制度在西州的顺利推行外，更深入到唐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初探》一书对高昌麹朝典制渊源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一方面，由此可明了中原政制对高昌地方割据政权的强大影响；另方面，可从中看到上承汉制、下启唐制的十六国北朝典制在吐鲁番地区的演变规律。陈仲安先生的《麹氏高昌时期门下诸部考源》是一部颇见功力的作品。陈文证明，高昌麹朝

官制实际脱胎于高昌郡之地方行政组织。高昌地方王朝在建制上其实是郡制的变动和扩大。《初探》一文通过唐西州时期文书的研究，对唐代典制亦获得了许多新知。如土地制度与水利制度，赋役制度与储粮制度，金融制度，烽燧制度与馆驿制度、军事制度等方面都有新的论证和收获。关于安西四镇的置废问题，一直是唐史研究中的一大公案，唐德宗时人苏冕已对安西四镇的第二次置废情况模糊不清。本书中，黄惠贤《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一文，考证出自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安西四镇恢复到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碎叶蹈落十二年间历史的重要线索。由于吴震、卫江、黄惠贤等专家的考证，四镇第二次罢废事已经基本弄清。由于《初探》作者中不少研究者有长期整理文书的实践经验，因此，本书在古文书研究方法方面，也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从古文书的角度而言，陈国灿《对唐西州都督府勘检天山县主簿高元祯职田案卷的考察》，在旁搜博采、拼合复原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就古文书的研究方法而论，《初探》一书的一些文章具有文献学、古文书学的功力，但却并未只限于文献学的范围。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研究方法上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根据文书的形式、书法、内容、特点进行缀合、断代和分类。第二层次：根据史籍对文书内容、有关典制进行考释。第三层次：融会贯通，透过文书考查社会结构的变动，从沉睡千年的文书中探查历史时代的脉搏。作者在最后指出，《初探》一书中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定会引发更多的讨论。如长期有争论的均田制，以及部曲制、租佃制、差兵制、赋役制、举贷制、义仓制、烽铺制、行水法等研究，正在出现新的进展。汉晋乃至南朝的中原典制对西域的影响，以及丝路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真实情况，正在日益深入的研究中进一步得到再发现。

755　敦煌、新疆古藏文写本述略　　　陈　践

（《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

本世纪初，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先后将敦煌莫高窟庋藏的文书写卷盗运海外，分别收藏于英、法两国。其中藏文写本约有五千余卷。稍后，俄国人马洛夫等也从新疆获得若干吐蕃木牍。解放后，新疆博物馆在婼羌、米兰地区考古发掘也陆续获得一些藏文木简及少量藏文写卷。这些藏文写卷、简牍在敦煌、吐鲁番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仅次于汉文文献。年代约在八、九、十世纪，是研究吐蕃历史、语言、文字、宗教、医药、经济以及西域交通、民族关系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本文介绍了这些藏文写本和简牍的内容、编辑、整理和出版状况。其中社会经济文书数量最多，都是吐蕃统治沙州（今敦煌）、于阗时期的遗物。有诉状、告牒、户籍、赋税逋欠帐册、田亩契约、土地交易契约、寺院财产、购马购牛契约等。官方告牒于文书右下方都盖有方形大印，一般诉状于文书下方盖有私人园形印章或按指印、签名。从中可知，吐蕃占领安西四镇时期（第二次占领为公元755——866年）和占领沙州时期（780——849年）的生产关系不是奴隶制，而是封建制，这必将影响吐蕃本部，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吐蕃时期的社会性质。写卷中的医药文书是十分可贵的医学记录。《藏医杂疗方》涉及各种疾病、症状、体征等共49种，植物性药材、动物性药材、矿物性药材约133种，这些药物绝

大部分属当地所产，其中动物性药材居多。《藏医炙方》中的计量方法常出现，如青稞大小之炙、豌豆大小之炙、羊粪大小之炙等的记载。这些医学文书有力证明，藏医是古代藏族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其中自然也吸收了兄弟民族和邻近国家的医学精华，但并非是由印度古医学演化而来。写卷中的古籍译文有《尚书》、《战国策》的译文残卷，以及经补配而完整的印度古代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其共同特点是生动、易懂、不损害原意，其某些意译方法至今仍值得借鉴。写卷中的社会文书，有助于了解当时吐蕃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及社会风貌和阶级关系。《礼仪问答写卷》以对话形式论述了为人处世、接物待人、君臣、父子、师生、主奴、乃至夫妻之间的关系。《狩猎伤人赔偿律残卷》和《纵犬伤人赔偿律残卷》规定了伤人赔偿命价及盗窃追赔等，其等级差别非常严格。从中不难看出赔偿价律已代替血亲复仇制。还有不少“卜辞”写卷，揭示了吐蕃人早期对凶吉、事物、是非的观念。写卷中的史籍文书，如《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反映了当时吐蕃人同周边其他民族——突厥及霍尔的关系，是研究北方民族史的重要文献。《于阗政教史》记载了于阗信仰佛教时与吐蕃的密切关系，于阗的佛教大师到吐蕃传教，工匠到吐蕃营造建筑。甚至还记载了文成公主的死因，这在汉藏文献中是最早的，该文对研究于阗史和佛教史都很有价值。总之，这些古藏文写卷、简牍，史实确凿，是研究千年前吐蕃社会制度、赞普传承、法律、军事、经济等情况和吐蕃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关系等重要历史问题不可缺少的佐证。由于这些文献均为手写本，在纪年方面难免有个别失误之处，但在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中仍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十二、丝路研究综述

756　王国维与西北史地学　　　钟兴麒

（《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本文简要评价了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的建树，并探讨了他独特的治学方法。王国维在整理西北史地文献工作中，高度重视二十世纪初我国新兴的学说，诸如殷墟甲骨文；敦煌、吐鲁番及和阗的简牍；敦煌千佛洞六朝唐人所书经卷；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遗文等。他写的《流沙坠简序》、《流沙坠简后序》、《敦煌汉简跋》、《罗布淖尔晋简跋》、《尼雅晋简跋》、《罗布淖尔前凉西域长史李伯书稿跋》、《唐李慈艺授勋告身跋》等一系列文章，条理清晰，考释较为准确，许多结论性意见至今仍为学者所沿用。王国维整理西北史地文献，以善本为主，用多种版本互校，以有历史渊源的同类典籍进行比勘，在求真求全的基础上，吸收有关研究成果，为之注疏。这种校勘史料的严谨态度，值得效法。在西北史地学早创时期，王国维除在搜集整理资料工作中做出巨大成绩外，其研究重心是力求通过史料复原历史的原貌。如他撰写的《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说明了于阗、沙州、西藏等地的历史文化联系；《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说明唐初推行的均田制在公元八世纪中期仍在实行之中；《唐李慈艺授勋告身跋》，指出了《旧唐书》的"瀚海军开元中盖嘉运置"的误记，并据此纠错补漏，至为精审准确。特别是他的《西域井渠考》，时至今日仍是人们研究新疆农田水利史乃至世界井渠史的重要论文。王国维在西北地理沿革的考证上，利用出土文物，凭其渊博学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古行记的整理，古都邑、烽燧的考证，道路、河流的识别，古代民族分布的探讨等多方面。他对李志常所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校注，对其中地名、道路多有创获。此外，他还开展了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专题研究。1915年他撰写的《鬼方昆夷猃狁考》，成为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古代西北少数民族族源的学者。他从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匈奴的族源来自鬼方、昆夷、猃狁、纠正了《史记》之误。1927年改定的《鞑靼考》，详细论证了辽、金史所记载的阻卜或阻轐即鞑靼，并把九世纪后期到十三世纪初三百数十年间鞑靼史及活动情况列表说明，为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线索。他对突厥回鹘族也研究有素，为史学界研究回鹘史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治学方法，陈寅恪总结为三条：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少数民族的故书与汉文的旧籍互相补证；三是取西方学术观点与故有的材料互相参证。这是他综合运用实证方法，由博反约，因疑而得信的治学之道。

757　斯坦因和我国西北史地研究　　　杨建新

（《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本文评述了匈牙利考古学家马克·阿弗勒尔·斯坦因(1862—1943年)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四次考察。第一次是1900年5月至1901年4月，主要考察了新疆南部的塔克拉玛干

沙漠。第二次考察是1906年4月到1908年11月，除新疆外，还到了甘肃河西及内藏古额济纳旗等地。第三次是1913年到1916年，主要考察了塔里木盆地南北和河西南北山。第四次是1930年至1931年，因当时新疆和西北地区政局紊乱，收获不大。本文评述的，是斯坦因前三次考察活动的一些主要方面。评述共分四个部分：一、帕米尔古道探索。这里是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以及印度进行交往的通道，即丝绸之道的通道。斯坦因考察了这里的三条主要通道，特别是我国北魏时的宋云，唐代和尚玄奘，安西都护高仙芝走过的瓦罕河谷通道。对高仙芝率领一万大军，经帕米尔南部讨伐吐蕃的进军路线、地名，进行了实际考察，给予高度评价，得出明确结论。二、探查埋藏在沙漠中的瑰宝。主要评述了斯坦因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尼雅遗址、米兰遗址以及楼兰遗址等进行的考察和发掘。在丹丹乌里克遗址，斯坦因发现了当地人民把老鼠奉为保护神和养蚕缫丝业传入和阗传说的版画。在尼雅遗址，他发现了大量写有佉卢文的木片和羊皮、汉文木简、武器、毛织物、丝织品、家具，以及中国古代的信件，并判定这个遗址就是《汉书》中所说的精绝国的政治中心。在米兰遗址，斯坦因清理了一所小佛寺，发现了一些藏文佛经残本、一块汉文碑和不少西晋时期的佉卢文木牍。在楼兰遗址，他发现了许多古代佉卢文书、汉文文书、木简、丝绸、毛织等遗物和楼兰遗址四周的城墙，及一处墓葬群中的铜镜、木制兵器模型、家具、汉文文书、彩绢、花毡、丝缣、堆线毡、粗制毛织物等。他在这四个遗址中，还发现有大量其他文字，其中有古和阗文、佉卢文、古突厥文、古藏文和粟特文。这些遗址中出土的大量佛教塑像、壁画和雕刻，其风格、构图、色调及用笔等，受希腊艺术影响很深，有些壁画的人物就直接来源于希腊神话。它们都属于健陀罗式美术。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发现和获得的文物，都是我国的稀世珍宝，对研究我国新疆历史和东西文化交流，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三、探查楼兰古道和汉代长城。在这里，他找到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痕迹，考察了汉武帝时代四次修筑的一条"丁"字形的长城，即从罗布泊经酒泉到令居（今甘肃永登），又从居延海到酒泉的长城。在长城沿线发现有驿站、粮食仓库等遗址，并在长城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粟特文文书和书信。四、藏经洞骗宝。斯坦因于1907年3月到达敦煌千佛洞，参观、欣赏了石窟中的壁画和塑像，并通过主持这里香火的道士王元箓，翻阅了藏经洞中的文书和画卷。并骗取文书三千卷，其他单页和残篇六千多篇，从画卷中挑选了五百幅，共装了二十九箱，运回英国。本文对斯坦因的考察活动和成果及其著作的评述，全面而周密，是研究丝绸之路的一篇重要资料。

758 斯坦因对东方学研究的贡献 王冀青

——他关于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的研究论著与考察报告详目

（《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

本文简要地介绍了斯坦因的生平事迹和他关于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的研究论著与考察报告的详细目录。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是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1862年11月26日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在奥地利的维也那大学、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和土宾

根大学专攻东方学，1883年获土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84年至1886年官费去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攻读，专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1887年去印度工作，任旁遮普大学学生注册主管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1900年至1901年进行第一次中亚探险。1904年加入英国籍。1906年至1908年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1910年至1929年任印度考古局局长。1912年被英国封为爵士。1913年至1916年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1930年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1943年当他八十一岁高龄时，准备对阿富汗进行全面考察，于同年10月26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去世。斯坦因在中亚探险过程中，从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发掘出并劫走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最主要的有：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的一万余卷古文书和数百幅绢画、刺绣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古文书；新疆和田、米兰诸遗址出土的古代壁画、泥塑、木雕作品等等。他的许多发现、学说和著作都证明了古代中国文化在中亚地区的深远影响。斯坦因从二十四岁起发表论著，到一九四三年去世之前，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专著和考察报告，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其中大部分仍具有参考价值，国外学术界至今仍在引用。本文按这些论著的发表或写作时间顺序，排列了目录，并注明发表或出版时间，登载的刊物名称、出版的单位，以及简要介绍，共四十三篇。因这些论著绝大部分都涉及到丝绸之路，故为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材料。

759 斯坦因所考见之中西交通 周谷城

（《历史社会季刊》1947年第1卷第2期）

斯坦因考古旅行至亚洲中部及中国西北部凡三次，行程二万五千英里。斯坦因所考见的为古代中西交通的路线；古代中西贸易往还情形；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汇合之大势等。尤其古代中国、印度、希腊三方文化在亚洲中部汇合情形，以遗物作证，得出令人可信之结果。关于古代中西交通道路，《汉书·张骞传》曾有记载；同时，西方人也有关于古代中西陆路通商要道的记载，如公元二世纪西方地理学家拖勒米，在他的著作中就有中西陆路通商要道问题，有些虽来源可靠，记载详细，但未得到实地考察证实之前，只是一种记载而已。斯坦因的功绩，在于实地考察后而予以证实。如葱岭上之阿来谷，经过考察，确知往昔中西陆路都要经过这个谷的。这个谷在拖勒米叙述中西通商要道时，有一大段涉及一个名为Komedoi的山国，这个山国的地位，裕尔爵士定为阿来谷所在地Karategin。玄奘也曾用一个名词曰"Chümito"（《大唐西域记》云：拘弥陁国，……据大葱岭中）名这同一之地。经斯坦因考证，此地确为中西通商要道，与历史所记，无不符合。经斯坦因考察了中西通商要道最难一段，已经证实并找到，因此，丝绸之路全线就可以确定了。作者在本文中，还对斯坦因其他考察贡献，如中国丝销售于西方的时代，销售的地方及产丝的中心地，都作了介绍。特别在文化交流方面，认为中国新疆及其附近之地，西至妫水河，东至中国本部，许多地方今虽为废墟，然在历史上却表现了极重要的作用。许多世纪，曾为印度、中国及希腊三方文化的交汇之所，为历史上的重要舞台，远东文化，印度文化及西洋文化交织于其间者，足有千年之久。故本文对斯坦因于中西交通之史的发见，表现了极大兴趣。

760　读《西域文明史概况》之笔记　　　　赵滚波

（《和平日报》1947年11月28日）

本文系作者读了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况》一书后之笔记。作者在文中就西域之形势（按汉唐时的西域范围，包括葱岭以西之广大地区，本文所述西域，专指今日新疆而言）；中西交通；西域人种；西域的宗教；佛教美术；西域之汉文明；汉人对西域之经营；回鹘部族转往西域；回鹘时代之西域文明等各方面，进行了阐述。但其重点在于阐明西域之文化。举凡西域人种之来源，西域语言文字之形成，宗教之传入及其佛教艺术等，叙述较详。作者认为，自汉以来，历代对西域之关系虽为密切，但因其地理和民族原因，汉文明对西域之影响，比西方文明对西域之影响较少。同时汉人向以属从对待西域，一切政治采取自理政策。汉人在西域的目的是防止北方民族之侵占，保护中原与葱岭以西之交通，并不夺取直接的统治，通过政治自理而与汉人保持从属关系，故汉人在文化上的影响不够深广。唐代在西域有相当发展，东西文化稍有融合，后因回教进入西域，其他文化大遭破坏，回教文化遂统治了此地。

761　日本的"丝绸之路热"　　　　童　斌

（《世界历史》1979年第6期）

随着中日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发展，了解和研究中国的空气在日本越来越浓，出现了研究丝绸之路的热潮。本文较为全面详细地介绍了这一热潮的情况。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出现过三次"丝绸之路"的热潮，这一次是第四次。第一次是1930年至1931年间，当时曾大量翻译出版了有关中亚细亚的旅行记。第二次是1955年前后，日本的学术考查队到阿富汗和伊朗进行考察。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火炬从雅典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东京。井上靖以西域为背景的小说问世，新闻电视也大肆宣传丝绸之路。第三次是六十年代。日本很多学者、作家、画家、摄影师和旅行者到阿富汗和西亚旅行，有关"丝绸之路"的书籍随即大量涌现。这次"丝绸之路热"有一个特点，就是总结检查了"丝绸之路"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即日本的"丝绸之路"观有了变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就是间野英二。他主张研究中亚史要和"丝绸之路史观"决裂，不能把中亚看成东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而忽视南北关系。他认为中亚民族的兴亡是由其本身内在的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东西方的交流和贸易来决定的。因而有的学者把他的这种主张称为"脱丝绸之路论"。他的论点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反驳。但学者们都认为，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早稻田大学教授长泽和俊在题为《东西文化交流与丝绸之路》一文中，把丝绸之路的主要作用归纳为三点：是欧、亚大陆的动脉，世界史发展的主轴；是世界文明的孕育地；是东西文明的桥梁。金泽大学教授佐口透在《近代的丝绸之路》一文中，主张研究丝绸之路历史，要注意交通道路，东西交通路上的遗迹，民族移动、战争、商业活动、文化的创造与传播问题，以及丝绸之路沿途土著民族的社会情况。文章还介绍了这次"丝绸之路热"的具体表现：如举办展

览、出版书刊、广播电视宣传，开办和扩大“丝绸之路”的旅游业务，很多作家和画家创作有关书籍和绘画、撰写学术著作、介绍文物资料等。

762 丝绸之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日）长泽和俊著 冯佐哲译

（《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5期）

本文对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研究的发展和现状，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进一步开展丝路学的研究，不无参考作用。丝绸之路，即指远古以来，从东亚开始，经中亚、西亚进而连接欧洲及北非的这条东西方交通路线的总称。给这条道路命名的是德人李希霍芬，他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间地区（即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叫作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Silk road）是英文译名。但是，随着东西方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德国东洋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把李希霍芬所谓的从中国到河间地域进而又扩大到遥远西方的叙利亚。作者认为，丝绸之路所以都被各方面重视，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丝绸之路作为亚非两洲的动脉，是世界史展开的主轴；二、丝绸之路是世界上主要文化的发源地；三、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在日本，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从东方史的塞外史研究开始的。初期的研究，对地名和民族的考证较多。对东西方关系史关心的高涨，是在史学会编辑的《东西方关系史论》于1939年（昭和十四年）出版后出现的。1944年（昭和十九年）发行了赫尔曼著作的日译本《古代丝路》，是日本用假名注出“丝绸之路”最早的一本书。同年末，出版了斯文赫定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纪行而以《丝绸之路》为名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人的研究中断，但到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日本人首次出现在丝绸之路的西部。他们的旅行记，引起人们对丝绸之路的极大关心。接着在东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将火炬从希腊通过丝绸之路传送至东京，于是“丝绸之路”一名便脍炙人口了。另方面，在东方史学界，从1955年到1965年间，相继出版了有关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交流的专著和一般概论。在日本，五十年代（昭和三十年代）是研究丝绸之路启蒙时期。到六十年代（昭和四十年代），以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为核心的海外学术考察日益活跃，许多研究人员以及普通人也陆续到西亚、印度等地去旅行，这可说是丝绸之路的大众化时代。到昭和四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丝绸之路热。从昭和四十年代后半期到五十年代直至今天，各方面的专家都积极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可说是专门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丝绸之路原是向西方运送丝绸的道路，近年研究的结果，除了经中亚的沙漠绿洲路以外，还另有通过北亚的草原路，以及从南亚迂回的南海路。根据过去的研究成果来推测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体系时，作者认为可能在古代通过草原路的东西方关系的比重极大，而近代以后，则是以南海路为主要发展东西方关系的，即丝绸之路的古代史，是以草原路为中心；从古代到中世纪是以沙漠绿洲路为中心；近代以后是以南海路为中心。东西方关系史本来不只是限于中亚、西亚地区的学问。应该用严谨的考证来展望整个伟大的人类历史，从世界史的角度来建立丝绸之路历史的体系，应该是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763　法国对中国西域的研究　　　耿　升

（《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本文详细介绍了法国研究西域学者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以及研究西域的有关机构和刊物。法国学者对中国西域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历代中国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大都是以对西域的研究而名燥一时。他们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受到世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文章介绍的学者二十六人，他们是：宋君荣（1689—1759）、钱德明（1718—1745）、德经（1721—1800）、雷慕沙（1788—1832）、儒莲（1797—1873）、德理文（1822—1892）、沙畹(1865—1918)、马伯乐(1883—1945)、伯希和（1878—1945）、列维（1863—1936）、高狄奥（1876—1915）、费瑯（？—1934）、格鲁塞（1885—1952）、韩百诗（1906—1978）、巴科（1877—1967），戴密微（1894—1979）、哈密屯、莫尼克·玛雅尔（女）、石泰安、布尔努瓦、勒内·吉罗（1906—1968）、哈马荣夫人（女）、路易·巴赞、阿里·玛扎海里、里夏尔。文章介绍了这些人的学术活动简况和著作，还特别较详细地介绍了伯希和的论著和对西域的考察。关于法国研究西域的机构和刊物计有：法兰西学院高等中国研究所，它出版了一套《高等中国研究所丛书》；法兰西学院的亚洲研究所高地亚洲研究中心、法国亚细亚学会，它出版期刊《亚细亚学报》；法兰西远东学院，它出版《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和一套《法兰西远东学院丛刊》；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它出版一套《东方高等研究丛书》；巴黎第三大学突厥学研究所，它出版期刊《突厥学报》；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它出版一套《敦煌学论文集》；吉美博物馆，出版期刊《亚洲艺术》；巴黎国立图书馆，正陆续出版一套《伯希和中亚探险团丛书》；法国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由法国和荷兰主办，于1890年创刊的《通报》，1926年更名为《国际中国学期刊》，发表过大量有关西域的论文。此外，赛尔努希博物馆、巴黎的其它几所大学中也从事西域研究，但较为零散。本文对法国研究西域的学者、著作、机构和刊物介绍得比较全面细致，从中可鸟瞰这方面的情况和成果，为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一幅简明的参考文献目录。

764　科兹洛夫与哈拉浩特文化　　　马曼丽

（《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本文着重介绍了俄国旅行家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1863——1935年)考察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哈拉浩特古城遗址的情况和成就。科兹洛夫是世界著名的旅行家，从二十岁起便开始了探险生涯。在五十二年的科学活动中，他曾参加过六次对中央亚细亚的大规模探险考察活动，足迹遍及我国内蒙、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四川等地，对哈拉浩特考察的成就，使他获得了广泛的世界声誉。在1895年到1941年的四十六年中，出版了他的六十二种专著和论文，为研究中央亚细亚的地理、历史等方面留下了相当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科兹洛夫在我国考察的最大收获和成绩，是在哈拉浩特古城遗址取得的。这个遗址位于额济纳河东支流坤都仑河东侧，曾是西夏时期的黑山威福军司的驻地。从1907年到1926年，科兹洛夫曾三次到这里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挖掘出举世闻名

的西夏文刊本数千种，其编号达8000号，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佛经。此外，还有不少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叙利亚文、女真文、蒙古文等书籍和文稿，以及各种佛像、绘画等文物不计其数。这些文物是研究我国西夏和元朝历史的珍贵材料。特别是西夏文物的发现，使西夏历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给识读西夏文提供了重要工具。本文对科兹洛夫的生平和事迹，对他考察发掘哈拉浩特遗址的情况和收获论述具体而详细，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还论述了继科兹洛夫之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和中国学者黄文弼所组织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额济纳河流域汉代居延遗址的情况。居延地区是古代漠北少数民族进入河西等地的一个主要通道。他们在毛目（今甘肃金塔县鼎新）之北，沿额济纳河发现了三十八处古遗址，其中属于汉代的达三十二处。特别是在哈拉浩特以西二十公里处的破城子里，发掘汉简五千余枚，并确认这里是汉代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寨候长的官衙。此后又在额济纳河中游汉代居延肩水金关遗址等地发掘出许多汉简，总共达一万多枚。这些遗址就是著名的居延遗址。它包括了古代居延海、居延城和遮虏障三个部分。哈拉浩特的一系列探险活动，打开了我国历史和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宝库，对我国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对研究丝绸之路也是不可缺少的参考材料。

本书主题索引

（依汉字笔画笔形排列．一般带短横“一”者顺读，带逗号“，”者逆读．标题之后数字为文献顺序号．）

二　画

人口一西域一西汉……022
　一凉州一历史……011
　一敦煌一历史……013
人口迁移一西北地区一汉代……027
　　一高车一北魏……054
人口构成一军屯一汉代……029
九姓乌古斯一民族起源……497，498

三　画

于阗一历史……733
　一古城遗址……219
　　一媲摩城一坎城……220
　一佛教史一古文书……512
　一尉迟王一世系……149
于阗文一文献一新疆……554
于阗国一王朝一谱系……150
　一历史……130
　一史料一古代……131，132
　一政权，与喀喇汗王朝关系……151
于阗语一新疆……546
土族一民族起源……448
大月氏一民族迁徙……430，491
大月氏一民族起源……430
大月氏一贵霜帝国一世系……492
大宛一浩罕一疆域……278
山丹一水利一五代十国时期……204
乞伏氏一民族起源……434
小月氏一民族一分布……431
弓月城一古城遗址……262，263
马可波罗一游记一元代……650，651，625
马球戏一传入一长安一唐代……616

四　画

文化一河西一五胡十六国时期……373
文化史一新疆……376、377
文化交流一元代一汉族，与西北地区
　　各民族……353
　一历史一古代……332
　一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358
　　，与世界各国……363、364
　　，与印度……404、405、406
　　，与尼泊尔……407
　一少数民族一元代……354
　一汉代……296
　　一西域……371
　　　，与中原……370
　一汉族，与维吾尔族……355
　一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365
　一西北地区一民族，与汉族……353
　一西域一唐代……371
　一阿塞拜疆，与中国……359
　一唐代一中原，与西域……374
　一晋代一西域，与中原……370
　一隋代一中原，与西域……374
　一维吾尔族，与汉族……355
　　，与蒙古族……375
　一新疆一汉代……343
　一蒙古族，与维吾尔族……375
文化教育一凉州一五胡十六国时期……372
火祆教一传入一中国一历史……520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521
火药一蒙古，西征时使用……416

—输入—欧洲 ……………………………414
—输出—中国 ……………………042,415
丰尼雅遗址—考古—新疆 ……………………221
天文学—历史—七曜历 ……………………425
天主教—碑刻—扬州 ……………………………717
天可汗—唐代 ……………………………………084
艺术—中国，对伊斯兰教艺术的影响 ………422
木简—佉卢文 …………………………222,223
支那—古代语言 ………………………049,050
—国号 ……………………………049,050
历史—中国，与伊朗比较 ………………………117
历史人物—马可波罗—元代 …649,650,651,652
—王玄策—唐代 ……………………………636
—王国维—近代 ……………………………756
—王延德—宋代 ………………351,646
—奘玄—唐代 …324,325,659,660,661
662,663,664,665
—冯嫽—西汉 ………………………624,625
—甘英—汉代 ………………………………623
—刘细君—西汉 ……………………624,625
—刘萨诃—东晋 ……………………………736
—刘解忧—西汉 ……………………624,625
—成吉思汗—元代 …………………111,375
—吕光—后凉 ………………………………634
—宋云—北魏 ……………………656,657,658
—苏祇婆—南北朝时期 …572,666,667
—李世民—唐代 ……………………………079
—李暹—明代 ………………………………648
—鸠摩罗什—五胡十六国
时期………………………………… 653,654
—张义潮—唐代 ……………………………637
—张骞—汉代…040,287,380,401,620
621,622,623
—阿史那忠—唐代 …………………………641
—阿波可汗—突厥 ………………141,147
—阿维森纳—北宋 …………………………645
—法显—东晋 ………………………………655
—沮渠蒙逊—北凉 …………………………123
—泥利可汗—突厥 …………………………147
—郑吉—西汉 ………………………………019
—耶律大石—西辽 …………………………177
—耶律楚材—元代 …………………………647
—契苾何力—唐代 …………………………642
—科兹洛夫—苏联 …………………………764
—段会宗—汉代 ……………………………626
—段善本—唐代 ……………………………668
—高居诲—五代十国时期 …………………644
—郭元振—唐代 ……………………………643
—康昆仑—唐代 ………………………668,669
—班勇—汉代 …………………………630,631
—班超—汉代 ………627,628,629,630
—曹元德—五代十国时期 …………………164
—曹仲达—北齐 ……………………………670
—斯坦因—匈牙利 ………757,758,759
—塔塔统阿 …………………………………375
—裴矩—隋代 ………………………………635
车师—战争—汉代 …………………………025
车师后部—历史 ……………………………133
车师族—历史 ………………………………469
屯田—丝绸之路—西汉 ……………………030
—西北地区—汉代 …………………………027
—西域—汉代 …………………………025,026
—河西—西汉 ………………………………005
—敦煌—西汉 ………………………………028
—瓦剌—部族—西域—明代 ………………089
中印交通—道路—吐蕃—唐代 ……………322
—历史 ………………………………………321
中外关系—历史 ……………………………091
—中国，与中亚各国 …………093,095
，与巴基斯坦 ………………………098
，与印度 ………………………097,636
，与伊朗 ………………………099,100
，与阿拉伯 …102,103,104,105、
106
，与阿曼 ……………………………107
，与拜占廷帝国 ……………………096
，与非洲、亚洲各国 ………………094
，与罗马帝国 ………………632,633
，与贵霜帝国 ………………………109
，与埃及 ……………………………110
，与斯里兰卡 ………………………108
—唐代 ………………………………………081
中亚—历史 ……………………113,114,115
—成吉思汗 …………………………………111

—历史地名—文献 ……………268、269、270
—汗国—历史 ……………085
—经济史 ……………356
中西交通—马可波罗—元代 ……………652
—历史 ……………633
—斯坦因 ……………759
中国—古代—史料，在阿拉伯、波斯文献中…116
中国文化，与少数民族 ……………366
中原—石器时代，与新疆关系 ……………073
—关系史，与新疆 ……………672
—西汉，与西域关系 ……………074
—先秦，与新疆关系 ……………073
—唐代，与新疆关系 ……………080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塔里木盆地关系…078
公验—唐代 ……………047
月氏—民族—汉代 ……………426、429
—先秦 ……………426、429
乌弋山离国—历史—历史地理 ……………272
乌孙—民族—汉代 ……………024、426、429、458
—先秦 ……………426、429
—民族史 ……………457
—民族聚居区—汉代 ……………460
—和亲制度—西汉 ……………043
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元代 ……………354
—甘肃—汉代 ……………426
—先秦 ……………426
—河西四郡—先秦 ……………429
—政策—唐代 ……………079
—贸易经济—元代 ……………354
水利工程—坎儿井 ……………385、386、387
水经注—法显传 ……………210

五 画

《汉书·西域传》—研究 …………… 128
汉武帝—大宛—战争 ……………053
—匈奴—战争 ……………052
汉族—文化—西辽时期，对中亚的影响 ……419
玉门关—历史地理—西汉 ……………196
—古城遗址 ……………197、198、199
玉门县—古城遗址 ……………199
古文书档案—吐鲁番—唐代 ……………068
—佉卢文 ……………560
—藏文 ……………755
古文字—佉卢文—新疆 ……………222、223
古代语言—中亚 ……………115
—古文字—新疆 ……………545
古印—匈奴—民族史 ……………724
古佚书—《三国志》 ……………702
—《本草集注》 ……………403
—《论语郑氏注》 ……………703、704、705
古钱—考古—广州 ……………718
—西宁 ……………709
—吐鲁番 ……………710
—扬州 ……………717
—龟兹 ……………707
—河北省 ……………711、716
—陕西省 ……………713、714、715
—综述 ……………712
—新疆 ……………719
—喀喇汗王朝 ……………173
节度使 ……………066
—古文书档案—敦煌 ……………066
—吐鲁番 ……………038
—北庭 ……………038
—北庭都护府 ……………038
—西州 ……………038
—伊吾 ……………038
可汗浮图城—古城遗址 ……………265
石窟—甘肃—陇东地区 ……………698
—艺术—历史 ……………388
—壁画—荷花 ……………392
—新疆 ……………699
，麦积山—历史 ……………696、697
，克孜尔—新疆 ……………391、700、701
，炳灵寺 ……………519
，敦煌 ……………735
—文化 ……………727、728
—文化交流，与印度的阿旃陀 …739
—古佚书—历史地理 ……………211
—艺术—历史 ……………730、731、732
—刘萨诃 ……………736
—塑像 ……………737

—壁画—历史，资料价值……734
—民族—文化交流……740
—佛经……738
—故事……741、742
—变文……743
—音乐—舞蹈—唐代……745、746
—舞蹈—艺术……747
，榆林……735
石刻艺术—新疆……695
东方学—研究—斯坦因……758
东罗马帝国—历史……192
—历史地理……274
卢水胡—民族—汉代……435
—民族迁徙……436
—民族起源……436
北凉—文化……373
—河西，与西域关系……076
—沮渠蒙逊—历史……123
北庭—古城遗址……254、255、256
北庭都护府—历史……254、256
出土文物—亚洲—斯坦因……671
—新疆—调查报告…674、676、720、721
令居塞—历史地理……194
瓜州—曹氏—家谱……638、639
瓜果—西域，与中原农作物交流……384
外交使节—拜占庭帝国—唐代……042
外交政策—西汉—王朝……624、625
外国音乐—输出—中国，汉代、唐代……568
氐—民族—汉代……426
—先秦……426
—民族史……634
印刷术—历史……400
印度—外交关系—唐代，与中国……636
印染工艺—唐代……689
乐器—火不思……609
—筚篥—龟兹……607
，民族—古代……606
乐舞—中原—文化交流，与西域……564
—民族—两晋时期……567
—唐代……598
—新疆—先秦……566
，敦煌—历史……744
尼雅俗语，与吐火罗语关系……552
民族—土族……448
—大月氏……430、491
—乞伏氏……434
—小月氏……431
—月氏……426、429
—乌孙……024、426、428、429、457、458、460
—卢水胡……435、436
—氐……426、634
—吐火罗……189、496
—吐谷浑……446、447、448
—吐蕃……031
—回族……489、490、502、542
—回鹘… 154、155、163、165、166、349、439、440、441、442、468、469、470、471、472、474、475、476、496、497、518、723
—杂种胡……452
—匈奴……429
—羌……426、432、433
—郁夷……430
—突厥……463、465、467、499
—柯尔克孜……500、501
—柘羯……452
—哌达……183、495
—裕固族……475、476
—尉迟氏……431
—维吾尔族…477、478、480、481、482、483、485、486、487、488
—塞人……456
—塔吉克……455
—葛逻禄……466
—粟特……323、496
—喀喇汗王朝……172
—鲜卑……445
民族文化—唐代—中国，与亚洲……418
民族史—乌孙—汉代……024
民族关系—乌孙，与西汉王朝……461
—古代—中原，与北方……449
—北方，与中原……449
—回鹘，与突厥……479
—突厥，与回鹘……479

，与铁勒 ……………………473
—唐代—中原，与北方 ……………451
—铁勒，与突厥 ……………………473
—隋代—北方，与中原 ……………451
—新疆—少数民族，与汉族 ………454
民族迁徙—大月氏 ………………………430、491
—吐谷浑 ………………………………446
—回鹘 ……………………154、155、470
—匈奴 …………………………493、494
—郁夷 …………………………………430
—突厥 …………………………………465
—鲜卑 …………………………………445
民族政策—唐太宗 ……………………………464
丝织品—出土文物 …679、680、681、682、684、685
686
丝绸—纺织工艺—新疆，由内地传入 …378、379
—输入—印度 ……………………………329
—欧洲 ……………………………330
—输出—中国 ……………………329，417
丝绸贸易—中国 ………………………………328
—汉代 ………………………………333
，与东罗马帝国 …………331
—西州—唐代 ………………………344
丝绸之路—文化 ………………………………367
—文化交流 …………………………369
—屯田—西汉 ………………………030
—历史 …………………………280、286
—辽代 ………………………039
—隋代 ………………………033
—中亚—艺术 ………………………420
—汉代 ………………………………288
—史料，在龙门石窟中 ……………319
—民族—经济史 ……………………327
—交通—历史 ……………292、293、294
—汉代 ……………317、318、629
—东晋 ………………………655
—北魏 ………………………657
—先秦 ………………………285
—唐代 ………………317、318
—粟特人 ……………………323
—新疆 ………………………675
—考察报告 …………………………295
—明代 …………………………………087
—音乐 …………………………………563
—研究—日本 ……………………761、762
—道路 …………………………283、299
—于阗 ……………………………315
—大碛路 …………………………313
—汉代 ……………………………316
—宁夏 ……………………………309
—甘肃 ……………………300、301
—祁连山—汉代 …………………297
—西宁 ……………………………307
—河西—西夏 ……………………302
—羌中道 …………………304、305
—青海 ……………………303、306
—居延 ……………………………298
—草原 ……………………………308
—南道—帕米尔 …………………312
，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365

六　画

安西四镇—历史 ……………………………………240
—历史地理 ……………………………240
—唐代 …………………………………059
安西都护府 ……………………………034、037
—西州—建置 …………………………036
—唐代 …………………………………035
安息国—历史 ……………………………………272
—历史地理 ……………………………272
交通—中国，与亚洲 ……………………………362
—西域—汉代 …………………………371
—张骞 …………………………287
—唐代 …………………………371
交通史—西北地区 ………………………………281
—西域 …………………………282、283
军屯—人口构成—汉代 …………………………029
—河西—汉代 …………………………029
军事史—西域—汉代 ……………………020、021
—晋代 …………………………021
军事行政—吐蕃—唐代 …………………………031
军事组织机构—西辽 ……………………………069
农作物交流—西域，与中原 ……………………384
考古—吐鲁番—调查报告 ………………………683

—萨珊王朝—文物 ……………………708
—新疆 ……………………691、692
—考察报告 ……………………673
西北史地学—研究—王国维 ……………………756
—斯坦因 ……………………757
西北地区—人口迁移—汉代 ……………………027
—屯田—汉代 ……………………027
—历史 ……………………112
西辽—王朝—历史 ……………………176、179
—迁徙 ……………………176、177
—政治 ……………………175
—疆域 ……………………178
西亚—历史 ……………………092
西征—成吉思汗，对中亚 ……………………111
西凉—河西，与西域 ……………………076
西凉乐 ……………………579、580、581、582
西凉伎—唐代 ……………………613
西夏—河西—历史 ……………………120
—经济史 ……………………352
西域 ……………………118
—人口—西汉 ……………………022
—文明史 ……………………760
—屯田—汉代 ……………………025、026
—历史地名 ……………………208、325、326
—历史地理 ……………………124、126、207、325、326
—汉代—武帝 ……………………040
，与河西关系 ……………………075
—古代地名—考证 ……………………212、213
—交通—汉代 ……………………287、289、296、371
—春秋战国 ……………………284
—唐代 ……………………371
—交通史 ……………………283、283
—军事史—汉代 ……………………020、021
—晋代 ……………………021
—西汉，与中原关系 ……………………074
—行政主权—魏晋南北朝时期 ……………………076
—佛教史 ……………………503、504、507
—明代 ……………………086
，与蒙古关系 ……………………087
—国家—历史地理—五胡十六国时期…209
—经济—汉代 ……………………016、022
—音乐—唐代 ……………………576
—音乐史，隋唐时期 ……………………569
—政治—汉代 ……………………016
—研究，法国 ……………………763
—南道—历史地理 ……………………311
—游记 ……………………124
—道路—历史 ……………………290
—汉代 ……………………291
—概况—唐代 ……………………214
—疆域—西汉 ……………………018
西域史 ……………………620、621、622、623
—汉代 ……017、023、626、627、628、630
—北魏 ……………………023、077
—唐代 ……………………034
西域都护府—历史—汉代 ……………………019
百戏—西域 ……………………610
—象舞 ……………………612
过所—唐代 ……………………047、048
吐火罗—民族 ……………………496
吐火罗文—文献—新疆 ……………………553
吐火罗国—历史 ……………………188、189、190
—民族—疆域 ……………………189
吐火罗语 ……………………548、549、550、551
，与尼雅俗语关系 ……………………552
吐谷浑—历史地理 ……………………206
—古城遗址—伏俟城 ……………………205
—民族关系，与土族 ……………………448
，与吐蕃 ……………………447
，与唐王朝 ……………………447
—民族起源 ……………………446
—民族迁徙 ……………………446
—朝贡贸易 ……………………041
吐鲁番—古文书档案—年号 ……………………134
吐蕃—民族关系，在统治敦煌时期 ……………………437
—军事行政—唐代 ……………………031
—河西 ……………………119
—政治，对新疆的影响 ……………………167
，在敦煌统治时期 ……………………169
回纥—汗国—历史 ……………………152
回族—民族起源 ……………………489、490
—政治—元代 ……………………502
回教—历史 ……………………542
回鹘—北庭—战争 ……………………067

—民族—五代十国时期 ……………………471
—丝绸之路 ……………………349
—唐代 ……………………471
—敦煌 ……………………165
—民族史 ……………………468、496、723
—民族迁徙 ……………………154、155、470
—汗国—国际贸易 ……………………340
，与唐王朝关系 ……………………153
—佛教—传播 ……………………517
—和亲制度—唐代 ……………………046
—政权—历史 ……………………468
—喀喇汗王朝 ……………………155
，十姓—民族起源 ……………………497
，甘州—五代十国时期 ……………………164
—民族—世系 ……………………441
—民族史 ……………………440
—民族关系，与西州回鹘 ……………………442
—民族迁徙 ……………………442
，西州—历史 ……………………488
—民族关系，与甘州回鹘 ……………………442
，龟兹—民族起源 ……………………475、476
，河西—民族史 ……………………439
—国家形成 ……………………162
，在敦煌古文书中 ……………………163
，高昌—王朝—历史 ……………………160、161
—民族 ……………………469
—世系 ……………………472
—佛教 ……………………518
，葱岭西—历史 ……………………474
，新复州 ……………………166
回鹘文 ……………………555
—文字起源 ……………………556
伏俟城—古城遗址 ……………………205
伊州乐—西凉乐 ……………………579
伊吾—战争—汉代 ……………………025
伊斯兰教—怛逻斯战役—文献 ……………………536
—新疆—历史 ……………………537、538、539、540
541
伊犁—古城遗址 ……………………677
—经济—西汉 ……………………024
后凉—河西，与西域 ……………………076
—政权—氐 ……………………634
行政主权—西域—魏晋南北朝时期 ……………………076
杂技—西域 ……………………611
杂种胡—民族史—唐代 ……………………452
危须国—古城遗址 ……………………230
匈奴—民族—汉代 ……………………429
—先秦 ……………………429
—河西走廊 ……………………428
—民族迁徙—欧洲 ……………………493、494
色料—输入—中国—汉代 ……………………424
阳关—古城遗址 ……………………197

七　画

泛龙舟—曲谱 ……………………591
沙州—驿户起义—唐代 ……………………065
库车—文化遗址 ……………………233
—古城遗址 ……………………233
—佛教—文化遗址 ……………………514
—佛像—藏文—题刻 ……………………515
坎儿井—新疆 ……………………385、386、387
坎城—古城遗址 ……………………220
医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 ……………………409、413
，与印度交流 ……………………408
，与阿拉伯交流 ……………………411、412
—输入—中国—宋代 ……………………410
折摩驮那国—古城遗址 ……………………335
别失八里—历史地理 ……………………260、261
佉卢文—鄯善 ……………………516
佛教—玄奘—唐代 ……………………659、660、661、664、665
—传入—中国—历史 ……………………506
—传播，在突厥 ……………………517
—经典—翻译—玄奘 ……………………664
—鸠摩罗什 ……………………653
—哲学—发展，在汉代，唐代 ……………………509
—僧侣—六朝时期 ……………………510
—新疆 ……………………511
佛教史—中国 ……………………505、508
条支—历史地理 ……………………271、273、274、275
龟兹—古文字 ……………………553
—古城遗址 ……………………234
—佛教—石窟 ……………………513
—音乐—苏祗婆 ……………………572
—舞蹈 ……………………599

—壁画—技法 ……………………………389
龟兹乐 ……………………………………583
　　—木卡姆 ……………………585、586
　　，对民族音乐的影响 ……………584
龟兹乐舞 …………………………………587
龟兹语—新疆 ……………………………546
张仪潮起义—唐代 ………………063、064
阿里麻里—古城遗址—元代 ……262、264
阿旃陀—印度—文化交流，与敦煌石窟 ……739
纺织工艺—输出—中国 …………………417
纳缚波国—古城遗址 ……………………235

八　画

河西 ………………………………………118
　—屯田—西汉 …………………………005
　—文化—五胡十六国时期 ……………737
　—历史—西汉 …………………………003
　　　—隋代 …………………………032
　—汉代，与西域关系 …………………075
　—军屯—汉代 …………………………029
　—农业基地—西汉 ……………………334
　—回鹘—国家形成 ……………………162
　　　　，在敦煌古文书中 ……………163
　—建制—汉代 …… 001、005、006、007、008、009、010
　—经济史—西汉 ………………………005
　—政区沿革—汉代 ……………………015
　—战略地位—唐代 ……………………057
河西地区—民族分布—汉代 ……………427
　　　　　—先秦 ……………………427
　　—民族问题—宋代 …………………438
　　　　　—五代十国时期 ……………438
法曲 ………………………………………589
　—霓裳羽衣曲 …………………………590
波罗球戏—唐代 …………………………615
波斯帝国—历史 …………………………101
泼寒胡戏—传入—中国 …………………614
府兵制—唐代—西州 ……………………061
羌—民族—汉代 ……………………426、432
　　　—先秦 …………………………426
　—民族史 …………………………433、462
板桥三娘子—代唐 ………………………618
郁夷—民族迁徙 …………………………430
　—民族起源 ……………………………430
轮台—古城遗址—唐代 ……249、250、251、252、253
拘弥国—历史 ……………………………129
昆仑—历史地理 …………………………195
国际贸易—历史—古代 …………………332
　　　—回鹘—汗国 …………………340
　　　—河西走廊 ……………………335
　　　—唐代 …………………………360
　　　—隋代 …………………………360
帖木儿王朝—中国—明代 ………………088
帕米尔—历史地理 ………………………127
和田—美术—古代 ………………………390
和亲制度—乌孙—西汉 …………………043
　　　—回鹘—唐代 …………………045
　　　—唐代 …………………………044
建制—河西—历史 …………………008、009
　　　—汉代… 001、005、006、007、008、009、010
　—敦煌—汉代 …………………012、014
《弥勒会见记》—剧本—吐火罗文 ………605
　　　　　　—回鹘文 ………………604
经济—历史—西夏 ………………………352
　—西域—汉代 …………………………016
　　　—西汉 …………………………022
　　　，与中原 ………………………370
　—伊犁—西汉 …………………………024
　—陇右—唐代 …………………338、339
　—河西—五胡十六国时期 ……………337
　　　—唐代 …………………338、339
　　　—魏晋南北朝时期 ……………336
　—晋代—西域，与中原 ………………370
经济史—中亚 ……………………………356
　　—民族—丝绸之路 ……………………327
驿户起义—沙州—唐代 …………………065
驿站—新疆—唐代 ………………………314

九画

突厥—中原—战争 ………………………056
　—民族—分布 …………………………465
　—民族史 ………………………………463

—民族迁徙 ……………………………465
—汗国—历史 ……135、136、137、138、140、
141、142、145、146、147、467、499
—政治组织 ………………………139
，与唐王朝关系 ……………………144
，与隋王朝关系 ……………143、144
突厥人—宗教信仰 ……………………………533
突厥文—文献 ……………………………………559
突骑施—汗国—历史 ……………………………148
音乐—中国—文化交流，与印度 ………………556
—汉族—文化交流、与西域 ……………570
—北朝—苏祇婆 ……………………666、667
—印度—文化交流，与中国 ……………565
—发展—中国 ……………………………562
—西北地区—唐代 ………………………574
—西域—文化交流，与汉族 ……………570
—唐代 ……………………575、577、668、669
—歌舞—新疆—唐代 ……………………578
庭州—历史 ……………………………………257、258
—古城遗址 ………………………………258
养蚕—输出—中国 ………………………………417
—新疆，由内地传入 ……………378、379
美术—北齐 ………………………………………670
叛乱—王著杀阿合马—元代 ……………………070
—海都—元代 ……………………………070
前凉—文化 ………………………………………373
—年号 ……………………………………120
—河西，与西域关系 ……………………076
—炼丹术—输出—中国 …………………402
神话—人物—西王母 ……………………………619
玻璃器皿—中国—古代 …………………………693
—出土文物—新疆 ……………………694
政区沿革—河西—汉代 …………………………015
政治—西域—汉代 ………………………………016
草药—输入—西域 ………………………………401
南亚—国家—历史地理 …………………………276
南凉—秃发—部族—历史 ………………………122
—河西，与西域关系 ……………………076
胡腾舞 ……………………………………600、601
柯尔克孜—民族史 ……………………500、501
柘羯—民族史—唐代 ……………………………452
战争—大宛—汉代—武帝 ………………………053
—车师—汉代 ……………………………025
—北庭—回鹘 ……………………………067
—西州营—吐蕃 …………………………061
—西域—汉代—武帝，与匈奴 …………052
—回鹘—北庭 ……………………………067
—吐蕃—西州营 …………………………061
—西域，与唐王朝 ………………059
—沙州—唐代 ……………………062
—别失八里 ………………………060
—伊吾—汉代 ……………………………025
—沙州—吐蕃—唐代 ……………………062
—突厥，与中原 …………………………056
—凉州—西晋 ……………………………055
—唐王朝—西域，与吐蕃 ………………059
—高昌—唐代—太宗 ……………………058
哌哒—民族起源 …………………………………495
哌哒国—历史 …………………181、182、183、184、
哈拉浩特—苏联—古城遗址，与文化 ………764
贵霜—王朝—历史 ………………………………180
拜占庭帝国—外交使节—唐代 …………………042
香料—贸易经济—经济史 ………………………320
科学技术—新疆—古代 …………………………678
复面—唐代 ………………………………691、692
贸易—大黄 ………………………………………362
—宝石—埃及，与中国 …………………361
—茶叶 ……………………………………362
—香料 ……………………………………320
贸易经济—元代—汉族，与西北地区各民族 …
353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358
—少数民族—元代 …………………354
—汉族，与维吾尔族 ………………355
—西域，与唐王朝 …………………346
—回纥—民族，与唐王朝 ……347、348
—阿塞拜疆，与中国 ………………359
—经济史—新疆 ……………341、342
—突厥—民族 ………………………350
—唐代—王朝，与西域 ……………346
，与回纥族 ……347、348
—管理—西域—唐代 ………………345
—维吾尔族，与汉族 ………………355
—粟特文—古文书档案 ……………357

—新疆—汉代 ……………………343
服饰—宗教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 …………393
—绘画—西域 ……………………394
柔然—民族史 ……………………450
绘画—中国，对伊朗绘画影响 ……………421

十 画

浩罕—历史地理 ……………………279
—清代 ……………………090
部落稽—音乐—唐代 ……………………588
高车—人口迁徙—北魏 ……………………054
高昌—王朝—世系 ……………………723
—古城遗址 ……………………238
—回鹘—王朝—历史 ……………160、161
—疆域 ……………………236、237、239
高昌国—历史 ……………………156
—古文书档案 ……………………158
—行政区划 ……………………239
—官制 ……………………157
高昌郡—史料—魏晋南北朝时期 …………159
高昌馆—明代 ……………………051
凉州—人口—历史 ……………………011
—文化教育—五胡十六国时期 …………372
—疆域—东汉 ……………………011
瓷器—输入—非洲 ……………………423
—输出—中国 ……………………423
桃花石 ……………………082、083
党项—民族—中原，与亚洲关系 …………443
唆里迷—历史地名 ……………………277
铁门关—历史地理 ……………………247、248
铁关谷—历史地理 ……………………248
铁勒—民族—人种 ……………………453
—语言 ……………………453
—民族关系 ……………………453
造纸术—文化交流 ……………………395
—出土文物—新疆 ……………………396
—输入—印度 ……………………397
—南亚 ……………………398
—新疆 ……………………399
陶俑—出土文物—唐代 ……………………725
绢画—出土文物—吐鲁番 …………687、688、689

十一 画

烽火台—唐代 ……………………068
裕固族—民族起源 ……………………475、476
焉耆—古文字 ……………………553
—历史—北魏 ……………………229
焉耆国—历史地理 ……………………231
—古城遗址 ……………………230、232
基督教—传入—中国—历史 ……………535
葛逻禄—民族史 ……………………466
萨珊王朝—文物—考古 ……………………708
—古钱 ……………………709、710
眼罩—唐代 ……………………691、692
尉迟氏—民族—分布 ……………………431
尉犁国—古城遗址 ……………………230、232
隋代—王朝，与突厥汗国关系 ……………143
维吾尔文—文献 ……………………561
维吾尔族—文化交流，与蒙古族 …………478
，与满族 ……………………478
—民族史 ……………………482、485、488
—民族形成 ……………………469
—民族起源 ……………………477、481、483
—丝绸之路 ……………………480
—译名 ……………………482、484
—摩尼教 ……………………530
—新疆—民族聚居区 …………486、487

十二 画

敦煌—人口—历史 ……………………013
—艺术—历史 ……………………729、730
—屯田—西汉 ……………………028
—历史 ……………………002、013
—历史地理—元代 ……………………203
—汉魏时期 ……………………202
—古佚书—五代十国时期 …………164、752
—藏文 ……………………437
—民族关系—历史 ……………………444
—吐鲁番—古文书档案 ……………………754
—曲谱—长沙女引 ……………………602
—古佚书 ……………………749
—李氏—世系—五代十国时期 …………640
—佛教—文化—汉魏时期 ……………726

—艺术……………………732、733
—张仪潮起义—唐代………………063、064
—建制—汉代……………………012、014
—经卷—文化…………………………753
—音乐史—资料………………………748
敦煌学—研究…………………………751
敦煌郡—历史地理—西汉……………196
琵琶—奏法—唐代……………………608
覩货逻国—古城遗址…………………235
博格达沁—古城遗址…………………231
葡萄—输入—中国…………381、382、383
萄葡酒—输入—中国…………………382
葱岭—历史地理………………………215
朝贡贸易—吐谷浑……………………041
塔吉克—民族—新疆…………………455
塔里木盆地—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中原关系…………………………………… 078
植物—输入—中原……………………380
—输出—西域…………………………380
棉花—西域，与中原农作物交流……384
—纺织—新疆—古代…………………690
—种植—新疆—古代…………………690
粟特—民族史…………………………496
粟特人—丝绸之路—交通……………323
粟特文—文献…………………………557
—古文字………………………………555
—新疆…………………………………544
粟特国—历史………………185、186、187
粟特语—新疆…………………………546
硇砂—天山—宋代……………………351
喀什噶尔—历史地理…………………218
喀喇汗王朝—历史…………170、173、174
—民族…………………………………172
—政治—历史…………………………171
—谱系…………………………………174
—疆域…………………………………172
，与于阗政权关系……………………151
跋禄迦国—赭时国—道路……………324
傀儡戏—木俑…………………………617
锁阳城—古城遗址……………………201
犁轩—历史地理………………200、274

十三 画

塞人—文化……………………………368
—民族史………………………………456
塞语—古文书档案—和田……………547
新石器时代—西域，与中原…………072
新复州—回鹘…………………………166
新疆—历史……………………125、673
，与中原关系…………………………071
—古文书档案—藏文…………………755
—石器时代，与中原关系……………073
—先秦，与中原关系…………………073
—政治，吐蕃统治时期………………167
—唐代，与中原关系…………………080
蒙古—明代，与西域关系……………087
蒙古文—文献…………………………558
蒲类县—历史地理—唐代……………259
墓志—洛阳—唐代……………………722
墓碑—拉丁文—扬州…………………717
楼兰—历史地理………………223、227
—古城遗址……………224、225、226、228
楼兰国—历史…………………………310
—交通—历史…………………………310
碎叶—历史……………………………243
—唐代…………………………………245
—历史地理……………………241、243
—古城遗址……………242、244、246
—建置—唐代…………………………245
碑刻—高昌—王朝—世系……………723
鲜卑—民族—分布—西北地区………445
—民族迁徙……………………………445
疏勒—历史地名………………216、217
媲摩城—古城遗址……………………220

十四 画

察合台汗国—历史……………………191
遮留谷—历史地理……………………248
鄯善—历史—北魏……………………229
—历史地理……………………………227
—佛教—魏晋时期……………………516
鄯善国—历史…………………………222

鄯善郡—历史 ……………………………………223
裴罗将军城—历史 ……………………………267
—历史地名 …………………………266
—古城遗址 …………………………266
舞蹈—中国—古代 ……………………………592
—龟兹 ……………………………………599
—唐代 ………………594、595、596、597、598
—隋唐时期 ……………………………593
舞蹈音乐—秦王破阵乐 ………………………603
—屈拓枝—唐代 ……………………602

十五　画

摩尼教—历史 ……………………………522、523
—古文书档案—回鹘文 ………………525
—寺院—戒律—历史 …………………524
—回纥—宗教思想 ……………………534
—回鹘—唐代 …………………………528
—经典 ……………………………531、532
—高昌—回鹘 …………………………529
—康昆仑—唐代 ………………………669
—唐代，与中亚教团 …………………527
羯胡—民族—唐代 ……………………………452

十六画—十九画

蔬菜—西域，与中原农作物交流 ………………384
燕乐—隋唐时期 ……………………………571
—调式—音节 ……………………………573
穆斯林—中国—历史 …………………………543
壁画—新疆，斯坦因发现的 …………………706
藏文—竹简—新疆 …………………………168
—古文书档案 …………………………750
疆域—西域—西汉 …………………………018

后　　记

丝绸之路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我们西北地方文献工作的任务之一。早在1979年牟实库同志就对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和选编，至1981年初，初步完成了解放前旧报刊中有关文献的发掘工作，编写了七万余字的叙录。同年夏，全国唐史研究会组成丝绸之路考察队，并在兰州召开了学术讨论会，应会议之约，将已完成的叙录初稿，以《丝绸之路资料题录》名称先期油印了50份，作为会议交流材料。嗣后，牟实库同志又陆续将解放后新报刊中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了搜集和选编，至1988年10月底，历时10年，《叙录》初稿基本完成。后经反复筛选，共收录有关丝路调查报告、考古发掘及学术论著等方面文献资料764篇，写成百万字的叙录。由于工作量较大，先后又有雪梅和刘瑛同志参加了编写工作，易雪梅还为本书编制了文献主题索引。另外，李亚林、罗舒群等同志也为本书的选编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康民、傅昌佐、强宗恕和郑子文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表深切的谢意。

编　者

1989年5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丝绸之路文献叙录
作者＝甘肃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甘肃省图书馆
页数＝６３０
ＳＳ号＝１０２３７５２５
出版日期＝１９８９年０９月第１版
出版社＝兰州大学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一、政治军事
（一）丝路开拓与经营
００１　建郡前的河西走廊＆武守志
００２　郭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刘光华
００３　试述西汉对河西的开发＆翟宛华
００４　汉武经略河西考＆缪凤林
００５　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刘光华
００６　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张维华
００７　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王宗维
００８　西汉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考＆周振鹏
００９　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谷苞
０１０　建郡后的汉代河西＆刘光华
０１１　东汉凉州之疆域及人口之密度－－并论河西四郡对文化之贡献＆刘仁成
０１２　古敦煌郡沿革及其遗迹＆陈希夷
０１３　敦煌沿革与人口＆齐陈骏
０１４　汉代的敦煌郡＆吴礽骧　余尧
０１５　汉代的属国＆王宗维
０１６　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孟池
０１７　前汉西域经略＆丁国藩
０１８　西汉西域都护所辖诸国考＆周振鹤
０１９　汉代西域都护府的由来－－兼谈郑吉的历史功绩＆贾应逸
０２０　试论西域戊己校尉＆侯灿
０２１　汉晋时期的西域戊己校尉＆侯灿
０２２　西汉时期西域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情况－－《汉书·西域传》研究＆钱伯泉
０２３　东汉后期至北魏对西域的管辖＆苏治光
０２４　论汉代乌孙对伊犁河流域的开发－－关于汉代乌孙族人口发展问题的研究＆王明哲
０２５　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韩儒林
０２６　两汉在西域屯田论述＆彭慧敏
０２７　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李古寅
０２８　西汉敦煌军屯的几个问题＆徐乐尧　余贤杰
０２９　汉代河西军屯劳动者成份和生产状况＆李占寅
０３０　西汉屯田与“丝绸之路”＆张荣芳
０３１　ＫＨＲＯＨ（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匈）乌瑞著　荣新江译
０３２　隋朝对于西北之开发与经营＆李松伍
０３３　略论隋朝对丝路的经营＆陆庆夫
０３４　唐代对西域的开拓和经营＆章伯锋
０３５　唐代都护府述略＆唐启淮
０３６　安西都护府治西州境内时期的都护及年代表＆柳洪亮
０３７　评《新唐书·地理志》关于安西都护府记载＆胡树杞
０３８　敦煌吐鲁番史料中有关伊、西、北庭节度使留后问题＆唐长孺
０３９　辽对西北路的经营＆（日）长泽和俊著　陈俊谋译

０４０　汉武帝的西域节团＆张德光
０４１　吐谷浑遣使考＆（日）松田寿男著　周伟洲译
０４２　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杨宪益
０４３　论西汉与乌孙的和亲＆翟宛华
０４４　试论唐代的和亲政策＆任崇岳
０４５　唐代真公主与回纥的和亲＆刘美崧
０４６　四方万国　回纥最亲－－略论唐朝与回纥的和亲＆鲁琏
０４７　唐代的公验与过所＆程喜霖
０４８　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王仲荦
０４９　“支那”一词起源质疑＆汶江
０５０　支那名号原音证＆李志敏
０５１　明代高昌馆来文及其历史价值初探＆胡振华　黄间华

（二）军事活动

０５２　试论汉匈之争的初期战略及在西域的对抗＆刘锡淦　陈良伟　尚衍武
０５３　论汉伐大宛和汉朝的西方政策＆李开元
０５４　关于高车副伏罗部起义西迁的背景与时间问题＆段连勤
０５５　论“凉州之乱”＆施光明
０５６　六世纪下半叶突厥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原因探讨＆芮传明
０５７　唐代河西陇右的战略地位＆钮海燕
０５８　唐太宗平定高昌的历史意义＆王澴
０５９　唐代前期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唐安西四镇的弃置＆郭锋
０６０　究竟是回鹘还是吐蕃在公元７８９－７９２年间夺据了别失八里？＆（日）森安孝夫著　罗贤佑译
０６１　唐开元二年西州府兵－－“西州营”赴陇西御吐蕃始末＆朱雷
０６２　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陈国灿
０６３　略述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及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齐陈骏
０６４　唐末沙州（敦煌）张议潮的起义＆金启综
０６５　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姜伯勤
０６６　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唐长孺
０６７　唐代回鹘控制北庭的过程＆孟凡人
０６８　从吐鲁蕃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之二－－唐代烽铺的管理＆程喜霖
０６９　哈剌契丹的军事组织＆（苏）皮科夫著　冯继钦泽　龙体聪校
０７０　马可波罗记叙的元初两起叛乱考释＆余士雄

（三）国家关系

０７１　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吕振羽
０７２　“凿空”前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朱振杰
０７３　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王炳华
０７４　两汉时期西域与祖国的关系＆刘慧琪
０７５　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王宗维
０７６　河西诸凉王朝与西域－－论魏晋末至北魏初我国西疆的行政主权＆薛宗正
０７７　北魏与西域＆马荣国
０７８　魏晋时代之塔里木盆地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翦伯赞
０７９　李世民与少数民族＆陈金陵
０８０　唐代内地与新疆的关系＆陈全方
０８１　岑参边塞诗和唐代的中西交往＆柴剑虹
０８２　释桃花石（Ｔａｕｇａｓ）＆岑仲勉
０８３　桃花石和回纥国＆章巽

０８４　唐代天可汗考＆罗一之
０８５　突厥以后、蒙古以前－－过渡时期的中亚汗国－－《草原帝国史》选译＆（美）路克·关顿著　赵结译
０８６　明朝的西域关系＆赵俪生
０８７　明代蒙古与西域关系述略＆白翠琴
０８８　明初帖木耳帝国和中国的关系＆陈生玺
０８９　明代瓦刺与西域＆马曼丽
０９０　１７５９－－１８２０年清与浩罕的关系＆潘志平
０９１　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朱杰勤
０９２　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周谷城
０９３　公元第十到第十五世纪中国同中亚的关系＆王治来
０９４　十五世纪初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关系＆郑鹤声
０９５　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马雍
０９６　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齐思和
０９７　中古时期中印人民的友好交往＆黄道立
０９８　中巴友谊的历史＆夏鼐
０９９　“丝路之路”与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交往＆张铁伟
１００　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朱杰勤
１０１　萨珊朝波斯＆周谷城
１０２　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冯家升
１０３　中国与阿拉伯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马坚
１０４　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关系＆（叙利亚）卡米勒尔·雅德
１０５　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纳忠
１０６　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深厚友谊＆周一良
１０７　中国和阿曼历史上的友好往来＆沈福伟
１０８　汉唐时期中国与狮子国的关系＆许道勋
１０９　东汉和贵霜关系史上的两个问题＆莫任南
１１０　汉代的中国与埃及＆孙毓棠
１１１　成吉思汗和中亚＆王治来

二、历史地理

（一）西域各国历史

１１２　西北史概述＆杜光简
１１３　中亚历史与文明研究概论＆（法）韩伯诗著　耿升译
１１４　《中亚历史和文明》第一、二章摘要＆（法）韩伯诗主编　耿升摘译
１１５　关于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中亚历史研究之现状＆（日）森安孝夫著　陈俊谋译
１１６　阿拉伯和波斯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史料＆（英）唐·丹·莱斯利著　陈海龙译
１１７　丝绸之路上两大国－－伊朗和中国历史的比较＆赵俪生
１１８　盛唐诗歌中之河西走廊及西域＆朱？
１１９　公元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陈守忠
１２０　西夏时期河西历史概述＆（日）中岛敏著　王鉞、汤开建译
１２１　前凉年号新考辨＆侯灿
１２２　秃发南凉始末＆赵向群
１２３　沮渠北凉略论＆林干
１２４　西域风闻琐记＆向达
１２５　新疆＆何观洲
１２６　西域、新疆与新疆省＆齐清顺

１２７　我国历史上的帕米尔＆黄盛璋
１２８　《汉书·西域传》的研究－－以呼尔斯威和岑仲勉两人最近成果为中心（节译）＆（日）榎荒阁　袁林译
１２９　拘弥国考＆（日）长泽和俊著　李步嘉译
１３０　于阗国考＆（日）掘谦德著　纪彬译
１３１　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张广达　荣新江
１３２　藏文文献中的若干古于阗史料＆巴桑旺堆
１３３　车师后部史中若干问题的探讨＆孟凡人
１３４　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吴震
１３５　突厥初世史探幽＆薛宗正
１３６　突厥研究史概述＆（德）Ｋ·Ｈ·孟格斯著　李时尚译
１３７　突厥勃兴史论＆（日）松田寿南著　樊圃译
１３８　论突厥汉国的分裂＆刘锡淦
１３９　东突厥汗国的政治结构＆薛宗正
１４０　略论西突厥史中的若干问题＆林干
１４１　阿波可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创造者－－兼论突厥汗国的分裂与西突厥汗国的形成＆王譞
１４２　关于西突厥与西突厥汗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兼与王譞同志商榷＆段连勤
１４３　突厥和隋王朝的关系试探＆臧嵘
１４４　论西突厥部族与隋唐王朝的关系＆陈国灿
１４５　西突厥开国史考辨－－兼评沙畹说和王譞说＆薛宗正
１４６　西突厥纪事＆林干
１４７　试解突厥泥利之谜＆刘锡淦
１４８　突骑施汗国的兴亡＆薛宗正
１４９　于阗尉迟王家世系考述＆殷晴
１５０　藏文古籍所述于阗王谱系迄始年代研究＆林梅村
１５１　关于于阗政权与喀剌汗王朝关系的探讨＆汤开建　王叔凯
１５２　论回纥汗国＆刘志霄
１５３　加纥的兴起及其和唐朝的关系＆程溯洛
１５４　回鹘西迁路线新探＆阿合买提江·艾海提
１５５　从回鹘西迁到黑汗王朝＆王小甫
１５６　古高昌国历史略述＆黄文弼
１５７　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侯灿
１５８　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马雍
１５９　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唐长孺
１６０　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程溯洛
１６１　高昌回鹘王国（公元８５０年－－１２５０年）＆（德）葛玛丽著　耿世民译
１６２　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段连勤
１６３　从两件敦煌文书看河西回鹘＆高自厚
１６４　敦煌遗书Ｐ２９９２号卷《沙州上甘州回鹘可汗状》有关问题考＆孙修身
１６５　回鹘与敦煌＆（日）森安孝夫著　高然译
１６６　新复州加鹘研究＆钱伯泉
１６７　唐代吐蕃在新疆的活动及其影响＆马国荣
１６８　新疆藏文简牍考述及释例＆王尧
１６９　吐蕃在敦煌统治形态的变迁（摘译）＆（日）山口瑞凤著　朴宽哲译
１７０　关于喀喇汗王朝若干有争论的问题＆（德）Ｏ．普里查克著　魏良

韬译
１７１　喀喇汗王朝政治史述略＆魏良韬
１７２　喀喇汗王朝的疆域及其境内民族＆魏良韬
１７３　论两个喀喇汗朝＆（苏）达维多维奇著　徐均平充
１７４　哈拉汗朝历史简述＆耿世民
１７５　西辽政治史稿＆魏良韬
１７６　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周良霄
１７７　试论耶律大石西迁的原因＆纪宗安
１７８　西辽疆域浅释＆邓锐龄
１７９　关于“后西辽”＆王治来
１８０　贵霜王朝的形成＆阎宗临
１８１　？哒国在中亚的统治＆苏北海
１８２　《魏书·？哒传》考释＆余太山
１８３　？哒史二题＆余太山
１８４　关于？哒的覆亡＆余太山
１８５　粟特国考＆宪益
１８６　《魏书·粟特国传》辨考＆余太山
１８７　《魏书》粟特不是俄粟特＆肖之兴
１８８　论吐火罗＆王斐烈
１８９　吐火罗论＆杨建新
１９０　吐火罗国史考＆（日）内田吟风著　斯英琦　徐文堪译
１９１　察合台汗国初探＆刘志霄
１９２　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陈连庆
（二）丝路重镇
１９３　汉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之演进＆贺昌群
１９４　汉代令居塞的地理位置＆王宗维
１９５　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价＆顾颉刚
１９６　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马雍
１９７　两关遗址考＆劳干
１９８　玉门位置辨＆方诗铭
１９９　玉门关与玉门县＆陈梦家
２００　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来源＆张维华
２０１　锁阳城杂考＆陆庆夫
２０２　汉魏时期的敦煌＆（日）榻恍壑　徐秀灵译　陈国灿校
２０３　元代的敦煌＆（日）大岛立子著　高然译
２０４　误传的中国古王城与其水力利用＆岑仲勉
２０５　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黄盛璋　方永
２０６　吐谷浑的诸根据城＆（日）佐藤长著　王丰才编译　芈一之校订
２０７　西域辨正＆杨建新
２０８　西域地名考＆苏北海
２０９　《魏书》本纪中地望不详西域诸国考略＆陈连庆
２１０　《水经注》和《法显传》－－纪念顾颉刚先生（１８９３－－１９８０）＆章巽
２１１　唐写本地志残卷浅考＆薛英群　徐乐尧
２１２　唐代西域诗句释地＆刘维钧
２１３　岑参“西征”诗地名探讨＆刘满
２１４　岑参西域之行及其边塞诗中对唐代西域情况的反映＆卢苇
２１５　葱岭＆肖之兴
２１６　疏勒名称考＆苏北海
２１７　ＳＥＲＥＳ为疏勒说＆钱伯泉

２１８　喀什噶尔的历史变迁＆田卫疆
２１９　古代于阗的西城和东城－－于阗古都及绿洲变迁的探索＆殷晴
２２０　于阗媲摩城、坎城两地考＆孙修身
２２１　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史树青
２２２　新疆出土祛卢文简书内容的考释与分析＆赵俪生
２２３　新疆所出祛卢文书的断代问题－－兼论楼兰遗址和魏晋时期的鄯善郡＆马雍
２２４　沙漠古国－－楼兰考察记＆穆舜英
２２５　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侯灿
２２６　楼兰古城历史地理若干问题探讨＆陈汝国
２２７　楼兰鄯善问题＆冯承钧
２２８　从考古考察与调查论楼兰城市的发展及其环境变迁＆侯灿
２２９　北魏鄯善镇、焉耆镇考＆苗普生
２３０　焉耆尉犁危须都城考＆陈戈
２３１　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博格达沁古城调查＆韩翔
２３２　古焉耆、尉犁国都及四十里城东旧城考＆陈可畏
２３３　库车县古遗址简介＆梁志祥
２３４　略述龟兹都城问题＆黄文弼
２３５　《大唐西域记》中的覩货逻、折摩驮那、纳缚波故国考＆王北辰
２３６　高昌麹氏王国郡城考述＆侯灿
２３７　高昌疆域郡城考＆黄文弼
２３８　吐鲁蕃的高昌故城＆阎文儒
２３９　高昌王国行政地理区划初探＆郑炳林
２４０　唐安西四镇考＆张建侯
２４１　碎叶是中国唐代西部重镇－－驳苏联所谓中国西部边境“从没有到过巴尔哈什湖”的谬论＆卫江
２４２　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殷孟伦
２４３　李白的故乡－－碎叶＆马国荣
２４４　从吐鲁番出土“氾德达告身”谈唐碎叶镇城＆吴震
２４５　唐碎叶建置诠索＆薛宗正
２４６　碎叶城今地考＆张广达
２４７　铁门关考＆刘伉
２４８　铁门关、铁门谷和遮留谷＆陈戈
２４９　唐代“轮台”初探＆林必成
２５０　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钱伯泉
２５１　唐轮台名实核正＆薛宗正
２５２　唐轮台位置续考＆钱伯泉
２５３　轮台和乌鲁木齐＆刘维钧
２５４　北庭故城与北庭大都护府＆薛宗正
２５５　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中科院考古所新疆工作队
２５６　天山脚下的历史名城－－北庭＆王秉诚
２５７　关于唐代庭州的几个问题＆鲁才全
２５８　关于庭州的位置＆（日）长泽和俊著　陈俊谋译
２５９　唐蒲类诂名稽址－－庭州领县考之二＆薛宗正
２６０　别失八里（五城）名义考实＆陈戈
２６１　论别失八里＆孟凡人
２６２　弓月城和阿力麻里城方位考＆孟凡人
２６３　弓月城及双河位置考＆易漫白
２６４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黄文弼
２６５　略论可汗浮图城＆孟凡人

２６６　唐代西域裴罗将军城考＆周连宽
２６７　裴罗将军城考＆王叔凯
２６８　中亚地名考略三则＆刘伉
２６９　有价值的中亚地名文献＆（苏）哈萨诺夫著　牛汝辰译
２７０　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张广达
２７１　安息与乌弋山离－－读《汉书·西域传》札记之一＆孙毓棠
２７２　条支－－读《汉书·西域传》札记之二＆孙毓棠
２７３　中亚条支、条支海考＆苏北海
２７４　条支、犁轩、大秦和有关西域地理＆余太山
２７５　唐代“条支”地望质疑＆朱方
２７６　《魏书》本纪中所见印巴次大陆诸国考实＆陈连庆
２７７　唆里迷考＆耿世民　张广达
２７８　从大宛到浩罕的疆域问题＆苏北海
２７９　浩罕属于古代中国＆屈振华　秦江

三、丝路交通

２８０　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裴文中
２８１　西北交通之史的研究＆姚玄华
２８２　西域交通之历史的观察＆周谷城
２８３　历代西疆路程简疏＆岑仲勉
２８４　从《穆天子传》和西罗多德《历史》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西交通＆莫任南
２８５　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穆天子传》的研究＆钱伯泉
２８６　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开通＆卢苇
２８７　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王宗维
２８８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张春树
２８９　汉代的西域交通＆郜英
２９０　汉朝西域路线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王宗维
２９１　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黄文弼
２９２　丝绸之路概述＆孙培良
２９３　丝绸之路初探＆贾应逸
２９４　《丝绸之路》＆（瑞典）斯文赫定著　安应民译　胡清华校
２９５　丝路考察纪略＆齐陈骏
２９６　汉代对西域交通与中国文化之影响＆陈安仁
２９７　汉代祁连山路考述＆王宗维
２９８　古代居延道路＆王北辰
２９９　丝绸之路东段述略＆杨建新
３００　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鲜肖威
３０１　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兼与鲜肖威同志商榷＆吴礽骧
３０２　西夏时代河西南北交通路线＆（日）西田龙雄著　张鉴衡　陈宗祥译
３０３　丝绸之路在青海＆张得祖
３０４　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初师宾
３０５　也谈“羌中道”＆吴礽骧
３０６　丝绸之路东段的另一支线－－青海路＆周伟洲
３０７　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冯汉镛
３０８　自汉至唐的草原丝绸之路＆苏北海
３０９　宁夏境内的“丝绸之路”－－兼论唐长安、凉州北道的驿程及其走向＆鲁人勇
３１０　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黄文弼
３１１　古代西域南道上的若干地理问题＆王北辰
３１２　“丝绸之路”南道中我国境内帕米尔路段调查＆王炳华
３１３　试论唐贞观年间所开的大碛路－－兼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郑炳

林

３１４　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孔祥星
３１５　丝绸之路和古代于阗＆殷晴
３１６　关于汉代“丝绸之路”中段路线问题－－与李约瑟、齐思和等专家商榷＆莫任南
３１７　汉唐时代中西交通概述＆步履
３１８　丝绸之路－－汉唐时期中西陆路交通＆赵永复
３１９　龙门所见中外交通史料初探＆温玉成
３２０　伊斯兰教产生前香料之路的变迁＆安维华
３２１　中印交通的演变＆郭廷以
３２２　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节祥雍
３２３　粟特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自公元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芮传明
３２４　关于玄奘从跋禄迦国至赭时国的一段行程＆周连宽
３２５　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黄盛璋
３２６　《西天路竟》笺证＆黄盛璋

四、经济贸易

３２７　古代西北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贡献＆刘锡淦
３２８　中国丝绢西传考＆姚宝猷
３２９　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季羡林
３３０　华丝传入欧洲考＆朱杰勤
３３１　两汉与罗马丝贸易考＆龚骏
３３２　上古时期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莫任南
３３３　汉代丝绸贸易考＆（荷）胡四维著　耿升译
３３４　河西四郡新农业区的开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关键＆谷苞
３３５　河西走廊对沟通中西商务之贡献＆萧静安
３３６　曹魏时期河西经济恢复原因浅析＆陆庆夫
３３７　五凉时期的河西经济－－兼论汉代河西开发的历史趋势＆武守志
３３８　论唐初河陇地区经济的繁荣＆黄新亚
３３９　论唐代河陇地区经济的发展＆梁勤
３４０　甘州回鹘与中西贸易＆高自厚
３４１　历史上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新疆商业志编辑室
３４２　古代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商业往来＆徐伯夫
３４３　汉代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马国荣
３４４　唐代“丝绸之路”上的纺织品贸易中心西州－－吐鲁蕃文书研究＆孔祥星
３４５　略述唐朝对西域的商业贸易管理＆雷学华
３４６　唐代中原与西域间的商业贸易关系＆雷学华
３４７　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唐代马价绢新探＆马骏民
３４８　唐与回纥经济往来述论＆崔德明
３４９　回鹘与丝绸之路＆樊保良
３５０　突厥诸民族在中国的贸易活动＆陈庆隆
３５１　王延德行记与天山硇砂＆张承志
３５２　西夏社会经济及其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地位＆白振声
３５３　元代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白钢
３５４　元代色目人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贡献＆匡晔
３５５　古代维、汉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玉素甫·丁
３５６　从经济方面看中亚研究史＆（日）山本光郎著　姜镇庆译
３５７　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王冀青
３５８　中古时期中国与乌孜别克斯坦的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关系＆郭庆昌
３５９　中世纪时期阿塞拜疆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苏）寇瑟著　君石译
３６０　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乌廷玉

３６１　结绿和埃及宝石贸易＆沈福伟
３６２　从大黄、茶叶贸易看十五世纪后的中亚交通＆潘志平

五、文化交流

３６３　上古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齐思和
３６４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阎宗临
３６５　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日）长泽和俊著　张英莉译
３６６　少数民族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齐思和
３６７　关于《大唐西域记》＆季羡林
３６８　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王明哲
３６９　丝路掇琐＆刘铭恕
３７０　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汪宁生
３７１　汉唐间西域之交通及其文化＆常任侠
３７２　略论十六国时期凉州地区的文化教育＆施光明
３７３　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黎尚诚
３７４　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张广达
３７５　成吉思汗与塔塔统阿－－兼谈历史上的蒙维文化交流＆樊保良
３７６　由考古学上所见到的新疆在文化上的地位＆黄文弼
３７７　新疆在东西文化上的估价＆吴蔼宸
３７８　养蚕织绢的技术是怎样由内地传入新疆的＆谷苞
３７９　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贾应逸
３８０　试论我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石声汉
３８１　葡萄考＆谭少惠
３８２　葡萄、葡萄酒传入我国的考证＆张玉忠
３８３　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胡澍
３８４　棉花、瓜果、蔬菜及其他－－古代西域和内地农作物的交流＆谷苞
３８５　新疆的坎儿井＆王鹤亭
３８６　新疆省坎井来源析疑＆张之毅
３８７　新疆坎儿井的来源及其发展＆黄盛璋
３８８　关于石窟寺艺术和它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阎文儒
３８９　龟兹壁画的人体画法＆曷谛
３９０　古代和田派美术初探＆王冀青
３９１　克孜尔石窟壁画画法综考－－兼谈西域文化的性质＆吴焯
３９２　谈丝路石窟壁画中的荷花形象＆陈履生
３９３　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杨泓
３９４　西域绘画所见服装的研究＆（日）原田淑人著
３９５　中国纸的发明＆傅振伦
３９６　新疆出土古纸研究－－中国古代造纸技术史专题研究之二＆潘吉星
３９７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季羡林
３９８　关于中国纸和造纸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黄盛璋
３９９　纸张和印刷术在新疆的传播＆徐伯夫
４００　印刷术的发明和演进＆张怀礼
４０１　我对张骞出使西域与药物输入的看法＆宋向元
４０２　中国古代金丹术的医药化学特征及其方术的西传＆（英）李约瑟著　韩怡凡译
４０３　中央亚细亚出土的本草集注残简文献学的研究＆（日）渡边幸三著　储天任译
４０４　中印文化交流＆季羡林
４０５　中印文化的交流＆常任侠
４０６　略论印度龙与中国龙的关系＆胡同庆
４０７　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黄盛璋
４０８　中印历史上的医药关系＆刘成基
４０９　汉魏南北朝从国外传入的医药文化＆陆曼炎

４１０　宋代以前的外来药物及其在方剂中的应用＆穆德全
４１１　中国和阿拉伯的医药交流＆宋大仁
４１２　对宋大仁先生《中国与阿拉伯的医药交流》一文的意见＆郭庆昌
４１３　中外医药交流的一些史实＆耿鉴庭
４１４　火药的发现及其传入欧洲的经过＆冯家升
４１５　火药的发明、发展和西传＆冯家升
４１６　蒙古西征用过火药吗＆冯家升
４１７　中国丝绢的输出与西方的“野蚕丝”＆戴禾　张英莉
４１８　唐代中国和亚洲各族的文化交流＆方循
４１９　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魏良韬
４２０　古丝路道旁的中亚艺术＆唐恒亮译
４２１　中国画法的西渐与伊朗细画＆孙培良
４２２　中国艺术对回教艺术的影响＆（埃及）Ｄｒｅａｋｙ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Ｈａｓｓａｎ著　马继高译
４２３　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夏鼐
４２４　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陈竺同
４２５　七曜历的起源－－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刘世楷

六、民族宗教

（一）民族

４２６　商周秦汉时期甘肃境内的氐羌月氏和乌孙＆曹怀玉
４２７　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及其分布＆王宗维
４２８　关于匈奴人在河西走廊地区活动的几个问题＆白凤岐
４２９　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和匈奴及河西四郡的设置＆潘策
４３０　郁夷、大月氏的来源和迁徙＆何光岳
４３１　小月氏和尉迟氏＆（日）榎恍壑　斯英琦　徐文堪译
４３２　汉代羌族的活动＆（日）佑藤长著　王丰才编译　芈一之校订
４３３　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胡昭曦
４３４　乞伏氏出于高车补证＆陈仲安
４３５　汉肚卢水胡的族名与居地问题＆王宗维
４３６　关于卢水胡的族源及迁移＆赵永复
４３７　敦煌藏文写卷Ｐ·Ｔ·１０８３、１０８４号研究－－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探索＆王尧　陈践
４３８　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汤开建　马明达
４３９　河西回鹘略论＆林干
４４０　关于甘州回鹘史中的几个问题＆李萍
４４１　甘州回鹘世系考＆高自厚
４４２　甘州回鹘余部的迁徙与西州回鹘之关系＆汤开建
４４３　党项在中原与亚洲内陆关系中的作用＆（美）陆宽田著　乐赛月译
４４４　以敦煌为中心的诸民族之动态＆（日）梅村坦著　陈俊谋摘译
４４５　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与分布＆周伟洲
４４６　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周伟洲
４４７　吐谷浑与唐、吐蕃的关系＆胡小鹏
４４８　从李土司族谱谈到吐谷浑与土族的关系及土族族源问题＆芈一之
４４９　如何正确处理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林干
４５０　柔然与西域关系述考＆余太山
４５１　隋唐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的关系＆吕光天　古清尧
４５２　“羯胡”、“柘羯”、“杂种胡”考辨＆黄永年
４５３　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周连宽
４５４　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传统友谊＆白寿彝
４５５　新疆之伊兰民族＆王日蔚

４５６　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王炳华
４５７　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王炳华　王明哲
４５８　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杨建新
４５９　也谈汉代的乌孙－－《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商榷＆刘光华
４６０　汉代乌孙居地考＆苏北海
４６１　乌孙及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林干
４６２　西域的羌族＆钱伯泉
４６３　突厥族＆林干
４６４　从突厥内徙看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张雄
４６５　九至十三世纪初突厥各部的分布与变迁＆蒋其祥　周锡娟
４６６　初期葛逻禄族史之研究＆（日）内田吟风著　陈俊谋译
４６７　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马长寿
４６８　试论回鹘史中的若干问题＆林干
４６９　从车师族到高昌回鹘＆苏北海
４７０　关于回鹘的西迁＆（日）森安孝夫著　陈俊谋译
４７１　唐及五代时期的回鹘族＆林干
４７２　高昌回鹘亦都护谱系考－－西域时代回鹘史札记＆程溯洛
４７３　铁勒与突厥的关系及铁勒是否可以被称作民族的问题＆段连勤
４７４　葱岭西回鹘考＆王日蔚
４７５　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钱伯泉
４７６　关于《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一文的几点看法＆汤开建
４７７　维吾尔族＆乌衣古尔·沙依然　史众
４７８　元代维吾尔人对于祖国文史的贡献＆程溯洛
４７９　维吾尔族先民回鹘与匈奴、突厥关系考辨＆苏北海
４８０　丝绸之路与维吾尔族＆刘志霄
４８１　维吾尔族源流新考＆苏北海
４８２　维吾尔族汉译名称源流考＆苏北海
４８３　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谷苞
４８４　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演变考＆王日蔚
４８５　关于维吾尔族历史的几个问题＆冯家升
４８６　维吾尔族居新疆考＆樊哨
４８７　对樊哨同志《维吾尔族居新疆考》的几点意见＆冯家升
４８８　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樊保良
４８９　试论回回民族的来源及其形式＆林干
４９０　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白寿彝
４９１　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黄靖
４９２　略论大月氏贵霜帝国的建立及其族系问题＆水天长
４９３　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齐思和
４９４　关于匈奴西迁过程的探讨＆肖之兴
４９５　？哒民族的起源＆（日）榎恍壑　刘永增译
４９６　古代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语言＆易卜拉音·穆提依
４９７　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法）哈密顿著　耿升译
４９８　关于Ｔｏｑｕｚ　Ｏｒｕｚ与“九姓”的几个问题＆（日）片山章雄著　章莹译　吴大山校
４９９　西突厥的形成、属部及其它诸问题＆杨建新
５００　柯尔克孜族的故乡及其西迁＆杜荣坤　郭平梁
５０１　叶尼塞吉尔吉斯的西迁与中亚吉尔吉斯民族的形成＆马曼丽
５０２　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杨志玖

（二）宗教

５０３　西域佛教之研究＆（日）羽溪了谛著　许敦谷译
５０４　佛教下之西北＆顾颉刚
５０５　佛教东渐的传说＆（日）白鸟库吉著　朱彤樵译
５０６　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序＆任继愈
５０７　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吴焯
５０８　从《张骞出使西域图》谈佛教的东渐＆孙修身
５０９　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任继愈
５１０　六朝时代中国境内之西域佛僧＆江应梁
５１１　汉唐时期新疆佛教流行情况述略＆陈戈
５１２　《于阗教法史》＆王尧　陈践译解
５１３　龟兹佛教与石窟＆姚士宏
５１４　古代库车的佛教与佛教遗址＆买买提·木沙
５１５　库车发现的卵石佛像及藏文题刻＆刘松柏
５１６　魏晋时代的鄯善佛教＆陈世良
５１７　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耿世民
５１８　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孟凡人
５１９　炳灵寺石窟与西秦佛教＆杜斗城
５２０　火祆教入中国考＆陈垣
５２１　魏晋南朝火祆教钩沉＆王素
５２２　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
５２３　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林悟殊
５２４　摩尼教寺院的戒律和制度＆刘南强著　林悟殊译
５２５　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耿世民
５２６　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柳存仁著　林倍殊译
５２７　唐代摩尼教与中亚摩尼教团＆林悟殊
５２８　试论摩尼教与回鹘的关系及其在唐朝的发展＆艾尚连
５２９　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林悟殊
５３０　中世纪维族与摩尼教的关系＆苏北海
５３１　《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林悟殊
５３２　摩尼教《下部赞》汉译年代之我见＆林悟殊
５３３　六到八世纪突厥人的宗教信仰＆樊儒
５３４　试论回纥宗教思想的演变与改宗摩尼教＆杨圣敏
５３５　中古时代中亚细亚及中国之基督教＆（法）伯希和著　陆翔译
５３６　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白寿彝
５３７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考＆王日蔚
５３８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考＆苏北海
５３９　伊斯兰教在新疆发展之商榷＆柏南
５４０　一千年来伊斯兰教（回教）在新疆的发展＆苏北海
５４１　新疆佛教由盛转衰和伊斯兰教兴起的历史根源＆李泰玉
５４２　回回教入中国考＆Ｉｓｓａｃ　Ｍａｓｏｎ著　朱杰勤译
５４３　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白寿彝

七、语言文字

５４４　新疆之语言文字＆王日蔚
５４５　新疆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耿世民
５４６　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方壮猷
５４７　和田塞语七件及文书考释＆黄盛璋
５４８　吐火罗语略说＆子范
５４９　论吐火罗语＆王斐烈
５５０　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季羡林
５５１　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国语考＆（法）列维著　冯承钧译

５５２　吐火罗语与尼雅俗语－－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乌鲁木齐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季羡林
５５３　焉耆－－龟兹文及其文献＆李铁
５５４　于阗文及其文献＆黄振华
５５５　浅论粟特字母的传播与回鹘文的创制＆王叔凯
５５６　回鹘文字来源及其演变＆李符桐
５５７　粟特文及其文献＆黄振华
５５８　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道布
５５９　突厥文及其文献＆陈家振
５６０　尼雅新出的一件佉卢文书＆（美）邵瑞祺著　黄盛璋译
５６１　古代维吾尔族文字和文献概述＆耿世民
八、音乐百戏
５６２　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阴法鲁
５６３　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日）岸边成雄著　邹仲华译
５６４　八世纪前中国乐舞与西域乐舞之递禅＆常任侠
５６５　中、印两国在音乐文化上的关系＆杨荫浏
５６６　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新疆乐舞＆周菁葆
５６７　两晋南北朝是各族乐舞大交流的时代＆王克芬
５６８　汉唐间外国音乐的输入＆贺昌群
５６９　关于隋唐时代吸收西域音乐的历史经验＆马可
５７０　隋唐时代汉族人民学习西域音乐的故事＆刘兆云
５７１　隋唐燕乐的成立、递变和流传＆潘怀素
５７２　苏祗婆的“五旦”理论＆何昌林
５７３　从新疆的古老农音乐探索燕乐及其调式音阶理论＆关也维
５７４　唐代音乐与西北之关系＆吴荣曾
５７５　唐代的音乐艺术＆阴法鲁
５７６　唐代西域音乐的流行＆赵铭善
５７７　漫谈唐代的音乐＆阴法鲁
５７８　新疆歌舞与唐代音乐＆阴法鲁
５７９　《西凉乐》与《伊州乐》－－我国西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与汉族音乐文化相结合的乐种＆谷苞
５８０　试探《西凉乐》民族之源－－暨论“变龟兹声为之”＆郝毅
５８１　也谈《西凉乐》－－兼与郝毅同志商榷＆牛龙菲
５８２　精美的西凉乐舞＆李根万
５８３　古代龟兹乐的巨大贡献及其深远影响－－在新疆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的发言＆谷苞
５８４　从古今字谱论龟兹乐影响下的民族音乐＆潘怀素
５８５　《龟兹乐》与《十二木卡姆》－－为纪念维吾尔族著名音乐家吐尔地阿洪诞生一百周年而作＆谷苞
５８６　龟兹尔与木卡姆＆周葆菁
５８７　龟兹乐舞史话＆霍旭初
５８８　唐乐《部落稽》考源－－暨论匈奴音乐文化艺术之流传＆郝毅
５８９　法曲＆丘琼荪
５９０　“霓裳羽衣曲”考＆杨荫浏
５９１　关于《泛龙舟》＆陈文成
５９２　中国古代的舞蹈艺术＆常任侠
５９３　隋唐的舞蹈＆常任侠
５９４　试谈唐代舞蹈＆欧阳予倩
５９５　唐代舞蹈续谈＆欧阳予倩
５９６　唐代舞蹈浅述＆秉勋

５９７　唐代－－古代舞蹈艺术高度发展的时期＆王克芬
５９８　西安地区部分出土文物中所见唐代乐舞形象＆周伟洲
５９９　龟兹舍利盒乐舞图＆霍旭初
６００　胡腾舞何时传入中原＆周到　刘建洲
６０１　胡腾舞考＆瀲川
６０２　唐代舞曲《屈柘枝》－－敦煌曲谱《长沙女引》考辨＆何昌林
６０３　秦王破阵乐的来源＆杨宪益
６０４　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耿世民
６０５　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Ａ《弥勒会见记剧本》＆季羡林
６０６　古代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及新疆的几种乐器－－略谈角、笳、笛、？篥和琵琶的产生及其演变＆谷苞
６０７　龟兹筚篥的流传及其艺术特色＆霍旭初
６０８　唐代的琵琶技法＆曹安和
６０９　火不思乐器考略＆关也维
６１０　汉唐间西域百戏之东渐＆常任侠
６１１　汉唐间西域传入内地的杂技艺术＆常任侠
６１２　说汉唐间百戏中的“象舞”－－兼谈“象舞”与佛教“行象”活动及海上丝路的关系＆贾峨
６１３　民间保存的唐西凉伎＆杨宪益
６１４　康居泼寒胡戏传入中国考＆刘铭恕
６１５　唐代波罗球戏考＆罗香林
６１６　唐代西藏马毬戏传入长安＆阴法鲁
６１７　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金维诺　李遇春
６１８　板桥三娘子＆杨宪益

九、丝路人物

６１９　西王母新考＆库尔班·外力
６２０　张骞与西域＆张仲和
６２１　张骞通西域＆姚鉴
６２２　试论张骞通西域＆刘戈
６２３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徐伯夫
６２４　西汉经营乌孙的三个女外交家－－刘细君、刘解忧、冯？＆杜裔
６２５　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冯？＆其平
６２６　段会宗在西域活动的年代背景及其评价＆刘光华
６２７　班超与西域＆秦卫星
６２８　班超投笔护西域＆刘维钧
６２９　班超对中西交通的贡献＆莫任南
６３０　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徐伯夫
６３１　班勇生平考＆柳用能
６３２　甘英出使大秦考＆龚骏
６３３　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及其贡献＆莫任南
６３４　氐人吕光和他的后凉政权＆齐陈骏　郭锋
６３５　裴矩功过述评＆齐陈骏
６３６　王玄策使印度及其勋业＆郑师许
６３７　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补唐书张义潮传》订补＆姜亮夫
６３８　瓜沙曹氏世谱＆姜亮夫
６３９　谈与瓜州曹氏世谱有关的几个问题＆孙修身
６４０　敦煌李姓世系考＆孙修身
６４１　阿史那忠在西域－－《阿史那忠墓志》有关部分考释＆郭平梁
６４２　唐朝的少数民族大将契苾何力＆郭平梁
６４３　略论郭元振＆张启揆

６４４　高居诲《使于阗记》笺证＆钱伯泉
６４５　关于“西域”“回回”和“阿维森纳”问题－－答郭庆昌先生＆宋大仁
６４６　王延德与《西州使程记》＆顾吉辰
６４７　耶律楚材及其《西游录》杂议＆樊保良
６４８　关于李暹及其西行＆鲁深
６４９　中西方历史上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余士雄
６５０　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向达
６５１　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唐锡仁
６５２　《马可波罗游记》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中西交通的贡献＆余士雄
６５３　略论鸠摩罗什＆殷鼎
６５４　鸠摩罗什年表考略＆陈世良
６５５　法显是怎样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谭吴铁
６５６　宋云行纪笺注＆（法）沙畹撰　冯承钧译
６５７　宋云丝路之行初探＆马曼丽
６５８　关于敦煌入宋云西行的几个问题＆杜斗城
６５９　杰出的学者玄奘＆吴晗
６６０　玄奘三藏之行脚与取经＆郑师许
６６１　论玄奘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石峻
６６２　唐玄奘和他的《大唐西域记》＆方循
６６３　试论玄奘法师出生、西行的年代问题＆郭元兴
６６４　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游侠
６６５　玄奘与印度佛学－－从玄奘在印所著的三论说起＆吕澂
６６６　苏祇婆其人＆何昌林
６６７　关于苏祇婆身世的一个假设＆杨宪益
６６８　康昆仑与段善本＆杨宪益
６６９　康昆仑与摩尼教＆杨宪益
６７０　来自中亚的北齐画家曹仲达＆吴焯

十、丝路考古

６７１　斯坦因与亚洲极中部文物＆周谷城
６７２　从出土文物看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李遇春
６７３　新疆考古概况－－中国考古专题报告＆向达
６７４　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武伯纶
６７５　“丝绸之路”新疆路段考古述略＆王炳华
６７６　新疆考古的发现＆黄文弼
６７７　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黄文弼
６７８　从新疆出土文物中探索新疆古代的科学技术＆穆舜英
６７９　新疆出土汉、唐丝品初探＆武敏
６８０　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绵和刺绣＆夏鼐
６８１　“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新疆博物馆
６８２　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它＆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
６８３　吐鲁番考古研究概述＆穆舜英　王炳华　李征
６８４　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竺敏
６８５　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武敏
６８６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几种唐代织锦＆陈娟娟
６８７　唐代西州墓中的绢画＆金维诺　卫边
６８８　试释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绢画伏羲女娲像＆刘凤君
６８９　吐鲁番出土丝织物中看唐代的印染＆武敏
６９０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棉花种植和纺织＆沙比提
６９１　唐代的复面和胡部新声＆武伯纶
６９２　复面、眼罩及其它＆王澍

６９３　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安家瑶
６９４　若羌县巴什夏尔遗址出土的古代玻璃器皿＆张平
６９５　新疆的石刻艺术＆王子云
６９６　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张学荣
６９７　麦积山石窟的分期＆董玉祥
６９８　丝绸之路东段的几处佛教石窟－－泾川王母宫与南北石窟寺考察＆马化龙
６９９　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阎文儒
７００　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分期问题浅探＆朱英荣
７０１　克孜尔新１窟试论＆许宛音
７０２　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郭沫若
７０３　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说明＆中科院考古所资料室
７０４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文物出版社
７０５　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郭沫若
７０６　新斯坦因在我国新疆丹丹乌里克、磨朗遗址所发现几块壁画问题的新评述＆阎文儒
７０７　龟兹五铢铸币的考古发现及其有关问题＆张平
７０８　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王朝文物＆夏鼐
７０９　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夏鼐
７１０　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夏鼐
７１１　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夏鼐
７１２　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夏鼐
７１３　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朱捷元　秦波
７１４　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夏鼐
７１５　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廷式金币＆夏鼐
７１６　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廷金币＆夏鼐
７１７　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夏鼐
７１８　中国发现的十五世纪威尼斯银币＆（意）毛·斯卡尔帕里
７１９　“和阗马钱”考＆夏鼐
７２０　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物概述＆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
７２１　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新疆博物馆考古队
７２２　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新出土墓志＆赵俪生　温玉成
７２３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黄文弼
７２４　杂胡官印考＆黄盛璋
７２５　唐代胡俑、骆驼与“丝绸之路”＆孙迟

十一、敦煌文化

７２６　汉魏时代之敦煌＆（日）槝恍壑　陈俊谋译
７２７　敦煌石室＆卫聚贤
７２８　敦煌莫高窟在东方文化上的地位＆王子云
７２９　敦煌艺术概论＆向达
７３０　谈敦煌艺术＆吴作人
７３１　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常书鸿
７３２　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贺昌群
７３３　敦煌佛教艺术和古代于阗＆孙修身
７３４　形象的历史－－谈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段文杰
７３５　莫高、榆林二窟杂考＆向达
７３６　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史苇湘
７３７　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阎文儒
７３８　敦煌壁画与佛经＆周一良
７３９　阿旃陀和敦煌－－纪念印度阿旃陀艺术１５００周年＆常书鸿
７４０　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段文杰

７４１　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金维诺
７４２　敦煌壁画祇园记图考＆金维诺
７４３　祇园记图与变文＆金维诺
７４４　敦煌乐舞资料的历史背景＆阴法鲁
７４５　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阴法鲁
７４６　敦煌壁画和唐代舞蹈＆董锡玖
７４７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艺术－－“丝绸之路上的乐舞之一”＆董锡玖
７４８　敦煌乐史资料概况＆牛龙菲
７４９　三件敦煌曲谱资料的综合研究＆何昌林
７５０　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陈庆英　端智嘉
７５１　试论“敦煌学”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和意义＆周丕显
７５２　敦煌遗书概述＆周丕显
７５３　敦煌经卷在中国学术文化上之贡献价值＆姜亮夫
７５４　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姜伯勤
７５５　敦煌、新疆古藏文写本述略＆陈践

十二、丝路研究综述

７５６　王国维与西北史地学＆钟兴麒
７５７　斯坦因和我国西北史地研究＆杨建新
７５８　斯坦因对东方学研究的贡献－－他关于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的研究论著与考察报告详目＆王冀青
７５９　斯坦因所考见之中西交通＆周谷城
７６０　读西域文明史概况之笔记＆赵浚波
７６１　日本的“丝绸之路”热＆童斌
７６２　丝绸之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日）长泽和俊著　冯佐哲译
７６３　法国对中国西域的研究＆耿升
７６４　科兹诺夫与哈拉浩特文化＆马曼丽